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状元卷.3.大清状元卷.上/杨寄林主编.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4
ISBN 7-5440-2223-4

Ⅰ.中… Ⅱ.杨… Ⅲ.科举考试-试卷-中国-清代 Ⅳ.D69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1351号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迎泽图小区2号楼)
山西太原今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30毫米 1/32 印张:27.625
字数:758千字 印数:1-2000册
定价:46.00元

读书中文网

中华状元卷编译委员会

学术总顾问　王树民　王炳照

主　　编　杨寄林　宋大川　金　山

副 主 编　陶黎明　祁振良　郑晏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明元　郑晏明　祁振良

孙继民　杨倩描　杨寄林

李岩松　李绍平　宋大川

金　山　侯真平　姜慧颖

陶黎明　董文武　蔺瑞生

目 录

◉ 大清状元卷 ◉

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1)
会试试题 ……(1)
殿试策问 ……(1)
熊伯龙　会试卷一道 ……(2)

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5)
会试试题 ……(5)
殿试策问 ……(5)
马世俊　殿试对策 ……(7)

清圣祖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 ……(16)
会试试题 ……(16)
殿试策问 ……(16)
缪　彤　殿试对策 ……(17)

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 ……(26)
会试试题 ……(26)
殿试策问 ……(26)
韩　菼　会试卷二道 ……(28)
殿试对策 ……(34)
朝考卷一道 ……(42)

清圣祖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 …… (46)
会试试题 …… (46)
殿试策问 …… (46)
陆肯堂 朝考卷一道 …… (48)
陈元龙 会试卷一道 …… (51)

清圣祖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 …… (58)
会试试题 …… (58)
殿试策问 …… (58)
王式丹 会试卷一道 …… (60)

清高宗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恩科 …… (64)
会试试题 …… (64)
殿试策问 …… (64)
卢文弨 殿试对策 …… (68)
朝考卷三道 …… (76)

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恩科 …… (81)
会试试题 …… (81)
殿试策问 …… (81)
胡高望 会试卷一道 …… (85)

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科 …… (89)
会试试题 …… (89)
殿试策问 …… (89)
戴衢亨 殿试对策 …… (92)
蔡廷衡 殿试对策 …… (100)
孙希旦 殿试对策 …… (107)

《1》微信专享免费转存 1000g 珍稀古籍古图、家谱大全、全国地理方志、现代易学、道学、佛学、玄学、中医、历史等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网盘的管控，资源可能会变动）。

《2》朋友圈持续免费分享各类珍稀绝版资源中。

《3》中医古籍、易学（术数）古籍、道文化古籍、天文地理学古籍、先进技艺类古籍、军事兵法古籍、古今中华武术大全、佛文化古籍；各类历史文献与绝版实用资源代找。

《4》两个微信都是我的号，只需添加一个号即可（两个号所发内容是一样的），资源不定期变动更新，你如果已经有我的微信，可以多看我朋友圈置顶评论同步更新进行了解转存。



或



古籍的内容往往会颠覆现有历史，非常珍贵值得研究。（举个例子：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在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获得的灵感。）古籍的内容也会更纯粹，更接近老祖宗的思维与智慧。

微信：laijy2222　　微信：laijy3333

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恩科……(115)
会试试题 ……(115)
殿试策问 ……(115)
汪如洋 殿试对策 ……(118)
江德量 殿试对策 ……(126)
程昌期 殿试对策 ……(135)

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144)
会试试题 ……(144)
殿试策问 ……(144)
钱 棨 殿试对策 ……(147)
陈万膏 殿试对策 ……(154)
汪学金 殿试对策 ……(162)

清高宗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170)
会试试题 ……(170)
殿试策问 ……(170)
茹 棻 殿试对策 ……(173)
邵 瑛 殿试对策 ……(179)
邵玉清 殿试对策 ……(185)

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科……(192)
会试试题 ……(192)
殿试策问 ……(192)
史致光 殿试对策 ……(196)
孙星衍 殿试对策 ……(203)
董教增 殿试对策 ……(210)

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恩科……(217)

会试试题 …… (217)
殿试策问 …… (217)
胡长龄　殿试对策 …… (222)
汪廷珍　殿试对策 …… (229)

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科 …… (238)
会试试题 …… (238)
殿试策问 …… (238)
石韫玉　殿试对策 …… (244)
洪亮吉　殿试对策 …… (253)
王宗诚　殿试对策 …… (262)

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 …… (272)
会试试题 …… (272)
殿试策问 …… (272)
潘世恩　殿试对策 …… (275)
陈　云　殿试对策 …… (286)
陈希曾　殿试对策 …… (295)

清高宗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恩科 …… (305)
会试试题 …… (305)
殿试策问 …… (305)
王以衔　殿试对策 …… (309)
龚　晋　殿试对策 …… (318)
潘世璜　殿试对策 …… (327)

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丙辰恩科 …… (337)
会试试题 …… (337)
殿试策问 …… (337)

赵文楷　会试卷三道 …… (341)
　　殿试对策 …… (347)
汪守和　殿试对策 …… (354)
帅承瀛　殿试对策 …… (361)

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 …… (368)
　会试试题 …… (368)
　殿试策问 …… (368)
　姚文田　殿试对策 …… (372)
　苏兆登　殿试对策 …… (379)
　王引之　殿试对策 …… (386)

清仁宗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 …… (394)
　会试试题 …… (394)
　殿试策问 …… (394)
　顾　皋　殿试对策 …… (397)
　刘彬士　殿试对策 …… (404)
　邹家燮　会试卷一道 …… (412)
　　殿试对策 …… (415)

清仁宗嘉庆七年(1802)壬戌科 …… (422)
　会试试题 …… (422)
　殿试策问 …… (422)
　吴廷琛　殿试对策 …… (426)
　李宗昉　殿试对策 …… (434)
　朱士彦　殿试对策 …… (441)

清仁宗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 …… (449)
　会试试题 …… (449)

殿试策问 …… (449)
彭　浚　会试卷三道 …… (453)
　　殿试对策 …… (460)
徐　颋　殿试对策 …… (468)
何凌汉　殿试对策 …… (475)

清仁宗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科 …… (483)
会试试题 …… (483)
殿试策问 …… (483)
吴信中　殿试对策 …… (487)
谢阶树　殿试对策 …… (494)
石承藻　殿试对策 …… (501)

清仁宗嘉庆十四年(1809)己巳恩科 …… (509)
会试试题 …… (509)
殿试策问 …… (509)
洪　莹　殿试对策 …… (514)
廖金城　殿试对策 …… (521)
张岳崧　殿试对策 …… (529)

清仁宗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科 …… (538)
会试试题 …… (538)
殿试策问 …… (538)
蒋立镛　殿试对策 …… (542)
吴毓英　殿试对策 …… (549)
吴廷珍　殿试对策 …… (555)

清仁宗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 …… (563)
会试试题 …… (563)

殿试策问 …… (563)
龙汝言 殿试对策 …… (567)
祝庆蕃 殿试对策 …… (574)
伍长华 殿试对策 …… (581)

清仁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丁丑科 …… (589)
会试试题 …… (589)
殿试策问 …… (589)
吴其浚 殿试对策 …… (593)
凌泰封 殿试对策 …… (600)
吴清鹏 殿试对策 …… (607)

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 …… (615)
会试试题 …… (615)
殿试策问 …… (615)
陈 沆 殿试对策 …… (619)
杨九畹 殿试对策 …… (626)
胡达源 殿试对策 …… (633)

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 …… (641)
会试试题 …… (641)
殿试策问 …… (641)
陈继昌 殿试对策 …… (645)
许乃普 殿试对策 …… (653)
陈 鑾 殿试对策 …… (660)

清宣宗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 …… (668)
会试试题 …… (668)
殿试策问 …… (668)
戴兰芬 殿试对策 …… (673)

郑秉恬　殿试对策 …… (681)
罗文俊　殿试对策 …… (689)

清宣宗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 …… (699)
会试试题 …… (699)
殿试策问 …… (699)
林召棠　殿试对策 …… (703)
王广荫　殿试对策 …… (712)
周开麟　会试卷一道 …… (720)
　　殿试对策 …… (723)

清宣宗道光六年(1826)丙戌科 …… (732)
会试试题 …… (732)
殿试策问 …… (732)
朱昌颐　会试卷一道 …… (736)
　　殿试对策 …… (739)
贾　桢　殿试对策 …… (747)
帅方蔚　殿试对策 …… (756)

清宣宗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 …… (765)
会试试题 …… (765)
殿试策问 …… (765)
李振钧　殿试对策 …… (769)
钱福昌　会试卷三道 …… (776)
　　殿试对策 …… (784)
朱　兰　会试卷三道 …… (790)
　　殿试对策 …… (797)

清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恩科 …… (805)
会试试题 …… (805)

殿试策问 …… (805)
吴钟骏 殿试对策 …… (809)
朱凤标 殿试对策 …… (817)
季芝昌 殿试对策 …… (824)
清宣宗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 …… (833)
会试试题 …… (833)
殿试策问 …… (833)
刘 绎 会试卷三道 …… (837)
殿试对策 …… (845)
曹联桂 会试卷二道 …… (852)
殿试对策 …… (858)
乔晋芳 殿试对策 …… (865)

◉ 大清状元卷 ◉

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殿试策问

[顺治六年四月十三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朕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音语未通,意见偶殊,畛域或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自兵兴以来,地荒民逃,赋税不充。今欲休养生息,使之复业力农,民足国裕。何道而可?迩来顽民梗化,不轨时逞。若徒加以兵,恐波累无辜,大伤好生之意;若不加以兵,则荼毒良民,孰是底定之期。今欲使之革心向化,盗息民安,一定永定。又何道而可?尔多士经术济世,直陈无隐。务期要言可行,不用四六旧套。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商汤时刻在盥洗盘器上的铭文说:如果一天可以更新,就天天更新,再每天不间断地更新。

天下人都会称许你的仁德。实践仁德全靠自己,能依靠别人吗?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是用来奉承天道的作法。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自古以来帝王都是把天下当做一家。皇帝我自从入主中原以来,对满人和汉人从来没有当两样看待,但是远近的百姓,还是未能形成同一的风俗。难道是满人崇尚质朴,汉人崇尚华美,习俗有所不同吗?言语相互不懂,看法偶有区别,两方面的界限还没有消除吗?现在想把满人和汉人融和为一体,使他们能够同心合力,非常高兴地亲密相处毫无隔阂。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食物是人民的头等大事。自从战争发生以来,田地荒芜,人民逃难,田赋和税收都不充足。现在想休养生息,使人民恢复常业努力耕作,使人民富足国家富裕。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呢?近来刁顽之民顽固而不服教化,叛乱时有发生。如若派军队加以镇压,恐怕连累无辜的百姓,大大地损害爱惜生灵的原意;如果不派军队加以镇压,便会使他们继续残害良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平定?现在想使这些顽民洗心革面归服朝廷,达到盗贼平息人民安定,不但现在安定而且永远安定。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点呢?你们这些众多的贤士用你们学到的经学来救世,可以直率地陈述自己的治世良策,不要有什么保留。务求讲些切要可行的话,不要用过去四六文的陈词滥调。皇帝我将要亲自阅览你们的文章。

熊伯龙　会试卷一道

熊伯龙(?~1669)　字次侯,号塞斋,晚号钟陵,汉阳(今武汉市

汉阳)人。顺治六年(1649)榜眼。后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屡司考选文士之权柄,均能得士。其制举文,雄浑雅健。与同科状元刘子壮齐名,时号熊刘。古文亦朴茂,著有《无何集》、《贻谷堂诗文集》。

汤之盘铭　一章

传者以新民望天下,而稽古以示其极焉。盖君子将偕民于至善,而可苟焉以为新乎?商、周之间,其极可睹矣。且君子诚得掺天下而为所欲为,讵不欲举斯民于三代之隆哉?而考其功用之所存,恒令人有不醇不备之感焉。则未尝深求古哲王之意,而积吾学以通之也。

夫言志莫患乎无征,而立法必崇其所尚。商之民,汤治之者也。周之民,康叔分理之,文王始靖之者也。以彼道德一,风俗同,后之君子何尝不流连感慕于其际乎?乃其道固未易易也。读盘铭而知小物之克勤,不敢忘焉。日新又新,其不遽求乎民也如此。读《康诰》而知一方之淫酗,不可弃焉。新而言作,其不因任乎民也如此。读《诗》而知怙西土,燕皇天,其道光明焉。旧邦新命,其永命于民也如此。此以见天下之大可为而治,天下之诚不可以苟焉而已也。

后之君子则何如哉?自其本而言之,建中以为绥猷之始。万几之中,无一瑕焉,而后即安。非自劳也,新之先实有是不易之理,而君子不敢不及也。以全天德,以体王道,岂细行欤?自其末而言之,锡福以昭荡平之应。万人之聚,无一愚焉,而后即安。非动众也,新之中实有是当然之事,而君子不敢不勉也。商俗之骏厉,周道之尊亲,岂小康欤?《诗》、《书》所载,历世所传,其心则一人之心也,其道则天下之道也。用而必至于极也,君子犹夫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与?自非然者,世仍商、周之世,学非商、周之学,后之君子不徒览古训而流连也哉?

解释经文的人把民德的更新来期望天下,于是通过考察古代来说明更新民德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君子既然将要偕同人民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难道可以随意就把什么当做"新"的标准吗?在商、周时期,新的最高标准是可以看得到的。况且君子将要掌握天下而做他想

要做的事，岂不想把这些人民提高到夏商周三代时最高的道德境界吗？但考察现存教化的功效，常常令人有不精纯不完备的感觉。这是没有深入探求古代贤明君主的用意，而积累自己的学识来贯通它呀！

谈到治理国家的大志无不担心没有证据，而立法必须推崇那些值得重视的东西。商代的人民，是汤王治理好他们。周代的人民，是康叔姬封分治了殷商的遗民，但仍是文王开始把周民治理好的。因为商、周时代道德划一，风俗相同，后代的君子何曾有不留恋感动和倾慕于那些时代的呢？这因为商、周实行的治理办法是不容易改变的成功经验。读盘上铭文知道在小事上能勤劳不息，不敢忘记它。每天要求更新再不断更新，他们是这样不急切地去要求人民道德一下子更新。读《康诰》后知道对一个地方的过分酗酒的人们，不应该抛弃他们不管。对道德的更新要求振作起来去做，他们是这样地不因循放任人民。读了《诗经》后知道周人依赖周部族西方的故土，宴飨上天神灵，他们推行的治国之道昌明盛大。使旧日的国家获得新的生命，他们是这样地使人民获得长久的美好生活。由此可见天下虽大可以努力去做使它得到治理，而对待天下是绝不可随心所欲的。

后代的君子有哪些方面和他们相似呢？从它的根本方面来说，建立中正之道作为安定计划的开始。在成千上万的繁杂政事中，没有一件事的处理有差错，从此以后就可安定。这不是自寻劳累，在更新之前，确实有这个不可更改的道理，君子是不敢不这样做的。以此保全天的德性，以此来承继王道，这岂是小事吗？从它的小的方面来说，应赐福给人民以显扬王道坦平的实现。在万人聚居的地方，没有一人是愚昧的，从此以后就可安定。这不是无故劳动大众，在更新当中确实有这种必须要做的事，君子是不敢不勉力去做的。商代风俗的良好严肃，周代王道的尊奉老人，难道只是社会小安的体现吗？《诗》、《书》上所记载的三代事迹，历代所传颂的王道，就其心说只是一人的心，就其道说则是天下的道。运用它时必须要贯彻到极致，君子就像那古代想在普天下昌明美德的人一样吧？倘若不是这样，时代仍是商、周的时代，所学的内容却不是商、周的学说，后代的君子不就是在空看古先王的遗典而白白留恋它们吗？〔蔺瑞生译〕

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殿试策问

[顺治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帝王平治天下,开创守成,其道并隆,缔造维艰,缵承匪易。政治修明,群黎安遂,文德覃敷远迩,武功克奏敉宁,乃可祗绍先猷,茂登上理。朕以冲龄诞膺丕绪,仰惟太祖太宗肇开大业,逮我世祖式廓鸿图,亦既治定功成,显垂谟烈矣。朕兹欲绍述祖宗,必何如而后可以乂安海宇欤?继治之道,首重典章。今纪纲法度虽已彰明,然因革损益,岂无顺时制宜者。何以酌定章程,以为万世之规欤?闾阎愉悴,视吏治污隆。何以示之激扬,以奠民生欤?风俗淳漓,由人心邪正。何以使之朴诚,以敦教化欤?至于底定四方,赖师武臣力,然必赏明罚当,而后可以鼓励勋庸。凡行间功罪,宜如何清叙,用昭劝惩欤?尔多士蕴怀有素,各抒所学,毋泛毋隐,详著于篇,用裨维新之治。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知道了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然后才有确定的方向;方向确定

了,然后才能够宁静下来;宁静下来了,然后才能够居处安定;居处安定了,然后才能够精密地思虑;精密思虑了,然后才能够在达到最高目标方面具有收获。

老师关于文献典籍方面的学问,能够听得到。老师讲论人的本性和上天定律,却听不到。

整治好他们的田地,对他们减轻税收,可以让百姓富起来。按照时节来食用,依据礼法来消费,财物是用不完的。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帝王治理安定天下,开创基业,保持住已有的成绩,这两个方面的做法都应该叫它们很有气势,可创建国家却相当艰难,继承大业也不容易。只有政治修明,众百姓安定,礼乐教化遍及远近,军事胜利实现了抚定各地,才能够恭敬地承接起先王的大谋略,隆盛地步入最美好的治理状态。皇帝我凭借幼小的年纪承当起帝位传续的重托,仰赖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首先创建起大业,延续到我大清世祖皇帝扩展鸿图,已经是治理确定下来,大功告成了,显现并垂示那谋略和功业了。现在皇帝我准备对列祖列宗的丰功伟绩加以继承和发扬,必定要去怎样做,然后就可以使全天下更安定呢?继承前代治绩的办法,首先应当重视典章制度。如今朝廷纲纪和国家法度虽然已经显而易见了,可是在承袭与变更、减少和增加方面,哪里会没有需要顺应时势来制定更为合适的呢?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去酌定规章条例,把它们作为永远遵行的准绳呢?民间众百姓愉快还是心焦,完全以官吏作风和治绩的好坏为转移。应该怎样向官吏表明朝廷激浊扬清,去稳定住民众的生计呢?社会风尚淳厚还是浇薄,取决于人心的邪僻还是纯正。应该怎样使它变得质朴诚实,去促进教化呢?至于平定天下四方,正依靠军队和将领的力量,然而一定要赏赐有理,处罚得当,然后能够鼓励人们建立功勋。凡属军事活动中的功罪,应当怎样去进行清整和排定,来显示激励和惩治呢?你们这些读书人胸中蕴含和怀有的学识已经在平常积累得很多了,各自抒发

所学到的东西,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讳,把它详尽写在答卷上,来对国运更新的治理有所补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览。

马世俊　殿试对策

马世俊(生卒年不详)　字章民,一字甸臣,溧阳(今属江苏)人。顺治十八年(1661)状元。官至翰林院侍读。性情朴实,及第后骑一蹇驴,命老仆人携持宫袍随后而行,被士林传为佳话。对策中反对满汉之分,颇得时论赞许。擅长书法绘画,有"二右"(晋王羲之、唐王维)之誉。工诗、诗风以清正见长。著有《匡庵集》。

臣对:臣闻治天下者,当全盛之时而为善建不拔之计,非破庸俗之论,以鼓豪杰之心,则其道无由。昔唐太宗与房、魏论创业守成之难易,而曰与我取天下者,知创业之难;与我安天下者,知守成之难。《周书》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天下正所谓兼创垂之盛而持危乱之防者也。人才不可谓不盛,而未尽所以取才之方;吏治不可谓不肃,而未尽所以驭吏之道;惩贪不可谓不严,而未尽所以止贪之术。俗尚亦数变矣,而未尽所以靖俗之谋;兵制亦甚精矣,而未尽所以弭兵之要。故有谓今天下为已安已治,遂可晏然无事者,皆庸俗人之论也。臣窃尝见夫古来全盛之时,不可以数遇,而往往弊之所伏,即伏于其盛。而又窃尝慕夫贾谊之策,陆贽之议,苏轼之对,皆能举一代之治,而断其何以治,何以乱,何以治而不乱,何以乱而复治。盖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以应之。臣有志焉而欲陈久矣。今当拜献之始,岂可自诬其所学乎?

钦惟皇帝陛下,翠妫承符,紫微正象。协运而兴辛壬,肇四日之祥矣,拟乎敬承之世,岂止四百载,而颂吾君之嗣,实赖启贤;体元以御子丑,正三才之统矣,媲乎中乂之朝,何啻三十世,而考昭子之刑,咸称诵圣。克艰厥后,敦茂质于冲龄,汝翼汝为,汝明汝听,济济然见安止弼直之休;无竞惟人,树弘规于首出,有辅有弼,有疑有丞,秩秩然成无为至正之范。今且晋此多士,询以纶言,岂非已治而益求其治,已

安而益求其安者欤?《礼记》曰:文王以文德,武王以武功。《汉书》曰:功莫大于高,德莫大于文。周之兴也先文,汉之兴也先武,我国家文武并济,以有天下。太祖之肇基启祚,太宗之积功累仁,至于世祖以沉毅之姿而兼以明断之识,以恢廓之度而兼以缉辑之才,一年而平兖豫,一年而下江淮,一年而定荆襄,一年而檄巴蜀,不数年而五岭望风,滇南稽颡,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盛也。

天下文武之臣,莫不愿毕志竭忠以待用。人才亦已辐辏矣,而臣独谓未尽所以取才之方者,何也?古者人才既用,而尝有未用者存于既用之外。故《尚书》曰:有三宅,有三俊。而《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今天下岩野川泽之中,其隐然备公辅之器者谁耶?泛然而取之,泛然而应之,又泛然而任之。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应之者不知其何以应,任之者不知其何以任。欲兵则兵,欲刑则刑,欲钱谷则钱谷。古之圣人,一人止任一事者,今则以一庸人兼之而有余。古之圣人,终身不易其官者,今则一旦应之而亦无不足。是亦理之所难信也。今即不必用九品四科之制,而州郡之荐举,将帅之征辟,似亦不可少也。若乃掣签而使,按资而升,贤愚同科,茫然无据,彼论而后官,量而后人,独不可稍存其万一乎?

程才莫先于计吏,而臣谓未尽所以驭吏之道者,何也?古者亲民之官,莫重于二千石,有以公卿而为之者。唐宰相出为刺史,李泌、常衮皆然。若夫守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今之郡县官,大抵如传舍,与民情漠不相接。监临使者,顾盼威动,所荐未必贤,所纠未必不肖。其趋谒勤者即为才,其应对捷者即为敏,则何若专重郡县之责,外听责成于督抚,内听考核于铨部,而用唐虞三载之法以黜陟之!彼监临之所荐所纠,不亦可以已乎?且今天下可汰之吏,亦甚多矣。势有不能尽汰者,虑庸人之无所容耳。夫不虑庸人之无所见,而反虑庸人之无所容,此从来之积弊也。即以今日之计吏言之,亦莫亟于惩贪矣。而臣谓未尽所以止贪之术者,又何也?凡人之溺于赇赂而不能脱者,大抵有田园妻子之见,以惑其中也。故有昔居环堵,而今则拥甲宅;昔泣牛衣,而今则列姬姜;昔无半顷,而今则连阡陌。诘其所从来,不贪何以有是耶?诚能稍限其田宅媵妾之数,而为之禁。其有敢于逾禁者,即坐

以僭肆不敬之罪;彼有私金于筐篚,而受贪墨无耻之名。虽愚者亦必自笑其所为矣。

臣尝见败坏风俗之事,必自卿大夫开之,而后愚民从而效之。此臣所谓靖俗之谋犹有未尽者。巫风淫风,有一于身,家必丧。今之卿大夫,多为淫靡无益之事,煽惑愚民,而后倡儿舞女之装,宝马画船之饰,探丸跳剑之侠,棘猴刻楮之巧,靡所不至。甚且富者必有术以求其贵,贵者必有术以求其富,而圣人驭富驭贵之权,皆何所施乎?今富者之必贵,既有严谴以禁之;而贵者之必富,独相习而以为固然。如是而欲风俗朴厚,教化兴起,不可得也。且夫天下驯服于教化而不能变者,无事则赖文,有事则赖武。今日师武臣之力,亦可谓肤功毕奏矣。而臣独谓用兵虽精,未尽所以弭兵之要,此又非无说也。处今日而欲如古者遂人治野之法,鄙长旗鼓之节,藏兵于民,则诚迂;然必使兵与民习,民与兵习,一旦有事,毋论兵勇于斗,而民亦有各护其田畴庐井之心,此不战而自胜者也。今则兵之所轻者民,而民之所畏者兵,一旦有事,则民自为民,兵自为兵。天下未有民自为民、兵自为兵而能久安长治者也。宋艺祖留意赏罚,平蜀之役,赏曹彬而罚全斌,夫亦赏其与民相安,罚其与民相扰者而已矣。行间之功罪,即以此定之可也。

凡此者,皆臣所谓当已安已治,而呶呶焉为善建不拔之计者也。虽然,治天下有本有末,得其本而治之,则无不治矣。所谓本者何?即制策所云纪纲法度是也。司马相如曰:风轨简易、易遵也;淇恩庞鸿,易丰也;垂统理顺,易则也;宪度著明,易继也。尝取历代之典章而考之,其可得而损益者,不过质文之异其尚耳,不过隆杀之异其制耳,不过宽猛竞绿之异其用耳。若夫纪纲法度者,不可得而损益者也。纪纲法度治,则吏治以肃,民俗以淳,文德於焉诞敷,武功於焉赫濯,创之有其基,而守之亦有其渐者也。纪纲法度乱,则吏治以乖,民俗以坏,文德伤于优游,武功失于争竞,创不可以宪后,而守亦不可以承前者也。故曰纪纲法度者,不可得而损益者也。

我国家之典章,至简便而至精详,至严明而至仁厚,似无以加矣,而臣尤有进者。唐贞观时,天子问山东、关中之同异,而其大臣曰:王者以天下为家,不宜示同异于天下。裴度既平蔡,即用蔡人为牙兵,而

曰蔡人即吾人。今天下遐迩倾心，车书同轨，而犹分满人、汉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诚能尽捐满汉之形迹，莫不精白一心，以成至治，则赞赞者皆皋、益之选也，桓桓者皆方、召之俦也，将见江南静横海之戈，而冀北息桃林之乘，即以跻于唐虞三代之盛，亦何难乎？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治理天下的人，正当全盛阶段而致力于精善地定立下国家永远不会被动摇的大谋略，如果不破除掉平庸的论调，来鼓舞起豪杰的心志，就没有什么途径能够达得到。从前唐太宗和房玄龄、魏征讨论创业和守业哪个方面困难，哪个方面容易，就说与我夺取天下的大臣，最了解创业的艰难；而与我安定天下的大臣，又最了解守业的艰难。《尚书》中的《周书》里也说过：像那前代的大谋略，是在国家还没动乱的时候就制定好治理的方案，在国家还没危险的时候就保定国家。当今的天下，正属于人们所说的那种情形：开国和垂示后代的兴盛劲头同时存在，但又必须持守住对危险动乱的防范大计。人才不能说不雄盛，可还没有把选取人才的办法运用得完全又彻底；官吏的作风和治绩不能说不肃正，可还没有把驾驭官吏的办法运用得完全又彻底；惩治贪污不能说不严厉，可还没有把制止住贪污的办法运用得完全又彻底。社会风尚也改变过好几次了，但还没有把那致使社会风尚归向宁静的谋略施用得完全又彻底；兵制也非常精善了，但还没有把那致使用兵停止下来的要道施用得完全又彻底。所以有的人说什么当今天下已经属于安定和大治了，于是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都纯粹是平庸人的论调啊！臣下我曾经私下观察到自古以来全盛阶段根本就碰不上几回，但往往弊病潜伏，恰恰也就潜伏在全盛的时候。同时又曾私下仰慕西汉贾谊的治安策，唐朝陆贽的议论和北宋苏轼的对答，他们全都能够列举一个朝代的治理要务，并且判定出为什么就得到了治理，为什么就出现了动乱，为什么就得到了治理却不出现动乱，为什么就出现动乱却又重新得到了治理。这大致上是因为一个时代的治理，必定会有一个时代的人才去适应它。臣下我怀有志向，打算做陈述已经时间很长了，现下正赶上拜见君主应

当先向君主有所献呈的时候,怎能自行欺骗自己所研习的学问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就像当年的黄帝在翠妫川承受到神鱼降赐的灵图,紫微天宫显现出正位的兆象。与时运相一致,就如同大禹在辛日娶妻,历经壬、癸、甲三天又去治水而由此兴起,开示出这前后四天使儿子启呱呱坠地的祥兆了,而同夏启恭敬承顺父业的时候相比拟,又哪里仅仅像夏朝那样存在四百年?可当时的诸侯却都称颂我那君主大禹的儿子,自动归他管辖,实际上也依仗夏启真贤明。体察那元气的初始形态,就如同周武王在建丑之月的甲子那天已经灭商建立起周朝,把天、地、人的统系确定下来了,而同周朝治理最为鼎盛的朝代相媲美,又哪里仅仅像周朝那样传续了三十个天子?可考察当时给儿子康王做出光辉的榜样,也全都赞颂成王姬诵真圣明。陛下付得出帝王该付出的艰辛劳苦,从幼小的年纪就加深加厚那卓异的天赋,而臣僚们又辅助陛下抚有民众,替陛下把力量贯彻到四方各地,为陛下辨明礼服的等级,给陛下听取音乐得失和下面的意见,济济一堂地呈现出了君主谨慎、辅臣正直的美好局面。最强盛只在得到贤才,而在刚刚登上帝位的时候,就确立起宏大的朝规,既有左辅,又有右弼,既有前疑,又有后丞,井井有条地形成了无为而治、极其严正的典范。如今又把我们这些读书人招到殿廷上,用圣帝明王的深远话语来做询问,这难道还不是已经得到了治理,又谋求进一步的治理吗?已经实现了安定,又谋求进一步的安定吗?《礼记》上说:周文王凭借礼乐教化而征服天下,周武王依靠军事胜利建立国家。《汉书》中讲:功业谁也没有能比汉高祖更高的了,仁德谁也没有能比汉文帝更大的了。周朝的兴起,是把礼乐教化放在前面;汉朝的兴起,是把军事行动放在前面。我们国家却是礼乐教化和军事行动相互补充,拥有天下。太祖奠定基业,开启国运,太宗又扩大武功,积累仁德,到了世祖那里,凭借深沉坚毅的英姿,再加上圣明决断的特识;依靠恢宏广阔的器度,再加上安抚集聚的才干,一年就平定兖州和豫州地区,一年又攻下江淮地区,一年又平定荆襄地区,一年又向巴蜀地区发出前来归顺的檄文,没过几年就五岭地区归降,滇南地区归服,这真是天地开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雄盛气象啊!

全天下的文臣武将，没有谁不甘愿献出全部志向、竭尽忠诚来等待任用，人才也已经都聚集在周围了，可臣下我偏偏认为还没把选取人才的办法运用得完全又彻底，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古代对人才已经任用以后，经常还在已经任用的人才之外储存着尚未加以任用的人才。所以《尚书》里说：设有政务官、民事官和司法官，选有确能胜任这三类官职的优秀人才。而《诗经》中也说：雄赳赳的武士，是王公诸侯的屏障。如今在天下山林原野和江边湖畔居住的人们当中，确实内在地具备充任公卿辅臣的才干的人，到底该是哪一个呢？一古脑儿地选取他们，又一古脑儿地应合朝廷的选用，朝廷又一古脑儿地委任他们。去选取的人闹不清根据什么选取他们的，来应征的人闹不清自己凭仗什么来应征的，做委任的人闹不清依凭什么去委任他们的。想让他带兵就让他带兵，想让他掌管刑法就掌管刑法，想让他办理钱粮就办理钱粮。古代的圣人还只是一个人负责一种事务，如今却让一个平庸的人把所有的事务都负责起来还绰绰有余。古代的圣人一辈子都不改换原任的官职，如今却一旦应合上也没有不胜任的了。这也纯属从常理上都叫人难以相信的。如今不一定必须采用九品官人法和四科用人制，但州郡的推荐举用，将帅的征召聘任，似乎也是不能缺少的。至于通过抽签决定谁去出任什么官职，按照资历辈份予以升迁，致使贤能人和愚笨人搅合在一起，茫然没有任何依据。针对这种状况，古代通过筛选，然后再授官；经过衡量，然后再入朝，唯独就不能稍稍留存它那万分之一的做法吗？

衡量人才没有什么能比考核官吏更占首位的了，可臣下我却认为还没把驾驭官吏的办法运用得完全又彻底，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古代和民众离得最近的官员，没有哪一种能比太守更重要的了，甚至有让公卿去出任这种官职的情况。唐朝的宰相到地方上去担任刺史，李泌、常衮就都是这样。至于太守和县令，更和民众离得近，决不能不慎加择用。如今的郡县官，大致上就如同暂且借个地方住，与百姓的想法和做法根本就远远不接触。那些由朝廷派来负责监察的官员贪求贿赂，滥发淫威，他们向朝廷所荐用的人，不一定就贤能；他们向朝廷所弹劾的人，不一定就庸劣。那些趋附拜谒很殷勤的人，在他们的

眼里就成为能干的官员;那些当面对答很有一套的人,在他们眼里就成为机敏的官员。既然如此,哪里比得上专门加重郡县官的权限,在地方上听凭总督或巡抚的政绩督责,在朝廷上听凭吏部的考察验核,采用唐尧虞舜时代每隔三年进行考核的办法,对他们予以罢免或提升呢!由监察官员负责荐举和弹劾的那套做法,不也是可以停止行用了吗?况且如今天下可以淘汰掉的官员,也真是太多了,却有无法全都淘汰掉的情势,原因只在于担心平庸人没有去处罢了。不担心平庸人没有识见,反而却担心平庸人没有去处,这是自古以来的积弊啊!就拿目前考核官吏来说,也没有哪一条能比惩治贪污更为紧迫的了。而臣下我又认为还没把制止住贪污的办法运用得完全又彻底,这是为什么呢?世人沉溺在贿赂这种罪恶勾当中却摆脱不出来,原因大致是怀有田产房产和妻室儿女的个人欲念,这种欲念在骨子里起着使人惑乱的作用。所以就产生了以下的现象:从前住在十分破旧的房子里,如今却拥有了第一等的豪华宅第;从前由于家境贫寒而伤心落泪,如今却家里美女成群;从前没有半顷田地,如今却田连阡陌。追查这些东西的来源,不贪污又会通过什么途径获取到这一切呢?确实能够稍略限制一下官员们拥有的田地住宅和姬妾的数目,给他们做出防禁的规定来。对胆敢超过防禁规定的人,立刻就按肆意超过等级规定纯属大不敬的罪名予以惩办;对那些家中藏有来路不明钱财的人,就让他戴上贪污无耻的恶名。这样一来,即使是愚昧的人也必定会对本人所干的勾当自己感到太可笑了。

臣下我曾经观察到败坏社会风尚的事情,准保是由公卿大夫开头,然后愚蠢的百姓就跟在后面加以效仿。这也就是臣下我所说的还没有把那致使社会风尚归向宁静的谋略施用得完全又彻底啊!请神祭祷的风气和奢侈淫靡的风气,有一样沾染到自家的身上,他那个家庭必定就会丧亡。如今的公卿大夫,大多干那淫靡而无任何益处的事情,煽动迷惑那些愚蠢的百姓,然后歌童舞女的装扮,宝马画船的修饰,杀人报仇和耍剑这类游侠的举动,在棘刺的尖端雕刻母猴以及在楮叶上雕刻国君图像这类要弄奇巧的手艺,就没有不去干的了。而且有钱的人必定会想出奸招来谋取到官职,当官人的必定会想出毒计

来谋取到大量的钱财,可圣人驾驭有钱人和驾驭当官人的灵活做法,都该在哪里去得到施用呢?如今对有钱人必定会谋取到官职,已经定立有严加斥退的条规来做防禁了,可对当官的人必定会拥有大量钱财,却偏偏习以为常,认为本来就该那个样。像这样却想使社会风尚变得质朴淳厚,教化兴行起来,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况且天下逐渐归从到教化的范围以内来而又根本改变不了的情形是,天下没有突发的事变,就依仗文教;出现突发的事变,就凭借武力。如今军队和将领所发挥出的力量,也可以称得上大功全都奏报上来了。而臣下我偏偏认为用兵尽管很精妙,可还没有把那致使用兵停止下来的要道施用得完全又彻底,也不是没有说法的。处在当代,却想照搬古代遂人官总掌国都郊外一百里到五百里以内的辖区政务的做法,鄹长率领本部百户人家自带旗鼓兵器服兵役的规定,确实就显得迂阔而不切合实际了。然而也必须要让部队与老百姓彼此很熟悉,老百姓与部队也很熟悉,一旦发生突然的变故,姑且不必说部队要在战斗方面特勇敢,就连老百姓也怀有各自保护自家田地和住宅水井的心愿,这是不展开战斗却自动就取得胜利的地方啊!如今部队轻视的对象却是老百姓,而老百姓惧怕的对象又是部队,一旦发生突然的变故,也就老百姓归老百姓,部队归部队了。可天下却不存在着老百姓归老百姓、部队归部队而能长治久安的情况啊!宋太祖对赏罚很留意,平定后蜀的战役,就赏赐曹彬而处罚王全斌,这实际上也就是赏赐那些与老百姓一起保持安定的人,处罚那些对老百姓造成骚扰的人罢了。凡属军事活动的功罪,全照这样来做裁定也就行得通了。

以上所对答的问题,都是臣下我所说的时值已经安定和已经大治之后,需要急切地致力于精善地定立下国家永远不会被动摇的大谋略啊!尽管这样,但治理天下具有根本所在,又具有末节所在。获取到根本所在而治理好它,也就没有什么不能治理好的了。所谓根本所在又是指的什么呢?也就是皇上制策中所讲的朝廷纲纪和国家法度啊!西汉司马相如曾说过:各种规定简要又很平常,就容易让人遵守;深厚的恩惠广大宽远,就容易让人有活动的余地;垂示统系而道理顺当,就容易让人效法;朝纲国法非常明确,就容易让人沿用。臣下我曾

经择取历代的典章制度进行考察,其中能够予以减损或增加的,不过是崇尚质朴还是崇尚文采能有所区分罢了,不过是把这项制度定得细密些或将那项制度定得简略些能有所区分罢了,不过是施行得宽大些或严厉些、缓和些或急切些能有所区分罢了。至于朝廷纲纪和国家法度,是决不可以进行减损或增加的东西。朝廷纲纪和国家法度得到了整顿,官员的作风与治绩也就肃正了,民间的社会风尚也就淳厚了,礼乐教化于是也就广泛施布开了,军事胜利于是也就显赫鲜亮了,创业有那根基而守业有那逐步实现的途径了。朝廷纲纪和国家法度出现混乱,官员的作风与治绩也就倒行逆施了,民间的社会风尚也就败坏了,礼乐教化也就在贪求享乐上出毛病了,军事胜利也就在争功抢功上有问题了,创业却不能给后世树立标竿而守业也做不到继承前代了。所以说朝廷纲纪和国家法度是决不可以进行减损或增加的东西啊!

我们国家的典章制度,最为简便又极其精详,最为严明又极其仁慈宽厚,看上去是没有什么能够再加以补充纠正的了,可臣下我还有要进呈的意见。在唐朝贞观时期,天子询问崤山以东地区和函谷关以西地区的相同处和不同处,而他手下的大臣却回答说,帝王正把天下做为自己的本家,不应该向天下显示出对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的不同态度来。裴度平定蔡州以后,马上就任用蔡州人充当手下的直系部队,并且声明蔡州人也就是我的人。如今全天下远方和近处都一心归服,车辆的宽度都一样,文字也统一使用同一种文字,可仍划分满人、汉人的名分,这恐怕不属于国家全盛时代所应实行的事体啊!确实能够把满人、汉人特作区分的种种表现全都抛到一边去,没有谁不纯洁得就只有一个心念,去形成最高的治理局面,那就会辅助朝政的人,都是虞舜时代皋陶、伯益那样的人选了;驰骋疆场的人,都是西周方叔、召虎那样的武将了。将会看到江南号称横海的战船不出动,冀北的战马投放在桃林而不跨乘了。随即步入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兴盛状态,又有什么困难的呢?臣下我本是民间一个普通的百姓,属于刚要被朝廷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侵凌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清圣祖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

会试试题

唯天下至诚能为化论

殿试策问

[康熙六年三月二十日，策试天下贡士] 制曰：朕惟帝王统一寰区，必任用贤才，澄清吏治，使国有丰亨之象，民饶乐利之休，而后庶政毕修，群生克遂，登上理焉。朕以冲龄仰承天眷，嗣缵祖宗鸿业，夙夜冰兢，期于俊乂充廷，廉能著绩，国计日盈而闾阎不扰，数年于兹矣。乃图治弥殷，厥效未睹，其故何也？国家简任贤良，以共襄治化，必如何而后用当其才，人称其职欤？迩来贪风未息，诛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至不肖有司私派横征，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欤？至于国用浩繁，繄惟正之供是赖，乃催科不善者每昧于抚字。兹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其道安在？尔多士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帝王统一整个天下，必定要任用贤才，把官吏的作风和治绩搞得纯纯正正，使国家呈现出盛大亨通的景象，民众有很多自己感到满意和自己得到自己利益的地方，然后各种政务才会全都得到修明，所有的百姓得以实现各自的愿望，步入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皇帝我凭借幼小的年纪，仰赖并承受到皇天的眷顾，继承列祖列宗的宏大帝业，从早到晚如履薄冰，兢兢业业，期望达到优异的人才站满朝廷，廉洁贤能的臣僚建立起突出的政绩，国家财政一天比一天充裕，而民间却不受到赋税征收的骚扰，对这种局面已经关注好几年了。可是谋求大治越来越殷切，而那实际效果却没有看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国家挑选任用贤良，来共同协助治理和教化，一定要去怎样做，然后就任用恰恰切合他的才能，每个人都胜任自己

的职务了呢?近来贪污的风气并没有止息下来,对下面的官吏索取钱财物品,用来供给上面的官员享用,于是恶化到政府部门的不贤良官员擅自摊派,强行征收,致使老百姓的生计变得越来越困顿,该用什么办法就能革除掉这种积弊呢?至于国家的财政支出浩大繁多,也只应依靠法定的赋税征收来解决,可那些催缴赋税却做得很差的人常常对安抚百姓的事情一点儿都闹不明白。如今想使民间免掉被催逼的痛苦,而国家用项又经常充裕,具体的好办法又该在哪里呢?你们这些读书人要详尽恰切地做陈述,皇帝我准备亲自观览。

缪彤　殿试对策

缪彤(生卒年不详)　字歌起,吴县(今属江苏)人。康熙六年(1667)状元。官至翰林院侍讲。后因亲丧归乡,淡于仕宦,闭门不预时事,乃创建三畏书院,刊印明人曹端《家规辑略》、蔡清《密箴》、刘宗周《人谱》,据以教诲求学者,造就成才甚多。其享年71岁。著有《双泉堂集》。

臣对:臣闻帝王之统御天下,而绵历服于无疆也,必有其为治之本焉,必有其致治之要焉。夫用人不可以不慎,吏治不可以不清,赋税不可以不均。此三者,固治天下之大端也,而犹非其本也,抑犹非其要也。盖所谓本者何也?人主之一心是也。所谓要者何也?人主之以一心行仁者是也。故仁以举贤,而爱惜人才,则收用人之效矣。仁以择吏,而澄清吏治,则成廉洁之风矣。仁以理财,而抚循百姓,则致丰亨之象而臻乐利之休矣。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庶政毕修,民生克遂而登上理者,此道得也。故善治天下者,不恃有驭天下之术,而恃有治吾心之道;不徒有爱百姓之名,而贵有爱百姓之实。以是内之百僚,有师济之盛;外之群吏,有廉法之操。上之府库,有充盈之积;下之闾阎,有康阜之风。是尧舜三代之丰功茂烈,不难再见于今日者也。

钦惟皇帝陛下,鸿图克懋,龙德方升。孝思永言,隆祖任母姜之

尊养；惠泽普被，备文谟武烈之显承。文教著日出之区，武功及海隅之表。四方皆已底定，天下皆已治安。而犹圣不自圣，进臣等于廷，而咨以用人择吏之道、足国裕民之方，虽帝咨王访，宁有过欤？以臣之愚陋，非有藻鉴群流之识，何敢言人材之用舍？非有封疆牧民之责，何敢言百官之短长？非有钱谷大农之计，何敢言财赋之充诎？然臣尝闻柳宗元曰：思惟报国，独有文章。又闻欧阳修曰：士患不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吾职不敢言，是终无可言之日也。今煌煌清问，实式加之，其敢不竭千虑之一得，以对扬休命乎！

臣尝缅怀上理，追念先猷，而知古帝王为治之本，无过内治之心；而治心之要，无过吾心之仁。何也？盖有纯王之心，斯有纯王之政，言政之必本乎心也。有《关雎》、《麟趾》之风，斯可以行《周官》之法，言心之可以立法也。故欲求国用之足，未有不由民生之遂而可得也；欲求民生之遂，未有不由吏治之贤而可得也；欲求吏治之贤，未有不由用人之慎而可得也；欲求用人之慎，未有不由皇上之仁以立心而可得也。惟我皇上，夙夜冰兢，期于俊乂充廷，廉能著绩，以裕国计而慰民生者，诚莫逾于此矣。

伏读制策有曰：国家简任贤良，以共襄治化，必如何用当其才，人称其职。此我皇上辟门吁俊之盛心也。朝廷选用人才，非苟慕其才而富贵其身也，殆将用其能以理不能，用其明以理不明者耳。其在《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所以长育人才之道也。故方其未用也，尝患其多；及其既用也，恒患其少。与其用不足而后取，何如多取以待用！凡有人而不用，与用之而不当，皆可惜也。故贤能不可不惜也。以内而言之，台省之内升，本以贤能而升者，反逸之山林之内，升而候缺，不如遇缺后升，久置之拾遗、补过之列，非无益也。外而言之，监司郡县之转迁，亦以贤能而升者，又留以未竟之案，有功而升者，仍以有过而留，苛求于钱谷刑名之间，亦已甚也。总之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必得知人之佐而行以保任之法，然后真才辈出矣。臣每见今之在位者，见一贤焉，若亲与迩，不敢举也；见一不善焉，若疏与远，不敢去也。问其故，曰避嫌也。避嫌之念生，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矣。臣故曰仁以举贤，则爱惜人才而可以收用人之效者，此也。

伏读制策有曰：贪风未息，诛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至不肖有司私派横征，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兴言及此，真百姓之福也。夫今日之百姓，诚苦矣，苦于有司之剥削也。今之下吏亦苦矣，苦于大吏之诛求也。大吏之取于小吏，必饰其名曰公费。不知藏之私橐之中者，为公乎，为私乎?有司之取于百姓者，饰其名曰乐输。不知得之敲扑之下者，为乐乎，为怨乎?臣恐虽文致其辞，而终无以掩人之耳目也。于是一田之人，而有两田之出，使吾民曾不得卖丝而粜谷焉。一定之税，而有无定之征，使吾民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耒耜方思东作，而输将不待西成，使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耨焉。贪吏之弊，一至于此!民生安得不日困乎?以臣计之，惩贪之法不可不严也。惩其吏之小者，不若惩其吏之大者。夫大吏之贪，不止赋敛无度已也。其位愈尊，其害愈大；其害愈大，而人愈不敢言。即有不畏强御之臣出，力而排之，不过举其大概，而不能悉其实也。莫如访其贪之最者而惩之。彼贪冒无耻，止为室家妻子计耳。以今日居官之所得，为后日平居之所乐，何惮而不为之?惟行汉世惩贪之法，宋人禁锢贪吏之制，彼又何利而为此耶?此非过于刻核也，盖除吏之蠹也，去民之害也。杀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下之至仁也。臣故曰仁以择吏，则澄清吏治而可以致廉洁之风者，此也。

伏读制策有曰：国用浩繁，繄惟正之供是赖。乃催科不善者，每昧于抚字。兹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此以见爱民裕国之宏模也。今之赋，犹古之赋也；今之民，犹古之民也。何以古则上有余而下无不足，今则上未尝有余而民又患不足?岂非抚字催科之道，得则俱得，失则俱失者乎!故善催科者，必为民治农桑焉，必为民广畜牧焉，必为民缓刑罚焉，必为民通有无焉。如是而民力裕矣，民力裕而上之所求无不应矣。不善催科者，惟日夜取民之财，穷民之力，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将元元安所归命哉?臣尝观小民之家，其初牛羊菓蔬熙熙然若为子孙百年之计也者，一往过焉，则为墟矣；再过三过焉，则又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逃亡也，或曰赋重而不能守也。是非催科之所迫而然耶?故抚字之道不

可不讲也。惟皇上宏岂弟之恩，立慈惠之师，使天下之为吏者，寓催科于抚字之中，则上有仓盈庾亿之庆，兼抚字于催科之内，则下有家给人足之风。臣故曰仁以理财，则抚循百姓而可以致丰亨之象，臻乐利之休者，此也。

然臣反复深思，欲为皇上更进一筹，而终无易于仁以存心之为要也。《书》曰：皇天无亲，惟仁实亲。又曰：民罔常怀，怀于有仁。此之谓也。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统领和驾驭天下，把帝王的宝座永远传下去，必定具有那施行治理的根本，必定具有那实现大治的纲要。任用人才不可以不慎重，官吏的作风与治绩不可以不肃正，赋税不可以不均平。这三项固然是治理天下的重大方面，但还不属于那根本，也不属于那纲要啊!这里所强调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呢?正是君主的专一用心啊!而所强调的纲要又是什么呢?正是君主依凭那专一的用心推行仁惠啊!所以靠仁惠而去举用贤才，也就爱惜人才，收到任用人才的效果了；靠仁惠而去选派官吏，也就肃正官吏的作风与治绩，形成廉洁的风尚了；靠仁惠而去料理财政，也就安抚住百姓，造成盛大亨通的气象，达到百姓自得其乐、自得其利的美好局面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隆盛至极，各种政务全都得到修明，百姓的生计实现了各自的愿望，步入了最美好的治理状态，原因就在于获取到了这种治国之道啊!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仰仗具有驾驭天下的权术，而仰仗具有整治我那用心的方法；不在表面上享有爱护百姓的名声，而看重确有爱护百姓的实绩。由此而身在朝廷的文武百官就呈现出众人忠正、同舟共济的盛况，分布在各地的官吏就确立起廉洁和遵用法度的操守。上面的国家府库，就有充足多余的储备；下面的民间百姓，就有安康富裕的风俗。这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丰功伟绩并不难在当今重新显现出来的东西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宏大的谋划得到扩展，天子的德业

正在上升。永久想尽孝，加深了如同周初对太王元妃太姜、文王生母太任那样的尊崇与奉养。仁惠的恩泽施布到整个天下，具备了如同当年对周文王谋略、周武王功业那样的发扬和继承。礼乐教化彰显到太阳升起的区域，军事胜利延伸到海角的边际。四方已经全都平定了，天下已经全都得到了治理并且稳定下来了，可仍然原本圣明却不自以为圣明，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专拿任用人才和选派官吏的方法、使国家富足又让百姓充裕的对策来进行咨询，即使是当年尧舜咨询四岳，周武王访问箕子，又哪里真有超过皇上这一盛举的呢?凭借臣下我的愚昧浅陋，并不具备评品和鉴别各类人物的识见，哪里敢讲论人才的取用与舍弃?并不负有统领一方、管理民众的责任，哪里敢讲论百官的长处与短处?并没做过中央财政部门对钱粮的核算事宜，哪里敢讲论财用赋税的充裕与短缺?然而臣下我曾经听说唐代的柳宗元讲过：只想一心报效国家，唯独有那文章。又听说宋朝的欧阳修讲过：读书人平常为自己没得到任用而忧虑，可被任用以后却又说那类事情并不属于我的职权范围，不敢讲论它们，这就是永远没有自己能去讲论的时候了。如今皇上的盛明而又清晰的策问，实际上非常郑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哪敢不竭尽千虑仅有一得的浅见，用来对答并阐扬美好的圣命呢?

臣下我曾经缅怀最佳的治理状态，追念前人的大谋略，由此了解到古代帝王施行治理的根本，没有超过在自身内部修明用心的了；而修明用心的关键，又没有超过我那用心仁惠的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拥有纯粹靠仁惠称王天下的用心，这才会形成纯粹靠仁惠称王天下的国政，这正说的是国政必定来自那用心啊!造成了《关雎》诗和《麟之趾》诗所描述的那种风尚，这才能够施用《周礼》的那些制度，这也正说的是用心才可以把制度确立起来啊!因而打算谋求国家财政充裕，没有不经过民众生计各自都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却能达到目的的；打算谋求民众的生计各自都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没有不经过官吏的作风与治绩都变得良好却能达到目的的；打算谋求官吏的作风与治绩都变得良好，没有不经过任用人才特慎重却能达到目的的；打算谋求任用人才特慎重，没有不经过皇上凭

借仁惠确立起用心却能达到目的的。想我皇上，从早到晚如履薄冰，兢兢业业，期望优异杰出的臣僚站满朝廷，廉洁贤能的官吏取得突出的治绩，用来使国家财政充裕，让民众的生计感到欣慰，确实是没有什么能够超出以上所说的范围之外的了。

跪拜敬读皇上的制策中有这样的问话：国家挑选任用贤良，来共同协助治理和教化，一定要去怎样做，就会任用恰恰切合他的才能，每个人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呢?这番问话正是我皇上像当年虞舜开辟四门、夏朝呼唤贤才那样的盛大用心啊!朝廷选用人才，并不光是向往他的才能而让他富贵起来啊!其实正准备发挥他的才能，让他去治理好别人不能治理好的政务；发挥他的聪明智慧，让他去辨明别人不能辨明的事情。这在《诗经》上说来就是：萝蔓生得长又长，在那山阿的正中央。这两句诗讲的正是培育人才的长远方法啊!所以正值还没有任用这些人才的时候，常常觉得他们太多了；等到任用这些人才以后，又总感到他们太少了。与其任用后感到不够用再去临时选取，哪里比得上多多选取而留待将来任用呢?只要是拥有人才却不任用，以及任用却不恰当，都属于太可惜了。所以对贤能不可以不爱惜啊!就朝廷来说，中央各部门的职务升任，原本上应该依照贤能来升任的人，反而使他们仍被遗漏在隐居的处所。予以升任而需要等候空缺的职位，比不上遇到空缺的职位再予以升任，把这些人长期安排在拾遗官、补过官的闲散官的行列里，也就不是没有好处的了。就地方上来说，监察官和太守县令的转调升迁，也应依照贤能来升迁的人，又被还有没审完的案件给留在原位不动；而立有功劳应当升迁的人，仍被曾有过错给留在原位不动。对他们在钱粮和断案的事务圈内加以苛求，也是做得太过份了。总而言之，了解人就圣明，只是在帝王这里做到这一点特困难。一定要得到确实了解人的助手，施行担保举任的制度，然后真正的人才就一批接一批涌现出来了。臣下我常常看到当今在位的人，遇到一位贤才，如果是自己的亲属或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就不敢向朝廷举荐；相反遇到一个并不贤能的人，如果是与自己关系很疏远的人，又不敢不向朝廷荐举。询问其中的缘故，说是为了避

嫌。这种避嫌的念头一产生，而积累德行的君子就无法被朝廷了解到了。臣下我因此说用仁惠而去举任贤才，也就爱惜人才，可以收到任用人才的效果了，道理正在这里啊!

跪拜敬读皇上的制策中还有这样的问话：贪污的风气并没有止息下来，对下面的官吏索求钱财物品，用来供给上面的官员享用，于是恶化到政府部门的不贤良官员擅自摊派，强行征收，致使老百姓的生计变得越来越困顿，该用什么办法就能革除掉这种积弊呢?皇上问到这个问题，可真是百姓的福份啊!如今的百姓确实很愁苦了，愁苦于官府的剥削啊!如今下面的官吏也很愁苦了，愁苦于上面的大官的百般索取啊!上面的大官向下面的小官进行索取，一定要打着公费的幌子。可不知道被装入私囊的钱物，究竟是属于公家的呢?还是属于个人的呢?官府向百姓进行索取，往往亮出甘愿缴纳的招牌。可不知道从鞭抽棒打之下榨取上来的钱物，究竟是属于百姓甘愿缴纳的呢?还是属于怨恨不已的呢?臣下我恐怕尽管这帮家伙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可终究没办法掩盖住人们的耳目啊!于是一亩田地的收入，竟要承担两亩田地的支出，致使我大清的百姓竟然没办法不卖掉新丝又售出新谷；赋税具有固定的数额，但却没有固定的征收，致使我大清的百姓竟然没办法房屋一家挨一家，生存在里面；备好农具正想春耕播种，而缴纳钱粮却还等不到秋收，致使我大清的百姓竟然没办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贪污官吏造成的弊害，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老百姓的生计怎么能够不一天比一天困顿呢?从臣下我这方面来做考虑，觉得惩治贪污的措施不能不严厉啊!然而惩治小官，不如惩治大官。大官的贪污行径，不仅仅是横征暴敛没有限度就算完事了。他那地位越尊贵，构成的祸害就越巨大；他构成的祸害越巨大，而人们就越发不敢说三道四。即使遇有不畏惧强暴的臣僚挺身站出来，大力排击他，也不过是仅能列举他那大致的情形，却不能够完全掌握住他那实情啊!最好是访察那些贪污最严重的大官并且惩办他们。他们贪得无厌，没有廉耻，只是为自家和妻室儿女做打算罢了。拿今日当官所聚敛到的钱物，为将来不再当官的时候做享乐用，还会惧怕什么而不去干呢?只管

施行汉朝惩治贪污的做法以及宋代终生不准贪官再当官的制度，他们还会贪图什么而去干那罪恶的勾当呢?这决不是太苛刻、太计较了，这正属于铲除掉官吏中的蠹虫，去除掉老百姓的祸害啊!斩杀一两个人，全天下都获得到生存，这正是天下的最仁惠的表现啊!臣下我因此说用仁惠去选派官吏，也就肃正官吏的作风与治绩，可以形成廉洁的风尚了，道理正在这里啊!

跪拜敬读皇上的制策中还有这样的问话：国家的财政支出浩大繁多，也只应依靠法定的赋税征收来解决，可那些催缴赋税却做得很差的人常常对安抚百姓的事情一点儿都闹不明白。如今想使民间免除掉被催逼的痛苦，而国家的用项又经常充裕。这番问话正显现出爱护百姓又使国家富足的宏大谋划啊!当今的赋税，和古代的赋税是一回事；当今的百姓，和古代的百姓也没有什么差异。可为什么在古代就上面用度有余而下面也没有不充足的，当今却上面未曾出现过用度有余而百姓又忧愁不充足呢?难道不是安抚养护百姓和催缴赋税的做法，两方面都做得妥当就两方面效果都好、两方面都做得糟糕就两方面效果都坏吗?所以善于催缴赋税的人，必定要为老百姓搞好农业生产和养蚕植桑起督促作用，必定要为老百姓扩大家畜饲养提供便利条件，必定要为老百姓放宽刑罚，必定要为老百姓疏通物品交换。像这样去做，老百姓的财力就充裕了，而老百姓的财力一充裕，国家要征收的钱物就没有不交纳的了。不善于催缴赋税的人，光知道日夜索取老百姓的财物，把老百姓的财力弄个底朝天，天天侵削，月月剥取，逐渐达到完全枯竭的地步，老百姓可准备把性命归付到哪里去呢?臣下我曾经观察普通百姓的人家，在当初牛羊和果木蔬菜一片兴旺，真好像要为子孙后代好好垫下一个家底，但经过一次催缴赋税以后，就变成废墟一般了。经过第二次和第三次催缴赋税以后，就又变成废墟一般了。向那些邻居询问，有的说逃亡了，有的说赋税太重，根本守不住这个家了。这还不是催缴赋税逼迫造成的情况吗?所以安抚养护百姓的办法不能不讲求啊!只请皇上弘扬官员中和乐平易的恩德，树立官员中爱民惠民的榜样，使全天下担任官吏的人，把催缴赋税寄寓在安抚养护民众当

中，上面就有国库官仓多得上亿盛不下的吉庆景象了；又把安抚养护百姓包容在催缴赋税当中，下面就有家家丰饶、人人充足的富庶风光了。臣下我因此说用仁惠去料理财政，也就安抚住百姓，可以造成盛大亨通的气象，达到百姓自得其乐、自得其利的美好局面了，道理正在这里啊!

然而臣下我反复深思，想为皇上再进献一条大筹划，也就是归根结底永不改变真用仁惠去存住用心，把这构成纲要啊!《尚书》中讲：皇天并没有偏爱的东西，实际上只是谁仁惠就偏爱谁。而且还讲：老百姓并不永久拥戴什么人，只是谁仁惠就拥戴谁。说的也就正是这个意思啊!臣下我本是民间一个普通的百姓，属于刚刚要被朝廷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侵凌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殿试策问

[康熙十二年三月二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以仁心行仁政，无不以万物得所为己任。其时丰亨克泰，教化覃敷，人无狙诈之心，户洽敦庞之盛，驯至遐荒向化，顽梗率俾，讼狱息而兵革销，风雨时而休征应。何风之隆也！朕缵承祖宗鸿绪，抚御万方，夙兴夜寐，冀登上理。乃天时未尽调协，治道未臻纯备。尚德缓刑之令时颁，而仁让未兴；发帑蠲租之诏累下，而休养未遂。意者审几度务，设诚制行之源，尚有未究者欤？夫治狱之吏，以刻为明，古人之所戒也。近见引律烦多，驳察诬良，时见参奏。出入轻重之间，率多未协于中。何以使民气无冤，而谳法克当欤？积贮乃天下之大命，乃常平之设，多属虚文，一遇荒歉，即需赈济。而奉行不实，致使朝廷之德意，不能遍及闾阎。其何以使利兴弊革欤？古者耕九余三，即有灾祲，民无饥色。其道有可讲求者欤？夫有治人，始有治法；行实政，必有实心。今欲疏禁网，以昭惇大，缓催科，以裕盖藏，务使物阜民安，政成化洽，以庶几于古帝王协和风动之治，抑何道之从也？尔多士蓄积有素，其各摅所见，详切敷陈，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所谓要使天下平定在于先治理好他的国家的问题，是因为国君尊敬老人，民间便会兴起孝的风气；国君尊敬年长者，民间便会兴起敬爱兄长的风气；国君怜恤孤儿，民间就不会互相背弃。因此，当政者在道德上要起规范和表率作用。

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就是要爱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就是善于鉴别人。

能弄清人善良本心的一切，这就懂得了人的本性。知道了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了。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是以仁爱之心来推行以仁爱为中心的政治的，没有不是使世上的万物都得到合适的生活处所作为自己的责任的。那时富裕顺达生活安泰，政教风化广泛传布，人人都没有狡猾奸诈的心思，户户普遍有富足的盛况，逐渐达到边远荒僻之地也归服朝廷，愚昧而不顺服的人也顺从管教，诉讼的没有了，兵器甲冑销毁不用了，风调雨顺按时而至，吉祥的征兆完全应验。风教怎么这样隆盛呀！皇帝我继承祖宗的大统，安辑控驭万邦，早起晚睡，希望达到最高的治理水平。但却天时气候没有完全协调，治理方法没有达到精纯完备。尊崇美德和放宽刑罚的命令按时经常颁发，但仁爱谦让的风气并未兴起；发放财帛和免除租税的诏书不断下达，但安定并发展人民生活的目的没有实现。这或许是，省察事机和揣度事务，存心忠厚和规定德行准则的根源，还有没有探究清楚的地方吧？那些审理案件的官员，把苛刻当作明察，这是古人所反对的做法。近来发现援引律令繁琐冗杂，复审驳回又诬蔑断案恰当的官员，这些官员又常被弹劾。一出一入一

轻一重之间，大多不能符合事实，达到正确的判理。既然这样，怎样才能使人民没有含冤的情绪，而使刑法条例恰当呢?积聚储存谷物钱财乃是天下的大事，有设置的常平仓，但这多属于徒具形式的规定，一遇到荒年歉收，就需要官府发放赈济钱粮。这样不实实在在遵照和实行朝廷诏令的情况，致使朝廷布施恩德的心意，不能普遍传达到民间。到底用什么办法可以使利益兴起弊端革除呢?古时候人们耕种九年可积余三年的粮食，即使遇有灾异，人民也不会有饥饿之色。他们这种做法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东西吗?有治理国家的人才，才有治理国家的法则；施行实实在在的政治，必须有真心实意。现在想要放宽太严的禁令以显示敦厚宽大，延缓催收租税以充裕人民的储藏。务使物产丰盛人民安康，政治成功教化普沾，以近似于古代帝王和谐融洽普遍响应的政绩。到底应采取哪种方法来达到上述目的呢?你们众多的贤士在学识上素有蓄积，应当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详细切要地进行陈述论列，不要浮泛不要隐讳。皇帝我将要亲自阅览它。

韩菼　会试卷二道

韩菼(生卒年不详)　字元少，别字慕庐，长洲(今江苏省吴县)人。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由修撰累官礼部尚书。居官期间，持论侃侃，从不为两可之说，其所不愿做的事，不可以利害祸福动。其性情恬旷，喜好山水，于闲暇时则徜徉于泉石之间。点勘经史，以文章名世。卒谥文懿。著有《有怀堂诗文稿》。

所谓平天下

即治国以验民情，道有操乎天下之全者焉。夫孝弟不倍，家国间已若有一矩焉。君子必务絜诸天下也。絜之道无穷，而平岂易哉?今夫君子自身修而后，其于家国天下，固已旷览乎同然之势，而得其所以相及之端。然君子之所及者愈大，而所操者愈以密矣。

故尝毕举天下之情，仍本吾身心以内之求，要使出之吾者，无一不与民相际，而遂可以给天下之无穷而皆当也。吾得经言平天下之谓矣。

盖尝综治与平之大要而思之，君子治国之道犹略，谓自家推之而近也；君子治天下之道恒详，谓自国推之而犹远也。然经言平天下在治国，斯何谓哉？今夫家国天下异势也，然民情则一而已矣。家之中有老，上之老老，非以劝国人孝也，而民之兴孝者已若是。家之中有长，上之长长，非以喻国人弟也，而民之兴弟者已若是。家之中有孤，上之恤孤，非以诏国人慈也，而民之不倍者已若是。是可以见天下之民之无不然，而顺而推之，即可以平天下，逆而施之，即不可以治一国。则其待于君子诚切，而君子之所持，与天下相尽者，诚不可苟焉而已也。是故君子有道焉。

君子自类情通欲以来，已与天下之物有日相考验之端。凡公私之似，邪正之交，其知之至矣。知之至，而知其不可以愚民也。吾之所知，必非民之所不知；民之所知，或更虑为吾之所不知。国家数大事，而有一不足以厌小民之智，则其余俱无以相服。君子所为，穆处深宫，而东西朔南，皆其神明之条贯，一若有不易之则，以深其拟议变化也已矣。君子自审几克治以来，又与天下之物有忧乐相关之故。凡嗜欲之必谨，燕昵之必防，其求之诚矣。求之诚，而意自不忍以欺民也。我日求尽乎吾之意，而民之意尽；我日求尽乎民之意，而吾之意亦尽。朝廷数大典，而有一不足以惬草野之私，即身被而不生其感。君子所为，本诸性情，而殊甸遐荒，皆其恺泽之旁流，一若有至正之轨，以消其偏党陂侧也已矣。是道也，何道也？平天下之事，大抵本此孝弟慈以为端。而天下之待平于我者，亦只此孝弟不倍之民以惟上之从。君子于此得矩焉，而兢兢乎惟恐不得其平，而絜之必尽者，道在则然也。治一国之道，即平天下之道也。

就治理国家以检验民情这一点看，在治国之道中已含有掌握整个天下的方法。不违背孝顺父母和敬爱兄长这些道德原则，在家和国之间已经好像有一个治理家国的标准法则。当政者必须从事规范天下的工作，规范的途径和方法没有穷尽，而平定整个天下岂是容易

的吗？当政者如在自身完成修养以后，他对家、国、天下，必定已纵观到相同的情势，并且发现它们之间所以相互联系的端倪。但是当政者所涉及到的治理目标愈大，而所要掌握的方面也就越加多了。所以曾经毕举过的天下之情，仍然依据我身心以内的要求，要使出之于我自己身心的要求，没有一点不和人民要求相关联，这样便可以做到不管给予天下多少都是合适的。我理解到经书上所说的平定天下的话了。

我曾经综括治国和平定天下的要旨而思考过它，圣贤们讲的治国方法虽还太简略，但说是从治家推广到治国是近便的；圣贤们讲的治理天下的方法固然曾是详细的，但说是从治国推广到治天下却还距离修身齐家远点儿。但是经书所说的平定天下在于治理好国家，这是说的什么道理呢？现就家、国、天下来说，它们的情势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民情却是一样的。家庭里面有老人，君王的尊敬老人，虽并没有直接鼓励国人孝顺父母，然而人民中兴起孝道的人已经这样去做了；家庭中有年长者，君王尊敬年长者，虽并没有直接晓谕国人敬爱兄长，然而人民中兴起悌道的人已经这样去做了；家庭中有孤儿，君王的怜恤孤儿，虽并没有直接诏令国人慈悲为怀，然而人民中不互相背弃的人已经这样去做了。由此可以看到天下的人民没有不去仿效君王做法的。如果顺着民情去发扬美德，就可以平定天下；如果逆着民情去做，就连一国也不能治理好。因此治理天下对于君王有着非常急迫的期待。然而君王所要掌握的，应和天下完全一致，确实不可随心所欲的。因此君王是有治国之道的。

一个君王自从与民情相类与民欲相通以来，已经和天下的东西，有每日相互稽考检验的开端。凡是国家和个人问题上的相似之处，邪恶和正直的对立关系与斗争情况，他对此可以说了解得非常彻底了。了解得彻底后，就知道在治国上是不可以愚弄人民的。我所知道的，必定不是人民所不知道的；人民所知道的，或许更担心是我所不知道的。国家许多大事，如果有一件事不能够满足老百姓的智慧，那么其余的事便都无法使民众信服。君王所做的事，都是肃静地处在深宫之中做的。而东西南北四方之事，都是由他的明智如神的思想

来条理贯穿，好像有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来加深他的思考计议和变化一样。一个君王自从省察事机克制私欲以来，又因为和天下的事物，有忧虑欢乐相互关联的原因，凡是有关嗜好和欲望的事必须谨慎克制，对亲昵行为必须严防。他责求自己是极真诚的，由于责求自己的真诚，便内心不忍去欺骗人民。我每日都力求尽量实现我的意愿，而人民的意愿也就完全实现了；我每日都力求竭尽人民的意愿，而我的意愿也就完全实现了。朝廷有许多大典，如果有一个不能够使民间满意，就是亲自领受也不会产生快感。君王所做的事，都根据于自己的禀性和情感，即使异域远荒的地方，也都是他真诚的恩泽广泛流布的范围。好像有一个无比中正的法度，来消除那种偏私歪邪的行为一样。这种治国之道，是什么道呢？平定天下的事，大抵是要本着这孝、悌、慈几种道德原则来作为发端，而天下要达到平定的要求有待于我的，也只是这些不背弃孝悌的人民来顺从君王的教化。君王在这里得到治国的标准了。于是小心谨慎地唯恐天下不得平定，而规范它必须彻底，是因为有道存在才如此的。可见治理一国的道，也就是平定天下的道。

樊迟问仁

推知仁之事与心，而各得其所专及者焉。盖鬼神亦义之，存获亦难之。验而所务所先不存焉，此为知仁之事与心欤？且夫世有至人，其量固无乎不举也。然其生平功力之所积，则必不杂乎其途。事事去其可疑，而中之不精焉者寡矣。念念去其可欲，而中之不纯焉者亦寡矣。故至人一出，而其事恒足以正天下之人心，而其心亦足以任天下重远之事。

昔者樊迟问知。子曰：知者，以无不知为大也。无不知，则不特以人世之所可知者为知，而必以所不可知者为知矣。今夫人心之知，至无穷也。毋论耳目所睹记之物，日相寻于今古，而变化以生。乃至屈伸往来之交，而能确然指其为鬼为神之故，斯亦极天人之致矣。而抑知知者正不以之为教也，知者以为民之所与立，独有义而已。习之于

君臣父子之节，使不迁于异物，经可守而权可达也。游之于诗书礼乐之途，使不惑于异言，德可成而艺亦可观也。而至于郊坛日月之文，庙祧享尝之制，已于敬之之中，寓以远之之意，要亦明夫义之所当然而已。夫人惟有所不知，斯益相蒙于幽深旷渺之端。故好言知者，不为民欺，而常为神愚。若兹之于可知，不必知之介断如也，斯必其无不知而然也。虽欲不谓之知而不可矣。

迟又问仁。子曰：仁者必无不仁而全也。无不仁，则必不以人心之偶得者为仁，而必以其无不得者为仁矣。今夫人心之仁，致足乐也。勿谓斯须辄易失之物，日相求于旦暮，而离合无凭。乃至忧劳积久之余，而自悠然其有实获我心之处，斯亦阅甘苦之途矣。而抑知仁者正不以之居心也，仁者以为仁之所克治，独有难而已。审择于取舍之大闲，而积数十年之力，去欲恶之念而不暇也，从容于存养之微密，而乘一息之隙，隳戒慎之素而有余也。即至于不闻亦式之安，德音不瑕之美，其所为获之之故，亦初无后之可言，要亦视夫难之所自至而已。夫人惟有所未仁，不能无杂于计功谋利之间，故骤言仁者，不惟私足为累，理亦足为累。若兹之于为仁，而即人于不仁之几谧如也，斯必其无不仁而然也。虽欲不谓之仁而不可矣。若此者，一语之以务义，一语之以先难，非明理之尽，不足言知，非去私之尽，不足言仁也。知仁岂易言哉！

推究有关智慧和仁德的事与心两方面，它们是各自具有自己所专门涉及的东西的。鬼神也称许它合理，但要获取它也是很难的。对它进行检验但它们所致力的所首先追求的各是什么却未能看到，这就是智慧和仁德的事与心两方面的实情吧。况且世上有修养高超的人，就其才能说固然没有什么事是他办不到的，但是他在一生中所积累起来的功力，则必定不会杂取并蓄。对所有的事都能排除掉疑问，却认识和处理得不精到是很少有的。对所有的想法都能排除掉私欲，却认识和执行得不纯正也是很少有的。所以修养很高超的人一旦出现，他做的事常常足以端正天下的人心，同时他的心也足可以承担天下最重最远大的事情。

从前，樊迟问孔子什么是智慧。孔子说：智慧这东西以无所不知为最高表现。无所不知，就是不但把人世间所能够知道的都变成自己的知识，而且必定要把所不能知道的也变成自己的知识。现在看来人心的智力，实在是无穷无尽的。不仅对耳目所能看到和记忆的事物，每日在当今和往古的书籍中寻求，并且变而化之不断生发，甚至屈伸于过去未来之间，而能够明确地指出那作为鬼作为神的原因道理，这已极尽天道与人事之间的深奥微妙的道理了。但是岂知有智慧的人恰恰不把这些拿来教育人。有智慧的人认为人民所赞许倡立的，只有义罢了。学习有关君臣父子的礼节，使人不把思想转移到与此不同的事物上，这样就可以遵守经义并取得高位。攻读诗书礼乐这些经典，使自己不迷惑于那些离经叛道的言论，这样就可以成就自己的道德并可以具有相当可观的文艺才能。至于有关郊坛日月的祭祀仪节，有关庙祧享尝的祭祀制度，已经在敬重天地祖宗之中，包涵着疏远它们的意思。其重要之点也不过是明示合理的态度和做法应该是这样的罢了。人只有遇到有些无法知道的，这样才越会相互蒙蔽在幽深难测辽阔渺茫的情况中。所以喜好谈智慧的人，不会被百姓欺骗，却常常被神所蒙蔽。像这种对于可以知道却不必知道的就像与世隔绝的事，这必定是他无所不知才会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虽想说他不聪明也是做不到的。

樊迟又问什么是仁德。孔子说：仁德这种品行，必定是无所不仁而是十全十美的。无所不仁，就必然不把人心所偶然得到的仁当做仁，必定把无时无处都会得到的仁当做仁。人们心中所追求的仁德，是极能使人快乐的。不要说这是须臾之间常容易失去的东西，每日早晚都在书本中追求它，但它的聚散没有凭依。甚至在忧虑劳苦积累日久之后，而自会悠悠然地有了确实打动我心的地方，这也是要经历无数甘苦的历程的。但是岂知有仁德的人恰恰不存心这样做的。有仁德的人认为仁要克制欲望，只有困难而已。审慎地选择于要取舍的基本行为准则，需要积累好几十年的心力，来排除私欲邪恶的念头而没有一点闲暇时间，盘桓逗留在精微周密的存心养性的生活中，只要遇到一点点放松的空隙，就会毁弃掉平素警惕谨慎所取得的存

养成果还有余的。就以文王虽未听前人说过但办事也都合于法度的安妥,周公有德誉没却有过失的完美来说,他们之所以获得这些成就和美誉的原因，也不能说是因为在开始时就把获取放在后面。其重要之点也只是看困难来自哪里罢了。人只要有时离开了仁德，就不能不参与到计较功名谋求私利之间。所以忽然间讲仁德的人，不仅私利足以成为他的连累，道理也足以成为他的连累。像这种要行仁德,却立即意识到那些不仁的好像隐微平静的事,这必定是他无所不仁才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虽想说他不仁也是做不到的。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方面谈了要心力专一地去干合理的事,一方面谈了要先进行困难的克制私欲的道德修养。不把义理彻底弄明白，是不能去讲智慧问题的,不把私欲排除彻底,是不能去讲仁德问题的。智慧和仁德岂是容易讲的吗？〔蔺瑞生译〕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帝王欲举治天下之大法,必先有以倡天下之人心。夫心者,万事之权舆,至治之根柢也。世有百年必敝之法,而有万世可以无敝之心。为政而不本之以心，虽举唐虞三代之法施之，而无一可。古之圣王,不能以身劳天下,而惟以心劳天下。其分猷布化,则寄之百官有司;其兼总条贯,则付之纪纲法度;而其子爱元元、忠厚恻怛之实心,必有余于用人立政之外者。以劝其群臣之递相倡也,以率其下渐磨陶冶,淬厉鼓舞,务尽出其精白不欺之心,以为天子拊循斯民之具。何者当兴,何者当革,若何而可,若何而否,张弛宽猛,休养生息,君臣相与,早作夜思,无往而不得其当。由是衣食足而积贮充,教化行而狱讼息,暴民不作,兵革不试;即有水旱不时之虞,无改乎闾阎乐利之旧;驯至四方从欲,协和风动,人事修于下,天休应于上,阴阳以和,风雨以时。则惟圣王能帅其臣以实心行实事之所致,而非徒法严令具,一切随事补救,润饰吏治之所可几也。

钦惟皇帝陛下,得一居贞,兼三出震。定黜陟而澄吏治,远媲云师龙纪之遗;因燠暵而念民依,务协毕雨箕风之好。覃敷文教,而益

讲于道德仁艺，常使史诵诗，士献箴；底定武功，而不忘乎狝狩蒐苗，共美右《驺虞》，左《狸首》。淑问既已扬于疆外，湛恩既已普于群生，庶绩既已受成，百神既已顺职，乃犹进臣等，亲策之以府事未尽修和，治道未臻醇备，而欲究于仁让之化、休养之泽、审几度务、设诚致行之源，此真公听并观、悬鞀设铎之盛心也。臣请得而备陈之。

臣惟狱者，天下之大命，和气之所由致，灾沴之所由生也。我皇上深矜庶民之不辜，时沛更新之恩，屡下停刑之令，而且宽失出之罚，重矜疑之典，禁惨酷之刑，所以戒枉滥者至矣，而民犹或多冤者，何也？制策曰：引律多烦，驳察诬良，时见参奏。臣以为今日刑狱之刻，正在于驳察苛于前而参奏随其后也。古之治狱者，盖使之议论轻重，慎测浅深，宽然得尽其心焉。今自臬司上谳，毋论或重或轻，而必以驳察为例。有司苦于其上之苛刻缴绕也，乃逆窥意指之所向，而文致罪人之辞，以求一当。究之出于罪人之供者，实非出诸其人之口者也，而上下文移，公名为妥招。夫招而曰妥，是徒幸免驳察而不顾生民之命者矣。臣谓宜少宽假臬司之参驳，而第慎择其人焉，以寄一方之民命，则庶乎其可也。而臣尤有请者，在减例而一从律。古者律一成而不可变，而复有疑有比，是律之中已不胜其权衡变化，而不必增例以预拟之也。今常例之外，条例日增，徒使轻重上下得易以为奸而已矣。且夫法亦顾用之若何耳。劓刖椓黥，蚩尤之刑，而唐虞仍之，不闻其或滥；五刑三千，法莫详焉，而周之中叶，不闻其召祥。刑之当否，果不在法之详略也。又况今之律所谓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八字之义，亦已尽乎小大之比，岂犹不足而复议例乎？

恭惟制策念积贮之当务，而洞晰夫常平之设，多属虚文，赈济之恩，奉行不实。臣以为今日欲行古者遗人委积之法则迂，如近者频下赈济之令，亦难为继。欲仿古者平籴之制，又恐有结籴、俵籴、括籴之弊；若欲一恃于常平，则出纳敛散之不时，蓄积之不实，今亦既见之矣。而臣窃以为今日惟社仓之法，犹可行也。诚各委一方之守令，俾请其乡之耆宿有才德者，劝民量输其粟而时敛之，而时出之，少加其息，以偿腐耗。其行之也以鄙鄙，而不以县；其主之也以乡人士君子，而不以官；其劝之也以忠厚惽怛，而不以督责苛急。于以御凶荒也，

其庶几乎!

若夫制策所云耕九余三,即有灾祲而民不饥者,此则足民之本计也。臣谓今日足民之道有三:曰减赋,曰缓征,曰减饷。今赋税既有定额,似不可复减,然古者十而税一,又或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则今他省之额最轻者,犹为重也。而江南一省之人,至六百余万,欠厘毫以上辄罪之,及上计簿而欠者,亦数百万也。此数百万者,民不敢欠而官不能有也,则安归乎?夫征发急则奸欺易生,条目多则侵蚀难诘,势不得不议停,亦不得不议蠲,则曷若少留有余于民之为利乎?臣请即一省以例其余,权其轻重,苟有可少宽减者减之。藏富于民,即余富于官,此时务也。

缓征之说,诸臣请之数矣,言之切矣,皇上亦欲行之再三矣,而格而不遽行者,以协饷之故,则臣请言减饷之说。古者一州之入,必足当一州之出。姑以战国时言之,养兵百万而不仰给于他国。今天下大定而馈饷不绝,如岁岁用兵,竭中原民力之供,辇输于岭海之滨、绝远不毛之地,而所在雄藩大镇,外挟一二窜伏山薮之余孽以自重,而内以邀于朝廷,日耗司农不生不息之财,以厌其子女玉帛无穷之欲。此岂可为继而辄因循而不变乎?臣请于兵之可撤者撤之,其必不可撤者则留屯田。古者常且战且屯,今正当养兵不用之时,其力尤可用。且往者兵在湟中则屯湟中,在淮则屯淮,在许则屯许,在振武则屯振武,在乌孙、伊吾则屯乌孙、伊吾,安得借口无可耕之田乎?或犹有不足,则姑以近省之饷,量给之,俟行之数年,佃作盛而军实充,乃尽举协饷而罢之。协饷停而征可缓,赋可减矣;缓征减赋而民有余财,则可以耕九余三,遇灾祲而无菜色矣。

凡此数条,臣敢因圣策而尽其愚。虽然,为政有本,致治有要,则臣以为必先于倡天下之人心,以实心行实政而后可也。宋儒朱熹有言:世有二敝,有法敝,有时敝,法敝可救之以法,时敝必变之以心。今百僚师师,庶事具举,然诸臣或畏罪之念重而踊跃之意轻,功名之虑深而忠爱之谊薄,推委瞻徇之情多而公忠任事之气少,则或者御臣之道,亦有未至也。臣谓宜推忠信以结之,宽文法以优之,破资格以异之,丰禄饩以劝之。崇尚圣贤之实学,以砥其礼义廉耻之防;试以

当世之要务,以观其经理才干之实。渐磨陶冶,淬厉鼓舞。而向之数条者,可以付之其人有余矣。然其本,要在皇上之一心。诚夙夜讲学,一本于戒谨畏惧之至意,则德业益充矣;恭己出治,而一将以吁咈咨儆之实心,则万几益敕矣。侧身修省,斋居渊默,而一出于敬天之诚,则嘉祥致矣;冬寒夏暑,祈福请命,而实格以爱民之心,则生养遂矣。此所谓以仁心行仁政,而政成化洽,无一物不得其所,以进于古帝王协和风动之治者也。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打算全面兴用治理天下的重大法则,一定要首先有办法鼓舞起天下的人心来。人心是所有事情的起点,也是最高治理的根基。世上存在着历经一百年必定会产生弊病的成法,但却具有万世也能不出弊病的人心。施行治理却不把人心作为依据,即便兴用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成法去实行它们,却没有一条能够行得通的。古代的圣明帝王不能够借助身躯去为全天下操劳,而只凭仗那心念去为全天下操劳。分别承当治国大谋略,施布化导,都交给百官和各个政府部门去办理;有关兼顾总揽和条理贯串,就付归到朝廷纲纪和国家法度上来;而他那如同爱护儿子那样爱护众百姓、忠诚厚道又怜惜哀悯的实心,一定会在任用人才和定立国政之外还有其余的因素在无形中发挥作用。用来激励群臣递相倡明,率领下面的人不断磨砺和陶冶,锤炼熔铸作鼓舞,务必全部献出纯洁而不欺瞒的那颗赤心,作为天子安抚百姓的有力工具。什么东西应当兴行,哪些地方应当改变,怎样做就正确,如何搞就错误,急切些或缓和些,宽大些或严厉些,让百姓休整养护,化生滋息,君臣都一起在早晨筹划,在夜晚深思,做到哪里也没有一处不恰切的。由此而百姓丰衣足食,国库储备充裕,教化推行开,都不打官司,凶暴的刁民不出现,兵器不再擦拭磨快。即使遇上突然发生的水灾旱灾,也改变不了民间自得其乐、自得其利的原状。逐渐发展到四方部族奉从自动归服的意愿,协调一致,望风响应,人间的事体在下面得到修明,皇天的吉兆在上面降示出来,阴阳保持和谐,风雨按节气准时到来。这

一切都只是圣明的帝王能够统领手下的臣僚用实心办实事而造成的，决不光是法令严密，一切随顺事情做补救，给官员的作风和治绩涂脂抹粉所能企及的。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获得到天一而占居在纯正的统辖天下的地位上，把天地人聚合在一起，施布出东方的化生仁德。定立起罢免和提升的考核制度，刷新官员的作风和治绩，往远处可以同黄帝用云字、伏羲氏用龙字来命名职官的遗迹相媲美；根据持续高温、久旱不雨的灾象，体念老百姓赖以活命的地方，务必要同毕星喜好雨、箕星喜好风的天象保持一致。广泛施布礼乐教化，进一步讲求道德仁义和技艺，经常让史官吟诵民间的诗歌，叫士子献上规谏的言辞。通过军事胜利安稳住天下，但不忘记一年四季的军事训练，共同把举行射礼时由天子这方面首先演奏《驺虞》诗，再由诸侯那方面演奏《狸首》诗作为美事。美好的名声已经播扬到域外了，深厚的恩惠已经遍及到一切生灵了，各种政务已经接到成功的禀报了，所有的神灵已经履行天职了，竟然还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亲自用六府三事尚未完全得到修明和统一，治国之道尚未达到精纯完备的地步，来进行策问，打算穷尽那仁爱谦让的化导、休养生息的恩泽、审视微妙状态而揣度时务、设布至诚而付诸实行的本源。这可真真是全面听取又对各方都观视并搜采吸纳意见的盛大用心啊！臣下我请求允许完整地陈说这些问题。

臣下我想来，断案定罪是天下人性命攸关的大事，也是和谐气到来以及灾殃逆气产生的源头。我皇上深深哀悯普通百姓无罪蒙冤，时时降下让人改过自新的盛大恩泽，多次颁布停止斩杀的命令，并且对重罪轻判或有罪释放的错断行为减轻处罚，重视疑案不判或轻判的法典，禁止惨忍严酷的动刑，用来警戒错判乱判的举措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民众仍旧大多蒙受冤枉，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也正如制策中所指出的：援引律条大多都很烦琐，复审驳回又诬蔑断案恰当的官员，这些官员又常被弹劾。臣下我认为如今断案判罪的苛酷现象，正出在前面复审驳回很苛刻，紧跟着又进行弹劾啊！古代审核案件的人，大致是让他们议论罪轻罪重，慎重地揣测该轻判或重判，本着宽

大为怀的原则得以竭尽那用心罢了。如今向省级司法机构呈报复审的案件,不论案重还是案轻,必定按驳回再审做处理。负责审案的官员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苛刻又纠缠不清感到苦恼,于是迎头窥测上司意旨所投向的地方,设法编造罪犯的供词,来希求一报上去就得到批准。但细查所谓由罪犯供认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出自本人的口中,而上下往来的案卷,公开称作招供妥当。招供却说什么妥当,这只是侥幸免除掉驳回再审但却不管百姓的性命了。臣下我认为应当稍略让省级司法机构对下面放宽复审驳回以及弹劾,只该慎重地择用本机构的长官人选,来把一方百姓的性命寄托在他的手上,差不多也就很妥当了。臣下我还有进一步请求皇上做出圣裁的问题,这就是减少法外的补充规定,完全依照刑律办。在古代,刑律一经制定,就不能再做改变,而且还有疑难案件的审理规定以及类推判刑的原则,这表明在刑律里面已经包含着灵活处断的用不完的地方了,而不必再增加补充规定,预先都开列出来啊!如今在常例以外,条例一天比一天增多,这只是致使轻罪重判、重罪轻判得以让人容易从中要弄手段而已。况且法律也只看它实际执行得怎么样罢了。割鼻砍脚和破坏生殖器官以及刺面,这都属于当年蚩尤使用的刑罚,而唐尧虞舜沿用它们,没听说有过滥用的情况。五种刑罚细到三千条,作为刑法可以说是最为详尽的了,而在西周的中期,也没听说有过招来吉祥兆应的现象。用刑是否妥当,并不真在于法律的详密与简略啊!又何况当今的刑律所强调的照它来办,对各种犯罪和判刑也全都涵盖进来了。就拿从八个方面对公卿大夫犯罪酌定减刑或免刑来说,也已经把那比照罪轻罪重做判决全都包括进来了,难道仍显不完备,还要再去议定补充规定吗?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的制策考虑到储备粮食应当大力去做好它,又非常清楚常平仓的设立,大多属于一纸空文,朝廷赈济百姓的恩典,到地方上得不到实际贯彻。臣下我认为,在今日还想行用古代遣人官掌管国家余粮进行施予的做法,也就很迂阔而不切合实际了,但像近来多次颁布赈济百姓的命令,也难以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再打算仿效古代由国家在粮价高时低价出售粮食、在粮价低时高价收

购粮食的做法，又担心出现强买强卖、摊派、统购统销的弊端。如果打算完全依仗常平仓，粮食的出入和聚集散发松松垮垮，储存的数量也不真实，这在当前也已经看见了。臣下我私下认为，在现今只有社仓这种做法，还可以行用。确实分别责成辖领一方的太守县令，让他们聘请乡里具有才干与德行的声望高的老年人，劝导乡民按照一定数量缴纳谷米，在规定的时间内收进来，又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发下去，稍略加收一些利息粮，用来抵补朽烂和消耗的那部分。具体施行由乡邑来做，而不由本县去管；负责人由乡里的正派读书人来担任，而不由官吏去充当；进行劝导要凭借忠诚仁厚和怜悯哀伤的那份心肠，而不依仗苛酷紧迫的督责催逼。这样用来抵御灾荒，恐怕也就差不多了吧！

至于制策中所讲的耕作九年，要有三年的余粮，即使发生灾害凶殃，老百姓也不挨饿，这正是使百姓富足的根本大计啊！臣下我认为，当今使百姓富足的办法有三条，第一条叫做减轻赋税，第二条叫做放宽征调，第三条叫做减轻军饷的负担。如今赋税已经具有定额了，似乎没办法再往下削减了，然而古代收税只收总收获量的十分之一，还有的只收总收获量的十五分之一，甚至三十分之一。如今其他省份税额最轻的，同古代相比仍然属于是重的；而江南地区一个省份的赋税收入，就高达六百多万两白银，少交一毫一厘以上的，就予以治罪。等到往朝廷报送帐目表却还不足数的，也有好几百万。这好几百万，老百姓不敢不交纳而公家也得不到它，那么究竟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征收调发一紧急，奸诈和欺骗的行径就容易产生出来；税收名目一多，侵吞就很难追查出来。于是客观上就不得不讨论停征，也不得不讨论免征。既然如此，哪里比得上稍略在百姓那里留有余力而对国家更为有利呢？臣下我请求专拿一个省份去比照其他省份，权衡赋税的轻重，如果确有可以稍略减轻税额的，就予以减轻。把财富收藏在百姓手里，也就等于在官府手中剩有财富，这正是目前要解决的事情啊！

放宽征调的主张，众位大臣已经多次做过陈请了，讲论得也很激切了，皇上更三番五次准备行用了，但却遇到阻碍，不能立刻实行开

来,这是由于富省向贫省拨款来协助军饷的缘故所造成的,臣下我因而就请求陈奏减轻军饷的意见。在古代,一个州的财政收入,必定足以同一个州的财政支出相持平。姑且拿战国来说,养兵百万但并不仰赖别的国家来供给。如今天下完全平定了,可军费供应却接连不断。如果年年用兵,拿出中原地区民力的全部供应,往山岭脚下和海边以及十分荒远、什么都不生长的地方运送军用物资,而所在的势力强大的军区长官,在外部仗着有一两股逃入山林水泽的对抗朝廷的残余分子要剿灭,用来加重自己的地位,而在内部却向朝廷提出种种带有胁迫性的要求,每天都耗费中央财政机构掌握的那份自身生不出来也增长不了的财物,用来满足他们那永无尽头的索取女子玉帛的欲望。这怎么能够持续下去而动不动就照老样子办却不改变呢?臣下我请求对驻军可以裁撤掉的,就裁撤掉它;对那些绝对不能裁撤掉驻军的,就让他们在驻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古代就经常一边作战,一边开荒种地,如今正当养兵而不调用的时期,驻军的力量更可以在开荒种地上让它发挥出来。况且过去军队驻扎在湟中地区,就在湟中地区开荒种地;驻扎在淮水地区,就在淮水地区开荒种地;驻扎在许昌地区,就在许昌地区开荒种地;驻扎在振武地区,就在振武地区开荒种地;驻扎在乌孙国或伊吾国,就在乌孙国或伊吾国开荒种地。怎么可以拿没有能够长庄稼的土地作为借口拒不施行呢?这样去做了,有的地方的驻军,军费还不够用,姑且用离它最近的省份的军饷,酌情拨付,使它够用。等到实行几年后,召募农民开荒种地形成一片兴盛的景象,军备充裕了,于是把富省向贫省拨款来协助军饷全都废除掉。而这项规定一废除,征调就可以放宽了,赋税就可以减轻了;征调得到放宽,赋税得到减轻,老百姓就有剩余的财物了,做得到耕作九年而有三年的余粮了,遇到灾害凶殃也就没有饿得脸色青黄的人了。

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对答,臣下我敢于依从皇上的圣明策问,把自己的愚昧看法全都献出来。尽管这样,处理国政却具有根本,实现大治也具有要领,臣下我认为一定要把鼓舞起天下的人心放在第一位,凭仗实心去推行实政,然后才真行啊!宋朝的大儒朱熹说过这样的

话：世上存在着两种容易出毛病的事情，一是法令制度容易出毛病，二是社会状况容易出毛病。法令制度出了毛病，可以再用法令制度去补救它；社会状况出了毛病，必须要用人心去扭转它。如今文武百官彼此学习和效仿，各种政事全都得到推行，然而众臣僚中有的人害怕受到罪罚的念头很重，但主动站出来为朝廷贡献力量的心思却很轻淡；有的人对功名利禄的考虑很深切，但忠君爱国的道义感却很薄弱；有的人推卸责任、顾念私情的想法倒很多，但公正忠直、承担任务和责任的气概却很少。这些现象或许还是因为驾驭臣僚的方法存在着尚未运用得特恰当的地方啊！臣下我认为应当推布忠正诚信来联结起他们，放宽约束惩罚的规定来优待他们，打破资历限制来越级提拔他们，用优厚的俸禄来激励他们。崇尚圣贤的实学，用来砥砺他们在礼义廉耻方面防止出现闪失；拿当今的紧要政务来测试他们，去观察他们经营处置的实际才干。不断进行磨砺和陶冶，加以锤炼熔铸和鼓舞，而以上所陈奏的那几个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交付给合适的人选处理得绰绰有余了。然而那根基，总之在于皇上的专一用心，确实从早到晚讲论圣贤的学问，完全依凭那警戒谨慎、敬畏惧怕的最高义旨，德业也就越发充盈了；自身恭谨，亮出治理的措施，而完全用君臣互相切磋讨论的实心作统率，各种事端就越发保持警惕了；倾身修明做省察，斋戒别居深沉静默，而完全出自敬奉皇天的一片至诚，吉祥的兆应就招来了；在寒冷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天祈求福佑，请求皇天赐给统治权，而确实用爱护民众的心意感动皇天，对民众加以化生和养护也就实现了。这正是所说的依凭仁爱的心性实行仁爱的国政，而国政就成功，教化就遍及，没有一种事物不获取到它那固有的位置，步入到古代帝王那种协调和谐、天下闻风响应的大治状态了。臣下我本是民间一个普通的百姓，属于刚刚要被朝廷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侵凌冒犯了皇帝的尊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朝考卷一道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微示之也。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者,情相待也。故意气至广,得一人焉,可以不孤矣。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间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意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问,亦用自叹矣。而独是唔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圣人将自己或行或藏的恰当处理,等到有可以同样这样做的人

时就悄悄地告诉他。圣人的行和藏，一贯正确绝不会改变常规。因为颜子在这方面近似他，才可以和他谈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特意对他说这番话。圣人自己整个一生的阅历，只有一两个方面来等待别人分取它，如要求可以不穷尽于它的际涯的情况，往往是很少的。等到有了收获可以充分相信自己的时候，就或者独自占有而不同别人共享，或者独自居处而不去和人谈说，这种心意也许会寄托在白日放歌上来得其乐的吧？但我现在正好有些话想对你说。

颜回啊！人有时有这种情况，自己一生不断得到别人的助力，却始终自己不明白，必须等待那个人来开导他，这是情感上的相待。所以人的志趣极其广泛，能得到一个志趣相同的人，就可以不孤独了。人有时会有这种情况，自己通过长期的冷静观察取得独到的见解，还没有开始在实践中试用，却不知道别人已认识到它，这是精神上的相通。所以学问固然是深奥的，只要有一人认真观察探究，就不容许你始终保守秘密的。颜回啊！我曾试着和你仰望天空研究天时的变化，对下观察人情事理，然后再推测我们自身，是用呢？还是不用呢？是行道呢？还是藏起来呢？急于去行道的容易跌跤，迟疑于行道的会耽误事情，如果不是非要去推行的，人家用你就去推行吗？这样那个人就不再是追求功名的人了。始终隐居的人生活平静，坚决不应召的人会有危险，如果不是必须要藏起来，人家不用就藏起来吗？这样那个人就不再是喜欢隐居在山水间的人了。

曾经试着以推测的方式来寻求那种人，心想在诗书里面必定有那种人，于是便流连在诗书之中来认识他。但是我为什么要学他呢？而这种想法竟感到永无尽头，于是就长久地自行把它作为目标了。暗想自己自从穷究事理观察教化以来，在用和不用之间曾屡屡亲身经历过，都能有我满意的自我处置的情况，这时候也很可以自慰了。又曾经通过亲自去做来试验它，现在在周游天下的时候有小小的专长，却天天在应酬中周旋而忽略了它。但为什么和别人一起学他呢？而这种想法竟寂寂然没有人问，也足以令人自我叹息了。特别是当我们相对忘言相知于心的时候，竟不和我询问评断有关行和藏的疑问，而却深化了这问题中的相互感发的东西，这时也足以使我们两人

共慰了。于是我因此思考到我，思考到我和你。只有我和你能总揽一切事物的终极道理，而且确有独立自主弄清问题的能力，所以完全不管社会上人事的变迁，而只是自己实行自己本性所固有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可以是我，你也可以是你了，用和不用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两个人永远抱守着这种最好的理想境界一起度过自己的一生算了！只有我和你考索验证天地神明的变化，来顺从适应这种无穷的变化，所以虽然积累了深厚的道德修养，却总不去争取走在运气的前面。这个时候，我不坚持是我，你也不坚持是你了，又进行什么行和藏呢？我们两个人永远把这个不可知的问题留给造物主算了！能这样的，只有你和我吧？这个时候的颜回，也怡然有所得，默然有所理解了。〔蔺瑞生译〕

清圣祖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

殿试策问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帝王抚驭寰区,覃敷治化,必务本敦行,厚生正德,俾俗尚鸿庞,兆人乐利,斯庶几时雍风动之上理也。朕仰荷天庥,缵承祖宗大业,孜孜宵旦,期登郅隆。念小民之依,惟农桑是重。而犹虑野余旷土,室鲜盖藏,未底家给人足之盛。将无游惰逐末者尚众,而秉耒耜者或寡欤?蠲租之诏屡下,垦荒之令时举,率作兴事者素矣。其果争趋本业否欤?行莫大于孝,守莫重于廉。汉有孝廉之科,其法犹为近古。自积习浮靡,人鲜门内之行,士昧一介之操。今欲使束修砥节,何道而可?教化之不兴,以凡为士者从事虚名,而未敦实学也,矫伪相煽,中于人心。咸令惕然知返,著诚去伪,抑何术之从也?夫野有醇风,斯朝多端士。匿情饰貌,滋长浇凌,孝弟力田,幸臻美俗。其说可悉指欤?尔多士盱衡古今,于民生士习得失之数,筹之熟矣,其各抒所学,以裨教养之隆。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颜渊问如何去实践仁德，孔子说：克制尽自己的私欲，使自己的言行都回归到礼上，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都会赞许你的仁德。实践仁德全靠自己，岂能凭别人吗？

孔子远承唐尧虞舜的道，近效文王武王的法，往上遵循天时变化，往下因袭水土常规。

圣人是百代的老师，伯夷和柳下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听到伯夷的风操的人，贪婪的人廉洁了，懦弱的人也有独立不屈的志气了；听到柳下惠的风操的人，刻薄的人敦厚了，胸怀狭小的人也心胸宽广了。他们在百代以前发扬了美德。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帝王安辑控驭天下，广泛施行政治教化，必定要致力于根本，切实去实行，使人民生活充裕，并要端正道德，使得世俗的风尚庞大，亿万人民幸福，这也许可以是时世太平、四方广泛响应的上乘治绩了。皇帝我承受上天的庇护，继承祖宗的大业，早晚孜孜不倦地勤于政事，期望国家达到昌盛。考虑到百姓们所依靠的，只有农耕蚕桑是最重要的。因此还忧虑野外有余下的荒芜的土地，家中缺少储存的粮物，未能达到家家富足、人人饱暖的盛况。莫非游荡懒惰逐末弃本的人还很多，而操持农具去种田的人却很少吗？减免租税的诏书不断下达。开垦荒地的命令时常颁发，但率领大家以兴起事功的人却稀少，他们果真在争着趋附农业吗？人的德行没有大过孝的，人的操守没有重过廉的。汉代有推举孝廉这一科目，那种办法还算是接近古代的。自从长期以来形成虚浮靡费的恶习，一般人缺少家庭内的德行，读书人丧失一个人的操守。现在想使大家提高修养砥砺气节，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点呢？政教风化之所以不能兴起，因为凡是读书的人，只致力于追求虚名，而没有崇尚实学，假冒虚伪的风习相互煽惑，侵袭毒害人的

心灵。让这些人都能警觉省悟迷途知返，增添诚实，去掉虚伪，又应采取什么办法呢?民间有淳厚质朴的风气，这个朝廷内的正直人就多。如果隐瞒真情装饰外表，就会滋长浮薄欺凌的风气。让人们孝悌成风，努力种田，有幸形成好的风俗。这方面的道理可以一一指出来吗?你们众多的贤士们纵观古今，对于民生、士习得失的情况已考虑得很成熟了。可以各自发表自己所学的心得，来增益社会教养的隆盛。皇帝我将要亲自阅览它。

陆肯堂　朝考卷一道

陆肯堂(生卒年不详)　字邃升，一字澹成，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状元。由翰林院修撰迁升为侍读。其才气磊磊，为文凌厉顿挫。朝廷之大著作，多出其手。卒于官。

圣人之教不肃而成

自古致治不一主，而一道同风之治必推圣人。何也?天下之众，其待治圣人久矣，而各挟其智力以争胜。夫民各挟其智力，而君人者复以智力先之，是与天下争胜也。与天下争胜，而一道同风之治终不可得而成。圣人知其然。是故原夫天地之性而审乎人情所同，则惟因天下以教天下。初无化民成俗之劳，而天下皆欢欣鼓舞而不知其所由然，而无敢自越于圣人之教。旨哉乎!《孝经》之言曰：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请申论之。

千古之圣人，皆乘权而秉势者也。乘权者可以居高而率物，秉势者可以作法而防淫。而圣人皆有所不恃，曰：我其威天下欤?我教天下耳。然而古今之教亦多术矣。党庠、术序以束之，司徒、学正以董之，上贤崇德以旌别之，春诵夏弦秋礼冬书之属以时教之。即以圣人临其上，而其术亦有所不废。是圣人之教若是乎劳也。然而非劳也。

《礼》曰：先王承天道以治人之情。又曰：立爱自亲始，教民

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夫先王岂不能大有所作为?而必曰承天道，曰治人情，则其意可知矣。立爱立敬而即致民之睦顺，则教之在爱敬又可知矣。且民各所昵则争，至各事父兄、各尽子弟而卒无起而争者，爱敬之原于至性也。民各有爱之性而不知所以爱，民各有敬之性而不知所以敬。圣人之教，务使天下自敦其爱敬，油油然服习于家庭之行、伦序之常、出入趋承之节。其地至近，其事至易，其习闻而习见者至亲且切。若不知朝庭上何以董率而诰令也，更党庠、术序之设，司徒、学正之官也，更不徒循上贤崇德弦诵书礼之文也，然而其教已成矣。粤稽其朝，君无劝赏刑威之迹，臣无三令五申之劳，夏、楚设而不事，桁杨立而无庸，优游歌咏坐致太平。猗欤休哉!是则圣人之不肃而成者也。后之人主亦尝有意于不肃之治矣。然其甚也，滋泮涣之弊而长丛脞之端，殆未知不肃之原者欤?若夫古之帝王，钦明允塞，何其肃于心；严威俨恪，何其肃于天人。然后出之制治，则恭己而已，无为而已，黎民於变四方从欲而已。是圣人之不肃，正其深于肃者乎?其深于肃者何也?本也。

自古以来达到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的不是一个君主，但能达到统一道德风俗的治理水平的必推圣明的君主。这是为什么呢?天下众多的人民，他们等待圣明君主的治理已经很久了，而各自凭着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来竞争胜负。人民各自凭着他们的智慧和力量，而统治人民的君主如也把智慧和力量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在和天下人民竞争胜负。和天下人竞争胜负，那么统一道德和风俗的治理就始终不可能成功的。圣明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依据天地的本性和详察人情的相同之点，便想顺应天下的人情来教导天下的人民。因自始至终没有受到过教化百姓使之形成良好风俗的劳累，天下的人民都欢欣鼓舞并不知道怎么会形成这样好的社会风气，但是却没有人敢于自己超越圣明君主的这种教化。真是好啊!如《孝经》上说的：圣明君主的教化是不用威严而成功的。现在请让我阐述一下这个问题。

远古的圣明国君，都是驾驭着权柄并掌握着权势的。驾驭权柄的人可以居于高位而统领万物，掌握权势的人可以制作法律而防止淫滥。但圣明的君主对这些都不依赖，而是说：我难道要用威严制服天下的人吗?我只是要教化天下的人民的。不过，从古至今的教化，也是手段很多的。用党庠、术序等这些学校来约束他们，有司徒、学正等这些官员来监督他们，用推崇贤才封赏有德的人来区别他们，用春季学诵诗、夏季学音乐、秋季学礼仪、冬季学尚书等这多种学科来按时教育他们。就是圣明君主在执政，以上的手段也是不能废除的。看来圣明君主实行的教化是如此的烦劳。然而实际上并不烦劳。

《礼记》上说：前代君王承奉天道来陶冶人的情性。又说：树立仁爱之心从侍奉父母开始，这是教育人民亲睦；树立恭敬之心从尊敬兄长开始，这是教育人民和顺。前代君王难道不能有很大的作为?他们非要说承奉天道，说陶冶人情，那么他们的想法可想而知了。树立仁爱之心与树立恭敬之心就是要实现人民之间的亲睦和顺，那么所要教化人民的就在于仁爱恭敬，又是可以看出的。人们各自有所贪恋就会争斗，等到各自侍奉父兄，各自竭尽做子弟的爱敬之心，便终于没有起而相互争斗的人，这说明爱敬之心是根源于人的天赋的品性。人们各自都有仁爱的品性但不知为什么要爱，人们各自都有尊敬的品性但不知为什么要敬。圣明君主的教化，务必要使天下的人都能各自注重自己的爱敬品性，悠然自得地习惯于家庭中的品行、人伦次序的常道、出入侍奉的礼节。这种地方极近，这种事极容易，这种常听而且常见的情况极使人感到亲切。好像不知道朝廷上为什么要领导并发布命令，还要设立党庠、术序这些学校和司徒、学正这些官员，而且不但遵循推崇贤才、封赏有德者并要学习弦诵书礼这些文章，然而这种爱敬的教化已经完成了。如考察一下朝廷的情况，君主没有奖励赏赐严行刑罚的行动，大臣没有三令五申的烦劳，虽然设有夏、楚这些责挞学童的工具但不用，虽然有桁杨这些加在犯人脚上颈上的刑具也不用，在悠闲自在、歌唱吟咏的情况下轻易地获得太平盛世。啊哟真是好啊!这就是圣明君

主不用威严而成功的情况。后来的君主，也曾经有意于这种不用威严而得到治理的做法，但是那些最严重的，竟产生了涣散而自由放纵的毛病，并滋长了琐碎杂乱的弊端。这也许是不了解不用威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吧?至于古代的帝王，他们敬肃明察而又诚信诚实，在他的心中是多么庄重!他们严肃威重而庄严恭敬，在对待天和人上他同样是多么庄重!有了这样的修养和品性，然后再去治理政务，就只需要恭谨律己了，就只是不依威严以德化人罢了，就是使天下民众从此改变过去到处放纵私欲的情况罢了。所以圣明君主的不威严，不正是他超过威严的地方吗?他超过威严的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他抓住了爱敬这个根本问题。

陈元龙　会试卷一道

陈元龙(生卒年不详)　字广陵，号乾斋，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榜眼。由编修而积功累擢为广西巡抚。所建兴安陡河石堤及三十六陡门，尽复汉代马援、唐代李渤之故迹。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死后谥号文简。著有《爱日堂文集》。

拟上面谕南省地方大小诸吏、以变易风俗、崇实务本、必使家给人足、以副老安少怀之至意群臣谢表　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二十三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恭遇皇上面谕南省地方大小诸吏，以变易风俗，崇实务本，必使家给人足，以副老安少怀之至意。臣等谨奉表称谢者。伏以圣治勤民，广畴咨而亲补助；皇心重本，崇淳朴而饬浮华。驻辇辂以观风，务令吏治民心之并古；抚江山而问俗，必期厚生正德之兼隆。听纶绋之亲传，睹臣工之交励。恩流北斗，泽溥南疆。臣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

窃惟王者重巡狩之典，必纳贾而陈诗；盛朝纪游豫之休，用观民而设教。问百年而视三老，期遐迩之同风。巡东作而秩西成，冀阎阎之咸足。欲奠斯民于殷阜，必返习俗于俭勤。里布夫征，游惰

与奇赢并抑；任土作贡，衡虞与农牧交资。唐虞世号郅隆，必先教稼；成康治称极盛，首重明农。禁末作而事耕耘，蓄民力于畎亩；贵五谷而贱珠玉，务本计与宫廷。文景称殷富之朝，劝农之诏屡下；贞观当全盛之日，崇俭之政时闻。布帛菽粟之是先，务期驱商贾而归耕凿；锦绣雕镂之必黜，虑其伤农事而害女红。维大定之时，嘉与黎元休息，而雍熙之世，还期守牧承流。顾兹烂烂卿云，大小同宣雅化；庶几芃芃黍雨，郊原共沐深仁。自宫禁远隔九重，而君门遂同万里。深居简出，既罔恤夫民依；廉远堂高，更谁咨于风土。行迈时巡之久废，省方问俗以何从。甚至锦缆牙樯，徒饰旌旗之壮丽；琼花璧月，孰怜蓽屋之痌瘝。风日习于奢靡，户渐流于凋敝。未有恩膏广沛，阳和随凤盖俱舒，咨儆弥殷，化日与龙旗并转如今日者也。

兹盖伏遇皇帝陛下德迈百王，功高千古。乘乾御极，川岳既已效灵；出震膺图，神人罔弗协应。仁恩普被，草木若而风雨时；威武遐宣，烽燧销而讴歌起。会见丰亨共庆，筐进八蚕之绵，大有兴歌，家登再熟之稻。乃念西北近环畿辅，巡历之典时行，东南遥阻江淮，望幸之心未慰。况值上元开泰，正逢甲子一周，涓吉日而亲巡，戒属车而远历。受元符于泰岱，云外呼嵩；考底绩于黄河，波臣拜舞。悯泽国昏垫之厄，驰豹尾而下淮阴；思江左财赋之区，飞鹢首而临吴会。撤羽林之万骑，童稚不惊；建翠葆于双桡，耕桑在目。扶杖而环玉勒，踊跃震天；负耒而傍霓旌，欢呼地动。固已山川土物，尽入睿谟，乃因区域缤纷，弥回宸眷。谓芜城风月，俗未变于陈隋；建业繁华，习犹沿于晋宋。冷流黄于夜月，争听雀舫讴歌；卧钱镈于青畴，又逐龙舟竞渡。茂苑之城女画，阊门之瓦欲流。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泞。然而伯通庑下，岂无贫士之孤春？漂母祠边，或少王孙之一饭。横阓阓而流溢，无非陆海珍羞；睹村鄙之凄凉，尚缺晨昏藜藿。家无担石，尚事春游，甑欲生尘，不忘花信。卖丝粜谷，仅供一日之繁华；剜肉补疮，莫救他时之缓急。学歌习绣，渐废男耕女织之勤；秉烛飞觞，竟忘出作入息之旧。倘相沿而不改，将自敝以何堪！特谕镇抚诸

臣，务期变移斯俗。览风土于四国，无须几幅幽风；聆咳唾于九天，不必十行汉礼。葭灰乍转，亲承帝训春温；黍谷初回，共睹王言日丽。自督抚以至守令，敢忘教养兼资?由郡县而迄郊原，会见雍熙成俗。缙绅士庶有定分，毋僭越以相夸；冠婚丧祭有常经，勿虚靡以互竞。习劳务本，宁恃居奇货殖之长；返朴还醇，自变轻诜浮夸之习。量入为出，务期用之有度而取之不穷；节用守身，要令富不至贫而贫可使富。聚游手之徒于南亩，江村尽作桃源；归流离之众于故庐，沮洳皆成粟里。地无弃利，何忧满地之追呼；岁有余粮，足慰终岁之勤动。从此月明夜织，尽是丰年，雨洒春耕，无非乐土。士食旧德，农服先畴，贱奇丽而弗珍，耻纤靡而不服。黄童白叟，重逢击壤鼓腹之风；白粲朱提，共睹千仓万箱之庆。治斯茂矣，化孰隆焉!

臣等才惭抚牧，职愧旬宣。际四海之升平，时怀沃土瘠土之训；念三吴之烦剧，尤怀既庶既富之虞。日驭飞巡，窃幸举头见日；天颜咫尺，敢不涤虑承天。伏愿化洽时雍，治隆丕变。蠲浮粮而宽常赋，俾南国永沐恩膏；重抚字而缓催科，使廉吏皆登上考。泽遍山陬海澨，跻赤子于春台；化通出日无雷，登远人于衽席。则嘉禾生于田亩，庆万年有道之长；神雀集于殿庭，衍百世无疆之福矣。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康熙二十三年某月某日，徒居官位的臣下等恭遇皇上当面训示南方地方大小官员，要求他们改变风俗，崇尚朴实，致力于农业，必须要使户户富足人人温饱，以实现老人安逸年轻人怀思的极深远的用意。臣下等谨上表道谢。臣下等匍匐在地认为陛下圣明的治理，总是尽心尽力于民事，广泛访求问题并亲自给以救助。皇帝的心意重视根本，崇尚淳厚质朴而斥责浮虚华丽作风。常停下车舆来视察民风，一心要使官吏的作风治绩和人民的思想感情都返朴归真；常巡视天下询问各地方的风俗，务必企求在富裕人民生活和端正人民德行两方面都能做得很好。臣下听到了诏令的当面传达，皇上可以看到群臣百官互相勉励。恩惠来自北方的朝廷，恩泽遍及南

方的臣民。臣下等非常惶恐不安，稽首顿首，进呈言辞。

暗想古代帝王重视通过巡行视察邦国的制度，诸侯必须进呈市场物价的贵贱和采集进献民间诗歌。现在圣明的朝廷记载游乐的美好景象，用来视察民风和实施教化。慰问百岁老人并看望三老，期望远近都是同样的风气，巡视春耕并依次关怀秋收，希望民间粮食都很充足。欲使这些百姓都达到富足，必须使风俗恢复节俭和勤劳。对民间和壮劳力征发赋役，就使游惰之民和经商牟利的人都受到抑制；依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的品种和数量，让守护山林的官和从事农业牧业的人都供给朝廷。唐尧虞舜时代号称最为兴盛，是因为必须先教耕作种植。周成王、周康王时代被称为至治之世，是因为首先重视推崇农业。禁止工商业而去从事耕耘，把民力都蓄集在农田上；重视五谷而看轻珠宝玉器，要致力于根本之计和官廷治理。汉文帝汉景帝时虽被称为殷实富足的朝代，鼓励农耕的诏令屡屡下达。唐代贞观年间虽正当全盛之日，但崇尚节俭的政治措施常可听说。要把布帛豆谷等当做第一位的事，就务求要驱使经商的人都返回到耕田凿井的农业上。锦绣物品雕刻器物之所以必须摈弃，是担心追求这些会影响农事和女功。在天下全部安定时，要奖励优待百姓休养生息，即使到了和乐升平的时代，还是期望州郡长官继承以往良好的风尚传统。看到这少见的色彩鲜艳的庆云，尊卑长幼一起宣示纯正的教化。希望有茂盛的黍苗润沾膏雨，使郊原的人民共同蒙受深厚的仁爱。自从宫廷远隔九重宫门，国君的门便如同有万里之遥。如果深居简出，便不可能忧念人民的苦衷；堂帘远离地面，殿堂高高在上，老住在这里还有谁去谘问风土人情。按时出行巡狩的制度长久废置，巡视四方访问民俗的事将怎么办?甚至用锦制的缆绳象牙装饰的桅杆，徒然把旌旗装饰得那样壮丽。天天对着珍贵的琼花和皎洁的明月，还有谁可怜那些草屋中人民的疾苦。风气一天天习惯于奢侈靡费，家家的日子渐渐走向衰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恩译广泛降临，春风随着凤凰伞盖一起舒展；征询和警戒非常殷勤，阳光和龙旗一起移动。

如今敬遇皇帝陛下，您的德行超过历代帝王，功绩高于久远的

古代。登极为帝统御乾坤，山岳河流都已经献出灵异宝物，登基得国承受瑞应之图，神灵人民无不协和响应。仁爱的恩泽普遍施与，草木茂盛而风雨及时。军威宣示到遥远的边方，烽火熄灭而颂歌四起。将会看到富厚顺达普天共庆，进贡一年八熟的蚕丝；在丰收之年到处兴起歌声，家家户户收上一年两熟的稻米。于是想到西北方就近环绕着京都，巡行视察的制度时常举行，东南方远隔着长江淮河，臣民希望皇上临幸的心未能得到安慰。况且正遇上第一个甲子年即上元之年，一切亨通安泰。选择一个吉祥的日子去亲自下去巡视，命令备好侍从车辆前去远行。在泰山上接受大的祥瑞，云外传来祝颂的呼声；在黄河边考察取得的治绩，连河臣也跪拜舞蹈谢恩。哀怜水乡人民陷溺于水灾的苦难，车驾驰驱南下淮河以南。考虑到江东财货贡赋的地区，飞船来到了吴会。虽散布着羽林军的千军万马，但儿童们都不害怕。把翠羽缀成的葆盖立在船上，种田的采桑的都看在眼里。老人扶着拐杖围住戴着玉饰马衔的御马，跳跃欢呼声震于天，农夫背负着农具靠近彩旗，齐呼万岁惊天动地。固然山河土产都已经完全在皇上圣明的谋略之中，也因为众多的区域都受到皇上的恩宠。说是芜城的风情，还没有改变陈、隋时代的风俗。建业的繁华，仍然沿袭着晋、宋时代的旧习。妇女在夜晚的月色下停织流黄，争着去听河中雀舫上的清美讴歌；男人们把锄地用的钱和镈卧放在绿色的田野上，又争先去看龙舟竞渡的比赛。苏州的城市，城西阊门上的瓦因人声震撼好像在动。人们挥动衣袖的风扬起红尘使得白天也昏暗起来，人们汗流如小雨纷纷使得路上都泥泞起来。然而，大富豪皋伯通家的走廊下难道没有贫士梁鸿在孤独地舂米吗?在为赐饭给韩信的洗衣老母建立的祠边，或许连王孙公子的一点祭饭也没有。顺着街道在流溢的，无非是陆地上海洋中能有的珍贵的菜肴食品。再看一看乡村的凄凉景象，每日早晚连灰菜豆叶这类粗劣的饭食也可能缺少。家中没有一担一石的粮食，竟然还去春游不去耕作；蒸食的甑器上眼看要生尘土了，还不忘开花的消息不想劳动。农民卖丝粜谷的钱，只能供上有些人一天的奢华生活。剜掉自己的肉去补自己身上的疮，并不能补救将来的危急。学

习唱歌练习刺绣，渐渐丢掉了男耕女织的勤劳习惯；持烛照明频频举杯，竟忘记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老作风。上述恶习倘若相互沿袭而不加以改变，将会自己损害自己而怎能忍受呢?特诏令总兵、巡抚各位大臣，务必要改变这种风俗。在全国四方观看风土人情，不一定非要看到几幅博大高雅的豳风图景。在皇上面前亲听圣旨，就不必非要用汉光武的十行诏书。占气候的葭灰刚刚飞动，便亲自承受了像春天一样温暖的帝训。春天刚刚回到京都附近的黍谷，便一起听取了像阳光一样明丽的王言。从总督、巡抚以至郡守县令，岂敢忘记教化养生不能缺一。由郡县直到郊外，将会见到和乐升平成为普遍现象。官吏和平民有确定的名分，不能非分超越而相互夸耀。加冠、婚礼、丧礼、祭礼都有常规，不应任意浪费并相互竞赛。应习惯于勤劳致力于农业这个根本，岂能依恃居奇经商的长处。应该恢复醇厚朴实的作风，自己力求改变轻率浮夸的不良习气。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务求使用财物有一定限度做到拿不完用不尽。节约用度保持美德，要让富裕的人不至于再贫困，而贫困的却可使他们富裕起来。把游手好闲的人都聚集在农田上，使水乡村庄都变成像桃花源一样的理想世界。使流离失所的人都重新回到故土老家，让低湿的地方都成为可耕和像陶渊明家乡栗里一样可躬耕自给的地方。土地上如果没有丢弃的资源，还忧虑什么满地追呼到处逃难。每年都有余粮，便足以安慰一年的辛勤劳动。从这个时候起，明亮的月光照耀着夜间织布的妇女，每年都是丰收之年；及时的春雨淋洒着春耕的土地农夫，每个地方没有不是安乡乐土的。士民承受先辈往日的德泽，农民致力于先人遗留下的田地。轻视奇瑰艳丽的东西而不珍贵它，耻于用细巧华丽的东西而不使用它。儿童和老人，重新遇上古代作击壤游戏鼓腹而歌的太平盛世。到处是白米白银，可以共同看到千仓万箱银粮丰足的人民欢庆的富裕生活。治理达到这种程度就算很好了，教化取得这种结果还有什么比这更强的呢?

臣下等自惭缺少安抚治民的才能，有愧于不能很好履行周遍宣示圣谕的职责。遇上四海升平的好日子，仍时刻记着古人关于沃土

之民不成材，因为太安逸；瘠土之民无不向义，因为勤劳的这种教导。想到三吴地区繁重的事务，更让人怀着人多了要使他们富，人都富了要教育好他们的这种忧虑。皇上的车驾如飞一样来巡察，私自感到有幸一抬头便可见到皇上；皇上的容颜近在咫尺，岂敢不丢掉一切不应有的顾虑来奉承天颜。衷心希望今后教化普施时世太平，治绩隆盛民风大变。免去定额外的粮税并放宽正常的赋税，使南方各地永远蒙受恩泽。重视抚恤百姓并放缓催收租税，使廉洁的官吏都能列入上等的考绩。恩泽遍及山角海滨，使百姓们都过上饱暖的生活。教化通向日出的地方，没有人不顺从，而且冬日无雷，都是丰年，这使得边远的民族都过着太平安居的日子。这样就必然会在田亩中长出茁壮奇异的禾稻，庆贺万年有道的君长；凤鸟降落在皇宫的殿庭上，长久地享受百世无疆的吉福了。臣下等不胜仰慕圣明的皇上而感到激动恐惶之至。谨奉上表章表示称谢以达圣听。

〔蔺瑞生译〕

清圣祖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

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

殿试策问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初四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临御天下四十余年，宵旰不遑，勤求化理。凡吏治之淑慝，民生之休戚，无晷刻之顷，不切于怀。比岁以来，利兴弊革，随事剔厘，蒸蒸然有治平之象、康乐之风矣。然而官方犹未尽饬，习俗犹未尽醇，讼狱犹未衰止，岂久道化成之难期欤?抑有司奉行者之不力也?从来治有大体，贵在适中。若或矫饰以邀名，深刻以表异，虽复矢志洁清，而民不被其泽，岂非务综核，则人受烦苛之扰；尚宽平，则人蒙休养之福。其何法以激劝之欤?夫闾阎之风俗，世道之淳漓系焉。风俗厚，则仁让之教兴；风俗偷，则嚣凌之气炽。今欲使家敦孝弟，户励廉隅，共勉为忠厚长者之道，而耻为非僻浮薄之行，宜何术之从也?至于刑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者也。若乃饰辞周内，轻重失平，又或恣意滥刑，无辜罹罪，朕甚痛之。每当法司奏谳，必详酌再三，求其可生之理。兹欲听讼之吏，体朝廷好生之心，悉归平允，以渐臻于刑措，何道而可?夫吏治纯而不杂，则民心感而易从，习俗厚而靡争，则刑罚清而不滥。事有相因，理本一致，尔多士诵习诗书，讲明久矣，其悉心以对。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大学的根本要求,在于彰明自己本性固有的美德,在于使人民革除旧习去作新人,在于使上述两方面都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孔子说:禹,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

有源头的泉水滚滚而流,不分白天晚上,流满了坑坑坎坎后继续向前流,一直流向大海。有本源的便像这样,孔子就是取它这一点罢了。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自从统驭天下以来已四十多年,每天早晚都没有空闲时间,在勤劳不倦地力求教化治理好天下。凡是官吏的作风和治绩的好与坏,民众的生计生活方面的喜乐和忧虑,没有一刻时间不深深地挂在心上。近年以来,有利益的事在兴起,以往的弊端在革除,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该去除的去除,该治理的治理,一切蒸蒸日上,似有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气象和安康欢乐的景象了,然而为官之道还没有完全得到整顿,风俗习惯还没有完全变得醇厚,诉讼还没有减少停止。这难道是长期倡导教化成功是很难一下做到的事吗?还是官吏中遵奉执行的人不肯用力呢?从来治理国家虽有大的纲领,但可贵之处在于要做得适中。如果用造作夸饰的不正当手段来捞取名声,用严峻苛刻的做法来标新立异,虽然再立下誓愿要做到廉洁清白,但人民却得不到他的好处。这岂不是要致力于综合考核,人们就要受到烦琐苛刻的骚扰;如果崇尚宽平,人们就会享受休养生息的福气。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激励劝导这些官吏呢?民间风俗的好坏,是关系到社会上风俗的淳厚和浇薄的。风俗如果淳厚,仁爱谦让的教化就会兴起;风俗如果浇薄,嚣张欺凌的风气就会严重起来。现在想使得家家劝勉孝敬父母和敬爱兄长,户户勉励树立端方不苟的品行,共同

鼓励去做忠实厚道德高望重的人，而耻于去做邪恶轻薄的事，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呢？至于刑罚这种事，关系着千万人民的生命，是用来禁止暴行防止奸伪，使良善的人们生活安全的。如果是用虚浮不实之辞罗织罪状，就会使判决结果轻重失平，或者任意判罪施刑，就会使无辜的人遭受罪罚，皇帝我非常痛惜这些人。每当司法官署将案件上奏请示定罪时，皇帝我必定再三详细斟酌，寻求他有没有可以不死的理由。现今想使负责审讯的官吏，能体察朝廷爱惜生灵的心意，使案情审理全部做到公平恰当，以逐渐达到使刑法闲放在那里而不必使用它，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上述目的呢？官吏的治理政事的行为和方法如果纯正而不杂乱，人民就会心中感动而容易服从；风俗习惯如果淳厚朴实而不相互争斗，刑罚就会清正而不过度。事情的相互之间都有因果关系，事理本来就有相同的地方。你们众多的贤士诵读学习诗书，早已讲解研究得非常清楚了，可以尽心地回答上述问题。皇帝我将要亲自阅览它。

王式丹　会试卷一道

王式丹（生卒年不详）　字方石，号楼村，江苏宝应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其为人积学嗜古，淡于仕进，不久以疾归。著有《楼村集》。宋荦选刻《江左十五子诗》，以式丹为最。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

夏德之无可议也，圣心有独契焉。夫世称禹功，未有以间求之者。“吾无间然”之叹，殆别有契于明德之远乎？若曰自古帝王，往往伟伐振天壤，休问及来兹，而论世者犹指其隙而议之，岂后人之过刻哉？彼其盛业所传，或擅其大而遗其细，或著于显而忽于微。于是后人从俯仰论赞之余，不觉抚卷太息，以为是固不免于有间然者也，而特不可以论禹。

夫禹也，勋华临于上，而以司空创未有之功；崇伯隳于前，而以文

命干先人之蛊。为臣为子,天下皆知其无可指摘之端。而或者帝降而王,将不无遗议乎?抑禹也,出天下于龙蛇洚洞,而《禹贡》一书,遂贻则壤之利。审时变于禅让征诛,而象贤有嗣,遂开传子之天。治国治家,天下皆谅其更无罅隙之地。而或者德变而功,亦将有微訾乎?乃吾窃盱衡当日,而有以知其无间然也。今夫论人而求其间,非必薄待其人也。恒流每惧为人讥,而上哲则耻为人恕。正惟其抱非常之略,负高世之名,而施以责备圣贤之论,必将指其过误以相为惋惜。甚或原其不得已之情而暴扬遗迹,以与天下共咨嗟于受过之有故。此亦昔人之所不辞也。独至于禹而觉无不可辞者,吾益信吾之非有私于禹矣。且论人而有所间,亦正不必曲护其人也。过多者或奖其小善,而功大者反录其微瑕。正惟其荣称溢乎当代,鸿号垂于无穷,而衡以示诫后人之思,必不混于是非以稍为假借,甚至极之无可逃之地,而推见至隐,以与后世共儆惕于覆过之无从。此意又昔人之所深折也。独吾之于禹,而无可使之心折者,吾益信吾之非饰过于禹矣。

立乎有虞之廷,皋陶有谟,益稷有赞,其与闻乎危微者,宁无推求同列之才?然而禹拜昌言以后,未闻其吁咈而讥弹也。夫岂独两阶既格,尚留淳朴之风?抑亦祇台之自中而发外者,实有以协极于中天,而为稽拜之所不能窥也乎?历乎三代以来,商人有誓,周人有诰,其屡迪乎多方者,渐有弥缝口实之意。然而禹平水土以前,不闻其推原而释惭也。夫岂独衢壤流风犹多顺则之众,抑又文德之自心而征事者,宜有以远迈乎后王,而为掩覆之所不必施也乎?夫以禹而犹求其间,是圣人之难也。乃由吾而历观其无间,则圣人之难也。

夏禹的品德没有可以非议的地方,在圣人孔子心中是有独特的体会的。历代人们称颂禹的功绩,从来没有人去探求禹的缺点的。“我没有什么批评”的感叹,大概是另有感于美德意义的久远吧?如果说,自古以来帝王们伟大的夸耀往往可震动天地,美好的声誉可传到后世,然而评论时世的人仍然指着他的缺点而议论着它,这难道是后人过于苛刻吗?他们的盛大的事业流传到后世,或专讲他们大的方面而遗漏了细小的方面,或称道他们明显的功绩而忽略了那些不明显

的事。于是后人从一俯一仰的沉思默想和论评赞美之余，不觉抚摩着书卷深深地叹息，以为这些事迹确实不免于有可以非议的缺点。然而只是不可以这样评论禹。

禹这个人，唐尧、虞舜都君临在他的上面，而他以司空的身分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功绩。他的父亲鲧在他治水之前被处死，而他却从事他死去的父亲没干好的事。在做臣子和做儿子两方面，天下的人都知道绝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不过或者在由帝降而为王这个问题上，将不会没有留给后人议论的吧？还是禹这个人，他使天下的人逃脱了龙蛇困扰大水弥漫的灾难。而《禹贡》这部书，给后人留下了划分土壤等级的好处。他在帝位禅让和征诛叛逆方面能详细审视，又有能效法先人的贤德的后代，便开始了传王位给儿子的时代。在治国和治家两方面，天下的人都相信禹更没有什么有缺陷的地方。而或者在由德高变为功成这方面，也将有细小的过失吗？可是我纵观昔日的一切情况，却有理由知道他是没有缺点的。而今说来评论一个人去探求他的缺点，并不一定是轻视亏待那个人。平常的人常害怕被人讥笑，但那些超凡的贤人却耻于被人宽恕，这正是因为他具有不平常的谋略，享有超越世俗的名声。如果对圣贤之人进行责备性的评论，必然将要指出他的过失错误并表示出惋惜之情，甚至会推究出他不得已而为之的具体情况，并暴露传扬流传下来的迹象，来和天下的人共同叹息他承受责备是有原因的。这也是古人所不推辞的。唯独对于禹，却觉得没有不可推辞的，于是我就更加相信我对禹是没有什么偏私的。况且评论一个人对他有所批评，这也正是不必曲意袒护那个人。对过失多的人或者赞扬他的小小的善行，而对于功绩很大的人也许反而记录他一点细小的过错。这正因为他的美称传遍了当代，大名流传于千古。如果对他做一点公正的批评来对后人以示儆戒，这就必须不能使是非混淆而对他稍为宽容，甚至会穷究到他没有可以逃遁的地方，而推见到他的极隐蔽的问题，来和后世的人共同警惕于遮掩过失是不可能的。这个意思又是古人所深深折服的。但唯独我对于禹，却没有什么可以使他的内心折服的东西，于是我更加相信我绝不是要为禹掩饰什么过失的。

禹立身在虞舜的朝廷之上,大臣皋陶对舜谈了自己的谋略,益和稷协助禹治洪水。当他参与朝政会议听到舜帝谈到人心危险和道心幽微,要把帝位让给他时,难道没有向舜推荐与自己同一班列中有才能的人吗?虽然这样做了,然而当禹在征三苗无功,听到益的建议便拜谢了益的美言以后,并没有听到别人对禹的失误议论纷纷进行讥讽和抨击。这难道只是因为禹用文舞感召三苗,还留存着淳厚朴实的风气?也许是禹的恭敬发自内心而表现于外的言行,确实能够造成盛世的和谐,从而使臣下所体察不到吧?经历了夏、商、周三代以后,商代的人有《汤誓》,周代的人有《大诰》,他们屡屡开导众多邦国的话,渐渐有弥合人们口实的意思。然而在禹平治水土以前,并没有听到他为父亲的失误而推究本原以消解惭愧心情的话。这难道只是当路击壤讴歌的风气还有众多的顺从法则的民众?或者是在礼乐教化由内心修养而验证事实的方面,确实有远远超过后代君王的地方,从而使得没有必要掩饰过失了吧?对于禹这样的人却仍要寻求他的过错,这是圣人要做的难事;现在却由我一一考察看到他确实没有缺点,便证明圣人完成了一件难事。〔蔺瑞生译〕

清高宗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屨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

殿试策问

[乾隆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绍承大统,抚御万邦,宵旰孜孜,勤求治理。所冀内外臣工,靖共尔位,闾阎黎庶,共庆盈宁,群材之登进日隆,边境之敉宁益永,庶几海内臣民,共登上理焉。顾官方或未尽肃,民食或未尽丰,取士之术犹疏,边圉之防未备。将何以整纲饬纪,以臻郅隆之治欤?

国家设官分职,所借以熙绩亮工,宣上德而达下情也,唐虞之世,五臣、四岳、九官、十二牧,师师济济一堂之上,同寅协恭,用能明良喜起,成中天之盛治。然虽有都俞,不废吁咈。一时动色相戒者,犹以丛脞为虞。观赓拜扬言:慎乃宪,屡省乃成。其交相责者何至也!朕日以修和之盛,望之内外大小臣工。顾因循瞻顾之私,或犹有未尽化者。官方之砥砺,其道奚从?

农者,天下之大本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开其资财之道,斯以蓄积多而备先具。周家穑事启国,爰兴八百之基。逮至西汉文帝,蠲租劝农之诏屡下,而皆以务本为兢兢,岂非治要之所在欤?今幅员日广,民生日繁,游惰杂处,其间雕文刻镂,伤农之事愈兴。俗尚奢靡,罔知节俭。朕勤求民瘼,闾阎之艰苦,纤悉周知。偶有偏灾,赈恤立沛。然裕民足食之道,有不得不深为计者。今欲重农事而务本计,其

道安在?

制科取士,所以振淹滞,储任使也。登明选公,责在有司,鉴空衡平,言乎公则生明也。比年以来,加意厘剔,宜人知畏法,罔敢触禁矣。而不谓舞弊者之即生于察弊,此虽千百人中仅亦一见,即或者处士虚声,恩门年谊,习俗相沿,流风未殄欤?司衡者秉校士之任,当使寒畯无沦落之虞,非材绝觊觎之念,斯无负辟门吁俊之盛典。宜如何立法,俾宿弊永蠲,以光文治欤?

国家文德既修,武事必备,防边固圉,绸缪未然,非以夸远略也。汉唐宋以来,兵制迭更,其间善否,或亦有可采求者欤?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兵,选将固在所重矣。然将非兵莫与为用,兵非将莫与为统。联属之方,娴习于平时,诚不可缓。我国家全付所覆,土宇畈章,亘古罕匹。而将士之勇,韬略之娴,训练之精,制胜之神,皆远过前代,惟是承平日久,或狃于佚乐,易致废弛。则修明武备,以慎固边圉,所宜豫为筹论者也。

凡此者,上自庙堂,下周乡国,本保泰持盈之心,筹制治保邦之要,思皇多士,久沾雅化,其以素所蕴蓄者,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君子害怕的有三件事:怕天命,怕王公大人,怕圣人的话。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虽然他是愚昧的也必定会变得聪明,虽然他是软弱的也必定会变得刚强。

孟子去到滕国,住在上官。有一双没有织成的草鞋放在窗上不见了,旅馆的人寻找鞋找不到。有人问孟子说:“像这样,恐怕是随从你的人把它藏起来了吧?”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承帝业,安辑统驭天下,每日早晚孜孜

不倦，辛勤地探求治理政务的道理，所希望的是内外的官吏，都能静肃恭谨地奉守自己的职位，民间的百姓，都共同庆贺生活丰盈和安宁，各种人材的升进一天比一天多，边境上的安定更加永久。这也许可以使全国的臣民们，都步入治理的最佳状态。但是做官的应遵循的为官之道或者还没有完全整顿好，人民的粮食或者还没有完全充裕，取士的方法还有疏漏的地方，边疆的防御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将要用什么办法整顿法度整治纲常，来达到最兴盛的治理呢?

国家设立官员划分职责，是凭借这些来弘扬功业辅佐天子立功，宣扬朝廷的恩德和上达人民的情况与思想。在唐尧虞舜那个时代，有五臣、四岳、九官、十二牧这许多官员，相互师法庄严恭敬地聚集在一堂之上，君臣互恭互敬，协同一致，方能君主圣明，臣子忠良，大臣们乐意办事，君主奋起治理，成就盛世的盛治。即使如此，他们君臣之间讨论问题，虽可以用“都”“俞”这种语气表示赞同，也不在乎用“吁”、“咈”这种语气表示不以为然。一时以激动的表情劝戒舜帝的人，仍然把君王的琐碎而没有远大谋略当作值得忧虑的事。看了皋陶向舜帝连续跪拜大声说：“谨慎执行你的法度，不断省察你的成就”。会感到他们君臣相互要求是多么高啊!皇帝我每天把君臣之间的和衷共济的盛况，寄希望于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吏。但因循守旧瞻前顾后的私心，或者还有未能完全改变的。为官之道的磨练，究竟应该采用哪种办法?

农业这件事是天下最根本的问题。仁德只在于政务治理好，政务的关键在于养育人民。开辟取得钱财物资的各种渠道，这就可以做到蓄积很多钱财而使储备预先齐全。周朝就是靠搞好农业开国，于是建立起统治八百年的根基。等到西汉文帝时，免除租税劝勉务农的诏书不断下达，而总都是把从事农业作为谨慎关注的事情，难道这不是施政要领的所在吗?现在国土疆域一天比一天扩大，有关民生的事一天比一天繁多，游荡懒惰的人杂处在农民之中，其中有些人热心于刻镂文饰器物的工作，使伤害农业的事越来越多。习俗崇尚奢侈靡费，不知节俭。皇帝我殷切了解民众的疾苦，对民间的一切艰难困苦，都细微详尽地知道。偶然遇上大灾，救济灾民的钱

物会立刻发下去。但是使人民富裕都过上丰衣足食生活的办法，仍有不能不深深为之考虑的。现在想重视农事而去致力于根本之计，它的办法在哪里呢?

用科举制度取士，是用来选拔那些被埋没的有才德的人和储备将要委用的人才的。进用上贤明而且选取公正，责任全在负责这方面事情的官员，不存私情，评定公平，这是说公正就可以形成贤明。近年以来，由于加意革除弊端辨别优劣真伪，应该是人人知道畏法，不敢触犯禁令了。却不料舞弊的人就出在检察作弊的人身上。这虽然在千百人中也只是仅仅遇到一次，但或许正因隐居的士人盗取虚名，仰攀师门和讲究同年登科的关系，这些习俗相沿，长期流行的风气还没有灭绝吧?负责评阅试卷的人担负着考评士子的责任，应当使出身寒微而有才学的人没有沦落的忧虑，使只有浅薄才能的人断绝非分希望的念头，这样才能不辜负广开贤路呼唤俊才的盛典。应该如何立法，使积弊永远消除，来光大文治呢?

国家的礼乐教化已经搞好后，和军事有关的事必须准备好，要巩固边防，事先做好一切以防患于未然，这并非夸示对远方用兵的谋略。汉唐宋以来，建军制度不断变更，他们的办法到底好不好，或者也有可以采取的地方吧?有必胜的将领，但没有必胜的兵士，因此选择将领就成为必须重视的问题。然而将领如果没有兵便没有人为他所用，兵士没有将领就没有人统领他们。将与兵联系的常规方法，应在平时就熟悉，确实不可迟缓。我们国家全部承受到皇天所覆盖的地方，疆域版图自古以来很少能和现在比的，而将士的勇敢，韬略的娴熟，训练的精良，制胜的神妙，都远远超越从前各代。只是因为天下太平的时间过于长久，有时习惯于悠闲安乐，容易导致对军事管理的废弃懈怠。看来整饬昭明军备，来认真巩固边防，是应该预先进行筹划讨论了。

凡是这些问题，上自朝廷，下到乡国，都本着保持安定兴盛的局面，谋划治理政务保护邦国的关键。你们这众多的贤士，长时间接受纯正高雅的教化，可以把你们平素所蕴蓄起来的学识，详细地写出来。皇帝我将要亲自去看它。

卢文弨　殿试对策

卢文弨(1717～1796)　字弓召，号矶渔，又号抱经。浙江余姚人。乾隆十七年(1752)探花。后官至侍读学士。乞归奉养父母。归田后，主讲书院二十余年。平生好校书。所刊抱经堂汇刻书十五种，最称精审。又合经史子集三十八种，摘字而注之，名曰《群书拾补》。自著有《〈仪礼〉注疏详校》、《〈广雅〉注》、《钟山札记》、《龙城札记》、《抱经堂文集》。

臣对：臣闻帝王之治天下也，如治巨室然。公卿者，栋梁也。百执事者，茨盖也。民也者，基址也。士也者，储蓄也。将帅者，垣庸也。甲兵者，关键也。是皆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天下至大，百官兆民至众，与夫庠序之修明，边圉之巩固，其事皆萃于人主之一身。而要其所以致治之具，无他焉，在慎守其纪纲而已矣。盖信赏必罚者，治天下之大柄也。以正官方，则忠荩自矢之臣必重其任而善遇之，其背公营私者在所必斥也。以裕民生，则课农务本之吏必著其劳而优奖之，其治理无状者在所必罢也。以端士习，则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而因言亦当核其邪正之分。以严武备，则选将必取其有谋，练士必取其用命，而有事更必明其功罪之实。此所谓慎守其纪纲者也。盖虽圣王在上，不能使朝尽无佥壬，野尽无游惰，学校必无辱行之士，四境必无窃发之虞。而其所以卒成至治者，道不越乎此。

钦惟皇帝陛下，具清明刚健之德，又深以格致诚正之学，敬存于宥密，而事协于大中。固已知人善任而作其寅恭，重农薄赋而足其生计。尚经义，崇实学，以求有用之才；勤训练，慎封疆，以获敉宁之效。乃犹圣不自圣，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整饬官方之道，备裕民食之图，与夫作士防边之善术。臣之愚陋，何足以知之？然清问所及，不弃刍荛，臣敢不罄其愚衷，以为拜献之资乎！

伏读制策有曰：设官分职，所借以黜绩亮工，宣上德而达下情，而因及乎砥砺之有其道。臣惟王者所与共治天下，内有辅弼之臣，外有

司牧之职，皆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唐虞之世，五臣九官所以治其内，四岳十二牧所以治其外，师师济济，称极盛矣。而君臣之间动色相戒。其臣之所以进勉者，必曰无怠无荒；其君之所以倚毗者，必曰予违汝弼。盖皆以克艰为心，而不敢一刻自暇逸也。夫同寅协恭之义，言君与臣同此敬畏之心也。天命之难谌，民情之难保，虽当太平无事之日，而持盈保泰弥凛日中之戒，推其心岂不愿有都俞而无吁咈哉？然而不能已者，安危治乱之几相为倚伏，而惟恐失于不及觉。故兢兢乎慎之又慎，然后可以免丛脞之咎，而常保此明良喜起之休风也。惟其同此寅恭之心，故和衷之美亦于斯而见焉，非若以水济水之谓。苟君所谓可，虽有否焉而亦曰可，君所谓否，虽有可焉而亦曰否，此则因循瞻顾之私，非纯臣之所宜居心也。夫臣之所以事君，但当衡之于道，不当承望意旨以为迎合之计。君之所以察臣，亦惟断之以道，不当乐其将顺以开谀悦之风。则职事得以修举，而大小臣工自无不精白一心，以期报称矣。

制策又以养民必开其资财之道，斯蓄积多而备先具，而因筹其何以重农事而敦本计。臣惟古者计口受田，故其时无不耕之民，而可以严游惰之罚。后世田既不可井授，故闲民之遨于城市者，官不得而稽之，此固势之所无如何也。然民不可稽而田则可稽，其岁垦成熟者固无以议为矣。至若污莱无主之地，皆当召民认佃，给为永业，而毋急于升科，则庶几无不耕之土矣。臣观《七月》之诗，于耜举趾而妇子往馌，则田畯见其勤而喜之。其著于《雅》者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又曰："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此可见耕虽民事，而亦贵在上者有以劝之也。汉世力田与孝弟并重，凡朝廷有行庆施惠之典，必首及焉。其重农也如此。今牧民之有司，其亦有知此意者乎？毋亦簿书讼狱之务繁，而有所不暇及也。且汉时贾人不得为宦为吏，而七科谪中，则虽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免焉。其贱贾人也至矣，而言者犹病其奢侈，令民有不劝耕之心。后世更无此禁，而奇技淫巧相竞为侈靡之习者，大率自贾人开之，愚民慕效，浸成风俗，此其伤农事也实甚。农事伤则饥之本，故一值水旱之不时而匮绌立见。然则为今计者，当以课农劝俭之效责之有司，而毋专以听断干办为殿

最,则耕九余三之盛其复见乎!

制策又以制科取士所以振淹滞,储任使,将令寒酸无沦落之虞,菲材绝觊觎之念,当如何立法以蠲其宿弊。臣惟古者乡举里选之制既已不可复行,而九品中正亦行之不能以无弊。惟试之文词,而定为糊名易书之制,主司但择其文理之优者取之,无所牵制于毁誉之口,无所荧惑于爱憎之情,法至善也。然考之唐时,士品之卑污甚矣。呈身识面、自衒自鬻之习恬然为之而不怪。司文衡者初以专官主之,故关防不密,而要挟请托至于再三而不已。此则久于其任之弊也。今主文之人初无一定,其于防闲之法可谓更精,乃犹有弊习之未革者。利禄之途人竞艳之,下以求知己,上以植私门,且见援引推荐之习古亦有之也,乃遂不顾法禁而冒焉为之。不知公则生明,理实相因。司文衡者果有为国得贤之心,而鉴空衡平,凭文取录,虽不能尽无遗才之憾,然才之为所得者亦应十收八九。苟私其所爱,而饰为怜才之论,无论其所谓才者未必才,而品之不可问已较然矣。此则断无可宽假者也。虽然,贡举者取士之法也,而教之则在于平日。诚使师之选得其人以充之,使士皆知立品植学,而不为利禄之诱,则其未达也不急于求知,其既达也亦自无徇私舞弊之失矣。

制策又以防边固圉,绸缪未然,而因豫筹乎兵将之娴习。臣惟庙堂制胜之略,莫重乎择将。将苟得人则训练有方,行阵整饬士卒皆服,从其教,怀其惠,而畏其威。如是,虽使之蹈水火可也。为将之道,非唯核名数,勤操演,遂可以尽其责也。凡山川之险易,道途之纡直,与夫器械之异宜,人材之异适,皆当熟悉于平时。夫然,故举而用之,真如臂指之相使矣。至考古昔兵制,汉时京师有南北军,皆郡国之士更番直上。而郡国亦有材官骑士,常以八月为都试之期。至东汉罢之,论者咸议其失。唐初府兵本西魏北周之遗制也,其后屡变而遂有养兵之费,如宋之所谓长征兵者亦然。平时虚糜物力,而临事讫不可用。有急复主召募,然亦何也恃耶?今时无屯聚之兵,无专辄之将,内外相维,文武协力,此其所以远轶前代也。我皇上安不忘危,静而待动,故将骄卒惰之失无有也,黩武穷兵之失亦无有也。然则御边之善术,诚莫不外乎此矣。不轻遽以徼功,不姑息以养祸,将亦岂能舍是

而为良哉!

凡此者，臣以为风示磨厉之道皆在上也。要皆由我皇上运健行不息之神,而尽凝命敕几之实。故惟臣钦若而以成大法小廉之治,惟民丕应以还力本节用之风，取士必得而碔砆不至滥收，驭将有方而潢池不忧小警。则我国家之治化,自比隆于唐虞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就好像修建一座巨大的房屋。三公九卿就是栋梁,执事的百官就是屋子的茅草顶盖,人民就是房屋的基础，士人就是屋中储蓄的财物，将帅就是墙壁，武装的兵士就是门闩，这些都是不可不早晚无时无刻要考虑的问题。天下极大,文武百官和亿万人民极多,和那学校的整饬昭明,边疆的巩固等,这些事都集中在君主一个人的身上。如探求那能够把天下治理好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于认真坚持法度罢了。因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是治天下的大权。用它来端正为官之道,就要对以忠诚自誓的臣子加重他的责任并给予优待，对那些损公肥私违法求利的官吏必须加以贬斥。用它来富裕人民的生活，就要对督责务农致力于根本的官吏必须称赞他们的功劳并予以优越的奖励，对那些治理没有功绩的必须罢免他的官职。用它来端正士人的习气，就要推崇有德才的人来提倡美德,淘汰品行不良的人来贬斥邪恶,而根据他的言语文章也应当考察它正直不正直。用它来加强军备，选用将领时就必须选用那些有谋略的,训练士兵就必须要求他们听从命令,而当有事时更必须查明他的功劳和罪过的确实情况。这一切就是所谓的认真坚持法度的具体内容。大概即使是圣明的君王在位执政，也不能保证朝内没有一个奸邪的小人,民间没有一个游荡懒惰的人,学校一定没有行为不端的士子，四方边境一定没有突然发生的忧患。但最终能够实现最好的治绩的原因,是不能离开认真坚持法度这一点的。

敬思皇帝陛下具有高洁明察、刚强果健的品德,又精深于穷究物理、推极知识、诚实其意、端正其心的学问,谨慎的态度表现在存心仁厚宁静上，做事都能协调于中正之道。本来已经知人善任使臣下都

激发其恭敬之心，重农薄赋使人民的生活都充裕起来。崇尚经书的义理，提倡切实有用的学问，通过这些来寻求有用的人才。勤于训练士兵，重视加强边防，以此获得国家安宁的效果。但就是这样，皇上仍然本来圣明却不自以为圣明，把臣下等宣进宫廷，策问我们有关整顿治理为官之道的方法，储备充裕人民食粮的计划，和那振作士子、防御边疆的好办法。以臣下我的愚钝浅陋之才，哪里能够懂得这些？但是既然清审详问所及，不遗弃我这草野之人，臣下我岂敢不竭尽自己不才的想法，做为拜献的材料呢？

敬读制策上说：国家设立官员划分职责，是凭借这些来弘扬功业辅佐天子立功，宣扬朝廷的恩德和上达人民的情况与思想。并因此谈到磨练官吏的为官之道有它的方法。臣下我想来，和君王一起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朝内有辅佐君王的大臣，京都以外有在各地区任职的官吏，都是来接受君主的旨意并进行宣扬教化的。在唐尧虞舜的时代，五臣和九官是来治理朝政的，四岳和十二牧是来治理地方的，他们相互师法庄严恭敬地聚集一堂，可称为极盛了。然而他们君臣之间，还感情激动地相互劝戒。臣子中来进劝勉励君主的人，必定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朝政。他们的君主对要倚重亲近的人，必定说：如果我有过失，你们就辅佐我。大概都是一心要求能艰苦创业，而不敢有一刻时间使自己闲暇安逸。关于互恭互敬，协同一致的意思，是说君主和臣下都有这种敬畏之心。由于天命的难以相信，民情的难以安定，虽在太平无事的日子，却仍然思念着守住已成的盛业保持平安，更加关心事业光明昌盛之时的儆戒。推想他们的本心，难道不愿意只用“都”、“俞”的口气表示赞同肯定，而不用“吁”、“咈”的口气表示否定吗？然而不能不一直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安和危、治和乱转化的关键和机会是相互联系的，因惟恐失之于来不及发觉，所以总是兢兢业业，谨慎而又谨慎，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琐碎而无远大谋略的过错，而永远保持君主圣明，臣子忠良，大臣们乐意办事，君主奋起治理的美好风气。正因为大家同有这种互恭互敬的心，所以和衷共济的美好品行也于此可见了，不像那种所说的在水中再加一些水只是雷同附和。假如君主说可以，虽然自己有不同看法却也说可以，君

主说不可以,虽然自己觉得可以却也说不可以,这就是因循守旧瞻前顾后的私心，不是忠纯笃实的臣子所应该有的心地。一个臣子用来侍奉君主的,只能是用正道来衡量一切,不应当只揣测上意看着君主的眼色来采取迎合的办法。君主用来考察臣下的，也只能用正道来衡量判断，不应该只欣赏他的顺从来导致阿谀取悦在上的风气。这样政务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处理，而大大小小的官吏自然会无不纯洁清白,一心为公,以求报答朝廷了。

制策又认为开辟取得钱财物资的各种渠道，这就可以做到蓄积很多钱财而使储备预先齐全，从而筹划如何才能重视农业而加强这一根本大计。臣下我想来,古时候计算人口数来授给一定的田地,所以那时候没有不耕田的百姓，而可以严厉惩罚游荡懒惰的人。后世的田地既然不能按古代的井田制度来授田，所以对在城市中游串的一些不从事农业劳动的闲民,官府无法去稽查治理他们,这的确是时势所致而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百姓不可稽查但田地是可以稽查的,那些每年垦种成熟的田地固然不用去管它,至于像那些荒废无主的田地，都应当招引百姓去应承租种,发给他做为永久的家业，而不要急于征收赋税，这样就也许没有不耕种的土地了。臣下我读《诗经》中的《七月》这首诗，诗中讲到春天一到农民便去修理翻土的农具,接着举步去耕田,老婆儿女们到南亩去送饭,管理农业的田官看到他们如此勤劳很是高兴。这种情况还写在《小雅·甫田》这首诗中，说:“当农夫在农闲休息时，把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召来进行慰劳”。又说:“禾苗管理得好长满了田亩，最终一定是好年成大丰收,主人曾孙不恼怒,农夫们更能干得迅速”。由此可见耕田虽然是农民的事，但处在上位的官员对农民有所劝勉也是很重要的。在汉朝那个时代,把努力耕田和孝父母敬兄长看得一样重要,凡是朝廷有进行赏赐和广施恩惠的典礼，必定首先照顾到他们。当时就是这样重视农业。今天治民的官署,也有知道这个意思的人吗?恐怕也只是忙于文书簿册和诉讼这些繁杂的政务，而对农业没有时间去管。而且在汉朝的时代,商人不能当官为吏,如果被定为七种受罚从军的人,即使是他的祖父祖母有市民户籍也不能幸免的。当时轻视商人可以说

到了极点，可是谏官进言时仍然批评商人们生活的奢侈，使人民有不愿种地的思想。以后的各个时代更没有禁止过这些。在过分奇巧而无益的技能和制品方面相互竞赛去干这些奢侈浪费的事，大抵都是从商人那里开始兴起的，愚民们羡慕这些并加以仿效，便逐渐成为风气，这些对农业生产方面的伤害实际是很严重的。农业生产受到伤害就是遭受饥饿的根本原因，所以一旦遇到水旱失调而成灾，粮食的缺乏便可立刻出现。那么为了今天打算，应该把督责务农提倡节俭的积极功效要求各级官吏，而不要专把听讼断狱、干办公事当做政绩好坏的标准，这样耕九年可积三年余粮的盛况大概会再见到吧？

制策又认为用科举制度取士，是用来选拔那些被埋没的有才德的人和储备将要委用的人才，将要让出身寒微而有才学的人没有沦落的忧虑，使只有浅薄才能的人断绝非分希望的念头。这样应当如何立法，使积久的陋弊永远消除？臣下我想来，古代从乡里中考察推选贤良人才的制度既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而魏、晋、南北朝时在州、郡设立中正官，将各地士人按才能评为九等供朝廷按等选用官吏的制度，也是在实行中不可能没有弊病。只有考试他们文词水平，定出在试卷上糊上姓名并换人书写的制度，主试官只选择那文理最优秀的试卷来录取考生，既不会受别人诋毁或赞誉的影响，也不会受自己爱憎感情的迷惑干忧。这种办法极好。然而考察一下唐代，那时士人的品行实在太低下污秽了。亲自谒见自荐求仕，自我吹嘘自售其才能的习尚，安然去做而毫不为怪。主管评判文章的人最初是由专门的官员去主持，所以防范很不严密，于是以势要挟或走门路通关节也就一而再，再而三，没有停止的时候，这是某人长久地担任主考官所造成的弊病。现在主考官的人选从一开始就没有固定的，另在防止弊端的方法上可以说是更加精密，可是仍有没有革除的弊习。对取得财利荣禄这条途径，人人都争着倾慕于它，下面的人寻求知己，上面的人来培植私门弟子，况且看到相互援引推荐的风气从古以来就已有之，便不顾任何法禁冒着危险去干这些犯禁的事，殊不知公正就会明察，事理实际是相互关联的。主管衡文的人果真有为国家选得贤才的心，去毫无私心地秉公评定试卷，凭文章的优劣来录取，这样

虽然不能说一点也没有遗漏人才的缺憾，但是有才的人能被选取的也应该十收八九。假若偏向他自己所爱的人并伪装出怜才的意思，先不说他所谓的有才者未必有才，光他的品德不可过问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对这种情况是断然不可宽容的。虽然科举考试是选取士子的方法，但教育他们却只在于平日。假使在老师的挑选上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来任教，使士子都知道树立好的品德，建树扎实的学问，而不受财利荣禄的诱惑，就可以在他们还没有显达的时候，不急于希求别人的了解，当他显达以后，也自然不会有徇私舞弊的错误了。

制策又认为要巩固边防，事先做好一切以防患于未然，因而要求预先筹划讨论兵将的彼此熟习。臣下我想朝廷关于制服对方取得胜利的谋略，没有比选择将领更重要的。将领如果选得其人就会训练有方，无论是行阵还是对军队的整治士卒都会信服，听从他的教诲，怀念他的恩惠，并惧怕他的威严。这样，即使叫他们赴汤蹈火也是可以的。作为将领所应该做的，不只是去核查名数，勤于操练，就可以尽他自己的责任的。凡是山和河流何处险恶何处易过，各处道路的曲和直，和那各种器械不同的特点和用途，所有人才的不同特长适合做何工作，都应当在平时非常熟悉。做到这样，所以临事用起他们来，真像使用自己的胳膊和手指一样自如了。如今考察一下古代的兵制，汉朝时京都有保卫两宫的南军和卫护京都的北军，都是由各郡国的士兵轮番进京值勤。而各郡国也有材官和骑士等地方部队，常把八月作为阅兵期来考试讲武。到东汉时取消了这种制度，后代评论这件事的人都议论它的失误。唐朝初年的府兵制是根据西魏和北周所遗留下来的兵制设置的，征发时兵器资粮全由府兵自备。以后屡有变革便有养兵的费用，如宋代的所谓长征兵的情况也是这样。平时空费物力，等到遇上事情都不能用，有紧急战事时又要靠召募兵员，但这能靠得住什么呢？现在没有集中聚居的兵，没有专擅专断的将，朝廷内外相互联系，文臣武将协力合作，这是现在远远超过前代的地方。我们皇上居安而不忘危，以静等待变动，所以既没有将领骄傲士卒懒惰的缺点，也没有穷兵黩武任意征伐的缺点。那防御边境的好方法，的确不外乎这些了。不轻率地遽然去求功，不姑息迁就来

养祸,作为将领也岂能舍弃这些而成为良将吗?

凡属这些所对答的问题,臣下我以为告诫磨练的方法都在于朝廷。最重要的都应该由我们皇上运用健行不息的精神,而竭尽保住天命和警惕苗头的实际运作。于是因臣下敬顺而取得大臣尽忠、小臣尽职的治理成绩,因人民全力应和而恢复努力耕作、节约费用的良好风气,选取有才德的士子一定可以得到,而不至于滥收似玉的顽石,驾驭将领有道得法,不用忧愁小小的叛乱警讯。这样我们国家的治理和教化,自然可以和唐尧虞舜时代的隆盛比美了。臣下我来自草野民间,新得科第,不知道什么忌讳,冒犯皇上的威严,感到十分恐惧发抖,真是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朝考卷三道

诚无为几善恶论

诚者,天道也,天道无为,圣人亦无为。其未至乎圣者,不能纯任自然也,其要必在从其发念之始而严辨之。故言诚莫详于《中庸》,而其首章必先之以慎独。周子盖有会于夫子之所言,而因为之阐其旨曰:诚无为,几善恶。斯岂周子之创见哉?尝试论之。

天道一诚而已,而其功用则有阴阳。其在人也,寂然不动之中众理悉具,浑然在中诚也。而其几之动也,则有善有恶。善之念当引而申之,恶之念当销而去之。夫人莫不谓然。然善固善矣,而善之中有未尽善者焉,亦犹之恶矣。恶固恶矣,而恶之中有实非恶者焉,亦不失为善矣。是尤在所当察也。何以明之?如欲为一善事,而或有所为而为之,此不已害于诚乎?又如欲杀一人而实救众人之命,则刚断者善,而姑息者非善也。故人之善恶亦如天道之有阴阳相对,待而为用。人能察几,则善恶皆可为吾用矣。且诚之无为也,亦有其致力者在,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此静养之功也。至发念之始,在乎动静之交,唯己知之,故谓之独。吃紧检点全在此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方驰骛于事,为之末计校于成败之间,国人举得议论其得失,

而在己反莫识其由来矣。独之不慎，虽悔焉追？顾欲察几，必先明理，理不明则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素未精审，而当几恶能辨之不爽也？故《中庸》又言，诚身必先明善。苟不知此，必有诚非其诚者。《大学》之言知至而后意诚，其亦此意也夫？

诚是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可以顺乎自然无为而生成万物，圣明的君主也可以顺乎自然无为而治。那些没有达到圣明的人，是不能完全做到顺乎自然的，对他们来说重要之点必须在他们的念头刚刚发生时去严格辨别它的善恶性质。所以在谈“诚”的问题上没有《中庸》谈得更详细的，并在它的第一章中一定把慎独放在首位。周敦颐先生大概对孔夫子所说的话有所领悟，便对这些话的意义加以阐发说：“真诚便可以无为而成，在微念中就有善有恶”。这难道是周敦颐先生的创见吗？我现在试着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自然法则只有一个诚罢了，而它的功用则有阴阳的区别。它表现在人身上，是在寂然不动当中包涵着各种道理，在这些道理中都蕴涵着一种诚实无虚的精神。当他们那隐微的念头在发生时，便有善恶之分了。对善的念头应当发扬它，对恶的念头便应当去掉它，所有的人没有不说是应该这样的。但是善的念头固然是善的了，可是在善的念头中有不完全善的念头存在，这也就和恶相似了。恶的念头固然是恶的了，可是在恶的念头中有实际上不恶的念头，这也就不失为善的念头了。这些似是而非的念头尤其是要认真弄清楚的。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譬如要想做一件善事，却有所追求个人目的而去做它，这不是已经不诚实了吗？又如想杀掉一个人而在实际上是要拯救许多人的生命，那么对这件事果断地去干就是做善事，如果对之姑息养奸就不是善事了。所以人的善恶，也和自然的法则有阴有阳是一样的，相互对立而为人所用。人如果能够明察刚发生的隐微的念头，那么善的念头和恶的念头就都可以为我所用了。况且真诚的可以无为而成，也是有它竭力去做的事情的，对别人看不见的坏事他也警惕谨慎力求不做，对别人听不到的坏事他也害怕犯错误坚决不做，这是一种静养的功夫。当某个念头开始发生时，这是在要动和还没有动的交叉点上，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叫做“独”。认真检查它正确不正确全在这个时

候。过了这个时间以后，精神就正忙碌于要做的事，为了达到最后的目的计较着事情的成败，全国的人都可以议论他这事情的得失，但在自己这方面反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在独处中的不谨慎 以致出错，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了。但要想明察隐微的念头，必须先要明白事理，事理不明便会把善当成恶，把恶当成善。如果平素就未能对事理善恶有精密确实的认识，那么遇到隐微的念头怎能辨别不差呢？所以《中庸》又说，要使自身诚实必须先要明白什么是善。假如不知这一点，就必然会有看来似乎是诚实的，其实是不诚实的。《大学》上说的"知无不尽然后才能意念诚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拟察茂材异等诏

非常之人不世出，朕殊不谓然。爱珠玉者珠玉至，爱千里马者马亦至。世未闻乏珠玉与千里马也，患公卿大夫无与佐朕旁求之念耳。天下至大，人民至众，朕一人岂能周知。士岂无瑰玮殊特而无由上闻者乎？其令郡国察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朕且以观在位者知人之明焉。

不同寻常的人要隔好几代才会出现，皇帝我对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有喜爱珠玉的人珠玉就会来到，有爱千里马的人千里马也会来到。世上没有听说缺乏过珠玉和千里马的，只怕公卿大夫们不去满足皇帝我广泛搜求的想法罢了。天下极大，人民极多，皇帝我一个人岂能都知道呢？士人中难道没有人品才干都卓异特殊却没有办法使朝廷了解的吗？现命令各地方官府调查了解才德优异之士和特等人才，可以做将相和出使极其辽远的邦国的人，皇帝我将通过这点看一看在位的地方长官识别人的品行才能的眼力。

时政疏

臣谨奏：臣惟恤吏所以安民，而重内所以宁外。夫张官置吏，皆所以为民也。以畿辅重地，化导抚恤之政尤当加意，庶编氓不致失

所,以廑圣怀。

乃臣窃见直隶一省差务殷繁,自督臣以下,惟知办差为考成之要务,而他皆有所未遑。及今且州县不足而及于教职矣。夫厚其资给,优其升擢,以效力于公家,亦谁不乐就者。而臣窃闻道路之言,颇以为畏途者。何也?毋乃出纳之际,奏销之例,有未尽当其理者欤?盖银之给于上者,经易数四而后至于州县,则恐侵克之弊未尽绝也。小民之应上差役者,必征召于月余之前聚集守候,而后效用于一旦。官但案其听用之日给其廪直,则恐赔垫之苦未尽免也。当其任者,希苟免于目前,而弥缝于日后。窃恐州县帑藏所储未能皆无借动也。幸而太平无事,故不见其利害耳。然臣之愚,窃不胜鳃鳃然抱无穷之虑也。

今我皇上神悉贪利侵渔之弊,特严亏空之罚。法出而必行,人人晓然知上意矣。如谓皆悍然不顾而甘蹈于法,是岂人情?殆亦势有不能已者也。夫法行当济之以恩,伏愿我皇上轸念近畿之疾苦,曲体官吏之隐情。旧例之虚糜者可革也,其实不足者似当酌增之。庶官吏优裕而小民亦不致重困,国帑亦不至空悬。是在我皇上之特恩矣。臣又案《周官·司徒》,均民之力征,辨其车牛可任者,是将齐其劳逸也。今各州县所办,其上下于吏胥之手者亦恐不免。伏乞敕下督臣,酌议尽善之法,庶官与民皆仰戴仁恩于无既矣。臣狂瞽之见,不识忌讳,干渎宸严,无所逃罪。臣谨奏。

臣下我慎重上奏:臣下我想来,忧念官吏的隐情困难是用来安定百姓,而重视内部的整治是用来安宁外部的。设置官吏都是用来为百姓办事的,作为京都附近的重地,对教化开导和体恤爱护的政事尤其应当重视。但愿编入户籍的平民不至于流离失所,来烦劳皇上的关注。

但臣下我却私下看到直隶一省差务非常繁多,从督臣以下,只知道办理差务是考核官吏的政绩的主要工作,对其他事都没有时间顾及。到现在尚且各州各县经费不足,甚至波及到教职了。当然给他很优厚的资财给养,优先考虑他的提拔迁升,让他来为公家效力,这是谁不乐意去干的呢?但臣下我私下听到路人说的话,认为这走的是一

条危险可怕的道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财物的支出和收入之中，向上奏报的钱粮征收或注销的成例之中，有不完全合理的情况吗？大概由朝廷供给的银两，要经历好几道衙门，最后才到达州县，便恐怕侵吞克扣的弊病没有完全根绝。百姓们接受上司派下的差役的人，非要在一个多月以前征召，聚集在一起守候着命令，然后不过效劳很短时间。官员们不管他们等候多少时日，只按照听用的日子发给他们工钱，恐怕他们赔垫自己的时间费用的苦处没有完全避免。担当这方面职务的官员，只求在目前苟且免于损害，有什么问题等日后再去弥补。我私下以为恐怕各州县国库中的储蓄不可能都没有借动。幸而现在还太平无事，所以看不出它的利害影响罢了。但臣下我虽很愚笨却暗自非常恐惧地抱着无穷的忧虑。

现今我皇上非常了解官吏贪利侵夺的弊病，对钱财亏空的惩罚特别严厉。法令一出必须执行，使每个人都非常明白地知道皇上的用意了。如果说都悍然不顾而甘心去触犯法令，这难道是人之常情？也许必有客观上止息不了的地方。当法令施行时应当同时施之以恩德，敬望我皇上怜念京城附近地区百姓的疾苦，深入体察官吏的难言的事情。旧的成例中那些白白地损耗浪费的规定可以将它革除，那些实际上不够用的规定似乎应当酌情给予增加些。幸得使官吏优裕而小民们也不至于过分困苦，国库也不至于空缺。这就是我皇上的特殊恩典了。臣下我又考察《周礼·司徒》上所说的，对民力的征用要均等，弄清哪些车牛是可以任用的。这是打算使他们的劳逸相同。现在各州县所办理的事，由吏胥们玩弄手法而作弊的情况也恐怕是难以避免的。敬求皇上给各督臣下令，叫他们酌情议定出十全十美的方法，这样众官民就会敬仰感戴皇上的仁爱恩德不尽了。臣下我这些愚妄无知的见解，不知道什么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威严，真是没有地方可以逃脱罪责。臣下我谨慎上奏。〔蔺瑞生译〕

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缔绤必表而出之。

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殿试策问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 制曰：朕寅奉天命，式承丕基，缅惟古昔帝王制治求宁，履谦持泰。载稽典策，如见其心。朕早作夜思，勤求郅理，而抚躬省治，弗敢自安。乃者集庆迓庥，诸福骈臻，疆宇颂其式廓，雨旸顺以节宣，当宸永怀，惟增祇惕。尔多士际慈寿之维祺，应槱薪之雅化，鱼鱼阙下，当必有明于经术，通于吏道，审悉乎程材训俗之端者，其诵厥志，以达予聪。

夫学者载籍极博，必原本于六经。《易》有四尚，《诗》有六义，《书》有古今，《礼》有经曲，《春秋》有三传。能举其大义，详其条贯欤？注，一也。而有曰传、曰笺、曰学、曰集解之别。疏，一也。而有曰释、曰正义、曰兼义之殊。立博士者，或十四人，或十九人，先后何以不同？立石经者，或一字，或三字，纪载何以互异？多士亦能洞悉其源流，而略陈其梗概否也。朕崇尚经术，时与儒臣讲明理道。犹复广厉学官，蕲得经明行修之士而登之。其何以克副期望之意欤？

致治要在审官。考课之方，代详其制。论者谓自汉以前，大率详于外吏，而略于京朝。然观成周六计弊吏，而日要月会岁计，不遗六官之属。两京以六条察二千石，丞相、御史杂考郡国计书。而在三府者，光禄勋岁行进退。至唐京官之考，主之郎中，外官之考，主之员外。其后先法制同异，可晰言之欤？迩者慎简长吏，既令督抚举堪任郡守之材，

武途副将以上，甄择入告。其在京曹司，复饬堂上官于会同察计外，各疏其贤否，用资校核。何道而使人扬其职，群僚敦行实，大臣禀虚公也？

进士一科，得人为盛，伊古然矣。卿尹大夫皆由此其选，始进能无慎乎？乃行之既久，而文体或犹未尽淳，士习或犹多浮尚，岂风会使然欤？抑法制有未尽善也？临轩策士，要以遴拔真才，是在司事诸臣之共襄公慎耳。然而以水济水，其何能益？和而不同，古大臣每矢励厥心。见诸言论事绩者，可举似一二端欤？今既更易旧制，宜积习肃清矣。又何以使崇实去华，科名称极盛欤？

服勤尚俭者，民生风俗之原也，比岁涛膺鸿贶，闿泽应时。西域新疆，屯收充羡，食货可几渐裕矣。而年丰易滋游手，粜贱兼恐伤农。生谷止有此数，服食侈靡者耗之，法制禁防，既难尽及。迨顿积居奇，而耗于商贾者半；采买翔涌，而耗于吏胥者又半。司民牧者，将开源节流，使生者不匮，而用者不奢，道果安在？

凡此数端：溯经籍之源流，察官联之课最，士尚先资拜献，农知务本力田，诸生讲肄有年矣。其以所得者，悉之究之。朕将亲为裁择，且觇风抱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浅红色和紫色不用来作家居时穿的便服。在暑天，穿粗的或细的葛布单衣，一定要里着衬衣使它露在外面。

祭礼完毕后众亲宾相互敬酒时，晚辈要先向长辈敬酒，这是为了使礼仪也能下及于地位低贱的人。饮宴时按照毛发的黑白颜色安排坐次，是用来区别年龄的长幼。

大夫说怎样才对我的封地有利呢？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敬奉上天的意旨，来继承先人巨大的基

业。遥想古代的帝王们治理政务以求国家的安宁，履行谦让之德来保持着鼎盛的局面。考查那时的册籍，就好像看见了他们的心。皇帝我早起夜想，努力地寻求天下大治，但自我反省一下治理的情况却不敢自安其心。近时福庆美好的事很多，各种祥瑞接连聚集，疆域范围广大值得赞颂，雨天晴天按时变化都很顺调，临朝久久思念，只增加敬慎和恐惧。你们这众多的贤士，恰遇慈亲寿辰的吉利时候，参加选拔贤才的雅正化导活动，依次行进在宫阙之下，一定有通晓经学，精通为官之道，熟悉考评人才和教化民众这些方面的人。可以叙述一下你们的志向，让我听一听。

凡是学者掌握的极其丰富的典籍，必定都以六经为本原。圣人在使用《周易》时有四个方面的崇尚，《诗经》有风、雅、颂、赋、比、兴六义，《尚书》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礼》有《经礼》和《曲礼》，《春秋》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能指出上述内容的要义，把它加以系统详细的说明吗？都是对经书的注，却有叫传、笺、学、集解的这些分别。都是阐述经书和旧注的疏，却有叫释、正义、兼义的这些不同。设立博士官职的各朝代，有的设十四人，有的设十九人，先后为什么不一样？建立石经的各朝代，有的用一种字体，有的用三种字体，记载为什么各不相同？众多的贤士们也能透彻地知道它的起源和发展，并能不能大致陈述一下它的梗概呢？皇帝我崇尚经学，常常和儒臣们讲解和发明经书的义理，而且还不断勉励学官，祈求能得到经学博洽德行美善的士人而提拔他们。将怎样才能符合我这种期望的心意呢？

要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关键在于考察提拔官员。考核官吏政绩的方法，每个朝代都有详细的制度。研究的人说自汉代以前，大致是对外地官吏的考核详细，对京都朝廷的官吏考核较略。然而看一看周代考察官吏的六项内容，而每天、每月、每年的统计，从没有放过六卿的官属。两汉时用六条诏书考察二千石，丞相、御史会同审查各郡国年终上报的簿书。而在三公府的人，光禄勋每年进行升降任免。到了唐代对京官的考核，由郎中主持，对外地官员的考核，由员外主持。对于这后来的和先前的法制上的相同处与不同处，能清

楚地谈一谈吗?近来对地位较高的官员的选择很慎重,已叫总督、巡抚推举可以担任郡守的人才,对军事领域副将以上的人,斟酌选择向上禀报。对在京的各官署,又命令各官署长官在会同审察统计之外,各自分别陈述他好还是不好,用以帮助考校核察。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的工作,百官都能专心使自己的行为朴厚务实,大臣都能做到无私而公正呢?

进士这一科目,以能取得贤才为盛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卿尹大夫这些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面选取的,因此对最初的选进能不慎重吗?但推行它已经很久了,而文体却仍有不完全精纯处,士人风气仍有许多浮夸的毛病,难道是风气使他们这样吗?还是法制上有什么没有完善的地方呢?人主亲临前殿策试贡士,总归是要挑选真才,这关键在于主管其事的各位大臣能共同辅助做到公正慎重罢了。然而如果只在水中加水,这能有什么帮助呢?和衷共济而又各有所见,古代大臣常以此立誓磨炼自己心志,而体现在言论和事迹上的人,可以奉告我一两点吗?如今既然更改了旧的制度,旧的不良积习应该肃清了。又如何使崇尚实际去掉浮华,使科名达到极盛的地步呢?

致力于勤劳和崇尚节俭这些方面,是改善民生养成良好风俗的本源。近年来多次受到上天巨大的恩惠,和风细雨顺应天时而来。西部的新疆,屯田的收入充足而有余,食粮财货可以达到逐渐富裕了。但年成丰收容易产生游手好闲之徒,粜粮价贱又恐伤害农民。生产的谷物只有这个成数,食用过度浪费的人耗损着它,通过法制禁止预防,已难以完全做到。等到囤积居奇时,将会有一半被商贩们耗费掉;在高价采买中,又会有一半耗费在吏胥们的手里。管理人民的官长们,要开源节流,使生产谷物的农民不匮乏粮食,而用粮的人不奢侈浪费,这种办法究竟在哪里呢?

所有上述这几个方面:追溯经籍的源和流,考察官职中政绩之最,士人应重视拜见君主先想好自己的建议,农民应知道致力根本努力种田,各位贡生讲论学习已多年了。可以把你们所学到的知识,对上述问题都加以详述和探究,皇帝我将要亲自对它进行裁断和选择,且看一看你们的风操抱负。

胡高望　会试卷一道

胡高望(生卒年不详)　字希吕，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继王而言利，大夫不知有国矣。夫大夫只知有国，奈何计及于家，而惟利是视乎?大夫曰利，直王教之耳。且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有家者，分有邦之责者也。夫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官不及私昵，古志之矣。励相我国家，而保邦之义罔闻，肥家之念弥切，岂曰克绍乃辟哉?王曰利国，殆欲与大夫共利吾国也。

术工会计，则掊克必深，才本斗筲，则脂膏日朘。大夫体王心而俨然一德，夫岂有莫肯夙夜之忧?谈及纵横，则筹为之借，论陈耕战，则席为之前。大夫承王命而不啻同声，自无辞从事独贤之瘁。乃大夫竟不复以国为念，而惟以家为念也。曰吾有家在，吾何以利吾家而已。律以永建乃家之义，方且思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守箕裘以不坠家声可也。乃大夫别精心计，其较量并不在财贿器用之微。若曰宝龟不守，则三兆谁知?藏甲不多，则六关谁启?袭此世家之故智，而贫非可贺，干不独强，怙侈久而贪黩之算弥精。盖大夫之踌躇熟矣。揆诸服劳王家之分，方且惧位不期骄，禄不期侈，笃忠贞以克守家风可也。乃大夫独有经营，其筹画又不徒争钟釜豆区之细。若曰都苟堕其三，则前勋莫绍，宗已隆其贰，则后嗣渐繁，挟此保家之秘术，而子弟使之为卿，姻娅俾之肸仕，觊觎深而封殖之谋益固，盖大夫之图度勤矣。

然则簠簋不饬，大夫自无逃责备之词，而其心犹未服也。担爵析圭，原不应总及乎货宝，特当日之头会而箕敛。即出全力以佐明廷，何不可留余力以图私室?迨夫谙练愈深，侈肉食之远谋，无复知计以弊吏之先乎廉，而予取予求，显形之齿颊而不为讳。然则谿

壑难盈，大夫亦自知效尤之罪，而其责固有归也。奉令承教，业已知代计乎锱铢，将此日之持筹而握算。问国君之富既拓地而兼数圻，问大夫之富讵循分而安贪采?况至侵渔无厌，视茧丝为保障，谁复知贪以败官之名为墨?而得寸得尺，隐袭其意旨而莫之违。抱仕宦之深心，而算至无遗，毁家之义安在?借朝廷为口实，而厚以自殖，耦国之势已成。吾闻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国侨寓书，范宣轻币，昔日之贤大夫也，宁不闻焉?而奈何惟利是视也?孰知王先倡之，而士庶人又复起而应之耶?

接着国王谈利而说怎样才对自己的封地有利，大夫是不知有国家的利益了。大夫只应该知道有国家，为何考虑到自己的封地，而仅仅看到私利呢?大夫说利，只不过是国王教导他的罢了。况且舜的大臣皋陶就说过，只要每天都能传布九种美德中的三德，早晚都能敬谨努力地实行它，就可以做卿大夫保有自己的封地。有封地的大夫，是分担诸侯王国的责任的人。有腿脚有手臂才能成为人，有贤良大臣才能成圣主，官职不要授给自己所亲近宠爱的人，这些道理古代已有记载了。努力辅助治理我们的国家，却对保护国家的道理不理睬，对肥家的念头很急切，怎么说能继承你们国君的事业呢?国王所说的对国家有利，乃是想和大夫共同做对国家有利的事的。

如果擅长于计划计算的技术，他搜括聚敛财物就必定很厉害，如果他的才识本来就很浅薄低下，他榨取民众的血汗就会一天天加重。大夫如果能体察王心和国君真正同心同德，国君怎么会有害怕臣子不肯早晚尽忠国事的忧虑呢?战国时谋士向各国国王谈到合纵连横时，国王会把筷子借给他供他比划说明，商鞅向秦王论述如何加强农耕与战争的谋划时，秦王高兴地不觉移向前席倾心听取商鞅谈论。大夫如果能秉承王命如同同声共气，自然不会推辞做事独多的劳累。然而大夫竟然不再想着国家，却只想着自己的封地，只说什么我有封地在，我如何来为我的封地谋利而已。就以盘庚要求臣下迁都后永久地建立你们的家园的意思来要求吧，尚且想把宗庙的

建造放在前面，把马房库房的建造放在其次，要坚守父业不能辱及家族世传的名声才行。但大夫却另有精密的计谋，他所计较的并不在财货器用这些小事上。如说不掌握着用以占卜吉凶的龟甲，那么谁还知道玉兆、瓦兆、田兆呢?如果家中所藏的甲兵不多，那么有谁能打开六关呢?沿袭这些世禄之家的老办法，而贫穷是不值得庆贺的，没有枝叶光靠主干是不会独强的，放纵奢欲日久而贪污的算计就更精。看来大夫的反复思量已很成熟了。如从度量服事效劳于朝廷的位分来说，尚且应该警惕位尊不当骄傲，禄厚不当奢侈，要更加忠诚坚贞来保持家族的传统作风才行。但大夫却有自己的独特的规划营造，他的谋划又不只是去争钟釜豆区这四种量器所能容纳的那点细微的东西。如说假如像春秋时鲁国三桓执政时所建的三座都城被堕毁，过去的勋业就不能继承了，如果宗族中的贰宗也很兴盛，后代就会逐渐繁衍起来。依仗着这种保家的秘密方法，于是让自己的子弟都做卿这种高级官员，让自己的亲戚都享受高官厚禄，非分的希望和企图愈深而聚敛财货的谋划就会更加坚定。看来大夫的揣度是非常尽力了。

既然如此，那么对簠簋这两种盛稻粮的礼器不整饬，也就是说做官不廉正，大夫就自然无法逃脱别人的责备之词，但他的心还没有服。任官受爵的人原不应该总是和财货珍宝打交道，只是醉心于昔日暴秦的按人头征税，用畚箕收取被征的谷物。既然出全力来辅助圣明的朝廷，为何不可以留点余力来考虑私人的家呢?不过等到更加熟练之后，会张大居高位享厚禄者的长远打算，不再知道考核裁决官吏时把是否清廉放在第一位，而任意索取，甚至公开谈说这些而不知讳忌。那么贪欲难以满足，大夫也自知仿效坏行为的罪过，但其责任却原来有所归属的。以往遵从命令接受教诲，已经知道代替上级计算微利，秉承着今日的手持算筹来计数谋划。要问国君的富既然在扩充疆域上可以兼并几个方圆千里之地，问大夫的富难道只能恪守职分而安于自己原有的封地吗?何况甚至已达到侵夺没有满足的程度，把收敛赋税看成保护自己的封地，谁还再知道因贪婪而败坏职责被叫做“墨”呢?因而能得寸利就得寸利，能得尺

利就得尺利，暗暗因袭国君求利的意志而不改变。抱着出仕为官的深远用心，而谋算到没有一点遗漏，这哪里还会像春秋时在楚国担任令尹的子文自毁其家来拯救国难呢?把为朝廷当做借口，而无限地自我积聚财富，已经形成和国家相等的势力。我听说主宰国家的人，不发愁没有贿赂，而只担心得不到美好的声誉。春秋时郑国的子产给晋国范宣捎寄书信劝他不要贪财，范宣因此轻视钱财，这是古时的贤大夫，难道没有听说过吗?而为什么只看到私利呢?谁能想到国王先倡导它，而士人和普通百姓接着就又起而响应它了?

〔蔺瑞生译〕

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行而民莫不说。

王道之始也。

殿试策问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祇承鸿绪,兢兢业业,不遑康宁,深维元后之责,思所以会归皇极,敷锡黎庶,以承天庥,夙夜寅畏,日慎一日,四十三年于兹矣。凛兹保泰,伻尔嘉谟,其敬聆谘问。

治法莫盛于唐虞,史叙尧勋时雍於变,舜命司徒敬敷五教。夫教民以实不以名,惟在督、抚大吏,董率属员,实力化导,使百性迁善远罪,以无忝父母斯民之任。今欲使士敦廉让,民知礼教,愚蒙者咸识纲常,顽悍者潜消犷戾,以庶几一道同风之盛。其何道之从欤?

且士者民之望也,化民者先训士。士之学问纰缪,学臣得以文黜之;行之颇僻,有司得以法纠之。至于聚徒讲学,渐成门户,始于骛虚名,终于受实害。如东汉、唐、宋党禁,以及明之东林,其已事也。今将使学者笃潜修而杜私党,其何以劝迪之欤?今政治昌明,士风丕变,自爱者未必至此,然杜弊者先于未萌,识微者防其渐致。其又何以预绝之欤?

前言往行,悉载于书。自周有柱下史,汉魏有石渠东观。以至甲乙丙丁之部,《七略》、《七录》之遗,代有藏书。孰轶孰传,孰优孰劣,可约略指数欤?乃者命儒臣辑四库全书,搜访校雠,亦云勤矣。而网罗犹有放失,鲁鱼犹有讹舛。何欤?

国家重熙累洽，都邑蕃昌，人民和乐，由俭入奢，势固然也。会典通礼，所以别贵贱，辨等威，防奢僭。顾服舍之违制，得以法绳之，人工物力之糜费，不能以法绳也。宾祭之过侈，得以礼节之，饮食器用之琐屑，不能以礼节也。使事事为之厉禁则扰，听其纷华以耗本业，又岂藏富之道乎？其何以还淳返朴，用有节而民不烦，事有制而法可久欤？

尔多士稽古力学，于学问之要、政治之本讲求熟矣。其筹之策之，引之伸之，推之古昔证之当今，悉言无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如果百姓的用度够，国君您怎么会不够？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国君您又怎么会够？

对他的所作所为百姓无不喜悦。

这就是王道的开始。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承继大统，一直兢兢业业，没有闲暇的时间享受康宁的生活，深深地思念着天子的责任，想着如何共同依归帝王统治天下的准则，把恩泽施赐给黎民百姓，来承受上天的庇佑，从早到晚恭敬戒惧，一天比一天谨慎，到现在已经有四十三年了。为了严肃地保持这种安定的局面，企盼着你们的高明的谋略，可认真地听一听咨询。

在治理的方法方面没有比唐尧虞舜时更好的了，历史书上叙述唐尧取得了使人民变得和睦的政绩，虞舜命令契担任司徒之职，让他谨慎地施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道德教化。在教育人民问题上要求实效不能只务虚名，关键在于总督和巡抚大臣，要统率自己的属下官员，切实地努力教化引导，使得百姓们都能改过向善远

离罪恶，以不愧于做这些人民父母官的职责。现在想使士人能注重清廉礼让，百姓能知道礼仪教化，愚昧不明的人都能了解三纲五常，蛮横强悍的人都能不知不觉地改掉凶暴而乖张的习气，以希望达到统一道德风俗的盛境。应当用什么方法实现上述想法呢？

况且士人是人民所景仰的人，所以要教化百姓先要教训士人。士人们在学问上出现错误，学官可以根据他的文章摈弃他，在行为举止上如有偏颇邪僻之处，执法的官吏可以用法律来纠正他。至于那些聚集学徒来讲学的人，逐渐形成派别朋党，从追求虚名开始，最终受到真正的危害。如在东汉末桓、灵时期，唐代宪宗、文宗时期，宋代哲宗时期的党禁，以及明末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那些都是已往的事。现在将要使学习的人认真地专心修养而杜绝私党，应当如何来劝导启迪他们呢？如今政治昌盛光明，读书人的风气有很大的变化，凡是自爱的人未必有这些不良倾向，然而要杜绝弊端的人须在弊端没有萌芽之前就去防止，善于从事物出现的苗头识察到其结果的人要防止不良的苗头逐渐向坏的方向发展。这又应该用什么办法去杜绝它呢？

前人的话和已往人们的所做所为，都记载在书上。自从周代设柱下史掌握图书计簿后，汉代有石渠阁和东观这些藏书的地方，以至后来有了晋代荀勖的甲乙丙丁这四部图书分类法，有了西汉刘歆的《七略》、南朝梁代阮孝绪的《七录》这些目录书的留传，各时代都有藏书。对哪些书已散失哪些书留传下来，哪些书好哪些书不好，可约略地指陈列举吗？近时命儒臣们编辑四库全书，搜集访求校对考订，也可以说是非常劳苦认真的了。但搜罗还有散失，像鲁鱼二字相混之类，仍有文字上的谬误。这是为什么呢？

国家几代圣明太平相承，城市繁荣昌盛，人民和睦安乐，由生活的节俭而变为奢侈，这是情势所必然会这样的。会典制度和通行的礼仪，是用来分别贵贱，区分身分等级与相应的威仪，防止奢侈逾礼现象的发生。但在服饰房舍方面如果违背礼制的规定，可以通过法来纠正它，但人工物力方面的浪费是无法用法来纠正的。招待贵宾和举行祭祀过于奢侈，可以用礼制来节制它，但对饮食器用这些琐屑

问题，却没有办法用礼制去约束它。假若对每件事情都进行严厉的查禁便会过于烦劳，如果听任它如此繁华富丽来消耗基本生业，又岂是储存财富的办法？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恢复淳厚朴素的风气，用度有节制而人民不烦劳，做事按照制度而法制可以长久有效呢？

你们这众多的贤士考察古事努力学习，在学问的要点和政治的根本方面都已经讲求熟了。可以对上述问题提出谋划，加以发挥，推论古代的得失经验来验证当今的情况，把你们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不要有什么保留。皇帝我将要亲自去阅读它。

戴衢亨　殿试对策

戴衢亨（生卒年不详）　字荷之，一字莲士，江西大庾（即今大余县）人。乾隆四十二年（1778）状元。其后屡次主持江南、湖南乡试，历迁侍读学士。仁宗嗣位后，凡大典礼诸巨制，悉出其手。累官体仁阁大学士，掌理工部。前后任职内廷凡三十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57岁去世，谥文端。

臣对：臣闻圣人所以法天者，纯也；所以事天者，敬也；所以格天者，诚也。道原于自强不息，化极于悠久无疆。是故允升大猷，会归皇极，文治焕乎明备，习俗进于淳庞，久道所以化成也。德教已周而不忘董劝，风声已树而益励防维，不以稽古既精而弛绍闻之念，不以厚生既溥而纾撙节之怀，圣心所以恒久不已也。盖人主继天出治，则必本心法为治法，故治积累而弥光，心虔巩而益懋。举凡庶类之从风，群才之就范，与夫考订之何以详，乐利之何以永，莫不统于朝乾夕惕无逸作所之深衷。《书》曰：率作兴事，慎乃宪。言大君率臣下以振起事功，而必谨兹法度也。《易》曰：中正以观天下。言圣人在上，斯能举中正之德，以垂示天下也。夫当已治已安之时，而夙夜不遑，几康交敕。所由化导，握其原训，行昭其则。载籍征夫考信，生计保夫常赢。自昔圣王，奉若天道，而日慎一日，不敢荒宁者，胥是意也。

钦惟皇帝陛下，体元法健，履康持盈，际极盛之隆规，廑思艰于上

理,固已酝化覃洽,淳风茂扬。式观前古,无以逾斯。乃圣德渊冲,谘询弥切,复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明教化、端士习、稽往训、崇俭德之至计。臣至庸极陋,蠡测管窥,乌足以知体要?然刍荛之言,敷奏所不废,矧对扬伊始,拜献攸资,敬承清问!谨就平日诵习所及,勉竭愚忱以对。

伏读制策有曰:治法莫盛于唐虞,因缅於变之休风,师敬敷之遗意,而欲使教民者以实不以名。此诚致治保邦之要也。臣惟德盛者化神,故训俗型方必本于道德齐礼。古昔盛时,法制修明,纲纪具饬。其民皆有迁善远罪之思,而上之视其民皆必有父母斯民之责,故教化之权操之自上也。然或条教号令视为具文,而诚意弗属。则虽悬书屡示,读法频闻,窃恐无当于风行草偃之观,而潜移默运之功不数数觏也。《周礼》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而旌别淑慝,彰善瘅恶,于《周书》三致意焉。凡以使愚蒙者知所劝,而顽戾者知所惩也。夫守令者亲民之官,大吏者群有司之表。苟身膺民牧者,兴化善俗,大远于俗吏之所为,而耻以簿书期会为尽职。督、抚大吏复以是定其殿最,慎其考稽,将所称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诚操乎化民成俗之原也。圣天子整饬官常,勤求治理。凡封疆重臣,必尽心民事者始邀简擢,正本清源之道,莫切于此。犹虑董率有未周,化迪有未至,训谕周详,推诚共见。是在有教化之寄者,心体而力行之,将以一道德,同风俗,而士敦廉让,民知礼教,悉由于此。

制策又以士者民之望,而因及于潜修之宜笃,私党之务除。臣愚以为圣人之世无党。非无党也,人主识微知著,有以预绝其党也。夫士之学问纰缪,行止颇僻,诚不难以文绌之,以法纠之。至若假聚徒讲学之名,成党援门户之势,如东汉窦武、陈蕃诸人,自命名流,互相标榜,遂有八顾、八俊、八及、八厨之目。唐之牛、李构衅,数世相延。宋则有洛党、蜀党各为排击。夫以程颐、苏轼诸儒而犹不免于此,则知不党之学诚未易言也。明之季世,东林党盛,顾宪成、高攀龙倡于前,钱一本、孙丕扬、赵南星诸人继于后,至于潜借声援,隐挠国是。所谓生心害政者,将靡所止,不待党禁已成,而始知其败也。然则欲杜朋党之萌,而示儒术之正,亦惟化其偏私,祛其浮骛,使力崇实学而

已。我皇上本大公至正之心，操用人行政之准；荡平正直，中外率由。生斯世者，敢不争自濯磨，以慎厥步趋，端其志虑哉？

制策又曰：前言往行，悉载于书，而虑网罗之有未尽，雠校之有未精。臣谨案周有柱下史，汉魏有石渠东观。自《七略》昉于刘歆，四部起于荀勖。其后有从勖例者，如任昉、谢灵运之分部是也。有从歆例者，如王俭之《七志》、阮孝绪之《七录》是也。前史所载，藏书之富莫盛于隋之嘉则殿。唐开元时分经史子集为四库，宋初始建三馆，后又有秘阁、崇文书院。其书籍之可考者，如唐之《开元书目》，宋之《秘阁书目》，《崇文总目》，以及《中兴书目》，《续中兴书目》是也。夫书缺有间，则搜采宜殷。字体沿讹，则对勘宜审。国家文治昌明，超越往代，因前明《永乐大典》依韵分编，未为允当，爰易其割裂，归于完善。复访求遗籍，不下千百万卷。命儒臣辑为四库全书，分为应刻、应抄或仅存篇目，又掇书中要旨别为《提要》，鸿文秘简，盖云赅备矣。乃校订诸书，时勤乙览，犹间有舛讹，则校对之功尚多未尽。有编摩之责者，所宜殚心悉力，期尽免夫鱼鲁之误，而不敢诿诸扫叶之难者也。矧在事诸臣，近以五年期届，恩予简注，誉录诸生，亦仰邀优叙，斯诚千载一时之遇。而躬逢盛际者，宜何如勤勉将事，以快睹同文之盛欤？

制策又以民俗由俭入奢，因筹及于制事节用之要旨。此藏富于民之道，所宜亟讲也。臣窃惟国之本计在民，而民俗之淳漓关乎世运之升降。古圣人辅相财成，虽升平日久之余，而不忘制节谨度之思者，诚以民计期于饶裕，而其失则在奢靡也。夫服舍之逾制，宾祭之过侈，此礼法所得限者也。人工物力之靡费，饮食器用之琐屑，此礼法之所不得限者也。顾去奢从俭，不在乎虑禁之多端，而在乎风示之有本。诚使士大夫相尚以纷华，而民俗有不趋于敝者鲜矣。诚使士大夫相高以俭约，而民俗有不归于朴者鲜矣。昔明季荐绅竞为豪侈，靡惜物力，百姓互相效法，以至凋敝。则知民生之厚，未有不以崇俭为首务也。圣主勤恤民隐，轸念民依，当重熙累洽之时，不存豫大丰亨之见，比年屡奉恩旨，蠲免租赋。古者藏富于民之道何以加兹！顾养欲给求者，上之心也；端本善则者，民之训也。诚当隆盛之休，而不忘节俭之旨，将生计以之足，本俗以之敦，而蕃昌和乐之象益永于无穷

矣。

凡此者:德化期于周洽,学术戒夫拘偏,考古要在折衷,励俗贵臻淳固。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本至诚无息之心,懋纯一不已之学,群黎遍德而愈广教思,髦士攸宜而愈严趋向,博蒐往籍而愈切参稽,利济生民而愈昭节制。于以导扬圣化,敬迓休和,我国家万年保泰之规,基诸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明的帝王们用来效法天道的态度,是纯一;用来供奉上天的态度,是恭敬;用来感通上天的态度,是真诚。治国之道来源于自己努力向上不断追求而从不懈怠,教化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永久如此没有边际。因此理应登上治国大道,共同依归帝王统治天下的准则,在以文治国方面鲜明地达到明确完备,在风俗习惯上进入淳厚质朴的地步,这是长期行用大道从而实现了教化的成功。道德教化已经普遍充分却仍然不忘督导劝勉,好的风俗已树立起来却更加努力防备守护。不因为考查古事已很精到而松懈继承遗产的想法,不因为使人民生活充裕已很普遍而放弃节制的思想,这正是圣主的用心长久不止地思虑的原因。人君都是秉承天意而治理国家,就应根据先圣传授的心法来确定治法,所以治理的成绩不断积累而更加发扬光大,思想虔诚坚定而更加努力谋划。凡是万类事物的能够随时响应,有才能的人们能听从控制支配,和那考核订正典籍如何才能详细,人们的快乐利益如何才能永久这一切问题,无不统辖在终日勤奋谨慎、不敢懈怠、不敢安逸于职位的内心之中。《尚书》上说:统率起你所兴办的事业,谨慎地对待法度。这是说天子率领臣下,来振作起功业,而且必须谨慎对待这法度。《易经》上说:用中和纯正的德行来显示于天下。这是说圣明帝王在上,就可以高扬中和纯正的德行来垂示于天下。当已经得到治理、已经安定的时候,却仍然终日没有闲暇,无论是危是安都不断引起警惕。有关官员进行教化引导,都掌握那些原来的训令,行动都昭明着那些法则。典籍验证于考查的信实,生活保持经常的充裕。自古以来的圣明帝王,对这些

就像崇奉天道一样,而一天比一天谨慎,不敢荒废懈怠贪图安逸的原因,完全是这个意思。

敬思皇帝陛下,以天地的元气为本,效法皇天的刚健运行,面临安泰的局面,保持着已成的盛业,适逢极盛的重大法规,勤劳艰苦地思考着达到最好的治理,久已达到普遍地以宽厚的德政教化黎民,淳厚的风气极大地发扬起来。如果看一下古代的治理情况,没有超过现在的。但皇上至高无上的道德虽如渊之深,可是又很谦虚,咨询治理的方法却更急迫,又把臣下等人召进宫廷,而策问有关如何昌明教化,端正士人风气,考查往古遗训,崇尚节俭品德的最好办法。臣下我非常平庸极其浅陋,以短浅的见识窥测事物,怎么能够以此来体悟要旨呢?但是卑贱者的浅陋言论,向君王陈奏时也不会被废弃。何况这是刚开始报答君王,敬献长久积蓄的一些资料,恭敬地蒙受清审详问。现在谨就自己平日所阅读学习所涉及到的一些知识,努力竭尽愚拙的心意来对答。

拜读制策上有话说:在治理的方法方面没有比唐尧、虞舜时更好的了,因此缅怀唐尧时使人民变得和睦的美好风气,想效法虞舜让大臣谨慎地施行五教的留传下来的意思,而想使得教育人民的官吏要求实效不能只务虚名。这确实是使人民在政治上安定清平和保证邦国兴盛的最关键的问题。臣下我想德行美盛的人有很强的感化力量,所以教化百姓训导一方,必须根据孔夫子说的用道德来诱导,用礼教来整齐人民的方法。古代的盛世时代,法令制度整饬清明,纲常法度完备谨严。他们的百姓都有改过向善远离罪恶的思想,而在上位的人看待百姓都必定有如父母一样关怀教育这些百姓的责任,所以教育化导的权力是由在上位的人掌握的。但是或许法规教令与号召被看成徒具形式的空文,而不具有真诚的心意。这样虽然不断发布法令,频频宣读法令,我私下以为恐怕不会有像风吹草伏一样命令一下人民便顺从的现象,而潜移默化的功效肯定不会经常看到。《周礼》中规定,以乡学中的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种内容来教育万民,对教成的人用对待宾客的礼节对待他,并把他举荐给周王。而且对人民区别善恶,表扬良善,斥责邪恶,在《尚书·周书》中就多次表现了

这个意思。这些都是要使愚昧不明的人知道所鼓励的是什么，愚顽暴戾的人知道所惩罚的是什么。太守和县令这些地方官都是亲自治理民众的官，做大臣的人是一切官吏的表率。假若身为治理民众的地方长官，积极地振兴教化改善民俗，极大地不同于那些庸俗官吏的所作所为，而羞愧于只把管好文书簿册按时交差视作尽职的情况。总督和巡抚这些大臣如果再根据这些来评定他们政绩的高下好坏，谨慎地对其进行考查，那些以日计虽不足以岁计却有余的贤良地方官，也无疑是掌握了化民成俗的根本了。圣明的天子陛下整治官规，勤于追求治理的成绩。凡是封疆重臣，真正尽力于民事的人，才能受到选拔任用，端正根本清理源头的办法，没有比这更迫切的。即使如此仍担心统率有不周之处，教化有未达到的地方，训谕是如此周到详细，示之以诚是人所共见的。负有教化责任的人，应该认真用心体会而且努力去施行它，将遵照训谕来统一道德和风俗。而使士人能注重清廉礼让，百姓能知道礼仪教化，完全要靠这一点。

制策又认为士人是人民所敬仰的人，而因此谈到对潜心修养应该认真，对私党务必根除。臣下我愚昧地以为在圣明君主在位的时代是没有私党的。不是没有私党，是君主能通过事物的苗头而察知它的发展趋向与后果，有办法预先杜绝它这种私党的发展。士人的学问上出现错误，行为举止上有偏颇邪僻之处，的确不难根据他的文章摈弃他，用法律纠正他。至于像那些借着聚徒讲学的名义，形成私党而利用派别势力去搞帮派活动，如东汉时窦武、陈蕃等人，自命为名流，相互进行标榜，于是就有所谓八顾、八俊、八及、八厨这些标榜的名目。唐代的牛僧儒与李德裕两派制造争端，相沿了几个时代。宋代则有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中形成的以程颐为领袖的洛党和以苏轼为领袖的蜀党等，各为排击。以程颐和苏轼这些著名的儒界人物仍不免这种结党活动，便可知道不结党的事的确不好说的。明代末年，东林党很盛，顾宪成、高攀龙倡导于前，钱一本、孙丕扬、赵南星等人继续于后，以至于达到暗中借着相互声援，悄悄阻挠国家大事。所谓怀有异心有害国家治理的人，将没有地方是个止境，不用等待党禁已成才会知道他要失败的。那么想要杜绝朋党的萌生，而告诉人们什么

是正统的儒学，也只有改变他的偏袒私情的毛病，去除浮而不实的缺点，使他努力崇尚实学而已。我皇上本着大公至正的心怀，掌握选用人才推行政治的标准，指明的道路平坦正直，朝廷内外的臣民都相率循从。生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岂敢不争着对自己加强修养磨练，来谨慎选择自己的行动，端正自己的志向与思虑吗？

制策上又说：前人的话和已往人们的所作所为，都记载在书上，而担心搜罗的还不完全，校对考订的还不精到。臣下我谨慎查考在周代设有柱下史掌握图书，汉、魏时期有石渠阁和东观这些藏书的地方。自从《七略》开始于西汉的刘歆，四部的分类法起始于晋代的荀勖。以后有按照荀勖的分类法的，如南朝梁代任昉、南朝宋代谢灵运的分类就是。有学习刘歆的分类的，如南朝齐代王俭的《七志》、南朝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就是。据以前史书所载，藏书的丰富没有盛过隋朝的嘉则殿的。唐代开元时候分经史子集为四库，宋代初年才开始建立三馆，后来又有秘阁、崇文书院。那些书籍可以察考的，如唐代的《开元书目》，宋代的《秘阁书目》、《崇文总目》，以及《中兴书目》、《续中兴书目》就是。书的缺失有一定的时间了，而在搜集时应该不怕时间长。字体相沿而讹误，而校勘的时候应该详细慎重。我们国家在文治方面昌盛发达，大大超过了过去的各个时代，由于以前明代的《永乐大典》按照字韵来编排，不太恰当。于是改变了它割裂原文的缺点，使原文归于完善。又访求遗留下来的书籍，不下千百万卷。命令儒臣们辑为四库全书，分为应刻、应抄或仅存的篇目，又采摘书中的基本意思另外编写成《提要》，长篇巨著和奥秘的典册可以说齐备了。然而校对考订这些书，时常有劳皇上阅览，仍间或有错误，则说明校对的功夫尚有下不到的地方。负有编辑责任的人，应该竭尽全部心力，以求完全避免以鱼为鲁的这种不应有的错误，而不敢推诿于校勘的困难。况且参与其事的各位儒臣，近来因五年的期限已到，受到皇上的关注，作誊录工作的各位儒生，也受到从优叙功晋升了官职，这实在是千载一时的恩遇。而亲身遇到这种盛大际遇的人，应该如何勤勉从事这项工作，来喜悦地看一看这文字统一的盛况呢。

制策又认为人民习俗由节俭转向奢侈，因而筹谋到处理政事节

省用度的主要意思。这是藏富于民的办法，是所应该紧要去讲的。臣下我暗想国家的根本大计在于民众，而民俗的淳厚和浇薄关系着时代盛衰气运的升降。古代圣明的君王辅助裁成天地交泰万事亨通的局面，虽在升平日久以后，仍然不忘节俭克制严守礼法思想的原因，实在是期求人民的生活达到富饶充裕，而这方面的失误常在于奢侈浪费。服饰房舍的超越礼制，宴宾祭祀的过于奢侈，这是礼制法令可以限制的。至于人工物力方面的浪费，饮食器用方面的琐屑问题，这确是礼制法令所不能限制的。但是去掉奢侈实行节俭，不在于担心禁止的方面太多，而在于说明的有据有理。假使士大夫相互都崇尚繁华富丽，而民俗却不趋向这种坏风习是少见的。假使士大夫相互都崇尚节俭，而民俗却不归于朴素同样是少有的。过去明朝末年官员争着比赛豪华奢侈，毫不爱惜物力，百姓们相互效法以至于弄到国力衰败。由此知道人民生活的富足，没有不是把崇尚节俭当作首要事情的。圣明的皇上辛勤地怜恤民众疾苦，深切地思念人民的苦衷，当国家累世圣明太平相承的时候，不存有好大喜功奢侈挥霍的念头，人民连年屡次接受恩典，免除租赋。古代的藏富于民的做法有什么能比现在更好呢！但满足欲望供养需求的问题是在上位的人所思虑的，端正本业和遵守法则的问题则是百姓的应守的训条。如果正当兴隆昌盛的美好时代，而不忘节俭的意义，将会使人民生活因此富足，根本风俗因此敦厚，而繁衍昌盛和睦欢乐的气象会更加长久没有尽头了。

凡上述这些问题：道德教化期求于普遍，搞学问要警戒固执偏颇，考订古籍关键在于要折中取正，劝勉改进风俗贵在达到敦厚坚毅。敬望皇上能在政治清明时更加要求治理的好些，在天下安定时更加要求安定，本着极其真诚而永不改变的心灵，劝勉纯粹一贯的学问，万民普遍感恩怀德而更加推广教化思想，英俊之士位置恰当而更加严格前进的方向，广泛搜集以往的书籍而更加认真地进行参酌考查，施恩泽给人民而更加明确地要求节俭克制。用以引导宣扬昌明的教化，敬迎安定和平，我们国家万年保持安泰局面的规划，就正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平民出身，新得科第，不知道什么是忌讳，触犯

皇上的威严，真是十分颤抖畏惧，死罪死罪！臣下我谨慎地对答如上。

蔡廷衡 殿试对策

蔡廷衡(生卒年不详) 字咸一，浙江仁和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行健自强，乃见天则；无逸作所，斯知民依。自昔圣王承重熙累洽之余，履长治久安之盛，亦既懋昭端乎主极，雅化浹于士林，昌明征文教之覃敷，康阜验民风之淳茂。然且恪恭震动，作其气而励其修，岂过慎哉？行实政者在勤，而存实心者在敬。一日二日万几，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以勤而实政常行也。尧钦舜恭，文缉熙，武执竞，以敬而实心常存也。故彝伦攸叙矣，而敷锡训行之本愈切畴咨；学术已正矣，而行止趋向之原弥深劝迪。典籍必重厘，不敢谓文明之既启；闾阎必遍计，不敢谓乐利之有源。上下之理咸符，遐迩之情胥浹。以端教化，以正人心，治莫大焉；以一道德，以同风俗，绩莫隆焉。缅维盛时，大化翔洽，湛恩庞鸿，畅九宇之淳风，答三灵之繁祉，其治无以加，而其道无以易。何者？有兢兢业业之渊怀，斯有可久可大之上理。休嘉布于无穷，鸿称浹于来兹，不亦宜乎！

钦惟皇帝陛下，日新崇德，时叙亮功，秉至圣之资而朝乾夕惕，建非常之业而旰食宵衣。凡所谓崇治术，办实学，重古训，导民俗者，无不至详且悉。固已被润泽而大丰美，冠今古而独隆矣。乃宸衷渊惕，咨访弥殷，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自维椿昧，乌足以知体要？然久际升平，沐浴化泽，兹值拜献伊始，正宜敷奏以言，敢不竭管窥蠡测之愚，以仰副高深于万一！

伏读制策有曰：教民以实不以名，惟在大吏率属实力化导，而欲使士敦廉让，民知礼教。臣惟制治之道，教化尤先。尧之时雍於变，舜之敬敷五典，皆正立于上而化成于下也。然教固主于君，而亦分寄其责于良有司。盖继天立极者，君也；承流宣化者，臣也。天生民而立之

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此教之自君者也。设之以学校，董之以师儒，以风俗为必可厚，而不敢置力田孝弟为缓图，以礼让为必可兴，而不仅恃饮射读法为虚务，此教之在良有司者也。而群吏之奉行，则又视大吏之宣猷布政有以倡导而董率之。《易》曰：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记》曰：凯以强教之，弟以悦安之。盖主极立于上，臣职励于下，而后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所谓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胥是道耳。夫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固未有在官无振作兴起之方，而闾里能蒸然丕变者。我皇上体元建极，用人惟明。固已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罔不率俾，然且诏旨时宣，凡有以修德行之本而养廉耻之原者，靡不恺切详明，得以家喻而户晓。虽遐方殊俗，莫不共乐升平，而犹或有忘思不靖者，此亦愚蒙顽悍之徒，自弃于覆载之外，又何足为至治累哉？故稂莠一除，而嘉禾益昭其畅遂也。

制策又以士习务虚名而受实害，必宜杜私党而笃潜修，而因思防微杜渐之道。臣闻天地之性人为贵，四民之中士为先。士者，斯民所视为标准者也。故欲民之一其趋，必先使士之正其学。自汉以经学取士，分贤良、孝廉、博士为三科，虽得人称最盛，而角名之心已起，当时即有缘饰通经曲学阿世者。东汉之士如李膺、范滂、郭泰、广宪辈，并皆束身砥行，以节义相高。其敝也，群相标榜，过持清议，遂启天下楷模不畏强御之誉。唐代中叶而后，稍采声望，而士习益靡。宋元祐洛蜀碑中虽以正人未得免者，亦各树党援之故耳。至明季而此风愈炽，一时有"东林朋党录"、"东林同志录"，宵小协谋，排挤良善。籍令当日叶、赵、高、缪诸人不以独行自诩，稍知引退，则东林之患当不至此。乃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此史册所深慨也。总之，朋党之势成，即开营竞之习，二者又未尝不相为因依。方今政治昌明，士风向化，将欲杜于未萌，防其渐致，道惟以立诚为训学之本，以训学为人心之闲，则非特绝浮夸，且以收实用矣。《诗》曰：蔼蔼王多吉士。其是之谓乎？

制策又以历代藏书得失与夫网罗之难尽，舛讹之时多。夫载籍极博，浩如烟海矣。将汇之以集其成，惟有以审其体例，而酌乎今古

之中，以定为一代之典，斯其道大备。臣谨案汉刘歆父子校定群书，著为《七略》，而首以《辑略》，则条举诸书之大要，其实乃六略也。自晋荀勖撰定《中经》，分甲乙丙丁四部之目，后虽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之异，而唐代藏书定为四库，莫之改也。顾晋时子多而史少，辄先子而后史，荀勖之部未为至正，则经史子集之分，自一定而不可易。故汉志《艺文》而《唐书》因之；隋志《经籍》而《旧唐书》因之。其为编排或异，而类例则一，自非后儒之所可拟议而定定者也。方今圣天子旁搜遗轶，辑为四库全书，校雠厘定，靡不精详，图书之盛，古今罕匹。士生其间，诚千载一时也。又何石渠、东观所得同日而语哉？

制策又以人民殷富，由俭人奢，何以为返朴还淳之道。臣惟古者陈诗以观民风，而贞淫奢俭莫不毕见。诸歌咏之余，盖将以考其时尚，知其性情而因而为之制，则移易之道已隐寓乎其中。三代以下，两汉风气近古，故其时俗尚俭朴，人崇礼节，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自是而降，去古渐远。六朝承晋代之余，沿而未革。下此唐宋元明，其间盛衰升降之原，更难缕述。要之始以时尚而积成运会，继且以运会而变其时尚也。夫日用饮食，小民日相率而不知，而踵事增华，渐成侈泰，其势然也。国家都邑蕃昌，人民日盛，享太平之福，未必不忘帝力之艰。孟子曰：食之以时，用之以礼，民可使富也。盖乡闾日裕，则食用渐丰，以时以礼，所为因其势而节之者也。事有制而不烦，富以藏而可久，其道不外乎此与？

凡此者：作则所以观化，崇实即以黜浮。明经者修行之原，持盈者保泰之本。伏愿皇上设诚以致治，久道而成化，握乾纲则圣不自圣，持要道则安益求安，以施教化，而吏皆整躬，以端学校，而士知正己，文章著炳蔚之观，淳厚征富教之实，盛朝万年有道之庆，与天无极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运行刚健自强不息，这是体现了天象的法则。不安逸于职位，这才知道人民的苦衷。从古以来圣明的君王承受累世圣明太平相承之后，经历了长治久安的兴盛局面，也就会勉力显扬大德而端正君主的准则，纯正的教化遍及士大夫阶层，兴盛发达

证明礼乐法度的广泛传布，安乐富庶说明人民风气的淳厚茂美。然而尚且恭谨激励，振作其精神而砥砺其修养，难道是过于谨慎的吗？推行切实政治的人在于勤奋，而存有诚实之心的人在于端肃。一日又一日地处理朝政，从早晨到太阳由中天而西斜，顾不得休息和吃饭，这是因为经常勤奋地推行实政的缘故。像尧一样谨慎，像舜一样严肃，像周文王那样光明，像周武王那样刚强不息，这是因为经常端肃地存有诚实之心的缘故。所以治国的常道已经确定了，而对施赐恩泽和训导行为的根本问题便会更加殷切地进行访求；学术已经端正了，而对品行志趣的本源问题便要更加深入地进行劝勉和启迪。对典籍一定重加考核订正，不敢说文教昌明已经实现了。对平民一定普遍考虑他们的生活，不敢说幸福已有了来源。上下所讲的道理都一致，远近人的感情都融洽，以此来端正教化，端正人心，对国家的治理没有大过这样的，以此来同一道德，同一风俗，政绩没有高过这样的。遥想盛世，广远深入的教化非常周遍，深恩浑然宏大，畅扬九州的敦厚古朴的风俗，应和天地人的多福，其治理的成绩不能再增加，而其治理的方法不能再改变。这是为什么呢？有兢兢业业的深沉的心怀，才会有可久可大的最好的治绩。美好吉祥传播无穷，美称大名留传于后世，不也是很应该的吗？

敬思皇帝陛下，日日增新崇高的德行，不断理正代天行事的辅佐之功。秉持极为圣明的天资而终日勤奋谨慎不敢懈怠，为建立不同平常的事业而天已晚才吃饭天不亮就穿衣。凡是所说的崇尚治国之术，辨别切实有用的学问，重视古代留传下来的典籍，引导民俗向敦厚质朴方面的转变等问题，无不极其详细而且完备。本来大家已蒙受恩泽而大为丰厚和美好，治绩已盖过当今和往古而与众不同了。可是君王的心意却深沉戒惧，咨询更加殷切，把臣下等人召进宫廷来进行策问。臣下我自以为愚昧，哪里能够了解国家大事的要领？然而自己长久地遇到太平盛世，蒙受着教化的恩泽，如今正值刚开始礼拜奉献的机会，正应该陈奏意见，怎敢不竭尽自己的以管看天以瓢测海的浅陋愚见，来恭敬地辅助学问博大精深的皇上于万分之一呢！

敬读制策上谈到：教育人民要求实效不能只务虚名，这关键在于

地方大臣能统率自己属下的官员去切实地努力教化引导，而且想使得士大夫能注重清廉礼让，人民能知道礼仪教化。臣下我想治理政务的办法，尤其应把教化放在第一位。唐尧的取得使人民变得和睦的政绩，虞舜的让契谨慎地施行五种道德教化，都是先使在上位的人建立纯正的德行之后，而在下面的百姓才完成教化的。但教化固然由君王主持，而也要让好的官员分担他们的责任。因为继承上天居于最高地位的人，是君王。接受君王的旨意去教化百姓的，是臣子。上天生下人民而给他们立了君主，使君主治理他们不使他们失去本性，让君主像老师辅导他们不使他们超越界限，这就是教化来自君主的道理。设立起学校，由儒师们主持，认为风俗是必定可以淳厚的，而不敢把努力耕田与孝父母敬兄长这些事置于可延缓考虑的地位；认为守礼谦让作风是必定可以兴起的，而不仅仅把饮酒射箭的典礼与宣读法令当成空洞的事务，这是教化在于好的官吏的情况。而众官员的遵照实行，便又要看地方大臣在施展谋划施政方面，对他们有所倡导和统率的情况如何。《易经》上说：君子因此花费无穷的思虑教导百姓，发扬无边的美德来容纳养育民众。《礼记》上说：要用和乐去大力教导他们，要用平静去让百姓喜悦来安定他们。君主立教于上，臣子们勉励于下，然后就会表彰美善憎恨邪恶，树立好的风气。所谓通过正朝廷来正百官，通过正百官来正百姓，都是这个道理。做父亲兄长的如不首先重视教化，做子弟的就不会认真地遵从。绝没有做官的缺乏振作兴起的办法，而民间却能突然发生大变的。我们的皇上以天地的元气为本建立中正之道，任用人才非常圣明，早已达到普天之下至于僻远的海角天涯，百姓没有不顺从的。然而尚且圣旨常常宣布，凡是有关修养德性的根本问题，和培养廉耻的本原问题，无不恳切详明，能够做到家喻户晓。即使是远方不同风俗的地域，没有不共同喜欢这升平之世的。如果或许还有不加考虑进行骚乱的人，这也是愚昧不明、蛮横强悍之徒，甘心自弃于皇上恩德之外，又哪里能够成为治理最好的盛世的连累呢？所以杂草一旦除掉，而好的禾苗就更加显示它的畅茂顺遂了。

制策又认为士人常因追求虚名而受到实际的危害，必须要杜绝

私党而认真地专心修养，因此考虑防微杜渐的办法。臣下我听说在天地间的生命中只有人最贵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居第一位。士人，是被百姓看成学习榜样的人。所以要想使人民统一他们的努力方向，必须先要使士人端正他们的学习内容。自从汉代用经学来选取士人，分了贤良、孝廉、博士这三科，虽然所选得的人才被认为最多，但追逐名声的思想已经产生，当时就有伪装精通经学和歪曲自己学术以投世俗之好的人。东汉的士人如李膺、范滂、郭泰、广宪这些人，全都是约束自身修养道德，用节操义行相互比高。它的弊病是，大家相互标榜，过分坚持对时政的议论，于是便开启了天下楷模不惧怕豪强的声誉。唐代中叶以后，渐渐注重猎取众所仰望的声誉，而士大夫的习气更加不好。宋代所刻元祐洛蜀党人碑中的人，虽都是未能免祸的正人，但也是由于他们各树私党结党为援的缘故罢了。到了明朝末年这种风气更加厉害，一时之间有“东林朋党录”、“东林同志录”出现，由小人们共同谋划，排挤好人。假使当日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缪昌期等人不把节操高尚不与俗世浮沉来自我夸耀，稍稍知道退避，那么东林党狱的祸害可以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然而前车虽已折断，继来的车却正急迫地赶来，这正是史书作者所深深慨叹的。总之，只要朋党的形势形成，就会导致营谋竞争风习，两方面又未尝不相互为依托。如今政治昌明，士风归向教化，若想把营私结党杜绝在没有萌芽的时候，以防止它逐渐产生，其办法只有把树立诚心作为教育和学习的根本，把教育和学习作为人心的防护栅栏，便不但可以去掉浮夸的恶习，而且可以收到防止私党产生的实际效用了。《诗经》上说：君王的贤臣济济一堂。它就是说的这一点吧？

制策上又认为历代藏书的得失和那网罗的难以穷尽，错讹的不易避免。历史上留传下的书籍极多，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了。要把它汇集起来编成全书，只有认真研究它的体例，并对古今编书的得失加以斟酌，来定为这一时代编书的准则，这样它的办法就可以基本完备。臣下我谨慎查考，汉代刘歆父子校定所有的藏书，写成《七略》，而以《辑略》为首，来逐条举出各类书的内容大要，其实是六略。自从晋代的荀勖撰定《中经》，分成甲乙丙丁四部的目录，以后虽然有王俭

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的不同的分法，而到唐代把藏书定为四库以后，没有人再改变过它。因为晋朝时候子书多而史书少，往往先列子书而后列史书，所以荀勖的四部的排列不能算是最正确的，但经史子集的分法，是一定不可变的。所以《汉书》的《艺文志》，《唐书》因袭了它；《隋书》的《经籍志》，《旧唐书》因袭了它。它们在书目的编排方面或有不同，但体例却是一致的，决不是以后的儒者所可以讨论来修改确定的。如今圣明的天子四处搜集遗失的书籍，辑为四库全书，校订整理编定，没有不是精详的，图书数量之多，古今没有能和它相比的。读书人生在这个时候，诚然是千年一遇的难得机会，又是什么石渠阁和东观所能够同日而语的吗？

制策又认为人民生活富足后，由节俭变为奢侈，到底什么是恢复朴实淳厚的办法？臣下我想来，古代采集进献诗歌来观察民间风习，于是有关贞行淫乱奢侈节俭的情况无不完全显现出来。在唱咏这些诗歌之余，就可以通过它考查当时的风尚，了解人民的性情，而根据这些制定法令，这样移风易俗的办法已隐寓在其中了。夏商周三代以后，两汉时代的风气接近古代，所以那时风俗崇尚俭朴，人们崇尚礼节，仍然具有先王的遗风存在。从此以后，离古代渐远。六朝时承接晋代的余风，沿袭下来没有改变。再以后的唐代、宋代、元代、明代，其间的盛衰升降的原因源流，更难以详细叙述。总之都是开始以当时的风尚逐渐积累成时势，接着再由时势改变其当时的风尚。在日用饮食方面，小民们每天相继如此而不觉察，于是在继续旧习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渐渐成为奢侈无度，它的情况就是这样。国家的城市扩展昌盛，人民一天天增多，享受着太平之福，未必就不忘皇上用力的艰难。孟子说：按时食用，依礼消费，可以使百姓富足。乡间中百姓们一天比一天富裕，食用的东西便会日渐丰富，按时食用和依礼消费，是使所做的事顺着情况来节省物品。做事有节制便不会繁杂，财富因为能保藏便可以长久，树立淳朴风尚的办法不外乎这些吧？

凡上述这些问题：作出榜样是用来观察教化的成果，崇尚务实就是以它去掉浮夸，通晓经术是人们修养品行的本原，保守成业是人民保持安泰的根本。敬愿皇上以诚厚的存心使国家在政治上达到安定

清平，长期引导而完成教化，掌握着君权却圣明而不自傲，守持着重要的治国方法而安益求安，施行教化，因而官吏都修养好自己的身心，办好学校，因而士子知道端正自己的言行，文章表现出鲜明华美的特点，敦厚质朴验证了富裕人民并教育人民的实效，这样盛明朝廷万年有道的福庆，就和天一样无穷无际了。臣下我平民出身，新得科第，不知道什么是忌讳，触犯皇上的威严，真是十分颤抖畏惧，死罪死罪。臣下我谨慎地对答如上。

孙希旦　殿试对策

孙希旦(生卒年不详)　字绍周，浙江瑞安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探花，例授翰林院编修。撰有《礼记集解》，蜚声儒林。

臣对：臣闻正直荡平者，锡福之隆轨；忧勤惕励者，保泰之良图。遐稽在昔，载籍之传，维风可观也。盖道莫懿于尧舜，治莫盛于唐虞，于时协气淳风，旁魄允塞。然而俗□於变，不忘五教之敷；朝集群贤，尚切庶顽之虑。钦明浚哲而稽古者益殷，府事修和而厚生者弥至。何其英声茂实显烁之如彼，而储精垂恩勘毖者如此也！惟天行健，惟圣法天。恒久不已者，天之运；无逸作所者，圣之心。夫是以景运光亨而昭明寅畏，夙夜不敢康，凡所以化闾里而迪胶庠，考往昔而谨俗尚者，罔不单心于蟺蜎蠉濮之中，而实措诸海隅光天之远。迪教率典以笃其天性，黜浮崇实以警其奇邪，图书亮章以焕其文明，日用饮食以防其侈伪。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用使闾阎有群居和壹之休，朝廷有谟明弼谐之雅，文章日昭其炳蔚，食货益进于丰盈。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由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令德宜民，亹聪作后，建大中以敷治术，受厚福以浸黎元。固已泄苞符之蕴奥，兼富教之大全矣。乃圣德渊冲，畴咨弥切，爰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迪民、造士、监古、防奢之要。臣至愚极陋，何足以知此？顾念广思集益，有不弃流壤之心，而学古入官，有先资拜献之义，用不揆鄙陋，谨竭其平日所诵习者以对。

伏读制策有曰：教民以实不以名，而欲使士敦廉让，民知礼节。此诚节性防淫之至意也。臣窃谓王者之于民也，必有以使之回心而向道，而行之必有其实，导之必有其源。陶唐之化黎民，而由九族以逮百姓，由百姓以至万邦。其后舜命九官，而敬敷之事专责于司徒。故教民之道未尝不深，探其本而返自贵者始。夫长吏者，民之父兄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所固然也。则夫董率属吏，实力化导，使百性迁善远罪，以无负父母斯民之任，督、抚大吏固不得辞其责矣。我皇上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所以树之仪轨，陈之艺极者至矣。为督、抚者，诚能仰体圣意，正一身以为先路之导，勤训迪以示率由之方，不徒务乎太平粉饰之文，而必尽乎型方训俗之实。则属吏之承流宣化者无不勉，而斯民之革面洗心者无不率，将见横经者论秀而可升，负耒者处野而不曙，一道同风之化，不自此而愈隆也哉？且夫士者民之表也，苟名列宫墙者尚流于浮伪，何以使身处畎亩者克返于真淳。

制策欲学者笃潜修而杜私党，而思所以劝迪之术，虑至深远也。臣窃迹汉、唐、宋、明已然之事，而知朋党之为国家患非一日也。西汉之恭、显、许、史，小人成群，刘向之所以上书而极论者，不足言矣。而东汉之俊、厨、顾、及，以清流之矫激，而不免酿社稷之忧。唐之牛、李互相倾轧，文宗之所为临朝而兴叹者，不足言矣。而宋之蜀、洛交攻，以门户之各立，而不免启绍述之患。至于明季之东林，本以讲学为事，而卒之依声附响，议论纷拏，邪正由之而混淆，国是因之而莫定。此皆误始于学术，而患及于国家者也。盖小人以利势为党，其害固不可长，而君子以声气为党，其端尤不可不防。我皇上用中建极，而尤务破除朋党之积习。诚使为士者求道德之实，而不竞意气之私，学问醇自无虚声之标榜，涵养深自无意见之纷争，伏处既无伪辩坚僻之风，立朝必有同寅协恭之雅，士习既端而民风亦自此益厚矣。

制策又以前言往行悉载于书，而虑夫网罗之有放失，鱼鲁之有舛讹。此又右文重道之至意也。臣以为载籍之来尚矣。周有柱下之藏，汉、魏有石渠、东观之储。汉刘向分群书为七略：曰辑略，曰六艺略，曰诸子略，曰诗赋略，曰兵书略，曰方技略，曰术数略。晋荀勖因郑默

《中经》分为四部：一曰甲部，六艺、小学等书；二曰乙部，诸子、兵书、术数；三曰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字；四曰丁部，诗赋、图谱、汲冢书。梁阮孝绪分七录：曰经典录，曰记传录，曰子兵录，曰文集录，曰技术录，曰道录，曰佛录。而要惟唐之以经史子集为四库者为至当。盖方技术数与夫道佛之书，诸子可以该之。而晋之四部先子于史，不若唐先史于子为尤得其序也。我皇上圣学渊深，日新富有。兹特命儒臣辑四库全书，搜访校雠亦云勤矣。而犹不免于放失讹舛者，何哉？汉成帝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唐代宗时亦使苗发求书于江淮。而汉之《七略》，任校雠者，则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诸人也。故网罗之放失，由各省州县访求之未尽其方。而鱼鲁之或讹，则校雠诸臣识力之有未逮也。任其事者，可不思各殚乃心，以仰副圣天子稽古之圣怀乎？

制策又以民之由俭而入奢，而思所以还淳返朴，使民不烦而事可久。此又撙节爱养之心也。臣以为民俗之奢俭，民生之贫富所系也。汉景帝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故习尚侈则本业妨，本业妨则民贫而财匮，此诚不可不虑也。夫上之所以禁民之奢者，恃法与礼也。顾服舍之违制可以法绳，而人工物力之糜费不能以法绳；宾祭之过侈得以礼节，而饮食器用之琐屑不能以礼节。倘事事为之厉禁，则爱民而适以扰民，非所谓修其教不变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我国家重熙累洽，都邑蕃昌，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而奢侈之习，亦由之而生，固势所必至也。欲防其弊，要在为长吏者，明制度以示之，躬节俭以率之。则礼法之所及防者，既有所遵守，而不至僭逾。礼法所不能防，亦有所则效，以返于朴质。《礼》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此之谓也。

若此者：道备乎盛德大业，而事兼乎养士恤民。要期我皇上以至诚无息之心，成久道化成之治。中正以观而道德齐礼，益敦风化之原；教思无穷而激薄停浇，弥储俊髦之选。稽往册而尊闻行知之益典于学，阜民财而开源节流之日有其方。洽太和于四海，答蕃祉于三灵，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在是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王道正直平坦，是赐福于民的重要轨则。为国忧虑勤劳警惕谨慎，是保证国家安泰的良好谋划。远考过去的时代，在留传下来的典籍中，唯有风教是值得一看的。拿为王之道说没有比尧舜更好的，就治理的水平说没有比唐尧虞舜时代更兴盛的。当时和谐的敦厚的风气，绵延到所有地方。然而风尚虽变，他们仍然不忘记传布五种道德的教育；朝廷集中那么多的贤臣，他们还那样认真地思虑着教训和惩治那些愚妄的人。虽然敬肃明察智慧深邃却对考查古代的事更加殷切，六府三事条理顺和却对百姓生活的充裕更加关怀备至。当时美好的名声与盛美的德业是那样的鲜明，而蓄养精神施予恩泽却是如此地谨慎啊！只有天道运行壮健，只有圣人效法天道。永久不停止的是天道的运行，不安逸于职位的是圣人的心意。所以好的时运虽光明亨通却仍显著戒惧，从早到晚不敢康宁，用来教化人民而开设学校，考查已往的记载而慎重对待时俗风尚，这一切无不是用尽心思于深邃的宫廷之中，而实际要运用于普天之下以至海边之远。遵循教育常法来增厚他的天性，革除浮华崇尚实际来告诫他的邪伪不正，图书彰显可以焕发它的文采光明，日用器物和饮食要防止它奢侈僭越。仁德圣明的事既然已经都包括了，那么帝王的治国之道就完备了。须使民间有众人共处和睦同心之美，朝廷有决策英明辅佐协调之雅，文章一天天显示它的华美文采，食物钱财更加达到丰富盈足。以前的圣主之所以永远保持着盛名而常作为首屈一指的圣君的原因，正是由于能做到以上几点。

敬思皇帝陛下，美德极宜于安定人民，确实聪明最适合于作天子，建立中正之道来推行治国的方法策略，接受又多又大的福气来滋润百姓。可以说已泄露河图洛书的精深涵义，并兼有富民化民的大全了。但皇上至高无上的道德渊深谦逊，咨询极为迫切，把臣下等人召进宫廷，策问有关引导人民，造就士子，借鉴古籍，防止奢侈等关键问题。臣下我非常愚昧极其浅陋，怎么能知道这些呢？但想到当博采众人智慧来集中有益的意见时，有不嫌弃普通人的心，当学习研究古代典籍后入朝作官时，有向君王礼拜奉献的道理，因

此不考虑自己的鄙陋，认真竭尽自己平日所阅读学习的东西来回答提问。

敬读制策上说：教育人民要求实效不能只务虚名，而想使士人注重清廉谦让，使人民知道礼仪规范。这的确是节制性情防止淫滥的极深远的用意。臣下我私下以为以王道治天下的君主对于人民，必定有用来使他们改变心意向慕道义的办法，推行起来一定有它的实效，引导人们一定有它的基本根据。唐尧的教化人民，是先由和睦宗族开始再到治理百官，由治理好百官再到协和各国诸侯。以后舜任命九位大臣，却把谨慎地施行五教的事专让司徒负责。所以教化人民之道不能说不深奥，但如探索它的根本点却反过来应从地位显要的人开始。那些做大臣的人，就像是人民的父兄。做父兄的不首先重视教化，子弟的一切行为不谨慎，这是必然的。因此统率自己属下的官吏，切实努力地教化引导，使百姓们改过向善远离罪恶，以不辜负领导人民的责任。总督、巡抚大臣，实在是不能推辞掉他们的责任的。我皇上探讨治国之道先从自己开始，然后为百姓设置法度，因此所树立的礼法规矩和公布的准则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些做总督、巡抚的官员，假如能体察皇上圣明的意思，先正自己一身来做先行的领路人，勤于教诲启迪来告知人们遵循的常规，不只是空做那粉饰太平的表面文章，而坚决尽力去做规范道德教化民众的实际事情。这样属下官吏接受君主的意旨进行教化百姓的人就会无不努力，而百姓中想彻底悔改的人就会无不顺从。而且将会看到横经读书的人通过选拔秀士可以升迁，背负农具的人处身民间而不奸邪，同一德行和风俗的教化，不是从此就更加兴盛了吗?况且士人是人民的表率，假若考取功名的人尚且流于浮华虚伪的作风，如何使身处民间的人能够回到真诚敦厚的品行上呢?

制策想让学习的人认真地专心修养而杜绝私党，从而思考用来劝勉启迪的办法。这种思虑是极为深远的。臣下我私下考察汉、唐、宋、明各代已经存在的事实，知道朋党成为国家的祸患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西汉宣帝时的宦官弘恭、石显，外戚许伯、史高，小人成群，刘向之所以向宣帝上奏章而极论这些人的罪恶的事，不

必说了。而东汉时窦武、陈蕃等名流相互标榜而出现的所谓八俊、八厨、八顾、八及这些人，以自命名流的奇导偏激，而不免酿成国家的忧患。唐朝牛僧儒与李德裕两派互相倾轧，文宗之所以临御朝廷时发生感叹，不必说了。而宋代以程颐为领袖的洛党和以苏轼为领袖的蜀党相互攻击，因各立门户，而不免开启了哲宗时对神宗所实行的新法的继承的祸患。至于明末的东林党，本来是以讲学作为自己的职业，却终于随声附和，议论纷乱，邪正因此而混淆不清，国家大事因此而不能确定。这都是开始于学术的失误，而祸患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大概小人是根据利益和权势结成私党，它的危害固然不可让它发展，而君子们是以共同的志趣和爱好结成党派，对这种情况尤不可不防。我皇上以中正之道建立法度准则，并尤其致力破除朋党的不良积习。假使做士的人只是追求道德的实际效果，而不去争比个人的志趣，学问精纯自然会没有虚名的标榜，涵养深厚自然会没有意见的纷争，居家为民既不会有诡辩和固执怪僻的作风，立朝为官必定会有同僚一起恭谨事君的高雅表现，士习既然端正而民风也从此更加淳厚了。

制策又认为前人的话和过去人们的所作所为都记载在书上，因而担心对书的搜罗有散失，校订中有鱼鲁相混的错误。这又是崇尚文治重视道义的深远用意。臣下我以为典籍的由来已久远了。周代有柱下的藏书，汉和魏时有石渠阁和东观的藏书。汉代刘向把所有的书分为七略：叫辑略，叫六艺略，叫诸子略，叫诗赋略，叫兵书略，叫方技略，叫术数略。晋代荀勖沿袭郑默的《中经》分为四部：一为甲部，包括六艺、小学等书；二为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等书；三为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四为丁部，包部诗赋、图谱、汲冢书等。梁代阮孝绪把书分为七录：叫经典录，叫记传录，叫子兵录，叫文集录，叫技术录，叫道录，叫佛录。但总之只有唐代以经、史、子、集为四库的分法为最恰当。因为方技、术数与道、佛的书，诸子可以概括它。晋代的四部把子类放在史类前面，不如唐代的把史类放在子类前能更合乎顺序。我皇上对圣人之学了解很深，日日更新自己包罗万象的学识。

如今特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搜集访求校对订正也可以说非常勤劳了。但仍然不免于散失和错误，这是为什么呢?汉成帝派陈农在全国访求前代的遗书，唐代宗时也让苗发在江淮一带搜集书籍。汉代的《七略》担任校勘的人，是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等人。所以网罗的不完全，是因为各省、州、县在访求上没有找到最好的方法。而或者有鱼鲁相混的错误，便是负责校勘的各位儒臣在识别力上有不够的地方。担任这些事的人，难道可以不考虑各尽其心力，来符合圣明天子考古的盛意吗?

制策又因为民众的由俭朴而变得奢侈，于是想设法使他们再回复到淳朴方面，使人民不感到繁琐而且能使事情坚持长久。这又是抑制恶习爱护养育人民的爱心。臣下我以为民俗的奢侈和节俭，是关系着民生的贫富的。汉景帝说：雕刻文饰器物是伤害农业的事，编织锦绣是影响女功的事。所以习俗崇尚奢侈便会妨害农业，农业受到伤害便会民贫财缺，这实在是不可不忧虑的。朝廷之用来禁止人民的奢侈的办法，是依靠法和礼。但服饰居室的违背制度可以用法来处理，而人工物力的浪费却不能用法来处理；招待宾客和祭祀的过分奢侈能用礼制来节制，但饮食器用的琐屑小事却不能用礼制去节制。倘若事事都加以严厉禁止，则爱民恰恰成了扰民．不是《礼记·王制》上所说的整治他们的教化不必改变其风俗，统一政治而不改变他们已习惯的生活方式。我们国家前后功绩相继累世升平，城市繁荣昌盛，其富裕足可以使礼仪周备，其和乐足可以推广乐舞感化。然而奢侈的习惯也会由此而产生，这的确是形势所必然会发展到的。想要防止这种弊病，关键在于做大臣的，应该把制度明白地告知人们，亲身节俭来带领人们。这样礼法所能防止的事，既有所遵守而且不至于非分地超越礼制。礼法所不能防止的事，也会有标准去仿效而回归质朴。《礼记》上说：做百姓君长的人，衣服的样式要固定，举止有常规，以此来约束百姓，这样百姓的道德才会齐一。说的就是这点。

凡上述这些问题：就道来说已完备涉及高尚道德与伟大帝业，就事来说便兼顾到培养人才和抚恤百姓。总之希望我皇上以极其真

诚永不止息的心，完成长久倡导教化成功的治理，以中和刚正之质让天下人观仰，并以道德来诱导人民，以礼仪整齐人民，更加注重教化的本原。不停地思考教育问题而遏制浇薄的社会风气，选拔更多的优秀人才。考查以往典籍而尊崇见闻与具体践行，使更加有利于做学问，不断丰富民财而开源节流一天比一天有办法。使普天下太平，报答天地人多福，国家亿万年没有止境的美好现实都在这里了。臣下我出身平民，新得科第，不知道什么忌讳，触犯皇上的威严，真是十分颤抖畏惧，死罪死罪。臣下我谨慎地对答如上。

〔蔺瑞生译〕

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殿试策问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诞膺宝运,今四十有五年。幸函夏乂安,广轮茂豫,钦崇永保,慎宪省成,凛怀无逸之图,式迓延洪之福,恒思谠论,以赞鸿猷。况今佑荷天申,春禧溥愷,缅惟古义,寿考作人,槭朴薪槱,当必应期而作。兹因廷试,仁采嘉谟。

孟子述道统之传,自尧舜以至于孔子。盖谓心法,治法,同条共贯也。然帝王之学,与儒者终异。保大定功之要,其果在观未发之气象,推太极之动静欤?永嘉学派,朱子讥为事功。真德秀作《大学衍义》,其目自格致、诚正至于修、齐而止,治、平之经略,不详焉。抑又何欤?

天下之化理,存于民风;而民风之淳漓,由乎吏治。贾谊称俗吏之所为,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是则然矣。然蒲鞭示辱,谓之仁心;催科政拙,谓之循吏。其果可理繁治剧欤?一道德以同风俗,始臻上治。乃或以轻财结党为义侠,豪健挠法为气节,以败俗而负美名。为长吏者,将何以辨别而诲导之欤?

积贮之法,不出常平、社仓。然常平丰敛而歉散,其制在于出陈易新。但逢谷贵而采买入仓,虑有强派之弊;谷贱而红陈召籴,恐滋勒买之虞。何道而使仓庾常盈,闾阎不累欤?抑借社仓者,必皆贫户。

倘所人之息，不敢所出之数，是义举且见废；使必按册而促之偿补，则追呼滋扰，善政反成作法之凉。将何以斟酌而归于实惠欤？

《书》称刑期无刑，辟以止辟。盖天地之道，温肃并行；帝王之治，恩威交济。固大异乎名、法之家，而亦非徒博宽大之誉也。后世秉宪之吏，不知德礼刑政之同原。其于明罚敕法之道，未能权衡，要于至当。岂咸中之治，果难复见欤？将使惟明惟允，无纵无枉，以协于弼教之意，果操何道欤？

夫先资自献，官之始也；敷奏以言，古之制也。多士学古入官，于经世之略，讲之有素，又新自田间来，于民生利弊，知之必悉。其竭虑以对，无泛无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天下万物的表面和内部、精妙处和粗浅处就无不掌握住，而我那心性的完整主体和切要施用没有不明了的了。

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是他侥幸免于祸害。

完全信从《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承当国家的天赐气运，到现在已经四十五年了。很幸运整个华夏太平安定，统辖区域大为扩展，敬畏尊崇天道，永远保有天命，慎重对待已有的法典，反复思索成功的事例，十分戒惧地心怀不贪图安逸享乐的意图，迎受绵延盛大的福佑，经常想听到正直的言论，来辅助长远宏大的谋划。况且如今吉庆地蒙受上天赐寿赶上七十岁生辰，春天的吉福广大通畅，追念古人的义旨，君主年高长寿要培养造就新人，丛生的白棫和山枣树要砍伐它，堆起燃烧它，应当必须顺应时机去实施。现在借助殿试策问，长时间站立来期待采择到美好的谋略。

孟子叙述道学统系的传承，从唐尧虞舜一直到孔老夫子那里。这是认为心治大法和施政大法是道理相通，脉络连贯的。然而圣帝明王的学问，毕竟和儒士不同。保有播布到全华夏的仁德和确定下功业的要领，果真就在于观察那尚未显现的气象，推究那宇宙本原的阴阳变化吗？南宋主要由浙江永嘉人构成的学术派别，朱熹把它讥刺为功效与实利。南宋真德秀撰写《大学衍义》这部著作，著作的内容纲目从穷尽事理和充实知识，使意念虔诚和端正心地，直到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族，就结束了。而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的办法，没做解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天下的教化与治理，体现在民间风气上；而民间风气的淳厚或浇薄，取决于官吏施政的方法和治绩。西汉贾谊说平庸的官吏所能做的事情，在于文书案卷，却不懂得治理的纲要。这是讲得很正确的了。然而像东汉南阳太守刘宽那样只用蒲草做成的鞭子对犯有过失的下属抽几下来表示羞辱，就称为仁慈的心肠。催缴赋税却征收不上来，就称为依从事理施政的地方官。像这类人果真能够治理好特难治理的郡县吗？使道德统一，使风俗相同。这才达到了最为完美的治理状态。可有的人竟然把看轻钱财、结成团伙当成是仗义行侠，把豪迈强健、破坏国法当成是气概节操，通过败坏民间风气享有美名。做为地方长官的人，将靠什么去让他们辨别清楚并教诲引导他们呢？

聚积和储存粮食的办法，不超出常平仓、社仓这两种方式之外。然而常平仓是丰年由官府提价购进粮食，歉年由官府减价卖出粮食。它的运作在于把陈粮倒出去，换成新粮。但是赶上粮食价格贵采购到仓库内，担心会出现强行指定必须卖的弊病；赶上粮食价格贱要把眼看发霉和多年积存的旧粮让人来买，恐怕会产生强行指定必须买的忧虑。采用什么办法致使仓库经常储有足够的粮食而民间又不受到损害呢？从社仓借粮的人，必定都是贫困的农户。如果所应偿还的利息，同所借出的数量不能够对等，这就眼看着德义的举措遭到废弃。假设一定要按照借据催促他们偿还弥补上，就会追逼快交滋生搅扰，良好的政事反而成为制定法令的不厚道。应当怎样做斟酌，归结到实惠上呢？

《尚书》讲定立刑法是期望达到没有刑法，实行杀头是用来止息住杀头。因为天地的定律，温暖和寒冷一起施用；圣帝明王的治理，恩德和威势交互补充。这压根就与名家、法家区别特别大，也不是只去博取个宽大的美名。后世执行国家法律的官吏，不懂得仁德、礼仪、刑法、政务的本源是一个。他们对于宣明刑罚、修订法律的准则与方式，没能够仔细考虑衡量而归结到最为恰当上。这难道是一切都不偏不倚的那种治理，果真难以重新出现吗？打算做到严明公允，不存在放过罪犯或蒙受冤屈的现象，来同刑罚辅助教化的意图相符合，究竟应采用什么准则与方式呢？

向君主首先献上自己的建议，这是做官的第一步。拿政绩向君主做汇报，这是古代的制度。你们这些读书人学习古代知识，步入仕途，对于治理社会的谋略，讲求已有很深厚的基础了。又刚从民间上来，对于百姓生计的利弊，一定了解得很详尽。你们要竭尽心思来对答，不要空泛，不要隐瞒。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汪如洋　殿试对策

汪如洋(生卒年不详)　字润民，号云壑，浙江秀水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擅长作诗，著有《葆冲书屋集》。

臣对：臣闻健运有常，天行所以成岁；日新不已，圣德所以宜民。盖纯修必惕于自强，斯至化克符于久道。是故圣王御宇，恒持之以不暇豫之心，而性量验其敷施，风声资其倡导。以足储倚者，酌盈虚之用；以慎简孚者，昭出入之平。非徒致饰于治象已也。重熙累洽之朝，主极光亨，鸿施旁浹，物靡不得其所，亦既协气翔而休征应矣。而内勤缵绍，则格被弥周；外肃纲维，则训行益挚。盖藏素裕，而倍殷先事之筹；惩创维严，而愈广无私之照。所为殚精以臻上理者，盖不胜其钦崇而勖慥焉。《书》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言人君者随时随事皆当戒饬，而不可不惟天是法也。《诗》曰：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言其凜鉴临于寤寐，而矢敬畏于几微者，要本此纯一不已之衷，以为之宰

也。然则恢扬郅治之隆，而欲使业焕钦明，政归丕变，厚生允殖，弼教惟光，是在至诚悠久之规，有以赅万化而默操其要矣。

钦惟皇帝陛下，道崇敷锡，志劭寅虔，普乐利于无言，协平成而有庆，固已骏烈宣昭，徽猷式著，综观前古，无以逾斯。乃圣德渊冲，咨询弥切，复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修治统、饬化原、广仓储、彰宪典之实。臣自维愚陋，乌足以知体要?然伊古对扬之盛，采择不废刍荛，敬承清问，敢就平日所诵习者以对。

伏读制策有曰：孟子述道统之传，谓心法、治法，同条共贯，而因思保大定功之要更有进于是者。此诚驭世经邦之首务也。臣闻宋程颐有言：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尚。儒生循习章句，而帝王务得其要，以措诸事业。固未可规求于口耳之末，亦未得虚谈夫性命之微也。宋儒言学，备于《性理》一书。观未发之气象，所以严省察于几希；推太极之动静，所以验机缄于阖辟也。而于王者措正施行之道，或略而未之及焉。夫古者危微授受，即以致时雍风动之庥；缉熙光明，即以绍《典》、《谟》承烈之绪。事功之与学问，岂不同出于一源?然欲即蕴蓄之深，以指为发抒之迹，则有难于等量观者。惟是后儒侈张事业，大抵驳而不纯。如永嘉学派，矜上下千古之识，而详于事者，终略于道，诚难免乎朱子所讥。至真德秀《大学衍义》，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不及治平之经略。盖犹是经筵进讲，启沃身心之用，而非必薄视经纶，故为迂远之论也。方逢圣天子生知好学，统外王内圣而咸赅，洵足绍往圣之心传，而远迈诸儒之论说矣。虽媲美勋、华，又何让焉!

制策又以化理本于民风，民风实由于吏治，而因及于诲导者之必严其辨别。此训俗型方之要，所宜亟讲也。臣惟化民者，必习其业之所成。有时以清和咸理为良规，即有时以振刷维新为先务。此非示天下以武健之用也。儒者一行作吏，称述《诗》、《书》，其视刀笔筐箧之流，固非可以同日语。及试之簿书繁剧之地，而心劳政拙，有茫然无所设施者。况夫顽悍刁犷之习，往往而有。设徒效蒲鞭之小惠，而风力不足以镇奸民，声色不足以威敝俗，则儒术之疏，曾何裨官方之重者乎?昔西汉之世，吏治蒸蒸，黎民乂安。而其以六条察二千石也，首列强宗豪右之禁，凡以使轻财结党、豪健挠法之徒，举不得横断乡闾

而矫恃官吏。盖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非惟事势之不齐，抑其理固如是也。是故王者慎简官僚，以安民生即以纠民慝。当此盛世，官方澄叙，政体精详，为长吏者宜何如整饬规模，俾夫败俗而负美名者，争自濯磨，以期底于敦庞之化欤！

制策又以积贮之法，不外常平、社仓，而虑夫法久之不能无弊。臣惟法无弊也，有不能善其法者而弊生焉。则大约循乎积贮之名，而失乎积贮之实已矣。常平自耿寿昌、长孙平已行其法，意主乎丰敛歉散，而制在乎出陈易新。第相沿日久，而采买者不免强派之虑，召籴者亦恐滋勒买之虞。此岂弊之未易绝哉？亦难乎储蓄者之克酌其宜也。诚能收贮及时，不以挪移而务支俙，则虽谷贵谷贱之异时，而仓庾常盈，闾阎亦无扰累矣。至如社仓之设，本为贫户通其缓急。春借秋敛，有便于民用，而仍无耗于公费，意至美也。乃或取息以偿，而所出者反浮于所入，则册籍亏欠之恒不免焉。将任其挪延悬贷，而廪储虚旷，岁计遂多不足之形。将限以按户追呼，而逋积牵连，民力亦有难纾之患。所赖司其出纳者，审量于裒多益寡之宜，庶几善政之行，人蒙实惠，而足食裕民之举，非奉行故事比矣。我皇上轸念民艰，所以计其生全者至详且备，而郡邑蓄聚之制尤为亟务。行见比户盈宁，屡丰告庆，有不熙熙耕凿，胥忘帝力之勤者乎！

制策又曰：天地之道，温肃并行；帝王之治，恩威交济。盖刑期无刑，辟以止辟，固唐虞三代之盛轨也。臣尝考《周礼》秋官之职，正月始和，乃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之。凡以儆天下之愚不肖，而使之毋轻蹈于法也。夫名、法之学，治世所不言；而宽大之誉，亦圣王所弗尚。后世秉宪之吏，昧于德礼刑政之同原，而权衡于以鲜当。不知先王之明罚而敕法者，具有慎重之意焉。防之于始，有五戒五禁；审之于终，有三典三刺、三赦三宥、五听五过、八成八辟；待之于终，有三就三居。至于秦汉，法网滋繁，禁条岐出。前之律不可以旁引，后之律不免于递增，亦势之无如何者。惟夫由详核而归简要，由简要而得精密，小惩而大诫焉，斯不得私为上下于其间矣。皇上仁如天，知如神，凡刑狱之事，亲加审度，轻重悉由其人之自取，又复特谕法司，分别榜示，俾愚蒙咸知谨凛。盖与古者象魏之典，一无以异。无他，明之

至者慎之至，慎之至者爱之至也。

凡此者：教厥躬以议道，靖尔位以同风，耕九必策其余三，惩一要期于儆百。其见诸事者不同，而其源则归于一也。臣伏愿我皇上，本所其无逸之心，勖政贵有恒之义，性功已著，而尚凛绥猷；治具咸张，而犹严励俗。不以阜成已兆，而宽藏富之怀；不以风纪咸清，而弛协中之训。于以茂扬醇化，覃洽仁风，我国家亿载无疆之庆，基诸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刚健地运行具有定律，这是上天运行、形成一年四季的原因；每天道德都有提高而不停止，这是圣人道德致使民众得到好处的原因。因为纯正的修养必定在自强不息上保持警惕，这样最广泛深入的教化才能够同坚持长久的做法相符合。所以圣明的帝王统治天下，经常保持不悠闲逸乐的心思，而性情度量验证他那广远的施布，风教名声依仗他那倡行化导。用来使储备充足，就斟酌多余和不足的调剂方式。用来慎重对待供词的验核，就显示判定有罪无罪或罪重罪轻的公正。并不光是在大治景象上做点缀罢了。在好几代都圣明太平的朝代，君主定立的行为最高准则光明亨通，宏大的安排部署普遍地切合实际，万物没有不获得到它们的适当位置的，也已经是和协的气流转来转去，吉祥的征兆做出回应了。但仍内心对继承帝王大法特勤勉，穷究事理涉及到的对象越来越周全。在外部肃正纲纪，训导人们的行为越来越诚恳。官仓储备一向充裕，而对事先的筹划加倍地殷切。惩罚判罪只求严明，而更加扩大无私的察照。用来竭尽精明的用心去达到最完美治理状态的举措，简直敬畏尊崇天命又谨慎到了极点！《尚书》中说：高度戒惧上天的命令，时时事事都多加小心。这是强调君主每时每事都应当戒惧整饬，不能不只是效法上天啊！《诗经》中说：大白天也要像有人在瞧，黑夜里也慎重自保。这是强调君主在睡觉休息时对上天的察照监视感到害怕，在苗头上和隐微处誓必要恭敬畏惧，总之依据这纯正专一、永不止息的心念，作为它们的主宰。既然如此，那么，扩展扬布最佳治理的隆盛景象，而想让功业比恭谨圣明的唐尧更光辉闪耀，政务归入

到民风大变的境地，使民众生活富裕，确实繁衍，刑罚辅助教化只是得到发扬光大，这就在于极其虔诚能保持得悠远长久的定律，确有依凭地统括起各种化导又暗中操持那要领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在治国大道上重视施布最高准则，在志向上劝勉自己恭敬虔诚，在不做声张中把人们极感兴趣的利益普遍给谋求到，把公平判案定罪处置得特协调而民众蒙受到福庆，原本上已经是盛大的功业鲜明显现，美好的谋略充分显示，全盘考察古代，没有超得过这种情形的了。可圣上的德行十分谦虚，咨询更加殷切，把臣下我等人又宣召到殿廷，用修明治国的道统、整治教化的本原，扩充仓库储备、彰明国家法律的实务进行策问。臣下我自己知道自己愚昧浅陋，哪里足以明白纲要？然而自古以来对答称扬天子的命令都属盛事，采访择取也不抛弃割草打柴人的意见，恭敬地承奉明晰而又详尽的询问，敢依据平常所诵读研习的东西来做对答。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孟子叙述道学统系的传承，认为心治大法和施政大法是道理相通，脉络连贯的。据此而思索保有播布到全华夏的仁德和确定下功业的要领，还有比这更深一层的东西。这确实是驾驭天下、治理国家的首要大事啊！臣下我听说北宋程颐说过这样的话：圣帝明王的学问，与儒生追求的目标不同。儒生按老套子搞清楚经典原文的章节和字句含义，而圣帝明王务必要获取到经典原文的主要义旨，来运用到事业上。原本就不能够从口头传授和听老师讲这种太平常的做法中去求取，也不许空泛地谈论本性和既定命运的微妙之处。宋代儒士讲论学术，在圣祖康熙皇帝御纂的《性理精义》这部书中汇集得很完备。观察那尚未显现的气象，是用来对看不到、听不见的情形加强思索与察辨。推究那宇宙本原的阴阳变化，是用来对开启关闭的时运气数加以验核。但宋儒对称王天下的君主安排部署和施行的办法，有的却没涉及到。古代帝王用人心危险、道心隐微等十六字要诀授付与承受，就靠这实现天下和睦、闻风响应的美好局面；学向积累得大放光明，就靠这继承《尧典》、《舜典》和《皋陶谟》、《大禹谟》递相承接的功业的端绪。事功对于学问来说，哪里不是共同出自同一个本源呢？然而想拿学问积累到的深度，来指

定成抒发出来便应建树的实绩，就存在着二者难以完全一致的情况了。只因如此，后代儒士极力张扬事业，大致上都驳杂而不纯正。像南宋主要由浙江永嘉人构成的学术派别，就显示对古往今来各个朝代的见识，但在事功上很用力，最终在大道上就很粗疏，确实很难避免掉朱熹对他们的讥刺。至于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限定在穷尽事理和充实知识，使意念虔诚和端正心地，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族这些内容上，而不涉及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的办法。恐怕是因为还属于在经史讲席上向皇帝献上讲说，起到开导和滋润身心修养的作用，并不是一定要看不起筹谋规划治国大计那一套，故意提出不切实际的理论主张。如今正赶上圣明的天子从一出世就知道喜好学习，统括起在外部施行仁政、在内心具有圣人最高品德而一样也不缺，确实足以继承以往圣帝明王心治大法的传承系统，又远远超过各个儒士的论说了。即使同尧、舜相媲美，还有什么配不上的呢？

制策又认为教化和治理依据民间的风气，而民间的风气实际上取决于官吏施政的方法与治绩，据此谈到教诲化导必须要在使人们能辨别清楚是非上特严切。这是训导习俗，给一方树立起准则的关键问题，是应该急切讲求的。臣下我想来，教化民众的官员，必须要熟悉他那本职工作所应做出的成效。有时候把清正平和而都得到治理作为良好的办法，其实也就是有时候把整治肃正而面貌焕然一新作为头等的大事。这并不是拿勇武刚健的运用来亮给天下看。儒士一旦当上地方长官，称说讲述《诗经》、《尚书》这些经典，他们同熟悉文书案卷的平庸官吏比照起来，固然不能够相提并论。但等到让他们到簿册文书相当繁杂难办的郡县去上任，就费尽心思，政务处理得仍很糟糕，存在着茫然拿不出解决方法的情况。况且顽固不化、凶悍习蛮、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恶习，往往存在。假设光是效仿东汉南阳太守刘宽只用蒲草做成的鞭子对犯有过失的下属抽几下的微小恩惠，但威风势力不足以震慑住奸恶的百姓，声势气概不足以威慑住衰败的习俗，那么儒家治国理论的疏阔，竟对为官之道的重任会有什么补益呢？从前西汉时期，官员施政的方法和治绩一派兴盛，老百姓安定无事。但当时用朝廷制定的六项标准验核郡守的政绩，第一项就列

明禁止地方豪强胡作非为，总归是用来让看轻钱财、结成团伙、豪迈强健、破坏国法的那群家伙，一律不准在乡间横行霸道又胁迫威逼官吏。因为只有具有仁德的人，能够凭借宽厚使百姓心悦诚服，其次没有能再比得上严厉的了。这不仅仅因为事情态势不一样，它那道理也原本就是如此的。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慎重地选任官员们，去安定民众的生活也就是去纠察民众的邪恶。正当我朝这样盛明的时代，为官之道得到澄清，有条不紊，施政的要领精明详密，身为地方长官的人应当思考怎样去整治修明长远的规划，使那些败坏民风而享有美名的人，争相自动地洗涤磨砺自己，以期达到淳朴厚道的教化吧？

制策又鉴于聚积和储存粮食的办法，不超出常平仓、社仓这两种方式之外，由此忧虑法度行用时间一长久，不能不出现弊病。臣下我想来，法度本身是不存在弊病的，出现不能使法度得到妥善行用的人，弊病才产生出来。这就大致上沿用聚积和储存粮食的名义，而丧失掉聚积和储存粮食的实际就算完事了。常平仓从西汉耿寿昌、隋朝长孙平已经实行这种办法，宗旨定立在丰年由官府提价购进，歉年由官府减价卖出，而运作方式在于倒出旧粮，换成新粮。但递相沿用，时间很长了，而采购入库免不掉强行指定必须卖的忧虑，让人来买又恐怕生出强行指定必须买的担心。这哪里是弊病不容易断绝呢？也只是难在负责储存积蓄的人能够斟酌出合适的办法啊！确实能收购储存很及时，不用来挪占转移而极力支吾掩饰，那就尽管粮食价格贵或粮食价格贱所处的年景不一样，但官府仓库也会经常储有足够的粮食，民间也没有搅扰和损害了。至于社仓的设立，原本是为贫困的人家解决一时的急用。春季借贷，秋季偿还，对百姓的需用很便利，同时又对公家的费用没有什么损耗，用意是特别好啊！但有的收取利息来做偿还，而借出的粮食反而比偿还的粮食数量多，统计簿上出现亏欠就常常避免不掉了。打算任凭他们往后拖不偿还，而仓库储存越来越少，年终统计于是大多显出不足的情况来。打算用按户催逼还债做限定，而多年的拖欠又连在一起，百姓的力量也有难以承受的忧患。所依赖的是负责借出和追回的人，对削减有余去弥补不足的合适办法进行仔细的衡量，差不多达到美好政事施行开来，人们蒙受到实惠，而使

粮食充足、使民众宽裕的举措，就不是按惯例行事所可比拟的了。我皇上深深体念百姓的艰难，用来考虑他们获得生存、保全性命的措施十分详密又特别完备，而郡县储存聚积粮食的制度更属于首先要解决的政务。这就眼看着家家户户富裕安康，连年大丰收报告吉福，还有不欢欢乐乐地进行农业生产，直至忘记捧帝王用力特勤勉的人吗？

制策中又说：天地的定律，温暖和寒冷一起施用；圣帝明王的治理，恩德和威势交互补充。因为定立刑法是期望达到没有刑法，实行杀头是用来止息住杀头，这原本就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盛明准则。臣下我曾经考察《周礼》秋官大司寇的职责，每年正月初一经过订正，于是在宫门外的门阙上公布写在木板上的法律条文，让民众观看它，总归是用来警戒天下愚昧和不成器的人，让他们不要轻易地陷入法律惩处的范围里去。名家和法家的学说，在天下大治的时代根本不提它们；而宽大的美名，也是圣帝明王不看重的。后世执行国家法律的官吏，对于仁德、礼仪、刑法、政务同出一个本源闹不清楚，而考虑衡量很少恰当。又不明白古代圣帝明王宣明刑罚，修订法律，具有慎重的用意。当时在起始预防犯罪，就有宣誓、文告、禁止、纠察、布宪这五种告诫方式和宫禁、官禁、国禁、野禁、军禁这五种禁令。在最后审理时，就有轻典、重典、中典这三类刑典和天子向群臣、向群吏、向万民征询判决意见的三种方式，就有对七岁以下的儿童、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生下来就痴呆不懂事的人犯罪免予惩罚的规定和对误杀不认识的人、过失杀人、没想到那里有人却误杀了他而可以免罪或减罪的规定。就有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这五种审讯方法和对五种轻微罪过的处理规定，就有窃取国家机密、叛乱、出卖情报、触犯王令、伪造命令、盗取国家宝物、拉帮结伙、造谣诬蔑这八种案例和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八方面特做考虑，对罪犯酌情减刑或免刑的规定。在最后执行判决时，就有在原野、朝廷、集市这三个地方行刑和四方极远处、九州以外、中国以外这三处流放地的规定。到了秦朝、汉朝时期，法网越来越严密，禁令互有抵触地公布出来。前面的法律条文不能用来作引证，后面的法律条文又免不了递相增加，这也是时势拿它没办法的事情。只有从详密确凿归向简明扼

要,从简明扼要获得到精确严密,小范围惩办而大规模引起全社会的警戒,这就不能够私自在里面判定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了。皇上仁厚如同皇天,明智如同神灵,凡是断案定罪的事情,亲自加以审核衡量,处罚轻还是处罚重完全是由罪犯干了那样的犯法事而自己招来的,同时又特地命令司法部门,分别张贴布告让人们观看,使愚蠢蒙昧的人都知道畏惧加小心。这与古代在宫门外的门阙上公布法律的制度,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这不是出自什么别的原因,而是圣明到极点就慎重到极点,慎重到极点就爱护到极点啊!

总共以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使自身敦厚来讲明大道,谨慎对待你们的职守来使民间习俗都相同,九年耕作一定要考虑到拥有三年的余粮,惩处一个人总之要达到使众人警戒的目的。它们在事情上表现出来存在着区别,但它们的本原却归结为同一个。臣下我跪拜祝愿我皇上,依据在位执政不贪图安逸享乐的心念,对施政可贵处在于坚持长久的义旨特勤勉。心性修养的功夫已经显示出来,但仍对安定民众的大筹划保持戒惧。治国的措施全都张布开,但仍强化激励民俗改变的办法。不因为已经使亿万民众富裕安定,就放松了储存富足的念头。不因为法纪全都清平,就慢待了一切都符合不偏不倚准则的训条。用来大力播扬淳正的教化,普遍施布仁厚的风尚,我们国家亿万年永无尽头的福庆,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了。臣下我是刚要被进用的民间读书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江德量　殿试对策

江德量(生卒年不详)　字成嘉,江南仪征(今属江苏)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榜眼。后由翰林院编修改任监察御史。精通语言文字之学,喜好收藏碑帖、名人书画和古代钱币。著有《泉志》。又撰《广雅疏》,未及成稿而去世。

臣对:臣闻乾元者,天之统;存诚者,圣之统;居敬者,治之统。圣

人法天出治，而懋昭大德，允厘百工，人庆厚生，化隆刑措，夫非有异术也。以不二不杂之心立其诚，以亦临亦保之心矢其敬，由是合礼、和义、干事，而胥统于元德之长人。庶征蕃祉，百嘉讫凿，有久道化成之效，而不外乎无逸作所之常。皇极建矣，犹若慎修之未毖；黜陟严矣，犹若考绩之未详；委积充，刑罚敕矣，犹若均输之未普，而狱讼之尚滋。植基在宥密，而懋勉在绥猷。孔子曰：知者动，仁者静。注谓日进故动，无欲故静也。又曰：知者乐，仁者寿。动静交养，以裕乐寿之原。盖天地之高明博厚，即至诚之悠久无疆。主敬以极之诚，而天人协应，远迩禔福。律吕之精，下征民事；河海之润，上应星辰。休祥滂沛乎万方，典册感孚于百瑞。有以隆道术，有以饬官方，有以足国用，有以恤民生。治统大备，圣统亦全，而元贞衍属之统，遂冠隆古而立极。

钦惟皇帝陛下，两仪合撰，千圣传心，际道洽政治之辰，而倍切图易思艰之志。基命固已单心，官常固已澄叙，百室固已盈宁，五刑固已明慎，所谓内维外纲，同条共贯，抚时熙绩，笃祜凝庥者矣。乃圣怀冲若，谘访弥勤，爰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内圣外王之道，型民察吏之方，民生国用之原，折狱慎刑之法。臣管蠡之陋，导涓撮壤，罔裨海岳。顾适公所者书其对，事君者拜献其言，敢不祇罄愚忱，用以仰副高深于万一乎！

伏读制策有曰：心法、治法，同条共贯。然帝王之学，与儒者终异。臣惟精一执中，尧舜开道源为治源者也；昌言浚哲，禹汤本圣学为君学者也；缉熙执竞，文武尽性功为事功者也。故曰仁知合一在乎圣。曷有异理哉？顾儒生之学问，先明其理；帝王之学问，兼著其事。圣经言大人之学，格致诚正，所以言理之纯；修齐治平，所以言事之备。事而不学，朱子所以讥永嘉学派；学以基事，真德秀所以未详治平。《大学衍义》以为帝王有为治之序，有为学之本，取经文二百五字，先之以《尧典》、《皋谟》、《伊训》与《思齐》之诗、《家人》之卦，继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之说，而不及治平。明邱浚补之以审几微，更列四者之目，曰圣功之本、敕命之原，存理之端与制治保邦之要。盖可参观未发之气象，推太极之动静者。其羽翼乎四十三

卷，为功亦非浅鲜。皇上君师兼体，敛锡同原，止其所止，达本末而著止善之功；新之又新，贯精粗而用新民之极。张载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纯体著用，直绍唐虞，岂特追轶汉唐已哉！

制策又以民风之淳漓，由乎吏治，一道德以同风俗，长吏将何辨别而诲导之。臣谨按，《大戴礼·文王官人篇》以正月，王亲命七属之人曰：慎维深思，内观民务，本慎在人，平心去私。其必于民务兢兢者，诚以民为邦本而吏为民表也。故《白虎通德论》曰：考黜者何？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唐虞三代以来，察吏者必以守令为重，农桑为本，以为民也。俗吏不知大体，固非刀笔筐箧所为功。然庸吏不能振兴，又昧于默夺潜移之本计。能措卖刀买犊之化，而后可施蒲鞭示辱之仁；能抑强宗豪右之张，而后无害于催科政拙之考。为长吏者洁己奉公，表正率属，爱民体父母之念，则穷檐孚惠而不虑朘膏；逐恶矢鹰鹯之威，则豪健洗心而无难别黑。轻财结党之徒安在，而敢于败俗挠法哉？《传》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此道得也。圣朝察吏之典，大公至正；化民之泽，浃髓沦肌。正百官以正万民，平章於变之休，何让于中天之盛轨也欤！

制策又以常平丰敛歉散，入仓虑有强派之累，召籴恐滋勒买之虞。借社仓者必皆贫户，促之追呼滋扰。何以斟酌，归于实惠。臣谨按，《周官》遗人，职掌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以及仓人、廪人之共以余法，皆贮籴之权舆也。李悝平籴之法，汉耿寿昌祖之作常平；长孙平义仓之制，朱子仿之作社仓。或职之官，或司之民，诚足食之至策。乃行之既久，在官者徒饱侵渔，在民者难于收补。出陈易生囤积之奸，易新又启抑派之弊。将实政竟成虚惠，义举转类恶徒。总之补偏救弊为一时计者，其利浅；蚤计遍筹为长久策者，其利深。大吏严饬监守，有司申禁吏胥，饥则有以赈民之急，熟则有以足国之用，公私交济，平准胥宜也。我皇上惠爱黎元，有加无已，普蠲征额钱粮者，至再至三，拨运截漕，既周既渥。国家深仁厚泽，固已普天丰裕，率土熙皞矣。是岂补苴之术，争旦夕之效已哉？

制策又曰：刑期无刑，辟以止辟，固大异乎名、法之家，而亦非徒博宽大之誉。臣惟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变，故君子尽心焉。

《国语》曰：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故伯夷降典，皋陶作士，三居三就之条，象典流宥之目，而以钦恤之义，行乎其间。后世昧于本原，而以折民之典为令行禁止之文，束缚驰骤之具，遂别申韩之学名为法家。是以昧于德礼刑政之同原，而权衡未能要于至当也。我皇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遇秋审狱成之日，虽法司定拟，犹必反复研究，轻重皆秉大公，一视其人之自取，且揭示情罪之由，申明金刃之禁，所以矜全愚瞀者无不至。伏读经筵御论《导之以德节》曰：政刑者，德礼之先声；德礼者，政刑之大本。舍德礼而求政刑，必成杂霸之治；即政刑而寓德礼，乃见纯王之心。大哉王言！深契夫圣人垂教之本意，而默会夫一而二、二而一之原。凡为秉宪之吏者，宜何如昭信谳，慎庶狱，以共赞胜残之盛治也哉？

要之，峻德实放勋之本，奋庸即训俗之由，裕民乃富国之权，恤刑广好生之惠。是故敕几康以丕应，则盛德日新也；戒庶官以无旷，则百揆时叙也。以贵农重粟遂民生，以明罚敕法防民过，则蒸民于以乃粒，而庶顽欲其并生。臣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秉神圣文武之资，切保泰持盈之念，而圣敬日跻，天工时亮，饮食以遍尔德，详刑以惠嘉师。我国家亿万斯年之庆，基于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乾卦》所代表的元气，是上天的统领；保持住虔诚，是圣人的统领；持身恭敬，是治国的统领。圣人效法上天，拿出治理措施，而勉力显示盛大的仁德，确实整顿好百官，人民庆幸宽裕的生活，教化隆盛，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这并不是具有什么奇异的办法啊！凭借不想其他方面、不夹杂其他东西的心念，确立起那个虔诚；依仗大白天也仿佛有人在瞧、黑夜里也慎重自保的心念，誓必要十分恭敬。由此配合礼法，同道义相适应，支撑起事业，而全部都被占居第一位的仁德足以作为世人的尊长统领起来。各种天象显示的征兆兴盛吉祥，众多的美好事物欢乐通畅，具有坚持大道长久而教化就形成的功效，不超出所作所为时常不贪图安逸享乐的范围之外。天子给百姓制定的行为准则已经确立起来了，但仍像是慎重修养

好自己还不恭谨。对百官进行升降或罢免已经十分严格了，但仍像是考核政绩还不详尽。粮食储备已经充足了，刑罚已经修订了，但仍像是调济天下物资还不普遍，案件诉讼还在增多。把起始信从天命建立在施行宽仁安静的国政上，而勤勉集中在安定民众的大筹划上。孔子说：明智的人常活动，仁厚的人常沉静。古代的注解说是每天都有提高，所以就常活动；没有个人欲望，所以就常沉静。孔子还说：明智的人快乐，仁厚的人长寿。这说明活动和沉静交相养护，来扩展快乐和长寿的本原。天地的高远明朗和博大深厚，也就是极其虔诚的悠远长久和永无尽头。守持恭敬来达到最高的虔诚，就上天与人事协和回应，远方和近处安宁幸福。乐律的精妙，往下和民事相印证。河海的润泽，往上同星辰相对应。美好的吉祥迹象在天下各地涌现，法典政令同种种祥瑞感应符合，有理由来使治国大道隆盛，有理由整顿好为官的准则与方法，有理由使国家用度充足，有理由体恤百姓的生命。治国的统系相当完备，圣人的统系也很齐全，而元、亨、利、贞推衍领属的统系，于是超过隆盛的古代，树立起最高标准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是天地契合那定律，历代圣帝明王传授那心治大法，正处在大道切合政治的时日，而加倍增强那种谋求大治很容易却思索艰难的心志。起始就信从天命原本已经用尽心力了，百官的各自职责原本已经澄清并有条不紊了，众多的仓库原本已经充足安稳了，刺面、割鼻、砍脚、破坏生殖器官和处死的刑罚原本已经宣明并慎重对待了，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内外支撑维护，脉络连贯，顺应时势，各项政务振兴，增添福气，聚合起吉庆了。可圣上的心怀却十分谦虚，访求咨询越来越勤恳，于是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用内心具备圣人最高品德、在外部施行仁政的大道和给民众树立准则、察辨地方长官的方法，百姓生计、国家用度的本原和审理案件、慎重对待刑罚的办法，进行策问。臣下我浅陋得只能看见一点点儿，如同归入大海中的一滴水和一小撮土，对大海和名山不会有什么补益。但来到公堂的人，就要写出他的对答词；事奉君主的人，就要跪拜献上他的建议。因而敢不恭敬地竭尽那愚昧的忠心，用来符合圣上高深意旨的万分之一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心治大法和施政大法事理相通,脉络连贯。然而圣帝明王的学问,毕竟与儒士不同。臣下我想来,精意一心,掌握住不偏不倚的尺度,这是尧、舜开启大道本源成为治国本源的东西。赞同应该那样去办的言论,具有深长的智慧,这是夏禹、商汤依据圣人的学问扩展成君主学问的东西。持续光明无不恭敬与安宁,执守强盛的原则与方法,这是周文王、周武王穷尽养性修身的功效推广成事功的东西。所以说仁德与明智融合成一体在于圣人。哪里还有不同的道理呢?但儒生的学问,首先要通晓那道理;而圣帝明王的学问,同时要显示那事体。圣人的经典讲论在位者的学问,穷尽事理和充实知识,使意念真诚和端正心地,这是用来强调道理的纯正。而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族,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这是强调事体的完备。光讲事体却不求学问,这是朱熹讥刺永嘉学派的原因;讲求学问来给事体奠定基础,这是真德秀在著述中没涉及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这方面内容的原因。《大学衍义》认为圣帝明王具有进行治理的顺序,具有从事学问的根本,选取经文二百零五个字,首先列举《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伊训》和《诗经》中的《思齐》篇以及《易经》中的《家人》卦,接下来摘录战国时子思、孟轲、荀况和西汉董仲舒、扬雄、北宋周敦颐这些大儒的说法,而没涉及到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问题。明朝人邱浚增补上审辨苗头和隐微处的内容,重新定立四个方面的纲要,称为"圣功之本"、"敕命之原"、"存理之端"和"制治保邦之要"。大致算得上是可以参酌观察那尚未显现的气象,推究那宇宙本原的阴阳变化的东西。他这部《大学衍义补》辅助并充实四十三卷的《大学衍义》,所建立的功绩也不算浅鲜了。皇上您将君主和师长融为一体,聚合起长寿等五种吉福并把它们赐给众百姓,是出自最高准则这同一个本原。达到那所应达到的境界,贯通起显扬圣明的仁德这一根本和使民众自新这一末节,建立起达到最美好状态的显著功业。已经自新还让他自新,连结起精微和粗浅,运用好使民众自新的最高行为准则。这就像北宋张载所说的:给以往的圣人接续上已经断绝了的大学问,替千秋万代开辟出天下太平的局面。本体纯正,施用显著,直接继承唐尧虞舜,哪里只是追上

和超过汉朝、唐朝就算完事了呢?

制策又认为民间风气的淳厚或浇薄，取决于官吏施政的方法与治绩。使道德统一,使风俗相同,地方长官将靠什么去让他们辨别清楚是非并教诲引导他们。臣下我恭谨地查验《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讲到,在正月,周文王亲自训导诸侯国、乡级地方官、宫府、学校、宗族、卿大夫封邑、师长这七类人说:谨慎地深刻思索,在心里观察民间事务,从根本上要谨慎对待的对象在于人,你们要端正心念,去除掉个人的打算。周文王一定要在民间事务上小心谨慎，原因实在是因为民众是国家的根基,地方官是民众的表率啊!所以《白虎通德论》这部儒家典籍也说:为什么要考核罢免官员呢?因为这是称王天下的君主用来勉励贤能的官员,抑制奸恶的官员,特别重视民众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以来，督察官员的措施必定要把太守县令作为重点,把农业生产和栽植桑树作为根本,目的是为民众考虑啊!一般的官吏不懂得施政的纲要，固然不是靠文书案卷就能建成功绩的。然而平庸的官吏不能够振兴起一方的事业，又对潜移默化的根本计策闹不清楚。能做到像西汉渤海太守龚遂让当地百姓卖掉武器、从事农耕的那样的教化，然后才可以施布东汉南阳太守刘宽用蒲草做成的鞭子对犯有过失的下属抽几下表示羞辱的那样的仁惠。能够抑制住地方豪强的嚣张气焰，然后才对催缴赋税却征收不上来这类政务的考核没什么太大的影响。身为地方长官的人，自身廉洁，守奉公家,做出正直的榜样,给下属树立起施政的典范,而爱护百姓要体察当父母的心念,就会使贫困的人家确实得到实惠,而不担心受盘剥。打击邪恶势力就势必确立起苍鹰和鹞鸟捕捉鸟雀那样的威势，就会使豪迈强健的人彻底悔改,不难辨别出邪恶。看轻钱财、结成团伙的那类人还会存在在哪里，而敢于败坏风俗、破坏国法吗?《春秋左氏传》上说:用宽大来弥补严厉,用严厉来弥补宽大。这种做法是恰当的。我们大清皇朝考察官吏的制度,极其公正;教化民众的恩泽,深切到极点。端正朝廷百官去端正天下民众,辨别彰明各族姓、随着教化而递变的美好景象,又哪里比尧舜如日中天的盛明典范逊色呢?

制策又鉴于常平仓是在丰年由官府提价购进粮食，在歉年由官

府低价卖出粮食,采购入库担心会出现强行指定必须卖的拖累,让人来买又恐怕生出强行指定必须买的忧虑。从社仓借粮的人,必定都是贫困的农户,督促他们偿还就会催逼引出搅扰来。对此应该怎样做斟酌,归结到实惠。臣下我恭谨地查验《周礼》中地官所属遗人这一官员,负责掌管位于京师郊区的乡里的多余粮食,用来救济民众的困乏;掌管距离京师四百里和五百里的县邑、都邑的多余粮食,来等突然出现事变时和饥荒年再使用。以及地官所属的仓人、廪人用法定的支出办法来提供粮食。这都是储存和抛出粮食的起始做法。战国李悝通过政府买卖粮食来稳定粮价的措施,到西汉耿寿昌加以效法创造了常平仓。隋朝长孙平的义仓制度,到南宋朱熹加以模仿创造了社仓。有的由官府掌管,有的由民间负责,确实是使粮食充足够人吃的最好对策。但行用时间一长久,由官府掌管的常平仓,只是大量地被官员侵吞贪占;由民间负责的社仓,很难收补回来。抛出陈粮容易产生囤积居奇的奸诈行为,换成新粮又引出强行规定必须卖的弊病。眼看着实际的政务到最后却变成兑现不了的恩惠,德义的举措转过来却像是凶恶的奸徒。总而言之,弥补偏差、挽救弊害只为一时间作打算的,得到的好处少;提前考虑、全面筹划而为长久作谋划的,得到的好处多。统辖一省或几省的地方最高长官严厉命令太守县令等官吏,主管部门对办事人员申明禁令,灾荒年就有办法救济民众的危急,丰收年就有办法使国家的用度充足,公家和民间相互补充,价格调整就全都合适了啊!我皇上仁惠地爱护众百姓,只有增多而没有停止的时候。对全天下减免赋税数额和钱币粮食,达到两三次;调拨运输和截留由水路运往京师的粮食及其他物资去救济,特别周全,十分厚道。国家的深厚仁德与恩泽,本来就已经使全天下丰厚富裕,整个辖区内一片欢乐了。这又哪里是修补漏洞的办法,争出个短暂间的效应就算到头了呢?

制策中又说:定立刑法是期望达到没有刑法,实行杀头是用来止息住杀头。这压根就与名家、法家区别特别大,也不是只去博取个宽大的美名。臣下我想来,刑罚这东西,是针对定型的人体的;定型的人体,是天生长成那个样子的。一经长成那个样子,就无法改变,而

一用刑，也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所以君子对断案判刑竭尽心力。《国语》中说：唐尧能够使刑法公平到极点而让民众变良善。所以伯夷颁布关于天事、地事、人事的礼典，皋陶担任大法官，流放地有四方极远处、九州以外、中国以外和在原野、朝廷、集市行刑的规定，用在犯人衣服上画图形表示所受的刑罚和通过流放代替刑罚来表示宽大的各种条目，都把慎重、体恤的宗旨，贯彻在里面。后世对本原闹不明白，却把约束住民众的法典当成是有令即行、有禁即止的条文，当成是随意逮捕、胡乱判决的工具，于是独立形成战国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号称是法家。因此也就搞不清楚仁德、礼仪、刑罚、政务出自同一个本原，而罪罚衡量不能够归结到最为恰当上去。我皇上喜爱一切生灵的美德，深入人心。凡是遇到秋季审断案件、定罪判刑的时候，尽管由司法机关已经做出判决，还一定要反复研求推究，处罚轻还是处罚重都抱持特别公正的原则，完全根据罪犯是由他做了那样的犯法事而自己招来的做处置。而且向世人公布犯罪情节和定罪判刑的原由，申明犯法会被处死的禁令，用来哀怜保全愚蠢昏昧人的地方没有不顾及到的了。跪拜敬读在经史讲席上皇上亲自对《论语·为政篇》中《导之以德节》所作的论断说：政务和刑罚，是仁德和礼仪的先声；仁德和礼仪，是政务和刑罚的根本。放弃仁德和礼仪去谋求政务和刑罚，必定会形成仁政中夹杂暴力的治理。在政务和刑罚中寄寓着仁德和礼仪，才能显现出纯粹是王道的心志。真伟大啊！天子的论断！深深契合圣人垂示教化的本意，又无形中会归到元气分化成天地阴阳、天地阴阳又汇合成元气的本原上。凡是身为执掌国家法律的官员，应该怎样去显示公正的判决，慎重对待各种案件审理，来共同辅助战胜残暴的盛明治理呢？

总而言之，仁德广大得到达天边，实际上是唐尧事业的根本，勤奋地恪尽职守，也就成为训导民间习尚的来由。使百姓宽裕恰恰属于使国家富足的标志，慎重对待刑罚就扩展了喜爱一切生灵的恩惠。所以用天下普遍响应来对危险的苗头和确保平安高度加小心，就会盛明的德行一天比一天提高。用不许荒废本职工作来告诫众官员，就会各种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通过鼓励农业生产、重视粮食来

使百姓生计称心如意，通过宣明刑罚、修订法律来防止民众犯下罪过，就会众百姓高兴地有饭吃，而一般人中的坏家伙也想和世人一起生存。臣下我跪拜祝愿皇上，已经天下大治了，进一步谋求大治；已经各地安宁了，进一步谋求安宁。依仗神奇圣明、有文有武的天资，加重在极盛阶段更为谨慎以保平安的心念，而圣明恭敬的美德天天有进步，上天的事业协助来完成。在百姓的日常饮食上，全都托您的福份。慎重动用刑罚，来给善良的民众带去恩惠。我们国家亿万年的吉庆，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了。臣下我是刚要被进用的民间读书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程昌期　殿试对策

程昌期(生卒年不详)　字阶平，号兰翘，江南歙县(今属安徽)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探花。官至侍讲学士。精通经学，尤长于考据。著有《周礼义疏约贯》、《安玩堂集》。

臣对：臣闻锡福保极，道协于用中；基命单心，功归于行健。自古圣帝哲王，体元出治，以垂道统，以饬官常，教莫隆焉；以厚民生，以宪邦禁，典莫重焉。维时顺气翔洽，湛恩庞鸿，海宇已庆时雍，风俗日臻上理，犹复阐危微之辨，求励翼之明，黎庶廑夫阻饥，刑典期于钦恤。是岂忘逸豫而好忧勤哉？盖乾之行也不息，益之进也无疆。前圣所以永保鸿名，常为称首者，其道要诸可久，而其政贵于有恒。《诗》曰有觉德行，四国所以咸顺也；《书》曰董正治官，兆民所以阜成也。《易》曰有孚惠心，又曰明罚敕法，所为仁育义正而恩威之交济也。立纲陈纪，既表正于万邦；而图易思艰，复缉熙于宥密。是故敬以修己，慎以简僚，权缓急以裕民财，酌宽严以平国法，莫不作其震动恪恭之气，而永致夫惇大成裕之休，用能均禧九垓，同风三代，泰符炳于上，地纪洽于下。所谓建无穷之基，亦有无穷之闻者，胥是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功崇业广，德盛化神，集群圣之大成，配三才而立

极。所以慎宪敕几，厘工熙绩者，无不至；所以布德施惠，明刑弼教者，无不周。固已酝化覃敷，淳风丕畅矣。乃圣怀冲悒，采访弥殷，爰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圣学之传，吏道之要，与夫民食之宜裕，刑法之当齐。臣至愚极陋，譬犹尘露之微，何裨山海？然际嘉言罔伏之时，凛拜献先资之义，敬承清问，敢不述所闻，诵所学，以效刍荛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心法、治法、同条共贯，而因推帝王保大定功之要，以辨异于儒者之学。此诚明道之要旨也。臣谨按，道统之传，昉于唐虞。嗣是而禹之祗承，汤之日跻，文之缉熙，武之执竞，至尼山祖述宪章，而道与法兼之。盖内圣外王，交养互发。孟子述道统，而由尧舜以及孔子，职是故也。然而帝王之学，终有与儒生异者。夫子系《易》，而言圣人尽性之事，则曰知周万物，道济天下。言至命之事，则曰范围不过，曲成不遗。盖存之为盛德，发之为大业，知能原于易简，而位育本于中和。要非徒观未发之气象，推太极之动静已也。昔朱子在经筵，每以诚意正心开陈上意，而于永嘉学派，则讥为事功。真德秀作《大学衍义》，于治平之略阙如。盖儒者之学，其言近里，有端本善则之思焉。而要之钦明之量光被四表，温恭之德风功四方，岂非体用全备而本末共见者乎！然则帝王之学，其理不与儒者异，而其事功则固有异也。我皇上聪明天亶，懋典时勤往圣之心传，析诸儒之底蕴。道法，治法之隆，洵与勋、华媲美矣。

制策又以民风由乎吏治，而欲使为长吏者辨别而诲导之。此型方训俗之至意也。臣窃惟守令者，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然天下有循吏，有能吏。循吏非无能也，而慈祥恺弟，专务以德化民，不以能见，若汉之文翁、王成、朱邑是也。能吏虽于德稍有未足，而理繁治剧，剖决如流，若汉时张敞、赵广汉、尹翁归是也。至若悃愊无华而才不足立事，貌为循吏而实无异于俗吏者，则莫若得能吏而用之，而犹足以治民。夫轻财结党自以为义侠，豪健挠法自以为气节，此非其天性使然也。古者闾比之官，岁时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而戒其无良者。而复有司徒之六礼七教，以节性而防淫。诚使为长吏者规此而行之，则贤者知勉，而败俗者知所惩。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矣。我国家风化淳美，习俗敦庞。皇上察吏勤民，尤复加意谆笃，诚以守

令为亲民之官,吏治既正则民风自淳。而为长吏者,可不思各扬其职也乎!

制策又以常平、社仓所以利民,而虑及强派勒买之弊,与夫偿补有追呼之扰,欲斟酌而归于实惠。古王视民如伤,何以加兹?夫自《周官》仓人掌粟入之藏府,遗人掌邦之委积,而积贮昉焉。魏李悝之言曰:谷贵则伤民,谷贱则伤农。因视岁之上中下,平其价以便民。厥后耿寿昌、长孙平皆师此意,而朱子之法尤为尽善。虽然常平之制出陈入新,或谷贵也,而采买入仓则强派,而豪猾得以滋其弊;或谷贱也,而红陈召籴则勒买,而书吏得以售其奸。且仰给社仓,必皆贫民,或所入不敌所出,则追呼滋扰,而胥役得因以为利。故知良法美意,不能无弊,而要在得其人以任之。权出纳之数,以示变通之宜,庶百姓得沾实惠也。皇上爱育黎元,无微不至。直省州县,量地广狭以定常平之额;而仓储之输自民间者,皆官为之经理,并以京师为都会之地,采买解运,设厂以资平粜。近复特颁恩旨,蠲租免供,隆施叠沛。《易》曰民说无疆,所由户庆盈宁,人歌乐利,以共登仁寿之域也。

制策又以德礼刑政之同原,而于明罚敕法之条,务权衡于至当。所以期于协中之化者,至矣。臣闻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尽心焉。自虞廷命士,期于明允,罔或干不韪之罚,尚已。《周官》大司徒掌三物之教,大司寇掌五刑之典,而乡之八刑,司徒亦掌之。盖德礼刑政出治,本同原也。自后世名、法之家,析律二端,深浅不平,而矫之者或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其视周内文致之为,厥弊相等。不知春温而秋肃,天道所以阳舒而阴惨也;怀德而畏威,圣人所以仁昭而义立也。善乎朱子之言曰:怒而刑者阴也,圣人之所恶也。虽曰恶刑,而不敢纵有罪之人。盖所谓天命天讨,有非己之所得私者。夫用刑固贵于公,而明刑尤贵于慎。是故有情轻罪重者,则援肆赦之例而不为宽;有罪轻情重者,则援怙终之条而不为刻。法立于一定,而情准乎至平。所谓辟以止辟,刑期无刑者,其道恒不外此。圣天子明敕法令,咸秉大公。凡兹臣庶,孰不争自濯磨,以永协夫咸中之庆哉!

若此者:事有分端,理无殊致。伏愿我皇上,设诚于中,观化于久,际重熙累洽之运,励持盈保泰之图。性功纯粹,而犹必敦崇实学,以懋

几康;民俗诚和,而犹必整饬官方,以襄化理。比户虽庆丰亨,而足食之谋宜豫;律令虽昭宽简,而慎罚之意綦严。神人讯合,中外乐康。盛朝万祀郅隆之庆举,积诸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赐给民众长寿、富贵等五种幸福,确保天子所定立的行为最高准则,其中起根本作用的大道要同运用不偏不倚的尺度相符合。起始就信奉依从天命,用尽一切心力,功业归结到上天运行的刚健。自古以来,圣帝明王体察元气的初始状态,拿出治国的措施,来垂示道学统系,来整顿官员的各自职守,教化简直隆盛到顶点;来使民众生活充裕,来使国家禁令全都遵守,法典简直份量重到极限。当时和顺的气流腾涌融洽,深厚的恩德广远宏大,全天下已经欢庆和睦相处,社会习尚日益达到最美好的状态,仍然再度阐明人心危险、道心隐微的区别,求取众多明智人的勉力辅助,为众百姓避免被饥饿困扰仍在勤奋努力,刑法期望达到慎重施用并注意体恤。这哪里是忘记了安逸享乐而偏偏喜好忧虑与勤勉呢?其实是因为上天的运行永不止息,君主损上益下就每天往前奔而没有尽头。前代圣人永远保持盛大的美名而又总数第一的原因,就在于把那治国大道归结为坚持长久,而那国政可贵处在于持久固定。《诗经》上说:品德行为正大。这是四方各国全都归顺的缘故。《尚书》中说:督正各负其责的百官。这是亿万百姓丰厚富裕的根由。《易经》上说:用诚信来使人们从心里感恩戴德。又说:宣明刑罚,修订法律。这样说的目的是用仁德来抚育,用正义来纠正,恩德与威势相互补充啊!确立和张布开纲纪,既对天下各地树立起典范;在谋求大治很容易的时候却考虑到艰难,又在施行宽厚安宁的国政上大放光明。所以通过恭敬来修养好自身,依照慎重来选任官员,权衡舒缓和紧急来使百姓的财物充裕,斟酌宽大与严厉来使国家法律做到公平,没有一处不振作起受震动和恭谨的意气,而永远招来那淳厚博大形成宽广德业的美好气象,能够把吉祥均匀播扬到九州的最远处,和夏商周三代是同一种社会风尚,亨通的征兆在上面闪耀,维系大地的纲绳在下面特协调。世上

斯讲的建立起永无尽头的基业，同时享有永无尽头的美名，全都靠的是这些举措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功勋崇高，业绩宏大，仁德盛明，化导神妙，汇集了各位圣人的全部成就，配比天、地、人，确立起最高准则。用来慎重对待已有的法规，时时事事都保持警惕，确实整治好百官，各项政务都得到振兴的举措，没有不达到极限的。用来播扬仁德，施布恩惠，宣明刑罚，辅助教化的办法，没有不周密的。原本上已经是深厚的教化普遍延及，淳朴的风气大为畅行了。可圣上的心怀却谦虚自抑，采择访求越来越殷切，于是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用圣人学问的传承，官吏施政的要领，以及百姓的食用应当充裕，刑法应当标准统一，来进行策问。臣下我十分愚昧，极其浅陋，就好像灰尘和露珠那样微小，怎么能对名山大海有所补益？然而正赶上美好的言论没有隐藏的时代，高度戒慎拜见君主首先要献上个人建议的古义，恭敬地承奉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敢不陈述所闻知的东西，讲诵所研习的学说，来献上割草打柴人的一点点儿心得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心治大法和施政大法事理相通，脉络连贯。据此来推究圣帝明王保有播布到全华夏的仁德和确定下功业的要领，来与儒生的学问区分出不同点。这的确是明了大道的切要义旨啊！臣下我恭谨地查验，道学统系的传授与承接，是从唐尧、虞舜开始的。自此以后，大禹的恭敬承奉尧舜，商汤的圣明恭敬一天比一天增进，周文王的持续光明无不恭敬与安宁，周武王的执守强盛不止息，一直到孔老夫子效法尧舜，模仿周文王与周武王，而大道和法度都包括在内了。因为内心具备圣人的最高仁德，在外面施布仁政，既交相养护，又共同表现出来。孟子叙述道学的统系，而由尧舜一直排到孔老夫子，完全是由于这个缘故啊！然而帝王的学问，毕竟存在着和儒生不同的地方。孔老夫子给《易经》作注解，讲到圣人把本性彻底发挥出来的事情，就说智慧能够了解一切事物，道德可以匡济天下；讲到既定命运的事情，就说包纳了天地的一切化育而不超越，想尽各种办法成就万物而不遗漏。因为存积在内心就成为一天比一天有提高的德行，表现出来就成为拥有天下的大业，智慧和能量来自简单易

行,而天地位置固定和万物化育生长依据中正平和。总之并不光是观察那尚未显现的气象,推究那宇宙本原的阴阳变化就算完事了。从前朱熹在担任经史讲席的官员时,常常用使意念真诚、端正心地来做陈述并开导宋孝宗的思想,但对主要由浙江永嘉人构成的学术派别,就讥刺他们只讲功效与实利。南宋真德秀编著《大学衍义》这部书,对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的办法省略掉不谈。这是因为儒生的学问,他们的讲法贴近深层的东西,存在着端正根本、规定好准则的考虑。但拿这来与帝王恭敬圣明的器度光照四海、温厚恭谨的美德使天下闻风响应做比较,难道不是主体和施用周全齐备、本原与支节共同显现的东西吗?既然如此,那么圣帝圣明王的学问,他那原理并不是和儒生有什么不同,但他那事功却压根就与儒生存在着区别。我皇上耳聪目明由上天赋予,勉力彰明典训,经常对以往圣人心治大法的传承特注意,分析各位儒士的真确思想。大道法则和施政法则的隆盛,确实可以同尧、舜相媲美了。

制策又鉴于民间风气取决于官吏施政的方法与治绩,想让身为地方长官的人能使民众辨别清是非并教诲引导他们。这是端正一方、训导民俗的最深沉的用意啊!臣下我私下想来,太守和县令,是百姓的师长和表率,朝廷通过他们承接起君主恩泽去宣导教化。然而天下存在着遵用国家法度的地方官,存在着特能干的地方官。遵用国家法度的地方官并不是没有才干,但他们仁慈祥和,和乐平易,专门致力于用仁德感化民众,不靠能干来显示自己,像西汉的蜀郡太守文翁、胶东王国国相王成、北海太守朱邑就是这样。特能干的地方官虽然在仁德上存在着略显不足的地方,但治理头绪繁多、问题严重的郡县,做出决断非常迅速,像西汉的京兆尹张敞、颍川太守赵广汉、东海太守尹翁归就是这样。至于忠诚不浮华但才干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人,表面上像是遵用国家法度的地方官可实际上同平庸的官吏没有什么区别的人,对这两类人,那就比不上获取到特能干的地方官并加以任用,还足以治理百姓。看轻钱财、结成团伙却自以为这是仗义行侠,豪迈强健、破坏国法却自以为这是气概节操,这并不是这类人的天性使他们这样的。古代掌管二十五户人家或五户人家的基层官员,按固定

日期召集居民观看法律,记录下他们的道德品行和学业技艺,并告诫那些行为不端正的人。又有地官司徒的成年人加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和有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伦理关系的教化,用来节制百姓的性情,防止过分的举动。确实让身为地方长官的人仿照这些举措去施行,就会贤良的人知道勉励自己,而败坏风俗的人也知道该惩戒的东西。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转向善良,远离罪过,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这样去做了。我们国家风教化导淳正美好,社会风气厚道朴实。皇上督察官吏,为百姓操劳,更又特意恳切笃实地予以晓谕,实在是因为太守县令属于同民众最亲近的官员,官员施政的方法和治绩端正以后,民间的风气自然就会变得淳厚了。而身为地方长官的人,能不考虑各自奋扬本人的职守吗?

制策又鉴于常平仓、社仓是用来便利民众的,进而考虑到强行指定必须卖或必须买的弊病,以及偿还弥补会产生的催逼之类的搅扰,打算仔细加以斟酌,归结到实惠。古代帝王看待民众就像他们受到伤害一样,又怎么能超过皇上的这种忧虑呢?自从《周礼》规定地官所属的仓人这一官员掌管粮食收进来入库储藏,遗人这一官员掌管邦国的余粮调剂,而聚积和储存粮食就开始了。战国时魏国李悝的主张是:粮食价格贵就对百姓不利,粮食价格贱就对农民不利。因而根据年景的好、坏和一般的三种情况,稳定住粮食价格来便利民众。此后西汉的耿寿昌,隋朝的长孙平,都效仿这种意图,而南宋朱熹的做法更为完善。虽然常平仓的运作方式是抛出旧粮,换入新粮,但有时候粮食价格贵,而采购入仓就会强行指定必须卖,地方豪强得以滋长他们的舞弊行为。有时候粮食价格贱,而拿眼看发霉和陈旧的粮食让人来买,办事人员得以耍弄他们的花招。况且仰赖社仓的人,一定都是贫困的百姓。有的偿还的数量同借出的数量不能够拉平,就会催逼还债,滋生搅扰,而当差的人得以趁机捞取到好处。所以由此便可知道:妥善的措施和美好的意图,不能不出现弊病,而关键在于获取到合适的人选来任用他们。权衡借出去和收回来的数额,来显示变通的合适措置,致使百姓能够蒙受到实惠。皇上爱护和抚育众百姓,无微不至。由中央直接统辖的省份及其所属各州县,丈量土地的宽广或狭窄情

况，来确定常平仓的储存数额；而仓库储存从民间交纳上来的，都由官府替它经办，并且因为京师是全国最大城市的所在地，采购运输，设立粮厂来有助于稳定粮价。近来又特意颁布恩德圣旨，免除租税和贡品，隆厚的施恩一阵高过一阵。《易经》上说百姓欢悦无限，这正是为什么家家庆幸富足安康，人人歌颂得到了自己乐意得到的好处，来共同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地啊！

制策又鉴于仁德、礼仪、刑罚、政务出自同一个本原，而对宣明刑罚、修订法律的规定，务必要考虑衡量，归到最为恰当上来。用来希望达到符合不偏不倚的尺度的化导，真是做到极限了。臣下我听说刑罚这个东西，是针对定型的人体的；定型的人体，是天生长成那个样子的。一经长成那个样子，就无法改变，而一用刑，也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所以对审案判刑要竭尽心力。自从虞舜执政时期任命皋陶担任大法官，希望达到严明公平，而没人触犯那犯罪该受的处罚，这是由来已久的了。《周礼》中地官大司徒掌管六德、六行、六艺这三个方面的教育，秋官大司寇掌管野刑、军刑、乡刑、官刑、国刑这五种涉及到农事、军队、民事、官员、国家的法律，而在乡中施用的有关不孝、不和睦等八种刑罚，大司徒也负责掌管它。因为靠仁德、礼仪、刑罚，政务拿出治国措施，原来就属于同一个本原。自从后世名家和法家，把法律分化成两个极端，重判轻判都不公平。而故意一反常情的人有的把不禁绝奸邪看成是宽大，把放过和释放有罪的人看成是不苛刻。这同附会法律条文、说什么也要给人定罪的做法比照起来，弊端是一样的。不明白春天温暖，秋季肃杀，这是天道运行中阳气舒朗、阴气凄惨的原因；也不了解让人感念恩德，畏惧威势，这是圣人仁德显扬、正义确立的根由。朱熹的话说得太好了！他讲：愤怒而动用刑罚，这是阴气的表现，也是圣人所憎恶的东西。尽管说憎恶刑罚，但又不敢放过犯下罪过的人，因为经典上所讲过的：上天要任用具有德行的人，上天要惩罚犯下罪过的人。这里面存在着个人根本就不能作主的问题。施用刑罚，可贵的地方固然在于公平，但宣明刑罚，可贵的地方更在于慎重。所以有情节轻可罪行却严重的情况，就该援据赦免的规定来审断而算不上是宽大；有罪行轻可情节却严重的情况，就该援据屡教不改

的规定来审断而算不上严苛。法律确立起来就固定不变，而情由及情节的斟酌衡量要把最为公平作为准绳。古代所讲的定立刑法是期望达到没有刑法，实行杀头是用来止息住杀头，具体实现的途径永远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去。圣明的当朝天子宣明并修订法令，全都坚持最为公平的原则。凡是当代的臣僚和百姓，谁还不争相自己洗涤磨砺自己，来永远切合那一切都不偏不倚的福庆呢？

像以上这几个方面，在事体上存在着所属范围的划分问题，但道理并没有不一致的地方。跪拜祝愿我皇上，在内心确立虔诚，在长久行用大道上观察教化的成效，正处在好几代都圣明太平的国运上，激励在极盛阶段更为谨慎以保平安的意向。道德品性的功效已经纯正精粹了，但仍必定要促进和推崇务实的学问，来对危险的苗头和确保安宁更努力去处理。民间风气已经和睦协调了，但仍必定要整顿做官的准则与方式，来辅助朝廷的教化和治理。家家户户尽管欢庆丰厚亨通，但使粮食充足的对策应当预先想周全。法律虽然显示出宽大简要，但慎重对待刑罚的用意要极其严格。神灵和世人欢乐地应合，中外喜悦又安康。我们盛明的大清皇朝亿万年极其隆盛的吉庆举措，就积聚在这上面了。臣下我是刚要被进用的民间读书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

殿试策问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腾缵膺鸿业,严恭寅畏,夙寤晨兴,殚心万几,兢兢翼翼,弗敢康宁,四十六年于兹矣。思所以仰承天庥,持盈保泰,咸庶事之熙,遍群黎之德。进兹多士,咨尔嘉言,其敬听朕命:

人君所敬惟天,帝尧钦若,文王昭事,帝王受命,先后合符。夫爱民所以承天,勤政所以事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不爱乎?无旷庶官,天工人代,可不勤乎?民隐何以达之,庶事何以康之?人君集天下之耳目,合天下之智力,是以德泽下究,而情隐上闻。何以兼听并观,咸熙庶绩欤?

民生之康阜,系乎吏治之澄清,风俗淳漓,由此判焉。《周官》六计弊吏,皆以廉为本。汉唐以来条目滋多,要其惩贪奖廉,岂有异旨欤?夫正百官以正万民,转移化导之机,操之自上。《周礼·职方》所载与《王制》所称,其土宜风气不可推移,果何道而使之还淳返朴,臻一道同风之盛欤?

学术首念真伪,士子读书敦行,处为良士,出为良臣,原不藉文字为标榜。自欺世盗名之徒,托言讲学,谬窃虚声。如明季东林诸人,流而为门户,为朋党,甚至莠言乱政,变易是非,实于朝常国体、世教民风,所关甚大。其何以息邪说,距诐行,使行坚言辨者不得逞其私臆,

学术纯粹，毋误歧趋，以正人心而端风教欤？

明刑所以弼教，或轻或重，一视其人之自取。议谳者必审宽严之当，持情法之平，本无容心于其间。夫不求其平固不可，而求其平之后，于己原无涉也，乃或曲意市恩，或有心避怨，以国家刑章宪典之公，为邀誉沽名之具，其心尚可问乎？将欲使矜慎庶狱，无枉无纵，以臻咸中之庆，其何道之从欤？

尔多士洽闻稽古，来自田间，政教之本原，民生之利弊，所习闻也。其审思之，详究之，悉意以陈，毋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所蕴藏在自身却不推己及人，而能够让人们都明白的人，是从来没有过的。

你为什么不说：他为人哪！用功就忘记吃饭，快乐就忘记忧愁，不晓得衰老就要到来，如此而已。

等待周文王出来而后感动奋发的，是普通老百姓。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自从继承大业以来，严肃谨慎，恭顺戒惧，夙兴夜寐，尽心勤政，日理万机，兢兢业业，小心翼翼，不敢安逸康乐，已经四十六年了。如今在考虑，怎样才能上承天命，维持盛世，保持太平，使诸事顺遂吉庆，让百姓普受恩惠。今将诸位士人招进殿廷，向你们征询良言嘉谋，你们要恭敬聆听皇帝我提出问题：

人君所敬者只有上天，《尚书》记载说唐尧非常敬顺昊天，《诗经》记载称周文王勤勉服事上帝，自古以来帝王们接受天命，前后都要经历核验符契。爱民是为了上承天意，勤政是为了奉事上天。天的观察来自我民众的观察，天的听闻来自我民众的听闻，能不爱民吗？不要渎职失职，天的职司是由人来代替执行的，能不勤政吗？民众的疾苦

通过何种渠道加以了解，各种事务采取何种方法能够做到妥善。人君集中了天下人的能力和手段，汇合了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可做到恩德惠及下民，下情得以上达。怎样才能广泛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事务，各种政务顺利通畅地得到贯彻实施呢？

民众生活的康乐与否，关键在于吏治是否澄清，风俗的淳厚或浇漓，由此而得到判别。《周礼·天官·小宰》所载考察官吏的六条要求，廉洁是最根本的要求。汉唐以后有关的制度越来越多，核心都是惩办贪污和奖励廉洁，哪里会另有涵义呢？端正百官是为了端正万民，转移化导风俗的契机，应该由官方上层予以掌握。《周礼·职方》所记载与《礼记·王制》所称述的内容，都说各地的土俗风气不可强行更改，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使他们返朴还淳，以期达到天下道德一致而四海同风的盛世呢？

经学儒术，首先要实事求是和辨别真伪，士人们读书学习砥砺品行，居家为民就要做一个良士，出仕为官就要做一个良臣，原本不需要依凭文字互相吹捧。自从出现欺世盗名之徒，他们借口讲学，骗取虚假的声誉，例如明末的东林党诸人，后来又进而发展成为门户和朋党，甚至谬言乱政，颠倒是非，实在与朝廷纲常国家大体、时世教化民众风俗关系甚大。采取何种方法才能平息邪说，消除僻行，使行为伪诈而顽固坚持、言辞伪诈而强词夺理者不能逞其私意，儒经学术得以保持纯正，不致误入歧途，以端正人心和风教呢？

申明刑罚是为了辅助教化，或处以轻罪或处以重罪，完全视其本人自己触犯刑律的程度。审判者必须审慎掌握宽严的得当，保持情理与法律的平允，切不可在其间稍存私心杂念。那么不追求执法的平允固然不可，而在做到平允之后，本来与自己没有牵涉，居然又或者向犯人曲意卖好，又或者有意识地避免犯人仇怨，把国家刑罚典制的公法，变成为自己沽名钓誉的工具，这还谈得上什么良心吗？想要做到慎重刑案宽大为怀，既没有冤枉也没有放纵，以求达到审案的完全准确公平，给民众带来幸福，有什么办法可以采取吗？

诸位士人博学广闻，熟谙古事，来自民间，对政治教化的原则，民众生活的利弊，都非常熟悉。你们要审慎思考，详细研究，一一陈述，不要有所隐瞒保留，皇帝我将要亲自加以阅览。

钱棨　殿试对策

钱棨(?~1799)　字振威,一字湘舲,江苏长洲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状元,系三元及第者。历官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等,先后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广东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提督云南学政。主考及主持学政期间,以拔擢公允受到舆论称赞。

臣对:臣闻帝王钦崇天道,奉若天命,莫不本祇敬之一心,为之经纶而丕冒,故其以至明烛万几者,皆其以至公宰万物者也。夫单心基于宥密,而运量遍乎寰区。莅政则业矢精勤,考绩则治臻熙皞。劝学必归于正轨,明刑胥协乎王章。兢兢焉日慎一日,即至天人合德、民物咸和,道隆而化普,业举一世而跻之太平仁寿之域,犹不敢自暇逸者,何也?盖王者宪天出治,肃政本而振民风,正人心而申国禁,夙凛明威以昭彰阐,惟其事天之诚,故能立人之极。明则无私照也,公则无私覆也。《易》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书》曰:"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用能溥雍和之化,扩鸿远之模。主极克端,尚情殷于茂育;天工时亮,犹念切于敦庞。聿崇正学,畸邪之习全消;爰致祥刑,轻重之权悉当。是故智周道济,仁育义正,一人建极于上,而薄海内外沐浴咏歌尊亲,并戴于亿万斯年者,胥是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参天地,道贯古今,悬离照以有临,体乾行而不息,固已建中锡福,泽周于宜民宜人,崇实黜浮,法立于无偏无党矣。乃圣德渊冲,畴咨弥切,复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勤政爱民之本,兴廉察吏之方,黜邪辨正之严,弼教协中之务。臣自田间来,至愚极陋,譬诸细流土壤,何裨山海?窃复自念身际升平极盛之时,欣逢寿考作人之化,仰承清问,下逮刍荛。敢不竭平日所知,以对扬于万一乎!

伏读制策有曰:人君所敬惟天,爱民所以承天,而勤政即所以事天。此诚抚辰凝绩之盛心而熙载奋庸之要道也。臣惟天地万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天生民而立之君,有体天行政之权,即有代天养民之责。夫天行至健,风雨露雷,无非教也。王者本天之教以为教,则秩曰

天秩，叙曰天叙。举凡民彝物则之常，何在不奉天以从事乎？天心仁爱，大生广生，无弗遍也。王者以天之心为心，则工曰天工，官曰天官。举凡体国经野之规，何在不顺天以布令乎？是故六合既同矣，而犹虞民隐之未由上达，则举时巡之典以周悉之；百度既贞矣，而犹虑庶事之未尽乂康，则广选举之途以群策之。古人君凝承帝眷，而御宇绥猷，所谓集天下之耳目，合天下之智力，兼听并观而日勤其宵旰者，端在是乎？然则勤政者无非爱民之实心，而爱民者皆为敬天之至意。尧之钦若昊天，文之昭事上帝，类皆载以小心，升兹大业。用是天庥呈于上，人和积于下，遂以鼓舞一世，敦尚廉隅，以几一道同风之治也，岂不休哉！

制策又曰：民生之康阜系乎吏治之澄清，而风俗之淳漓由此判。臣谨按《周官》"以六计弊群吏"，而统之曰廉。官箴之本，其在是矣。汉以六条察二千石，唐有四善二十七最，差之以九等，要皆所以纠劾不廉也。其法令较周制为加密。夫法令虽操于大廷，而考察必严于各属。为大吏者先正己率物，身示之坊，斯为守令者自不敢不砥砺廉隅，肃清利弊。由是上行而下效，旋见俗易而风移矣。且夫五方之风气不齐，一时之俗尚各异，《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则有邦国、都鄙、侯甸、男采之殊制；《王制》司空度地居民，则有山川、泽、刚柔、轻重、迟速之异宜。然古者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风俗，则不必易其俗而其教自行，不必易其宜而其政自举。为长吏者诚能洁己奉公，于以型方训俗，因势利导，所谓奢则示之以俭，俭则示之礼者，酌剂焉而得其平，固无难黜诈伪，敦仁厚，以并底于正直荡平之路矣。皇上慎简群僚，懋敦醇俗，吏治民风，固以蒸蒸日上，乃当省方之岁，每咨闾阎疾苦，周悉民情，则知勤政之衷，无时或释。县官州牧宜何如整饬，勉励官方，以仰副圣朝察吏维风之至训也。

制策又以学术首严真伪，士子读书敦行，毋误歧趋，以正人心而端风教。此诚睿虑周详，见微而知著也。夫学术真伪，固人心风俗所视为转移者。三代以上无不正之学，故无伪学之名。然而勋华之时，间生佥壬，孔子之世，亦有闻人。倘非四凶之屏，两观之诛，焉知清流

朋党之患,不早炽于并生并育之世哉!东汉士林品流杂出,李膺、郭泰首倡宗风,负人伦重望。而范滂、黄宪辈并束身砥行,以节义相高。其弊也,以各立门户致来清流之目,降而唐之牛李,宋之蜀洛,交树党援,互相倾轧矣。明季朋党之风益甚,顾宪成讲学东林,而高攀龙等从而附唱之,一时意气自矜,矫持过甚。其后宵小协谋,挤排善类,藉令当李、赵、高、缪诸人不以独行自诩,稍为贬损,则东林之患当不至是。夫朋党之说,其局起于激之太甚,其端实萌于防之不严。故凡学校之中,群萃州处,必使趋表正,经明行修,无涉欺世之见,无起盗名之心,俾学术一归于至正。而假道学以为伪君子者,何由而强托哉!我朝正学昌明,士林向化。而欲杜弊于未萌,察几微于未著,必将举君子、小人之真伪,显别其径途,而争自树立者,宜知所自处矣。今夫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此必然之势也。

制策又曰:明刑所以弼教,或轻或重,一视其人之自取。臣惟以刑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大要持其平而已矣。唐虞之世,刑期无刑,辟以止辟,一则曰惟刑之恤,再则曰惟明克允。善用刑之中,自具详慎之至意,初未尝有过枉过纵之失参其间也。《周礼》狱词之成也,司寇听之,三公参听之,而告于王。王三听然后制刑。《吕刑》之篇曰:"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此谓率乂于民,咸中有庆也。夫不求其平,固不可以臆为听断,既得其平,则国家宪典之昭垂无可幸逃,而操致治之原者,亦何尝有成见据乎其中哉!

若此者:敕几于在宥,而奉天即以勤民;端本于群僚,而察吏即以善俗。黜伪学以正人伦之趋向,明王章以肃当代之纲维。是皆继天出治者,宰世服物之大要也。伏愿皇上帝德广运,悠久无疆,酥化懋崇,天庥滋至。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们崇敬天道,奉行天命,无不抱着庄重恭敬的心情,来筹划治理国家的大事,他们之所以能够明断政务,日理万机,都是因为秉持最大的公正来统治天下万物。尽心竭诚勤政是因为自觉恭承天命,而器量胸怀能够容下宇宙寰球。所以处

理政务则努力做到聚精会神勤勤恳恳，考核官员则追求实现政治清明，勉力求学又要求一定纳入正确的轨道之上，申明刑罚则是着眼于辅助王道礼教。他们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实现了天与人的和谐，民与物的和睦，使王道兴隆而教化广布，功业空前而进入了太平仁寿的时代，可是仍然不敢擅自贪图安逸享乐，为什么呢？这是因帝王效法天道，代理上天来治理民众，理应严肃政本而振奋民风，端正人心而申明国禁，秉持明威而昭示彰阐。正因为帝王们侍奉天道极其恭敬真诚，所以才能高高居于天下人的首位。明则没有私心私念，公则没有私行私利。《易经·系辞》说："圣人规范天地的化育而不逾越中道，适时通变、成就万物而无所遗漏"。《尚书·皋陶谟》说："天意与民情是相通的，要谨慎啊！有国土的君主。"因此能够普遍推行安宁和睦的教化，大力拓展影响深远的模式；握权中枢而端正中道，还要满腔热情广育人才，时刻遵奉天命代表上天治理臣民，犹须念念不忘实现丰厚富足；提倡崇尚儒家学说，邪僻欺诈的行业和习俗就会全部消失；实行宽大审慎的刑律制度，审判案件制定刑罚的法律准绳就会公正平允。所以，智慧超群而才艺兼备，品德仁厚而行为端正，皇帝一人高踞于万民之上，而普天之下四海内外的百姓沐浴皇恩，歌颂圣主，并将世世代代延续亿万年，这都是由于奉行天道的缘故。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品行超越天地，道德贯通古今，明察秋毫而临御天下，体行天道而自强不息，本来已经是建立了中庸公正之道，遍赐了洪福恩泽之仁，理政措施给民众带来了普遍利益，并崇尚了实干精神，摒弃了浮华不实，法律建立在了公正无私的基础之上。可是陛下您圣德越深厚，访求善政的心情越急切，又将我们士人招进殿廷，就有关勤理政事爱护民众的根本措施，倡导廉洁考察官吏的方法，扶助正气打击歪风的严厉手段，辅助教化协调中道的要务等问题提出策问。臣下我来自民间，极其愚昧无知，譬如是涓涓细流微小尘土，哪能有补于高山大海。不过心中自念生逢升平极盛的时代，欣遇圣主高寿奖拔人才的教化，上承陛下垂询臣下我一个草野之人，怎敢不竭尽平日学习积累的知识，以对答陛下策问的万分之一呢？

跪拜敬读制策，制策认为君主所崇敬的对象只有上天，爱民是为

了承顺天意，而勤政即是为了奉事上天。这真是根据五辰运行、四时变化来处理政务的满腔热忱和努力弘扬功业的重要途径。臣下我认为天地是世间万物的父母，天子是百姓的父母。上天养育了民众并为他们确立了君主，君主既有了替天行使政务的权力，就有了代天抚养民众的责任。天的运行最具强力，风雨露雷，无不是天的一种教示。君王们依据天的教示作为教示，因此人世间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常次序就称为"天秩"，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各自应遵从的等次礼节就称为"天叙"。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常还是事情物类本身的最高法则，哪个不是在遵奉天道而进行的呢？上天的性情最为仁爱，能够始生万物、广育万物而无不周遍。帝王们是以上天的性情作为自己的性情，因此代表上天来对人间进行统治的职能就称为"天工"，行使这些职能的官员就称为"天官"。无论是管理国家还是治理民众的制度，哪个不是在顺从天意而实施政令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天下虽然已经一统了，而皇上仍然还在忧虑百姓疾苦的下情无由上达朝廷，于是按照定期巡视的旧典来全面了解他们的疾苦；百事已经顺遂了，而仍然还在考虑民生诸事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于是大力拓展选拔士人贤才的途径来广泛征求达到天下大治的方策。古代的君主们凝聚秉承上天赋予的仁恩，统御天下并实现他们的治国谋划，人们所说的君主们集中了天下人的能力和手段，汇合了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广泛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事务，而能做到日夜勤政、宵衣旰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那么这样说来，勤于理政没有不是爱护民众的真心实意，而爱护民众全都是警崇上天的最高体现。唐尧的恭敬顺从上天，周文王的勤勉服事上帝，都是因为小心谨慎，恭敬勤政，开创了天下大业。因此上天授予他们大任，人间充满欢乐祥和，整个社会由此得到鼓舞振奋，品行崇尚高洁纯正，进入了文化同一而风俗相同的盛世，真是盛况空前啊！

制策又说：民众生活的康乐与否关键在于吏治的是否廉清，而风俗的淳厚与浇漓亦因此而判别。臣下我查检《周官·天官·小宰》有载录，要求以善、能、敬、正、法、辨六条标准考察官吏，统而言之就是要求做到廉洁。作官戒规的根本就恰恰在此。汉代根据"六条"对二

千石一级的官吏进行监察,唐代考核官员有“四善”和“二十七最”,并区分为九等,核心目的都是用以纠正不廉洁的行为。这些法令较之于周代制度大为严密。法令的制定虽掌握于朝廷手中,而对于官员属吏的督察考核必须严格执行。身为封疆大吏者如果能够端正自身,率先垂范,那么位居太守县令者自然不敢不砥砺品行,革除弊端。由此而上行下效,很快就能使习俗变化而风气改换了。再说各地的风气本来就存在差异,每一时期的习俗也各有不同,《周礼》记载由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那么说明存在着邦国、都鄙、侯甸、男采这些政区制度的不同。《礼记·王制》主张司空根据地理人口划分政区,那么说明存在山川、沮泽、刚柔、轻重、迟速这些各地土俗的差异。古代的时候通过讲究冠、婚、丧、祭等“六礼”来控制民性,提倡父子、兄弟、夫妇、君臣等“七教”来培养民德,整顿食、货、宾、师等“八政”来防止民淫,规范道德来划一风俗,这样就没有必要采取强制的手段来改变民俗而教化自然会得到推行,没有必要采取强制的手段来改变适宜的环境、社会条件而政令自然会得到贯彻。身为主要官员者如果真正能做到洁己奉公,那么在治理一方训导风俗时,就会因势利导,亦即所谓风气奢侈的就提倡以节俭,风气鄙陋的就提倡以礼仪,所采取的疏导、调控手段就不难做到及时和妥当;进而罢黜诈伪的习气,敦崇仁厚的风俗,从而踏上宽广通畅的康庄大道。皇上您慎重选择臣僚,大力提倡淳俗,吏治和民风,本来已经是一日胜过一日,而当此巡视四方之岁,依然是每每咨访民间疾苦,详细调查民情,可见皇上勤政的热衷没有片刻的懈怠。那么县官州牧应该怎样整饬政务,督导官属,不辜负圣朝督察官吏、纯洁风俗的最高训诫呢?

制策又鉴于经学儒术首先要严辨真伪,士人读书学习砥砺品行,不要误入歧途,期望以此端正人心和风教。这真是圣虑周祥,见微知著。经学儒术的真伪,本来就是影响人心风俗的决定因素。夏商周三代以前不存在不正之学,所以也不存在伪学的概念。虽然唐尧虞舜时期偶尔也产生小人,孔子生活的时代也出现了一个少正卯,倘若不是虞舜放逐共工、欢兜等四凶,孔子诛杀少正卯,怎能知道清流朋党的祸患,不早早伴生于当时那个时代呢?东汉时期的士人阶层品流杂

出,李膺、郭泰首倡一代风气,极负社会重望。而范滂、黄宪之辈都身体力行,砥砺品操,以气节道义相推尚。其弊端则是以各立门户来引起清流的注意,以后到了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蜀洛党争,进而发展成了交树党援,互相倾轧。明代末年的朋党之风更加严重,顾宪成讲学于东林书院,高攀龙等人随声附唱,一时间他们意气相矜,对时风虽有矫正但也不免过头之处。此后小人们串通一气,排挤良善,假设当时李三才、赵南星、高攀龙、缪昌期等人不以品操卓异自我吹嘘,稍微谦逊自抑一些,那么东林党的祸患当不至于后来那么严重。关于朋党的问题,其原因起始于激进过分,其发端萌芽于防范不严。所以凡是在学校里面,因为都是学生群聚一处,必须使他们认同正面教育,做到经学精通,品行端正,不接受欺世之见,不萌发盗名之心,使经学儒术完全纳入纯正的轨道。那么假借道学作为外衣的伪君子,哪里会有托身之地呢?我们皇朝经学纯正昌明,士人向慕教化。要想杜绝弊端于未萌,观察秋毫于未形成,就必须辨明君子小人的真伪,判别二者的不同表现。那么当他面临选择时,就知道自己该如何办了。现在高尚的君子们都在身体力行信用和道义,卑鄙的小人们都遭到了刑戮的惩罚,这体现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制策又说:申明刑典是为了辅助教化,或处以轻罪或处以重罪,完全视其本人触犯刑律的程度。臣下我认为:刑罚是圣人迫不得已而采用的手段,关键在于执法要平允罢了。唐尧虞舜时期,使用刑罚是为了除去刑罚,惩处犯罪是为了根除犯罪,第一位的原则是仁恕在心而慎重用刑,第二位的原则是明察案件而执法平允。善于做到用刑适当,这本身就已包含了严肃慎重的周到考虑,从一开始就不允许过枉过纵的失误存在其间。《周礼》说审判的过程是,先由司寇受理,然后三公参审三次,再报告于王,王复审三次后定刑。《尚书·吕刑》说:"罪情较重,本应处以重刑,但只是偶尔为之,不是一贯不法,便可以从轻处理。罪情较轻,本应从轻处理,但因是一贯犯法,便应从重处理。刑罚或轻或重,可以根据具体案情灵活掌握。"这是说要依法治理民众,达到审案的完全准确平允,使民众得到幸福。即使不力求执法的平允,原本上也不能只凭主观猜测去审案断案,已经做到执法

的平允，在国家完备和严密的法典制度面前一切罪案都别想侥幸逃脱，所以掌握达到天下治理的方法又何必一定要有一成不变的预定看法存留在心中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时刻保持庄重恭敬是为了奉行天道，而奉行天道是为了勤理民政；端正根本从臣僚做起是为了督察考核官吏，而督察考核官吏是为了纯化风俗；罢黜伪学是为了端正社会的追求风尚，申明朝章是为了严肃当代的法律制度。这些都是代天治民的帝王们主宰社会、统治天下的重要措施。臣下我衷心祝愿皇上您帝德广远，悠久无疆，以宽厚德政教化黎民而民俗淳厚充溢，天赐嘉命而洪福纷临。我们国家亿万年有道之世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啊！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

陈万青　殿试对策

陈万青（生卒年不详）　字湘南，室名惕号斋，浙江石门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事迹待详。

臣对：臣闻天道惟诚而无息，圣功本敬以日跻。故《书》敕时儿，《诗》基宥密，盖必有凝命宪天之实，以凛此持盈保泰之衷，而后奉帝谓以念民依，则旰食宵衣之覃敷德泽也；肃官常以敦世教，则承流宣化之尽归朴淳也。学术已端而必惩异说，祥刑惟恤而悉准恒情。此其治务臻于上理，而其原托始于君心。《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言君能法天自治，纯乎理而不间以欲，则可以奉若而弗违。又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言世际重熙，则深仁厚泽之所积累者，自潜孚而默应。粤稽古昔，德莫隆于唐虞三代，而典谟所载，凡以纪盛烈而告成功者，义皆无取乎媚，兹情则倍深于惕若，非过慎也。当太和翔洽之时，而夙夜不遑，几康交谨，所由闾阎共沐涵濡，风俗皆登仁让，正学之师承无伪，法司之详慎有加，于以成光被之庥而致泰交之盛。五气顺布，兆往平康，蒸蒸乎进于熙嶲之隆焉。

钦惟皇帝陛下，循枢建极，握镜临宸。德泽所加，纳之于仁寿；神明所运，致之于郅隆。固已凝承弗替，化导弥勤，力学无偏，纠民惟允，会归准乎彝训，清宴亦纪休征矣。乃圣德渊冲，畴咨弥切，复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敬天核吏之要，崇儒敕法之方。臣至愚极陋，未能积学砥行，窥治道之全，譬流壤之细微，奚补泰山河海？惟是先资拜献，臣下之分宜然也。兹当对扬伊始，敬承清问，敢不勉竭微忱，以效刍荛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爱民所以承天，勤政所以事天，而因思民隐之何以达，庶事之何以康。臣谨按人君致治之道者，莫备于《尚书》。唐虞之世，六府孔修，百工允厘。而《尧典》以钦始，《益稷》以钦终。大禹之陈谟，首曰"后克艰厥后"。至于天命人心之交儆，祁寒暑雨之宜思，《尚书》数十篇中谆谆三致意者，盖深知帝王之受命，先后合符，未有不以敬天为首务者也。夫性与命非两物，即天与人无二理，小心翼翼为永言配命之基，惟日孜孜为克享天心之学。语曰："天因人，圣人因天"。此亦言天之一证也。惟是天道远而人道迩，故言法天者必居正以体元，而无事不本诸躬行实践焉。自古建中锡福之君，一夫有不获，必引以为予辜予咎，万事得其理，不敢谓已治已安。则必集天下之耳目，合天下之智力，以兼听并观，斯民隐不壅于上闻，德泽亦可以下究。臣伏读《经筵御论》"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二句曰："天高听卑，一念之克罔，而天之眷顾与否，亦捷于响应，故求天于天，不若求天于己，人事尽而天理见"。大哉王言！洵有以殚夙夜昭事之忱，而致无疆惟休之庆矣。

制策又以民生之康阜，系乎吏治之澄清，风俗淳漓由此判焉，因思转移化导之机操之自上。臣惟自古命官，各分职守。《周官》"以六计弊群吏"，善、能、敬、正、法、辨，皆冠以廉。注曰：廉者，察也，如别其善恶，观其能否之类是也。或曰廉者，有司之大节也。官必廉而后其他可观焉，故六事必皆首之。汉法以六条察二千石，宣帝时有治行优异者增秩赐金。唐考功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善最相承，差以九等。盖最者才也，善者德也，总不离乎正己正人、训俗型方者。近是诚使督抚大吏不行私以任意，则直省官员皆知自爱，必多廉节自持。凡

厥庶民，皆将视上之所为以为法焉。《记》曰："恺以强教之，悌以悦安之"。是起化于微渺，而绝恶于未萌。虽九州之风气不齐，诚有如《职方》所载、《王制》所称者，而既申科条，讲律令，复为之薰陶涵育，以俟其自化。于以仰体皇仁，兴治立教，将见士食旧德，农服先畴，而道德既一，风俗自同矣，非砥砺官方之实效欤？

制策又以学术首严真伪，而不可藉文字为标榜，以欺世而盗名。臣谨按孔子之言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告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理学真伪之辨，实本于此。自《宋史》《道学》、《儒林》列为两传，世之谈理学者往往假诚意正心之说，以为欺世盗名之由。不知理学之真者，有体立用行之实学，有修己治人之全功，以故处为良士，出为良臣，卓然可以信今而传后，此濂洛关闽之授受，所以无有殊趋也。独是天下之理，有阳不能无阴，有正未必无邪，故真伪每参错于其间。夫辨真伪于绝不相侔之中，其道易；而辨真伪于似是而非之际，其道难。以圣贤之学所凭惟心，心同则理无不同，其作伪者，每借真儒之名以遂其计功谋利之私。其术愈巧，其伪愈甚。如明季东林诸人，流而为门户，为朋党，其始亦惟是藉文字为标榜，迨至谬窃虚声，混淆臧否，行坚言辨，而弊有不可胜言矣。则惟是严以别之，甚者威之以刑，使不得并存于圣世，则歧趋辨而正学不益以明哉！

制策又曰：议谳者必审宽严之当，持情法之平，而因预虑其市恩而避怨。臣闻礼防于未然，刑禁于已然，故刑者所以辅礼之穷也。自虞以明刑弼教，而刑之名以起，一则曰明允，再则曰钦恤，盖古圣人忠厚之意如此其至也。然宽严之间，亦贵乎持之得其平，而非有所容心于其际，使月吉未颁而爰书已定，木铎未振而桎梏已施，固非所以为教。而《周官》八议之条，于亲、故、贤、能特从宽典者，亦斟酌乎情与法之间，而非敢曲意以市恩，有心以避怨也。故圣人观象系言，其于刑也，或言折狱致刑，或言赦过宥罪，张弛之道时为变通。若议谳者多所瞻顾，则律例之间既可以轩轾任心，高下其手，将以国家之宪典为要誉沽名之具，而臣心愈不可问矣。我皇上如天好生，重恤民命。凡自军流以上，必详加勘拟，按诸律例，即单词只字，缕晰条分，则所

以越礼犯法之故、轻重大小之分，执法者苟一秉大公，则无枉无纵，协于大中，以几刑措易易耳。

要之，登斯民于衽席之安，措天下于荡平之路，兹数者皆经国之要图也。惟是感覆帱之德，则欲天之弥高；荷容载之恩，则欲地之弥厚。臣伏愿皇上益懋朝乾夕惕之心，愈深长治久安之计。敬德纯而恤民之纲纪尤权度于至精，官方饬而起化之谋猷弥振兴于无已。不以儒修既正而宽综核之怀，不以法纪常昭而释平中之念。我国家亿万年升平之庆，在是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天道的核心是至诚而永不停息，圣人的功业本源于崇敬天命而逐渐形成。所以《尚书》说“努力奉行上天的旨意，时时刻刻小心谨慎”，《诗经》说“夙夜积德终日竭诚，以承受天命”。因此必须具有凝聚天命而效法天道的实心，时时刻刻激励持盈保泰的内衷，而后才能谈得上符合帝王的名号而去体念民众的疾苦，那么就旰食宵衣，努力勤政，以实现德泽广布；整顿吏治，严肃伦常，以敦厚世风礼教，那么就承奉圣恩而广布教化，使天下尽归淳朴。学术虽然已经端正而一定要惩治异端邪说，刑罚的行使虽然已经非常慎重而更应该确定持久永恒的法律准绳。治理国家要务求达到上等的水平，而其本原都肇始于君主的内心。《易经·乾》说：“上天的运行刚健有力，君子效法天道，因此而自强不息”。这是说君主能够师法天道，自我勉励，完全是出乎理性不会因私欲而间断，因此可以奉行天命而不去违抗。《易经》又说：“圣人持久地推行德治，天下万物就会从化而成。”这是说社会遭逢世代升平，那是深仁厚泽所积累的结果，人们自行就暗中信服与默默应合。稽考古事，恩德隆盛没有能超过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根据《尚书》的《尧典》、《大禹谟》等典籍所载，凡是历史上被记载的盛事和大功，之所以获得成功都是因为超俗出群而拒绝媚世媚俗，于是由这种情志就加倍警惕小心，但并非过于谨小慎微。当此太平和乐上下融洽之时，帝王终日勤奋理政，不敢放纵松懈，态度严肃恭谨，百姓民众共同沐浴着浩荡皇恩，民情风俗

呈现出仁厚礼让，儒学的师承传授不存在伪诈的异端邪说，司法衙门的判狱审案进一步周详审慎，因此出现了圣德光照天下的祥瑞，而使国家进入了安定太平的局面。金、木、水、火、土这“五气”顺利运行，各种吉祥兆象预示出前途平康，国家于是进入一个更加光明兴盛的理想时代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继承大业，荣登皇位，承受天命，临御天下，恩德所加，使民众享受到安乐长寿；神明所运，将国家带进了繁荣昌盛；本来已经做到了恭奉天命而毫不松懈，化导民俗越来越勤奋，努力勉励求学而又防止偏颇，治理民众力求达到平允，一切行为都按照上天的训诫行事，清平安宁呈现出盛世景象。可是陛下您圣德越深厚，访求政事的心情就越急切，又将我们士人招进殿廷，策问有关敬仰上天、考核官吏的要务、尊崇儒学、严肃法纪的方法。臣下我极其愚陋无知，未能做到学问渊博品行高尚和掌握全部治道之术，譬如是涓涓细流和微小的尘土，无补于泰山和大海。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当此对答朝廷之始，敬承皇上垂询，怎敢不竭尽微忱，以提出臣下我一个草野之人千虑一得的愚见呢？

跪拜敬读制策，制策认为爱民是为了上承天意，勤政是为了奉事上天，因而思考民众疾苦的下情通过何种渠道上达朝廷，有关民生的各种事务采取何种措施使他们实现康乐。臣下我经过慎重的思考，认为论述君主追求实现天下大治方法的，没有比《尚书》更详备的了。唐尧虞舜时期，有关水、火、金、木、土、谷的六府政务都做得非常好，百官职务范围内的事务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所以《尧典》以“钦”字开篇，《益稷》以“钦”字收篇，《大禹谟》记载大禹的话首先就是“只有君主才知道做君主的艰难”。至于对天命和人心的变化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和给以充分的注意，对民众夏天暑热大雨、冬天凛冽严寒时的仇怨疾苦应该时时刻刻予以关怀，《尚书》数十篇之所以谆谆教诲，再三给以关注，都是因为深切地知道帝王们接受天命、先后核验符契没有不是以敬崇上天为第一要务的。再说“性”与“命”并非两物，而天与人没有二理，小心翼翼永远是仰承天命的根基，终日孜孜不倦是

体悟上天性情的学问。俗话说:“天依靠的是人,圣人依靠的是天。”这也是有关天命论述的一个佐证。只是天道虚无遥远而人道近便现实,所以谈论遵奉天命的人必须居守正道以体法天地之德,无论任何事情都必须身体力行,亲自实践。自古以来,凡是能够建立中正之道,遍赐民众幸福的君主,哪怕是有一个人生活还得不到保障,也一定要引以为是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各种政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也仍然不敢说天下已经达到了治理和安宁。所以,君主们一定要集中天下人的条件和手段,汇合天下人的智慧与力量,努力做到广泛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事务,使民众疾苦得以听到的渠道不致阻塞,使皇上的恩德也可以向下传布。臣下我恭敬地阅读《经筵御论》,其中对“努力奉行上天的旨意,时时刻刻小心谨慎”二句发挥道:“天高高在上,时时刻刻在听闻低处人们的动静,一思一念都尽知无遗。不管上天是否予以关注理会,它都会迅速感知,所以向上天求取天助,不如向自己求取天助,政事处理得尽善尽美也就体现了天理。”这真是帝王气度的恢宏之论,确实具有通过坚持不懈,勤勉服事上帝的热忱,而使百姓达到乐享无穷无尽幸福的精神。

制策鉴于民众生活的康乐与否关键在于吏治是否澄清,而风俗的淳厚与浇漓亦因此而得到判别,因而想把转移化导风俗的枢纽,掌握在上层手中。臣下我经过考虑,认为自古以来任命官吏,都要求忠实于职守。《周礼·天官·小宰》规定“根据六计考察群吏”。“六计”就是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六条之前都冠以“廉”字。注释说:廉,就是考察,例如区分善恶,观察有否才能等等即是。有人说:廉洁是官员的大节,官员必须首先做到廉洁而后才能谈及其他。所以考察官员的六条内容必定都是首先冠以“廉”字。汉代法律根据“六条”考察二千石一级的官员,宣帝时期制定了政绩和品行优异者可以晋升级别和给以赐金的规定。唐代考核官吏的方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善和最合并计算,区分为九等。“二十七最”是对才能的要求,“四善”是对品德的要求,都离不开正己与正人,训导风俗与表率一方这些基本要求。假使总督、巡抚大员们真正能做到不行私利,不任私意,那么中央直辖各省官员就会皆知洁身自爱,肯定有很多人廉

洁自持。所有的庶民百姓，都将把官员的所作所为看作是自己仿效的楷模。《礼记·表记》说："和悦是以勉励的方式教导人们，平易是以愉悦的方式安抚人们。"如此便可以从点滴小事做起，形成善俗，并将恶念恶行遏止于萌芽状态之前。虽然各地风俗不同，但诚如《周礼·职方》所记载、《礼记·王制》所称道的那样，通过申明制度、宣传法令，再加以熏陶教育，可以达到潜移默化的目的。因此只要仰承天命，体念皇恩，改善吏治，厉行教化，那么就将出现一个士人勤奋读经，农民努力耕田，而道德实现规范，风俗自动同一的盛况，这难道不是整饬吏治，讲求政术取得的实效吗？

制策又鉴于经学儒术首先要严辨真伪，而不可凭藉文字标榜以欺世盗名。臣下我恭敬地查检，孔子曾经说过："古人的学习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修养，今人的学习是为了讨好取悦于别人"。又告诫子夏说："你应该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理学的真伪之辨，实质上即本源于此。自从《宋史》将《道学》、《儒林》列为两传，世人谈论理学者往往假借诚意正心的学说，作为欺世盗名的工具。不知道理学的内涵包含有"体立"和"用行"的实学内容，有修养自身、治理民众的各种功用，凭此就能够做到居家为民则做一个良士，出仕为官则做一个良臣，可以卓然超群，扬名于当今而流芳于后世，这便是宋代濂洛关闽学派传授之所以没有中断分途的原因所在。天下偏偏有这样的道理，有阳不能无阴，有正未必无邪，所以真伪每每掺杂于其间。在绝不相干的事情之中辨别真伪，这容易做到；在似是而非的事情之中辨别真伪，这很难做到。鉴于圣贤的学问所凭借的唯独是"心"，"心"同则"理"没有不同，因此作伪者每每借真儒之名以实现其计功谋利的私心。他的手段愈巧妙，那他的伪诈的程度愈厉害。例如明末东林党诸人，后来变成了门户之见，变成了朋党之争，他们最初的时候也只是凭藉文字互相标榜，及至骗取了一定的虚名，就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行为伪诈而又顽固坚持，言辞伪诈而又强词夺理，弊端实在不可胜言。对儒学经术的真伪问题应严格加以辨别，甚至不惜施以刑罚，使他们不能并存于圣明之世，那么歧途既得到辨别而纯正的儒学不就可以更加彰明了吗？

制策又说:审案判罪者必须审慎把握宽严是否得当,保持情理与法律的公平,因而要预先防范执法者有意识地卖好或有意识地回避仇怨。臣下我听说礼教是防范犯罪形成于事实之前,刑罚是惩处犯罪形成于事实之后,所以刑罚是在礼教手段无法见效之后采取的辅助措施。自从虞舜时代通过申明刑罚来辅助教化之后,有关刑罚的理论获得了充分发展,其核心有两个,一是称作明察案情而执法公允,二是称作仁恕在心而慎重用刑,可见古代圣人的忠厚之意是如此的周到细密。然而宽严之间的把握,贵在力求保持审案的平允,而不置身其间心存私念。假如读法活动还没进行而审案结果的判决书已经预定,摇铃警众还没落实而刑具已经加身,这些本来就不是施行教化的方法。对于《周官》所记"八议"条文有关亲、故、贤、能可以特从宽典的内容,也需要在情理与法律之间根据具体情况慎重斟酌,而不可故意枉曲法律以向犯人卖好,有意识地枉曲法律以回避犯人的仇怨。所以古代圣人通过观察天象来阐述见解,他们对于刑罚也是或主张折狱致刑,或主张赦过宥罪,在宽严的掌握方面时常变通。如果审案者徇私枉法,那么在法律条文之间便会随心所欲,高下其手,把国家的法律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不过他们的为臣之心也就不问自知了。我们皇上天性好生,非常体恤民命。凡是受到充军流放以上的刑罚,一定要详细加以复审,和法律条文认真进行对照,即使是片言只语,也要条分缕析,找出越礼犯法的原因,区分轻重大小的界限。执法者如果都能秉公断案,那么无枉无纵,量刑准确,达到刑罚措而不用就很容易。

总而言之,使百姓获得安宁稳定,让天下走上平坦大道,像上面所对答的几个方面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谋划。臣下我感到:越是感谢苍天的庇护之德,那么越是希望苍天更高;越是承受大地容载之恩,那么越是希望大地更厚。臣下我衷心祝愿皇上更加坚定终日勤谨的热忱,越发深谋长治久安的计策;提倡高尚品德、体恤百姓疾苦的法律制度尤其要追求达到至精至善,可使官员整肃、能让风俗淳厚的政策谋划更应该不断提出并付诸实施。不因为儒学已经得到倡明而稍微松懈深入研讨的决心,不因为法纪已经完备而放弃追求公平

的信念。我们国家亿万年升平之世的美好前景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啊!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

汪学金　殿试对策

汪学金(1748~1805)　字敬箴,号杏江,晚号静厓,江苏镇洋人。室名井福堂、澹香书屋。乾隆四十六年(1781)探花。后历官侍读、文渊阁校理、日讲起居注官等,曾充江西乡试副考官,官至左庶子。著有《井福堂文集稿》10卷,《静厓诗初稿》12卷,《后稿》12卷,《续稿》6卷。编《娄东诗派》28卷。

臣对:臣闻天之德贞于恒,圣之功成于敬,帝王之道纯于一。粤稽古昔,勋华至治载在典谟,其时文思光被,府事修和,而钦崇奉若之意日慎一日。此所以与天协德,而圣功王道一以贯之者也。夫人君诞膺景祚,则必天工时亮,庶绩咸熙,然后由可大期于可久。是故时几兢业,内心也;协和於变,上理也。去邪勿疑,惟明克允,大中至正之极轨也。体诸身则至诚无息,措诸世则悠久无疆。以之赞化而位育成,以之敷政而训行协;以之辨学而人心无不正,以之弼教而邦典无不修。用能纲维道德,经纬天地,鸿名茂实,禔福中外。《洪范》言皇极之建,而征其用于敷锡庶民;《诗》咏"嘉乐君子",而究其原于保佑申明。惟以精明疆固之本,体迪之于纯常,举凡握枢基命,饬纪型方,与经正、民兴、明罚、敕法之切务,莫不执中广运,久道化成。盖一人裕钦明浚哲之原,而四海臻润泽丰美之效,理固然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备福基,治符心矩,法至健以乘乾,普太和而寿世,固已大化翔洽,庆泽广覃,洋洋乎帝者之上仪矣。乃万几无逸,兼听并观,复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体天行、端治化、祛伪学、迪祥刑之本。臣占毕庸愚,未能诠究理要,讲求政体。兹者仰承清问,抚衷悚悸,顾不敢昧于敷陈之义,谨就所知以对。

伏读制策有曰:爱民所以承天,勤政所以事天,而因求乎达民隐

而康庶事。此诚敬天诚民之大原也。臣谨按《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言人主之励精图治,当如天德之静专动直也,而即继之以一人首出,万国咸宁。明乎人主之容保小民,即天之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也,盖君德一天德也。天之行主乎健,惟法之以勤,而对越寅恭,凝承夙夜,一如天之日月运行,寒暑周流而无间。天之德首于元元者,仁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夫天心仁爱,怙冒万物,而风雨露雷之各顺其序,飞潜动植之咸遂其生。大君之爱民,亦若是而已矣。且天道无形,而民生有象。天子有代天子民之责,而怀保惠鲜,无一夫之不获;达聪明目,无一事之不周。所以宣上德而达下情者,祁寒暑雨之资,稼穑艰难之故,必曰念切民依也。所以儆庶官而无旷职者,功歌董劝之文,畴咨询考之法,必曰政在养民也。故百度惟贞则四方从欲,熙熙皞皞,物阜民康,闾阎之疾苦不壅于上闻,耕凿之优游几忘乎帝力。自古圣王所谓协于上下、以承天庥者,其揆一也。圣天子以聪明之时宪,为帱覆之生成,昭格精忱,天人合应,所成太治之隆而膺古稀之庆,岂寻常推验之理所能窥测于万一也哉!

制策又曰:吏治之澄清,为风俗淳漓所由判,而因求所以尚廉崇朴者。此官方民俗之本,所宜亟讲也。臣惟渐仁摩义,大圣人过化存神之用也。其慎简官僚,无非有为民师帅之意,故《周官》于"六计"善、能、敬、正、法、辨,必以廉为本者,诚以人臣分猷列采,必先洁己奉公,而后可以言宣力也。否则簠簋不饬,虽有理繁治剧之才,曷足尚哉!是以汉之六条察二千石,唐之四善二十七最,宋立审官、考课院,定磨勘之法。立制虽有异同,而大旨必归廉洁。夫正百官所以正万民也,风俗之不同,强弱阴阳,难归一致,要在因其俗以化导之耳。《周礼》大司徒之所辨,职方氏之所别说者,谓所感不同,故形类有异。《王制》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郑康成曰:"教谓礼义,政谓刑禁"。转移之用,不外是矣。我皇上澄叙官方,综核名实。大小臣工各宜感激奋兴,勤宣德意,吏饬廉隅,民还淳朴。猗欤盛哉!风同而道一也。

制策又以学术首严真伪,而深恶夫莠言乱政,变易是非,因思所

以正人心而端风教。臣惟三代以上人无异学，自公卿大夫以迄士庶莫不律身砥行，实践躬行，而不徒为标榜声华之用。故言伪而辨、行僻而坚者，为圣人所必诛。而邪说诐行，孟子辞而辟之，不遗余力。诚以学术之辨至微，苟窃其名，以乱其实，外托仁义道德之途，而阴济罔上行私之计，其为害于仁心风俗者至大，固不可不严为之防也。后世讲学之局开，而欺世盗名之流往往借以为号召。其始附和随声，依托门户，互相援行，及徒党既众，争相倾轧，恩仇报复，其弊不可胜言。如明之东林，视汉唐宋之党锢为害尤甚，可为炯戒者也。我朝纲纪肃清，士习醇谨，皇上屡颁谕诫，谆切开导，正心术于儒修，奉天言为彝训，庶几处为良士，出为良臣，无复范围，曲成之至意也乎！

制策又以明刑弼教，轻重视人自取，而必审宽严之当，持情法之平，以期无枉无纵。此民协于中之良法也。臣闻皋陶作士，五刑有服。《周官》大司寇建三典以刑邦国，古帝王兢兢于民，慎用刑辟，诚所以禁暴止邪，而纳天下于咸中之庆也。夫奸宄怙终，唐虞不免，故象刑钦恤，帝廷三致意焉。倘以市恩避怨之心，为邀誉沽名之计，岂朝廷法令刑章之体乎？《吕刑》五刑之属三千，汉世律令三百五十九章，厥后代有修明，至今大备。其折中画一，夫岂有畸轻畸重于其间？核罪以定刑，准情以定罪，刑之轻重悉视罪之所取以为衡而已。议狱者不可有高下在心之见，稍失其公平，尤不容以罪疑宥过之文，务存乎疏纵，则平允得矣。我皇上以至公至平之心矜慎庶狱，每当爰书入奏，必亲加披阅，详审再三。有折狱之责者，可不平法之是务哉！

凡此者：本敬若以宜民，昭董政以行俗。行同伦而饰诈无所容，法持平而姑息无所自。其大要在设诚以致行，其大原在主敬以作所。盖内圣外王之业，契於穆而纯亦不已者，用此道也。臣伏愿我皇上以惟日孜孜之盛心，懋昭事翼翼之大德，治功成矣而弥切巩虔，道化洽矣而益釐匡直。当正学昌明之会，而防伪不可不严；际嘉师率义之时，而简孚不可不慎。于以茂扬鸿业，溥畅祥和，益征我国家亿万年累洽重熙之庆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上天的厚德来源于持之以恒,圣人的伟功成就于真诚敬业,帝王的统治之道纯化于认真专一。稽考古事,可知远古的唐尧虞舜时期,天下太平达到了盛世,这些都记在了《尚书》的《尧典》、《皋陶谟》、《大禹谟》诸篇内,那时功业和道德光照天地人间,六府三事处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崇敬天道、恭奉天命的诚意却日慎一日。这便是他们之所以上膺天命、圣功王道持续不断、保持一贯的原因所在。君主们承受天命、继承皇位就必然要领导天下大事,各项事业顺遂之后便要进一步追求长治久安。所以说时刻保持庄重恭敬的态度,是内在心理素质的涵养;天下臣民和睦相处而亲如一家,是国家治理达到上等水平的表现。排斥邪恶而毫不犹豫,明察案件而处理公允,是纯粹中道和极其公正的最高法则。致力于修身养性则至诚之心永不停息,运用于治理社会则国祚悠久无疆;用它来辅助教化则天地安居其位而万物生长发育,用它来佐理政事则训导民俗能够获得协和;用它来辨别学术则人心没有不端正的,用它来辅佐礼教则国家典章制度没有不完备的。因此它能够端正纲常而维护道德,经天纬地而建立大功,盛名远扬而名副其实,中外安宁而幸福欢乐。《尚书·洪范》所说的君主要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法则,要将幸福一并赏赐给臣民,《诗经》所咏叹的"嘉乐君子",究其根源,都是要祈求上天降福赐禄和保佑安抚民众,任用贤臣,而要做到这些,只有以精诚和顽强的信念,去认真体察、施行天定的纲常伦理。所有握政中枢而膺受天命,整饬制度而训导民俗,以及经学纯正、选拔贤能、明察刑法、整饬法律的切实要务,没有不是执守中道而德泽广远,持久推行德治而天下教化形成的。这就是君主一人不断致力于恭谨节俭、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纯备的修养,而四海收到普承浩荡皇恩润泽的实效,道理本来就是如此。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道德完善,洪福齐天,稳握枢机,精加治理,师法天道而代天行政,国家太平而世人长寿,本来已经实现了天下大治,恩惠遍施,圣德巍巍已成为帝王们的最佳楷模。虽然政务繁忙,可是仍然不求安乐,认真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问题,又将

我们士人招进殿廷,策问有关代天治民、端正教化、罢黜伪学、审慎用刑的根本措施。臣下我极其愚昧无知，未能透彻了解事理，讲求政体。当此敬承垂询之际,内心非常惶恐惭愧。不过臣下我不敢违背作为臣子上奏陈述意见的义务,谨就自己所知内容对答如下。

跪拜敬读制策,制策认为爱民是为了上承天意,勤政是为了奉事上天,因而要求将民众疾苦的隐情上达朝廷,做好有关民生的各种事务使他们康乐,这真是尊崇上天、和谐民众的根本措施。臣下我恭敬地查检《易经·乾》的《象辞》,其中有言:"君子效法天道,因此而能做到自强不息"。说的是君主们追求励精图治,应当像上天具有的品德那样,品性的修养要宁静而专一,政务措施的实行要合理而坚决。这样才会接着出现帝王一人高居万民之上，而天下万国和平安宁的局面。要明白君主容育百姓、保护小民的义务,即如上天以丰美的财利造福天下人间，而并不炫耀自己的恩惠。君主的品德完全秉承于上天的品德,天的运行主要表现为刚健有力,只能以勤谨的态度效法天道,因而称扬天道必须恭敬庄重,处理政事必须日夜孜孜不倦,完全像自然界的太阳和月亮运行，天气的寒冷和暑热交替那样从不间断。上天的盛德首先施于民众的身上,这是仁爱的表现。君子体涵上天的仁爱之心,就足以统治民众。上天的性情慈善仁爱,包容爱护万物,因而自然界的风雨露雷都按照自身的规律自动运行,飞翔的动物和静止的植物都按照各自的本性进行生存。君主的爱民，也应该像这样才对。再说天道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而民生是具体存在的现实,天子既然有了代表上天养育民众的职责，因而就有义务关心民众疾苦并向包括无依无靠孤老在内的民众施以恩惠，不使一个人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听力灵敏而目光锐利,不使一件事情办得不周到。之所以要传布上德而通达下情，要求时刻思虑民众夏天暑热大雨和冬天凛冽严寒时的愁怨,时刻想到民众终日耕作整天辛劳的艰难,都是为了说明一定要深切体念民众的疾苦。之所以要告诫百官忠于职守而不渎职,有关用威罚进行监督、用诗歌进行勉励的记载,有关选拔官吏考核政绩的方法，都是为了说明施政的目的在于抚养民众。因此百事顺遂则四方从欲,天下和乐,物阜民康,民众疾苦上闻的渠道就

不会被阻塞，耕田凿井的悠闲就会几乎忘记了帝王的存在。自古以来圣王们都说，通过和谐上下来承受天命洪福，他们遵循的准则是相同的。圣明的天子您以圣主善于效法天道聪明公正的精神作为统治天下、庇护生灵的本原，事天之心达到了至诚纯一，天与人实现了和谐共存，形成了天下大治的盛世，目前又喜逢陛下的七十古稀之庆，这岂是寻常推理所能窥测，哪怕仅仅是万分之一呢？

制策又说：吏治的好坏要根据风俗是否淳厚来判断，因而要求采取崇尚廉洁和淳朴的措施。这是官员理政和化导民俗的根本，应该积极加以研究。臣下我认为，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是大圣人传播仁义倡导教化的主要方法。慎重选拔官员，本意无非是为了让他们统治民众，所以《周礼·天官·小宰》对"六计"的善、能、敬、正、法、辨这六条内容，一定要以廉洁作为根本的要求。这确实在于：作为人臣，当他为国分忧、担负起官员的责任时，必须首先是要求洁己奉公，而后才谈得上贡献力量。否则为官不廉洁，纵使有管理各种繁重事务、处理各种复杂局面的才能，那又何足称道！所以汉代规定以"六条"考察二千石官员，唐代制定有"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核制度，宋代设立了审官院和考课院，制定了磨勘之法。所立制度虽有异同，而主旨必定都是围绕廉洁这一核心。端正百官是为了端正万民，风俗存在不同是一种正常现象，或有强弱之别，或有阴阳之差，很难做到完全一致，关键在于要因俗而利导。《周礼》的大司徒有对各地风俗的辨别，职方氏则另有别说，这是强调风土感染不同，所以民众的类属产生了差异。《礼记·王制》说："广阔的谷地和宽大的河川有不同的建制，民众生活于其间有着不同的风俗，刚柔、轻重、迟速的性情有异，饮食口味不一，器具制作有别，整顿他们的教化而不改变他们的习俗，统一他们的政务而不改变他们的便利。"郑康成说："教化是指采用礼义的手段，政务是指刑罚禁令。"化导风俗的方法，不外乎这两种形式。我们皇上整顿吏治，综核名实。大小官员各应感激振奋，勤宣圣意，官吏做到品行端正，民风做到返朴归淳。我们国家道德归一、四海同风的太平景象，真是盛况空前啊！

制策又鉴于儒学经术首先要求严辨真伪，对于以谬论干扰政务、

混淆是非的做法深恶痛绝，因而要求考虑正人心和风教的措施。臣下我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前不存在异端学说，自公卿大夫到士庶百姓没有不是严格自律，身体力行，而不光是为了标榜虚浮的声名。所以内心伪诈而能言善辩，行为怪僻而顽固不化者，必然遭到圣人的诛伐。对于异端邪说和乖僻行为，孟子就予以了强烈的批判并且不遗余力。说到底，儒学经术的研究至精至微，如果窃取虚名以乱其实，表面上假托仁义道德的招牌，而暗中实施罔上行私的计谋，那么它对于人心风俗的祸害就极其严重，切切不可不为之严防。后世形成了讲学的风气，而欺世盗名之流往往借用这种形式攫取名声。这些人开始时随声附和，依托门户，互为声援，及至徒众增加，形成了势力，就互相倾轧，党同伐异，或是报恩，或是复仇，弊端不可胜言。例如明末的东林党，较之汉唐宋三代的党争为害尤烈，这可以作为最突出的鉴戒。我朝制度完备，纲纪严明，士人的风气纯正恭谨，皇上屡次颁发告诫，谆谆给以开导；通过提倡纯正的儒学来端正人们的心术，恭敬地遵奉天意做为规范人们言行的明训，士人差不多都做到了居家为民则做一个良士，出仕为官则做一个良臣，不再有帮派区分，这不正是皇上设法成就士人的最深用意吗？

制策又说申明刑罚是为了辅助礼教，判刑轻重取决于自身触犯刑律的程度，因而要求必须审慎对待宽严是否得当，在情理与法律之间保持公平，以期达到既没有冤枉也没有纵容。这是保证民众和谐社会安定的最佳方法。臣下我听说皋陶担任法官时，使用了墨、宫等五刑。《周礼·大司寇》称当时以轻、中、重三类刑法治理国家，古代帝王兢兢业业，勤政爱民，慎用刑罚，确实是把它用来禁止暴力和邪恶，使天下民众都能享受到量刑准确所带来的执法平允。有奸人犯法作恶，即使在唐尧虞舜时期也不能避免，所以才有了古书所记载的“象刑慎用，朝廷再三考虑”的说法。倘若把枉法曲意向犯人卖好或有意识地曲法回避犯人的怨恨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这哪里与朝廷法令刑章的主旨相合呢？《尚书·吕刑》说五刑的条文合在一起有三千，汉代的律令有三百五十九章，此后历代都有修订增补，至今已经非常完备、这些法令都已规范划一，岂能允许执行起来畸轻畸重呢？

根据犯罪程度确定刑罚,按照犯罪事实确定罪名,刑罚的轻重完全视其罪行的程度来衡量确定。审判者切不可有高下在心的私见而稍微偏离一点点执法公平，尤其不能容许因为有罪案不清可以给予宽恕的条文而一味给以纵容，这样就会做到公平无失了。我们皇上本着极其公平的心愿关注着刑狱的执法，每当刑案入奏，必定亲自披阅，详细审阅再三。担负执法之责的审判官们，你们能不务求执法公平吗?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崇敬上天是为了更好地治理民众,整顿吏治是为了有效地纯化风俗。品行纳入了规范则饰诈虚伪就无所容身，执法达到了公平则姑息养奸就无从发生。这些措施的关键在于平时生活中要提倡诚实敦行的风气，根源在于日常政务中要保持庄重恭敬的态度。内圣外王的事业之所以符合皇天深远壮美而圣人纯一永无止境这一精神，就是因为采用的这种方法。臣下我衷心祝愿皇上永怀孜孜不倦勤政的热忱,长保勤谨服事上帝的盛德,治理国家的目标已经达到了而更加勤奋理政，良好的教化已经形成了而越发注意匡正扶直。当此儒学光大昌明之际，而防止伪学滋生蔓延的措施不可不进一步严格;值此善良民众普遍安定之时,而施政务求实效的态度不可不更加慎重小心。用来弘扬拓展宏伟的基业，深化营造浓郁的祥和气氛，越发显现出我们国家亿万年累代升平的兴旺景象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

〔孙继民译〕

清高宗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

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

殿试策问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奉丕基,仰荷昊绎纯佑,史谨民淳,咸知顺则。比者展义行庆,河海奠安,五世一堂,欣被景贶。用是弥深乾惕,式懋凝承,劼毖宵旰,不敢自康,逾廑崇实学,昭雅化,敦善俗,裕民天,虽略臻康乂而犹日孜孜,上期淳懿,周谘博稽,以裨集思广益之治。尔多士其敬听予询:

夫致用在乎通经。士自束发授书,思探奥旨,先考颐文,宋儒谓有举其辞而不能通其义者矣,未有通其义而不能举其辞者也。简策异同,微言实关大义;诸经互引,厥有殊辞。唐人刻石犹存,或间与今判。郭氏之《易举正》,王氏之《诗考》,杂胪歧出;《礼》之《大学》,《书》之《武成》,考定纷如;《春秋》经文,《三传》间别。诵习有素,其能赅louan而条系欤?

辟雍之制,古者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也。或谓殷无辟雍,信欤?有文王之辟雍,有武王之辟雍,于《经》何据?"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或解以为四学,师氏守东、南,保氏守西、北,义相通欤?辟雍之名,或取字义,或取地形,有达诂欤?灵台、明堂、清庙、太室,异名同地,说可订欤?三老、五更,养于太学,老、更何义?各一人或三、五人欤?今方茂举旧典,考古证今,能通贯其制欤?

三王不易民而治，然淳朴日开，奢俭相矫，中天盛世，已非复狉獉旧俗矣。虽风会所关，在上者宜引为己责，将何以善所导欤？《王制》谓："无旷土，无游民"，而《周礼》则有："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无乃异治欤？千亩嘉禾，不无稂莠，或以邪教鼓愚，或以告讦罔利，岂民尚未能迁善欤？抑亲民者化之未浃欤？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顾俭非貌取。雕文纂组，或资其业以养生；浣衣狐裘，或矫其行以希世。将何以撙节而务实欤？

积贮者生民之大命，常平、社仓，今久行之，毋庸缕述古制矣。顾贮则有浥烂之虞，出则有挪移之蠹。方其补也，市价或因采而昂；及其发也，奸胥或冒民以领。甚或仓非实储，户或俵籴，将欲杜弊端而经理得宜，何道之从？朕念切民依，截漕平粜，动不惜费，计期周溥。果黎氓实被其泽，而吏无中饱，商无囤积欤？

尔多士横经就塾，鼓箧圜桥，服我教泽，将以学古入官，讲求民生。风俗之原，养恬之效，固仕学所均宜有事也。毋泛毋隐，具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清楚至善所在，然后心志具有定向；心具有定向，然后能够心不妄动；心不妄动，然后能够所处而安；所处而安，然后能够处事精详；处事精详，然后能够获得到所当止之地。

不预先怀疑别人的欺诈，也不无根据地猜测别人的不诚实，但也能及早地觉察出来。

我给他按规矩驾车奔驰，一整天打不到一只鸟；我给他不按规矩驾车奔驰，一个早晨就打到了十只鸟。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自从继承皇位以来，上仰苍天保佑，官吏

勤谨，民众淳朴，人人知道守法，个个自觉顺从。近些时候，所有的举动都合乎时宜，所有的举动都取得成功，黄河没有出现决口，大海没有造成灾害，汇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五代于一堂，到处充满着天降的祥瑞，到处沐浴着上天的赐福。然而皇帝我不仅没有自我陶醉，反而更加谨慎小心，恭承天命而兢兢业业，宵衣旰食而不敢贪图安逸，越发勤奋地尊崇实学，大力地宣扬教化，积极地鼓励善俗，多方面充裕民生，虽然初步实现了物阜民康，而依然是终日孜孜不倦，追求实现更高程度的淳朴和完美，因此广泛咨访意见，周密考查政情，以期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你们诸位士人请听皇帝我提出如下问题：

致力于实践在于要通晓经典。士人们自童年起读书，就知道探究深奥的道理，须先考察高深的文献。宋代的儒生说过，有能表达一定的辞语而不能通晓其含义的，没有能通晓其含义而不能表达辞语的；经典的文字有不同，而精微之言实在关系到大道理；诸种经典辗转引用，于是产生了不同的文辞。唐人所刻石经今天依然存在，但其中有些文字与今天的版本已经有别。郭氏的《易举正》，王氏的《诗考》，内容杂列，文字歧异；《礼记》的《大学》，《尚书》的《武成》，有关的考订纷繁复杂；《春秋》的经文，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也间或存在着不同之处。你们各自诵习有素，能给予高度概括和条分缕析吗？

辟雍的制度，就是古人所说的建立国家、君临臣民诸政中居于优先地位的教学育人的制度。有人说商朝没有辟雍，这种说法可信吗？有周文王的辟雍，有周武王的辟雍，这在经典之中有什么根据呢？“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有的人解释为四所学校，这与“师氏执掌东、南，保氏执掌西、北”的含义相通吗？辟雍的名称，有的人根据字义来解释，有的人根据地形来解释，有确切可信的解释吗？灵台、明堂、清庙、太室，有的说是异名同地，此说可以订正吗？三老、五更，养于太学，“老”、“更”的含义是什么？二者各是一人，还是分别为三人、五人呢？现在正要求广征博引，考古证今，你们能将这些问题贯通起来回答吗？

夏商周三王时期，民众没有改换而天下实现大治，然而淳朴的民俗日益变化，奢侈的风气与俭朴的风气互相影响，如日中天的盛世，早已不是茹毛饮血时代的旧俗。虽然这属于民俗和风气的问题，但居

于上位者应该承担起自己责任,应该采取什么方法给以妥善的引导呢?《礼记·王制》说,"不要有旷荒的土地,不要有游离的百姓",而《周礼·天官·大宰》则说,"闲民没有常业,流动被人雇佣",莫非是处理的方法有什么不同?俗话说,"千亩良田,难免杂草",有的人用旁门左道煽动愚民,有的人以搬弄是非谋取私利,是百姓们还没有主动向往善良呢?还是亲民官们治理措施不力呢?由俭朴变为奢侈容易,由奢侈变为俭朴困难,但是否俭朴不能仅仅根据表面判断,从事雕刻,编织锦缎,有的人是凭借它来维持生计;浆洗衣服,身着旧皮装,有的人是掩盖真情欺骗世人。将如何处理使之符合事实呢?

粮食的积储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常平仓、社仓制度,已经施行很久了,你们不用历述古制了。不过储存粮食则有霉烂的忧患,出库入库则会产生挪移的弊端。当采购粮食补充库存时,市场价格会因采购而上涨;当救济发放粮食时,有的奸胥就冒充灾民领取。甚至有的是帐面虚存而实际无粮,有的是按户摊派,用以顶替库粮。要想杜绝这些弊端而使管理得宜,从何处着手呢?皇帝我深切体念民众的疾苦,又是截取漕米,又是平价供粮,不惜工本,务求周到。果真能使黎民得到实惠,而官吏没有中饱私囊,商人没有囤积居奇吗?

诸位士人初入家塾习经多年,又进官学、太学继续深造,一直沐浴着皇恩的教泽,现在又将凭着优异的学业做官,投入到讲求民生的实践。而考查风俗的原本,讲究治理的方法,本来也是做官和求学均应掌握的内容。你们不要泛泛而论,不要故意隐瞒,全部写进文章,皇帝我将要亲自阅览。

茹棻　殿试对策

茹棻(?~1821)　字稚葵,号古香,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状元。后历官奉天府丞、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等,曾充山东正考官、江南正考官。撰有使兖、使晋、使楚、使南、使沈等诗草。

臣对:臣闻经学光昌,人材蔼吉,野被淳风,仓归实贮,将必以至健者法天,运精神于不息;以用中者立极,播化育于无疆。是以敦崇实学而道接心传,鼓舞贤才而制期首善,行三代之直而户尽可封,乐万宝之成而民登至足。《书》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又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古昔帝王所以横经讲艺,侧席求贤,易俗移风,耕三余九,驯至天人协应,纯嘏聿臻,仁恩汪涉,惠泽覃敷。于是清和咸理,郁郁彬彬,道德一而风俗同,群生育而百昌遂,有由然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符广运,治协时雍,固已学贯三才,教崇四术,恬熙永庆,丰乐同休,乃犹宵衣存若谷之怀,临驭凛如伤之念,睿虑周详,谘诹弥切。复以通经、吁俊、厚俗、重农之要,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至愚极陋,譬微尘涓滴,奚裨山海?顾自献者人臣之义,兹当对扬伊始,敢不就平日所诵习者以对!

伏读制策有曰:简策异同,微言实关大义,诸经互引,厥有殊辞,而因期于檃括而条系。此诚表章经训之盛心也。臣谨案诸经,自汉初至今,由科斗而篆而隶而楷,字凡数易,诚不免乌焉亥豕之讹。况汉初经师分教弟子,各有专门,则其间语音之不合,授受之不同。延及唐宋,其义纷如。《易》则言理,与言数异;《诗》则齐、鲁、韩,与毛氏异;《礼》则大、小戴之说又异;《书》则今文、古文异;《春秋》则《三传》异。此固不可强同者。至石经之与雕板,则自汉之三体石经以来,唐人刻石幸而仅存,纵有间见错出,亦足以备参考而广异闻。我皇上尊经重道,于诸经莫不考订详明,颁示遐迩,俾士人得以家有一编,朝吟夕讽,岂非同文之极盛也耶!

制策又以辟雍之制,古者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茂举巨典,期于考古证今。此尤文教昌明之会也。夫辟雍之立,取于圜水,以节观者。诸侯半之,则为泮宫。案《诗》,辟雍凡两见,说者遂分指为文王之辟雍与武王之辟雍。要之辟雍之名,始见于成周,亦犹皋门冢土,周有天下,遂以为一代之号。至南学、北学、东学、西学之称,见于汉说,亦不为无据。第古人之立辟雍也,以祭则为庙,以朝则明堂,以教则为学,而灵台亦在其中焉。固不仅地形、字义之殊已也。三老、五更,古有祝哽祝噎之文,执爵执酱之仪,而因有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之说。然名

为三、五，而累代举行，仅止一人。则三、五之说，固不攻而自破矣。圣天子集金声玉振之大成，特建辟雍，行见四方观礼，喁喁向风，而文治益以蒸蒸日上已。

制策又以三王不易民而治，中天盛世，风会日开，在上者宜引为己责。此又整齐习俗之隆轨也。夫太古之世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于是三代相承，颛蒙日远，斯固元会运世之一大关键也。圣朝累洽重熙，太平未有如此其久也，幅员未有如此其广也，生齿未有如此其繁也，必斤斤焉绳以尺寸，使一返而为朴陋之风，势固有所不能。甚者如毛玠所以为政，世转以敝车羸马相高，诚有如张敞所讥。假令当世民皆让畔，道不拾遗，究亦无益于治。是唯在为大吏者正己率下，而亲民之官复有以化导之，俾冠昏祭祀之礼秩然，一轨于正，庶于古者理大物博之旨始有合耳。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将欲杜弊端而经理得宜，何道之从。此尤充裕民食之要图也。《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周礼》有遗人、廪人之掌，而荒政十有二，且掌之大司徒。良以水旱之灾，圣世不免，不可不为未雨绸缪之计。就令八蜡顺成，而补助之政亦所不废，此常平、社仓之所由设也。然天下立一法，即有一弊行乎其间，如官吏之侵渔，胥役之中饱，驵侩之居奇，反乘民之急以邀利，而谷贵谷贱之伤尚不论也。要之，有治人，无治法。立法以防弊，而法有所穷；用人以行法，而法以持久。我皇上勤恤民隐，轮免天下钱粮以亿万计。而一隅偏灾，截漕平粜，有加无已。百万生灵咸获登仁寿之域，无不沦肌浃髓，歌咏太平。承流宣化者，宜何如振兴洗刷，以清宿弊也乎？

凡此者：学古训而至德懋昭，念典学而文思光被，普润泽而大丰美，歌大有而乐盈宁，皆圣功王道之要也。臣伏愿皇上精益求精，治益求治，宗往典而单心宥密，定成规以广厉学官，锄稂莠而化臻上理，实仓廪而效奏屡丰。斯国家亿万年有道之基，在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经学儒术发扬光大，人材济济野无遗贤，民俗良善淳风蔚然，农业丰收仓廪充盈，就必然要求君主们效法

天道，聚精会神而永不停息；以中正之道作为最高法则，化育万物而无止限。因此通过提倡实学而使道统精神相传，奖励贤才而追求成为典范，实行三代的朴直而使户户可以封爵，接受自然万物的惠赐而使百姓丰登富足。《尚书·皋陶谟》说："努力奉行上天的旨意，时时刻刻小心谨慎。"《尚书·说命》又说："上天聪明公正，圣主善于效法天道。"古代帝王就是凭借提倡经学，虚心求贤，易俗移风，广泛储粮，逐渐达到了天人和谐，洪福降临，仁恩深厚，惠泽广布。于是天下清静和平，生机盎然；道德整齐而风俗相同，民众安乐而百业昌盛。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德符天道，泽及广远，治国太平，应天顺人，本来已经是学问贯通天、地、人三才，治国奉行忠爱、无私、用贤、简能四术；国家持续繁荣，百姓普遍安乐，而仍然宵衣旰食虚怀若谷，临御天下而视百姓如受伤者不敢惊动；理政虽已缜密周详，而咨访得失的心情愈益恳切。又针对精通经学、选拔贤才、纯正风俗、重视农本的核心问题，将我们士人招进殿廷亲自策问。臣下我极其愚昧无知，譬如是微尘和滴水，哪能有补于高山和大海？不过陈述己见是作臣民的义务，值此当面回答皇上垂询之际，哪敢不就平日诵习的内容对答皇上的策问呢！

跪拜敬读制策，制策认为经典文字有异同，而精微之言实在关系到大道理，各种经典辗转引用，于是产生了不同文辞，因而期望给以整体概括和条分缕析。这确是表达了发扬光大经学的强烈愿望。臣下我谨慎地考察过诸种经典，从汉代初年到现在，由科斗文而变为篆体，又变而为隶体，又变而为楷体，字体总共经历了数次变化，确实不免发生"乌"与"焉"、"亥"与"豕"之类的讹误。何况汉初经学大师们都是分别教授弟子，学问各有专门所长，其间于是便出现了语音的不合，授受的不同；延及唐宋时期，歧义更是纷繁复杂，《易经》方面则有研究义理与研究数术的不同；《诗经》方面则有《齐诗》、《鲁诗》、《韩诗》与《毛氏诗》的不同；《礼记》方面则《大戴礼》、《小戴礼》之说又有不同；《尚书》方面则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的不同；《春秋》方面则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不同。这些本来也是不必强

求一律的。至于石经与雕板文字方面，自从汉代刻写三体石经以后，幸运的是唐人所刻写的石经还存在，纵然其中还不断有些错讹，但也足以备作参考和扩大异闻之用。我们皇上尊崇经学，重视儒道，对诸种经典无不考订详明，颁示远近，使士人得以家备一套，朝吟夕诵，这难道不是天下同文的极盛之事吗？

制策又鉴于辟雍制是古人所说的建立国家，君临臣民，教学育人居于优先地位的关键，因而要求广征博引，考古证今。这尤其是文化昌明的集中体现。辟雍的设立，取意于它被水面四周环绕如同玉璧一般，作用是用来限制游观者。诸侯的学校是半月形的水池，因此称为泮宫。查检《诗经》一书，辟雍一词总共出现两次，论者于是认为分别是指周文王的辟雍与周武王的辟雍。要而言之，辟雍的名称始见于成周时期，犹如当时所建的皋门冢土。周朝获得天下以后，遂将它作为一代太学的称号。至于南学、北学、东学、西学的称谓，见于汉人的说法，也不算没有根据。不过古人设立的辟雍，用以祭祀则称为庙，用以朝会则称为明堂，用以教育则称为学校，并且灵台也处于其中。原本不只是地形和字义的差异。关于三老、五更，古代即有祝愿老人免去哽噎的文字记载，和为老人端酒端饭的礼仪，因而就有了像对待父亲一样服侍三老，像对待兄长一样服侍五更的说法。然而字面上虽说是“三”、“五”，而历代的设置却只有一人。那么所谓三、五人之类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圣明的天子汇集德行兼备、才学精妙的学子，专门为他们建立辟雍，可以预料即将出现一个天下竞相效仿礼义，众人向慕教化，而文治更加蒸蒸日上的局面。

制策又鉴于夏商周三王时期民众未有改换而天下得到大治，而如今太平盛世，风气却逐渐发生变化，居于上位者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又是整齐习俗的重要措施。远古的时候，虽是结绳记事而天下太平，后世圣人以文字书写取代结绳记事，于是夏商周三代顺序相承，逐渐脱离愚昧，这真是原始风气发展变化的一大关键所在。我朝累世升平，持续昌盛，太平时光未有如此长久的，国土幅员未有如此广大的，人口增加未有如此众多的。如果一定要斤斤计较，点滴纠正，使风俗完全返归朴陋的状态，那种情势也本来就不可能。假如更有甚

者像毛玠那样理政，世风转而以破车瘦马相推尚，那就怪不得招来象张敞一类的批评。假如当今百姓都是互让田产，都是路不拾遗，说到底对社会发展并无什么益处。要想整顿风俗，唯有让位居高官者端正自身，率先垂范，再加上亲民官不断给以化导，使成人加冠、男女婚姻、祖先祭祀的礼仪依例进行，秩序井然，并全部纳入规范，如此方能与古人理大物博的旨趣差不多相合。

制策又鉴于粮食的积储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将要杜绝弊端而使管理得宜，垂询从何处着手？这尤其是充实丰富百姓粮食的重要谋划。《礼记·王制》规定以三十年为单位安排国家财政，《周礼》记载有遗人、廪人关于粮储的职掌，归纳救荒之政有十二项内容，由大司徒执掌。实事求是地说，水旱之类的灾害，即使圣明之世也不能避免，不可不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即使八蜡的祈祷顺遂如愿，而预防补备的救荒措施也不能因此废弃，这便是常平仓、社仓设立的缘由。然而天下订立一法即有一弊相应伴生，例如官吏的侵渔，胥役的中饱，商人的囤积居奇，他们不仅不救急，反而乘民之急从中取利。至于粮价涨落所造成的损害尚且不论。总之，有“治人”而没有“治法”，订立法令以防止弊端，但法令的制定终有尽头；任用贤人以执行法令，那么法令就可能维持持久。我们皇上时刻关心百姓疾苦，接二连三豁免的天下钱粮累计起来有亿万之多。一地遭灾，又是截取漕米，又是平价供粮，赈灾的措施有加无减。百万生灵因此而有幸乐享长寿，他们无不感恩戴德，歌颂太平。承奉圣恩宣扬教化的官吏们，应该怎样振奋自己，以洗刷、清除宿弊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学习古代经典可使品德高尚，好学上进可使德才兼备，普施皇恩而恢宏丰美，歌颂丰收而乐享太平，这些都是建立圣功王道的关键。臣下我衷心祝愿皇上精善了更求精善，升平了更求升平，宗尚经典而恭奉天命，制定规划以广建学官，除去恶俗而教化更上一层，充实粮仓而农业屡奏丰收。我们国家亿万年有道之基全在此啊！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

邵瑛　殿试对策

邵瑛(生卒年不详)　字瑶圃,号桐南,浙江余姚人。室名桂隐书屋。乾隆四十九年(1747)榜眼。后由翰林院编修改任内阁中书,曾充湖北乡试副考官。通经学,著有《刘炫规杜持平》6卷、《说文解字群经正字》28卷。

臣对:臣闻帝王师古以建事,立学以明伦,一道德以同风,广贮蓄以利用。盖必有昭事凝承之本,明物察伦之学。斯古训是式,而经术明焉;敬典在德,而彝教兴焉;是匡是敕,而民俗成焉;余三余九,而国用足焉。《书》曰:"以昭受上帝"。言人主钦崇天道,而后奄庸熙载,罔不勤也。《易》曰:"知临,大君之宜"。言人主知周万物,而后尊经崇古,正民育物,无不当也。故其时正学昌明,兆民亲逊,俗习醇美,家用平康,上有钦明文思之盛,而下有亲贤乐利之休,斯道得焉耳。

钦惟皇帝陛下,阐经史之精微,广胶庠以劝学,慎奢俭之风会,修府事以阜生。固已心法昭而化道成,淳风畅而民生厚矣。乃圣怀冲挹,益深保泰持盈之念,弥切思艰图易之猷,进臣等于廷,而策以传经之法,兴教之规,化俗之方,养民之本。臣之庸愚,何足知此?窃念拜献先资之义,敷奏以言之法,敬承清问,敢不述所闻,诵所学,以效管窥蠡测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致用在乎通经,思探奥旨,先考颐文。此诚读书穷理之要务也。臣闻《荀子·劝学篇》曰:"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故读书之道,必熟读而后可深思。有举其词而不能通其义者矣,未有通其义而不能举其词者也。然熟读亦非徒举其词之谓,必比字栉句,究其异同,庶于大义微言,学有实得。如汉鸿都石经,其残字见于洪氏《隶释》。唐国子学石经,刘昫讥其有乖师法。然如《易》"他吉"作"它",《诗》"屡丰"作"娄尔",《雅》燕、白颈鸟、鸢鸟、丑鸟作乌,杨鸟、白鹭作鹜。实足校正俗本之流失,今文之谬讹。郭京《易举正》、《困学纪闻》、《六经奥论》尝条举其词,谓实有胜于今本者。王应麟

《诗考》，析齐、鲁、韩三家之互异，更益以《说文》、《汉书》、《文选注》、《楚辞》王逸《注》诸书所引，虽尚不能无遗，亦足为穷经之助。《春秋》经文，《三传》互异，大抵缘声同传误，亦或古字假借通用。古书此类多矣。若夫《礼》之《大学》，自程朱以下多更定；《书》之《武成》，自二孔注疏即疑之，所更当考订而定一尊者也。

制策又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因举辟雍之制，老、更之义，以究其指归。臣以为辟雍之制，自殷肪也，义见于郑康成《王制注》，崔灵恩《三礼义宗》主之，盖不爽也。灵台辟雍，文王之学。镐京辟雍，武王之学。《经》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正见周立五学，辟雍居中。武王至辟雍讲学行礼，而成均、上庠、瞽宗、东序四学之士咸来观礼，故有是言。则所谓"师氏守东、南，保氏守西、北"，不为无见也。《王制》郑注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此以义言者也。灵台《诗传》曰："水旋邱如璧，以节观者"。此以形言者也。因字求象，证以《说文》"泮宫为半水"，当以形言者为近是。至于灵台、明堂、清庙、太室，异名同地之说，孔颖达《诗疏》引袁准《正论》辨之详矣。老谓寿考，更谓更历。《礼》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学"。三公非一人，则老、更亦非一人明矣。但不必拘定三、五，如三公之不必备，惟其人可耳。蔡邕《章句》必以为三、五人，《白虎通德论》、应劭《汉官仪》必以为一人，非通论也。圣天子寿考作人，化成久道，复以京师为首善之区，酌古宜今，创建辟雍，鼓钟於乐，岂不盛哉！

制策又以民俗淳朴日开，奢俭相矫，欲为之善所导。臣以为风俗之自淳而日漓，自朴而日华，理势之所不得不然也。土阶茅茨之世，断不同礼明乐备之朝，而尚忠贵质之民，必有异于尊礼尚施之俗。此固气化之日开，人情之日巧，圣人与时宜之，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也"。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亦言其弊则然耳。董仲舒曰："俭非中制，圣人亦何尝偏尚俭哉！务节其流，不使之荡闲逾检而已矣"。天下之有闲民，亦理势之所不得不然。《周礼》太宰职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周公所以处之化之也。《王制》曰："无游民"。亦处之得其宜，化之得其道耳。岂有异治哉！

制策又曰：积贮者生民之大命，将何道而使黎民实被其泽，而吏

无中饱,商无囤积。此又轸念民依之至意也。臣闻之宋臣苏轼曰:"任法不如任人"。又曰:"有治人,无治法"。常平、社仓,昔人行之或享其利,后世行之或滋其弊,非法之不善,任之不得其人也。历观前代所行,其得也,大抵董于良有司,而分其责于乡里之老成;其失也,大抵侵渔于里胥书吏,而富商豪猾相倚为私。故无论常平、社仓,而或则册籍抵易而廪粟那移,或则出多扣克而人必需索,无一可者。圣天子爱养黎元,勤求备储,直省州县量地之广狭,以定常平之额,而义仓、社仓之输自民间者,亦令官为经理,可谓法良意美矣。为大吏者,可不恪恭清慎,以共襄豫大丰亨之治也乎?

若此者:法《八索》而郛《五经》,文治所以日隆也;崇四术而修六礼,声教所以四讫也。风化行而无思不服,宇内有击壤之休;仓廪实而疋匡以生,比户征鼓腹之庆。上溯唐虞,远稽三代,其道又孰有外于此?抑臣又闻《春秋》之义,圣人以天自处,於穆不已者,天之命也;纯亦不已者,圣之德也。惟其不已,是以日新,休烈垂诸无穷,鸿猷畅于奕祀。伏愿我皇上,本敬天承命之心,勖勤民体物之义。经义纷纶,而终始典学之衷,益勘毖于宥密;庶民敷锡,而《诗》、《书》造士之念,尤怵厉于神明。不以民风丕变,而稍弛乐和礼节之防维;不以国用既充,而不修太宰少府之法式。将见中正观化,一天之高明覆物也;安贞应吉,一地之博厚载物也。万物厌德,万世永赖,一天地之悠久无疆也。国家仪载咸宁之庆,基于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应师法古人以建立功业,建立学校以明辨伦理,规范道德以统一风俗,广贮粮食以改善供给。必须以勤勉服事上帝恭奉天命作为立身的根本,必须具备通晓事物明察伦理的学问。坚持不懈地遵循古训,经学儒术就能精通熟谙;虔诚恭谨地尊奉经典,伦理教化就会蔚然成风;又是匡正又是惩治,良好的民俗于是形成;实行三年、九年的粮食储备制度,国家财政因此富足。《尚书·皋陶谟》说:"要等待接受上帝的命令。"说的是君主崇敬天道,然后才能发扬光大功业,这种因果无不应验。《易经》说:"以智临御天

下,这是君主应当掌握的本领。"说的是君主周知万物,然后才能尊经崇古,教育民众,抚育万物,这种能力无不胜任。所以那个时候:儒学纯正昌明,民众亲睦廉逊,风俗习尚淳美,家庭生活小康,上有功业彪炳道德纯备的昌盛,下有奖掖人才安居乐业的丰宁,这是统治方法精熟得当的体现。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阐释经典、历史达到了至精至微,广设学校以鼓励求学,抑制奢侈以端正风气,修明六府三事以康阜民生。本来已经是心法昭明而教化形成,淳俗充溢而百姓富裕。可是陛下您谦虚自抑,保持国泰民安的念头越发强烈,思虑国家治理的谋划更加急切,将我们招进殿廷,策问有关传授经学的方法,兴盛教化的规划,引导风俗的手段,抚育百姓的根本。臣下我庸碌愚昧,哪里知道如此道理?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和进廷面君陈奏意见的惯例,敬承陛下垂询,怎敢不叙述所闻所学,以表达自己的一孔之见呢!

跪拜敬读制策,制策认为致力于实践在于要通晓经典,探究深奥的道理,须先考察高深的文献。这的确是读书明理的主要任务。臣下我听说《荀子·劝学篇》说过:"用反复诵读把所学的东西贯穿起来记忆,用深入思考把所学的东西贯通起来理解。"所以读书的方法,必须是首先熟读然后再深思。或者有能够表达词汇却不能通晓该词汇含义的,但从来没有能够通晓词汇含义而不能表达词汇的。然而熟读也并非是说只知道纸面文字即可,必须逐字逐句理解,深究其中的异同,这样差不多才能对深奥的道理学有所得。例如汉朝皇宫的石经,其残存的文字见于宋朝洪适的《隶释》。对唐朝国子学的石经,刘昫批评它有违师法。然而像《易经》的"他吉"写作"它",《诗经》的"屡丰"写作"娄尔",《尔雅·鸟》的燕、白鹭鸟、鸢鸟、丑鸟的"鸟"写作"乌",杨鸟、白鹭写作"鹭"。实在足以校正流行本的失误,今文经的谬讹。唐朝郭京《易举正》、宋朝王应麟《困学纪闻》、《六经奥论》等书,曾经逐条举出例证,认为它确实有优于当时版本的地方。王应麟《诗考》一书,分析了《齐诗》、《鲁诗》、《韩诗》三家的异同,又增加了《说文解字》、《汉书》、《文选注》、《楚辞》王逸《注》诸书所引的内容,虽然还不

能说无所遗漏，但也足以作为深究经学的参考了。《春秋》一书经文的解释，《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三传互有区别，大抵是因为语音相同而解释错误所造成，或者是因为古字假借通用所造成。古书此类的情况举不胜举。像《礼记》的《大学》，自程颢、程颐、朱熹以后就多次更改订正；《尚书》的《武成》，自孔安国、孔颖达进行注疏时就对它产生了怀疑，这都属于应当重新考订而定于一尊的范围。

制策又鉴于建立国家，君临臣民，教学育人居于优先的地位，因而提出辟雍的制度，三老、五更的含义等问题，要求探讨其中的内容和意义。臣下我认为辟雍的制度创始于商朝，其含义见于郑康成《礼记·王制注》的解释，崔灵恩的《三礼义宗》也主张此说，他们的见解不会有误。灵台的辟雍是周文王的学校。镐京的辟雍是周武王的学校。《诗经》说："来自西学来自东学，来自南学来自北学。"恰好可见周朝所立学校是五所，辟雍居于中央。周武王至辟雍讲学祭礼，则成均、上庠、瞽宗、东序四所学校的士人都来听讲行礼，所以才有如上说法。那么所谓"师氏主掌东学、南学，保氏主掌西学、北学"一说，不能说没有根据。《礼记·王制》的郑玄注说："辟字的含义是明亮；雍字的含义是和乐；辟雍的含义就是通过教学育人使天下充满光明和乐。"这是根据含义来解释辟雍一词。《诗经》的《灵台篇》的《毛传》说："水面像玉璧一样环绕台邱，用以限制游观者。"这是根据地形来解释辟雍一词。根据地形以推求实象，再佐证以《说文解字》所说"诸侯的学校泮宫是半圆形池水"，当以根据地形解释辟雍含义的观点接近于正确。至于灵台、明堂、清庙、太室，属于异名同地之说，唐朝的孔颖达《诗疏》引用袁准的《正论》已有很详细的考辨。三老的"老"指年长高寿，五更的"更"指有经历阅历。《礼经》说："三公处于朝中，三老处于学校之中。"三公不是一人，那么三老、五更也不是一人就显而易见。但不必要非得理解成三老就是三人，五更就是五人不可，例如三公未必是同置三人，只待有合适者才设置罢了。蔡邕的《章句》认为肯定是三人、五人，《白虎通德论》、应劭《汉官仪》认为肯定是一人，这不是正确的观点。圣明的天子年长寿高，奖掖人才，努力坚持治国大道而形成教化，又鉴于京师是模范之区，根据古制变通今情，创建了太学，鼓钟

极尽欢乐，人才济济，真是盛极一时啊！

制策又鉴于民俗的淳朴风气日益变化，奢侈与俭朴互相作用影响，想要对此加以正确的引导。臣下我认为风俗自淳厚日益变为浇漓，自朴实日益变为奢华，这是客观趋势而不得不如此。以土台子和茅草房为代表的原始时代，断然不同于礼制粲然和乐制完备的文明社会，而崇尚忠诚朴素的民众，必定有别于尊尚礼教乐于互助的风俗。这本来就是风气日益变化，人情日益乖巧的结果。圣人应该适应时代潮流，即像《易经·乾》所说的那样“跟随时代而顺应时代啊”！孔子说：“奢侈就显得骄傲，节俭就显得寒伧，与其骄傲，宁可寒伧。”也谈到了过俭的弊端。董仲舒说：“俭朴不符合中庸之道，圣人何曾过于崇尚俭朴呢？不过是要控制支出，不使它奢侈得超过一定的限度罢了。”天下存在闲民，也是客观情势的必然结果。《周礼·天官·太宰》说：“闲民没有常业，流动被人雇佣。”这是周公对他们进行安置和教育的措施。《礼记·王制》说：“不要有游民。”也是说对他们安置要适宜，教育要得法。哪里存在处理的措施不同呢？

制策又说：粮食的积储是百姓生存的根本，采取什么方法可使百姓从中得到实惠，而官吏无法中饱私囊，商人不能囤积居奇？这又是深切体念民众隐痛疾苦的一片真情至意。臣下我听说宋代大臣苏轼说过：“依靠法律不如善于用人。”又说：“有治人无治法。”常平仓、社仓等制度，古人实行或能从中受利，后世实行或许滋生出弊端，这不是制度的不完善，而是用人的不当。历观前代实行的情况，凡是获得成功的，大致是掌管于称职的官吏之手，而将责任分解于乡里的年高有德之人；凡是遭到失败的，大致是因为胥吏的侵渔，富商豪猾的相互勾结以营私。所以无论常平仓还是社仓，作弊者或是改动帐册簿籍来挪移粮食，或者是出库时克扣入库时强行索取，整个过程无不存在作弊的可能。圣明的天子真诚抚育百姓，务求大量储粮，中央直辖各省的州县都根据区域大小确定常平仓储粮的定额，储粮来自民间的义仓、社仓等，也都让官府进行管理，可谓是制度完备而用意良美。身居高官者能不严肃谨慎，共同努力，以达到富足安乐的盛世吗？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师法《八索》而遵循《五经》，文治就可以因

此日益兴隆;崇尚四术而致力于六礼,声教就可以向周边地区传播。教化得到推行而无不愿意归附,天下就会出现太平盛世;粮仓充裕而民众互相帮助共同生活,家家就会出现鼓腹唱歌的富足景象。上溯唐尧虞舜时期,远考夏商周三代,他们统治天下、治理国家的方法哪里又能离开以上几个方面呢?臣下我还听说,《春秋》阐发了这道理:圣人之所以像天那样深远壮美而永无边际,是因为意识到了上天赋予的使命;之所以纯正专一而永无止境,是因为这是圣人应该具备的品德。正因为永无止息,所以品德日新,盛美的事业留传后世而无穷无尽,宏大的谋划造福后代而千秋万年。衷心祝愿我们皇上,本着敬崇天命承受天命的意识,励行为民勤政体恤万物的道义。虽然经学的义理纷繁,而自终至始好学不倦的精神越来越勤谨缜密而坚定;虽然庶民遍享恩惠,而通过儒家经典培育士人的观念尤其要真诚以达到更高的自觉。不因为民风大变而稍微松弛通过礼乐引导民俗的作用,不因为国家财政充裕而放松财政部门的制度建设。我们将要见到教化适中纯正,犹如天空高悬的太阳普照万物;国家安泰康定,犹如广阔深厚的大地博载万物;千载万年盛德流芳,千秋万世基业永恒,与天地共存而悠久无疆。国家亿万年升平之世的命运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啊!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

邵玉清　殿试对策

邵玉清(生卒年不详)　字履洁,直隶天津府人。室名朗斋。乾隆四十九年(1784)探花。曾官国子监司业。

臣对:臣闻穷经为明理之资,立学乃敷化之本,崇俭为型方之要,足食乃民命之原。《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曰:"学古人官"。言经术明而后可致用也。《诗》云:"於论鼓钟,於乐辟雍"。又曰:"誉髦斯士"。言雅化昭而后贤才奋兴也。若夫浮靡革而习尚敦庞,积贮饶而世登乐利,此又帝王所宵旰勤求者也。经训昌矣,而精微必阐;儒修励

矣，而教思无穷。世风淳茂，犹严防逐末于未形；阎井雍熙，而尚虞恩膏之未浹。是以实学昭而士敦齿让，淳化洽而户庆盈宁也。

钦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寿考作人，一道同风，阜成亿兆，固已典章美备而人文蔚起，寰宇乂安而仓储充裕矣。乃圣德渊冲，畴咨弥切，爰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宗经建学之义，善俗裕民之方。臣至愚极陋，自知土壤细流，奚裨瀛岳？然幸际嘉言罔伏之时，正臣子对扬之日。敬承清问，下逮刍荛，敢不竭管蠡之窥测，冀仰副高深于万一乎！

伏读制策有曰：致用在乎通经，思探奥旨，先考颐文，而胪及于简策之异同。诚厘订诸经之盛心也。臣惟《六经》并出于圣人，阅世悠长，师承不一，故往往互异。唐司户参军郭京，世授《五经》，尤深《易》义，曾得王辅嗣、韩康伯传授真本，比校当时流行之本，或将《经》作《注》，用《注》作《经》，《小象》中间，上下倒置，《爻》辞注内，前后讹移，并依定本正之，为《周易举正》三卷。宋王应麟以《诗》有四家，师异指殊，时惟毛传、郑笺孤行，韩仅存《外传》，而鲁、齐久佚，未有参考三家者，因网罗散轶，傅以《说文》、《尔雅》诸书，为《诗考》。朱子《大学章句》，大指宗程氏，会众说而折其中。断简缺文，亦悉补正。但《定静》、《本末》二节，程子置"听讼知本"句之下，而结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为《格物》、《致知》章，微有不同耳。《武城》错简，自二孔疑之，后儒王氏、刘原父所定，亦各不同，自程子订之而始定。朱子以《汉志》日辰参之经文，移"四月既生魄"于"丁未祀周庙"之前，更为精当。至左氏、公羊、谷梁并传《春秋》，而彼此不同，则诚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也。我国家昌明经学，旷轶古今，四经三礼，并有成书。皇上万几之暇，务阐微言，是以户诵家弦，人知向学，有不抱遗经而思利见者哉！

制策又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因以订辟雍之名义，诸说之异同，养老之规制。臣谨案《王制》："天子曰辟雍"，而其名始见于《灵台》之《诗》。文王，殷诸侯也，殷学在郊，故文之辟雍在郊外。武有天下，遂以为太学之名。周学在国，故镐京辟雍在国中。《王制注》辟训明，雍训和。《灵台》，《诗传》："水旋邱如璧曰辟雍"。一以义言，一以形言也。周立五学，辟雍居中，为太学；南成均；北上庠；东序，亦曰东胶；西瞽宗，

亦曰右学。天子讲学于辟雍,则四学之人来观,故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以四学对辟雍,则辟雍为太学;以郊外之小学对四学,则四学亦太学也。灵台、明堂、辟雍、太室,本非一地,说者以《大戴记》有"明堂外水曰辟雍"之文,而明堂五室、辟雍五学又略相近,诸家袭谬。郑康成非之,袁准驳之,是已。古者视学,必先养老,《文王世子》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是也。《注》:"老、更各一人,名以三、五者,取三辰五星"。《白虎通论》谓:"老为寿考,更为所更历者"。众:"言三以明于天、地、人,言五以明于五行之道,而各一人"。蔡邕以"更"字为"叟",又以三老为三人,五更为五人。非郑义也。我皇上躬先教育,仁寿涘世,方将茂举巨典,考古证今,折衷而行之,岂非盛世之隆轨欤!

制策又以淳朴日开,奢俭相矫,在上者宜善所导,而使民之迁于善。臣惟俗尚之由俭而奢,民性之由诚而伪,风会使然也。皇帝王霸之运,有如四时,虞夏商周之民已殊上古,在因其势而善导之。斫雕为朴,破觚为圆。受之以渐而持之以恒,则习俗自移矣。《王制》谓"无旷土游民",而《周礼》乃有"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王与之"。谓必其单丁下户,力不能任百亩而耕,又不能从事于园圃、虞衡等职,故列八职之后。然佣力之人,亦势所必需,自当有不受田者为之,以在八职之外,故曰闲民,非有异治也。语曰:"稂莠不除,嘉禾不殖"。虽至治之世不能保无一二奸民,以邪教鼓愚,以告奸罔利,亦在有司化导于未发,而严创于已萌,则闾阎共知惩劝,不难比户可封矣。我皇上躬行节俭,敕法绥和,海隅苍生共遵荡平之路,惟久道而化成,自时雍而风动,皞皞熙熙,岂曰小补之哉!

制策又以积贮为生民之命,必先杜弊端而筹经理之得宜。臣惟《周官》仓人掌粟入之藏,遗人掌邦之委积,此积贮所由昉也。汉耿寿昌仿李悝平粜之法,而立常平仓。隋长孙平之义仓,宋韩琦之广惠仓,朱子之社仓,法良意美,历代循行。然利之所在,弊即因之。贮则浥烂为虞,出则挪移丛蠹。买补则市价或因采而昂,给发则奸胥或冒民以领。甚且仓不实储,户或俵籴,皆不可免也。欲杜其弊,惟在奉行者以实心行实政而已。有司无肥橐之念,自足以驭胥役之奸;大吏严稽核

之条，自不致虞牧令之玩。隶籴以时，出入相准，则经理得而从弊自息矣。我皇上爱育群生，痌瘝在抱，常补助于随时，备峙储于平日，综核名实，是训是行，岁庆三登，市盈千斛，职有由也。

凡此数者：尊经训而考订惟殷，详学制而典章弥备，民知务本而风俗可成，吏不为奸而恩膏下究，猗欤盛哉！臣尤伏愿皇上，至诚无息，安益求安。载籍揽石渠之富，而更切研求；思皇多王国之桢，而倍深乐育。淳固可风，而愈期治臻乎上理；盖藏有备，而弥饬调剂之得宜。则我国家亿载无疆之福，基于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深究经典是探求义理的依据，建立学校是推行教化的根本，崇尚节俭是治理一方的关键，充裕粮源是百姓生存的本原。《尚书·说命》说："学习古训才会有所收获。"《尚书·周官》又说："先学古训再入仕途。"说的是儒学精通之后才能致力于运用到实践。《诗经》说："啊！钟鼓得见伦理。啊！欢乐都在辟雍。"又说："爱才育才，选贤举能。"都是说崇尚文明成风而后才会贤才大量涌现。如果浮靡的风气革除而习俗崇尚敦厚，粮食储备丰饶而人民安居乐业，这正是帝王们宵衣旰食孜孜以求的目标。经学的研究已经很昌盛了，但精微之义还必须阐释；儒生的学业已经很勤奋了，而教育追求的目标没有穷尽。世风即使淳美敦厚，仍要严防追逐末业于无形；社会即使和乐安宁，还要防止皇恩虽施却有不均。所以实学得到重视士人就会促进礼教，淳厚的风俗形成家家就会丰乐安宁。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功业彪炳，道德纯备，年长寿高，奖拔贤才，使道德风俗归于统一，万民安乐，本来已经是典章完备而人文蔚起，天下平安而仓储充裕。可是陛下您圣德越深厚，咨访政务的心情越急切，特将我们士人召进殿廷，策问有关宗尚儒经发展教育的问题，引导风俗富裕民众的方法。臣下我极其愚昧无知，自知微小的土壤、涓涓的细流无补于高山大海，然而有幸遭逢良言可以尽情陈述的时机，正是臣下我当面对答之日。皇上垂询我一个草野之人，哪敢不畅所欲言，献出一孔之见，以期不负于陛下厚望万分之一呢？

跪拜敬读制策，制策认为致力于实践在于要通晓经典，探究深奥

的道理，须先考察高深的文献，因而涉及到典籍记载文字不同的问题。这确是表达了考订诸经的强烈愿望。臣下我认为《六经》全都出于圣人之手，但历时悠久，师承不一，所以文字往往不同。唐朝的司户参军郭京，世世代代传授《五经》，尤其精通《易经》的深义，他曾得到王辅嗣、韩康伯传授的真本，与当时流行的版本相比较，发现有的将经文当作了注文，有的用注文当作了经文，《小象》中间的内容上下倒置，《爻辞》注内的文字前后讹移，就依据定本进行了纠正，撰写成《周易举正》三卷。宋朝的王应麟鉴于《诗经》有四家学说，师承不同而解释各异，当时只有毛氏传释、郑氏笺注的版本流行，《韩诗》仅仅剩下《外传》，而《鲁诗》、《齐诗》早已失传，从未有人综合参考三家进行研究，因此网罗各种散轶的版本，增益以《说文解字》、《尔雅》诸书的内容，撰写成了《诗考》一书。朱熹的《大学章句》，主要精神宗尚程颐、程颢，而又汇集折中众说，断简缺文因而全部得到补充纠正。但《定静》、《本末》二节，程子置于"听讼"、"知本"句之下，而结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语，作为《格物》、《致知》二章，稍微有些不同罢了。对《武成篇》的错简，从孔安国、孔颖达起就持怀疑态度，后儒王氏、刘原父所定，也是各自不同，自程子订正之后才确定下来。朱子根据《汉志》所记载的日辰，又参考以经文，将"四月既生魄"移于"丁未祀周庙"之前，这样一来更为精当。至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书，虽然都是阐释《春秋》的内容，但彼此并不相同，那的确是因为圣人孔老夫子所见世不同，所闻世不同，所传闻世又不同。我们国家倡导经学，重视的程度前所未有，各种经学典籍都有成书。皇上日理万机之暇，还致力于阐释精义，因此家家户户诵读经典，人人知道学习文化；哪有不懂儒家经典而想到龙显现而对贵人特有利的呢？

制策又说建立国家，君临臣民，教学育人居于优先的地位，因此要求考订辟雍的名称和含义，各种观点的不同，以及古代养老制度的规定。臣下我查检《礼记·王制》说："天子的学校称作辟雍"，而其名称始见于《诗经》的《灵台篇》。周文王原是商朝的诸侯，商朝的学校位于城郊，所以周文王时期的辟雍在郊外。周武王得天下以后，于是将辟雍作为太学的名称。周朝的学校位于城内，所以镐京的辟雍位于城中。《礼记·王制注》将"辟"字解释为明亮的意思，将"雍"字解释为和

乐的意思。《诗经》的《灵台篇》的《毛传》说:“水面环绕台邱如玉璧一般,故称辟雍。”一是根据辟雍的字义来解释,一是根据辟雍的地形来解释。周朝五所学校,辟雍居于中央,作为太学;南学称为成均;北学称为上庠,东学称为序,也称为东胶;西学称为瞽宗,也称为右学。天子在辟雍讲学,则东、西、南、北四学的人都来听讲,所以《诗经》的《大雅·文王有声》说:“来自西学来自东学,来自南学来自北学。”以四学相对于辟雍而言,那么辟雍是太学;以郊外的小学相对于四学而言,那么四学也是太学。灵台、明堂,辟雍、太室,原本不是一地,解释者根据《大戴记》有“明堂之外的水池称作辟雍”的记载,恰好明堂是五室,辟雍有五学,又大致相合,因此认为二者同是一处。于是诸家沿袭谬误,郑康成对此持否定意见,袁准也对此进行了批驳,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古代办学,一定要先养老尊老。《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在国学向先师群老设祭致礼,于是设三老、五更,这也就是当时的群老之席啊!《注》称:“三老、五更各为一人,所以冠以三、五之数,含义是象征三辰五星。”《白虎通德论》说:“老指年长高寿,更指有经历阅历。”郑众说:“冠称以三是指明晓天、地、人,冠称以五是指明晓五行之道,各置一人。”蔡邕认为“更”字应为“叟”,又认为三老是三人,五更是五人,不同意郑氏的解释。我们皇上亲自重视教育,年长寿高,惠施天下,现在又要广征博引,考古证今,择取中道而行,这难道不是太平盛世的集中体现吗?

制策又鉴于淳朴的风气日益变化,奢侈与俭朴互相影响,居于上位者应该善于引导,使民众形成良好的习俗。臣下我认为,风俗由俭朴转向奢侈,民众本性由诚实转向伪诈,是社会风气变化造成的。称皇、称帝、称王、称霸者的命运,犹如春夏秋冬的四季交替而无穷无尽,虞舜和夏商周时期的民众也早已与远古时期不同,关键在于对民俗要善于因势利导。将奢侈的风气改为朴直的风气,将诈伪的性情改为诚实的性情,要潜移默化并持之以恒,那么习俗的变化就会自然实现。《礼记·王制》说“不要有旷荒的土地,不要有游离的百姓”,而《周礼·天官·大宰》乃有“闲民没有常业,流动被人雇佣”的记载。说的是如果确是贫困之家,无力从事正常的农耕,又无法从事菜园、林圃、渔猎等职业,因此列于八职之后。然而存在出卖劳动力之人,也是客

观情势所必需，自然应当由无田地的人充当，以列于八职之外，所以称作“闲民”，并非说是另外处理。谚语说：“杂草不除，禾苗不长”。即使是太平盛世也不能确保没有一两个奸民，对利用旁门左道煽动愚民，以达到售奸图利者，官员们应在这种情况尚未形成时进行疏导教育，在其成为萌芽时进行严惩，这样就人人知道奖善惩恶，不难做到家家可以封爵。我们皇上亲自倡行节俭，法令宽平，海内百姓已经走上帝王设布的康庄大道，长期坚持就能教化形成，自然会时气协和而闻风响应，社会一片太平，谁能说风俗的作用微不足道！

制策又鉴于粮食的积储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必须先杜绝弊端而后筹划合适的管理制度。臣下我想来，《周官》所记仓人掌管粟米的入藏，遗人掌管国库的管理，这是粮食储备制度的开始。汉代的耿寿昌仿照战国李悝平粜之法建立了常平仓。隋代长孙平的义仓，宋代韩琦的广惠仓，朱熹的社仓，都是制度完备用意良美，为历代所遵行。然而利之所在，弊端随即相应产生。储藏粮食则有霉烂的担心，出库则有擅自挪移的舞弊；购粮补充库存则市价有可能因而上涨，发放救济则奸猾胥吏有可能冒民代领。甚至有的是仓储不实，有的是按户摊派，这些都不可避免。要想杜绝如上弊端，唯有执行者以实心行实政而已。主管者没有私利之念，就足以控制胥吏的舞弊；大吏们严格审计的制度，就不会导致州县官玩忽职守。出粜和入籴按时，支出和收入相符，那么就管理有序舞弊自息。我们皇上真诚抚育百姓，关心民众疾若，或随时随地给以救济，或坚持平时大量储粮，既综核名实，又督促检查，之所以农业连年丰收，市场粮食充盈，原因即在于此。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尊尚经典则研究就会更深入，讲求教育则典章制度就更完备，民众知道务本则淳俗就可形成，官吏不肯舞弊则皇恩就能下施百姓，这真是一种盛世之风啊！臣下我衷心祝愿皇上至诚之心不息，平安了更求平安。书籍虽已富如汉代石渠收藏，而更加锐意研求；治国的栋梁之才虽纷纷涌现，而加倍乐意栽培。淳俗固然可嘉而更期望达到理想境地，储藏已经达到丰富而更应做到调剂适宜。我们国家亿万年的无疆之福都植根于这个基础之上啊，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孙继民译〕

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路拱之,三嗅而作。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殿试策问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抚驭九宇,膺祚久长,于今五十有二年。仰荷昊苍眷佑,幸而精神纯固,车书乂安,五世一堂,胥宙合臻于蕃祉,老寿如前代,秕政无一蘖芽,庶底小康见于向之古稀说矣。然而宵旰益懋,惟日孜孜,罔敢自暇逸。思欲鉴古观文,与民游大道而裕所天,教养大备,式跻郅隆。兹多士观光沐浴,诵习之已久,庶几敷赞。其敬听予询:

史非徒纪事,所以监先式后,等百世以为因革损益者也。则表志尚矣,顾曰书、曰志、曰考,或有或无,或取他家以益之,或越数代以补之,或统及古今,或并详五朝,征其体例能较然与?胜或作通史而全书以志名,能著其凡与?地理之山川、物产、古迹,经籍之类例、撰人,何者为当?符瑞、释老,不已细与?传之隐逸、止足、独行、孝义,更易其名;儒林、道学、文苑,纷歧其品,可类指与?赞、论、评,毋乃赘与?论史家体例者,刘知几、郑樵,能述晰与?本大公至正之心,慎守器勿失之戒,辟纪载失实之诬,屡经论断,宜狄闻而心识之,其抒所见焉。

夫《虞书》标言志之文,宣圣示辞达之旨,经典所垂,具有明训。迨后世体裁递变,门径各殊,论诗论文,遂多乖正旨。刘勰《文心雕龙》虽局于齐梁之俪偶,然具书首以《原道》,次以《征圣》,次以《宗经》,次以

《正纬》,所见实在诸家上。能约举其说欤?杜诗韩笔,为后来作者冠冕。其论诗论文之宗旨,具见本集,能举其得失欤?《昭明文选》,多取华藻,真德秀《文章正宗》,深矫其弊,然萧之末流亦或伤朴僿,欲酌文质之中,其何道之从欤?且诗文之体虽殊,其为载道则一也。宰之以理,运之以气,亦既文成数万矣。所期以化成天下,而共咏圣涯,同游艺府,能知所致力欤?

古人有言,积贮者生民之大命。《周礼》之廪人遂人,屋粟锄粟,后人师其遗意,而耿寿昌、长孙平、朱子皆有规制。及夫上熟、中熟、下熟之敛,和籴、俵籴、兑籴之名,言积贮者靡弗能详,固不必泥古而规缕也。朕截漕平粜,所以为闾阎计朝夕之供者,数十年时举,亦无一日或间。然欲求实贮,则默吏之亏缺宜绳;欲孚惠心,则猾胥之蚕蠹宜察;欲平市价,则驵侩之囤积宜惩。而且谷数民数,岁报可稽,酌盈剂虚,讵易言给足欤?采买则虑价昂,散给则虑中饱,筹后日之饥,节目前之食,朝三暮四,宁善术欤?作民父母,仰我乳哺,即一饕飧计,而为君之难如此。诸生服畴食德,亦有一二区画可采裨乎?

昔先王设奇邪之禁,严左道之诛,立法綦详,诚以邪说诬民,易于荧惑。非预遏其萌,恐为世道人心之患也。我国家化泽涵濡,士大夫读书明理,自不为异论所移。至乡里愚氓或诱于罪福之说,奸黠匪徒或借为箕敛之术,自扞法网者间亦有之。如概从禁绝,则祈报蜡社皆将为吏胥需索之端;若虑其滋扰不为区画,又恐日累月积,久且草蔓。今将为杜渐防微,清源正本,使人人知礼义之维,而谩妄之言不能蛊其视听,其何道之从焉?

朕抚临悠久,无时不以稽古明理期天下之士,无时不以正德厚生筹天下之民。多士以读书起家,宜明古今著述之源流。又新自田间来,宜悉土俗民生之利弊。其以夙所抱者胪于简,毋浮毋隐,朕亲览遴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子路朝野鸡拱拱手,它们又振一振翅膀飞去了。

君子尊重贤能的人，也接纳一般的人；鼓励好人，可怜无能的人。我是特别好的人吗？

大道在近处却往远处去寻求，事情本来很容易却往难处去做它。人人只要把自己的父母当做父母，把自己的长辈看成长辈，天下就太平了。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统御天下九州，膺受天命的时间久长，于今已经五十二年了，上仰苍天保佑，幸而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国家统一，天下太平，汇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五代于一堂，人口的繁衍空前众多，人们的寿命如同前代，而不良的政事没有发生一件，差不多可说是以往古稀老人传说的小康社会已经出现了。然而更加以宵衣旰食的精神自励，终日孜孜不倦，不敢擅自贪图安逸。希望借鉴古代，尊尚旧典，仰观天文，谨奉天命，带领百姓共同追求理想，充裕生活，实现教化蔚成、涵养大备、进入太平盛世的目标。诸位士人多年受到儒学薰陶和皇恩沐浴，对经典素有研究，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敷陈进奏。你们请听皇帝我来询问：

史籍并非只是为了记载史实，还用以借鉴前朝垂范后代，流传百世以作为因袭或革除的参考。表和志的体例很早了，不过在有的史籍中称为书、有的称为志、有的称为考，有些史籍有表、志，有些史籍没有表、志，有些史籍的表、志取自它书，有些史籍的表、志是数代之后补写，有些表、志的内容统及古今，有些表、志的内容并详五朝，这些体例能考述清楚吗？再者，有些史籍的内容是通史而全书却以志作为书名，能列出这些书名吗？《地理志》的山川、物产、古迹，《经籍志》的类例、撰人，哪些史籍编纂得恰当？《符瑞志》、《释老志》，是否分类过细了？《隐逸传》、《止足传》、《独行传》、《孝义传》等，名称改来换去；《儒林传》、《道学传》、《文苑传》，标题纷繁杂出，能够分类列举吗？史籍的赞、论、评等等，是否过于累赘了？论述史学体例者，如

刘知几、郑樵等，能够分述缕析吗?你们要抱着大公至正的态度，牢记守器勿失的训诫，辨别记载失实的错误，反复分析判断，应该认真听取而心领神会这次的策问，抒发你们的见解。

《尚书·虞书》标榜文章是用以抒发情感志向的，孔圣人提倡语言词汇是用以明畅地表达思想内容的，这是经典记载、流传的圣贤明训。发展到后世，文章的体裁接连不断发生变化，种类和方法各自不同，论诗论文的学说，于是多有违反正旨之处。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带有齐梁俪偶风气通病的局限，但该书首列《原道》，次列《征圣》，次列《宗经》，次列《正纬》，其见解实在诸家之上。能够概括列举它的观点吗?杜甫的诗歌、韩愈的散文，是后来作者的楷模。他们论诗论文的宗旨，都包含在他们本人的著作之中，能够举出他们的得失吗?《昭明文选》使用了很多华美的辞藻，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对它的弊病极力加以纠正，不过昭明太子萧统的追随者也有的文风未免失之于朴陋，要想使文采和朴实适中，从何处着手呢?再者，诗歌和散文的体裁虽有不同，但用以表达一定的道理则是相同的。理清思路，运足中气，下笔之间也就不难文成数万了。这些都是为了化导天下风俗，共同咏赞圣业，一起畅游文苑艺府，你们知道该从何处用力吗?

古人有言，粮食的积储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周礼》记载有廪人、遂人对物资储备的执掌和对屋粟、锄粟征收的方法，后世人根据它的主张，于是有耿寿昌、长孙平、朱熹的创制。至于对上等收成、中等收成、下等收成的征敛，以及和籴、俵籴、兑籴之类的名称，凡是研究储粮制度者无不能详，因此不必拘泥古制而一一缕述。皇帝我又是截取漕米，又是平价供粮，都是为了百姓每天能有饭吃着想，数十年间经常进行赈济，从无一日间断。然而要想做到粮储落实，则要对贪官造成的亏缺绳之以法；要想使良好的动机实现，则要对污吏的侵吞给以纠察；要想平抑市场物价，则应对奸商的囤积予以严惩。而且收成和人口情况，每年报表的虚实验实，物资的调剂余缺，谁能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得很好呢?采买粮食则顾虑市场价格上涨，散发赈济则顾虑贪官污吏中饱，或是预防日后饥

荒，或是节用目前的食粮，朝三暮四，反反复复，难道说是好方法吗?作为百姓的父母，都要靠皇帝我来抚养，即便是一顿饭也要考虑，作为君主竟是如此之难。诸位士人耕读起家，是否有一两个善策可供采纳选择呢?

古代帝王制定了有关谄媚欺诈行为的禁令，对旁门左道严加诛伐，立法极其详密，说到底是因为邪说煽动百姓，容易造成混乱。不采取预防措施，遏制于未萌，恐怕会祸患整个世道人心。我们国家深恩厚泽，士大夫读书明理，自然不会为邪说所动。但乡里愚民有的可能为罪福之说所诱惑，奸猾之徒有的可能借机作为收敛之术，自触法网者也间而有之。如果一概加以禁绝，那么民间正常的祭祀活动有可能成为贪官污吏借机索贿的借口；如果任其滋扰，不作筹划，又恐怕日累月积，久而蔓延。现在将要采取防微杜渐、正本清源的措施，使人人懂得礼义的重要，使谩妄之言不能混淆其视听，这应从何处着手进行呢?

皇帝我统御天下的时间很长，无时不以尊奉经典明白事理期待天下士人，无时不以纯正品德富裕百姓治理天下民众。诸位士人凭借读书起家，应该明了古今著述的源流。并且又是刚刚来自民间，应该熟悉风俗民生的利弊。现在就将你们平时掌握的知识和了解的情况写在对策上，不要浮泛不要隐瞒，皇帝我将亲自阅览遴选。

史致光　殿试对策

史致光(生卒年不详)　字葆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事迹待详。

臣对：臣闻鉴古者，上理所资也；鸣盛者，太和所感也；长裕者，丰享之象也；时雍者，豫顺之征也。古帝王治洽淳庞，化成悠久，将欲观古今于治忽，广教育于文思，奏三登而顺叙岁功，协万国而凝休风动，必有行健秉恒之德，以著延洪纯佑之符。《礼记》曰："大人举礼乐，则天地为昭焉"。《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诚以四方之训

行，则仿胥克奉皇极之敷言，会其有极，而后能光昭简策，黼黻勋猷，锡盈宁之福，登懋良之书。所由政教合一，治学同轨者也。

钦惟皇帝陛下，阐图史之精要，集道艺之大成，乐利广夫蓄储，诚和正于风俗，固已炳谟训而焕文章，溥沃泽而覃雅化矣。乃圣怀冲挹，深思久安长治之道，弥切持盈保泰之图，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史学体裁，诗文标准，厚生利用，成俗化民。臣之庸愚，何足知此？窃念先资拜献之端，敷奏扬言之义，敬承清问，敢不述所闻，诵所习，以效管窥蠡测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史非徒纪事，所以监先式后，等百世以为因革损益，而因欲核夫体例名类之异同，此诚读书稽古之要务也。臣闻董仲舒《繁露》曰："《春秋》无达例"。自何休《公羊解诂》设科分例，见于徐彦疏。杜预《左传集解》，别为《释例》一书。后世史家，言例所自昉也。司马迁始创纪、表、书、传之体，后之作史者因之。《史记》八书，班固以下皆称志。欧阳修《五代史》删薛史《职官》、《食货》诸志，别为《司天》、《职方》二考。范蔚宗《后汉书》无志，梁刘昭取司马彪《续书》志注补之。八书统及古今，《隋志》兼详五代，繁简各殊，体制固一矣。陈寿《三国》以志名而不作志，郑樵《通志》以通史之体而称志，又参互各出者也。《地理志》昉于《汉书》，述古文则《尚书》旧说，引桑钦则《地理志》专家，得其精核，体简而该，或详记山川物产以及古迹，专为地理书则可，入于史志则嫌冗矣。《汉艺文志》本《七略》，《隋经籍志》本《七录》，《汉》详学术源流，《隋》著书名存逸。其《七略》沿而为四库，事势之所固然，要其类例，各有当也。江淹云："修史莫难于志"。诚神明马、班之意，何至《符瑞》、《释老》之贻讥乎？传多标目，始于华峤、范蔚宗，史汉惟《儒林》、《循吏》等而已。分《儒林》为《道学》，又自宋始。史之有赞，起于《左传》之述君子。郑樵已言，迁史多补传外意，班固近决科之文，而后人复论后有赞，不可谓不赘也。论体例者，莫详于刘知几、郑樵。知几分《史记》、《汉书》为二家，樵宗《史记》，故诋议《汉书》多失其质。伏读《御制评鉴阐要》，折衷至当，辨析精微，正群史之舛讹，溯《六经》之义蕴，昭斧钺而炳日星。万世修史之法，举莫出其范围矣。

制策又曰:诗文之体虽殊,其为载道则一,而欲溯体裁之变,酌文质之中。臣以为文章之正变,由时会之迁移而成。尧舜之世,赓歌喜起,运启文明。成周《诗》定《雅》、《颂》,《书》陈《诰》、《诫》,《国语》以《棠棣》为召公之诗,《韩诗》以《关雎》为毕公所作。皆洋洋乎盛世之元音也。然其指归,要于辞达。汉初贾、董之文原本经术,而司马相如诸赋,人已讥其讽一而劝百,故东京后文体遂靡。论诗文者,陆机《文赋》、钟嵘《诗品》,未能尽合正旨。刘勰《文心雕龙》所论,诸体悉备,或谓其沿俪偶之习。然《原道》、《征圣》、《宗经》诸篇,虽辞义尚浅,而厥旨不乖,洵六朝之杰出者。唐世诗文,端推杜、韩。杜云:"熟精《文选》理"。韩云:"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即自道所得欤?《昭明文选》,唐人谓之"选学"。其后宫体之流实伤绮靡。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深矫其弊,而流失又多朴僿。欲得乎中者,其守经典之明训而后可哉!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因欲为酌盈剂虚之善术。斯又济世之大权,保赤之盛意也。臣谨按《周官》,仓人"掌粟入之廪藏",遗人"掌邦之委积",其为积贮计者甚详。后世师其意,于是有常平、义仓、社仓之设。《汉书·食货志》载耿寿昌常平之法,班固盖深予之,而颜师古乃指为权道,则其识去萧望之无几矣。州县立社仓,自朱子为浙东提举,及真德秀帅长沙,皆行之有效。而其后亦不能无弊,则殆所谓"任法不如任人"者。大抵诸仓之法,其得也,则官司之出入有时;其失也,则胥吏之侵渔莫制。固不在规制之泥古而求也。圣天子惠养黎元,勤思备储,审画周详,有加无已,为大吏者宜何如承奉,以实心行实政,而成菽粟水火之天下也乎?

制策又以愚民诱于罪福之说,自扞文网,而思杜渐防微正本清源之计。夫奇邪之禁,左道之诛,《周官》、《王制》大为之防。古王者所以正人心,维世俗,不惮立法之烦者,非必实有其人也。盖恐邪说为民所易惑,不先立其防,则一朝煽诱,滋扰必多。惟先有厉禁,而盛世之人心皆知礼义自维,不为异端所蛊。其即有一二奸黠者,假以要结,亦不过逞其私智,以为箕敛之地。此则稂莠不除,嘉禾不殖,必不容稍存姑息,以纵其奸。申保甲之令,严督捕之方,几呵禁察,预遏其萌,安见耕田凿井之俦,尚有作奸犯科之虑哉!

若此者:法五始而正纲维,则体元以建治;修六艺而尚辑怿,则抗雅以宜民。耕九余三,备黍稌于亿秭,而时和年丰;礼陶乐淑,暨声教于大同,而化行俗美。唐虞三代之隆,又孰有逾于此?抑臣又闻:乾道以不息为义,君子所其无逸,庄敬日强。载籍取于征信,经论本于至诚,补助得游豫之时,彰瘅有风声之树。悉由寅恭翼畏,以垂裕于亿万斯年。伏愿我皇上本日新久照之谟,凛慎宪省成之义。鉴于古籍,以钦若为光被之原;观乎人文,以显思绵缉熙之学。不以野溢仓箱,而东作西成稍缓其平秩;不以俗臻良善,而春温秋肃稍间其弛张。清宁合撰,覆帱弥纶,敬迓蕃厘,式承多祉,国家申锡无疆之庆,肇于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借鉴古代是达到上等治理的依据,歌颂盛世是对太平和乐的感应,长久富裕是丰厚亨通的景象,时世升平是安乐通顺的象征。古代帝王把国家治理得丰厚而富足,把教化训导得淳厚而持久,如果要考察或治或乱的古今历史,推广充满才智道德的儒学教育,频奏丰收的捷报而依时论功行赏,协调藩属的关系而万国向慕华风,必须具有效法天道的品德,才能应验佑护社稷延长国祚的符命。《礼记·乐记》说:"大德之人兴办完善礼乐制度,那么天地就会为之充满光明。"《周易·恒》说:"圣人持久地推行顺应时代的统治方法,就能使天下万物从化而成。"如果天下四方都能认真遵奉实行天子所宣布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任用那些能够按照王道的准则办事的人做官吏,那就能使大业光照载籍,功绩彪炳千秋,享受到丰盈安宁的赐福,被记入流芳后世的史册。一切都是通过政治与教化合一,理政与治学同轨而实现的。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阐释经典史籍的精要,汇集义理才艺的大成,重视民生而广泛储粮,诚实和睦而纯正风俗,早已是儒学得到弘扬而礼乐法度粲然大备,恩典泽惠得到普施而善俗教化广为传布了。可是陛下您谦虚自抑,依然是深入思考达到长治久安的途径,孜孜以求保持国泰民安的良策,将我们士人招进殿廷,策问有关史学体例、诗文评价、民生经济、引导风俗、教化民众等问题。臣下我

极其愚昧无知，哪里懂得如此道理？但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不过念及事奉君主首先提出政见和进廷陈奏意见是臣子义务的古义，敬承皇上垂询，岂敢不述说所闻，诵读所习，以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呢！

跪拜敬读制策，制策认为史籍并非只是为了记载史实，还用以借鉴前朝垂范后代，流传百世以作为因袭或革除的参考，因而提出要查核体例名类的异同。这确实是读书学习和稽考经典的要务。臣下我听说董仲舒《春秋繁露》说过："《春秋》无达例。"自何休《公羊解诂》开始设科分例，这见于徐彦的《公羊疏》。杜预著《左传集解》，另撰《释例》一卷，是后世史家研究体例的开端。司马迁始创史书纪、表、书、传的体例，为后代史家所因袭。《史记》有"八书"，班固以下诸史都称为"志"。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删去薛居正《旧五代史》的《职官志》、《食货志》诸志，另撰写《司天考》、《职方考》二考。范蔚宗的《后汉书》原来无志，梁朝的刘昭取用司马彪的《续汉书》志和本人注为它补上了志。"八书"内容统及古今，《隋书》诸志兼详五代，虽是繁简各异，体例却本来相同。陈寿的《三国志》以"志"作为书名但本身并非是志，郑樵的《通志》是通史体例而称作"志"，二者又恰好相反。《地理志》始创于《汉书》，追述古代则是沿袭《尚书》旧说，其余内容则主要引自桑钦一家，且深得《地理志》的精华，体例简括而内容完备，书中详细记载了山川、物产以及古迹，它作为专门的地理著作还是可以的，但作为史书的志则稍嫌冗长。《汉书·艺文志》本源于《七略》，《隋书·经籍志》本源于《七录》，《汉书·艺文志》详细记述了学术源流，《隋书·经籍志》只是著录了书名和存逸的情况。由《七略》演变而为"四库"，是其本身发展的必然，关键在于分类的方法要得当。江淹说："纂修史书莫难于作志。"果真能够按照司马迁、班固的本意深加体悟，何至于出现《符瑞志》、《释老志》之类而招致批评呢？本传按类逐人标目，开始于华峤和范蔚宗的《后汉书》，《史记》和《汉书》原来只有《儒林传》、《循吏传》等而已。从《儒林传》分出《道学传》，又开始于《宋史》。史书有赞论，起源于《左传》引述君子曰。郑樵已经说过，司马迁的评论大多是超出正文之外的补充说明，班固的评论接近于

审案判决之文，而后人又认为后来的史书赞论，不能说不是累赘。论述史书体例者，详细的程度没有人能超过刘知几、郑樵二人。刘知几将《史记》、《汉书》分为二家，郑樵因为宗尚《史记》，所以对《汉书》颇有非议而大多失当。跪拜敬读皇上的《御制评鉴阐要》，非常中肯得当，有关的阐释析理入微，纠正了诸多讹误，探求了《六经》的意蕴，光照历史而炳耀天地，万世修史的方法，概莫能超出这一范围。

制策又说：诗歌、散文的体裁虽然有别，但用于表达一定的道理则是相同的，因而要求追溯体裁变化的源流，斟酌文采、质朴的适中。臣下我认为文章的“正”与“变”，是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而形成的。唐尧虞舜时期，君臣接续的歌声，开启了文明的时代。成周时期的《诗经》确定了《雅》、《颂》，《尚书》诸篇列有《诰》、《诫》，《国语》认为《棠棣》是召公之诗，《韩诗》认为《关雎》是毕公所作。都是洋洋大观，堪称盛世代表之作。然而其主旨，在于通过语言表达思想感情。汉初贾谊、董仲舒的文章本源于经学，而司马相如诸赋，有人已经讥评它是讽一而劝百，所以东汉以后文体趋向浮靡。评论诗文者，有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都未能尽合正旨。刘勰的《文心雕龙》所论诸种体裁一应俱全，有人说它沿袭有当时骈俪的风习。然而《原道》、《征圣》、《宗经》诸篇，虽然辞义有些肤浅，而其主旨相当不错，确是六朝时期的杰出者。唐代的诗歌散文，应该首推杜甫、韩愈。杜甫说：“熟精《文选》理。”韩愈说：“约取《六经》的主旨而写成文章。”大概就是对自己读书创作心得的自白吧？《昭明文选》一书，被唐人称之为“选学”。以后的宫体诗文之类确实存在绮丽浮靡的弊端。宋朝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竭力矫正浮靡文风的弊端，但又失之于太朴陋。要想做到文采和质朴的适中，只有遵守经典的明训，而后才能做到。

制策又鉴于粮食的积储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因此要求我们提出调剂余缺的最佳方案。这又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爱护百姓的真情厚意。臣下我查检《周礼》的制度规定，仓人“主掌粟谷的入库收藏”，遗人“主掌国家物资的储备”，有关粮食储备制度的论述甚详。后世遵循这一思想，于是有了常平仓、义仓、社仓的设立。《汉书·食货志》记载了耿寿昌的常平之法，班固给予极大的注意，而颜师古认

为是权宜之计，可见其见识与萧望之相差无几。州县设立社仓，始于朱熹担任浙东提举之时，及至真德秀任职安抚使于长沙，都大力推行并获得成效。此后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弊端，大概即所谓“任法不如任人”吧。大致说来各种仓储制度，其获得成功是因为官府管理得法出入有时；其遭到失败是因为对胥吏的侵渔无能为力；本来就不在于非拘泥古制而一味照搬不可。圣明的天子爱抚百姓，勤思储备，谋划周详，有加无已，身居高官者应该怎样遵行办理，以实心行实政，达到百姓丰衣足食而又礼义仁爱的天下盛世呢？

制策又鉴于愚民受到罪福之说的诱惑而触犯法网，要求提出防微杜渐，正本清源的计策。对谄媚欺诈行为的禁止和对旁门左道的诛伐，《周礼》和《王制》都为此大力设防。古代帝王之所以为了端正人心，维护风俗，不怕立法细密，并非一定必有其人，是担心百姓易于受到邪说的诱惑，不预先采取防止措施，那么百姓一旦受到煽诱，必然滋扰动乱增多，只有事先厉行严禁才行。太平盛世时期的人们，都知道以礼义约束自我行动，不会为异端邪说所蛊惑。即使有一两名奸猾之人，借机结成团伙，也不过是逞其私智，作为聚敛的手段。对此应如谚语所说“杂草不除，禾苗不长”，切不可稍有纵容以姑息养奸。若申明有关保甲的法令，严格有关督捕的措施，及时禁断违法，预先遏制乱萌，哪里还会有太平盛世的百姓们作奸犯科的担心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效法《春秋》笔法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五始”而端正纲维，则体法天地之道以治理国家；讲修《诗经》、《尚书》、《易经》、《礼记》、《乐经》、《春秋》“六艺”而崇尚亲睦和乐，则弘扬温文尔雅的教化以安抚庶民而善任贤人。耕种九年而积余粮三年，储备下菽稻无数，就会时世和宁年景丰登；礼乐制度完善，声教推广于全国，就会教化大行风俗醇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兴隆，哪个又能超越于此？不过臣下我听说，天道以刚健运行从不间断作为自己的本义，在位的君子不应贪图安逸而应庄重恭敬，自强不息。史籍文献取之于征而有信，治理国家立足于至诚之心，补助贫穷有待于君王按时出巡，褒扬善良、惩罚邪恶使其形成风气，这都是由于戒惧恭慎、兢兢业业勤政的缘故，从而为后人留下传世亿万年的业绩。衷

心祝愿皇上本着圣德日新圣辉久照的谟训，牢记慎守法度经常反省的教义。借鉴于古代典籍，以敬顺上天作为圣恩光被天下的源泉；瞩目于人文精神，以显扬倡导文采焕然的学问。不因为百姓粮食满仓而使春耕秋收的农事受到哪怕是稍微的荒废；不因为民俗达到了纯良美善而使健康的风气受到哪怕是稍微的损害。时世太平而阴阳和协有序，皇恩浩荡而无所不在，恭迎洪运，敬承福祉，上天赐给我们国家无穷无尽的瑞庆就肇始于此啊！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

孙星衍　殿试对策

孙星衍(1753－1818)　字渊如，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由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督粮道，又曾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和江宁钟山书院。工篆隶，精校勘，擅诗文，博通群书，勤于著述，在经学、史学、训诂学、音韵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传世著作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等近20种。另刻有《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

臣对：臣闻唐尧稽古以同天，《周易》观文以成化。《礼》载仓人、遒人之制，《记》有言伪行伪之防。《七经义纲》称孔子曰："化合神者皇，德合天者帝"。《易乾凿度》曰："天子者，父天母地以养人，至尊之号。皇者，中也；帝者，谛也"。本执中之智，谛察人伦，故圣作明述之事昭焉，经纬天地之文出焉，家给人足之治臻焉，移风易俗之化神焉。《书》称："念终始典于学"。《易》称："夬，扬于王庭"。又称："以美利利天下"。《论语》称："富而教之"。古之所以久安长治，民气乐而颂声作者，道在是也。

钦惟皇帝陛下，一德日新，九功时叙，固已丹书闻灏瑞之道，绿图炳河洛之传，积贮足而民乐其生，象魏县而人端其行矣。乃睿德谦冲，犹以鉴古衡文、藏富型方之道，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至愚极陋，

念敷奏以言，及询于刍荛之义，敬承清问，敢不竭所诵习以对，用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史非徒纪事，所以监先式后，等百世以为因革损益者也。臣考江淹曰："作史莫难于志"。年表始于司马迁，并及前代帝王，《世本》既失，赖以证古。又作"八书"，褚少孙补其亡篇，《礼》取荀子《礼论》，《乐》取《乐记》，不足称也。班固《汉书·艺文志》取诸《七略》，其《地理志》考《禹贡》山川，引《周地图》及桑钦说，郑康成注书用之。惟《古今人表》以意轩轾，且多阙略，如《吕览》朱襄氏之臣士达，《墨子》燕简公之臣庄子仪之属不载，是可补也。范蔚宗《后汉书》，合以司马彪《续汉志》，刘昭注极博赡。陈寿作史，名《志》无志，后人议之。沈约《宋书》，虽以《符瑞》蒙讥，然《乐志》载古乐章，《州郡志》载侨置，颇资掌故。魏收《地形志》，详于山川、古迹，并及碑刻，惜其杂出《释老》一志。《晋志》唐时所补，李淳风、于志宁等各用所长。然其时《太康地志》、《晋书地道记》、《舆地志》尚存，惜其《地里》一志不能博考。《隋志》兼有五代，最为详核。新旧《唐书》互有短长，而《通典》、《元和郡县志》之典章、地理，精当过之。《五代史·职方表》尤略，尝见《太平寰宇记》载五代州郡县沿革甚详，又可补也。史家创传，因人立名，然得失互见。迁、固屈贾马杨传中，载其文章，不别立《文苑》，最为得体。后世改易其例。其班固《儒林传》载传经诸儒，后之史家或取性理之学为《儒林》，不如《宋史》别立《道学传》之为得矣。释老之类应入《方伎》，《元史》别立一传，亦殊谬也。史家有赞，惟司马迁补传外意，其余论评皆赘。刘知几、郑樵《通志》，辨证史例尤详。然刘多偏见，郑则考古甚疏，惟《世族略》稍长耳。我皇上学贯天人，特撰《贰臣传》以昭《春秋》笔削之志，又敕纂《职官表》，统古今而稽职掌，诚千古未有之盛事矣。

制策又以经典所垂，具有明训，而欲酌文质之中。斯诚正学明理之要道也。臣读周秦之文，自经传而外则有诸子，犹《三百篇》之后有楚词。管、荀之文，犹似《六经》；老之精，庄、列之超，晏、尹文、公孙龙之辨，韩、商、鬼谷之谲；《墨子》质而明，《文子》赡而俊；《吕氏》、《淮南》兼用诸家之长。汉魏文人之所滥觞也。刘勰《文心雕龙》博论文

体，自谓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其言过当，然其书典核可观。初唐诗有齐、梁风格，文有徐、庾规模。自有杜甫、韩愈，一变其体。杜诗出于汉魏乐府，韩文出于《史记》、《汉书》，不袭骈俪之体，所以为工。梁昭明太子《文选》虽取华藻，然如子夏《诗序》、孔安国《书序》、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之属，亦有采焉。宋真德秀矫其弊太过，遂流于朴僿。要之文各有体，考古议礼之文宜于质直，所谓"君子耻言有枝叶"也；赋颂之文不病华缛，所谓"敷陈其事，雍容揄扬"也。故两汉赋颂之属亦多沉博绝丽，六朝议礼之文亦近清真雅正云。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而欲酌盈剂虚以求给足。斯诚藏富于民之良法也。臣惟籴粜敛散之法自管仲始，而李悝用之富国。汉有耿寿昌设常平仓，每代行之。隋长孙平设义仓，即用其法。唐太宗因之，亩税二升，饥则赈民，又或贷种秋偿。高宗以后，用为他费，神龙中略尽。元宗时有和籴。居易疏论之，谓和籴不如折籴。宋时韩琦建广惠仓，朱子又奏立社仓，日久渐以生弊。又有博籴、给籴、俵籴、兑籴、括籴、均籴之名。金元以来，亦有常平、义仓之设。明有预备仓，巡抚周忱又立济农仓。大抵立仓原以救荒，自唐行和籴，则仓储为军国之需。宋南渡后，更恃为军饷、边储之一大事，而利鲜及民，亦时势使然耳。我国家纬武经文，拓地万里，余粮栖亩，亦既含哺鼓腹矣。惟宜以实心实政，筹爱惜物力之方。况皇上截漕平粜，所以为闾阎计者至优且渥。治人治法，从古不能方其万一；胥吏之伦，咸知回心而向道矣。

制策又以昔先王设奇邪之禁，严左道之诛，将为杜渐防微，清源正本。斯诚道一风同之盛轨也。臣考尧舜之世，比户可封。《礼》称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昔太公诛华士，孔子诛少正卯，子产杀邓析，谓其似是而非，莠民诚不可以杂良也。夫熙皞之世，歌咏太平，润色鸿业，祈报蜡社，固不可禁。而潜察奸宄，在严保甲之任乎？《周官》立比闾族党之法，而党正、闾师有以闲其邪僻。汉承秦制，亭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巡禁盗贼，所以辅风教而诘奸慝也。今州县官诚择邑之孝弟力田者奖谕之，俾

教导其乡。又饬保甲察缉逃亡以相保任,则奸黠无所容,而胥吏需索之端,亦不禁而自绝。我国家化泽涵濡,士大夫读书明理,民日迁善远罪,而不知更何至有诱于罪福之说,惑乎谩妄之言?而为政之道,在预遏其萌,则学校之修,月吉之布,尤当知所急务矣。

若此者:典坟邱索之既备,则鸿都虎观不足方其博也。赓歌飏拜之有词,则《长杨》、《羽猎》不足方其醇也。阜财庆则虞帝之裳垂,诛行消则成周之刑措。《白虎通德论》称"唐,荡荡也;虞,乐也"。又称"尧德峣峣,舜德巍巍"。其复见于今乎?臣尤伏愿我皇上至诚无息,安益求安。考订精而常懋孜孜之念,雅音矢而弥求蔼蔼之材。不以仓廪足而忘视民之如伤,不以风俗醇而忽志淫之有禁。士既学古多文,民亦厚生正德。休哉!国家亿万载无疆之庆,肇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唐尧稽考古事是为了恭奉天命,《周易》仰观天文是为了实现教化。《周礼》记载了仓人主管粮仓、遗人主管库藏的制度,《礼记》记载有对言行伪诈而又固执的防范。《七经义纲》称孔子说:"化能合乎神者称为皇,德能合乎天者称为帝"。《易乾凿度》说:"天子这一称号,是指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而抚养民众的人,这是最尊贵的称号。'皇'的含义是中央;'帝'的含义是细察"。正因为立足于居中临御的智慧,仔细地观察社会人伦,所以圣作明述的事业得以昭然,经纬天地的才能得以具备,家给人足的治理得以实现,移风易俗的教化得以形成。《尚书·说命》称:"自始至终好学不倦。"《易经》称:"夬卦,举用于王庭。"又称:"以丰美的财利造福于天下。"《论语》说:"富裕之后对他们进行教育。"古代久安长治,民众快乐而颂声大作,道理就在这里。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品德日新,功业常建,本来已经是理政之术如同被丹书具载的颛顼之道,天下太平如同出现了河出图、洛出书那样的瑞兆,粮储丰足而民众安居乐业,法令严整而百姓行为端正。可是陛下您圣德谦虚自抑,又以借鉴古代,评论文章,藏富于民,训导地方的方法,将我们士人招进殿廷策问。臣下我极其愚昧无

知,考虑到奏陈意见是臣民的义务,我一个草野之人怎敢不竭尽平素诵习的内容对答皇上的垂询,以献出管窥蠡测的一片热忱呢?

跪拜敬读制策,制策认为史籍并非只是为了记载史实,还用以借鉴前朝垂范后代,流传百世以作为因袭或革除的参考。臣下我查检江淹说过:"纂修史书莫难于作志。"史书有年表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内容并及前代帝王,《世本》失传之后,全靠它来考查有关古代的世系。司马迁还作有"八书",褚少孙对亡佚的卷篇进行了补充,《史记》的《礼书》取自于《荀子·礼论》,《乐书》取自于《乐记》,这些不足称道。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取自于《七略》,其《地理志》参考了《禹贡》的内容,引用了《周地图》及桑钦的学说,郑康成注书使用了它的材料。但他的《古今人表》随意褒贬,并且有很多缺略,例如《吕氏春秋》一书所见的朱襄氏之臣士达、《墨子》一书所见的燕简公之臣庄子仪这类人就没有记载,这些内容可以补充进去。范蔚宗的《后汉书》,汇合了司马彪《续汉书》的志和刘昭的注释,内容极其广博丰富。陈寿纂修的史书,书名有"志"而内容无志,为此遭到后人的非议。沈约的《宋书》虽因《符瑞志》遭到讥评,然而《乐志》所记载的古代乐章,《州郡志》所记载的侨置州郡县,颇具资料价值。魏收的《地形志》,详细记载了山川、古迹以及碑刻,可惜它又杂列出《释老》一志。《晋书》诸志是唐朝时期所补,李淳风、于志宁等人都发挥了各自所长。然而此时《太康地志》、《晋书地道记》、《舆地志》等书都还存在,可惜它的《地理》一志未能广考博集。《隋书》诸志内容兼述五代,最为详细完备。新旧《唐书》二书互有短长,而《通典》、《元和郡县志》有关典章、地理的内容、体例很精当,超过了二书。《五代史·职方表》尤其简略,我曾读过《太平寰宇记》,见所载五代州郡县的沿革甚详,这些内容可补《五代史·职方表》的不足。历史学家创立列传的体例,因人立名,而得失互见。司马迁、班固在屈原、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的本传中,登载了他们的文章,没有别立《文苑传》,最为得体。后世的史家改变了这一体例,班固的《汉书·儒林传》载列传授经学的诸儒,后来的史家有人将性理之学归入《儒林传》,不如《宋史》别立《道学传》处理得得当。释老之类应该归入《方伎传》,而《元史》别立《释老》一

传，也是很荒谬的。史家有赞论，只有司马迁是超出正文之外的补充说明，其他人的论、评都是累赘。刘知几的《史通》、郑樵的《通志》，对史书体例的辨证尤其详明。然而刘知几多有偏见，郑樵的考证太粗疏，只有《世族略》稍略见长。我们皇上学问贯通天人，特撰《贰臣传》以弘扬《春秋》的修史笔法，又下令纂修《职官表》，贯通古今而又便于稽核职掌，这确实是千古未有的盛事。

制策又鉴于经典所传，备载先王明训，因而要求斟酌文采和质朴的适中。这确实是正学明理的关键。臣下我看周秦时代的文章，在经传之外还有诸子百家，二者的关系犹如《诗经》三百篇之后又产生了楚词。《管子》、《荀子》达到了极文极雅的程度，犹如《六经》一般；《老子》达到了极精微的程度，《庄子》、《列子》达到了极超然的程度，《晏子春秋》、《尹文子》、《公孙龙子》达到了纯思辨的程度，《韩子》、《商君书》、《鬼谷子》达到了极诡谲的程度；《墨子》质朴而鲜明，《文子》博赡而俊逸；《吕氏春秋》、《淮南子》兼用诸家之长。这便是汉魏文学形成的渊源。刘勰的《文心雕龙》博论文体，自称于梦中手执红漆礼器，随孔子南行。他说的话往往过头，而此书的内容典雅赅博，相当可观。初唐的诗歌带有齐、梁风格，文章具有徐陵、庾信特点。自有杜甫、韩愈之后，文体始为之一变。杜甫的诗歌源出于汉魏乐府，韩愈的散文源出于《史记》、《汉书》，他们没有沿袭骈俪的文体，创作的作品极有功力。南朝梁昭明太子的《文选》虽然取材华藻，然而如子夏《诗序》、孔安国《书序》、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之类，亦有可采之处。宋代的真德秀矫正《文选》的流弊有些过分，于是导致了过于朴陋。总而言之，各类文章自有体裁，考据古典、研究礼仪的议论之文适宜于质朴直率，即所谓“君子以文章篇幅过长枝蔓太多为耻”；赋、颂之类文学诸体之文则不把典雅华藻视为缺陷，即班固《两京赋》所讲的“铺叙陈述起来，从容不迫而极力渲染”。所以两汉时期的赋颂之类也是大量铺陈，辞藻华丽，六朝时期的议礼之文也是接近于清新率真，淡雅质淳。

制策又鉴于粮食的积储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因而想调剂余缺以达到家给人足。这确实是藏富于民的好方法。臣下我认为粮食的籴

粜敛散之法开始于管仲，而李悝采用之后达到了富国的目的。汉代有耿寿昌倡设常平仓，以后历代实行。隋代长孙平倡设的义仓，即采用了耿寿昌的方法。唐太宗时期因袭了义仓制度，实行亩税二升，饥荒时则用以赈济灾民，又或者是出贷种子秋天偿还。唐高宗以后用作其他经费，神龙时期消耗殆尽。唐玄宗时期有和籴。白居易曾上疏讨论和籴，认为和籴不如折籴。宋代的韩琦设立广惠仓，朱熹又奏立社仓，施行日久逐渐产生了弊端。另外又有博籴、给籴、俵籴、兑籴、括籴、均籴之名。金元以后也有常平仓、义仓之设。明代则有预备仓，巡抚周忱又设立了济农仓。大抵立仓原本是用以救荒，自唐代实行和籴起，仓储便成为军国之需。宋代皇室南渡以后，更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国防储备的主要内容，而极少惠及民生，这也是时势造成的结果。我们国家武功强盛，拓地万里，余粮遍地，百姓早已是丰衣足食了。目前应以实心行实政，筹划爱惜民力物力的方法。再说皇上平时又是截取漕米，又是平价供粮，对老百姓的关怀无微不至；治理国家的人才和治理国家的法律，自古以来都不能达到现在的万分之一；胥吏之辈，也都知道回心转意走向了正道。

制策又鉴于古代先王制定有对谄媚欺诈行为的禁令和对旁门左道的严厉诛伐，将要采取防微杜渐，正本清源的措施。这真是道德风俗归于一统的重大举动。臣下我考察唐尧虞舜之世，人人品德高尚，家家可获封爵。《礼记·王制》称命令太史陈列诗篇，用以观察民情民风；命令市场官员呈报物价，用以观察民众生活的喜好厌恶。过去姜太公诛杀华士，孔子诛杀少正卯，郑子产诛杀邓析，都是说他们表里不一似是而非，奸人确是不可以混杂于良民之中。在升平之世，百姓们歌颂太平，为盛世宏业润色增辉，有关祈求还愿蜡祭社火等活动，自然不可禁止。而随时监控奸人，在于要严格加强保甲制度。《周官》制定有比、闾、族、党之法，而党正、闾师熟悉所属的治安状况。汉代承袭秦朝制度，亭、乡置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主掌教化，游徼主掌巡查和禁捕盗贼，是用以辅佐教化而惩治奸邪的。如今州县官员认真择取乡邑中那些品性端正、致力本业者给以奖励委任，让他们领导一乡，教育所属。又饬令保甲查缉逃犯互相连保，如此就会奸邪

无处容身，而胥吏敲诈勒索的苗头也不禁而自绝。我们国家深仁厚泽，士大夫读书明理，老百姓越来越向善远恶，不知道还会受到什么罪福之说的诱骗和谶妄之言的蛊惑呢？然而施政之道，在于要预先遏制奸邪于未萌。因此学校的兴办，每月初一对国法的颁布宣读，尤其应当知道是当务之急。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各种典籍文献已经具备，则汉代鸿都、白虎观的藏书不足以比拟我朝图籍的广博。各种文学体裁应有尽有，则《长杨赋》、《羽猎赋》之类的名篇不足以比拟当今文章的纯正。财物丰富则会象虞舜时天降祥瑞那样天下大治，僻行消失则会象西周那样刑具措而不用。《白虎通德论》说："唐，是浩浩荡荡的意思；虞，是快快乐乐的意思"。又说："唐尧的品德高洁，虞舜的品德崇高"。唐尧虞舜的景象真的又重见于今日了。臣下我衷心祝愿皇上至诚之心不息，平安了更求平安。考订虽精而更思孜孜不倦，雅音虽正而弥求济济人才。不因为仓廪已经丰足而忘记民众的疾苦，不因为风俗已经淳厚而忽略对荒淫的禁令。士人已经博学多文，民众也是安康俗纯。真是美好啊！我们国家亿万年无限的吉庆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

董教增　殿试对策

董教增(1750～1822)　字益甫(或作"其")，又字观桥，江苏上元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探花。后历官礼部考功司主事、四川盐茶道、贵州提刑按察使、安徽巡抚等，嘉庆间官至闽浙总督。其在督抚中以识见明果著称，所言"人不可做无益事，不可为无益语，不可用无益钱"；"刻于己为俭，俭于人为刻"，被称为名言。

臣对：臣闻鉴古所以知今，同文所以考道，阜财所以裕俗，正德所以兴教，斯经国之大猷，治世之要务也。稽诸载籍，鸿濛未启，爰有坟索之书；乔野尚存，先流卿云之藻。万物得极其高大，百姓至不相往

来。休哉，何道之隆与！圣人因之，制作渐备，有奉简之职，有教胄之官，有委积之掌，有木铎之徇。本末具举，巨细兼该。于时风俗大和，朝无作聪明之君子，野无轻稼穑之小人，是以文皆可信，言必有伦，乐利贻诸奕祀，声教总乎朝廷，天下称郅隆之盛治焉。

钦惟皇帝陛下，咸五登三，金声玉振，邵农重本，锡福宜民，固已制作之隆上掩百王，教养之泽下周黎庶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体至善之无穷，冀愚者之一得，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纪载之体、文章之要，兼及于积贮、民风诸大政。臣之庸陋，即殚精极虑，何足以仰赞万一？然幸际嘉言罔伏之时，惟古者先资拜献之义，敢不即所诵习者以对！

伏读制策有曰：史非徒纪事，所以监先启后，以为因革损益，而因备举诸史之异同。此诚执笔者所当研究，以昭慎重者也。盖诸史之体不一，而其原皆出于司马氏。孟坚虽断代为书，而纪传之文多因其故，惟改“书”以为“志”，取《货殖传》以为《地理志》，较之太史为优耳。陈寿无志，而后儒因以言作志之难。范书亦无志，刘昭等补之。而郑夹漈乃通缉诸史之文，统名之曰志，又其变也。夹漈之言曰：“山川终古不易，而郡县之名代有更改”。于是举《禹贡》以为志地理之法，以为自班氏而下皆可不存。其论自非无见，然千余年以来相沿不改，一旦欲创为别体，其事固未易也。《符瑞》、《释老》，语多夸诞，载之正史，体要何存？分立诸传，诸史各自不同，然大要在因人因事，如汉之《党锢》、唐之《藩镇》是也。宋立《道学传》，事同一例，不得以他史并论矣。史有褒贬二义，而通以“赞”名，论者尝讥之。其或曰“评”，作史者所以自见其识。必拟以专争口舌，亦似未免太刻。刘知几作《史通》，于前史多指摘，而执笔不逮古人，非知之匪艰之明验与？我朝典策大备，纂修诸臣敬谨将事，而衮钺所在，往往上秉圣裁，执笔之士得所遵循，其焉有纪载失实之虑哉！

制策又以《虞书》标言志之文，宣圣示辞达之旨，而于文体诗体详辨其源流。盖文章与政治通，其中正变之故，不可无所裁制，以昭极则也。三代以前，以文明道。秦汉而降，始有以文著者。而评论得失，则刘勰《文心雕龙》尤著。虽核其体制，局于齐梁，而较之诸家，固非

陆机、钟嵘可及也。杜诗、韩笔为作者冠冕，其所得力之处各自言之。杜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韩曰："能自树立不因循"。盖皆一代之英杰，而又专肆力于此，以故前古无有，后世莫及耳。《昭明文选》为词章渊海，其弊也失之绮靡。真氏《正宗》，大近朴塞，其分词命、叙事、议论诸体，盖欲以此上接《六经》，示学者修辞立诚之义，不仅为文章言也。诗之为体，自三百而后盖屡变矣。建安为五言极盛，晋宋以后渐以衰苶，至唐而复振，要求其足以扶世翼教，大抵有合于风雅者近是。国家文运昌明，多士获生其间，酌文质之中，彬彬称盛，不亦幸欤？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自《周官》廪人、遂人之掌，而常平、社仓实师其意，然弊亦因之而滋。臣以为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也，惟在乎用法之人耳。是以不得其人，则上焉者有墨吏之亏蚀，下焉者有猾胥之蚕蠹，居其中者复驵侩囤积。无以惩之，而国家之良法美意，只以惠奸贪而终不及于良善。事为之制，人为之防，精神有所不及，而其弊已如前矣，此不得人之患也。如得其人，而效亦随矣，何又采买虑价昂矣。然准上熟、中熟之意，不且农末交资耶？散给虞中饱矣，然惸惸之吏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又宁有良吏而不能行政者耶？仰惟皇上爱育黎元，截漕平粜，无日或间。惟在大吏董率所属，以实心行实政而已。

制策又以先王设奇邪之禁，严左道之诛，恐其惑世诬民。此诚为世道人心设未然之防，使无犯者也。夫乡里愚民或诱于福罪之说，而匪徒得乘机鼓动，诚事之所不免。一蹈于法而欲从而恕之耶？固事理所不可。然论其本，则亦陷于不自知耳。此圣人所以多为之禁，而亦刑期于无刑之妙用也。虽然，杜渐防微不若澄源正本，盖人之禀于天者厚，则邪气不能为之伤；民之渐于教者深，则邪说不能为之动。然为此者，非一日之故也。先王之教民也，虽至纤至细之事，皆尝预为之地，曲为之防。礼义之说著，而谩妄之言有倡之而弗应者矣；学校之制行，而非僻之行有斥之而无与者矣。然则使民无犯，莫如治之于其本之为愈也。我国家德化涵濡，士大夫既以读书明理，而仍虑有司化导之未及，此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尤圣德之所以度越千古者也。

凡此者:严著作之体,而纪载不妨有阙文;总文质之运,而儒雅亦足以鸣盛治。物丰于野,而百昌咸获其休;民安其性,而四方咸纳于教。国家久安长治之基,不外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借鉴古代是为了知晓今天,统一文字是为了研究学问,积累财富是为了纯化风俗,端正道德是为了振兴教化,这是治理国家的大计,管理社会的要务。根据文献记载,鸿濛未启的浑沌时代,就有了《三坟》、《五典》、《九丘》、《八索》之类的书籍;榛莽原野尚存的时候,就已流传有《卿云之歌》的文藻。万物得以随意生长,尽情高大,百姓至于老死,不相往来。真是盛美啊!多么隆盛的王道!圣人继之而起,各项制度逐渐完备,有执行考核检查的官职,有主管贵族嫡子教育的学官,有主管库藏粮仓的执掌,有负责摇铃警众的人员,本末具举,巨细兼备。这时风俗非常醇和,朝中没有自作聪明的君子,民间没有轻视农耕的小人。因此文章都是朴实可信,言语必定顺畅有条理,惠政给百姓带来的精神快乐和物质利益世代相传,风俗和教化演变的枢纽掌握在了朝廷手中,天下普遍称赞进入了升平极盛之世。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的品德超越五帝三王,各种才艺萃集一身,勉励百姓耕种而重视农本,赐惠天下而造福民众,本来已经是制度的创设超过古代百王,教养抚育的恩泽遍及黎民百姓。可是陛下您圣德谦虚自抑,不肯遗忘细微,抱着至善无穷的态度,希望听取愚者的一得之见,将我们士人招进殿廷,策问有关史籍的体例,文章的精要,并兼及仓储制度、民风民俗等重要政务。臣下我极其庸碌愚昧,即使殚精极虑,也不足以仰赞皇上期望的万分之一。然而有幸遭逢良言可以尽情陈述的时机,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怎敢不就平素所诵习的内容对答皇上的垂询呢?

跪拜敬读制策,制策认为史籍并非只是为了记载史实,还用以借鉴前朝垂范后代,流传百世以作为因袭或革除的参考,因而要求

列举诸种史书的异同。这真是史家应当研究，用以显示慎重的基本要求。各种史书的体例不一，而其本原都是出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虽是断代为书，而本纪、列传的内容大多因袭《史记》原文，只是改“书”为“志”，将《货殖传》改为《地理志》，较之于司马迁为优。陈寿的《三国志》并没有志，而后人因此感叹作志非常之难。范蔚宗的《后汉书》也没有志，刘昭等人对它进行了补充。郑樵汇集诸史内容，统称为《通志》，又是一种新体例。郑樵说过：“山川自古没有改换，而郡县的名称代代有更改。”于是将《禹贡》作为纂修地理志的基本模式，认为自班固以后都可以不存。这一观点自然不是没有见解，然而千余年来相沿不改，一旦要想创造出另一种体例，这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符瑞志》、《释老志》，内容大多属于夸诞不实，将这些内容记载于正史，这叫做什么体例?分立各种类传，诸史各自不同，然而大要在因人因事而定，例如《后汉书》的《党锢》、《唐书》的《藩镇》就属于这种情况。《宋史》设立《道学传》，事同一例，不能以它史与此相提并论。纂修史书的指导思想有褒扬和贬斥两个原则，而通常称作“赞”，论者曾对此批评。也有的称作“评”，属于修史者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一定把它说成是专争口舌，似亦未免太尖刻。刘知几作《史通》，对于以前的史书多有指摘，而自己亲自执笔纂史并比不上古人，这大概就是不亲自实践不知道艰难的明证吧?我朝典章制度完备，纂修国史的诸臣兢兢业业，而褒贬所在，往往秉承皇上圣裁，执笔之士得以遵照执行，哪里会有记载失实的顾虑呢!

制策又鉴于《尚书·虞书》标榜文章是用以抒发情感志向的，孔圣人提倡语言词汇是用以顺畅明白地表达思想内容的，因而要求详细考辨文体和诗体的源流。因为文章与政治存在相通之处，所以不能对其中的“正”与“变”无所裁制，以昭示最高的准则。夏商周三代以前，文章是用来说明道理的。秦汉以后，才开始有人以文学作品著称于世。而评论得失，则有刘勰的《文心雕龙》最为突出。验核本书的体制，尽管受到齐梁风气的局限，不过较之于当时

诸家，则本非陆机、钟嵘等人可以相比。杜甫的诗歌、韩愈的散文，被视为文人的楷模，他们都各自谈过自己的心得。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韩愈说："能自树立不因循"。他们都是一代英杰，而又专门致力于文学创作，因此取得的成就前无古人、后世莫及。《昭明文选》可称为词章的渊海，其缺点也是失之于绮丽浮靡。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太过于质朴，该书分为词命、叙事、议论诸体，是想以此上承《六经》，显示学者的修辞立诚之义，不仅仅为言文章而言文章。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自《诗经》三百篇之后已经屡有变化。建安文学为五言极盛时期，晋宋以后逐渐趋于衰微，至唐代再度振兴，力图追求以此作用于社会，辅助教化，大抵与《诗经》的风、雅主旨相近似。我们国家文运昌明，士人们获生其间，斟酌兼采，文质适中，彬彬称盛，不也是很幸运吗？

制策又鉴于粮食的积储是百姓生存的根本，自从《周礼》记载国了廉人、遂人有关储备的职掌之后，后世的常平仓、社仓实际是师法了它的精神，然而弊端也因此滋生。臣下我以为天下之法未有无弊端的，关键在于执法之人如何。因此任非其人，则上有贪官的侵蚀，下有猾吏的蚕食，中间有奸商的囤积居奇，不给以惩处，则国家的良法美意，只能有利于奸商贪官而最终不能有利于良善百姓。建立各种制度以互相制约，设置各种人员以互相监督，一旦精力稍有疏忽，弊端就一如既往，这是任非其人的缺陷。如果能任人得当，则成效亦随之而来，哪里又用得着担心采购引起市价上涨呢？然而按照上等收成、中等收成来购进售出以平抑粮价的指导思想办，不也就农商互为补充了吗？散发赈济都会担心有人贪污中饱，如果称职的官吏一日计事不足，则一月计事总是有余，又哪里会有良吏不能胜任管理的职能呢？我们皇上真心抚育百姓，又是截取漕米，又是平价供粮，一天也没有间断，唯有期望高官们率领所属，以实心行实政而已。

制策又说古代先王制定有对谄媚欺诈行为的禁令和对旁门左道的严厉诛伐，担心上述行为煽动百姓蛊惑人心，这是为了给世道人

心设防于未然，使人不再违犯。某些乡里愚民受到福罪之说的诱惑，匪徒乘机从中鼓动，这确实是不可避免之事。一旦犯法而想要给以宽恕吧?自然是法理所不允许。然而论其本原，倒也确是因为自己不知法。这是古代圣人之所以为之多方设禁，期望通过刑罚达到废除刑罚目的的妙用。虽然如此，防微杜渐不如正本清源。因为人受到先天的赐予越厚越多，则邪气就越不能对他造成伤害；百姓受到的教化影响越长久，则他们就越不会被邪说所动。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一朝一夕可就。古代先王教育民众的时候，虽是非常细微的点滴琐事，都要预先为之作出安排，处处为之设防，免出纰漏。礼义的作用能充分发挥，那么即使有人散布谩妄之言也会无人响应；学校教育的制度得到广泛推行，那么邪僻之行只有遭到斥责而无人参与。然而这样不使百姓犯法，不如从根本上进行治理为优。我们国家深仁厚泽，士大夫已经致力于读书明理，而仍然在考虑官员的教化引导是否无所遗漏，这是国家升平了更求升平，安定了更求安定，尤其是皇上的圣德超越千古的原因所在。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严格要求历史著作的体例，而记载不妨像《春秋经》那样有阙文；总揽文采和质朴适当运用的方法，而儒雅也足以歌颂盛世。物类丰产于大地原野，则百业全都呈现出吉祥之兆；民众各自安于本身天性，则四方全部纳入到教化之区。国家久安长治的根基不外乎这几个方面。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孙继民译〕

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溥博如天，渊泉如渊。

苟为不熟，不如荑稗。

殿试策问

[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 制曰：朕寅承天佑，抚驭寰区，五十有四年，稽诸往牒，自三代以下所未有，用致海宇小康，尉候广远，集家庆于五代，祝丰岁于三登，虔荷昊苍眷赉者独厚。子于父母，不敢言报，惟是朝夕乾惕，日慎一日，仰体仁覆之心，布德于众，兆民由小康而臻上理，集思广益，冀于实政有裨。多士通经致用，蒇史适用，敦习尚以征材，修浚防以溥利，妙损益以鉴古。讲肄有素，其仁予谘询焉。

经旨奥衍，章句其显也。《易》备四德者七卦，爻无卦名者五卦，言数者二十七卦，吉居一耳。有六爻皆吉者，有五爻皆吉者，是可偻指之。《舜典》他籍所引，或以为《唐书》，或以为《夏书》。言仁言性，言诚言学，何以皆始《商书》？《洪范》有考定文，其可从欤？《诗》三百十一篇，名见《礼》及《左传》者凡几？十五《国风》，或谓斟酌次序，或谓以两相比，语出何氏？《春秋》最重书王，冠于正月、二月、三月者可计也，有阙一时者，有阙二时者，有无月有日者，有有朔无甲子者，有有日无事者，可详也。《考工记》不合周制者何官？《中霤》、《投壶》、《迁庙》、《衅庙》，可补《仪礼》否？《夏小正》、《周书·时训》可代《月令》否？缕悉言之，将征所学。

史家属词比事，出于《春秋》，互文尤关考证。班固之书，半资司马，或因或改，异同得失，至为繁赜。南、北《史》合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之书，亦有短长，缀谱系、划时代，何者为优？新旧《唐书》，今武英殿始合刻并存，修者谓事增而文减，论者或轩眴而轻祁，孰为定论？薛居正《五代史》佚之数百年，近始辑成，其视欧阳修《五代史记》孰以事胜？孰以法胜？至若"表"罗古今，"志"补前代，汉末群牧，错见《国志》，典午《载记》，间人《魏书》，其参互论断，以为定衡焉。

士为四民之倡，朝廷登选，将以备任，使厚风俗也。乡举里选之典古矣，九品中正流弊更甚，以文取士，自唐至今循之。其中糊名易书，搜索之禁，分路分额，分卷分经之法，累代史志言之详矣。然汉世已有私改漆书文字之讥，八叉假手，一联巡乞，场屋丑之。至郁轮袍绿衣吏而扫地矣。上请之说，通榜之议，其何取焉？今制《四子书》以正其途，《五经》以博其趣，八韵以觇其才，五策以征其实，立法善矣。士宜何如端淳淬砺，以副予文治乎？

《禹谟》六府，《箕畴》五行，皆先曰水，除其害所以溥其利。西北之渠，川蜀之堰，自豫已下之堤，沿江沿海之塘，其大势也。昔人谓《禹贡》无堤防字，然而地徙流合，人众地辟，若酾若鬣，其何以鸠民而奠之？若夫陶庄之河，引溜北趋，窖金之洲，排江东注，海塘之筑，一劳永逸，要未尝非疏瀹与堤防并用。朕数十年来临事图指，不惜数千万帑金，以为闾阎计，大都平成矣。其或随宜善守而有未尽，又偏隅井邑畎浍沟洫之则，自田间来者，亦有可指陈欤？

《说命》以师古攸闻，周文以监代成盛，重古制也。然鉴古必宜今，有可因，有不可泥。古有边防，今日无边防，幅员广矣，其诚无边防乎？古有马政，今日无马政，孳贡蕃矣，其诚无马政乎？古辟雍，今亦辟雍，立之郊外则已迂。古养老，今亦养老，三老五更袒割酱馈则已亵。今韶乐犹古，无取乐古之沿。今藉田犹古，无取劳酒之琐。古美命官交让，仿以为京察自陈，则伪也。古取经筵讲学，责以为成就君德，则诲也。朕久道慎修，思跻淳邃，而酌古准今，屏华崇实，具有微权。其有能知古知今，以会其通者，可推广陈之欤？

凡兹五事者，蕴诸心为经史之实学，施诸政为教养之良规，见诸事为古今之善制。沐浴涵泳，服我作人之化者，端心声，祛臆说，实著于篇，朕将亲择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曾点，你怎么样？曾点弹瑟正接近尾声，铿地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回答说：我的志向同他们三位所讲的不一样。

周遍广阔如苍天，静深有本像深渊。

五谷如果不能成熟，还比不上稊米和稗子。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承奉天命，统御天下九州，已经五十四年了。稽考以往的历史记载，这种情况自夏商周三代以下就不曾有过，因此使海内出现了生活小康，国土广大，社会安宁的局面，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五代的家族吉庆汇集到一起，农业上连年丰收，五谷丰登。苍天赐给我们的恩惠实在丰厚了，就好像子女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是不能用报偿一类的话来表达这种感情一样，皇帝我只有以终日勤奋，不稍懈怠，一天比一天恭敬庄重的勤政热情来报答，将上天体念仁爱百姓，庇护抚育民众的圣德传布给天下黎民，使百姓由小康更进一步达到理想的社会，通过集思广益而对实政多所补益。诸位士人对通晓经学而致力于实践，熟谙历史而应用实际，敦尚民俗以选拔人才，修筑堤防以推广水利，斟酌损益以借鉴古代，都学习日久，研究有素，你们来听皇帝我提出以下问题。

经典主旨的探密和演绎，需要通过章句的解释得到体现。《易经》中具备有四德的是七卦，爻没有卦名的是五卦，言数的是二十七卦，吉利的只有一卦。有六爻都是吉利的，有五爻都是吉利的，这些都可以屈指数来。《尚书》的《舜典》，其它书籍所引有人认为是《唐书》，有

人认为是《夏书》。谈论"仁"、"性"的内容和谈论"诚"、"学"的内容，为何都开始于《尚书》的《商书》？《洪范》曾有人对此考定文字，能够信从吗？《诗经》的三百一十一篇，篇名见于《礼记》及《左传》的共有多少？十五国风，有人说它的次序经过斟酌，有人说以两相比，有关话语出自何人？《春秋》最重视王位纪年的书写方法，时间书写上冠以正月、二月、三月的有数可计，其中有缺一个季节的，有缺二个季节的，有的没有月份但有日期，有的有朔日但没有甲子，有的有日期但没有记事的内容，可以详细列举出来。《考工记》所记内容不合周代制度的是何官？《中霤》、《投壶》、《迁庙》、《衅庙》的内容文字，可以补充《仪礼》的内容吗？《大戴礼·夏小正》、《周书·时训》可以替代《礼记·月令》吗？一一缕述列举上述内容，将体现你们的学问功底。

史家行文措词编年记事，都是源出于《春秋》一书，文字内容互见尤其关系到考证研究。班固的《汉书》一半凭借于司马迁的《史记》，内容有的是因袭《史记》，有的是稍加改动，其中异同得失，至为纷繁深奥。《南史》、《北史》汇合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诸书内容，也是各有长短。叙述谱系、划分时代，哪种史书具有长处？新旧《唐书》，现行的武英殿本才开始合刻并存，纂修者称《新唐书》内容增加而文字减省，研究者有的抬高刘昫而贬低宋祁，哪种看法是正确的观点？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散佚了数百年，最近才辑轶成书，此书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哪个以记事见长？哪个以章法见长？至于用表列叙古今，用志补充前代，东汉末年各州牧杂见于《三国志》一书，《晋书·载记》应该记载的内容有的出现在《魏书》，你们要参互比较，提出看法，作为评价的标准。

士人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朝廷实行科举，准备给予任用，以使你们治理民众，淳厚风俗。乡举里选的制度很古老了，九品中正制的流弊更为严重，通过文章选取士人，自唐代至现在都遵循实行。其中像试卷上糊住姓名，阅卷前试卷重新誊抄，检查搜索的严格，按路分配考生名额，分经分卷考试的方法，历代史志的记载很详细了。然而汉代已经有了对私改漆书经文字句的讥评。像温庭筠在考场上代替别人写律赋，贾岛在考场上乞求别人给自己想两句律赋文字，这

种行为已被科场中人所鄙视。至于像王维通过创作琵琶曲《郁轮袍》，靠别人说情而获取功名，这种做法已使进士的尊严完全丧尽了。允许在考试中向主考人员询问题意，考试尚未进行而已经预定考中者的名单，这些方法有什么可取吗？现在规定通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四子书"来端正士人的途径，通过《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的"五经"来培养士人的旨趣，通过试帖诗的"八韵"来考察士人的才华，通过对策文提出问题的"五策"来证明士人的实才，订立的制度很完善了。你们士人应如何端正自身，砥砺磨炼，以适应皇帝我实行文治的需要呢？

《尚书·大禹谟》所说的"六府"，《洪范》所说的"五行"，都是首先谈到了水，着眼点都是为了通过根除水害来普及水利。西北地区的水渠，川蜀地区的堤堰，自河南以下的黄河大堤，沿江沿海的塘坝，这是水利情况的总体概括。过去人们说《禹贡》没有提及堤防一类的字词，然而地形地貌的变化，河流的汇合，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垦辟，情况极其复杂，采用什么方法率领民众消除水患呢？至于像陶庄河分洪工程引黄河水北流，窖金洲泄洪工程排江水东注，沿海塘坝工程修筑之后的一劳永逸，总括起来都未尝不是疏浚与堤防两种方法并用。皇帝我数十年来临政处事，励精图治，不惜花费数千万金帛，都是为了百姓着想，虽然大都已经告成了，但其中或许还有应该做好和应该管好的事情却未能做到尽善尽美。再说偏远地区的水利情况，来自民间乡村的你们，是否也有什么可指陈的呢？

《尚书·说命》中傅说把效法古代说成是自己所曾听到的一条原则，周文王由于借鉴了夏商二代而形成了空前盛世，这都是重视师法古制的缘故。然而借鉴古代必须适宜于今天，有的可以因袭，有的就不可以拘泥。古代有边防，而现在没有边防，这是疆域扩大了，是真的没有边防了吗？古代有马政，而现在没有马政，这是畜牧繁荣了和进贡增多了，是真的没有马政了吗？古代有辟雍，现在也有辟雍，如果现在也把辟雍建在郊外，那就太迂腐了；古代有养老之制，现在也有养老之制，如果对三老、五更还是由天子亲自为他们割牲执酱做慰劳，则是对今日的莫大讽刺；现在演奏韶乐仍跟古代一样，但没有必

要取古乐来照搬照用，现在藉田仍跟古代一样，但没有必要取用古代天子宴请慰劳群臣的琐碎礼仪。古代以朝廷命官相互谦让为美事，但若把它照搬到现在考核官员的京察自陈那就是虚伪了。古时候实行为皇帝经筵讲学的制度，但要求它来成就君主的品德，那就变成讲官教诲君主了。皇帝我一直实行德政，慎修自身，期望达到品性的纯正和睿智的深邃，因而斟酌古制，适应现实，摒弃浮华，崇尚朴实，掌握化导的契机和转换的枢纽。你们有人能够博古通今，融会贯通，给予发挥吗？

以上五个方面：潜心于学问则致力于经学、史学这样的实学，施行于理政则创制出教育、抚养民众的良规，运用于事务则订立下无愧古今的善制。你们这些沐浴着浩荡皇恩、惠受到我皇朝教泽的人，要端正态度，除去臆说，将你们的见解如实写进文章，皇帝我将要亲自从中遴选择取。

胡长龄　殿试对策

胡长龄（生卒年不详）　字印渚，江苏通州人。室名三余堂。乾隆五十四年（1789）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著有《俭德斋随笔》。

臣对：臣闻考载籍者，必折衷于六艺；式前闻者，尚体要于三长。选士造士，所由辨论官材；康功田功，遂以弼成五服。然必得会通因仍之道，而后有神明损益之权。《春秋传》曰："视诸故府"，则其事也。荀卿曰："欲观圣王之迹，于其粲然者矣"。是则枕经葄史既观治忽之源，设教图功愈得化裁之益。唐虞文思光被，浚哲重华，惠畴载采，地平天成，皆本之于则天慎宪，俊德敕命。《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书》曰："君子所其无逸"。前圣之膺受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稽古同天，观文成化，作人倬云汉之章，敷土庆山川之奠。固已事勤于三五，而功兼于在昔矣。乃圣怀冲挹，深思久安长治之道，弥切持盈保泰之图，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经学、史裁、贡举、浚防、鉴古。臣之椯昧，何足知此？顾念先资拜献之义，敢不诵所

闻以效愚者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经旨奥衍,章句其显也。臣按汉儒说经,各有章句,递相师承,以为家法。故《后汉·徐防传》言:"博士试经,多从私说。自今策试甲乙,宜各用其家章句"。惟费氏《易》无章句,时刘向以三家校之,或脱"无咎"、"悔亡",独费氏与古文合,即合所传本。《困学纪闻》言:"卦备四德者,乾、坤、屯、随、临、无妄、革七卦。六爻皆吉者,惟谦一卦。言数者二十七,爻无卦名者五"。其它讹文脱句,如郭京之《易举正》、容之《随笔》,载其二十余条。范谔昌《易证坠简》,若"不丧匕鬯"之类,均未为无补正经也。《尚书·舜典》,今文合于《尧典》,古文乃分为二。前人不见孔书,故所称多异。如《左传》以《舜典》、《禹漠》为《夏书》,《说文》引《舜典》为《唐书》也。说者谓《商书》始言性学等,见孔子之传有自来,其说近凿。苏轼、王柏、金履祥皆有考次《洪范》,凭臆更古圣之旧,其过甚于僭经。司马迁言孔子删《诗》,然三百十一篇之外,其佚犹散见于各经。如《狸首》、《驺虞》、《采齐》、《肆夏》等之见于《礼》;《新宫》、《河水》、《祈招》、《茅鸱》、《鸠飞》、《辔之柔矣》等之见于左氏也。《毛诗》次序,郑康成先有《诗谱》,欧阳修得之重加补缉,始秩然可观。说《春秋》者,谓以夏时冠周月,惟左氏春王周正月,一字可抉千古之疑。至日月有无,皆因史阙文。以是言例,徒滋缪辐。《考工记》以补《冬官》,不尽合周制。古经出于淹中,合五十六篇。惟《士礼》十七篇与高堂生合,吴澄以《中霤》、《投壶》等八篇补之,固已离于全经矣。《月令》,吕不韦之书也,《隋志》谓马融足人。《周书·时训》为刘歆所改,不若用《夏小正》为得耳。我皇上典学高深,表章微义,凡在横经执业者,敢不益自砥砺,以期通方适用哉!

制策又以史家互文,尤关考证,因改异同,至为繁赜,而兼及于志、表、载记之错出。诚观治尚象之要务也。臣惟《史记》上综古昔,班固始断代为史。理有相因,事非剿袭。陆澄注班书多引《史记》,皆采摘成句,标为异说,书今不传。厥后李思作《班马异同》,所著颇详。李延寿南、北《史》,剪截繁芜,视本书为有加。新旧《唐书》,论者或轩昸而轻祁,盖《新书》不载俪辞,故删诏令,专工涩体,徒觉艰深。然谓文

减于前，事增于旧，亦其所长也。欧阳修以薛史之繁，重加修定，书成初藏于家，后诏取列学官，薛书遂微。今乃称合璧，物之显晦，固自有时。然欧书究略，必得如裴松之之注《三国志》而后为尽美也。作史最重表志，《汉书·古今人表》殊失断限，惟《隋书》志兼五代，绍闻述往，厥意甚宏。若魏收取同时列国之君而强附臣传，斯无谓之至也。

制策又曰：士为四民之首，将以备任，使更以厚风俗也。臣案虞廷有九德之采，周室有三物之兴，汉晋以来，郡国守相得以掌荐举之权，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自隋而缙绅发轫，始由于科目。唐代因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字、明法等科。而士俗所向，惟明经、进士而已。李肇《国史补》云："进士为时所尚久矣，其争名常切，其为俗亦弊"。盖其势然也。唐博士、助教分十经为大、中、小以授诸生。宋司马光、欧阳修并以分路均额为言。熙宁、元祐之间，经义、诗赋迭为废兴；景德、祥符之际，糊名易书，制防已密。盖禄利之路既开，斯浮薄之风日竞，此班固已致意于《儒林》，而蔡邕欲求正乎经字也。然则欲正本澄源者，必如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仕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则三代之风可以复见矣。

制策又以除其害所以溥其利，而欲疏瀹与堤防并用。斯体国经野之善术也。昔平当以明《禹贡》使领河堤，奏言"经义有决河深川，无堤防壅塞之文"。按《周礼》匠人为沟洫，稻人"以防止水，以潴蓄水"。盖其制相为表里，故曰"善沟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自秦开阡陌，制度悉堕，而水利之说始兴。《史》、《汉》所载，如史起引漳以灌邺，郑国导泾以富秦。郑当时穿渭关中，庄熊罴引洛商颜，李冰、文翁凿通江水，并言其利。然水就下者也，遏而陂之，利于旱而不利于水。而翟方进、杜预之徒，又必欲尽去陂障，则逞其偏见，而未规其美全也。夫因势利导，存乎其人。我朝海塘、河工、江防诸大政，悉奉睿略指示，相度机宜，安澜胥庆，诚驾禹功而上之者矣。

制策又以鉴古必取宜今，有可因有不可泥。斯尤执权用中之至道也。臣以为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易世，不相袭礼，盖创制显庸，自有制度，初不必慕古昔以为美名也。如疆域也，南北一候尉，不必置屯戍而自固金汤；如马政也，天骥充下陈，不必立监坊而如游汧、

渭。更若国典朝章,上仪隆礼,于监古成宪之中,寓综核名实之道。伏读《御制评鉴阐要》,著日星之大义,垂政典之恒经,洋洋乎丕天之大律,畴能亘之哉!

若此者:鸿都虎观,不足言经术也;金匮石室,不足言史才也。兴秀举孝,龙首白渠,不足言其训俗而厚生也;夏造殷因,或素或青,不足言其折中而贵当也。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备哉粲烂,真神明之式也。臣伏愿皇上本日新之德,法天健之行,安益求安,延洪曼羡。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庆,肇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考证载籍必须以《诗经》、《尚书》、《易经》、《礼记》、《乐经》、《春秋》"六经"作为判断的标准,纂修历史著作还需要掌握史才、史学、史识"三长",选拔士人、培养士人是发现、任用有才能的人为官的必要途径,君王节俭、勉励农耕是为了使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服事天子。必须得到会合变通的因袭之道,而后才能把握斟酌损益之权。《春秋左传》定公元年所说的"回去查看一下档案"就是这样一件典型的事例。《荀子·非相》说:"要考察古代圣王治国原则中那些清楚明白的东西"。由此可见埋头钻研经典史籍可以考察国家安定与动乱的根源,设施教化、励精图治更能收到化育裁制的效益。唐尧虞舜的功业和道德光照天地人间,具有深邃的智慧,并在唐尧的基础上重增文德光华,考察人才,任用贤德,水土平治,万物成长,都是本源于效法天道而慎守法度,发扬大德而兢兢业业。《易经·乾》说:"君子通过效法天道而能自强不息"。《尚书·无逸》说:"身居官位的君子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古代的圣人之所以博得盛名而常为后人称道,都是因为牢记了如上的教诲。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稽考古事而敬顺上天,仰观天文、近观人文而蔚成教化,大量选拔贤才超过了古代先王,修建工程使山川大地平顺奠安。本来已经是勤政理事超越了五帝三王,功绩盖过了古代所有勋业。可是陛下圣德谦虚自抑,深思久安长治之道,弥切持盈保泰之图,将我们士人招进殿廷,策问有关经学、史书体例、科

举、兴修水利、借鉴古代等问题。臣下我极其愚昧无知，哪里知道如此道理？但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怎敢不就自己平素诵习的东西回答垂询以期愚者一得呢？

跪拜敬读制策，制策认为经典主旨的探密和演绎，需要通过章句的解释得到体现。臣下我谨按汉代儒生研究经典，各家都有自己的解释，递相师承传授，形成了各家的流派。所以《后汉书·徐防传》说："博士考试经典多是根据个人的私见。自今以后再举行策试决定名次，应该各自采用自家流派的解释"。只有费氏传授的《易经》没有章句解释，当时刘向根据三家传授的《易经》进行校对，有的就脱漏了"无咎"、"悔亡"等内容，独有费氏的传本与古文的《易经》相合，于是将它合入自己的传本。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说："《易经》具备四德的卦名是乾、坤、屯、随、临、无妄、革七卦，六爻都是吉利的只有谦一卦。言数的卦是二十七卦，爻没有卦名的是五卦"。其它的讹字脱句，如郭京的《易举正》、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有二十余条。范谔昌《易证坠简》中像"不丧匕鬯"之类，都不是对正经无所补益啊。《尚书》的《舜典篇》，今文经将它与《尧典篇》合而为一，古文经则将它分而为二。前人没有见到过孔安国的传本，所以说法多有不同。如《左传》认为《舜典》、《大禹漠》属于《夏书》的内容，《说文解字》引用《舜典》时作为《唐书》的内容。研究者认为《商书》开始谈论性理之学等，可见孔子的解释是有来源的，此说近于穿凿。苏轼、王柏、金履祥都曾经考订《洪范》，凭自己的理解更改古代圣人的旧文，他们的过失超过了伪造经典。司马迁称孔子删订《诗经》，然而在三百一十一篇之外，其佚失的内容仍然散见于其它各经。如《狸首》、《驺虞》、《采齐》、《肆夏》等篇见于《礼记》；《新宫》、《河水》、《祈招》、《茅鸱》、《鸨飞》、《辔之柔矣》等篇见于《左传》。关于《毛诗》的次序，郑康成先撰有《诗谱》，欧阳修在此基础上重新加以补充编缉，这才秩然可观。研究《春秋》的人，认为该书是以夏代历法的季节冠以周代历法的月份，对此只有《左传》的"春王周正月"的"周"一字可以决断这桩千古疑案。至于日月的有无，都是因为史有缺文所致。如果把它和体例联系起来，那只

能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用《考工记》补《周礼》的《冬官》,内容并不尽合周制。古代经典出土于鲁国的淹中,总共有五十六篇。只有《士礼》十七篇与高堂生传释的古经相合,吴澄将《中霤》、《投壶》等八篇补充进去,早已是脱离了全经。《月令》是吕不韦所著,《隋志》说是由马融给加入《礼记》中的。《周书·时训》为刘歆所改,不如用《大戴礼·夏小正》为得当。我们皇上勤奋好学,知识高深,探微发幽,阐释精义,凡是尊孔读经的士人,敢不更加砥砺自奋,以达到知识博通、才能实用吗?

制策又鉴于史家著作文字互见,尤其关系到考证研究,内容的因袭、改动、异同,最为纷繁深奥,因而涉及到了志、表、载记的内容交错问题。这确实是观察政治情况、观察社会现象的要务。臣下我认为《史记》是会综古代的通史,至班固才开始断代为史。《汉书》理应对《史记》有所因袭,并非属于抄袭。陆澄注释班固的《汉书》就大量引用《史记》,都是采摘现成的语句,却标榜为是新提出的异说,他的书现今已没有传本。从那以后,李思撰写《班马异同》,所著非常详细。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剪裁繁芜,删去重复,与所汇合的原书相比内容有所增加。对新旧《唐书》,研究者或抬高刘昫的《旧唐书》而贬低宋祁的《新唐书》,这是因为《新唐书》不载骈文俪辞,删去了诏令,专意于讲究行文,致使文体艰涩。然而说它文字比以前减少,内容比《旧唐书》增多,也是它的长处。欧阳修认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过于繁复,重新加以修定,书成之后藏于家中,后来皇上下诏令取出列于学官,《旧五代史》于是逐渐被人忽略,以致失传。今日二书合璧并传,可见事物的明暗显晦,本来就有其自身的机缘。然而《新五代史》毕竟简略,必须得到如裴松之注《三国志》那样的注释才能称为尽善尽美。纂修史书最重视表和志,《汉书》的《古今人表》在断限方面疏失过大,而《隋书》的诸志是兼综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与以前史书记载的内容相衔接,其用意和指导思想极为宏远。至于像魏收的《魏书》取同时列国之君而强附为列臣之传,实在是无谓之至。

制策又说士人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准备给予任用,以使他们治理民众,淳厚风俗。臣下我查检古代虞舜时期有依据九德择

取人才的制度，周王室有依据六德、六行、六艺“三物”荐举贤能的制度，汉晋以来郡守和国相得以掌握荐举之权，九品中正得以主管人物评议之柄。自隋代以后，官员的起家开始通过科举，唐代因袭了这种制度。科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字、明法等科，而士人的风气趋向只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李肇《国史补》就说：“进士为社会所尊崇，已经很久了，他们争夺名次通常较急切，但一旦形成风气也就产生了弊端”。这也是客观形势造成的。唐代的博士、助教将十经分为大、中、小三类以传授学生。宋代的司马光、欧阳修都提出按路分配科举名额。熙宁、元祐年间，考试内容或是经义或是诗赋，迭为废兴；景德、祥符之际，或是试卷上糊住姓名，或是阅卷前试卷重新誊抄，防止作弊的制度已经很严密。入仕做官的禄利之途既然打开，于是轻浮浅薄的风气愈演愈烈，对此班固已经寓意于《儒林传》之中，因而蔡邕想要求正于经字。然而要想正本清源，必须要像朱熹《学校贡举私议》说的那样，士人前来做官，为义而不为利，那么夏商周三代的纯正风气就可以重见于今日。

制策又鉴于除水害是为了普受水利，因而要求疏浚与堤防并用。这是治理国家、规划政区的好方法。从前西汉的平当因精通《禹贡》而被任命主管黄河河堤事务，他上奏皇帝称：“经典上说治理黄河只有分流泄洪和疏浚河道的办法，而没有修筑堤防和堵塞水潦的记载”。根据《周礼》，匠人主掌田间沟渠，稻人主掌“以堤防遏水，以陂塘蓄水”。这些制度和措施都是互为表里的，所以《周礼·考工记·匠人》有“善于开挖沟渠者利用水的冲力来冲刷，善于筑堤者利用水的淤土来筑堤”的说法。自从秦代废除井田，各种制度全部遭到破坏，因而有关水利的学说开始盛行。如《史记》、《汉书》所载，有史起引漳河水灌溉邺的田地，有郑国开渠引来泾水使秦人富裕。有郑当时穿凿渭水贯通关中，有庄熊罴引洛水至商颜山下，有李冰、文翁凿通江水，都是倡言兴修水利。然而水是流往低处的物质，遏制水势而作陂塘，利于抗旱灾而不利于抗水灾。而翟方进、杜预之类的人，又坚持主张全部撤去陂塘和堤障，则是表现了他们的偏见，而未能规划出万全之策。根据水势而善于疏导，关键在人。我朝的沿海陂塘、治

黄工程、长江堤防等大工程，全都遵奉陛下的圣略指示，把握机宜，避免了水患，普天同庆，真是治水的功绩远超于大禹之上了。

制策又认为借鉴古代必须适宜于今天，有的可以因袭但不可以拘泥。这尤其是灵活处置和坚持适中尺度的最高法则。臣下我认为五帝所处时代不同，故不递相沿用乐制，三王时期社会发生了变化，故不递相因袭礼制，创立的制度是否施行长久，自有其本身的规律，不必处处以崇慕古人作炫耀的借口。例如疆域，若国家统一强盛，不必像汉代那样沿边设置戍兵而国防自然会固若金汤；再如马政，若良马充盈马厩，不必像唐代那样设立马监马坊而畜牧业也会兴旺繁盛。其它如我们国家的典章制度，隆重礼仪，都在借鉴古制的成份中包含了综核名实的原则。恭敬地阅读陛下的《御制评鉴阐要》，论述了天地之间的最高道义，概括了政典之中的永恒规则，真是洋溢着天命天意的重要法则，除皇上之外谁能穷尽此理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如果都能做到，那么像汉代鸿都、白虎观那样繁盛的经学可以轻而易举地出现；像留下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史著的史家可以大量涌现。推行科举，整顿吏治，那么淳正风俗和厚养民生就可以很容易做到；夏代开创，商代因袭，各种制度的优劣好坏就很容易评判并得当。对照《六经》而衡量道德，审视古今而评论功绩，完美而又充满光明灿烂，真是神明无比的法式。臣下我衷心祝愿皇上不断砥砺品行，师法遵行天道，平安了更求平安，永享洪福而再添丰饶，国家亿万年无疆的太平盛世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啊！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

汪廷珍　殿试对策

汪廷珍(1757～1827)　字玉灿，别称瑟庵，江苏山阳人。室名实事求是斋。乾隆五十四年(1789)榜眼。后由翰林院编修历官国子监祭酒、提督江西学政、太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等。卒谥文端。著有《实事求是斋诗文集》、《作赋例言》，与人合编有《新

疆识略》。

臣对：臣闻观文者成化之原，吁俊者尊帝之实。《书》纪涤源既陂之治，《易》著变通神化之宜。《礼记》载孔子曰："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郑《注》谓："人主法天当如是也"，《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孔颖达谓："得长久之道，以光宅天下，使万物从化而成也"。古圣人本纯一不已之心，行悠久无疆之政。而稽古右文，经史崇焉；举贤育才，俊乂出焉。地平天成，而百川顺理焉；酌古准今，而万世永赖焉。所由典章大备，教养兼隆，而成一代之郅治者也。

钦惟皇帝陛下，至健法天，太和寿世，固已同唐尧之稽古，轶周文之作人，利导得宜而行所无事，质文交济而协于大中矣。乃圣德渊冲，不遗微小，犹以明经、考史、取人、治水、监古，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占毕庸愚，乌觇体要？然幸际嘉言罔伏之时，惟古者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即生平所诵习者以对乎！

伏读制策有曰：经旨奥衍，章句其显也，而因及夫《易》、《书》、《诗》、《礼》、《春秋》之文。臣按元亨利贞，《文言》谓之曰四德。乾以下，若坤、屯、随、临、无妄、革，皆备之卦。爻多举卦名，惟坤、小畜、泰、大畜、既济不及。《易》本倚数，而以数言者二十七卦，吉一而已。独谦之一卦，内三爻皆言吉，外三爻皆言利，而家人一卦，亦五爻皆言吉焉。《舜典》今文本合《尧典》，而传记或引为《夏》、《唐》，以舜本绍尧而书成于夏史，犹"念兹在兹"之称为《夏》，"无偏无党"之系以《商》也。言仁始《仲虺》，言性始《汤诰》，言诚始《太甲》，言学始《说命》，特文昉于此耳。《武成》有程子、刘敞、蔡沈等定本，《洪范》有苏轼、王柏、金履祥等定本。然《武成》有《汉志》日辰可据，《洪范》或移"庶征"之文于"五纪"，或易"皇极"、"三德"之词于"福极"，直臆说而已。《诗》篇名见《礼》及《左传》者，若《鹿鸣》、《白华》等见礼制，《文王》、《肆夏》等见称说，《硕人》、《黄鸟》、《清人》等见事迹，《草虫》、《六月》等见赋诗，不可胜举。而逸篇如《新宫》、《河水》、《猩首》类犹多。十五国次序，毛郑义已殊，故朱子以为不可晓。《春秋》尊王，于春三月必

以王冠之,虽无事必书首月,传所谓四时备,然后为年也。然桓四年、七年阙秋、冬;定十四年阙冬;昭十年十二月无冬;僖二十八年冬无月,有壬申、丁丑;桓十七年冬十月有朔,无甲子;桓五年春正月甲戌无事,皆因旧文,或以为有义,非矣。《考工记》,汉河间王以补《周官》,然《轮舆》异《巾车》,《旗旐》异《司常》,《匠人》异《遂人》矣。《中霤》见《月令注疏》,《迁庙》、《衅庙》见《大戴记》。《投壶》,《小戴》亦有之。王应麟谓即淹中古经之逸。《大戴夏小正》、《逸周书·时训》与《吕氏》十二纪首篇,同异相半,可互考也。我国家敦崇经术,四经三礼炳列学官,士咸知离经而辨志矣。

制策又以史有异同得失,而欲参互论断,以为定衡。臣闻孔子修史,先观《周书》,左氏传经,先辑《国语》,以传闻异辞,当会其通也。班固《汉书》,太初以前多袭用迁史,而断汉为书,去前代本纪,分侯世家;志,改《平准》为《食货》,《河渠》为《沟洫》,《封禅》为《郊祀》;表,改诸侯、功臣、将相之例,而独创为《古今人表》,其得失参半。延寿南、北《史》能删繁举要,司马光称其亚于陈寿。然不作表、志,不若沈约。魏收史虽劣,而能志一朝之典故也。刘昫《旧唐书》,其是非多谬,而文颇明赅,足资考证。《新唐书》表自谓事增文减,然如《文德皇后传》"户知之",《德宗王后传》"祭无用寓"之类多晦涩。而崔沔《驳太常议》三见,来济四人"言志"两见本传,未为简也。《五代史》,薛居正以事胜,欧阳修以法胜。尝考五代时诸书,如《十国纪年》、《九国志》、《五国故事》、《吴越备史》、两《南唐书》诸书及《通鉴考异》,乃知欧之赖薛补正者多矣。若《隋志》之兼五代,《宋志》之入魏晋,刘表诸人两见《后汉》、《三国志》,《晋载记》后半间入《魏书》,异同得失,皆可互考。其他古别史存于今者,如谢承《后汉书》,荀悦、袁宏《汉纪》之类,诚仿裴松之注《三国志》法,博引以考正史,不独广异闻,并可衷一是矣。

制策又以士为四民之倡,而详及夫选举之制。臣考《周官》:"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德、行与艺兼重者也。使民兴贤,郑众以为若今举孝廉,兴能以为若今举茂才,是汉法犹近古也。九品中正,刘毅极论其非,谓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以文取士,唐以后皆

然矣。怀挟之禁，自唐已严。宋尤加密，糊名始于淳化，易书始于祥符，五路别立分数，经卷殊其大小，盖不得不然也。唐以通榜取士，爰有求知己温券之习，其流至于借手他人，假途贵戚，呈身宦竖。以视汉之行赂，改兰台漆书以合私文者，抑又甚矣。岂称言有坛宇，行有坊表者哉！我皇上立制，三场并重，期得真才，士生今日，宜何如端醇淬厉乎！

制策又以除害所以溥利，而筹及疏瀹堤防之要。臣惟《传》称"为川者决之使导"，说者遂谓古不防川，然而防之名见于《毛诗》、《尔雅》、《礼记》矣。汉武帝塞宣房而梁、楚无水灾，王景修筑汴渠堤，利及数郡。元贾鲁上治河二策，脱脱以疏塞并举为是。是疏导、堤防，不可偏废也。束河以堤，捍海以塘，通以渠而分减其势，障以堰而时泄其暴，古人无以易矣。我皇上临视图指，不惜数千万帑金以为闾阎计，而偏隅井邑，畎浍沟洫之利亦无不修，惟在司事者之实力奉行耳。

制策又曰：鉴古必取宜今，有可因有不可泥。此千古论治之枢要也。臣闻司马迁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然，周而复始"。董仲舒曰："天不变，道亦不变"。二端异焉。盖因先古而损益，法后王之粲然，亦曰"时为大而已"。俗儒偷为一切，迂儒动引古初。要以时异世殊，故杂霸或以成功，而官礼反以误国。《记》曰："考诸三王而不谬"，在得其意而已。得其意则凡边防、马政之法，辟雍、韶乐、养老、藉田之典，京察自陈、经筵讲学之文，岂必拘拘古制乎哉！

凡此者：定章句、备同异所以明实学也，核名实、慎疏防所以求实用也，酌古今、参时变又以实心行实政之权衡也。《援神契》谓"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应劭谓"奉行天道，举事审谛"。其谓是欤？臣尤伏愿我皇上至诚无息，安益求安。经术已明而益思表章，史志已备而益勤搜采。俊民章而更严敷奏明试之典，四海同而弥重修利道达之原。文教愈隆，人才愈出，水土愈平，合前代而观其通，胥万古而立其极，登三咸五，纯佑延洪。我国家亿载咸宁之庆，基于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观察天文人文是形成教化的本原,选拔任用贤才是使帝王之位尊贵的实际措施。《尚书》记载了兴修水利的主要方式,《易经》彰明了变通神化的适宜做法。《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说:"如同太阳、月亮自东到西相跟随而从不停息,这就是天道"。郑玄的注释在这里说道:"君主效法天道就应当像这个样子",《易经》说:"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孔颖达解释说:"持久地推行顺应时势的统治方法,就像阳光普照天下人间,使世间万物从化而成"。古代圣人本着砥砺品行而永无止境的精神,实行着悠长久远而无穷尽的政治措施。因而稽考古事、重视文化,经学史学得到崇尚;通过科举选贤、学校育才,俊彦奇士得以涌现;水土平治、万物成长,而所有河川平稳安流;酌采古制、合乎今情,而成为万世长治久安的依赖。这都是由于典章和制度完备,教化和抚养兼善,而形成的一代盛世之治。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坚持不懈地效法天道,元气太和而使世人寿高,本来已经做到了如同唐尧一样稽考古道,并超过了周文王的奖掖人才,疏通河水得宜而各个流域平安无事,质朴和文采相济而符合于中正之道。可是皇上圣德越是深厚,越是不肯遗忘微小,仍然以通晓经学、考证历史、选拔人才、兴修水利、借鉴古代等问题,将我们士人招进殿廷进行策问。臣下我极其庸碌愚昧,不懂得政事的大体和事务的纲要。然而有幸遭逢良言可以尽情陈述的时机,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怎敢不就生平所诵习的东西对答皇上的垂询呢?

跪拜敬读制策,制策认为经典主旨的探密和演绎,需要通过章句的解释得到体现,因而涉及到了有关《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的内容。臣下我谨按《易经》所说的元、亨、利、贞,也就是《文言》所称的四德。乾卦以下,象坤、屯、随、临、无妄、革等,都是具备四德的卦名。爻辞大多列举卦名,只有坤、小畜、泰、大畜、既济等卦没有举出。《易经》原本都是靠的数字,因而以数字言二十七卦,吉的只有一卦。只有谦一卦内三爻都是言吉,外三爻都是言利,而家人一卦也是五爻都说的是吉。《尚书》的《舜典》一篇,今文本将它与《尧

典》合为一篇，而后人的传记有的引为《夏书》，有的引为《唐书》，这是因为虞舜本是继承唐尧而《尚书》成于夏代史官之手，犹如“念兹在兹”应该属于《夏书》的内容，“无偏无党”应该属于《商书》的内容一样。谈论“仁”的内容始于《仲虺》，谈论“性”的内容始于《汤诰》，谈论“诚”的内容始于《太甲》，谈论“学”的内容始于《说命》，不过这只是说有关的词语始见于此处。有关《武成篇》的研究有程子、刘敞、蔡沈等人的定本，有关《洪范篇》的研究有苏轼、王柏、金履祥等人的定本。然而《武成篇》有《汉志》的日辰可以为据，《洪范篇》或移“庶征”之文于“五纪”之中，或易“皇极”、“三德”之词于“福极”之中，只是主观臆说而已。《诗经》篇名见于《礼记》及《左传》的，像《鹿鸣》、《白华》等篇是见于礼仪制度的叙述当中，《文王》、《肆夏》等篇见于《左传》的称说，《硕人》、《黄鸟》、《清人》等篇见于《左传》的事迹，《草虫》、《六月》等篇见于《左传》的赋诗，举不胜举，而散轶的篇目如《新宫》、《河水》、《狸首》之类更多。关于十五国风的排列次序，毛亨和郑玄在意义的解释上已经有差异，所以朱子认为不可理解。《春秋》的主旨是尊王，每于春三月必以王冠之，虽无内容也必定书写首月，即《传》所谓的“四季具备，然后才构成一年”。然而鲁桓公四年和七年缺秋、冬两季；鲁定公十四年缺冬季；鲁昭公十年十二月条无“冬”字；鲁僖公二十八年冬季没有月份，有壬申、丁丑条；鲁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条有朔但无甲子；鲁桓公五年春正月条列有甲戌但无内容；这些都是因袭旧文，有人认为其中含有寓意，这不对。《考工记》一书，西汉的河间王刘德用来补充《周官》的内容，然而其中的《轮人篇》、《舆人篇》有异于《巾车篇》，《旗𣰰篇》有异于《司常篇》，《匠人篇》有异于《遂人篇》。《中霤篇》见于《月令注疏》。《迁庙篇》、《衅庙篇》见于《大戴礼》。《投壶篇》，《小戴礼》也有关于它的记载，王应麟说这就是鲁国淹中所出古代经典的逸文。《大戴礼·夏小正》、《逸周书·时训》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首篇，文字或同或异，各占一半，可以互为参考。我们国家尊崇儒家经典，“四经”、“三礼”都被列为官学，士人们都懂得钻研经典而汲取营养了。

制策又鉴于史书存在异同得失，因而要求参互比较，提出看法，

作为评价的标准。臣下我听说孔子在修史之前，先观览了《周书》，左丘明在传释《春秋》之前，先辑成了《国语》，通过考察不同的文字记载，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班固的《汉书》，太初年间以前大多袭用司马迁的《史记》，时间以汉代作为断限，去掉了前代本纪，将列侯从《世家》分出归入列传；志的部分，将《平准书》改为《食货志》，将《河渠书》改为《沟洫志》，将《封禅书》改为《郊祀志》；表的部分，对诸侯、功臣、将相的体例也作了改动，而独创了《古今人表》，这一改动得失参半。李延寿的《南史》、《北史》能删繁举要，司马光称其仅次于陈寿的《三国志》，然而不作表和志，不如沈约的《宋书》。魏收的《魏书》虽然低劣，然而毕竟记载了一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刘昫的《旧唐书》，其是非观念多有谬误，而文字颇为明畅，足资考证历史。《新唐书》的表文自称内容增多而文字减少，然而如《文德长孙皇后传》中的“户知之”，《德宗昭德王皇后传》中的“祭无用寓”之类，多有晦涩。而崔沔的《驳太常议》的内容凡三见于本传，来济等四人“言志”的内容凡两见于本传，这不能算是简洁。两部《五代史》，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以记事见长，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以章法见长。我曾考察五代时期的诸书，如《十国纪年》、《九国志》、《五国故事》、《吴越备史》、两《南唐书》诸书及《通鉴考异》，才知道《新五代史》靠《旧五代史》补正的地方很多。像《隋书》诸志兼综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宋书》诸志掺入了魏晋内容，刘表等人分别见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的《载记》后半部分有的夹杂《魏书》的内容，其中的异同得失，都可以互相考见。其他古代别史留存于今天的，如谢承的《后汉书》，荀悦、袁宏分别纂修的《汉纪》之类。确实对它们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方法，广征博引以考正史，不仅可以扩大异闻，并且可以判断史实是非。

制策又鉴于士人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因而要求详细叙及选士的制度。臣下我检考《周官》有言：“根据乡里的六德、六行、六艺教化万民而推举贤能”，就是要求德行与才能兼重。从百姓之中举贤，郑众认为就好比是当今的举孝廉，从百姓之中举能，认为就好比是当今的举茂才，可见汉代制度还是接近于古代。对九品中正制，晋朝的刘毅极论其非，称它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以科

举文章选取士人，唐代以后都是如此了。考试严禁怀藏挟带，自唐代起就已经很严格。宋代防范尤其加密，试卷上糊住姓名开始于淳化年间，答卷内容重新誊抄开始于祥符年间，五路各自确定分数，经卷分为大小，这是不得不如此。唐朝科举存在尚未开考而已经预定考中者的所谓“通榜”取士的方法，于是就有了请求名人显要推荐自己的所谓“温卷”的风气，后来发展到或用他人代笔，或通过贵戚疏通，或卖身投靠宦官。以此与汉代的徇私行赂，私改兰台收藏的漆书经文的情况相比，又是大大超过了前代。这类人哪里还谈得上言谈话语为人楷模，行为举止为人表率呢？我们皇上建立的科举制度，初场、二场、三场并重，期望得到真正人才，士人生活于今日，应该怎样去修身养性完善自身呢？

制策又鉴于根除水害是为了普受水利，因而筹划疏浚与堤防措施的要点。臣下我考虑：《传》称“治理河流要疏浚河道，进行疏通以导流”，论者于是认为古代河流不设堤防，然而“防”一词早已见于《毛诗》、《尔雅》、《礼记》等书了。汉武帝时堵塞黄河的瓠子决口，而梁、楚之地不遭水灾，王景修筑汴水渠堤，利益惠及数郡。元代的贾鲁呈上治理黄河的二策，脱脱认为疏导与堵塞二者并举的主张正确。于此可见疏导和堤防二者不可偏废。控制黄河要靠大堤，防御海潮要靠塘坝，以泄洪渠道来分减水势，以堤堰遏制水势而适时泄其洪流，古人治水除此之外也是别无它法。我们皇上到现场视察，指示具体的治水方略，不惜花费数千万金帛为百姓谋利，而偏隅乡村的水利设施也是无不修缮，一切都在于主持官员的实心实力奉行而已。

制策又说，借鉴古代必须适宜于今天，有的可以因袭但不可以拘泥。这是千古论政的核心。臣下我听说司马迁说过：“三王之道好像是循环而行，周而复始”。董仲舒说过：“天如果不发生变化，道也不会发生变化”。两种观点截然不同。应该既因袭先古又有所损益，师法后王最突出的那部分。也可以这样说：“时代潮流第一”。但浅陋的儒生苟且地全照老样子办，迂腐的儒生都是动辄引用古训，实际情况是时代已经不同，社会已经变化，所以有的杂采王霸之道获得了成功，而拘泥官礼者反而导致误国。《礼记》说：“考证夏商周三王而不

出错误”，关键在于掌握它的精神实质罢了。如果是掌握了精神实质，那么凡是有关边防、马政的制度，辟雍、韶乐、养老、藉田的旧典，对在京官员进行考核的京察自陈、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的经筵讲学的惯例，何必一定要严格拘泥于古制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订正章句、备考同异是用来彰明实学的，校核名实、慎择疏防是用来追求实用的，斟酌古今、适应时代又是以实心行实政的重要参考。《援神契》说“像上天一样无所不在覆盖之中，像大地一样无所不在博载之中，这就叫做天子，他效法北斗星和北极星而居天下之中”。应劭说“遵奉实行天道，举动行事就会审慎全面”。他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臣下我衷心祝愿皇上至诚之心不息，平安了更求平安。经学已经得到阐释而更加追求彰明，史籍典志已经完备而越发勤于搜采，贤人已经得到重用更加严格选拔人才的制度，四海一统而更加重视因势修治水利之原。文治愈受到推崇，人才愈易于涌现，水土愈趋于平安，纵览前代而看到历史的通变，观察万古而建立最高的法则，超越五帝三王，社稷得到天佑而洪福绵延久长。我们国家亿万年升平之世的命运就建立于这个基础之上啊！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

〔孙继民译〕

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皆自明也。

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殿试策问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祗承大宝命,仰荷燕翼贻厥,御宇久长。日慎一日,惟是纳隍驭朽,廑于以养以教,以子惠兆民,上答昊绎恩德。今幸年跻八旬,康强勤恁,未敢高自颐养,抑非术致驻延。孜孜不息,久习而安,用致五代逢吉,四裔向风,保赤诚求,鲒倪爱戴。然犹仔肩罔怠,思欲持敬宅心,鉴古出治,千仓藏富,六计励官。而集思广益,贵乎周逮,乃询尔多士,以仜昌言。

《洪范》九畴,五福验之人,八徵验之天,而总原于五事之敬用。故主敬者,天人之合也。《尚书》道政事,赅帝王五代心传,万世治要。其中深切著明,惟"曷其奈何弗敬"一语,足蔽全书。向曾于读《召诰》篇,阐厥义宗矣。若夫耆、妫、子、姒之临其下,禹、皋、伊、旦之贡其君,六体十例中,与斯言互为发明者,可胪举欤?《易》、《诗》、《礼》、《春秋》,可旁通欤?《大戴礼》、《逸周书》、《管子》、《晏子》、《荀卿·成相》、《淮南·主术》,亦有绀绎斯语者欤?《帝范》、《帝学》,《大宝》、《丹宸》二箴,《大学衍义》、《养正图说》,或言主敬,或不言主敬,而义相印、事相彰者,可指述欤?能以此扬明廷,抑用资宥密也。

以古为鉴,可知治忽。编年之体,《通鉴》谦不敢继《春秋》,而托于继《左传》。其平生精力,书局自随,同撰者何人,分代者何属,采取

者正史外何书?略而为《目录》,析而为《甲子纪年》,订而为《考异》,别而为《稽古录》,体例可陈欤?分而冠之以纲,为《纲目》,尽出于朱子之意欤?远而追之于古,曰《前纪》,征引尽轨于正欤?续当代者《长编》、《五朝》、《九朝》,有全帙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不少约欤?续后代者《宋元通鉴》,两家之作,孰优欤?然且纪统纪年,不出至公;纪事纪辞,或嫌失实。炎兴存宋,宣光黜元。黄帝国画万区,后启鼎铸九赋。释兵权者诧奇谋,耽晏安者夸至孝。火牛燧象,虎渡蝗迁。昔备之《鉴评》,尚无愆于《春秋》之义乎?

蠲贷之政,惠泽攸先。损上益下,惠心元吉。《易》义可绎欤?昔人谓古者画井授田,故无蠲政。然帝王因利利民,《周官》之职,《左传》之文,其制亦有相近者欤?除民田租,史昉汉文。有蠲半者,有蠲十之三者,有免逋者,有免酒课坊税者;有巡幸而蠲,有封禅而蠲,有幸旧宅而蠲,有军所过而蠲,有优圣人林庙而蠲。皆能指其年代,稽其事实欤?宽缓之令,宋人谓之倚阁。或且迫于衷私,累于破限,甚至有黄纸放、白纸收者。当时章奏剀陈之,能言其弊欤?至于放民租,而以内库拨还,非示人私欤?因免赋而及私债,不扰民欤?朕课晴问雨,为民亟三时;布闾敷酝,为民谋四酺。自乾隆五十年以前,蠲贷已二千万万,积岁有加焉。本年以大庆,普蠲天下钱粮,三年而遍,冀裕盈宁而广和乐。民力其有纾欤?奉行其尽善欤?多士自田间来,盍说陈之!

善为政者,安民必先察吏。《尧典》重乎允厘,舜歌戒其丛脞。其要在先事后食,勿欺而已。《周官》太宰受其会,正其治,听其政事,岁月日皆有期会。能详之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又有十二年之巡狩,大明黜陟。立法之意,可征诸说经家欤?唐考流外官四等,宋考百官三等,皆以勤为上。能列其目欤?城隍修理,为二十七最之一。窃盗十一而得十,为中考。能举其故事欤?官百,官箴之所规,政经之所尚。断章可取欤?《戒石》本有全辞,节镌公廷,何时所颁欤?朕耄念殷求,出则秉烛待章,居则宵衣鲜寐,以尽负扆之职。盂水方圆之谓何,何犹有延玩庇饰者?率作兴事,慎宪省成,法犹未尽良欤?

凡法,立敬则不忒,法古则不愆,孚惠则不屯其膏,莅勤则不懈于位。书之简策为治谱,庀之朝夕为躬行。予曷敢弗亹,其孰敢弗蔓?上

下交修予一人，藉报帝载鸿贶之隆尔。万方更胜公堂兕觥之祝。家修廷献，明道敷言。毋讳毋肤，朕将亲遴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都要彰明自己光明的德行。

君主下令召见，孔子不等车辆驾好马便先步行走了。

孟仲子派了好几个人分头在孟子回家的路上进行拦截说：请您一定不要回家，要赶快到朝廷去。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秉承上天赋予的统治权，恭敬地承受祖宗留给子孙后代的谋略和福庆，驾驭天下已有很长时间了。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想来这迫切的心情就像救民出水火之中不避艰难一样，畏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去驾驭六匹马一样，致力于使百姓得以生养、使百姓获得教导的事情，来对亿万百姓施以仁爱恩惠，向上报答广漠天宇的深恩大德。如今有幸年龄已进入八十岁，安康强健，勤奋思考，不敢高高在上自我保养，这并不是追求养生之术导致容颜不衰老而延长寿命。勤勉努力，自强不息，使天下长期养成习惯而安定下来，因此使百姓赶上唐尧、虞舜、夏、商、周五代那样的大吉大利，四方边远地带的人仰慕向往文德教化而自动归服，保护臣民如同保护小孩一样，诚心诚意地追求，受到老人幼儿的爱护拥戴。然而仍然担负重任不敢懈怠，想把持守恭敬放在心上，借鉴古代的事情来治理国家，使所有粮仓储藏的粮食多起来，用考察官吏是否善于处理政务、是否有能力、是否勤劳守职、是否公正廉直、是否遵纪守法、是否明辨是非等六种方法来勉励官吏。然而集中众人的智慧，博采有益的意见，关键在于周到细致，于是询问你们这些众多的贤能士子，来凝神倾听正当有益的言论。

《尚书·洪范》记载天帝赐给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长寿、富贵、健康安宁、遵行美德、高寿善终等五种幸福验证于人，各种天气征兆验证于上天，而归总起来源于容貌要恭敬、言论要正当、观察要明白、听闻要广远、思考要通达等五方面事情的认真做好。所以以恭敬谨慎为主，是天道与人事的相互融合。《尚书》叙述政事，包纳了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五代帝王心心递相传授的修身和治国原则，作为千秋万代施政的要领。其中精深恰切透彻显明的话，只有“为什么不应该有所恭敬谨慎呢”这一句话，完全可以用来概括全书的内容。从前曾经在阅读《尚书·召诰篇》的过程中，已经阐述它的意义宗旨了。至于唐尧、虞舜、夏代、商代统治他们的臣民，夏禹、皋陶、伊尹、周公旦对他们的君主奉献忠诚，《尚书》的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和典、谟、训、诰、誓、命、贡、歌、征、范十种体例中，和这句话互相印证的地方，能够列举出来吗？《周易》、《诗经》、《周礼》、《春秋》，可以广泛贯通吗？《大戴礼记》、《逸周书》、《管子》、《晏子春秋》、《荀子·成相篇》、《淮南子·主术训》，也有详尽深入地说明和陈述这句话的地方吗？《帝范》、《帝学》，《大宝》、《丹扆》二篇规戒著作，《大学衍义》、《养正图说》，有的谈到以恭敬谨慎为主，有的没有谈到以恭敬谨慎为主，而意义相互印证、事情相互彰显的地方，可以指明和陈述它们吗？能够把这些问题在圣明的殿廷上阐述出来，或许可以有助于心存仁厚宁静。

把古代的事情作为镜子，可以知道治乱得失。按时间顺序编排史实的体裁，《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谦虚不敢说是接续《春秋》，却假托是接续《左传》。司马光一生专心竭力，编书的机构一直跟随着自己，和他一起撰述的作者是什么人，分掌各代的作者各自负责什么，所采用的史料除了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以外还有什么书？略举事目而写成《资治通鉴目录》，分类编排而写成《甲子纪年》，考订异同而写成《资治通鉴考异》，另外又撰写了《稽古录》，它们的体例能够陈述出来吗？分注而用大纲提要挈领，写成《资治通鉴纲目》，完全都是出自于朱熹的本意吗？将《资治通鉴》再向远古追记的著作，叫做《通鉴前纪》，所引用的史料全部合理吗？续写宋朝当代的编年体

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五朝国史》、《宋九朝编年备要》，还有完整的卷帙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看起来不稍微有些简略吗？续写宋朝以后朝代的编年体著作《宋元资治通鉴》，明代王宗沐、薛应旂两家的著作，哪家更好一些呢？然而记载一脉相承的系统，记载年代，不超出最公正的范围；记叙事实，记述言辞，有时不满意它失去真实。南宋高宗赵构的建炎年号、绍兴年号使宋朝得到了保存，北元爱猷识里达腊的宣光年号抛弃了元朝。黄帝把诸侯国划分为上万个地区，夏后氏帝启在鼎上刻写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田赋。让将帅放弃兵权的人被夸耀为有非凡的谋略，沉溺于安乐的人被夸赞为极尽孝道。用尾巴系着火炬的牛、尾巴系着火炬的象袭击敌人的战术，老虎渡河、蝗虫迁移而去。从前在《评鉴阐要》中已经将它们的虚妄阐述得十分详尽，这些记载还不违背《春秋》的大义吗？

免除租税、借放钱粮的施政措施，是布施恩泽的首要事情。减损于上、增益于下，施利于天下民众的心愿是最为吉祥的。《周易》的意义能够引申吗？从前人们认为古时候把土地划分为形如井字的方块田来授受，所以没有免除赋税钱粮的施政措施。然而帝王顺着百姓得到利益的方面做事从而使百姓获得利益，《周礼》所记载的各种官职，《左传》的文字记载，它们记载的制度也有与这种施政措施相互近似的地方吗？免除百姓按田亩交纳的赋税，史书记载始于汉文帝。有免除一半的，有免除十分之三的，有免除拖欠不还的，有免除酒税、作坊税的；有皇帝巡游驾幸而减免的，有皇帝举行祭祀天地大典而减免的，有皇帝回到从前居住的地方而减免的，有官府军队所经过的地方而减免的，有优宠祭祀圣人的树林、庙宇而减免的。全部都能指出它们的年代，稽考它们的事实吗？宽容缓和的政令，宋朝人将它叫做暂缓催纳。有时要被内心隐私所困迫，被违背期限所拖累，甚至有用黄麻纸写的文告表面进行减免而暗地里却用不盖印的白麻纸回收的现象。当时臣僚呈报皇帝的奏章已经恳切直率地陈述它，能够谈论一下这种做法的弊端吗？至于减免百姓的田租，却用皇宫府库的款项调拨偿还，这不是给人看到私占吗？因免征赋税而涉及到私人所欠的债

务,这不扰乱百姓生活吗?皇帝我卜问晴天、雨天,替百姓考虑急需的春夏秋三季农作之时;布施深厚的恩泽,替百姓谋划升、豆、区各以本身的四倍进位而形成的标准量器所能装满而够吃的粮食。从乾隆五十年以前,免除租税、借放钱粮已经达到二千万万,此后经过多年又有所增加。今年因为庆贺皇帝我的生日寿辰,普遍免除天下百姓交纳的钱财和粮食,经过三年就会遍及天下,期望丰裕富足安宁而普遍和睦欢乐。百姓的人力、物力、财力大概有所宽松缓和了吧?臣民遵照实行大概尽善尽美了吧?你们这些众多的贤能士子从农村乡间前来,为什么不直言不讳地陈述这些问题!

善于处理政事的人,安抚百姓一定首先考察官吏。《尚书·尧典》重视规定百官的职守,舜帝作歌戒备君王把精力放在琐碎的小事上而没有远大的志向。他们治理百官的要领在于首先办实事然后再拿俸禄,不要欺骗罢了。《周礼》记载太宰接受百官政绩的汇总考核,整理百官政绩的材料,听断百官处理政事的功过得失,每年、每月、每日都有官员政绩的会计考核。能够详细述说一下这种考核办法吗?每三年按一定的标准考核官吏的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后就黜退昏庸的官员而晋升贤明的官员。还有每隔十二年天子就按时视察天下四方,大张旗鼓地罢免昏庸的官员而提拔贤明的官员。设立奖赏惩罚法规的意图,能够从讲解儒家经书之人的观点中得到验证吗?唐朝考核九品以下官员分为四个等级,宋朝考察百官分为三个等级,都把勤勉从政作为最好的政绩。能够列举一下它们的名称吗?城墙和护城河修理,是二十七项杰出的办事能力之一。偷窃和强盗有十一人如果能抓获十人,就是考绩优秀。能够列举出这样的旧例吗?对于百官来说,做官的戒规所规定的,是处理政事的常法所崇尚的。截取片断可以取用吗?《戒石铭》本来有全部的词句,节选章句刻写在官署办公的厅堂里,是从什么时候颁布的呢?皇帝我虽然年纪已高但仍然始终思索,殷切探求,外出时就端着蜡烛等待奏章,闲居时不等天亮便穿衣起身很少睡眠,以便竭尽背靠屏风临朝听政的职责。水因为器皿盂而形成方形或圆形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仍然有延误政事、玩忽职守、包庇罪犯、掩饰过失的人呢?天子率领臣下振兴各种事业,谨慎

地对待法度,经常检察所取得的成就,法规还不够完善吗?

大凡法规,持守恭敬就不会有差错,效法古代就不会有过失。要真诚信实地施惠于天下就不会吝惜恩泽,治理政事勤勉就不会在职位上懈怠。记载在竹简编连而成的典籍上成为治绩之典,经常从早到晚治理政事就成为亲自实行。我怎么敢不勤勉,又有谁敢不勉力?上上下下交相匡助我一人,借此报答先帝事业的巨大恩惠罢了。天下各地比在古代君主的厅堂举起酒杯庆祝的场面更加盛大。在家中学好后就要向朝廷进献忠言,阐明治道就要陈奏良策。不要有所顾忌、不要肤浅进言,皇帝我将要亲自选拔你们众位士子。

石韫玉　殿试对策

石韫玉(生卒年不详)　字执如,号琢堂,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状元。后奉命提督湖南学政。嘉庆元年(1796)充日讲起居注官,三年入直上书房,寻出为四川重庆府知府,佐助四川经略保勒定分兵策,兼用坚壁清野法,平定川陕楚教民起义,赏戴花翎。后历官陕西潼商道、山东按察使,以足疾乞归,终年82岁。有《独学庐诗文集》传世。为文贯穿古今,尤长于经世之学。

臣对:臣闻上德之应,锡极而观文;大猷之升,诚民而贞度。天子体天出治,法行健以乘时,溥太和以寿世,茀禄于是乎集,仪型于是乎孚,惠保章于俊民,亮采熙于庶绩,皆本此自强不息之精神,以固纯常而凝宝命。《汉书·礼乐志》曰:德施大而世曼寿,高贤愉而民和乐。言训行于上,斯瑞应于下。由是体诸躬则向用之庶,垂诸世则成宪之监也。以之保世而治官,则惠鲜董正之隆轨也。荀悦《申鉴》曰"三才允叙,五事交备,膺鸿名而受多祜"者,盖莫隆于此矣。

钦惟皇帝陛下,德备福征,道光文治,惇允元之精意,播熙载之良图,亦既保极敛时,称先则古,迩安远格,大法小廉矣。兹乃以万寿昌辰,特开庆榜,进臣等而策以敷言、监古之精,惠庶、叙官之要。如臣椿昧,安能仰赞高深?惟念先资拜献,古人靖共之义也,敢不竭其愚以

对!

伏读制策有曰:《洪范》九畴,五福验之人,八徵验之天,而总原于五事之敬用。因而推论夫五代心传,万世治要。臣愚以为,皇极者,九畴之本,而五事又皇极之本也。孔安国《书传》曰:极者,中也。朱子亦曰:中,所以为极者也。故"允执厥中"一语,实与建极之义相发明。而危微精一,皆敬用之实功。尧之钦明,舜之温恭,禹之祗承,汤之懋昭,文武之缉熙执竞,罔非此一念之敬基之。故《尚书》五十八篇,有六体以表其义,有十例以发其凡,七观以宣其蕴,而《召诰》"曷其奈何弗敬"一语,直可该全书之意。外此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皆所以为祈天永命之原。而敬事上帝,敬保元子,君臣交勉,咨儆一堂,均足互相印证者也。后世哲后贤臣,读其辞而心知其义。故唐太宗《帝范》十二篇,严饬躬阐政之几。张蕴古《大宝》一箴,著物侈声淫之戒。李德裕《丹扆》六箴,胪辨邪纳诲之条。而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前列二者之纲,后分四者之目,胥推本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以立说焉。我皇上体元建极,宵旰勤思,固已治臻上理,中外会归。兹届八旬圣寿,特镌八徵耄念之宝,诚求保赤,惟曰孜孜,直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为心。五福备其隆,五行顺其序,实基于此矣。

伏读制策又曰:以古为鉴,可知治忽。因而稽夫《通鉴》、《纲目》之作。臣考编年之史,昉自荀悦,而柳芳、陈岳、马总、贾纬之徒,代有撰述。至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年经国纬,托左氏表年之例。其时同撰者,如二刘、一范,皆抱著作之才。其所采录,正史而外,若葛洪《西京杂记》,刘珍《东观汉记》,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三十国春秋》,王韶《太清记》等书,指不胜屈。学识既精,征引又富,综计二百九十四卷。又别为《目录》三十卷,以备检阅;《考异》三十卷,以参异同;《稽古》一图,以资讲读;《历年》五图,以便讨论,直能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事迹于一书之中。其体大,其思精矣。朱子因之作《纲目》,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削新莽以纠班固之失,正蜀汉以革陈寿之非。述渑池之会,则宗杨氏之言;辨博浪之锥,则原程子之说。夫唯博览深思,故克集其大成焉。他若尹起莘之《发

明》，刘友益之《书法》，汪克宽之《考异》，王幼学之《集览》，徐昭文之《考证》，陈济之《正误》，冯智舒之《质实》，皆能各成一家之言，而羽翼正史者也。要而论之，史家著述，或臆断而失之谬，或好怪而失之诬。谓轩皇之封国为万区，谓姒后之铸金为九赋。夸田单、鍼尹之奇策，则述火牛、燧象之谋；誉刘昆、宋均之循声，则载虎渡、蝗迁之异。讹以传讹，古今耳食而莫之辨。皇上几余清暇，评骘史事，睿训详明，辟古今史臣相沿之陋，诚足与《春秋》之义相发明矣。

制策又以因利利民，《周官》、《左传》，其制亦有相近，而因及历代蠲缓之令。臣谨按，《周礼》大司徒减末输之租，曰薄征，维时无所为蠲免也。迨西汉孝文帝，始诏除田之租税，曰蠲除。考之《汉书》，文帝二年诏赐民田租之半，十二年诏赐民租税之半，十三年诏除田租税。武帝蠲诸逋贷，宣帝元康元年、神爵元年，元帝永光四年，俱诏所赈贷勿收。此汉代蠲除之大略也。踵而行之者，宋孝武帝有逋租缓征之诏，而唐武德、开元、贞元之间，累蠲宿逋。权德舆曰：役不蠲除，亦无可贷之理。宋太宗至道二年，诏悉除逋籍。真宗咸平元年，遣使四出，蠲宿逋至一千余万。仁宗时，改追欠司为蠲纳司。淳熙而下，但循旧规。朱子在浙东时，建议以去年已纳之数，应作明年未纳之数，则百姓被泽，不致偏枯，而官吏亦无由滋弊矣。此又历代蠲除之事，载在史册可考者也。我朝薄赋轻租，民间已多储积，而又屡有蠲除之令。本年恭值万寿庆典，普免天下钱粮，裕盈宁而广康乐，无一夫不被泽矣。

制策又以安民必先察吏，而详求慎宪省成之要。臣谨按，察吏之法，昉于唐虞。敷奏明试，三考黜陟，尚矣。夏有遒人之徇，商有官刑之儆，皆所以考课也。周以八法治官府，八柄御群臣，六计弊群吏，以及日成、月要、岁会，随时以考，而总诸冢宰，黜陟行乎其间。汉初以六条察二千石，东汉则司徒掌人民事功，太尉掌四方兵事，司空掌水土事功，岁终奏其殿最。晋以五条考郡县，而杜预又改其法，委达官各考所统。唐之考课，分以二十七最，差以九等，其法视前代加详，而镇防重城隍之筑，守令严窃盗之捕，则因其地，因其时，亦调剂之深心也。《戒石铭》，黄庭坚书之，而梅尧臣有开元戒石之句，则唐已有之

矣。宋之考课,大略因唐,而绍兴中以七事为考,熙宁中以九事为最,此可见二主励精求治之心。而高宗时,则又分守令所课与县令所课,而二之。皆非初制也。要而论之,治官之道,有治人,无治法,而察吏先察大吏始。为大吏者,果能实心任事,洁己率属,则寮吏宁有玩延庇饰之事乎?

若是者:主敬以格天,敷文以成化,惠心协其元吉,奋庸敕其时几,固已臻郅治之庥,洽同风之化,凛保泰持盈之念,成重熙累洽之模矣。而臣尤伏愿皇上,法天行之自强,以日新为富有,敛时赐福,安益求安,则我国家万年景祚之庥,长无极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盛大德行的响应,在于赐给民众至高无上的原则而观察天文现象和社会人文现象;治理国家方法的蒸蒸日上,在于使百姓和协而符合正道的法度。天子取法上天的意志来治理国家,效仿上天的刚健运行来利用时机,遍布太平和乐来造福世人,幸福荣禄因此汇集,楷模典范因此使人信服,爱护百姓在才智杰出的人身上显示出来,辅佐政事在各种事业上兴盛起来,都是根据这种不停地自我发奋图强的精神,来坚定纯粹永恒的德行而永远保住天命。《汉书·礼乐志》说:德泽恩施盛大而世人长寿,高尚贤良的人快乐而百姓和睦欢乐。这是说君主的训导在上面施行,祥瑞就在臣民中应验。由此身体力行就构成人们自觉服从的美好局面,留传于世就构成对先王原有规章制度的借鉴。用它来保持王朝世代相传而治理百官,就形成赐惠关心百姓、监督整顿百官的重大法则。东汉荀悦《申鉴》所说的"天地人三才各得其宜,容貌要恭敬、言论要正当、观察要明白、听闻要广远、思考要通达等五方面的事情全都完备,享受盛大的名声而蒙受众多的幸福"的现象,大概没有比这更兴盛的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道德完备得致使幸福应验,治道弘扬那文教治绩,加厚信任有德行之人的精深意旨,播扬对事业的妥善谋划,结果也就保持至高无上的准则,把各种幸福集中起来,称颂先人,效法古代,附近的人安居乐业,远方的人前来归顺,大臣竭尽忠诚守

法,小臣廉洁自律了。现在又因皇帝陛下的生日庆辰,特意设置庆颂祝贺的皇榜,宣进臣下我等人,而用广泛地听取意见、借鉴古代事情的精华、布施恩惠于百姓、按照劳绩大小奖惩官吏的要领等问题策试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无知的人,怎么能够抬头向上有助于皇帝陛下博大精深的学问呢?只是念及事先考虑好要说的话在拜受君命之后就要献出自己的一切,是古人恭敬地奉守的君臣大义,怎敢不竭尽自己的愚钝来对答!

跪拜恭敬地阅读皇帝御制策书上有这样的话:《尚书·洪范》记载天帝赐给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长寿、富贵、健康安宁、遵行美德、高寿善终等五种幸福验证于人,各种天气征兆应验于上天,而归总起来源于自身容貌要恭敬、言论要正当、观察要明白、听闻要广博、思考要通达等五方面事情的认真做好。因而推阐论述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及武王等五代帝王递相心心传授的修身和治国原则,千秋万代施政的要领。臣下我私下认为,君主至高无上的准则,是九类治国大法的根本,而容貌、言论、观察、听闻、思考等五方面修身的事情又是君主至高无上准则的根本。汉朝孔安国《尚书孔氏传》中说:准则,就是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南宋朱熹也说过: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就是用来作为准则的内容。所以"实实在在地秉承着那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这一句话,实际上是和建立至高无上的准则的意义相互印证的。而人的思想是危险的、道的内涵是精微的、体察道的精微、始终如一地遵守,都是要虔诚做好的实际事功。唐尧处理政务敬慎节俭、明察是非,虞舜温和恭敬,夏禹恭敬承受尧、舜二帝的教导,商汤努力宣明高尚的大德,周文王光明正大又恭敬、周武王自强不息,没有谁不是把这满心的恭敬作为基础。所以《尚书》五十八篇中,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来表达它的意义,有典、谟、训、诰、誓、命、贡、歌、征、范十种体例来揭示全书的要旨,有观义、观仁、观诚、观度、观事、观治、观美这七个可供借鉴的方面来显示它的内涵,而《召诰》中"为什么不该有所恭敬谨慎呢"这一句话,简直可以概括全书的意旨。除此之外还说"天子要赶快敬重有德行的人",又说"天子恭敬对待宝位就不能不敬重有德行的人",这些都可以作为祈

祷上天、永保长命的根本方法。而恭敬地事奉上天，恭敬地保护众百姓，君主与臣下交相勉励，咨询商议满堂进行，都完全可以作为与《召诏》所言互相印证的话。后世贤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阅读《尚书》里的话而内心知道它的意义。所以唐太宗所著《帝范》十二篇，严加警饬自身、阐明政事的萌芽苗头。张蕴古所著的《大宝》这一规谏著作，昭著用物奢侈、沉迷声色的戒鉴。李德裕所著的《丹扆》的六条规谏内容，列举了辨别邪恶、进献善言的条目。而南宋真德秀所著的《大学衍义》一书，前面列举了治理国家、从事学问的纲要，后面分别是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意念诚实而心术正当、修养自身的品德、整治家庭四项内容的名称，全都是探究唐尧、虞舜二帝与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心心递相传授的修养自身品德的方法和治理国家的方法，来确立论点的。我大清皇帝陛下以天地元气为本建立至高无上的准则，天不亮就穿衣起身而天黑了才吃饭，勤奋思考政事，本来已经使国家达到了最好的治理状态，在海内外君主聚合臣民有准则，臣民归顺君主也有准则。现在时值皇帝陛下八十岁生日寿辰，特地镌刻了写有“八徵耄念”字样的宝印，诚心实意地追求保护臣民如同保护幼儿一样，时时想到每天勤勉努力而不懈怠，简直是把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及武王修养身心的方法当作自己修养身心的方法。长寿、富贵、健康安宁、遵行美德、高寿善终五种幸福全都齐备盛大，金、木、水、火、土五行遵依它们的顺序运行，实际上就在这里奠立根基了。

跪拜恭敬地阅读皇帝御制策书上又说：把古代的事情作为镜子，可以知道治乱得失。因而考察《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的撰写。臣下我考察按时间顺序编排史实的史书，开始于东汉的荀悦，而唐代的柳芳、陈岳、马总、五代的贾纬等人，每代都有著述。等到北宋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上限始于战国时期，下限结束于五代，以年代为纵线，以国别为横线，仿照左丘明标明年代的体例。当时和司马光一同撰写的人，像刘恕、刘攽二人和范祖禹一人，都怀有著述创作的才能。该书所采集录用的材料，除了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以外，像晋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东汉刘珍所著的《东观汉记》、北魏

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梁萧方等所著的《三十国春秋》、隋王韶所著的《太清记》等书，扳着手指计数都数不过来。学问知识既精深，旁征博引又繁富，总计二百九十四卷。还另外撰写了《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以供寻检查看；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用来检验不同相同之处；编纂了《稽古》一图，用来帮助讲习诵读；编纂了《历年》五图，用来方便研讨评论，简直能够在一部著作之中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迹。该书的体例是庞大的，作者的思考是精深的。南宋朱熹根据它的内容而撰写《资治通鉴纲目》，标列时间而把年代放在首位，根据年代来记载一脉相承的王朝系统。删削王莽新朝的年号来纠正东汉班固《汉书》的过失，把蜀汉摆在正统的位置来改正西晋陈寿《三国志》的错误。记述战国时期秦王与赵王的渑池会盟，就尊奉杨氏的言论；辨别张良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的行动，就根据北宋程颐的观点。只因朱熹广泛阅览，深入思考，才能够最终汇集众人的所有成就。其他像宋朝尹起莘的《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刘友益的《通鉴纲目书法》，元汪克宽的《通鉴纲目考异》，元王幼学的《通鉴纲目集览》，元徐昭文的《通鉴纲目考证》，明陈济的《通鉴纲目集览正误》，明冯智舒的《通鉴纲目质实》，都能够各自成为有独到见解、自成一家的论著，从而辅助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了。概括论述起来，历史学家编纂史书，有的凭主观臆测而下决断因而过失在于出现谬误，有的喜欢怪异之事因而过失在于诬妄不实。说黄帝轩辕氏分封的诸侯国有上万个地区，说姒启夏后氏用金属铸鼎刻写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田赋。夸大战国齐人田单、春秋楚人鍼尹固的奇异策略，就叙述用尾巴系着火炬的牛、尾巴系着火炬的象布阵的谋略；赞誉东汉刘昆、宋均为官有奉公守法的名声，就记载老虎渡江、蝗虫迁移而去的怪异现象。把本来不正确的话又错误地传开去，从古到今只是相信传闻却不加以辨别省察。我大清皇帝陛下在处理政事后剩下的清闲之时，评定历史上的事情，圣明的教诲详细明白，指出古往今来修史大臣相互沿袭的弊端，的确能够和《春秋》的要义相互印证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顺着百姓可以得到利益的方面做事而使百

姓获得利益,《周礼》、《左传》,它们记载的制度也有与这种施政措施相互近似的地方,因而便谈论到历代免征或缓征赋税的政令。臣下我恭谨考察,《周礼》记载大司徒减免未交纳的田租,叫做减轻赋税,那时没有所谓的免除赋税一说。等到西汉孝文帝,才开始下诏免除百姓按田亩交纳的租税,叫做免除。考察《汉书》的记载,汉文帝二年下诏减免百姓按田亩交纳的赋税的一半,十二年下诏减免百姓交纳租税的一半,十三年下诏免除百姓应交纳的田租和赋税。汉武帝免除所有拖欠不还借贷的官物,汉宣帝元康元年、神爵元年,汉元帝永光四年,都曾下诏命令救济时借贷的钱物不再回收。这是汉代免除赋税、钱物的大致情况。继汉朝以后实行济民政策的,南朝刘宋孝武帝曾经有拖欠的田租延缓期限征收的诏书,而唐高宗武德年间、唐玄宗开元年间、唐德宗贞元年间,多次免除百姓长期拖欠不交的赋税。唐朝大臣权德舆曾说过:劳役不免除也就没有可以借贷的道理。北宋太宗至道二年,下诏全部免除拖欠的赋税。北宋真宗咸平元年,派遣使者到各处去,免除长期拖欠的赋税达一千多万。北宋仁宗时,将追欠司改为蠲纳司。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以后,只是遵循从前的规定。朱熹先生在浙东的时候,建议将去年已经交纳的赋税数额,应当作为明年未交纳的数额,这样百姓就蒙受恩泽,不至于普遍贫困潦倒了,而官吏也没有办法滋生弊端了。这又是历代免除赋税的事情,是记载在史书上可以考察到的。我大清皇朝减轻赋税与田租,民间已经多有储备积存的财物,然而皇帝陛下又经常有免除赋税的诏令。本年恭敬地适值皇帝生日庆祝典礼,普遍免除天下百姓应交纳的钱财和粮食,使百姓丰盈安宁更加富足而天下普遍平安快乐,没有一个人不蒙受恩泽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安抚百姓必须首先考察官吏,因而详细探究谨慎地对待法度不断地检查已有事例的要领。臣下我恭谨考察,其实有关考察官吏的方法,从唐尧、虞舜时代就开始了。诸侯普遍地向天子报告自己的政绩,天子也要认真地考验他们的政绩,对百官的政绩进行三次考察后就黜退昏庸的官员而晋升贤明的官员,由来已久了。夏朝有宣传礼乐教化命令的官吏道人摇着木铃在路上巡行了

解民情，商朝有惩治官吏的刑法来告戒百官，这都是考核官吏优劣、分别等差决定升降奖罚的办法。周代用官员各有下属来推行国家政令、官员各有职责来分担国家的政务、官员联合办公来会办国家政事、官员各有职守来听断本职内的政事、官府有办事的成规来治理国家的政事、官员各有所主的法度来整饬国家的政事、官府中有刑罚来纠察国家的政事、官府有考核官吏的制度来考核国家政事的得失等八种方法治理官府，用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等八种权柄来驾驭群臣，用考察官吏是否善于处理政务、是否有能力、是否勤劳守职、是否公正廉直、是否守法、是否明辨是非等六种方法来听断官吏们的政绩，以及用参校而成的每日会计来考核每日成事的文书、用一月的统计来稽考一月成事的文书、用一年的统计来稽考一年成事的文书，随时对官吏加以考核，而全部呈报给冢宰，升迁或降免就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汉朝初年用不奉诏书遵承典制、不恤疑狱、选署不平、子弟恃势请托等六条诏书的内容来考察月俸为二千石的郡守政绩，东汉则由司徒掌管百姓教化的事情，由太尉掌管四方的用兵事情，由司空掌管水土工程的事情，每年年底汇报百官政绩的优劣。晋朝用五条诏书的内容考核郡县官吏的政绩，而杜预又改变了这种做法，委派职位显赫的官员分别考核所统辖地区官员的政绩。唐朝考核官员政绩优劣的办法，是分为近侍、选司、考校、礼官、乐官、判事、宿卫、督领、法官、校正、宣纳、学官、军将、政教、文史、纠正、句检、监掌、役使、屯官、仓库、历官、方术、关津、市司、牧官、镇防等二十七项办事能力标准，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三级九等，这种考核方法同以前历代相比内容更加详细，而镇守防卫重视城墙和护城河的修筑，郡守县令严格加强对偷窃劫夺的缉捕，则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根据不同时间的具体情况，也是调节使其适宜的深远用意。《戒石铭》，是北宋黄庭坚书写的，而梅尧臣有唐开元戒石的句子，那么唐朝就已经有刻着警戒官吏铭文的石碑了。宋朝考核官吏政绩优劣的方法，大致上是沿袭唐朝的方法，而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把举官当否、劝课农桑与增垦田畴、户口增损、兴利除害、事失案察、校正刑狱、盗贼多寡等七方面事情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内容，北

宋神宗熙宁年间把九方面事情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标准，从这里可以看到二位君主振奋精神尽力设法治理好国家的决心。而南宋高宗在位的时候，则又分为郡守所要考核的政绩和县令所要考核的政绩，从而把考核对象分为两个方面。这都不是当初的规定了。概括起来进行论述，治理百官的方法，关键在于具有治理百官的人，却没有自动就能产生效果的法度，因而考察官吏要首先从考察职位高的官吏开始下手。做高贵官吏的人，果真能够实心实意地任职处理政事，使自身廉洁奉公来率领下属，那么下属官吏难道还有玩忽职守、延误政事、包庇罪犯、掩饰过错的事情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恪守恭敬来感通上天，广布文教来完成教化，施利于民众的心愿和大吉大利相互协调，奋发努力建功立业而警惕天时和事情的萌发苗头，本来已经达到天下大治的美好状态，普遍受到天子教育的感化，严格遵守保持安定兴盛局面的信念，形成前后功绩相继、累世升平相承的局面了。然而臣下我更加跪拜祝愿皇帝陛下，效法天体运行的自强不息精神，把天天更新当作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聚集各种幸福普遍地赐给臣民，已定安定了再追求更加安定，那么我大清皇国上万年洪福的美好国运，就会长久下去无穷无尽了。臣下我来自民间出身微贱，新被举拔准备进用，不懂得禁忌避讳，触动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罪该万死。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洪亮吉　殿试对策

洪亮吉(1744～1811)　字稚存，号北江，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少孤，孝事寡母。初佐安徽学政朱筠校文，继入陕西巡抚毕沅幕府校刊古书，词章考据，著于一时，尤精研舆地。乾隆五十五年(1790)榜眼。后督学贵州，教士以通经学古为先，黔士始治经史。嘉庆二年(1797)入直上书房，次年大考翰林与詹事，试《征邪教疏》，亮吉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四年与修《高宗实录》，上书军机大臣指斥时政落职获罪，遣戍伊犁(治今新疆霍城)。五年赦还，自号更生居

士。十五年卒于家,终年68岁。平生于书无所不窥,诗文有奇气,有《北江全集》传世。

臣对:臣闻法天由于主敬,鉴古所以知来。伊耆之世,民比户而可封;成汤以来,吏守官而不懈。《文子》曰:帝者体太乙,王者法阴阳。则建中之说也。《吕氏春秋》曰:黄帝之道在丹书,颛顼之师为绿图。则稽古之说也。《慎子》曰:圣王在上,四生无不遂。则民生之厚可知矣。《管子》曰:政令所及,百体无不从。则居官之绩可见也。由斯而言,上有建中立极、稽古同天之实,斯下有安民察吏、同风一道之庥,上咸五,下登三。古哲王所谓滂仁广惠而与时茂豫者,举由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统三才而立极,合七顺以承庥,上则法天,次则法古。法天则所其无逸,稽古则日进无疆。近者悦,远者来,小臣廉,大臣法,固已上绍九皇之治,远超七制之君矣。乃圣德冲挹,犹以持敬宅心,镜古出治,藏富于民,寓治于吏,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之椯昧,何足以知?然自维拜献之义,幸逢曼寿之期,敢不举平时之所诵,以效愚者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洪范》九畴,五福验之人,八徵验之天,而总原于五事之敬。此则五三六经、万世帝王心原之授受,在此矣。臣谨按,皇极者,大中也。获福由于建极,故汉儒刘向、许商等,皆以五福配皇极。而极之于八徵,向、商等皆有《洪范五行传》,今皆不传。惟《后汉书·郎顗传》引《洪范传》说曰:月行中道,移节应期,德厚获福,重华留之。盖即刘向等逸说乎?其言实足以发明五福、八徵之蕴,盖非知天人之学者,不及此矣。《庄子》曰: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墨子采尧舜盘盂之铭曰:君子福大而愈惧,爵隆而益恭;尧之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蹶于山而蹶于垤。又尝得黄帝之所以教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夫曰挈天地、袭气母及大圜、大矩者,皇极也。皇极,即大中也。曰日慎一日,获福而愈惧,得爵而益恭者,即主敬也。此之言主敬,不又在六体、十例之先乎?《易》之言曰:终日乾乾。《诗》之言曰:小心翼翼。《曲礼》一篇,俨若以弁其首;《春秋》三例,钦若以顺乎时。推之《大戴

礼·五帝德》、《逸周书·作洛篇》,以及《管子》、《晏子》、《荀子·成相篇》、《淮南子·主术训》,其征引古前哲王嘉谟懿训,往往可与《洪范》相发明。盖三代以下,君知主敬之说者,莫若唐太宗;臣知主敬之说者,莫若范祖禹。今《帝范》、《帝学》等篇具在。书既有典、谟、训、诰之风,义不足佐精一危微之蕴乎?敬绎我皇上八徵耄念之章,而知《洪范》天人之学,又远非前人所及矣。

制策又曰:编年之体,《通鉴》谦不敢继《春秋》,而托于继《左传》。臣考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起于战国。其编年之例,与《左传》同。同撰者有刘攽、范祖禹诸人。二刘精于汉事,撰有《两汉刊误》等书,故以汉代属之。祖禹熟于唐事,撰有《唐鉴》等书,故以唐代属之。正史之外采取者,如荀悦《汉纪》,鱼豢《魏略》,王隐、臧荣绪之《晋书》,崔鸿《十六国春秋》等,不可悉数。外又别为《目录》、《释例》,又为《甲子纪年》,又为《考异》等,则仿司马迁大事等记而作也。《纲目》之作,出于朱子之门人。故其言天也,不知汉景之日食;其纪舆地也,不悉慕容氏方隅,前人常屡讥之。然朱子固不任咎欤?《前纪》溯及于三皇,微嫌不得其实。宋《五朝长编》、《九朝长编》,皆为续《资治通鉴》而作也。李焘《九朝长编》,已缺徽、钦二朝,非全帙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其例亦如《长编》而少约。《宋元通鉴》两家,则薛胜于王,然薛亦惟详道学之源流。而《宋史》以外,如《长编》、《北盟会编》、《九朝编年》、《三朝政要》等,皆未之见殊,有待于重创也。史之载符瑞,侈神奇,实自班固、沈约等启之,然涑水亦不能尽洗其陋。信乎著述之难矣。

制策又曰:蠲贷之政,惠泽攸先。损上益下,惠心元吉。夫帝王因利利民,何代不然?《周官》荒政之外,有比闾族党相恤之文。即春秋时而宽徭役、薄赋敛者,亦屡见于楚、郑之国。自汉而口率出赋,民力始不能宽。于是有恩泽下逮者,必登之于帝纪。自汉文继统,而始除田租矣。统而言之,高祖之复丰沛,光武之复南阳,明帝之复元氏,则以始生之地也。文帝之除代租,武帝之免汾阴,则以巡幸所至也。汉章过显宗之旧宅,贞观幸高祖之故居,则因王迹所基而复除也。他若登封告成,奉高胙上,则减租由于封禅;五原云中,朔方上郡,则宽赋

以优军兴。至若永元之蠲曲阜，祥符之复仙源，则又优礼圣哲之异数矣。唐贞元以后，加恩节镇，则免本道逋税。宋则凡效祀行庆，则免酒课坊税，犹汉时免所过民租十之一、十之三之类也。倚阁之名，昉于宋时，最为弊政。建炎之后，帅川陕四路者，已知其弊而革之矣。至我朝而逮下之厚，远过汉唐。本年复以大庆，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美哉！是又振古所未有之泽也。

制策又以安民必先察吏。夫《尧典》重乎允厘，舜歌戒其丛脞，《周官》著其期会，《国语》表其勤能。是以士会在晋，则盗迹已移；孙叔相荆，则惰民必斥。故汉文景之诏曰：与我共天下者，非良二千石乎？又曰：使民无叹息痛恨之声者，非良有司乎？三代以来，汉之吏治，最为近古。刺史以六条察郡国，而不察黄绶以下矣。汉之刺史，即今督抚之职也。汉二千石，举其大纲，不苛细微。汉二千石，即今监司、郡守之任也。其时谣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又曰：桴鼓不鸣董少平。盖若张敞、赵广汉之为京兆，董宣之令洛阳，真可谓盗贼屏息，人民安堵者矣。唐考流外官四等，宋考百官三等，皆以勤为上能。边境肃清，城隍修理，则唐二十七最之一也。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则宋《戒石辞》之略也。他若辽之进治状，金之停阁俸，元之备五事，莫非考绩之良法。然则今之为百职事者，其何以矢公矢慎，无怠无荒，以佐我皇上熙皞之治乎？

若此者：统天人以建中，汇古今而成治，九服有饮和食德之乐，百官著奉令承教之诚。信乎立敬则不忒，法古则不愆，孚惠则不屯其膏，力勤则不懈于位。我国家与天永久之庆，基于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效法上天在于恪守恭敬，借鉴古代因此知道未来。帝尧的时代，百姓家家户户都可以受旌表；商汤以来，百官恪守职分而不懈怠。《文子》上说：称帝天下的人根据天地未分前的混沌之气，称王天下的人效法天地间的阴阳之气。这就是建立中正之道的学说。《吕氏春秋》上说：黄帝治国的方法在于赤雀用嘴衔来的用红笔写的神书，颛顼所师从的是绿图这个人物。这就是稽考

古代的学说。《慎子》上说:圣明的君王高高在上,世界众生没有不能顺利生长的。这样百姓的富厚就可以知道了。《管子》说:国家施政命令所传播到的地方,如同身体各个部位无不听从心脏指挥一样。这样臣下在官位上的政绩就可以看到了。由此说来,在上有建立中正之道、树立最高准则、稽考古代史事、与上天的意旨协同的事实,在下就有安抚百姓、考察官吏、同一风俗、同一道德的美好反应,向上都和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五帝相合,向下都和夏禹、商汤、周文王等三王相合。古代贤明的君王所说的仁爱恩泽广泛流布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昌盛安乐起来,全都是由于这个原因。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驾驭天地人三才而建立最高准则,聚合顺天得时、顺地得助、顺民得和、顺利财足、顺德助明、顺仁无失、顺道有功来承受美好,首先去效法天道,其次又效法古代。效法天道做到了在位不贪图安逸享受,考察古事每天都获得无穷无尽的提高。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来朝,小臣廉洁尽职,大臣守法尽忠,本来已经上继远古九个帝王的大治,远远超过西汉七代君主了。然而圣明的皇帝陛下德行谦虚退让,仍然用持守恭敬之心放在心上、借鉴古代事情治理国家、在百姓中储藏富裕、在官吏中寄托治理这些问题,宣进臣下我等人来到殿廷而策试我们。臣下我愚昧无知,哪里能够懂得这些问题?然而自己思考拜受君命之后就要献出自己的一切想法的君臣大义,有幸赶上皇帝长寿庆贺的时期,怎敢不拿出自己平时所学到的全部本领,来效纳愚笨之人的一点浅薄的见解呢!

跪拜恭敬地阅读皇帝御制策书上有这样的话:《尚书·洪范》记载天帝赐给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长寿、富贵、健康安宁、遵行美德、高寿善终等五种幸福应验在人身上,各种天气征兆从上天应验出来,而归总起来源于自身容貌要恭敬、言论要正当、观察要明白、听闻要广博、思考要通达等五方面事情的认真做好。这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五帝和夏禹、商汤、周文王等三王以及《诗经》、《尚书》、《周礼》、《周易》、《乐经》、《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万代帝王心心相传的修身和治国原则的授予与接受,全在这里了。臣下我恭谨考察,皇帝至高无上的准则,就是无过与不及的中正之道。获得幸福是由

于建立了最高准则，所以汉朝的儒家学者刘向、许商等人，都把五种幸福与皇帝至高无上的准则相匹配。而建立准则经常思考的各种天气征兆，刘向、许商等都有《洪范五行传》加以论述，如今都不流传了。只有《后汉书·郎颉传》引《洪范传》的观点说：月亮运行经过太阳一年在天空中移动一圈的路线，变换季节，顺应期运，道德深厚就会获得幸福，木星就会停留在心宿上。这大概就是刘向等人失传的说法吧？他的言论实际上完全可以印证五种幸福、各种征兆所蕴含的深义，如果不是精通天道与人事关系学问的人，就做不到这一步了。《庄子》说：狶韦氏得到"道"，用来统驭天地；伏羲氏得到"道"，用来调合元气。墨子摘取唐尧、虞舜刻在圆盘和方盂等器皿上的劝诫文辞说：君子幸福洪大却更加恐惧，爵位隆盛却更加敬慎；尧帝告戒说：诚惶诚恐，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人们没有被大山绊倒的却有稍不经意被小土堆绊倒的。还曾经记得黄帝教导颛顼的方法说：有大的圆天在上，有大的方地在下，你能够效法它们，就能够成为百姓的父母。上面所说的统驭天地、调合元气以及大的圆天、大的方地，就是皇帝至高无上的准则。皇帝至高无上的准则，就是无过与不及的中正之道。说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获得幸福却更加恐惧，获得爵位却更加敬慎，就是恪守恭敬。这里所谈论的恪守恭敬，不又在《尚书》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和典、谟、训、诰、誓、命、贡、歌、征、范十种体例之前吗？《周易》所说的整天勤奋努力，《诗经》所说的小心翼翼。《礼记·曲礼》这一篇章，把恭敬放在它的篇首；《春秋》三例中，强调恭敬以顺应天时。推求《大戴礼记·五帝德》、《逸周书·作洛篇》，以及《管子》、《晏子春秋》、《荀子·成相篇》、《淮南子·主术训》，这些书引用古代贤明君主高明的谋略、美好的教诲，常常可以和《尚书·洪范》相互印证。大概夏、商、周三代以后，君主知道恪守恭敬观点的人，没有赶得上唐太宗的；臣子知道恪守恭敬观点的人，没有赶得上北宋范祖禹的。如今唐太宗所著的《帝范》、范祖禹所著的《帝学》等书籍全都存在。他们的著作既然有典、谟、训、诰的风格，他们阐发的意义难道不能够佐证《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所蕴含的精义吗？恭敬体味我大清皇帝陛下写有"八徵耄念"字

样的印章，因而精通《尚书·洪范》天道与人事感应的学问，又远远不是前代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按时间顺序编排史实的体裁，《资治通鉴》的作者谦虚不敢说是接续《春秋》，却假托是接续《左传》。臣下我考察北宋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从战国时期开始。该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史实的体例，和《左传》相同。和他一同撰写的人有刘攽、范祖禹等人。刘恕、刘攽二人精通汉代的史事，撰有《两汉刊误》等著作，所以把汉代部分交给他们撰写。范祖禹熟悉唐朝的史事，撰有《唐鉴》等著作，所以把唐代部分交给他撰写。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以外采用的材料，像东汉荀悦的《汉纪》，三国魏人鱼豢的《魏略》，东晋王隐、南朝齐人臧荣绪的《晋书》，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等，不能够全部数得过来。此外还另外撰写了《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释例》，又编写了《甲子纪年》，还写成了《资治通鉴考异》等书，都是仿照西汉司马迁大事等记载方式而写成的。《资治通鉴纲目》的写作，出自于南宋朱熹弟子之手。所以该书谈论天文的时候，不知道汉景帝时发生的日食现象；它记载地理的时候，不能洞悉鲜卑族慕容氏的边疆方位，过去人们经常多次指责它。这样朱熹本来就不应当承担过错吧？《资治通鉴前编》上溯到伏羲、神农、燧人等三皇之时，微小的不足之处是不能掌握那时的实际情况。宋朝《五朝国史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都是为了续写《资治通鉴》而撰写的。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已经缺佚北宋徽宗、钦宗二朝的史文，并不是完整的卷帙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这两部著作的体例也如同《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而内容稍微简约一些。《宋元资治通鉴》有明代王宗沐和薛应旂两家，相比之下薛应旂比王宗沐的著作要强些，然而薛应旂也只是详细记载了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罢了。而《宋史》以外，像《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盟》、《宋九朝编年备要》、《三朝政要》等，都没有看到它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等待着以后重新撰写了。史书中记载吉祥的征兆，夸大神妙奇特的现象，实际上从东汉班固、南朝梁沈约等人就开了这个头，然而涑水先生司马光也不能全部消除这种毛病。编纂著作确实是十分困难

啊!

皇帝御制策书上又说:免除租税、借放钱粮的施政措施,是布施恩泽的首要事情。减损于上,增益于下,施利于天下民众的心愿是最为吉祥的。帝王顺着百姓可以得到利益的方面做事从而使百姓获得利益,什么时代不是这样呢?《周礼》中除了赈济饥荒的政令措施外,有五家为一比、五比为一闾、四闾为一族、五族为一党要相互体恤照顾的文字。就是春秋时期减免徭役、减轻赋税的内容,也常常在楚、郑等诸侯国见到。自从汉朝按照人口比例交纳赋税,百姓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始不能宽缓。于是有恩惠施及到百姓身上的救济措施,必定要记载在帝王本纪上面。从汉文帝继承帝统,就开始免除百姓按田亩征收的赋税了。综合概括起来说,汉高祖免除自己故乡沛县丰邑的赋税,汉光武帝免除家乡南阳郡的赋税,汉明帝免除家乡元氏县的赋税,是因为那里是他们出生的地方。汉文帝免除代郡的赋税,汉武帝免除汾阴县的赋税,是因为那里是他们巡游驾幸所到的地方。汉章帝经过汉明帝的故居,唐太宗驾幸唐高祖的故居,是因为那里是帝王功业所肇始的地方而免除赋税的。其他像登上泰山祭祀天地、上报所完成的功业,到山东奉高县、山西汾阴脽丘,则减免赋税是由于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五原、云中,朔方、上郡,则减轻赋税是由于优宠当地征集财物以供军用。至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免除曲阜县的赋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免除仙源县的赋税,却又是优待礼遇具有超人道德才智的圣人故乡的特殊礼遇了。唐德宗贞元年间以后,对设置节度使的重镇施予恩惠,就免除本道欠交的租税。宋朝则凡是在郊外祭祀天地、进行赏赐,就免除酒税和作坊税,这就像汉朝时皇帝免除所经过地方按百姓田亩所征收的赋税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三等等一样。暂缓催纳的名称,从宋朝开始实行,实在是不良的政令。南宋高宗建炎年间以后,统率川陕地区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四路的人,已知道它的弊端而取消这种做法了。至于我大清皇朝施恩于臣民的深厚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两汉和唐朝时期。今年又因为皇帝陛下高龄寿辰的庆贺之事,普遍免除天下百姓交纳的钱财和粮食,经过三年就会遍及天

下。简直太美好了!这又是自古以来所没有过的恩泽。

皇帝御制策书上又认为安抚百姓一定要首先考察官吏。《尚书·尧典》重视规定百官的职守,舜帝作歌戒备君王把精力放在琐碎的小事上会没有远大的志向,《周礼》著明百官定期的政绩考核,《国语》表彰百官勤勉而又有才能。因此春秋时期士会在晋国,那么盗贼的行迹就已转移到其它国家了;孙叔敖在楚国担任国相,那么不务正业的游民就必然被斥退了。所以汉文帝、汉景帝曾下诏说:和我一起治理天下的人,难道不是俸禄为二千石的优秀郡守吗?又说:使百姓没有叹息痛恨的声音的人,难道不是各有专职的好的官吏吗?夏、商、周三代以来,汉朝的官吏作风和政绩,最为接近古代。刺史用不奉诏书遵承典制、不恤疑狱、选署不平、子弟恃势请托等六条诏书的内容考察郡国的政绩,却不考察用黄色丝带系官印以下的低级官吏了。汉朝的刺史,就是现在总督和巡抚的职务。汉朝俸禄为二千石的郡守,对他们考核只是抓住关键部分,不做烦琐细微的苛求。汉朝俸禄为二千石的郡守,就是现在负有监察之责的官吏和郡守的责任。汉朝当时的民谣说:前面有赵广汉、张敞,后面有王尊、王章、王骏三人。又说:警鼓不响是因为董宣还在。大概像张敞、赵广汉担任京兆尹,董宣担任洛阳县令,真可以说是形成盗贼敛迹消失、人民安定地生活的局面了。唐朝考核九品以下官员分为四个等级,宋朝考核百官政绩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都把勤劳政事当作最有才干。把靠近省区边境的地方完全整顿好,城墙和护城河得到整修治理,是唐朝考核众官员二十七项办事能力的标准之一。你们的俸禄,都是百姓的血汗换来的财富,这就是宋朝立于地方官署中的石碑所刻警戒官吏铭文的大致内容。其他像辽朝呈报百官政绩事实的文书,金朝暂停政绩不良官员的俸禄,元朝要求百官认真做好修养自身的容仪、言论、观察、听闻、思考等五方面的事情,没有一项不是按一定标准考核官吏政绩的好措施。既然这样,那么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官员,他们将怎么决心公正无私、发誓谨慎小心,不敢怠惰政事、不敢荒废政事,来辅佐我大清皇帝陛下和睦欢乐的治理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总括天道人事的规律来建立中正的准则,汇

集古代当今的治理经验而成就政绩，全国各地有享受和睦自在、享受先人德泽的欢乐，百官表现出遵从命令、接受教诲的真诚。确实是恪守诚敬就不会有差错，效法古代就不会有过失，真诚信实地施惠于天下就不会吝惜恩泽，治理政事勤勉就不会在职位上懈怠。我大清皇国和上天一样永久的吉庆，就奠基在这上面了。臣下我来自民间出身微贱，新被举拔准备进用，不懂得禁忌避讳，触动冒犯了皇帝的尊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罪该万死。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王宗诚　殿试对策

王宗诚(？～1837)　字中孚，号廉甫，江南青阳(今属安徽)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探花。嘉庆中，历典云南、四川、陕西乡试，督河南、山东、江西学政，经荐举提拔为礼部侍郎，历工部、兵部，典会试。道光二年(1822)，擢兵部尚书，历署礼部、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曾与其父王懿修同直禁廷，海内推为荣遇。道光十七年卒。平生严峻不苟，历官皆能举其职。

臣对：臣闻建中所以锡福，鉴古所以垂型，裕益道而万室盈宁，廉上计而百工熙绩，胥本于宥密之渊衷，为之弥纶于六合。《易乾凿度》曰：至诚专密。言笃敬也。《春秋繁露》曰：理往事，正是非。言考鉴也。《尚书大传》曰：四时从经，万姓允诚。言厚生也。《韩诗外传》曰：明其分职，较其官能。言宅俊也。惟其融延纯固，笃念益虔，于是大中立极而圣学昌，法戒成书而治统著。引养引恬，斯群黎遍德；有要有会，斯庶绩敷凝。从古郅隆之治，洵莫逾于持敬、则古、阜俗、励官也。

钦惟皇帝陛下，焕苞符之精蕴，集史册之大成，跻治化于平康，肃官常于秩叙，固已训行立而事功垂，膏泽渥而纪纲饬矣。乃圣怀冲挹，深思累洽重熙之本，弥切持盈保泰之图，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演畴、考史、惠民、察吏之大端。臣占毕庸愚，何足知此？愿幸际广思周逮之时，窃附于先资敷奏之义，敬承清问，敢不勉述所闻，缕陈所习，用效管窥蠡测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洪范》九畴,五福验之人,八徵验之天,而总原于五事之敬。此诚德参天人之至旨也。臣考《礼记疏》引郑康成《书》注云:庶,众也;徵,验也。徐幹《中论》云:《书》言五福,一曰寿,此王泽之寿也。观于天人相应之机,必尽人事,以合天则。夫五福八徵,总原于五事之敬矣。《书》赅五代,粤《尧典》肇称钦明,则言敬克蔽全书。虽典、谟、训、诰、誓、命厘为六体,贡、歌、征、范增为十例,要皆敬德作所,用能永观承叙,受命无疆惟休。推之《易》占惕若,《诗》咏敬之,《周礼》首建极,《春秋》重体元,六艺之文,同条共贯。旁征载籍,厥指攸符。敬胜怠者吉,《大戴礼》存《践祚》之篇;体民无不敬,《逸周书》有《程典》之解。故左端右端为戒书,而前席之铭先之曰:安乐必敬。五和九因有成言,而《大开》之训申之曰:非敬不知。汝为汝翼,纳其言;见知闻知,绍其绪。三代之昌谟,固若是愔愔而抑抑也。至于艺别九流,书存《七略》,班固称为经之支裔,有足取焉。《管子·枢言》,以心之敬执,为先王之书;《晏子·外篇》,述敬为礼经,明治国之本。《荀子·成相》之词,事彰于敬法;《淮南·主术》之训,敬著于检仪。斯其为辅经而行者乎!唐宋以还,递修法制。《帝范》成于贞观,《帝学》进于元祐。唐太宗鉴治维三,范祖禹讲官第一,卷帙流传,古今具粲。以及张蕴古箴陈《大宝》,李德裕箴著《丹扆》,与《大学衍义》、《养正图说》,均足以备法戒也。我皇上圣敬日强,至诚无息,千古之心法、治法、可一以贯之也已。

制策又曰:以古为鉴,可知治忽,而详举夫编年纪事之体例。臣闻司马光《通鉴》,编摩者一十有九载,裒采者二百二十家。分任其事,则《史》、《汉》资于刘攽;三国迄隋,资于刘恕;唐及五代,资于范祖禹。然刘凝尝与研摩,司马康亦司雠校,则当日授简,不止三人。至备引它书,匡裨正史,前人所述,谓两汉则用荀悦、司马彪,六朝则取崔鸿、萧方等,唐采柳芳、周存、贾纬。约其标举,仅得大凡。夫尺壤崇山,细流纳海,遐稽《孔丛·连语》之文,近甄《洛阳搢绅》之记。其书名不必尽见于《考异》,然即《考异》之精,已见用心之密。略为《目录》,析为《甲子纪年》,别为《稽古录》。光自言精力尽在此书,良不诬矣。《纲目》成于赵师渊,未尽合朱子之意。补《通鉴》以前者,则有刘

恕《外纪》;续《通鉴》以后者,则有李焘《长编》。恕能搜剔幽遐,焘尤谙习掌故。洪迈《五朝国史》,早见沦遗;陈均《九朝编年》,稍嫌简略。李心传史裁蔚密,亚于李焘,《系年要录》颇称具体,《朝野杂记》仅载琐言。作《宋元通鉴》者,王宗沐之空疏,薛应旂之芜陋,俱贻讥大雅。他若前史记载之失实,即墨火牛,昆阳战象,与夫炎兴、宣光之纪年,皆有待于论定也。伏读《御制评鉴阐要》,衡断精严,至公至当,论史者俱莫出其范围矣。

制策又以蠲贷之政,惠泽攸先,尤轸念民依之至意也。臣谨案,马端临有云:蠲贷之事,始于汉文。《前汉书》所载赐民田租之半是也。《周官》有散利薄征之条,《左传》有宽政已责之举,因利利民,与蠲政相近。诸史所载,若元康勿收赈贷,元光免责贫民,永元、永建之除租,因郡国水旱。泰始、太康之复赋,因初政开疆。唐则贞观免山东之供,开元给田租之半。虽德音仅见,要与过旧宅之偏恩,行封禅而广誉者,有殊焉。宋屡行蠲除之令,天圣中定限分除,见王偁《事略》;南渡后倚阁全放,见熊克《小纪》。合两税而倚阁一半,分三户而倚阁带征,则《玉海》备载之。然苏轼讥白纸之收,万春请私负之免,或营私靳惠,或立制扰民,何以称惠心元吉乎?皇上爱养黎元,普免天下钱粮,以亿万计。民生其间,获游康乐和亲之宇,而长具夫含哺鼓腹之休,诚驾三代而上之已。

制策又以安民必先察吏,而兼及夫列代之制。夫三载考绩,肇自《虞书》。勉贤重民之至意,《白虎通》已详言之。《周官》太宰之职,受百官之会于岁终,计群吏之治于三岁。郑众注引《书》为证,周制同虞。至于巡狩以明黜陟,《郑志》谓唐虞五载,夏殷六年,周十二岁象取周星,疏数之制虽殊,庆让之行则一。《唐会要》课以四善,曰德义有闻、清谨明著、公平可称、恪谨匪懈;又分二十七最,如内而献可拾遗,外而修隍诘盗。条章具在,核实为难。故刘秩请约其大纲,杜佑复陈其课议。宋制则因唐四善,分为三等,政绩优异为上,职务粗理为中,临事弛慢为下。淳化中,取孟蜀《戒石》之铭,简存四言,广为镌石,义操简要,制贻久长。夫守令者,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公卿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也。官箴在寸念自持,政经取四时备举,

勿欺为本,可弗凛欤?

若此者:建极敷言,王道懋焉;准今酌古,成法昭焉。藏富于民,而家给人足焉;议事以制,而大法小廉焉。《易纬》云:天子者,继天治物。《管子》云:察道者帝,通德者王。其谓是乎!臣尤伏愿我皇上,钦德日新,敬修可愿。天德懋而弥切寅恭,史志备而愈勤稽验。储蓄已裕,犹深爱养之思;政绩用彰,尚廑澄清之念。国家亿万载无疆之庆,肇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中正准则是赐予各种幸福的方法,借鉴古代史事是垂示治国法则的方法,扩展损上益下之道而使家家户户丰盈安宁,考核地方官呈报的政绩簿而使百官兴办各种事情,都是来源于仁厚宁静深渊的心怀,为此能够包容天地四方间的一切事物。《周易乾凿度》上说:极其真挚诚恳,用心专一细密。这里说的是笃厚敬肃。《春秋繁露》上说:研究过去的事情,端正是非对错。这里说的是参证借鉴。《尚书大传》上说:春夏秋冬四季更替顺从规律,广大百姓真诚信实。这里说的是使人民生活充裕。《韩诗外传》上说:明确百官的职责,考较百官的才能。这里说的是任用才智出众的人。只因长期引导纯粹坚固,深切顾念更加虔诚,于是用无过与不及的中正之道建立起最高的准则从而使孔子之学昌盛,将楷式和鉴戒汇成书籍从而使治理国家一脉相传的系统显著。不停地奉养百姓、不断地安抚百姓,黎民百姓才能普遍享受德泽;有每月月终所有官吏呈报的当月政绩材料、有每年年底所有官吏呈报的当年政绩材料,各种事业才能全部获得成功。自古以来昌盛兴隆的国家治理,确实没有超过持守恭敬之心、效法古代、使风俗淳厚、劝勉官吏的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焕发出神妙经典的精深含义,汇集史书所记载的大的成就。使治理国家、教化人民达到平安,整饬官员应遵守的法规达到正常的运转状态,本来已经做到准则确立而政事的功绩流传于后世,恩泽深厚而法度被整饬了。然而圣明的皇帝陛下心怀谦抑退让,深深思考前后功绩相继、累世升平相承局面的根本,

更加加深对保持安定兴盛政治局面的谋划，宣进臣下我等来到殿廷，而用推演治国大法、考察历史事实、布施恩惠于民、考核官吏政绩的主要方面的问题策试我们。臣下我只会诵读经书上的文字，庸下愚昧，哪里能够懂得这些问题？只是有幸赶上集思广益、周遍询问下臣的时刻，臣下我私下迎合先考虑好要说的话再向君上报告一切的君臣大义，恭敬承蒙皇帝陛下清审详问，怎敢不竭力陈述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详细陈述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来效纳从竹管中看天、用瓢量海水所得到的一点肤浅见解呢！

跪拜恭敬地阅读皇帝御制策书上有这样的话：《尚书·洪范》记载天帝赐给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长寿、富贵、健康安宁、遵行美德、高寿善终等五种幸福应验在人身上，各种征兆从上天应验出来，而归总起来源于自身容貌要恭敬、言论要正当、观察要明白、听闻要广博、思考要通达等五方面事情的认真做好。这实在是德行参验天道与人事的极其美好的意图。臣下我考察《礼记疏》引用东汉郑玄《尚书》注说：庶，就是众多的意思；征，就是验证的意思。东汉徐幹的《中论》说：《尚书》谈论长寿、富贵、健康安宁、遵行美德、高寿善终等五种幸福，第一种幸福叫做长寿，这是帝王德泽的长寿。观察天道与人事相互感应的预兆苗头，一定要完善人间事情，来应合上天的法则。五种幸福和各种征兆，归总起来源于修养自身的容貌、言论、观察、听闻、思考五方面事情的认真做好罢了。《尚书》总括了唐尧、虞舜、夏、商、周五代的事情，《尧典》一开始就称说帝尧处理政务恭敬节俭、明察四方，这正说的是恭敬谨慎能够概括全书的主旨。虽然典、谟、训、诰、誓、命分为六种文体，贡、歌、征、范增加为十种体例，总之都是在王位上恭敬谨慎行德，因此周成王能够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将永远看到我周民子孙归顺他的德政了，接受了治理天下的大命，吉祥美好无穷无尽。推论《周易》占卜警惕慎行，《诗经》歌咏戒慎恐惧，《周礼》把建立至高无上的准则放在首位，《春秋》重视以天地元气为根本。《诗经》、《尚书》、《周礼》、《周易》、《春秋》、《乐经》等儒家六部经典的文字，是事理相通、连贯一起的。多方引证典籍，它们的旨意全都相互符合。敬慎超过怠慢的就吉利，《大戴礼记》保存着《践

祚篇》;治理百姓没有不恭敬谨慎做事的,《逸周书》有对《程典》的解释。所以周武王在座席前面与后面的左方、右方都摆着自我警戒的文字,而座席前面左方的铭文首先是这样的话:安逸快乐时必须警惧。得天心方能享国等政治和谐的五种表现、心地不真诚那么鬼神就不享用祭品等危及王朝统治的九种因素于是有完整的论断,而《逸周书·大开》的训戒陈述说:如果不是敬慎就不能了解情况。你们帮助我、你们辅佐我,我要采纳你们诸位大臣的意见;亲眼见到同时代的事情、亲耳听到以前的事情,要继承发扬它们的事业。夏、商、周三代的盛大谋略,本来就是像这样戒惧而慎密的。至于典籍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个学术流派,书籍保存在《七略》里面,东汉班固称史学是经学的分支,确实有值得采纳的地方。《管子·枢言》,把内心所敬爱的东西,称为先王的书。《晏子春秋·外篇》,叙述弟弟敬重兄长是礼的原则,从而阐明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荀子·成相》的语句,强调政事彰显于各级官吏敬守君王的法令上;《淮南子·主术》的训戒,强调恭敬在约束法度上表现出来。这是它们成为辅助经书而推行的地方吧!唐朝、两宋以来,递相整治法令制度。《帝范》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帝学》进献于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唐太宗以镜、以古、以人为鉴作为正人心身的标准,北宋范祖禹的《帝学》把为皇帝经筵进讲的官员列在第一位,他们的书籍篇章在社会上流传,从古到今全都粲烂华美。以及唐朝张蕴古陈述规谏的《大宝》,李德裕著述告戒的《丹扆》,和南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以及《养正图说》,均能够用来完备楷式和鉴戒。我大清皇帝陛下圣明恭敬一天比一天加强,极其真挚美好的心意永不间断,千秋万代帝王递相传授不变的修养自身道德和治理国家的方法,可以用恭敬这个原则来贯穿它们。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把古代的事情作为镜子,可以知道治乱得失,因而详细列举史籍按照时间时序记载史实的体例。臣下我听说北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编辑纂集的时间共有十九年,搜集采纳的史书有二百二十家。分别担任编纂任务的,由《史记》和《汉书》所记载的战国、秦朝、汉朝部分,依靠刘攽来完成;三国到隋朝部分,依

靠刘恕来完成；唐朝和五代部分，依靠范祖禹来完成。然而刘凝也曾参与过研究揣摩，司马康也曾担任过校勘文字的工作，这样看来当时分授简札嘱人写作，并不只是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至于大量引证其它书籍，匡正补益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前人所记述的，说西汉、东汉时期采用的是东汉荀悦、西晋司马彪的编年体著作，吴、晋、宋、齐、梁、陈六朝时期采用的是北魏崔鸿、梁萧方等的编年体著作，唐朝时期采用的是唐人柳芳、周存、五代贾纬的编年体著作。简要概括该书所标明、列举的参考著作，只能得到以上大致的情况。微少的土壤堆积成高山，细小的水流汇聚成大海，向远处稽考《孔丛子·连丛子》上下篇的文字，向近处鉴别《洛阳搢绅旧闻记》的记载。这些书名不一定全都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看到，然而仅就《资治通鉴考异》的精华部分，已经能够看到作者用心的细密。略举事目而写成《资治通鉴目录》，分类编排而写成《甲子纪年》，另外又撰写了《稽古录》。司马光自己说他平生精力全放在这部书上，确实不是虚妄的话了。《资治通鉴纲目》成书于朱熹弟子赵师渊之手，不能完全符合朱熹的意图。补写《资治通鉴》以前时期的著作，则有北宋刘恕所著的《资治通鉴外纪》；续写《资治通鉴》以后时期的著作，则有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恕能够搜寻隐微久远的事情，李焘尤其熟习旧制旧例的史实。南宋洪迈的《五朝国史》，早已经沦没散失；南宋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稍微简约一些。南宋李心传裁断史事的能力细密，仅次于李焘，他所著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很是称得上粗具大体，他所著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只是记载了一些逸闻琐事。撰写《宋元资治通鉴》的作者，明代王宗沐属于空虚浅薄，薛应旂属于繁杂浅薄，都招致学识渊博之人的讥责。其他像从前史籍记载的不合乎事实，即墨城尾巴系着火炬的牛冲击敌人，昆阳城经过训练用于战斗的象，与南宋高宗赵构的建炎年号、绍兴年号和北元爱猷识里达腊的宣光年号用来记载年岁，都是有待于讨论确定的。跪拜恭敬阅读皇帝陛下所作的《御制评鉴阐要》，品评鉴定精细严密，极为公正、极为恰当，评论史书的人都不能超出它的范围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免除租税、借放钱粮的施政措施，是布施恩

泽的首要事情，这尤其是深切顾念百姓痛苦的极其真挚美好的心意。臣下我恭谨考察，元朝马端临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免除租税、借放钱粮的事情，从汉文帝时开始。《汉书》所记载的免除百姓按田亩征收赋税的一半就是这样的事情。《周礼》上有遇到荒年贷给百姓种子和食粮、减轻赋税等救济政策的条目，《左传》上有为政宽大不苛刻、免除对公家所欠债务的举动，这些顺着百姓得到利益的方面做事而使百姓获得利益，和免除赋税的为政措施相近似。各种史书所记载的，像西汉宣帝元康年间不再回收救济时借贷给百姓的钱粮，西汉武帝元光年间免除贫困百姓所拖欠的债务，东汉和帝永元年间、顺帝永建年间免除百姓按田亩所交纳的赋税，那是因为诸郡和王国、侯国发生了水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西晋武帝泰始年间、太康年间免除百姓交纳的赋税，是因为皇帝开始执政并开拓了疆域领土。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免除山东境内百姓向朝廷缴纳的赋税，玄宗开元年间免除百姓应交田赋的一半。虽然这类施舍恩惠、宽大体恤的诏书极其少见，但概括起来与皇帝经过故宅偏私的恩宠、举行祭祀天地大典到处扩大好名声的减免赋税措施，是有所不同的。宋朝多次颁行免除赋税的政令，北宋仁宗天圣年间在一定的期限内免除赋税的一半，从王禹偁的《东都事略》上可以看到；宋高宗渡过长江迁到南方建都后将暂缓催纳的赋税全部减免，从南宋熊克的《中兴小纪》中可以看到。合夏税和秋税而暂时减免一半，分为三等纳税人家而暂停苛捐杂税，《玉海》详细记载了这些措施。然而苏轼讥讽这实际上是用不盖印的白麻纸回收，万春请求免除私人的债务，有的是图谋私利、吝啬恩惠，有的是建立制度、侵扰百姓，怎么能够和施惠于百姓的心愿是大吉大利的相符合呢?我大清皇帝陛下爱护养育黎民百姓，普遍免除天下百姓交纳的钱财和粮食，数量用亿万来计算。百姓生活在这个时代，得以游历安定快乐、和睦相亲的社会当中，因而长期拥有口含食物、挺腹讴歌从而过着安乐生活的美好景象，这的确是凌驾在夏、商、周三代之上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安抚百姓一定要首先考察官吏，因而涉及到历朝历代考核官吏政绩的制度。每隔三年按一定标准考核一次官

吏的政绩,起始于《尚书·虞书》。勉励贤能、重视民众的极其诚挚的心意,《白虎通义》已经详细谈论了这个问题。《周礼》中大宰的职掌,在每年年终时就接受百官政绩材料汇总的考核,每隔三年就考核一次所有官员的政绩。东汉郑众注释《周礼》时引用《尚书》的内容作为证据,认为周朝的制度和虞舜时期相同。至于天子巡视天下来大张旗鼓地罢免昏庸的官员,提拔贤明的官员,《郑志》认为唐尧、虞舜时代每隔五年举行一次,夏朝、商朝每隔六年举行一次,周朝每隔十二年举行一次取象于岁星十二年在天空运行一周天所行经的十二次。次数稀少和频繁的制度虽然不同,但赏赐和责罚的实行却是一样的。《唐会要》记载考核官吏用四种善政,分别叫做道德信义拥有声誉、廉洁谨慎鲜明显著、公正无私可以称赞、恭敬勤恳永不懈怠;唐朝又分为二十七项杰出的办事能力,像在朝内为官对君主进献可行的而废去不可行的政令、补正朝政的缺点过失,在朝外为官修理护城河、查办盗贼。这些条例规章全部存在,但核实起来十分困难。所以刘秩请求简略保存它的总纲要点,杜佑又陈奏对考核百官的建议。宋朝考核官员的制度则因袭唐朝的四项善政,分为上中下三等,官吏在执政时办事成绩优秀突出的为上等,职位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大致完成的为中等,治理政事懈怠忽略的为下等。北宋太宗淳化年间,取五代孟氏所建后蜀《戒石铭》的铭文,简略地保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话,在地方官署中普遍刻立成石碑,义在让人掌握起来简单扼要,制度留传长久。做郡守县令的人,就是百姓的表率,是委派他们接受君主的旨意而去宣扬教化的。做公卿大夫的人,是百姓所效法的对象。做官的戒规在于内心方寸之地自我持守,处理政事的常规在于一年四季能够全面地实行仁义之道,把不欺骗作为根本,能不严格遵循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建立至高无上的准则并宣扬这个准则,帝王的仁政就盛大了;择取古代的事情用来比照今天的情况,既定的法规就显著了;在百姓中储藏财富,因而就家家富足、人人饱暖了;根据典章制度议论商讨政事,因而就大臣守法尽忠,小臣廉洁尽职了。《易纬》上说:做天子的人,秉承上天的意旨来治理万物。《管子》中说:明察

天道的人可以称帝于天下，通晓道德的人可以称王于天下。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臣下我特地跪拜祝愿我大清皇帝陛下，恭敬行德并天天增新，恭敬修行百姓所希望的美好道德。如天之德已经盛大而更加加深恭敬，史书典志已经齐备而更加勤奋检验。百姓储存的资财钱粮已经富足，却仍然加深爱护养育百姓的思虑；官吏在执政时办事的成绩已经彰著，却仍然勤动肃清吏治的念头。我大清皇国亿万年无穷无尽的吉庆，就肇始在这里了。臣下我来自民间出身微贱，新被举拔准备进用，不懂得禁忌避讳，触动冒犯了皇帝的尊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罪该万死。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董文武译〕

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

殿试策问

[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荷天宠命,御宇久长。兹幸功葳十全,庆征五代,每虞盛满,日切勤求。虽年逾八旬,未敢少耽安逸。缅唐虞之心绍,溯孔孟之微言,期康阜于闾阎,励巩谦于夙夜。时慎敕几,思登上理,咨尔多士,伫听嘉谟。

十六字心传尚矣,蔡氏沈《书序》言之綦详。其说可悉陈欤?执中一言,禹、汤、武相传不易。所以致其精一者,其要何居?唐太宗作《帝范》,所言果尽醇欤?宋范祖禹《帝学》一编,具有条理。能见其大者何在?真德秀《大学衍义》,仅及修身、齐家而止。其治、平之迹,果可举而措之欤?邱浚《大学衍义补》,政典极为详备。抑尚有提挈大纲者在欤?

洛学末流,歧为二派。永嘉之学,好谈经济,朱子谓其近事功。其故安在?其源流得失,能一一言之欤?金溪之学,流为姚江;紫阳之徒,流为河津。世多以河津为正脉,然论者或谓王守仁所树立,断非薛瑄所能。可详言之欤?王畿以后,讲心学者,又空虚而无实用。其故又安在欤?

汉代力田与孝弟并重,宋代守土之官,结衔必有"管内劝农"字,犹三代重农之遗意也。其规制尚可考欤?明代有检田之吏。其设官之意,与古人同欤?异欤?《孟子》有"不知检"之句,《汉书》引之作"敛"。

然则采买积贮,周代已有之欤?他书尚有可考者欤?朱子社仓,立法至善,而论者或谓其近于青苗法。其似同实异之故,能悉举之欤?

尧戒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舜庸作歌之时,亦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古帝王治定功成,兢业犹如是也。宋张根作《吴园易解》,六十四卦之中,惟《泰卦》别著一论,反覆申明。能约举其大旨欤?《泰》之内卦即《乾》,本有健行不息之义。能阐发其义欤?老氏知足知止,仅自守而已。圣贤之学,必有所持守运行,而后能久于其道。能指陈其要欤?

多士稽古有年,必有淹贯博通,深达于治理之原,可以敷之实用者。悉抒所蕴,副朕博访之意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古时候百姓还有三种可贵的毛病,可现在或许连这些毛病都没有了。

有的人生下来就懂得天下共行的准则和道德,有的人通过学习才能懂得天下共行的准则和道德,有的人遇到艰难窘迫后经过学习方能懂得天下共行的准则和道德。

孔子说:抓住有利条件就会存在发展,放弃有利条件就会萎缩消亡。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禀承上天加恩特赐的统治权,驾驭天下已有很长时间了。如今有幸十个方面的武功都已完成,吉庆可以像唐尧、虞舜、夏、商、周五个朝代那样验证出来,但仍常常防范骄傲自满,因此每天都在急切努力追求进取。尽管年龄已经超过了八十岁,但从不敢稍微沉溺在安闲舒适之中。遥想唐尧、虞舜治世思想的继承,追念孔子、孟子精深微妙的言辞,希望能够使民间里巷安乐富庶起来,

勉励自己日日夜夜勤劳谦虚不止。时时刻刻都在小心谨慎、告诫自己警惕事情的萌发苗头，想要达到天下大治的治国状态，所以才咨询你们这些众多的贤能士子，凝神倾听诸位高明的治国谋略。

尧、舜、禹心心相传的十六字修养自身和治理国家的原则，由来已久了，南宋的蔡沈在《书集传序》里将它阐述得极为详细了。他的观点能够全部陈述出来吗？秉承着那不偏不倚的中正原则这句话，夏禹、商汤、周武王三位开国君主递相传授不加变更。用来达到那精粹纯一的道德修养境界的方法，它的要点在什么地方呢？唐太宗撰写的《帝范》一书，所谈论的为帝准则果真纯粹完美了吗？北宋范祖禹所著的《帝学》这一著作，详备又有条理层次。能够看出它的主要意旨在什么地方吗？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一书，只涉及到修养自身、整治家庭就结束了。那些治理国家、安定天下的迹象，果真能够拿来并实施它们吗？明代邱浚著有《大学衍义补》一书，记载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极为周详完备。难道该书仍有揭示重要纲领的内容存在吗？

北宋洛阳人程颢的学说发展到后期，分歧为二大流派。南宋永嘉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喜欢谈论治理国事、救济民众，朱熹称他们追求做事的实际功用和效果。其中的缘故在哪里？它的本末源流、优劣得失，能够逐一地谈谈吗？南宋金溪人陆九渊的学说，演变为明代浙江余姚人王守仁的学说；南宋紫阳先生朱熹的弟子，演化为明代山西河津人薛瑄的学说。社会上的人大多把河津人薛瑄的学说当作理学嫡传的宗派，然而议论的人有的认为明代心学是王守仁所建立的，绝对不是薛瑄所能够做到的。能够详细地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吗？明代王畿以后，讲习研究心学的人，又变得空洞虚无而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其中的缘故又在哪里呢？

汉代努力耕作的人和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德行的人一并得到重视推崇，宋代掌管所辖区域的地方官员，签署的官衔一定有“管内劝农”的字样，这还是夏、商、周三代重视农事活动遗留下来的本来意图。它的制度规定还能考察到吗？明代设有察验农田的官吏，当时设置这些官吏的意图，与古人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孟子》一书中有“不知检”这句话，《汉书》引用它时把“检”写作“敛”。既然这样，那么

收集购买、积蓄储存粮食或钱财，周代就已经有这样的方法了吗？其它书籍还有可以考察的吗？南宋朱熹在乡社设置防备灾荒之年的粮仓，制订的方法十分完善，然而议论的人有的认为这种方法同青苗法相近似。它们看来好像相同而实际内容却完全不同的原因，能够全部将它们列举出来吗？

尧帝告戒说：诚惶诚恐，一天比一天谨慎。舜帝因为百官互相信任、和睦团结而作歌的时候，也说：努力按照上天的命令行事，必须顺应天时，必须小心事情萌发的迹象。古代帝王政治清明、功业成就后，谨慎戒惧尚且像这个样子。北宋张根撰写《吴园周易解》，在六十四卦之中，只对《泰卦》另外提出了一种观点，翻来覆去加以重申阐明。能够约略举出它的主要意旨吗？《泰卦》的下三爻就是卦形为☰的八卦之一《乾卦》，本来就有刚强劲健运行永不停息的意思。能够阐明并发挥它的意思吗？老子认为自知满足就不会招致羞辱、适可而止就能避免危险，这仅仅能够自我保护罢了。道德才智杰出的圣贤之人的学问，一定有保持平安、运转世局的方法，然后才能够永久保持他们那美好的治国之道。能够指出列举其要点吗？

诸位众多的贤能士子稽考古代史事已有多年，一定拥有深通广晓各种知识，精通治理各种政务的根本，能够用来施展于实际应用的本领。全部表达出你们所蕴藏的才智，来符合皇帝我广泛地访求政事的意图。

潘世恩　殿试对策

潘世恩(1767～1854)　字槐堂，号芝轩，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嘉庆朝，历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兵部、户部、吏部侍郎，督云南、浙江、江西学政，工部、户部尚书。道光朝，超拜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东阁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太傅。咸丰四年(1854)卒，终年86岁，谥文恭。生平历仕四朝，屡主科考，直廷枢凡十七年，以慎密自持。曾荐用林则徐、姚莹。先后得罪权臣和坤、穆彰

阿。有《思补堂集》传世。

臣对:臣闻建中者,心法之要也;懋修者,致用之原也。敦劝课以训农功,所为家给而人足也;敕几康而勤夙夜,所为久安而长治也。自古圣皇,配天立极,重道崇儒,厚民生而三时不害,承昊贶而庶绩其凝。《书》曰:念终始典于学。《易》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诗》曰:立我丞民,莫匪尔极。又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是皆本乎设诚致行之衷,以为敷治绥猷之具,用能弥纶天地,荣镜宇宙,祉祚流衍,纯嘏延洪,所为畅九垓而溯八埏,洋洋乎帝者之上仪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勤参两,运协升恒,固已绍往圣而益懋缉熙,正学术而聿端趋向,兆民普乐利之休,百度凛几康之饬矣。乃圣德渊冲,愈深无逸作所之念,倍切思艰图易之怀,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圣学、儒修、足民、勤政。臣之椯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念先资拜献之义,际兹对扬伊始,敢不敬诵所闻!

伏读制策有曰:十六字心传,尚矣。执中一言,相传不易。而因思所以致其精一之要。臣惟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而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是故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此蔡氏沈《书序》言之綦详也。执中一语,禹、汤以来,相传不易,要亦严辨夫人心、道心之界而已。盖人心易私而难公,道心难明而易昧。惟精以察之,斯不杂形器之私;一以守之,则纯乎义理之正,而执其中矣。要所以致其精一者,其要在于存诚,而其功在于居敬。存诚而后,中之体有以立;居敬而后,中之用有以行。此帝王传心之本也。后世哲后贤臣,心知其意,如唐太宗《帝范》十二篇,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王道本末兼该。宋范祖禹《帝学》八卷,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宋代神宗,圣学实事具备,皆足与《典》《谟》相发明。真德秀《大学衍义》,大旨在正本清源,故首之以为治之要、为学之本,次分四大纲,曰格物致知,曰诚意正心,曰修身,曰齐家,而治、平之略缺如。邱浚因之,仿真氏所衍之义,于齐家之下,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其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

曰严武备,曰驭外藩,曰成功化。真氏之书,本之身家,以达之天下。邱氏之编,则又将致治平之要,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也。昔宋儒程颐有言,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儒生循习章句,而帝王务得其要,以措诸事业。夫古者危微授受,即以致时雍风动之休;宥密单心,即以绍显谟承烈之绪。事功之与学问,岂不同条共贯欤?我皇上君师兼体,敛锡同原,内圣外王之学,一以贯之,洵足与勋华媲美矣。

制策又以洛学末流,歧为二派,王畿而后,徒尚空虚,欲究其源流得失。臣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道法相授受。自荀、董绍闻而后,濂洛未出以前,其所谓学,大都不过诵法先圣,以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自濂溪周子得不传之秘,作《太极图说》、《易通》等书,二程师之,于是明艮其背之义,申反鉴索照之戒,析无主则实、有主则虚之辨,而濂洛之学,灿然大明。一时相望而兴者,盖横渠之以礼为教,尧夫之以数为学,而其指归,要不失濂洛正传。惟陈傅良之才高气粗,述汉、唐致治之具,自任欲兴礼乐。陈同甫之智数法术,修皇帝王霸之略,自谓长于用兵。殊非儒者切己近里之学。则朱子谓永嘉学术急近事功,良不诬也。金溪之学,世多谓其涉元虚。然考其生平事实,子静之才极大,其为荆门州,至境内无贼,路不拾遗。又尝造一城,估计五十万人者,止用五千人,克日而就。姚江之学,实宗子静,故其劾刘瑾,戡剧盗,倡义讨,平宁藩,气节勋烈,推重一时,视子静更有出蓝之誉。然则守仁之学,确然有以自得,亦确然有以自立。彼河津之贵践履,惓惓于复性,于学虽为正脉,要其树立,岂可与守仁同日语哉?至若王畿、王艮之徒,沿其师说,堕空虚而无实用,使人病为浙学。此亦如子夏之后,流为庄周,而非姚江之过也。方今圣天子敦崇实学,溯先圣之微言,析诸儒之底蕴。世之学者,宜何如束修砥励,以期蕴之为德行,发之为事业乎!

制策又以汉代力田与孝弟并重,而欲勤求于三代重农之遗意,积贮之良规。臣闻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是以《周官》九职,以农为首;《洪范》八政,以食为先。至于汉代置力田常员,薄其租税,宠其强力,令与孝弟同科,凡以务农功,勤本业也。逮夫宋世,此意犹存。自雍熙、明道间,亲耕藉田,屡申劝农之旨。至道中,爰置劝农使。其见于

《宋史》者,有陈靖为西京劝农使。按行陈、许等州。景德中,复诏诸路转运、刺史以上,并领劝农使;知州军、通判,并兼劝农事。天禧中,并改诸道提刑为劝农使副使,兼提点刑狱。于是一时守土之官,无不以"管内劝农"结衔。此犹见三代遗意。若明之编黄册,走官民田,而因有检田吏,不过为征收粮税之计耳。且夫重农者,盛世之首务也;积贮者,生民之大命也。考周制大司徒荒政,一曰散利。遗人掌乡里县都之委积,旅师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闲粟,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是采买积贮 ,周代已有之,固不第《孟子》有"不知检"之句。《汉书·食货志》引之作"敛"。师古注谓:菽粟饶多,此时可敛。为可据也。朱子社仓,立法最善。所谓敛散有经,维持有要,即此乡之粟,活此乡之民者。而论者或谓其近于青苗,不知青苗以钱,社仓以粟;青苗主以官吏,社仓储之里保;青苗志在取息,社仓志在济农,迹虽同而实迥异矣。我皇上爱养黎元,无微不至,偶遇歉收,截漕平粜,有加无已,所由跻斯民于仁寿,而迪万姓于吉康也。

制策又曰:帝王治定功成,不忘兢业。圣贤之学,必有所持守运行,而后能久于其道。此尤持盈保泰之要图也。臣惟唐虞之世,黎民於变,万邦协和,府事孔修,平成永赖。而法宫之上,不敢康宁,岂过慎哉?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书》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王者奉天临民而安不忘危,类如此也。谨按《大易》,首系乾元。乾者,君象也,而必以自强不息为本。言人君代天出治,必法天之行以为行也。夫阳开三而成《泰》,《乾》之三曰:终日乾乾,夕惕若。盖忧勤惕厉,所以开泰交之运也。故《泰》之三亦曰:艰贞,无咎。按程《传》谓:既能艰贞,即可常保其泰。又曰:善处泰者,其福可长也。盖德善日积,则福禄日臻;德逾于禄,则虽盛而非满。是说也,诚得保泰之道矣。要之,开泰者,一元之运,亦临亦保,治化所以常贞也。保泰者,不息之诚,无怠无荒,规为所由大备也。宋张根《吴园易解》,六十四卦中,于《泰卦》别撰一论,所以深著满盈之戒,发明保泰之义者,至详至备。夫日月得天而久照,圣人久道而化成。《书》曰:满招损,谦受益。是以尧舜业业,汤武皇皇,即使已治已安,而犹廑其咨其儆。伊古帝王,未有不励精图治若此者也。若老子知足知止之论,仅知自守而

已，要岂足以语至治哉？圣朝太平日久，累洽重熙，奏十全之武功，廑八徵于耄念，固已事勤于三五，而功兼乎在昔。综观前古，莫与比隆矣。

若此者：圣敬日跻，儒风丕焕，百室有盈宁之庆，万几凛逸欲之防，猗欤盛哉！臣尤伏愿皇上，懋日新不已之功，成悠久无疆之治，慎之又慎，精益求精，中外乐康，神人禔福。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中正的原则，是修养自身心地的要领；勤勉修明大德，是付诸于实际应用的根本。注重鼓励督责来训导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是使家家富裕、人人饱暖的方法；诫饬居安思危而日日夜夜坚持勤劳不懈，是使国家永久安定、长期太平的方法。自古以来圣明的皇帝，比配上天确立最高的治国准则，重视儒道，崇尚儒士，使百姓丰足而春、夏、秋三季农作的时间不发生灾害，承受广漠天宇赐与的福佑而各种事业都获得成功。《尚书·说命》说：自始至终念念不忘致力于学习。《周易·系辞》说：成全万物的本性、维持万物的生存，这是通向道义的门户。《诗经·思文》中说：种粮养活众百姓，无非是你有德行。《诗经·大明》又说：小心谨慎地对待一切，诚惶诚恐地敬事上苍，幸福接踵纷至沓来。这些都来源于存立真诚致力推行的内心，把它们作为进行全面治理、安定谋划的手段，因此能够包容天地，光辉映照天下，福泽广泛流布，大福绵延盛大，所谓的通达九重青天之上而流衍到八方边远地区，就是盛大无边的帝王最高治国法则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勤修道德与天地并列，运数和协好比上弦月盈满、好比太阳正东升，本来已经继承前代圣贤的事业而越来越盛大光明，端正学术而让读书人迅速归向正道，使亿万百姓普遍享受快乐和利益的福分，使做各种事情敬畏居安思危的诫饬了。然而我大清皇帝至高无上的道德如同渊潭幽深一样宁静淡泊，更加加深不该贪图安逸享受于君位的信念，愈加深切想到百姓有艰难就要想

办法改善他们的处境的情怀，宣进臣下我等人来到殿廷，而用圣帝的学说、儒业的修习、使百姓富足、勤劳于政事等问题来策试我们。臣下我愚昧无知，哪里能够用来领悟要领所在？但是想到臣下事奉君主就要先考虑好自己要说的话、拜受君命后就要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君臣大义，值此面君奏对颂扬开始的时刻，怎敢不恭敬述说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跪拜恭敬地阅读皇帝御制策书有这样的话：尧、舜、禹心心相传的十六字修养自身道德和治理国家的原则，由来已久了。秉承着那不偏不倚的中正原则这句话，夏禹、商汤、周武王三位开国君主递相传授不加变更。因而便想到用来达到那精粹纯一的道德修养境界的要领的方法。臣下我想来，唐尧、虞舜二帝与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治理，本源于“道”；而二帝三王的“道”，本源于合乎仁义礼智伦理原则的心地。因此礼节音乐、政教风化，是心地的表现；法令规范、礼乐制度，是心地的著明；家庭、国家得到治理而天下安定，是心地的推广。这是南宋蔡沈在《书集传序》里阐述得极为详细的观点。秉承着那不偏不倚的中正原则这句话，从夏禹、商汤以来，递相传授不加变更，概括起来也是严格区别人心和道心的界限罢了。大概人心容易自私而难以公正，道心难以明白而容易暗昧。只有用精诚来体察，才不会与有形器物的自私相混杂；只有用始终如一来守持，才不会与经义道理的公正相混杂，从而秉承着那不偏不倚的中正原则了。总而言之，达到精诚专一的方法，它的要点在于坚持虔诚，而它的修养在于持身恭敬。坚持虔诚以后，不偏不倚中正原则的本体就有确立的依据了；持身恭敬以后，不偏不倚中正原则的效用就有推行的依据了。这是古代帝王心心相传的修养自身道德和治理国家原则的根本。后代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内心知道这个意思，像唐太宗所作的《帝范》十二篇，始于《君体》、《建亲》，终于《阅武》、《崇文》，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的原委全都齐备了。北宋范祖禹所作的《帝学》八卷，上限起自于伏羲、神农、燧人等三皇和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五帝时期，下限结束于宋代的神宗时期，圣帝明王的学问和切实有益的事情全都齐备了，都完全可以和《尚书》中的《尧典》、

《舜典》和《大禹谟》、《皋陶谟》等篇相互印证了。南宋真德秀所作的《大学衍义》一书，主要意旨在于从根源上进行整顿清理，所以把治理国家的纲要、从事学问的根本放在首位，其次分为四条大纲，分别叫做：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意念诚实而心术正当、修养自身的品德、整治家庭，然而治理国家、安定天下的大致内容却空缺了。明代邱浚承袭该书的内容，仿照真德秀所推演的意义，在整治家庭的后面，补充上治理国家、安定天下的要领。他设立的要目共有十二条，分别叫做：匡正朝廷、整治百官、巩固国家的根本、制定国家费用的预算、修明礼节和音乐、整饬祀神供祖的仪式、崇尚政教风化、完备规章制度、谨慎对待刑罚、严整军事装备、驾驭外部藩属、成就功业教化。真德秀的著作，本源于自身修养和家庭整治，来达到天下治理的目的。邱浚的著作，却又秉承使国家在政治上达到安定清平的要领，来收到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意念真诚而心术正当、修养自身品德与整治家庭的功效。从前北宋儒家学者程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帝王的学问，和儒家学者不同。儒家学者因循沿袭对篇章字句的解释辨析，而帝王却致力于掌握它的要领，来安排处理各种事务。古时候关于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要诀递相传授与接受下来，就可以用来招致百姓和睦相处、四方广泛响应的美好景象了；心存仁厚宁静和殚精竭诚，就可以用来继承昭著的谋略和盛大功业的端绪了。政事功效与学问知识，难道不是事理相通、连在一起吗？我大清皇帝陛下兼容并包各个方面，把各种幸福集中起来普遍地赐给臣民同出于一源，将内心具备圣人至高无上的德行、对外施行帝王仁政的学说贯穿在一切事物之中，实在足够和尧、舜相匹配比美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北宋洛阳人程颢、程颐的学说发展到后期，分歧为二大流派，明代王畿以后，只是崇尚空洞虚无的内容，想要探究它们的本末源流优劣得失。臣下我想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孔子等人，用大道的法则递相传授与接受。自从荀卿、董仲舒继承这个统绪以后，到北宋濂溪先生周敦颐、洛阳人程颢与程颐没有出现以前，那时所说的儒家学说，大多不过是称诵并效法先世圣人，来修养自己的品德去管理别人罢了，根本没有后来

所说的理、气、心、性等精微深奥的道理。自从濂溪先生周敦颐得到了久不传习的奥妙处，撰写《太极图说》、《易通》等书籍，程颢、程颐二位把他当为老师，因此明白抑止于自己背后不让身体直接面向应当被抑止的私欲的意义，申明背对着镜子寻找映照的身影的戒鉴，辨析没有身处于内而与外部相呼应的人那么国家就会充实、有身处于内而与外部相呼应的人那么国家就会空虚的区别，因而濂溪先生周敦颐、洛阳人程颢与程颐的学说，一下子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明亮起来。一个时期内接连不断而兴盛起来的学说，大概是北宋横渠先生张载把礼仪作为教育的内容，邵尧夫邵雍把象数作为学习的内容，然而他们的主旨意向，概括起来仍然没有丧失濂溪先生周敦颐、洛阳人程颢与程颐的正统传授。只有南宋人陈傅良才能高超、气质粗放，叙述两汉和唐朝时期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的手段，想把振兴礼节音乐当作自身的职责。陈同甫陈亮有计谋、懂法术，研习称皇于天下、称帝于天下、称王于天下、称霸于诸侯的谋略，自己认为自己擅长指挥军队。他们根本不是儒家学者密切联系自身近乎情理的学说。那么南宋朱熹认为永嘉人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急于谋求眼前做事的功利，确实不是虚妄的。南宋金溪人陆九渊的学说，社会上的人大多认为它属于玄妙虚无的道理。然而考察陆九渊的生平事迹，陆九渊的才能特别大，他担任荆门知州，达到州境之内没有盗贼、路上的人不拾捡丢掉的东西的地步。他还曾经营造一座城池，估计需要动用五十万人的劳力，结果只用了五千人，就在规定的日期内完工了。明代浙江余姚人王守仁的学说，实际上是师承了陆九渊的学说，所以他揭发当权宦官刘瑾的罪行，平定强悍的盗贼，宣扬为正义进行讨伐，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节操功勋在一个时期内受到推许尊重，同陆九渊相比更有青出蓝而胜于蓝的赞誉。既然这样，那么王守仁的学说，确实有他获得独到见解的原因，也确实有他独树一帜的条件。那明代河津人薛瑄重视脚踏实地地进行实践，念念不忘回复本性之善，对于儒学来说虽然属于一脉相传的嫡传流派，总括他的建树，怎么能和王守仁相提并论呢？至于明代王畿、王艮等人，沿袭他们老师王守仁传授的学说，落入空洞虚无而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地步，

让人们诋毁为浙学。这也像子夏的弟子分化为庄周一样，而不是浙江余姚人王守仁的过失了。如今圣明的皇帝陛下重视崇尚切实有用的学问，追念先世圣人精深微妙的言辞，辨析众位儒家学者的内情底细。社会上研究学问的人，应当怎样约束修养磨炼自己的节操和品行，来期望积聚它们成为道德品行，扩大它们成为做事的成就呢？

皇帝御制策书又因为汉代努力耕田的人和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德行的人一并得到重视推崇，因而想致力追求夏、商、周三代重视农业的遗留义旨，积蓄储存粮食的好办法。臣下我听说引导百姓的方法，在于致力于根本性的农业生产。因此《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周代的九种职业，把居住在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从事谷物生产的农民放在首位；《尚书·洪范》记载施行八方面政务，把百姓粮食生产放在前面。至于汉代设置努力耕田人员的固定名额，减轻他们的租税，优宠他们勤勉努力，命令将他们和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德行的人同等对待，都是为了从事农业生产、致力于根本性的职业。等到了宋代，这个用意仍然存在。自从宋太宗雍熙年间到宋仁宗明道年间，皇帝亲自带头象征性地耕作田地，屡次申明鼓励农耕的宗旨。宋仁宗至道年间，开始设置劝农使。这类事从《宋史》中可以看到的，有陈靖担任西京劝农使时，曾巡视过陈、许等州。宋真宗景德年间，又下诏命令各路转运史、刺史以上的官员，一并兼理劝农使；知州军，通判，一并兼管劝农事。宋真宗天禧年间，一并改诸道提点刑狱公事为劝农使副使，兼任提点刑狱。从此在一个时期内掌治所辖区域的地方官员，没有不用“管内劝农”等字样来签署官衔的。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重视农事活动的遗留意旨。像明代编造征派赋役的黄色户口册籍，普查公私田地，因而便设有察验农田的官吏，这只不过是用来征收粮食赋税的计策罢了。况且重视农事活动，是太平盛世的首要任务；积蓄储存粮食，是百姓生存的重要命脉。考察周朝官制中大司徒采取十二项赈济饥荒的措施，第一项叫做贷给百姓种子和粮食。遗人掌管乡、里、县、都的余财储蓄，旅师掌理聚储野地农民交纳的税粮和对有地不耕之民所罚的税粮、无职闲民所罚的税粮，在饥荒时平均地把平时聚集贮积的粮食借贷给他们，救济有利于民

众的衣食，资助有利于民众的生产事业。凡是使用粮食，春季颁赐下去而秋季回收上来。因此收集购买、积蓄储存粮食或钱财，周朝就已经有这样的方法了，本来不只是《孟子·梁惠王》中有“不知检”这句话。《汉书·食货志》引用它时把“检”写作“敛”。唐代颜师古《汉书注》说：大豆和小米非常多，这时可以收购粮食。这是可以作为依据的。南宋朱熹在乡社设置防备灾荒之年的粮仓，制订的方法十分完善。所说的对粮食物资的买进和卖出有一定的标准，维系保持它有一定的要领，就是指用这个乡生产的粮食，养活这个乡的百姓的意思。然而议论的人有的认为这种方法同青苗法相近似，却不知道青苗法是用现钱借贷与回收，乡社义仓是用粮食借贷与回收；青苗法是由官吏主持进行，乡社义仓是由乡里当差人员储藏粮食；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收取利息钱，设置乡社义仓的目的在于救济农民。两者迹象虽然相同，但实际内容却是截然不同的。我大清皇帝爱护养育黎民百姓，没有一个细小的地方不考虑周到，偶尔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就截留通过水道运输的税粮，平抑粮食价格，同过去相比不断地增加，这是为了使老百姓变得有仁德而长寿，从而使广大百姓达到吉祥安乐。

皇帝御制策书又说：古代帝王政治清明、功业成就后，仍然不敢忘记谨慎戒惧。道德才智杰出的圣贤之人的学问，必定有保持平安、运转世局的方法，然后才能够永久保持他们那美好的治国之道。这尤其是保持兴盛安定局面的重要方针步骤。臣下我想来只有唐尧、虞舜的时代，黎民百姓变得友好和睦起来，所有诸侯封国都团结融洽起来，水、火、金、木、土、谷这六方面人民生活需要的物资和端正人们的德行、便利人们的用物、富足人们的生活这三件事都治理得很好，水土得到平治、万物得到成长从而使千秋万代永远获得依赖。然而在宫室听朝正殿的上面，不敢片刻安宁下来，难道是过于谨慎吗？尧帝告戒说：诚惶诚恐，一天比一天更谨慎。《尚书·大禹谟》上说：努力按照上天的命令行事，必须顺应天时，必须小心事情的萌发苗头。称王天下的人秉承上天的意志统治天下百姓，而处于安定的环境要时刻不忘危险的出现，都像这类训导一样。恭谨考察《周易》，首先编

排的是上天的创始之功。所谓的上天,是君主的象征。然而一定要把不停地自我发奋图强作为根本。这是说君主代替上天治理国家,一定要效法上天的运行规律作为自己运转世局的准则。那阳气清明开始上升构成三阳爻而形成《泰卦》,《乾卦》的九三爻辞说:君子整天勤勉努力,直到夜间还警惕戒惧。大概为国事而忧虑勤劳,警惕发生危险,是开通天地阴阳之气交合感应的运行途径。所以《泰卦》的九三爻辞也说:遭逢艰难而能守正不移,就可以免遭祸殃。考察程颐的《伊川易传》说:既然能够遭逢艰难而守正不移,就可以经常保持他的亨通安泰。还说:善于保持亨通安泰的人,他的福祉就可以长久。大概德惠和美善一天一天地积累,那么幸福和利禄就会一天比一天增多;德惠超过了利禄,那么即使盛大然而仍不盈满。这种观点,确实是掌握了保持亨通安泰的方法了。总而言之,亨通安泰,是世界从开始到消灭一个周期的运行,虽然贤才之质不明也得观于礼、虽无射箭之才也得居于位,这是治理国家、教化人民达到经常贞正坚固的手段。保持亨通安泰,是永不间断的极其真挚诚恳的心意,永不怠惰,永不荒废政事,是谋划所做事情大为完备的来源。北宋张根撰写的《吴园周易解》,在六十四卦之中,只对《泰卦》重新提出了一种观点,用来深切著明骄傲自满的戒备,阐发彰明保持亨通安泰的要义,十分详细而且十分完备。太阳、月亮运行遵循上天永恒之道就能永久照耀天下,圣人永久保持美好的治国之道就能教化百姓形成美俗。《尚书·大禹谟》说:自满就会招致损减,谦虚才会得到增益。因此尧、舜兢兢业业,商汤、周武王惶恐不安,即使国家已经大治了、已经安定了,但仍然勤勉咨询、戒备不停。古代的帝王,没有不振奋精神想方设法治理好国家像这样的。像老子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羞辱、适可而止就能避免危险的论断,仅仅知道自我保护罢了,总括起来哪能用来和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相提并论呢?我圣明的大清皇朝安宁和平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前后功绩相继,累世升平相承,皇帝您虽然取得十个方面的武功,但到了老年仍然念念不忘勤劳关注各种征兆,本来做事比伏羲、神农、燧人等三皇和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五帝更加勤奋,而功业已经同时具备从前的规模了。综合考

察远古，没有可以与这个时期比试隆盛局面的了。

像以上这些问题：对圣明的虔敬日益提高，使儒家的传统风尚大放光明。家家户户有粮仓盈满、家人安宁的吉庆，处理纷繁的政务对贪图安逸、嗜欲享乐严加防备，真是盛美啊！臣下我尤其跪拜祝愿皇帝陛下，致力于日日更新、永不停止的修养功夫，成就悠远长久、无边无际的大治，对政事谨慎了还要再加谨慎，精工了还要力求更加精工美好，使朝廷内外安宁快乐，使神灵与人类安宁幸福。我大清王国亿万年政治清明的长久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来自民间出身微贱，新被举拔准备进用，不懂得禁忌避讳，触动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罪该万死。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陈云　殿试对策

陈云（生卒年不详）　字起溶，顺天府宛平县（今属北京）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建极为圣功之要，穷理乃儒术之原。惠心必本于有孚，化成贵要诸久道。圣王宪天出治，锡福绥猷，绍衍心传，敦崇实学，民生于是乎丰裕，治象于是乎光昌。《皇极经世书》曰：天以时授人，圣人以经法天。言典学以懋德也。《宋史·乐志》曰：文教普旁，多士舒翘。言崇儒以翊道也。《晏子春秋》曰：民有终年之委，期月之食，则盈宁有象已。《文子》曰：帝者体太乙，王者法阴阳，则治安有本已。前圣之所以比崇往号，延光将来，罔不同条而共贯者，胥是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单心原于宥密，阐性学之精微；裕益道以阜民，励贞恒而启化。固已天德纯而人文焕，民食足而治术隆矣。乃圣怀冲挹，深思长治久安之道，弥切持盈保泰之图，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治心、明道、茂俗、凝命之端。臣占毕庸愚，何足以知体要？顾念扬言敷奏之文，窃附拜献先资之义，敬承清问，敢不勉述所闻，备陈所习，用效管窥蠡测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执中一言，禹、汤、武相传不易，而因以考千圣百

王之极则，帝臣王佐之嘉谟。臣惟精一执中，尧舜开道原为治源者也。昌言浚哲，禹汤本圣学为君学者也。缉熙执竞，文武本性功为圣功者也。而要之传心之法，不外执中；执中之矩，不外主敬；主敬之本，不外存诚。蔡沈《书传》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乎心。其言可谓切而要矣。夫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儒生之学，先明其理；帝王之学，兼著其事。圣经于大人之学，格致诚正，所以言理之纯；修齐治平，所以言事之备。真德秀《大学衍义》，以为帝王有为治之序，有为学之本，取经文二百五字，先之以《尧典》、《皋陶谟》、《伊训》与《思齐》之诗、《家人》之卦，继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之说，而不及治、平。明邱浚补之，以审几微，更列四者之目，曰圣功之本、敕命之原、存理之端、制治保邦之要。其羽翼乎四十三卷，岂浅鲜哉？《帝范》十二篇，成于贞观；《帝学》八篇，进于元祐。《唐书》称太宗锐情经术，日昃不怠。《宋史》称范祖禹守经据正，献纳尤多。二书均有可采。我皇上至诚无息，庄敬日强，千古之心法、治法，可一以贯之也已。

制策又以洛学末流，歧为二派，而因以辨正学之本原，核诸儒之底蕴。臣谨按，孔子之言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理学真伪之辨，实区于此。自《宋史》道学、儒林，列为两传，儒术遂歧。朱子集诸儒之大成，绍濂洛之微绪，其为学，主于穷理致知，深造实践。黄榦曰：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朱子而始著。盖知言也。同时陈君举，学于永嘉薛氏，才气粗豪，朱子尝讥其近事功。然《本传》言其研精经史，贯穿百氏，自井田、王制、《司马法》、《八阵图》之属，皆可施之实用。较之言道学而空疏无据者，固有间已。朱、陆异同，始于鹅湖论辨。盖朱子主道问学，而九渊指归尊德性。其言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至子静在白鹿洞，讲君子喻于义章，朱子以为深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然则二子之学，其源未始不一也。明代理学，首推河津。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所著《读书录》，平易简切，实为紫阳功臣。学金溪者为姚江，尝提四语为教法，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数语不刊之论，厥后功业烂然，

足征所学。至龙溪王氏,以四无四有之说,判为两种法门,洸洋恣肆,遁入禅宗,启后人之聚讼矣。总之,言致用而不先明理,则推之无本;言穷理而不求致用,则施之罔效。本末兼该,表里如一,斯为明体达用之学乎!

制策又以汉代孝弟力田并重,而因及劝农检田之法,采买积贮之方。臣谨按,《周礼》载遗人掌委积,旅师掌颁敛,仓人掌藏谷,廪人掌藏米。所贮之地,则有乡里、门关、郊野之别。所施之道,则有艰厄、老孤、羁旅之殊。盖法良意美矣。自是师其意而行之者,莫如汉之常平仓。常平始于耿寿昌,而实仿于魏李悝,渊源于管子。管子相齐,通轻重之权,桓公用之,而齐以富。李悝之法,视岁之上、中、下熟,与大饥、中饥、小饥,以为籴粜,亦即管子遗意。后汉显宗欲立常平仓,刘般奏以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大不便。所谓徒法不能自行也。隋文帝开皇中,长孙平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唐太宗时,戴胄奏立义仓,太宗善之。宋乾道中,朱子作社仓于建。嘉定末,真德秀踵行于长沙,民多赖之。其法使贫民岁以中夏,受粟于仓,冬加二计息以偿。岁小不收,则弛其息之半,大饥则蠲之。其法甚善,或谓其近于青苗法,不知其迹似同,其实则异,未可混也。圣天子轸念元元,至深且切,间遇岁歉,或一隅偏灾,民食少乏,皇仁广洽,蠲免天下钱粮,不可数计,又何虑民艰之难达也哉!

制策又以尧称战栗,舜敕时几,古帝王治定功成,兢业犹如是,因推之《易》,以广其义。臣考黄帝语颛顼曰: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贾谊书《修政语》引帝喾曰: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颛顼曰:至道不可过,至易不可易。帝尧曰:吾存心于三古,加意于穷民。帝舜曰:吾取之以敬也,得之以敬也。《吕氏春秋》称:尧见善绻北面而问焉。《荀子》称: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践阼篇》载武王十七铭,《邓析子》载武王《戒慎铭》。古帝王乘乾宰化,胥本宵密之渊衷,为之弥纶于六合,故宵衣旰食,忧盛危明,不敢曰已治已安也。《易》与《书》本相通,河洛之精与《洪范》九畴建极锡极之旨,可相发明。宋张根作《吴园易解》,六十四卦之中,惟《泰卦》别著一论,反复

申明。盖《泰》之内卦,本有健行不息之义,圣贤之举动,一无虚假间断,必有所持守运行,而后能久于其道,纯亦不已,则圣与天合矣。皇上庆征五代,功蕆十全,受多祜而膺鸿名,固纯常而凝宝命,上咸五,下登三,仁圣之事赅而帝王之道备矣。岂不休哉!

若此者:敬德以作所,讲学以饬躬,邦本固则遍德群黎,治术光则贻休奕祀。自古累洽重熙之盛,盖基此。臣伏愿我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建极以锡厥福,成化以保其恒,则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庆,在是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中正的原则,是帝王功业的首要任务;穷究事物的道理,是儒家学说的根本源泉。利民之心必然起源于拥有诚信,教化成功关键在于永久保持美好的治国之道。德才超群的帝王效法上天治理国家,降赐各种幸福,实行安定的谋略,继承发展圣人递相传授的修养自身道德和治理国家的方法,重视崇尚切实有用的学问,百姓的生活因此丰足富裕,大治的景象因此显扬昌盛。《皇极经世书》上说:上天把四季的时节授予人类,圣明的君主效法上天定律来制定治国的原则。这是说致力于学习来努力施行大德。《宋史·乐志》说:文德教化普遍施予,众多的贤士得到举拔。这是说崇尚儒家学说来辅助国家治理。《晏子春秋》说:百姓有终年的柴米积蓄,一个月的食物储存,那么丰盈安宁就有征兆了。《文子》说:称帝天下的人效法天道,称王天下的人效法阴阳,那么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就有根本了。古代圣贤之所以接连推崇往古帝王的称号,留传美名于将来,没有不是事理相通而前后连贯的,全都是因为这个道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殚精竭诚起源于心存仁厚宁静,阐发人性之学的精深微妙,扩展损上益下的道义来使百姓丰足,勉行贞固有恒的德行而开导感化百姓,本来已经使如天之德纯粹而礼乐教化昌明,使百姓的粮食充足而治理国家的方法显赫了。然而圣明的皇帝陛下心怀谦抑,深深思考使国家长期治理、长久安定的方法,更加关切处在极盛时要谦虚谨慎以保持平安的谋划,宣进臣下我等人来

到殿廷，而用修养自身的思想品德、阐明治国的原则、使风俗淳美、严肃对待天命等方面的问题策试我们。臣下我只会诵读经书上的文字、庸下愚昧，哪能够懂得大体和要领？只是念及大声说话向君上陈奏的文字记载，私下迎合拜受君命后就要把事先考虑好的要说的话全部献出的君臣大义，恭敬地承蒙皇帝详细询问，怎敢不尽力述说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详尽陈述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来效纳从竹管中看天、用瓢量海水所得到的一点肤浅见解呢？

跪拜恭敬地阅读皇帝御制策书上有这样的话：秉承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这句话，夏禹、商汤、周武王递相传授不加变更，因而便用来考察成百上千的圣明帝王的最高准则，帝王辅佐大臣的高明谋略。臣下我想来精诚专一的道德修养、秉承不偏不倚的中正原则，是尧、舜开创君主修养自身道德的本源为治理国家的本源的。正当的言论，深邃的智慧，是夏禹、商汤根据圣帝的学问发展为君主的学问的。小心谨慎、自强不息，是周文王、周武王根据人性之功发展为神圣功业的。而概括他们心心相传的修养自身道德和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外乎是秉承不偏不倚的中正原则；秉承不偏不倚中正原则的法度，不外乎是持守恭敬之心；持守恭敬之心的根本，不外乎是心存诚信仁厚。南宋蔡沈的《书集传序》上说：唐尧、虞舜二帝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治国方法，本源于道；而二帝三王的道，本源于合乎仁义礼智伦理原则的心地。他的话可以说是确切而且扼要了。帝王的学问，和儒家学者不一样。儒家学者的学问，先阐明它的道理；而帝王的学问，还一并昭著它的事实。儒家经典对于帝王的学问来说，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意念诚实而心术正当，是用来谈论义理的纯正的；修养自身的品德、整治家庭、治理国家、安定天下，是用来谈论事情的完备的。南宋真德秀所撰写的《大学衍义》一书，认为帝王有进行治理的顺序，有从事学问的根本，选取《大学》中属于经文的二百零五个字，首先把《尚书·尧典》、《尚书·皋陶谟》、《尚书·伊训》和《诗经·思齐》这首诗、《周易·家人》这副卦放在前面，接着安排的是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的学说，却没有谈论到治理国家、安定天下的内容。明代邱浚增补该书空缺的内容，来仔细审察事

情萌发的微妙先兆，重新列举了四方面的条目，分别叫做：帝王功业的根本、谨慎对待天命的本源、存养理性的开端、治理政务与维护国家的要领。该书对《大学衍义》原书四十三卷的辅助作用，难道轻微吗?《帝范》十二篇，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帝学》八篇，进献于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唐书》称颂唐太宗对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用心专一，太阳偏西了仍不懈怠。《宋史》赞许范祖禹维护经典，遵依正道，进献忠言以供采纳尤其众多。这二部著作都有值得采纳的地方。我大清皇帝陛下极其真挚诚恳的心意永不间断，对处理政事的庄严恭敬一天比一天加强，对于流传千古的修养自身的方法和治理国家的方法，可以贯通它们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北宋洛阳人程颢、程颐的学说发展到后期，分歧为两大流派，因而便来辨析合乎正道的学说的本源，考核众位儒家学者的内情底细。臣下我恭谨考察，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问道德，现在的人求学是为了沽名钓誉给别人看。宋明理学家真实与虚假的分辨，实际上就区别在这里。自从《宋史》将理学、儒林列为两大列传，儒家的思想学说便产生分歧了。南宋朱熹荟萃众位儒家的所有成就，继承北宋濂溪先生周敦颐和洛阳人程颢、程颐尚不明显的端绪，他研究学问，以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为主，更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亲自实践。南宋黄榦说：从孔子去世以后，到了曾子、子思时继承了已经衰微的儒家学说，到了孟子时才开始显著起来。从孟子去世以后，北宋周敦颐、程颢和程颐、张载继承了已经中断的儒家学说传授统绪，到了南宋朱熹时才开始重又显著起来。这大概是有见识的话。和朱熹同一时代人陈傅良，向永嘉人薛季宣学习，才能气概粗犷豪放，朱熹曾经指责他追求做事的实际功用和效果。然而《宋史·陈傅良传》说他精心研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融会贯通诸子百家的著作，从井田制、王朝制度、《司马法》、《八阵图》等等，都可以在实际应用中施行它们。这和那些谈论理学而空虚浅薄没有根据的人相比，确实是有差别的了。朱熹和陆九渊学说的不同，肇始于在鹅湖寺相会时进行的论辩。大概朱熹主张致力于学问，而陆九渊的主旨在于尊重人的自然至诚品性。陆九

渊说道:既然不懂得尊重人的自然至诚品性,哪有所说的致力于学问呢?等到陆九渊在白鹿书院,讲授《论语·里仁》君子只懂得义这一章,朱熹认为他的观点准确击中了做学问的人隐约细微、积习难返的毛病。既然这样,那么朱熹与陆九渊二位先生的学说,它们的来源并不是从开始就不一致的。明代的理学家,推举为第一的是河津人薛瑄。他晚年专心致志研究高大光明的天道,暗地里契合那天道的神妙。他所撰写的《读书录》,浅近易懂、简要切实,实际上是对朱熹学说传播做出贡献的人。学习金溪人陆九渊学说的人是浙江余姚人王守仁,他曾经提出四句话作为门徒遵守的法规,分别叫做无善无恶是内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意念的活动,知善知恶是先天具有道德意识,为善去恶是研究事物原理。这几句话成为不可改易的论点,此后功勋事业灿烂卓著,完全可以用来验证所学到的知识。等到龙溪先生王畿,把王守仁四无四有的学说,区分为两种途径,言辞放纵肆意、无拘无束,将理学引入禅宗,于是开启后人众说纷纭、久无定论的争议了。总而言之,谈论付诸实际应用如果不事先懂得事理,那么推究起来就没有根本;谈论穷究事物原理如果不讲求尽其所用,那么实施起来就没有效果。本质和现象全都兼备,思想和言行完全一致,这才是明白本体、尽其所用的学说吧!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汉代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德行的人和努力耕作的人一并得到重用,因而便谈论到鼓励农事和察验农田的方法,收集购买、积蓄储存粮食或钱财的方法。臣下我恭谨考察,《周礼》记载遗人掌管余财余粮的储蓄,旅师掌管颁发和回收粮食,仓人掌管收入谷粟的贮藏,廪人掌管供给需用的去皮的各种粮食。所贮藏的地方,则有在周王及诸侯国郊内设置的乡与民众聚居的里所、出入必经的国门和关门、距王城百里的郊外和距王城三百里的野外的区别。所救济的措施,则有困乏无以为生的人、死于公事的老弱眷属、暂时寄居客民的区别。这大概是良好的方法和美好的心意了。从此以后仿效这种美好的心意而施行利民措施的,没有能赶得上汉代常平仓的。筑仓储谷在谷贱时增价购入、在谷贵时减价售出使米价长期平衡的方法由汉宣帝时耿寿昌首先创建,但实际上是仿照战国

时魏国李悝的做法，又起源于春秋时齐国的管仲。管仲在齐国担任国相，精通关于调节商品、货币流通和控制物价的理论，齐桓公采用了他的办法，于是齐国因此富裕强大起来。李悝在丰年按平价购粮储存以备荒年出售的平粜方法，是观察每年的上等收成、中等收成、下等收成，和严重的饥荒、中等的饥荒、轻微的饥荒，作为卖出谷物、买进谷物的依据，这也就是管仲的遗留意旨。东汉明帝打算建立常平仓，大臣刘般上奏认为这样做是侵害百姓，富豪家族、世家大户乘机勾结为非作歹，十分不便利。这就是所说的只有制度是不能自动施行的。隋文帝开皇年间，大臣长孙平奏请命令各州郡的百姓和隶属军籍、服兵役的人，鼓励与督责他们在所在的乡社，共同建立起为防备灾荒而设置的粮仓。唐太宗在位时，大臣戴胄奏请建立防备灾荒的粮仓，唐太宗认为他的建议是好的。南宋孝宗乾道年间，朱熹在建州乡社建立为防备荒年而设置的粮仓。南宋宁宗嘉定末年，真德秀在长沙仿照实行，百姓大多依赖这种方法得以维持生活。这种方法是让贫穷的百姓在每年的农历五月盛夏季节，从粮仓中领取粮食，到了冬季增加二分计算利息来偿还。稍微有些欠收的年头，就减免百姓所偿还利息的一半，灾荒严重的年头就全部免除百姓所偿还的利息。这种方法非常好，有人说它和北宋在春夏两季青色的禾苗青黄不接时将各路所积钱粮出贷给民户的方法相近似，却不知道这两种方法表面看来好像相同，而它们的实质却是大不相同的，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大清圣明的皇帝陛下怜惜顾念百姓，极其真挚而且恳切，偶尔遇到收成不好的年头，或者一个地区发生危害很大的灾害，百姓的食粮稍微缺乏一些，皇帝的仁爱广博周遍，免除天下百姓交纳的钱财和粮食，不能用数目计算得过来，又何必忧虑百姓生活艰难困苦而难以富裕起来呢？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尧帝告戒要诚惶诚恐，舜帝也说努力按照上天的命令行事必须顺应天时，必须小心事情萌发的苗头，古代帝王政治安定、功业成就以后，谨慎戒惧尚且像这个样子，于是推究于《周易》，来增广它的含义。臣下我考察黄帝曾经对颛顼说：大的圆天在上面，大的方地在下面，你能效法天地方圆之道，就可以

成为百姓的父母。汉朝贾谊所撰写的《新书·修政语》援引帝喾的话说：处理政事没有比讲究信用更重要的，治理国家没有比普施仁爱更重要的。黄帝说：道就像河流中的水，它的流出源源不断，它的运行永不停息。颛顼说：最玄妙精深的道理不能够失去，最简单易行的东西不能够改变。帝尧说：我用心于上古、中古、下古，着意于贫穷的百姓。帝舜说：我取得它靠的是恭敬谨慎，我得到它靠的也是恭敬谨慎。《吕氏春秋》称：帝尧接见有道之士善绻时面向北方以臣子的身份向他请教。《荀子·大略》称：帝尧曾经向君畴学习，帝舜曾经向务成昭学习，夏禹曾经向西王国学习。《大戴礼记·践阼篇》记载着周武王镂刻在弓、矛、宝剑、水盆、屋门、南窗、屋柱等十七种器物上自我警戒的文字，《邓析子》记载着周武王的《戒慎铭》。古代帝王秉承天意主宰教化，都本源于仁厚宁静渊深的心怀，所以能够包容天地四方之间的一切事物，因此天不亮就穿衣起身，过了中午才进食，身居安定时想到危险，不敢说国家已经治理了、社会已经安定了。《周易》和《尚书》本来相互贯通，黄河出现背上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背上有图形的神龟与《尚书·洪范》九类治国大法中君主建立并施布最高准则的意旨，可以相互印证。北宋张根撰写《吴园周易解》，在六十四卦之中，只对《泰卦》重新提出了一种论点，翻来覆去加以重申阐明。大概《泰卦》的下三爻，本来就有刚健运行永不停息的意思，道德才智杰出的圣贤之人的举止行动，丝毫没有虚假间断，一定有保持世局运行的原则，然后才能长久保持他们美好的治国之道，纯正不杂的心念也永不间断，那么圣明就与天意相合了。我大清皇帝陛下的吉庆可以验证于唐尧、虞舜、夏、商、周五代，十个方面的武功都已完成，接受众多的幸福而享有盛大的名声，坚定纯粹完美的德行而严格遵守上天的命令，向上都和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五帝相合，向下都和夏禹、商汤、周文王相合，仁德圣明的事迹齐备以后于是称帝称王天下的原则也就都具备了。难道不是太美好了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敬崇德行来在君位上劳作，研习学问来饬戒

自身。国家的根本牢固，那么恩德就普遍施予给百姓；治理国家的方法显扬，那么美名就能世世代代留传了。自古以来前后功绩相继、累世升平相承的盛大局面，大概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跪拜祝愿我大清皇帝陛下，社会安定了再追求更加安定，国家治理了再追求治理得更好，建立至高无上的准则来赐予各种幸福，教化成功形成美俗来保持那永恒的状态，那么我大清皇国亿万年无穷无尽的吉庆，就在这里面了。臣下我来自民间出身微贱，新被举拔准备进用，不懂得禁忌避讳，触动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罪该万死。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对上。

陈希曾　殿试对策

陈希曾(生卒年不详)　字集正，又字雪香，号钟溪。新城(今属江西)人。工于为文，精通掌故，有治事之才。乾隆五十八年(1793)探花。嘉庆时官至工部右侍郎，在浙、闽一带审理诉讼，坐事降二秩，留任卒。

臣对：臣闻持敬者，锡福之原；典学者，淑世之本。裕民宜储乎委积，慎宪贵凛乎时几。伊古帝王，继天出治，胥本正位凝命之实，立丰亨豫大之模。以垂道统，则所其无逸也；以正学术，则会其有极也；以渥膏泽，以跻治安，则重农贵粟之有经，保泰持盈之必饬也。《易》曰：中正以观天下。《礼》曰：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惟钦崇之道，端自一人，斯醇茂之风，应于四海。是以绵区饮化，匝宇归仁，上畅九垓，下溯八埏，所为罄图牒而难称，超古今而莫拟者，道由是也。

钦惟皇帝陛下，学贯天人，道光谟烈，性功裕而文治益昭，邦本固而民气胥乐，式稽前古，无以逾斯，洋洋乎帝者之上仪矣。乃圣怀冲挹，弥切畴咨，犹以体天、明道、足食、保邦之要，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来自田间，知识椷昧，然际嘉言罔伏之时，敬承清问下逮，敢不竭刍荛之愚以对，用效土壤细流之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十六字心传，蔡氏沈《书序》言之綦详。执中一

言，禹、汤、武相传不易。所以致其精一者，其要何居？臣惟尧之命舜曰：允执厥中。实开万世心法、治法之原。舜命禹而衍以危微精一之训，继之曰：敬修其可愿。则于审择固执之道，谨几慎动之要，益加密焉。至于汤、武相继而王，而史臣之赞汤曰：建中于民。箕子陈范于武王，则曰：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所谓极，亦中也。言人君以中之道化民，如树表而立之极也。信乎帝王之治法，即帝王之心法。蔡氏沈《书序》所谓治本于道，道本于心，良不诬也。唐太宗作《帝范》，言虽不必尽醇，而指陈实事，引经证史，具有条理。至宋范祖禹《帝学》一编，归本于健行不息之旨，则所谓能见其大者矣。真德秀《大学衍义》，取经文二百五字，证之以《尧典》、《皋谟》、《伊训》与《思齐》之诗、《家人》之卦，申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之说，而治、平之道，在举而措之耳。明邱浚补之，提挈大纲，更列四者之目，曰圣功之本、敕命之原、存理之端，与夫致治保邦之要，则又内外兼赅，信足以羽翼原书矣。皇上心通造化，道阐苞符，衍往圣之心传，析诸儒之底蕴。伏读经筵御论允执其中一章，精义微言，发前人所未发，盖合心法治法而一以贯之。帝典王谟，莫是过也。

制策又以洛学末流，歧为二派，而因推究于金溪、紫阳之异同。此诚表章正学之盛心也。臣惟道学之名，至宋始有。自周子倡道东南，而二程子继之，至朱子而益衍其传。故后世言理学者，以朱子为宗。永嘉之学，谈经济而遗心性，非圣贤明体达用之旨，当时朱子已深议之。至金溪陆氏之学，则以践履笃实、求放心为要。或谓其学与朱子异，然其发明义利之辨，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疾，朱子亦倾服之。则其致力于本原之地，亦曷尝与朱子异也。明代以制义取士，学者皆读程朱之书。至姚江天资高朗，独扩金溪之传，而河津性术醇谨，恪守紫阳遗矩。世遂多以河津为正，而訾议姚江。然姚江之书具在，其所树立尤著，即其以良知提醒斯人，与金溪之求放心同旨。皆原本孟子，所以救斯人之迷溺于利欲之途而失其本心者也。河津非不知此，然或才识未逮，所以树立亦稍逊焉。至王畿以后，讲心学者，流入空虚而无实用，则其本原已非，非但末流之失也。皇上缉熙执竞，懋典时勤，本道法以垂治统，盖帝王之学，体用具备，非儒生所能

望其万一矣。

制策又曰：汉代力田与孝弟并重，而因究论夫采买积贮之方，社仓青苗之法。臣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又民食之本也。劭农之官，莫先于亲民之吏，以其周知民隐也。宋时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其结衔，必有"管内劝农"等字，则犹三代重农之遗意也。至明代设检田之吏，其于古人设官之意，虽欲相承而实远矣。若夫采买积贮，亦重农贵粟之一端也。臣考《周礼》，遗人有委积之掌与法，丰年敛之，凶年散之。此积贮之原也。而司市以泉府同货而敛赊。郑注云：同谓民货雍积，则为敛而买之。此采买所自昉也。《孟子》"不知检"之语，《汉书》引之作"敛"。汉世去古未远，其所引证，必不虚。此可见采买积贮，自周已有之也。后世积贮之善，莫如朱子之社仓。顾或谓社仓之法，春散秋敛，与青苗相似。然青苗之法，贷之以钱，而责其偿粟。民得钱而买贵粟以食，及其偿也，又以贱粟而折钱。虽曰二分行息，而钱粟相较，不止二分矣。社仓粟贷粟偿，春耕粟贵，农民不苦乏食；秋收多粟，农民借仓以储。虽曰二分行息，而实与无息同。况行之既久，减为一分，又久则并去其息。此其利病悬殊，有未可同日而语者矣。圣天子轸念斯民，无微不至，偶遇偏灾，即特赐蠲赈，普免正供，隆施叠沛，此汉唐未有之盛事也。而又责成所在有司，实力采买积贮。民生斯时，信游隆古之世矣。

制策又以古帝王治定功成，不忘兢业，而因反覆于保泰持盈之道。此诚敕几敛福之至意也。臣谨案，《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宋臣苏轼有言：天之所以运而不已者，以其动而不息也。然则人主体天立极，亦必法天之行以为行，而后功崇业广，久道化成焉。若夫地天合而成《泰》，《泰》之内卦即《乾》之内卦也。《乾》三之辞曰：厉无咎。《泰》之三则曰：艰贞无咎。《泰》三之所谓艰贞，即《乾》三之所谓厉也。有朝乾夕惕之心，而后无恤于平陂往复之运。尧戒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舜庸作歌亦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然则自古帝王，所以久安长治与天同符者，未有不凛以其难其慎之思，而将以亦临亦保之诚者也。宋张根作《易解》，六十四卦中，惟《泰卦》别著一论，于开泰保泰之道，盖反复申明焉。若老氏知足知止之戒，仅足自

守,而不可语圣贤之学矣。皇上治洽万方,道隆千祀,文德武功,既已高出乎往代矣。然犹耄念八徵,阐四得之训,扩十全之模,夙夜勤求,历五十余年如一日。虽《诗》美殷宗不敢怠遑,《书》称文王之不遑暇食,何以逾兹?

若此者:宗往圣而单心宥密,布成宪以广历学官,下土溢余一余三之庆,深宫麾曰明曰旦之衷。臣尤伏愿我皇上至诚无息,日新又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皇极敷言,是彝是训。仰观俯察,咨度必先夫岁功;旰食宵衣,乾惕弥勤于上理。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庆,视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持守恭敬之心,是赐予福泽的源泉;始终不忘致力于学习,是陶冶世人的根本。使民众富裕应当储备余财余粮,谨慎对待你立下的法度关键在于顺应天时、谨慎对待事情的萌芽。古代称帝称王的人,秉承上天的意旨来治理国家,全都根据端正帝位、保住天命的实际心愿,建立丰盈、亨通、欢乐、弘大的太平景象。用来垂示帝王大道授受的系统,那么君主在位就不能贪图安逸享受了;用来端正治国之术,那么君主就能聚合那些按照至高无上的王道准则办事的人;用来扩展对百姓的恩泽,用来达到社会的安定,那么重视农事活动、重视粮食生产就有准则了,保持安定兴盛的政治局面就必然谨严了。《周易·观卦》上说:具有中和刚正的资质就可以让天下人观仰。《礼记·礼运》上说:君王处在中间作为核心而无所作为,来保持最纯正的君王法则。只有敬奉尊崇皇天的法则,发端于我自己一人,这淳厚丰茂的为政之德,在整个天下就得到响应。因此广阔的疆域得到滋润化育,所有的区宇归附仁德仁政,向上可以通达到九重天上,向下可以流布到八方边远地方,之所以用尽图籍表册却难以述说,超越古代当今却无法摹拟出来,是由于至高无上的准则造成这种情况的。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渊博的学问贯通了天道和人事,治国之道弘扬了祖宗的谋略和功业,保全百姓生命的功业盛大而礼乐教化的治理越来越显著,国家的根本稳固而百姓的精神面貌全都喜乐

洋洋，用这种盛况稽考远古，没有超过这样的，帝王的至高无上法则真是太盛大了。然而圣明的皇帝陛下心怀谦抑，更加恳切访问，仍然用体察天命、阐明治道，使粮食充足、保卫国家的要领，宣进臣下我等人来到殿廷而策问我们。臣下我来自民间乡村，见识愚昧，然而值此美善之言无所藏匿的时刻，恭敬承蒙清审详问恩惠及于下人，怎敢不竭尽打柴人的愚昧来恭谨对答，来效纳微少的泥土、细小的溪流对泰山大海的帮助呢？

跪拜恭敬地阅读皇帝御制策书上有这样的话：尧、舜、禹心心相传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修养自身道德和治理国家的原则，南宋的蔡沈先生在《书集传序》里将它们阐述得极为详细了。秉承着那不偏不倚的中正原则这句话，夏禹、商汤、周武王递相传授不加变更。达到那精粹纯一的道德修养境界的方法，它的要点在什么地方？臣下我想来，唐尧命令虞舜继位的时候说：要实实在在地秉承那不偏不倚的中正原则。这实际上是开启了千秋万代君主修养自身道德的方法和治理国家的方法的源泉。虞舜命令夏禹继位的时候便推演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训戒，接着虞舜又命令夏禹说：恭敬地施行百姓希望做的事情。这样对于审察选择、专一坚持的原则，小心对待事物萌芽、谨慎对待行为动作的要领，就更加细密了。至于商汤、周武王相继称王于天下，因而写史书的臣子们赞扬商汤说：在百姓中建立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作为共同的准则。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向周武王陈述治理国家的九类大法时，便说：第五类，帝王统治天下的准则。帝王应当建立起他统治天下的至高无上的准则。所谓的准则，也就是中正的准则。是说君主用不偏不倚的中正准则教化百姓，如同竖立标志记号而确立中正的准则一样。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的确就是帝王修养自身道德的方法啊。蔡沈先生在《书集传序》里所说的唐尧、虞舜二帝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治理本源于道，而二帝三王的道本源于合乎仁义礼智伦理原则的心地，确实不是虚妄的。唐太宗撰写的《帝范》，言论虽然不一定十分淳美，然而指明和陈述切实有益的事情，援引经书验证史实，全都具有条理层次。到了北宋范祖禹撰写《帝学》

这一著作，把本源归结到天道刚健运行永不停息这一要旨上来，也就是御制策书中所说的能够看出它的主要意旨了。南宋学者真德秀撰写的《大学衍义》一书，选取《大学》中属于经文的二百零五个字，用《尚书·尧典》、《尚书·皋陶谟》、《尚书·伊训》和《诗经·思齐》这首诗、《周易·家人》这副卦来证明它，用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的观点来说明它，然而整治家庭、安定天下的方法，在于拿来然后实施它们罢了。明代邱浚补充该书整治家庭、安定天下方面的内容，揭示它的要点，重新列举了四方面的条目，分别叫做：帝王功业的根本、谨慎对待天命的本源、存养理性的开端，与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维护国家的要领，则又兼备内心具备至高无上的德行而对外施行帝王仁政的学说，确实足够用来辅佐《大学衍义》原书了。我大清皇帝陛下心通天地自然创造化育，治道阐明神圣经典的奥妙，继承前代圣贤心心相传的修养自身道德和治理国家的原则，辨析众位儒家学者内心蕴藏的才智见识。跪拜恭敬阅读讲经论史的御前讲席上皇帝亲自拟定的论断中实实在在地秉承好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这一章节，精深的义理、微妙的言辞，阐发前人所未能阐发的论点，大概是将自身品德修养的方法和治理国家的方法合在一起而把它贯穿在一切事物之中了。《尚书》中记载帝王法则和谋略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没有超过这些的。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北宋洛阳人程颢、程颐的学说发展到后期，分歧为二大流派，因而便推求研究南宋金溪人陆九渊的学说与紫阳先生朱熹的学说的不同和相同之处。这实在是表彰合乎正道的学说的深厚美好的用意。臣下我想来，儒家的道统学问这个名称，到了宋朝才开始出现。自从北宋周敦颐先生在东南地区进行倡导，而程颢、程颐二位先生继承了他的观点，到了朱熹先生时就更加扩展了理学的传播范围。所以后世谈论理学的人，把朱熹先生作为师承的宗主。南宋永嘉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喜欢谈论治理国事、救济民众而遗忘了心性之学，这并不是道德才智杰出的圣人、贤人明确透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意旨，当时朱熹先生已经严厉地指责他们。至于金溪人陆九渊的学说，却把行为纯厚朴实、寻

找沦丧了的仁爱之心当作要领。有人认为他的学说与朱熹先生不一样,然而他揭示道义和功利的辩证关系,准确击中了做学问的人隐约细微、积习难返的毛病,连朱熹先生也倾心佩服他。那么他竭尽全力探寻根源的地方,又什么时候曾经和朱熹先生有过不同呢?明代用八股文选拔士人,求学的人全都阅读程颢、程颐和朱熹的著作。至于浙江余姚人王守仁天性豁达开朗,独自扩展金溪人陆九渊学说的传播,而河津人薛瑄性情淳厚谨慎,恭谨地遵守紫阳先生朱熹留下的法度准则。社会上的人于是大多把河津人薛瑄的学说当作理学嫡传的宗派,因而诋毁非议浙江余姚人王守仁。然而浙江余姚人王守仁的著作全都存在,他所建树的观点格外显著,就是他用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提醒世人,这与金溪人陆九渊寻找沦丧了的仁爱之心是相同的意思。都是本源于孟子,是拯救那些世人沉迷在利欲熏心的道路上而丧失了他们天然的仁爱之心的办法。河津人薛瑄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然而或许因为他的才能识见未能达到顶点,所以所建树的观点也比王守仁稍微逊色些。等到王畿以后,讲习研究心学的人,演变成空洞虚无而没有实际应用价值,那么它的本源已经与原来不同,不仅仅是心学本身发展到后期的过失了。我大清皇帝陛下光明正大、自强不息,重大的典章制度时刻勤奋修习,根据帝王大道授受的方法来垂示治理国家一脉相传的统系,大概帝王的学问,本质和现象全都完备,并不是儒家读书人所能赶得上万分之一的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说:汉代努力耕田的人和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德行的人一并得到重视,因而便研究讨论那收集购买、积蓄储存粮食或钱财的方法,在乡社设置防备灾荒之年的粮仓、在春夏两季青色的禾苗青黄不接时将诸路常平仓、广惠仓所积钱粮出贷给农户的方法。臣下我想来,国家把百姓作为根本,百姓把吃饭作为根本,农业生产又是百姓能吃上饭的根本来源。鼓励农业生产的官员,没有比接近百姓的官员更为首要的,因为他们能够详细了解百姓的痛苦。宋朝时命令朝廷大臣外出驻防各郡,号称暂且代理军州事。他们签署的官衔,一定有"管内劝农"等字样,那么这仍然是夏、商、周三代重视农业生产的本来意图。到了明代设有察验农田的官吏,这和古人

设立农官的意图相比，虽然是想要前后相互继承沿袭但实际上却相去太远了。至于收集购买、积蓄储存粮食或钱财，也是重视农事活动、重视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臣下我考察《周礼》的记载，遗人有对余财余粮的掌管与救济的方法。在丰收之年就收集余财余粮，在饥馑之年就散发余财余粮。这是积蓄储存方法的起源。而司市用泉府的货币对滞销的货物和急需的货物用收购和赊销的方式调节市场的供需。东汉郑玄注释说：同指的是民众货物的滞销堆积，因此就用收购的方式来购买它们。这是收集购买的由来开始。《孟子·梁惠王》中“不知检”这句话，《汉书·食货志》引用它的时候把“检”写作“敛”。汉朝距离古代不算十分遥远，《汉书》援引作为证据的话，一定不是虚假的。由此可以看到收集购买、积蓄储存的方法，从周朝就已经有这种方法了。后代积蓄储存方法运用最好的，没有赶得上朱熹在乡社为防备灾荒之年而设置粮仓的。不过有的人认为在乡社设置粮仓的方法，春季发放、秋季回收，与青苗法相类似。然而青苗法，是把钱财借贷给民户，而要求他们偿还的却是粮食。百姓得到借贷的钱财以后便购买价格昂贵的粮食来食用。等到他们偿还的时候，又把价格低廉的粮食折合成钱财。虽然说是按照二分支付利息，但钱财和粮食相互比较来看，就不仅仅是二分利息了。在乡社设置的粮仓用粮食借贷，用粮食偿还，春季耕作的时候粮食价格昂贵，农民不被食用不足所苦；秋季收获的时候所产的粮食众多，农民借助粮仓来储存粮食。虽然说是按照二分支付利息，但实际上和没有利息是一样的。况且这种方法推行时间长久以后，就减少为按照一分支付利息了，再推行很长时间以后就一并免去农民所支付的利息了。这是青苗法、乡社义仓法好处弊病相差悬殊，有不可相提并论的地方。我大清圣明的皇帝陛下怜惜顾念百姓，关怀照顾没有细微不周到的地方，偶尔遇到一个地方发生大的灾荒，就特别赐恩免除租税、救济饥贫，普遍免除法定交纳的租税，盛大的恩泽接连降下。这是两汉与唐朝所从来没有过的盛大事情。而且又命令各地官吏，切实用力收集购买、积蓄储存粮食和钱财。百姓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确是畅游远古的时代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古代帝王政治安定、功业成就后，仍然不忘记谨慎戒惧，因而便对如何保持安定兴盛的政治局面再三加以思考。这实在是谨慎对待事物的苗头、聚集各种幸福的极其深远的用意。臣下我恭谨加以考察，《乾卦》的《象辞》说：天的运行刚强劲健，君子因此不停地自我奋发图强。宋朝大臣苏轼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体之所以运行而不停止的原因，是因为它运动而不停止。既然这样，那么君主根据天命来确立至高无上的治国准则，也必须效法上天的运行来作为自己运转世局的准则，然后才能功勋盛大、事业扩大，永久保持美好的治国之道，最终教化形成。至于天地阴阳交合而形成《泰卦》，《泰卦》的下三爻就是《乾卦》的下三爻。《乾卦》的九三爻辞说：虽然处境危险，但终究没有祸殃。《泰卦》的九三爻辞也说：遭逢艰难危险而能守正不移，就可以免遭祸殃。《泰卦》九三爻辞中所说的遭逢艰难危险，就是《乾卦》九三爻辞所说的处境危险。有白天勤勉努力、夜晚警惕戒惧的心思，然后对于平地变成险坡、离去必定复返的运行就不用担心了。尧帝曾经告诫说：诚惶诚恐，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舜帝因为百官互相信任、和睦团结而作歌也说：努力按照上天的意旨行事，必须顺应天时，必须小心对待事物萌发的苗头。既然这样，那么自古以来的帝王，之所以使国家长久安定、长期治理与天意相合，没有谁不是因为怀有敬畏任用辅佐官员是艰难的事因而要慎重加以考察的心思，而始终秉承虽然贤能不显著也得观礼、虽无射箭才能也得居位的诚意的。北宋张根撰写的《吴园周易解》，在六十四卦之中，只对《泰卦》重新提出了一种观点，对于亨通安泰、保持兴盛的方法，翻来覆去加以重申阐明。像老子自知满足就不会招致羞辱、适可而止就能避免危险的告诫，仅仅能够用来自我守护罢了，却不能和道德才智杰出的圣人、贤人的学问相提并论。我大清皇帝陛下治理安抚天下各地，使治国之道兴盛于千秋万代，礼乐教化、军事功绩，本来就已经超过从前历代了。然而到了老年仍然时刻思考各种征兆，阐发元始、亨通、和谐有利、贞正坚固四种美德的训戒，扩大十个方面武功的规模，日日夜夜都在勤奋追求，经历五十多年如同一天一样。虽然《诗经·殷武》赞美商王武丁不敢怠慢荒废政事，《尚

书·无逸》称赞周文王忙碌处理政务没有空暇时间吃饭，怎么能超过这种辛勤劳苦的精神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遵奉前代圣贤的事业而殚精竭诚心存仁厚宁静，推行原有的规章制度来广泛磨砺主管学务的官员和生员，下等土地也充满耕种三年余有一年存粮、耕种九年余有三年存粮的吉庆，皇帝居住的宫禁之中殷切关注天就要亮了、天就要亮了的心念。臣下我尤其跪拜祝愿我大清皇帝陛下极其真挚诚恳的心意永不间断，天天更新再天天更新；天子的德行广大而且影响深远，既是圣明的，又是神妙的；君王所宣布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就是要经常遵守的法令，就是天子的教导。抬头观察天文、低头观察地理，咨询商酌必定把一年农事的收获放在首位；过了中午才进膳、天不亮就穿衣起身，白天勤奋努力、夜晚警惕戒惧，越来越勤奋追求天下大治的局面。我大清皇国亿万年无穷无尽的吉庆，就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来自民间出身微贱，新被选拔准备进用，不懂得禁忌避讳，触动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罪该万死。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董文武译〕

清高宗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齐人曰:所以为蚿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殿试策问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六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懋膺昊眷,惟日孜孜,延洪景命,四事是黾,八徵念协,以唐虞三代之心为心,以唐虞三代之治为治,期天心之吉祐,冀民俗之协中,海隅成买犊之风,乡校整掺觚之体,庶跻上理,爰布嘉谟,尔多士尚其敬听。

民之天惟君,而大君为天之子。应天以实不以文,庶徵协应,首重养民。汉文帝赐半租,宋仁宗免积逋,一次仅见之举,讫致小康。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定田赋额;圣祖仁皇帝曾经普免田赋、漕粮各一次;世宗宪皇帝蠲免浮粮,如苏、松二府,每年减至数十万。朕御宇至今,免天下钱粮四次,免漕粮三次,免各款积逋亦不下数千万。凡以殷怀保赤,敬体天心。子之于父,不敢言报;天之于朕,申锡无疆。古之荧惑退舍,蝗不为灾,虽未可尽信史册,而善言天者,必验于人。其说若何?

虞廷弼教,钦恤惟刑。《禹刑》、《汤刑》,其书缺轶。肉刑除于何时,非刑酷于何代,刑之属何以共系三千,法与名何以各为一家,刑与兵何以合为一典?朕慎重民命,准之天理人情,以为明罚敕法。当虑囚之时,惟期其得实;观纵囚之事,每哂其好古。引《春秋》以决事,非读书、读律者所当留意欤?

古之海防,以御外寇。故明郑氏《海防全图》,袤延万里,多讲戍

守之方。今中外大同，鹿耳、鸡笼，久已内属，茭塘沙湾，诸盗薮亦全就廓清。所防者，莠民之出洋窃掠而已。惟是波浪迢遥，帆樯倏忽，乘隙窃发，往往难稽。论者以为，稽人不如稽舟，稽出不如稽入，稽水不如稽陆。盖出洋行劫，赃必载还。于出口先给一票，记舟中之所有。无赍而往，有挈而来，其来历可诘也。出产货物，各有其地，贩鬻货物，各有专行。货非生所往之地，及忽卖此货，忽卖彼货，恒无一定者，其来历亦可诘也。果可行欤？不虞其滋扰欤？

民风多随乎士习，士习可验于文章。故韩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古法乡举里选，汉尚有孝廉、茂才诸名，制科则偶一举行，不为定制。进士科始自隋而盛于唐，至宋元祐中，始变诗赋为经义。元延祐因之，明洪武中，遂定为三场之制，沿用至今。或谓隆庆以后，不及嘉靖以前。然摹拟王、唐，每成貌似。又谓隆庆以后，始机法周密；天启以后，始议论崇闳。然纤巧恣肆之弊，又因以丛生。果以孰为是欤？至文以明理，或驰骋以见才，或臶积以见学，固为陋习。然一矫其弊，又或枯窘而空疏，使庸浅者易售。又何以酌其中欤？

凡此者，乾惕朕衷。一日二日，欲至于万年，于惠心孚其昭事，于止辟播其祥和，于戢暴致其安恬，于作人观其成化。多士桥门释褐，学古入官，言资先献也。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百姓所喜好的，国君也应喜好它；百姓所厌恶的，国君也应厌恶它。

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颇，仲由卤莽。

齐国便有人说：孟子为蚳蛙出的主意，确实是挺好的了。但蚳蛙为自己做的打算，我却不知道了。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荣耀地承受苍天的宠爱,只想每天勤勉努力地操劳国事,延续授予帝位的洪大天命,对礼、乐、兵、刑四方面的事情勤勉尽力,对各种天气征兆时刻思考和谐,把唐尧、虞舜与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合乎仁义礼智伦理原则的道心当作自己的道心,把唐尧、虞舜与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的治国原则当作自己的治国原则,期望在上天意志的保佑下获得吉利,期望百姓的风俗习惯符合正道,海边僻远的地方养成换剑买牛从事农业生产的风气,乡间地方学校整饬执简写作的体裁,但愿达到上等的治国状态,传布高明的经国谋略,你们这些众多的贤能士子要恭敬地聆听策问的事项。

老百姓的主宰者是君主,而君主是天的儿子。顺应天命依靠实际事功而不是根据表面文彩,各种气候征兆配合呼应,首先在于重视养育百姓。汉文帝下令减免百姓一半的租税,宋仁宗免除百姓累积拖欠的赋税,一次这样极其少见的举动,差不多就能使社会形成小康状态。我大清世祖章皇帝定立国都为燕京的初期,就确定了按田亩征收赋税的数额;圣祖仁皇帝曾经普遍免除按田亩征收的赋税、从水路运往京师的税粮各有一次;世宗宪皇帝免除定额之外的钱粮税款,像苏州、松江二府,每年减免达到几十万。皇帝我统治天下到现在,免除天下的钱财和粮食有四次,免除从水路运往京师的税粮有三次,免除各种税款累积拖欠的数额也不低于几千万。都是出自深切怀有保护臣民如同保护小孩一样的心意,恭敬地体察上天的意志。儿子对于父亲,不敢谈论报答;上天对于皇帝我,重重赐福无穷无尽。古代隐现不定、令人迷惑的火星后移位置,蝗虫不造成灾害,虽然不能完全相信史书的这类记载,然而擅长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要用人事来验证。他们的说法怎么样呢?

虞舜在朝廷上命令皋陶用刑罚来辅助教化的推行,在使用刑罚时十分注意慎重不滥、心存矜恤。夏朝制定的《禹刑》、商朝制定的《汤刑》,那个时期的刑书早已散佚了。残害肉体的刑罚是在什么时候废除的,在法律规定之外施行的肉体刑罚在什么时代最为残酷,刑罚的条目为什么共计三千条,法家与名家为什么各自成为一个流派,刑法和用兵为什么合为同一典制?皇帝我谨慎认真地对待百姓的生命,把

天理人心作为严明刑罚、整饬法令的准则。每逢审查记录囚犯的罪状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实情;观看史书记载唐太宗暂时释放在狱罪囚回家、限期自动归狱的事情,常常讥笑他追求虚假的名声。援引《春秋》来决断事情,难道不是阅读史书、阅读刑律的人所应当关心注意的吗?

古代在沿海设置防卫设施,是用来抵御外来的敌寇入侵的。所以明代郑开阳撰有《海防全图》,所记海防线伸展延续长达上万里,大多讲述戍卫防守的方法。如今海内外已经统一,鹿耳、鸡笼早已经归附朝廷成为属地,茭塘、沙湾所有强盗聚集的地方也全部达到肃清。所要严加防范的,是邪恶坏人到海洋上去寻机抢劫罢了。只是这海洋上波浪起伏不平,航程遥远难识,帆船出没不定,趁此机会突然劫掠的事时常发生,常常难以稽察。议论此事的人认为稽察人不如稽察船只,稽察出行不如稽察驶入,稽察水面不如稽察陆地。大概到海洋上去进行抢劫,所获赃物必定用船只装载运回。在通向海洋的口岸先发给一张船票,记下船中的全部东西。没有携带东西出去,却有东西携带回来,它们的来历就可以诘问。出产的货物,分别有生产它们的地方,贩卖货物,各自有专门的行业。货物不是生产在船只所要前往的地方,以及忽然出售这种货物,忽然又出售那种货物,始终没有一定常规,它们的来历也是可以诘问的。这种办法果真能够实行吗?不担心由此生出搅扰民众的事情吗?

民间的风尚大多追随读书人的风气,读书人的风气可以靠文章来检验。所以唐代韩愈说:仁爱正直的人,他写出的文辞是和气可亲的。古代选拔人才的方法从乡里中考察推荐,汉代还有孝廉、秀才等举士的科目,由皇帝亲自策问的科目却偶尔才施行一次,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进士科从隋朝开始设立而在唐代尤为兴盛,到了宋哲宗元祐年间,才开始变考试诗赋为考试经书义理。元仁宗延祐年间继承了这种做法,明太祖洪武年间,于是确定为必须经过初场、二场、三场三次考试的制度,一直沿袭使用到现在。有人认为明穆宗隆庆年间以后,赶不上明世宗嘉靖年间以前。然而模仿明代王慎中、唐顺之写八股文的人,常常成为表面上相似而实质上不一样。还有人认为明穆宗

隆庆年间以后，才开始在强调契机的方法上变得周到细密；明熹宗天启年间以后，才开始评议论证高远宏伟。然而小巧柔弱、放肆无拘的弊端，又因此同时出现了。究竟把哪种倾向当作是正确的呢？至于写文章是用来说明道理的，然而有的文章纵横奔放来表现才能，有的文章堆砌辞藻来表现学问，本来就是不良的风气。然而一旦矫正它们的弊端，有时又容易陷入文词枯竭贫乏从而内容空虚浅薄，使平庸浅陋的人容易被录取。又怎么能符合那适中的原则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从白天到夜晚都戒惧警惕地始终存在于皇帝我的内心。一天二天，天天都坚持辛勤地处理繁忙的政务，想使统治保持万年，对于施惠利民的心愿要在勤勉地做事上使人信服，对于减省刑罚要传布吉祥和睦，对于平定暴乱要致力于安然恬静，对于培育人才要观察完成教化。你们这些众多的贤能士子在太学四门脱去平民衣服，学习古人就任官职，自己先考虑好要说的话拜受君命后就要献出自己的一切，不要不切实际，不要有所隐瞒，皇帝我将亲自阅览你们的答卷。

王以衔　殿试对策

王以衔(生卒年不详)　字署冰，号勿庵，归安(今浙江吴兴)人。乾隆六十年(1795)状元，官至礼部右侍郎。平生口不言他人过错，视天下人无一不是君子，当时享有德高望众的称誉。

臣对：臣闻行庆施惠，所以阜成兆民；除莠安良，所以劝惩庶类。掌疆、掌固之制设，而四海无虞；师氏、保氏之教兴，而万民向道。圣王治洽敦庞，化昭炳蔚，莫不以绥猷敷教之典，致延洪纯佑之符。《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见惠民之心焉。《书》曰：刑期无刑，民协于中。纪禁民之法焉。《礼》曰：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诗》曰：倬彼云汉，为章于天。言风俗皆臻于上理，而人文可观其化成焉。当是时也，上有钦明浚哲之德，下有亲贤乐利之庥，郅治上仪，万福所由向用也。

钦惟皇帝陛下，建中出治，锡福同民，固已百室庆夫盈宁，万类公

乎彰瘅，朝野聿臻静治，庠序式焕光华，斯诚千载一时也。乃睿德谦冲，本所其无逸之念，弥深建其有极之思，复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安民之术、弼教之方、制治之严、同文之治。臣之椷昧，譬如细流土壤，奚裨海山？顾义切对扬，时当敷奏，敬承清问，敢不就平时诵习，谨述所闻，以效管窥蠡测之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庶征协应，首重养民。斯诚惠爱黎元之盛心也。臣考唐虞三代之君，继天出治，勤恤民隐，布德施惠，屡见于经。《周官》大司徒减未输之租，曰薄征。春秋列国，救时之政，薄敛已责，往往而有。迨汉孝文二年，诏赐民田租之半。十二年，诏赐民租税之半。十三年，诏除田租，税则蠲免。施恩自汉文始，其后武帝蠲诸逋贷，宣帝、元帝俱诏赈贷勿收。至唐武德、贞观、开元，宋至道、咸平，俱诏除宿逋，仁宗亦免积逋一次。总论汉唐以来蠲免，或因桑梓之乡，或因巡幸之地，或因封禅郊祀、谒圣奏凯诸事，故阅数十年而一见，未能数数然也。我朝定鼎以来，逮下之厚，体恤之周，已迈两汉唐宋而上。仰惟皇上，功叙十全，德施屡降，免天下钱粮四次，免漕粮三次，免各款积逋又不下数千余万。此固生民以来所未有者也。其在《书》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既敬承天意，将见德化丕懋，协气旁流。史册所载星退舍而蝗不害，又理所必然者矣。

制策又以虞廷弼教，钦恤惟刑，而兢兢于明罚敕法之间。臣按舜之时，德威德明，爰定五刑之制，尔时民协于中，罔干于正，尚已。禹则下车有政，而夏之后世作《禹刑》。汤则祝网有仁，而殷之后世作《汤刑》。宜晋之叔向，与周之《九刑》同讥也。五刑之属三千，详于《吕刑》及《周官》，此刑之律也。至上下比罪者，例也。虽不止三千，要不外三千之定律。至五刑中有肉刑三。汉文十三年，淳于公得罪，其少女缇萦，上书愿代，因诏除肉刑。其时张苍、冯敬，请易黥为髡，易劓为笞三百，易斩左趾为笞五百。至今读"改行为善，道亡繇至"数语，想仁人之言之利溥焉。至武帝时，张汤、赵禹之属，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禁网甚密。刑非其刑，识者饥之。夫刑与兵，俱以象天地严凝之气，其合为一者，即董仲舒所云，阴尝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意，故以减为主。其分为二者，如《书》所称，慎

于庶狱，又必克诘戎兵也。圣天子好生为德，事准乎情理，律断以《春秋》，民志静而奸不生，民气和而刑可措。彼肆眚失刑，纵囚干誉，岂不重可嗤哉？

制策又以古之海防，以御外寇，而因及稽察之方。斯又预防之善术也。臣考海之近内地者，自广东乐会县起，经八闽环浙江，沿江南达山东，抵辽东山海关，袤邪一万五千余里，则绵亘之地甚广。粤则有三路，闽则有五塞三游，浙则有四参六总，江南则有七汛九堡，山东则有登、莱、青三郡，则设守之地诚多。晋唐以前，收鱼盐之利，通番船之饶，即有寇盗，旋亦荡平。至明嘉靖间，倭寇窃发，海防之严自此始。方今中外一家，膏泽覃洽。鹿耳、鸡笼，久已内属，茭塘、沙湾诸渊薮，全见廓清。即有莠民，亦且革面革心矣。顾宁谧者，大同之规；而豫防者，万全之策。夫海之风候不常，则事之稽查非易。惟于内洋山岛，设兵驻守，则侦伺易，而声援亦便。此稽水不如稽陆也。贼之出口行劫，赃必载还，则来历可诘。是稽出不如稽入也。出口之舟，各给一票，复于每舟各烙字号以记之。如来无票与字号者，盘问。是稽人不如稽舟也。而又诘舟之虚往实归，及贩货所产之地符与不符，则防之之法密。将见迁善远罪，更无有敢售其欺者矣。圣朝化日光天，声教四讫，金柅以止柔道之牵，即金汤以巩苞桑之固，海不扬波久矣。岂尚有奸民不回心而向道者乎？

制策又以民风多随乎士习，士习可验于文章，俾砥砺廉隅，学术醇美。臣闻宋司马光之言曰：士先德行而后文章。唐之韩愈曰：约六经之旨以成文。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故文可验其人，而文必视所举。《周官》乡举里选，大司徒以三物宾兴。汉文有孝廉、贤良科，孝武有茂才、明经科。至进士科，则始于隋而盛于唐。唐以诗赋取士，而应试者俱以才华相尚。即有极言直谏贤良方正诸科，大半以骈体取功名。宋则变诗赋为经义，以《四书》命题，考第高下以取士。夫以文取士，必原本经术，观其文即知其行，非徒苟焉已也。由宋迄明，总守此法，而有明一代之文，亦致不同。嘉靖以前讲理法，隆庆之时讲机法，天启以后讲议论。夫机法、议论之文盛，恐纤巧恣肆之弊生。而尚理法之文，又恐貌似王、唐，为空疏枯寂者所藉口。要而论之，质与

文，不可偏废。苟立言得圣贤之本意，揭经史之精华，则其人亦归于正，而不愧为经术之士。此听言即可观行，衡品不外衡文也。圣人寿宇凝厘，同文播化。《诗》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其是之谓乎！

若此者：心以推心，而业臻大有；辟以止辟，而刑可称祥。戢暴有方，自征四海之长治；观文有准，可轶八百之兴歌。自来阐乾符，握坤珍，鲜可与比絜也。猗与盛哉！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以日新久照之模，凛慎宪省成之义，德至周焉，法至备焉，守至严焉，化至洽焉。既仁育义正之兼行，亦武功文事之悉举。抚于五辰，以凝庶绩，人物吉康，中外禔福。巍巍乎光四表而格上下，畅九垓而溯八埏。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庆，基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实行赏赐、布施恩惠，是使亿万民众富厚安定的办法；除掉坏人、安抚良民，是奖励或惩罚各类百姓的办法。掌管修建城墙、沟壕、护城河、防卫林带等防守工事的掌疆和掌管城郭坚固的掌固两种官职的设立，因而全国各处就没有忧患了；掌理辅导王室、教育贵族子弟以及朝仪得失之事的师氏和掌理以礼仪匡正君王、教育贵族子弟的保氏两种教育兴起，于是广大百姓就向慕道义了。德才超群的圣明君王治理周遍、深厚庞大，教化昭著、光明灿烂，没有不是凭借安抚谋略、布施教化的原则，招致长久的洪福、盛大的佑助的应验。《周易·益卦》上说：从上方施利深入到下方，这种道义必能大放光芒。在这里表现的是施惠利民的心愿。《尚书·大禹谟》上说：使用刑罚正是期望以后不再使用刑罚，百姓的行为都能符合正道。在这里记载的是禁止百姓为非作歹的方法。《礼记·礼运》上说：外面的门户不必关闭，这就叫做大同社会。《诗经·棫朴》上说：那浩渺无边的云河，像灿烂的织锦挂满天空。在这里说的是风气习俗全都能达到最好的治理状态，而且从社会人文现象可以观察到教化的成功。正当这个时候，君主在上有敬肃明察、英明睿智的德行，臣民在下有亲近贤能、喜欢利益的美好反应，天下大治的最高原则，于是成为各种幸福享用的源泉。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建立不偏不倚的中正原则来治理国家，降赐幸福来和睦百姓，本来已经家家户户庆祝粮仓盈满、家人安宁，广大百姓共同表彰美善、憎恶邪恶，朝廷民间全都达到无为而治，庠序等地方学校焕发出光彩，这的确是一千年也难以遇到的盛治时期了。然而皇帝陛下的品德谦虚逊让，根据在位不可贪图安逸享乐的念头，更加加深建立起至高无上准则的想法，又宣进臣下我等人来到殿廷，而策试我们安定百姓生活的手段、用刑罚辅助教化的方法、治理政务的威严、统一文章的途径。臣下我愚昧无知，就好比细小的溪流、微少的泥土，哪里能够裨益大海泰山？想到按理该恳切面君奏对，适逢要陈奏报告，恭敬地蒙受皇帝清审详问，怎敢不依照自己平时诵读学习到的知识，恭谨地陈述自己所知道的答案，来效纳从竹管里看天、用瓢测量海水所得到的浅薄见识，表达真诚呢！

跪拜恭敬地阅读皇帝御制策书上有这样的话：各种征兆配合呼应，首先在于重视养育百姓。这的确是施仁慈爱黎民百姓的深厚美好情意。臣下我考察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仿效上天来治理国家，忧悯体恤民众的痛苦，散布德泽，施予恩惠，在儒家经书中多次见到。《周礼》记载大司徒减免未交纳的田租，叫做减轻赋税。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匡救时弊的政治措施，减轻赋税、免除对公家所欠的债务，处处存在。到了汉文帝二年，下诏减免百姓按田亩交纳赋税的一半。十二年，下诏减免百姓交纳租税的一半。十三年，下诏免除田租，赋税则全部免除。施予恩惠从汉文帝时开始，此后汉武帝减免所有拖欠不还的借贷官物，汉宣帝、汉元帝都曾下诏命令救济时借贷的钱物不再回收。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间、唐太宗贞观年间、唐玄宗开元年间，以及宋太宗至道年间、宋真宗咸平年间，都曾下诏免除长期拖欠的税赋，宋仁宗也曾经免除百姓累积拖欠的赋税一次。概括论述两汉和唐朝以来免除百姓赋税的政举，有的因为是皇帝的故乡，有的因为是皇帝巡游驾幸的地方，有的是因为皇帝到泰山或在郊外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拜谒圣贤孔子、向祖先报捷等各种事情，所以经过几十年才能见到一次，不能经常见到。我大清皇朝定立国都以来恩惠施及于百姓的深厚，体贴抚恤照顾的周到，已经远远超

过两汉、唐宋各代而遥遥领先了。抬头想来，皇帝陛下的武功排列着十个方面，德泽恩施屡次降临给百姓，免除天下百姓交纳的钱财和粮食有四次，免除从水路运往京师的税粮有三次，免除各种税款累积拖欠的数目也不低于几千万。这确实是人类诞生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种行为在《尚书·泰誓》中称作：上天惠爱下民，君主尊奉天意。君主既然恭敬地秉承上天的意旨，就将表现出道德教化的盛大美好，祥瑞之气的广泛流布。史书上所记载的火星后移位置而蝗虫不造成灾害，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虞舜在朝廷上命令用刑罚来辅助教化的推行，在使用刑罚时十分注意慎重不滥、心存矜恤，从而谨慎戒惧于严明刑罚、整饬法令之间。臣下我考察虞舜的时代，以恩德行其威罚使臣民感到畏惧，德行彰明使臣民内心悦服，开始制定使用墨、劓、刖、宫、大辟等五刑的制度，那时百姓的行为全都符合正道，没有人干扰正道，这已经是太久远了。夏禹出巡遇见罪人便停下车来询问并为他哭泣而有善政，于是夏朝的后裔就制定了《禹刑》。商汤外出看见四面张网捕禽，祈祷一网打尽、网开三面而有仁德，于是商朝的后裔就制定了《汤刑》。春秋时晋国大夫叔向认为《禹刑》、《汤刑》和周朝的《九刑》制定为时已晚一并加以指责，的确是应该的。五种刑法的条目共计有三千条，详细记载在《尚书·吕刑》和《周礼·司刑》上，这是刑法的条文。至于重刑、轻刑比照明文规定的罪行轻重处以相应的刑罚，是惩罚罪犯的惯例。虽然惯例的条目不只是三千条，但概括起来都不在已经制定的三千条法律条文之外。至于五种刑法中，有三种是残害肉体的刑罚。汉文帝十三年，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获罪，他的小女儿缇萦，向朝廷上书愿意将自己没入官府充当奴婢代替父亲受罚，汉文帝于是下诏废除残害肉体的刑罚。当时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请求将应处脸上刺字的黥刑改为处以剃去头发的髡刑，将应处以割去鼻子的劓刑改为用荆条或竹板笞打三百下代替，将应斩掉左脚的刑罚改为用荆条或竹板笞打五百下代替。到现在读到“有人即使想改变不良行为诚心行善，却没有路途可以到达”这几句话，从中就可以想象到有德行之人的话所施利益的普遍。到了汉武

帝在位的时候，张汤、赵禹之类人，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严明，制定知道他人犯罪内情而不检举则被看作故意纵容犯罪、罪犯所在地区或部门的长官也要牵连坐罪的法律，张布如网的禁令法律十分严密，所施加的刑罚没有施加在应该受到刑罚的对象上，有见识的人讥讽这种做法。施刑与用兵，都用来象征天地的严寒 之气，它们之所以合而为一的原因，就是汉朝董仲舒所说的，阴气经常处在严寒的冬季而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的意思，所以把减损当作根本。它们之所以区分为二的原因，就如同《尚书·立政》上所说的，要谨慎地处理好各种刑狱诉讼之事，还必须整治好你的军队和兵器。我大清圣明的皇帝陛下，把爱惜生灵当作自己的美德，做事把天理人心作为准则，裁定法律案件根据《春秋》，百姓内心安静而奸邪的事不发生，百姓态度和蔼而刑法可以弃置不用。那些宽大赦免罪人、应当受刑却未处以刑罚，释放在狱罪囚回家、限期自动归狱来追求虚假名声的事，难道不应当被大加嘲笑吗？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古代在沿海设置的防卫设施，是用来抵御外来的敌寇入侵的，因而便论及到稽察的方法。这又是事先防备的好策略。臣下我考察海洋靠近内陆的地方，从广东省乐会县起，经过福建省，环绕浙江省，沿江南省抵达山东省境内，一直延伸到辽东山海关，伸展延续长达一万五千多里，连接的地区特别广阔。广东便有三处通往海上的险要隘路，福建便有五处要塞和三处游击将军驻扎的地方，浙江便有四处参将和六处总兵驻守的地方，江南便有七处军队驻防的汛地和九处军队战守的堡垒，山东便有登、莱、青三郡，这样设置守军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晋朝、唐朝以前，可以收到捕鱼晒盐的利益，交换域外船只上的丰富物产，即使有侵扰劫掠，也立刻扫荡平定了。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日本海盗窃掠的事发生，沿海防卫的严格加强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如今海内外混同为一家人，恩惠普遍施及。鹿耳、鸡笼早已经归附朝廷成为属地，茭塘、沙湾所有强盗聚集的地方，全部被肃清。就是存有邪恶的坏人，也将洗面革心彻底悔改了。想来安静平定，是国家统一的常规；而事先防备，是万无一失的策略。海洋上的风向气候不固定，那么为非作歹的事检查起来就不

容易。只有在有狭窄水道跟海洋相通而其余全部为陆地所包围的内陆海上岛屿，设置军队驻扎防守，那么侦察监视起来就容易了，而遥作支援也就方便了。因此稽察水面不如稽察陆地。强盗离开口岸进行海上抢劫，所获脏物必定用船只装载运回，那么所携带东西的来历就可以诘问了。因此稽察出行不如稽察驶入。对于离开口岸的船只，分别发给它们一张船票，并在每条船上分别烙上用文字所作的符号来登计它们。如果驶来的是没有船票和用文字所作的符号的船只，就详细查问它们。因此稽察人不如稽察船只。而且再诘问船只空着出去却满载东西而回，以及贩卖货物所出产的地方与实际相符还是不相符，那么防卫强盗的方法就严密了。就将出现改过向善而远离罪恶，再也没有敢于施展其欺骗手段的人了。我大清皇朝光天化日之下，声威教化达到四邻各族居住的地域，刚坚金属制成的灵敏车刹用来阻止柔和笼络所遇到的牵制，就像金属建造的城墙、沸水流淌的护城河用来巩固柔弱的苞草、桑枝的根基那样安然无恙，海洋上不掀起波浪已有很长时间了。难道还有乱法犯禁、不务正业的人不回心转意而向慕道义的事情吗？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民间的风气大多追随读书人的风气，读书人的风气可以靠文章来检验，使方正的节操得到磨练，使学习的风气纯粹完美。臣下我听说北宋司马光曾经说过：读书人先修养自己的德行然后再做文章。唐朝的韩愈曾经说过：概括《诗经》、《尚书》、《周礼》、《周易》、《乐经》、《春秋》等六部儒家经典的要旨来形成文章。他还说过：仁爱正直的人，他写出文辞来是和蔼可亲的。所以文章可以检验作者本人的品行，而撰写文章必须先看所推举的人才。《周礼》记载由乡里推举选拔人才，大司徒用智、仁、圣、义、忠、和等六德与孝、友、睦、姻、任、恤等六行及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三方面的事情来教化万民，要按敬待宾客的礼节敬待贤能的人并举荐给周王。汉文帝时有孝廉、贤良等选送人才的科目，汉武帝时有秀才、明经等选送人才的科目。至于进士科，却是从隋朝开始设立 而在唐代尤为兴盛。唐朝用考试诗赋的办法来选取士人，而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都以才华相互推崇。就是有极言直谏贤良方正等各种选拔人才的

科目，大半都是用骈体写成的文章来取得官职名位。宋朝才变考试诗赋为考试经书义理，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的内容来出题目，根据考核评定的等第高低来选取士人。用文章来选取士人，必定根源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观看士人撰写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品行，并不只是苟且敷衍了事就可以了。从宋朝一直到明朝，始终都是遵守这种科举取士的方法，而明朝一代的文章，也情趣不一样。明世宗嘉靖年间以前讲究义理和章法，明穆宗隆庆年间讲求阐述契机的方法，明熹宗天启年间以后讲求评议论证。讲求阐述契机的方法、发表评议论证的文章盛行，就会担心小巧柔弱、放肆无节的弊端产生。而崇尚讲究义理和章法的文章，又担心表面上与明代王慎中、唐顺之的八股文相似，成为文章内容空虚浅薄、文词枯竭贫乏所凭借的理由。概括论述起来，文章的实质内容与外在形式，两者不可重视这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如果写文章确立论点掌握道德才智杰出的圣人、贤人的本来意图，揭示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的精粹光华，那么作者本人也会回到正道上来，从而不愧为研究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了。这就是听人说话就可以观察到这个人的行为，衡量人品不外乎是品评这个人所写的文章。我大清皇帝陛下健康长寿、积聚美善，统一国家文字、播植化育万物。《诗经·泮水》中说：人才多得很，胸襟宽弘为心胸。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像以上这些问题：以诚待人，因而事业达到无所不有；刑罚用来制止犯法，因而刑罚可以叫做慎用。制止暴乱有方法，自然招致天下的长期治理；观赏文采有准则，可以超越八百诸侯对周武王的歌颂。历来阐发受命于天的吉祥征兆，掌握大地呈现出的符瑞，很少能够有和这种局面相比的。真是太盛大啊！臣下我特别跪拜祝愿皇帝陛下，已经治理了再追求治理得更好，已经安定了再追求更加安定，以天天更新、永久照耀的规模，严格禀承谨慎地对待你自己立下的法度、不断地检查旧有事例的大义，使德行极为周遍，使法律极为完备，使防守极为严明，使教化极为融洽。既要以仁德教化培育与以义服人的政治并行，又要军事方面的功绩和文德教化方面的事业全部兴起。按照四时的变化处理政务，来办成各种事情，使人类和万物吉祥安

乐,使海内外广大地区安宁幸福。真崇高伟大啊!光辉照耀到四方以外的地方而到达天上地下,向上可以通达到九重天上而向下可以流布到八方极远的地方。我大清皇国亿万年无穷无尽的吉庆,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来自民间出身微贱,新被举拔准备进用,不懂得禁忌和避讳,抵触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罪该万死。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莫晋　殿试对策

莫晋(?~1826)　字锡三,号宝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六十年(1795)榜眼。迄嘉庆三年(1798)擢侍讲,此后历官提督山西学政、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通政使司副使、太仆寺卿、太常寺卿、提督江苏学政、通政使司通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仓场侍郎等职。道光二年(1822)以言仓场盘查事宜贬为内阁学士,次年以疾乞归,六年卒。曾刊刻《明儒学案》,对明代王守仁的学说尤有心得。

臣对:臣闻勤民者,敬天之实;明刑者,弼教之资;戢暴者,奋武之功;造士者,揆文之要。《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礼》曰: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古帝王德配三无,功覃九有,将必基宥密于亦临亦保,而殚宵旰于惟几惟康。由是光绍燕谋,润色鸿业。食德饮和,人歌乐利焉;迁善远罪,民庆协中焉;西被东渐,声灵赫濯焉;扬《风》抗《雅》,德造誉髦焉。仁育彰乎薄敛,义正谨乎省刑,保泰裕乎安邦,同文炳乎华国,所由天地节而四时成,阴阳和而万物得也。

钦惟皇帝陛下,立极绍天,含元寿世。固已康衢昭鼓腹之休,而民隐上通于嘉肺;薄海际投戈之盛,而士习丕变于胶庠矣。乃圣德渊冲,益深履满持盈之想,弥切思艰图易之猷,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厚民生、宪邦禁、肃海防、厘文体。臣知识椯昧,譬涓滴微尘,奚补高深于瀛岭?顾拜献先资,人臣之义,敬承清问,好察迩言,敢不诵述所闻,以效蠡测管窥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应天以实不以文，庶征协应，首重养民。此诚敛福锡极之盛心也。臣惟《周官》有散利薄征之典，《左传》有施舍已责之文，实蠲赈所自昉。而三代以下，恤政肇始汉文。史载二年及十二年，皆赐民半租。十三年，复诏除田税。迄今读《议佐百姓》、《道民务本》等诏，实政实心，概可想见。嗣后元朔之勿收逋贷，元康、永光之免责贫民，又踵文帝而行者也。唐人旷典，详载《会要》。宋至道中除逋籍，见《玉海》。绍兴中蠲田税，见《通鉴长编》。乾道中蠲减追纳，见《九朝编年备要》。嘉泰中减放二税，见《宋史全文》。大率有名无实。惟仁宗天圣之蠲宿负，嘉祐之免积逋，论者称其恻怛之心，忠厚之政，足以培蹙国基。然汉宋两朝，仅号小康，未克臻上理也。我国家赋额最轻，几于三十税一，加以重熙累洽，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被润泽而大丰美者，莫不家给人足。而皇上保赤求宁，有加无已，普免钱粮者四，普免漕粮者三，复蠲各款积逋以千万计。《乾》始以美利利天下，而所利溥于不言。《益》以损上益下，致民说无疆，而元吉孚于勿问。是以庆符四得，功藏十全。去年瑞雪告丰，今岁雨旸时若，洵乃先而不违，后而奉时，天人之感通，捷于影响。若宋景公有至德之言三，而荧惑退舍；唐太宗不避吞蝗之患，而蝗不为灾。特一时之征应，奚足语于迪畏天显、勤恤民隐之诚哉？

制策又以虞廷钦恤惟刑，务准之天理人情，以为明罚敕法。臣闻舜、皋陶曰钦曰中，苏公曰敬曰中。《吕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斯刑期无刑之要旨也。叔向称三辟之兴，皆叔世。《禹刑》、《汤刑》，非夏商盛时所定，特后人假禹汤名目，故其书不传。汉文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系狱，少女缇萦上书，愿赎父罪。文帝乃下诏，以肉刑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非为民父母之意。张苍、冯敬，奏请定律，易以髡笞。然崔浩《汉律序》，谓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按《通鉴》西魏大统十三年，除宫刑。《书正义》及《周礼疏》，又谓至隋唐乃赦。则肉刑之除，不尽在汉也。苗民承蚩尤之暴，始淫为劓、刖、椓、黥，非刑之酷始此。至秦之赤族收孥，汉之腹诽沈命，而戮刑甚矣。《周礼·秋官·司刑》，五刑之属各五百，穆王更定为三千，轻刑增而重刑减。班固谓《甫刑》用重典者，非也。夏刑大辟二百，膑三百，宫五百，劓、墨各千，

见《周官》郑注。三千之制，自夏已然，即《甫刑》所本。《吕氏春秋·孝行览》引《商书》云刑三百者，亦非也。《汉艺文志》法十家，出于理官；名七家，出于礼官。虽义类略同，而源流自别。上古详于教而略于政，故兵刑合为一典。然有苗徂征，不命皋陶而命禹，则无事合而有事分矣。圣天子秉赦过宥罪之心，尽折狱致刑之术，罪必本乎天讨，法惟求乎民情。程子有云：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咸中有庆，敬告祥刑，复何取纵囚之干誉乎？

制策又曰：海防以御外寇，欲讲求戍守之方，使人舟出入水陆之稽，无滋纷扰。臣谨按治海，自广东乐会县接安南界起，由福建抵浙江，由江南抵山东，由辽东抵朝鲜，袤延一万五千余里。防御之严，自明嘉靖始。胡宗宪《筹海图编》，载南北沿海冲要及战守经略甚详。郑开阳在宗宪幕中，多所撰著，有《万里海防图论》二卷、《海防一览图》一卷、《海运全图》一卷，铺陈形势，了如指掌，可与宗宪之书互相发明。方今圣朝怀柔震叠，万国来同。鹿耳、鸡笼之阻，既尽入版章，而茭塘、沙湾之深，亦尽清通薮。久已沧海无波，可销锋而偃燧矣。惟是风帆浪舶，出没于云涛浩渺之中，约束既难，稽查非易。虽窃发无忧乎外寇，而安民宜去其小奸。备豫不虞，万全之策也。夫人繁而舟简，故稽人不如稽舟。出远而入近，故稽出不如稽入。水险而陆夷，故稽水不如稽陆。诚使为大吏者，坚明约束，而关津之吏，谨于异言异服之讥，则虚往实归，踪迹可考，行商居贾，贩鬻有常，即有不逞之徒，无所售其诈伪，自当回心革面，而共游于光天化日中矣。

制策又以民风多随乎士习，士习可验于文章，欲矫驰骋襞积、枯窘空疏之弊，而折其中。臣闻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韩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诚以心画心声，非华藻绳墨之谓也。周制，乡学掌于乡大夫，而用之在司徒；国学掌于大乐正，而用之在司马。汉世孝廉、贤良，始于文帝；茂才、明经，始于武帝。皆不专取文艺。进士之名，本《王制》。其科起于隋而盛于唐。始以诗赋取士，宋元祐改为经义，明洪武十七年，颁行科举成式。三百年间，高才硕学，多出其中。厥初作者，气象浑穆，一变而尚体格，再变而尚机法，三变而尚才情。而至变之中，仍有不变者存，则理与法而已。皇上稽古右文，兢兢

以清真雅正为士林模楷。儒者沐浴教泽，咀嚼道真，咸思志贤圣志，言孔孟言，佩实衔华，以仰副寿考作人之至意。和其声以鸣盛，不且金声而玉振之乎！

若此者：翼翼昭事，代天育物之心也；威威显民，降典折刑之义也。防微杜渐，寇贼奸宄所由消也；成化观文，敷奏明试所由协也。抑又闻：荷覆帱之德，则愿天之弥高；感容载之恩，则冀地之弥厚。行健期乎自强，至诚归乎无息。伏愿我皇上，本所其无逸之忧，勖政贵有恒之念，耕九余三，既富方谷，惩一敬百，以杀为生。德威则丕冒海隅，道化则为章云汉。国家亿载咸宁之庆，基诸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尽心尽力于民事，是敬奉天命的实际内容；阐明各种刑律，是辅助教化不及的依靠对象；平定暴乱，是振奋武力的功业；造就学业有成就的士子，是施行文教的关键。《周易·恒卦》上说：圣人长久保持那美好的治国之道，从而天下教化成功，形成美俗。《礼记·礼运》上说：君王处于中间作为核心而无所作为，来保持最中正的原则。古代帝王的德行和天无私地覆盖着大地、地无私地承载着万物、日月无私地照亮人间三种无私的精神相匹配，功绩遍及九州，将必定把仁厚宁静之心建立在虽然贤才之质不明也得观于礼、虽无射箭才能也得居于位的基础上，天不亮就穿衣起身、天黑了才吃饭而把精力全部用在考虑居安思危上面。因此继承发扬祖宗给子孙后代的谋划，使盛大的事业增加光彩。享受先人的德泽使人感觉到自在，人人歌唱快乐和幸福了；诚心向善，远离罪恶，百姓吉庆就符合中正原则了；向西到达沙漠，向东抵达大海，声势威灵就威严显赫了；颂扬《风》诗、发扬《雅》诗，大德造就出优秀的人才。以仁德教化养育从减轻赋税上彰显出来，以义服人的政治在于谨慎对待减轻刑罚，保持安定兴盛的局面在于使国家平安稳定富饶起来，国人同用笔划一致的文字从光耀国家上显示出来，于是天地自然具有规律地运行，而寒来暑往形成一年四季节气，阴气阳气调和而万物各得其宜。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秉承上天的意旨树立最高的准则，包含万物的本原造福世人，本来已经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显示出鼓起肚子来唱歌的美好景象，而百姓的痛苦可以通过设在朝门外的形如垂肺、颜色赤红的美石上达；靠近海边地区放下武器的风气盛行，而读书人的风气在各级学校中大大变化了。然而圣明的皇帝陛下德行谦抑，更加加深保守已成的事业的想法，更加深切想到事情艰难而把它办得容易的谋略，宣进臣下我等人来到殿廷上，而用使百姓富厚、揭示国家的法禁、整饬沿海的防卫、厘正文章的体裁等问题策试我们。臣下我知识愚昧，譬如极少的水滴、细小的尘埃，哪能对高山、大海有所裨益？不过想到拜受君命之后就要将事先考虑好的要说的话全部奉献出来，正是臣子奉行的大义，恭敬承蒙皇帝陛下清审详问，喜欢审察那些浅近的话，怎敢不述说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来效纳用瓢量海水、从竹管中看天所得到的一点浅薄见识呢？

跪拜恭敬地阅读皇帝御制策书上有这样的话：顺应天命依靠实际事功而不是根据表面文彩，各种征兆配合呼应，首先在于重视养育百姓。这实在是聚集各种幸福普遍地施予给臣民、设布至高无上的准则的深厚美好的情意。臣下我想来，《周礼·地官·大司徒》有遇到凶年官府借给百姓种子和粮食、减轻赋税的制度，《左传》鲁宣公十二年有过路的旅客受到赐予的文字、鲁昭公二十年有免除对公家所欠债务的文字，这实际上是免除租税、救济贫民的由来。而夏、商、周三代以后，体恤救济百姓的政治措施从汉文帝开始。史书记载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都曾下诏减免百姓应交纳租税的一半。十三年，又下诏免除百姓应交纳的按田亩征收的赋税。到现在阅读《议佐民姓》、《道民务本》等诏书，实际利民的政策、真实的心意，大体能够想象得出来。此后汉武帝元朔年间不再回收百姓借贷后拖欠不还的官物，汉宣帝元康年间、汉元帝永光年间免除贫穷百姓的债务，又是继汉文帝以后而实行的济民措施。唐朝前所未有的典制，详细记载在《唐会要》里。北宋太宗至道年间下诏免除百姓拖欠未交的租税，从《玉海》中可以看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免除百姓按田亩交纳的赋税，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可以看到。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减免催交

的赋税，从《宋九朝编年备要》中可以看到。南宋宁宗嘉泰年间减免百姓在夏秋二季完纳的赋税，从《宋史全文》中可以看到。这些措施大多都是空有其名称而没有实际内容。只有北宋仁宗天圣年间减免百姓拖欠的赋税，嘉祐年间免除百姓累积拖欠的赋税，议论的人称宋仁宗有恻隐百姓的心意，忠实厚道的政举，足够用来养护巩固国家的根基。然而汉、宋两个朝代，只能号称是使百姓稍微安定的社会，并未能够实现最佳的治理状态。我大清皇国赋税的数额征收最轻，几乎接近三十抽一的税率，再加上前后功绩相继，累世升平相承，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百姓生活以恢复元气，滋润养育长达百年的时间，承受恩泽而十分丰富美好，没有不家家富足，人人饱暖的。然而皇帝陛下保护臣民如同保护幼儿一样、追求安宁的做法，不断地有所增加，普遍地免除天下百姓应交纳的钱财和粮食有四次，普遍免除从水路运往京师的税粮有三次，又免除各种税款累积拖欠的数额也用成千上万来计算。《周易·乾卦》只有天才能把美好的利益施予给天下，而所施予的利益普遍广泛在于从不提起它的恩德。《周易·益卦》用减损于上、增益于下的原则，致使百姓欢喜无边，而真诚信实地施惠于天下的心愿毫无疑问是大吉大利的。因此吉庆和元始、亨通、和谐有利、贞正坚固四种美德相符，十个方面的武功都已完成。去年应时好雪预示着丰收，今年雨天、晴天及时到来，确实是应提前到来而不违背农时，应晚些到来而遵奉天时，天道与人事相互感应，比影子和回声还要迅捷。像宋景公有国相是我的重要辅佐、做国君的要依靠人民、年成不好闹饥荒而人民困苦的话我依靠谁来做国君这样三句体现最高德行的话，致使隐现不定、令人迷惑的火星从心宿的分野宋国上方天区迁移位置；唐太宗不躲避吞食蝗虫的害处，因而蝗虫不造成自然灾害。这只是一个时期的应验，哪能够与顺从畏惧上天的意旨、忧悯关怀民众的痛苦的那种真诚相提并论呢？

皇帝御制策书又鉴于虞舜在朝廷上命令使用刑罚要注意慎重不滥，心存矜恤，一定要把天理人心作为公正的准则，用来严明刑罚，整饬法令。臣下我听说虞舜、皋陶分别说过要谨慎啊！要服从正道啊！西周苏公曾经说过要恭敬要适中。《尚书·吕刑》有七个地方说到恭

敬，有十个地方谈到适中。这正是使用刑罚是期望以后不再使用刑罚的主要意旨。春秋时期晋国人叔向说夏、商、周三代刑法的产生，都是在衰微的末世。《禹刑》、《汤刑》，都不是在夏朝、商朝兴盛时制定的，只不过是夏朝后裔、商朝后裔假借夏禹、商汤的名义而作罢了，所以这些书没有流传下来。西汉文帝十三年，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被囚禁在牢狱，他的小女儿缇萦向朝廷上书，愿意将自己没入官府充当奴婢代替父亲受罚。汉文帝于是下达诏书，认为残害肉体的刑罚斩断罪人的肢体，刻刺罪人的肌肤，罪人终生致残不再生长恢复，这并不是做百姓父母的用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请求制定法律条文，将残害犯人肢体的肉刑改为用剃去头发的髡刑和用荆条或竹板笞打的笞刑来代替。然而北魏崔浩的《汉律序》，认为汉文帝虽然废除了残害犯人肢体的肉刑，但破坏犯人生殖器的宫刑却没有改变。考察《资治通鉴》记载西魏大统十三年，才废除破坏犯人生殖器的宫刑。《尚书正义》和《周礼注疏》，又说到隋唐时期才舍弃破坏犯人生殖器的宫刑。由此可见，残害犯人肢体的肉刑的废除，就不完全在汉朝了。周穆王时苗民紧接蚩尤的暴乱之后不遵守政令，开始过分地使用割鼻子、割耳朵、破坏生殖器、刺刻面额染成黑色等刑罚，在法律之外施加的肉体刑罚的残酷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等到秦朝诛灭全家族的赤族法、一人犯罪后他的妻子儿女也受诛连被削籍没入官府充当奴婢的收孥法，汉朝见到政令有所不便后嘴里不说却心中讥笑不满要处死刑的腹诽法、官吏没有发觉盗贼起事或者发现后逮捕的人数不够规定标准的则有关二千石级官吏以下到小吏员都得处死的沉命法，致使滥施刑罚的程度就更严重了。《周礼·秋官·司刑》记载墨刑、劓刑、宫刑、刖刑、死刑等五刑的条目各有五百条，周穆王改订为三千条，轻的刑罚宜于加重就用重刑处治而重的刑罚宜于减轻就用轻刑处治。东汉班固认为《吕刑》用严酷的刑法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夏朝的刑法，处死罪的大辟条目有二百条，剔去犯人膝盖骨的膑刑条目有三百条，破坏犯人生殖器的宫刑条目有五百条，割掉犯人鼻子的劓刑条目和在犯人脸上刺字并染成黑色的墨刑条目各有一千条，见于《周礼》东汉郑玄注。刑罚的条目共有三千条的规定，从

夏朝时期就已经是这样了,也就是《吕刑》所依据的。《吕氏春秋·孝行览》引用《商书》说刑罚的条目有三百条,也是不对的。《汉书·艺文志》记载法家的十大代表,出自于治狱的官员;名家的七大代表,出自于掌管礼仪教化的官员。虽然比义推类两者大致相同,但来源却各不相同。远古时代对教化处理得详细而对政令处理得简略,所以用兵和刑法合为同一典制。然而三苗不服从德教而前往征讨时,舜不命令掌管用兵和刑法的皋陶前去却命令禹前去,可见没有战事时用兵和刑法就合为一体而有战事时就分开了。圣明的皇帝陛下秉承赦免过错、宽恕罪行的心思,完善判决诉讼案件、动用施行刑罚的手段,有罪必定根据上天的惩治意旨而行,量刑只求符合民众的心情愿望。北宋程颐曾经说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圣人的高兴,是因为万物应当高兴;圣人的愤怒,是因为万物应该愤怒。运用刑罚都能公正适当就会得到幸福,恭敬地告诉大臣们慎用刑罚的方法,又何必采取暂时释放在狱囚犯回家、限期自动归狱的办法来求取名声呢?

皇帝御制策书上又说:在沿海设置防卫设施,用来抵御外来的敌寇入侵,打算研究戍卫防守的方法,使人和船、出海与驶入、水面和陆地受到稽察,不再产生纷乱搅扰。臣下我恭谨考察统管的海防线,从广东乐会县接壤安南的交界处算起,经福建抵达浙江,由江南抵达山东境内,再由辽东抵达朝鲜,伸展绵延长达一万五千多里。沿海防备的严格,是从明世宗嘉靖年间开始的。胡宗宪的《等海图编》,记载南北沿海地区的军事交通要地以及进攻防守的筹划谋略十分详细。郑开阳在胡宗宪的府署中,撰写的著作有很多,有《万里海防图论》二卷、《海防一览图》一卷、《海运全图》一卷,详细叙述地理形势,像指着自己的手掌给别人看一样十分明白清楚,可以和胡宗宪的著作互相印证。如今我大清皇朝笼络安抚四方使天下震动而恐惧,使天下各国前来朝觐。鹿耳、鸡笼等险要的地方,已经全部纳入疆域图册;而茭塘、沙湾等水深的地方,也全部肃清了藏匿的反叛者。早已经大海上不起波浪,可以销毁锋利的武器、停止烽火报警了。只是飘荡在波浪中的帆船,出现隐没在白浪翻飞、水面旷远的波涛之中,管制起来很困难,稽察起来也不容易。虽然突然劫掠发生没有外敌入侵那么

大的忧患，但是安定百姓应当除掉那小的邪恶。防备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是万无一失的策略。人数量众多而船只简单，所以稽察人不如稽察船只。出海路途遥远而驶入路途很近，所以稽察船只出行不如稽察船只驶入。水上险恶而陆地平坦，所以稽察水面不如稽察陆地。果真能够让做封疆大吏的那些人，明确规章法令，而水陆要道关卡上的小吏，对语言不同、服装奇异的人进行严格检查，那么船只空着前往却满载而回的踪迹就可以考察到了。外出经营的流动商人和在固定地点营业的商人，贩卖货物有一定的规律，就是有犯法为非的不逞之徒，也没地方施展他们奸诈欺骗的手段，自然应当洗心革面彻底悔改，而在光天化日的场所里同他人一起交往生活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民间的风气大多追随读书人的风气，而读书人的风气可以用文章来检验，打算矫正文章卖弄才华、堆砌辞藻、枯竭贫乏、空虚浅薄的弊病，从而调节不同倾向达到适中的原则。臣下我听说道德是文章的根本，文章只是道德的枝条和树叶。唐代韩愈曾经说过：仁爱正直的人，他写出文辞是和蔼可亲的。这实在是因为文字是思想的图画、语言是思想的声音，而不是用华丽的辞藻讲说、雕饰华丽的辞采的意思。周代的制度，地方学校由乡大夫掌管，而由司徒任用地方学校的优秀人才；国家设立的学校由大乐正掌管，而由司马任用国家所设学校的优秀人才。汉代孝廉、贤良等举士的科目，从汉文帝时开始设立；秀才、明经等举士的科目，从汉武帝时开始设立。都不专门选取有撰述和写作才能的士人。进士的名称，起源于《礼记·王制》。它作为科举取士的科目兴起于隋朝而在唐朝最为兴盛。开始时用考试诗赋选取士人，北宋哲宗元祐年间改为考试经书义理，明朝太祖洪武十七年，公布施行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宋、明实行科举取士的三百年过程中，才智过人的人、学问渊博的人，大多从这里面产生。那些最初从事文章撰述的人，气韵格调质朴淳和，第一次变化便是崇尚体裁格调，再次变化便是崇尚阐述契机的方法，第三次变化便是崇尚才气和思致。然而最大的变化之中，仍然有不变化的内容存在，那就是文辞义理和章法罢了。我大清皇帝陛下考察古事、崇尚文治，小心谨慎地把真实自

然、典雅纯正作为文人士大夫阶层学习的榜样。儒家学者蒙受教育的恩泽,咀嚼体味道德学问的真谛,都想在志向上抒发圣人贤人的志向,讲孔子、孟子该讲的话语,使文章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完美,来向上符合高龄长寿的皇帝陛下造就培育人才极深远的用意。调和那中正平和的声调来歌颂盛世,不就是用钟发声而用磬收韵、奏乐自始至终使声名昭著远扬了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恭敬谨慎地对待一切,光明正大地侍奉上帝,是代替上天养育万物的心思;惩罚应当受到惩罚的人并让庶民清楚地了解这种治国之道,是颁布法典依照刑律审理民事案件的意思。在坏事刚萌发时就加以制止而不使其发展,是抢劫杀人在境内外违法作乱的事情消除的办法;观察社会人文现象来推行教化促成天下昌明,是诸侯向天子陈奏自己的施政言论而天子也明白地考验他们做出的政绩并达到和谐的办法。而且还听说:蒙受覆盖遮蔽的恩德,就希望上天更加高大;感受包容承载的恩惠,就期望大地更加深厚。刚健运行要求自己努力图强,极端真诚在于永不间断停息。跪拜恭敬地祝愿我大清皇帝陛下,本着居位不可贪图安逸享乐的真诚心意,勉励为政贵在持之以恒的念头想法,使百姓耕种九年余有三年的存粮,使各地的谷物增多起来;惩罚一人来警戒众人,用杀戮的办法使众人获得生存。恩德与威罚那么就能遍及到海边僻远的地方,阐明道德风化那么就像浩渺的天河明亮灿烂布满天空。我大清皇国亿万年全都安宁的吉庆,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来自民间出身微贱,新被选拔准备进用,不懂得禁忌避讳,触动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害怕到了极点,真是罪该万死。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潘世璜　殿试对策

潘世璜(生卒年不详)　字黼堂,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乾隆六十年(1795)探花,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勤民即敬天之实,明德乃慎罚之原,怀柔暨讫乎要荒,

服习首端夫学校。稽古帝王，莫不体覆载兼容之心，以成悠久无疆之化，故能遐迩禔福，中外乐康。而要不外此自强不息之精神，有以垂裕于无穷也。《大戴记》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言膏泽溥而旌别当也。《虞书》曰：至于海隅，苍生罔不率俾。《大雅》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德化远而风俗茂也。由是函夏乂安，广轮懋豫，天人协应，纯嘏缉熙。自尧舜以来，所以恢郅理而迈鸿庥者，胥是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洋恩溥，道一风同，兆姓蒙阜成之利，黎民昭於变之庥，梯航尽入版图，草野咸知礼义，洵古今所罕觏矣。乃圣怀冲挹，思保治之无穷，冀愚者之一得，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恤民应天，安良禁暴，与夫海疆巡察之方，士庶范围之准。臣之椷昧，何足语此？顾念先资拜献之义，敬承清问，敢不诵述所闻，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民之天惟君，大君为天之子，应天以实不以文，而因及蠲免之政。诚保赤之良图也。臣谨按，《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二曰薄征，然未言蠲除也。汉文帝二年，始诏赐民田租之半。十二年，诏赐民租税之半。十三年，诏除民田租税。逮及元康、神爵之间，蠲逋赈贷，犹时一举行。此蠲除所由昉也。踵其事者，如宋太宗诏除逋籍，真宗遣使蠲宿逋，仁宗又改追欠司为积逋司。宽贷之典，视前代有加焉。然或不过蠲之于一时，蠲之于一方。载在史册，已为仅见。而蒙其庥者，迄至小康，亦可见德之应天而感人者，至深切也。国朝鸿泽覃敷，田赋较前代特减。我皇上际累洽重熙之庆，子惠元元，有加无已。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三次，以及各款积逋，更不下数千万计。深仁厚泽，沦浃肌髓。《易》曰：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言上以诚益下，则下自以诚应上。用是四海盈宁，人民和乐，丰登屡庆，雨旸协宜。所谓以和召和，至无疆之庥者，此也。

制策又以虞廷弼教，钦恤惟刑，因思明罚敕法，必准乎天理人情之至当。臣惟寇贼奸宄，帝世不能不预为之防。故士师有命，必曰刑期无刑，诚慎之至也。刑也者，禁于已然之后，实防于未然之先。《周官》有嘉石、肺石之设，有三赦、三宥之条，有八成、八议之法。凡欲酌情理之当，而无畸轻畸重之虞，所以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按

周法以三典刑邦国,五刑之属各五百。迨后穆王命甫侯度作刑,以诘四方,始定五刑之属三千。盖谓墨属千,劓属千,髌属五百,宫属三百,大辟二百也。汉初兴,除秦苛法。文帝诏除肉刑,天下乂安。而后世或多任用酷吏,刑罚亦多未得其平者。夫古之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出于礼官,以正上下,辨等威。二者源流不同,著述各异,至于禁暴诘奸,其事本合。故古者大刑用甲兵,则刑与兵,未尝不可合而一之也。要之,准情以定罪,核罪以定法,务在得其平允,而不少以己意,与乎其间。至以姑息博宽大之名,则养奸之患,更有甚者。如唐太宗纵囚一事,欧阳修讥之。此特欺世盗名之尤者耳。盖过严则滥,而过宽则纵。我皇上整饬群伦,纪纲庶务,于明察之中,寓慎重之意,民之所以知廉耻而重犯法也欤!

制策又曰:古之海防,以御外寇。今中外大同,惟当稽其出入。此诚通贾便民之要务也。臣考海防之设,古多讲戍守之方。明郑氏《海防全图》,袤延万里,置守防御,船有五等,哨有定限。夫如闽之福、宁,浙之舟山,素称险要,为奸民乘间窃发之所,则巡缉诚不可废也。我国家六合同风,抚辑外藩,无远弗届。沿海如鹿耳、鸡笼等处,全就廓清。即偶有一二莠民,亦震慴屏迹,而不敢动。海宇宁谧,商贾交通,而稽察之法则益不可不严。《周礼》山国用虎节,泽国用龙节,土国用人节,而且道路以旌,门关以符,货贿以玺。凡以便于稽也。今仿此意,以稽洋舶之往来,于出口时,先给一票,登记舟中有无,使莠民无所托迹,而又察其货物之所出,觇其贩鬻之所主,则货有专地,贩有专行,不难稽之而知也。诚使为有司者,实心访察,严其出入,绝其纷扰,所以便民而惠商者,不外是矣。

制策又以民风多随乎士习,士习可验之文章,谓文以明道,当有以酌其中。臣窃惟文章者,载道之器。言为心之声。韩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故观其文,可知其人也。汉初得士最盛,其取士之法,有贤良方正、孝廉、茂才等科。而其时贤良如董仲舒,明经如召信臣辈,尤卓然为一代冠。隋大业中,专以文辞试士,曰进士。唐用三科十九目,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而天子自诏,则曰制科。宋元祐中,罢诗赋,专经义。建炎以来,兼用经义诗赋,分为两科。至明

洪武中，始定三场之制，沿用至今。夫取士之法，总期实用。制义代圣贤立言，自非根柢经术，精熟义理，必非可剿袭而为之者。明初宋濂之文，深博典赡，高出一世，而杨士奇、李东阳辈继起，亦并足鼓吹休明。正、嘉之际，王慎中、唐顺之辈，咸规模大家，为文章正宗。而酝酿深醇，善学史迁，则惟归有光一人而已。隆、万以后，伪体竞出。尚机法者，或失之滑；恃才气者，或失之杂。苟不酌其中，何以免驰骋襞积之诮也。士诚明体达用，务为有本之学，则士习端而文体亦蒸蒸日上矣。

若此者：溥润泽而大丰美，锄稂莠以安善良，薄海同仁，士林向化。猗欤盛哉！蔑以加矣。臣尤伏愿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不以盈宁有象，而忘小人之依；不以风俗既同，而弛咸中之训。率土皆臣，益廑抚绥之念；人文蔚起，弥殷乐育之思。于以茂扬大业，溥畅鸿庥，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尽心尽力于民事是敬奉天命的实际内容，彰明德行是谨慎处理刑罚之事的根本，笼络安抚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就能招致要服、荒服等王畿以外极远地方之人的到来，养成习惯开始于建立学校。稽考古代的帝王，没有谁不是依据天地覆盖与承载同时包容万物的心意，来完成悠远长久、无穷无尽的化育的，所以能够使远近地区安宁幸福，使中原和边疆安宁快乐。而概括起来不外乎是这种不停地自我发奋图强的精神，从而有理由给后人留下业绩名声。《大戴礼记》说：圣人的仁爱如同上天覆盖万物一样，圣人的智慧如同有神灵相助一样。这里是说恩惠遍施百姓而识别善恶准确无误。《尚书·虞书·益稷》说：一直到僻远的海边地方，百姓没有不全都顺从我们的。《诗经·大雅·文王》上说：栋梁之臣多又多，文王因此得安宁。这里是说用德行感化远方的人而使风气和习俗美好盛大。因此所有华夏地区太平安定，整个大地呈现昌盛安乐的景象，天道与人事配合呼应，承受大福和光明。自从唐尧、虞舜以来，之所以弘扬盛大的治国原则而迎受洪大的庇荫

关怀的原因，全都是这个道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德泽恩惠优渥普及，道德风俗统一协调，使亿万百姓蒙受富厚安定的利益，天下众人从此也都明显变得友好和睦起来，水陆交通要地全部纳入疆域图册，平民百姓全都懂得礼法道义，确实是古往今来所难得遇见的现象了。然而圣明的皇帝陛下心怀谦让，思考使国家长治久安直到永远的办法，希望从愚钝的人那里获得一些可取之处，宣进臣下我等人来到殿廷上，而用体恤百姓的疾苦、顺应上天的意旨，安抚善良百姓、制止强暴势力，与那沿海边疆巡视稽察的方法，读书人所效法的准则来策试我们。臣下我愚昧无知，哪里能够谈论这些问题?只是念及臣下事奉君主要先考虑好自己要说的话、拜受君命后就要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君臣大义，恭敬承蒙皇帝清审详问，怎敢不讲述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来效纳从竹管里看天、用瓢量海水所得到的浅薄见识的那片忠心呢!

跪拜恭敬地阅读皇帝御制策书上有这样的话：老百姓的主宰者是君主，而君主是天的儿子，顺应天命依靠实际事功而不是根据表面文彩，因而便谈论到免除百姓赋税钱粮的政策。这实在是保护臣民如同保护婴儿一样的妥善谋略。臣下我恭谨考察，《周礼》记载大司徒用十二项荒年的救济措施来使广大百姓聚集而不离去，第二项叫做减轻赋税，但是没有谈论到免除赋税。西汉文帝二年，开始下诏减免百姓按田亩交纳赋税的一半。十二年，又下诏减免百姓交纳租税的一半。十三年，又下诏全部免除百姓应交纳的田租、赋税。等到汉宣帝元康、神爵两个年号之间，免除百姓积欠的租税，救济时借贷的钱物不再回收，仍然有时偶尔施行一次。这是免除赋税钱粮的发端起始。接续这些事情的，像宋太宗下诏免除拖欠未交的捐税，宋真宗派遣使者免除长期拖欠的赋税，宋仁宗还将追欠司改为积逋司。北宋从宽减免百姓赋税的制度，同前代相比有所增加。但是有的不过是在一个时期内免除赋税，或者在一个地区内免除赋税。记载在史书典册上，已经成为罕见的现象。然而蒙受这种救济措施好处的人，差不多稍微获得安定，从中也可以看到君主用

恩德就能顺应天命而感化百姓，是十分深刻切实的。我大清皇朝巨大的恩泽广泛布施，按田亩征收的赋税同前代相比较格外减免得多。皇帝陛下值此一向融洽、累世升平的吉庆时代，将慈爱恩惠施于百姓，不断地增加。普遍地免除天下百姓应交纳的钱财和粮食有四次，免除从水路运往京师的税粮有三次，以及免除各种税款累积拖欠的数额，更是不低于几千万的数目。深厚的仁爱和恩惠，渗透到百姓的肌肉骨髓中去。《周易·益卦》上说：怀有真诚信实地施惠于天下人的心愿，毫无疑问是十分吉利的，天下人也必将真诚信实地感激报答我的恩德。这是说君主用真诚信实给百姓带来好处，那么百姓自然用真诚信实响应君主，因此四海之内富裕安宁，百姓和睦欢乐，收获丰盈、屡屡喜庆，雨天、晴天协调适宜。所说的用和协召来和协，得到无穷无尽的美好幸福，就是这个缘故。

皇帝御制策书又鉴于虞舜在朝廷上命令用刑罚来辅助教化的推行，在使用刑罚时十分注意慎重不滥，心存矜恤，因而想到严明刑罚，整饬法令，一定要把天理人心的最为恰当公正作为准则。臣下我想来，盗贼侵扰劫掠，违法作乱造成外患内乱，帝王时代不能不预先为此加以防备。所以执掌禁令刑狱的士师接受命令，一定要说使用刑罚正是期望以后不再使用刑罚。这实在是十分慎重的态度。刑罚，虽是在已经成为事实以后加以禁止，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成为事实以前就进行防备。《周礼》记载在外朝门左侧设立有纹理的石头然后命犯人坐在上面示众，思其纹理而改悔，在朝廷门外设置形如垂肺、颜色赤红的石头而让有不平的百姓击石发声来鸣冤申诉，有对年纪幼小的孩子、对年纪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对痴呆一类精神病患者三类人可以赦免的条目，有对因不懂法律而犯罪、因疏忽大意而造成过失犯罪、因遗忘法律有关规定而造成犯罪等三种情况可以从宽处理的条目，有依靠对刺探国家情报、造反叛乱、给外国当间谍、违反王命、假冒君命搞欺骗、盗窃国家宝藏、结党拉派、诬告好人等八类犯罪行为惩治判罪的方法，有对皇亲国戚、皇帝故交旧友、有大德行的人、有大才能的人、有大功勋的人、高官显贵、勤劳国事的官员、先朝帝王子孙等八种人犯罪经过特别审议

可以享有减免刑罚特权的规定。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想斟酌人情、事理的常规，而没有偏轻或偏重的忧患，因此使百姓一天比一天诚心向善、远离罪恶而自己却不知道。考察周代的法制，用轻的、正常的、重的等三种不同的刑罚分别对各邦国中新建的诸侯国、太平安定的诸侯国、犯上作乱的诸侯国施加刑法，墨刑、劓刑、宫刑、刖刑、死刑等五刑的条目各有五百条。等到后来周穆王命令甫侯根据宽大的原则制定刑律，来治理禁戒天下四方的臣民，才开始确定五刑的条目为三千条。大概是说在犯人脸人刺字并染成黑色的墨刑的条目是一千条，割掉犯人鼻子的劓刑的条目是一千条，砍去犯人膝盖骨的髌刑的条目是五百条，破坏犯人生殖器的宫刑条目是三百条，犯死罪的刑罚条目是二百条。汉朝刚刚兴起，就废除了秦朝的烦琐法律。汉文帝下诏废除残害肉体的刑罚以后，天下重又安定下来。但是后世有的大多任用滥用刑罚残害百姓的官吏，施加刑罚也大多没有能够做到公正治罪。古代的法家，出自于治狱的官员，有功必赏赐、有罪必治罪，来辅助国家礼仪制度的推行。名家出自于掌管礼仪教化的官员，来端正君臣上下的等级、身份、地位，辨别与一定身份、地位相适应的威仪。这两个流派的来源并不相同，所撰写的书籍也各不相同，至于制止暴乱、究办奸盗，它们的事情本来合为一体。所以古时候最重的刑罚动用披挂铠甲的军队进行诛伐，那么行刑和用兵，并不是不能将它们合而为一的。概括起来讲，根据实情来确定罪行，核实罪行来制定法律，关键在于获得那些公正平允的事实，而不能稍微把自己的主观意图掺杂到中间去。至于用无原则的宽容博取宽大的名声，那么纵容奸邪的祸患，就更有严重的。像唐太宗暂时释放在狱罪囚回家、限期自动归狱这一事情，北宋欧阳修就指责这种做法。这更是欺骗世人、窃取名誉尤为突出的事情了。大概刑罚过于严厉就会没有节制，而过于宽容就会放纵不羁。我大清皇帝陛下整治各类人物，治理各种政务，在明察秋毫的过程中，加上谨慎持重的态度，这是百姓之所以懂得廉洁节制、知道耻辱而重视违犯法纪的原因吧!

皇帝御制策书上又说：古代在沿海设置的防卫设施，是用来抵

御外来的敌寇入侵的。如今海内外已经统一，只是应当稽察船只的出行与驶入。这的确是交换商货、便利百姓的主要政务。臣下我考察沿海防卫设施的设置，古代大多讲究戍卫防守的方法。明代郑开阳撰写的《海防全图》，所记海岸线伸展绵延长达上万里，设置守军进行防御，船只有五个等级，哨位有固定数目。像福建的福州、宁波，浙江的舟山，一向以地势险峻地处要冲地位而著称，是奸邪刁民乘机突然劫掠的地方，那么巡查缉捕的确是不能废除的。我大清皇国天地四方共同接受天子的教化，安抚辑和外部的屏藩，使藩属地区不论多么遥远也没有不前来朝拜的。沿海地区像鹿耳、鸡笼等地方，全部达到肃清。即使偶尔有一二个邪恶坏人，也将震惊惶恐收敛恶迹，而不敢轻举妄动了。近海的地方安定平静，行商坐贾互相交换商品，而稽察的方法就越发不能不严格了。《周礼》记载多山的国家使者出行时使用铸有虎形的符节，境内多沼泽地的国家使者出行时使用铸有龙形的符节，地处平原地区的国家使者出行时使用铸有人形的符节，而且在道路上通行用旌节，出入门关用符节，货物通行用玺节。所有这些都是用来方便稽察的。如今仿照这个意思，来稽察海上航行船舶的往来，在船只离开通向海洋的口岸时，先发给一张船票，登记船里面的所有东西，使邪恶坏人没有可以寄身的地方，而且还检察船中货物从什么地方出产，侦察他们贩卖货物以什么东西为主，那么货物有专门的产地，贩卖有专门的行当，就不难稽察他们的真实情况而了解他们了。果真能够让有关部门的官吏，真心实意地进行调查，严格盘查船只的出行与驶入，杜绝对民众的搅扰，用来便利百姓而使商人获得好处的办法，不外乎就是这些了。

皇帝御制策书又认为民间的风尚大多追随读书人的风气，读书人的风气可以用文章来检验，认为写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理的，应当有符合那无过与不及的中正原则的办法。臣下我私下想来，文章是表达一定思想道理的工具，言语是内心发出的声音。唐代韩愈曾经说过：仁爱正直的人，他写出文辞是和蔼可亲的。所以观看某个人的文章，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品行。汉朝初年获得贤士最为兴盛，

汉朝选取士人的方法，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科目。而那时有德行才能的贤良之士像董仲舒，通晓经书义理的明经之士像召信臣等人，格外卓越，成为一代出类拔萃的人。隋朝炀帝大业年间，专门用文章策试士人，考试合格的人叫做进士。唐朝用三个类别和十九个科目选取士人，由学馆考试应科举的士子叫做生徒，由州县推荐应科举的士子叫做乡贡，而天子亲自下诏策试于殿廷，则叫做制举科目。宋朝哲宗元祐年间，废除考试诗赋，专门考试经书义理。南宋高宗建炎年间以后，同时考试经义和考试诗赋，分为两个科目。到了明朝太祖洪武年间，才开始确定为必须经初场、二场、三场三次考试的制度，一直沿袭使用到现在。选取士人的方法，总是期望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用八股文代替道德才智杰出的圣贤之人确立论点，如果不是经学基础深厚，精通熟悉经书义理，必定不能够剽窃他人的作品而写出来。明朝初年宋濂的文章，内容精深广博、文辞典雅富丽，超过同一时期的文章，而杨士奇、李东阳等人相继崛起，也都足够用来宣扬美好清明的政治。明武宗正德年间到明世宗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都取法摹仿大作家的风格，成为文章的纯正代表。然而酝酿深湛淳厚，擅长学习西汉司马迁的人，却只有归有光一人罢了。明穆宗隆庆年间、明神宗万历年间以后，专事摹拟而无真实内容和独特风格的文章竞相出现。崇尚阐述契机方法的人，有时在偏向一边方面有缺陷；仰仗才能气魄的人，有时在内容庞杂方面有欠缺。如果不能符合那无过与不及的中正原则，怎么能避免卖弄才华、堆砌辞藻的讥诮呢?读书人果真能够明白本体又真会施用，努力追求有根底的学问，那么读书人的风气就可以端正而文章的风格、结构、体裁也就天天向上发展了。

像以上这些问题：普遍降施恩泽而社会丰足美好，铲除害群之马来安定善良的百姓。海内外广大地区同行仁德，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向慕道义。真是盛美啊!没有什么可以超越了。臣下我更加跪拜祝愿皇帝陛下，已经安定了再追求更加安定，已经治理了再追求治理得更好。不因为丰盈安宁有了征兆，而忘记平民百姓的

疾苦；不因为风气习俗已经统一，而松懈都要符合中正原则的教诲。境域之内全都是皇帝的臣民，更加勤于安抚四方的念头；礼乐教化蓬勃兴起，更加加深培育人才的念头。用来繁荣弘扬盛大的事业，普遍赐予鸿大的吉福。我大清皇国亿万年拥有道义的长久国运，就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来自民间出身微贱，新被举拔准备进用，不懂得禁忌和避讳，抵触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罪该万死。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董文武译〕

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丙辰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殿试策问

[嘉庆元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懿惟凝褫集祜，长治久安，在乎夙夜宥密，单心基命。朕仰承昊苍眷佑，抚驭寰宇，幸臻宁谧康乂之庥，夕惕朝乾，不敢暇逸。勉思法一中之运量，考三古之规模，兆民遵正直之途，五材归化裁之用。克与垓埏瀛嶂，偕之大道。兹以敷奏为明试，爰举胪询。

人心道心，肇闸虞延。帝王所以与天下相见者，心也。《书》所谓享天心，肩一心，洽民心，盖彻上下之义也。心之用，主乎敬。《尧典》一篇始终皆曰"钦"，即至于元首股肱，喜起赓歌，而尤勗以钦，乃传心之功效也。经训之粹，足相证明者何语？伏羲以前，尚矣。《文子》有神农之法，《新书》有神农之教，诸家言黄帝者更详。颛顼"敬胜义胜"之训，帝喾"博爱博利"之文，载籍微言，稽唐虞三代而上者，可举欤？《大戴礼》武王诸铭，能约其词欤？后世若《帝范》、《帝学》、《心经》、《政经》，亦有合欤？凡皆帝学心传，所宜沿溯也。

《周书》曰：政贵有恒。记曰：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盖治道有定而不可泥者也。然其得失，可得而言。井田、封建，古以为大经大法。然而汉起七国，唐限名田，踵而行之，如棼丝矣。战之以车也，泉之以刀也，税之以绢也，后世断不可行，无论得失矣。周昉六官，唐沿六典，今犹其职。而掌隶分合，品秩崇卑，考课疏

密皆殊。轩画万井，舜区九州，今更扩之，而疆宇襟带，控制沿革每异。它若刑法、食货、兵戎、礼乐，史迁之书，列史之志，旁及政书如会要、典章、会典所厘具者，能源本权衡言之欤？

司徒修六礼，明七教，凡以节民性、兴民德也。《礼·坊记》数千百言，皆以坊民而已。故《周礼》有禁暴之官，《王制》严左道之律。道政齐刑，三代不废。孔子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使由者何途？不使知者何道？先圣名言，必有奥旨。今未尝不禁奇邪而诞疑未尽泯，未尝不严保甲而奉行未尽善。蠲贷普而民或未尽厚生，教诫谆而民或未尽正德。至于吏为民父母，而富教非由科条。士为民表率，而跅弛无由观感。欲使道德一而风俗同，诸生来自田间，宜有闻见。

兵所以威天下，实所以安天下。田乘丘甲，非如古之制也。步伐止齐，非如古之法也。汉之南北军，唐之府兵、矿骑，宋之更调，明之团营，与今之制孰善？钱文子之《补汉兵志》，宋之《武经总要》，明之《纪效新书》，与今之法孰详？要所以奏肤公而成伟绩者，练其技则精而不苶，鼓其气则作而不竭，实其籍则不虞冗且浮，明其赏罚则不至窳且怠。古之善将将者，孰能得此意？《易》曰：师出以律。孔子曰：我战则克。其以此欤？

凡此者：式于古训，而时几精一传其学；监于成宪，而因革损益合其宜。民安于日用饮食，而遵路之俗成；士忘乎智名勇功，而知方之风劝。治道祎而协气蒸，其必有所由致，循是以观厥成，曷敢不亹？维尔修于家，扬于庭。毋隐毋肤，朕将亲第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虽说没学习过，可我必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不要在幽暗的地方表现出来，不要在细微的事情上显露出来。

不要偏差，不要遗忘，一切都遵循传统的规章。〔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美好地想来，使国家得到福佑和保持福运，并且长治久安，在于朝夕恭俭宽仁宁静，竭思殚精于国家的命运。皇帝我承受天命并得到上天的顾念佑助，安抚控御天下，幸蒙得到安宁康泰治理的吉祥。早晚小心谨慎自强不息，不敢逸乐放纵。勤勉考虑效法纯一执中的运用权衡的方法，考察伏羲、文王、孔子时代的制度规模，使亿万人民遵循正直的道路，五材得到恰如其分的使用，并且确能与天下四海偕同于大道。今天以臣僚进呈意见的方式作为公开的测试，于是依次列举出咨询的问题。

人心道心始述于虞舜的朝廷。帝王与天下人推诚相见的东西，在于心。《尚书》所说的顺天心，任一心，谐和民心，大概是通彻了上下之间关系的道理。心之用，以恭敬为主。《尧典》一篇，始终都说"敬"。至于君主和大臣作歌欢唱，而特用恭敬来勉励，这便是传语交心的成效。经典训导的精粹，足以相证明的有哪些话呢？伏羲以前，很久远了。《文子》一书有神农教导帝王的方法，《新书》一书也记载了神农之教，诸子百家讲黄帝的事更加详细。颛顼"以恭敬胜过懈怠，以道义胜过私欲"的训教，帝喾的"广泛推爱施利"的文诰，这些记载在典籍上的精微的话，考察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以上的事，可以尽举吗？《大戴礼记》中武王时的诸种铭文，能约略举出具体的内容吗？后世如《帝范》、《帝学》、《心经》《政经》，也有相吻合的吗？这都是帝王学问和心法传授所宜推源溯流的。

《周书》说：政治最重要的是有常规。《礼记·乐记》说：五帝不同时，不相因袭旧乐；三王不同世，不相遵循旧礼。大概治理之道有定规，但不可拘泥于一，这样它的得失，可以能够讲清。井田制、封建制，古代以为大经大法。然而汉朝遽有七国之乱，唐朝限制占田地，接踵作为大法推行，结果如一团纷乱的丝麻。打仗用兵车，铜钱用刀币，纳税用丝绢，后世是一定不可行的，这无需谈论它的得失了。周创建六官，唐沿袭六典，现在还是实行它的职事。而职掌和隶属关系的分合，品位次序尊卑，考课好坏优劣都不同。轩辕规划井田，帝舜划定九州，现在又扩大了。而疆界山川、区域沿革每有不同。其它如

刑法、食货、兵戎、礼乐，司马迁的《史记》，诸史书的记载，另外政书如会要、典章、会典厘定备具的事项，能够挥求本源有分析地讲一讲吗？

司徒修明冠、婚、丧、祭、乡、相见等六礼，彰明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七种伦理关系的教导，都用来调节人民的性情，培养人民的道德。《礼记·坊记》数千字，也都用来防止人民有失于礼教。所以《周礼》有禁止暴乱的官吏，《王制》有严禁旁门邪道的禁律。用政治来诱导他们，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夏、商、周都不废弃。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可以使他们照着走的，到底是什么路？不可以使他们知道的，到底是什么方法？先圣的名言肯定有它的深刻道理。现在不曾不严禁歪门邪道，但欺骗迷惑的行径尚未消灭。现在不曾不严饬保甲制度，但保甲制度的奉行尚未尽善。普遍减免租税徭役，老百姓的生活并未变富裕，对人民推行诲人不倦的教化，而人民并未都归于正德。至于官吏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使老百姓富裕并实行教化，不取决于法令条规。读书人作为老百姓的表率，而放纵不羁，不循礼法，就没有理由作为表率。想使社会道德纯一不乱而风俗同一不杂，诸位考生自来于民间，应当有所闻见和了解。

兵是用来威慑天下的，实际是用来安定天下的。按田地出兵车和戎马、步兵的兵赋制度，不同古代的兵制一样了。行止、进退的步伐和击刺的整齐划一，不同古代的法式一样了。汉朝的南军和北军，唐朝的府兵、骁骑 ，宋朝的更调，明朝的团营，与现在的兵制哪一个好呢？钱文子的《补汉兵志》，宋曾公亮、丁度等撰写的《武经总要》，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与现在的兵法哪一个详细呢？总之想建立大功而成就伟大业绩的人，练习他的击技之术就会精纯而不倦怠，鼓足他的勇气就会奋发而不衰竭。考核名册就不担心超员和假冒，严明奖赏和惩罚就不至于懒惰和怠慢。古代善于驾驭将领的人，谁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意思？《周易·师卦》说：军队出动要有严明的纪律。孔子说：我军出战即能克敌制胜。大概就出自这个原因吧！

以上所有这些问题：用之于古训，就在时时警惕、注意苗头和用心精微纯一上，承传了圣人的那个学问。有鉴于成法，而使继承、革

除、减损、增益合乎实际情况。老百姓对于他们的日常用品饮食感到安心，而形成遵循王道的风俗。读书人不计较于智、名、勇、功，而懂得道理与鼓励百姓。国家的治理办法好而协合之气盛行，其中一定有所达到的原因，从这来考察成功，怎么能不勤勉？你们在家里培养道德学问，在朝廷上阐扬主张，不要顾虑，不要说空话，皇帝我将亲自选拔你们。

赵文楷　会试卷三道

赵文楷(生卒年不详)　字逸书，安徽太湖人。嘉庆元年(1796)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因琉球国请袭封，文楷奉命赐麟蟒服，充任正使，持节东行，礼成，琉球国主厚赠礼物，文楷坚辞不受，廉洁之声闻于海外。归国后不久，出任山西雁平兵备道，以劳卒于任。著有《楚游稿》、《独秀草堂古今文》及《槎上存稿》等。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贤者定学之品，所以存真儒也。盖学也者，笃行之谓也。贤亲君友之间，既各尽其诚矣，虽曰未学，其谁信之？今夫学术之异，学者为之也。异于为学者之功，实异于士君子之口。是故不审所尚，则积行者不彰；惑于所称，则从事者多误。天下不少一二笃实之儒，相率而非之，亦将相率而倍之。君子于此，盖不可无定识已。有如贤亲君友，各尽其当，然而无遗憾如此，此何如人也哉！

昔先王以三德六行，教人于党庠术序之中，而乡有书而岁有比。所谓敦实行以化民俗者，由此其选也。古大人本格致诚正，以尽夫子臣弟友之经，而由小成以几大成。所谓表人伦而昭物则者，其风未远也。使若人出而与当世之所谓学者较，吾未知其奚如。而或且以未学疑之，则不容不辨。

炫异矜奇之举，末俗惊焉。独至于伦纪是敦，则往往视为庸行之常，而转没其暗修之自然。而《诗》、《书》所载，《风》、《雅》所歌，皆以

立彝伦之极。当其至性所流，虽千载之余，犹将感慨唏嘘而不能已，吾恐被服儒林者，固未必感人之若斯矣。殚见洽闻之誉，举世趋焉。独至于拙诚自矢，则往往略其躬修之实，而姑奉以质美之名。彼夫训诂相高，风流相尚，亦各标《尔雅》之称。而苟大节有亏，则身心之际，终觉怀惭负疚而不自安。固不如悃愊无华者，犹得为生初之无忝矣。而顾曰未学也哉？或者望道未见，则当局之欿然自下，未尝不出以虚衷。君子之为学也，第揆于本原之地。苟先立其大而无可疵议，即姑置其余而不必苛求。或者好尚多殊，则今日之如量以称，未必不讥为过当。儒者之论学也，当求之性量之间。苟其尽伦常之秩序而无亏，即知其合先哲之仪型而不愧。吾必谓之学矣，夫吾岂敢为过情之誉哉！敦笃之儒，不以儒见，则华文少实又何讥焉？悠悠之口，其无定评也久矣。

贤明者规定学习的品级，是为了保存真儒。大概学习，说的是笃诚品行。贤亲君友之间，已经各尽其诚信，虽然说没有学习，难道有谁相信他没有学习吗？现在学术的不同，是学者造成的。研究学问的人功用不同，实际上士君子口头所说也不同。因此不考察所崇尚，那么努力修行的人就不显著。被所称说的迷惑，那么从事修行的大多迷误。天下不缺少一两个笃实的真儒，相继责难他们，也将相继而背离他们，君子对于这个问题，大概不可不明确区别。就像贤亲君友，各尽自己的诚信，然而这样没有遗憾，这是怎样的人呢？

从前先王在学校中用三德六行教育人们，乡邑有记载而每年有考核。所谓敦厚诚实品行，用来改变民俗的人，是从这里选拔出来的。从前君子依据穷尽事理、充实知识、使心地虔诚、修养好自身而尽作人子、人臣、兄弟、朋友的准则，而由小成积累为大成。所谓表率人伦而昭明物法的人，他的德风不远。使这样的人出现而与今世的所谓学习的人做比较，我不知他们如何。而有人将他当作没有学习来怀疑他，那么不容不辨论。

炫耀和仗持奇异的举动，使末世的人们感到惊异。只是对于在伦理纲纪上下功夫的人，往往就看作平庸的行为，转而使他自然的潜

在修养不突出。而《诗》、《书》所载的事,《风》诗和《雅》诗所歌咏的事,都是为了建立常法伦理。当他们最高的性情流传,虽然是在千载之后,还将使人感慨赞叹而不能自已,我恐怕常居儒林中的人,也未必如此感人之深。广见博闻的荣誉,全社会都追求它。只是对于拙诚自誓的人,那就往往省略他修身的实绩,而姑且送给质美的名誉。那些训诂相互认为深刻,风流相许的人,也各标精通《尔雅》的美称。而假如大节有亏损,那么在身心上,终感惭愧内疚而不自安。原本不如朴实无华的人,还能保持有生以来没有愧辱。然而反说没有学习吗?有的人望道而未见,那么当事者就谦卑自下,未尝不出自心里。君子治学,只揆度于根源的地方。如果首先建立他的大的方面,而无可非议,就姑且放弃小的方面而不必苛求全面。有的人崇尚很殊异,那么现在按照实际来衡量,未必不被讥为过失。儒生论学,当在性情和器量之间探求,如果他能遵循伦常道德的尊卑秩序而没有亏损,就知道他符合先哲的仪型规范而无愧。我一定认为他学习了,我难道能对他作出越过实情的赞誉吗?敦厚笃诚的儒生,不凭儒生来显现,那么只有华美的文辞而缺少实质,能对此有什么讥嘲呢?无穷无尽的人言,大概没有一个准定的评价是已很久的了。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即隐微而切指之,而几之动也,危矣甚矣!隐非见也,微非显也,乃几之已动,则莫见焉,莫显焉,谁谓隐微之可恃乎?且夫人具此湛然之心,必不能有静而无动。然静易知也,动易知也,惟介于静与动之交而有不可掩遏之势,则其理操乎莫遁,而其几已涉乎至危。有如不睹不闻,静之极已,顾安得常守此不睹不闻之时哉!

耳目之所未周,而此心忽触而思动,则当其随感辄应,已大异于人生而静之初。形声之所未著,而此心或迫而思迎,则即使讳莫如深,已灼然于内顾难欺之地。如是而犹得谓之隐乎?夫隐之与见,有异境而无异理。当夫一意甫动,本非有迹象之可凭。以为隐,何必非隐?顾恃其隐而思以自藏,则此中先有不能自藏者矣。且乌知其藏之

愈深者，非即其暴之愈著者乎？故以隐视隐，不得也；即以见视隐，亦不得也。则吾以为莫见乎隐。如是而犹得谓之微乎？夫微之与显，有异候而无异心。当夫一念初萌，本非有端倪之可指。以为微，何必非微？顾恃其微，而幸以自蒙，则此中先有不容自蒙者矣。且乌知其蒙之愈久者，非即其彰之愈疾者乎？故别显于微，不得也；即例微以显，亦不得也。则吾以为莫显乎微。

盖形迹众著之余，指视交集于旁观，而当境转疏于内照。故使其自隐而见，自微而显，而百虑之与为朋从者，敛之不及敛，亦防之不胜防，或转冀有幸逃之隙。若朕兆方萌之始，理欲只争于片念，而危微早判于当几。正惟此隐犹未见，微犹未显，而方寸之自为消长者，欲盖而弥彰，亦稍纵而即逝，必无可以自匿之区。此无他，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所谓独也，君子审于此而知所慎矣。

特就隐蔽细微而明切指出它，但细微的萌动，危险到极点了啊！隐蔽不是显现，细微不是显露。于是细微已经萌动，那就没有什么不出现了，没有什么不显露了。谁说隐蔽细微可以依恃呢？至于人具有这种湛然洞察之心，必不能只有静止而没有运动。然而静止容易知晓，运动容易知晓，只有介于静与动的交界而有不可掩遇之势。而那道理掌握起来不遁隐，它那细微已经涉于最危险了。有如不睹不闻听，静止到极端状态，又哪里能经常坚守这不睹不闻的时刻呢？

耳目还没有完全听到和看到的，而这个心忽然接触事物而考虑动。于是就当它随着感觉而响应，已经大大不同于人从生下来就沉静的初始状态。形和声还未明显，而这个心有时急迫而想与物相接，那么即使将事情尽力隐瞒，不使人知，也已经在难欺瞒的地方灼然清楚地暴露了。像这样还能说它隐蔽吗？隐蔽与显现，有不同的环境而没有不同的事理，当那一意刚刚萌动，本来没有迹象可以凭借。以为隐蔽，何必不隐蔽？想依恃它的隐蔽而考虑自藏，那么这里面先有不能自藏的东西了。况且哪里知道他藏得愈加深远，不就是他暴露得更加明显吗？所以从隐蔽来看隐蔽，不能；就是以显现看隐蔽，也不能。那么我以为这就是不在隐蔽处显现。像这样还能说它微细吗？微

细与显现有不同的时候而没有不同的心。当那一念刚刚萌发，本来没有端倪迹象可以指示。以为微细，何必不是微细？想依恃它的微细而侥幸自蒙，那么这里面先有不能自蒙的东西了。况且哪里知道他蒙蔽越久的东西，不就是更快地暴露它吗？所以在微细中辨别显现，不能；就是在显现处辨别微细，也不能。那么我以为这就是不在细微中显露。

大概形迹彰著之后，被旁观者注视指出，而当此境地转疏于内照。因而使它自隐而现，自微而显，而百次考虑它构成那朋党群从的，收敛而不及收敛，也防不胜防，有的反而希望有侥幸遁逃的间隙。如果在征兆刚萌生之始，理念与欲念只争于一念间，而人心危险和道心隐微早判别于正该微细的时候。正因为隐蔽还未显现，微细还未显露，而主观之心自为消长的人，欲盖而弥彰，也稍纵而即逝，肯定没有可以自我藏匿的地方。这没有其它什么原因，动而未形，有和无之间的差异细微，也就是所说的独处，君子审察于此就懂得谨慎了。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引《诗》之咏率由，知愆忘所由免也。夫不愆不忘，政之所以行也。而惟旧章之率由，乃以致此。《诗》言不重可思乎！尝思有国家者，创制难而守文易。吾谓不然，非守文之难也。其运会已极乎治平之轨，必思有以更而张之，非驳而不纯，即偏而不举，而终无以过乎累朝奕叶之盛，所以难也。吾因徒善之不足为政，而有怀于《假乐》之诗。

彼其目睹乎主德之隆，而导扬盛美，必追原夫肇造之勋。夫单心宥密，所得于《访落》者何穷？而诗人曰：此先代之所留遗也。身游乎郅隆之世，而推本先型，必进究其缵承之实。夫《官礼》、《雎》、《麟》，所庇于奕祀者何限？而诗人曰：此吾君之所缉熙也。

盖我周自建邦启土，圣圣相承。至于文、武，集大勋以一天下。本祖宗之遗意，鉴二代之兴衰，凡厥典章，虽万世率由焉，可也。亦越成王之世，身底太平，而积德累仁之报隆焉。然使成王有狭小前人之志，诩诩焉自用其聪明，则其始也，或以喜事而致纷更；其继也，或以

怠事而滋废坠。愆、忘之不恤，于旧章乎何有？而当日者仰惟穆考率时昭考，人民以此宜也，纪纲以此秩也。后之人徒慕其致治之休，而抑知非率由之功不及此？呜呼，可谓盛矣！盖古者君臣赠答之词，皆关学问。穆穆皇皇，不以为受天之祜，而以为率祖之行。一若伴奂优游，几非其所幸致。盖颂声之作也，而亦风人之旨矣。且当日元子嗣位之始，尚在冲龄。基命定命，只以觐文王之耿光，只以扬武王之大烈。一若绍庭上下，直可永于万年。盖承先之意也，而亦裕后之谋矣。故其时作求世德，诞保受民。继序者祇承二后，仪型者作孚万邦。数传而后赋《车攻》而歌《鸿雁》者，且以为能复文武之功也。岂非率由旧章之一证乎！而又何疑于遵先王之法也哉？

引用《诗经》歌咏的一切都遵循，也就懂得避免过失和忘记了。没有过失没有忘记，构成了政治推行的保证。而只是一切都遵循旧规章，于是能达到这样。《诗》说不可以反复考虑吗？常想拥有国家的人，创立国家体制难而守持前代规章容易。我说不是这样，并不是守持前代规章很困难。那时势已到达于安定太平的正轨上，一定想有新法改变而发扬它，结果不是驳杂而不纯一，就是偏颇而不全面，而终于不能凭借什么超过前朝累世的昌盛，这是难的原因。我只是鉴于它在表面上很完善却不足以为政，而怀思《诗·假乐》这篇诗。

他目睹君主德治的兴隆，而引导张扬盛大美好，定然探源那首创的功勋。殚心竭虑，从《访落》诗中得到的怎能穷尽？诗人说：这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人生活在隆盛的社会，而推源究本以先代为法式，定会探究那继承的实绩。设官分职的《周礼》与《关雎》和《麟之趾》二诗的教化，对世代都能祭祀的庇护怎能有限？而诗人说，这就是我们君主的光明。

大概我周朝自建国开疆，圣君相承，传至文王武王，集大功统一天下。根据祖宗遗留的思想，借鉴夏商二代的兴衰，大凡其典章，虽然万世之后也一切都遵循它，是可以的。到周成王的时候，天下已经安定太平，而先王积聚德智仁义得到丰厚的报答。然而假使成王觉得前人的志意狭小，自以为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么他一开始，

或因好大喜功而招致纷扰更变。接下来，或因对政事怠慢而逐渐废败坠落。对过失、忘记还不忧虑，哪里会去遵循旧规？而当时成王也只是一切遵循文王武王旧规，人民因此感到适宜，纪纲因此井井有条。后人只羡慕他天下大治的美好，而又哪里知道不一切遵循旧规就不会达到这样的局面呢？嘿！可说是昌盛啊！大概古时君臣赠答之词，一切都关于学问。庄严肃穆，美盛鲜明，不以为是受上天的赐福，而以为是一切遵循祖规的成效。正如逍遥闲散、优游自得，几乎不是他侥幸得到的。大概颂扬之声的产生，也是诗人的意旨。况且当时嫡长子嗣位之时，还在幼龄。国家的命运安危，只去显现文王的光辉，只去张扬武王的伟大业绩。正如继承父道施布上下，定可永远保持上下千万年。大概继承先王的思想，也就是用来充裕后人的谋猷。所以当时经常追求世代相传的道德，保有民心。继承王位的，只恭敬地承继二王；给天下做出榜样的，只让万邦会信任。多次传世而后赋《车攻》而又歌《鸿雁》的贵族，将以为能复兴文王、武王的功勋。这难道不是一切遵循旧规的证明吗？而又怎能怀疑遵循先王的法规呢？

赵文楷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建中者，锡福之原；善制者，绥猷之本；观民者，设教之方；讲武者，安邦之要。桓宽《盐铁论》曰："修圣绪，宣德化。"言懋昭也。《淮南子》曰："放准循绳，曲因其当。"言法鉴也。《抱朴子》曰："运大钧乎皇极，开元楷以轨物。"言善俗也。贾谊《新书》曰："王者战义，帝者战德。"言振武也。是以郅隆之世，时几儆而损益精，文治昭而武功备。盖惟有纯一不已之心，以驯致夫久道化成之治，而后能昭宣元化，鼓铸群生，俾梯山航海之众，无不蹈德泳仁，而咸游于太和之宇宙也。

钦惟皇帝陛下，至德敷文，精心鉴古，遍教而会归有极，握算而揆奋兼权。固已德教成而政皆适俗，民志定而士尽知方矣。乃圣怀冲挹，当重熙累洽之时，而复切保泰持盈之计。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懋修之密，法古之精，与夫民俗之所以醇，军政之所以善。臣至愚极

陋，何足以语此？顾念泰山不辞土壤，河海不择细流，敢不敬述所闻，以效管窥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人心道心，肇阐虞延，帝王所以与天下相见者，心也。"而因及夫唐虞三代而上之圣学，此诚传心之要也。臣窃以为，自古帝王尝未废学。是故黄帝学乎大真，颛顼学乎绿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跗，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威子伯，文王学乎铰时子斯，武王学乎郭叔。此以知学之不可废也。夫学所以正其心，而心之用主乎敬。《尧典》一篇始终曰"钦"，元首兴歌，终以"钦哉"。其后禹之"祇台"，汤之"日跻"，文之"小心"，武之"执竞"，讵不与《尧典》相证明欤？唐虞以前，书缺有间。然而《文子》有神农之法，《新书》有神农之教。其最醇者，则有如《丹书》颛顼之训曰："敬胜怠者言，义胜欲者从。"《大戴礼》帝喾之文曰："博施利物，抚教万民。"推之武王诸铭，所谓安乐必敬，戒慎必恭者，皆足以见治法之全也。若夫《帝范》十二篇，成于贞观，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宋范祖禹约三皇迄宋代之治法为《帝学》八卷，真德秀本《大学衍义》为《心经》一卷，《政经》一卷。此数书者，皆能综贯王道，则又三代以下治术所略可见者。仰惟圣学高深，心德纯固，性命事功，同条共贯，生民以来未之有也。

制策又曰："治道有定而不可泥，其得失可得而言。"臣谨按董仲舒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夫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然而文质异用，风俗异宜。必泥古法而不顾天下之所安，强之以必从，持之而莫易，不几于刘歆、王安石之以《周礼》乱王下乎！夫井田、封建，先王本之以为治。然而汉仿封建而起七国，唐仿井田而限名田。岂封建、井田未善哉？亦以汉唐之世非唐虞三代而已。今欲强战阵者以车，责市贷者以刀，令人税者以绢，军有不淆，市有不纷，民有不扰者乎？又何论夫得失哉！夫唐之《六典》，即六官之遗也。今虽品秩考课之殊，而职官仍之熙绩。舜之九州，即万井之地也。今虽控制沿革之异，而土宇于以敉宁。诚使变通尽利，则凡刑法、食货诸大典皆可以少有因革，何必拘守其成法乎？此则治天下者之大要也。

制策又以道政齐刑,三代不废,欲使道德一而风俗同。此尤勤民之至意也。夫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坊记》数千百言，而皆有以此坊民之语，诚见夫民之不可不教也。故禁暴有官焉,左道有诛焉。太公之诛华士,孔子之诛少正卯,子产之诛邓析,良以稂莠不去，不足以安嘉禾也。夫奇邪禁则正士荣，保甲严则盗贼息,蠲贷普则民厚生,教诫谆则民正德。然而吏者,民之父母也。士者,民之表率也。吏而徒严科条,士而竞尚跅弛,则民安所观感乎?故汉制亭乡有三老、啬夫、游徼,所以辅风化而诘奸慝。凡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之人,以十月赠酒食。唐设里正,掌按比户课植农桑,检察非常。宋重保甲之法,明有《大诰》之颁,皆于治民之道兢兢焉。夫民非无良,亦在渐以化之而已。圣朝清和咸理,风俗敦庞,生斯世者,有不遵荡平之路也哉!

制策又曰:"兵所以威天下,实所以安天下",而详及汉、唐、宋、明之兵制。臣惟三代之前,兵制备矣。汉初南军以卫宫城,北军以卫京城,此京师之兵也。材官、楼船以待战,率更、践更为工役,过更、谪发为戍边,此郡国之兵也。武帝时,番上变为长屯;光武时,长屯变为远征,而兵制以坏。魏晋以后无足言者,惟宇文氏仿周制为六军,颇有大小相维之势。唐定府兵之制,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则二百六十一焉。平居无事,惟耕于野;有事命将帅之以出,事解则兵归于府,将归于朝,其制实为最善。张说乃请一切募士,长从宿卫更号矿骑。天宝之末,矿骑则又废矣。宋之兵制有四:曰禁兵、厢兵、番兵、乡兵。统计天下之兵,京师居其半。内外重轻,适得其当。其后厢兵既多,县官坐受其困,此孙洙、苏洵所以忧而议之也。明京畿兵约五十万,尽诸省之兵不能当其数。于谦汰其老弱,得胜兵十五万,改为十团营,各设都督统之,体统相维,号令归一。嗣后或废或置,浸易其制焉。且夫军不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管子》曰:"缮器械,选练士,为教服,连什伍,遍知天下审御机数。"此兵主之事也。是故稽其籍而实之,选其技而精之,鼓其气而进之,明其赏罚而激厉之,古之称善用兵者不越乎此。夫知兵之将,生人之司命也。郤谷以敦《诗》、《书》而为元帅。其后孙、吴有《兵法》,卫、霍有别

传。诚通其意，则钱文子之《补汉兵志》，曾公亮之《武经总要》，戚继光之《纪效新书》，皆可取而则之矣。

若此者：性道阐其微，损益昭其用，教养之泽，下周于九有，蒐狩之制，无弛于四时，于以茂扬宏业，溥畅祥和。猗欤休哉！盖亘千古而独隆者矣。臣尤伏愿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天德懋而弥切寅恭，政绩休而不忘考证。时雍既协，犹深型方训俗之心；治化已昭，益鉴容民畜众之象。慎修思永，熙载厘工，宏化式敷，德威遐播。由是上畅九垓，下溯八埏，握符阐珍，固纯常而凝宝命，则我国家亿载咸宁之庆，基于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为适中的准则，是上天赐福的根源。善于制定法度，是安抚谋略的根本。考察人民的动向，是设布教育的途径。研究武备，是安定国家的关键。桓宽《盐铁论》说："继承圣人的事业，宣扬仁德教化。"说的是发扬光大圣人的学问。《淮南子》说："模仿标准，遵循准绳，弯曲的也依准则而纠正。"说的是取法于明鉴。《抱朴子》说："运用重要手段去确立起最高准则，树立大楷模去规范事物。"说的是建立好的风俗。贾谊《新书》说："称王的人凭借正义而战，称帝的人凭借仁德而战。"说的是整顿武事。因此清平盛世，顺时慎戒而或损或益都恰到好处，教化天下政绩显著而武力威慑完备。大概只有专一不断进取的人，逐渐达到那长久守住治道和天下教化成功的政治局面，而后能显明大自然的原始生化，改变塑造天下众生，使翻越高山和渡海航行的天下人，没有谁不行进在道德的路上，没有谁不游泳在仁义的海洋中，而全都遨游在太平和协的盛世。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用崇高的道德普施文教，用尽心力以古为鉴，教化普遍而人民行动有准则，掌握胜算而文武并用。原已德教成就而政法适合民俗，老百姓思想安定而士人都懂得道理。但皇上胸怀广大，谦虚自抑，正当历代兴盛之时，又考虑保持国泰民安的长久之计，宣召臣下我等人来到朝廷，询问缜密的勤勉修养，效法古训的精微处，民俗醇厚的原因，军政完善的办法。臣下我愚浅鄙陋，

哪里有资格谈这些道理?但想到泰山不拒绝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挑剔小川细流,故能成其大的道理,敢不恭敬陈述臣下我的所见所闻,而献上管窥一得的想法吗?

恭敬地诵读皇上的制策,上面说:"人心道心,最先阐述于虞舜的朝廷,帝王与天下人相见的东西,是诚心。"而随之推及尧帝、舜帝和夏、商、周以上的圣学。这确实是传心的关键。臣下我私下认为,自古帝王未尝废弃学问。因此黄帝向太真学习,颛顼向绿图学习,帝喾向赤松子学习,尧帝向尹寿学习,舜帝向务成跗学习,大禹向西王国学习,商汤向威子伯学习,周文王向铰时子斯学习,周武王向郭叔学习。由此可知学习是不可废弃的。学习是用来端正心的,而心的作用以恭敬为本。《尧典》一篇始终讲"敬",君主作歌,用恭敬收尾!后来大禹的"祇台",商汤的"日跻",文王的"小心",武王的"执竞",难道不恰好与《尧典》相证明吗?尧帝以前,书籍残缺不存,然而《文子》有神农之法,《新书》有神农之教。其中最醇美的,就有如《丹书》上所载颛顼的训诫说:"恭敬胜过怠慢的就吉利,正义胜过私欲的就顺畅。"《大戴礼记》所载帝喾的话说:"广泛施恩使万物得利,抚绥教化万民。"推及武王诸铭,所说安乐必谨敬,戒慎必谦恭,都足以看出治法的完备。至于《帝范》十二篇,成于贞观年间,始为《君体》、《建亲》,终为《阅武》、《崇文》。宋范祖禹综括三皇至宋代的治理之法,撰为《帝学》八卷,真德秀据《大学衍义》,撰成《心经》一卷,《政经》一卷。这几种书,都能综合贯通王道,又是能使夏商周以下的治理之术大略可以见到的书。敬思皇上圣学高深,心德纯固,性理天命和事业功绩,都事理相通,脉络连贯,是自有生民以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的。

制策又说:"治理的办法有一定成式,但不可以拘泥,它的成败得失可以讲论出来。"臣下我恭谨考察,董仲舒说:"道之所往,是符合治理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它的具体部分。"作君主的人,有改变法制的名声,没有改变治道的实质。然而文和质有不同的作用,风俗有不同的表现情况。一定要拘泥古法而不顾对天下的适应性,强行遵循,坚持古法而不肯改变,不是和刘歆、王安石以《周礼》的招牌迷乱天下差不多吗?那些井田制、封建制,是先王根据当时社会实际制定

而作为治法的。然而汉朝模仿封侯建国制，却发生了七国之乱。唐朝模仿井田制而用来限制占田，却效果不好。难道封建、井田不好吗？只是汉唐之世不是唐尧虞舜夏商周的时代罢了。现在勉强要战阵的人用兵车，责成交换的人用刀币，让交纳赋税的用绢抵税，这样，军队有不混淆、市场有不纷乱、人民有不搅扰的吗？又怎么可谈得失成败呢？唐朝的《六典》，就是本于《周礼》的六官，现在虽然品位、考核不同，而职官仍因袭古代。舜帝的九州，就是古时万井之地。现在虽然疆域沿革不同，而国家借它而安定。真正使法治变通充分发挥作用，那么大凡刑法、食货等重要典制都可以略有因袭变革，为什么一定要拘守那成规旧法呢？这是治理天下的人必须注意的要务。

制策又因使用政法来引导人民，使用刑罚来整顿人民，夏、商、周不废弃，想使道德统一，风俗齐一。这是最勤于民事的最尽心之处。司徒修造六礼，用来节制民性，彰明七教，用来振兴民德。《坊记》数千百言，而都有防止人民犯法的话，确实可见人民是不可不教导的。所以禁止暴力有官吏，邪门旁道有诛杀的法律。太公诛华士，孔子诛少正卯，子产诛邓析，确是因为杂草不除，不足以使嘉禾茁壮成长。奇异怪邪被禁止了，那么正直之士就荣耀，保甲制度严密，盗贼就会消失。免税普遍，人民就生活富裕，教化诚善，人民就取正于德。然而官吏，是民之父母；士人，是民之榜样。如果官吏只是严格法律条文而无引导，士人而竞相放纵不羁，那么人民怎么能有好的观感呢？所以汉朝的制度规定亭乡有三老、啬夫、游徼，用来辅助风俗教化和盘诘奸人。凡是有品行修养好，能率领众人作善良之事的人，在十月就馈赠酒食。唐朝设立里正，管理农民每家每户从事农桑，检查考察非常事故的发生。宋朝很重视保甲之法，明朝还颁布了《大诰》，这都是对于治理天下之民的治道兢兢业业。老百姓不是没有优秀的，只在于潜移默化罢了。我圣朝清平协和，百事皆理，风俗质朴淳厚，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有谁不遵循坦坦王路呢？

制策又说："兵是用来威慑天下的，实际也就是用来安定天下的。"进而详细考察汉、唐、宋、明的兵制。臣下我认为夏商周以前，兵制已经完备了。汉初南军保卫宫城，北军保卫京城，这是京城的兵。

材官、楼船用来备战，掌知刻漏的率更、代人服役的践更是工役，雇役以代的过更以及谪发是戍边，这是郡国的兵。汉武帝时，轮次值役改为长屯。汉光武时，又把长屯改为远征，而兵制已经破坏了。魏晋以下不值得谈论它，只有宇文氏仿周制为六军，颇有大小相系牵制之势。唐朝设立府兵制度，全国分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有府二百六十一。国家平安无事，就从事农业生产；有战事就命将帅带兵出征；战事平定后兵仍归于府，将领归于朝廷，这种制度是最好的。张说建议全部召募兵士，把长从宿卫更号曰矿骑。天宝末年，矿骑则又废除。宋朝的兵制有四：叫禁兵、厢兵、蕃兵、乡兵。统计全国的兵数，京城的兵占一半。内外重轻，适得其当。后来厢兵渐渐增多，朝廷被其事所困扰，这就是孙洙、苏洵担忧而议论的问题。明朝京畿兵大约五十万，其数量超过各省兵的总数。于谦裁减兵中老弱，得精兵十五万，改编成十个团营，各设都督统管，体制统领连成套，号令归一。此后有时废弃，有时设置，渐渐改变了这种体制。至于军队不勤加训练，百不当一；练习后用兵，一可当百。《管子》曰："修缮器械，选拔训练兵士，对他们进行教导，搞好编制，全面了解天下用兵奥妙。"这就是用兵的人的重要事情。因此考核名册而查实兵数，选拔其中技术好的而使其更精，鼓励他们的勇气而使他们一往无前，宣明赏罚而激励他们，古时号称善于用兵的人也不超过这些。那些懂得用兵之道的将领，是掌握兵士生死命运的人。郤谷致力于《诗》、《书》而为元帅。其后孙膑、吴起著有《兵法》，卫青、霍去病著有别传。确能贯通其意，钱文子的《补汉兵志》，曾公亮的《武经总要》，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都是可以用来借鉴和效法的。

如上所阐述的问题：用性命天道阐述那精微，用因革损益阐明那作用。教化培养的沾溉润泽，周遍于天下九州。训练讲武的制度，一年四季不废弛。用以大大发扬伟大的事业，使国家上下普遍畅行祥和气象。这是多么美好啊！定然是千古以来未有而唯独兴隆的盛世之治了。臣下我衷心希望皇上于国家安定中更加寻求安定，于国家大治之中更加寻求大治，大德峻隆而更加关切恭敬谨慎，治理的业绩美好而又不忘记历史借鉴和考证。国家雍和祥吉已经融洽，还深切

关心规范训化民情民俗。政理教化已经昭明,更加鉴察宽容人民、厚养人民的情况。谨慎修养自己,考虑天命永在,努力整顿厘定百官,大化遍行,道德威仪远播。由此而往上畅达九天,往下贯彻八方。掌握国家符命而阐扬地纪,使天命永固而永保国家命运,那么我大清国运将亿万年安宁的喜庆吉祥,全奠基在此了。臣下我是草野之民、新进小生,不懂忌讳,触犯皇上尊严,不胜惶恐畏惧之极。臣下我恭敬地回答如上。

汪守和　殿试对策

汪守和(生卒年不详),字惟衣,一字巽泉,江西乐平人。嘉庆元年(1796)榜眼。历顺天乡试同考官、起居注官、江府学政、礼部尚书、权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其自幼读书,根底深厚,学问赅博,屡主文衡,颇得嘉庆皇帝信任。为官四十余年,以谦恭谨慎闻名。

臣对:臣闻圣学肇自执中,治道贵知体要。讲让型仁,臻四民于上理。安良整旅,绥六合于太和。《书》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易》曰:"中正以观天下。"又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盖其精神默运,常严翼于亦临亦保之余。而其法制周详,复勘毖于无怠无荒之际。于是性量邃深而涵养淳,政教修明而损益当,孝秀升而比闾益劝,步伐饬而防豫常周。天人协应,朝野蒙麻。古帝王抚五辰,贞百度,崇日新之德,丰茂世之规,用致祉祚流衍,纯嘏延洪,胥是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道隆位育,治懋登咸,固已集千圣之大成,立百王之大法,教养兼举而俗尽还淳,纪律严明而备先未雨矣。乃圣德渊冲,愈深《无逸》作所之念,弥切久安长治之图。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心性渊源,制度同异,以暨善俗卫民之大端。臣之椿昧,何足知此?顾幸际广思周逮之时,窃附先资拜献之义,敢不勉竭愚忱,缕陈管见,用效刍荛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人心道心,肇阐虞廷",而原本传心之功效于主敬。此诚帝王所以与天下相见之精意也。臣谨按二帝三王之治本于

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可得而言。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尧典》一篇始终曰"钦",尚矣。推之《易》占"乾惕",《诗》咏"小心",《曲礼》以"俨若"冠篇,《春秋》以"体元"为重,总与《书》言钦明,同此谨凛。夫道不外一心,心不外一敬。黄帝诲颛顼曰:"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又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颛顼之言曰:"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从。"帝喾之言曰:"德莫高于博爱人,政莫高于博利人。"武王诸铭,如席之四端、机鉴、盥盘、楹、杖带、履屦、觞豆、户牖、剑弓矛之属。其词如安乐必敬,慎戒必恭,敬祀皇天,敬以先时之属。大抵阐明《丹书》,归于皇自敬德而已。《帝范》成于贞观,唐太宗严饬躬阐政之几。《帝学》进于元祐,范祖禹为经筵讲官之首。《心经》、《政经》成于真德秀。《心经》大旨以正心为本,《政经》以经典论政之言为经,而杂引事迹以为之传。博征载籍,帝王之心法治法,直一以贯之焉。皇上聪明时宪,上迈唐虞。斟酌道德之渊微,肴核仁义之林薮,心如规矩,志如尺衡,古圣授受之原,俱以析其底蕴矣。

制策又曰:"治道有定而不可泥",因而详言其得失。臣惟《周书》所称"政贵有恒",盖本一定不易之理,以精运于纪纲法度之中,非谓泥古人之旧典,而墨守之也。《荀卿子》曰:"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君子审后王之道,论百王以前,考制度,慎宪章,虽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而因时制宜,实所以变通尽利。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自古已然。又何惑乎秦汉唐宋以来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之不能尽同也?若必胶守成辙,是古非今,则画井授田,亲侯建国,古来大经大法,孰过于是?乃汉起七国,唐限名田,慷慨复古,非不履迹求宪,转至烦扰无稽,国与民俱受其病者,岂成法之不效,亦以古今异宜故也。至于战之以车,泉之以刀,税之以绢,行于古不宜于今,其得失又不足与论矣。圣天子经纶天地,荣镜宇宙,极隆之轨,至治之休,虽羲、农盛烈,轩、项良规,炳炳烺烺,布在方策,曾何足以拟议于万一哉!

制策又以《礼》教坊民,而欲使道德一而风俗同。臣闻熙皞之世,

比户可封,民日迁善。《礼》称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闾里之日用行习,罔不与深宫之宵旰相关。故虽圣人在上,亦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任在司徒矣;而复有禁暴之官,严左道之律。盖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三代之隆德礼重而政刑不废者,无非冀斯世共归于正直荡平之路。如泥之在钧,金之在镕,惟甄者之所为、冶者之所铸耳。孔子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先圣名言,真致治圭臬矣。国家建中锡极,左绳右规,夹海宇以驰风,罄轮裳而受范。犹不以诳疑既泯,而宽奇邪之禁;不以奉行尽善,而弛保甲之规。民生已厚,犹阜利之;教诫已谆,犹茂正之。海隅苍生,万邦黎献,有不观感兴起,摩义渐仁,相与遵道遵路者哉!

制策又以"兵所以威天下,实所以安天下",而因及各代兵制。臣考《周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上地、中地、下地,别其可任者。或家三人,或二家五人,或家二人,此教练之数也。《司马法》所言,六十四井,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调发之数也。教练多则人皆习于兵革,发简则人不疲于征战,此古者用兵制胜之道也。汉兴,置材官于郡国,而京师有南北军屯。南军以卫宫城,北军以卫京城。其兵更调于民间,有事斯召以羽檄,无事斯劝以农桑。唐则诸府关内之置刺史符契之验,始未尝无统驭,其后法浸坏。张说请一切募士宿卫,号长从宿卫,又更号曰矿骑。天宝时,矿骑之法又坏,至诸府无兵可交,而后方镇之兵始盛。宋统外兵于枢密,总内兵于三卫。明设都督府于京师,设卫于畿甸,设指挥使司于四方,军士俱有定数。而日久就窳,乃汰其老弱,得胜兵十五万,改为十团营。嗣后或置或废,各营已虚。夫天生五材,并资民用,第必教习于平日,而后可致用于一朝。《易》曰:"师出以律。"孔子曰:"我战则克。"丈人之吉,肤公之奏,非幸邀矣。圣世文德武功,渐被中外,夫岂汉、唐、宋、明所可相提并论也哉!

凡此者:统壹圣真,恭德著焉。综核名实,品式昭焉。左契执而六辔和,慈卫修而百代利,协气嘉生,薰为太平。臣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

求安，运健行于不息，被化育于无疆，则我国家亿万载景祚之庥，基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学肇始于执中，治理之道重要的在于懂得政体的要害。提倡礼让，以仁为法式，使四方之民步入最好的治理境界。安定人民，整顿军队，绥抚天下到最好的太平盛世。《尚书》说："戒慎上天之命，时时保持警觉和注意苗头。"《周易》说："依据中和平正而考察天下。"又说："圣人对大道长久施用，而天下教化成功。"大概是圣人的精神潜移默化，时常在临民时如临深渊、保民时如履薄冰，而严肃恭敬；圣人的法制周密详细，又在不怠慢不荒戏的时候小心谨慎。因此性情、气量和胸襟宽大深邃，而涵养淳厚。政教修明而损益得当，孝悌优秀之人被选拔任用而邻里更加相互勉励，战法整饬而防备保持周密。上天和人间和谐而感应，朝廷和民间得到上天的嘉美。古时帝王顺应星象变化，使百事符合正道，使每日新进的道德更加兴隆，使盛世的法规更完善。致使福祚流传衍沃，大福延伸洪大，都是由于这些举措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道德隆盛，超过圣人，治理勤勉，胜过五帝三王，已经集聚了千圣的大成，建立了百王的大法，教化和抚养兼善，而民俗全都归于淳厚，纲纪严饬，法律严明，而豫先有备于不虞。但圣明的道德深厚又谦逊，更加深刻领会周公所作《无逸》的告诫意图，更加关切国家长治久安的计划，在朝廷里召见臣下我等人，而用心性渊源、古代制度同异以及怎样使民俗和善、卫护人民的要务来策试。臣下我浅陋，怎能懂得这些大事？但幸逢集思广益之时，私下依附先资拜献之义，敢不勉力竭尽愚诚，条陈管见，献上草野之人的见解吗？

恭敬诵读制策，上面说："人心道心，始闻于虞舜的朝廷"，而溯源传心的功效在于恭敬。这真正是帝王与天下人相见的精神所在。臣下慎予考察，二帝三王的治理是本于道，而二帝三王的道是本于心。得其心，那么道与治就可能讲论。精诚专一，守执中正之道，是尧舜禹递相传授的心法。建立中正之道和确立最高准则，是商汤、文王与

周武王递相传授的心法。叫做德、叫做仁、叫做敬、叫做诚，名称虽然不同而道理是一样的，无非是彰明这个心法的妙用。《尧典》一篇始终说“敬”，是由来已久的。推寻《周易》的乾卦“终日乾乾，夕惕若”，《诗经》歌咏“小心”，《曲礼》以“俨若”冠篇首，《春秋》经以体察初始为重，总之都与《尚书》说“敬明”，同样是小心谨慎。道不外乎专一其心，心不外乎专一恭敬。黄帝教诲颛顼说：“天在上，地在下，你能够效法天地，就能为民父母。”又说：“道如川谷中的水，它的喷出不竭，它的流行不止。”颛顼的话说：“恭敬胜过怠慢就吉利，道义胜过私欲就顺从。”帝喾的话说：“德没有什么比广泛爱人更高的了，政没有什么比广泛使人得利更好的了。”周武王的各种铭言，如坐席的四端，机鉴、盥盘、楹柱、杖带、履屦、觞豆、户牖、剑、弓、矛之类，其词如：“安乐必敬”、“慎戒必恭”、“敬祀皇天”、“敬以先时”之类，大抵阐明丹书，意归“皇自敬德”而已。《帝范》成于贞观之年，唐太宗亲自恭敬整饬阐述政要的精微。《帝学》奏进于元祐之年，范祖禹把它看作经筵讲授官的首要内容。《心经》、《政经》成于真德秀。《心经》的主要内容以“正心”为本，《政经》以经典论政的内容为主，而杂引故事作为解说。广泛征引典籍，帝王的心法、治法，也就贯穿统领起来。陛下聪明效法，往上超过尧舜，斟酌道德的深微，考察仁义的广博，心如规矩，志如尺度，古代圣人授受的渊源，都能分析，得其底蕴了。

制策又说：“治理之道有定规，但不可拘泥”，因而详细讨论其得失。臣下我考虑《周书》所称“政贵有恒”，大概根据一定不易之理，以其精神实质运用于纪纲法度之中，并不是说拘泥古人的旧典，而墨守成规。《荀子》说：“想要观察圣人的行迹，那么就观察成就灿然的地方。”君子审察后王的治道，论述百王以前，考制度，慎宪章，虽然殷因袭夏，周因袭殷，继承周朝典章制度而增加或减损，百世可知。而因时制宜，实是为了变通尽利的目的。五帝不同时，不相沿袭乐；三王不同世，不相因袭礼，自古已经如此，又何必被秦汉唐宋以来的官名改易，地理沿革，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的法规不能全同所疑惑呢？如果一定要墨守成规，颂古非今，那么划分井田授民，亲近诸侯，建立诸侯国，自古以来的大经大法，有哪些超过这两样？然而汉朝有

七国造反之祸，唐朝限制占田数量，慷慨恢复古制，并不是不遵循古制古法，反而烦扰不堪，国家与人民都蒙受其祸害，这难道是古代成法没效用吗?确实是因为古今情势不同的缘故。至于用车辆作战，用刀币作流通货币，用绢纳税，这些都行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它们各自的得失利弊是不值得讨论的。圣天子经纬天地，使宇宙大放光辉，最完善的法则，最美好的治理，即使是伏羲、神农氏的盛烈，轩辕黄帝、颛顼的良规显赫光明，载在法典策简上，又哪里能有资格去讨论它们有万分之一的可比之处呢?

制策又由于《礼》经教导防民，而想使道德纯一、风俗同一。臣下听说古代隆盛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可封赏，人民日渐趋善。《礼记》称说命太史陈述民歌而考察民情，命市官陈述物价以考察民众的意向好恶。乡间市井的日常用品、行为习俗，无不与皇宫的深切忧虑密切相关。因此，即使圣人在上，也忧虑天下之事，而未尝凭借高位权势享乐。修明六礼以它来节制老百姓的性情，彰明七教以它来培养老百姓的道德，责任在于司徒。而又有禁暴的官吏，强化肃清旁门左道的禁律。大概质朴叫做性，性没有教化就不能形成。人的欲望叫做情，情没有制度就不能节制。爵禄用来培养道德，刑罚用来威惩凶暴。夏商周崇尚道德重视礼制，而政令刑法不废弃，无非是希望这个社会一切归于正直平安的轨道。就如泥土在于陶钧的塑制，金属在于模具的铸造，只在于转动陶钧和制模人的主观所作所为罢了。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先圣的名言，真是实现天下大治的法则。我们大清国家建立了中正之道，赐给了最高原则，辅以准绳规矩，整饬天下，推行于全国，而使海内万民万物循规蹈矩。尤其不因为有人用诳言疑惑百姓、而放松了对奇说邪门的禁止；不因为奉行尽善，而废弛了保甲制度。老百姓已经富裕，还要使他们得到好处。教化告诫已经淳厚，还要努力使他们端正。一直到边远沿海地区的老百姓，万邦和民众，哪有不深受感染而磨砺仁义、接近仁德共同遵循王道的呢?

制策又鉴于"兵是用来威震天下的工具，实质也就是用来安定

天下的工具”，进而推及到各朝代的兵制。臣下我考察《周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上地、中地、下地，是区别他们充当兵役的义务。有的一家三人，有的二家五人，有的一家二人，这是参加教练的人数。《司马法》所说，六十四井，甲士三人，兵卒七十二人，这是可以调遣的人数。教练的次数多，那么人们都能熟习兵事，一旦调发，人们就不被征战弄得疲于奔命，这就是古代用兵克敌制胜的方法。汉朝建立，在郡国设置材官，而京城驻扎有南军、北军。南军保卫宫城，北军保卫京城。兵卒轮番从民间调集，国家有急就用紧急文书召集，国家无事就勉励他们从事农桑。唐朝则在诸府和关内设置刺史，并用符契对验，开始时未尝无统一驾驭，后来就渐渐败坏。张说奏请全部改为招募壮士来宿卫，称号为“长从宿卫”，又更号叫矿骑。天宝时，矿骑法又败坏了，以致各府没有兵可派遣，后来藩镇的兵开始兴盛起来了。宋朝由枢密院统领外兵，由三卫总领内兵。明朝在京城设置都督府，在畿甸设置卫，在四方设立指挥使司，军士的人数都有一定限额。以后时间长了就怠惰败坏了，于是就陶汰那些老弱疲病的人，得精兵十五万，改为十团营。此后有时设置，有时废弃，而各团营已经空虚了。天生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资，都资助人民使用。必在平常教练操习，然后可以使用于紧急时刻。《周易》说：“军队出动要有严明的纪律。”孔子说：“我军出战就要克敌制胜。”这表明长老人的吉利，大功的进献，不是侥幸得到的。圣朝文德武功，广泛覆盖中外，这难道是汉、唐、宋、明各朝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吗？

综计以上这些问题：统一于圣真，恭敬的大德彰明。综合审核名和实，制度品类昭著。执左券于手就如驾驭驷马，使六辔和鸣，慈爱仁义和武卫得到修明而使百世得到好处。和气蓬勃涌现，蔚为太平。臣下我恭敬希望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继续推行刚强有力的措施而不息，教化抚育万民而无止境，那么我国家亿万年大福祚的美好命运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是草野之民、新进小生，不知讳忌，冒犯皇威，不胜惶恐畏惧之极。臣下我恭敬地回答如上。

帅承瀛　殿试对策

帅承瀛(?~1840)　字仙舟,湖北黄梅人。嘉庆元年(1796)探花。屡迁侍郎,历吏部、礼部、刑部。典试广东、江西,督学广西、山东,所至以公正廉明闻名。道光元年(1821)授浙江巡抚,奏请盐政改归巡抚兼理,同时减少商人捐银,得到商民拥护。又修浚湖河,整顿海盐,赈济贫民,亦得民心。道光四年(1824)以丁忧去官,自此不复出仕,于道光二十年(1840)卒于家。

臣对:臣闻建中所以立极,法古所以绥猷,一道操同风之原,揆文兼奋武之用。《管子》曰:"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言懋修也。《春秋繁露》曰:"理往事,正是非。"言鉴古也。刘向《新序》曰:"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言乂民也。《鹖冠子》曰:"指天之极,与神同方。"言肆武也。古之圣人握镜临宸,履荡平而泯偏党,维时缉熙之体昭焉,化裁之宜妙焉,渐摩之治洽焉,训练之法详焉。然后知太平之朝,天人协应,酝化覃敷,于以上畅九垓,下泝八埏,而臻乎郅隆之盛者,有由然也。

钦惟皇帝陛下,学阐苞符,道光谟烈,迪吉康以从乂,播神武而遐敷。固已单心宥密,而治术攸隆;锡福会归,而德威丕著矣。乃圣德渊冲,勤求弥切,犹以传心、敷政、训俗、治军之要,进臣等于廷而策之。如臣椿昧,何足仰赞万一?顾当对扬敷奏之时,念先资拜献之义,敢不诵述所闻,以效刍荛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人心道心,肇阐虞廷。帝王所以与天下相见者,心也。"而因沿溯夫帝学心传之原。臣谨按蔡沈《书序》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而《尧典》以"钦"始,《益稷》以"钦"终。传心之要,主敬而已矣。禹之祇台,汤之圣敬,文之小心,武之执竞,此皆经训之粹,足相证明者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史迁谓百家多言黄帝。然《九经》、《八阵》、《星官》、《泰素》诸篇,杂出诸子,与神农之教见于计然,神农之法称于贾谊者略同。至若载籍微言,稽诸唐虞三代而上者,《吕氏春秋》黄帝语颛顼曰:"大圜在上,大矩在

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新书·修政语》引帝喾曰：“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丹书》黄帝颛顼之训曰：“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从。”《大戴礼》帝喾之文曰：“博施利物，抚教万民。”古帝王乘乾宰化，其保邦致治之原，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武王诸铭，自席之四端，以及户牖、弓剑，皆托物以自警。而安乐必敬，戒慎必恭，三致意焉。其词之兢业，为何如也！唐太宗《帝范》十二篇，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指陈事实，引经证史，具有条理。宋范祖禹《帝学》八卷，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宋代神宗。其言皆归本于健行不息。真德秀《心经》一卷，《政经》一卷，能约《大学衍义》之要，不均有合于帝王传心之旨欤！仰惟圣学高深，至德纯粹，诚统千古之心法治法而一以贯之者矣。

制策又以“治道有定而不可泥，然其得失可得而考。”此诚通变宜民之深心也。夫圣王之治天下，纲举目张，百度咸饬。而井田、封建为大经大法之所存，自秦开阡陌，置郡县，而良法遂废。有志复古者，未尝不思踵而行之。然如汉起七国，则分封者苟慕美名，本非唐虞三代之公。唐限名田，则定制者但知授田，亦无先王补助之法。善乎马端临之言曰：“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谮。”此其得失固甚较然也。若战之以车，如武刚偏箱诸制。泉之以刀，本诸九府圜法。税之以绢，晋唐皆有岁输之令。虽或取济一时，而后代有必不可行者矣。建官之法，成周渐备。唐沿六典，今犹其职。而品秩考课，以古证今，多不尽同。轩画万井，舜区九州。后世版图日廓，其控制沿革之殊，又非必矩规以求合。盖帝不相沿，王不相袭，而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惟在用古而不泥于古。诚得其意而神明之，将累代之刑法、食货、兵戎、礼乐诸典，与夫会要、典章、会典所厘具者，皆可损益折衷，以合人情而宜土俗，而久安长治之模在是矣。

制策又以道政齐刑，三代不废，而欲进斯民于礼教之治。臣考《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民而宾兴之，而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复有以考其德行，闲其邪僻。凡以使愚蒙者知所劝，而顽戾者知所惩也。《王制》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故虽在至治之世，不必不设禁暴之官，严左道之律，而所为司化导于未

发,严惩创于已萌者。奇邪有禁,而不至惑于谩妄之言;保甲有严,而无所容其奸宄之迹。以厚生则屡沛隆施,而蠲免之恩溥;以正德则求臻上理,而教诫之法详。治之以长吏,则乐防情而礼防伪,有以渐进于敦庞;董之以师儒,则贤得民而道得民,有以日生其观感。用以张仁让之闱,杜华竞之津,驯至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化穆三雍,人从五典,非独如士会在晋而盗迹为之潜移,孙叔相荆而惰民因以知惩也。我圣朝教泽涵濡,风俗醇□,敷天之下,不已臻时雍风动之休哉!

制策又曰:"兵所以威天下,实所以安天下",而询及汉、唐、宋、明之兵制。臣谨案周制有乡遂之兵,有丘甸之兵,即比闾族党,为伍两卒旅之法,即蒐苗狝狩,为步伐止齐之训,兵农不分,制诚善矣。汉初有南军以卫宫城,北军以卫京师,诚得居重驭轻、内外相制之道。唐置府兵,统练有法,更代有时,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将无握兵之重,兵亦未尝无事而食。其后番役更代,多不以时。一切募士宿卫,始号长从,更号矿骑,则又府兵之变法也。宋收天下精兵,列营京畿,以备防卫。其制有禁兵、厢兵、乡兵、蕃兵之目。自王安石变民兵为保甲,而兵制坏矣。明初设五府四十一卫,永乐时增七十二卫,设五军、神机、三千大营。于谦于三大营中选其精锐者,分立十营团,谓之团营,则亦简练而归于节制者也。夫《立政》称"克诘",而召公亦曰"张皇六师。"王者容民畜政,练其技则精而不苶,鼓其气则作而不竭,实其籍则不虞冗且浮。而凡钱文子之《补汉兵志》,宋曾公亮之《武经总要》,明戚继光之《纪效新书》,不皆可取以为整军经武之资哉!

若此者:持敬以宅心,镜古而出治,声教宏敷于暨讫,神威尽人乎怀柔,治道祎而协气流,猗欤盛哉!臣尤伏愿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帝德广运,而时切几康之廑;大猷允升,而不忘成宪之监。闾阎共跻熙雍,而弥殷于训迪;声灵已昭震叠,而尚诘其戎兵。主极端而天工亮,民风振而武功隆。湛恩庞鸿,中外禔福,因以聿迓天庥,诞膺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庆,视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为适中的准绳是确立最高原则

的基础,法古是安定天下的谋猷。统一治道就掌握了使风俗同化的源泉,搞好文教就同时发扬光大了武功的作用。《管子》说:"明察道的人为帝,通达德的人为王。"说的是勉励修养。《春秋繁露》说:"治往事,理正是非。"说的是以古为借鉴。刘向《新序》说:"治理天下,控御风俗,在于掌握最关键的东西。"说的是治理老百姓。《鹖冠子》说:"到达天的边际,与神明相同。"说的是演习武事。古时圣人执定大权而治理国家,畅行大道而无偏袒,于是光明的学问主体辉耀,化生裁制的措施适宜,以仁义潜移感化教育人的治法深入人心,训练军队的办法周详。然后就知道太平的朝代,天与人协和响应,隆盛的教化全都施行,因此往上畅达九天,往下溯至八方,而到达最高的盛治状态,是有其原因的。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学问穷尽河图洛书,道德谋略光大祖宗,开启吉祥安定而天下大治,播传神明英武而远近普施。确已殚心竭虑,宽仁静密,而治理之法更精深。赐给百姓幸福,使民众归到最高准则之下,道德威权伟大光明。但圣明的品德深厚谦虚,勤求更切。又用传心、治政、训俗、治军的重要问题,宣召臣下我等人到朝廷上进行策试,而臣下我极其浅陋,哪里能够赞助皇上万分之一呢?但正当集思广益之际,想到先资拜献之义,能不条陈所闻,以献草野之人的一孔之见吗?

恭读制策有这样的话:"人心道心,开始阐述于虞舜的朝廷,帝王能与天下之人推诚相见的东西,是心。"于是考索帝学心传的发源。臣下我谨敬考察,蔡沈《书序》说:"二帝三王的治理本于道,二帝三王的道本于心。"而《尧典》以"敬"开始,《益稷》以"敬"终结。传心的纲要,在于重视"敬"而已。大禹的"祇台",商汤的"圣敬",文王的"小心",武王的"执竞",这些都是经典训示的精粹,完全可以相互印证发明。《周官》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司马迁说诸子百家多谈黄帝。然而《九经》、《八阵》、《星官》、《泰素》诸篇,杂出于诸子,与神农之教见于计然的,神农之法被贾谊所称述的,大略相同。至于典籍的微言大义,考查唐尧、虞舜、夏、商、周以上,《吕氏春秋》载黄帝对颛顼说:"上天在上,大地在下,你能效法它,就能作老百姓的父母。"《新书·修政语》引用

帝喾的话说:“政教没有什么比诚更大的,治理人民没有什么比仁义更大的。”《丹书》载黄帝告诫颛顼的话说:“恭敬胜过怠慢的就吉利,正义胜过私欲的就顺从。”《大戴礼记》载帝喾的话说:“广泛布施,使万物得利,安抚教化万民。”古代帝王乘天道之正主宰万物,保有国家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根源,总而言之不离古文的载述就是对的。周武王的各种铭言,自坐席的四端,到门户、窗棂、弓弩、宝剑,都借物铭刻以自警诫。而安乐时必定恭敬,警戒谨慎时必定恭谦,对此一再用心致意。其语辞的认真严肃,达到了何种程度!唐太宗《帝范》十二篇,始为《君体》、《建亲》,终为《阅武》、《崇文》。指陈事实,引用经典,以史求证,都有条有理。宋范祖禹《帝学》八篇,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宋代神宗。其意都归本于像天那样刚健不息。真德秀《心经》一卷,《政经》一卷,能够概括《大学衍义》的精要,不是都有相合于帝王传心的义旨吗?恭念圣学高深,至德纯粹,是真正能够统括千古的心法、治法,而加以贯穿领会的人了。

制策又认为:“治理的方法有定式,但不可拘泥,然而它的成功与失败可以考察。”这真正是变通治法而使之符合人民的深刻用心。圣王治理天下,纲举目张,百事皆治。而井田制、封侯建国制为大经大法所存有。自从秦朝开阡陌,设置郡县,而良法于是就废弃了。有志于复古的人,未尝不想接踵而推行它。然而如汉朝恢复封建制,却有七国造反之乱。这是分封的人只仰慕封建美名,而本来就不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的公正分封。唐朝限制占田,是制定制度的人只知道授人田地,也没有先王的补助之法。马端临的话很对,他说:“想恢复封侯建国,是自己割裂自己的土地国家而招致纷乱争斗;想恢复井田制,是强行抢夺民田而招来怨恨愤懑。”这说明它的得失确实是很清楚的。如果用兵车来作战,如古代的武刚车和偏箱车等形制。用刀币制作钱,则是取法于周代的九府圜法。用绢帛纳税,晋唐都有岁输之令。虽然有的能救济一时之急,但后代有肯定不能实行的客观情况。建立职官制度,周代就基本完备。唐代沿袭《周礼》六典,现在还是那些官职。而品秩考核,以古证今,多数不尽相同。轩辕黄帝规划万井,舜帝区分九州。后世版图日渐扩大,那些控制范围、沿袭革除的不同,又不一定

要拘泥旧法而求契合。因为各帝不相沿，各王不相袭。而所称通达它的变化，使老百姓不疲倦，心领神会旧法而变化使用，各归原处使老百姓感到方便，只是在于取法古法而又不被古法所拘束。真正能得古法的精意而发明古制，有关各代的刑法、食货、兵戎、礼乐诸典，与那些会要、典章、会典所排列载述的，都可以减损增益斟酌考虑，用来切合当今人情而适应地方风俗，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就在这里。

制策又鉴于用政法来诱导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夏商周不废弃，而欲使老百姓进入礼教的治理之下。臣下我考察《周官》大司徒，用乡中三种方式教民而推举贤能之士，而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又考核他们的德行，防止他们的邪僻。目的是使愚蠢暗昧的人懂得鼓励，顽劣暴戾的人懂得惩罚。《王制》说："命太师陈述民歌以考察民情民风，命市官献价以考察老百姓的好恶。"因此，即使在大治的社会，不可不设禁暴的官吏，强化严禁邪僻的法律，这是为了教化导引于事故未发之前，严刑惩罚想触法犯事的人。歪门邪道有法可禁，而不至于使老百姓惑于诈骗虚妄的说法。保甲制度严格，而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就无处容纳。使人民富裕而不断地施布泽惠，普遍得到免除租税徭役的皇恩。端正德行而追求最高的治理境界，而教化训诫的法制详尽。由长吏治理人民，用乐舞防止情欲，用礼仪防止虚伪，这样有所依据而渐渐达到风俗敦厚。由师儒来督察人民，贤明的人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有道的人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样每日就会使人受到感染。用来张大仁义礼让的范围，塞堵浮华豪奢的津途，逐渐使天下同风，九州同步，教化在辟雍、明堂、灵台这三雍形成，人民遵从五典。不只是如士会在晋国，而盗贼因为士会才销声匿迹。不只是像孙叔敖在楚国为相，而怠惰的百姓因为孙叔敖而懂得惩罚。我大清圣朝教化恩泽深入人心，社会风俗纯朴厚道，普天之下，不是已经步入了社会安定详和、教化风行的美好局面吗？

制策又说："兵是用来威震天下的，实质也就是用来安定天下的。"进而询问到汉、唐、宋、明的兵制。臣下我谨慎考察：周朝的兵制有乡兵、遂兵、丘兵、甸兵，依据比邻的乡族构成车乘兵卒的军事编制，依据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狩猎活动形成操练步伐、整齐进退

的训练。亦农亦兵，这种兵制是确实很好的。汉朝初期设有南北军，南军保卫宫城，北军保卫京城。真正能够举重驭轻，使内兵外兵各得其所，各得其用。唐朝设置府兵，统辖训练有法度，按时更换戍守，国家有急就命将率兵出征，事定就各归原处。将领没有手握重兵的权力，兵士也未曾无事而耗费。后来轮番服役，多不按时。改用招募兵士宿卫，始称长从宿卫，更号矿骑，这是府兵制的变动方式。宋朝收聚天下精兵，驻扎京畿，以备防守。兵制有禁兵、厢兵、乡兵、蕃兵的名称。自王安石改民兵为保甲，兵制就破坏了。明朝初期设五府四十一卫，永乐时增至七十二卫，设五军、神机、三千大营。于谦在三大营中选拔精壮的兵士，分立十个营团，叫做团营。这也是简选精锐加强训练而便于控制。《尚书·立政》宣称："要能整顿好军队"，而召公也说："扩大六军。"帝王宽容人民，包纳政事，训练兵士的技击之术就会精湛而不倦怠，鼓励兵士的斗志就会振作不衰竭，检核兵士的名册符合实数就会不担心超员而虚浮。大凡钱文子的《补汉兵志》，宋曾公亮的《武经总要》，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不都可拿来作为整军经武的借鉴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心里以"敬"为主而保持不变，以古为鉴而制定出治理的办法，声威教化大布于已经控制的地界，神威深入远方人心。治道美好而协和之气畅行，多么地昌盛啊！臣下我更希望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帝王的道德广大深远，时刻殷切关注国家的安危，大谋允当，而不忘借鉴先王的成法。老百姓共享太平和乐，而训导人民更加殷切。声势威灵使人震惊已很昭彰，而犹加强军事。帝王的最高准则端正而上天命定的工作成功，民风振奋而武功隆盛。深恩浑然宏大，中外大福，随后受到上天的光宠嘉美，大受天福，而我国家亿万年无疆的长治久安就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是草野之民、新进小生，不懂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惶恐畏惧之极。臣下我恭敬地回答如上。〔赵振兴译〕

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

会试试题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殿试策问

[嘉庆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诞膺洪祚,统驭广轮。荷穹昊之佑申,缅祖考之彝训,兢兢业业,日昃不遑。恒思求帝王之法要,推修齐以至治平;挈刑赏之纲维,厘守令而宁黎庶。当生聚熙攘之后,虑稂莠之潜生;丰亨豫大之余,惧纷华之相耀。盖典学所以启化源,察吏所以培邦本;而预防奸匪,禁止奢靡,尤所以保泰而持盈,均不可不亟讲也。顾明作在乎朕躬,而得失则听诸舆颂。多士讲习有素,当深知学问经济之源流。又来自田间,见闻最切。其各抒所见,毋泛毋隐 ,毋摭拾陈言,虚陈无用之论,朕将亲览焉。

溯圣学之源者,必推"精一危微"十六言。然"允执厥中",实为治世之枢要。古帝王不空言心也,《易》为尽性至命之书,四圣人之微旨存焉。而六十四卦之《大象》中,如云"君子以",以者,用也,非皆切人事言乎?而好语精微者,顾皆引之于心。然与?否与?孔门一贯之传,曾子得之。《大学》一篇,帝王之全体大用也。条目中节,节各有其功力。而真德秀作《大学衍义》,乃略治平而不言,果操于一家之内,而国自治、而天下自平与?所谓帝王之学异乎儒生者,果安在也?

闾阎之休戚,恒视守令之贤否。顾守令之中,为民计者十不二三,为己计者十恒七八。其有情迫势逼,激而上陈者,或曰恐启刁风,虽知其有据,亦不可不薄惩。或曰恐激众怒,虽不尽得实,亦不深究。各执成见,牢不可破。其何术使两得其平乎?悃愊无华之吏,诚不病

民，然缓急或不足恃。强健有为之吏，诚足集事，然得志又或恣睢而横行。其何以各得其用乎？举劾不操之上官，非惟不持其柄不足以驱策群力；且君门万里，其长短何由上达？全委之于上官，其覆辙又一一可数也，其何以核其真乎？

天地之大，枭鸾并育，虽三代不能无奸民。奸民惑众，治之于已成，不如治之于未起。是诚然矣。然守土之吏，或轻忽视之，以为无害，或惧干谴咎，匿而苟安，故不能豫杜其萌也。惟是平时察之不严，则不免养奸贻患。察之太严，则胥役借此以扰民，或反激而生变。何术而使不枉不滥也？密相勾结，伏莽伺隙者，当必有信使之往来，其何以侦伺之与？非道非僧，非寺非观，无故聚集多人，必露形迹，其何以稽察之与？兵役难保不通贼，贼难保不诡充兵役，又何以辨别之与？此当今之切务，有所闻见，其具陈之！

风会所趋，人情争向，太平日久，踵事增华，则奢丽生焉。此虽物力丰盈，故能相夸耀。然积而不返，亦非撙节养富之道也。惟是车裘服饰之细，实不能物物而稽，亦不能人人而察。必一一为之禁止，琐屑烦扰，恐不可行。其何以酌其中与？冠昏丧祭，原有定制，然诗礼之族，或不尽循；里巷小民，尤不能尽齐。论者谓禁止靡丽，当自辨别等威始，辨别等威当自士大夫始。是或一道与？抑别有劝谕之术与？

以上四条，或理关学术之精微，或事切民生之利病，或为人心世道之防，或为利用厚生之本。多士通经致用，今当先资拜献之始，仁望谠言，冀资启沃。其咸体朕意，各抒嘉谟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因此君子拥有修己治人的大道，必定靠忠信来获得它，因骄傲奢侈而失掉它。

曾子说：谨慎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老百姓的德行就自然归于淳厚了。

孟子说：极力扩展善良的本心，就懂得人的本性了。懂得人的本

性,就懂得天命了。〔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承大位,统治着广大的国土。蒙受上天的一再保佑,缅怀祖先的彝言训诲。治事勤谨,兢兢业业,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常常想着要寻求帝王心法、治法的要义,研究修身、齐家直到治国、平天下等问题,提起奖惩大权这条纲维,厘定郡守、县令等官员的职守,以安定黎民百姓。因为处在生齿日繁、聚财日多、社会富裕、熙熙攘攘之后,耽心会暗暗的产生一些坏人;又因为时当《易经》上所讲的丰亨豫大的太平盛世,害怕人们以繁华盛丽的生活互相夸耀攀比。大概典学是导致教化的源泉,察吏是巩固国家基业的根本。而预防奸诈的匪徒,禁止奢侈浪费,更是保守成业和富强局面的重要措施。这些问题都不能不抓紧讨论。但是公开宣布政策由皇帝我亲自决定,而事情的得失成败则要听听大众的舆论。你们这些读书人经过长期的讲论研习,应当深知学问和经邦济世之事的源流。又来自田间,接近下层,见闻应该最为深切。希望你们各抒己见,不要泛泛而谈,不要隐讳真情,不要摭拾别人陈词滥调,陈献一些空洞无用的议论,皇帝我准备亲自审阅啊!

追溯圣学渊源的人,必然推求"精一危微"等十六个字,而其中的"允执厥中",确实是治国的关键所在。古代帝王是不空谈心性的。比如《易经》是将性命的道理阐述得最为透辟的书,四类圣人之道的精微旨意都包含在里面,而六十四卦的《大象》中,如说"君子以","以"就是"用"的意思,难道不是针对人事来说的吗?而喜欢谈论"精微"道理的人,却只是将它引向心里,这种做法是对,还是不对?孔门一贯的学派传授,后来被曾子得到了。《大学》一篇,把帝王之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内,用途很大。书中的条目排列合理,每条每节都有它们的功力。而真德秀所作的《大学衍义》却省略治国平天下的内容而不言,难道真的将修身齐家的事情搞好了,国家就会自治,天下就会自然平定吗?所谓帝王之学与儒生之学的不同,到底表现在哪里呢?

里巷平民百姓的冷暖忧乐,与郡守、县令等地方长官的贤与不贤很有关系。但是守令之中,为老百姓着想的十个中没有两三个,为自己谋利的十个中常常有七八个。有的老百姓为情势所逼,迫不得已向上级陈诉冤情。有的人说,这样一来恐怕会助长刁风。尽管他们知道百姓说的有根有据,也不可不给予轻微的惩罚。有的则说惩罚恐怕会激起众怒,尽管他们还没有完全弄清事件的真象,就马虎了事,不敢深究。这两种人各执己见,牢不可破。要怎样才能纠正这两种偏向,求得公平的解决办法呢?诚实可靠而不浮华的官吏,确实不会害民;然而一旦碰到紧急情况又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健有为的官吏,确实有魄力,会办事;然而一旦得志又会骄傲恣肆,横行无忌。要怎样才能发挥他们的长处呢?举劾之权如果不操纵在上级长官手里,那么,他不但不能掌握住权柄,不能驱使下级众人为之效力,而且老百姓与君王相隔万里,他们生活的忧乐休戚,又怎么能传达到君王的耳朵里呢?如果将举劾之权全部交给大吏,他们又会揽权横行,以往失败的倒证又一一可数呀。要怎样考察到事件的真实情况呢?

天地有这样的大,真可以说是枭鸾并育,好人坏人都有,就算是夏商周三代,也不能没有奸民。奸民惑众,如果等到坏事已经发生了才去处理,倒不如在它尚未发生时就采取措施进行防治。道理诚然是如此。然而守土的地方长官,有的人却忽视它,以为无害。有的人则害怕事情捅出去了会招来上级批评;因而隐匿祸乱而不上报,以期苟且偷安,所以不能预先杜绝坏事的萌芽。因此如果平时对坏人监视不严,则不免会纵容坏人,自留后患;倘若监察太严,则那些小吏、差役又会借此机会欺压扰乱民众,有时反而会激起民愤,导致发生变乱。有什么办法能使监视奸民的工作不流于冤枉也不至于滥察呢?那些秘密地勾结、潜伏在草莽之间等待机会作乱的人,必定有信使互相往来,有什么办法侦察他们呢?又不是道士,又不是僧侣,又不是寺庙,又不是道观,无缘无故聚集许多人,必然会暴露出可疑的形迹,要怎样去稽查他们呢?兵士役卒难保不串通盗贼,盗贼也难保不冒称兵士役卒,又要怎样才能辨别他们呢?这些都是当今的要务,你们要将自己的所闻所见,都详细地陈述上来。

社会风气出现一种趋向，人情一般都会争着赶风头。社会太平的时日一久，人们继承先辈的成就，并加修饰，总是不断提高，于是奢侈靡丽之风就产生了。尽管这是由于国家物力丰裕充盈，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能够互相夸耀；然而如果长此以往，积而不返，那也不是勤俭节约、保持富裕的办法。只是因为车马、衣裘、服饰这些东西品种琐碎，确实不能样样去验核，也不能人人去察他。如果对这些逾制行为一一予以禁止，则琐碎烦扰，恐怕行不通。要怎样才能考虑出一个折中合理的办法呢？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原来都有定制；然而以诗礼传家的士族阶层有的也不能完全遵守，那些里巷小民，他们对礼制的执行则更加不能整齐一致。论者认为，禁止奢侈靡丽之风，应当从辨别等级威仪开始；辨别等级威仪，又应当从士大夫开始。是不是只有这一条途迳，亦或还有别的劝诫晓谕的办法？

以上四条，有的在道理上关系到学术的精微，有的在事体上切中到民生的利病，有的则作为人心世道的防范，有的则是充分发挥物力的作用、使人民生活充裕的根本。你们这些读书人精通经书，学以致用。如今正当你们先资拜献开始的时候，皇帝我久久地盼望着你们正直的言论，希望你们能对皇帝我有所启发。你们都要体察皇帝我的用意，各人都把你们的好谋略抒发出来。

姚文田　殿试对策

姚文田（1758～1872）　字秋农，浙江归安（今吴兴）人。嘉庆四年（1799）状元。由翰林院修撰，累官至礼部尚书。其出阮元之门，与陈寿祺、王引之等为同年进士。师友濡渐，故亦究心汉学。所著《说文声系》、《说文考异》、《邃雅堂学古录》诸书早为儒林所重。且又推尊宋贤义理，深知时文之害。有《邃雅堂集》及《续集》传世。

臣对：臣闻明德为新民之本，厘工实熙绩之原，禁奸宄所以安善良，崇节俭所以保康阜。古帝王寅绍丕基，廑求上理，莫不敬修厥德，慎简庶僚，严匪僻之防，著奢淫之戒。是以万邦咸正，百度惟贞，国无

莠民,野有善俗。《诗》曰:"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书》曰:"任官惟贤才。"《周礼》司寇以诘四方,《王制》司徒以齐八政。盖主德纯而酝化敷,臣工良而庶务饬,民无邪慝而海宇乂安,家有盖藏而群生和乐。国之所以久安长治,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恃有此道耳。

钦惟皇帝陛下,缵膺大宝,振饬崇纲,本继志述事之心,广辟门达聪之益。固已万几兢业,刑赏兼施,九有会归,礼教咸被矣。乃圣怀虔巩,蓟菲不遗,体至善之无穷,惟迩言之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崇圣学、肃吏治、靖奸民、慎俭德之至计。臣之愚昧,何足以裨高深?顾当先资拜献之时,敬念古者敷奏以言之义,敢不竭所闻,以效刍荛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溯圣学之源者,必推'精一危微'十六言",而因博求"允执厥中"之蕴。臣以为"执中"与"用中"无二理也。《虞书》言"人心道心",先儒谓二帝三王之心法乃即二帝三王之治法也。盖道心存则用人行政皆得其正,而黎民致於变之休。人心祛则惰慢邪僻不能相干,而庶事著康哉之效。故如《周易》为尽性至命之书,而圣人系《大象》之词,则称"君子",称"先王",称"大人",称"后",称"上",亦以其著诸人事者言也。孔门一贯之传,实具《大学》一书。其始"格致",而终"治平",实节节各有其功力。后世言学而空语心性者,非笃论矣。宋真德秀作《大学衍义》,本为进讲之书,其意在于勖主德,故略治平不言。明邱浚又补成之,使谓能齐其家而国可自治,天下可自平,则义有所未备。昔人有德被一乡,化行一郡,及其身膺重任而誉望遂减者,岂非设施之有异哉!后世有裨主术者,如《大宝箴》、《丹扆箴》,或黜远声色,或分别贤奸,而总不外一中之用。则古帝王治世之枢要,洵非可以空言竟矣哉!皇上几康时敕,夙夜勤求,持小心抑畏之思,而见之于敷政□言之际。所谓以实心行实政者,又何难咸五而登三也哉!

制策又以"闾阎之休戚,视乎守令之贤否",而因求禁民安民之各得其宜,良吏能吏之各收其用,又推及于上官举劾之效。臣闻汉宣帝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又闻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

有余。是民之休戚，实在守令。守令为亲民之官，果能养之以惠，使之以义，民无不爱其上者。至于情迫势逼，激而上陈，则顺之既易启刁风，惩之又虑干众怒，几无善术之可施矣。故欲杜其萌，则莫如使之爱上。欲民也爱上，则必先予之以可爱。至于安静之吏，缓急不足恃，强健之吏恣睢，又易行欲，求其各尽所用，则又在人地之相得。昔龚遂、黄霸、朱邑等以仁厚用而境内治，张敞、赵广汉、尹翁归等以强健称而境内亦治，其所处之地异也。若夫举劾之权，不得不操之上官，上官之贤否，又在于任用之得失，是黜陟所必慎耳。皇上自亲政以来，孜孜以澄叙官方为要务。大吏能体此以率属，守令能奉之以自行，又何有闾阎之不并登于康乂耶！

制策又以当今之切务在于奸民，而欲求治之于未起。臣以为民虽至愚，未有不爱其身家者。其或致激而生变，则必其衣食匮而生计竭也。治平日久，户口滋丰，生齿繁则财力难给，故必先使其富，而后民兴于善。今守土之吏或不然，任意掊克，虽有失所而不顾恤，则众怒之势渐成。守土者知其有是而惧干谴咎，则隐忍而苟安。奸民见其罔所作为，愈肆意藐法而无所畏忌。于此用侦伺之法，则党与未易动摇。恃稽察之勤，则胥役转滋扰累。求辨别之道，则兵役皆非可深恃之人。故已成而治之，其势实难。而欲治之于未起，亦非能以权术御也。宋臣苏轼有言："任法不如任人。"窃以为吏治肃而民自宁，故探本之图仍在察吏。至于防民之道，盛世所不废。《王制》有左道之诛，《周官》有奇邪之禁。示之以义而民知向方，怵之以刑而民知畏罪。且必先使之遂其生，而民愈有以自爱。所谓治之于未然者如此。今墨吏日就剔除，当必有实力行之而获效者矣。

制策又以"风会所趋，人情争向；太平日久，踵事增华，则奢丽生焉"，因思有以禁谕之，此诚撙节养富之要道也。臣闻《逸周书》云："不为骄侈，不为靡泰。"其戒劝诚在有位者。然风俗之攸关，亦即在是。物土之所产，民力之所人，省啬而用之，则积久可以有赢；一日而耗之，则竭蹶犹将不继。故奢丽之习，不可不大为之防。然车裘服饰之细，必一一为之禁止，则烦扰而民必有所难安。冠昏丧祭之礼，既事事示以等威，更琐悉而民亦难于遍喻。此诚宜有以善其用者。要之

上行下效,其权实在上。王者不宝金玉,则捐金于山,沈珠于渊矣。齐桓公好衣紫,则国俗为之变矣。《礼记》云:"国奢则示之以俭。"士大夫以奢丽相尚,而欲使小民之胥安敦朴,其势必不能。士大夫以恭俭相高,而犹有小民之过事纷华,其意且不适,则不待禁止劝谕,而可以日返于淳者。我朝法制周详,民知向化,惟因物产丰豫而风俗渐奢。诚示之以撙节之方,则淳朴可复,而民生益阜矣。

凡此者:典学为致治之基,择吏握安民之要,正人心以维世道,爱物力以裕民资,体用兼该,内外咸理,实治道之至大者。臣尤伏愿皇上大德日新,九功时叙,治平奏而不忘夫敬畏,举措当而益慎于登崇,庶民悉趋于驯良,海内愈跻于康裕。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在是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彰明德行是使老百姓面目一新的根本,治理百官实为事业兴盛的渊源,禁止犯法作乱是用来安抚善良人的方法,崇尚勤俭节约是用来保持安康富裕局面的措施。古代帝王恭敬地继承伟大的基业,殷勤地追求最高的治理,没有哪一个不是恭敬地修养他的德行,谨慎地选用所有的僚属,严格地防范行为不正当者和邪僻的人,彰明禁止奢侈淫逸的戒令。所以全国各地的人行为都很规范,各种事务都能正确处理,国都没有奸恶之民,郊野亦有善美风俗。《诗经》上说:"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尚书》说:"任官惟贤才。"《周礼》记载说:"司寇以诘四方。"《礼记·王制》说:"司徒以齐八政。"大概君主的德行纯正而隆盛的教化得以广施,臣僚良好而各种事务得以整饬,老百姓中没有邪恶之人而天下太平,家家都有储蓄而百姓生活和乐。国家之所以长治久安、保住宏大名声而常常成为称扬之首的原因,就是依靠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继承大命,整饬宏纲,本着继承先君遗志、遵循前人事业的雄心,广辟言路,多方听取意见。本来已经万机咸理,兢兢业业,刑赏兼施,九州会归,礼乐教化遍施广布了。然而陛下圣怀虔诚认真,对任何细小之事都挂在心上,体念最完善并无止境,连浅近之言都加以考察。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而以崇圣学、肃

吏治、靖奸民、慎俭德方面的最好计谋进行策问。臣下资质愚昧，何足以对皇帝陛下渊博高深的学问有所裨益?只是正当先资拜献之时，敬念古代"敷奏以言"的大义，怎么敢不竭尽所闻以效献草野之民的千虑一得呢!

恭读制策有这样的话："溯圣学之源者，必推'精一危微'十六言"，因而广博地探求"允执厥中"的义蕴。臣下以为"执中"与"用中"理无二致。《虞书》上说"人心、道心"，先儒谓二帝三王之心法亦即二帝三王之治法。大概只要道心存在，那么任用人才、推行政治举措都会正确，而黎民百姓都会达到受教化被转变的美好效果。危险不安的人心被去除了，则懒惰、怠慢、邪僻等坏习惯不能干扰人的思想，而各种事情都能取得像古书上载录的那种"康哉"的效果。所以如《周易》为尽性至命之书，而孔子圣人给它加上《大象》之词时，则称"君子"，称"先王"，称"大人"，称"后"，称"上"，也是因为它是体现在人事上才这样说的。孔门一贯的学术渊源传授，实际上都包括在《大学》一书里。此书从格物致知开始，而终于治国平天下，确实节节各有它的功力。后世那种讲学问却空谈心性的人，不是确当的结论。宋人真德秀作《大学衍义》，本为给皇帝进讲之书，其用意在于勉励君主的德行，所以略去治国平天下而不言。明代邱浚又将这两项内容加以补充，使那种认为能齐其家而国家可以自治，天下可以自然平定，则显得含义尚未完备。以前有善德施布于一乡，教化兴行于一郡，等到他亲自担当重任时，其名誉身望就减退了的人，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实际从政能力不如他的声望之高吗? 后世有对君主统治术有裨益的书，如《大宝箴》、《丹扆六箴》，有的讲摈弃疏远声色狗马，有的讲分别贤否忠奸，而总之离不了一个"中"字的实际运用。那么，古代帝王治世最为关键之点，确实并不是几句空话就可以讲透、可以讲完的。皇上为政谨慎小心，时时考虑国家的安危休戚，早晚孜孜以求，勤勉不懈，保持着"小心抑畏"的思想，而体现于布政以言的实际行动。这正是前人所谓"以实心行实政"，置身于比隆五帝之盛、跻登三王之列，又有什么难处呢!

制策又以为"闾阎之休戚，视乎守令之贤否"，因而寻求禁止奸民

与安抚良民各得其宜、良吏和能吏各得其用的措施，又推而及于上级长官举劾的作用等。臣下听说汉宣帝说过这样的话："平民百姓之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处理得好。与我共同维持这种好局面的，在概就是优秀的二千石地方官吏吧！"臣下又听说：平和安静的官吏，至诚无华，政绩日计虽然不足，月计却有很多。这说明老百姓的休戚，实在决定于郡守和县令等地方长官。守令身为亲民之官，确实能够以恩惠养民，以大义使民，则老百姓没有不爱他们的长官的。至于那些由于情势逼迫而上诉的人，如果顺从他们则容易开启刁风，如果惩罚他们则又担心激起众怒，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可想了。所以如果想要杜绝小民激而上诉的萌芽，就没有能使老百姓亲爱长官更好的了。要使老百姓亲爱长官，那长官就一定要先让他们有可爱之处。至于平和安静的官吏，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不能解决问题；强健有为的官吏骄恣放纵，又容易逞欲。要想使这两种官吏各尽其用，则又在于根据不同地方的需要任用不同的人。以前龚遂、黄霸、朱邑等人因为仁厚发挥了作用以至境内太平，张敞、赵广汉、尹翁归等人以强健著称，而境内也得到了治理。这就是根据不同地方的需要而任用了不同特长的人。至于举劾之权，不得不操纵在大官手里；而大官的贤与不贤，又在于任用谁当是否得当，这是对官吏进行考课升降时所必须慎重对待的。皇上自从亲政以来，孜孜不倦，把澄清吏治、整顿官方作为要务。大吏们能够体会 ，意去率领他们的下属，守令们能够遵奉圣旨搞好自己的工作，又怎么会有民间间巷不达到太平安康的呢！

制策又以为，当今最急切的任务在于治理奸民，而想要在奸民没有闹事时就加以治理。臣下以为，老百姓尽管最为愚昧，也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有的人由于激愤而发生变乱，那也一定是因为他们衣食匮乏而生计无望而造成的。天下承平日久，户口越来越多，人口繁殖则财力难以供给，所以必须首先使老百姓富起来，然后他们才会兴善趋良。现在有的地方长官却不是这样做的。他们任意聚敛，压迫剥削老百姓。尽管有的人被害得流离失所，他们也毫不顾恤。这样，老百姓的愤怒势必逐渐形成，积压在胸。那些贪官污吏知

道是由于这种原因而造成民众上诉和起事，因而害怕事情闹大了会招来谴责和查办，于是极力含隐，以期苟且偷安。奸民见他们无所作为，束手无策，于是肆意妄为，藐视法规而无所畏忌。对于这些人如果采用侦查的办法，他们的党羽就不易动摇；如果对他们勤加稽查，那么吏胥、差役反而会借此机会滋扰民众。如果想要寻求分辨奸民的方法，那么兵丁和差役都不是完全可靠的人。所以如果等到奸民已滋事才去治理，事实上是困难的。而要想在他们尚未起事时就加以防治，那也不能靠权术去驾驭他们。宋朝的臣子苏轼有句话说："任法不如任人。"我以为只有吏治整肃了，老百姓就会自我安定。所以探求本源的办法仍然在于察用官吏。至于防民的办法，即使是太平盛世也不能废弃。《礼记·王制》有关于"执左道以乱政，杀"的记载，《周官》上有关于"禁其奇邪"的记载。向老百姓晓以大义，他们就知道归向正义；向老百姓加施以刑罚的威严，他们就知道畏罪。况且必须先使他们得以生存下去，老百姓才会更懂得自爱。所谓防患于未然，就是这样做的。如今贪污的官吏一天天被清除，肯定会有一批官员尽力干实事而获得效果的了。

制策又以为"风会所趋，人情争向；太平日久，踵事增华，则奢丽生焉"，因而想着要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和晓谕，这确实是勤俭节约、保养财富的一条重要途径。臣下听说《逸周书》上讲："不为骄侈，不为靡泰。"其劝诫作用确实是针对有权位者说的。然而社会风俗所关联到的问题，也是在这一点上。土地上所出产的东西，靠老百姓的力气所换来的收入，如果节省着用，时间一长就可以有盈余；如果一下子将它们消耗掉了，物资就会匮乏，并且不能接续下去。所以奢侈华丽的习俗，不可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然而车马衣裘服饰等细小项目如果一定要一一为之禁止，则十分繁琐纷扰，而老百姓必定不会习惯；冠、婚、丧、祭等礼节，既事事规定了等级威仪，则更为琐碎，而老百姓也难于遍加晓谕。这确实应该有一种善于处理这类事情的方法。总之，上行下效，起决定作用的实际在上面。帝王不看重金玉，那就会将金子丢弃在山上不开采，将珠玉沉入到深渊中不取用了。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人们跟着效仿，国家的风俗为之一变。《礼记》

说:"国奢则示之以俭。"士大夫以奢侈华丽互相夸耀,而要想使小民安于敦厚朴实,情势肯定是不可能的。士大夫们如果以恭敬俭朴互相崇尚,而还有小民过份地追求纷华盛丽,在他们的心里其实都不会那样去想的。这也就用不着对奢侈之风进行禁止和劝诫,人们就会一天天返回到淳朴节俭上来的。我朝法制周密详备,老百姓知道向往归化,只是因为物产丰饶而风俗便渐渐变得奢侈。假如真的能够告诉老百姓勤俭节约的方法,淳朴的风气就可以恢复,而民生会越来越富裕了。

像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典学是国家达到治理的基础,择吏则抓住了安民的要务,正人心以维系世道民风,爱物力以丰裕民生资财。体用兼备,内外皆理,实在是治道中最大最好的。臣下尤其希望皇上大德日日更新,六府三事等九功都安排得更好,四海共奏太平而不忘敬畏天命,人事安排适当而更慎于对官吏的进用推荐,庶民都争作温顺善良之人,四海愈登于安康富裕。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就在这里了。臣下是草茅之民,新登科第,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恐惧颤抖,几致跌倒。臣下敬答如上。

苏兆登　殿试对策

苏兆登(生卒年不详)　字晏林,号朴园,山东沾化人。嘉庆四年(1799)榜眼。次年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九年,补浙江道御史。十三年,授江西南安府知府。十五年至十九年,先后充军机章京,迁户部郎中。是后又几次出任地方官,终福建按察使。

臣对:臣闻建极者锡福之原,考吏者制治之本。诘奸慝而刑暴乱,所以除莠安良。祛奢侈而安淳朴,所以厚生利用。《说命》曰:"念终始,典于学。"言逊志时敏,厥修乃来,以为建中出治之基也。《舜典》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言吏治审而邦本固,斯郅治成也。《易》曰:"屨校灭趾。"言预防奸匪,小惩而大戒也。又曰:"节以制度。"言法禁明于上,俭德昭于下也。古圣本几康敕命之精,成荡平归极之治,

百工允厘，庶绩咸熙，所由道德一而风俗同，阴阳和而万物得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符广运，道协重华，体元化以同天，溥至仁以育物。固已万几咸理而庶官无旷，顽民胥化而汰俗不生矣。乃圣怀冲挹，时切持盈保泰之忱，弥深思艰图易之意。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心学治法、饬官、弭盗、维风之要。臣占毕庸愚，何足以语此？顾幸际嘉言罔伏之时，窃念拜献先资之义，敬承清问，下逮刍荛，敢不述所诵习，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溯圣学之源，必推'精一危微'十六言。然允执厥中，实为治世之枢要"，而因及修齐治平之理。斯诚内圣外王之要旨也。臣惟帝王之学，与儒者同其理，而不同其事。《书》别人心道心，盖心本虚灵，以有知觉，而或生于形气之私，故危殆而不安。或源于性命之正，故微妙而难见耳。"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由此而蕴之为德行，发之为事业，无过不及之弊焉。故心法实治道之总，非好语精微而不复求诸实事也。《易》中六十四卦之《大象》皆云"君子以"。以者，用也，即人事言者也。而或尽引之于心，则岂以《易》为尽性至命之书，而不及事功之实乎？夫离心性而语猷为，则或成杂霸苟且之术；舍事功而谈性道，则或开虚无淡泊之风。《大学》一篇，王者之全体大用备矣。真德秀作《大学衍义》，略治平而不言，彼以国与天下不外一家之理，而政教未详，措施未备，不已疏乎！我皇上君师兼体，锡极同原，本末咸赅而著止善之功，精粗皆尽而用新民之极，诚足绍往圣之道统，而追隆古之治理矣。

制策又以"闾阎之休戚，恒视守令之贤否"，而欲有以核其真。臣窃以郡守职在董率，州县职在亲民。守令而惟惜身家，不思利民，则必使民情迫势逼，激而上陈。刁风固不可长，众怒亦岂可犯乎？欲无罪守令，难矣。夫悃愊无华，循吏之治也；强横暴戾，酷吏之为也。过于苛刻，则有束湿之患，而民不安其生。过于曲谨，则有丛脞之忧，而民或玩其政。欲两矫其弊，宜详考课之法。欲考得其实，宜先择大臣之任。民之安不安，令之治不治，所由觇也。政简而俗清，政勤而民和，均宜署上考；政虽举而民不得者，为中下；若夫政弛而民困，是两

无足取也，署下考宜矣。以此察守令，而必择大吏以督率之，核察之。大吏靖共尔位，无欺君罔上之私，则小吏亦不敢欺其长，以虐其民。日计不足，岁计有余，民怀其上如父母师保。无强健有为之概，实缓急足恃之人。而自下讼上之风不禁而自止，宁忧民隐有不上达者哉！皇上轸念黎元，慎简僚吏，官箴肃而民怀畅，风气蒸蒸日上矣。

制策又曰："天地之大，枭鸾并育，三代不能无奸民"，而必欲杜其萌而察其奸，诚抚民之急务也。臣考《虞书》命皋陶以寇贼奸宄，《周官》有司寇士师掌八成，曰邦贼、邦盗。外有野庐氏，内有修闾氏若司厉，所以防盗者严矣。守土之令，苟平时视为无害而察之不严，则不免养奸贻患。而或察之太严，则又足以扰民，恐其激而生变。此吏之不实心任事，故不枉不滥，难也！夫致盗有由，察盗有方，勾结伺隙，必有信使往来，此侦伺之有其间也。无故而聚集多人，此形迹之有可据也。善变其俗，精简其众，至于兵以威之，而兵役必不至于通贼，贼必不得充兵。师出以律，简阅必详也。昔有汉宣帝遣太守而听便宜从事，周世宗置义营而使鸣金建鼓，诚弭盗之良术。他若韩延寿之治颍川，尹翁归之守扶风，龚遂安牧养而使卖刀买犊，贾琮选良吏俾各安其资业。或善招致之术，则如张纲之单车就道；或用不测之威，则如李崇之村置鼓楼，虞诩之绥缝擒获。相机而动，固视乎弭盗者之才识矣。欧阳修论御盗之事有四，总之以去冗官、用良吏，使不起为盗，尤为探本之论也。圣天子设奇邪之禁，严左道之诛，选帅以除奸邪，择吏以安善良，使邪说不得诬民，各安耕凿之天，不足媲唐虞之治哉！

制策又以太平日久，奢丽生焉；积而不返，非撙节养富之道。臣考先王之治，必立制度。车裘服饰之细，即为耗费物力之端。冠昏丧祭之仪，须有恪谨遵守之实。乃诗礼之族不能循分，闾巷小民何能尽齐？是惟严别等威自士大夫始，而民之服用不使逾限。遍责有司，明示天下，不待物物而稽，人人而察，而民自不敢陨坠典法以自取罪戾，可以长享安平之乐矣。或以琐屑扰民为忧。夫物有限度，天下之欲者十之七，不欲者十之三。有法以齐之，则不欲者亦安于礼之宜然，分之当然，而不以为苛。令行禁止，莫之敢违也。皇上勤求治理，先崇节俭，天下之人孰敢矜于奢靡哉！

凡此者：夙夜基命，仪型之所以孚也。官方澄叙，黎庶之所以安也。奸恶除而仪制定，民风之所以日醇也。统天人而建中，汇古今而成治，百官奉令承教，庶民食德饮和，猗欤休哉！而臣尤伏愿皇上慎宪省成，安益求安，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建立最高准则是赐福的源泉，考课官吏是筹划大治的根本，诘治奸诈邪恶之人而处罚暴乱者是为了除暴安良，去除奢侈之风而安抚淳朴之民是为了使人生活富裕并物尽其用。《尚书·说命》讲："念终始，典于学。"是说帝王志虑谦虚，又时时努力学习，其品德修养的完善就自然实现，以此作为建立大中之道和施行治国的基础。《舜典》讲："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是说吏治明审而国家根本就牢固，这样至治的局面就形成了。《易经》上讲："屡校灭趾"，是说预防奸匪，稍加惩治而进行很大的惩戒。又讲："节以制度"，是说上面的法制禁令明确，下面老百姓的勤俭品德也就明显形成了。古代圣王根据居安思危、重视天命的精神，成就了坦荡太平、万民都归顺最高准则的大治盛业，百官都得到治理，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由此道德纯一而风俗相同，阴阳和谐而万物各得其所。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圣德和唐尧一样广大深远，道术协应虞舜，体悟元气化生以同于上天，普施至仁以抚育万物。本来已经是各项政务都得到治理，百官之职全无荒废，顽民都得到感化而汰侈之俗不再产生了。然而陛下圣怀谦挹，时时热切地想着如何保守成业和太平局面，越发加深思艰图易的想法。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而以心学治法、饬官、弭盗、维风等重要问题进行策问。臣下只知读书吟诵，平庸愚昧，怎么能谈论这些问题？只是臣下幸而碰上这个嘉言善语没有被埋没的时代，又恭思先资拜献的大义，敬承圣上询问，下逮草野之民，岂敢不陈述自己平素所诵习的一些东西，以献上管窥蠡测的一点赤忱之情呢！

恭读制策有这样的话："溯圣学之源，必推'精一危微'十六言，然'允执厥中'实为治世之枢要"，因而推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道理。这确实是"内圣外王"之治的最重要的内容。臣下想,帝王之学与儒者之学道理本是相同的,而所要完成的事业却不相同。《尚书》将人心与道心分别开来,大概在于人心本是空虚的灵魂,因为有知觉而从形气的私处产生出来,所以危险而不安。道心则来源于性命的正面,所以它微妙而难见。"精"是察于人心和道心二者之间而无杂念。"一"是要坚守本心的纯正而不能偏离。由此而蕴积起来便成为德行,抒发出去则成为事业,没有超过或赶不上正确标准的毛病。所以心法实际上是治道的总合,并非只是喜欢空谈"精一危微"之理而不再求之于实际事功。《易经》中六十四卦的《大象》都说"君子以"。所谓"以",就是"用",也是就人事而言的。而有的人将这一切都引入到"心性"的范畴,那岂不是以《易经》为尽性至命之书,却反而不涉及事功的实际作用吗?如果离开心性而谈谋略和作为,则有时会成为霸道王道杂用的马虎苟且之术。如果丢下事功而空谈性道,则可能会开启虚无谈泊的风气。《大学》一篇,包括王者之术的各个方面,用途很大。真德秀作《大学衍义》,略去治国平天下而不言。他认为国与天下不外乎一家之理,因而对于政治教令不详述,各项治国措施没有具备,不也太疏略了吗?我们皇上君师兼体,锡极同源,本末皆备而彰显至善之功,精粗皆尽而用新民之极,确实足以继承以往圣王的道统,赶上和超过往古的治理了。

制策又以为"间阎之休戚,恒视守令之贤否",而想要考核他们才能和治迹的真实情况。臣下愚意以为,郡守职在督率属吏,州县官则职在亲近民众。作为守令如果只是顾惜身家性命 而不想想老百姓的利益,那就必将逼使老百姓情势窘迫,激而上陈。刁风固然不可助长,众怒难道就可以触犯吗?想要不归罪于郡守、县令,实在难啊!至诚无华,这是循良之吏的治民方法;强横暴戾,这是酷烈之官的所作所为。过于苛刻则有非常严急的害处,老百姓不得安生;过于小心谨慎则有繁杂琐碎的忧虑,老百姓可能就轻视政令。想要纠正这两个做法的弊病,就应该详细制订好考核制度。想要使考核符合实际情况,就应该首先选择好担任大吏的人。民生是不是安定,政令是不是有效,以这点上便可看出。政令简约而风俗清正,为政勤勉而民众和

睦,这样的官吏应该署上考的等级;政令虽然得以实行而民众却不和睦,应署中下考。至于政令废弛而民众贫困,这样的官员可以说得上两无足取,给他署个下考就行了。按这个标准来考察守令,就一定要选择好的大吏来督率他们,核察他们。大吏若能安静恭谨,恪尽职守,没有欺君罔上的行为,那么小吏也不敢欺骗他们的长官,而虐待他们的百姓。这种官吏日计虽不足,岁计却有馀。民众怀念他们的上司如同父母师保。那些没有强健有为的气概的官吏,实际上却是在紧急情况下足以依靠的人。而自下讼上的风气不禁而自止,难道还用担心民间的痛苦不能上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吗?皇上辗转思念黎民百姓,谨慎地挑选僚属官员,吏治得到整肃,民众心情舒畅,纯厚的风气已经蒸蒸日上了。

制策又说:"天地之大,枭鸾并育,三代不能无奸民",而一定要杜绝它的萌芽,察明它的奸谋。这确实是安抚老百姓的紧急事务。臣下考察《虞书》上说,帝命皋陶去惩治外贼内奸。《周官》上有司寇、士师掌管八成之法,对各种危害政权者判罪处罚,其中有邦贼、邦盗等名目;京外有野庐氏,京内则有修闾氏以及司厉等官管理,用来防盗的措施确是极为严密的了。守卫一方的地方长官,假如平时对坏人的行动认为无害而察视不严,则不免养奸贻患。然而如果察视太严,则又足以导致扰害民众,恐怕会因此激起变故。这说明,官吏如果不能实心实意地办事,想要他们待民不枉不滥,那就困难了。招致盗贼是有原由的,察访盗贼也是有办法的。盗贼互相勾结,找空子为乱,一定有信使互相往来。这就给侦查工作提供了机会。无缘无故聚集许多的人,这是形迹可疑的证据。善于改变民众的习俗,精简部队的人数,甚而至于对乱众施以兵威,那么兵士必不至通贼,盗贼也必不至于充当兵士,军队的行动一定要有纪律,检查挑选一定要审慎。以前汉宣帝派太守时允许他们根据实际形势的需要自行处理紧急问题,不必请示。周世宗设置义营时,让他们鸣金建鼓,应付突然事变。这些都是消弭盗贼的好办法。其他的如韩延寿的治理颍川;尹翁归的镇守扶风;龚遂施行安抚对策而使老百姓卖掉刀具,买回小牛犊;贾琮选用贤良的官吏,使他们各安其资业。有的官吏善于运用招安的

办法,比如张纲单车上路就招抚盗贼。有的官吏采用不测之威制敌,比如李崇让每村设置鼓楼防盗;虞诩派间谍为盗贼缝衣服,将其衣服前襟缝上彩线以为标识,盗贼入市则擒获他们。这些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动,本来要看止弭盗贼者的才干见识了。欧阳修讲论御盗之事谈了四个方面,总之以去冗官,用良吏,使百姓不起来为盗为上,这是最好的探本清源的论断。圣天子设置了对奇邪之俗的禁令,严格诛除左道旁门,选择将帅以除去奸邪,慎择官吏以安抚善良,使得邪说不能惑众,老百姓各人都能安心地耕田凿井,难道还不足以与唐虞时代的太平盛世媲美吗?

制策又以为"太平日久,奢丽生焉;积而不返,非撙节养富之道"。臣下考察先王之治,必定要设立制度。车马、衣裘、服饰之类的精雕细刻,就是耗费物力的一个方面。冠、婚、丧、祭等礼仪,必须要实实在在地恪遵谨守。然而以诗礼传家之族既然不能遵循本分,闾巷小民的行为又何能整齐划一?因此严格规定等级尊卑必须从士大夫开始,而老百姓的衣服用具也不让他们超过礼制的规定。要普遍地督责有关部门将所有等级制度公开向天下明白地宣布,这样便用不着对每一件物品都去稽查,每一个人都去考察,而老百姓自然不敢陷入法网而自取罪戾,可以长久地享受安定和平的快乐生活了。有的人担心这样做会烦琐扰民。其实对物品的要求都要有个限度,天下人愿意这样做的有十分之七,不愿意的十分之三。有一个法令制度使之整齐划一,那么不愿意的也会习惯。因为按照礼制原规定应该是如此,按照他的本分也当然是如此,他就不会认为是苛刻了。令行禁止,没有哪一个敢于违反了。皇上勤求治理,率先崇尚节俭,天下之人又谁敢以奢侈相夸耀呢!

总共以上这几个方面:夙夜基于大命,这是取信于民众的法式;吏治得以澄清,这是使黎民安定的措施;奸恶之徒被清除,礼制得以确定,这是民风日益醇厚的良策。统协天人而建立大中之道,汇集古今嘉谋而成圣治,百官奉令承教,平民享受到一惯的安乐生活。啊,这是多么美好呀!而臣下仍特别希望皇上慎宪省成,安益求安,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便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是草茅之民,新登科第,不

识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恐惧颤抖，几致跌倒。臣下敬答如上。

王引之　殿试对策

王引之(1766～1834)　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嘉庆四年(1799)探花。后官至工部尚书。其治学得自其父王念孙，深于名物训诂之学。所撰《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及与其父合著之《广雅疏证》、《读书杂志》诸书，甚为时人所重，为语言文字学名著。另有《王文简公文集》传世。

臣对：臣闻懋修者，建极之基也；官人者，致治之本也。严辨莠良者，世风之所以丕变也；敦崇节俭者，民用之所以常饶也。夫惟圣人在上，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要必自正心始。是以商有"逊志时敏"之诰，周陈"克知灼见"之谟。诘奸止暴之防，周于四闾五族。慎财节用之制，统乎耕九余三。正学术而端吏治，除奸慝而化浮华。古之所以仁风旁流，谊方远播，德化光四表，声灵震六区者，用是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孝思锡类，令德宜民。戒言祥瑞，励惟敬作所之心；禁献珍奇，崇以善为宝之训。固已形端而表正，大法而小廉，於变时雍而小人知革面，黜浮崇朴而兆民庆厚生矣。乃圣德渊冲，勤求弥切，犹以典学、察吏、禁暴、止奢之要，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自揆愚陋，何足以语此？顾当对扬伊始之时，念先资拜献之义，敢不敬述所闻，以效刍荛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溯圣学之源者，必推'精一危微'十六言"，古帝王不空言心也，因而询及性命之指，治平之术。臣谨案：《虞书》"允执厥中"，实千古传心之准，百王治世之经。载稽《论语》所纪，尧以是咨舜，舜以是命禹，递相授受，罔不率由。盖惟在上者无党无偏，而锡庶民之极，斯在下者是彝是训，以近天子之光。秉实心而行实政，先观我而后观民，固非空言心性所可同日语也。《易》为尽性至命之书，而《大象》曰"君子以"，或曰"后以"。以者，用也。其道至显，其功至切，

小之贯乎日用饮食之恒，大之通乎天下国家之远。六十四卦未有不切人事者。推而至于箕子"以"之，文王"以"之，皆主实事，不尚空谈。倘好语精微，是道在迩而求诸远矣。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先以为治之端，次以为学之本，继以四大纲：曰格物致知，曰正心诚意，曰修身，曰齐家，意在正本清源，故治平之事略而不及 。其实治平之事亦不可略，循序渐进，设诚致行 ，圣功王道 ，各有全量，此邱浚所以有《大学衍义补》之作也 。宋儒程颐之言曰："帝王之学异于儒生。盖儒生之学止于循习章句，帝王之学务在得其要而已。"此至论也 。仰惟圣学高深，源流交彻，固统千古之心法治法，而一以贯之者矣。

制策又曰："闾阎之休戚，恒视守令之贤否"。此诚爱育黎元之至意也。夫守令之官，所使承流而宣化也。《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以强教之，悌以悦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于此而有情迫事逼，激而上陈者，知其必不出此矣。若抚驭稍乖，控诉迭至 ，不惩之则不足以止刁风，惩之则又恐激众怒，调剂之术最难得宜。而其要不在于治诉官之民，而在于择治民之官。诚使慈惠之长，忠厚之吏，劳来之，安集之，使皆畏其威，怀其德，虽有健讼之民，无所用其矫诬之说矣，是故选吏之为要也。吏有廉吏，有能吏。廉吏或短于才，能吏或失其守 。用之之道，在先责其操守，而后试其才能。夫弓调而后求劲焉，马驯而后求良焉。枉戾之弓，由基不能以命中；泛驾之马，伯乐不能以致远。用人之道，亦犹是矣。虽然，安民之要在选吏，选吏之要又在择大吏。大吏得人则举劾公，举劾公则吏皆知奉法。廉洁者不至中道而改操 ，贪污者亦可回心而向善。所谓任人者逸也。国家澄叙官方 ，至公至正，由督抚以至州县 ，无不举能其官。夫岂若汉之六条，唐之四善，徒相求于法制之末而已哉！

制策又以"天地之大，枭鸾并育，虽三代不能无奸民"，而欲得稽察之术。臣谨案，聚教罢民，古有明法；左道疑众，国有常刑。是奸民者，王政之所不宥也。顾奸民之禁止，惟在长吏之奉行。平时教化之深，既使渐仁摩义，不至陷溺于邪途；而察核之勤，又能朝考夕稽，不使潜藏夫奸匪，庶几民之谨愿者可安其耳目，民之狡黠者亦可辑其心思。即有一二异言异服之徒，亦必无所容其身也。惟是稽察之道，宜

酌夫宽猛之中，在侦其聚散之迹。古者闾师、党正养万民之德，保氏、司谏纠万民之恶，而司寇所掌：邦贼、邦盗、邦明。察之未尝不严，而不闻激而生变者，是在得其人耳。夫必有张敞治京兆，而后知盗贼之主名；有韩延寿治颍川，而后见奸宄之屏迹；有龚遂治渤海，而后卖刀买犊、卖剑买牛者相继也。他如虞诩之在朝歌，张咏之平益州，王守仁之抚南赣，德威互用，剿抚兼施，既有已成之效，即为前事之师。是惟抚之以良吏，察之以保甲，严绝胥役之扰民，奖励兵丁之义勇，要使经画有人，消弭得法，于以除莠安良，可计日而待矣。

制策又曰："风会所趋，人情争向；太平日久，踵事增华，则奢丽生焉"，而询及撙节爱养之道。臣谨按，《记》曰："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盖当物力丰盈之会，易长人情侈泰之萌。不有以节制之，则耗屈堪虞。不有以辨别之，则冒滥无等。《大学》之言生财也曰："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孟子之言为治也曰："食之以时，用之以礼。"是以古之圣人，明贵贱，辨等威，使上下有章而不可紊，隆杀有渐而莫敢干，非独以定民志，亦以厚民生也。夫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一人织之，十人聚而衣之，则所生者不支所用之费，所人者不敌所出之多。贾谊《陈政事疏》所谓"富人嘉会，锦乡被墙；卖僮之家，偏诸缘履"，诚有以见其渐之不可不防，而制之不可不定也。是惟冠婚丧祭酌其经，衣服饮食辨其制，则不期俭而自俭之道也。抑又闻之，《春秋》深探其本而返自贵者始，则士大夫者，又斯民奢俭之所自来，近者则而效之，远者望而慕之，不可不端其始也。仰惟圣天子躬行节俭，风示中外，宜乎薄海之内，耻纤靡而弗服哉！

若此者：端主术则治协雍熙，正官箴则民享乐利，闾里无奸慝之扰，仓庾征蓄积之饶，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伏愿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懋学而交修益切，诚民而大化弥昭。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庆，在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广修大德，这是建立最高准则的基础；官吏的任用，这是国家实现大治的根本；严格辨别百姓的良莠，这

是世风得以大变的措施；勉励并崇尚节俭，这是百姓得以经常富裕的保障。只有圣人处在上位，端正朝廷而端正百官，端正百官而端正万民，端正万民而端正四方，四方的人行为都端正了，那么远近的人没有哪一个不统一在端正的标准之内 。总之重要的是必须从端正内心开始。所以《商书》有“逊志时敏”的诰辞，《周书》有“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的谟谋。诘察奸邪、制止暴乱的防卫措施，周遍四闾街坊、五服亲族。慎费钱财、节制用度的规制，统括在耕获九年、余储三年的计划里 。端正学术，整顿吏治，清除奸慝之徒，教化浮华之俗。古时候之所以能够仁风四流，义方远播，德化照耀四方极远之地，声灵震荡六合寰宇之中，就是依靠了这些方法。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孝心想着赐予同类，美德只管惠众宜民。警戒称述祥瑞，心里时刻用“惟敬作所”的古语来自励；禁止献纳珍奇美物，崇尚“以善为宝”的古训。本来已经是表率作用纯正，大臣守法而小臣廉洁；天下众人变得友好和睦，小人也知道洗心革面；斥退浮华之风，崇尚勤俭朴素，万民都喜庆生活富裕了。然而圣上德行渊深谦抑，更加勤勉地追求最好的治理，仍然以典学、察吏、禁暴、止奢等重要问题，将臣下等人召入朝廷而进行策问。臣下自度资质愚昧，学识浅陋，又怎么能讲论这些问题?只是正当对答称扬圣上美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想着先资拜献的大义，又怎敢不恭敬地陈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效献草野之民的千虑一得呢!

恭读制策上有这样的话：“溯圣学之源者，必推‘精一危微’十六言”，古帝王并不空泛地讲论心地，因而询及性命之学的旨意，治国平天下的措施。臣下谨按，《虞书》上的“允执厥中”，实在是千古以来传授心法的准绳，历代圣王治世的常规。考察《论语》所记，唐尧用这一条告诫虞舜，虞舜用这一条训命大禹，他们互相授受，没有不按照这个成规办事的。大概只有在上者公正无私，而赐给平民最好的准则，这样在下者便遵循这些训诲办事，以接近天子的光辉。如果秉持实心而推行实政，就必须先看我做得怎

么样，然后再看老百姓的行动如何，这本来就不是可以与空谈心性者同日而语的。《易经》为尽性至命之书，而《大象》说“君子以”，或者说“后以”。“以”就是“用”的意思。道理至为明显，其功效至为切实，小则贯穿在每一件日常饮食用品之中，大则通达到国家长远的利益。六十四卦没有哪一卦不切于人事的。推而至于箕子谈到“以”，文王也谈到“以”，都主要是干实事，不崇尚空谈。倘若只喜欢空谈“精微”而不干实事，那纯属大道就在近前却往远处求索了。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先列为治之端，次谈为学之本，接着是四条大纲，叫做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他强调齐家，用意在于正本清源，所以治国平天下之事略去而不谈。其实，治国平天下之事也不能省略。循序渐进，设诚致行，则圣功王道，各有其全量，这就是邱浚之所以又撰《大学衍义补》的原因。宋儒程颐有句话说：“帝王之学异于儒生。大概儒生之学只遵循篇章字句的内容做解说，而帝王之学则务在求得书中的要旨而已。”这是最为通达的议论。皇帝陛下圣学高深，源流都很透彻，本来已经统括千古以来的心法治法而贯通如一了。

制策又说：“闾阎之休戚，恒视守令之贤否”。这确实是爱护抚育黎民百姓的最为深厚的情意。郡守、县令这些官吏，是用来奉承上级指示而宣扬教化的人。《诗经》上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是实行强化教育，悌是以和悦的态度去安抚他们，役使老百姓时有父亲般的尊严，有慈母般的关爱。在这样的管理下，老百姓中还有由于事势逼迫、激而上告的吗?绝对知道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干的了。假若管理工作稍微出点差错，那百姓中控诉守令的状子也就不断地往上递了。若不惩罚他们就不足以止息住刁风；真去惩罚他们，则又恐怕激起众怒，调节的办法最难得宜。而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治理诉官之民，而在于选择治民之官。假如真的能够派遣慈惠的长官、忠厚的吏属对众百姓进行劝勉、慰劳、安抚，使他们都害怕长官的威严，怀念长官德行，这样一来，尽管有善于诉讼之民，也无法使用他们那一套狡诈欺妄的说法了。所以选择官吏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官吏中有廉吏，有能吏。廉吏有的可能才干差

一点，能吏有的可能丧失他们的操守。使用他们的办法，在于首先督责他们的操守，而后试验他们的才能。弓弦要先调准了而后再追求它的强劲，马匹也要先选驯服的然后再寻求它精良。弯戾之弓，即使是养由基也不能以之命中目标。乱奔之马，就算是伯乐也不能用它来到达远方。使用人才的方法也是这样的。尽管如此，安民之要在于选吏，选吏最为重要的，又在于选择大吏。大吏选择得人，则举劾公正；举劾公正则官吏都知道奉公守法。廉洁的人不至于中途改变操行，贪污的人也可以回心向善。所谓任人得当就上面省心省力了呀！我们国家澄清吏治，十分公正，由总督巡抚一直到州县地方长官，无不选拔贤能者任职，哪里像汉代的六条，唐代的四善，仅仅只从法律条文的末节上去追求，而不注意大的方面呢！

制策又鉴于“天地之大，枭鸾并育，虽三代不能无奸民”，而想求得稽察奸民的办法。臣下谨予考查，聚集那些行为恶劣的人进行煽动，古代已有明确的禁断法令。左道旁门，欺惑民众，国家已有固定的刑罚进行处治。这说明奸民是王政所不能宽恕的。然而对于奸民的禁止工作，只有靠长吏去实行。只要平时深入进行教化，已经使老百姓受到仁义的浸染薰陶，他们就不至于陷溺于邪途。同时勤加察核，又能朝夕进行稽考，不使奸匪有潜藏容身之地。这样老百姓中那些安分守己的人，就能使他们不去乱听乱看，那些狡诈的人也可以安辑他们的心思。即使有一两个言语反常、服装反常之徒，也肯定没有地方容身了。因此稽察奸民的方法，应该仔细斟酌，做到宽严适中，在于侦察其聚散之迹。古时候闾师、党正职在养护万民的德行，保氏、司谏则掌纠察万民的恶行，而司寇的职掌则是监管邦贼、邦盗和邦明。监察的工作未尝不严，而没有听说激起变乱，这是因为管理工作能得其人的缘故。一定要有像张敞那样治理京兆的人，然后才能知道盗贼首领的名字；要有像韩延寿那样治理颍川郡的人，然后才能看到犯法作乱者的屏声匿迹；要有像龚遂那样治理渤海郡的人，然后才能相继出现卖刀买犊、卖剑买牛的人。其他如虞诩在朝歌任职，张咏的平定益州，王守仁的安抚南赣，都是德威并用、剿抚兼施的。既有古人成功的范例，就可以

作为我们的前事之师。因此以良吏来安抚他们，以保甲制度来监察他们，严厉禁绝吏胥役卒骚扰民众，奖励义勇的兵丁，重要的是使经营谋划此类事情有能人负责，消除奸恶有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用来除暴安良，就指日可待了。

制策又说："风会所趋，人情争向，太平日久，踵事增华，则奢丽生焉"，因而询及勤俭节约、爱护物力、保养财富的方法。臣下谨案，《礼记》上说："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大概时值物力丰盈的际会，容易滋长人情奢侈的萌芽。如果不想办法加以节制，则物力将被耗费匮竭，很值得忧虑。如果不想办法辨别尊卑，则滥行而没有等级贵贱。《大学》在讲到生财的时候说："生产物资的时候要迅速，使用它们的时候要缓慢。"孟子在讲到为治的时候也说："饮食要依据季节的不同有所变化，物资使用时要根据礼制的规定区别高低。"所以古代的圣人都辨明贵贱，辨别等级，使上下有别，不可混乱；尊卑有序，没有谁敢冒犯。这样做并非只是以此确定人的名分思想，也是要以此而使民生得以宽裕呀。如果一个人耕种粮食，十个人聚集在一起来食用它；一个人织布，十个人聚集在一起服用它，那么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抵不上所花的费用，所收入的东西抵不上所支出的东西多。贾谊《陈政事疏》所谓"富人嘉会，锦乡被墙。卖僮之家，偏诸缘履"，这确实是看到了渐渐奢侈的苗头不可不防，而制度不可不定呀！因此冠、婚、丧、祭等礼节要考虑确定其常规，衣服饮食等物品要辨别其规格，这将是不希望他们节俭而人们会自行节俭的对策。而臣下又听说，《春秋》深探其本，认为由奢返俭应该从贵者开始。这就表明士大夫是导致老百姓奢侈或者俭朴的来源。离士大夫近的老百姓就学习和效法他们，离士大夫远的老百姓就仰望和羡慕他们。因此不可不使士大夫从一开始就很纯朴。圣天子亲自实行节俭，给朝廷内外作出示范，所以海内外的百姓都以服用奢侈的东西为耻辱，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像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端正君主的心法，于是政治和协光明；吏治整肃，于是民众享受到快乐和利益。乡里没有邪恶不正之

人进行扰乱，仓库里收聚了丰饶的积蓄。这是太平的基业、万世的利益。希望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勉力扩充学识而更加抓紧修养，老百姓和协而更加彰明普遍的教化。我们国家亿万年无疆的喜庆就在这里了。臣下是草茅小民，新登科第，不识忌讳，冒犯君威，不胜恐惧，浑身颤抖，几致跌倒。臣下敬答如上。

〔李绍平译〕

清仁宗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殿试策问

[嘉庆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缵丕基,勤求上理,兢兢业业,夙夜不敢康。期于斟元阐绎,熙绩亮功,比户可封,邪慝不作,以庶几道一风同之盛。用是兼听并观,广开言路,尔多士所共闻也。兹当对扬伊始,伫献谠言,以资采择,其敬听朕命!

自唐虞授受一中,开万世之治要。而《尧典》首"钦",《舜典》首"恭",实能体天以出治。可推阐其义欤?三代圣王,后先一揆。《尚书》而外,经旨相通者,可类陈欤?《大学或问》谓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或问》谓中和、位育,极之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心法治法一以贯之者,二书实括其全。能申明朱子之意欤?又若王通《中说》,真德秀《大学衍义》,邱浚《大学衍义补》诸书,其言亦有合欤?

有司为亲民之官,抚字训迪,无不可以实心行实政。《记》曰:大臣法,小臣廉。言上下能相承也。朕澄叙官方,加意整饬。顾侵渔之弊未尽除,黩墨之风未尽息,大臣已法而小不尽廉,岂真积重之难反欤?抑封疆大吏所以董率而甄核之者,尚未扼其要欤?《周官》六计弊吏,汉法六条察吏。良规具在,果何以踵行而共知濯励欤?

凤俗基于人心,亦教化所见端也。太平既久,踵事而增。今欲还淳返朴,而地大物博,何由使家喻户晓欤?别等威而禁奇邪,朝廷俱有定制,何由使无僭越欤?必欲一一督责之,则又失六礼节性、七教兴德之本怀矣。朕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士为四民表率,所以佐朕化民成俗者,果何道之从欤?

保甲之法,昉于《周官》。地近则耳目易稽,人习则防闲尤密,无巡察之劳,而民不致有良莠之杂,法至善也。顾或奉行不实,不免姑息养奸。今欲申明旧章,严为考察,又恐吏胥苛索,致扰闾阎,效未著而弊已滋矣。惩盗于已然,终不若弭盗于未然。营汛墩堡之当修,寺院庵观之当察,亦保甲之一端。良有司何以稽核而无弊欤?

夫心法为宰化之原,吏治乃安民之本。挽浇漓以归醇厚,除稂莠以殖嘉禾,皆制治之要也。多士各抒所见,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唐尧虞舜用仁德给天下做出榜样,民众都追随他们。

百姓用度够,君主怎么会用度不够?百姓用度不够,君主怎么会用度够?

民众的生存规律是,拥有固定的财产就有一定道理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固定的财产就没有一定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如果没有一定的道理观念和行为准则,就放肆邪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陷入罪过,然后紧跟着去惩罚他们,这属于陷害百姓啊!哪有仁慈的人掌握了政权却可以去做陷害百姓的事情呢?〔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大业,殷勤地追求最好的治理,兢兢业业,早起晚睡,不敢贪图安逸。以期体会天地之德,并加以阐明陈述,使各种业绩兴起,国家大事领导有方。天下大治,每户都

有可受封爵的德行，邪恶之人不再出现，国家差不多达到道德统一、风俗相同的盛世。因此广开言路，多方听取意见，这是你们这些读书人都听到了的。现在正当你们对答称扬天子策问刚刚开始的时候，伫望诸位陈献正直的言论，以供选择采用，你们要恭敬地听好皇帝我的命令。

自从唐尧、虞舜以精一执中的心法递相授受以来，实际上开创了万世治国施政的基本方针。而《尧典》首先讲"钦"，《舜典》首先讲"恭"，实能体会上天之德以制订出治国措施。可推广阐述它们的含义吗？三代圣王的心法治法，先后沿用，是一个通理。《尚书》以外，经书的意旨有相通的，可依类陈述出来吗？《大学或问》以为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而《中庸或问》认为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的最高标准的圣神功化的枢钮关键，也不外乎一个"诚"字。帝王的心法、治法贯通如一的所有内容，以上二书实际上全部概括。能申述、阐明朱子的意思吗？又如王通的《中说》，真德秀的《大学衍义》，邱浚的《大学衍义补》等书，它们中间的话语，也有与朱子意思相合的吗？

各政府部门都是亲民之官，安抚养护和训导启迪百姓，没有哪一件事不可以不用实心而行实政。《礼记》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是说上下能互相承袭。皇帝我澄清吏治，锐意进行整顿，只是侵夺老百姓财产的弊病仍然没有完全除去，贪污之风仍然没有完全止息，大臣已经尽忠守法而小臣没有尽廉。难道真的是积重难返吗？还是封疆大吏在督导和甄核小吏的方法上，尚未抓住其要害呢？《周官》用六计来裁决官吏的优劣成败，汉代的办法是刺史以六条诏令监察守相长吏。古代的良好规矩都保留到了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去继承实行，而官吏们就都知道涤濯污行、砥励意志呢？

风俗建立在人心好尚的基础上，也是教化结果的体现。天下太平的日子一久，人们总要加以增饰，于是渐致奢侈。现在想要返回到过去淳厚俭朴的民风，但是国家地大物博，要怎样才能使家喻户晓呢？辨别等级贵贱，禁止奇邪之俗，朝廷都有固定的制度，要怎样才能使人们没有僭越犯上的行为呢？如果一定要对每一件事进行督察

和责罚，则又违背了六礼节制人的性情、七教振兴民众德行的本来意图了。皇帝我亲自实行节俭，走在天下人的前头。士大夫为士、农、工、商四种民众的表率，是辅佐皇帝我教化老百姓形成好风俗的人，他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跟随皇帝我教化百姓呢？

保甲之法，始见于《周官》的记载。同一保甲的人住地靠近则运用耳目容易稽查，居民互相熟悉则防闲尤为严密。用不着巡察的劳苦而老百姓中不会有良莠混杂的现象。这个办法最好。但是，有的人却不是忠实地执行这种制度，则不免姑息养奸。现在想要申明旧的章程，对老百姓严加考察，但又担心地方官府的小吏乘机向老百姓苛暴地榨取财物，以致扰害乡里，则尚未取得明显的效果而弊病便已产生了。所以，等到盗贼已经产生了才去惩治，终究不如在盗贼尚未形成时就加以防止。营汛墩堡都应该修筑，寺庙、庵堂、道观都应该访察，这也是保甲制度的一个方面。称职的负责官吏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去稽查核实而没有弊害呢？

总之，心法为治民教化的源泉，吏治乃安民的根本，挽救浅薄奢侈的风俗使之返归醇朴敦厚，清除稂莠之民以安抚良民，这些都是达到国家治理的重要措施。希望你们这些读书人各抒所见，不要泛泛而谈，不要隐讳真情，皇帝我准备亲自披阅。

顾皋　殿试对策

顾皋(？～1831)　字晴芬，江苏金匮(今无锡市)人。嘉庆六年(1801)状元。后入直懋勤殿、上书房，擢工部侍郎，旋调户部。连典顺天及浙江乡试，兼理国子监事务。其为官恭谨，不为激亢之行。

臣对：臣闻懋学为宰化之基，考绩实厘工之本，还淳朴所以维世运，慎防守所以奠民生。古帝王德配三无，功覃九有，勤求上理，寅绍丕基，莫不本心法以为治法，饬官方以定官常，澄清风俗之原，申画郊圻之禁。《书》曰："克绥厥猷，惟后。"言道民先自一人也。《周礼》曰："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言承流宣化，得人然后得民也。《书》又

曰:“政由俗革。”又曰:“慎固封守。”言教化宜详,防卫宜周也。伊古以来,功炳蔚而治敦庞,风俗同而道德一,克保鸿名,常为称首者,用此道耳。

钦惟皇帝陛下,锡福同民,绥猷定命。本“所其无逸”之念,深“建其有极”之思。固已一德日新,九功时叙,万邦咸正,百族雍和矣。乃圣德渊冲,不遗微小,景郅治之上仪,察枢机于在迩。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崇圣学、慎官方、训节俭、禁奸慝之至计。臣之愚昧,何足以裨高深?顾当先资拜献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平昔所诵习者,用以效刍荛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自唐虞授受一中,开万世之治要。而《尧典》首钦,《舜典》首恭,实能体天以出治”,此圣神功化之极致也。臣谨按,三代圣王,后先一揆。而论道统者必推本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十六言。盖圣贤传心之要,不外一中;建中之矩,不外一敬;主敬之本,不外一诚。尧曰“钦明”,舜曰“浚哲”,禹曰“祗台”,汤曰“日跻”,文曰“缉熙”,武曰“执竞”,无非主敬存诚,以协于中而已。《尚书》以后,诸经之理,奥旨相通。《大学》一篇,首列八条目,而朱子《或问》谓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此主敬之说也。《中庸》一书,中列三达德,而朱子《或问》谓中和、位育,极之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此存诚之说也。诚敬立,而中之理建焉矣。朱子而外,先儒绪论亦多可采。隋时王通教授河汾,作《元经》以拟《春秋》,又著《中说》以拟《论语》。事涉于僭,而评论颇多格言,程子尝取之。真德秀《大学衍义》取经文二百五字,证以《尧典》、《皋陶谟》、《伊训》之书,《思齐》之诗,《家人》之卦,子思、孟子、荀况、扬雄诸儒之说。意在揭明为学、致治之本,而治平之略缺焉。明邱浚补之,为目十有二。盖真氏之书,本诸身、家以达天下;邱氏则以治平之效,发挥格致诚正之蕴也。斯内圣外王之学,一以贯之者欤!我皇上大德懋昭,登三咸五,几康是敕,夙夜惟寅。治象炳于八埏,风教达于四表。洋洋乎锡极之隆仪,万福所由向用也。

制策又以“有司为亲民之官,抚字训迪,不可不以实心行实政”,此诚澄叙官方、加意整饬之至意也。臣闻考绩之法,始于虞廷,《皋陶

谟》"亦行有九德",注谓"考绩之次,序于四方"是也。六计弊吏,《周官》特详其文,岁终旬终,无非考成之日;冢宰小宰,无非考成之人。而六事之本,悉归于廉。惟廉故察,贪则昧矣;惟廉故洁,贪则污矣。官箴如此,成周吏治所由蒸然日上欤!汉世考课,事犹近古。刺史以六条察二千石,丞相、御史得杂考郡国之计书,至天子则受丞相之要。以史考之,如尹翁归为东海太守,必于秋冬课吏,是郡课县也。尹翁归又为右扶风,盗贼课常为三辅最,是州课郡也。丙吉谓长安京兆尹,岁竟,丞相课殿最,奏行赏罚,是公卿课群吏也。六条之诏,有田宅逾制之禁,侵渔聚敛之禁,通行货贿之禁,崇廉训洁,足以媲美《周官》。隋唐以后,考察之法,损益不常: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有五术六艺六行之条,有九班崇让之说。遗规具在,吏治或可鉴也。《记》曰:"大臣法,小臣廉。"诚哉!六事以廉为本,而承流宣化,实意奉行,尤在大臣之督率,惩贪墨,禁侵牟,则一国之肥,天下之肥矣。今圣天子整饬治原,凡封疆大吏所以董率守令,而甄别其优绌者,谁敢不考核严明,兢兢业业,共期以实心行实政哉!

制策又曰:"风俗基于人心,亦教化所由见端",而深虑太平既久,踵事而增,因思还淳返朴之道。稽古先王之治,有六礼以节性,七教以兴德,所以积基树本,经纬礼俗,节理人情,勤恤民力也。虽文质异时,功业不同,而立制坊民,其揆一焉。盖既明法制以别等威,自克禁奇邪而归中正。汉之孝文,躬行节俭,而民破觚斫雕矣。汉之孝武娱游壮观,而民绨锦被墙矣。上之人法行自近,则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国无浇俗,众知向方。故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众庶之标准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敦习俗也。《易》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惟节故益,民生所由裕也;惟俭故节,人心所由正也。教化之原本,治理之枢机,其在此乎!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俾薄海内外,咸知务本抑末。士食旧德,农服先畴,粲乎隐隐各得其所,诚三代盛隆之极轨也。

制策又以保甲之法,宜密其防闲,而因进稽《周官》之制。臣考《周官》,自乡遂大夫,以迄闾师比长,莫不联其什伍,合其众寡,以相保而相恤。有伍两师军之法,有比闾族党之制,有田里追胥之事,有

训练校阅之期。盖以兵卫民,实即以民卫民也。欲使耳目易稽,故必联之于近地;欲使巡察易密,故必习之使有功。则良莠既分,奸邪自靖。惟是成法虽定,而或奉行不实。将宽为考察,不免姑息养奸;严以核稽,或致闾阎滋扰。而吏胥苛索,假事生端,尤不可不禁也。盖惩盗于已然,不若弭盗于未起。小民有同井同疆之利,因有相友相助之谋,此备之裕于民者也。营汛墩堡之当修,寺院庵观之当察,此备之裕于官者也。诚得良有司以申明旧章,加意稽核,不使宽以容奸,不至严以滋扰,万物群生,联属其乡,所谓合天下为一家,由此其选也。

若此者:本圣学以为王道,重吏治以升大猷,挽浇漓以厚民生,除良莠以封比户,猗欤休哉!四海之民,交被天和矣。抑又闻荷覆帱之德,则愿天之弥高;感容载之恩,则冀地之弥厚。臣伏愿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天德懋而弥切寅恭,庶事康而不忘率作。致惇大成裕之俗,宏四方日靖之功,慎宪于以省成,惟动昭夫丕应。中外禔福,遐迩一心,治轶勋、华,功昭巍焕。式敷在民德,彝训在万邦,繇是协气旁流,淳风四溢,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勉力扩充圣学是进行治理和教化的基础,考核治绩是厘定百官的根本,返回淳朴的风俗是维系世运的方法,谨慎疆界的防守是奠定民生安全的措施。古代帝王道德堪配三无,功勋广布九州,殷勤地追求上等的治理,恭敬地继承伟大的基业。没有哪一个不凭借心法作为治法,整饬居官的常规以确定官员的职守,澄清风俗的渊源,申明居住区内人们行为的禁令。《尚书》说:"克绥厥猷,惟后。"是说引导老百姓先自国王一人开始。《周礼》说:"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是说秉承朝廷指示,宣扬王道教化,得到了胜任官职的人去治理,然后便能得到百姓拥护。《尚书》又说:"政由俗革,"又说:"慎固封守,"是说对老百姓教化应该详慎,防卫应该周密。自古以来,那些功劳彪炳盛大,治理敦厚隆盛,风俗相同而道德纯一,能保持大名,常常成为称扬的首位者,都是依靠了这些方法。

敬思皇帝陛下,赐福给所有的百姓,奉行安定的谋策,确立大

命。依据“所其无逸”的想法，加深“建其有极”的思虑。本来已经是皇帝一人的德行日日更新，六府三事等九功都安排好了，天下万国的人都合乎正道，各族民众都和谐了。然而圣德深厚又谦虚，不遗漏哪怕是很微小的意见，景仰太平盛世最高的准则，在浅近之言中考察枢机所在，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而以崇圣学、慎官方、训节俭、禁奸慝等问题的最好计策予以策问。臣下愚昧浅陋，怎么能对高深渊博的圣学有所裨益？只是如今正当先资拜献的时候，敬念古人“敷奏以言”的大义，怎么敢不勉力地陈述自己平日所念诵、温习的那些知识，用以效献一个草野之民千虑一得的管见呢！

跪拜敬读制策上有这样的话：“自唐虞授受一中，开万世之治要。而《尧典》首‘钦’，《舜典》首‘恭’，实能体天以出治”，这可正是圣神功化的极致啊！臣下谨案，三代的圣王治国，先后运用同一原理。而论述道统的人一定要推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大概是因为圣贤传授心法的要点，不外乎一个“中”。而建中的规矩，不外乎一个“敬”。主敬的根本，又不外乎一个“诚”。尧称“钦明”，舜称“浚哲”，禹称“祇台”，汤称“日跻”，文王称“缉熙”，武王称“执竞”，无非都是主要以恭敬为主，保存住诚正，以期合乎“中”的标准而已。《尚书》以后，各种经典所讲的道理，其深奥的旨趣都是相通的。《大学》一篇首先开列了八个条目。而朱子《大学或问》认为，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这是主敬之说。《中庸》一书，中间开列三达德。而朱子《中庸或问》认为，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一直到帝王的圣神功化，其枢纽总不外乎一个“诚”字，这是存诚之说。诚、敬确立了，而中和的治理状态也就建立了。朱子之外，先儒的理论也有很多可以吸取采纳的。隋代时，王通在汾河一带授徒讲学，作《元经》以模拟《春秋》，又著《中说》以仿效《论语》，虽然这种做法属于僭越，而其评论却颇多格言，程子就曾采取他的观点。真德秀《大学衍义》取经文二百零五字，然后拿《尧典》、《皋陶谟》、《伊训》等《尚书》的文字，《思齐》的诗句，《家人》的卦辞，以及子思、孟子、荀况、扬雄等诸儒之说来验证，他的用意是在揭明为学致治的根本，而治国平天下的谋

略就给省略了。明代邱浚补上了这些内容，撰成《大学衍义补》一书，此书有十二个条目。大概真氏的书，是以修身齐家为本，以达到治国平天下；邱氏则以治国平天下的效用，发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义蕴。这恐怕是内圣外王之学贯通如一了吧！我们皇上大德美盛昭明，跻登三王之列，等同五帝之德。居安思危，重视天命，早晚勤谨敬畏。治迹彪炳于八方边陲，风俗教化远布于四表裔民。多么美好兴盛地赐给万民最高准则的隆盛仪法啊！这是享用万福的原因所在。

制策又认为“有司为亲民之官，抚字训迪，不可不以实心行实政”，这确实是澄清吏治、着意进行整顿的最为重要的考虑。臣下听说，考绩之法，开始于虞舜的时候。《尚书·皋陶谟》：“亦行有九德”，注谓：“考绩之次，序于四方，”就是这样的制度。用六种事项来裁断官吏优劣，《周官》上对这类文字记载特别详细。每年之末，每旬之末，都是考成的时间；冢宰、小宰，都是考成之人。而六种事项的根本，都归于一个“廉”字。因为只有廉才明察，贪则昧良心了；只有廉才纯洁，贪则污秽了。为官的戒条如此，所以成周时的吏治能够蒸蒸日上呀！汉代时的考课制度，做法还是与上古相近。部刺史按六条诏令监察二千石长吏，丞相、御史大夫可以杂考郡国的计书，到了天子那里，则接受丞相汇报的材料。按照正史的记载来考察，比如尹翁归担任东海郡太守，必定于秋冬两季考核属吏，这是郡考课县。尹翁归又为右扶风长官时，其郡的盗贼课常常是三辅中最好的，这说明州是考课郡的。丙吉说长安京兆尹，到了岁终时，丞相考课京兆，以定官员优劣，上奏天子，颁行赏罚，这说明公卿考课群吏。在六条诏令中，有“田宅逾制”的禁令，“侵渔聚敛”的禁令，“通行货贿”的禁令，崇尚和训导廉洁，足以与《周官》媲美。隋唐以后，考察之法，损益不常。有四善二十七最的名目，有五术六艺六行的科条，有九班崇让的说法。前人留下的旧规矩都在这里，吏治工作或者可以作为借鉴。《礼记》上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确实是如此啊！六条考课标准都以廉为本，而秉承上面旨意，宣扬天子教化，实心实意加以奉行，则更在于大臣的督率。惩罚贪污的官吏，禁止侵夺百姓财物的行为，则一个郡国富裕了，整个天下也就富裕了。如今圣天子整顿吏治的

本源，凡是那些督导郡守、县令而甄别其优劣高下的封疆大吏，谁敢不考核严明，兢兢业业，都共同期望以实心去推行实政呢！

制策又说："风俗基于人心，亦教化所由见端"，而深深思虑太平日久，人们总要增饰，以致奢侈，因而要寻求如何返回淳朴风尚的方法。臣下考察古代先王治国，有六礼以节制人性，七教以复兴德行。这是用来打好基础，树立根本，培养礼俗，节制理顺人情，勤谨爱惜民力。尽管各个时代崇尚文采与崇尚质朴不一样，功业也不相同，然而要设立制度，以防百姓，其道理是一致的。大概既然明了法制以辨别等级尊卑，就自然能够禁止奇邪之俗而使老百姓归于中正的标准。汉代的孝文帝亲自实行节俭，于是老百姓便破去八棱有隅的觚改为圆形，削掉雕饰的物件而做成质朴的。汉代的孝武帝娱乐和游宴奇伟壮观，于是老百姓有的便绨锦挂满墙了。在上位的人法令都是从自身近旁实行起，那么，君子就会勤守礼制，小人就会尽力办事，国家就不会有浇薄的风俗，大家都知道努力的方向。所以朝廷是天下的根本，公卿大夫是众百姓效法的标准。卑贱的不超过尊贵的，新鲜的不超过陈旧的，这是为了统一人情，使习俗归于敦厚。《易经》上说："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只有节约，所以能增益，民众的生活由此便能富裕。只有俭朴，所以能节约，人心由此便能纯正。教化的本源，治理的枢机关键，不就在这里吗！皇上亲自励行节俭，走在天下人的前面，使海内外的百姓都知道要务本抑末。士大夫享受旧德，农夫们耕种祖先田亩。他们有的表现显著，有的潜移默化，二者各得其所。这确实是三代以来最为隆盛的最高的规则啊！

制策又以为保甲之法，应当加强它防备奸恶的作用，进而考察《周官》之制。臣下考察《周官》的记载，自乡、遂大夫，以迄于闾师、比长，下属民众莫不什伍相联，众寡结合，互相保护，互相关心。有伍、两、师、军等军事编制单位，有比、闾，族、党等基层行政组织。有乡里追捕盗贼之事，有训练士卒、查核检阅的日期。大概以兵卫民，实际上就是以民卫民。要使人们视线容易稽查奸民，所以必须将住地靠近的老百姓联结起来；要使巡察容易周密，所以必须让巡察人员彼此特熟悉，使之有功。这样一来，则良莠分清了，奸邪之徒自然不敢

捣乱了。只是成法虽已制定，而有的人却不能忠实地加以执行。或者考察时采取宽松态度，则不免姑息养奸；或者查核过于苛严，则有时会导致民间受到骚扰，而地方官府的小吏苛扰勒索，借机生事，尤其不可不加禁止。大概到盗贼已经产生了再去惩治，不如在他们没有起事时就加以制止消除。小民之间有同井同疆的利益，因而也就有互相友爱、互相帮助的办法，所以防盗对老百姓来说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的。营汛墩堡应该修筑，寺院庵观应当监察，这些防卫措施对于官府是有很大的施展空间的。假如真能够得到称职的负责官吏以申明旧的规章制度，特别注意对本辖区进行稽查考核，不让对策过于宽缓以致包容奸邪，也不过于严厉以致吏胥滋扰生事，万物群生，都按照本乡本土联结在一起，所谓合天下为一家，就是要选择这样的方式。

像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根据圣学以制定王道，重视吏治以升上大道，挽回浅薄轻浮的风俗以使民生富裕，清除稂莠之民以实现比户可封的理想。美好兴盛啊！四海之民，互相都享受到自然祥和之气了。不过又听说，蒙受上天覆盖庇荫之德，则希望天更高，感念大地相容托载之恩，则希望地更厚。臣下伏愿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大德圣茂而更加恭谨，众事安康而不忘率作。招致"惇大成裕"的风俗，宏扬"四方日靖"的功勋。慎宪省成，动则显出大瑞应。内外福安，远近一心。治绩超过唐尧虞舜，功业彪炳，巍峨显赫，恩德广施民众，彝训遍及万邦。由此和协之气旁流六合，淳朴之风充溢四海，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是草茅小民，新登科第，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恐惧颤抖，几乎跌倒。臣下敬答如上。

刘彬士　殿试对策

刘彬士（生卒年不详）　字筠圃，湖北黄陂人。嘉庆六年（1801）榜眼。后迁监察御史，转礼科给事中，旋升礼部侍郎，调刑部，署浙江巡抚，由于试用称职，实授浙江巡抚。任内则奏请添加宁海、象山等县营房炮台，以资防守。又兴修杭、嘉、湖三府水利，又请缓征灾民赋

税。寻因事降职,补授刑部侍郎,署尚书,卒于任。

臣对:臣闻敬修为起化之原,吁俊实诚民之本,一道德所以移风而易俗也,别淑慝所以除莠而安良也。《管子》曰:"政令所及,百体无不从。"《慎子》曰:"圣王在上,四生无不遂。"是以《诗》有缉熙光明之颂,《书》垂克知灼见之文,《礼》以纳贾陈诗为省方之制,《易》以重门击柝为御暴之防。自古圣皇建极于上,慎简乃僚,闾阎崇淳朴之风,海隅无暮夜之警。盖惟几康敕命,而无敢荒宁,斯能诞保延洪,而莫不徯应。于以荣镜宇宙,膺受鸿名,固纯常而凝宝命者,胥是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道光谟烈,撰合清宁,固已夙夜昭宥密之功,训迪著忱恂之哲,树风声而民遵道路,诘奸宄而势巩金汤矣。乃圣德渊冲,勤求弥切,犹以传心、敷政、训俗、安民之要,进臣等于廷而策之。如臣椿昧,何知体要?顾念兹嘉言罔伏之时,循古者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诵所闻,以效刍荛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唐虞授受一中,开万世之治要",而因推求所以后先同揆之实。此诚建中立极之本也。臣谨按,蔡沈《书序》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乎心。得其心则治与道可得而言矣。《尧典》以"钦"始,《益稷》以"钦"终,而《舜典》言"温恭",亦与《尧典》言"允恭"者无异。至于禹之"祇德",汤之"日跻",文之"小心",武之"执竞",圣圣相传,其旨一也。是宅心之要,不外一中,执中之功,归于主敬。推之《诗》言"昭事上帝",《书》言"王敬作所",《易》言"恐惧修省",《礼》以"俨若"冠篇,《春秋》体元为重。载道之文,皆发明主敬之旨者也。先儒训敬为主一无适,一者,诚而已矣。《大学或问》谓格致以及治平,始终不外乎敬,即《中庸》之言"笃恭而天下平"也。《中庸或问》谓中和极于位育,枢纽不外乎诚,即《大学》之所以戒欺而求慊也。心法治法,一以贯之,朱子之书申明此旨尤详也。后世若王通《中说》,虽疑于僭经,而圣贤之要旨,经传之微言,间有发明,不可尽废。宋真德秀进《大学衍义》,取经文而细绎其旨,触类旁通。先之以《尧典》、《皋陶谟》、《伊训》,《思齐》之诗,《家人》之卦,继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之说,而治平略焉。明邱浚补

之,其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驭外藩,曰成功化。此皆可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也。其羽翼夫四十三卷者,功岂浅鲜哉!我皇上庄敬日强,至诚无息,内圣外王之学,洵兼综而条贯者矣。

制策又曰:"有司为亲民之官,抚字训迪,无不可以实心行实政",而思所以考核其真。臣考《周官》以六计弊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廉者,立身之大节,而在小臣尤宜慎。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顾必察之得其方,督之得其要,而后黩墨侵渔之弊乃可尽除也。汉初以六条察二千石,举其大纲,不苛细微,其时吏治最为近古。若张敞、赵广汉之为京兆,董宣之令洛阳,盗贼屏息,人民安堵,固与文翁、召信臣、黄霸诸人同炳耀于史册矣。晋以五条考郡县,杜预议以黜陟之课总于六载,时不能行。唐之考课分二十七最,差以九等。其目自献可拾遗,以迄于边境清肃,城隍修理。纲举目张,其法倍详于昔。宋以七事考监司,九事考县令,皆所以试其材而程其功也。要之,小吏之贤否,非甚难知。特在为大吏者,树以清介之型,核以殿最之等,使下僚有所则效,而不敢自逞,则甄核何难明?积重何难返?亦惟以治人行治法,斯能放之皆准耳。我国家澄叙官方,肃清吏治,州县必慎其选,考课必平其衡,蕲臻于熙绩亮工之盛。为民牧者,宜何如濯磨以图报称乎!

制策又以"风俗基于人心",而思所以革其僭越之习,还其淳朴之风。臣以为由俭而趋奢者,风会之所以日开也;由淳而即漓者,人心之所以难正也。自古帝王礼乐不相沿袭者,亦欲因时制宜,救其弊而起其偏耳。盖太平日久,物力既盛,则人情竞为美观,奢丽成风,则材力必将不给,此诚不可不大为之防也。《记》曰:"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然车裘服饰之细,一一为之厉禁,则烦扰之弊必生。冠昏宾祭之礼,事事示以等威,则纤悉之情,难一辨等阶。而禁奇邪,莫详于《周礼》,而行之既久,视为具文,僭逾者萌蘖其中,亦其势然也。要之,革薄从忠,自贵者始。由朝廷以达于州巷,咸喻乎禁奢之意。而士大夫复以恭俭相高,以为小民之表率。则君子爱其礼,小人

爱其财,而俗可成矣。我皇上恭行节俭,为天下先。屏纤靡而弗珍,拒贡献而弗纳,日昃不遑,为百姓奠身家,谋乐利,此所由民生阜而民志定也。

制策又以"保甲之法,昉于《周官》",而虑巡察之未严,奉行之未善。此尤杜渐防微之至意也。臣闻古者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使之相保相受。无事属诸司徒,有事隶于司马。夜则声相闻,昼则目相识。此先王所为容民畜众,而万国咸宁者也。后世生齿日繁,民皆散处于田野市廛,而不肖者潜踪于其内,则稽之不可不严也。汉有亭长、啬夫,唐有里正、坊正,亦仿《周官》鄙长、鄙师之意,以取济于一时。顾同一保甲也,王安石行之而民扰,王守仁行之而民安,则又在奉行其事者,使奸民无漏网之幸,胥役无苛索之烦也。夫保甲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动息易知,形踪难掩。而又营讯必设其人,墩堡必详其制,所以稽其往来者无不严。寺院时必有巡,庵观人必有察,所以稽其居止者无不至。于以杜奸民而安良善,法至美也。盖惩盗于已然,不若弭盗于未然。平居因循苟且,一切委诸胥吏,迨其形迹既彰,而后多方捕缉。虽如李崇之村置楼鼓,虞诩之绥缝擒获,或鸣金而举火,或按籍而捕盗,盗虽止而不胜其扰矣。圣朝典章明备,道一风同,良有司奉行成法,期于法行而无弊。生斯世者,敢不遵荡平之路哉!

若此者:性道探原于精一,则广运之德隆矣;廉仁遍喻于班联,则百度之贞著矣。慎乃俭德,则俗臻于时雍;备其不虞,则势安于磐石。湛恩庞鸿,中外禔福,洋洋乎畅九垓而溯八埏。猗欤休哉!臣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德盛而心弥恭,化神而政弥懋,则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业,基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敬修身心是兴起教化的渊源,求取贤才是使老百姓和睦的根本,统一道德标准是移风易俗的方法,区别贤奸是除莠安良的措施。《管子》说:"政令所及,百体无不从。"《慎子》说:"圣王在上,四生无不遂。"所以《诗经》上面有"缉熙光明"的颂辞,

《书经》上面有"克知灼见"的文字,《礼记》以"纳贾陈诗"作为省察四方风俗的制度,《易经》以"重门击柝"作为防御暴乱的措施。自古以来,圣皇在上面建立起治国治民的最高准则,谨慎地选择他的臣僚,里巷平民崇尚淳厚质朴的风气,就是海涯天角也用不着早晚进行警戒。这大概是由于君王重视天命,居安思危,而不敢怠荒和贪图安逸。这样就能确保大命,延致洪福,没有哪一件事不与之相应。因而以之明镜宇宙,承受大名,巩固纯德常位而凝聚起天命,都在于遵循了这些方法。

敬思皇帝陛下,道法光耀前代的谋谟功烈,事体合乎清明太平。本来已经早晚彰明宽仁宁静之功,对臣民的教训昭示了一片诚信之情,树立好的风气而老百姓遵循君王的大道,整治奸恶之徒而国势固若金汤了。然而皇上圣德深厚又谦虚,殷勤地追求最好的治理,心情更加迫切,仍然以传心、敷政、训俗、安民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而加以策问。像臣下这样愚昧无知的人,怎么能知道国家大事的精要?只是考虑到自己生当这样嘉言都将被采纳而不会被埋没的圣明时代,应该遵循古时候拜献先资的大义,怎么敢不陈献出自己的所见所闻,以献纳山野草民粗浅的看法和赤诚之情呢!

跪拜敬读制策上有这样的话:"唐虞授受一中,开万世之治要",因而探求历代君臣先后承继、本同一理的事实。这确实是建立大中之道,设置最高准则的根本啊!臣下谨案,蔡沈《书序》说:"二帝三王之治本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乎心"。得其心则治与道可得而言了。《尧典》以"钦"字开始,《益稷》以"钦"字终篇。而《舜典》讲"温恭",也与《尧典》讲"允恭"的含意没有什么区别。至于大禹讲的"祇德",商汤讲的"日跻",周文王讲的"小心",周武王讲的"执竞",可以说是圣人们代代相传,其含义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定养心法最重要的地方,不外乎允执其中;而执中的功用则归根于"主敬"。再推导到《诗经》说要"昭事上帝",《书经》说"王敬作所",《易经》说君子"恐惧修省",《曲礼》以"俨若"放在书的最前面,《春秋经》以体元为重。这些载道之文,都是阐发彰明"主敬"的旨意的呀!!儒学先辈将"敬"字解

释为“主一无适”,所谓“一”,就是一片诚心罢了。《大学或问》认为,从格物致知一直到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也就是《中庸》里讲的“笃恭而天下平”呀。《中庸或问》认为,从“致中和”一直到“天地位”、“万物育”,其中的枢纽关键不外乎一个“诚“字,也就是《大学》里所讲的要戒欺而心安理得的境界。心法和治法,都是互相贯通的,朱子的书反复申明这种旨意是特别详细的。后世的书,像王通的《中说》虽然有僭越经书之嫌,对于圣贤的要旨,经传的微言大义,也间或有所发明,不可全部废弃。宋人真德秀进献给朝廷的《大学衍义》,取经中原文而仔细寻绎研究其中的道理,于是触类旁通,先以《尧典》、《皋陶谟》、《伊训》等《尚书》的文章,以及《思齐》之诗,《家人》之卦进行论说,继而又引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等诸家之说进行补充,而关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缺略了。明代邱浚补上了,作《大学衍义补》一书。此书有十二目,叫做正朝延、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 、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外藩、成功化。这些都是可以收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功用的措施,它对那四十三卷的《大学衍义》起到辅助作用,其功效难道浅显吗?我们皇上庄敬之心日益增强,至诚之念从不停息,所具有的内圣外王之学,确实已经综合全面、条理贯通了。

制策又说:“有司为亲民之官,抚字训迪,无不可以实心行实政”,因而考虑如何考核官吏真实情况的方法。据臣下考察,《周礼》用六计裁断所有官吏的优劣。这六计是: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廉”这个条件,是官员立身行事的大节,而在小臣尤其应该慎重。安静平和的官吏,非常诚实,没有浮华。其政绩按日计算虽感不足,按月计算却有很多。但是察核官吏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督责他们一定要得其要领。只有这样,然后官吏渎职、贪污、侵渔百姓的弊病才能完全除去。汉代初期,刺史按照六条诏令察核二千石官吏,只是条举大纲,不苛求细微末节,当时吏治情况很好,最与古代的情况接近。像张敞、赵广汉担任京兆尹,董宣担任洛阳令时,盗贼屏息踪迹,老百姓安居乐业,本来就与文翁、召信臣、黄霸等人一起彪炳于史册了。晋代时中央以五条标准考核各郡县,杜预建议将升

降考课的工作,总合在六年内进行,当时没有得到采纳。唐代的考课标准分为二十七个最,在每一个标准中又区别为九个等级。其子目从献可拾遗开始,一直到边境清肃、城隍修理等,纲举目张,其办法比以前详细几倍。宋代以七事考核监司,以九事考核县令,都是以这些标准来测试官吏的才德,衡量官吏所做出来的成绩。总而言之,对于小吏的是否贤能,并不很难了解;只是在于那些担任大吏的人,应该树立起清正廉洁的榜样,以殿最的等级来进行考核,使下属有所效法,而不敢胡作非为。如能做到这些,则对官吏的甄别审核又有什么难以弄明白的呢?对长期以来的积习又有什么难以革除的呢?也只有依靠会治理的人去实行完美适合的法制,就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我们国家澄叙官方,整肃吏治,对于州县长官必定慎重地加以选择,对于官吏的考课也必定统一标准,符合实际,以期达到振兴政事辅助皇天的盛况。作为管理老百姓的地方长官,应该好好想一想,自己要怎样磨励志节,勤求治理,以图报答,才对得起皇恩呢?

制策又以为“风俗基于人心”,因而考虑要怎样革除那些奢侈僭越的习惯,返回淳厚质朴的风气。臣下认为,人们易于由俭朴而趋向于奢侈,这是社会日益开化的结果。人们易于由淳朴进入浇薄,这是人心难端正的事情。自古以来,帝王们的礼乐制度之所以不相沿袭,也就是想要因时制宜,以挽救弊端,纠正偏颇。大概太平的日子一长,物力一丰盛,人情就会争着作美盛壮观之事,奢侈淫丽就会形成风气。这样,国家的财力物力必将供应不上,这种歪风确实不能不着力地加以防止。《礼记》说:“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然而车马、衣裘、服饰等细小物品项目,如果要一一严厉地加以禁止,那么,烦扰百姓的弊端必将产生。冠、婚、宾、祭等礼节,如果要事事 定出等级尊卑,那么,这些细小的活动,难以一一辨别其等级高低。而对于禁止奇邪歪风的记载,没有比《周礼》更为详细的了。然而这种制度行之既久,就被看作是一纸空文,僭越逾制的现象就从中产生,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总而言之重要的是,革除浇薄之习使人们归向忠厚必须从贵者做起。先由朝廷提倡,再推广到各个州巷,有关禁奢从俭的旨意晓喻给每个臣民。而士大夫又要特别崇

尚恭谨俭朴，以此作为小民的表率。这样一来，则君子爱其礼制，严格按礼制办事；小民爱其财物，自然注意节约，然后好的风俗就形成了。我们皇上亲自实行节俭，为天下臣民作出榜样。摒弃作工精细、靡丽奢华的东西而对外国的奇异贡品也不予接纳。工作繁忙辛苦，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为百姓奠定身家基础，谋取快乐和福利。正因为如此，所以民生富裕而民心安定。

制策又以保甲之法，始自《周官》，因而考虑到巡察之法还不严密，奉行之道尚未尽善。这正是防微杜渐的最深的用心啊！臣下听说，古代五家组成一比，五比组成一闾，使老百姓互相保护，互相担责任。无事之时，比闾的百姓由司徒管理，如果有事发生，则由司马统率。夜里时，同比闾的人声音互相听得清，辨得出；白天里，同比闾的人眼睛一看也互相认识，坏人当然无处容身。这是先王创造的用来容民蓄众，使天下万国都得到安宁的好办法。但是后世人口一天天增多，老百姓都散居于田野和市肆，而不肖之徒潜藏在他们中间，那么稽查坏人的措施就不可不严密了。汉代有亭长、啬夫，唐代有里正、坊正。这也是仿照《周官》设置鄰长 、鄙师的意图，以满足一时的需要。然而同是一个保甲制度，王安石实行它时，老百姓受到扰害，王守仁实行它时，老百姓得以安居。这又在于奉行其事的人，要采取措施，使奸民不至产生自己可以漏网的侥幸心理，使胥役没有苛扰勒索百姓的害处。保甲制度利用同里同乡互相熟悉的人，来监察自己耳目能听到能看到的最近范围的事，坏人的一举一动容易侦知，不法形迹难以掩盖。再者说来，各营汛之处一定要设置专人驻守，各墩堡要制订详尽的保安制度，国家用来稽查往来行人的制度不能不严。各处寺院一定要时时有人巡查，各种庵观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监察，政府用来稽查他们举止的措施不能不周至。这些都是为了杜绝奸民，安抚良善，法制最为完美。到盗贼已经产生了再去惩罚，则不如在盗贼尚未形成时就加以防范。如果平居时因循苟且，敷衍了事，把一切都交给胥吏去办，到了盗贼形迹已经明显了，然后才千方百计去缉捕，即使有李崇那样每一个村子设置鼓楼，虞诩那样以彩缝作为标志来擒获盗贼的方法；或者鸣金举火，或者按照簿籍登

记来捕盗，尽管能够消除盗贼，但是对于民间的扰害就非常之多了。圣朝典章法制明确完备，道德纯一，风俗相同，又有好的部门官吏奉行成法，以期法令得到推行而没有弊病。生活在这种太平盛世的人，难道有谁还敢不遵循圣王坦荡太平的道路吗？

像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性道探源于“精一危微”十六字心传，则广大深远的德行更隆盛了；廉仁之旨对所有官吏遍加晓喻，则各种事情都能办得正确、取得显著成绩了；谨慎地对待勤俭德行的修养，则社会风俗臻于雍和了；防备意料不到的事变发生，则国家形势安如磐石了。恩德深厚庞大，内外臣民福安，瑞气洋洋广盛，畅遍九重天而远溯八方边际。啊，真美好呀！臣下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圣德盛大而心越恭谨，教化神奇而政更勤勉，我们国家亿万年无疆的大业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是草茅小民，新登科第，不识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恐惧颤抖，几致跌倒。臣下敬答如上。

邹家燮　会试卷一道

邹家燮（生卒年不详）　字秀升，江西乐平人。嘉庆六年（1801）探花。出典贵州乡试，号称得人。旋转御史。时有一总兵官指名挑选吏员，家燮上章疏论其失。江西巡抚奏清设置总局勾稽积案，家燮亦上言，疏陈其陋，谓恐开需索之门，启招摇之习。寻巡视南城，擢给事中。卒于官。

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

以仁帅民，天下定于一人矣。夫民之仁，由一人之仁而定。尧舜亦仁天下而已矣，帅与从又何知焉？且天下之至无定者，民也。而至有定者，亦民也。以天下定天下，不若以一人定天下，而天下定以一人。定天下不若以一人，定一人而天下定。郅隆之治，若无所绳于民，若无所责于民，而民且自绳之，而自责之者，是可为一人定国之一证。家国之理，本之于孝悌慈，通之于仁让，而统之则为一仁，虽天下

无以异也。

本天地之生曰仁，胥天下而出于太和之保合也。元者善之长，亨者诚之通，仁所以葆天下于各足。建中和之德曰仁，胥天下而归于王道之荡平也。建极者锡福之原，通德者类情之本，仁所以范天下于大同。此其故不在民也，亦在有以帅之而已矣。帅不徒以仁声也，尤不徒以仁言。试观诰作而疑，誓作而畔，古圣人惟恃有潜移默化之权。帅不徒以仁政也，亦不徒以仁心。逮至不介以孚，不速而成，古圣人并不自知草偃风行之用。斯诚善帅者也。

古之善帅民者，孰如尧舜乎？帅之而无不从者，孰如尧舜之民乎？非尧舜之独有治术也，非尧舜之民之独有治心也。其帅也无所为帅也，而不啻帅也；无不可帅也，而又不啻不帅也。夫所以帅之者，何也？曰仁也。尧舜之帅天下，尧舜之仁天下也，而岂有异民哉！盖古今不独尧舜也，以尧舜之帅民者帅民，则一尧舜矣。尧何为而放勋？舜何为而重华？无非此仁德之昭宣，历千载而不敝。天下顺其则，而一人廑其心。所谓无所为帅而不啻帅者也，尧舜何知焉？古今不必尧舜之民也，有尧舜之所以帅民者帅民，而民一尧舜矣。尧之民胡为而时雍？舜之民胡为而风动？无非此仁心之感召，相默运于无言。一人自切疡瘝，而天下且忘帝力。所谓无不可帅而不啻不帅者也，而民又何知焉？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尧舜亦仁而已矣。

用仁爱来率领民众，天下就可以由一人安定了。老百姓的仁爱之心，是由一个人的仁爱而决定的。尧舜也只不过是以仁爱来统治天下罢了，他们对率领老百姓和老百姓跟从在后又有什么特了解的呢？况且天下最没有定向的是老百姓，而最有定向的也是老百姓。以天下人来安定天下，不如以一个人来安定天下，而天下就由此而以一个人便安定了。安定天下不如依靠一个人，确定了一个人，天下跟着也就安定了。最为太平时世的治理方法，似乎对老百性没有什么约束，似乎对老百姓没有什么督责，而老百姓却能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督责自己，这种现象可以作为由一个人定国的一个证据。家庭和封国的道理，是依据孝悌慈爱的精神，贯通到仁爱谦让的品德，而统

括起来就是一个仁字,即使是治理整个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同的 。

依据天地的生成就叫仁，整个天下都出于太和之气的保养聚合。“元”是善的主宰,“亨”是诚的通用,“仁”就是用来平衡天下万物使之各自得到满足的东西。建立中和之德叫做仁,整个天下都归于王道的坦荡太平的状态。建立最高准则是赐福的渊源,通贯善德是类情的根本,“仁”就是用来规范天下万世使之达到大同境界的东西。这就是说起决定作用的不在老百姓，是在于有一个好的率领老百姓的纲领而已。率领老百姓不能只是依靠仁慈的声音,尤其不能只是依靠仁爱的话语。试看古代历史,往往是诰令发布了而民众仍然怀疑,誓言立下了而人们仍然背叛,所以古代圣人惟有依靠潜移默化之术了。率领老百姓不能只是依靠仁政,也不只是依靠仁心,及至不须祈告而百姓却相信了,没有催促而百姓自己却办成了,古代圣人自己并不知道草偃风行的作用,他们只是以仁率领老百姓罢了。这确实是善于率领老百姓的了。

古代善于率领老百姓的人有谁比得上尧舜呢？君主率领他们而没有哪一个不听从的,又有谁比得上尧舜之民呢?并不是尧舜独有高明的治术,也不是尧舜之民独有顺治之心。尧舜的率民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率民行动,但与实际率民行动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率领的,但又和不去率领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用来率领老百姓的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仁”呀。尧舜的治理天下,实际上就是尧舜用仁化导天下百姓,这又怎么会出现不服从的老百姓呢!大概古今不只是尧舜是这样做的，凡属按照尧舜率领老百姓的方法那样率领老百姓的人,则一概可以视作尧舜。尧为什么被称为放勋?舜为什么被称为重华？无非是这种仁德的昭明和宣扬，所以能经历数千载不衰败。天下人顺从他的规则,而君主一人则做到敬慎小心。这就是所谓不必率领什么而又和什么都率领并没有什么两样，尧舜又了解了什么事情呢?古今不一定都有尧舜之民,只要有了尧舜率领老百姓那样的方法率领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就都成了尧舜之民了。尧的老百姓为什么那样的和顺?舜的老百姓为什么那样如风鼓动而四方响应?无非是这种仁心为之感召,大家相互默运于无言之中罢了。如果君主一个

人深切关心民众的疾苦，天下就将忘记帝王的作用。所谓没有什么不可以率领的而又和不去率领没有什么两样，老百姓又了解了什么事情呢？尧舜用仁爱来率领天下老百姓，而老百姓就都跟从在后，尧舜依靠的只是仁爱而已。

邹家燮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绥猷者，治化之原；厘工者，熙载之本；崇俭者，弼教之资；安民者，经邦之要。一人行健以建中，诚民而贞度，饬躬而起化，立法以厚生。本正位凝命之实，立丰亨豫大之模。以垂道统，饬几康于精一危微；以熙亮采，底庶绩于慎修时宪。以节民情，礼让兴而海隅向化；以宪邦禁，经制肃而比户可封。是以《易》著裁成辅相，《书》陈谟明弼谐，《诗》有懿筐秉耒之讴思，《礼》有育德兴贤之雅教。古帝王寅绍丕基，廑求上理，所由体诸躬而淑诸世者，盖基于此焉。

钦惟皇帝陛下，大德懋修，重光广运，体元化以同天，溥至仁以育物。固已万几兢业而刑赏兼施，九有会归而礼教咸被矣。乃圣怀冲挹，弥切勤求，犹以传心、察吏、敦俗、安良之要，进臣等于廷而策之。如臣椿昧，何足仰赞万一？顾泰山不辞土壤，河海不择细流，幸际嘉言罔伏之时，窃念拜献先资之义，敬承清问，下逮刍荛，敢不述所诵习，以效管见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唐虞授受一中"，而因推夫诚敬之原，诚万世帝王之治要也。臣愚以为，自古聪明天亶，无不藉学以启其知。颛顼之训曰："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言执中也。尧之铭曰："日慎一日，不蹶于山而蹶于垤。"言居敬存诚也。而见于六经者，唐虞开执中之传，孔门阐致诚之旨。《鲁论语》载尧之命舜曰："允执其中。"《古文尚书》载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旨一也。盖《尧典》首"钦"，《舜典》首"恭"，推之禹之"祗承"，汤之"懋昭"，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乂胜"，古圣人无不体天以出治者，故其心传一以贯之。《新序》曰："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跗，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威子伯，文王学乎铰时子，武王学乎

郭叔。”知二帝三王之学,则知二帝三王之治;知二帝三王之治,则知二帝三王之心。何也?王道本乎天德,其学原于敬,而其用本于诚。故朱子《大学或问》谓格至、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或问》谓中和、位育,极之神圣功用,枢纽不外乎诚。敬、诚二者,真有以抉千古治术心源之准也。若王通《中说》十篇,真德秀《大学衍义》四十三卷,邱浚《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莫不有以证圣王心传之蕴者矣。我皇上治化乘元,天人协应,厥修允执,惟日孜孜,心法治法,诚远绍唐虞而独隆千古也哉!

制策又以“有司为亲民之官,抚字训迪,无不可以实心行实政”。夫虞廷肇基考绩,夏徇木铎,商立官刑,周以八法治官府,八枋驭群臣,六计弊群吏,以及日成、月要、岁会,而总诸冢宰,黜陟行乎其间,驭官之法綦备。汉初以六条察二千石,其目以“强宗豪右”为始,“违公损下”为终,不止聚敛为奸,通行货贿,宜先凛不廉之戒而已也。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事下三府,崔林、杜恕、傅嘏以为未可,不果行。晋太始初课吏以五条,后因文帝课吏以六条,一以“正心”为第一条,一以“清身心”为第一条,皆简要而得其本。唐考课之法,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叙以四善二十七最,如内而献可拾遗,外而修隍诘盗,条章具在,核实为难。故刘秩请约其大纲,杜佑复陈其课议。宋以七事考监司,以四善二最考守令。监司则分举官劝农、兴利除害等事,守令则分断狱平允、赋税不扰等事。他如辽之进治状,金之停阁俸,元之备五事,莫非考绩之良法,欲使皆归于循吏耳。颜师古曰:“循者,顺也。上顺公德,下顺人情也。”国家澄叙官方,时加整饬,封疆、守令,争自濯励,将见大法小廉,吏治肃靖矣。

制策又曰:“风俗基于人心”,而因及于六礼七教为风化之先,此化民成俗之极轨也。臣惟国奢示俭,国俭示礼。当物力丰盈,则人情侈泰。语曰:“俭则能足用,族可以庇;侈则不恤匮,忧必及之。”奢靡之渐,不可不大为之防也。《管子》曰:“奸邪生于匮不足,匮不足生于侈,侈生于无度。”敝化奢丽,何所不至?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其止之。纂组锦绣,害女红者也,其禁之。不为骄侈,不为靡泰。丧祭冠昏之礼示以等威,车马衣服之制辨其品节。于是上下有章,隆杀有度,则

民生以厚而民志以定矣。况士为四民之首，欲表率乎！庶民必自端其趋向。西京则兴廉举孝，东汉则砥节励义，去乡举里选之时犹未远。厥后士风靡侈，因之民俗纷华。所谓“富人嘉会，锦绣被墙，卖僮之家，偏诸缘履”，其所由来者渐矣。士谨黜华崇实之心，则民有节性防淫之化，此不待禁止劝谕，而可以日臻上理者。方今圣天子躬行节俭，为天下先，而闾阎之至纤至悉，无不体念周详，俾士气之关民风，务使敦崇实学，不事虚靡也。生逢圣治，宜何如敦教化而励人心乎！

制策又以“保甲之法，昉自《周官》”，而廑念于惩盗于已然，不若弭盗于未然，除莠安良之至计尽之矣。盖安民莫先于弭盗，弭盗莫先于保甲。周制，比闾族党邻里皆有长，所以分掌其政事戒令，以均其役，而弭盗之善政寓其中，保甲所由昉也。管子轨里连乡之法，仿而行之，而奔亡无所匿，迁徙无所容，或犹得《周官》遗意。汉制亭有长，乡有三老、啬夫、游徼。高帝以来，赐酒食、赐帛、赐爵宠之，以异于齐民也。唐以百户为里，坊村每里各置正一人，俱慎其选择，免其课役。宋则所以待之者，与汉唐异矣。古无不敝之法，赖行法者善用之。王安石意祖《周官》，而当时受其扰。王守仁抚赣南，盗辑民安，江右以为便。益可见不在法，而在行法者矣。

若此者：统天人以锡福，王道昭焉；熙百工而惠畴，官常饬焉。还淳返朴，禁盗息邪，风俗敦庞，而人心丕变焉。臣尤伏愿皇上钦德日新，敬修可愿，天德裕而弥切寅恭，治典彰而尤深几饬，爱物力而家颂盈宁，正人心而治臻熙皞。我国家万年景运之隆长无极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讲求心法，定下大谋，这是治国化民的源泉；厘定百官职守，这是功业隆盛的根本；崇尚节俭，这是辅助教化的手段；安定民生，这是治理国家的要务。君主一人行为刚健，效法天道，以建立大中之道；和洽百姓而使众事中度合理；正身行事以兴起化导，建立法制以使民生充裕。本着正位凝命的实际需要，树立在太平盛世的规模。用以传继道统，根据精一危微之旨居安思危。用以兴办众事，在谨慎地搞好政令中落实各项工作。用以节制民情，讲礼

谦让之风兴起，海边偏远之民都知道向往归化。用以规定邦国禁令，经国之制既已整肃，人们受到教化，便每户人家都可以给予封爵了。所以《易经》昭示“裁成辅相”之文，《书经》陈述“谟明弼谐”的话语，《诗经》有“懿筐、秉耒”的讴歌，《礼经》有“育德兴贤”的雅教。古代帝王恭敬地继承伟大的基业，殷勤地追求最好的治理，之所以自己身体力行又能搞好当世之事，大概就是奠基在这上面。

敬思皇帝陛下，勤勉地修养大德，广大深远再放光辉；体会大自然的化育，与上天相同，遍施至仁之德，以哺育万物。本来已经是政事兢兢业业，刑罚与奖赏兼施并用，九州会归在最高准则之下，人们都受到礼教的熏陶了。然而圣怀谦抑，勤求上理却更加迫切。仍然以传心、察吏、敦俗、安良等重要问题，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加以策问。像臣下这样愚昧无知的人，又怎么能对圣德起到万分之一的微小赞助作用？只是高高的泰山不会辞让小土块而不让它添入，大河大海不会选择细流而不让它流进。臣下幸而碰上嘉言善语不会被埋没的时代，心里私下想着拜献先资的大义，承蒙陛下垂赐询问，延及到割草打柴的人，臣下又怎敢不陈述平时所诵习的一点知识，以效献自己管窥蠡测的微小赤忱之情呢？

跪拜敬读制策有这样的话：“唐虞授受一中”，进而推求诚敬的渊源，这确实是万世以来帝王施政的基本方针。臣下愚意以为，自古以来虽然有天生聪明的人，也无不依靠后天的学习来启迪他的智慧。颛顼的训导说道：“大圜之天在上，大矩之地在下，你如果能效法它们，就可以作老百姓的父母。”这是讲的执中。尧之《铭》说：“要一天比一天谨慎，不然的话，没有被山绊倒却会被蚁冢绊倒。”这是说的要居敬存诚。这些道理见于六经的，唐虞开创了“允执厥中”的传授，孔门阐述了“致诚”的大义。《鲁论语》载录尧命舜的话说：“允执其中。”《古文尚书》载录舜命禹的话说：“人心动荡不安，道心幽昧难明，只有精诚专一，实实在在地实行中正之道。”他们的用意都是一样的。大概《尧典》首先讲“钦”，《舜典》首先讲“恭”，再推广到禹讲的“祗承”，汤讲的“懋昭”，周文王讲的“小心”，周武王讲的“义胜”，可见古代的圣人没有哪一个不是体察天意以制订出治国措施，所以他

们传授的心法都是贯通如一的。《新序》说:"尧向尹寿学习,舜向务成跗学习,禹向西王国学习,汤向威子伯学习,文王向铰时子学习,武王向郭叔学习。"知道二帝三王是如何学习的,就知道二帝三王是如何治国的;知道二帝三王是如何治国的,就知道了二帝三王的心法。为什么呢?因为王道是依据天德确定的,它的学问渊源于"敬",而它的运用则归本于一个"诚"字。所以朱子《大学或问》认为,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他的《中庸或问》又认为,从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直到神圣功用,其中的枢纽始终不外乎一个"诚"字。"诚"和"敬"这两者,真的是用以抉选千古以来治国之术和心法之源的准则。此外,像王通《中说》十篇,真德秀《大学衍义》四十三卷,邱浚《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也无不可以用来论证圣王心法传授的义蕴的。我皇上治化乘元,天人协应,对于"允执厥中"的修养、讲求,天天坚持,孜孜不倦。其心法和治法的运用,确实是远继唐虞而在千古以来最为隆盛的啊!

制策又认为"各有关负责部门都是亲民之官。安抚养护和训导启迪百姓,都不能够不以实心来实行实政的。"在我国历史上,唐虞时就有了考绩制度。夏代时,每当宣布政令,就振木铎以警众。商代便设立官刑以处罚贪渎之官。周代则以八法治理官府,用八枋统驭群臣,用六计裁决百官。又采取日成、月要、岁会的办法,将群吏的情况会归到冢宰那里,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奖惩升降,管理官吏的办法最为详细。汉代初期,以六条诏令督察二千石长吏,其具体条目从"强宗豪右"开始,到"违公损下"为止,不只是聚敛为奸,通行货贿,应该首先对不廉之官进行警戒就算完事了。曹魏制定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交三府讨论,崔林、杜恕、傅嘏以为不可,所以没有实行。西晋太初年间,开始时以五条标准考课官吏,后来根据魏文帝的办法以六条课吏。一个以"正心"为第一条,另一个以"清身心"为第一条,都简明扼要而抓住了根本问题。唐代考课之法,是由各个部门的长官,每年考校他们下属的功过,分为九等,用四善二十七最作为标准进行排列。如对内有献可拾遗,对外有修隍诘盗等名目。条例章程虽然全面具备,但要核实却有困难。所以刘秩奏请简约其大纲,后来杜佑又上疏陈述如何

考课的意见。宋代用七条标准考核监司，以四善二最考核郡守县令。各监司则分举官劝农、兴利除害等事；郡守、县令则分断狱平允、赋税不扰等事。其他如辽代的“进治状”，金代的“停阁俸”，元代的“备五事”等，没有哪一种不是考绩的好方法，目的都要让官吏归入到良吏中来。颜师古说：“所谓循，就是顺的意思。亦即上顺公德，下顺人情。”我们国家澄叙官方，经常进行整顿。各地封疆大吏和郡守县令等官，都争先恐后地以廉洁自励，即将见到大臣守法尽忠，小臣廉洁尽职，吏治肃清了。

制策又说：“风俗基于人心”，因而推及于六礼、七教，以之作为人心风化的先务。这是教化民众，形成好的风俗的最好的途径。臣下想到前人“国奢示俭，国俭示礼”的话。当物力丰盛充盈之时，那么人们的生活就会过于奢侈。俗话说：“勤俭则能使用度充足，整个亲族都可以得到保护。奢侈则不担心财物匮乏，肆意挥霍，这样忧患一定会跟上来。”所以对于奢华侈靡的苗头，不可以不特别地加以防止。《管子》说：“奸邪是由于财用匮乏不足产生的，财用匮乏不足是由于奢侈产生的，奢侈是由于挥霍无度产生的。”由于奢侈靡丽产生的弊端，何所不至？雕文刻镂、过分华丽的物品，是要伤害农事的，应该制止。赤色的绶带，锦绣的绸缎，是要妨碍女工的，应该禁止。不做骄奢侈淫之事，不作靡丽泰侈之物。丧、祭、冠、婚等礼节都要规定出等级高低，车马衣服等制度要辨别它们的品级规格。于是上下有章程区别，高低有等级规格，那么民众的生活就会丰厚充足，民众的心志就会宁静安定了。更何况士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原本要作出表率的呢！这样，庶民就必然会自觉地端正他们的趋向，不至于奢侈。西汉的办法是兴廉举孝，东汉则砥励人们的节义，离开乡举里选的时代还不久远。此后士风靡丽侈淫，因此社会风俗随着也就繁华盛丽。所谓“富人嘉会，锦绣被墙，卖僮之家，偏诸缘履”，这种奢侈浪费之风就是这样渐渐形成的。士大夫若在心里铭记着除去奢华、崇尚朴实的话，那么老百姓就会有克制自己的心性、防止侈淫的转化。这样一来，就用不着禁止奢侈，劝谕勤俭，却可以一天天地到达高度的治理境界。如今圣天子亲自实行节俭，给天下人民作出了榜样，而民间的防范，其措施制订得

极为细致、全面，没有哪一样不是体察民情，为百姓考虑得周到而详细。使士风紧联民风，务使他们重视崇尚实学，不做那些虚浮、侈靡的事。我们生逢圣明的治理时代，自然应该千方百计切实地搞好教化，以激励人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制策又以为“保甲之法，始自《周官》”，而殷勤谋画，想到惩盗于已然，不若弭盗于未然，除莠安良的最好的计策都包括在这里了。大概安民的措施中没有什么更应该比防止盗贼要首先讲求的了，而止盗的措施中则更没有什么比保甲制度更为重要的了。按照周代的制度，比闾族党邻里等行政组织设置有“长”，其目的是用他们分掌各项政事的戒令，平均他们的徭役，而止盗的善政也就包括在内，这是保甲制度的开始阶段。管子轨、里、连、乡的办法就是仿照这种制度而推行的，使得逃亡的人没有地方躲藏，迁徙的人没有地方容身，差不多还是得到了《周官》的遗意。汉代的制度每亭设有亭长，每乡有三老、啬夫、游徼。高祖以来，赐给他们酒食，赐帛，赐爵，宠幸他们，与对待平民百姓是不一样的。唐代以每百户人家设置一里，坊村每里各设置里正一人。对其人选都要慎重地加以选择，并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宋代对待这些基层官的措施与汉唐就不一样了。古代没有不出现弊端的法制，关键在依靠执行法制的人善于运用它。王安石效法《周官》建立保甲制度，而当时人们却受到扰乱；王守仁也以保甲制度管理赣南，结果盗辑民安，江右一带的民众都感到这种制度很好。这就更加说明，关键不在法制如何，而在于行法者的措施是否得当了。

像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统括天人关系以赐福百姓，王道就彰明了。使百官振作，理顺各类职守，居官的常规就得到整饬了。返归淳厚质朴之习，禁防盗贼，止息奸邪，风俗就会敦厚朴实，人心就会发生很大变化了。臣下尤其希望皇上圣德日日更新，敬修可愿。天德宽广而更加讲求敬畏，治典彰明而尤其谨慎于政令，爱惜物力而每户每家都讴歌富裕安乐，端正人心而治绩兴盛美好。我们国家万年大运的兴隆长久就无穷无尽了。臣下是草茅小民，新登科第，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恐惧颤抖，几乎跌倒在地。臣下敬答如上。〔李绍平译〕

清仁宗嘉庆七年(1802)壬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殿试策问

[嘉庆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承昊绎大宝命,于今七年。仰受训诒付托罔极之德,亲政以来,朝夕亹勉,兢业寅畏,庶期克副宙合烝黎爱戴之心,以无负君天下、子万民之责。恒思相小民以知依,念经训以建事,代闾阎谋厥温饱,为学校端其步趋,道洽政治,底于淳熙,嘉与亿兆共蒙康乂淳良之福。凡所以治心、典学、保赤、正俗者,庸举要旨,为多士廷献者咨。

《尚书》传帝王心法治法,而其最深切著明者,莫如《无逸》一篇。我皇考常书于屏扆,朕诵仰寻绎,念释在兹。其曰严恭、曰懿恭,曰寅畏、曰抑畏,将无"恭"、"畏"二字为七更端之要义与?顾羲、轩、顼、喾、尧、舜、禹、汤皆帝王隆轨,而近代独举三宗,一家专尊穆考,何与?或曰祖甲,或曰太甲,各有其义,将何遵与?受命中身,溯自即位,然则受命改元之说诬,虞芮质成之年妄与?惟正之供,或以为正道以待,或以为伯国之贡,畴为定论?"鲜"或训"乏",或训生意,畴为正音?唐紫宸殿,宋迩英阁,谁书谁图?能举其事与?

五经之书,广大悉备,微旨未易推寻,撮举儒先传注之显者。《易》重卦何时?《文言》何人所作?《系辞》疑不出孔子,先后天复有中天。《书》古文疑信何纷!古今文复有中文;《武成》、《洪范》曷可更定?《费》、《秦誓》何以入《书》?《诗》风、雅、颂外有南,南、雅、颂入乐,而

风不入乐。《笙诗》应否有辞?《鲁》、《商》何以入颂?《周礼·冬官》散在五典,《仪礼》仅士礼而非阙,《礼记》何篇出汉儒?各有其说。《春秋》经传何时间配?获麟后经畴作?《左传》有中兵谋、兵法,皆可详胪与?

尧、汤水旱不能必无,为人君者,心廑恫瘝,力谋补助,为民父母之谓何?而忍恝邪!赋饘铸币,伊古有之。《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万民,其目云何?其科条解义,先郑、后郑所注不同。吕祖谦酌申其说,可述而断与?此外散见诸官者可详与?富弼青社赈荒,千古良法,其分给田土之疏、支散斗斛之檄,可仿与?程子赈济之论,曾巩救荒之议,朱子画一事件之状,有可行与?蠲赋缓征,截漕平粜,鬻赈以工代赈,资送流民,今皆行之。古于何始与?法不蔑古,不泥古,以合时宜为善,将采以惠吾民焉。

士也者,民之坊也,亦官之朴也。士而端心术,治性情,砥砺廉隅,不亏儒行,则其乡人薰而善良,不入于奇邪,不蹈于匪僻。否则民何型焉?一旦出而服官,士廉则不为贪夫,士良则不为酷吏,士勤则不为旷官,皆以章缝为圭臬也。今或中存徼幸,罔顾箴检,诡遇求合,其毋乃辱青衿而羞黄卷乎?《王制》大司徒、大乐正四术四教,何正且严!而犹有不帅教者,何以善其化导与?察行而或起别居之谣,考文而空致虚车之饰。举鹿洞之遗规,仿苏湖之教法,上之待士甚厚,亦思何以克称与?

凡兹四事:端主德以建极,崇正学以稽古,观民生以孚惠,培士气以含淳。朕夙夜图维至亟也,问察至广也。各抒素所讲习者,毋泛毋隐,朕将亲遴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作为君主,要停留在仁德的最高境界上;作为臣僚,要停留在恭敬的极佳状态上。

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法来划一他们,百姓就有廉耻观念并

且归顺了。

大丈夫应住在“仁”这天下最宽敞的住宅里，站立在“礼”这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行走在“义”这天下最光明的大路上。〔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敬承上天所赐予的统治权，到如今已经七年了，一直仰受先帝训诲和付托重任的无边无际的恩德，自从亲政以来，朝夕不懈，勤勉自励，兢兢业业，敬畏上天，以期能对得起普天下黎民百姓对我的爱戴之心，不辜负君临天下养育万民的责任。常常想到，要察看那些小民，了解他们的隐痛，按照经书的教训来兴办各项事情，要代替里巷平民为他们谋划温饱问题，要为学校端正他们的前进方向。大道和协，政事得以治理，达到风俗淳厚光明的境界，高兴地与天下万民共享社会安康、世风淳良之福。凡属可以用来治心、典学、保赤、正俗的措施，现今都举出其要旨，以此作为众考生廷献时咨询的内容。

《尚书》传授帝王的心法、治法，而其中最为深切著明的，莫过于《无逸》这一篇了。我父皇曾经将它写在宫殿内户牖之间的屏风上，皇帝我常常吟诵，反复推求，精念释解都在这上面。它讲到“严恭”、“懿恭”、“寅畏”、“抑畏”，这“恭”、“畏”二字莫不是“七更端”亦即全文共七段转折的重要意旨所在吧！但伏羲、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大禹、商汤等人都是帝王中的最高典范，然而《无逸》篇中于近代圣王唯独举出殷中宗、高宗和祖甲，一家祖先只是尊崇文王，这是为什么呢？对于祖甲，有的说是祖甲本人，有的又说是太甲，各有他们的一番道理，到底要遵循哪一说呢？文中“受命中身”是从文王即位时算起的。既然如此，那么受命改元之说就是骗人的，虞国和芮国的人到文王那里请求解决争端的年份竟是虚妄的了吗？“惟正之供”一句，对于“正”字的解释也不同，有的人以为是“正道以待”，有的以为是“伯国之贡”，究竟哪一种说法是定论呢？“惠鲜鳏寡”一句，对其中的“鲜”字，有的解释为“乏”，有的解释为“生”的意思，究竟哪一个是正

音呢?唐代的紫宸殿,宋代的迩英阁,其中字是谁写的?图是谁画的?能举出这些事典的来历吗?

五经之书,数量广大,内容完备,精微的旨意不容易推求寻绎,现在撮要举出儒学先辈传注中比较明显的例子来问问。《易经》的重卦是何时出现的?《易》传中的《文言》是何人所作的?《系辞》有人怀疑并非孔子所作,为何有先天、后天,又有中天呢?《尚书》里的《古文尚书》,到底可信还是不可信,看法是那样的不一致!既有古文,有今文,还有中文,这是怎么一回事?《武成》篇和《洪范》篇,怎么可以改定?《费誓》和《秦誓》记的并非王室之事,何以能够编入《尚书》之内?《诗经》在风、雅、颂之外又有"南",为什么南、雅、颂可以入乐,而风不能入乐?《诗经》中的《笙诗》原先是否应该有文辞?《鲁颂》、《商颂》何以编入"颂"这一类?《周礼》的《冬官》散在五典,《仪礼》一书仅仅是士礼并不存在缺少的内容,《礼记》中何篇出于汉儒之手?这些问题都各有其道理和原因。《春秋》的经和传何时配在一起的?获麟以后的《春秋》经文是谁作的?《左传》中有用兵的谋略和兵法,这些问题都可以详细地罗列吗?

唐尧、商汤这样的圣帝明王在位,水旱之灾也不一定就没有。因此作为一个君主来说,心里应该殷切地关怀着民众的疾苦,尽力地谋求补助的办法,常常想到为民父母该表现在哪里?知道民众的疾苦,却忍心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吗?布施米粥,铸币解急,这些措施自古以来就有。《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二条聚集万民,其细目是怎么讲的?对于这些法令条规的解释,郑众和郑玄的注释各不相同。后来吕祖谦予以斟酌说明,你们可以叙述出来并予以决断吗?此外,还有散见于《周礼》其他官职中的意见,可以详细说说吗?富弼青社赈荒之策,是千古良法,他的分给田地之疏,支散斗斛之檄,今天可以效仿吗?程子赈济之论,曾巩救荒之议,朱子画一事件的奏状,其中有可以实行的吗?蠲除赋税,缓征赋役,调拨漕运去救灾,调节好粮价,赈济时以工代赈,发钱送流民,这些措施我们今天都实行了。这些在古代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制订法令制度不要轻视古代的做法,也不可拘泥于古代的做法,总之以适合时宜为好,准备拿来为我们的老百姓谋

福利呢!

士人是老百姓的模范，是未穿官服的预备官员。士人如果端正心术，陶冶性情，砥砺志节，使儒者的行为风范不致亏损，那么他的同乡人都会受到薰陶而变得善良，不会陷入奇邪之中，不会陷入邪僻里面。不然的话，老百姓以谁为榜样来学习呢？一旦他出来当了官，那么，这个士人原来廉洁，他为官就不会成为贪夫；这个士人原来善良，就不会成为酷吏；这个士人原来勤奋，就不会旷官误事；都以儒家学说作为准则。而如今有的读书人却心存侥幸，不顾箴言和检束，用不正当的手段追求功名富贵，这样做大概有辱于读书人和经籍典册吧？《礼记·王制》中的大司徒、大乐正规定的以诗、书、礼、乐四术教士，那是何等的正当而严厉！即使这样却仍然有不遵循教导的人，要怎样完善对士人的教化与引导呢？考察士人的孝廉之行则有“父别居”的歌谣流行，考察文章则士人只注意文辞的雕琢而无实用价值，正如将一部空车装饰起来而不加使用一样。举出白鹿洞书院的遗规，依照苏湖州学的教法。上面对士人很好，士人也应想想，要怎样做才能对得起主上的恩德呢？

总共这以上的四宗事体：端正君主德行以建立最高的行为准则，崇尚正学以考察古代，观察民生以遍施德惠，培养士气使民风淳厚。围绕这些问题，皇帝我起早睡晚，谋画思考，劳神到了极点，询问观察的范围也至为广大。希望你们将平素所讲习的东西抒发出来，不要泛泛而谈，不要隐瞒真情，皇帝我准备亲自加以遴选。

吴廷琛　殿试对策

吴廷琛(生卒年不详)　字震南，号棣华，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嘉庆七年(1802)状元。道光间官至云南按察使，以执法严明著称。有《归田集》传世。

臣对：臣闻思艰所以图易，稽古所以同天，惠德所以有孚，造士所以兴教。斯行远之令图，不易之通典也。稽诸载籍，钦明有作，耕凿爰

播其谣;书契聿兴,《坟》、《索》肇垂其目。余粮栖于亩首,命士宠以饰车。康乂淳良,猗欤茂矣。圣人因之,纲纪具举。有奠丽之教,有念典之训,有施舍之政,有广学之条,皆本乎设诚致行,以宜民而淑世。是以敬畏凛而酝化敷,文明昭而经术懋,乐利贻诸奕祀,声教浹乎儒林。自古帝王所为,埴在埏、金在炉、陶天下为一家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洽修和,治臻富教,固已稼穑开藉田之制,图书炳河洛之传,仓廪实而民乐其生,庠序谨而士端其行矣。乃圣怀冲挹,深维久安长治之道,弥切持盈保泰之思。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治心、典学、保赤、正俗。臣之椯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念敷奏以言之义,际兹对扬伊始,敢不敬诵所闻!

伏读制策有曰:"《尚书》传帝王心法治法,而其最深切著明者,莫如《无逸》一篇"。臣惟"敬胜"一语,肇载《丹书》。其后帝典王谟,隆轨述遵,心源阐绎,不越是旨。周公作《无逸》,凡七更端,恢之弥广,曰严恭,曰懿恭,曰寅畏,曰抑畏。"所其无逸"与"敬德作所"之义,实相发明。举三宗者,继体之贤君也。言文王者,身之所逮事也。孔安国、王肃以祖甲为汤孙太甲,马融、郑元以为武丁子帝甲。如王、孔说则世次倒置,且周公明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者,因其先后次第而枚举之词。马、郑说较长。"受命中身",《孔传》谓中身即位。然《泰誓序》:"惟十有一年",《传》又谓"周自虞芮质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盖惑于《武成》"九年,大统未集"之说。"惟正之供",《传》谓:"众国所取法,则以正道供待之。""惠鲜鳏寡",《传》谓"加惠鲜乏鳏寡之人。"案陆德明《经典释文》:"鲜,息浅反",与孔义合。后世如唐宋璟之于元宗,宋孙奭之于仁宗,皆写《无逸图》以献。考唐国史,图设于紫宸殿;宋在迩英阁,《奭传》所谓"施于讲读阁"者也。皇上朝夕亹勉,轸念民依,咸和之实政,固非往昔所可媲隆矣。

制策又以"五经之书,广大悉备",因举儒先传注之显者,以要厥指归。臣考《易》之重卦,郑元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史迁以为文王,然《系辞传》言"神农取《益》取《噬嗑》",则当断自伏羲。《系辞》本文王、周公所作,系于卦爻下者。孔子所述,乃《系辞传》也。《文言》为孔子第七翼,《乾》、《坤》,《易》之门,故特释之。壁经自魏晋间晚出,

《书》盛行而真伪始淆。刘陶又别为《中文尚书》。《武成》有程子、刘敞、蔡沈等定本,《洪范》有苏轼、王柏、金履祥等定本。录《费》、《秦誓》者,鲁有征讨之备,秦有悔过之美,故以备王事焉。《诗》南、雅、颂皆入乐,风惟篇章有豳篇,然豳、雅、颂,先儒亦未有定论。《笙诗》云笙,不云歌。刘原父谓本无其词,非亡失之亡。然《大射》管《新宫》三终,《左氏》宋公享昭子赋《新宫》。管诗有词,则《笙诗》亦应有词 。鲁自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颂,夫子因其实著之。宋,王者后,巡守不陈其风,《猗那》五篇,固颂体也。《周礼·考工》,汉博士所补,多不合周典。程泰之因谓五官各有羡数,凡羡数,百工事,当归冬官。俞庭椿亦云《司空》之篇,杂出于五官之属。《礼古经》本五十六篇,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高堂生传十七篇,皆士礼。后苍推士礼而致于天子,非也。《礼记·王制》、《乐记》皆汉儒纂辑。《春秋》公、谷二家,皆以传入经,《左氏》自杜预始分年相附。获麟后《经》,弟子因记圣师始终,据史续之。《左氏》载用兵,谋士决胜,武臣用奇,千载如见,实开《国策》纵横、史迁叙述之先声矣。

制策又以"尧、汤水旱不能必无",归于鳏惸瘝而谋补助,以尽父母斯民之实。臣惟先王之世,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岁即不登,民无菜色。然且处常虑变,定为经制。《周礼》太宰均节财用,廪人移民就谷,士师移民通财,纠守缓刑,遗人待以县都之委积,又总其要于大司徒。自散利薄征,至索鬼神、除盗贼,荒政之目十有二。先郑以去几为关市不几,后郑以为但去其税。又康成以眚礼属吉礼,而以第八条为省凶礼,亦与司农小异。东莱吕氏谓荒政始于黎民阻饥,舜命弃为后稷。夏商无闻,周则大司徒外,其详又错见于六官。春秋乞籴,国鲜九年之蓄。至李悝创平粜,谷价不贵,民安其居。斯三代后救荒良策也。后世如富弼在青州,处流民于城外,室庐措置皆有法则,使寄居游士分掌其事,而吏胥不与,其经画俱非苟且。夫法不可蔑古,亦不可泥古。皇上爱养黎元,有加无已。凡截漕、平粜、蠲赈诸善政,皆酌乎古今之宜。封疆大吏咸能实心奉行,固无一夫不得其所矣。

制策又以民之坊,官之朴,胥在于士,蕲从事于性情心术以全儒行。此又崇起士习之要务也。臣闻董仲舒有言曰:"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士苟砥砺廉隅,则其乡人闻风矜式,薰德善良。一旦以家修为廷献,廉则不贪,良则不酷,勤则不旷,素所树立然也。古者卿大夫宾兴贤能,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所以成就之者,不外乐正之四术四教。帅教者升之,不帅教者屏之。盖以下兴民行,上饬官常,考察既严,人才斯出。郑司农注《周礼》,谓“兴贤若今举孝廉,兴能若今举茂才”。汉法取士,犹为近古,故其时吏有循良之最,民鲜偷薄之风。唐取士有明经、进士、明字、明法等科,士俗所向,惟明经、进士而已。禄利之途既开,徼幸之心斯起。原其所以,不在古今立法之递变。察行而或起别居之谣,考文而空致虚车之饰,转移风教之权操自上矣。方今圣天子道德齐礼为天下先,有志之士罔不端淳淬砺,以为拜献之资。所谓言有坛宇,行有坊表,凡民有不观感而兴起者哉!

若此者:法天自强,则勤民之政举也;学古有获,则观文之化成也。重民天以固本,则德遍群黎;正儒术以树坊,则风淳比户。猗与休哉!道洽政治,腾实蜚声矣!臣尤伏愿皇上至诚无息,安益求安。鞠谋之绩维熙,益单心于夙夜;作述之成已集,弥式训于典常。厚生载永赖之功,誉髦申无敦之意。事勤乎三五,功兼乎在昔。神人禔福,中外乐康,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从艰难的地方着想是为了求得事情容易成功,考察古制是为符合天道,对民众施惠布德是为了取得信任,培养造就士子是为了兴行教育。这是能够经久行远的好策谋,是不可改变的通行典则。考察书籍的记载,自从恭敬明智的帝尧崛起,耕田凿井的民谣也就有了;文字产生以后,《三坟》及《八索》的书名也就开始流传了。余粮置于地头,委任士子用征召的车辆表示荣宠。社会安康,风俗淳良。多么好又多么兴盛啊!后世圣人继承了这种好传统,使之纪纲俱举,更为全面。于是出现了巩固天命的教诲,念念不忘学习的训导,施舍救济的政事和扩大学校教育的条规,这些都是出自设布诚恳,付诸实行,以适合于老百姓的需要而使世风美好善良的措施。所以君主懔然敬畏上天,而隆盛的教化广施于民众,文明昭彰而

经术懋畅，快乐与利益致使国家世代相传，风声和教化通彻于儒林。自古帝王用来像泥土之在模具，金属之在炉膛，而把天下陶冶为一家，就是依仗这些措施。

敬思皇帝陛下，圣德修明协和，治绩臻于富然后教的地步。本来已经是重视稼穑，早开带头耕作之制；图书繁富，彪炳于河图洛书之传。仓廪充实，积蓄很多，老百姓安居乐业。学校教育严肃，而读书人的行为端正了。然而圣怀却谦逊自抑，深深地思考着长治久安之道，更加急切地考虑着保持成业、保守太平局面。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而以治心、典学、保赤与正俗等问题进行策问。臣下这样愚昧无知的人，怎么能知道国家大事的精要？只是考虑到“敷奏以言”的大义，值此对答圣问、颂扬皇恩刚刚开始的时候，怎敢不把我所知道的东西恭敬地陈述出来呢！

跪拜敬读制策上有这样的话：“《尚书》传帝王心法、治法，而其最深切著明者，莫如《无逸》一篇”。臣下想来，“敬胜”一语，始载《丹书》，其后帝典王谟，隆轨极则，都加以祖述和遵守；对心法渊源的阐释，也不超越这个旨意。周公创作《无逸》篇，一共用了七段转折，将它弘扬得越发广大。它的要点叫“严恭”、“懿恭”、“寅畏”、“抑畏”。而“所其无逸”与“敬德作所”的含义，实际上是互相阐发和彰明的。之所以只举出商朝三宗，是因这三人都是继体的贤君，周室一家只讲文王，是因为他为周公直接侍奉的人。孔安国、王肃以为祖甲就是商汤的孙子太甲，而马融、郑玄，以为是武丁之子帝甲。如果按照王肃和孔安国的说法，则会导致世次倒置。况且周公也明明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讲“及”，这就是根据他们的先后次第而进行一一列举之词。故以马融和郑玄的说法比较合理。“受命中身”一句，《孔传》说是活到一半年龄的时候即位。然而《尚书·泰誓序》又说：“周文王十一年，武王伐殷。”《孔传》又说：“周自虞国和芮国人请问公理时，诸侯都归附于它。”人们便把这一年看作是文王受命之年，大概是被《尚书·武成》篇中“周文王九年，大统未集”的话所迷惑。“惟正之供”一句，《孔传》解释说：“因为被众国所取法，故以正道供待之。”对于“惠鲜鳏寡”一句，《孔传》解释为“加惠鲜乏鳏寡之人。”查考陆

德明的《经典释文》对"鲜"字的注音是:"鲜,息浅反。"这与孔传讲的意思相合。后世如唐代的宋璟对于玄宗,宋代的孙奭对于仁宗,都画了《无逸图》献给自己的君主。考察唐代的国史,这张图摆设在紫宸殿;宋代则放在迩英殿,《孙奭传》所谓"施于讲读阁",就是指此处。皇上朝夕勤勉,辗转反侧,时刻思念着老百姓的隐痛,本来就不是往昔帝王可以媲美的。

制策又以为"五经之书,数量广大,内容周悉完备",因而举出先儒传注中含义比较显著的,考求其宗旨所在。据臣下考察,《易经》的重卦,郑玄以为是神农所作,孙盛以为是夏禹所作,司马迁则以为是周文王所作。然而《周易·系辞传》说:"神农取《益》、取《噬嗑》",这样看来,则重卦当断自伏羲。《系辞》本来是文王和周公所作,系于卦爻之下的文字。至于孔子所论述的,乃是《系辞传》。《文言》是孔子对《周易》所作的第七个辅翼之作。因为《乾》、《坤》二卦是《易经》的大门,所以他特别地加以解释。壁经是从魏晋间晚出的,《尚书》盛行时真伪才开始淆乱。刘陶又另外造了一部《中文尚书》。《武成》篇有程子、刘敞、蔡沈等定本。《洪范》有苏轼、王柏、金履祥等定本。《尚书》之所以要收录《费誓》和《秦誓》,是因为鲁国有征伐之功,秦国有悔过之美,故以二者备王事。《诗经》的南、雅、颂皆可入乐,"风"这一部分只篇章之内有《豳篇》可入乐章,然而对于豳、雅、颂,先儒也没有固定的看法。《笙诗》云笙,不说是歌,刘原父说,《笙诗》本来就没有歌词,所以那"亡"字并非亡失之亡。然而《仪礼·大射》载吹奏《新宫》之曲三终,《左传》记宋公宴享昭子赋《新宫》。这类管弦之诗既然可以有歌词,那么《笙诗》也就应该有歌词了。鲁国自从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颂,孔夫子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著录。宋国是王者之后,巡狩时不陈献本国的民歌,而《商颂》中《猗那》等五篇,本来也就属于颂的体裁。《周礼·考工记》是汉代的博士所补上的,多不合乎周代典制。程泰之因而认为天地春夏秋这五官各有多出之数,凡多出之数都是百工之事,当归冬官。俞庭椿也说《司空》之篇,杂出于五官之属。《礼古经》本有五十六篇,大多数内容是天子、诸侯和卿大夫之制。高堂生传出十七篇,都是士礼。后苍推究士礼而扩展到天子,那是不对的。

《礼记·王制》和《礼记·乐记》都是汉儒纂辑的。《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都是以"传"升入"经"的行列的。《春秋左氏传》是从杜预时才开始分年与《春秋经》合附在一起的。获麟以后的《春秋》经文,哪是弟子们记圣师始终,根据史实补续上去的。至于《左传》所记用兵策略,像谋士是如何决胜的,武臣是如何用奇计的,虽事历千载,读来如在目前。这实开《战国策》中纵横辩说、司马迁《史记》生动形象地叙事的先河了。

制策又以为"即使是唐尧、商汤这样的圣王在位的时候,水旱之灾不一定就没有",因而归结到要殷切地关怀民众的痛苦,想办法进行补助,以竭尽作为民众父母官应尽的实际义务。臣下回想先王之世,都是以三十年的需要进行通盘计算,来安排国家的用度。这样一来,年成即便不好,老百姓也没有挨饿的脸色。然而在处于平常时,经常考虑到应付变故,以此作为定制。《周礼》上规定:太宰掌管均节财用,廪人掌管移民就谷,士师掌管移民通财,纠守缓刑,遗人又以各县都所积聚的财物进行布施抚恤。又总括其报表呈交大司徒。从散利薄征到索鬼神,除盗贼,荒政的条目一共有十二项。郑众以去除稽察是关市不查验,郑玄以为只去其税。又,郑玄以眚礼属吉礼,而以第八条为省凶礼,亦与郑众稍微不同。东莱吕祖谦以为荒政开始于古时候黎民困厄饥饿,舜乃命弃主持农业,教人们播种百谷。夏商两代没有听说荒政之事。周代则除了大司徒掌荒政之外,其详细情况又交错见于六官。春秋时有向别国借粮之法,那时国家少有九年之蓄。到李悝创造了平粜之法,谷价不贵,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三代以后的救荒良策。后世如富弼在青州,把流民安排在城外,房室安顿和其他安置工作都有法则,还让寄居游士分掌其事,而不让吏胥参与。其经营筹划都不是草率马虎的。一种制度不可轻视古代的做法,但也不可拘泥于古代的做法。皇上爱护恩养黎民百姓,这种爱心日益加深。举凡截漕、平粜和蠲赈诸项善政,都能参酌古今,采取其中最为适宜的办法。各处封疆大吏也都能实心实意地执行圣旨,本来就没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安排了。

制策又以为"百姓的楷模,官吏的预备力量,都集中表现在士人

身上”，希望士人从事于性情心术的修养，以保全儒生良好的品行。这又是提高士人习尚的一项重要事情。臣下听说董仲舒有这样的话说：“要端正事情的意义而不图谋它的利益，要明了事情是否合乎大道而不计较它的功效。”士人假如能砥砺志节，那么他的同乡人闻风效仿，就会受其薰陶而变得善良。一旦以家修之学效献朝廷，为国家服务，那么，他若原来廉洁，就不会为贪官；原来善良，就不会为酷吏；原来勤勉，就不会旷官渎职；这些都是由平日树立起来的志节操行所决定的。古时候卿大夫荐送贤能，诸侯每年向天子进献英才，他们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是大乐正的四术和四教。接受四术四教的人，就加以提升，不接受四术四教的人，就摒弃。大概因为在下面便提倡培养老百姓的德行，在上面则整顿百吏的居官职守，考察严格，人才便造就出来了。郑众注释《周礼》时说：“兴贤就好像今天的举考廉，兴能就好像今天的举茂才。”汉代取士的方法，还算是接近古代，所以那时循良之吏考核起来就挺多，老百姓中很少有苟且浮薄之风。唐代取士设有明经、进士、明字、明法等科，然而士人中所崇尚的，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而已。禄利之途既已打开，士人中侥幸的心理就兴起来了。考察产生这种习气的原因不在于古今之法的递相变化。察其孝行时，然而有的孝廉却有“父别居”的讽刺歌谣；考其文章，却导致空自雕琢文彩，就好像将一部空车装饰起来一样，这说明转移风俗教化的控制权操纵在君主手中了。如今圣天子对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天下人作出榜样。有志之士无不讲求正直淳朴，刻苦进修磨炼，以此作为日后朝廷拜献之资。所谓言论有规范，行为有标准，凡是百姓看过、感觉到这一切后，有不闻风兴起的吗？

像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取法上天，自强不息，则勤民之政就能够实现了；学习古代，很有收获，则观看天下文明的教化形成了。重视民食民生以巩固根本，那么恩德就会遍施黎民百姓；端正儒术以此树立榜样，那么每家每户都会风俗淳朴。多么美好啊！大道协和，诸政治理，已是实迹腾跃，蜚声扬名了！臣下尤其希望皇上至诚之念永不停息，安益求安。鞠躬尽瘁，为民谋利，业绩已经光大，却能更加早晚勤勉，竭尽心力。创作传述的成就已经取得，却能更加在常法中以

之为训。使民生充裕,人们得到永远依赖的功效。受到赞誉的俊杰很多,这反复表明教化培养人才没有厌倦之意。做事比五帝三王时更为勤勉,取得的功劳抵得上往昔的总和。神人福安,中外康乐,我们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是草茅小民,新登科第,不识忌讳,冒犯皇威,不胜害怕,恐惧颤抖,几乎跌倒。臣下敬答如上。

李宗昉　殿试对策

李宗昉(?~1846)　字静远,号芝龄,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嘉庆七年(1802)榜眼。历官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其出河间纪昀之门,为学精途径,明流别,通目录。有《闻妙香室文集》行世。

臣对;臣闻懋德者致治之原,学古者建事之要,惠下者奉天之本,修身者成教之基。一人主敬而主极,鉴古而垂模,施惠以学民,正德以化下。本所其无逸之念,开会归有极之源。以廛民依,端其本于严恭寅畏;以明经术,勤其业于极深研几。以惠闾阎,恺泽流而群黎共被;以端学校,儒术正而髦士攸宜。是以《易》著盛德日新,《诗》言古训是式,《书》有利用厚生之善政,《礼》有化民成俗之良箴。古帝王元化昭宣,德洋恩普,所由正一心而光四表者,盖基于此焉。

钦惟皇帝陛下,法兼圜矩,化播钧陶,则古圣以绥猷,溥至仁以育物。固已万几坐理而成宪常遵,九有乂安而礼教悉被矣。乃圣怀渊挹,弥切勤求,犹以治心、典学、保赤、正俗之要,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之椿昧,何足仰赞万一?顾泰山不辞土壤,河海不择细浣,际兹嘉言罔伏之时,窃惟拜献先资之义,敬承清问,下逮刍荛,敢不述所诵习,以效管见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尚书》传帝王心法治法,而其最深切著明者,莫如《无逸》一篇"。此诚万世君人之至要也。臣谨按《周书》,周公作《无逸》之篇,以戒成王,反覆引喻,凡七更端,其大旨以恭畏为本。盖温恭之美,古圣所先。曰严恭,曰懿恭,所以著临民之大德也。明畏之怀,前王所凛。曰寅畏,曰抑畏,所以表昭事之小心也。伊上古之世,

肇自羲、轩、顼、喾，以至尧、舜、禹、汤，本仁存心，主敬立极。遐哉邈乎！洵帝王之隆轨也。乃切鉴商之志，而近代独举三宗。严继序之思，而一家焉万穆考？孝忠所发，溢乎言词矣。夫“不义惟王”，此正所以称祖甲也，而疑为太甲，将毋穿凿不经？“受命中身”，此正可以信文王也，而妄议改元，益征附会不实。然则《无逸》一篇，既已于帝王之心法治法，灿然咸彰。而考其词义，核其旨归，商王三十三年之勤，据实而见；文王九年受命之说，不辨而自明。此其于勤民忠君，亦非无关系者。观唐之紫宸殿，宋之迩英阁，书之图之以为座右之警，非以其有裨于治道乎！我皇上御极以来，宵旰勤民，不遑自逸，恭已临下，而百度咸以修明，畏威保民，而万邦于以康乂，不诚立千古人君之极哉！

制策又以“五经之书，广大悉备，微旨未易推寻”，而因及儒先传注之显者。臣窃按《系辞》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重卦盖始于伏羲也。《文言》亦列《十翼》，而好奇者或辨《十翼》非圣人之言，既迂且诞矣。而先后天之说更不一。夫易先天为中天，易中天为后天，易小成为中成，易中成为大成。皇初浑穆，岂如是之紊乎！《尚书》初出孔壁，有百篇。安国定其可知者为《古文》，伏生所授为《今文》。虽科斗蒙之，张霸乱之，而终得显于世。迄今观《费》、《秦誓》之入《书》，圣人之深心独可见也。《诗》风、雅、颂外有南，南、雅、颂入乐，而风不入乐。《南陔》六诗，束皙补之。《商》、《鲁》二颂，后儒疑之，甚且谓《商》当阙，《鲁》当度，匪特当详不详也。以圣人所不敢废者，而欲废之，何其谬哉！《周礼·冬官》散在五典，俞廷椿欲分五官之属隶司空者为冬官，既有乱经之过。张淳之疑《士礼》不明，所谓推而至于天子之故，又未免拘固而不通。《礼记·月令》出吕不韦，《儒行》出战国时，其间如《礼运》等篇亦有后儒窜入者。《春秋》经传之间配，始于杜预。《左传》中兵谋兵法，见于列国将兵之时。如七德之议及“前茅虑无，中权后劲”，楚尚有然，齐晋何论焉？此诸经传注之显然灿著者也。我朝经学昌明，文教日盛，金匮石室之秘藏，不且星辉云烂乎！

制策又曰：“尧、汤水旱不能必无，为人君者心廑恫瘝，力谋补救”，而因思所养之之宜。臣伏思赋馆铸币，自古有之。《周礼》大司徒

以荒政十二聚万民，自散利薄征，以及蕃乐多昏、索神除盗，法良意美。下逮旅师、仓人、廪人、遗人之职，皆加意恤民焉。后世非无赈济之法，第嗷嗷待哺之余，必待奏报，然后开仓，道路攸远，文移稽滞，倒悬之急何以获舒？惟开元立法，委之妙县；洪武著令，任之有司，诚千古良法也。夫行法者，必得其人。富弼青社赈荒，人民利赖；分给田土之疏，支散斗升之檄，诚为以治人行治法。他如范公领浙西，吴中饥而兴土木，使工食技力之人皆得仰食公私。滕甫知郓州而流民得所，固与蠲赋缓征、截漕平粜同为美谈矣。林希元《荒政丛言》洞中利害，其言三难、六急、三便诸条，确有所见。以得人为最优，以拘文为大弊，不与程子赈济之论，曾巩救荒之议，朱子画一事件之状相为发明乎？皇上赈恤民生，轸念至切，真所谓孚惠心、孚惠德也，何其盛哉！

制策又以“士也者，民之坊也，亦官之朴也”，而因及端心术、治性情之要。此又立身行己之亟图也。臣闻冢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有曰儒以道得民。《礼记·儒行》一书，言儒綦详。虽其间有圣人之儒，有贤人之儒，趣不同而道则一也。夫四民之中，惟士尤贵。必砥砺廉隅，不亏儒行，而后其乡人薰而善良。以中道为准，志不惑于奇邪；以正道为归，行不蹈于匪僻。观型之众，有由然也。至于以学古之基，致服官之用。廉洁自守，岂即贪污？子惠为心，不流严酷。而且勤敏自效，更不至有旷官废职之讥。以此清应自思，庶几无愧。乃或中存徼幸，罔顾箴规，逾防检而不知，伤风化而不觉，诡遇求合，贪冒无耻，其毋乃辱青衿而羞黄卷乎！自古礼以节性，乐以导和。所以正人性情，心术之本者，原无微而不至；况大司徒、大乐正四术四教示之者，又正且严！此而犹有不帅教者，自宜坚以斥之矣。而乃移郊移遂，不遽屏之远方，可想见先王待士之优容。而躬列儒林者，当何如淬厉以端其趋向也？彼察行而或起别居之谣，考文而空致虚车之饰，亦前事之可鉴者未悉于心耳。今者学校之士，际升平之世，明礼教之原，有不争自濯磨，以求端厥士品乎！

凡此者：勤修不怠，而主德克端焉；学古有获，而经训自著焉；和辑民心，整饬士习，淳风丕播而至教广宣焉。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德盛而心弥恭，化神而志弥笃，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

长,基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培育兴盛的德行,这是达到治理的本原;学习古代,这是兴办事情的要务;施惠下民,这是遵奉天道的根本;修身养性,这是成就教化的基础。君主一人看重敬畏,主建皇极;借鉴往古,下垂模式;普施恩惠,以教民众;端正德治,以化下民。归本"所其无逸"的思想,开辟"会归有极"的渊源。用以殷切关怀民众的隐痛,在严恭和寅畏方面端正其根本。用以阐明经术,勤其事业,在穷极深奥之处和究研精微之旨方面下功夫。用以加惠里巷平民,和乐的恩泽流布而广大百姓受到恩赐。用以端正学校,儒术端正了俊杰之士便得到适宜安排了。所以《易经》载有"盛德日新"的文字,《诗经》上表达了"古训是式"的诗句,《书经》记有"物尽其用,民厚其生"的善政。《礼经》上有"化民成俗"的良好箴言。古代帝王化育万物昭彰宣扬,德行美盛,恩惠普施,之所以能够正其一心而光照四表的措施,大概就奠基于此了。

敬思皇帝陛下,法制兼容天地,教化播于陶钧;效法古代以制定大谋,普施至仁以哺育万物。本来已经万机自然料理,成法常常遵守,九州安康,人们广泛地蒙受了礼教。然而圣心却深厚又谦虚,更加殷切地勤加探求,仍然用治心、典学、保赤、正俗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将臣下等召进朝廷而加以策问。像臣下这样的愚昧无知,又怎么能对陛下作出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帮助呢?但是泰山是不会辞让小土的添增的,大河大海是不会选择细小的水流汇入的。臣下有幸生逢这种嘉言善语不会被埋没的时代,私下里暗暗想着拜献先资的大义,敬承陛下的清审详问下及割草打柴的乡野之民,又怎么敢不敬述平日所诵习的那些东西,以效献管窥蠡测的一点微小赤诚之情呢!

跪拜敬读制策上有这样的话:"《尚书》传授帝王的心法和治法,而其中最为深切著明的,莫过于《无逸》这一篇了"。这确实是万世以来,君人之术中最为重要的了。臣下谨按《周书》,周公制作《无逸》篇,以此告诫周成王。反复引喻进行说明,一共用了七段转折,每个

转折后的内容，其主要旨意都是以恭畏作为根本。大概温良恭谨的美德，这是古代圣人所首先讲求的。之所以强调严恭、懿恭，是用来表明君临民众时的一种大德。明了畏惧的心怀，这是前代君王警惕地保持着的。之所以强调寅畏、抑畏，是用来表明临事时应该小心谨慎的。在上古之世，以伏羲、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开始，直至唐尧、虞舜、大禹、商汤，他们都以仁为本，存于心中，以恭敬之心为主，来建立帝王统治的准则。这是多么久远的事啊！确实是帝王的最高规范了。而周公却更加深切地注意以商朝为借鉴，于是近代就独举商朝的三宗。为了严继序之思而重一家传承，哪能讲许多祖先？所以就专讲文王，那番忠孝之情在发论时已经溢于言词了。“不义惟王”一句，正是用来称祖甲的。而有的人怀疑为太甲，这恐怕是穿凿不经。“受命中身”一句，这正可以相信是讲的周文王。而妄议改元之事，则更加证明那是附会不实的。既然如此，那么《无逸》这篇文章，已经对于帝王的心法、治法，讲得十分清楚明白了。而考察这篇文章的词义，核实它的宗旨所在，则商王祖甲三十三年的勤勉，据实可见；文王九年受命之说，不辨而自明。这些词句对于勤民忠君，也并不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看唐代的紫宸殿，宋代的迩英阁，写上文字，画上图画，以此作为座右之警，不就是因为它们有裨于治道吗？我皇上即位以来，朝夕不懈，勤政为民，也没有空儿休息一下。恭谨克己，君临天下，而百事都得以修明，上畏天威，下保民众，天下万邦都得以安康太平，不确实是设立了千古以来人君的最高规范吗？

制策又以为“五经之书，数量广大，内容完备，精微的旨意不易推求寻绎”，因而谈及儒学先辈传注中那些比较明显的问题。臣下考察《周易·系辞》说：“八卦成列，像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重卦大概始于伏羲的时候。《文言》也列在《易经》的《十翼》之中，而好奇者有的辨别，认为《十翼》并非孔子圣人之言，这就既迂腐而且又荒诞了。而《易经》有先天、后天的说法，就更不一致了。改先天为中天，改中天为后天；改小成为中成，改中成为大成。皇初浑穆，难道会是这样的紊乱吗！《尚书》最初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传出，有一百篇。孔安国确定其中可知者为《古文尚书》。伏生所传授者为《今文尚

书》。尽管是蝌蚪文字蒙蔽了它的内容，张霸又将它搞乱了，但最终得以显白于世，一直传到如今。观看《费誓》、《秦誓》被收入《书经》中，圣人的深远用心唯独可以看到了。《诗经》中风、雅、颂之外有二"南"，南、雅、颂可入乐，而风不入乐。《南陔》等六诗，是束皙补上去的。《商》、《鲁》二颂，后来的儒家学者怀疑它，甚至认为《商颂》当阙，《鲁颂》当度，并不只是当详不当详的问题。以圣人所不敢废弃的东西，而要废掉它，这该是多么荒谬啊!《周礼·冬官》散在五典，俞廷椿欲分五官的属官中隶属司空的合为冬官，这样做已有乱经之过。而张淳之又疑《士礼》不明，所谓推而至于天子之故，则又未免拘泥固执而不通。《礼记·月令》出自吕不韦之手。《礼记·儒行》篇则出于战国时期。其间《礼记·礼运》等篇也有由后儒窜入之作。《春秋》的经文和传文相配，开始于晋人杜预。《左传》中的用兵之谋及兵法兵制，已见于列国将兵之时。比如楚人"七德之议"以及"前军以旄旌开路以防意外，中军斟酌谋划，后军以精兵押阵"等谋略。楚国尚有这样的兵谋，齐晋等国就更不用说了。以上这些都是诸经传注中一些明显突出的例子。我朝经学昌明，文化教育一天天兴盛，皇家图书馆的秘藏不将会越来越多，星辉云灿吗!

制策又说："就是唐尧、商汤这样的圣王在位，水旱之灾也不一定没有。所以作为君主的人，在心里要殷切地关怀着民众的疾苦，要尽力谋求补救办法"，因而思念着保养老百姓的适宜措施。臣下想来，施布米粥和铸币，这样的措施自古就有。《周礼》记载，大司徒以荒政十二条聚集万民，从散利薄征，一直到收藏乐器不演奏、婚礼从简和索神除盗，法制良好，用意美善。下及旅师、仓人、廪人、遗人等官的职掌，都特别注意体察、关心老百姓。后世也不是就没有赈济之法，只是民众早已嗷嗷待哺，却一定要等到地方奏报上来批转下去，然后才能开仓。其间道路遥远，文书稽留停滞，饥民的倒悬之急又怎么能够得到舒缓呢!惟有唐代开元时之法，委之妙县；明初洪武时定令，任之有司，这些确实是千古良法。然而推行这些法令的人，一定要是很胜任的人。富弼青社赈荒之法，人民得利，并有了依靠。其分给田土之疏，支散斗升之檄，确实算得上是以治人推行善法。其他如范公领

浙西时，吴中百姓饥饿，范公便兴土木，使得那些工食技力之人都能有口饭吃。而滕甫知郓州时，流民得到了合理安排。这些本来与蠲赋缓征、截漕平粜等措施同为佳话了。林希元《荒政丛言》透彻地切中利害所在，他所讲论的三难、六急、三便各条，确有所见。总之以得人为最优，以拘文为大弊。林氏不与程子赈济之论，曾巩救荒之议，朱子画一事件的奏状相互阐发彰明吗？皇上赈济并关心民众生活，辗转思念至为殷切，真是所谓"孚惠心、孚惠德"呀，这种恩德又是多么的盛大深厚啊！

制策又以为"士人是老百姓的模范榜样，是没有穿官服的预备官员"，因而论及士人端正心术、陶冶性情的重要办法。这又是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所应当急切地讲求的东西。臣下听说，冢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其中有一条叫"儒以道得民。"《礼记·儒行》一书，对"儒"的问题讲得很详细。虽然其间有圣人之儒，有贤人之儒，二者追求趋向不同，而大道则是一致的。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只有士最尊贵。所以作为士人来说，一定要砥砺志节，不使儒生的行为标准有所亏损，然后他家乡的人才会受到熏陶感染而变得善良。要以中道为标准，使志节不被奇邪之说所迷惑；以正道为依归，使行为不致陷入邪僻之途。所以，学习士人榜样的人很多，这是有来由的。至于凭借学习古人这样一个好的基础，用到当官的实践中，当然会廉洁自守，难道会贪污？心里想着养护民众，施恩百姓，为政就不会流于严酷。而且能够以勤劳黾勉来要求自己，这就更不致于会招来旷官废职的讥议了。用这样清廉的标准自己想想，对照一下，言行就差不多可以无愧于心了。然而如果心中存在着侥幸的想法，不顾别人的箴言和规劝，超越了规范、纪律而不自知，伤害风气而不自觉，用不正当的手段猎取名誉地位，贪图财利，不知羞耻，岂不将会辱没秀才之名而使书籍蒙受羞耻吗？自古以来，礼是用来节制性情的，乐是用来导致中和的。古人用来端正人的性情、心术这个根本的措施，原来是无微不至的。何况大司徒、大乐正以四术和四教向读书人作出的示范，既正确又严格，即使这样却仍有不接受教育的人，自然应该坚决地进行斥责了。然而对他们仍然只是移郊移遂，不立即放逐到远方，由此可以想

见先王对待士人的优待与宽容态度。亲身列名为儒林的人，应当怎样刻苦进修而端正自己的前进方向呢?那些察行而有"父别居"的人，考文而空致"虚车之饰"的人,也是因为对于以前可借鉴的历史事实，没有全部将它们记在心中，作为借鉴罢了。如今我们这些学校的读书人，正碰上升平盛世，明了礼教的渊源，可以不争先恐后地修养磨砺，以求端正自己士人的品行吗?

像上面所讲的这些问题:勤勉修养而不怠荒，君主的德行就能端正了;学习古代而有收获，经典的训释自然彰著了;协和安辑民心，整饬士人的习尚，淳朴的风俗就能得到大面积的传播，最好的教化就能得到广泛的宣扬了。臣下尤其希望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德行懋盛而心意更加恭畏，教化神奇而意志更加笃诚，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皇祚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是草野小民，新登科第，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恐惧颤抖，几乎跌倒。臣下敬答如上。

朱士彦　殿试对策

朱士彦(?~1838)　字休承，号永斋，江苏宝应人。嘉庆七年(1802)探花。后历任会试、乡试考官，进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等。撰《国史·河渠志》。道光十八年卒。

臣对:臣闻懋德者建中之要，观文者成化之原，德施普而兆民蒙乐利之休，正教彰而多士得训行之准。《书·无逸》曰："则皇自敬德。"王肃注:"况滋益用敬德也。"《春秋传》曰:"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易》疏曰:"圣人得长久之道,以光宅天下,使万物从化而成也。"《礼记》疏曰:"学《书》于有虞氏之学，学礼乐于夏后氏之学，学舞于殷之学。"古圣人宅中御宇，惟是道契危微，学勤稽览，仁风广布，教思无穷，用能握乾符而凝泰运,绍燕翼而集鸿休也。

钦惟皇帝陛下,稽古同天,容民如地,固已文思横被于四表,俊德上迈乎九皇，保太和而仁寿同登，建皇极而垓埏顺则矣。乃圣怀冲

挹，深维长治久安之理，弥切持盈保泰之图，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慎德、稽经、保民、训士。臣知识椿昧，何足以仰赞高深？幸际悬鞀设铎之辰，窃闻土壤细流之义，对扬伊始，拜献先资，敢不缕述谫闻，恪陈一得，以效管蠡之窥测乎！

伏读制策有曰："《尚书》传帝王心法治法，而其最深切著明者，莫如《无逸》一篇"。此诚往圣之微言，而千秋之宝鉴也。臣惟《大戴礼·丹书之训》曰："敬胜怠者吉。"《逸周书·程典》曰："助余体民，无小不敬。"言主敬也。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又"黄帝在民上，兢兢如临深渊。"言知惧也。"恭"、"畏"二字，实为要义矣。羲、轩、顼、喾，皇煌帝谛之号可稽；尧、舜、禹、汤，典谟训诰之文具在。而言守成非言开创，则举三宗而道统已该。为家学即为治原，则称穆考而皇猷丕著。马、郑之训祖甲即太甲也，以世次为先后。梅氏本始以祖甲为帝甲，而"不义为王，旧为小人"，皆太甲事也。《石经》作高宗享国百年，既与古文之年不合；祖甲在中宗之前，又与古文之次不合，则太甲为允矣。"受命中身"，溯自即位。然《大雅》疏引《洛诰》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取白鱼，皆七年"，则衔书止户非尽荒。注疏又引《诗纬》云："一年听虞芮之讼"，则向化归心，端由渐被。"惟正之供"，供，《尔雅》训"具"，则两义皆通。"鲜"之声，齐、鲁近"斯"，则生意为正。皇上小心翼翼，终日乾乾，犹时以《无逸》为戒，唐虞三代以来未之有也。彼夫宋璟、孙奭书先《六箴》、图偕《七月》者，讵足拟哉！

制策又曰："五经之书，广大悉备"，而要于推寻微旨，撮举传注。臣闻《周官》三《易》，其经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贾氏疏引《归藏坤开筮》："尧降二女为舜妃。"又见《节卦》云："殷五有国，常毋谷。"则重卦当为伏羲神农。而《史记》云文王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者，非矣。唐之定本无"《文言》曰"三字，则《乾》、《坤》之有《文言》，非古经也。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则《系辞》似无可疑。"先天后天"，肇自宋儒，汉学固未之有也。马、郑所注之《古文》止二十八篇，太史公亲从安国问故，则放勋郁夷导洚是也。"西有河，北为济，东为淮，南为江"，此真古文《汤征》也。"有火入于王屋，流为雕"，此真古文《泰誓》也。《汉书》引"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此真古文《伊训》

也。证以韦昭、杜预逸书之说、《舜典》、《益稷》割裂之迹，而孔氏之《传》不辨自明矣。刘陶以博士《今文》、孔壁《古文》校定为《中文尚书》。蔡沈之今考定《武成》，苏轼移"五省惟岁"于"四五纪"之下，皆有可取。《费誓》、《秦誓》本鲁太史所著录，非圣人有意其间也矣。札观乐，首歌《周南》、《召南》，故南、风、雅、颂为四体。《吕览》：涂山之女始为南音，则南非南国之谓也。《诗谱》：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于诸侯歌《文王》，合《鹿鸣》。于大夫歌《鹿鸣》，合乡乐。乡乐见《仪礼》，《关雎》之三，《鹊巢》之三也。四者入乐，则列国之风不为乐，审矣。《笙诗》之辞，郑注《仪礼》谓佚于删诗之前。后得《毛传》，定为散于孔子之后。鲁、宋之诗，采风不及，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见于《诗序》。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见于《国语》。鲁、商所由有颂也。李氏献《周礼》，缺《冬官》一篇。而俞氏以为散在五典，则事典竟为虚设，匠师属何官乎？《仪礼·聘礼》、《公食大夫》、《觐礼》迥非士礼，而禘于太庙礼、烝尝礼、中霤礼，自属逸篇。《礼记》中《月令》、《乐记》、《明堂位》相传马融所增。然桥君《章句》已称四十九篇，刘向《别录》亦云《乐记》第十九，后人何所增哉？《左氏》析传附经始于杜预，获麟后《经》亦出孔门。先轸、狐偃之谋，偏伍鹳鹅之法，皆兵家之要也。圣天子鉴古右文、章明经学，炳炳平驾石渠虎观，而出其上矣。

制策又以"尧汤水旱不能必无"，而因思所以补助之法。臣闻尧以历山之金铸币，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皆所以赐贫穷也。大司徒荒政十有二，始"散利、薄征"，终"索鬼神、除盗贼"。此外县都之委积以待用见于遗人，移民就谷见于廪人。诚以耕三余一、耕九余三者，其常也。人食三脯、人食二脯者，其暂也。储之于平日而缓急有备，则朱子社仓之法为最优。救之于临时而老弱无虞，则富弼赈荒之策为最善。《赍序》曰："赍，予也。所以锡予善人也。"《假乐》传曰："宜民，能安民也。"我圣朝子惠黔黎，凡夫蠲赋缓征、截漕平粜之事，亦既被和食德，而偶遇偏灾，复鬻赈兴工，资送流民，期无一夫之失所。是以含哺鼓腹，无不褰鼓轩舞，而效康衢之祝也。猗欤休哉！

制策又曰："士也者，民之坊也，亦官之朴也"。臣考《尚书大传》，

尧舜之时，必有命民，而诸侯贡士，一适谓之攸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周官》使民兴贤，先郑谓犹今举孝廉也。使民兴能，先郑谓犹今举茂才也。夫以文取士，或徒竞浮华绮丽之辞；以德举人，亦不乏饰行矫情之辈。唐人进士，试文也，而求知己、温卷、关节、书策之弊生。魏之中正观行也，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仕族之诮起。诚纳之六艺以博其文，期之九品以课其实，则虎门师保既可以育英才，鹿洞规模益足以征远大。士生今日，有不争自濯磨、仰副皇上作人之雅化乎！

若此者：盛德日新，所以建中和之极；典章赅备，所以鉴成宪之垂。怀保惠鲜，而水毁火旱豫筹补救之方；选造誉髦，而户诵家弦悉荷甄陶之力。臣尤伏愿我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天德懋而勘毖维严，正学崇而就将弥切。民风和乐而怙冒遍九垓，士习敦庞而薰陶周万类。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基此矣。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懋盛的德行是建立大中之道的重要因素，观察文采是成就教化的渊源。恩德普施而万民蒙受快乐和利益的美好恩赐，纯正教令彰明而读书人获得行为规范遵从的准则。《尚书·无逸》说："他们就更加敬慎自己的德行了。"王肃注释说："何况他们更加要敬慎德行。"《春秋左氏传》说："他喜受礼乐而勤勉地学习《诗》、《书》。《诗》、《书》是道义的府库，礼乐是德行的准则。"《易经》的疏解说："圣人获得长治久安之道，以普遍安定天下人民，使万物跟从化育而得以形成。"《礼记》的疏解说："学《书经》于有虞氏之学，学礼乐于夏后氏之学，学舞于殷之学。"古代的圣人居于中央，统御宇宙，只管治道合乎精一危微之旨；学问广博，勤于考察，泛览典籍；仁政之风广布天下，教化之思延及无穷。因此能够手握乾符，巩固吉祥的运数，继承先王的燕翼之谋而招集洪大的福祉。

敬思皇帝陛下，稽考古制同于苍天，容载民众如同大地，本来已经是功业和恩施广布四方，俊美的德行上迈远古的九皇，保合太和元气而仁寿同登高峰，建立帝王统治的准则而八埏九垓的人都能顺从

这个规则了。然而皇上的胸怀却谦虚自抑，深深地想着长治久安之理，更加深切地注意考虑保持成业和太平局面的问题。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而以慎德、稽经、保民、训士等问题进行策问。臣下知识浅陋、愚昧，怎么能够对皇上高深的学问有所帮助？不过臣下有幸碰上了悬鞀设铎、广采群言的好时机，又私下里曾经听到过泰山不避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的大义，当此对答称扬圣问刚刚开始的时候，想着拜献先资的意义，怎么敢不详尽细微地陈述我的那一点点知识，恭敬地陈献自己的千虑一得，效纳臣下管窥蠡测的见闻呢！

跪拜敬读制策上有这样的话："《尚书》传授帝王的心法和治法，而其中最为深切著明的莫过于《无逸》这一篇了"。这确实是以往圣人精微的言论，千年以来宝贵的明鉴。臣下想到《大戴礼记·丹书之训》说："敬胜怠则吉。"《逸周书·程典》说："助余体民，无小不敬。"这是讲的主敬。帝尧诚言说："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又说："黄帝在民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这是讲的要懂得戒惧。"恭"和"畏"这两个字，实属要义所在了。伏羲、轩辕、颛顼、帝喾，皇即是煌，帝即为谛，从这些名号里可以考察出来。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尚书》的典、谟、训、诰的文字都在，可以考见他们的事迹。而周公说的是保守成业，不是讲开创洪基，所以只举出商朝的三宗，道统即已概括无遗了。研究家学即为治道的渊源，所以称穆考文王，帝王的谋划也就很显著了。马融和郑玄二人之所以解释祖甲即为太甲，是按照世次的先后推定的。梅氏本《尚书》才开始以祖甲为帝甲。然而"不义为王，旧为小人"，这都是太甲的事迹。《石经》作高宗享国百年，既与古文之年不相符合；祖甲在中宗之前，又与古文的次第不相符合，那么还是以祖甲为太甲恰当些。"受命中身"一句，是从周文王即位算起。然而《诗经·大雅》的疏文引《洛诰》注释说："文王得赤雀，武王取白鱼，皆七年"，这就表明衔书止户并非全是荒诞无稽的。注疏又引用《诗纬》的话说："一年听虞、芮之讼"，这就表明向化归心，确实是逐渐形成的。而"惟正之供"一句，"供"字《尔雅》解释为"具"，则两义皆可通。"鲜"字的读音，齐、鲁之地近于"斯"，则解释为"生"，意思为正。皇上小心翼翼，终日高度警惕，还是经常以《无逸》篇为戒，这是唐虞

三代以来所没有过的。至于像唐朝宋璟在李德裕献呈《丹扆六箴》以前写字，宋朝孙奭画图和《诗经·七月》相配，又岂能相比呢！

制策又说："五经之书，数量巨大，内容完备"，因而要推求寻绎经书精微的含义，撮要举出一些重要的传注。臣下听说，《周礼》中所讲的三《易》，其经卦都分八卦，如果推衍开来，则为六十四卦。贾氏疏引《归藏坤开筮》说，尧降二女作为舜的妃子。又见到《节卦》说："殷五有国，常毋谷。"那么重卦当为伏羲、神农所作。而《史记》却说周文王将八卦两两相重，配合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唐代的定本《易经》没有"《文言》曰"三字，则《乾》卦、《坤》卦之有《文言》，并不是古经。孔子喜读《周易》，以至编连简书的皮条断了三次，所以为《周易》所传，那么《系辞》为孔子所作似无可疑。《易经》分"先天后天"的说法自从宋儒开始才有，汉代学术界本来就没有这样讲的。马融、郑玄所注的《古文尚书》只有二十八篇。太史公司马迁亲自跟随孔安国学习故实历史，那么"放勋郁夷导淮"就是真的了。"西有河，北为济，东为淮，南为江"，这是真的古文《汤征》。"有火入于王屋，流为雕"，这是真的古文《泰誓》。《汉书》引"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这是真的古文《伊训》。以韦昭、杜预"逸书"之说证之，那么《舜典》、《益稷》割裂的痕迹，以及孔安国作《传》的事，就不辨自明了。刘陶以秦博士伏生的《今文尚书》及孔壁所出的《古文尚书》互相校定，成为《中文尚书》。蔡沈考定《武成》，苏轼移"五省惟岁"于"四五纪"之下，都有可取之处。《费誓》和《秦誓》本是鲁国太史所著录的，并不是孔子圣人有意要这样作编排的。吴季札观乐，首先就歌咏《周南》、《召南》，所以南、风、雅、颂为《诗经》的四体。《吕览》记载涂山氏之女始为南音，则"南"并不是说南国。《诗谱》说：天子招待诸侯领袖，歌奏《肆夏》，合奏《文王》。对于诸侯，则歌奏《文王》，合奏《鹿鸣》。对于大夫，则歌奏《鹿鸣》，合奏乡乐。乡乐见于《仪礼》，即《关雎》之三，《鹊巢》之三。上述四者入乐，那么列国之风不为乐，这就很明显了。《笙诗》之辞，郑玄注《仪礼》时说亡佚在孔子删诗之前，后得《毛传》，定为散逸于孔子之后。鲁、宋之诗，行人采风时不及收集，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见于《诗序》。正考父在周太师那里得到《商

颂》十二篇，以《那》为首，此事见于《国语》。这是鲁、商之所以有颂的来由。李氏所献《周礼》，缺《冬官》一篇。而俞氏以为《冬官》散在其他五典，则事典竟然成为虚设，匠师又属于何官呢?《仪礼·聘礼》、《公食大夫》、《觐礼》决不是士礼，而禘于太庙礼、烝尝礼、中霤礼，自属逸篇。《礼记》中的《月令》、《乐记》、《明堂位》相传为马融所增。然而桥君的《礼记章句》已称有四十九篇，刘向的《别录》也说《乐记》第十九，后人又怎么可能增补呢?《左传》被按年分开与《春秋经》相附，始于杜预。西狩获麟以后的《春秋》经文也出自孔门弟子之手。先轸、狐偃的谋略，偏伍的车战法，鹳鹅的军阵法，都是在《左传》中讲到的兵家的要略。圣天子借鉴古代，崇尚文籍，彰明经学，灿烂显赫，已经凌驾石渠阁、白虎观的讲论经典，而超出其上了。

制策又以为“即使是帝尧、商汤这样的圣王在位，水旱之灾也不一定就没有”，因而思考着以什么方法来对百姓进行补助。臣下听说尧以历山之金铸币，汤以庄山之金铸币，都是用来赐给贫穷人的。大司徒掌管荒政十二条，从“散利、薄征”开始，到“索鬼神、除盗贼”为止。此外，各县都积储粮食财物以等待灾荒时应急之用，这个措施见于《周礼》的遗人，移民就谷的措施见于廪人。确实是因为耕获三年，要积余一年，耕获九年，要积余三年，这是他们的常制。人食三鬴或人食二鬴，这是周代暂时的措施。粮食和财物在平日储存起来，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有了应急之备，则以朱于社仓之法为最优。碰到灾难而采取临时应急措施，而使老弱无忧，则以富弼赈荒之策为最善。《诗序》中的《赉序》说：“赉是予的意思，是用东西赐予给善良的人。”《诗经·假乐》的注解说：“宜民，是能安民的意思。”我圣朝养护并施惠于平民百姓，凡属那些蠲免赋税，缓征徭役，以及截漕平粜等事都实行过，老百姓已经蒙受和气，正常生活。一旦偶然遇到小的灾害，又采取鬻赈兴工、发钱资送流民等措施，以期达到没有一个人流离失所。所以老百姓都能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没有哪一个不击鼓而喜歌，高蹈而欢舞，共献康衢的祝福。这是多么美好啊!

制策又说：“士人，是老百姓的榜样，也是官员的后备力量”。臣下考察《尚书大传》，在帝尧帝舜之时，必有命民而由诸侯贡士，一次

合适叫做诸侯好德,二次合适叫做尊重贤才,三次适合叫做对天子有功。《周礼》上的使民兴贤,郑众说是"犹今举孝廉"。《周礼》上的使民兴能,郑众说是"犹今举茂才"。如果按文才取士,有的人便只是竞相写作浮华绮丽的文辞;如果按德行来推举人才,则亦不缺乏弄虚作假、矫揉造作之辈。唐代的进士要试文章,则求知已、温卷、打通关节、挟藏入试等弊病就产生了。曹魏的九品中正要观察士人的德行时,则"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仕族"的讥诮就兴起来了。如果真的能够以六艺来博观他们的文才,用九品来考核他们的等次,那么虎门的师保既可以培育出英杰俊才,而白鹿洞书院的规则也可以使大贤士涌现出来了。士人有幸生活在今天,可以不争相修养磨练,以求符合皇上培养人、教化人的殷切期望吗?

像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懋盛的德行日日更新,用以建立中和的最高治国准则;典籍图书完备,用以借鉴成宪,垂示后世。关怀保护加惠那些资用匮乏的人,对水、火、旱灾等要预先筹划好补救的办法。选择造就美好的才俊之士,家家户户诵读弦歌,都蒙受培养教导之恩。臣下仍然更希望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天德懋盛而更加谨慎恭敬,正学崇高而更加急切地求学就教。民风和乐而赖以幸福生活的景象遍及九重天,士人的习俗敦厚朴实而各种各样的人都深深地受到他们的薰陶,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吉庆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是草野小民,新登科第,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害怕,恐惧颤抖,几乎跌倒。臣下敬答如上。〔李绍平译〕

清仁宗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殿试策问

[嘉庆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仰膺昊眷,统驭寰区,十年于兹。朝乾夕惕,不遑暇逸,以冀绍古帝王执两用中之治,保大定功之谟,黜陟以严考课,宣防以利转输,期臻上理,爰待嘉谟。

《尚书》综帝王之治道,二《典》必始"钦恭",《洪范》九畴,亦必原于五事之敬,而要皆本于一诚。《书》言精一,《中庸》言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诚也。盖诚则必敬,敬则必勤。君人在上,缉熙单心,所以敬天位;人臣在下,精白敬事,所以亮天工。故敬天即以勤民,至诚即以格天,其致一也。六籍所著,其与敬勤之旨相印合者,可综贯而条举欤?《大宝》、《丹扆》之箴,典矣茂矣。朱子《或问》所言治道,《皇极经世书》言君道、臣道十二则,《大学衍义》纲举四条,皆本心传以发明治道。能详述之欤?

古者寓兵于农,伍、两、卒、旅,蒐、苗、狝、狩,制善法良,有明征已。汉设郡国材官、骑士。唐置府兵,后更矿骑,其制已异于古。宋有禁、厢、乡、蕃之目。苏轼言被边百姓,自相保聚,可收爪牙之利;司马光复言其害。可悉指欤?盖兵于无事之时,训练为尤急,勤练则可使有勇,教训则可使知方。《孙子》所谓"练士",吴子所谓"治军",可备举欤?太宗与李靖《问对》中所言足法、手法,可通于古步、伐、止、齐之

义欤?若平时以游惰之民募补,又以杂色服役之人滥充,是岂国家设兵卫民之意欤?膺斯任者,宜何如督率而振厉之也?

《书》曰: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尧舜犹兢兢于察吏,考绩之典所自昉也。《周官》弊吏,一以"廉"为本。汉时取士曰"兴廉",察吏曰"廉察",其亦本此意欤?朕乙夜批章,日昃不遑。内而卿尹,外而疆吏,共矢法廉,以襄予治。果何以僚属咸知励职,吏胥不致逞奸?乃或甘优逸而案有积延,避吏议而事多消弭,是岂惠养吾民之意欤?《书》言无旷庶官,《传》言民生在勤。夫循名责实,则人不旷官;朝考夕稽,则吏皆勤职。其果何道之从欤?

古之治河者,治一河而止耳。今则合淮与漕治之。黄河自失故道,遂累代为患。《史记》谓水行平地,数为败,故禹厮二渠,北载之高地。夫水性趋下,引之高地,转不为害,何也?河之变迁屡矣,唐一代河患最少,其故安在?论者谓水性北行,折之东南,故易决溢。此修防所宜亟讲也。元明以来,余阙、邱浚、潘季驯诸人之议,孰为得失?国家岁漕四百万粟,以供天庾,必取道于黄、运两河。而以清刷黄,尤为轵渡利漕要法。今于束清御黄两坝之外,别有长策可臻一劳永逸欤?

若此者:稽古而讲求治理,饬戎而绥靖嘉师,官方叙而纲纪毕张,漕运利而堤防永固。有典有则,是经是程,仁望谠言,籍资启沃。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说:老年人让他安逸,朋友让他信任我,年轻人让他怀念我。

喜悦、愤怒、哀伤、欢乐没表现出来,这叫做"中"。

思想意志是最紧要的,意气感情是第二位的,所以说要持守本人的思想意志,不要滥用本人的意气感情。〔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仰承上天眷顾，统治天下，到如今已经十年了。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从早到晚高度警惕戒惧，小心勤慎，不敢有半点闲逸松懈。希望以此继承古代帝王“执两用中”的治理方法，采用“保大定功”的谋略，对官吏的任免升降严格执行考课制度，修浚河堤，宣泄洪水，以便使航运畅通。如今期待着国家的治理能达到最好的境界，盼望你们能够提供好谋略。

《尚书》综合了帝王的治国之道，《尧典》和《舜典》二文叙事必始于“钦恭”。《洪范》九畴，也一定以“五事之敬”为始基，这些最后都归根于“一诚”。《尚书》说要“精一”，《中庸》则说“所以行之者一”。所谓“一”就是“诚”的意思。大概一个人若有诚心，行动就会恭敬，行动恭敬就一定会勤劳。作人君的处在上位，光明纯白，尽心尽意，以敬奉大位。作人臣的处在下位，也会心地纯洁，恪尽职事，以辅助皇天赋予的任务。所以敬奉上天就是为了忧劳百姓，心虑至诚就能感通上天，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六经》所记载的内容，其中哪些与敬天、勤民的含意相符合，可以综合贯通，一条条列举出来吗？前人所著《大宝》、《丹扆》等箴言，思想纯正典雅，内容茂美丰富。朱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所讲的治道；《皇极经世书》所言君道、臣道十二则；《大学衍义》列举大纲四条，都是依据十六字心传，再推阐发明治国之道，能将它们详细地叙述一下吗？

古时候寓兵于农，伍、两、卒、旅等军事组织，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等围猎习武形式，制度很好，方法优良，在历史上都有了明确的验证。汉代设置地方部队材官、骑士。唐代开始设置府兵，后来改名为矿骑，其制已与古代不同。宋代有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等名目。苏轼说，沿边一带的百姓自相聚集，互相保护，可以起到保卫边疆的作用。司马光却又论说这种做法的害处。对此可以全部指陈出来吗？一般说来，军队在无事之时，训练就应特别抓紧。因为勤练就可以使士兵艺高胆大，作战勇敢；教训则可以使将士懂得作战目的。孙子所讲的“练士”，吴子所说的“治军”，可以详尽地列举出来吗？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中所谈到的足法、手法，可与古代的步、伐、止、齐等战术动作的含义相通吗？如果平时招募那些游手好闲和懒惰的百姓，以之补

充兵员；或者又以各种服役之人滥竽充数，招入队伍，这难道是国家设兵卫民的本意吗？承担统军任务的人，应该如何督责指挥、激励振扬他们的士兵呢？

《尚书》说：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尧舜尚且小心谨慎地督察官吏，考绩的典制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根据《周官》所记裁断官吏的办法，一概以“廉”作为根本。汉代时取士叫做“兴廉”，察吏叫做“廉察”，是否也是依据这个意思发展而来的呢？皇帝我直到二更时分还在批阅奏章，白天太阳偏西仍顾不上吃饭。朝廷上有公卿京尹，地方上有封疆大吏，大家都一起发誓，表示要坚持法治，坚持廉洁，以帮助皇帝我治理国家。到底要怎样才能使僚属都知道恪尽职守，地方吏胥不致于奸谋得逞呢？然而有的官吏却沉迷于优游逸乐，以致于断案有积滞拖延；或者因为畏避吏议，而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掩盖起来不上报，这难道是爱护、抚养我们的民众所应抱的态度吗？《尚书》上说：不要荒废职守。《左传》上说：民生在勤。如果政府对百官能循名责实，那么人们就不会荒废自己的职守；如果坚持经常的考察，那么官吏就会勤于本职工作。到底要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

古代治河，仅仅治理一条黄河罢了。如今则要加上淮河与运粮水路一并治理。黄河自从它的故道改变以后，于是累代为患。《史记》以为，一旦水行平地，便会多次造成破坏。所以大禹分凿二渠，将黄河往北引到高地。一般水性是往低处流的，可把它引到高地反而不为害，这是为什么呢？黄河河道变迁发生过许多次了，只有唐代黄河为患最少，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呢？论者以为水性往北流，现将它折转往东南走，所以容易决口泛滥。这是修堤防洪时急须讨论的问题。元明以来，余阙、邱浚、潘季驯等人的议论，谁优谁劣？国家每年漕运四百万石粮食以供应京师皇仓，一定要取道黄河和运河这两条水道。而以清刷黄尤其是挽渡利漕的一个重要方法。如今在束清、御黄两坝之外，还有别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可以使治河工作一劳永逸吗？

像以上所讲的问题：考察古制以讲求治理国家的办法，整饬兵戎以组成建一支好军队，百官遵守常规而纲举目张，漕运顺畅便利而堤防永固。既为典制，又有准则，以为常规，以为程式。殷切希望你们发

表正直的言论,以便作为对皇帝我的启发引导。不要泛泛而谈,不必禁忌隐讳,皇帝我将亲自审阅。

彭浚　会试卷三道

彭浚(生卒年不详)　字宝臣,湖南衡山人。嘉庆十年(1805)状元。历官翰林院侍讲、福建正考官、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等。生平志行过人,屡为主考官,门生故吏很多。其内行纯备,生活节俭,数助乡学,为乡里所称赞。65岁去世,邑人为之立祠。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因人而与,圣人之志,在天下也。夫老者、朋友、少者,无日不接于天下也;安、信、怀,因而予之,子之志不诚大哉!尝思万物待理于圣人,而圣人则以万物之心为心者也。圣人在上,行乎心之所得为,而其功巨;圣人在下,言乎心之所欲给,而其志真。任物情之得所,只以完吾心之自然,而各足之分愿,殷然在抱焉。日者侍坐言志,而由有愿闻之请也。子曰匡居何与经猷之建,而性情之所深,动与民物相系。生成之理在天地,因应之则在吾身也。故性分外别无事功,而感通愈挚。

伦类有难遍及之端,而形骸之相共,适与接构为缘。求诸天下非有余,取之目前非不足也。故仰给者只此数事,而结契尤微。一在老者,周人养因食礼,燕兼修而飨兼修;太学制备隆仪,爵则执而酱则执。高年之精力不可过劳,非安无以适其体也,而吾则愿有以安之。一在朋友,金石之心与共,勿贰二而参三;车笠之盟毋寒,岂我虞而尔诈?皦日之悃忱依然永矢,非信无以践其实也,而吾则愿有以信之。一在少者,知保抱提携之意,歌恩斯与勤斯;同出入顾复之情,念长我而育我。髫龄之依恋倍觉情亲,非怀无以被其恩也,吾则愿有以怀之。

且夫形不隔者意必诚。老者、朋友、少者,揆诸我身之程途,在所必历,而即以是为共证之端。此其中有性焉,非学之所可恃也。即使

"祈耆"之句不赓，而安之意自在；《伐木》之什不作，而信之诚自在，《式》、《谷》之歌无闻，而怀之隐自在。养欲给求，不啻于甘苦之亲尝者，取怀而予，吾是以恍然于大顺之机焉。且夫理之同者谊亦笃，为安、为信、为怀，验诸身世之相与，不越彝常，而因以得夫暨及之本。此其中有天焉，即伦之所为备也可知。酌兕以奉君长，即此老者而无殊；歌鹿以联兄弟，即此朋友而无殊；鼓瑟以敦匹偶，即此少者而无殊。民胞物与，不啻取行习之自彰者，因物而付，吾是以殷然于大道之行焉。所以伦物不无缺陷，长抱此有生共适之心，宥密实具，感孚祇行。夫斯人，吾与之素，是则吾之志也夫。

根据接触对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圣人的志向，在于整个天下。老者、朋友、少者，这几种人在天下是没有哪一天不会接触到的。对于他们，分别采取安、信、怀的态度，孔子的志向不确实是很大的吗！我曾想，万事万物要依靠圣人来治理，而圣人则根据万物的心愿作为自己办事的心愿。圣人处在上位时，实行自己心中想要做而又可以做的事情，他所得的功劳大。圣人处在下位时，则说出自己心里所应说的话，他所表达的志向真切。总之听任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只是用来实现我心里的自然想法，而自然界万物各自应该得到满足的本分和心愿，我也都殷切地替他们想好了。以前弟子们侍坐在孔子旁边谈自己的志向时，仲由有"愿闻子之志"的请求。孔子说：安居又参加什么治国谋略的筹划呢？而性情所深入之处，一举一动都与泛爱一切人和物紧密相联。万事万物生成之理在天地掌握，而适应它们的方法则由我自由掌握。所以天性之外并无什么事功可言，而心灵的感通却越发诚挚。

人的类别很多，难以遍及，然而形骸却相与共，又有缘经常接触在一起。求取天下的东西并不是有余的，但目前所取用的东西，又不是不足的。所以一个人依赖的只是这几件事，而与人结交的方面就尤其细微。一在老者，周人养老沿袭殷人的食礼，又兼修有虞氏的燕礼和夏后氏的飨礼。太学制度完备又礼仪隆重，人们执酒杯又执酱，服侍老人特别周到。高年的人精力不可过于劳累，不加安抚就不能

使他们身体舒适,而我便希望有安抚他们的办法。一在朋友,要以固如金石之心与之共同维持友谊。不要三心二意,对平素的好友不要冷淡改变,难道可以尔虞我诈?皎如白日的诚恳忠实之情依然永远如誓言那般,不以诚信待人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而我则希望采取措施使朋友相信我。一在少者,也知道要有人抱持与抚育,歌恩于此而勤于此;察看出入之际,反复回顾,情深恩重,考虑到父母哺育我,使我长大的深情。幼童的依恋使人倍觉情亲,如果不加怀抚就无法对他们施加恩情,所以我希望想办法去关怀他们。

况且形体不隔离的,其意念必定诚恳。老者、朋友、少者,想想我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也都要步步经历的,而就凭这一点即可作为一个证据。这中间有本性呢,并不是单靠学问所能解决问题的。即使"祈*耆*"的诗句没有接续而安抚老人的心意自然存在;《伐木》的诗篇没有出现而相信朋友的一片诚心自然存在;《式微》和《谷风》的诗歌没有听到而怀抚少年的满腔隐情自然存在。养人所育和给人所求,其味之浓比自己亲尝还要浓厚;从自己怀抱取出施予别人,我因此恍然大悟,明了大顺的真谛。况且情理之相同者友谊也就深厚。安抚老人,相信朋友,怀念少年,验之于自己身世也同他们一样,始终没有超出伦常之外,并因而得到了暨及的本原。这中间有天性呢,即伦常所为具备的内容可知。斟酒举杯敬献君长,就跟这里安抚老者没有区别;歌唱击鼓以联欢兄弟,就跟这里的相信朋友没有区别;鼓琴鼓瑟以怡悦配偶,就跟这里的怀念少年没有区别。泛爱众人和万事万物,而无异于行习中那些自行明显者;依据万事万物的自然需要而决定采取适当的付予措施,这样,我就自然在实行大道中处于正确的位置了。所以各类事物没有无缺陷的,只要经常抱着这种有生共适之心,宽仁宁静实际上也就具备了,既诚信感人又恭敬行事了。这种人我与他深深同步,这就是我的志向呀。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揭性之德于中,而原其未发之情焉。夫喜怒哀乐,情之具于性者

也。而原其未发,则纯乎中矣。《中庸》故揭之曰:自道统之传,开于中天。《虞书》曰"执中",《汤诰》曰"建中",而中之名以立。顾既有中以后,中待表于建极之时;而未有中以前,中自凝于主一之际。当夫嗜欲未启,而此衷之纯一无伪者,固可直揭焉,而使之共明。戒惧慎独,不足见道之不可离乎!夫道原于性,而性统于情,是可得其所谓矣。太极未剖之始,元黄莫判,人事孰进而持权?乃二五之精司乎血气,而阴阳之有属,俨然得以指名者,则情实为之孕也。诞降既分之时,质地已成,天工若因而相谢,乃妙合之理宰乎真精,而刚柔之所之,犹然莫窥其朕兆者,则性实为之浑也。

孕者何?喜怒哀乐是也。浑者何?其未发然也。盖尝深观而微察之:为虚无之说者,徒欲相寻于自然,则或且因其忽喜忽怒、忽哀忽乐者,一举而空之。此亦宁静之足课,然而索之渺矣。澄其虑于至寂至虚,灭情者徒高淡泊之守,而含其蕴于何思何虑?存性者所以为道义之门也,酝酿深而端倪未露,以是为无过不及之归而已矣。为惩窒之说者,徒欲自遏于后起,则或且即其将喜将怒、将哀将乐者,相忍而拒之。此亦防检之至周,然而伤于意矣。但于情之中有所减,不行者或不免横决之虑;而不于性之中有所增,自具者乃得其纯全之致也。蕴藏厚而机缄未开,以是为不偏不倚之宰而已矣。

谓之中,夫非所性之德乎?且夫道无定体,于此地而见为中,易一地而别有所以为中矣。不知中无定,而以视未发之喜怒哀乐,则只见为有定。此亦如风雨露雷默含于一元之鼓荡,而未昭其变也,夫何至有偏颇之虞?道无停机,于此时而见为中,阅异时而更有所以为中矣。不知中无穷,而以观未发之喜怒哀乐,则不可以遽穷。此亦如飞潜动植互藏于造物之胚胎,而未启其蒙也,夫何至有参差之象?至情所结,渊微莫罄其端;实理所孚,灵府自司其钥。至于发皆中节,而道之用彰矣。

从"中"里面揭示"性"的德行,而探究它没有出来时的"情"的形式。喜怒哀乐,这是人的"情"包含在"性"里面的。而考察它们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则纯粹是处于"中"的状态。所以《中庸》揭示它说:

"自道统之传，开于中天。"《虞书》说"执中"，《尚书·仲虺之诰》说"建中"，于是"中"这个名词就确立了。但是有了"中"以后，"中"就等待着表露于建立最高准则之时。而在没有"中"以前，"中"就自己隐凝在"主一"之际。当那嗜欲未开之时，这种内心纯一无伪的状态，本来可以直接揭示，而使之共明。而心怀戒惧，慎于独处，不正足见大道不可离吗！道来源于情，而性却统于情，这就可以得其所谓了。当太极尚未开辟之时，天地玄黄，尚未分清，人事又怎能出现而掌握其变化？正是二五之精主宰血气，而阴阳有了归属，非常清楚地可以指名，则"情"实际上由此孕育了。到轻升重降、天地既分之时，质地已经形成，天工因而谢去托付给人。但是妙分之理，仍然主宰其真精，而刚柔二者的动向，还是无法窥视出其中的征兆，原因实际上是"情"使它们浑然一体，分不清了。

孕育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喜怒哀乐等感情。浑沌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感情尚未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经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思考后我发现：主张虚无之说的人，只是从自然中去考察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于是对于那些忽喜、忽怒、忽哀、忽乐等感情都视而无见，认为是自然现象，一概否认。这种宁静的态度固然可以督课，然而显得虚无飘渺了。人们的思想引入到了一种至为寂静虚无的境界，而天性忘情的人只是崇尚淡泊的操守，又将自己的"情"蕴含于何虑何思呢？存性者旨在形成道义之门，酝酿很深而端倪未露，因此他们为人处世的标准总是坚持无过无不及罢了。主张惩忿窒欲之说者，只是想在欲望发生后自己加以克制遏止，那么有时他就会在将喜、将怒、将哀、将乐时加以忍耐和抵制。这也可以说是防检最为周到了，但却伤于自然的情意。只要是在"情"的"中"的状态人为地有所减杀，而得不到抒发的那部分，有时就不免有"横决"的危险。而不在"性"的"中"的状态有所增益，而自行就全部具备它，就能得到最为纯真全面的极致。蕴藏厚重而机缄未开，把这作为不偏不倚的主宰罢了。

叫它为"中"，不就是"性"的德行吗？况且道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在这个地方表现为"中"，改易一个地方又变为另一种形式的"中"了。不知道"中"本来没有固定的形态，只看到没有表现出来的喜怒

哀乐，那就只可以看出他先入为主。这也就好比风、雨、露、雷等现象默含在元气的鼓荡之下而尚未彰明其变化，哪会担心它们偏向一边去呢？然而大道的机微变化不会停止，在这个时候你看到它为“中”，到了另一个时候它就变成另一种“中”的形式了。不知道“中”的形态变化无穷，而只是看到没有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那就不能穷尽其变化。这也好比天上飞的、水底藏的各种动植物各自藏于天地的胚胎中一样，尚未启其外壳，又怎么会有参差不齐的形状呢？至情所凝结成的心态，精深微妙，没有谁能穷尽其中的发端。实理所符合的事情，由心灵自掌那锁钥。至于表现出来都能符合标准，而大道之用就很明显了。

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即志与气以明其序，而有其兼用之功焉。夫志至而气次，此序之可明也。然志当持而气可暴乎？孟子故由明之。且凡人之欲有所致力者，未有失其本末轻重之序，而可以自竟其功效也。等杀明而有不得不分之愿力，操存一而有不得不合之功能。其不至举精神意量而卤莽灭裂之者，固已循循焉，得其全量焉。夫志为气之帅，气即体之充。则欲知不动心之说，不可于志与气加之意乎！

是盖有独尊之势，有递及之端。曷言乎有独尊之势也？百为之听从皆后，而志已主之。彼气之沛然莫御者，夫且卓然驾乎其上焉。俨百体之从令，高而不可逾。若万物之有原，终必溯夫始。即欲暴气于其前，而志固有所不受也。盖未有气，先有志，则志固至焉者也。曷言乎有递及之端也？一身之洋溢独周，而气实充之。彼志之夐然莫越者，抑且追之惟恐不及焉。纵瞠乎其在后，俨徐行而不相陵。实瞻之于在前，拟降阶之有其等。设令无志以处先，而气固有所难犯也。乃既有志，复有气，则气固次焉者也。假使不有以持之，则一时之志，实足以役气，使必从。纵情意之所如，其凌厉殆未可知也，若是为任吾志者危。假使又有以暴之，则一时之气，实足以扶志，使必达。操勇敢之所至，其横决殆未有已也，若是为任吾气者病。

嗟乎!士君子俯仰身世,礼陶乐淑,当思存心于纯粹之途;目染耳濡,宜自淑躬于中正之域。乃至任志任气,斯一身之中,其不至滋多咎者几何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则其修之也有各尽,而致之也有全功。密而课之于内念,则敬慎积中,而志自不渝其则;动而察之于临时,则检饬自矢,而气方不溃其防。持与无暴,不至有偏重之端,此则其有各尽者也。守内以修其外,而傲慢之气不参于缜密之衷。制外以裕其中,而谨恪之志不虞有决裂之势。持与无暴,自得夫交致之实,此则其有全功者耳。我自四十以来,从得力之后,窃有以自证矣。彼告子之不动心,岂知道者哉!

就志与气二者进行比较,以辨明其先后次序,就有其兼用的功效了。志向是最根本的,意气是次要的,这种次序可以弄明白。然而志向应当坚持而意气就可以暴乱吗?孟子因而说明这个问题。况且大凡一个人想要做的那些事,没有搞乱了诸事先后轻重的次序,就可以自己完成其任务,取得功效的呀。等级明白而有不得不分的要下的力量,操存纯一而有不得不聚合的功能。那些不至于将一切精神、意量卤莽草率地对待的人,本来就已经次序井然,得其全量了。内心的志向是意气的主帅,意气是浑身充满的力量。那么想要了解不动心之说,不可以不对志向与意气多加注意吗?

大概志与气二者中,一个有独尊之势,一个有递及之端。为什么说一个有独尊之势呢?因为一个人的所有行为都听从于心志的指挥,落在心志的后边,而心志早已主管它们了。那种沛然莫御之气,且已卓然凌驾于心志之上了,身体各部位俨然从令,高高在上而不可逾越。但好比万物一定有渊源,最后终于要追溯到它们的开始。就算你想要在心志的先前乱用意气,然而心志本来也是不会接受的。大概尚未有气时,已先有志,那么志本来就是最根本的了。为什么说另一个有递及之端呢?一身的力量洋溢周遍,实际上是气将其充满了。那心志高远而不能够超过它去,追还惟恐追不上呢。纵然百体瞠乎其后,但还是俨然慢慢行走,不相互侵凌。实在是瞻望在前面,也降阶保持其等差距离。假使没有志处在前面,那么气本来就有所难犯了。

但是既然先有志,再有气,那么气本来就是在其次的东西了。假使不想办法坚持自己的志,那么一时之志,实在是足以役使气,使它一定听从。但是如果放纵情意,任其所往,气势凌厉得不知怎么样,那么志是否还能驾驭它恐怕就很难说了。像这种情况会成为任从吾志的危险。假使又有乱用其气的事情发生,那么一时之气,当然足以扶持志向,使之一定能达到目的。但操持勇敢之气往前进,其横决之患大概就没有止境了。像这种情况将成为任从吾气的祸害。

唉!士君子俯仰一生,与世沉浮,受到礼乐的陶冶、受到好的影响,应该将自己的心思用于纯粹之途,目染耳濡,应该在中正的领域内实行自我完善。竟至于任志任气,这样在一身之中,其不导致越来越多错误的人又有几个呢?所以说"要坚持自己的志,不要乱用自己的气。"那么他对于自己的修养就能各尽其用,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有全功。内心经常暗自使深层的想法变周密,于是恭敬谨慎就聚积在心中,这样,志就不会自己越过它的规则。临事时考察自己的行动,时常加以检查整饬,发誓做好事情,这样,气才不会从它的堤防里溃决出来。持守其志,不暴其气,二者不至于向一方有所偏重,这样就能各尽其用了。坚守内部的志,修养外部的气,而傲慢之气就不会渗入到缜密的内心来了。制止外部的气,充裕内部的志,敬慎之志就不必担心它有决裂之势。持守其志,不暴其气,自会得到二者相互都能达到的实效,这样,人的修养就有其全功了。我自四十岁以来,从得到这种修养方法的好处之后,便私下里感到有了自我验证。告子的不动心,难道是懂得大道的人吗?

彭浚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大德之懋,典学而安民;郅治之隆,厘工而利运。稽古帝王,建用皇极,丕奏肤功,庶绩咸熙,万世永赖,莫不以敷政宁人之本,致延洪纯佑之符。《管子》曰:"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言崇圣教也。《尉缭子》曰:"人君有必胜之道,故能兼并广大",言修武备也。《鬻子》曰:"功最于吏,福归于君",言勤考课也。《庄子》曰:"河润百

里,泽及三族”,言兴水利也。盖惟基命宥密而严律靖边,澄叙官方而众流顺轨,醇洪鬯之德,丰茂世之规,所为凝宝命而迓鸿厖者,恃有此道耳。

钦惟皇帝陛下,阐极法天,含元育物。固已夙夜阐性道之精,而率土咸绥以大定,官职昭法廉之式,而薄海永庆夫安澜矣。乃圣德渊冲,勤思上理,惟枢机之是察,至葑菲之无遗。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稽古、饬戎、察吏、治河诸大政。臣之椉昧,何足以知体要所存?顾当对扬伊始,敬念古者敷奏以言之义,敢不竭刍荛之愚,勉述所闻,用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尚书》综帝王之治道,二《典》始‘钦恭’,《九畴》言‘敬用’,其要皆本于一诚。”此诚圣德王道之全功也。臣愚以为执中授受之原,著于《尚书》,而其微词奥旨,莫切于《大学》、《中庸》。诚意之戒欺求慊,至诚之尽性达天,实能剖析乎人道危微之界。尧舜之精一,尧舜之诚也。诚则必敬,故尧以钦明同天,舜以温恭协命。敬则必勤,故尧称圣神广运,舜称兢业万几。人君之建极保极,臣民之会极归极,胥是道也。即此《易》之立诚以乾惕而体法健行,《诗》之主敬在旦明而戒申游衍。俨若首曲台而存“庄敬日强”之训,体元重鲁史而录“民生在勤”之箴。六籍所陈,同条共贯。朱子《大学或问》谓格致以及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或问》谓中和极于位育,枢纽不外乎诚。诚敬立,而慎独以清好恶之源,笃恭以全圣神之化,赅洽无遗矣。真德秀《大学衍义》纲举四条,曰格致、诚正、修身、齐家。意在于以本贯末,故略治平而不言。明邱浚补之,体用兼备。外如张蕴古箴陈《大宝》,李德裕箴著《丹扆》,凛物侈声淫之鉴,胪宵衣正服之条。以及邵子《皇极经世书》,言君道、臣道十二则,皆本心传以发明治道者也。我皇上圣学高深,缉熙浚哲,举凡用人行政,无不根于诚敬,以绥猷于古帝王之心法,旷世相符;道统与治统一以贯之矣。

制策又曰:“古者寓兵于农,伍两卒旅,蒐苗狝狩,制善法良”,而因及于训练之方。臣窃考汉初南军以卫宫城,北军以卫京师,得内外相制之道。唐置府兵,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后更矿骑,其制悉坏。宋统外兵于枢密,总内兵于三卫。明京畿兵约五十万,后于谦汰

其老弱，改为十团营。夫兵，重事也，不勤练不能有勇，非教训无以知方。昔杨龟山曰："兵农不可复合，而伍两军师之制不可不讲。无事之时，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用之于有事之际，则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挥之节。"诚善言戎政也。若夫"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往来，无不如意"，此孙子练士之谓。"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此吴子治军之谓。"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则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中语也。成规具在，而督率振厉之用，则在膺斯任者之实力奉行。平时游惰之民不以募补，杂色服役之人不至滥充。由是禁怠荒，程技艺，步伐止齐之义娴习既精，则信乎若手足之捍头目，如虎豹之有爪牙矣。圣朝化日光天，声教四讫，固可养兵不用矣。而整饬戎行，深于睿念，将弁体而行之，有以振作勿怠，不诚保大定功之宏谟哉！

制策又以安民必先知人，而兢兢于考绩之典，惠养之意。此诚肃清吏治之至计也。臣谨按，察吏之法始于唐虞，允厘黜陟，敷奏明试，尚矣。夏严木铎之徇，商著官刑之儆。周以八法治官府，八枋驭群臣，而尤严于弊吏之六计：善、能、敬、正、法、辨，皆冠以"廉"。廉固洁清之义，而亦训察，其即因操守以为综核欤？汉取士曰"兴廉"，察吏曰"廉察"，犹本《周官》遗意。刺史以六条按郡国，而察豪强者一，察二千石者五。晋以五条考郡县。唐分二十七最，差以九等，其法倍详。宋以七事考监司，九事考县令，皆试其材而程其功。夫循名责实，则人无旷官也；朝考夕稽，则吏皆勤职也。乃行之既久，视为具文，甘优逸而案有积延，避吏议而事多消弭，皆不能以实心行实政，是又不徒在立法之良，而在行法之人矣。我皇上乙夜批章，日昃不遑。内而卿尹，外而疆吏，能率僚属以励职，惩吏胥无逞奸，有不蒸蒸日上，臻于亮工熙载之盛哉！

制策有曰："古之治河者，治一河而止耳，今则合淮与漕治之"，而因思夫一劳永逸之策。臣窃考《禹贡》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盖水之性合则冲，骤则溢。别而疏之，所以杀其冲，"又北播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大野既潴"是也。黄河自失故道，遂累代为患。汉时河决瓠子，武帝筑宣防宫，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

楚之地无水灾。王景修汴渠堤，河由东北入海，偶合禹迹，自东汉至唐无河患。元时河决白茅、金堤等处，贾鲁以二策进。一议疏塞并与，脱脱韪之，此疏瀹堤防之兼重者也。且夫治河必并治淮，淮治而河患息，斯漕运自利。今欲收其利，惟当加意清口。清口者，淮黄之会合也。淮力易弱，黄力常劲。淮不敌黄，湖口已患倒灌矣。黄逆入淮，河道转患淤垫矣。是则以清刷黄，所以轵渡利漕之法，务在因时度势，为疏为筑，修举无遗耳。国家岁赋正供，不惜帑金，以修漕道，恬波济运，真亿万年之福也。

若此者：勤求治理，心学懋矣；绥靖嘉师，戎律娴矣；纲纪毕张，官职厘矣；堤防永固，转输利矣。猗欤盛哉！臣伏愿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明政贵有恒之要，深所其无逸之思。德已裕而弥切笃恭，民已宁而犹严捍卫，吏已察而愈饬几康，防已宣而更思利赖。敛福昭夫敷锡，慎宪于以省成。扇巍巍，显翼翼，总八方而为之极。至道大光谟烈，治功远轶勋、华。由是协气旁流，淳风四溢，弥纶天地，荣镜宇宙，我国家亿载咸宁之庆，基于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美好盛大的德行就要坚持学习又安抚百姓，国家太平至极的盛况就要吏治清明又便利漕运。考察古代的帝王，他们建立施政治国的最高标准，取得重大的功勋，各种事情都兴旺发达，万世都能得其好处，没有哪一个不是以施政宁人这个根本，来招致洪福和上天保佑的符瑞的。《管子》说："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这是讲的尊崇圣教。《尉缭子》说："人君有必胜之道，故能兼并广大"，这是讲的修治军备。《鬻子》说："功最于吏，福归于君"，这是讲的勤于考课。《庄子》说："河润百里，泽及三族"，这是讲的兴修水利。大约国命基始于宽仁宁静，而严格纪律安定边疆；澄清吏治，整顿官常，而各条河流顺畅。使洪大畅茂的德行更加淳厚，使盛世的规矩更为丰茂。用来巩固大命而迎至鸿福的，都是依靠这些措施。

敬思皇帝陛下，开创皇极，效法苍天，含念黎元，抚育万物，本已早起晚睡，以阐述性命道德之精华，普天之下都已非常安定；官职则

向百僚昭示法治廉洁的准则，一直到天涯海角都欢庆河流不泛滥了。然而皇帝陛下圣德渊深又谦虚，经常想如何将国家治理得更好，达到最高水平。全心全意处理着国家的机枢重事，以至细微之处也不遗漏。将臣下等人召入朝廷，颁下制策，以稽古、饬戎、察吏、治河等国家大政向臣下等垂询。像臣下这样愚昧无知的人，怎么能知道政事体要？只是现在回答圣上的提问，称扬圣上的德行还刚刚开始，又敬念古时候"敷奏以言"的大义，臣下怎么敢不竭尽自己作为草野之民的粗浅愚见，勉力陈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用以效献出如同土壤对泰山、细流对大海那样的微小辅助力量呢！

恭读制策上有这样的话："《尚书》综帝王之治道，二《典》始'钦恭'，《九畴》言'敬用'，其要皆本于一诚。"这些话确实概括了圣德王道的全部事功呀。臣下愚意以为，"执中"之说的授受渊源，鲜明地载录在《尚书》中，然而它的隐微言辞、深奥含义则没有比《大学》和《中庸》更切要的了。像《大学》"诚意"章所讲的戒欺求慊，《中庸》"至诚"章所讲的尽性达天，则确实能够剖析"人道危微"的彼此界限。尧舜的"精一"，即尧舜的诚心。有诚心则言行必敬，所以尧以"钦明"同于上天，舜以"温恭"协于大命。行为恭敬则必定勤勉，所以尧称"圣神广运"，舜称"兢业万几"。人君的建极保极，臣民的会极归极，都是遵循这个道理。这也就是为何《易经》以朝乾夕惕来树立诚心，而体悟效法皇天的强健运行；《诗经》的主敬在旦明，而申诫纵意游乐。《曲礼》一开篇就讲"俨若"，而保存了"庄敬日强"这样的训词；《春秋》以体法天地之德为重，记载了"民生在勤"这样的箴言。《六经》所陈述的，事理相通，脉胳连贯。朱子的《大学或问》认为，从格物致知一直到治国、平天下，其中心内容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他的《中庸或问》又认为，从中和一直到"天地位，万物育"，其中的枢纽关键不外乎一个"诚"字。诚敬确立了就用慎于独处的方式以清除好恶之源，用笃诚恭敬的态度以成全圣神的教化，这的确是完备无遗了。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列举了四条大纲，叫做格致、诚正、修身、齐家。他的本意在于以本贯末，所以略去治国平天下而不言。明代的邱浚将这两点补充进去了，于是体用兼备。此外如唐朝张蕴古陈献了《大宝

箴》,李德裕撰著了《丹扆六箴》,其中警示了"物侈声淫"的明鉴,胪举了"宵衣正服"的戒条。以及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讲论君道、臣道十二则等等,都是依据十六字心传以阐明发挥治道的。我皇上圣学高深渊博,光明睿哲。举凡任用人才,推行政治,无不植根于诚敬,用来安定天下,与古代帝王的心法永远相符合,道统和治统都贯通如一了。

制策又说:"古者寓兵于农,伍两卒旅,蒐苗狝狩,制善法良",因而又询及训练之方。臣私下考察,汉代初年以南军保卫宫城,以北军保卫京师,得到了内外相制的好处。唐代设置府兵,一旦有事,则命将统兵出征,战事一结束,兵将皆罢。后来改为矿骑,府兵制度就都被破坏了。宋代由枢密院统率京外之兵,由三卫总管京内禁军。明代京畿之兵约有五十万,后来于谦删汰那些老弱人员,改为十团营。建设国家军队,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不勤加操练,将士们作战就没有勇气;如果不加强训导,他们就不懂得作战目的。以前杨龟山说过:"兵农不可复合,而伍、两、军、师之制不可不讲。无事之时,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用之于有事之际,则申之以卒武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挥之节。"这真是善谈军政的人啊!至于所谓"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往来,无不如意"的话,这是孙子讲的如何练士。"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这是吴子讲的如何治军。"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这是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中的话。古人的成规具在,足够我们效法。至于发挥督责、率领、振扬、激励士兵的作用,则在于具体担当这种任务的人实际去尽力奉行了。平时游手好闲、懒惰成性的老百姓不能招募到队伍中来,各种各样服役的人不至于滥竽充数。在此基础上再禁止怠慢荒忽,检查督促战斗技艺的操练情况,到将士们对进退步法、击刺动作的奥妙都领会得十分娴熟精通之后,那么这支军队对国家来说,就确实如同一个人的手足保护自己的脑袋、眼睛,如同虎豹有锋利的爪牙一样,能够起到自然的保卫作用了。我圣朝光照天下,声威远振,教化四达,本来是可以养兵不用的。然而对于整饬军队的问题,圣上却常常在深入地思考着。将士们一旦体会圣意并付诸行动,就可以

保持旺盛的斗志，不至于松懈，这难道不是实现“保大定功”的一项宏伟战略吗！

制策又以为“安民必先知人”，因而谨慎对待考绩的典制，思考着如何恩养百姓的问题。这确实是肃清吏治的一个最好的想法。据臣下细加考察，考核官吏的方法开始于唐虞时代。《尚书》中说“允厘”、“黜陟”、“敷奏”、“明试”，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夏代时每当颁布政令，就派人振木铎巡行于路，以警众官。商代时，颁布了《官刑》之典，用以惩戒官吏。周代时以八法治理官府，以爵、禄、废、诛等八种手段驾驭群臣，而要求特别严格的则是裁决官吏的“六计”，即：善、能、敬、正、法、辨，每一条的前面都加上一个“廉”字。廉字本来是廉洁的意思，它又可以解释为“察”，不就是根据官吏的操守而进行综合考核吗；汉代取士叫“兴廉”，察吏叫“廉察”，还是依据了《周礼》的遗意。汉代刺史按照皇帝的六条诏令考察各郡国，其中考察豪强的只有一条，而考察二千石郡国守相占了五条。晋代以五条考察郡县。唐代将考核标准定为二十七个最，每一类又区分为九等，这种办法比起以前来加倍地详细了。宋代以七事考察监司，九事考察县令，都是检试他们的才能而考核他们的功过。对官吏能循名责实，那么就不会荒废政事；朝夕进行考察，那么官吏就都会勤于职守。然而行之既久，官吏们会把这些规定看作是一纸空文而不加执行。他们沉迷于优游逸乐而对断案积滞拖延，因为畏避吏议，有些重要的事给掩盖起来。他们都不能以务实的态度来办好实际的政务。这又说明，要办好事情不只在于创立一种好法制，而在于要有好的执行这些法制的人。我皇上二更时分仍在批阅奏章，太阳偏西顾不上吃饭。京内有公卿大臣，京外有封疆大吏，能率领他们的僚属以尽忠职守，惩戒吏胥不使他们的奸谋得逞。难道国家不会更加蒸蒸日上，达到辅助天工的兴盛局面吗！

制策又说：“古代治河，只是治理一条黄河罢了，如今则要加上淮河和漕道一起治理”，因而想要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臣下考查《禹贡》讲到治水的办法时提出两条，叫做“播”，叫做“潴”。大概水性聚合起来就将冲击打漩，水势凶猛则会引起泛滥。对它分别加以疏

导，这是消除水的冲击的办法。“又北播为九河”，就是讲的这种情况。在洪道旁边将水蓄起来，这是节制洪水泛滥的办法。“大野既潴”，就是讲的这种情况。黄河自从偏离故道之后，便累代为患。汉代时，黄河在瓠子口决堤，汉武帝筑宣防宫，开挖两道河渠引导黄河之水往北流，恢复大禹时黄河的故道，于是梁楚之地无水灾。王景修汴渠堤，黄河由东北入海，偶然同大禹的路线相吻合，于是自东汉至唐代没有黄河水患。元代时，黄河在白茅和金堤等处决口，贾鲁呈献了两条治河计策。一策建议又疏又塞，丞相脱脱认为是对的。这属于疏导洪水与构筑堤防并重的方法。况且治理黄河势必同时治理淮河，淮河一旦治理好了，黄河的水患也就止息了。这样漕运自然顺利畅通。如今若想得到这种利益，只应当看重清口的修治。清口是淮河和黄河的交汇之处。淮河水流的力量容易变弱，黄河水流的力量常常强劲。淮河水流抵挡不住黄河水流的冲击，所以湖口已出现了河水倒灌的祸患。黄河逆流进入淮河，反而给淮河河道造成了淤塞。因而以清刷黄，便是挽引船只、便利漕运的重要方法。其关键在于审时度势，或者进行疏浚，或者修筑堤防，两者并举无遗。国家从每年的常赋中，不惜拨出重金来修治河道，以平息水灾，有利漕运，这真是亿万年的福祉啊！

像以上所对答的这些问题：勤求治国之道，心学就昌盛了；安抚好军队，军纪和技艺就娴熟了；吏治纲举目张，百官就尽职了；堤防永固，航运就便利了。真是美好啊，兴盛啊！臣下希望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明了“政贵有恒”的重要性，深入思考“所其无逸”的话。圣德本已深厚而更加迫切要求笃厚恭谨，百姓本已安宁而仍然加强捍卫措施，官吏已经廉察而愈加居安思危，堤内洪水已经被宣泄而更加想着如何才更为有利。积聚五福，以昭示并广泛赐予给臣民，慎重对待祖宗法度，来考察旧时的事例。圣功多么炽盛高大，多么显赫宏伟，总揽八方而为之设立最高准则。至高的道德发扬光大古代帝王的谟烈，治国功勋远远超过放勋与重华。由此和协之气周流六合，淳朴之风充溢四方，包罗天地，照耀宇宙。我国家亿万年永远安宁的吉庆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学识浅陋，新登科第，冒犯皇威，万分恐惧，几至

跌倒。臣下敬答如上。

徐颋　殿试对策

徐颋(生卒年不详)　字少鹤,号直卿,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嘉庆十年(1805)榜眼。后官至内阁学士。其得江声指授,而通文字声韵之学,有经进文及诗文传世。

臣对:臣闻缉熙者,勤政之本也;武备者,卫民之实也。重吏治,所以昭其职守;修河渠,所以利其转运。天子法天行以自强,顺秋气以肃物。秩鸠鹰之司,而百工咸理;设堤防之掌,而四海攸同。《周颂》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左氏传》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礼》设三百六十之官,《书》著"浚畎浍距川"之文,于以立君人之纪纲,安闾阎于衽席,在廷有《羔羊》之歌,在国有九年之乐。古郅治之隆,所为亿兆欢欣,中和感发,洋洋彟彟,超图溢牒者,以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道该文武,庆洽生全,固已建皇极而大中共仰,诘戎兵而耀德有经,亮天工以咨岳牧,循地利以登粒食矣。乃圣德渊冲,迩言犹察,不遗岩薮之奇,欲尽刍荛之实。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崇圣学、励戎士、严黜陟、利转输之至计。臣之椯昧,何足以知治要?顾生长黉序之内,濡染道真,幸际悬鞀设铎之辰,窃效土壤细流之益,敢抒情愫,敬绎所闻!

伏读制策有曰:"帝王之治道必始钦恭,《洪范》九畴亦原于五事之敬,而要皆本于一诚。"臣窃惟诚敬之理,帝王相传之心法也。《中庸》言"用中于民",又言"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而归之于天下至诚与天地参,可知诚为敬之本矣。《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许慎《说文》引作"夕惕若厉",厉即敬也。《乾》为纯阳之卦,阳为实,实即诚。惟其能诚,故健行不息。此诚与敬,敬与勤,相待而成也。班固《艺文志》引《洪范》今文作"羞用五事"。"羞"系"苟"之误,"苟"亦训敬。《仪礼》:"苟,敬",是其证。敬者礼之实,上下共之。

君得之以绍天阐绎，臣得之以展采错事。无往而不敬，即无往而不勤。武王席之铭曰:“安乐必敬”,即本《丹书》“敬胜怠”之旨。《内传》引刘子之言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有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是故君子勤礼。”盖礼无不敬，勤礼即敬也。唐张蕴古、李德裕进箴于上,载在《唐书》本传。而朱子、邵雍、真德秀所言,亦皆有以宣明其蕴者。恭读御制《勤政殿记》,发勤敬之理,与六籍为印合。更伏诵御制《原诚》,阐千圣之微言,汇群经之奥旨,洵非诸儒所能及矣。若《中庸或问》,若《皇极经世》,若《大学衍义》,其言诚言敬,大抵若是。

臣读制策又曰:“兵于无事之时,训练为尤急。膺斯任者,宜何如督率而振厉之?”臣考三代之世,伍、两、卒、旅,即以民为兵。六乡出六军,乡遂之吏即为六军之将。有事则战,无事则耕。而四时讲武,以考其坐作进退之节，所以见太平之时不忘武备，其法最善。春秋时，即离兵民为二。六国魏时有苍头、奋击之属。汉有六郡良家子及期门、佽飞、材官、羽林之属。其都试之法,见《韩延寿传》中。唐之府兵置于各州,更番宿卫,各立帅以统之。其府之名,若京兆下真化、匡道之属,载于《地理志》者綦详。然《杜牧集》及《会要》所言,其数皆不合。或言在关中者五百,实即二百八十。其制则苏辙著《论会》善之。宋有禁兵、厢兵、乡兵、番兵之不同。要之,兵所以卫民也,必有勇知方,然后可用。《牧誓》步、伐、止、齐,即后世手法、足法之祖。孙、吴之法具在,必得名将然后能治兵。汉之赵充国,唐之李光弼,宋之狄青,明之戚继光，训练皆有成效。诚得其人而任之，自见罴熊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者日多矣。我国家儆伯灵台，寰海之间，销剑戟以为农器，而营伍之制，训练具有法度，威不轨，禁奸慝，节制之臣有不日讲肄者乎?

制策又以考绩之法,昉于尧舜,《周官》弊吏,以廉为本,而因求循名责实、朝考夕稽之道。此诚知人安民之至虑也。臣闻六佐之号,始于上古,五行之正,治于高辛。天子以群臣为股肱耳目,故官之设,取象于天。官之为言宣也,宣上之德也。《尚书大传》曰:“积善至于明五福,以类升,故陟之;积不善至于幽六极,以类降,故黜之。必三载者,以为天道三年一周也。”《周官》六计弊吏:善、能、敬、正、法、辨,皆以

"廉"统之。郑氏注:"六事皆以廉为本。"汉孝武诏书:"兴廉举孝。"《黄霸传》有"察廉"。王褒《四子讲德论》曰:"禄勤增奉,以励贞廉。"故京房、姚平之法虽不行,而汉廷之中廉直者接踵。夫人臣事君必抒其悃忱,励其志节,正直以临下,公忠以将事。故贤者立于朝,黜陟之法以己之一心律之。有一官即有其事,所谓职秩是也。通经致用,果可以安国家,利民人,方可曰名实相称。否则旷官之责,鹈梁之咏,虽上之人不闻,亦断断不敢自宽其责。以此律心,庶乎能廉直而勤慎矣。至于操黜陟者,若左雄之在汉,刘毅之在晋,正色不阿,亦足以肃朝纲,正官常耳。圣天子旰食宵衣,勤恤民隐,虽尧舜不能有加于此。于斯时也,若内而卿尹,外而疆吏,亦当共矢法廉,以襄太平之治欤!

制策又以"古之治河,止治一河,今则合淮与漕治之",而因求一劳永逸之策。臣谨按,《春秋记》曰:"齐桓公填阙八流,以自广。"盖禹疏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桓公阙其八,后世止有笃马河。《周谱》:周定王五年,河徙。《汉书音义》谓即今砾渠,则河渐南也。《河渠书》云:"禹贳二渠,北载之高地。"如淳说,一即河之经流,一则漯川也。汉武帝时,河决瓠子,帝乃自临塞河,搴长茭,沈美玉,以竹落为楗,作宣房之宫。后屡泛溢,河堤置谒者领之。东汉时,王景一治,而至唐数百年无河患,以与禹故道相近耳。然古言治河不合漕运,自元以后,转东南之米以北输,于是取道于黄、运两河。而言治河者,必兼言利漕,与古为异。余阙、邱浚,潘季驯诸人之说,具有可采也。欲漕运之利,则必以清刷黄。而欲于堤之外别求良策,则惟于海口刷沙,使河水迅流而勿壅。至若引之北行,势必坏民庐舍,耗费度支,且违水性就下之理,有不可遽行者。所谓利不百,不变法,其即谓是欤?皇上亲指治河之略,安澜普庆,万世乂宁,实一劳而永逸者矣。

若此者:钦明尚古,于以成光宅之休焉;简练习兵,于以昭震叠之威焉。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法则永垂焉;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怀柔丕著焉。猗欤祎而!备哉粲烂乎!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观象而弥切严恭,披图而弥深祗翼,国家亿万载景祚之隆在是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说:臣下听说,致力圣学,心明眼亮,这是勤政的根本。加强军备建设,这是保国安民的实际行动。重视吏治工作,用以明确百官的职守。修治河渠,旨在有利于水陆转运。天子效法皇天的运行而自强不息,顺应秋气以整肃万物。整顿好各个部门,百官之事便都治理好了;设置管理堤防的机构,四海就能风平浪静,同享太平。《诗经·周颂》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春秋左氏传》说:"春蒐,夏苗,秋弥,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周礼》设置三百六十种官职,《尚书》载有"浚畎浍距川"的文字。至于说到建立君临臣民的纲纪,平民百姓高度安宁,在朝廷上就有《羔羊》这样歌颂廉洁的诗歌,在邦国就有九年积储三年余粮的快乐。古代太平时世达到最高水平,亿万人民欢欣鼓舞,中和之气感发充溢,形成一片旺盛祥和的气氛,功绩美誉超过神图秘籍的载述,原因就出在这里。

敬思皇帝陛下,治道文武兼备,福庆博洽众生,本已为国家建立起了最高的准则,大中之道为天下所共仰。又治理军政而经常宣扬圣德,垂询封疆大吏而辅相天功,顺循地利而获得粮食丰收了。然而圣德深远又谦恭,对于浅近之言仍加考察,采择草野之论毫不遗漏,意欲尽量听取百姓的粗浅意见,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以崇圣学、励戎士、严黜陟、利转输等方面的最好策略进行策试。像臣下这样愚昧无知的人,怎么能知道治国施政的重要基本方针?只是自己生长在学校里面,耳濡目睹大道真谛;又有幸生逢悬鞀设铎的盛世,愿意效献像小土块对于泰山,细水流对于大海那样一点微小的助益,怎么敢不抒发出自己的一片赤诚,恭敬地陈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呢!

恭读制策上说:"帝王之治道必始钦恭,《洪范》九畴亦原于五事之敬,而要皆本于一诚。"臣下想,所谓诚敬之理,就是帝王相传的心法。《中庸》说要"用中于民",又说只要"致中和",则"天地位,万物育"了。而最后归根于天下至诚与天地鼎立而三,由此可知,"诚"是"敬"的根本。《周易·乾》卦说:"倒数第三阳爻:君子整天忧愁戒惧,晚上也警惕",许慎《说文》引作"夕惕若厉","厉"也是"敬"的意思。《乾》是纯阳之卦,阳为实,实即诚。惟其能诚,所以能够健行不息。这

说明,诚与敬,敬与勤,这几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引用《尚书·洪范》的文字,今文本写作"羞用五事"。其实,"羞"字系"苟"字之误,"苟"字也可解释为"敬"。《仪礼》说:"苟,敬",是其明证。"敬"是礼的实际内容,君臣上下都要循用它。君主得到它,即以之继承天命,并加以阐明,加以陈述。臣下得到它,就以之展采述职,措置完成各自的职守。所以无论到哪里,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讲求敬。这也就是说,无论到哪里,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讲求勤。周武王坐席的铭文说:"安乐必敬",就是根据《丹书》上"敬胜怠"的意义制作的。《春秋左氏传》引刘子之言说:"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有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是故君子勤礼。"大概按照礼的规定没有什么事不能不敬,勤谨礼制也就是要讲求敬。唐代的张蕴古、李德裕向皇上进献箴言,其事载在《唐书》他们各自的传记上。而朱熹、邵雍和真德秀所说的,也都有可以宣扬、阐明这种意蕴的地方。恭读皇上大作《勤政殿记》,其中阐发"勤政"的道理,完全与六经的记载相吻合。又恭读御撰《原诚》,更觉得阐发历代圣贤精微的言论,汇集所有经书的深奥旨趣,确实不是一般儒生所可企及的。至于像朱熹的《中庸或问》,像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像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这些书所讲的"诚",讲的"敬",也大抵是如此。

臣下恭读制策,其中又说到:"兵于无事之时,训练为尤急。膺斯任者,宜何如督率而振厉之?"臣下考稽三代之世,那时的伍、两、卒、旅,就是以民为兵。其六乡之民组成六军,乡遂的官吏就担任六军的将领。有事时操戈作战,无事则休耕于野。平时则一年四季讲练武功,以考察其坐作进退等节度动作,体现出太平之时不忘武备,这种办法最好。到春秋时,兵与民则分而为二。六国时,魏国有苍头、奋击之类专门的军队。汉代时有六郡良家子以及期门、佽飞、材官、羽林之类军队名称。其士兵考试之法,见于《汉书·韩延寿传》当中。唐代的府兵设置于各州,府兵轮番宿卫,各府设置一帅以统率士兵。其府之名比如京兆尹下的真化、匡道之类,在《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得很详细。然而《杜牧集》以及《唐会要》所记载的军府数目都不相同。有的说,在关中的有五百个,实际上只有二百八十个。其建置制度,则

苏辙写有《论会》专文，认为很好。宋代有禁兵、厢兵、乡兵和番兵的不同。总而言之，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兵士必须有勇气，懂得作战目的与方法，然后才可得其实用。《牧誓》中所讲的步、伐、止、齐，就是后世手法、足法之祖。孙武、吴起的兵法如今俱在，但是一定要得到名将，然后才能治兵。汉代的赵充国，唐代的李光弼，宋代的狄青，明代的戚继光，训练军队都卓有成效。假如真的能够得到胜任的人来担任部队的训练工作，就自然会培养出如熊如罴的勇士，忠诚无贰的武臣，这样保卫皇家的人就会日益增多了。我们国家休兵息武，大兴文教，环海之间，销毁剑戟等武器以制造农具。而军队中的营伍编制，训练都有完备的法度。威慑不轨之人，禁止奸恶之徒，主管此事之臣，可以不天天讲论练习吗？

皇上制策又认为，考核官吏的办法创始于尧舜，《周官》所载裁定官吏优劣的标准都是以“廉”作为根本。因而寻求循名责实、朝考夕稽的办法。这确实是知人安民的最好的考虑。臣下听说，六佐的名号从上古就开始有了，掌管木、火等五行事务的官员，则始于高辛氏。天子把群臣看作是自己的股肱和耳目，所以百官的设置，都是取象于天的。“官”这个字就是“宣”的意思，官吏就是宣传君上的德行的人。《尚书大传》说：“积累善行达到了明悉五福时，按标准应该升级，所以提升他；积累恶行达到了幽于六极时，按规定应该降级，所以贬黜他。”考绩黜陟之所以每三年进行一次，是因为天道三年一次循环。《周礼》规定按“六计”来裁定官吏的优劣，具体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每一条都用“廉”来统括。郑玄注释说：“六事皆以廉为本。”汉孝武帝诏书有“兴廉举孝”的话，《汉书·黄霸传》有“察廉”字样。王褒《四子讲德论》说：“禄勤增俸，以励贞廉。”所以京房、姚平等人的考绩之法虽然没有实际执行，而汉代朝廷之中廉洁正直的官员却不断涌现。作为人臣来说，事奉君主一定要抒发自己的一片赤诚之情，激励自己的志节，以正直的态度对待下级，以公正忠诚的态度来奉命行事。所以当贤良者在朝廷里主持考绩时，他就会按照黜陟之法，凭自己公正公平的心来处理问题。朝廷设置一官，就有一官之事，这就是所谓的“职秩”。通晓经典，实际运用，真的可以安定国

家，有利于百姓，这才能叫做名实相符。否则的话，就会招来“旷官”的责难，“鹓梁”亦即不称职的讥讽，尽管上级有时并未听到，然而作为官员本人来说也绝对不能原谅自己。要以这种态度来要求自己的良心，那就差不多可以说是廉直而勤慎了。至于操纵奖惩升降大权的人，比如左雄在汉朝，刘毅在晋朝，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也足以整肃朝纲、端正官常了。圣天子早起晚睡，辛勤操劳，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就算是古代的尧舜，也不能超过陛下了。生当此时，京内的公卿大臣，京外的封疆大吏，也应当共同坚持正直廉洁之风，以辅助太平盛世的治理。

制策又以为古人的治河，只是治理一条黄河，现在则合并淮河与漕道一并治理，难度加大，因而寻求一劳永逸的治河之策。据臣下考察，《春秋记》说：“齐桓公填塞八条河流以扩大自己的国土。”大概大禹疏治了九条河流，即徒骇河，太史河，马颊河，覆釜河、胡苏河，简河，洁河，钩盘河和鬲津河。齐桓公淤塞了其中的八条，后世只有一条笃马河。《周谱》载：“周定王五年，河徙。”《汉书音义》认为就是今天的砾渠。如果真是那样，则黄河渐渐往南移徙了。《史记·河渠书》云：“禹厮二渠，北载之高地。”如淳解释说：“这两渠一条就是如今黄河的干流，另一条就是漯川。”汉武帝时，黄河瓠子口溃决，武帝于是亲自前往堵塞黄河缺口，手拉长长的篾缆，沉下美玉进行镇压，以竹、草、土石等筑成拦洪的楗，还建了一座宣防宫。后来黄河又屡次泛滥，因于河堤设置谒者之官进行专门管理。东汉时，王景只治理了一次，以后一直到唐代都没有发生黄河水患，这是因为黄河河道与大禹时黄河故道相接近的缘故。然而古人说的治河都不包括漕运，自元代以后，要将东南的米粮运往北方，于是取道于黄河、运河。而谈治河的人，必定要兼言利漕，这是与古代不同的。余阙、邱浚、潘季驯等人所说的那些办法，都有可以采纳的地方。想要漕运畅通便利，必定要以清刷黄。而想要在筑堤之外别求良策，则只有在海口刷沙，使黄河之水迅速入海，不致壅塞。至于引黄河之水向北流，这样势必毁坏民房，耗费国家财政经费；而且违背了水往低处流的原理，不能马上实行这种办法。常言道：“利不百，不变法”，不就是讲的这种情况吗？

皇上亲自指示治河方略,安波静澜,普天同庆,万世太平,这实际上就是一劳永逸的可靠保证了啊!

像以上所对答的问题:钦敬圣明,崇尚古代,形成寰宇广布圣上美德的局面;选择和教练士兵,彰明震慑中外的声威;设官分职,为民立极,法则永垂后世;随山疏浚河道,依土制定贡赋,怀柔远方,圣德远播。多么美好完备又灿烂辉煌!尽管如此,臣下还是希望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观察天象而更加恭敬上天,披阅瑞图而更加敬慎戒惧,国家亿万年特别隆盛的大福就奠基于此了。臣下学疏才浅,新登科第,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恐惧,几致跌倒。臣下敬答如上。

何凌汉　殿试对策

何凌汉(1747～1815)　字云门,号仙槎,湖南道州(今道县)人。嘉庆十年(1805)探花。后督广东学政,又督山东学政。历官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及户部尚书等,颇得最高统治者信任。69岁去世。有《三朡山房诗文集》传世。

臣对:臣闻执中原于主敬,奋武所以安邦,官箴饬则励翼勤,水患蠲则输将利。古帝王寅绍丕基,勤求上理,心敕几而罔懈,民有勇而知方,百工凛澄叙之经,四海享宣防之乐。桓宽《盐铁论》曰:"修圣绪,宣德化",言勤政也。《管子》曰:"制器选士,政教服习",言训练也。又曰:"政令所及,百体无不从",则居官之绩,从可见矣。《玉海》曰:"《禹贡》九州末系河,是为运道",则转输之利,从可想矣。夫是以函夏乂安,广轮懋豫,天人协应,纯嘏延洪,恢郅治而景上仪,万福所由向用也。

钦惟皇帝陛下,仁敷宙合,化浹垓埏,固已心法严而治道弥勤,文德昭而武功益备,法廉著熙亮之勋,修筑庆堤防之固矣。乃圣怀冲挹,深维久安长治之道,愈切持盈保泰之思。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执两用中之治,保大定功之谟,黜陟以严考课,宣防以利转输。臣之椯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念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当兹对扬伊

始，敢不敬诵所闻！

伏读制策有曰："《尚书》综帝王之治道，二《典》、《九畴》言钦言敬，而皆本于一诚。"此诚传心之要道也。臣惟治统者道统之著，心法者治法之原。故圣德虽本生安，而圣心必先诚敬。惟诚而敬，则用以理万几，贞百度，而勤以昭焉。《尚书》所载，《尧典》以"钦"始，《益稷》以"钦"终。稽尧曰"允恭"，稽舜亦曰"温恭"，盖言敬也。推之《易》占"乾惕"，《诗》咏"小心"，《曲礼》以"俨若"冠篇，《春秋》以体元为重，无往非敬即无往非勤，亦无往非诚也。先儒训敬为主一无适。一者，诚也。其与《书》言"精一"，《中庸》言"所以行之者一"，有异旨乎！后世若张蕴古之《大宝箴》、李德裕之《丹扆六箴》，固典茂可观矣。朱子《或问》谓：自格致、诚正以及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由中和以极位育，枢纽不外乎诚。故欲清好恶之原，则功在慎独；全圣神之化，则道在笃恭。是亦可谓深切著明者矣。其与邵子之《皇极经世》所言君道臣道，皆足与经旨相发明。真德秀《大学衍义》，大旨在正本清源，故首之以为治之要、为学之本，次分四大纲，曰格物致知，曰诚意正心，曰修身，曰齐家，而治平之略缺如。明邱浚补之，为目十有二，所以羽翼四十三卷者，诚不为无助也。我皇上至诚无息，庄敬日强，古圣传心之要，固有吻合无间者矣。

制策又以古者寓兵于农，法良制善，至后世而已异，因勤求乎训练之道与振率之方。臣考《周礼》所载，乡、遂、郊、甸皆因井田而制军赋，居为比、闾、族、党，出为伍、两、卒、旅，制诚善矣。汉兴，置材官于郡国，而京师有南北军之屯。武帝后募兵，买复之事起，而兵制遂坏。唐时分天下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则三百六十一焉。后其法渐坏，张说乃请募士宿卫，更号矿骑。天宝末，矿骑又废矣。宋有禁、厢、蕃、乡之目，天下之兵统于枢密，京师之兵统于三卫，第不耕聚食，骄悍自如，则固利害相半矣。夫兵训之不早，则无以作其义勇之气；练之不勤，则无以娴乎击刺之法。孙子曰："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往来，无不如意"，则练士之道得也。吴子曰："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则治军之道得也。他如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所云"画方点圆，步教足法，兵教手法"者，犹得古兵法遗意

焉。第训练之责,不在兵而在将,惟得其人,则自无游惰募补、杂役滥充之患矣。圣世文德武功,渐被中外,固可以驾汉唐而远追成周之盛已。

制策又曰:"《书》言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尧舜犹兢兢于察吏,考绩之典所自昉也。"臣惟民生之休戚,视乎吏治之贤否。故安民莫先察吏,而察吏尤在兴廉。《周官》六计弊吏:善、能、敬、正、法、辨,无不冠之以"廉",其义可深长思也。汉取士曰"兴廉",课吏曰"廉察",犹本此意。其时以六条察二千石。东汉后,司徒、太尉之所掌,可谓密矣。然详于外不详于内,行于小吏而不行于达官,不无弊焉。魏作都官考。晋太始初课吏以五条,其后文帝课吏以六条,亦皆简要得体。唐则叙以四善,分以二十七最,差以九等。至宋初,因唐四善,分为三等,以七事考监司,以四善二最考守令。他如辽之进治状,金之停阁俸,元之备五事,皆有成法。夫大吏者,小吏之师率也。大吏勤则小吏无不勤,而案牍何至有积延?大吏慎则小吏无不慎,而吏胥何至于逞奸?故为人臣者兢兢奉职,纠心之法倍于纠吏,又何有于甘优逸而避吏议者哉?我皇上乙夜批章,日昃不遑,内而卿尹,外而疆吏,其可不躬率僚属,共矢法廉,以无负寄托之重任,子惠黎元之至意也欤!

制策又以今之治河者,必合淮与漕治之,而欲得乎一劳永逸之策。臣按姒氏九河之分,逆河之同,自是无水患者七百余年。其后河决屡告。汉武时宣房之策,复禹故绩,即《史记》所谓"北载之高地"是也。晋永平中,王景修渠筑堤,自荥阳至千乘海口,偶合于禹功,以故唐一代河患独少。自显德杨列之决,而自宋迄明无宁岁矣。夫昔之治河专治河,今之治河者兼治淮。盖岁漕之运,势必由淮入河,淮与河固相为表里者也。黄水倒灌,清口必致淤淀,洪泽湖水不出,自高家堰各坝流入高宝,旋入运河,下流皆为泽国,而运道亦于是不通矣。故欲收淮河之利而不被其害,则宜加意于清口,筑拦黄矶嘴长坝,以杀黄水之势。其或淮、黄并涨,则最宜保固高家堰。盖淮扬之保障,而黄淮之关键也。黄淮治,而运河亦与继治矣。今惟以清刷黄,诚为挽渡利漕要法。而束清、御黄两坝之外,所为因时制宜,以期一劳永逸,使岁漕四百万不致少有碍者,诚不可无术也。方今睿虑周详,八方永

臻清晏，飞刍挽粟，不可鼓楫而共庆安澜也哉！

若此者：本精一以出治，练士卒以卫民，官方叙而纪纲毕张，漕运利而堤防永固，猗欤盛哉！蔑以加矣！臣尤伏愿皇上懋日新不已之功，成悠久无疆之治。天德素裕，尤深慎修思永之心，酝化既敷，益鉴容民畜众之象。绩已凝，而庶官必期无旷；供维正，而三汛咸迪有功。德威则揆奋兼权，兴革则臣民共赖。茂扬大业，溥畅鸿庥，固纯常而凝宝命，国家亿载咸宁之庆，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持守中正来源于主敬，奋扬武备用以安定邦国，吏治整饬就能激励官员恪尽职守，水患免除了就能运输畅通。古代帝王恭敬地继承伟大的基业，勤于政事，寻求最好的治国景象，从内心戒慎危险苗头，从不懈怠。老百姓既有勇气，又懂得战斗目的。百官恭谨地遵守吏治的常制。四海人民享受宣泄洪水、巩固堤防、消除水患的欢乐。桓宽《盐铁论》说："修治圣绪，宣扬德化"，这是讲的勤政。《管子》说："制造武器，选用士卒，政治教令，适应熟悉"，这是讲的军队训练。《管子》又说："政令传达下来时，就像身体的各个器官没有不听从的"，那么官员居官的政绩，从此也就可以看出来了。《玉海》说："《禹贡》九州，在最后要联上黄河，因为它是运道"，那么运输的便利，从此就可以想见了。所以整个华夏太平无事，举国上下兴旺发达，和乐安适，天人互相协应，延布洪大福庆，弘扬最好的治理，景仰最高的准则，由此各种幸福便都能归向并享受到了。

敬思皇帝陛下，仁义广施宇宙六合，教化周遍九垓八埏。本来已经是心法寅敬而治道更加勤勉，文德彰明而武功更加充备。在法制和廉政方面有助天施治的功勋，在兴修水利方面可以庆祝堤防的稳固了。然而皇上非常谦虚自抑，深深思考着长治久安之道，思考着如何保持现有的成绩，保障这种太平局面的继续。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而以"执两用中"的治道，"保大定功"的谋略，以及严格考课制度，搞好河防治理以便利于物资运输等内容进行策试。臣下愚昧浅陋，怎么能懂得国家的体要？只是考虑到像泰山那样的高山不会避让小

土块的加入，江河湖海也不会选择细弱的水流而不让它们汇入，当此对答制策、颂扬圣德刚刚开始的时候，臣下怎敢不恭敬地陈述我的所见所闻，以供陛下采择呢！

恭读制策上说："《尚书》综帝王之治道，二《典》、《九畴》言钦言敬，而皆本于一诚。"这真是古帝王传述心法的重要方法。臣下想，治统是道统的显著体现，而心法又是治法的本源。所以圣德尽管归本于化生安养，而圣心则必须首先讲求诚敬。只有诚和敬这两个字，才能用来治理万机政务，端正各种事情的处理方法，勤勉也由此显现出来。根据《尚书》的记载，《尧典》以"钦"字开头，而《益稷》以"钦"字终篇。据考察，对尧说他"允恭"，对舜也说他"温恭"，这大概都是说的恭敬。进而推广到《易经》的占词有"乾惕"，《诗经》上歌咏"小心"，《曲礼》将"俨若"二字放在最前面，《春秋》以体法天地之德为重。这些都说明，无论到哪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不讲一个敬字，亦即无论到哪里都无非是一个勤字，亦即无论到哪里都无非是一个诚字。儒学前辈将"敬"解释为主一无适。所谓一，就是诚的意思。这与《尚书》里讲的"精一"，《礼记·中庸》里讲的"所以行之者一"，还有不同的深意吗！后世学者如唐代张蕴古的《大宝箴》，李德裕的《丹扆六箴》，本来也都内容典雅、丰富，很值得一看。宋代朱熹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认为：从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一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由中和一直到"天地位"，"万物育"，其中的枢纽不外乎一个诚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要清除主观好恶的根源，则主要是依靠个人闲居独处时也必须小心谨慎的功夫；要想成全圣神的教化，则主要依靠笃诚恭敬的处世为人之道。这些道理也可以说得上是深切著明的了。它与邵雍《皇极经世书》所说的君道、臣道，都足以与儒家经典的意义互相阐发彰明。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其主旨在于正本清源，所以首先谈为治之要务，为学之根本，其次分列四条大纲，叫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策略则付阙如。明代邱浚为他补上了这些内容，写成《大学衍义补》，有子目十二个，它是用来辅佐补充这四十三卷的《大学衍义》的，确实不能说他对名教没有功劳。我皇上心意至诚，修养不息，庄

敬之心一天天加强，对于古代圣王传授心法的要旨，本来就已完全吻合，毫无偏差了。

制策又以为古者寓兵于农，法良制善，至后世已经发生了变化，因而孜孜不倦，寻求训练士兵之法与振励、统率士卒之方。臣下考察《周礼》所载，乡、遂、郊、甸这些行政单位，都依据井田来制定军赋。闲居时，大家构成比、闾、族、党这些基层组织；出外作战时，就变成了伍、两、卒、旅等军事单位，这种制度确实很好。汉朝建立以后，在各郡国设置材官，在京师则驻扎了南军和北军。汉武帝后，出现了募兵制和买复制，古代传统的兵制便被破坏了。唐代时将天下分为十道，设置兵府六百三十四处，而关内则有二百六十一处。后来这种制度渐渐被破坏，宰相张说于是请求募士宿卫，并改名为矿骑。唐玄宗天宝末年，矿骑又遭废弛。宋代有禁兵、厢兵、蕃兵、乡兵等名称。天下郡国之兵由枢密院统领，京师之兵由三卫统率。只是不再耕田而聚食，骄纵凶悍一如往昔，则这种制度本来就利弊参半了。一般说来，兵士如果教训得不早，那么他们义勇的士气就不能振作；如果操练得不勤，那么他们击刺的技术就不会娴熟。孙子说，要做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往来，无不如意”，那么操练士卒的方法就做到家了。吴子说：“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这样，治军的方法就做到家了。其他如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中所说的“画方点圆，步教足法，兵教手法”，多少还得到了古代兵法的遗意。只是训练的责任不在兵而在将，只有得到了那种胜任的将官，在他们的管理之下，则自然没有以游闲懒惰之民招募补入、以杂色服役的人滥竽充数的害处了。圣朝的文德武功广布中外，本来就可以凌驾汉唐之上而远追成周盛世了。

制策又说：“《尚书》上说：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尧舜尚且兢兢业业地考察官吏，考绩的典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臣下认为，民生的休戚，决定于吏治的贤与不贤。所以安民没有比察吏更为重要的了，而察吏则尤其重在兴廉。《周礼》以六计裁断官吏的优劣：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六条标准没有哪一条不在前面加上一个“廉”字，它的含义可以让人深思啊！汉代取士叫做“兴廉”，考课官

吏叫做“廉察”，还是本着这个意思。那时刺史按照皇帝的六条诏令考察二千石郡国守相。东汉以后，由司徒、太尉掌管考课，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这种制度详于外而不详于内，行于小吏而不行于大官，不能说没有弊端。曹魏时制订了都官考课法。晋太始初年，考课官吏依据五条标准。后来文帝考课官吏则根据六条标准，也都简要而得体。唐代则以四善叙次官吏，又区分为二十七最，每一类型又分为九个等级。到宋代初年，根据唐代的四善分为三等，以七事考察监司，以四事二最考察郡守县令。其他如辽代的“进善状”，金代的“停阁俸”，元代的“备五事”，都有成法可循。一般说来，大吏是小吏的表率。大吏勤政，则小吏没有不勤政的，而案牍何至于有积压拖延不办的？大吏敬慎则小吏没有不敬慎的，而吏胥何至于逞奸？所以为人臣的人若能兢兢业业奉行职守，纠正思想上的错误比纠正吏治上的错误能加倍地予以重视，又怎么会存在那些沉溺于优游逸乐以及畏避吏议的人呢？我皇上二更天还在批阅奏章，太阳偏西仍顾不上吃饭。从朝廷上的公卿大臣到地方上的封疆大吏，难道可以不恭敬地率领其僚属，共同矢志法廉，以不辜负皇上寄托的重任和爱抚惠养黎民百姓的最高心意吗？

制策又以为“今之治河者，必合淮与漕治之”，而想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策略。据臣下考察，大禹九河分治，逆河都让它朝一个方向流，自此以后，黄河没有水患达七百余年。其后，黄河决口的消息屡次报告到京师。汉武帝时，修筑了宣房宫，恢复了大禹治水时的故道，亦即《史记》所说的“北载之高地”。晋代永平年间，王景修渠筑堤，从荥阳一直到千乘县海口，偶然符合大禹治河故道之功，所以唐代黄河水患唯独很少。自后周显德年间杨列决口，以后从宋朝到明代，就没有安宁的年份了。以前谈治河专治黄河，如今治河者则要兼治淮河。因为每年的漕运势必由淮河入黄河，淮河与黄河本来就是相为表里的。黄河之水一倒灌进来，必然导致清口淤淀，洪泽湖的水流不出，自高家堰各坝流入高宝，旋即又流入运河，下游便都成了水乡泽国，而漕运之道也就不通了。所以要想获得淮河的水利而不蒙受其害，则应该特别注意清口，修筑拦黄矶嘴长坝，以抑制、减弱黄河

水的水势。假若淮河与黄河一起涨水，那就最好是保固高家堰，因为它是淮、扬的保障，是黄、淮的关键。黄河与淮河如果治好了，运河也就跟着被治理好了。现今只有以清刷黄，才真正是挽渡船舶、有利漕运的重要方法。而除了束清与御黄两坝之外，应该因时制宜地采取措施，以期一劳永逸。要使每年四百万石漕运物资不致于稍受阻碍，确实不可以没有相应的办法。如今皇上考虑问题特别周详，八方达到了永远太平安定的局面，飞刍挽粟，粮运迅速，难道可以不击浆高歌，共庆风平浪静、治水成功了吗？

像以上所对答的这些问题：依据"精一"心法以制订出治国之策，训练士卒以保卫百姓，居官准则整顿好了而纲举目张，漕运便利了而堤防永远坚固。啊！多么美好兴盛的景象啊！再没有什么时代比这更好了！但臣下仍然特别希望皇上发扬光大日新不已的功夫，成就悠久无疆的太平治世。圣德本已高尚美好，仍然特别注意谨慎地修明天命常在的意念；隆盛的教化本已普遍推广施及，仍然特别留心各种应该宽容百姓、蓄养民众的兆象。治绩已经成就，而众官必然会不荒废自己的职守；赋税供应正常，而春夏秋三季涨水时都能引导取得功效。文德和武威则根据实际情况兼施，各项兴革措施则臣民都依靠它们带来好处。大业得以繁盛发扬，洪福得以普遍通畅，巩固纯德常位而成就上天宝命，国家亿万年永远安宁的大喜大庆就奠基于此了。臣下学识浅陋，新登科第，不识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恐惧颤抖，几乎跌倒在地。臣下敬答如上。〔李绍平译〕

清仁宗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殿试策问

[嘉庆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祇绍鸿图,仰荷昊绎纯佑,寰宇敉宁。比者展义行庆,河海奠安,欣被景贶。用是弥深寅畏,式懋凝承,宥密单心,罔敢暇逸。勉思绎精一之微言,跻荡平之郅治,慎刑期协中之效,宣防臻顺轨之庥。顾惕励亹诸朕躬,而谘诹采乎士论。兹当临轩发策,延揽维殷,尔多士对扬伊始,其各献嘉谟,用资启沃。

自古帝王传心之要,主敬为先。《尧典》始终曰"钦",至舜而喜起赓歌,明良交翊,尤必相勖以"钦",此千古传心之精蕴也。三代圣王曰敕命,曰昭受,曰日跻,曰灵承,先后一揆,可互相证明欤?朱子谓《大学》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枢纽不外乎诚。心法、治法一以贯之者,二书实括其全,能申明其义欤?《帝范》、《帝学》、《心经》、《政经》诸书,其言亦有合欤?夫天亶聪明,尤勤念典,所谓帝王之学异乎儒生者,又安在也?

三载考绩,始于《虞书》;六计弊吏,见于《周官》。曰日成,曰月要,曰岁会,法綦密矣。汉制以六条察守相,盍举其目欤?刺史秩六百石,守相秩二千石,以卑察尊,何也?二千石以下,六条之外,刺史得察之欤?唐考吏以四善二十七最九等,宋以七事,明以三等,可略言欤?朕澄叙官方,风厉有位,所期内外臣工无旷职守。顾或上行而下不效,

大法而小不廉，因循塞责者多，实心任事者少，抑独何欤？

明刑所以弼教，《易·噬嗑》之《象》曰：先王以明罚敕法。敕犹理也。《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言审慎用刑，而不稽留狱讼也。《周礼》大司寇以三典刑邦国，以八刑纠万民。听以五声，议以八辟，未有不听讼而遂可期无讼者。黄霸之治疑狱，颜真卿、崔碣之决冤狱，皆卓可传述。其他尚多可考欤？夫狱犴不平，固多文致。而尘案递积，必少平反，遂使情伪滋纷，奸诈百出。将欲矜慎庶狱，无枉无纵，果何道之从欤？我朝立法，至为详备，重民命而恤民生。问刑之官，宜何如存明允之意，以求合乎刑期无刑之道欤？

天津为渤海故郡，其地南则卫河，北则白河，川渎辐辏，漕运所经。卫河向苦浅滞，自漳河南徙，始以堤防为务。乃堤日增而水亦随长，何以治之？白河性易冲突，非堤防所能御，疏泄之功，可或懈欤？三岔河上受南北诸水，下乘强潮，何以免倒漾横流之患？滹沱、子牙，是一是二？桑乾、永定，孰原孰委？格淀以障浑流，何以三滩必须接筑？筐港以泄盛涨，何以坦坡必须致功？今淀津堤河各工以次告竣，有能洞澈水利者，其条贯敷陈之！

凡兹四事：持敬为宅心之本，亮功为熙绩之征，五刑恤而折狱惟良，六府修而安澜永庆，皆制治之要图也。多士学古入官，讲求有素，以所蕴者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仁德是根本的东西，财用是枝节的玩艺。

假如有人对百姓广泛地给予好处，又能救助大众，这个人怎么样？可以称得上是仁道了吧？

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上面很分明，普通百姓在下面就会特亲近。〔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先帝鸿图,仰蒙上天眷顾保佑,寰宇太平,安宁无事。近来又申示礼仪,颁行庆赏,大河大海风平浪静,安宁无灾,高兴地蒙受着上天赐予的大福。因此就更加深了对上天、对朝政的敬畏谨慎之情,更加勉力于继承和巩固统治权的工作,宽仁宁静,竭尽心力,不敢贪图安逸。勉力思考寻绎着"精一危微"的微言大义,以登上坦荡太平的最好的治理途径。慎用刑罚,以期达到公平中正的效果;宣泄洪水,修筑堤防,以臻于水流顺轨畅通的美好景象。终日警惕勉励则由皇帝我本身勉力地去实行,然而咨询善道则必须采取读书人的议论。现在正当临轩发布策命,殷切地延揽人才,你们众考生回答询问,称扬功德刚刚开始,希望你们各自陈献好谋略,用以作为对皇帝我的启发开导。

自古以来,帝王传授心法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主敬为先。《尧典》始终讲"钦",到舜又高兴地接着来歌唱,明君良臣相互辅助,特别需要以"钦"字互作勉励。这是千古以来帝王传授心法的精微义蕴。三代圣王讲"敕命"、讲"昭受"、讲"日跻"、讲"灵承",前后相继,都是一个道理。你们可以互相证明一下吗?朱子以为《大学》一书,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中庸》一书的枢纽,也不外乎一个"诚"字。帝王的心法、治法相互贯通如一,这两部书实际上全部概括了。你们能够申说阐明其含义吗?《帝范》、《帝学》、《心经》、《政经》这些书,它们中的话也有与此相合的吗?虽然天生聪明,也要勤念典学。所谓帝王之学不同于儒生之学,又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三年进行一次考绩,这种制度开始见于《虞书》的记载。以六计决断官吏的优劣升降则见于《周礼》。叫"日成"、叫"月要"、叫"岁会",这种考核方法也很严密了。汉代的制度以六条诏令考察郡守、国相,何不举出其细目来呢?刺史的俸禄只有六百石,而郡守、国相的俸禄却有二千石,其考察方式属于以卑察尊,这是为什么呢?二千石以下的官,六条诏令以外的事情,刺史可以考察吗?唐代考察官吏按照四善、二十七最、九等这个标准,宋代按照七事来考察,明代按照三事来考察,对此可以简略地说说吗?皇帝我澄清吏治,理正官吏应守的常规,

讽喻激励有位者严格遵守,希望朝廷内外臣僚不要旷废职守。但是有的是上官实行了,但下官却不效仿;大官守法尽忠了,小臣却不廉洁尽职。因循守旧、敷衍塞责的多,实心实意办事的却很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宣明刑罚是用来辅佐教令的。《易·噬嗑》的《象辞》说:先王以明罚敕法。其中"敕"犹如说"理"。《旅》卦的《象辞》说: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这是说要审慎用刑,而不能使案件稽留。《周礼》的大司寇以轻、中、重三种刑法处理邦国,以不孝、不睦及造言、乱民等八刑纠正万民。小司寇以辞、色、气、耳、目等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以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辟议贵族减轻刑罚等问题。总之从来没有不听讼而可以期望无诉讼的。黄霸治理疑狱,颜真卿、崔碣等人判决冤狱,都卓有成效,可以传述后世。其他还有可供考察的吗?刑狱处理不公,固然多是奸官猾吏舞弄法律条文,陷人于罪引起的。而尘案递相堆积,必然少有平反。于是使得案情真假难辨,更加纷乱,奸诈百出。将要谨慎地处理各种案件,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到底要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做到呢?我朝立法最为详细完备,重视老百姓的性命又怜惜老百姓的生活。断案判刑之官,应该怎样做到心存明确允当之意,以求得合乎"刑期无刑"的方法呢?

天津是渤海的故郡,这个地方南边则有卫河,北边则有白河,川渎会聚于此,是漕运所必经之地。卫河历来被河道浅滞所苦。自从漳河南徙,才开始加紧修筑河堤。然而随着堤防的日益增高,水位却也一天天提高,要怎样才能够治理它呢?白河的水性容易冲突,不是堤防所能捍御的。那么疏导、宣泄洪水之功可以松懈吗?三岔河上面受到南北各条河流汇入,下面又受到强大潮水威胁,要怎样才能免除河水倒灌横流的祸患呢?滹沱河和子牙河是一条河还是两条河?桑乾河和永定河哪个是源哪个是流?格淀是用以抵障浑流的,为什么三滩必须接筑?筐港是用来宣泄骤涨的洪水的,为什么坦坡必须致力修好?如今淀津堤防等各项工程依次竣工。有能够熟悉洞彻水利工程者,希望一条条全面地陈献出来。

总共上面这四件事:保持敬畏是定立心法的根本,辅相天功是庶

绩兴盛的验证。施用五刑时要怜惜民众,决断狱案时要用贤良官吏。六府储藏之事修明了,河海风平浪静,永远值得庆祝。这些都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举措谋划。你们这些读书人学习古代贤人,入仕为官,对上述问题的讲论探求早已熟悉,就把你们平日所掌握的那些知识写到文章里,不要泛泛而谈,不要有所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披阅。

吴信中　殿试对策

吴信中(生卒年不详)　字阅甫,江苏吴县(今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后官至侍读学士,有《玉树楼稿》传世。

臣对:臣闻建极所以绥猷,厘工所以熙绩,彰瘅者纠愆之宪,宣防者疆理之经。逖稽曩籍,《易》训健行,《诗》歌蔼吉,《书》著简孚之诫,《礼》垂修利之文。茂矩崇仪,粲焉赅备。圣人绍天阐绎,握镜临宸,念典以劭渊修,亮采以资慎简,宪禁明而刑法当,河渠开而水利兴。悉本乎虔巩兢业之衷,以垂拱而司契。用是日就月将,天工人代,庶狱归于明允,丕绩奏其平成。郁郁乎焕哉!天人之事炳焉,帝王之道隆焉。自古凝薰万宇,陶化二仪,所为扇淳风而席福嘏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懋缉熙之圣学,饬廉法之官箴,洽大德于生成,登寰瀛于清晏,固已主极端而吏治修,国典平而朝宗会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廛衢室之畴咨,冀刍言之一得,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宅心之本,弊吏之方,听讼之宜,浚川之务。如臣椯昧,譬诸涓流撮壤,奚补崇深?顾义切对扬,时当敷奏,敬承清问,敢不就平昔诵习,谨述所闻,用效蠡测管窥之微悃!

伏读制策有曰:"帝王传心之要,主敬为先",而因求夫先后同揆之实。此诚基命宥密之大原也。臣谨按《尚书·尧典》首曰"钦明",至舜而喜起赓歌,明良翊赞,尤必相勖以"钦",用致康哉之盛。嗣是而禹曰"祇台",汤曰"懋昭",文曰"小心",武曰"执竞",同此旨也。周公作《无逸》,曰"严恭",曰"懿恭",曰"寅恭"、"抑畏",犹斯义也。无非"以敬作所"、"精一危微"之蕴也。而《丹书》之训,所为"敬胜怠者吉"两

言，又其前此者矣。《周易·乾》："九三，君子以终日乾乾，夕惕若。"许慎《说文》引作"夕惕若厉。""厉"即"敬"也。而《乾》之象为天，君子体天以出治，则必有昭事凝承之实，以契於穆不已之运。故三代圣王曰"敕天之命"，曰"昭受上帝"，曰"圣敬日跻"，曰"灵承于帝"。心源代衍，如契斯合。朱子《大学或问》谓格致、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或问》谓中和位育，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先儒训敬为主一无适。一者，诚也。诚与敬交相勘悫，而存之为道统，发之为事功焉矣。唐太宗《帝范》十二篇，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宋范祖禹约三皇至宋代治法为《帝学》八卷，真德秀为《大学衍义》，《心经》一卷，《政经》一卷，均有足于经训相发明者。《说命》之篇始言学，而天亶聪明，元后作民父母。帝王之学固与儒生之占毕异也。皇上君师兼体，敷锡同原。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薮，诚统千圣百王之心法、治法而一以贯之者也，岂不倬哉！

制策又以澄叙官方，风厉有位，期内外臣工无旷职守，爰以求实心任事之臣。斯又设官分职之要图也。臣闻察吏法始于虞廷，敷奏明试，三考綦详。夏有遒人之徇，商有官刑之儆。至周而八法治官府，八枋驭群臣，而以六计弊群吏，日有成，月有要，岁有会，其法皆总诸冢宰。汉法，刺史以六条考二千石，凡田宅逾制，牟利侵渔，具申其禁。夫刺史秩仅六百石耳，而得周行郡国，省问治状，以卑察尊，具得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义。至六条之外，则固未尝下侵守相职也。唐有四善二十七最，善之言德，最之言才。四善者，德义有闻，恪勤匪懈等是。二十七最者，献可拾遗，修隍诘盗等是。宋分七事，明别三等。名虽殊，法由旧也。荀悦《申鉴》曰："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动则考行，静则考守。"然则分猷任职，品秩虽有崇卑，官守均宜无旷。乃或上行而下不效，大法而小不廉，斯固在上位者所当正己率属，以力为激劝者矣。圣天子整饬官常，凡封圻大僚，下逮守令，吏治有不肃清者哉！

制策又以明刑所以弼教，期于矜慎庶狱，无枉无纵。臣以为五刑之设，上世不能废。古称"象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非所谓画衣不犯也。《易·噬嗑》之《象》曰："先王以明罚敕法。"卦体雷电合章，卦德威明德中，用狱之义取此。《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

狱。”狱者，罪人之旅也。慎重如山，明照若火，而狱不稽留如旅寄焉耳。《周礼》大司寇以三典刑邦国，以八刑纠万民，听以五声，议以八辟，立法亦云详矣。后世若黄霸之治疑狱，颜真卿、崔碣之决冤狱，皆具有明决慈惠之意，非徒以钩距见长也。夫狱犴不平，固多文致，而尘案积压，必少平反，遂使情伪滋纷，奸诈百出。宽之则坐长刁风，严之又重为民累。是宜揆之以情，断之以法，而衷之于理。古称刑官为大理，盖其义也。《书》“惟刑之恤”，《史记》作“静”，言欲其静而无扰也。而听断之勤，则又其本图矣。伏读御制《明慎用刑说》，本慈祥恺悌之诚，阐阅实矜疑之旨。凡为秉宪之吏者，宜何如重民命、昭信谳，以其襄刑措之休风乎！

制策又以天津为川渎辐辏，漕运所经，筹及夫堤防疏泄之功。臣考防之名，见于《毛诗》、《尔雅》、《礼记》。昔人谓古不防川者，非也。津门以渤海故郡，南有卫河，北有白河，洪波巨浸，条分缕析，诚天汉之津梁，畿辅之雄郡也。卫河发源苏门山下，隋为永济渠，其流向苦浅滞。自漳河南徙，始以堤防为务。乃堤日增而水亦随长，筑捺之力宜勤也。白河发源塞外，亦名潞河，性易冲突，非堤之所能御，分疏之道宜畅也。三岔河上受南北诸水，下乘强潮，归墟之路宜顺也。滹沱为子牙上游，势均而力敌。永定旧名无定，汇于桑乾，淳为芦沟，源合而流分。格淀堤旧至台头而止，今则接筑至三滩。筐儿港以泄盛涨为功，今且兼及于坦波，所为因势而利导也。夫《禹谟》六府，《洪范》五行，皆以水居首。此涤川陂泽之策，康功所由奏也。矧兹夫转漕孔道、列服近畿者哉！方今睿谟广运，轸念民依。凡淀津千里长堤以及格淀堤，各工均豪，特颁帑金，鸠工增修。地庆安澜，人歌乐土，遐哉迈超禹绩，宜乎銮辂省方，怀柔告瑞也！

若此者：体性功以宰化，则玉烛调和；统班叙以甄才，则瑶图亮绩。咸中协庆，而恩乐熙春；允翕升歌，而欢胪函夏。胥根至诚悠久，用垂裕乎亿万斯年。伏愿皇上本日新久照之谟，勖慎宪省成之义。执中考道，以钦若昭格被之光；灼见克知，以惠畴励弼谐之治。不以科条已审，而惟钦惟恤，董戒稍宽；不以浚距已成，而或委或原，经营偶弛。清宁合撰，曼羡延洪，于以祇迓蕃厘，式承多祜，则我国家申锡无疆之

庆，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建立最高准则用来确定大谋，整饬百官用以导致众事兴旺。彰明善行，震慑邪僻，这是纠错惩恶的宪章；宣泄洪水，修筑堤防，这是治理河道的常法。远考古籍，《易经》训词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诗经》歌唱"蔼蔼王多吉士"；《尚书》著有"五辞简孚，正于五刑"的告诫；《礼记》留下兴修水利的文字。盛大的规矩，崇高的仪则，十分明确，非常完备。圣人继天而作，阐明陈述天道，紧握大权，统领天下。精念典学以勉励德行的深入修养，辅佐天工以谨慎地选拔人才。禁令明确而刑法得当，河渠开辟而水利兴举。这些都归本于恭敬戒惧、小心谨慎、兢兢业业的一片心怀，于是垂衣拱手，抓住关键而治。因此能日积月累，学问至于光明；无旷庶官，天工由人代替完成；众狱皆治，归于明确允当；勋绩卓著，臻于地平天成。多么繁荣啊！多么显赫啊！天人之事兴旺发达，帝王之道无比兴隆。自古以来凝固宝命，薰陶教化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常煽淳风，享受福祉，都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

敬思皇帝陛下，使积于光明的圣学十分繁盛，申饬大官守法而小官廉洁的官箴，在抚育万物中培养成盛大德行，使整个寰宇达到太平安宁的境界。本来已经是皇极端正而吏治修明，国典平允而百川入海了。然而圣怀却十分谦虚自抑，不遗弃非常微小的善言，殷勤地效法古人"衢室访求"的做法，希望从草野之人的言论中获取千虑之一得。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而以宅心之本、弊吏之方、听讼之宜和浚川之务等重要问题进行策问。像臣下这样愚昧的人，就好比是涓涓细流和一小撮土壤一样，又怎么能对陛下高如泰山、深如渊海的学问有所补益？只是从大义上来说关系到回答君主垂问和宣扬皇帝圣德，从时间上来说又正当敷奏以言之际，敬承皇帝的清审详问，怎么敢不就臣下平时所诵习的知识，谨慎陈述其所见所闻，用以效献自己管窥蠡测的一点微小的赤诚之情呢！

跪拜敬读制策有这样的话："帝王传授心法的要点，以主敬存诚

为先”,因而探求先圣传心前后方法一致的事实。这确实是奠基大命、宽仁宁静的大本大原。臣下谨案,《尚书·尧典》首先说“钦明”,至舜而喜起续歌,明君良臣互相翊赞,一定以“钦”字彼此勉励,用以达到“康哉”的盛况。自此以后,禹说“祇台”,汤说“懋昭”,周文王说“小心”,周武王说“执竞”,都与这个意义相同。周公作《无逸》篇,说“严恭”、“懿恭”、“寅畏”、“抑畏”,还是这个意义。无非都是“以敬作所”与“精一危微”的含意。而《丹书》所训导的“敬胜怠者吉”等二十个字组成的两句话,又比这还早一些。《周易·乾》卦说:“九三,君子以终日乾乾,夕惕若。”许慎《说文解字》引作“夕惕若厉。”“厉”即“敬”的意思。而《乾》卦之象为天,君子体察天道以制订出治理措施,则必定有昭事凝承之实,以合于天道於穆不已之运。所以三代圣王说:“敕天之命”,又说“昭受上帝”、“圣敬日跻”、“灵承于帝”。心法的渊源代代推衍,就像符契一样互相吻合。朱子的《大学或问》认为: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其《中庸或问》又认为:从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一直到圣神功化,其中的枢纽关键不外乎一个诚字。儒学先辈将“敬”解释为主一无适。所谓“一”就是“诚”的意思。“诚”与“敬”交相配合,谨慎小心,存之于心即为道统,发之于外则为事功了,唐太宗《帝范》十二篇,始于《君道》、《建亲》,终于《阅武》、《崇文》。宋人范祖禹综括从三皇到宋代的治法写成《帝学》八卷,真德秀写成《大学衍义》以及《心经》一卷,《政经》一卷,都有足以与经典的解释互相发明的地方。《尚书·说命》开始谈到学习的事。而天生聪明的人作君主,而君主又作民父母。帝王之学,本来就与儒生读书吟诵之学不一样。皇上君、师兼于一体,对百姓施布幸福和赐给幸福同于一源。斟酌道德之渊源,吸纳验定仁义的林薮,确实是统括千圣百王的心法、治法而贯通如一,难道不是特别盛大卓著吗!

制策又认为整顿官吏常规,讽喻激励有职位者尽职守法,以期内外臣僚不旷废自己的职守,于是寻求以实心实意任事之臣。这又是设官分职的一个重要考虑。臣下听说,考察官吏之法肇始于唐虞时代。那时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一考绩,制度十分详密。夏代有遒人振木铎征询于路。商代则有官刑以作为对官吏的警戒。到了周代,则有

八法治理官府，八枋统驭群臣，而以六计裁断群吏的优劣，考察他们的治绩。日有成，月有要，岁有会。而这一切的执行办法都总汇于冢宰那里。汉代的制度，是由刺史按照六条诏令考察二千石郡守国相。凡属田宅逾制，牟利侵渔，都全面地申明其禁令。刺史的俸禄只不过六百石罢了，然而却可以周遍巡行各个郡国，省察审问守相的治理状况，以卑职监察尊官，这是完全获取了小大互相牵制、内外互相维系的统治要义。至于在六条诏令规定之外的事，则本来未尝下侵郡国守相的职权。唐代考察标准有四善二十七最。“善”是讲德行的标准，“最”是衡量才能治绩的标准。所谓四善，包括德义有闻、恪勤匪懈等。所谓二十七最，则包括献可拾遗、修隍诘盗等。宋代分为七事，明代别为三等。名目虽然不同，却都是沿袭旧制。荀悦《申鉴》说：“有事考其功，有言考其用，动则考其行，静则考其守。”既然如此，那么分猷任职，品秩虽然有高低尊卑之分，职守则应该不能旷废。然而有的却上行而下不效，大官守法尽忠而小官却不廉洁尽职，这本来是在上位者应该端正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率领自己的部属，以此极力作激励，鼓舞他们来做到的。圣天子整顿居官者应尽的职守，举凡封疆大吏，下至郡守县令，吏治有不肃清的吗！

制策又以为宣明刑罚是用来辅佐教令的，希望做到怜悯臣民，谨慎施刑，使得众狱案既不冤枉好人，又不放纵坏人。臣下以为，五刑的设置，即使是上古盛世也不能废弃。古称“象刑惟明”，是说象征天道以制刑法，并不是说当时无肉刑，只在衣服上画上特殊的花纹，以示耻辱，人们就不会犯法了。《周易·噬嗑》的《象辞》说：“先王因此明察刑罚，修正法律。”卦体是雷电相合而彰显，卦德是威猛明确，德行适中，用狱之义取法于此。《旅》卦的《象辞》说：“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监狱就好比是罪人的旅店。对待它的慎重要像山那样，明察要像火一样，而狱讼的不稽滞就要像旅店不滞留客人一样。《周礼》的大司寇以三典来处理邦国，以八刑来纠察万民。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以八辟议论贵族减刑的问题，立法也说得上很详细了。后世如黄霸的治理疑狱，颜真卿、崔碣的决断冤狱，都具有严明果断和慈惠的意思，并不只是凭着辗转推问而见长。狱讼处理不公，固然多是因为猾吏舞

弄法律条文而陷人于罪的。然而尘案积压，必定少有平反，于是使得真伪越来越纷乱难辨，奸诈百出。如果处理从宽，则坐长刁风；如果处理过严，则又成了老百姓的另一种祸害。这就应该推求它的实情，而以法律进行决断，使它正好符合道理。古时候称刑狱官为大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尚书》"惟刑之恤"，《史记》"恤"字作"静"，是说要做到安静而不扰民。而勤于断狱，则又是刑狱官本来的目的。恭读皇帝的大作《明慎用刑说》，是依据那慈祥、和易近人的一片诚心，阐明查阅实情、矜悯疑案的旨意的。凡属那些执掌刑宪的官吏，应该怎样去做好重视民命的工作，昭示可信的判案作风，用来辅助刑罚可以不用的美好风气呢？

制策又以为天津是川渎辐凑、漕运所经之地，因而筹划到修筑堤防、疏泄洪水等工程的作用。据臣下考察，"防"这个名称，见于《毛诗》、《尔雅》、《礼记》等书。前人所谓"古不防川"的说法，是不对的。津门因为是渤海故郡，南有卫河，北有白河，洪波巨浸，条分缕析，确实是京师的津梁、畿辅的一个雄郡。卫河发源于苏门山下，隋代时为永济渠，它的水流一向被河道浅、又阻滞不通畅所害苦。自从漳河河道南徙，才重视修筑堤防的工作。但是河堤日益增高而水位却也随着往上长，所以筑堤的事要勤加用力。白河发源于塞外，亦名潞河。其水性容易冲突，不是一道河堤所能防得住的，所以分流疏导应该大力做。三岔河上游汇入南北诸水，下游则受强大潮水的冲击，所以此河入海应该顺畅。滹沱河是子牙河的上游，两河长短势均力敌。永定河旧名无定河，汇于桑乾河，河水积聚而不流通，形成芦沟。这几条河源头相同，而下流却分开了。格淀堤旧筑至台头就打住了，如今则接筑到了三滩。筐儿港用来宣泄盛涨，发挥作用，如今要连带着扩至坦坡，目的是因势利导，治理河道。《尚书·大禹谟》叙六府，《洪范》篇谈五行，都是以水居首位的。这就是涤川陂泽之策，田地大丰收所以奏效的原因。更何况此处正当转漕的通道，于九服中靠近京畿呢！方今圣上睿谋广为运筹，深切关注着老百姓的痛苦。举凡淀津千里长堤以及格淀堤等，各项工程都很浩大。特意颁下国库的金帛，聚集工役从事增修。于是大地庆祝河海水波安宁无事，人民都讴歌"乐土"之诗。这已超过

了远古大禹治水的功绩，而皇帝巡视远方，各地都奏报上天瑞应，自然是合乎情理之中的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这些问题：体察心性之功以治理化育万物，造成四时和气之祥。统一为官准则以甄选人材，导致瑶图亮绩。刑罚适中，协和致庆，人们恩乐熙春。洪水敛息，万民歌舞升平，整个华夏一片欢愉。这些都是植根于至诚悠久，为后人留下的亿万万年的法式。伏愿皇上依据日新久照之谋，勉力于慎宪省成的大业。持守中正，考察大道，通过敬顺皇天来彰明那遍及上下的光辉；洞察一切，知人善任，通过各种职事都顺畅来勉力实现那辅臣和谐的盛治局面。并不因为科条已经明审，而只是谨慎，只是怜恤，督察和诫敕稍有放宽。并不因为疏浚河道、修筑堤防已经完成，而对河流下游、源头的经营治理偶有松弛。世道清明太平，合乎自然发展规律。扩大散布大喜庆，用来恭敬地迎接承受诸多福祉。则我国家申示赐予的无穷瑞庆就奠基于此了。臣下学识浅陋，新登科第，不知忌讳，冒犯皇威，恐惧颤抖，达到极点，几乎跌倒。臣下敬答如上。

谢阶树　殿试对策

谢阶树(生卒年不详)　字欣植，一字于玉，号向亭，江西宜黄人。嘉庆十三年(1808)榜眼。嘉庆十五年乃主顺天乡试，十九年则充会试同考官，出督学湖南。累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为人谨慎，处事平允。有《守约堂集》行世。

臣对：臣闻上德之应，锡极而绥猷；郅治之隆，厘工而熙绩。弼教而刑号祥刑，顺轨而水称德水。圣皇体天出治，寅绍丕基，莫不以开模轨物之心，为敷政宁人之本。《诗》曰："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言懋昭也。《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言考课也。又曰："刑期无刑，民协于中"，言钦恤也。《周礼》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言宣防也。盖夙夜单心，廑求上理，用至三才叙而五事备。《汉书·礼乐志》曰："德施大而世曼寿，高贤愉而民和乐"。古圣王之膺鸿名而受多祜

者,以此。

钦惟皇帝陛下,极建中和,功参化育,固已百度凛几康之敕,庶绩昭寅亮之心,民气淳而比户可封,众流顺而安澜永庆矣。乃圣怀冲挹,愈切畴咨,体至理之无穷,惟迩言之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圣学、察吏、明刑、治河诸大政。臣之椷昧,譬如细流土壤,奚裨海山?顾当先资拜献之时,敬念古者靖共之义,敢不就平日所诵习者,以效管窥蠡测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自古帝王传心之要,主敬为先",因而思夫千古传心之精蕴。此诚持盈保泰之要图也。臣案危微精一,帝王传心之学也。"敬"之一字,帝王治心之功也。故尧曰"钦明",舜曰"温恭"。当时君臣交勉,无不相勖以"钦"。其所以都俞吁咈,开授受之传,喜起赓歌,极明良之运者,大要不越乎此。三代圣王,亦皆恪守此意。禹之"祇台",汤之"日跻",文武之"缉熙"、"执竞",悉本此严恭寅畏之意,以为祈天永命之原。而敬事上帝,敬保元子,先圣后圣,异世同揆。朱子《大学或问》谓格致以至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或问》谓中和极之位育,枢纽不外乎诚。蔡沈《书传》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尚书》之旨,二语足以尽之,此可以知心法、治法一以贯之之道也。后世人君知此意者,莫如唐太宗。《帝范》十二篇,成于贞观,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人臣知此意者,莫如范祖禹。《帝学》八卷,进于讲读。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宋代神宗。外此如真德秀《心经》一卷,《政经》一卷,皆足与二书相发明。程子云:帝王之学与儒生异。盖儒生不过诵习章句,阐明理气心性之微妙;帝王必见诸事功,以为治国平天下之业。虽天德王道之源同,而其流则异也。皇上圣学高深,聪明天亶,绍勋、华之心绪,迈轩、顼之前规,咸五登三,袭六为七,洋洋乎帝者之上仪,真亘千古而独隆矣。

制策又曰:"三载考绩,始于《虞书》,六计弊吏,见于《周官》",而因求所以考察之法。臣窃考察吏之法,虽昉于虞廷,然至周而始密。小宰以六计弊群吏: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是也。汉制,刺史以六条察郡国,而察豪强者一,察二千石者五。其考课之次序,令长于岁终计户口、钱谷、盗贼之数,上之郡国,是郡守课令长也。而

郡守课于刺史，刺史课于御史、宰相，宰相上之天子，而赏罚乃行，颇有内外相守、尊卑相维之意。唐考课掌于吏部，京官郎中主之，外官员外主之。考其德则有四善，考其才则有二十七最，又分为九等，以定黜陟。宋绍圣中以七事考转运、提举等官。明则差以三等，曰称职、曰平常，曰不称，而又有旌异、访举、保留、纪录、闲剧、谪戍之法，以核其能否。顾树之风声者，朝廷之典，而饬其纲纪者，夙夜之心。小臣或奸法而无忌，大臣或畏事而苟安，工养羞之谋，怀恋栈之意，其谁不为张奭之假手而效阳城之自署乎！故欲澄叙官方，则莫如使之畏法；欲使之畏法，则莫如使之知耻。庶几乎大臣法而小臣廉矣。国家治轶虞廷，政隆周室，内外臣工，咸知恪遵职守，以期无玷官箴。故能使瀛海兆民安居乐业，同游于太和之宇也。

制策又以明刑所以弼教，欲问刑之官存明允之意。此尤勤恤民隐之盛心也。臣窃思《易·噬嗑》及《旅》之《象辞》，皆言用刑之道贵于明慎，二卦实互相发明。《周礼》大司寇刑邦国以三典，曰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是也。纠万民以八刑，曰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乱民是也。虑囚之际听以五声，减罪之条议以八辟。盖听讼明慎，则民不得以无情之辞试，是无讼由于听讼也。至若黄霸之数决疑狱，庭中称平。颜真卿之决五原冤狱，天为之雨。皆卓可传述。他如隽不疑之断卫太子，终军之诘徐偃，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亦其可称者。伏读御制《明慎用刑说》："明生于公，公则无私，无私始能明。慎由于勤，勤则不怠，不怠斯能慎。"诚可为万世理刑者之法鉴也已。

制策又曰："天津为渤海故郡，川渎辐辏"，因思所以理漕运而奠民居。臣愚以为，直隶之水，总汇于天津，以达于海。其经流有二：自南来者为卫河，自北来者为白河。而淀池之水，贯乎白、卫二河之间。考卫河源出卫辉府，至天津府城，北与白河会入海，向苦浅滞。故额设浅夫以挑之后，始立堤工，乃堤日高而水亦随长，不得不于堤上加埝，以防漫溢。白河出宣化府滴水崖，至武清县入直沽，会卫河入海。而通惠诸河之水悉注其中，源高势峻，有若建瓴。故遇水潦即冲突难治，惟多设减水坝以泄之。三岔河固白、卫之总汇，诸水之尾闾也。欲

令其无倒漾横流之患，则莫如减入口之水。至若子牙会南北二泊、滏、滹诸水，则子牙为经，而滹沱为支也。桑乾发源于太原之天池，则桑乾为原，而永定为委也。皆当游衍而节宣之，使无壅溃填阏之患。故格淀以障浑流，而三滩必须接筑；筐港以泄盛涨，而坦坡必须致功。诸河治而漕运通，转输利，堤防疏泄不容缓也。日者圣驾巡幸淀津，图视方略，行见河堤巩固，百川朝宗，一劳永逸，诚越禹功而上之矣。

若此者：典学守其兢业，省吏察其猷为，大布明允之心，聿著平成之绩，诚千载一时也。臣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天德懋而弥切畴咨，酌化敷而愈勤考察。矜慎庶狱，既仁育义正之兼行；奠定闾阎，自海淀河防之永固。由是上畅九垓，下溯八埏，伊古圣皇鲜可与争隆也。猗与盛哉！握乾符，阐坤珍，以固纯常而凝宝命，则我国家亿载咸宁之庆，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最高德行的瑞应，是赐予臣民最高准则和安定整个天下。最美好的治理状态，是百官尽职和庶绩兴旺。辅之以教化，则刑罚号称祥刑。众流顺轨，则水称德水。圣皇体察上天，制订出治国措施，恭敬地继承伟大的基业，没有哪一件事情不是开示准则规范事物，以这样的心理作为施政宁人的根本。《诗经》上说："日积月累，知识就会渐渐多起来，以达到光明辉煌的境界"，这是讲的懋昭圣学。《书经》上说："广泛地听取他的意见，明确地验核他的功绩"，这是讲的考课。又说："起初用刑，目的是为了以后不必用刑，百姓则服从中正之道"，这是讲的用刑要慎重，要体恤罪人。《周礼》说："以库坝积蓄洪水，用堤岸防止水灾"，这是讲的宣泄和防治洪水。大概帝王早起晚睡，勤劳政事，竭尽心力，殷切地追求上等的治理，用以导致天地人三才和谐而貌恭、视明等五事赅备。《汉书·礼乐志》说："德施盛大而世人长寿，高贤愉悦而民众和乐"。古代贤王之所以荣膺大名而享受众多福祉，就是凭借这些措施。

敬思皇帝陛下，最高准则定立起中和，功劳与天地化育并列为三。本来已经是众事都居安思危，各项业绩的完成都昭示出一片恭

敬诚信。民风淳厚而每户都可封侯拜爵，众流顺轨而水波安静、永远可以庆贺了。但是圣怀谦虚自抑，更加急切地重视垂询，体察最高治理永无止境，只管察访浅近之言。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而以圣学、察吏、明刑、治河等重大问题进行策问。像臣下这样愚昧的人，就好比是细流、小土块一样，怎么能够对大海和泰山有所裨益？但是现在正当先资拜献之时，敬念古人"靖恭尔位"的大义，怎么敢不就平日所诵习的知识，恭陈圣前，以效献自己管窥蠡测的千虑一得呢！

跪拜敬读制策上有这样的话："自古帝王传授心法的要义，以主敬为先"，因而思考那千古以来传授心法的精蕴。这确实是保守成业和太平局面的重要图谋。臣下考察，"危微精一"，这是帝王传授心法的学问。"敬"这一个字，是帝王治心的功用。所以尧说"钦明"，舜说"温恭"。当时君臣之间互作勉励，没有哪一个不以"钦"字互相鼓励。帝尧以君臣互答声开创授受之传，帝舜喜起续歌，极尽明君良臣的大运，大体上不超过这些做法。三代圣王也都恪守此意。大禹之讲"祇台"，商汤之讲"日跻"，周文王、周武王之讲"缉熙"、"执竞"，都是依据着这种"严恭"、"寅畏"之意把它作为祈于上天、永保大命的来源。而敬事上帝、敬保众百姓，则不管先圣后圣，时代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朱子的《大学或问》认为，从格物致知一直到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他的《中庸或问》又认为，从致中和一直到天地位、万物育，其中的枢纽也不外乎一个"诚"字。蔡沈《书传》说："二帝三王之治归本于大道，二帝三王之道归本于心法。"《尚书》的宗旨，这两句话足以概括。从这里可以知道，心法和治法是始终贯通如一的大法。后世人君知道这个意思的，则没有哪一个比得上唐太宗了。他的《帝范》十二篇，成于贞观年间。此书始于《君体》、《建亲》，终于《阅武》、《崇文》。人臣了解这个含意的，则莫过于范祖禹了。他的《帝学》八卷，献进于担任讲读期间。此书叙事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宋代的神宗皇帝。此外如真德秀《心经》一卷、《政经》一卷，都足以与上述二书相互发明和补充。程子说：帝王之学与儒生之学不同。大概儒生之学只不过是诵习经史的篇章字句，阐明理气心性的精微奥妙；而帝王之学则一定要见之于事功，建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尽管二者在

天德王道方面的渊源是一致的，然而它们的流别却是不一样的。皇上圣学高深莫测，天生聪明，继承唐尧、虞舜的心法绪端，上迈轩辕黄帝、颛顼的前圣成规，跟五帝并列，与三王等同，承袭六经而成为第七经。可谓洋洋盛事，帝王的上仪，真是绵延千载以来而唯独最为隆盛的了。

制策又说："三载考绩之制，始见于《虞书》。六计弊吏之法，始见于《周礼》"，因而寻找古代考绩的方法。臣下私下考察，察吏之法虽然肇始于唐虞时代，然而直到周代才开始严密。小宰按照六计裁断群吏，这六计就是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汉代的制度是：刺史按照六条诏令考察各个郡国，其中监察豪强的有一条，监察二千石的有五条。其考课的程序，是县令县长于年终统计户口、钱谷、盗贼之数上报郡国，这是郡守考课县令县长。而郡国守相接受刺史考课，刺史接受御史大夫和丞相的考课。丞相将所有情况上报天子，然后颁行赏罚，颇有内外相守、尊卑相制的深意在内。唐代的考课权掌握在吏部。京官由吏部郎中主管，地方官由吏部员外郎主管。考察他们的德行的标准则有四善，考察他们的才干的标准则有二十七最，又分为九等，以确定赏罚升降。宋代绍圣年间按七事考察转运使、提举等官。明代则分为三个等级，叫做称职、平常、不称。此外又有旌异、访举、保留、纪录、闲剧、谪戍之法，以考核其能与不能。但是，树立好的风气是朝廷之典，而整饬纲纪的，则在于官员们早晚敬慎小心。有的小臣干犯法制而无忌讳，大臣中有的又畏事而苟且偷安，工于保住俸禄的心计，怀恋权位的意图，又有谁不像张奭那样假手于人，效法阳城那样自署其考察等级呢？所以想要澄清居官常规，则没有使官吏畏法更好的了。要使他们畏惧法制，则没有比使他们知道廉耻更好的了，这样就差不多会使大臣守法小臣廉洁了。国家治绩超过唐虞，政治声望高于周王室。内外臣僚，都知道恪遵职守，以期不致玷污官箴，所以能够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一同游息于太和的宇宙之中了。

制策又以为宣明刑罚是用来辅佐教化的，想要问刑之官心里常常想着如何使刑狱明确而允当。这尤其是皇上殷勤地关切怜惜民间

痛苦的一片盛情。臣下暗自想来,《周易·噬嗑》和《旅》卦的《象辞》,都说用刑之道,可贵之处在于用刑明确而慎重,二卦实际上是互相发明,阐述了这个道理。《周礼》规定,大司寇治理邦国时运用三典作标准,是说治理新建之国用轻典,治理一般之国用中典,治理乱国用重典。纠察万民时用八刑,用刑的对象叫做不老、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乱民。审讯记录囚犯的罪状时,要以辞、色、气、耳、目听讼;减罪之条以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议作为议刑依据。大概听讼时做到严明慎重,那么老百姓就不能够以不情之辞诉讼,这就是说无讼是由于听讼合理带来的好结果。至于黄霸多次断决疑狱,法庭中称为公平;颜真卿判决五原冤狱,上天为之降雨。这些都卓有成效,可以传布后世。其他如隽不疑之决断卫太子冤狱,终军之审讯徐偃,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也是值得称道的例子。恭读圣上大著《明慎用刑说》云:"狱讼决断严明产生于用心公正,用心公平则铁面无私,要铁面无私才能做到严明。决狱谨慎来源于办事勤奋,办事勤奋则不致怠荒,不怠荒这样就能慎重了。"这些话确实可以作为千秋万世治理刑狱的重要借鉴呀!

制策又说:"天津是渤海故郡,川渎辐凑",因而想着用什么方法来治理漕运而安定民居。臣下愚意以为,直隶之水,总汇于天津,而流入大海。其干流有两条:自南边流来者为卫河,从北方流来者为白河。而淀池之水,贯通于白、卫二河之间。考察卫河,其河源出于卫辉府,流到天津府城时,往北与白河汇合流入大海。此河向来被河道浅滞所苦,所以按定额设置一些浅夫来挑泥沙之后,再设置堤工。但是河堤一天天增高而河水也随着往上涨,这就不得不于堤上再加埝,以防河水漫溢。白河源出于宣化府滴水崖,到武清县时流入直沽,汇合卫河流入大海。而通惠河等诸河之水也都注入其中,源头高,流势峻急,有如高屋建瓴,所以一遇洪水就冲突难治,唯一的办法是多设减水坝以宣泄洪水。三岔河本来是白河和卫河的总汇,是各条河流的汇归处。想要使它没有倒灌横流的祸患,则没有比减少入口之水为好的了。至于子牙河会合南北两个水泊以及滏阳河、滹沱河诸水,这就表明子牙河为干流,而滹沱河为支流了。桑乾河发源于太原的天

池,这就表明桑乾河为源,而永定河为委了。这些河都应该游衍时而节制它们,宣泄它们,使它们没有被堵塞、溃决和淤垫的祸患。所以格淀堤是用以阻障浑流的,而三滩必须接筑;筐港是用来宣泄盛涨的,而坦坡则必须用力将其修好。这些河能够得到治理则漕运畅通了,运输顺利了,所以堤防和疏通宣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近来圣驾巡察淀津,绘图指示方略,不久就将见到河堤坚固,百川朝宗归海,一劳永逸,确实超越了大禹的功劳而在其上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这些问题:典圣学,重心法,持守兢兢业业的精神;督察官吏,观看他们的谋略与作为;慎理刑狱,大布严明允当之心;修治河渠,盛著地平天成之绩。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重大举措。臣下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天德已经懋修然而却更加迫切地征求采纳臣民的意见,隆盛的教化已经广施然而却愈加勤奋地进行官吏考察。谨慎地处理好各类刑狱案件,已经做到仁育义正之兼行,又兴修水利,奠定闾阎之民居,自行使海淀等处河防工程永远牢固。由此上畅九重天,下通八方边际,自古以来的圣皇仁君,很少有能与陛下抗衡的。多么美好兴盛啊!手握乾符之瑞,阐扬坤珍之应,用以巩固纯德常位和成就上天赐予的宝命。则我国家亿万年永远太平的瑞庆就奠基于此了。臣下学识疏陋,新登科第,不识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恐惧,浑身颤抖,几乎跌倒。臣下敬答如上。

石承藻　殿试对策

石承藻(生卒年不详)　字馥庭,湖南湘潭人。嘉庆十三年(1808)探花。纂修《治河方略》及充文颖馆协修,治学博涉多通,为士林所重。其状貌魁伟,率直尚气,高谈惊人,时人号之为石猛。在馆未久,改御史,晋兵科给事中,转刑科掌印给事中。终以憨直得罪朝贵,诬以造言,被降职。卒于道光初,享年60余岁。

臣对:臣闻懋德者,绥猷之本也;厘工者,熙载之原也。除稂莠,所以安善良;修堤防,所以利转运。稽古帝王敦崇心学,慎饬官方、五

刑垂钦恤之风，四洎普安澜之庆，莫不以敬天勤民之意，为保邦制治之谟。《书》曰“念终始，典于学”，言逊志时敏，厥修乃来也。又曰“任官惟贤才”，言知人则哲，庶官无旷也。又曰“惟明克允”，曰“九川涤源”，言民协于中，而水归其壑也。盖端本于上，承流于下，奸宄不作，蓄泄得宜，所为化照炳蔚，治洽敦庞，固纯常而凝宝命者，恃此道耳。

钦惟皇帝陛下，冠德卓踪，绍天阐绎，本所其无逸之念，深建其有极之思，固已诚敬立而百度维贞，慈祥昭而万世永赖矣。乃圣怀冲挹，深维长治久安之道，弥切持盈保泰之图，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治心之学，察吏之条，弼教之方，防河之政。臣之椯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殚述平昔所诵闻，以效管窥蠡测之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传心之要，主敬为先。《尧典》始终曰‘钦’，至舜尤相勖以‘钦’。”此诚内圣外王之精蕴也。臣谨按，执中授受之原，肇自唐虞。而其后三代圣王曰“敕命”，曰“昭受”，曰“日跻”，曰“灵承”，无非主敬存诚之意。上以绍十六字之心传，即下以开千百王之大统，圣圣相承，其揆一也。《大学》一篇，首列八条目，而朱子《或问》谓格致以至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一书，中列三达德，而朱子《或问》谓中和极于位育，枢纽不外乎诚。盖诚则必敬，敬则能诚。二书固已括其全矣。后世哲后贤臣，心知其义。如唐太宗《帝范》十二篇，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王道本末兼该。宋范祖禹《帝学》八卷，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宋代神宗，圣学实事具备。真德秀本《大学衍义》为《心经》一卷，《政经》一卷，深明治道，胥本二帝三王以立说，于主敬之旨，实相发明焉。昔程子有言：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儒生循习章句，而帝王务得其要，以措诸事业。所以聪明亶于天，无竞尤昭执竞；功业征诸世，惟时更濂惟几也。我皇上继天立极，媲美勋、华，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薮，用是敷锡庶民，则洋洋乎郅治之上仪，万福所由向用也。

制策又以考课之法，始于虞廷，见于《周官》，而虑核察之未真，奉行之未善。此尤整饬治原之至意也。夫虞严三载之例，周严六计之文，以至日成、月要、岁会，随时以考，总诸冢宰，而黜陟行其间，驭官

之法至详且备。汉初刺史以六条考二千石,其目以"强宗豪右"为始,"违公损下"为终,不止聚敛为奸,通行货贿,宜凛不严之戒也。丞相、御史得杂考郡国之计书,至天子则受丞相之要。考之于史,如尹翁归为东海太守,必于秋冬课吏,则郡亦课县也。尹翁归又为右扶风,盗贼课常为三辅最,则州亦课郡也。丙吉为长安京兆尹,岁竟,丞相课殿最,奏行赏罚,则公卿亦课群吏也。而汉之吏治,最为近古。晋以五条考郡县,杜预又改其法,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唐考课之法,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叙以四善二十七最。如内而"献可拾遗",外而"修隍诘盗",法綦详矣。然条章具在,核实为难,故刘秩请约其大纲,杜佑复陈其课议。宋以四善二最考守令,其外又以七事考监司。至明而区以三等。皆以试其材而程其功也。我皇上澄叙官方,风厉有位,凡内外臣工敢不实心以任事也哉!

制策又以明刑所以弼教,而期于矜慎庶狱,无枉无纵。此慎重民命之至意也。臣闻舜、皋陶曰"钦",曰"中"。《吕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斯非刑期无刑之要旨乎?《易·噬嗑》之《象》曰:"先王以明罚敕法",所以立法于未犯之先。《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所以用法于既犯之后。盖明而加以敕,则朝廷之令,严如挟雷霆之怒;用而无所留,则万物之气畅,无伤造物之和也。成周之世,刑措者四十余年,蒸蒸然上理。说者谓此无讼之风,非听讼所及。则《周礼》刑以三典,纠以八刑,听以五声,议以八辟,又何以无非为听讼者立之制乎?此以知未有不听讼而可期无讼者也。夫讼之难,难于情理参半之间。而决其真伪,尤难于案牍既成之后。而剖其欺枉,则黄霸之治疑狱,颜真卿、崔碣之决冤狱,不皆卓可传述欤?他如汉之于公,唐之徐有功,治狱率多平反,皆可为后世刑官之法。然则欲酌情理之中,以去文致之弊,固不徒在治人之法,而在行法之人矣。皇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问刑之官可不求合于明允之意乎?

制策又以天津为漕运所经,而因讲求夫水利之要。臣考天津之南为卫河,向苦浅滞。自漳河南徙,于馆陶入运,湍急浩瀚,每羡溢为灾。始以堤防为务,乃堤日增而水亦随长。盖漳水泥浊,河形曲折,垫淤于下,则泛溢于上。若于上流度地建坝,引而注之古黄河,则永底

宁谧矣。白河会通惠诸河之水，势如建瓴，而西北诸山泉流汇聚积，雨未歇，怒流已至，非堤防所能御，则疏泄之功不容懈也。三岔河上受南北诸水，下乘强潮，《禹贡》所谓逆河是也。伏秋水涨，每有倒漾横流之患。惟于南北运河各建坝，开河减水，分流别途，归海人口之水减，则达海之口宽，永定、子牙皆得绰然入口而东注矣。滹沱之下游为子牙河，天津归海之水以子牙为正流，余皆附之以达海。永定河俗名浑河，即桑乾之下流也。其源本不甚大，而迁徙无定，则以水浊泥多，河底逐年高淤耳。夫子牙、永定二河，以淀为壑，淀廓而后河有归，亦必河治而后淀不壅，此治二河之法，所当熟计也。皇上轸念民依，随宜浚治，淀津堤河各工以次告竣，真有以建永赖之功，而溥无疆之利矣。

若此者：持敬以宅心，亮工以熙绩，慎狱以全民命，宣防以利转输，猗与盛哉！而臣尤伏愿皇上至诚无息，安益求安，法天行之自强，以日新为富有。圣功日懋，犹严慎修思永之忱；官职允厘，益深慎宪省成之意。刑可称祥，率土有生成之庆；河不为患，洪流无泛溢之虞。事勤于三五，功兼乎在昔。于以茂扬大业，式迓鸿庥，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于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回答：臣下听说，勉励地搞好德行的修养，这是安定国家大政的根本；治理好百官，这是发扬功业的本原。清除稂莠之辈，是用来安定善良民众的措施；修筑堤防，治理河道，是有利于运输的大事。考察古代的帝王，他们敦勉崇尚心学，谨慎地整饬官员应该遵守的常规，五刑的施用垂示慎重、体恤的优良风尚，各条河流得到治理，出现风平浪静、值得永久庆贺的可喜景象。没有哪一件事不是以敬天勤民的心意，来定下保邦制治的谋略。《尚书》说："念终始，典于学"，说的是学习时心志谦逊，又时时勤奋努力，那么他品德的修养完善就自然会实现。又说："任官惟贤才"，是说了解人才就明智，各个官位不至于旷废误事。又说："惟明克允"，"九川涤源"，是说对老百姓的刑狱合乎公正的标准，而水流都能归于河道，不致泛滥。大概在

上者端正本原，在下者就会承流效法，奸轨之人就不会出现，河水的蓄积和宣泄就会各得其宜。之所以教化昭彰，治绩炳蔚，明刑弼教，民风合乎敦厚朴实，能巩固纯德常位而成就上天赐予的宝命，都是依靠了这些方法与途径。

敬思皇帝陛下，圣德冠绝，政迹卓越，继承天命，阐扬推广。根据"所其无逸"的思想，加深"建其有极"的想法。本来诚敬的心法已经确立，各项事情都得以正确的处理，审理刑狱，慈祥昭明，大兴水利，千秋万世永远得到依靠。但是圣怀谦虚自抑，深思长治久安之道，更加迫切地寻求保守成业和太平局面的办法。将臣下等人召进朝廷，而以治心之学、察吏之条、弼教之方与防河之政等大问题进行策问。像臣下这样愚昧无知的人，又怎么能知道国家大政的体要呢？只是现在正当对答圣问、称扬圣德刚刚开始的时候，恭敬地想着"敷奏以言"的大义，又怎么敢不全部陈述平日所诵习、所了解到的那些知识，以效献自己管窥蠡测、千虑一得的赤诚之情呢！

跪拜敬读制策有这样的话："古代帝王传授心法最为重要的，就是以主敬为先。《尚书·尧典》始终都说'钦'，到虞舜仍然以'钦'字与大臣互相勉励。"这确实是内圣外王之学的精蕴所在。臣下谨案，允执厥中的心法，其授受的渊源始自唐虞。而自此以后，三代圣王说"敕命"、说"昭受"、说"日跻"、说"灵承"，这些话无非都是主敬存诚之意。对上继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对下则开辟千百代君王的大统。圣圣相承，其道理是一致的。《大学》一篇，首先排列八个条目；而朱子《大学或问》认为从格物致知，以至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中庸》一书，中间列示三达德；而朱子《中庸或问》认为，从致中和直到天地位、万物育，其中的枢纽不外乎一个"诚"字。大概心存诚意，遇事必敬慎；做到恭敬则能以诚待人。这两部书大概已经概括它的全部内容了。后来的明君贤臣心里都知道这个意思。比如唐太宗的《帝范》十二篇，从《君体》、《建亲》开始，到《阅武》、《崇文》为止，王道治体，本末兼备。宋臣范祖禹《帝学》八卷，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宋代神宗，圣学实事，完全具备。真德秀依据《大学衍义》作《心经》一卷，《政经》一卷。他深明治

道，都是追本二帝三王之治以立说，对于主敬存诚的意旨，确实是互相发明了的。以前程子有句名言，说是帝王之学与儒生不同。儒生遵循诵习经书的篇章字句，而帝王之学则务得其要旨，并运用于实际事业中。所以聪明天生，像周武王那样无竟，而尤其昭明执竞。功业已经受到当世的验证，由此却更加小心，为政更加居安思危。我皇上继承天命，建立最高准则，可以与唐尧、虞舜媲美。斟酌道德之渊源，吸纳仁义的林薮，以此遍赐庶民幸福，于是乎洋洋盛美，达到了趋于最高治理境界的最高典范，各种福祉都得以归向并享用了。

制策又以为考课之法开始于唐虞时代，又见于《周礼》，因而担心考课工作中核察尚未真实，奉行尚未尽善。这尤其是整顿治源的最好的想法。唐虞时严格执行三载考绩之例。周代则严格贯彻六计的条文，以至日成、月要、岁会，随时加以考察，最后总汇于冢宰，并在此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奖惩升降，其管理官员的办法最为详尽而且完备。汉代初年刺史根据六条诏令考察二千石守相，其条目以“强宗豪右”开始，到“违公损下”为止。不只是对聚敛为奸、通行货贿应该注意不严之戒。丞相、御史大夫可以集中考核各郡国上报的计书，到了天子那里则接受丞相汇总的材料。考之于史，如尹翁归为东海太守，每年必定于秋冬两季考课官吏，这说明郡也考课属县。尹翁归又曾担任右扶风，盗贼课在三辅中常常是最好的。这说明州亦考课属郡。丙吉担任长安京兆尹，每年年终，丞相考察京官的优劣，奏行赏罚，这说明公卿也考课朝廷官吏，而汉代的吏治最为接近古代。晋代按五条标准考核各郡县，其后杜预又改变做法，委任达官贵族各自考核他们的下属。唐代考课之法规定，凡各部门的长官，每年考校他们的下属的功过，分为九等，排列为四善二十七最。如内有“献可拾遗”，外有“修隍诘盗”，法制甚为详细。然而条令规章虽然都摆在那里，要核实却很困难。所以刘秩奏请皇帝要简化其大纲，杜佑又陈献了他关于考课的意见。宋代按四善二最考核郡守县令，此外又以七事考核监司。到了明代区分为三等。都是用来考察官吏们的才干、衡量他们的成绩的。我皇上澄清并整顿居官常规，讽谕勉励在位百官。凡是朝廷内外臣僚，怎么敢不实心实意地办事干工作呢！

制策又以为宣明刑罚是用来辅佐教化的，因而希望做到怜悯臣民，谨慎地处理各种狱讼，做到既不冤枉好人，又不放纵坏人。这是慎重地对待、关心老百姓性命的最好的考虑。臣下听说，舜、皋陶说“钦”，说“中”，《吕刑》说“敬”字有七次，说“中”字有十次，这不是体现了“刑期无刑”的重要旨意吗?《易经·噬嗑》的《象辞》说：“先王因此明察刑罚，修订法律”，这是要在没有犯法之先建立法制。《旅》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明察慎重地用刑，而不拖延狱讼”，这是要在人们犯法之后施用刑罚。大概明察刑罚而又加以申敕，朝廷发出的命令就具有裹挟雷霆般的威严；运用刑罚处理狱讼而无所拖延稽留，万物之气就畅顺，而不会伤害造物的和气。成周之世，刑罚弃置不用达四十多年，社会风气淳厚美盛，达到了最佳治理的境界。有的评论家认为，这种没有狱讼的好风气，不是听讼得当所带来的结果。那么《周礼》以三典刑邦国，以八刑纠万民，以五声听狱讼，以八辟来议论贵族减刑的问题，又何以不是为听讼者所设立的制度呢?从这点可以知道，没有不听讼而可以希望出现无狱讼的局面。听讼之难，就难在情理参半之间；而判断其真伪，则尤其难在案卷已经形成之后。而剖析其欺枉，则如黄霸的治理疑狱，颜真卿、崔碣的决断冤狱，不都是卓然可以传述的例子吗?其他如汉代的于公，唐代的徐有功，其治理刑狱一般多能平反，都可以作为后世司法官的准则。既然如此，那么想要考虑案情的实际情况，求得正确的审理，以去掉舞文弄法、陷人于罪的弊端，本来就不在于有好的治人之法，而在于有好的行法之人了。皇上爱惜生灵的美德，深入人民的心中，问刑之官可以不追求自己的工作合乎明确允当的意旨吗!

制策又认为天津是漕运所经过的地方，因而讲求水利工程的重要性。据臣下考察，天津之南为卫河，向来被河道浅、水流阻滞不通所苦。自从漳河南徙，在馆陶流入运河，水流湍急浩大，经常泛滥成灾，人们这才开始重视堤防的修筑工作。但是堤防虽然一天天增高，而水位也一天天随着涨高。这大概由于漳水浑浊，含泥沙量大，而河形又曲折多弯，泥沙淤积在下面，水流就在上面泛滥。如果在上游选定一个地方建坝，引流注入古黄河，那就永远风平浪静，没有水灾

了。白河会合通惠河等诸河之水，水势凶猛，有如高屋建瓴。而西北各处山泉流汇积聚，暴雨尚未停息，汹涌的激流早已冲来。这不是堤防所能挡得住的，因此疏浚河道、引泄洪水的工作就刻不容缓了。三岔河上游先汇聚南北诸水，下游受到强潮的威胁，这就是《禹贡》所说的逆河。伏天、秋天一涨水，就常常有水流倒灌横流之患。只有在南北运河各建水坝，开挖河道，减损水势，分流别途，使归海入口之水减少，河道达海之口才能加宽，永定河、子牙河就都能够入口而舒缓地往东流入海里去了。滹沱河的下游为子牙河，天津归海之水以子牙河为正流，其余的河流都归附到它那里以达于海。永定河俗名浑河，也就是桑乾河的下游。其源头本来不很大，然而迁徙不定，于是因为水浊泥多，河底便逐年垫高淤塞了。子牙、永定这两条河，把淀泊作为归流处，淀泊的泥沙必须廓清，然后河水才有归路，也必须到河道治理好以后淀泊才不致壅塞。这是治理子牙、永定二河的办法，是应该好好地思考的。皇上时刻挂念老百姓的痛苦，因地制宜疏通根治，淀津堤河各项工程依次完成了，真的能够依靠这些建立永远的功业，而普施无穷无尽的利益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这些问题：保持敬慎态度慎理刑狱，以保全民命；宣泄洪水、修筑堤防，以有利于运输。真是美好啊！兴盛啊！然而臣下仍然希望皇上至诚之念，永不停息，安益求安。效法皇天运行的自强不息，以日新之德作为富有。圣功虽然懋盛，仍然谨慎对待自身的行为，永保天命；百官虽已得到确实的治理，却仍然深切注意慎宪省成用心。刑法可以称为祥刑，普天下的人民都有受到抚育生成的吉庆；河流不造成祸患，用不着担心有洪水泛滥的危险。政事比三王五帝更为勤奋，功劳囊括了以往的君王。于是以此弘扬大业，迎致鸿福，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就奠基于此了。臣下学识浅陋，新登科第，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恐惧，浑身颤抖，几致跌倒。臣下敬答如上。〔李绍平译〕

清仁宗嘉庆十四年(1809)己巳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殿试策问

[嘉庆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覃熙宙合,仰荷上苍鸿佑,祖考眷贻,海宇乂宁,雨旸时叙。而深宫劼毖,益矙治安,弗侈小康,冀臻大同。兹御极之十四年,值朕躬五旬庆节,诞敷纶诏,特开恩榜,嘉与天下普锡蕃厘,同跻仁寿。思所以昌明经术、会通典礼、正士趋而裕民食者,非博采胪言,曷弼予治?尔多士扬对大廷,其敬听咨询,各抒所蕴。

言《易》首称汉学。其授受源流,皆有可考。上下经原目,始于《乾》而讫于《丰》。今之篇目,何时所定?先儒《十翼》,次第不同。其以《文言》分附《乾》、《坤》二卦者何人?荀爽《九家易》列诸逸《象》,能约举欤?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周官》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其书有见于他籍者欤?《洪范》"九畴"与八卦相为表里,能畅其旨欤?《诗》首"二南"。《诗谱》云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厥旨安在?《诗》之用于乐者,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燕飨所用,或上取,或下就,见于《书》、《传》者凡几?《周颂》为周室太平德洽之诗,作于何时?《鲁颂》果奚斯所作欤?宋无"风"而商有"颂",其义安在?《春秋》宗《公羊》者几家?宗《谷梁》者几家?平其异同者几人?修《左氏传》者自何人始?条列二家不如左氏数十事者何

人何事，能确指欤？

经曲之文，损益之道，莫备于《礼》。汉时后仓最为明《礼》，授弟子三家者谁氏？其名《周礼》为《尚书·周官》者何谓？作“十论”、“七难”以排之者何人？其能释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者又何人？《周礼》为末，《仪礼》为本，岂真本难明而末易晓欤？《周礼》注者多门，注《仪礼》者止郑康成。其为章疏者二家，孰举大而略小，孰举小而略大？《礼记》则大小二戴，既共氏以分门；王郑两家，复同经而异注。其为《义疏》者则有南北九家五家，可缕指之。至若唐之《开元礼》、《曲台新礼》、《续曲台礼》，宋之《开宝通礼》、《太常新礼》、《太常因革礼》，以及《通典》、《续通典》诸书源流得失，其参互论断，以为定衡。

古之用人，首德行，次才能。汉举孝廉及贤良方正，有未仕而举者，有既仕而举者，何欤？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刘毅谓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所谓八损三难者，撮举其略。唐取士多沿隋制，常贡之科有几？其择人有四事，而犹必先德行者，本末先后，不较然欤？觅举之讥，最为士习之痼弊。宋太宗谓科级之设，以待士流，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言之何笃切欤？国家求贤取士，非徒以阶荣进之路。多士学古入官，宜何如束身自爱，以副贡选之盛典也！

食为民天。《周礼》仓人藏粟，旅师聚粟，遗人委积，其为储蓄甚备，常平、义仓、社仓无论。《元史》所载，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即今制所由昉。顾天庾转输，丁胥丛杂，回漕搀和之弊，何以杜之？平籴之法，所以便民，其后或定和籴之制，或筑富人之仓，或置东西市之籴，厥为何代？《管子》“守国守谷”之说，李悝“籴三籴二籴一”之论，所言果有当欤？宇文融之受诏益贮九谷，孙成之发仓贱售，薛讷之不与仓粟，皆有可采欤？夫粟运多则囤积不免，存贮久则红朽堪虞。果何道而使市无腾踊、谷无浥烂欤？

夫覃研经籍为致用之原，参稽礼制为建中之准。先器识、后文艺，而后登进之法严；三余一、九余三，而后储备之道广。斯数者，皆经国之要图，立政之先务也。尔多士坐言起行，先资拜献，即在于此。其勉殚素学，悉意敷陈，以备遴选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君子对道义很明白,小人对私利很明白。

打算了解人才,不可以不了解天理。

获取到天下具有方法,也就是获取到百姓的拥护,从而也就获取到天下了。获取到百姓的拥护具有方法,也就是获取到民心,从而也就获取到百姓的拥护了。〔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了盛大的基业,使整个宇宙一片欢乐。仰仗上苍的大力庇佑,以及皇祖皇考在天之灵的眷顾和赐予,现在海内安宁,雨雪阴晴依时有序。但皇帝我在深宫里仍然尽力用心,更加勤勉于治国安邦,不想夸耀小康之世的美妙,而希图将天下推进到大同境域。如今是皇帝我御极的第十四年,恰逢皇帝我五十大寿庆典。因而颁布诏书,特开恩榜,将喜庆分给天下百姓,把吉福普赐藩国臣民,高兴地与大家一起步入增仁添寿的境地。皇帝我还经常思考关于如何昌明经学儒术、融会贯通历代的制度和礼仪、端正士林趋向和使人民足食丰衣等问题。若非博采众人胪陈的建言,又靠什么来辅助皇帝我对国家的治理呢?你们众士子既被选举出来应对于大廷,那就敬听咨询,各将胸中所积蕴的见解抒发出来吧。

说到对《易》的传习研究,则首称汉儒之学。汉儒《易》学的授受源流,都有文献典籍可资查考。《易经》上经、下经原来的篇目,始于《乾》而讫于《丰》,现在的篇目为何时所定?前代儒士对"十翼"即《易传》十篇,各家的排列次序有所不同,其中以《文言》分附于《乾》、《坤》二卦的是何人?荀爽编注的《九家易》开列了散失的诸《象》,你们能简要地列举它们吗?孔子删定《尚书》,上限断自唐尧虞舜时代。而据《周礼》记载,周朝"外史"官的职掌是保管三皇五帝的文献,这些文献

有见于其他典籍的吗?《尚书·洪范》所述天帝赐给禹王治理天下的九种法则,与《周易》的八卦相为表里,你们能畅言其旨意吗?《诗》的开头部分是"二南"。《诗谱》说得圣人教化而产生的叫做《周南》,得贤人教化而产生的叫做《召南》,这样说的用意何在?《诗》中常用于谱曲演奏的部分,按规定国君用的是《小雅》,天子用的是《大雅》。然而当时宴享所用,有时上取《大雅》,有时下就《小雅》,这种事例见之于《书》、《传》的共有多少?《周颂》为周王室处于天下太平、君臣行德政、内部关系和睦时期产生的诗篇,它作于何时?《鲁颂》果真是奚斯所作吗?《诗》中无《宋风》而有《商颂》,其意义何在?《春秋》各学派中,尊从《公羊传》的有几家,尊从《谷梁传》的又有几家?评说它们异同者有几人?修撰《春秋左氏传》自何人开始?条列《公羊传》、《谷梁传》不如《左氏传》数十例的是何人,所列举的又为何事,你们能准确地指出来吗?

在记述古代礼仪规范及其损益变通法则方面,没有比《礼》更为详备的了。汉朝时后仓最通晓《礼》,他教授的三家弟子是谁?将《周礼》更名为《尚书·周官》有何道理?写出"十论"、"七难"来排击他的是何人?能够对这些论难作出合理解释,从而使《周礼》的大义得以梳理贯通的又是谁呢?《周礼》为末,《仪礼》为本,难道真是本难明而末易晓吗?《周礼》的注释者有多家,而注释《仪礼》的只有郑康成。后为《仪礼》郑注作"章疏"的两家中,谁举其大者而略其小者,谁举其小者而略其大者?《礼记》则有《大戴礼》与《小戴礼》之分。其编者戴德与戴圣,虽同姓氏却分为两个学派。王肃和郑玄两家,又同治《小戴礼》一经而作出不同的注释。其后就王、郑注本再作《义疏》的则有南九家、北五家。可以逐项指出来。至于唐代的《开元礼》、《曲台新礼》、《续曲台礼》,宋代的《开宝通礼》、《太常新礼》、《太常因革礼》,以及《通典》、《续通典》诸书的源流得失,你们可将它们互相参照比较后加以论断,从而作出定评。

古代用人首重德行,次观才能。汉代荐举"孝廉"及"贤良方正",有未入仕途而被荐举者,也有已入仕途而被荐举者,这是为什么呢?曹魏时陈群定立"九品官人"之法。刘毅说"九品法"有"八损",而任用有才能之人为官本有"三难"。对其所说的"八损"、"三难",撮要举

出大略来。唐代科举取士多沿隋制,常贡之科设有几科?当时选拔人才共有四条标准,但仍然坚持必须先看德行如何。本末先后,不是非常鲜明的吗?历来受世人批评的寻找关系以求举荐之风最是士林习气中的痼疾流弊。宋太宗说:科举这个阶梯的设置,是用以等候士子们来登的,岂容打杂胥吏冒牌钻进窃取科举功名!此话为何讲得这等笃切呢?国家求贤取士,并非只是为了给士子铺设一条光彩的仕进之路。众士子学古从政,应如何束身自爱,以符合贡选盛典呢?

食为民众的头等大事。《周礼》记载:周朝由仓人掌管粟米的入仓贮藏,由旅师掌管收集郊野粟米,由遗人掌管邦国粟米的积聚。作为一套储蓄粮食的措施已甚为完备,那就更不用说常平仓、义仓、社仓之设了。据《元史》所载,元代在京畿地区设立的国家粮仓,便有河西务的十四仓,京师的二十二仓,通州的十三仓。这就是现今有关定制的由来。但在国家粮仓的仓粮转运之中,往往有丁役胥吏从杂其间,伙同偷盗或在漕粮中掺和沙粒的种种弊端,该如何杜绝?古代创设丰年由国家以高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以待荒年再低价卖给百姓的"平籴"之法,用以便利人民。其后有定立"和籴"之制的,有筑"富人之仓"的,有设置"东西市之籴"的,它们都是在什么朝代?《管子》的"守国守谷"之说,李悝的"大丰之年四籴其三,中丰之年三籴其二,小丰之年二籴其一"之论,讲的果真允当吗?宇文融在接到诏令后多存各种谷米,孙成开仓贱价售粮给百姓,薛讷坚持不把仓存之粟抵给富人作利息钱,这些做法都有可取之处吗?粮食买卖转运多了则不免造成商人囤积,储存久了又发霉腐烂令人忧虑。真有什么好法子能使市场不出现粮价飞涨,仓藏谷米不发生潮湿腐烂吗?

深入钻研经籍是学以致用的基础,查考学习礼制是建立中正之道的依据。选拔人才先察其度量胆识,后观其文采才能,这样仕进之法就严谨了。存储粮食能三年有一年的余粮,九年有三年的余粮,那么储粮备荒的路子就宽广了。这几条,都是治国的重要方略,立政的先急之务。你们众士子应当坐而谈论、起而实行并率先提供献策的,就在于此。希望努力发挥平日所学,悉心尽意铺陈所见,以准备接受遴选罢!

洪莹　殿试对策

洪莹(生卒年不详)　字宾华,安徽歙县人。嘉庆十四年(1809)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淡于仕进,对《五经》均有撰述。

臣对:臣闻稽古者观文之盛,建中者制礼之经,明宅俊所以登贤良,实仓廪所以保康阜。《吕氏春秋》曰:黄帝之道在《丹书》,颛顼之师为绿图。言念典也。《文子》曰:天道为文,地道为理。言垂制也。《易纬稽览图》曰:君五期,辅三名,以建德,通万灵。则官人之法可知矣。《尚书大传》曰:八政先食,万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则民食之重,可思矣。懿夫图书亮章,润色鸿业。《驺虞》乐官备,陇亩栖余粮。巍乎事赅功备矣。自古升恒有庆,容保无疆,所为膺福嘏而凝宝命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锡畴御宇,握镜临宸,固已河洛阐羲轩之蕴,经曲揽文质之宜,论升材则《棫朴》可歌,验藏富而阜昌有兆矣。乃圣德渊冲,勤求上理,思崇久治之规,益切咨询之实。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经训、礼制、官人、积贮诸大典。臣之椷昧,何以知体要?顾念幸际嘉言罔伏之时,敬附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就平时所考见者,谨述所闻,以效颛蒙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言《易》首称汉学,其授受源流,皆有可考",而因统究夫《书》、《诗》、"三传"之精微。此诚宅心知训之要典也。臣考《汉书》,立博士十四家。汉兴,《易》学本田何,有施、孟、梁邱之学。而刘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经,或脱去"无咎"诸字。唯费氏《易》与古文同。夫"汉易"莫古于孟喜。《艺文志》载孟氏上下经二卷,二卷是孟喜以前已题经字。然孟喜、费直之古《易》,郑康成尊之,王弼易之,王肃难之。而河北江南为郑氏、王氏之学,遂立门户之见矣。"十翼"次第,以孔颖达《正义》所列为定。自《正义》定,而先儒无异议矣。李鼎祚《集解》载荀爽九家,逸《象》三十有九家,有虞翻、陆绩等九人,称爽者以爽为之主也。《尚书》断自唐虞。《尚书大传》以《尧典》为《唐传》,是伏生时所见本《虞书》亦谓之《唐书》。孔安国《序》云:三皇之书言大道

也,五帝之书言常道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未必至汉初全佚。若王应麟《困学记闻》所载,《荀子》、贾谊《修政语》诸篇所引,可参考也。刘歆《洪范五行传》云:自"初一"以下六十五字皆"洛书"文。唐一行引京房《传》云:自《中孚》冬至,用字九八七六,是为三十。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张衡云:龙图受羲,龟书畀姒,而戴九履一、阳奇阴耦之文,其表里相符可考也。《诗谱》云:《周南》得圣人之化,《召南》得贤人之化。然周、召分陕,而至谓周公以圣自居,而以贤居召。此后儒所以不能无议也。若《大雅》、《小雅》,燕飨所用,天子诸侯之乐有未能画一者,故笺经者定为上取下就之说。《鲁颂》有"清庙奕奕,奚斯所作"之语。班固《两都赋·序》云:"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后人遂以《鲁颂》为奚斯作,误矣。《商颂》宋戴公得其五篇,称"颂"者仍其旧也。宋无"风",王者之后不备辖轩之采也。刘知几云:左氏之义有三长,公、谷之义有五短。王应麟胪列诸家之说甚详。而三科九旨之等,善经善礼之言,皆昭然矣。我皇上倬汉经天,振兴文教。生斯世者,宜何如通经以致用也乎!

制策又曰:"经曲之文,损益之道,莫备于《礼》",而因及王、郑异同之文,唐宋因革之义。此又质文损益之大经也。臣考汉时后仓最善于《礼》。《曲台古经》五传,弟子分曹教授。而注《礼》之大宗,为郑康成。贾公彦、孔颖达二家《义疏》,详略异宜,或得或失。小戴四十九篇为今《礼记》。《大戴记》之《五帝德》、《帝系》诸篇,犹可考见三代之遗也。河北、江南为郑、王之学者,党同伐异,而门户之见分矣。汉初叔孙通定礼仪,为绵蕞于野外为之。东汉则又有曹褒定礼。唐初太宗、高宗时有《贞观显庆礼》。开元中命张说、徐坚等撰《开元礼》。由是有唐一代若《贞观显庆礼》、《开元礼》、《曲台新礼》、《续曲台礼》,粲乎备矣。宋之《开宝通礼》视乎唐为损益,而《太常新礼》、《太常因革礼》以及《通典》、《续通典》诸书源流得失,皆可参稽互考也。仰惟圣天子德车乐御,玉振金声,超百代以立隆,宰万殊而示准,郁郁乎文,优优之大,又岂唐宋以来所可企及于万一也哉!

制策又以"古之用人,首德行,次才能",爰及汉魏而下官人贡士之方。此又循名责实之要义也。臣按《毛诗传》云:八能可使为士,九

能可使为大夫。王应麟云:三德官人之法,三宅知人之法。秦汉以上取士不一途,惟名实相宾而已。汉世始有"贡举"之名。《韦彪传》云:二千石贤则贡举得其人。文帝十五年亲策贤良,武帝元光元年、五年策试董仲舒等,为后世策试贡士之始。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晋刘劭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法。晋干宝云: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此刘毅"八损"、"三难"之说深有见乎?知人之不易已。唐代取士多沿隋旧,常贡之科择人有四。时之所向,明经、进士而已。至宋太宗谓科级之设,以待士流,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其言笃切,士之所宜奉为圭臬也。皇上敦崇实学,奖励士林。凡服古人官者,敢不深相勉励也乎?

制策又曰:"食为民天。《周礼》仓人藏粟,旅师聚粟,遗人委积",则储蓄之方与平籴之法,均不可不亟讲也。臣考蔡邕《月令章句》曰:谷藏曰仓,米藏曰廪。许慎《说文》曰: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仓黄取而禀之,故谓之廪。古者耕九余三,财用不匮,所由民气乐而颂声作也。若耿寿昌之常平,朱子之社仓,皆仓储可取者也。管子守谷守国之说,李悝籴三籴二籴一之论,则平籴可酌者也。夫惟实意奉行,则转输不虞其劳,而回漕搀和之弊息矣。籴粜均当其时,而屯积红朽之虑免矣。《管子》曰:圣王在上,政令无不从,惟民生之厚也。皇上惠爱黎民,至优极渥,念三农之生谷,式九用以宜民。而仓储籴粜诸大政,有裨于斯民生计者大矣。

若此者:翱翔仁义之圃则经术昌也,览观文物之林则轨度昭也,升司马之书而士气勉也,重司农之粟而物产宁也。抑臣尤伏愿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考古验同文之盛,而章志贞教,不忘考订之勤;大中建皇极之隆,而纬地经天,益饬仪文之等。小廉大法而官方澄叙,幸进于以严其防;解愠阜财而民依轸念,惠鲜弥以深其泽。九垓八埏莫不涵濡沾被,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倡导考古是观察文教的盛举,树立中正之道是制定礼法的准绳,明确任用俊杰的原则是选拔贤良之士的需

要,充实粮仓是保障人民安乐富足的前提。《吕氏春秋》说:黄帝的治世之道写在《丹书》上,而颛顼的老师是绿图这个人物。这讲的是坚持学习的重要。《文子》说:天之道为文,地之道为理。这讲的是垂示人间礼仪制度。《易纬·稽览图》说:那五百年产生的一位杰出帝王,必得有三个名臣辅佐,专去讲求修身立德,使万事达于美善。由此便可懂得选任官员的法则了。《尚书大传》说:八大政事,以"食"为首,"食"为万物之始和人情事理的基础。由此便可懂得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重要性了。真美好啊!图籍典册的明亮光彩,润色那伟大业绩。《驺虞》之曲又配备了乐官演奏,田野里堆积着余粮。事功完备真崇高了呀!自古升进持久而有喜庆,容众保民永无尽头。所谓帝王接受天赐福寿而凝结其宝命,靠的就是这些措施。

敬思皇帝陛下,得上天所赐治世大法而统御天下,手握明镜登临宸极,当然已经对于"河图"、"洛书"阐发了伏羲氏、轩辕氏的精深意蕴,对于传统礼仪规范的形式和实质把握得宜。若论善于选拔人才,则有如《诗·大雅·棫朴》所歌颂的周文王那样。若察看人民藏富之多,便知国家的大昌盛有了兆应。然而圣君之德竟如此深厚而谦逊,仍然勤勉地追求最高治理,思考和崇尚长治久安之道,日益切实地开展国事咨询。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经籍训诂、礼仪制度、任用官员、积谷贮粮等方面的大法则。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无知,怎能懂得这些问题的大体与精要?但想到自己幸遇嘉言不被埋没的好时代,理当敬从"事先提供献策"的旨意,怎敢不就平时所研究发现者,恭谨地陈述出来,从而献上自以为有一得之见的无知愚蒙呢?

跪拜敬读而见策问诏书上说:"谈到对《易》的传习研究,首称汉儒之学。汉儒《易》学的授受源流,均有典籍文献可资查考",顺而全面探求《书》、《诗》及《春秋》三传的精深微妙之所在。这些的确都是用以武装臣民思想并训告他们的重要经典。臣下我查阅《汉书》,汉朝曾设有专掌经学传授的博士十四家。汉朝建立后,《易》学本于田何,有施雠、孟喜、梁邱贺三个学派。但刘向以藏于皇宫秘府中的古文《易经》去校订三家《易经》时,发现有的地方脱漏了"无咎"诸字。只有费直《易》与古文《易经》相同。其实汉代的《易》学中,没有比孟

喜所传本更古的了。《汉书·艺文志》记载，孟氏《易》有上下经两卷。此两卷是在孟喜得到之前便已题写了“易经”字样的。然而对孟喜和费直的古文《易》本，郑康成尊从它，王弼更改它，王肃诘难它。而河北、江南又分别传习郑氏、王氏之学，于是便各自树立起门户之见了。“十翼”即《易传》十篇的排列次序，以孔颖达《周易正义》所列为定准。自从《正义》排定此次序后，先儒们便无有异议了。李鼎祚所编《集解》收载了荀爽等《九家易》中的注释和三十九家对重新找回的诸《象》所作的注释。其中有虞翻、陆绩等九人之注，而称许荀爽则以荀爽为其代表。《尚书》所收文献起自唐、虞。《尚书大传》把《尧典》作为《唐传》，那是因为汉初伏生传授《尚书》时所发现的抄本而上面《虞书》也被称为《唐书》。孔安国写的《尚书·序》说：三皇时代的文献是讲“大道”的，五帝时代的文献是讲“常道”的。《周礼》记载周朝外史官掌管三皇五帝时代的文献，它们未必至汉初便全部散失了。如王应麟《困学记闻》所载的《荀子》、贾谊《修政语》各篇所引的，便对人们了解“三皇五帝之书”的内容，具有参考价值。刘歆的《洪范五行传》说：《尚书·洪范》中自“初一”以下六十五字都是“洛书”的文字。唐朝僧一行引证汉京房所注《易传》说：自《中孚》冬至，用字是九、八、七、六，这些数加起来正好是三十。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取法它。东汉张衡对此有言道：龙负的“河图”为伏羲所受，龟驮的“洛书”给了大禹；而那种顶爻为九、底爻为一、阳爻为奇画、阴爻为偶画的八卦卦象，与“河图”、“洛书”表里相符，这是可以比照查证的。《诗谱》说：《周南》是得到圣人教化而产生的，《召南》则是得了贤人教化而产生的。然而周公和召公当时是分陕而治的，竟至于说周公以圣人自居，而把召公摆在贤人之列。这是后世儒者对此种说法不能没有议论的原因。至若《大雅》、《小雅》，本为宴享时用来配乐曲演唱的诗歌，但周代对“天子用乐”与“诸侯用乐”的界限实际上并未完全划分清楚。而后世注经者因而确定出天子宴享诸侯或“上取”《大雅》、或“下就”《小雅》的说法。《鲁颂》中有“清庙奕奕，奚斯所作”的诗句。班固《两都赋·序》说：“皋陶歌虞，奚斯颂鲁”，而后人便认为《鲁颂》为奚斯所作，其实是误解了“奚斯颂鲁”的意思。《商颂》宋戴公获得了

其中的五篇，因而还依照旧称来称为“颂”。至于宋国无《风》，那是因为王者的后裔不具备乘轻车去民间采风的权力。关于《春秋》“三传”，刘知几评论说：《左氏传》的文义有三大优点，《公羊传》、《谷梁传》的文义有五方面的缺点。王应麟胪列诸家的评说甚详。其中认为《公羊传》可分出三个等次九种义旨的意见，或认为某“传”侧重治道、某“传”侧重礼法的说法，都昭然可见。我皇上以俾彼云汉之气魄，经天纬地之才华，振兴文教。生当此世者，该如何努力做到通经致用啊！

策问诏书又说：“关于古代礼仪规范及其损益变通之法，没有比《礼》记述得更详备的了”，并由此而提及王肃、郑玄同经异注的文字，和唐宋两朝对古代礼制沿革的意义。这又揭示了在质朴与文采上作损益变通的大法则。据臣下我查考，汉朝时的后仓最熟知《礼》，他的《曲台古经》共传五批弟子，由他们分科教授的。而注《礼》的大宗则为郑康成。贾公彦、孔颖达两家为《仪礼》作的《义疏》，在详略处理上不同，有得有失。《小戴记》四十九篇即为现在的《礼记》。《大戴记》中的《五帝德》、《帝系》各篇，尚可从中考见三代的遗风。河北江南尊从“郑学”、“王学”之人，党同伐异，因而门户之见便分立起来了。汉初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先在野外对着引绳束茅扎成的“皇位”演习。至东汉则又有曹褒定礼。唐初太宗、高宗时制有《贞观显庆礼》，开元中玄宗又命张说、徐坚等撰《开元礼》。由此有唐一代诸如《贞观显庆礼》、《开元礼》、《曲台新礼》、《续曲台礼》等，灿然齐备。宋代的《开宝通礼》是参照唐朝的礼仪制度并略加损益而制定的。而《太常新礼》、《太常因革礼》以及《通典》、《续通典》诸书的源流得失，皆可通过互相参稽，比较研究而明了。敬思圣明天子道德和礼乐在专用车辆上显示出来，玉振金声，所立礼仪的隆重超过百代，用颁示的统一准则宰制着万类不同的事物，使本朝文采郁郁，礼仪优优。这又岂是唐宋以来各代所能企及于万一的吗？

策问诏书又鉴于“古代用人，首重德行，次观才能”，于是问及汉魏以来任用官员、贡举贤士的方法。这又体现了“循名责实”的主要精神。臣下我谨按：《毛诗传》说：有八种才能者可任用为士，有九种

才能者可任用为大夫。王应麟说：根据一个人的三种主要德行如何而决定是否任其为官，这是“官人之法”；考察一个人胜任政务或民事或司法，这是“知人之法”。秦汉以前取士没有统一的途径，只要求名实相符而已。汉代始有“贡举”的名目。《韦彪传》说：如果二千石太守贤能，那么就能给朝廷荐举到合格的人才。汉文帝十五年亲自策问贤良，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和五年策试董仲舒等，为后世策试贡士之始。至曹魏时陈群定立“九品官人”之法。晋朝刘劭又制定“都官考课七十二法”。但东晋的干宝说：刘寔著有《崇让论》而无人知晓，刘颂编制了“九班制度”而不得施用。这说明刘毅关于“九品法”有“八损”和任官有“三难”之说是深有见地的吧？可见“知人”本是件不容易的事。唐代取士多沿隋朝旧制，常贡之科挑选人才的名目有四种，但当时士子所向往的，不过“明经”、“进士”而已。至于宋太宗说的“科举阶梯的设置，是用以等候士子们来攀登的，岂容打杂胥吏冒牌登进窃取科举功名！”此话讲得十分诚笃，是士子们应该奉为圭臬的。皇上敦崇实学，奖励士林。凡属学古从政者，怎敢不深自勉励呢？

策问诏书又说：“食为民众的头等大事。《周礼》由仓人掌管粟谷的入仓贮藏，由旅师掌管收集郊野的粟谷，由遗人掌管邦国粟谷的集聚”，可见储粮之方与平籴之法，均不可不急切讲求。臣下我查考蔡邕《月令章句》说：谷子收藏之处叫做仓，米的收藏之处叫做廪。许慎《说文》说：将仓黄色的谷粒取而藏之，故叫它“仓”；将仓黄色的谷子取而禀之，故叫它廪。古代每耕种九年便将其中三年的收成节余下来，财用当然不会匮乏，因此民气乐而颂声起。像耿寿昌创设的“常平仓”，朱子创设的“社仓”，都是设仓储粮方面可资取法的。管子“守谷守国”之说，李悝“大丰之年四籴其三、中丰之年三籴其二、小丰之年二籴其一”之论，则是考虑平籴问题时可以参酌的。只有实意奉令行事，则转运仓粮便不会忧虑其烦劳，而且船只回空误期、漕粮被挠和沙粒等弊端也就消除了。只要籴粜均当其时，那么商人屯积过多和发霉朽烂的问题便可以避免了。《管子》说：圣王在上，其政令无不被遵从，这只在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皇上惠爱黎民百姓，达到了至广极深的程度。顾念天下农民生产谷物的艰辛，多方节省财用以

便利百姓。而且讲求仓储籴粜诸大政，这对于人民生计更是大有裨益的了。

像以上这些问题：圣君翱翔于仁义之圃便使得经术昌明，观览于典章之林就能让礼仪制度的规矩和法则彰显，像周代那样举用人才从而使士林风气趋于勤勉，重视粮食的生产和储备从而使物产积贮充足。然而臣下我更敬望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考察古代来验证天下文字统一的盛况，彰显志向端正教化，不忘记勤加考订。光大中正之道以建立帝王治世准则的深厚基础，并为规范天下而进一步整顿礼仪方面的等级制度。大小官员奉公守法，仍使吏治澄清有序，严防那些沽名钓誉之徒得逞。百姓已经解除忧愁而增多财富，但仍深切关注民间疾苦，又总觉得给予百姓的实惠太少，因而更加注意深施恩泽，使九天之下、八疆之内无人不被这种深恩厚泽所包容笼盖。那么，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永福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天子尊严，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廖金城　殿试对策

廖金城(生卒年不详)　字钰夫，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十四年(1809)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俟考。

臣对：臣闻通经者致治之基，制礼者绥猷之本，崇俊良所以端士习，广储积所以裕民生。古帝王绍天阐绎，握镜临宸，莫不学阐苞符，道通经曲，三物六行而选造有经，千仓万箱而丰亨有庆。《说命》曰："念终始，典于学"，言稽古也。《记》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言定制也。《书》曰："知人则哲"，则庶士乐誉髦矣。《诗》曰："乃积乃仓"，则万民歌率育矣。盖本敷文考典之忱，为善俗宜民之用。俊德以励群材，积蓄以资国计。所谓昭宣元化，鼓铸群生，扇淳风而席福嘏者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周六宇，功冠百王，固已微言探河洛之精，大典立黎元之极，慎迪简而世庆明良，绵乐利而人怀醉饱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体至善之无穷，惟迩言之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穷

经之要，考礼之经，取士之方，养民之道。如臣椿昧，譬诸涓流撮壤，奚补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念先资拜献之义，敢不敬述平昔所闻，用效管窥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言《易》首称汉学，其授受源流皆有可考"，而因约举诸经之要旨。此诚考古之大端也。臣谨按：汉传《易》学者，有施、孟、梁邱诸家。今惟《费氏易》独存。古本《周易》上下经、《十翼》，分为十二篇。至费氏始合《彖》、《象》于《经》，而郑氏注之，《文言》尚自为篇，至王弼始分附于《乾》、《坤》二卦之中。而古本之序次，于是乎失矣。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周官》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其轶或时时见于他说。如颛顼"敬胜怠者吉"两言见于《丹书》，帝喾"博施利物，抚教万民"之言见于《大戴礼》。以及《文子》有"神农之法"，《新书》有"神农之教"，皆足补古史所未备。《河图》以十起数，体圆而用方；《洛书》以九起数，体方而用圆。二书相为表里者也。《诗》有"风"、"雅"、"颂"之别，而"二南"尤为王化所基。《诗谱》云：得圣人之化者为《周南》，得贤人之化者为《召南》。夫《诗》以合乐者也，《雅》歌于朝，《颂》奏于庙。而宴聘则上而取，燕侯则下而就。考之书传，具有明征。他若《周颂》为太平德洽之诗，《鲁颂》为大夫奚斯所作，类而析之，义各有当矣。《春秋》三家并列。《左氏传》外，《公羊》、《谷梁》二家各标旨趣。后世传习之者，或以断狱，或用之以取丞相。汉武帝好公羊学，宣帝好谷梁学，所尚不同。唯贾逵条列公、谷二家不如《左氏传》者数十事，后儒以为特识，可为说经者法矣。我皇上学贯天人，修明经术。凡在服经之士，孰敢不勉自策励哉！

制策又以"经曲之文，损益之道，莫备于《礼》"，而深求夫制作之原。此尤制治保邦之盛轨也。臣惟《礼经》之分，所以定民情，正民分。一代之典章备焉，百王之制度详焉。考言《礼》之家，后仓称最。所著《曲台记》，《隋史》载有《明堂阴阳记》、《王史氏记》、《孔子三朝记》等共二百余篇。戴德删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记》，今所传《礼记》是也。《周礼》一书，疑者最多。封建不与《武成》合，官制不与《周官》合，建都不与《洛诰》合，故或谓为战国时所作。然朱子尝称其天理烂熟，则亦未可深议矣。《周礼》注者多

门,而注《仪礼》者止郑康成。盖《周礼》为末,《仪礼》为本,本难支而末易晓也。《礼记》则大小二戴,既共氏以分门;王、郑两家,复同经而异注。至南北九家五家之属,更指不胜屈矣。夫所贵乎议礼者,为其能折古今之同异,考法制之变迁。三《礼》之书,固已昭然可考。而至若唐之《开元礼》,宋之《开宝通礼》、《太常新礼》,《通典》、《续通典》诸书,本末源流粲然备具。专斯学者,乌可不精心考究,俾千古之典则有所折衷,以无负淹通之选哉!圣代典章文物超轶百王,巍焕之规诚足以冠绝乎百王也。

制策又曰:"古之用人,首德行,次才能",而因考历代官人之法。臣考古者德行之教,董于司徒,三载宾兴,实始广登进之途。自是以后,莫不以进贤为急务。汉文有孝廉、贤良科,孝武有茂才、明经科。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刘毅谓九品有"八损",官才有"三难"。盖用人若斯之难也。唐以诗赋取士,一时应试者俱以才华相尚。虽有极言直谏贤良方正诸科,大半以骈体取功名。宋元祐中罢诗赋,专经文。后复以诗赋、经义分两科。明洪武中,始定三场之制,沿用至今。且夫所贵乎士者,岂为寻章摘句,循诵习传,遂足膺俊造之选哉!必将敦崇实行,砥砺廉隅,受禄不诬,蔚然为众人之望。然而士习之弊,每有觅举之讥。宋太宗谓科级之设,以待士流,岂容走吏冒进窃取功名!其于士习盖言之痛切矣。盛朝重道崇儒,有加无已。士之学古入官者,宜何如自爱也哉!

制策又以食为民天,而稽诸《周礼》储蓄之道详焉。臣谨按仓人藏粟,旅师聚粟,遗人委积,为积贮自昉。常平之设起自管子,谓自李悝者非也。管子相齐,通轻重之权,立国谷三分、二分在上之法。李悝沿其法于魏,大熟籴三,中熟籴二,下熟籴一,以备不虞。汉耿寿昌令边郡筑仓,而常平之法以立。隋长孙平令诸州百姓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课出粟麦,民告乏者即以此赈之。唐戴胄亦有义仓之议,太宗善之。社仓起于朱子,因乾道间建民艰食,请于府,得常平六百石,委本乡刘如愚赈贷,乃事久弊生。马端临因有"良法美意,于焉胥失"之叹。若夫东汉之名常满,北齐之号富人。韩琦广惠之兴,恩周老疾;周忱济农之设,泽及东南。皆仿常平、社仓之遗意也。和籴始于牛仙客,

白居易欲以折籴代之。宋世代籴兼以助饷，则非徒济民已也。至于内郡之寄籴，熙河之结籴，淮南之先籴，陕西之均籴，缘边之俵籴、括籴，皆非为民蓄飧之计。而仓庾转输，丁胥丛杂之弊，不待言矣。此宇文融之贮谷、孙成之发仓所以称善也。

若此者：探名山而考业，则经术湛深；入故府以征文，则礼仪赅备。甄别当而《书》颂其难，积贮饶而《诗》歌乃粒。臣伏愿皇上，懋日新不已之功，成悠久无疆之治。经学明而益切研求，礼制详而不忘考证。不以百僚交赞而拔十得五，彰瘅稍宽；不以六府孔修而耕九余三，经营偶弛。崇仪茂矩，粲然具修 。于以祗迓蕃厘，式承多祜，天人协应，曼羡延洪。则我国家亿万载咸宁之庆，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通晓经籍是达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制定礼法是实现安邦大计的根本，崇尚俊彦良臣是为了以此来端正士林习气，多多储积粮食是为了借以改善人民生活。古代帝王继承天命阐明天理，手握明镜登临宸极，无不学识渊博，阐述经典秘籍，治道精通，通晓各种礼仪规范；对于选拔造就人才，在六德、六行、六艺上，则有慎重的方法和具体的标准；由于重视发展生产和储粮备荒，总使得谷子装满千仓万箱，百姓过着丰足顺心喜庆的日子。《说命》上讲："要始终不忘学习，经常从事学习。"这是强调查考取法前人经验的重要。《礼记》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讲的是礼义必须有一定的制度。《尚书》说："了解人才，就会明智。"果能如此，则众士子都乐于被誉为英俊杰出之人了。《诗经》说："大积谷米，充实粮仓。"果能如此，则万民都会歌唱得到化育了。这是根据倡导敷陈文章 、考察经典的诚意，施用到美化风俗适合人民上。还以彰明美德来激励众多人才的成长，以积谷蓄财来解决国计民生的需要。正所谓昭宣元气那样的化育，陶冶一切人们，煽起淳厚风尚而聚集起所有的吉福啊！

敬思皇帝陛下，大德遍及六宇，丰功冠绝百王，当然早已探究了《河图》、《洛书》精妙微言的深远含义，为天下黎民树立了为

人处世的重大准则。由于慎重地选拔进用官吏而使世人都庆幸得有明君良臣，由于长期不断地给予百姓快乐和利益，人们都获得顿顿酒醉饭饱的生活了。然而圣上的心怀是如此地谦虚，同时又细致得葑菲无遗，体会到“至善”的永无止境，乐于倾听浅近之言。召臣下我等进入朝廷，而策问穷究经籍之要领，研习礼制之常规，选士为官之方法，抚养人民之途径。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无知，好比涓流撮壤，何能有补于高山深海?但当此应对开始之时，念及事先提供献策是人臣的义务，怎敢不敬述平素所闻，以献出管中窥豹的一得之见呢?

恭读策问诏书而见其上说：“讲到对《易》的传习研究，应当首称汉儒之学。汉代《易》学的授受源流，都有文献可资查考”，随后诏书又简要列举了儒学诸经典的要旨。这的确是研考古代的大端啊!臣下我谨按：汉代传授《易》学的，有施雠、孟喜、梁邱贺诸家，现在却唯有《费氏易》独自保存下来。古本《周易》的上下《经》加上《十翼》，共分为十二篇。至费直始将《十翼》中的《彖传》、《象传》合到《易经》里，而郑玄给这本《费氏易》作了注解。此时《文言》尚独自为篇，但到后来王弼又将其分附于《易经》的《乾》、《坤》二卦之中。于是古本《周易》的篇目次序便不复存在了。孔子删定《尚书》，上限断自唐、虞。然而《周礼》所说的周朝外史官掌管的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文献，其未被《尚书》收入部分的有些内容却常常见之于其他书籍。如颛顼说的“能以‘敬’克服‘怠’的人就会吉利”等两句话见之于《丹书》，帝喾讲过的“博施利人，抚教万民”的话见之于《大戴礼记》。以及《文子》里载有“神农之法”，《新书》中记有“神农之教”。这些都足以填补上古历史记载的不完备。《河图》以十起数，本体圆通而功用方正。《洛书》以九起数，本体方正而功用圆通。二书是互为表里的。《诗》有“风”、“雅”、“颂”之分，而“二南”尤为王道教化的基本教材。《诗谱》说：得到圣人的教化而产生的为《周南》，得到贤人的教化而产生的是《召南》。《诗》本是用来配合乐曲的。其中以《雅》歌唱于朝廷，以《颂》

演奏于宗庙。而天子款待聘问者时便上取《大雅》诗，赐宴诸侯时则下就《小雅》诗。查考经典解说，都可以找到明显的例证。其他如《周颂》为太平德洽之诗，《鲁颂》为大夫奚斯所作，大抵分析起来，这些说法都各有其道理。《春秋》之“传”有三家并列。《左氏传》外，《公羊传》、《谷梁传》两家各标旨趣。后世传习公、谷二《传》者，有的依据它们来裁断讼狱，有的用它们来考选丞相。汉武帝喜好公羊学，汉宣帝喜好谷梁学，因其所尊崇旨趣不同。唯有贾逵条列公、谷二《传》不如《左氏传》的事例达数十个，后世儒者认为这是特出的见识，值得解说经籍者取法。我皇上学问贯通天理人文，致力于完善彰明经学儒术。凡属正在钻研儒学经典的士子，谁敢不奋勉地自策自励啊！

策问诏书又认为“关于古代礼仪制度及其损益变通之道的记述，没有比《礼》更详备的了”，因而深入探求这些制度定立形成的原委。这更是达到治国保邦的重要途径。臣下我认为，《礼经》的作用，在于用以安定人民的情绪和正定其各自的名分，它完备而详细地记载了一代之典章、百王之制度。查考古代讲习《礼》的学问家，要以后仓为第一。其所著《曲台礼记》，在《隋书·经籍志》上载有其中的《明堂阴阳记》、《王史氏记》、《孔子三朝记》等共二百余篇。戴德删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记》，即是现今所传的《礼记》。对《周礼》一书，怀疑者最多。因为其中关于分封诸侯建立邦国的记载不与《尚书·武成》的史实相符，关于周朝职官制度的记载与《尚书·周官》不相一致，关于周朝建都的记载又不跟《尚书·洛诰》相合。所以有人认为它是战国时人所作。然而朱子曾称赞它“天理烂熟”，那么也就未便深议了。《周礼》的注释者有多家，而注释《仪礼》的只有郑康成一家。因为《周礼》为枝末，《仪礼》为根本，根本较难确立起来，而枝末性的东西则较易于知晓。说到《礼记》，则有大小二戴，虽然同姓氏却编出了两个不同的本子；后有王肃、郑玄两家，又同治《小戴礼记》而作出了不同的注释。至于在王、郑注本基础上作《义疏》的南九家、北五家之类，

就更指不胜屈了。对于研究“礼”的学者来说，贵在其能判断古今礼仪的同异，查明礼法制度的变迁。而在郑康成兼注的《仪礼》、《周礼》、《礼记》等三《礼》之书中，这些确已昭然可见。至于唐代的《开元礼》，宋代的《开宝通礼》、《太常新礼》，以及《通典》、《续通典》诸书，关于礼仪制度的本末源流更是灿然备具的。专治此学者，怎可不精心查考研究，使千古典章法则有所折衷，以不负朝廷对博学通才的选拔呢?我圣清一代的典章文物超越了历代王朝，那巍然焕然的规章的确足以冠绝历代王朝呢!

策问诏书又说：“古代用人，首重德行，次观才能”，随即而考求历代任官之法。臣下我查考古代推行德行教育，由司徒负责，每隔三年向王室保送人才，开始扩大选拔任用人才的途径。从此以后，当国者无不以进用贤良之士为急务。汉文帝时设有“孝廉”、“贤良”科，孝武帝时又设有“茂才”、“明经科”。曹魏时陈群定立“九品官人之法”，但刘毅认为“九品法”对进用人才势必造成“八损”，而任用才能之士则有“三难”。原来用人一事有如此之难哩!唐代以诗赋取士，一时间应试者俱以才华相尚。当时虽设有“极言直谏贤良方正”诸科，却大半以骈体文博取功名。宋元祐中曾一度罢弃诗赋，专以阐释经义的文章取士。但后来又实行按诗赋和经义分为两科。明太祖洪武中，开始定立经三场考试录取进士的制度，沿用至今。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科举制度下士子们究竟应当追求什么。难道是仅凭寻章摘句，死死地诵习经传，便足以被考选为有造诣的才俊之士而得授官职吗?必须要诚心看重实际行为，磨砺清廉的操守，使自己一旦居官便能不枉受俸禄，而且蔚然为民众所景仰。然而士林习气的弊病，就在于每每有人企图通过找关系走门道使自己得到选拔，以致受到世人的批评。宋太宗说：“科举阶梯的设置，是用以等候士子之流的。岂容打杂胥吏冒牌钻进，窃取科举功名!”他对士林坏习气的批评是够痛切的了。我盛清一朝重道崇儒，有加无已。士子中学古从政者，应当如何自爱啊!

策问诏书又强调“食为民众的头等大事”，于是详细地查考了

《周礼》记载的古代储粮蓄谷之道。臣下我谨按：周朝由仓人掌管粟米的入仓贮藏，由旅师掌管收集郊野粟米，由遗人掌管邦国之粟的收积，这是积贮粮食的开端。常平仓[illegible]设置起源于管子，说它始自李悝那是不对的。管子做齐国国相，懂得权衡轻重，定立将全国粮食收成的三分之二收藏入国家粮仓的制度。李悝沿用其法于魏国，大丰之年四籴其三，中丰之年三籴其二，下丰之年二籴其一，入于公仓，以备不测。至汉代耿寿昌令边郡修筑常平仓，于是“常平”之制正式建立。隋朝时长孙平教各州百姓以社为单位，集合在社神庙前共同议定设立义仓，收获之日按一定数量从各户抽提粟麦储入，待到有人口粮告乏时即以此赈济。唐朝的戴胄也有过设义仓的建议，得到唐太宗的赞许。“社仓”之设，始于朱子。当时因孝宗乾道年间，建宁府民间多闹饥荒。经朱子向知府请求，得常平仓谷六百石，委托本乡人刘知愚负责赈贷给乡民，但事久弊生。马端临因而有“良法美意，却全丢掉了”之叹。至于东汉时的“常满”仓，北齐时的“富人”仓，北宋韩琦兴建的施恩周济孤老残疾之人的“广惠”仓，明代周忱创设的泽及东南地区的“济农”仓，这些都是仿效“常平”、“社仓”的遗意而设立的。“和籴”之法始于牛仙客，白居易欲以“折籴”代替它。宋朝时的“代籴”兼有帮助解决军队粮饷的作用，已非只为周济人民而设。至于内地州郡的“寄籴”，熙河地区的“结籴”，淮南的“先籴”，陕西的“均籴”，沿边境一带的“俵籴”、“括籴”，都不是为解决百姓吃饭问题着想的。而在仓储转运中丁役胥吏丛杂等方面的弊端，就自不待言了。这也是历史上宇文融受诏多存粮食、孙成开仓贱售之举受到人们称许的原因。

像以上这些问题：探访名山以考究学业的源头，那么经学儒术就会湛深；进入历代帝王册府而寻求典章文物，那么礼仪制度就会完备。对人材甄别使用得当，那么《尚书》对此都称颂难能可贵；使粮食积贮充足，那么《诗经》上正歌唱人们有饭可食。臣下我敬望皇上勤勉于日新不已的圣德修养，以造成悠久无疆的美好政治。经学昌明了则更加切实地研求，礼制详备了则不忘考证。不因所有

臣僚的交口称赞而十人中选取到一半人才，就稍微放宽对官吏的彰善瘅恶。也不因国家府库充盈而偶或放松“耕九余三”的农业经营方略。要使礼仪规则崇隆而丰富，齐备完美，灿然可观。用来敬迎福庆，承受皇天的保佑，天人之间和协感应，国家的富足和强大将延布无垠。那么我国家亿万年长治久安之幸福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仕途新进，不知忌讳，冒犯天子尊严，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张岳崧　殿试对策

张岳崧(生卒年不详)　字子骏，一字翰山，广东安定人。嘉庆十四年(1809)探花。后官至湖北布政使。擅长书法。撰有《筠心草堂集》。

臣对：臣闻经学所以致用，礼制所以宜民，慎选昭旌别之权，储蓄裕阎阎之务。粤稽曩训，经解胪诸《戴记》，秩宗命诸《尚书》,《王制》则论选有文,《周官》则仓遗有掌。圣人御宇，懋谟室介，甄铸埏垓。有念典之功，有同民之化，有彰瘅之用，有藏富之图。用是稽古同天而制度昭其盛，亮采凝绩而丰裕著其休。郁郁乎焕哉!经术修明，日月为章矣；典礼钦崇，天地定位矣；选造明，蓄贮备，则工允厘而民乂安矣。古所为象浑穹，式坤厚，懿纲酥化，曼羡延洪者，道有由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光谟烈，撰体清宁，本持盈保泰之心，成惇大丰登之象。固已经学光昌，礼教咸被，人材蔼吉，乐利无疆矣。乃圣怀冲挹，蓍菲罔遗，体至善之无穷，惟迩言之是察。兹者恭逢万寿昌辰，特开恩榜，值普天之同庆，俾多士以观光。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研经之要，崇礼之功，明扬之方，裕民之务。以臣椿昧，譬诸纤尘涓滴，奚补崇深?顾义切对扬，时当敷奏，敬承清问，敢不诵习旧闻，缕陈肤见，用效刍荛一得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言《易》首称汉学，其授受源流，皆有可

考”，而因博求诸经之义，平三《传》之得失。臣谨按刘勰云：三极彝训谓之经。秘书云：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汉易”著于李鼎祚《集解》者，郑康成、荀爽、虞翻三家。郑长于会通典礼，荀长于阴阳上下，虞长于消息盈虚。三家要以虞为优。《易》原目始《乾》讫《丰》，然《乾凿度》曰：《易》始《乾》，终《未济》，民戒慎，合王道。则自以今目为是。《十翼》释经，欧阳修疑非孔子作，李清臣、叶适亦讥其浅陋。然其中要有精处。九家《易》象如乾下为龙为直，为衣为官，离一巽四，坤坎各八，震艮各三，见于《经典释文》。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书，他如《五典》、《三坟》，楚史能读，或非谎诬。《河图》则卦，《洛书》陈畴。刘歆、孔安国皆主此论。孔颖达《尚书》、《周易》“正义”取之。诗首“二南”，皆文王之化。然《诗谱》以周、召分圣贤，所谓使圣人治其难，贤人治其易耳。《诗》用于乐，有天子诸侯之分。然文王为两君相见，则他多通用也。商鲁皆有歌《颂》者，鲁史克为请命而作，宋王者后故也。传《公羊》者有眭孟、彭祖等。传《谷梁》者有江公、申公等。传《左氏》者有张禹、尹更始、贾护、贾徽等。其最著者也。圣朝稽古右文，士生其间，将人称许郑，家传贾孔，彬彬极盛矣。

制策又曰：“经曲之文，损益之道，莫备于《礼》”，而因详及古之典礼之书。此诚一道同风之本也。臣谨案：《周礼》与《尚书·周官》皆出周公手，而所记稍异。孙氏谓周公书成归丰，实未尝行。郑樵讥其详制度而略道化，何休以为战国阴谋，林孝存作“十难”、“七论”以排之。然其书广大精微，实见本末赅贯之妙，岂可惑歧说而疑圣人之书乎?汉兴，叔孙通粗定礼仪，草创苟且，不足垂示后世。汉之明礼书者以后仓为最，注诸《礼》者以康成为宗。大小二戴，共氏分途。王肃《圣证》之论礼如禘祫明堂等，与郑学互相诋诽，又何论为《义疏》者有五家、九家之别乎?唐王仲邱撰《开元礼》百五十卷，王彦威撰《曲台新礼》三十卷。及宋之《开宝通礼》、《太常新礼》，又杜佑作《通典》，因刘秩《政典》而广其阙，杨绍复《续会要》，因苏冕《会要》而增其

成。或垂一代之制，或合数代之文，皆可采也。圣朝典章大备，康熙二十九年成《会典》，乾隆二十九年增修之。皇上特命开馆纂修，溥《雎》、《麟》之雅化，开黼黻之光华，岂不懿欤!

制策又以用人之道，先德行，后才能，因及累代选举之法，而要之以端士习。此诚风厉之大权也。臣惟汉制，察于州郡者曰孝廉、茂才，策于天子曰贤良方正。黜华崇实，即本于《周官》六行、六德之升。魏陈群立九品官人法，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诚有如刘毅之讥。唐制多沿隋代，有孝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名。然天子自诏谓之制举，所以优擢异才。至隋立科，虽军谋宏远之名，要不如贤良方正之选。本末轻重，不较然欤?宜乎宋太宗有曰：科级之设，以待士流，而不容以走吏冒窃。诚重之也。夫有孝弟之德，则子谅易直，而刻薄之念不生；有廉介之德，则砥行立名，而贪竞之风不作。读书尚友之道，即居官饬治之方。故学问非以守拘墟，而功名岂以梯荣进?诚使持躬重于圭璧，立志凛以冰渊，则奇才异能者出以恭慎，乃可观耳。皇上示义利之衡，重清廉之选，服古人官者，可不争自濯磨乎?

制策又以食为民天，而务求储积之备，与夫久贮之方、平价之道。此尤保赤之至计也。臣惟《周礼》仓人掌粟入之藏，旅师掌聚野之粟而用之，遗人掌邦之委积，储备称良法也。后世李悝平籴法，耿寿昌祖之为常平仓，及长孙平之义仓，朱子之社仓，他如唐有含嘉仓，宋有广惠仓，皆恤民之计，而社仓为善。至《元史》载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藏贮之地尤悉。夫民之生也资乎食，食之足也资乎贮，贮之善也资乎运。昔人论运之要务在粮不挂箸，军无借欠，道不守冻。故详察交卸则运自易，催促回空则运不稽，此固有道矣。若乎粜籴务平，则国与民无轻重之弊。《管子》曰：守国者，守谷而已。故丰歉因乎岁，久暂因乎时，燥湿因乎地。务使囤积者无红朽之虞，售易者无腾踊之患，则富人之仓，东西市之粜，遗规成法，皆可酌而行之也。皇上焘育群生，抚绥蒸庶，凡截漕平粜诸大政，斟酌咸宜，其所以为斯民谋补助之经而普康平之福者，至详至善。民当斯时，熟酉庆丰，由庚咏

化，有不击壤而歌祝者哉？

若此者：覃研图籍而治理汇其源，稔合典文而中和昭其备。登进先崇器识，则侈浮华者共返于醇良；储备裕于仓庾，则余九三者自形其康阜。洵足荷天衢而提地厘矣。臣伏愿我皇上至诚无息，安益求安，本日新久照之猷，勖慎宪省成之化。人文宣朗犹勤厘敬之心，茂典光昭更敕惇庸之意。车服之命端士习即以励官常，仓廪之谋厚民生即以正民德。士传经学，家习礼仪，官有慈惠之师，农乐盈宁之庆。共祝圣寿之无疆，而蔼洽熙春，欢胪函夏，洋洋乎扇淳风而席福嘏。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经学是用来指导实践的，礼制是用来调适人民社会生活的，通过慎选官吏可以表明对人才进行旌表和甄别的标准，实行储粮蓄谷有利于解决人民吃饭问题这件大事。查考古训，孔子对经典的解释胪列于《小戴礼记》，舜帝任命掌宗庙祭祀的“秩宗”官见之于《尚书》。关于考察选取贤才之制，则有《礼记·王制》篇的说明；关于储粮之方，则有《周礼》记载说周朝王田邦国之粟的收集储藏分别由仓人遗人掌管。古代圣人统治天下，扩展谋略到千家万户，陶冶化导抵达天边地角。有坚持学习的功效，有同化万民风俗的途径，有彰善瘅恶整饬吏治的方法，有贮积财富以利国计民生的方案。因此考察古代，如同皇天一样深远，典章制度显示出隆盛。群臣辅佐政事，政绩形成，财富丰厚而显示出美好景象。真是文采郁郁、功业焕焕啊！随着经学儒术的昌明，日月也就作有规则的运动了。随着典章礼仪被人们钦敬尊崇，天地也就定位了。由于选拔培养人材的制度严明，蓄谷贮粮的措施完备，也就有了吏治的整肃和人民的安定。古时取法皇天，效仿大地，政纲美好，教化深厚，扩展吉福，具体办法是有来由的了。

敬思皇帝陛下，圣德显扬，谋略正大，与天地合为一体而那样清宁；本着持盈保泰的心念，造成了淳大丰登的气象。自然早已使得天下经学昌明、礼教普及、人才济济、百姓福利无疆了。然而圣

君心怀谦虚，不遗漏任何细微之事。体会到“至善”的没有止境，乐于察识浅近之言。今年恭逢万寿诞辰，皇上特开恩科金榜，在普天同庆之际，使众士子得以来京观光。并召臣下我等进入朝廷，策问研究经学之要领，崇尚礼制之功用，公开选拔人材之方法，使人民富足之要务。凭臣下我的愚昧无知，譬如细尘滴水，何能有补于高山深海?但从人臣之义来说理当应对称扬，就时机难得来看值得敷陈上奏。既然敬承清详询问，怎敢不诵习旧日所闻，缕陈肤浅之见，以献呈农人樵夫贡献一得之见的那种微小热忱呢?

恭读策问诏书而得见其上说：“讲到对《易》的传习研究，应当首称汉儒之学。汉代《易》学的授受源流，都有文献可资查考”，接着又全面探求儒学诸经要义，衡量“春秋三传”的得失。臣下我谨按：刘勰说：有关天地人的训诲，谓之经典。神秘图籍讲：日月作为变易的表现，就是一阴一阳。“汉易”在李鼎祚所撰《集解》中载录的有郑康成、荀爽、虞翻三家。郑氏长于会合贯通制度礼仪，荀氏长于辨别阴阳上下，虞氏长于解释人事盛衰与自然变化的关系。三家总的来讲以虞氏为优。《易》的原初篇目，始于《乾》而讫于《丰》，但《乾凿度》说：《易》始于《乾》，终于《未济》，有助于人民警惕慎重，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王道。所以自然应以现在的篇目次序为是。《十翼》解释《易经》，欧阳修怀疑并非孔子所作，李清臣、叶适也批评其浅陋。但其中总的说来还是有些精到之处的。《九家易》中各家对卦象的解说不同。如关于乾卦底爻的象征意义，就有龙、直、衣、官等。关于其他各卦象底爻意义的解释，除离卦只一种外，巽卦有四种，坤卦、坎卦各八种，震卦、艮卦各三种。这都见于《经典释文》。孔子删定《尚书》，上限断自唐尧虞舜。而据《周礼》记载，周朝外史官掌管三皇五帝时代的历史文献。其中那些未被收入《尚书》的部分，如《五典》、《三坟》等，据《左传》说楚国史官还会阅读，这也许并非谎诬之言。《河图》是规范卦象的，《洛书》是陈述治理天下大法则的。刘歆、孔安国皆主此论，而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周易正义》采用了它。《诗经》的开始部分是“二南”，都是受周文王

教化而产生的。但《诗谱》却因其分别产生于周公封地和召公封地，便将它们区分为“得圣人之化”与“得贤人之化”，真所谓“使圣人治其难，贤人治其易”呢!古时将《诗》用于配曲演唱，天子所用与诸侯所用的部分是有区别的。但周文王为了主持两国国君的会见仪式，才有区分，其他时候则将两者通用。商、鲁两国都有演奏的《颂》诗，《鲁颂》是鲁国的史克为向王室请命而作，《商颂》则因宋国是王者后裔的缘故。传授《春秋公羊传》的有眭孟、彭祖等。传授《春秋谷梁传》的有江公、申公等。传授《春秋左氏传》的有张禹、尹更始、贾护、贾徽等。他们是传习“春秋三传”的儒者中最著名的人物。我圣清一朝重视研考古籍和文化建设，士子生当其时，必将形成人人称道许郑之学，家家传习贾孔之书那种彬彬极盛的局面。

策问诏书又说：“关于古代礼仪规范及对其进行损益变通的方法，没有比《礼》记述得更详备的了”，接着又详细问及古代的制度礼仪之书。这的确抓住了实现一道同风的根本。臣下我谨按：《周礼》与《尚书·周官》都出自周公之手，但所记稍有不同。孙氏说周公书成后送到了丰地，其实未曾施行。郑樵批评《周礼》详于制度而略于王道教化。何休把它看成战国时人出于阴谋目的之伪作。林孝存作“十难”、“七论”来排击它。然而此书博大精微，实在体现了本赅末贯之妙。怎可迷惑于歧异之见而怀疑圣人之书呢?汉朝初兴，叔孙通粗定礼仪，草创得马虎，不足以垂示后世。汉代通晓礼书者以后仓为第一，注释各种礼书者以郑康成为正宗。大戴与小戴，虽同姓氏而学分两途。王肃《圣证》对古代礼仪如禘祭、祫祭以及明堂的论述，与“郑学”是互相诋毁的。既然如此，又何论为《小戴礼记》作义疏者有北五家、南九家的分歧呢?唐代王仲邱撰《开元礼》一百五十卷，王彦威撰《曲台新礼》三十卷。到宋代有《开宝通礼》、《太常新礼》。又有唐代杜佑作《通典》，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补充了它的缺陷。而杨绍复编的《续会要》，则接续了苏冕的《会要》而比它编得更完备。它们有的垂示了一代的制度，有的收集了数代的文献，都有可供选取的内

容。我圣清一朝典章极为完备。康熙二十九年修纂成《会典》，乾隆二十九年又加以增修，到我皇上又特命开馆纂修，从而使得《关雎》诗、《麟之趾》诗所歌咏的那种纯正教化普及起来，使得古代礼仪制度的光华大放异彩，岂不美哉!

策问诏书又鉴于用人之道在先察其德行，后观其才能，并顺而论及历代选拔人才的方法，强调最重要的在于端正士林习气。这的确抓住了澄清吏治的决定性环节。臣下我想到汉代的选举制度，由州郡长官考察举荐者叫做孝廉、茂才，由天子策试选拔出来的称为贤良方正。当时在选举人才中采取黜华崇实的方针，就是依据《周礼》关于选任官吏要考察其“六行”、“六德”如何的宗旨而制定的。曹魏时陈群定立“九品官人法”，实行的结果是被定为上品人物而得授高官者无一出身寒门，而被列为下品人物只能获得卑微官职者无一是世族子弟，确像刘毅所批评的那样。唐朝的科举制度多沿袭隋代，设有孝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名目，但天子又还直接下诏开科，称为“制举”，用以优厚拔擢“异才”。至于隋代设立的选举科目，虽有“军谋宏远”之类的名目，但总的来说还不如汉代“贤良方正”的选举。其中的本末轻重，难道不是非常鲜明的吗?无怪乎宋太宗有言道：科举阶梯的设置，是用以等候士子之流的，不能容许打杂胥吏冒牌窃取。此话确实表明了对士人的重视。一个人若具有孝悌之德，就会慈祥诚实又和易正直，而不生刻薄之念。一个人如果具有廉洁耿介的品德，就会砥砺自己的品行，注意树立自己的好名声，于是贪污奔竞的坏风气就不会兴起。读书尚友之道，其实也就是居官饬治之方。所以学问不是用来株守狭隘偏见的，功名又岂能只当作个人的荣进之梯?若真能使士子把保持自身的节操看得重于圭璧，立志凛然如临冰渊，那么内怀奇才异能者出来做官就谦恭谨慎，这样的人，才可观哩!皇上昭示了对义利关系的正确权衡，并重视对清廉之士的选任。凡学古从政者，能不争相自觉磨练吗?

策问诏书依据“食为民之天”的原理，务求研讨储粮丰厚与久贮谷米的方法，平抑粮价的措施。这更是保全子民的至善之谋。臣

下我想到，《周礼》规定由仓人掌管粟米的入库储藏，由旅师掌管收集郊野粟米，由遗人掌管邦国粮食的收积。这在储备粮食方面已堪称良法。后世的李悝创立平籴法。耿寿昌继承此法创设常平仓。到长孙平创设“义仓”，再到朱子而创设“社仓”。另外如唐代设有含嘉仓，宋代设有广惠仓。这些都是周济人民的办法，而以社仓最好。至于《元史》所载：河西务设置十四仓，京师设二十二仓，通州设十三仓，这就在藏贮地点的安排上做得更周全了。人民的生存有赖于粮食，粮食的充足有赖于贮藏，贮藏的得法有赖于运输。前人论说运粮的关键在于必须做到筹粮不落空，军队不借欠，运粮水道要抢在封冻前使用。所以详察有司的交卸手续，粮运过程自然容易控制；催促运粮船及时放空回转，运务便不会被拖延。这方面原本是有些办法的。如果切实推行平籴与平粜政策，那么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便没有畸轻畸重的弊端了。《管子》说得好：“守国者，守谷而已。”所以丰歉决定于年成，久暂决定于时运，燥湿决定于地域。只要能确保囤积的粮食不霉烂，市场上粮价不飞涨，那么“富人之仓”、“东西市之粜”等等遗规成法，都可酌而行之。我皇上保育天下苍生，安抚黎民百姓，对诸如截留漕米、平粜济民等大政，都斟酌得当。所采取的旨在使人民得到补益救助、普享康乐平安之福的政策措施，都至详至善。人民生当此时，自然是年年在万物成熟的秋季庆祝五谷丰登，随着四时变换而赞咏天地化育，哪有不一边拍击土地一边放歌祝福的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深入钻研河图经籍，便可汇合起治理天下之道的本源。熟悉融会典章文献，就能达到“中和”境界显示出完备性来。拔擢进用人才时首重其胸怀与见识，则言夸浮华之人也将一同回归到淳朴良善。储备的粮食充盈于仓库，则九年拥有三年余粮会表现出其康乐富有。确实足以顶起通天的大路，提起大地的一角了。臣下我敬望皇上至诚不息，安益求安，本着日新圣德、永照万民的谋略，勉力于慎重对待成法和考察旧有事例的化导。当文化教育事业已普及昌明之时，仍然尽心于订正古籍。在典章制度光昭之后，更告诫臣民要忠实遵用。通过慎选官吏来端正士林习气，同时

也借以劝勉百官忠于各自的职守；通过筹谋充实粮仓来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也借以匡正万民的道德观念。于是士子们传习经学，家家学习礼仪，官吏中有对民慈惠堪称表率之人，农民沉浸于五谷盈仓的喜庆之中。天下臣民共祝圣上万寿无疆，大家和睦相处在阳春之下，将欢乐传布到整个华夏，盛大地煽动淳厚之风而聚集起所有的洪福。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永久福祚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天子威严，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董志国译〕

清仁宗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殿试策问

[嘉庆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诞膺昊眷,寅缵丕基,于今十有六年。幸函夏宁谧,海洋肃清,惟日孜孜,冀臻上理。探帝王建极之原,期河漕安澜之庆,刑罚清而民讼息,操防肃而兵制严。尔多士以敷奏为明试,爰资启沃,伫听嘉谟。

"危微精一"之旨,为帝王道统所开。尧曰"执中",舜曰"用中",汤曰"建中",与《中庸》"致中和"之义有合否?朱子谓《大学》之"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一"敬";《中庸》之"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一"诚"。心法治法,一以贯之,二书实括其全。能申明其意欤?真德秀《大学衍义》,略"治平"而不言,何欤?唐太宗《帝范》、范祖禹《帝学》、以及"大宝"、"丹扆"之《箴》,有可采欤?《洪范》"皇极",汉儒训为"大中",宋儒又以为不然,何欤?

禹之治河,先疏下流,《禹贡》一书可按也。若今之治河,则兼欲利漕。其治法不过曰疏曰浚曰塞。潘季驯云: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利不可强,治理不可凿。此诚不易之论也。夫以堤束水,以水刷沙,自有成法。顾何以浊流或致分侵,运道或成淤淀?以借黄济运,苟且目前,不顾后患。宜用何策,使之涓滴不久,又能利漕?其于入口出口堤防闸坝之利,宜何如置力欤?国家数百万漕,岁资济运,而施工亦所费不赀。必使清足敌黄,黄不倒灌,水得遄行,帑归实用,始于河漕

均有裨益。讵可因循怠忽,致失机宜欤?

虞廷弼教,钦恤惟刑。《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有"五禁"、"五戒",所以使勿犯也;有"三刺"、"五听",所以致其慎也;有"三赦"、"三宥"、"八议",所以加之仁也。肉刑除于何代?刑之属三千,夏商与周同否?法与名何以分为二家?兵与刑何以合为一典?人命至重。所谓悉其聪明,致其忠爱,岂不在折狱者之无成心无偏见欤?朕哀矜庶狱,每阅谳牍,再三审慎,以期无枉无纵。而司狱者或以姑息为阴德,或以武健为胜任,岂称"不刚不柔,受王嘉师"之意欤?

兵可以百年不用,不可以一日不备。《易》占利用,《书》称克诘,《礼》有蒐苗狝狩之典,皆于农隙讲武,所以振国威也。周制寓兵于农,管子作内政而兵农以分。汉有南北军之屯,唐有府兵、矿骑之制,宋有禁兵、乡兵之殊。元立五卫,明设京兵、边兵。统属异同,其详若何?今直省营制,非不勾稽有册,简阅有规,校练有期,侵冒有禁,保无有老弱充伍、巡防疏惰、习为具文而无实效者乎?近日又有团勇练勇之称,究竟有益无益?其何以副朕整饬戎行、设兵卫民之意?多士试详言之。

夫心法为宰化之枢,河防为安民之本,刑罚中而祥风洽,训练谨而武备修。皆致治之要图,经邦之大计也。多士学古人官,讲求实用,其各以素所诵习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遴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不偏不倚、最为适中的这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

知道这三项,就知道修养好自身的途径了。

保持人的善心,培养人的本性,用来对待天命。〔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承受苍天眷顾,恭谨地继承了盛大的基

业，至今已经十六年了。所幸全国安定，海洋肃清。只管每日孜孜以求，希图达到最高的治理，探求帝王建立治理天下准则的本原，期盼黄河及漕运水道得到根治的喜庆，刑罚清正而民间争讼平息，军队训练与防务整肃而军事制度严明。你们众士子以铺陈上奏作为公开应试，于是希望从中获得你们提供的启发和补充，伫立而听大家的好对策。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旨意，是帝王道统的起始。唐尧说“要执‘中’”，虞舜说“要用‘中’”，商汤说“要建‘中’”，这与《中庸》里讲的“要达到‘中和’境界”的含义有相合之处吗？朱子指出：《大学》中所讲的“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中庸》里所讲的“圣神功化”，其关键不外乎一个“诚”字。“心法”与“治法”贯通在一起，而这两本书实际上已概括了它们的全部内容。你们能申明他这段话的意蕴吗？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省略了“治平”不讲，这是为什么呢？唐太宗的《帝范》，范祖禹的《帝学》，以及《大宝箴》、《丹扆箴》，有可以选取的内容吗？《尚书·洪范》中的“皇极”概念，汉儒解释为“大中”，宋儒又以为不对，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禹治河的办法是先疏通下游河道，这有《禹贡》一书可资查核。若是讲到现在的治河，那就兼有便利漕运之目的了。其治法不外乎“疏”、“浚”、“塞”。潘季驯说过：水性不可违拗，河防不可松弛，地利不可强求，治理不可随意。此话诚属不刊之论。用堤防来约束洪水，借水力来冲刷泥沙，这自然是早有成法的。但为何其结果或是导致浊流分侵两岸，或是造成运道泥沙淤积？单靠引借黄河洪水来解决运河漕运之需，是个苟且于目前而不顾后患的法子。那么宜用何种办法，使河水水位不偏低，又能有助于漕运呢？而在对入口、出口、堤防、闸坝的开发利用上，又当如何致力呢？国家每年花数百万两银子用于漕粮水运，而在治河施工上支出巨大。务必要使清流足以抵拒黄流，黄河水不倒灌进淮河，运河水得以畅行，国家钱财用到实处，这才对治河与漕运，均有裨益。怎可因循怠惰，玩忽职守，以致坐失机宜呢?!

虞舜时在辅助教化方面，对施用刑罚采取慎重而哀怜的态度。《周礼》记载：大司寇以野刑、军刑、乡刑、官刑、国刑等五类刑罚纠察矫正万民的行为。同时设有“五禁”、“五戒”，以此叫人们不要触犯法律；定有“三刺”、“五听”等对犯罪事实进行多方面调查核实的制度，借以保证断狱量刑的慎重；在对犯罪人进行审判时，又有“三赦”、“三宥”、“八议”等对老幼愚蠢健忘者和亲贵贤能之人实行减免刑罚的特殊规定，以此施仁政于人民。肉刑废除于何代？古代治罪的名目有三千，夏商与周朝相同吗？法家与名家为何要分立为两家？军法与刑法为何可合为一典？人命问题至关重大。世上所说决断刑狱者一定要竭尽其聪明才智，奉献其忠爱之心，而这岂不在于他们既无成心又无偏见吗？皇帝我哀怜犯法待刑的庶民，每逢批阅定案文牍，总是再三审慎，以期无冤屈无宽纵。而执掌刑狱的官员有的以姑息为积阴德，有的以猛峻为胜任职务，这难道符合“不刚不柔，方能适合于王者善良的民众”这两句古训的意思吗？

兵可以百年不用，不可以一日不备。《周易》主张占卜获得有利时机方可用兵，《尚书》称许能整治军队之人，《周礼》载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集体围猎制度，都是在农闲时讲习军事，以此振扬国威。周朝本是实行“寓兵于农”制度的，自管仲作内政，兵与农由此分开。汉代建有南北两军屯戍京师。唐代兵制先后有府兵制和旷骑制。宋代军队有中央“禁兵”和地方“乡兵”的区别。元代将军队分置为五“卫”。明代设置了京兵和边兵。历代军队统属关系上的异同，其详细情况如何？现在中央直辖省的兵营管理制度，并非未做到考核有簿册，检查挑选有规章，操练比武有定期，对侵吞冒领士兵粮饷有禁令。但谁能担保就一定没有老弱兵丁充塞行伍、对巡逻防务疏忽怠惰、惯于对上作虚假空洞的例行报告而并无治军实效等不良现象了呢？近日又有了“团勇”、“练勇”的名称，究竟有益无益？怎样才能符合皇帝我整饬戎行、设兵卫民的旨意？你们众士子试详言之。

心法是决定教化的关键，河防为安民的根本，刑罚适当则祥风和顺，训练谨严则军备修明。这都是实现治国的要图，赖以经邦的大计。众士子学古从政，讲求实用，那就请各将平素所诵习的写于答卷

上,不要空泛,不要隐讳。皇帝我将亲自遴选你们。

蒋立镛　殿试对策

蒋立镛(生卒年不详)　字笙陔,湖北天门人。嘉庆十六年(1811)状元,例受翰林院修撰。他事俟考。

臣对:臣闻建极所以绥猷,经邦在乎济运,明刑斯能弼教,卫民莫如足兵。帝王寅承宝命,本内外交修之实,握天人协应之机。以课宥密,兢业凛夫九重;以利转输,贡赋通乎三壤。以示慈祥,法归于准情酌理;以昭震叠,义著于怀德畏威。是以《诗》歌敬止之文,《书》美浚川之绩,《礼》记参听之命,《易》系容保之辞。综搜载籍,主术懋而日月就将,民利兴而金汤巩固,国有政简刑清之化,士讲安民和众之方。所由规矩乾坤、甄陶品汇、胥一世而跻之仁寿者,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道契执中,治昭普利,沛好生之大德,修整武之常经。固已庄敬日强而堤防永赖,简孚有众而法制相维矣。乃圣怀冲挹,蓂菲无遗,既观民而设教,复询事以考言。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传心学、筹河防、慎典刑、严军制之至计。如臣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危微精一之旨,为帝王道统所开",而因揭夫内圣外王之功用。臣谨按:《史记·五帝纪》云:"帝喾溉执中以遍天下","执中"之说固不自《尚书》始。然删《书》断自唐虞,尧"执中",舜"用中",汤"建中",先后一揆。孔子特加一"庸"字,盖以性情言中和,以德行言中庸,其理无非一"中"也。朱子谓《大学》自"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自"中和位育"以迄"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诚则不息,敬则必勤,诚敬立而帝王之体用赅矣。二书实与《尚书》相表里。真德秀《大学衍义》分四大纲:曰"格致"、曰"诚正"、曰"修身"、曰"齐家"。意在于正本清源,故略"治平"而不言。明邱浚以"正朝廷"、"成功化"等目补之,乃为完备。唐太宗

《帝范》十二篇，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宋范祖禹《帝学》八卷，上自三皇五帝，下迄神宗。以至张蕴古《大宝箴》凓物侈声淫之戒，李德裕《丹扆箴》胪宵衣正服之条，皆有足述者。《孔传》训"皇极"为"大中"。朱子曰："中"所以为"皇极"也。以"极"为在"中"之准，则可，以"极"训"中"，则不可。"五行"、"五事"、"八政"、"五纪"，极之所由立；"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极之所由推。以《洛书》以五居中，而"九畴"以"皇极"为本也。仰维圣学高深，崇儒重道，洵足接心源于往哲，树作睹于群伦。复绎经筵讲论，阐"用中"之微旨，发"顺动"之真诠。固宜其昭垂万古矣。

制策又以今之治河，兼欲利漕。此诚一劳永逸之策也。考《玉海》载《禹贡》九州末系河，是为运道之始。顾黄河自唐以前，北行入海。晋开运元年滑州之决，河乃自北而东。宋熙宁八年澶州曹村之决，河乃自东而南。元延祐六年筑汴梁护城，使水南汇于淮，而河始与淮通。清口者，黄淮之会合也。淮之力易弱，黄之力常劲，黄水倒灌，清口必至淤淀。洪泽湖水不出，自高堰各坝流入高宝诸湖入运河，则下流皆为泽国，而运道亦以不通。故欲收淮河之利，宜加意于清口，添筑拦黄矶嘴长坝，以杀黄势。其或淮黄并涨，又宜保固高家堰。潘季驯所为用束淮刷黄之策，坚筑高家堰，蓄洪泽所注，全淮之水以七分入清口刷黄入海，而以三分入运河，自山阳、宝应、高邮、江都三百里以内以达之江，诚有以固东南之保障，导粮艘之关键也。自古河徙无常，惟在善治河者审时度势，或设矶嘴以御其冲，或修月堤以防其溃，或挑引河以杀其流。而其大指，不外助淮以敌河，使淮治而河亦治；合黄淮以治漕，使黄淮治而漕亦治。庶水得遄行，而帑归实用耳。方今海宇恬波，河流顺轨，皆仰赖睿谟筹画，集众议而衷一是，俾运道常通而仓庾益见充实已。

制策又曰："虞廷弼教，钦恤惟刑"，而欲使察狱之道无枉无纵。夫"五刑"之制起于蚩尤，唐虞三代因革不同，而要无失乎"刑期无刑"之意。史称汉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然崔浩《汉律序》谓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通鉴》西魏大统十三年除宫刑，《书正义》及《周礼疏》又谓至隋唐乃赦。则肉刑之除，不尽在汉矣。《周官》"五刑"之属各五百，

穆王增为三千，轻刑增而重刑减。然《周礼》郑注引《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则三千之制自夏已然，即《吕刑》所本。法十家出于理官，名七家出于礼官，源流自别。礼乐分为二职，兵刑合为一官，详略各异故也。昔陈咸言：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盖汉承秦法，过于严酷，咸亦有激而言。至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则姑息市恩，如唐太宗纵囚一事，亦不免为欧阳修所讥耳。臣读御制《慎刑论》，往复重申，戒喜怒之勿纵，虑轻重之失宜。更恭绎御制《息讼安民论》，仍本慎刑之意，推原勤政，非治民之要道欤！

制策又以“兵可以百年不用，不可以一日不备”。臣惟古者寓兵于农，蒐苗狝狩，皆于农隙以讲武事。自管子作内政，寄军令，而兵农始分。汉初南军以卫宫城，北军以卫京师，得内外相制之道。唐置府兵，一变为矿骑，再变为方镇，其制益坏。宋统外兵于枢密，总内兵于三卫，有召募、拣选、廪给、训练、屯戍、迁补、器甲、马政之目。明京兵锦衣十二卫、留守四十八卫，即唐府兵之遗；边兵如蓟辽、大宁诸司等卫，即汉募民实塞下之遗。大抵自唐宋后专用募兵，而游手无藉之徒应募滥入，养兵之费日浩，而实无所可用。必如宋臣苏轼疏河北弓箭社事宜，乡勇自相团练，人情不扰而边备修。特不至戎服执器，奔驱满野，如王安石保甲之法耳。圣朝承平化洽，疆宇敉宁，海岛重洋之区，输诚者亿万计。然犹敕谕屡颁，谆谆以简阅为念。属在将弁，孰敢不鼓舞而振兴哉！

若此者：基命以单心，宜民以利运，缓刑以尚德，奋武以昭戎。洋洋乎畅九垓而溯八埏，盖亘古而独隆也。臣尤伏愿皇上，懋持盈保泰之怀，臻累洽重熙之盛。时几已敕而益表洁斋，清晏已歌而愈勤疏凿，彰瘅已分而弥思保惠，戎兵已诘而更切怀柔。逊志之修敏焉，翕河之颂陈焉，折狱之良称焉，知方之训著焉。腾英声，蓄茂实，总八极而为量。于以弥纶宇宙，鼓铸群生，开骏发之远祥，固保定之宏业。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视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高准则是用来落实安邦大计的,治理国家有赖于开发利用水道物资运输,明察刑狱方能辅助教化,保卫人民最重要的是充实军队。古代帝王恭承天赐大命,依靠在“内圣”与“外王”两方面自我修养之实效,把握天人协和感应的机宜。通过坚持宏深静密地积累德行,在深宫里养成了兢兢业业恭谨畏慎的作风;通过致力于发展水上运输,使得贡赋通达全国各地;通过将法律修订得合情合理,表明了对人民的慈祥之心;通过一再显示军事震慑力量,道义使得周边各个少数部族表现为怀德畏威。因此,《诗经》咏唱其恭敬的文字,《尚书》赞美其治水的功绩,《礼》记录其察狱听讼的训令,《易》缀录其主张宽待和保卫人民的言辞。综览搜寻群籍所载,可知君主的统治术兴盛就要不断学习,民众的利益兴起而国势便会固若金汤,国家具有政简刑清之风尚,士子讲求安民和众之方略。这些正是帝王赖以经天纬地,造化万物,使全社会步入仁德长寿境地的原由。

敬思皇帝陛下,行道合乎“执中”的原则,治绩显示在普利民生上,扩展爱护生灵之大德,修明整军经武之常规。当然已经使自己的庄严敬慎之心日益坚强,江河的堤防修筑得永久可靠,众多的士兵经过训练而熟悉武艺了,国家各项法律制度也形成相互联结的完整体系了。然而圣上的心怀竟如此谦逊,对小事考虑得点滴无遗。既观察民风而设定教化之方,又垂询国事而考察浅近之言。特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有关传心学、筹河防、慎典刑、严军制等方面的最佳方略。像臣下我这般愚昧,何能足以知其大体与精要?但当此应对称扬开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这句古训的意义,怎敢不尽量陈述平素诵习所得,从而献上一点儿管窥蠡测的陋见,借以表示自己的一片忠忱呢?

恭读策问诏书而见其上说:“危微精一的思想,是帝王道统的起始”,并进而揭示它对于实现“内圣外王”的功用。臣下我谨按:《史记·五帝纪》说:“帝喾治理百姓采取‘执中’的方针而像河水遍润天下。”可见“执中”的说法,事实上不是从《尚书》开始的。然而孔子删定《尚书》,上限断自唐虞,而尧“执中”、舜“用中”、汤“建中”的

不同提法,其实前后是一个道理。孔子特加一"庸"字,因为"中和"是讲性情的,"中庸"是讲德行的,其实质无非是一个"中"字。朱子认为《大学》自"格致诚正"直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中庸》从"中和位育"起,到"圣神功化"止,关键不外乎一个"诚"字。"诚"则不息,"敬"则必勤。诚敬之心树立起来,帝王之道的本体和功用就完备了。《大学》、《中庸》二书实际上与《尚书》是互为表里的。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分为四大纲:"格致"、"诚正"、"修身"、"齐家"。因其意在于正本清源,故而省略了"治平"不讲。明人邱浚以"正朝廷"、"成功化"等目补充它,方为完备。唐太宗的《帝范》十二篇,始自《君体》、《建亲》,终于《阅武》、《崇文》。宋人范祖禹撰有《帝学》八卷,上始自三皇五帝,下迄于宋神宗。以至张蕴古的《大宝箴》严肃提出为帝王者要注意戒除奢侈豪华和沉溺于声色的毛病,李德裕《丹扆箴》胪列帝王夜晚办公、身着正服的条规,都有值得称述的内容。《孔传》将"皇极"即"帝王治理天下的准则"解释为"大中"即"万分中正之道"。朱子说:"中正之道"是构成整个"准则"体系的手段。把整个"准则"体系看作在"中正之道"中起准绳作用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把"准则"解释为"中正之道"则不可以。《尚书·洪范》中所说的"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五事"即貌、言、视、听、思,"八政"即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五纪"即岁、月、日、星辰、历数,是"准则"建立的基础;而"三德"即正直、刚克、柔克,稽疑即以卜筮决疑之方法,"庶征"即从自然气象及其变化推测人事的法则,"五福"即寿、富、康宁、好德、老有善终,"六极"即早夭、疾、忧、贫、恶、弱,则是"准则"借以推广开来的途径。因为《洛书》是以"五"这个数居中,而天帝赐给禹治理天下的九种法则是以"皇极"为根本的。敬思圣上学问高深,崇儒重道,委实足以从先哲那里接续心学之渊源,在众人中树立"圣人作而万物睹"的形象。且又不断讲论经学,阐发"用中"的精微要妙的旨趣以及"顺天而动"的真义。这就自然要昭垂万古了。

策问诏书又认为:现在治河要兼顾到便利漕运。这真是一劳永逸之计啊!查考《玉海》所载述的《禹贡》,大禹治水后,九州所开凿的河道最终都与黄河相通,这是运输水道的开始。但黄河在唐朝以前

是北行入海的。后晋开运元年滑州决口,黄河便自北而东。宋神宗熙宁八年澶州曹村处决口，黄河又自东而南。元朝延祐六年筑汴梁护城,使水南汇于淮河,黄河始与淮河相通。清口即是黄淮的汇合处。但淮河水力容易减弱，黄河水力却经常保持强劲。黄河水一倒灌入淮,清口必然形成淤塞,洪泽湖水不得由高家堰各坝流进高宝境内诸湖入运河,于是淮河下游皆成水淹之地。漕运水道亦因此而不通。故欲收淮河之利，宜加意于清口，添筑拦黄矶嘴长坝，以减轻黄河水势。鉴于有时黄淮并涨,又宜保固高家堰。潘季驯所设计的用"束淮刷黄"之策,坚筑高家堰,蓄住洪泽湖所注入的水流,使全淮之水以其七分泻入清口冲刷黄河所带来的泥沙入海,而以其三分流入运河,自山阳、宝应、高邮、江都三百里以内以达于长江,这对于加强东南地区的防涝保障,解决漕粮运输的关键问题,实在是个合理的方案。自古黄河水道迁徙无常,只有靠善于治河者审时度势,或设矶嘴以抵御其冲,或修月堤以防遏其溃,或挑引河床以减弱其流。而治河的大思路则不外乎借助淮水以抵拒黄河的倒灌,使淮水得治而黄河亦得其治;合黄淮以治理漕运，使黄淮得治而漕运亦得其治。差不多做到水得畅速而行,而国家钱财用有实效。方今海宇风平浪静,河流顺道,全仰赖皇上睿智宏谟的筹谋规划，广集众议而折衷一是，使得运道常通,而仓库越发得到充实。

策问诏书又说:"虞舜时在辅助教化方面,对施用刑罚采取慎重而哀怜的态度",由此想使察狱之道无冤屈无宽纵。说起"五刑"之制,原肇始于蚩尤。唐、虞、三代沿革不同,但总的说来都没有违背"设置刑罚以期达到无人犯法受刑"的本意。史称汉文帝十三年废止肉刑,但崔浩《汉律序》说,文帝废肉刑却仍保留了宫刑。《通鉴》载西魏大统十三年废宫刑,而《尚书正义》及《周礼疏》又说此刑直至隋唐时才宽免。可见肉刑的废除,不全在汉代。《周礼》记载"五刑"的种类各有五百,穆王增为三千,但增加了轻刑而减少了重刑。不过据《周礼》郑注所引,《夏刑》的"五刑"种类为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与墨刑各一千,则"刑罚三千"之制在夏代便已形成,它便是《吕刑》制定的依据。法家十家出于掌狱讼的理官，名家七家出于礼官，

源流自相区别。司礼司乐分为二职,掌兵掌刑合为一官,是因为施政侧重面有详有略的缘故。从前陈咸说过:为犯罪人议定他适应的刑罚,应当从轻。虽有百金的利诱,也千万不要按从重来给人定刑。因为汉承秦法,过于严酷,陈咸也是带着愤激情绪讲这番话的。至于轻率地追求轻刑的虚名而不体察对奸恶之徒讲仁慈的危害,那就属于姑息卖恩了。例如唐太宗放死刑犯回家过年一事,也不免受到了欧阳修的批评。臣下我读过御制《慎刑论》,记得其中反复重申,告诫断狱定案者切不可放纵自己的喜怒情绪,要谨防量刑轻重上的失当。臣下我更恭敬地寻绎了御制《息讼安民论》,见其仍本着慎重刑法的旨意,推求勤政为民之初衷。这些不正是治民的要道吗?

策问诏书又认为:"兵可以百年不用,不可以一日不备"。臣下我想到古代寓兵于农,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集体围猎制度,都是利用农闲讲求武事。自从管子作内政,寄军令,兵与农开始分离。汉初以南军保卫宫城,以北军卫戍京师,合乎内外相制之道。唐朝建置府兵,一变而为矿骑,再变而为方镇,兵制越变越坏。宋代由枢密院统辖"外兵","内兵"则由"三卫"总领,其下设有分掌召募、拣选、廪给、训练、屯戍、迁补、器甲、马政等事宜的名目。明朝的京兵置有锦衣十二卫,留守兵四十八卫,这是唐朝府兵制的遗存;边兵如蓟辽、大宁诸司所置各卫,即为汉代招募流民充实塞下之制的遗存。大抵自唐宋后专用募兵,而游手无业之徒应募滥入,使得养兵之费日益浩大,但实际上却无可用之兵。看来必须如宋臣苏轼关于河北弓箭社事宜奏疏所言,实行乡勇自相团练,才能既不扰民又加强了边地的防务。不至于强迫百姓身着戎装手执兵器,奔驱于满山遍野,像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那样罢了。我圣朝社会稳定,民风和睦,疆宇安宁。在海岛和重洋之外的地区,向我朝献纳诚心者数以亿万计。然而皇上仍屡颁敕谕,深切地以检查军队训练情况、挑选将士为念。凡属在军将士,谁能不感到鼓舞和振奋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依据天命来尽心于圣德修养,从便利人民出发来改进漕运,通过宽缓刑罚使社会更崇尚道德,依靠勤奋讲武而使军威大震。盛大得上到九重天,下至八方边际,造成了亘古未有的极盛

之世。臣下我更祝愿皇上扩展持盈保泰的心怀，以达历代大平之辉煌。时时防微杜渐已经做到之后，更要斋戒沐浴以表诚敬；百姓们已在歌颂天清地静之时，愈须勤勉地继续抓好疏浚河道的工程。对百官已经彰善惩恶，则进而考虑如何保民惠民；对军队已经严加整顿训练，则更深切地怀柔远方。对谦虚美德的修养与日俱进，对治河成效的颂辞纷陈，断狱的清官受到普遍称赞，教导将士要有勇知方的训导收到显著的效果。仁德的名声交腾，隆盛的业绩飞布，把总揽八方边际作为度量。赖此足以统摄宇宙，铸造群生，开启深谋大智所长远呈现的吉祥，巩固上天保定的大业。那么，我国家万年有道之永福便由此奠定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吴毓英　殿试对策

吴毓英(生卒年不详)　字鞠人，江苏吴县人。嘉庆十六年(1811)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俟考。

臣对：臣闻建中所以立极，导滞所以安澜，明刑者弼教之原，足兵者卫民之本。遐稽载籍，《诗》陈《小毖》，持敬之学必精；《礼》重旧坊，修利之功以懋。《书》著简孚之训，《易》占地水之爻。茂矩崇仪，粲焉赅备。圣人绍天出治，主一以证心传，道九以疏经渎，法寓于惟钦惟恤，政严于止暴止邪。要本乎虔恭兢业之衷，以垂拱而司契。是用帝德同天，河流顺轨。恩隆解网，异夏日之威；治诘戎兵，顺秋气之肃。猗欤休哉！古所谓风动四方，云施万汇，永延长而膺天庆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锡福同民，观文溥化，固已稽古敕生安之性，涤源征润下之休，怀乐利而刑亦称祥，勤蒐狩而兵皆向义矣。乃圣怀冲挹，愈切畴咨，不遗岩穴之奇，务尽刍荛之实。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圣学、河防、恤刑、讲武诸大典。如臣椯昧，何足以知体要？顾生长黉序之内，目染耳濡，匪朝伊夕，幸际悬鞀设铎之辰，窃效土壤细流之义。敢抒情愫，敬述所闻。

伏读制策有曰:“危微精一之旨,为帝王道统所开”,而因求夫心法治法一以贯之之道。此诚设诚致行之本也。臣谨案:百家皆言皇帝,而《尚书》独载尧以来,自蒲坂垂裳,平阳纂统。《尧典》、《益稷》以钦为始终,人心道心以中相受授。而尧曰“执中”,舜曰“用中”,汤曰“建中”,盖心源若接,旷代同符云。宋朱子作《中庸序》,以“天命率性”证“道心”,以“择善固执”证“允执”,以“君子时中”证“执中”。而《大学或问》则谓自“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或问》则谓“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盖心术者治术之本原,存之于心则为“敬”,莞乎始终内外,而精言之则为“诚”。唯诚,故无不敬也。昔之人君知此意者,莫如唐太宗《帝范》十二篇,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书成于贞观时。人臣之知此意者,莫如范祖禹《帝学》一书,约三皇至宋代治法,共为八卷。真德秀依“圣经”、“格致”、“诚正”诸条目,为《大学衍义》。其书未及“治平”,故明邱浚补之。他如“大宝”、“丹扆”之《箴》,“皇极”、“大中”之《训》,皆足与经义相证明者也。伏读御制经筵《用其中于民论》,本“允执”之全神,措休明之大业。恭读御制《读〈尚书〉诗》,心法治法,究厥精微,所由主极端而民风懋也。

制策又以今之治河兼欲利漕,与古之治河为异,因讲明夫缮完堤防之利、疏浚壅塞之功。臣考《禹贡》一册,专言治水,于“兖州”曰:“九河既道”,告河平也。《周谱》周定王五年河徙,《汉书音义》谓即今砾渠,则河渐南矣。自王景汴渠之筑,东汉至唐绝远。河臣等敬谨供职,凡增高培厚,当局之虑必周;储料鸠工,先事之图必审。夫是以清足敌黄,黄不倒灌,水得遄行,用无虚糜而河漕均有裨益也。

制策又以用刑之道贵于无枉无纵,而期折狱者之致其聪明,悉其忠爱。此尤勤恤民隐之盛心也。臣惟五刑之名,见于《舜典》,然所谓“五”者,未有明文。观《吕刑》苗民“五虐之刑”,则非即三代后之“五刑民”矣。周制立,而司寇“三典”,司刑“五刑”,法綦详焉。而“三刺”、“五听”以致其慎,“三赦”、“三宥”、“八议”以要诸仁。盖刑期无刑,辟以止辟,行法中之政,即以全法外之仁也。西汉沿用秦制,文帝元年始除“收孥相坐”,继除“诽谤妖言”,继除肉刑。然此三者,终汉之世

犹不能革。夫古者兵刑合为一典，自《汉志》列申韩之学而法家名家始分为二。后世律例皆昉于李悝《法经》六篇。王应麟有言曰：明允者用刑之法，钦恤者用刑之心。听讼之吏当思人命至重，毋存成心，无狃偏见，毋以姑息为阴德，毋以武健为胜任。如黄霸之数决疑狱，颜真卿之决五原冤狱，则庶乎可称廉平矣。御制《明慎用刑说》，本乎慈祥恺悌之诚，于以阐阅实矜疑之旨。御制《明赏罚以示劝惩谕》，赏滥则不知感劝，刑滥则民无所措，必大公无我以处之。凡为秉宪之吏者，敢不奉令唯谨欤？

制策又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因举整饬戎行之事为问。臣考《周官·小司徒》，“伍、两、卒、旅”，此训练之数也。《司马法》甸出长毂一乘，此调发之数也。训练不嫌其多，调发务从其少。训练多则人皆习于兵革，调发少则士不苦于征战。故古者兵出而战胜。及管子作内政，而兵农始分。汉时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自武帝置“八校”，以习知胡越人充之，募兵始此。期门、羽林皆家世为之，长从始此。遂有养兵之病矣。唐府兵置于各州，高宗时府兵之制渐坏。开元中张说请募士宿卫，更号“矿骑”，天宝后矿骑之制又坏。宋之兵制，有禁、厢、乡、蕃之目。明之兵聚京师者，几有五十万。后于谦汰其老弱，得胜兵十五万，设都督以统之。夫兵以义勇为主，故训练宜急。第其责则不在兵而在将。御制《出古北口即事》云：“备守列雄兵，训迪勖良吏”，则责成乎将。将而勤于校阅，则团勇、练勇皆收其益矣。嘉庆十年钦奉上谕：“枪箭刀牌勿取架式，惟以挽强命中、击刺矫捷为上选”，则鼓励夫兵，兵与将交奋，何有老弱充伍、巡防疏漏之弊哉？

若此者：本夙夜以殚心，则王道悉根天德；谱允犹而裒对，则薄海悉颂安流。咸中有庆，于以昭矜慎之心焉；有勇知方，于以重干城之寄焉。侯其祎而，治蔑以加矣！臣尤伏愿皇上所其无逸，时乃日新，观象而弥切严恭，披图而弥深祗畏。国家亿万载景祚之隆在是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中正之道是树立治国准则的需要，

疏导壅滞是降伏狂澜的方法,彰明法制是辅助教化的基础,充实军队是保卫人民的根本。往远处查阅典籍,便知《诗经·小毖》所述说的保持敬慎的学问必须精心讲求,《礼记》所强调的修固旧堤以发挥其水利功用的主张应当勉力实行,《尚书》昭示着刑法简明而令人信服的教训,《易经》有占卜地中有水的《师》卦卦爻。丰茂的法度,崇隆的礼仪,灿然详备于典籍之中。圣人继承天命出来治理天下,以一意恪守中正之道来验证帝王"心传",以开凿九条水流来疏治河道;所定法律贯彻着慎重和哀矜的精神,所出政令严厉到可以止暴止邪的程度。总之是本着恭恭敬敬、兢兢业业的心态,垂拱于上而掌握着关键。因此帝德齐天,使河流也乐于顺道。对百姓深仁厚泽,从不像夏日骄阳那样酷烈。只是在整治军队时,才如秋气一般严肃。这是多么美好的局面啊!古人所谓四方闻风响应,恩泽遍及万物,国运永远延长,承受皇天大福,正是赖有这些措施啊!

敬思皇帝陛下,赐福万民,关切文事,普及教化。当然早已通过考古得到了生性喜安的告诫,通过疏浚黄河上游水道而使下游良田得到灌溉,一片喜气洋洋;从保证人民的安乐和利益出发,施用刑罚也成了慎重之事;坚持督励军队像古代春蒐冬狩那样勤于训练,官兵们都心向大义了。然而圣君之心是如此谦逊,愈益急切于国策的咨询,不肯遗漏身居岩穴的奇异之士,务求使山野樵夫尽吐实言。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圣学、河防、恤刑、讲武诸方面的大法则,像臣下我这般愚昧无知,何能足以知其大体与精要?但想到自己成长于学校之内,耳濡目染,非止一朝一夕;今既幸遇悬鼓设铃之时,私下想到献纳土壤细流之义,故而敢抒情愫,敬述所闻。

恭读策问诏书而见其上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思想,是帝王道统的起始",因而推求在"心法"与"治法"中一条贯穿始终的基本法则。这的确是树立讲"诚"的原则并付诸实行的根本。臣下我谨按:各个学派都论说三皇五帝,而独有《尚书》收载了自唐尧在平阳建都垂拱、虞舜在蒲坂继承帝统以来的文献资料。《尧典》和《益稷》均以谨慎为始终,关于人心、道心都是按取其中正的原则来递相传授的。至于尧讲"执中",舜讲"用中",汤讲"建中",大

约由于他们心法的源头是相通的,故而尽管相隔几代,却仍然非常相合罢!宋朝朱子作《中庸序》,以"天命率性"来论证"道心",以"择善固执"来论证"允执",以"君子时中"来论证"执中"。而其《大学或问》则认为,自"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其《中庸或问》则认为,"圣神功化",关键不外乎"诚"。这是因为,心术为治术之本原,存于心中时就叫做"敬",这"敬"由始至终,由里到外都保持最佳状态,从精纯的角度说出来就是"诚"。正因为"诚",所以无所不"敬"。已往的人君能知会此意者莫过于唐太宗的《帝范》十二篇,始于《君体》、《建亲》,终于《阅武》、《崇文》,书成于贞观年间。已往的人臣能知会此意者莫过于范祖禹的《帝学》一书,简要论述了自三皇至宋代的"治法",共分为八卷。真德秀按"圣经"、"格致"、"诚正"诸条目,作《大学衍义》。但该书未论及"治平",故明人邱浚补充它而另成《大学衍义补》一书。其他如《大宝箴》和《丹扆箴》、《皇极训》和《大中训》,都是足以与经义互相印证发明的著作。伏读御制经学讲义《用其中于民论》,依据"允执厥中"的完整精神,筹划美好光明之大业。又恭读御制《读〈尚书〉诗》,于"心法"、"治法",深究其精微之处。这正是君主统治术很端正、民风兴盛的根源啊!

策问诏书又认为:现在的治河要兼顾便利漕运,与古代的治河不同,进而要讲明修缮保全堤防的益处和疏浚河道淤塞的功效。臣下我查考《禹贡》一书是专讲治水的。在"兖州"那一段文字说:"至此九条黄河支流都已畅通",这是宣告黄河洪患平定了。《周谱》记载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而《汉书音义》说所改河道就是现在的硃渠。如此,则河道是逐渐南移了。自王景修筑汴渠后,东汉至唐相隔久远而河未改道。可见只要河臣等敬谨于职守,凡增高培厚堤防之事,当局的考虑务求周全;储备材料,招募工匠,事前的计划务求审慎,就可以做到清流足以抵拒黄流,黄河不倒灌淮河,运河之水得以快速奔流,国家财用没有虚耗而对治河漕运均有裨益。

策问诏书又认为:施用刑罚之道,贵在不冤枉不放纵,并希望断狱者要拿出聪明才智,竭尽忠爱之心。这更是殷勤体恤民间疾苦的深心厚意。臣下我想到,"五刑"的概念最早见之于《舜典》,但关于五

种刑罚的具体名称尚无明文。观看《吕刑》追记的蚩尤对苗民所作的“五虐之刑”，则知其并非就是三代后的“五刑民”了。周朝制度建立后，大司寇对新国用轻典，对平国用中典，对乱国用重典；司刑官则有五刑，法制已极其详备了。而且还有“三刺”、“五听”的制度以保证听讼断狱的全面和慎重，有“三赦”、“三宥”、“八议”等对老幼弱质健忘之人和亲贵贤良者犯罪可以减免刑罚的规定，借以归结为体现“仁”的精神。因为用刑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无刑，对杀人者处以死刑是为了以此制止杀戮，所以按照法律内容执行国家刑法，就是借以保全法律之外的“仁”的精神。西汉沿用秦制，文帝元年始废妻子儿女连坐法，继废“诽谤妖言”法，继而又废除肉刑。但这三项，事实上直至汉代结束还是未能革除。古代军法与刑法本是合在一起的，自《汉书·艺文志》列举“申韩之学”，法家与名家始分为两派。后世刑法条例都是发端于李悝的《法经》六篇。王应麟有言道：严明公平是用刑的法则，敬慎哀矜是用刑的心术。听讼之吏当思人命至关重大，不要存有成心，不要狃于偏见，莫以姑息为阴德，莫以猛酷为胜任。而要像黄霸数决疑狱、颜真卿平决五原冤狱那样，差不多就可称为廉明公平了。皇上的御制《明慎用刑说》，本着慈祥而和易近人的诚意，阐明了审察实情、慎重疑案的思想。御制《明赏罚以示劝惩谕》又指出：奖赏过滥则使人不知感奋自励，刑罚过滥则使民无所措手足，必须要本着大公无我之心来处理好刑赏的分寸问题。凡为执法官吏，怎敢不奉令唯谨呢？

策问诏书又认为：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因而举出整饬戎行之事来策问。臣下我查考《周礼·小司徒》有“伍”、“两”、“卒”、“旅”的名称，这是进行军事训练时按一定人数编成的军事单位。而《司马法》所谓“每甸出长轴兵车一辆”，则是讲调集征发的军队数量。训练不嫌其多，而调发务从其少。因为训练多，人们就都熟习兵器，调发少，士兵就不苦于征战。故而古时兵一出而战必胜。待到管子作内政，兵与农始行分开。汉朝设置“材官”兵种于郡国，京师有南北两军屯戍。自汉武帝设置“八校”，以熟习了解胡越风俗之人充当，募兵制由此开始。而期门、羽林军又都实行父子相继世代为兵，“长

从"制由此开端。于是有养兵之弊了。唐朝"府兵"建置于各州,至高宗时府兵之制渐渐弛废。开元中张说奏请招募士卒值宿警卫于宫禁,更名为"旷骑"。天宝后旷骑之制又弛废了。宋代的兵制有禁兵、厢兵、乡兵、蕃兵等名目。明朝军队聚集于京师的几乎有五十万人,后来于谦淘汰其老弱,留得"胜兵"十五万,设都督来统领。军队其实是以义勇之气为主的,故而训练应抓紧。但训练的责任则不在兵而在将。御制《出古北口即事》云:"备守列雄兵,训迪勖良吏",可见是责成于将的。为将者勤于校阅,则无论团勇练勇皆能得其益处。嘉庆十年敬奉上谕:"枪箭刀牌的比武不要讲求架式,只以挽强命中、击刺矫捷为上选。"像皇上这样善于鼓励士兵,兵与将交相感奋,如何会有老弱充伍、巡防疏漏的弊病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靠着人君从早到晚地尽心于圣学,那么人间的王道便会全部植根于天德。编绘出得宜的规划蓝图并将众多的山川之神来配祭,那么大海边上都将歌颂安定河流的伟绩。全都适中而万民有福,用来显示对刑罚问题的哀矜慎重之心。将士有勇力懂方略,便将保卫国家的重任交付于他。真美好呀!治绩无以复加了。臣下我更敬望皇上不图安逸,圣德与时俱进。夜观天象而愈加诚恳地对上天怀着肃穆恭谨之心,披览《河图》而更对神灵深怀敬畏之意。那么我国家亿万年大福之兴就在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吴廷珍　殿试对策

吴廷珍(生卒年不详)　字叔琪,江苏吴县人。嘉庆十六年(1811)探花,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俟考。

臣对:臣闻建极所以绥猷,宣防所以兴利,明德者慎罚之本,奋武者戢暴之经。博稽载籍,《书》陈安止之谟,《诗》有允犹之颂,质成则《礼》严听讼,畜众则《易》象容民。伊古帝王,甄陶六合,经纬万几,宪天以懋渊修,度地以兴水利,犴狱平而刑法当,干城备而兵制严,悉本

虔巩兢业之衷，以临宸而御宇。用是夙夜单心，平成奏绩，弼教明乎淑慝，讲武合乎兵农。郁郁乎焕哉！镜纯粹之至精，表圣神之极轨，绵区饮化，匝宇归心。所为罄图牒而难称，合寰瀛而在宥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洽垓埏，道符圜矩。固已健行昭不息之功，而河海悉臻于顺轨；象刑播惟明之化，而蒐狩时切于卫民矣。乃至德渊冲，迩言好察，冀刍荛之有合，采葑菲而无遗。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崇圣学，慎河防，饬科条，励戎士。如臣梼昧，譬诸撮壤涓流，奚补崇深于山海？顾拜献先资，人臣之义。敬承清问，敢不就平昔诵习，谨绎所闻，用效蠡测管窥之一得！

伏读制策有曰："危微精一之旨，为帝王道统所由开"，爰深求夫"执中"、"用中"、"建中"之蕴。诚基命宥密之大原也。臣谨按：黄帝诲颛顼之训曰："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言"执中"也。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舜戒曰："取之以敬，得之以敬"，言立中以生正也。《鲁论语》尧命舜曰："允执其中"，《古文尚书》则以十六字括之。嗣是禹曰"祗承"，汤曰"日跻"，文曰"缉熙"，武曰"执竞"，不言"中"而"中"之理存焉。盖"中"之一字，敛之为圣功，推之即为皇极。戒谨恐惧，所以全"中"之体；天地万物，所以达"中"之用。圣贤心法止此一"中"，诸经所言原无异旨。朱子《大学或问》谓"格致诚正"以及"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或问》谓"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究之戒欺求慊，何莫非诚；不显笃恭，何莫非敬。心法治法，二书实括其全矣。真德秀《大学衍义》纲举四条：曰"格致"、"诚正"、"修身"、"齐家"，意在以本贯末，故略"治平"而不言。明邱浚补之，体用赅备。唐太宗《帝范》十二篇，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宋范祖禹约三皇至宋代治法，为《帝学》八卷。以及张蕴古之《大宝箴》，李德裕之《丹扆箴》，深切著明，均有可采。《洪范》"皇极"，自《孔氏传》训为"大中"，而诸儒皆祖其说。朱子《皇极辨》曰：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较汉儒之说尤密。我皇上圣学高深，朝乾夕惕，追踪轩颛，媲美勋华，先后如一揆矣。

制策又曰：今之治河兼欲利漕，曰疏曰浚曰塞，治法不外乎此。

臣惟《禹贡》治水之法，曰播曰潴。播者所以分其势，潴者所以蓄其流。要其大旨，在先疏下流，而上流自无壅滞。先儒以州末系河，指为运道，然犹未有漕运之名。自元以后，转东南之米以北输，于是取道于黄、运两河，而治河之方即为利漕之计。潘季驯云："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利不可强，治理不可凿"，诚千古治河良策也。夫黄与淮合，入海无阻，而运道于是乎流通。顾淮之力弱，黄之力强。淮不出而敌黄，则黄之势愈张；黄一入而灌淮，则淮之患尤大。今欲收其利，惟当加意清口。清口者，黄淮之会合也。欲去黄淮并涨之患，尤宜保固高堰。高堰者，淮扬之保障也。入口、出口、堤防、闸坝之利果能筹画万全，浊流何致分侵，运道何忧淤淀平？以淮敌河，淮治而河亦治；合淮、河以济运，淮、河治而漕亦治。堤以束水，水以刷沙，在相其宜而导之耳。国家数百万漕，岁资济运，而施工之费罔惜帑金。挽粟飞刍，安澜献瑞，诚有驾禹功而上之者，谓非亿万年之福也哉！

制策又以"虞廷弼教，钦恤惟刑"，爰进稽《周礼》制刑之法。臣以为"五刑"之设，上古不能废。《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而以"五禁"、"五戒"防于未然之先，"三刺"、"五听"审于已然之后。宽之以"三赦"，有幼弱、老耄、蠢愚之分焉；继之以"三宥"，有不识、过失、遗忘之辨焉；慎之以"八议"，贤能亲故无或枉挠焉。何其爱民深而忧民切也！汉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意下狱，其少女缇萦上书愿赎父罪，而肉刑始除。孔颖达曰：《周礼》五刑皆有五百，《吕刑》墨劓皆千，刖五百，宫三百，大辟二百。则轻刑多而重刑少，所谓世轻世重也。战国时刑名法术各有专家，要皆刻核少恩，与古圣王制刑教德之意判然离矣。有虞刑即兼兵，然征苗之命，不咨皋陶而咨禹，则无事合而有事亦分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必悉其聪明，致其忠爱，始可无枉而无纵。苟以姑息为阴德，以武健为胜任，甚且锻炼周内，深浅不平，安能重民命以昭信谳乎？伏读御制《明慎用刑说》，恺恻慈祥，至周且密，诚万世理刑之法鉴矣！

制策又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思所以振军威而收实效。臣考《周礼》伍、两、卒、旅之法，比、闾、族、党之文，刑法庆赏相及相共，所谓寓兵于农是也。管子作内政，寄军令，轨、里、连、乡，特一

时图霸之术，与周制异矣。汉初置材官于郡国，而京师有南北军之屯，南军以卫宫城，北军以卫京师。自后有募召之兵，有长从之兵，皆昉于武帝时。唐置府兵，分天下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府兵无事则耕，有事则战，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兵无失业之忧，将无擅兵之弊，其法最为近古。乃一变而为矿骑，再变而为方镇。宋有禁兵、乡兵，元立五卫，明设禁兵、边兵，制愈详矣。要之用兵之道，勾稽有册，简阅有规，校练有期，侵冒有禁，老弱充伍之必惩，巡防疏惰之必察。而团练乡勇，尤与同井友助之意相符，除莠安良，诚计之善者也。国家整饬戎行，有备无患，民登于衽席，势巩于苞桑，可铸剑戟以为农器矣。

若此者：宵旰时勤念典则训式球图，怀柔克迓神庥则礼行河岳，察辞在中而人无冤抑，养兵不用而国有制防。猗欤茂哉！盛德洪业蔑以加于此矣。臣伏愿皇上本日新久照之谟，切保泰持盈之想。不遑暇食，无忘敬胜之箴；修利堤防，永睹朝宗之瑞。五刑已昭审克，而用威用劝，倍极周详；万邦方咏来同，而曰旅曰师，弥勤训练。中外禔福，遐迩吉康，扇巍巍，显翼翼，弥纶天地，荣镜宇宙。则我国家亿载咸宁之庆，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树立准则是用来落实安邦大计的，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用来兴水利的，发扬美德是慎用刑罚的根本，振兴军事是止息暴行的常规。博览群籍，《尚书》陈述了帝王要确定好恶对象的谋略，《诗经》有对确实按图祭河的歌颂。对于如何公正地评判争执，《周礼》告诫要认真听取双方的诉讼再作处理。对于如何聚集民众，《易》卦卦象启示要对其宽容。那些古代的帝王，陶冶天下，料理万机，取法天道而勤勉于内心修养，测量土地而兴修水利，案件断得公平而刑法定得允当，防卫力量足备而兵制森严，都是本着虔诚坚定兢兢业业的初衷，来登临皇位统治天下。因此从早到晚殚精竭虑，使地平天成，功绩奏上，辅助教化而明辨美好与邪恶，讲习军事而使兵农合一。真是文采郁郁而光华灿灿啊！他们以纯粹的最高道德精

神照耀人间,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圣人神人极完美的行为范式,使广大的区域都沐浴其高风而感化,全天下都衷心归服,由此而用尽所有的神图秘籍都难以称颂,即使将陆地与大海加起来也还在其包容之中。

敬思皇帝陛下,圣德遍及九重天和八方边际,行道符合天规地矩。当然已经用刚健运行显示了自强不息的功力,而使河海都变得就道顺轨;通过实施刑法传布了只求严明的化导,而军队的训练更切合于卫民的需要了。然而圣德高深又谦虚,乐于察听浅近之言,期望樵夫也有合用的建议,博采众议不肯遗漏点滴。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策问如何尊崇圣学,慎重河防,整饬刑法,督励将士。像臣下我这般愚昧,好比撮土细流,何能有补于山海的高深?但事先提供献策,是人臣的义务,既已敬承清详的询问,又怎敢不就平日所诵习者,谨述所闻,从而献上蠡测管窥的一得之见呢?

伏读策问诏书而见其上说:"危微精一的旨意,是帝王道统的起始",接着又深入研求"执中"、"用中"、"建中"的意蕴。这确实是帝王承奉天命而宏深静密地积累德行这一优良传统的大本大原呢!臣下我谨按:黄帝教诲颛顼的训词说:"大圆在上,大方在下,你能效法这圆天方地,便可作民众父母"。这是讲"执中"即如何把握中正之道。尧告诫说:"要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舜告诫也说:"要取之以敬,得之以敬"。这讲的是如何立"中"从而生出"正"来。《鲁论语》里尧命令舜说:"要真诚地坚持不偏不倚的正道"。《古文尚书》则以十六字"心诀"概括了这些思想。此后禹讲"敬承天命",汤说"日日提高",文王说"会合光明",武王讲"保持强盛",不言"中"而"中"的道理却存乎其中。其实"中"这个字,将其收缩起来就是圣人的功效,把它推广开来就成了帝王治理天下的准则。警惕、恭谨、诚惶诚恐,是用来完备"中"之本体的;天地万物,是用来实现"中"之功用的。圣贤的心法只有这一个"中"字,对此各种经典所讲的本无异义。朱子《大学或问》认为"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中庸或问》则指出,"圣神功化"的关键不外乎一个"诚"字。仔细推究起来,戒除欺饰追求满意,哪一点不是"诚"的表现?鲜明地显示笃

实恭谨，哪一点不是“敬”的实行？所以关于心法与治法，这两本书实在已概括其全部内容了。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列举了四条大纲：“格致”、“诚正”、“修身”、“齐家”，意在从本贯末，故而省略了“治平”不讲。明代邱浚作了补充，使之在“体”与“用”两方面都完备了。唐太宗《帝范》十二篇，始于《君体》、《建亲》，讫于《阅武》、《崇文》。宋代范祖禹总结三皇至宋代的“治法”，作《帝学》八卷。以及张蕴古的《大宝箴》，李德裕的《丹扆箴》都深切著明，均有可取之处。《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一词，自从《孔氏传》解释为“大中”，诸儒皆宗奉其说。朱子《皇极辨》认为：以“极”作为在“中”里面起准绳作用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把“极”直接解释为“中”则不对。这比汉儒之说更缜密。我皇上圣学高深，从早到晚戒惧谨慎，直追轩辕、颛顼等上古帝王，实可与唐尧虞舜相媲美。时代虽有先后之殊，二者却达到了同一标准。

策问诏书又说：如今治理黄河兼有便利漕运之目的，治理方法不外乎“疏”、“浚”、“塞”三种。臣下我想到《禹贡》上讲的治水方法，一是“播”，二是“潴”。“播”是用以分减水势的，“潴”是用来蓄积水流的。此法最重要的目标，在先疏通下游，这样上游便自然不会壅滞了。先儒因见《禹贡》分州叙述的各段末尾都说到该州所分洪水渠与黄河连接，便指为运输水道，但当时还没有提出“漕运”的名称。自元代以后，将东南之米转运北方，于是取道于黄、运两河，而治河之方也就兼为利漕之计了。潘季驯说：“水性不可违拗，河防不可松弛，地利不可强求，治理不可随意”，确为千古治河良策。如果黄河淮河会合后，入海无阻，那么漕运水道便能保持畅通。但淮河之水力弱，黄河之水力强。淮水不能出而抵挡黄水，则黄水之势便愈涨长；黄水一旦倒灌入淮河，则淮河的灾祸更重。现在想要收取两河带来的益处，就应当加意于清口。清口是黄河与淮河的会合处，而要想消除黄淮并涨之患，更应保固高家堰。因为高家堰是淮水扬州的保障。对于如何发挥入口、出口、堤防、闸坝的积极作用，果真能筹划周全，浊流何致于分侵两岸，运道何愁淤淀不平？以淮水抵拒黄水，淮河得治而黄河亦得其治。合淮河黄河之力以助漕运，淮河黄河得到治理而漕运也就得到了治理。至于以堤防来约束洪水，以水来冲刷泥沙，就在于利

用得当而又疏导得法了。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石漕粮调运，而在治河施工花费上更不惜钱财，终于使物资运送十分便利，风平浪静，献上祥瑞。真有治水功绩超出大禹的地方，难道说这不是亿万年之福吗？

策问诏书又鉴于“虞舜时在辅助教化方面，对施用刑罚采取慎重哀怜的态度”，进而稽考《周礼》制定刑罚的法则。臣下我以为“五刑”的设置，上古不能废弃。据《周礼》记载，当时大司寇以“五刑”纠正万民的违法行为，同时又以“五禁”、“五戒”防范于未然之先，按“三刺”、“五听”的办法审判于已然之后。定罪之时，还实行“三赦”，即对幼弱、老耄、蠢愚三种人免刑；又实行“三宥”，即对因无知、过失、健忘而犯罪的三种人加以宽恕；又实行“八议”，即对贤能大臣、王室的亲戚故旧等八种人的犯罪处理特别慎重地加以审议，给予减免刑罚的优待，使之更无稍受冤屈者。可见其爱民忧民之心是何等深切啊！汉文帝时齐国太仓令淳于意下狱，其少女缇萦上书提出愿替父亲受刑，文帝感动，始废肉刑。孔颖达说：《周礼》上记载适用五种刑罚的犯罪的名目都各有五百。至《吕刑》则变为适用墨刑和劓刑的罪名皆为一千条，适用刖刑的罪名五百条，适用宫刑的罪名三百条，适用杀头的罪名二百条，轻刑增多了，重刑减少了，正所谓治世主轻而乱世主重呢。战国时讲刑名、法术的各有专门学派，但大体说来他们在刑狱问题上的主张都苛细而少恩，与古代圣王制刑以教德的本意判然相离了。虞舜为帝时实行刑事与军事合一，但发布征讨三苗部落的命令前，不咨询掌刑法的皋陶而咨询主管征伐的禹，可见是无事时合治而有事时也分开处理。刑狱是关系天下人性命的大事，必须要执掌者竭尽其聪明才智，献出其忠君爱民之心，方可做到既无冤屈又无宽纵。倘若以姑息为阴德，或以猛峻为胜任，甚至还锻炼人罪，深文周纳，议罪量刑又轻重不平，怎么能够体现对人民生命的重视而表明审判定罪的准确公正呢？伏读御制《明慎用刑说》，深感皇上的恺恻慈祥之心，极其周密，真是万世理刑的准则和宝鉴。

策问诏书又认为：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进一步考虑振扬军威又收到实效的方略。臣下我考察《周礼》记载的按伍、两、卒、旅编组军队的办法，按比、闾、族、党划分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以及

刑法与庆功奖赏相连相共的情况，正是所谓“寓兵于农”啊！管子创立内政，寄托军令，分成轨、里、连、乡，只是一时图谋霸业的办法，已与周朝制度相违背了。汉初设置“材官”兵于郡国，而京师有南北军屯戍，以南军保卫宫城，以北军保卫京师。自此以后有募召之兵，有“长从”之兵，均始于武帝时。唐朝设置府兵，分天下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个，而关内的占二百六十一个。府兵无事则从事农耕，有事则投入战斗，战事结束后总是即行解散，兵士散归原府，将领调回朝廷。兵无失业之忧，将无擅兵之弊。此法最接近古制。无奈一变而为矿骑，再变而为方镇。宋代设有禁兵和乡兵，元代建立了“五卫”，明代设置了禁兵和边兵，兵制愈益详备了。总而言之，所谓用兵之道，在于考核起来有簿册，挑选检阅有规章，比武训练有定期，对侵吞粮饷有禁令，对老弱之人充塞军伍者必须惩处，对疏忽怠惰于巡逻防务者必须查办。而团练乡勇，更与“同乡之人友爱互助”的意义相符，对于除莠安民来说，实为良策。国家整顿军队，有备无患，使人民高枕无忧，国势根深蒂固，真可以将剑戟销铸为农具了！

像以上这些问题：每天从早到晚坚持勤奋学习，于是便以天球河图为法式；治好河流而迎来神灵的庇荫，于是便依照礼仪祭祀河山。审察判决刑狱时遵循中正之道，便无人蒙冤受屈；养兵虽然未用，但国家有了控制和防卫的手段。多么繁盛啊！盛德大业真是无以复加了。臣下我敬愿皇上本着日新圣德、久照天下的谋略，抱着持盈保泰的想法，即使忙得顾不上吃饭，也不忘“敬慎胜过懈怠就吉利”的告诫；坚持修筑和加固江河的堤防，以便永睹百川归海的祥瑞景象。五刑已经明显地达到审慎和实用，又实行刑威与劝戒并用，措施倍极周详；当万国都已遣使来朝表示归附之时，仍督励军队更加勤于训练。于是乎中外平安幸福，远近吉祥康泰，弘扬崇高功业，播布盛大威名，统摄天地，光照宇宙。那么我国家亿万年长久安宁的幸福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董志国译〕

清仁宗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殿试策问

[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仰承昊绎眷佑,兢兢业业,夙夜不敢康,十有九年于兹矣。用是弥深寅畏,以期治臻上理,与我黎庶共享升平之福。当兹延揽,爰伫嘉谟。

《尚书》为传心要典。二帝三王以来,凡曰钦、曰恭、曰慎、曰克艰、曰孜孜、曰兢兢,君臣交儆之言,与《洪范》之言敬,《中庸》之言诚,能推阐其义欤?人君敬天以勤民事,人臣敬事以亮天工,诚敬相通之旨,可发明其蕴欤?"丹扆"、"大宝"之《箴》,《皇极经世》之论,典矣懋矣。朱子《或问》之言心法治法者,道无不赅,能互申其旨欤?真德秀《大学衍义》略"治平"而不言,岂果操诸一家之内,而国自治、天下自平欤?抑所谓措正而施行者,固有渐欤?

政教之美,风俗为先。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凡以化导其民,而兴贤兴能,由此其选也。《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夫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固有之良,尽人同具。彼民习闻正论,则奇邪之说自不得而中之。汉循吏如文翁、召信臣辈,或兴学校,或重本业,诚得端本善则之道欤?正学兴则邪说熄,官常肃则庶民从。公卿大夫所使承流而宣化,二千石与我共此民者,宜何如董率而化导之也?官多因循疲玩,吏多贪利徇私,启聋振聩,敕法除奸,用何道欤?

古无所谓兵，凡民皆兵也；无所谓将，六卿皆将也。《周官》始有伍、两、卒、旅、师、军之名，自丘甲田赋之制日紊，楚有“二广”，晋有“爰田”，法制纷如。嗣后崇卒用徒，车战渐废，战国之兵动以数十万计，于是兵民始分。至汉而内有南北军，外有郡国兵，厥制何若？唐之府兵，最为近古，何以更为矿骑？宋收节度之权，改为更调。元祐熙宁兵制，孰为合宜？明之五军都督府亦犹府兵之意也，何以改为十二团营，又改为三大营？召募之法既不可行，团练之名亦多流弊。多士自田间来，见闻亲切，其何以使兵归实用，饷不虚糜欤？

上古无司刑之官。《虞书》命皋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周礼》狱辞之成，司寇听之，三公参听之。其载在《秋官》者，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能举其略欤？春秋时郑有《刑书》，晋有刑鼎，情伪日出，法令滋彰。李悝法律，萧何益之，叔孙通又益之，其篇目若何？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死刑转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隋唐以来始制五刑，其即有虞鞭朴流宅之遗意欤？朕明慎用刑，期于辟以止辟。近又命廷臣清理庶狱，凡情有可原悉予减等。愚民无知，自罹法网，果何道而使之革面革心，不犯有司欤？

夫端主德以建极，正民俗以同风，饬戎而绥靖嘉师，敕法而矜慎庶狱，皆制治之要图也。多士学古入官，讲求有素，其以所蕴者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生产财富的人要多，享用财富的人要少，致力财富的人要用力，动用财富的人要舒缓。

孔子说：道德不修明，学问不讲习，听到义在那里，却不能赶赴上去，有毛病却不能改正，这些全是我的忧虑啊！

行为出现预期效果没达到的情况，全都朝自身这方面找原因。自身端正了，天下人就都归向他。〔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仰承上天交付天下之事并加以眷顾庇佑,自登基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从早到晚不敢贪图安乐,至今已有十九年了。因此也就更对上天深怀敬畏,以期使治理步入最佳状态,与我百姓共享太平之福。当此延揽人才之际,伫立而听美善之策。

《尚书》为传授心法的重要典籍。自二帝三王以来,君臣间互相儆戒之言,如"钦"、"恭"、"慎"、"克艰"、"孜孜"、"兢兢",与《洪范》所讲的"敬",《中庸》所讲的"诚",能推求阐释其含义吗?人君敬从天命而勤于民事,人臣则通过积极慎重地办理民事来辅助天上的职司。"诚"、"敬"相通的旨趣,可以阐明其意蕴吗?《丹扆箴》与《大宝箴》,《皇极经世书》的论说,都是很典正很深广的了。朱子《或问》中关于"心法"与"治法"的论述,道理讲得无不详备,能用它们互相说明其旨趣吗?真德秀《大学衍义》省略"治国平天下"不讲。难道果真只须下功夫于一家之内,便会国家自然治理,天下自然平定了吗?还是作者鉴于所谓措置政务而付诸施行,必然要有一个逐步前进的过程呢?

政治和教化的完善,以风俗为其先务。古时家设有"塾",党设有"庠",州设有"序",国设有"学",都是用来教化引导人民的。而所起用的贤能之士,也是从这里面挑选出来的。《礼记》说:君子若要教化民众美善风俗,大概只能通过兴办学校吧!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固有的美德,本是尽人都具备的。如果人民习闻正论,那么怪诞邪僻之说自然就不能够迷惑他们了。汉代的循吏如文翁、召信臣等人,有的兴办学校,有的重视农业,这确实合乎端本善则之道吗?正学兴盛则邪说止熄,官吏敬慎于职守由庶民服从其管理。公卿大夫的职责是承奉朝廷旨意进行化导,大守更是与我一起治理这些民众的,究竟应当怎样去统率和教化引导民众呢?现在为官者大多因循疲玩,为吏者大多贪利徇私,如欲启聋振聩,肃法除奸,宜用何种办法呢?

古代无所谓"兵",凡民皆为兵;无所谓"将",六卿皆为将。《周礼》上始有伍、两、卒、旅、师、军的名称。自从按丘出甲士按田亩缴纳

军赋的制度紊乱，楚国出现“二广”制，晋国施行“爰田”制，军事方面的法制便纷乱起来。嗣后天下重用步兵，车战渐被废弃，到战国时出兵动辄以数十万计，于是兵与民始行分开。至汉代时京师之内置有南北两军，京师以外置有各郡国之兵。其制度如何？唐代的府兵制最接近古代，为何又改为矿骑？宋朝收回了节度使的兵权，改为“更调”。宋元祐年间和熙宁年间的兵制以哪种为合适？明朝的五军都督府本来也还有唐代府兵的意味，为何改为十二团营，又改为三大营？现在招募之法既不可行，团练之名亦多流弊。众士子来自田间，见闻亲切。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使兵归于实用，军饷不致虚耗呢？

上古无司刑之官。《虞书》载舜帝任命皋陶为士师主管刑狱，宣明“五刑”以辅助“五教”。《周礼》规定审判材料写成之后，由司寇终审，三公参与终审。记载于《周礼·秋官》的，还有关于断狱量刑过程中实行的“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等制度。你们能举出其大略吗？春秋时郑国公布了《刑书》，晋国铸有“刑鼎”。结果弊病日出，法令条款日增。李悝的《法经》六篇，萧何加以增益，叔孙通又加以增益。所增篇目是什么？汉文帝废除肉刑固然好，却又代之以剃发鞭扑之刑。那些喜欢苛细严峻地援用法律条文的酷吏们在给犯人定罪量刑时，又一味地从重比照，于是被处死刑的反倒不胜其多了。此种情况在魏晋以后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隋唐以来开始制定现行的五种刑罚。它带有虞舜时代以鞭朴流放为刑的遗意吗？皇帝我历来明允谨慎地施用刑罚，期望能通过施行刑法达到最终废止刑法。近日又命朝廷诸臣清理庶民犯罪的案卷，凡属情有可原的在定罪量刑上都予以减等。愚民无知，自触法网。究竟该用什么好办法能使他们洗心革面，不再触犯法律呢？

端正君主的品德以树立治世的准则，矫正民众的习俗以划一社会的风气，整饬军旅而安定善良的民众，严明法制而本着怜恤慎重的原则处理庶民的讼狱，这都是达到天下大治的重要措施。众士子学古从政，讲求有素，就请将胸中所积蕴的见解写在答卷上。不要空泛，不要隐讳。皇帝我将亲自批阅。

龙汝言　殿试对策

龙汝言(生卒年不详)　字子嘉,又字锦珊。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九年(1814)状元。官至内阁中书。撰有《赐砚斋集》。

臣对:臣闻建极者绥猷之盛轨,遵道者训行之隆规,克诘重则卫合天慈,钦恤昭则治跻民服。绳古帝王,绍承圣绪,宣畅淳风,布武绩于八纮,凛宪成于三宥。以溯精一则心法传焉,以广教化则治术恢焉,以靖众志、安善良则军政修焉,以别淑慝、明彰瘅则刑罚清焉。是以典学敏修,式垂于《说命》;乂民用德,化洽于箕畴。《周礼》详蒐狝之文,《羲易》列噬嗑之象。饬宸躬而绵区饮化,肃武备而匝宇归仁。用兹启迪品类,覆露芸生,洪禧延醇,阐绎流祚,上哉夐乎!

钦惟皇帝陛下,参三立极,执两用中,健体乾行,比户遍德,威严师律,刑措成风。固已福应盛而嘉祉辏,众汇蕃而升平庆矣。乃睿怀冲挹,深维久安长治之方,弥廑保泰持盈之念。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圣学、教化、讲武、恤刑诸大政。臣之椿昧,曷知体要,譬若尘涓,奚裨山海?顾念对扬伊始,窃附拜献先资。敬承清问,敢不勉述前闻,备陈诵习,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尚书》为传心要典。二帝三王以来,君臣交儆,因及心法治法之精,治国平天下之理。诚措正施行之要义也。臣谨按:羲、农、黄、颛,尚矣。而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人道危微"十六言,乃千古帝王传心之要。故《尧典》以"钦"之辞始,《益稷》以"钦"之辞终。《舜典》曰"温恭允塞",又曰"慎徽五典"。《皋陶谟》曰"同寅协恭",又曰"慎厥身,修思永"。《大禹谟》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以及汤之"圣敬日跻",文之"缉熙",武之"执竞"。其所以惟日孜孜兢业而不遑者,非特主术之懋,亦唯是赞襄而燮理者与有责焉。《洪范》九畴,皇极之所为锡也,而"用五事"者首之以"敬";《中庸》一书,圣道之所为大也,而陈"九经"者要之以"诚"。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惟敬天以勤民事,则克享天心,凝承宝命矣。一人不能

以独理，故左辅右弼，前疑后丞，内则有六卿，外则有州牧侯伯。惟敬事以亮天工，则上膺主眷，懋官懋赏矣。张缙古《大宝箴》，李德裕《丹扆箴》，凛物侈声淫之鉴，胪宵衣正服之条。邵子《皇极经世书》，言君道臣道十二则，皆本心传以发明治道者也。朱子《或问》谓"格致"以及"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和"极于"位育"，枢纽不外乎"诚"。治法原于天命，圣神功化显于笃恭矣。真德秀《大学衍义》取经文二百五字，证以《典》、《谟》、《伊训》之书，《思齐》之诗，《家人》之卦，子思、孟子、荀子之说，意在正本清源。故首以"为学之要"，次乃分四大纲：曰"格物致知"，曰"诚意正心"，曰"修身"，曰"齐家"，而"治国平天下"之略缺焉。邱浚补之，因真氏所衍者，于"齐家"之下续以"治平"之要，其为目凡十有二。真氏之书，本之身家，达之天下；而邱氏之编，又将"治平"之要，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也。是则"修齐"与"治平"，岂有二理也哉？我皇上天亶聪明，日新盛德，中心无为以守至正，慎简有位以儆庶官。本至诚无息之全功，为辅相财成之盛治。岂不懿哉！

制策又以政教之美，风俗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力学乎！而因期循吏以端本善则之道，与夫董率化导之方。臣稽古者立学，所以教化斯民，使之各得其孝弟忠信之理，生其礼义廉耻之心，以全其同具固有之天良而已。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乡老以宾兴贤能，司马列辨论官材，此其选也。盖丰衣足食，既有以厚民生；礼、乐、《诗》、《书》，复有以正民德。父兄师长之训迪，耳闻目见之渐摩，奇邪之说何由得而煽惑之哉？颜师古曰：循者，顺也。上顺公德，下顺人情也。汉吏治最为近古。文翁守蜀郡，召信臣守南阳，或兴学校，或重本业，询足与黄霸、朱邑、龚遂等并传已。夫正学兴则邪说熄，官常肃则庶民从。汉宣帝诏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又曰：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是民之休戚在守令，而守令之贤否又视乎大吏之公忠体国，有以表率之。果其大法小廉，不戾于清慎勤之训，则承流宣化，夫何愧乎？而返朴还淳，又何难乎？圣天子几康用敕，德意旁敷，允厘百工，咸和万民者，甚盛治也！

制策又曰:"古无所谓兵,凡民皆兵也;无所谓将,六卿皆将也",而欲使兵归实用,饷不虚糜。此诚以兵卫民之要旨也。臣愚以为,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而无备。《左氏》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良非谬也。《周官·司马》,兵制详矣。自丘甲田赋作,而楚有"二广",晋有"爰田",于是兵民始分。汉之南北军,内兵也;有郡国兵,外之制也。《光武纪》曰:高祖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以春秋讲肄。唐府兵十人为火,火有长,三百人为团,厥制犹古。自更为矿骑而令典弛矣。宋惩唐季节度之患,改为更调,是已至元祐熙宁之间,议改议复,则柄国秉政之人异也。明五军都督府犹府兵也,一变而为团营,再变而为三大营。其制曷足贵乎?皇上神武布昭,天威震叠,八旗劲旅如虎如貔,盖从古无比也。

制策又以明刑弼教,期于辟以止辟,而又清理庶狱,愚民无知,使之格而有耻,改行迁善。此诚仁政也。臣考《周礼》狱辞之成,司寇听之,三公参听之。《秋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法纂详矣。春秋时郑有《刑书》,晋有刑鼎,法令滋烦矣。李悝者,魏文侯师也,著法六篇。萧何除参夷连坐,增部主见知等法,叔孙通又益为十八篇。汉文帝十三年,淳于公得罪,少女缇萦上书愿代,因诏除肉刑。张苍等易黥为髡,劓为笞三百,斩左趾为笞五百。酷吏重比,后世病之宜矣。我皇上明慎用刑,矜怜折狱,既协咸中之庆,更施法外之仁。非唯远迈隋唐,而刑期无刑,直媲美于虞廷矣。

若此者:崇主极以立隆,辑民情以丕变,饬戎而嘉师绥靖,敕法而明允协中,皆勤求乎上理已。然而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臣尤伏愿皇上,懋日新不已之功,成悠久无疆之治。执中含和,万福所由向用也;齐民情正,一道所以同风也。曰有御侮,师之所为以律也,念兹祥刑,讼之所由自无也。由是规万乾坤,荣镜宇宙,休风流衍,酿化懿纲,咸五而登三,畅垓而溯埏。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高准则是落实安邦大计的盛轨,提倡遵守王道是划一行为的隆规,坚持从严治军就能卫民又体现

上天爱民之意，表明对施用刑罚的慎重态度则能使国家的治理达到人民信服的程度。那些古代的帝王，继承圣学的传统，倡导播扬淳美的民风，把武力开拓疆土的功绩展布于八面边陲，使已有的法律制度严明到包含了“三宥”等规定。用来探求“危微精一”十六字心诀的本原，就获得了帝王心法之真传；观其大力推广教化，则治术更加恢宏；用来使民众情绪安定、善良百姓安乐，则军政整肃；用来区分良善之士与邪恶之徒并毫不含糊地彰善瘅恶，则刑罚公正。所以《说命》要求经常学习，敏于修身，改正错误。《洪范》主张治理民众要施行德教，以转变其人心风俗，使之与统治者协调一致。《周礼》有详细记载春季秋季集体狩猎的文字，《義易》开列了像咬嚼食物那样断案的卦象。古代帝王严于律己使广大区域都沐浴其高风而感化，通过整肃军队而使普天之下趋归于仁。用这些方面启迪万物，覆盖滋润芸芸众生，扩大和延展清醇的民风，阐明纷繁的事理，流布不绝的福祚。那是何等高尚而久远啊！

敬思皇帝陛下，与天地并列而建立最高准则，凡事执其两端而用其中道，善于体察而又勇于实行，将恩德遍施千家万户，把威武之师整顿得纪律严明，虽有刑罚而无须动用。诚然已是上天赐福回应多而且最好的福祉正在聚集，天下万类蕃昌，百姓共庆升平了。然而皇上睿智之心如此谦虚，深思长治久安的方略，更勤于如何持盈保泰之考虑。于是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圣学、教化、讲武、慎刑诸大政。以臣下我的愚昧无知，如何能知其大体与精要？正譬如尘土细流怎能有补于山海之高深？但鉴于应对已经开始，便窃自附和“事先提供献策”的古训。既已敬承清详询问，又怎敢不勉述昔日所闻，备陈诵习所得，献上一点管窥蠡测之见，以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忱呢？

伏读策问诏书而得见其上说：《尚书》为传授心法的重要经典。二帝三王以来，君臣互相儆戒。随后又涉及心法与治法的精髓和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的确体现了措置政务付诸施行的要义。臣下我谨按：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已经太久远了。故而孔子删定《尚书》，上限断自唐、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等十六字乃是千百年来帝王们传授心法的要诀。所以《尧典》在篇首介绍帝尧时用的第一个词是

"恭谨",而《益稷》的最后一个词也是"恭谨"。《舜典》说:"温和、恭敬,诚信充满天下。"又说:"慎重地推行和完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教。"《皋陶谟》说:"君臣要互相敬重和谐团结。"又说:"要慎重于自己的言行,考虑把国家治理长久进行下去。"《大禹谟》说:"君能吃苦方成其为君,臣能吃苦方成其为臣。"以及商汤的"在睿智和恭敬上日日提高",周文王的"学问大放光明",周武王的"保持强盛"。他们之所以整日孜孜不倦、兢兢业业而顾不上吃饭,不仅由于身为人主者的统治方略高明,也因为那些处在赞襄和燮理者地位上的人臣对天下治乱分担有责任。《洪范》提出的九大法则,是为君主赐给天下人的最高行为准则而设布的,其中"用五事"三字之前特别加有一个"敬"字。《中庸》一书,是阐述圣道盛大的一部经典,而它在陈述了治理天下国家的九条常道后又将其归结为一个"诚"字。上天生育万民并设立君主令其管理看护他们,人君唯有敬天而勤于民事,才能使天帝欢心,从而聚合并承接起统治权力。又由于君主一人不可能独理民事,故又为其配置左辅右弼,前疑后丞,朝内则设有六卿,朝外则设有州牧侯伯。他们惟有敬慎地办理民事以辅助天上的有关职司,方能受到君主的眷顾,获得大官职和大奖赏。张蕴古的《大宝箴》和李德裕的《丹扆箴》,前者严肃地儆戒帝王不可沉缅于奢靡与声色,后者胪陈了关于帝王夜晚办公、身着正服的主张。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提出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十二则,都是依据十六字心传来阐明治道的。朱子《或问》认为《大学》中自"格物致知"直到"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中庸》里从"中和"直至"位育",关键不外乎一个"诚"字。如果说治法原出于天命,那么圣神功化就显现于诚笃恭敬了。真德秀《大学衍义》选取属于经文的二百零五字,参证以《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皋陶谟》、《大禹谟》和《伊训》,《诗经》中的《思齐》诗、《易经》中的《家人》卦,以及子思、孟子、荀子之说,意在正本清源。故以"为学之要"为起始然后才分列四大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则不谈。后由邱浚补齐。他顺着真氏所作的推衍,于"齐家"之下续以"治平"要义,共列出十二目。真氏之书,立足于修身齐家,通达于治

国平天下。而邱氏增编本，又依据“治平”要领，收取“格致、诚正、修齐”的功效。如此看来，“修齐”与“治平”难道不是同为一理吗？我皇上天资聪明，日新盛德，内心清静无为以保持极度的纯正，慎选高位大吏以儆戒百官，依凭至诚不息的完善修养，造成了辅助天地、裁制生成万物的兴盛之治。岂不美哉！

策问诏书又认为政治和教化的美好，以风俗为先务。君子如欲教化人民美化风俗，就必须大力兴办学校吧！并因此而期望为官者都致力端正根本、完善法度的做法，以及对百姓的管理化导之方。臣下我考察古时设立学校，是用以教化人民，使之各自获得孝悌忠信之理，萌生礼义廉耻之心，以完善其固有同具的天良的。故而家设有塾，党设有庠，州立有序，国立有学。乡老按贵宾礼仪来推举贤能之士，司马来衡量他是否具有为官之才，这是在施以教化的基础上来选举人才的情况。如果既能使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又能用礼、乐、《诗》、《书》的教育来端正其道德，加上父兄师长的训导启迪，耳闻目见的步步影响，怪诞淫邪之说怎么可能煽惑他们呢？颜师古说：所谓“循”，就是“顺”。顺即上顺公德，下顺民情。汉代的吏治最接近上古。文翁作蜀郡太守，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或兴学校，或重本业，确实足以与黄霸、朱邑、龚遂等名臣并传呢！自古正学兴盛则邪说止熄，官吏忠于职守则庶民服从。汉宣帝的诏令说：庶民之所以安于其田间乡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行政公平，讼狱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与我共同担负这一责任的，是那些优秀的郡国长官吧！又说：安静之吏，至诚无华。其政绩按日统计嫌不足，按月统计则有余。所以庶民的悲欢取决于是否有好的郡守县令，而守令的贤能低劣又要看大吏是否公忠体国，为其作出表率。果真能大官循法，小官守廉，不违背“清慎勤”的为政准则，那么承奉朝廷旨意进行化导，又怎么会感到惭愧呢？而使之返朴归淳，又有何难呢？圣天子高度注意居安思危，德教之意广为传布，使百官得到治理，万民相处和睦，真是少有的盛世之治啊！

策问诏书又说：古代无所谓“兵”，凡民皆为兵；无所谓“将”，六卿皆为将，并想使兵归于实用，军饷不致虚耗。这的确是以兵卫民的要

旨呢!臣下我的愚见以为,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准备。《春秋左氏传》说:无准备无预测,不可以用兵。这话是很不错的。《周礼·司马》对兵制规定得够详细的了。自从按丘出甲士按田亩征军赋的制度实行后,便有楚国的"二广"制,晋国的"爰田"制,于是兵与民始行分离。汉代的南北两军,是"内兵";此外有郡国兵,属于"外兵"的建置。《后汉书·光武纪》说:汉高祖曾命天下郡国挑选能拉开硬弓、才力武猛之士,组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兵种,定于每年立秋后讲习训练。唐代府兵每十人为一"火",设有"火长";三百人为一"团"。其制尚合古意。自从改为矿骑后,原来的好典制便废弛了。宋代鉴于唐末节度使的祸害,改为"更调"之制。到元祐、熙宁之间,时而议定更改兵制,时而议定恢复原制,那是由于当国秉政之人不同的缘故。明代的五军都督府犹如府兵,但后来却一变而为团营,再变而为三大营。其制度又何足宝贵呢?皇上神武布昭,天威震撼,八旗劲旅如虎如貔,真是自古无双啊!

策问诏书又依据明察刑狱可以辅助教化的道理,期望达到以刑止刑之目的。且又下令清理庶民犯法的罪案。并指出愚民无知,重要的在使他们懂得顺从,产生廉耻之心,改变恶行迁归良善。这的确是行仁政呢!臣下我查考《周礼》的有关规定是,审判材料写成后,由司寇终审,三公也参与终审。《周礼·秋官》还规定了在断狱量刑中要实行"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等制度。可知当时法制已很详备了。春秋时郑国公布了《刑书》,晋国铸了"刑鼎",法令就变得又多又乱了。李悝为魏文侯之师,著《法经》六篇。萧何删除其中的"参夷连坐"法,增加"部主见知"等法,叔孙通又增益为十八篇。汉文帝十三年,淳于意因公事获罪,其小女缇萦上书表示愿意代父受刑,文帝因而下诏废除肉刑。张苍等改黥刑为髡刑,改劓刑为鞭笞三百,改斩左趾为鞭笞五百。酷吏们一味从重比照用刑,无怪乎要引起后世的责备了。我皇上严明慎重地使用刑罚,怀着怜惜之心来折断讼狱。既处置得当而百姓获福,更施加法制之外的仁慈精神。不仅在这方面远远超过隋唐,而且就"用刑期于无刑"的宗旨来看,简直可以媲美于虞舜了!

像以上这些问题:尊崇君主的最高准则而使国家制度长久兴隆,统一人民的情感而使风俗大变,整饬军队而使善良的百姓安定,慎重修订法律并使刑罚的施用准确公正合乎中道。这些都是勤勉地追求最佳治理的表现。然而国治应益求其治,邦安宜更求其安。臣下我更敬望皇上不断加强日新其德的修养,成就悠久无疆的盛治。遵守中正之道,含藏和协之心,使万种福祉因此而变为现实。整齐民心,矫正人情,通过划一道德规范来同化风俗。为了有效地抵御外侮,而强化对军队官兵的纪律约束。考虑慎重地施用刑罚,使百姓感念这种"祥刑"而自觉守法,讼狱因之自然消亡。以此规范乾坤,光照宇宙。美善之风流布延展,直上九重天而延及于八疆;民俗淳厚,纲常懿美,直可并列于五帝三王之世。那么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永福便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祝庆蕃　殿试对策

祝庆蕃(生卒年不详)　字蘅畦,河南固始人。嘉庆十九年(1814)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俟考。

臣对:臣闻建极所以绥猷,观风所以成化,揆文者政兼奋武,弼教者道在明刑。逖稽载籍,《易》著健行之训,《书》传康保之经,《诗》赓整旅之章,《礼》纪参听之命。备哉灿烂!崇闳之式也。自古帝王,斟元御宇,握镜临宸,宥密有基,化成有道,训练有法,简孚有稽。悉本乎虔巩之一心,以为之弥纶于六合。用是惟精惟一,渊修劭焉;防伪防情,陶铸宏焉;载戢载橐,懿德求焉;克明克允,咸中庆焉。所为扬骏业、畅鸿庥、奉三无而式九有者,汪汪乎丕天大律,振古之上仪也。

钦惟皇帝陛下,治炳勋华,道光谟烈,固已握符式焕乎瑶图,敷教聿光乎玉镜,戢武而烽销于火堠,陈臬而讼息于金科矣。乃睿怀冲挹,不遗细微。廛衢室之畴咨,冀葑菲之可采。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宅心、型俗、经武、恤刑诸大端。臣占毕庸愚,乌足以知体要?顾幸际

广思周逮之时，窃附于拜献先资之义，敢不敬述平日所诵闻者，用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尚书》为传心要典"，而勤思夫帝王诚敬相通之旨。此诚治平之要道也。臣惟帝王建中立极，不外主敬；主敬之功，不外存诚。《洪范》九畴，次五曰建用皇极。说者谓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协之以"五纪"，皇极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验之以"庶征"，劝惩之以"福极"，皇极所以用也。朱子《或问》谓《大学》自"格致"以及"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自"中和"以迄"位育"，枢纽不外乎"诚"。诚敬立，则中之理得而极可建矣。此与《尚书》"钦明"、"温恭"、"慎修"、"克艰"、"孜孜"、"兢兢"君臣交儆之言，相发明也。人君缉熙单心以敬天位，有体天出治之权，即有代天养民之责。而人臣熙绩亮工，宣德威则曰为天吏，备公辅则曰任天民。无一不本于天，则无时不主于敬。严恭寅畏敕其几，辅相裁成宏其化，修身行政，胥由乎此。盖勤政即以养民，养民即以敬天；慎德即以诚民，诚民即以永命。天人之应，诚敬之符也。彼夫张缙古《大宝箴》，著物侈声淫之戒。李德裕《丹扆箴》，胪辨邪纳诲之条。邵子《皇极经世书》，君道臣道，言之详矣。真德秀《大学衍义》，大旨在正本清源，而"治平"之略缺如。明邱浚仿其义从而补之，为目十二，则又羽翼夫真氏之书者也。皇上体天行健，自强不息。凡用人行政，无不根于诚敬以绥猷。于古帝王之心法治法，旷世相符；道统与治统，一以贯矣。

制策又以"政教之美，风俗为先"，而因询夫启聋振聩、敕法除奸之道，以责成于官吏。此端本善则、化民成俗之极轨也。臣思先王之治，"六礼"以节性，"八政"以防淫。所以积基树本、经纬礼俗、节理人情、勤恤民隐者，莫不以风俗为先务。而风俗之成，在于重本业而兴学校。农桑者，衣食之原，四生遂而民给其欲矣。《诗》、《书》者，德义之府，四维张而民厚其性矣。《书》曰"既富方谷"，又曰"资富能训"，胥是道也。盖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古昔盛时，崇德行之修而贤能者兴之，严奸伪之禁而匪僻者诛之。凡以使愚蒙者知所劝，而顽戾者知所惩也。虽然，正学兴则邪说

熄,亦必官常肃而后庶民从。则又在承流宣化者之以实心行实政。如文翁之兴学,龚遂之劝农,信臣有召父之称,卫飒修庠序之教,许荆为桂阳守而教民以礼,仇览为蒲亭长而化民以德。居官者不敢因循疲玩,姑息以养奸;为吏者不敢贪利徇私,舞文以玩法。用以张仁让之闱,杜华竞之津。驯至化格三雍,人从五典,道德一,风俗同矣。圣天子设奇邪之禁,严左道之诛,选帅以除奸宄,择吏以安善良。使邪说不得诬民,各敦礼义之经,不且回心而向道哉!

制策又以古者凡民皆兵,六卿皆将,后世兵民始分,而详稽夫历代兵制。臣考三代之隆,伍两卒旅即民为兵,蒐苗狝狩因隙肄武,太平之时不忘战备,制诚善矣。春秋时已离兵民为二。汉初南军卫宫城,北军卫京师,得内外相维之道。武帝时番上变为长屯,光武时长屯变为远征,兵法以坏。唐置府兵,统驭有法,更代有时。有事命将帅之以出,事解辄罢。将无握兵之重,兵亦未尝无事而食。后更矿骑,其法浸坏。宋统外兵于枢密,总内兵于三卫。其制有厢兵、禁兵、蕃兵、乡兵之目。统计天下之兵,京师居其半,内外轻重,适得其宜。后厢兵既多,县官坐受其困,此孙洙、苏洵所以议之也。明设都督于京师,设卫于畿甸,设指挥使于四方,军士俱有定数。日久就窳,于谦汰其老弱,得胜兵十五万,改为团营,体统相维,号令归一。嗣后或废或置,浸易其制焉。圣世文德武功,渐被中外,夫岂汉唐宋元明所可相提并论哉!

制策又以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欲民之不犯有司。臣考"五刑"见《舜典》,然所谓"五"者,亦无明文。周制立,而司寇"三典"、司刑"五刑",法綦备焉。魏李悝《法经》六篇,律例之书所自始。汉除苛政,萧何定律,叔孙通益律所不及者傍章八篇,然犹袭秦气象。文帝除肉刑,景帝减笞法。隋文帝命高颎定新律,刑名有五。后又敕苏威更定新律五百余条,其法简要。唐因隋制,稍为增损。宋窦仪重定《刑统》,一因唐制,参酌详备,世称平允。太祖立折杖之法,令详覆之议,缓故纵之诛,重误人之罪,严留滞之罚,怒不当之谴。立法既宽,立心更仁。明刘惟谦等造律文,篇目本于唐条例,因时损益焉。御制《明慎用刑说》,慈祥恺恻,蔼然洽于民心。凡内外秉宪之臣,宜何如

慎重以共襄郅治乎!

若此者:天禄石渠不足言典学也,雉驯乌集不足言时雍也,六术五权不足言兵机也,金鸡木鹤不足言钦恤也。茂矩崇仪,蜚声腾实,综万古而集其成者,仁圣之事赅焉,而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我皇上至诚无息,立政有恒。主德懋而弥切寅恭,民风淳而不忘申儆。止齐已习,尤思整饬之方;威德允怀,益致聪明之用。案经校德,成袭六为七之书;稽古论功,跻咸五登三之盛。繇是协气旁流,淳风四溢,荣镜宇宙,经纬乾坤。扇巍巍,显翼翼,总八方而为极,猗欤盛哉!绵区饮化,匝宇归仁。则我国家申锡无疆之庆,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高准则是用以落实安邦大计的,观察民风是为改善民俗作准备的,设置主管文治官员要在政务中兼顾振兴军事,辅助教化的途径在于明察刑狱。查阅古籍,《易》彰明帝王像皇天那样刚健运行的教训,《书》留传关于保民因而安康的法则,《诗》接连载有整治军旅的诗篇,《礼》记录了三公参予审理讼狱的政命。这些灿烂崇宏的范式,是多么完备啊!自古以来,帝王们斟酌元气化育,统御天下,手握明镜登临皇位,无不在宏深而静密地积累德行上有根基,在教化民众完善风俗上有方法,在训练军队上有法度,在推断讼狱的实情上有依据。这都本着恭敬坚定之一心,用它来统摄天地四方。因此精心一意于心法修养,就达到深厚而加以弘扬的程度;倡导去伪存真的民风,从而陶冶天下人;收藏起干戈弓箭,追求美好的德政;坚持明慎用刑,公允断狱,全都处置得当而百姓获得幸福。由此振扬大业,扩大洪福,尊奉"三无"而规范九州之事,都是奉行上天赐给的治世大法,属于自古以来的最高法则。

敬思皇帝陛下,治绩比唐尧虞舜还辉煌,大道辉映前代的谋略功业,原本上已是手握《易》卦法式而超过了神图,广泛施布教化而照耀在玉镜上,止息干戈则能令狼烟消除于烽火台,设置法律的效果则讼狱止息于金科玉律之下了。然而陛下睿圣心怀如此谦虚,且不遗细微。像尧舜那样勤勉访求于衢室,希望得到哪怕是点滴的可采纳之建

议。因而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居心、正俗、治军、慎刑诸大事。臣下我只会背诵经书，学识庸愚，何足以知其大体与精要？但既幸遇集思广益之时，自当附从“事先提供献策”之义，怎敢不敬述平日诵读见闻之所得，以此奉献土壤细流般微小的一点帮助呢？

伏读策问诏书而见其上说：“《尚书》为传授心法的重要典籍”，因而勤于思考帝王在“诚”与“敬”上相通的原理。这确实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途径。臣下我认为，帝王倡导中正建立最高原则，不外乎主敬。而主敬的基本功，又不外乎存诚于心。《洪范》提出的九种治理天下的大法，第五种讲的就是建立和实行至高无上的准则。解说经典者认为根据水火木金土这五种可利用的基本物质，恭行“貌”、“言”、“视”、“听”、“思”等五方面的事情，重视“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八方面的政事，并配合使用“年”、“月、“日”、“星辰”、“历数”五种记时方法，这些就是构成君主最高准则的基本内容。而用刚柔适中、以刚取胜和以柔取胜三种办法来治理臣民，用占卜等解决疑难问题的办法来使君王自己明白某些国事的可行与否，用各种不同的气候征兆来检验君王为人处事是否圣明，用五种幸福和六种恶运来劝勉臣民为善，儆戒人们为恶，这些就是最高准则的功用。朱子《或问》认为，《大学》从“格致”直到“治平”，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中庸》自“中和”起至“位育”止，关键不外乎一个“诚”字。诚敬二字树立起来，那么中正的道理便可获得，最高准则便可建立了。这与《尚书》中的“钦明”、“温恭”、“慎修”、“克艰”、“孜孜”、“兢兢”等君臣交相儆戒之言是互相阐明的。人君竭尽心力坚持学习，恭敬对待上天所赐之位，有体会天意出而治理万民之权，即有代天养民之责。而人臣兴办民事辅助天上的有关职司，宣播德政刑威时便说这是代表天吏，身居三公辅臣时便说是在任用天民。既然无一事不依据于天，那就当然要无时不主于敬。严谨、恭谦、敬畏而戒饬危险苗头，辅助天地和裁制生成万物而扩展那化导，修身行政，这都是必由之路。实际上，勤政即为养民之途径，而养民即是敬天之表现。慎于修德便可以和洽人民，和洽了人民便可以使国运长久。所以天人之间的积极感应，是人间君臣讲求诚敬的象征。张蕴古的《大

宝箴》,明确提出了对帝王侈于物欲、淫于声色的警戒。李德裕的《丹扆箴》,胪陈了帝王辨识淫邪、采纳忠告的建议。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对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更是言之详备。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大旨在于正本清源,故而将"治平"方略付之缺如。明人邱浚仿其原义增补它,开列了十二目,这样又完善了真氏之书。皇上体察天意,躬行刚健,自强不息。凡用人行政,无不根基于诚敬而作出重大部署。在心法与治法方面,与古帝王旷代相契合。在道统与治统方面,更用一个总原则而加以贯通了。

策问诏书又认为:"政治与教化的美好,以风俗为其先务",并为此而询问在官吏中启聋振聩、严法除奸之道,以便责成他们取得政绩。这确是端正根本完善法度、教化人民美化风俗的最好途径。臣下我想到以往的帝王治理天下,以"六礼"节制臣民的性情,以"八政"防止人们行为的过分。在为积累基础树立根本、规范礼仪习俗、调节理顺民众情绪、尽心体恤民间疾苦而采取的措施中,无不以转移风俗为先务。而好风俗的形成,在于重视农业和兴办学校。种田养蚕,是衣食的来源。各种生物生长顺利,那么人民的生活需求就能得到满足了。《诗》、《书》,是德义的府库。礼义廉耻"四维"张设,那么人民的性情就淳厚了。《尚书》说:"已富之后方能向善"。又说:"助其致富后方能教训他们"。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因为质朴谓之"性","性"非教化不能养成;人欲谓之"情","情"非制度不能节制。古代兴盛之时,崇尚德行修养而使贤能者升用,严设奸伪禁令而使行为邪僻者受到处罚。用这两方面的措施,使得愚昧者知道应当怎样修德行事,而顽固乖张者也知道哪些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虽然正学兴就会邪说熄,但也必须要官吏严守为政常道而后庶民跟从。而这又在于担负着承奉朝廷旨意进行教化的人能以实心行实政。例如汉代名臣文翁的举办教育,龚遂的鼓励耕作,召信臣为民兴利而被百姓尊称为"召父",卫飒改进地方学校教育,许荆做桂阳太守时以礼教民,仇览当蒲亭长时以德化民。如此,则居官者不敢因循疲玩,姑息养奸,为吏者不敢贪利徇私,舞文玩法。因而使仁义礼让之门大开,浮华奔竞的渡口关闭。渐至教化在各类学校遍布,人民遵守五常之教,道德齐一,风俗

趋同了。圣天子设置对怪诞邪僻之说的禁令，强化对左道旁门的惩罚；慎选将帅以除奸宄之徒，严择官吏以安善良民众。从而使邪说不得欺骗人民，百姓都遵守礼义的规范。这样一来，便是那些奸邪之徒，有的不也会回心而向道吗？

策问诏书又认为古代全民皆兵，六卿均为将帅，至后世兵民始行分开，而详考历代兵制。臣下我考察三代的兴盛阶段，伍两卒旅这一套军事组织也就是全民皆兵。每年四季当中都集体狩猎，利用农闲讲习武事，太平之时不忘战备，确实是个好制度。春秋时已将兵与民分离开来。汉初南军守卫宫城，北军守卫京师，合乎内外相制之道。至汉武帝时把番上兵变为长屯兵，光武帝时把长屯兵又变为远征兵，兵制由此而坏。唐朝建置府兵，统驭有章法，轮流代替有定时。有事时指派将领统兵而出，事完后总是即行罢兵。将领不会握兵自重，士兵也不曾无事而坐食军粮。后来改为矿骑，其制渐坏。宋代将外兵统辖于枢密院，内兵总领于三卫。其建置有厢兵、禁兵、蕃兵、乡兵等名目。当时统计天下之兵，京师占其一半。内外轻重，适得其宜。后来厢兵多了，朝廷坐受其困，因此受到孙洙、苏洵的批评。明代设都督于京师，设卫于京畿郊外，设指挥使于四方，军士俱有定数。但日久仍归于腐败，于谦淘汰其老弱，选留强盛之兵十五万，改为团营，体制相维，号令归一。嗣后团营时废时置，逐渐制度被改变。我大清圣明之世文德武功延及中外，岂是汉唐宋元明所能相提并论的呢？

策问诏书又根据皋陶做主管刑狱的士师时，能明察刑狱以辅助推行五种德教，而欲使庶民不再触犯法律。臣下我查考“五刑”一词最早见于《舜典》，但关于五刑的具体名称，当时亦无明文。到周朝制度建立，于是有了司寇所掌管的“三典”，司刑所掌管的“五刑”，法制极为详备了。魏国李悝的《法经》六篇，为律例之书的肇始。汉代废除苛政，由萧何制定刑律，叔孙通增益该刑律所未涉及的旁章八篇，仍留有秦法的气息。汉文帝废除肉刑，汉景帝削减笞刑条例。隋文帝命高颎定出新刑律，刑罚名称有五种。后又敕命苏威改定新律例五百余条，其法简要。唐沿隋制，稍加增减。宋朝窦仪重定《刑统》，全部沿袭唐制，参酌详备，世称平允。宋太祖定立折刑为杖责之法，下令有

关部门对讼狱要详细审察、认真复议，放宽对官吏断狱时犯所谓“故纵轻判”罪的处罚，加重对官吏误审错判的惩治，强化对讼狱拖延不报的处分，并对量刑不当加以愤怒处罚。立法既宽，居心更仁。明代刘惟谦等编制的律书，其篇目基本依照唐朝条例，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了一些增减。皇上御制《明慎用刑说》，慈祥恺恻，蔼然合乎民心。凡内外执法大臣，宜如何慎重于刑罚之事以共同辅助大治啊!

像以上这些问题:历史上的天禄阁、石渠阁这类文化设施不足以谈论我朝的天子之学，驯雉集乌之类的瑞应不足以谈论我朝的社会和睦，兵家的六术五权不足以谈论我朝的兵机，经常大赦天下者不足以谈论我朝的慎刑恤罚。制度繁茂，礼仪崇隆，飞扬仁德名声，腾驰隆盛业绩，综集万古之大成，仁圣之事全包括了，帝王之道都具备了。臣下我更伏愿我皇上至诚不息，立政有恒。圣德已茂而更讲敬恭，民风已淳而不忘申儆，军队已训练有素又进而考虑整饬之方，刑威公允让人感怀恤刑的德政时，更加督励各级官员为准确公平地决断讼狱而奉献聪明才智。依照经籍校正品德，继“六经”之后写成第七部儒学经典;考察古代帝王评论其历史功绩，使自己治理下的盛世达到能与五帝三王媲美的境界。由此协和之气遍流，淳厚之风四溢，光耀宇宙，规范乾坤。弘扬隆盛功业，播布盛大威名，总合八方而建立最高主宰地位。这是何等美好啊!广大区域都闻风感化，普天之下都趋归于仁。这样，我国家得天恩赐而无疆之幸福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伍长华　殿试对策

伍长华(生卒年不详)　字实生，号云卿，江苏上元人。嘉庆十九年(1814)探花。历官云南布政使、湖北巡抚。对西南铜矿衰旺及久积弊端，颇为明了，曾著《云南铜法志》。擅画花卉，兼工行书和楷书。

臣对:臣闻建极所以绥猷，抚国在乎善俗，足兵斯能御侮，恤民莫

如慎刑。帝王寅承宝命,本内外交修之实,握天人协应之机。以勤宥密,道统接夫百王;以广训行,善教周夫四国。以昭震叠,义著于怀德畏威;以示矜全,道凛乎明刑弼教。是以《诗》歌敬止之文,《书》纪安民之语,《易》系师贞之吉,《礼》详疑狱之辞。综搜载籍,主术懋而日月就将,民俗和而鼓钟乐育。下有奋武揆文之慕,上呈刑清政简之风。所由规矩乾坤,陶甄品汇,胥一世而跻之仁寿者,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备中和,治臻安阜,则古圣以同民,本至仁以育物。固已万几兢业而康乐成书,九有乂安而循良奏绩矣。乃圣怀冲挹,蓂荚无遗,既观民而设教,复询事以考言。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敕宸修、培世教、严军制、恤民命之至计。如臣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先资拜献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人君敬天以勤民事,人臣敬事以亮天工",而因揭夫帝王诚敬之实学。臣谨按:二帝三王之学,莫备于《尚书》。而曰钦,曰恭,曰慎,曰克艰,曰孜孜,曰兢兢,与《洪范》、《中庸》诚敬之旨,固有辞异而理同者。盖圣贤传心之要,不出一"中";建中之矩,不出一"敬",主敬之本,不出一"诚"。自来尧之"钦明",舜之"浚哲",禹之"祇台",汤之"日跻",文之"缉熙",武之"执竞",固从心道授受之,后代为传述而归于一致。正不徒二《典》以"钦"始,三《谟》以"钦"终,详见诸唐虞之世也。他如李德裕《丹扆箴》有宵衣正服之条,张蕴古《大宝箴》著物侈声淫之戒,与《皇极经世》同征典懋。朱子《或问》谓《大学》"格致诚正"以及"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谓《中庸》"中和位育"极之"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心法治法,道无不赅矣。真德秀《大学衍义》,取经文二百五字,证以《尧典》、《皋陶谟》、《伊训》之书,《思齐》之诗,《家人》之卦,子思、孟子及诸儒之说,意在申明为学致治之本,而"治平"之略缺焉。然以正本清源之意,举"格致"、"诚正"、"修身"、"齐家",分为四大纲,于家国天下相通之理,固自分明。而措则正,施则行,未始不由渐而至以成为正直荡平之化也。我皇上大德懋昭,登三咸五,几康是敕,夙夜维寅,治象炳于万方,风教达乎四表,巍巍乎锡极之隆仪,万福所由以向用也。

制策又以“政教之美，风俗为先”。此诚保邦制治之要也。臣考《礼记》云：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古人维持风化之原，始于学校。辟雍泮宫，天子与诸侯同其制；庠序校学，在乡与在国明其伦。凡以孝弟忠信，礼仪廉耻，固有之良心，虽至愚亦有其几希。日引而近之，则春秋冬夏得习于诵弦；日推而远之，则谗慝诈伪相流于怪僻。《王制》立升乡选士之法，而节民性，兴民德，一道德，同风俗，所以讲明而肄习之者至备。驯至移左移右可以不行，行伪言伪可以不虑，皆此道得也。后世青衿有诗，乡校议毁，民不知所率从矣。而文翁、召信臣辈行之于汉。当时美治行之异，史策流循吏之声，学之于人重矣。然则邪说之兴，由于正学之未讲。官常之肃，可征庶民之皆同。公卿大夫所使承流而宣化者，日与此无知之民优柔渐渍，纳之于轨物之中。由此《诗》、《书》足以涵养其性情，忠孝足以感发其志气。兴贤兴能之盛，可以进万民而讲三物。而又矢勤慎于厥躬，汰贪风于下吏。将见启聋振聩，敕法除奸，大道之行，三代之英，由此其选。谁谓积重之势固难返者乎？方今海宇安平，民人亲逊。睿谟筹画，犹以化民成俗为要图，民所为涤瑕荡秽于勿替也。

制策又以兵归实用，饷不虚糜，而因本《周官》以求历代之制。考古者寓兵于农，蒐苗狝狩，皆于农隙以讲武事。自邱甲田赋之法日紊，楚有“二广”，晋有“爰田”，法制纷如矣。管子作内政，寄军令，兵农始分。至于战国，而其风益肆。汉初南军以卫宫城，北军以卫京师，得内外相制之道。唐置府兵，有事则命将以出，无事则罢。后一变为矿骑，再变为方镇，其制悉坏。宋统外兵于枢密，总内兵于三卫。明京畿兵约五十万，锦衣十二卫，留守十八卫。他如蓟辽、大宁诸司等卫，即汉募民实塞下之遗意。然自唐宋以来，专用募兵，而游手无藉之人应募以滥入焉。养兵之费日浩，得兵之用益难度。惟是平时游惰之民不以募补，杂色服役之人不至滥充，因之禁怠荒，程技艺，步伐止齐之节娴习既精，则人情不扰而武备已修，于设兵卫民之意，乃得以收其实用耳。圣朝承平化洽，四海敉宁，投戈脱剑之下，输诚者亿万计。然犹训谕屡颁，殷殷以简阅为念。属在将弁，孰不鼓舞而振兴也哉！

制策又以明慎用刑，期于辟以止辟，而因求清理庶狱之计。臣惟

虞之时兵刑之官合为一,周之时兵刑之官分为二,两朝似有不同。然作士之命,始于《虞书》。嗣是狱辞之成,司寇听之,三公参听之,《周礼》遂因而制典。其载之《秋官》者:耳目气在所必听,亲贵故在所必议。而群臣、群吏、万民详于"三刺",不识、过失、遗忘详于"三宥",幼弱、老耄、蠢愚详于"三赦",所慎无遗矣。春秋时《刑书》刑鼎,法令滋彰。至李悝、萧何、叔孙通之徒从而益之,而篇目更繁。以汉文之深仁,除肉刑而代以髡笞。而深文酷吏,不晓大义。迨乎魏晋,此风不衰。惟隋唐以来制五刑,上法有虞,其庶乎鞭朴流宅之遗风。而上有好生之主,下有协中之臣,则惟有虞氏独隆焉。伏读御制《慎刑论》,往复重申,戒喜怒之无纵,惟轻重之得中。更恭绎御制《息讼安民论》,仍本慎刑之意,推原勤政,非治民之要道欤!

若此者:基命以单心,移风以易俗,制军以示武,敕法以明刑。洋洋乎畅九垓而溯八埏,盖亘古而立极也。臣尤伏愿皇上,懋持盈保泰之怀,臻屡洽重熙之盛。时几已敕而益亹明聪,礼俗已成而愈勤化导,戎兵已诘而更切怀柔,庶狱已平而弥存钦恤。圣敬之功精焉,於变之风广焉,止暴之规具焉,无讼之化远焉。披金绳,光玉镜,总八方而为极。于以鼓铸生灵,弥纶宇宙,开骏发之远祥,固保定之大业。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视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高准则是用来落实安邦大计的,安定国家在于美善其风俗,拥有足够的军队方能抵御外侮,体恤人民最重要的是慎用刑罚。自古以来,帝王们恭敬地接受天赐宝命,依靠内圣外王修养的实效,把握天人协和感应的良机。用来勤于宏深静密地积德,从以往百王那里接续了帝王道统;用来推广道德教化,使得善行之教传遍四方郡国;用来显示军事震慑力量,使周边部族在道义的感化下表现为对中原皇朝的怀德畏威;用来严格实行正确施用刑罚以辅助教化的原则,表明了怜惜保全民命之心。因此,《诗》歌咏至敬的文字,《书》记录安民的话语,《易》列示军队端正的吉利卦义,《礼》详陈如何决断疑狱的言词。综览搜寻群书所载,可知君主统治

方法兴盛而学问不断积累，民间风俗和睦而学校使人愉快地受到教育。下有振武治文之向往，上呈刑清政简之风尚。这些正是帝王赖以规范乾坤、造化万物，使全社会步入仁德长寿境地的根由。

敬思皇帝陛下，圣德完备到了“中和”的境界，对国家的治理达到了使民安物富的程度，带头学习古代圣贤以使万民同风，本着至仁之心而使万物化育。当然已是日理万机而仍兢兢业业，人民安乐足可载入史书，九州安定而循吏良将奏报政绩武功了。然而圣君之心如此谦虚，细微得点滴无遗。既观察民情而设立善教，又垂询国事而斟酌所得之建言。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关于加强帝王的自身修养、培植社会教化、严密军事制度、恤惜民命等方面的最好方略。像臣下我这般愚昧，如何能足以知其大体与精要？但当此事先提供献策之时，敬思“敷奏以言”之义，怎敢不勉述平日诵习所得，奉献一点管窥蠡测之见，借以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忱呢？

伏读策问诏书而见其上说：“人君因敬天而勤于民事，人臣以敬事来辅助天工”，随后揭示了帝王讲求诚敬的实学。臣下我谨按：关于从帝尧到周武王的二帝三王之学，最详备于《尚书》。而他们所倡导的“钦”、“恭”、“慎”、“克艰”、“孜孜”、“兢兢”，与《洪范》、《中庸》所主张的“诚”、“敬”，本有辞异而理同之处。因为圣贤相传心法的精要，不外乎一个“中”字；树立此“中”的法则，不外乎一个“敬”字；恪守此“敬”的根本，不外乎一个“诚”字。唐尧的“恭敬圣明”，虞舜的“聪明睿智”，夏禹的“敬修己德”，商汤的“日日进步”，周文王的“学问光明”，周武王的“保持强盛”，这些本来是通过心道相传的方式来授受的，后代为了传述的需要而将其归于一致。这种情况并不仅仅表现在《尧典》、《舜典》均从“钦”字开始，《皋陶谟》、《大禹谟》、《益稷》这“三谟”均以“钦”字结束而详见于唐虞之世。其他如李德裕的《丹扆箴》有帝王夜里办公、身着正服的条陈，张蕴古的《大宝箴》明写着帝王不要铺张浪费、溺于声色的告诫，与《皇极经世书》同样证明它们都很典正深广。朱子《或问》认为《大学》自“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认为《中庸》自“中和位育”及于“圣神功化”，关键不外乎“诚”。关于心法与治法的修养之道，二书的确是讲得很完

备的。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特取属于经文的二百零五字,证以《尚书》中《尧典》、《皋陶谟》、《伊训》,和《诗经》中《思齐》诗,《易》中的《家人》卦,还有子思、孟子及诸儒之说,意在申明为学致治之本,因而将"治平"方略付缺。然而该书本着正本清源之意,标举"格致"、"诚正"、"修身"、"齐家",分为四大纲,对于家国天下相通之理,诚然是自形分明的。而措置政务付诸施行,也未尝不是由渐进而形成王道正直坦平之化导的。我皇上大德茂昭,可并列于五帝三王;防微杜渐,早晚惟守虔敬;治国成效光照万方,以德化民远达于四方极远之地。真是赐给天下最高准则的盛大典制,万种福祉因此而归于实用。

策问诏书又认为:"政治与教化的美好,宜以风俗为先务"。这确实是保邦施治的要道哩!臣下我查考《礼记》上说:家设有塾,党设有庠,州设有序,国设有学。古人维持风俗教化的根本措施,始于学校。"辟雍"与"泮宫",是当时天子和诸侯各在京城和国都之郊设立的大学,名称虽异而制度相同;庠、校和序、学,分别办在党、乡、州、国,但其宗旨都是宣明伦理。大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人所固有的良心,虽至愚之人也还能自我发现。日日引导、接近他,则使其春秋冬夏都能读书学习;日日推开、疏远他,则谗言、恶念、欺诈、奸伪将包围他,把他引向怪诞邪僻。《王制》定立由乡逐级选士之法,对于如何节民性、兴民德、统一道德规范、同化风俗等问题,用来让人讲明并实行的方法也至为详备。循此渐进,必将达到受罚之路不会去走,伪言伪行不会去想。这都是遵行此道的收效。到后来,穿青襟的学子们做诗,有些人提议撤销乡校,于是百姓们就不知所遵从了。但文翁、召信臣等又将此道行用于汉代。当时就被称赞为独特的治国行政方法,史册上流溢着循吏之声,学校教育对于世人太重要了。然而邪说的流行,是由于正学没有宣讲。居官者若忠于其职守,便可验证出庶民都是愿意一齐跟在后面走的。公卿大夫担负着承奉朝廷旨意进行化导的使命,通过每天与这些无知之民从容讲道理,渐次薰陶,将其纳入正轨之中。在此基础上,《诗》、《书》足以涵养其性情,忠孝足以感发其志气,加上举贤举能之盛况的鼓舞,可以将万民推进到讲求六德、六行、六艺的。大臣又自身坚持勤慎,陶汰手下的贪官污吏,必将

实现启聋振聩,严法除奸。而且尧舜之世的大道将可推行,夏商周三代出现的那种精英人物,亦可挑选出来。谁说积重之势一定就难返呢?方今海内安平,人民亲附谦恭。而皇上睿智宏大的筹划,却仍以教化人民形成美俗为要图,人民为此正涤瑕荡秽而不松劲儿呢!

策问诏书又以如何达到"兵归实用、饷不虚耗"而依据《周礼》去研求历代兵制的得失。臣下我考察古代的寓兵于农、每年四季当中都集体狩猎,都是在农闲之时讲求军事。自从按丘出甲士按田亩征军赋之法紊乱,楚国有了"二广"法,晋国有了"爰田"法,法制便纷乱了。至管子作内政,寄军令,兵与农始行分开。到了战国,此种风气更加肆行。汉初以南军保卫宫城,以北军保卫京师,合乎内外相制之道。唐代设置府兵,有事则任命将领统率而出,无事则罢。后来一变而为矿骑,再变而为方镇,其制完全崩坏。宋代外兵统辖于枢密院,内兵总领于三卫。明代京畿兵约有五十万,设有锦衣十二卫,留守十八卫。其他如蓟辽、大宁诸司等卫,即为汉代招募流民充实塞下的遗意。然而自唐宋以来专用募兵,使游手无业之人应募滥入。于是养兵之费日益浩大,而欲得兵之用则日见其难。只有这类平时游惰之民不准应募补兵之缺,各色服役之人不至于滥竽充数,随后禁止荒怠,衡量技艺,使军事动作因娴习而达于精纯,则可使人心安定而军备得以整治,对于设兵卫民的本意来说,方可收到其实际效用。圣朝社会安定,风俗和美,四海安宁,投戈脱剑而自动向我朝献纳诚心者数以亿万计。然而皇上仍然屡颁训谕,殷切地以检查军训、挑选将士为念。凡属我军将士,谁不感到鼓舞而振奋呢!

策问诏书又鉴于正确掌握和谨慎施用刑罚,期望达到以刑止刑之目的,因而询求清理庶狱的办法。臣下我想到虞舜之时掌兵和掌刑之官是合而为一的,周朝时兵刑之官已分为二职,两朝似有不同。然而对司刑之官"士师"的任命始见于《虞书》。自此审判材料写成后,由司寇终审,三公参与终审,《周礼》于是为讼狱之事而制定法规。载列于《秋官》的有:审案时要注意耳、目、气的反应,王室亲贵故旧之人违法犯罪都给予宽大处理。而关于被告是否有罪,由司法官分别征求群臣、群吏、万民的意见,谓之"三刺"。对于因无知、过失、

健忘而犯罪者，处刑时给予有限度的宽大，谓之“三宥”。对于幼弱、老耄、弱质之人犯法，则给予宽赦，谓之“三赦”。这样，该慎重处理的对象全都照顾到了。春秋时出现了《刑书》、刑鼎，法令明显增多。到后来李悝、萧何、叔孙通这类人继续增益，于是法律篇目更为繁多。由于汉文帝的深厚仁心，废除了肉刑而代之以剃发和鞭笞。但深文酷吏不晓大义，援用法律条文时务求苛细严峻。直至魏晋，此风不衰。隋唐以来制定五刑，效法虞舜，差不多接近上古鞭朴流放的遗风。然而在上有爱惜生灵的仁主，在下有协和中正的贤臣，这种两全其美的状况，还只有虞舜时代独自兴盛。伏读御制《慎刑论》，其中反复重申，告诫断狱者不得放纵自己的喜怒之情，在处刑轻重上务求适当。继而更恭读了御制《息讼安民论》，还是本着慎刑之意，推求勤政。这难道不正是治民要道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承受天命以尽心学问，转移民风而变易世俗，约束军队以显示武德，整饬法制而明察刑狱。圣德高风，直上九重天，延布到八方边际，真可谓给万世人君树立了最高典范。臣下我更敬望皇上强化持盈保泰之心，实现持久昌盛。时时防微杜渐已经做到了，而又更切实地提高见微知著的能力；美善的礼仪风俗已经形成了，而又更勤于教化引导人民；军队业已整治好了，而又更殷切地怀柔远人；众多讼狱业已公平审断了，而又更对施用刑罚心怀谨慎和矜恤。以至于：圣明主敬的功夫精纯，百姓随教化转变的风气普及，赖以止暴的制度详备，守法无讼之风远传四方。于是乎一个总合八方的最高主宰地位建立起来，散布开象征皇权的金绳，照耀在代表王朝的玉镜上。凭此足以铸造生灵，统摄宇宙，开启深谋大智所长远呈现的吉祥，巩固上天保定的大业。那么，我国家万年有道之永福便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学无根本，仕途新进，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董志国译〕

清仁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丁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曰:为政以德。

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殿试策问

[嘉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承大宝命,二十有二年。仰荷昊绎眷佑,祖考贻庥,年岁顺成,函夏乂安,兢兢业业,不敢自逸。敬思修己治民之道,知人善任之原,官箴吏治之方,除莠安良之事。期与寰海生民,共臻上理。兹当对扬伊始,咨尔多士,用仁嘉谟。

孔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书》曰:在知人,在安民。以尧舜犹病之事责之一人,果可以无为而治乎?抑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法而则之,即可以为民父母乎?百官何以治,万民何以察,利病何以周知,情伪何以能辨?亦惟是躬节俭,屏声色,未明求衣,不遑暇食,遂可以致太平?是必深宫有格致诚正之学,然后朝野有官礼《雎》、《麟》之化。朕日夜孜孜,励精图治,保泰持盈,以诚御下。虽海宇升平,人民和乐,而由小康以致大同,其道何由欤?

《诗》云:无竞维人。《易》云: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知人之道,非君天下者所首重欤?古所传观人之法,若《大戴礼·文王官人》篇,以至陆贽、司马光、苏轼之论,亦有可采者欤?皋陶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舜典》曰:明试以功,敷奏以言。进贤用人,如此其难也。乃古之君臣相得,或决于立谈之间,何耶?大智若愚,大诈若忠,或外忠而内奸,或始贤而终佞,烛照数计,其道何由?君子小人各从其

类，然诸葛亮之所用，李泌之所兴，司马光之所取，或未必贤，抑又何说?孔子曰:取人以身。知言穷理，将何以浚其源欤?

亮工熙绩，治理所先。大法小廉，国家攸赖。朕率作兴事，日昃不遑。乃内外臣工，谨身守家之意多，奋发有为之气少。旅进旅退，流为怠惰因循;保禄保位，相率委靡迁就。岂称忘私奉国之义?六计首廉，尚已。然饬簠簋，杜苞苴，人臣之常分耳。案牍积而不厘，民生困而不恤，又安用此素食者为?至若浮躁喜事者，有似于敏勤;闯冗玩愒者，有似于持重。何以辨其真欤?悃愊安静者，大抵便民，而缓急或不足恃;强健明干者，易于集事，而恣睢或致殃民。何以善其用?举劾之权，不可不寄之大吏，而不无借以遂其私者。何以委任而责成欤?

天地之大，枭鸾并育，稂莠不翦，嘉禾不生。邪慝萌蘖之始，或结会敛钱，煽惑人心，或纠党斗狠，武断乡曲。地方官及时治之，本不难于立时净尽。乃或畏其激变，姑息养奸。甚或闻之上司，而封疆大吏反以多事斥之，一味姑容，纵邪害正。官既不经理，民甘心顺从。以致受其害者，忍而不敢言，一旦煽动，为患甚大。非有司酿成之罪欤?保甲之制，所以弭患未萌，法至善也。乃王安石行之熙丰，而世以为累;王守仁用之南赣，而百姓便之。其故何欤?吏胥所以察奸，兵弁所以戢盗，乃往往声息相通，反为援引。何术以防之欤?或谓民之不法，或迫于不得已，或陷于不自知。然则开衣食之原而明礼义之方，固自有其本欤?

若是者：典学以成化，迪知以用贤，澄叙以励官常，纠诘以除民慝，保邦致治，莫要于斯。多士稽古有素，且自田间来，见闻尤习。其各陈心得，以当先资。毋泛毋隐，毋摭陈言。朕将亲遴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说:施行政治要用仁德。

君子随时都处于最适中的状态。而小人的不偏不倚这种道德。

仁德是人们最安适的住宅，道义是人们最端正的道路。〔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承接天赐的统治权,已有二十二年了。仰荷上苍加以眷顾庇佑,以及皇祖皇考遗留的福荫,天下年年和顺,岁岁丰收,整个华夏安定升平。但皇帝我仍兢兢业业,不敢自图安逸。敬慎地思考修身治民之途径,知人善任之本原,整饬吏治之方法,除莠安良之要务,以期与海内民众共同进入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当此应对阐扬开始之时,特就以上问题咨询你们众士子,并伫立而等待良谋佳策。

孔子说:君子要通过修身以获取敬谨美德,并通过自身道德修养来安定百姓。《尚书》说:为政之道,在于了解人才,安抚民众。如果把尧舜办起来都感到困乏之事责成于一人,他果真可以无为而治吗?或者像黄帝教导颛顼时所说的那样,能够取法苍天这个"大圆"和大地这个"大方",他便可以作民父母了吗?对百官该如何治理?对万民该如何纠察?对事情的利弊得失怎样才能全面了解?对于人物的忠奸真伪怎样才能明晰辨识?是否只要人君躬行节俭,摒弃声色,天未明便起床治事,连吃饭也耽误了时间,便可以使天下太平呢?如果是这样,那也一定是先有人君在深宫里讲求"格致诚正"之学,然后朝野有《周礼》和《关雎》诗、《麟之趾》诗所载述的那种教化。皇帝我日夜孜孜不倦,励精图治,保泰持盈,以诚御下。虽然这样做已海内升平,人民和乐,但若要由小康状态达于大同境地,又该通过何种途径呢?

《诗经》上说:最强盛的,在于得到人才。《易》说:圣人尊养贤士,借以团结万民。知人之道,不是君临天下者所首重的吗?古代所传的观察人才之法,如《大戴礼》中的《文王官人》篇所言,以至陆贽、司马光、苏轼的有关论述,也有可以采用的吗?皋陶说:说某人有美好的德行,必须以许多事实作为依据。《舜典》说:除了让诸侯们报告自己的政绩外,还要认真考察其实绩事功。进贤用人,诚有如此之难呢!然而古代君王找到与自己相得的贤臣,有时竟决定于顷刻的交谈之间,这又是何缘故呢?有人大智若愚,有人大诈若忠,有的貌忠而实奸,有

的始贤而终佞。若要对此加以明察或预计,该用何种方法?君子与小人各属其类,按理说是不易混淆的,然而诸葛亮所任用、李泌所荐举、司马光所择取之人,有的却未必贤德,这又如何解释呢?孔子说:要以君主自身的品德去取人。明晓言论而穷究其理,又该怎样去正本清源呢?

人臣兴办民事以辅助天上的有关职司,是治理天下的先急之务。百官们能够大而遵法小而守廉,这是国家的依靠。皇帝我率先起来兴办国事,整日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然而朝内朝外群臣百官谨守身家之意多,奋发有为之气少。所谓共进共退,实际流为怠惰因循;为了保禄保位,便相率萎靡迁就。这难道符合忘私奉国的大义吗?《周礼》对官吏的六项考核内容,都以廉字打头,由来已久了。但守廉拒贿,原是人臣的本分。公文积压而不处理,民生困顿而不抚恤,对这种白领俸禄者,又何必用他呢?至于浮躁好事者,好像是办事敏勤;庸鄙玩惰者,好像是处事持重,如何辨识其真相呢?至诚安静之吏,大抵能方便百姓,却难以交付紧急之事;强健明干之吏,易于办成事情,但其放纵不拘却有可能导致害民。对这两种人,如何用其长而避其短?举荐弹劾官吏的权力,不能不托付于大吏,但大吏中不无借此权力遂其私欲者。针对这种情况,如何把委任与责成结合起来呢?

天地之大,使枭与鸾得以并育。但恶草不除,则嘉禾不生。邪恶团伙萌发之初,有的结会敛钱,煽惑人心,有的结党斗狠,武断乡曲。地方官若能及时整治,本不难做到即时铲除净尽。然而有的官员害怕这样将激起民变,就姑息养奸。甚至有人将情况报告给上司后,那封疆大吏反而斥责他多事。于是一味姑息优容,纵邪害正。官府既不去治理,愚民且甘心顺从,以致受其害者,忍受而不敢言说。待到这伙人一旦煽动愚民造反,往往为患甚大。这不是有关职司酿成的罪恶吗?保甲制度,是消除祸患于未萌的最好的办法。然而王安石在北宋熙宁、元丰年间推行它时,世人都觉得麻烦,后来王守仁行用于赣南,百姓却感到便当。其原因何在?吏胥是用来稽察奸人的,兵弁是用来平息盗匪的。然而吏兵与奸盗之间,往往声气相通,反而为后者做帮凶。用什么办法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呢?有人说,庶民犯法,有

的是迫于不得已，有的是陷于不自觉。果真如此，那么开辟衣食之源，宣明礼义之规，原本就有根本性的措施吗？

以上这些问题：人君经常研习修身之学以推进风俗的完善，增强知人之明以便进用贤士，坚持实行对官吏的考评淘汰制度以督励其忠于职守，纠察训诫百姓以消除民间的邪恶势力。这几条对保邦施治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众士子考古有素，且来自田间乡里，见闻尤为广泛。就请各陈心得，以此作为事先提供献策的实际行动。答卷中不要空泛和隐讳，不要摭拾老套之言。皇帝我将亲自遴选你们。

吴其浚　殿试对策

吴其浚(1789～1846)　字渝斋，别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状元。道光中，擢鸿胪寺卿、内阁学士、兵部、户部待郎。后历任湖南、浙江、云南、福建、山西巡抚，并署理过湖广、云贵总督。为官循谨，办事认真。曾劾罢滥用非刑、纵民扰民之官吏多人，亦曾于道光二十二至二十三年间镇压过湖北钟人杰起义和湖南的曾如炷起义。撰有植物学巨著《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今犹传世。

臣对：臣闻建中所以锡福，迪知所以任官，熙绩则道先厘工，安良则政在戢暴。稽诸载籍，《易》著健行之训，《书》传励翼之文，《礼》陈弊吏之经，《诗》颂宜民之化。茂矩崇仪，粲然具饬。自古帝王，乘乾御宇，锡极临宸，缉熙有学，黜陟有权，综核有方，郊圻有禁。悉本夙夜勤求之实，以握天人交应之机。用是精一执中而主极建，浚明亮采而百志熙，廉能既辨而官常严，保受相资而民风懋。所为扬骏烈、畅鸿庥、备五瑞而协庶征者，洋洋乎超图溢牒，洵郅治之隆轨也。

钦惟皇帝陛下，懋昭大德，时亮天工，本灼见以官人，严彰瘅以训俗。固已敬修可愿而考察无遗，贤能有书而礼教咸被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廛衢室之畴咨，冀葑菲之可采。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典学、知人、察吏、安民诸大端。臣占毕庸愚，曷足以知体要？顾幸际

广思周逮之时，窃附于拜献先资之义，敢不敬述平日所诵习者，用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而因推本于格致诚正之学。此诚图治之要道也。臣惟帝王之道不外主敬，主敬之功不外存诚。惟敬则勿敢慢，惟诚则勿敢欺。诚敬合，而主术于是乎立。黄帝之书曰：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其说见《吕氏春秋》，实开心法治法之源。《古文尚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颖达《正义》谓立君所以安民，安民必先明道，明道必先精心一意。盖道心存则兢业匪懈，人心去则佚豫不生。严祗敬而谐臣邻，百官何患其不治；敕几康而应徯志，万民何患其不察。知人安民，其要端不外是。夫法令者治之具，而非治之本。一日万几之繁，使事事待于督责，则宵旰不遑矣；九州四海之广，使人人问其疾苦，则情伪难悉矣。故立纲陈纪，以有为者振其机；而恭己垂裳，必以无为者端其范。《周官》为致太平之书，而首之曰"以为民极"。三德三行，所以建极也；六典六职，所以锡极也。至于四方和会，六幕恬熙，下有归极之化，上切保极之忱，则朱子《或问》所谓"格致诚正"始终不离乎敬，"中和位育"枢纽不离乎诚。其言深切著明，可为持盈保泰之良谟矣。我皇上乾惕为怀，廑求上理，凡用人行政，无不本诚敬以为敷施，治统与道统一以贯之，询足以远绍唐虞而独隆千古也。

制策又以知人之道为君天下者所首重，而因广求夫大智若愚、大诈若忠以及内外始终之异。臣谨按：《大戴礼·官人》篇曰：伦有七属，属有九用，用有六征。盖朝廷辨论官材，惟在于事举言扬之始。虞廷有九德之选，《周官》重三物之兴。其考之平时者，既无不至，而又必试之以事，任之以官。举凡所以诏爵诏禄者，无不兼功与德而计之。盖知人者劳，而后任人者逸。乃或闻其名而遽畀以政，聆其言而即授以权，立谈之间，上结主知，自非相契有真，未易得此。夫忠奸之别，界于几微；贤佞之分，淆于疑似。自来小人不能容君子，而君子或误用小人。诸葛亮之所用，既显违其节制；李泌之所取，又复涉于贪婪；至司马光急于去新法，而小人又以材能进矣。究之衡鉴之或爽，皆学识之未精。诚能无偏私之见以清其源，无朋党之意以弥其隙，有

光明正大之心，有英断果决之识。陆贽、苏轼之论，固可参酌用之矣。皇上敷求俊良，加意实学，尚廉介之风，杜幸进之门，先德行而后文艺。海内之士咸知向方，蒸蒸然人材蔚起，岂不懿欤!

制策又以大法小廉，治理所先，而思所以祛其怠惰因循、萎靡迁就之习。臣惟安民之道，在乎选吏。而吏有廉吏，有能吏。廉吏淡泊自守，而或短于才，则诸事必不免废弛；能吏奋发有为，而或失其守，则举动亦不免轻浮。故察吏之要，必先责其操守，而即试其材能。汉以六条察二千石，其法自田宅逾制以及通行货贿，所以察其廉。唐以四善叙内外官，其目自献可拾遗以及城隍修理，所以考其能。二者相济而不容偏废矣。虽然，群吏之黜陟，不能不寄于大吏。大吏得其人，则察之有其识，督之有其方。凡积案未厘，民风未淳，则劾罚随之，而又旌其有猷有守者，以为凡百有司劝。庶几群吏皆知奉法，相率忘私奉国，而无玩愒阘冗之弊也。我国家澄叙官方，时加整饬。内而群尹庶司，外而封疆守令，聆训诫之严切，宜无不争自濯磨，以力除夫保禄保位之习也哉!

制策又以邪慝萌蘖之始，可以及时治之，而虑有司之姑息。此制治保邦之至计也。臣案《周书》曰：绵绵不绝，蔓蔓若何。言凡事当防其渐也。乡曲之间敛钱结会，其始不过一二莠民倡立邪说，煽惑庸众。为长吏者及时治之，固易捕除。乃不知思患预防之术，姑为宁人息事之说。及至党羽渐众，邪慝丛生，纵之既恐其蔓延，惩之又惧其激变。守令畏干谴咎，大吏虑生事端，上下姑容，而宵小逞其奸，良民受其害矣。夫安民必先弭盗，而弭盗莫如保甲。《周官》有比、闾、族、党之制，管仲创轨、里、连、乡之法，皆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其法至为美备。惟是营汛堡墩之设，不能不寄于兵弁；寺院庵观之察，不能不责之吏胥。赏罚不明则兵不捕盗，稽核不力则吏或藏奸。王守仁行之而民安，王安石行之而民扰，则有治法尤贵有治人也。虽然，治之于已然，不如治之于未然。仓廪实则民自爱其身家，学校兴则人咸知夫礼义，何至惑于邪说哉?圣朝典章明备，一道同风，严左道之诛，设奇邪之禁。所由人心正，风俗淳，胥一世而纳之轨物也。岂非经正民兴之效哉!

若此者：怀寅畏之忱则主极端也，重升庸之典则明良庆也，隆进退之权则治绩茂也，严旌别之政则风声树也。酝化懿纲，蜚声腾实，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敬德昭而弥切严恭，翼为集而益期襄赞。纪纲既饬，愈勤考课之条；仁让已兴，犹廑风化之本。案经校德，成袭六为七之书；稽古论功，跻咸五登三之盛。淳良康乂，曼羡延洪，上以祗迓蕃厘，下以永绥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倡导中正之道是为了造福人民，增强知人之明是为了任用官吏，要兴办民事则须先治理百官，要安定善良百姓则须以制止暴乱为要政。查阅书籍，《易》彰明君子要刚健运行的训条，《书》有勉力辅政的文字，《礼》陈述了判定官吏贤能庸劣的方法，《诗》称颂适合人民的教化。繁茂的规则，崇隆的礼仪，都灿然而严整地具备于典籍之中。自古帝王们顺承天命而统御天下，赐给民众最高准则而高居皇位，无不在会集美德于自身方面有学问，在提拔罢黜官吏方面有权衡，对综合考核百官有方法，对聚众郊野有禁令。这都依凭从早到晚勤勉研求圣学的实际心得，把握住天人交相感应的机宜。因此能够精心一意地遵守中正之道从而使君王治理天下的最高原则得以建立，注意众臣显现德行辅助政务而团结一心，明辨官吏是否廉能从而使百官认真履行职责，把居民彼此保护、共同承担责任相结合从而使民风变得淳厚。用来弘扬盛大功业，播扬洪福，五种气候依次出现，同众多天象相应合，真是远远超出了神图秘籍的载述，属于最高治理的隆盛准绳啊！

敬思皇帝陛下，大德昭著，善于辅助天上的职司，依据真知灼见来任用官吏，严行彰善瘅恶以矫正风俗。当然已经在主敬的修养上达到了理想的境界，在考察人才上做到了没有遗漏，对官吏的贤能表现皆有记录，将礼法道德教育普及于天下了。然而圣君心怀竟如此谦虚，点滴无遗。勤勉地像尧舜那样垂询于衢室，希望得到哪怕是微小的建议。因而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策问修明圣学、鉴别人才、考

察官吏、安定民众诸大事。臣下我只会背诵经书，学识庸愚，如何能足以知其大体与精要?然而想到自己幸遇集思广益之时，理当窃自附从事先提供献策之义，怎敢不敬述平日诵读研习之所得，以奉献杯土细流般的一点帮助呢?

跪拜敬读策问诏书上说：要通过主敬来进行自身修养，要通过自身品德修养来安定百姓，并进而推究格致诚正之学。这确实是谋求天下治理的要道呢! 臣下我认为，所谓帝王之道不外乎主敬，而主敬的基本功不外乎存诚于心。惟有主敬则不敢轻慢，惟有存诚则不敢欺瞒。诚敬结合起来，帝王的统治方法便确立其上了。黄帝之书说："大圆在上，大方在下，你能学习这天之圆通地之方正，便可作民父母。"此话见于《吕氏春秋》，它实际上开启了心法与治法的本源。《古文尚书》说：与各种物欲相联系的"人心"是危险的，反映伦理道德准则的"道心"是微妙的。孔颖达《尚书正义》认为：设立君主是用来安定民众的，要安定民众必须首先宣明圣道，要宣明圣道必须首先精心一意。因为"道心"存留则人必兢兢业业不会懈怠，"人心"被清除则淫佚享乐之念不致产生。人君若能严守恭敬并融洽与身边诸臣的关系，何愁治理不好百官?若能居安思危并能使天下顺应而待命，又何愁不能纠察万民中的不良倾向?辨识人才与安定民众，其要点不外乎此。至于法令，它只是治理的手段，而非治理的根本。人君本有一日万机之繁忙，如果事事都要等他来督责，那么即使他宵衣旰食，也还是无暇顾全的。天下本有九州四海之广大，若是要求君主对人人都问其疾苦，那么对于民情之真伪，肯定是难以尽知的。所以国家要建立法制，以此"有为"之举来振兴其事机；而君主则须恭谨垂裳于上，以此"无为"之态来为臣民端正行为规范。《周礼》是实现太平之书，而其开头便说：以此作为民众准则。其所列举的"三德"、"三行"是用来建立这一准则的，而"六典"、"六职"，则是用来施布这一准则的。至于如何达到四方和睦融洽，天地四方一片隆盛，下有趋归准则的风气，上有保守准则的笃切诚心，这可以参考朱子《或问》所讲的"格致诚正"始终不离于"敬"，"中和位育"的关键始终不离于"诚"。其言深切显明，实可作为持盈保泰的良法。我皇上以朝夕戒慎为怀，勤勉追

求最高治理，凡用人行政，无不本着诚敬而作出安排，治统与道统贯通起来，确实足以远继尧舜而独高于千古呢！

策问诏书又认为知人之道是君临天下者所宜首先注重的，继而广为研求大智若愚、大诈若忠以及外忠内奸、始贤终佞的区别。臣下我谨按：《大戴礼》的《官人篇》说：人才类别有七种，每类人才可从九个方面来考察其能力，能力的强弱又有六个等次的表现。而朝廷辨析官吏的才能，只在于事举言扬之始。虞舜时代曾以“九德”选官。《周礼》强调从六德、六行、六艺察看人才然后起用。古代对人才平时的考察，既全面，又务必试之以事，任之以官。对凡拟授爵禄者，在衡量其条件时无不兼计其事功与品德。这是因为在辨识人才的工作上多用些心思与气力，而任用好以后便简单而轻松了。不过有时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君闻某人之名便立刻委以政事，听某人之言而当即授以权柄。此人能在立谈之间得到人主的知遇，显然是由于他们的思想主张确有相合之处，否则便不大可能。说到忠奸的区别，那界限其实是微妙的。而贤佞的分野，也由于相似不清而易于混淆。从来小人不能容君子，而君子有时却会误用小人。诸葛亮所用之人中有的就明显地不遵从其节制，李泌所选择之人中有的又涉嫌于贪污，以至司马光也因急于废除新法而进用了有才能的小人。推究起来，他们对人才的衡量鉴别上有时发生错误，皆因学识未精之故。在知人、用人问题上，果真能做到不抱偏爱私人之见从而使心源清澈，不存拉帮结党之意从而使人找不到可钻的缝隙，有光明正大之心，有英断果决之识，那么陆贽、苏轼的有关议论当然可以参酌采用了。皇上广求俊良之才，加意于实用之学，推崇清廉耿介之风，关闭邀宠求进之门，选拔官员首重德行而后观文才，使海内之士都明了努力方向，蒸蒸然人才蔚起，岂不美哉！

策问诏书又认为：督促百官做到大官奉法小官廉洁，是治理天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并思求祛除官场怠惰、因循萎靡迁就等恶习的办法。臣下我认为：安民之道在于选吏，而吏有廉吏，有能吏。廉吏能淡泊自守，但有的人才能短缺，那么诸事废弛便在所不免。能吏奋发有为，但有的人失其操守，那么其举动也就不免轻浮。所以考察官吏的

要诀,在于必须首先品评其操守,而后便是试其才能。汉代以诏令规定的"六条"考察二千石即郡国守相,其标准从所占田宅是否超过规定直至有受贿枉法行为,用以考察其廉洁。唐代以"四善"来评议中央和地方官员,其项目从能献合适之策补政令之缺直至城池的修理,用以考察其才能。当然察廉与考能,二者是互相辅助而不容偏废的。虽然如此,但群吏的黜陟之权不能不托付于大吏。如果所任用的大吏确实是贤明之人,那么他们对如何考察群吏自有其见识,对监督群吏自有其方法。凡有公文积案不加处理,治下民风不淳者,一经发现,随即弹劾处罚,且又旌表其中的有良谋有操守者,以此作为对属下所有职司的劝勉。这样大约能使群吏皆知奉法,相率忘私奉国,而无玩忽怠惰、庸碌低劣的弊病。我国家澄清吏治,时加整饬。朝内群官众吏,朝外封疆守令,经常聆听皇上严切训诫,自应无不争相磨练自己,以力除保禄保位的积习了。

策问诏书又认为:邪恶势力萌芽之初,可以及时消灭它们,而忧虑官吏的姑息养奸。这真是施治保邦的至善之策呢! 臣下我谨按:《周书》说:当有害的东西尚处在初生薄弱之时不根绝它,待其蔓延开来就难办了。这讲的是凡事应当防微杜渐。乡里之间的敛钱结会,开始时不过一二莠民倡立邪说,煽惑无知民众。地方长官及时治理,本易捕除。但有些官吏却不懂得思患预防之术,姑且信从宁人息事之说。等到那邪会党羽渐多,邪恶丛生,纵容它既恐其蔓延,惩办它又惧其激变,知府县令畏招谴咎,封疆大吏怕生事端。于是官府上下实际上都采取姑息纵容态度,因而宵小之徒得逞其奸,善良百姓深受其害了。安民必先除盗,而除盗的最好措施是建立保甲。《周礼》上已有"比间族党"之制,后来管仲又创"轨里连乡"之法,都是依靠熟悉本里巷情况的居民,探察身边见闻之事,其法最为完善。只是这营汛、堡墩的设置,不能不托付于兵弁;对寺院庵观的纠察,不能不责成于吏胥。赏罚不明则兵弁不会捕盗,稽核不力则吏胥可能藏奸。至于同是保甲之法,王守仁行用它而民安,王安石行用它而民受其扰,那是表明有了好的治理方法,更重要的还在于有善治之人。虽然如此,治理于已然又不如治理于未然。粮仓满则民众自爱其身家,学校兴则人

们皆知礼义，何至于被邪说迷惑呢？我圣朝典章美善而详备，统一道德，整齐风俗，严惩旁门左道，禁止怪诞邪僻。因此人心端正，风俗淳厚，自觉将自己的言行纳入法度和礼制的规范。这难道不是道正民兴的实效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人主心怀敬畏之忱，那么君王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就会正确；在进用人才上注重严格掌握有关标准，那么举世便会庆贺拥有明君良臣；提高对群僚的晋升罢免权力，那么各级政府便会治绩盛大；认真做好在百姓中旌别善恶的工作，那么良好的风气就会树立起来。淳美的风俗，至善的纲常，美名传扬，实绩腾驰，仁圣之事齐全，帝王之道完备。臣下我更敬望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主敬的德业已经昭显而更加切合于严谨谦恭，辅臣已经群集身边而愈益期望得到辅助，法律制度既经整饬则更勤于按有关条例考核官吏政绩，仁让之风既已兴起则仍然勉力于以德化民这个根本。查考经籍以对照完善自己的品德，继儒学六经之后写成第七部经典。考察历史而评论古代帝王功绩，努力创造包容五帝、比肩三王的盛德大业。使得天下的百姓淳良而安乐，洪福不绝。以此敬迎上天的繁多赐予，使下民得到诸多神佑而永久平安。这样，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永福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仕途新进，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凌泰封　殿试对策

凌泰封（生卒年不详）　字东园，安徽定远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俟考。

臣对：臣闻建极者锡福之原，知人者安民之要，饬廉法所以整纲纪，除稂莠所以卫善良。斯郅治之上仪，隆平之盛轨也。稽诸载籍，《易》有行健之文，《诗》纪官人之什，《书》著慎宪省成之义，《礼》载比闾族党之经。茂矩英规，备哉灿烂。圣人因之主敬以存心，亮工以熙绩，率作以兴事，禁暴以维风。皆原乎虔巩兢业之衷，以垂拱而司契。

是以主极端而吏治修，官箴肃而民气乐。古所为凝薰万宇，舆盖二仪，承燕翼而永弼丕基，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恃有此道耳。

钦惟皇帝陛下，德昭位育，化洽垓埏，播神武而遐敷，迪吉康以从乂。固已万几咸理而百度维贞，六计登良而兆人乐业矣。乃圣怀冲挹，深维久安长治之谟，弥切保泰持盈之意。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治心之学，善任之方，察吏之经，防民之要。臣之梼昧，譬涓流撮壤，奚补崇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古人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述所闻，用效管蠡之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而因及夫格致诚正之学。此诚励精图治之盛心也。臣考《吕氏春秋》引黄帝之诲颛顼曰：大圜在上，大矩在下，遂及夫能法之者可以为民父母。而《大戴礼·践阼》记黄帝颛顼之道在《丹书》者，首云"敬胜怠者吉。"然则圜矩之法，一敬而已。嗣是尧之"钦明"，舜之"浚哲"，禹汤之"祗台"、"日跻"，文武之"缉熙"、"执竞"，《诗》、《书》所载，条贯毕同，神圣相承，符契若合。"修己以敬"一语，圣人所以阐帝王心法之原。盖惟本基命宥密之意，凛自强不息之神，以天下之大，运之一心，则惟有为而后可以无为也。由是以治百官，以察万民，周知四方之利病，熟察小民之情伪，无非此敬之一念，有以推放之而皆准矣。且敬则奢侈之念无由入，故节俭可行；敬则嗜欲之原无由生，故声色可屏。《周书》载文王不遑暇食，《汉书》纪汉文未明求衣。文王治跻大同，汉文亦号小康，盖由此也。先儒训敬为主一无适。一者，诚也。朱子《大学或问》谓"格致诚正"，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或问》谓自"中和"极于"位育"，枢纽不外乎诚。体一诚以御世，而条教政令由此推焉。程子所谓"有《关雎》、《麟趾》之精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者，不与主敬存诚之旨互相发明欤？皇上夙夜孜孜，以诚驭下，诚统千古心法治法而一以贯之矣。

制策又以敷奏明试始于虞廷，而欲详求夫观人之法。臣按《大戴礼》文王以七属官人，此古者观人之法也。迪知忱恂，夏后以之吁俊；克知宅俊，殷汤所以旁求。《国语》载文王询于八虞，谘于二虢，谋于闳夭，度于南宫。即所谓"敷奏以言"者。《大戴》官人之法，特其一端

耳。夫用人之道虽异，大约不出考行、听言两途，而考行究为首务。是以敷奏明试虽兼言功，而《皋谟》载采专言其人有德。魏晋之九品中正，则用考行之法而失之。唐之以诗赋取士，则因听言之法而流弊者也。然此用人之常法耳。若夫主臣遇合，相得益彰，如汉昭烈之于诸葛亮，唐太宗之于房、杜，宋太祖之于赵普，皆决之于立谈之顷，终身用之而不疑，卒致其主于隆盛，此又非常之材，千载一遇，不可以常格拘也。人之贤否，藏于其心，故有厚貌深情之论。若大知若愚，大诈若忠，内邪而外正，始贤而终佞，要惟为人上者先谨其好恶之原，慎持其喜怒之节，而复精以察之，则自无难烛照而数计矣。汉诸葛亮相先主治蜀，唐李泌佐肃宗中兴，宋司马光成元祐之治，皆号称知人。然诸葛亮失之于李严、马谡，李泌失之于窦参，司马光失之于蔡京，此自贤者之偶过，无损于平日用人之明。然则惟上哲之姿，然后能深邪正之辨哉！皇上聪明天亶，澄叙官方，允厘考绩之典，诚轶虞廷而上之矣。

制策又以廉乃人臣之常分，期大小臣工厉奋发有为之气。臣考《周官》小宰以六计弊吏，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诸目。廉固洁清之意，而亦训察，盖兼掺守为核焉。汉取士曰兴廉，察吏曰廉察，犹本《周官》遗意。然苞苴不行，簠簋必饬。凡生承平之世者，涵濡既久，人人知礼义而重耻让，则廉固为臣之恒节。苟未实心任事，即斤斤自守，终无裨于治。所贵者，力返怠惰因循之习耳。昔汉武帝有诏曰：愿与天下士大夫厉精更始。汉史纪宣帝曰：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而《三国志注》始载"清慎勤"之说，其论以慎为本。不知居官最戒乎怠玩，则勤乃其要乎！夫循名责实，则人无旷官也；朝考夕稽，则吏皆勤职也。乃行之既久，视为固然，甘优逸而案有积延，任冤抑而民罔控告，素餐之诮诚不能免矣。大抵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为治尚此，固养和平之福。而当其有事，又非明决强健者不为功。是在用人者，转移调剂之耳。圣天子整饬官常，肃清吏治。内而卿尹，外而封圻大僚，能仰副睿念，以实心行实政，振作督率之气因日起有功也，岂不懿哉！

制策又以防奸之事必于未然，而因讲求夫保甲之法。臣考保甲之设，原于《周官》。管子轨、里、连、乡之制，亦因而变通之。汉制亭有

长，乡有三老、啬夫、游徼，而游徼职捕盗贼，制綦善也。惟官吏或不实力奉行，而太平既久，生齿日繁，奸人萌蘖其间，良民身受其累。州县避吏议而隐忍姑容，大吏又安无事而不以上达，于是乎其势乃浸浸乎不可遏矣。然而欲止其渐，非有异术也，亦仍行保甲之法耳。夫同一保甲也，王安石行之而民扰，王守仁行之而民安。果使董斯任者，令户口有核实之数，胥役无苛扰之烦，而又寺院必有巡，庵观必有察，即有一二奸宄，有不潜消于不觉哉！

若此者：持敬宅衷，心学懋矣；任贤出治，官职厘矣。勤考课而百尔尽竭蹶之忱，严防检而万姓获乂安之庆。臣尤伏愿皇上至诚无息，安益求安。天德备而弥切寅恭，藻鉴精而不忘审察。臣僚黾勉，犹廑在公夙夜之箴；寰海敉宁，倍凛思患豫防之戒。于以诞膺蕃祉，式迓洪厘，湛恩滂濡，中外禔福。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薮。上咸五，下登三。则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庆，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是赐福于民的渊源，知人善任是安定人民的关键，整饬百官循法守廉是整肃纲纪的需要，清除稂莠之徒是保护善良之众的前提。这些都是至善之治的主要制度，通向升平之世的盛大准绳。查考书籍，《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句，《诗》有记述如何用人为官的篇章。《书》彰明慎重对待已有法度和事例的主张，《礼》记载了在邻近的闾、党中组织治安联防的经验。盛大的法度，详备而灿烂。据此圣人主敬于心，积极辅助天上的职司，率先起来兴办民事，严厉禁止残暴行为，以维护社会风尚。这都本着虔敬坚定兢兢业业的初衷，垂拱于上而掌握住关键。因此君王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正确而吏治完美，百官严守为官之诚而民气和乐。古代帝王们所以能陶冶万方，笼罩天地，承奉祖宗谋略而永远辅助大基业，常保盛名而被首先称颂，靠的就是有这些措施。

敬思皇帝陛下，圣德昭明足以使天地定位万物化育，躬行教化足以融洽九重天和八方边际，将英明威武展布于远方，使吉祥安乐的化

导跟随于治理。当然已是万机俱理而百法均正，通过各种考核使贤良之士被进用，而亿万人民也安居乐业了。然而圣君之心如此谦虚，深思久安长治之策，更切保泰持盈之意。因而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治心之学，善任之方，察吏之法，防民之要。臣下我愚昧无知，譬如细流杯土，何能有补于高山深海？但当此应对阐发开始之时，敬念古人事先提供献策之义，怎敢不谨述所闻，以献上管窥蠡测的意见来表示自己的一片诚心呢！

跪拜敬读策问诏书上说："要通过主敬来进行自身修养，要通过自身道德修养来安定百姓"，从而论及"格致诚正"之学。这的确表明了励精图治的盛心呢！臣下我查考《吕氏春秋》上引述了黄帝教诲颛顼的话说：大圆之天在上，大方之地在下。接着又说到能取法天地者可以作民父母。而《大戴礼记·践阼》记载黄帝颛顼之道在《丹书》的那一段话，第一句就讲：能以"敬"克服"怠"才会吉利。然而所谓天地大圆大方之法，说到底就是一个"敬"字。此后尧的"恭俭圣明"，舜的"聪明睿智"，禹、汤的"敬修己德"和"日日进步"，文王、武王的"会集光明"和"保持强盛"，《诗》与《书》所载，条贯全相同；神与圣相接，若合符契。"修己以敬"这句话，是圣人用以阐明帝王心法之根本的。因为只有本着承奉天命而宏深静密地积德的意愿，奋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将广大的天下，运用于一心，那么帝王们才可能由这种"治心"上的"有为"而后达到对天下的无为而治。从这种"治心"的成效出发用以治理百官则能周知各地行政的利弊，用以纠察万民则能熟悉明察小民的真真假假，无非由于这一"敬"的心念，确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威力。而且人能主敬则奢侈念头无从侵入，所以在讲节俭方面也可以实行。能主敬，那么各种嗜欲的根源就无从产生，因此声色便也可以摒弃了。《周书》记载文王忙得没有时间从容用餐，《汉书》记载汉文帝天未明即起床办公。周文王之治达到了大同境界，汉文帝之治也号称小康之世，都是由"敬"而造成的。先儒解释"敬"为"主一无适"。这里的"一"，就是"诚"。朱子《大学或问》认为"格致诚正"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或问》认为自"中和"直至"位育"，关键不外乎"诚"。能体会这一"诚"字而用以治理天下，条令教令政令都可由此

推衍出来。程子所讲的有《关雎》、《麟之趾》诗的精于教化之意，然后可以施行《周礼》的法度，不就是与主敬存诚之旨互相阐明的吗？皇上朝夕孜孜，以诚驭下，确实是统摄千古心法与治法而将其贯通了。

策问诏书又认为以铺陈上奏进行公开考核始于虞舜时代，而欲详细研求观察人才的方法。臣下我谨按：《大戴礼》记载周文王曾按七种类型来用人为官，这就是古时的"观人之法"。循道、智慧、诚恳、戒惧，夏禹曾按这几条标准召唤俊杰，并能知道怎样安排俊杰。商汤王也曾以此广求俊杰。《国语》记载：周文王询于八虞，咨于二虢，谋于闳夭，商讨于南宫括。这即是所谓"敷奏以言"的行动。《大戴礼》所讲的任人为官之法，仅为其中一种而已。历代用人之道虽然不尽相同，但大约不出"考行"与"听言"两条途径，而考行毕竟为首务。所以敷陈上奏公开考核虽也兼谈事功，但《皋陶谟》主张：说一个人具有美德，必须有许多事实作依据。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法，是运用考行之法但有缺陷。唐代以诗赋取士，则承袭听言之法而产生了流弊。但此二法总归是用人常法。如果君臣一遇即合，相得益彰，例如汉刘备对诸葛亮，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宋太祖对赵普，都是拜任作出于立谈顷刻之间，并且终身用之而不疑，而后者也都最终将其所事君主送到了隆盛之治。这又属于另一种情况，即对于非常之材，千载一遇的，则不可以拘于常格。人的贤能庸劣藏于其心，故有厚貌深情之论。像大智若愚、大诈若忠、内邪而外正、始贤而终佞这类情况，要做到准确辨识，总之在于君主先谨防自己受好恶方面的成见的左右，小心地控制自己的喜怒情绪，而后再精心考察他们，那就自然不难明察其心术而对他做出估计了。汉诸葛亮辅佐刘备治蜀，唐李泌辅佐肃宗中兴，宋司马光成就元祐之治，都号称知人。然而诸葛亮失察于李严、马谡，李泌失察于窦参，司马光失察于蔡京。这些当然是贤者的偶然过失，无损于其平日的用人之明。然而只有具备最明智的资质，然后方可更深刻地辨明邪与正呢！皇上聪明由上天所特赋，将百官应遵守的礼法制定得清楚有序，并规定出一套完备的官吏考绩标准，真可谓超乎虞舜之上了呢！

策问诏书又指出清廉是人臣的本分，期望大小官吏踔厉奋发有

为之气。臣下我查考《周礼》小宰以六种考核内容评判官吏，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等名目。廉本为洁清之意，也解释成考察，是为了兼顾官吏所持操守来进行考核。汉代取士名曰“兴廉”，察吏名曰“廉察”，仍本《周官》遗意。但其实只要禁止了贿赂，廉洁就有了保证。大凡生于承平之世者，因久受教化的影响，人人知礼义并重视知耻与谦让，那么廉洁也就自然成了臣子的很平常的节操。如果尚未实心任事，便斤斤于自守其节，到底无益于国家的治理。可贵的是，大力扭转怠惰因循的官场习气。以前汉武帝有诏令说：愿与天下士大夫一起振作精神，除旧布新。《汉书》记录了宣帝的话说：我朝近要之官设置周密，品级礼仪规定完备，上下相安，不要存有苟且之意。而《三国志注》始载“清慎勤”之说，其论以“慎”为本。这大概是因为不懂得当官最需要自戒于怠惰玩忽，其实勤勉才是为官纲要。循名责实，则官无荒废职守之人；坚持朝考夕稽，则吏皆勤于职守。但因此法行之已久，有些人便视之为一种简单的套数。于是喜欢闲逸而案头有积压拖延的公文，听凭冤案存在而使小民无处控告。他们受到“尸位素餐”的讽刺便实不可免了。大抵说来，安静之吏至诚无华，按日计其事功嫌不足，以年计其政绩则有余。倚重此种官吏来进行治理，固然可养和平之福，但当国家有事，又非有明达果决强健之吏不能取得成效。这就在于用人者如何转换调剂他们了。圣天子督励百官尽职勤政，肃清吏治。朝内公卿大臣，朝外封疆大吏，应能不负圣望，以实心行实政，振作督率之气必将日益兴起并转化为实际成效，岂不美哉！

策问诏书又认为防奸之事必定行之于未然之先，并随即讲求保甲之法。臣下我查考保甲之设，源于《周礼》，管子的轨里连乡之制亦沿此而予以变通。汉制亭设有亭长，乡设有三老、啬夫、游徼，而游徼职责在于捕获盗贼，制度定得是极好的。但官吏有的不实力奉行，而太平已久，人口日多，奸人萌生其间，良民身受其害。州县守令为避免失职的拟议而隐瞒忍耐姑息宽容，大吏又安于无事而不予以上报，于是其势力便逐渐不可遏制了。然而当时若要遏止其发展的态势，并没有什么奇特的法子，也仍旧是实行保甲法。但同样一个保甲法，

王安石行用而民觉烦扰，王守仁行用而民得其安。果真能教主管此事者，让户口有核实之数，胥吏差役无苛刻烦扰百姓之举，又对寺院必有巡查，对庵观必有纠察，即便原有一二奸宄之徒，哪有不悄然消失于不知不觉中的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人君主敬于心则心学昌明，任贤出治则官职整饬，勤抓考课则百官尽竭力奔走之忱，严于防范检查则万家获平安之福。臣下我更敬望皇上至诚不息，安益求安。帝王品德已完备而更讲恭敬，评鉴人才已精详而不忘审察。臣僚都已很努力了，仍经常劝勉他们要日夜为公。海内早已安定清宁了，却加倍严肃地对待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告诫。依靠这些，使国家得受众多福祉，敬迎上天的丰厚赐予，深厚的恩泽如雨露滋润，中外同享升平之福。斟酌道德渊源，吃透仁义林薮，和五帝三王相并列。那么我国家亿万年悠久无疆之福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吴清鹏　殿试对策

吴清鹏（生卒年不详）　字西谷，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探花，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俟考。

臣对：臣闻懋德者绥猷之盛轨，观人者致治之良规。考课严则官常自肃，匪僻除则民气胥和。粤稽载籍，《诗》咏缉熙，《书》称慎简，《礼》重考成之典，《易》详容保之辞。伊古帝王，规矩乾坤，甄陶品汇。以照粹德，危微凛夫一心；以策群才，蔼吉歌其多士。以箴贪玩，则百职效其公忠；以儆邪凶，则万姓蒙其乐利。是用风雷涣号，日月著明。吏以廉隅自饬，民皆耕凿相安。雅化敷而宙合凝薰，谊风邕而寰瀛溥被。所谓道崇羲燧，功格元祇，诚亘古之上仪，宪天之极则也。

钦惟皇帝陛下，抚图赞化，握镜调元，固已德阐渊微，班联师济，官方澄洁而各登报最之书，民俗敦庞而屡进移风之管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廛衢室之畴咨，冀刍言之可采。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

典学、迪知、课吏、安良诸大端。臣占毕庸愚，乌足以知体要？顾幸际广思周逮之时，窃附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就平昔诵习，谨述所闻，以效蠡测管窥之一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以尧舜之事责之一人，而因思夫持盈保泰之道。此诚长治久安之至计也。臣按传心之学，始于二帝，而用则主于敬。《典》以"钦"始，《谟》以"钦"终，敬也。其后禹之"祗台"，汤之"日跻"，文之"小心"，武之"执竞"，亦犹是敬也。孔子所谓"修己以敬，修己即以安百姓"也。用是以治百官，察万民，无非本此严恭寅畏之心以出之。而敬胜则吉者，亦诚至则明。夫何有利病之不可知，诚伪之莫能辨也？昔黄帝语颛顼曰："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此盖三代以前之治，其治为大同。至于躬节俭，屏声色，如张蕴古《大宝箴》凛物侈声淫之戒；未明求衣，不遑暇食，如李德裕《丹扆箴》胪宵衣正服之条。此又三代以后之治，其治为小康。孔子删《书》则断自尧舜，论政必取诸文武。帝王之道，其庶几备于是矣。要之，正朝廷而后正百官，而后正万民。格致诚正之学，亦既裕于一人，由是垂为帝范，发为王言。斯《雎》、《麟》之咏可识王化之基，而官礼之设乃信乎致太平之书也。皇上聪明天亶，酌化覃敷，郅治之隆，固迈唐虞三代而上之矣。

制策又以知人之道为君天下者所首重，而思所以浚其源者，惟在知言穷理。臣惟人才者，国家梁栋之资也。故自古帝王莫不以博选为本，而要其用之也，又必有其难其慎之思。此《大戴礼·文王官人》篇，所由为千古观人之法欤？至如陆贽、司马光、苏轼论各不一，要皆为一代名臣，故能洞悉古今，足资采择。夫朝廷公辅之器不必备官，而国家铨选之权岂拘常格？自古君臣其相须也，若金受砺，而其相得也，如石投水。盖诚有取决于立谈之间者，又宁待左右之交章荐举而始信为国士哉！然而知人则哲，自古难之。《舜典》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皋陶谟》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言不可不慎也。使无相士之真，而徒取必于言貌，权术之士每工持论于大廷，是内外或判若两途也。廉介之儒多至改节于末路，是初终不尽如一辙也。又安得不售其诈而堕其愚哉？若夫权既足以相摄，智复足以相

驭，而偶以一时怜才之见，托于取节之说，则如诸葛亮、唐李泌、宋司马光所用，或不尽皆贤，而要视用之者何如也。圣天子神明广运，烛照无疆，其于以身取人之道，盖诚无加矣。

制策又以“亮工熙绩，治理所先。大法小廉，国家攸赖”，而用思振积习以收实效。臣考《周礼》六计弊吏，首重惟廉。廉固人臣之常分也。然而饬簠簋，杜苞苴，稍知廉耻者亦尚优为之。所虑拘谨太过，或以畏事而失之因循；唯诺相沿，或以保身而误于迁就。有如案广之积而不厘也，久复多所牵连，必至累及于无辜；民生之周而不恤也，势且无所控告，不免自蹈于非法。则揆诸忠国爱民之意，能无愧此素食哉？今夫风俗之淳漓，于吏系之，而吏治之贤否，于人辨之。浮躁喜事者多不自检，而非若黾勉急公者之循序无失也。阘冗玩愒者常不自振，而非若老成持重者之练识有待也。此察之于未事，而可得其真者也。悃愊安静者，用之以抚绥则可以便民，而缓急之事或不足恃，是才识有未裕也。强健明干者，用之以奔走则可以集事，而恣睢之气或有未消，是学养为犹未纯也。此试之于已事，而可观其用者也。然而随事制宜，因才任使，举劾之权又端在大吏矣。皇上整躬率物，垂谕殷殷，凡在臣僚，不既咸知奋励以效哉！

制策又以天地之大，枭鸾并育，而窃恐稂莠未除则嘉禾不生。此尤化民成俗之要务也。臣思百姓之愚，不尽无良。间有一二邪慝萌蘖其间者，始或出于一时射利之意，而于是结会敛钱、煽惑人心者有之；又或逞其一时好胜之心，而于是纠党斗狠、武断乡曲者有之。然果为有司者能严究其首事之人而置之法，切谕其附和之众而设之禁，则党羽不难立散，而根株亦可以净尽矣。是岂容姑息养奸，以致蔓延而无已哉！若夫平时纠察之法，则莫善于保甲。汉之亭长、啬夫，唐之里正、坊正，胥此制也。然王守仁行之南赣，而民以为便，王安石行之熙丰，而世且为累，则是有治人而无治法，唯在人之善用其法也。是故胥吏以察奸也，兵弁以弭盗也，然可以耳目寄之，不可以爪牙用之；可以指臂使之，不可以心腹任之。否则此委以权，彼诱以利，又安保其不声息相通而反为之援引哉？至于开衣食之原，明礼义之防，则所以教养于平时者，尤正本清源之道也。圣朝仁育义正，道一风同。良有

司奉行成法,斯于法行而无弊。生斯世者,其敢自外于荡平之道哉?

若此者:法两仪以立极,主德新焉;辨九能以授职,群才茂焉;约六条以察吏,官方饬焉;陶万族以归化,民风淳焉。抑又闻荷覆帱之德者,则愿天之弥高;感容载之恩者,则愿地之弥厚。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天德裕而弥切寅恭,人才盛而益精鉴别。严黜陟之法则争自濯磨,善化导之方则咸知鼓舞。于以开骏发之祥,大光昌之业,淳风四溢,协气旁流。则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庆,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发扬美德是谋求天下安定的大道,善于考察人才是导致国家治理的良法,考课认真则官吏自然尽职尽责,奸恶铲除则民气一片和睦。查阅书籍,《诗》咏唱"学问大放光明",《书》称赞慎选官吏,《礼》重视考绩法则,《易》详载宽待和保护人民的言辞。古代帝王规范乾坤,陶冶万物。用来对照检查自己道德是否精纯,就严格遵循"危微精一"的心法要诀;用来策试群才,就获得众多有威仪而善良的臣下;用来惩戒贪赃玩忽职守,百官就奉献公忠体国之心;用来儆戒邪僻凶顽,万民就得享安乐和利益。因此像风雷传播其命令,像日月显示其光明。官吏以品行端方自律,民众都在耕田掘井中相安。纯正的教化得以推广而天地四方集聚于圣德的薰陶之下,仁义之风畅吹而寰宇瀛海全部沐浴于其中。真所谓道高如伏羲燧人,功业顺从天帝。诚然为亘古之楷模,效法于天的最高典范呢!

敬思皇帝陛下,抚摩《河图》而促成万物化育,手握明镜而调合黎民,当然已经阐明了帝王之德的渊源和精微,选拔了一批又一批的贤才并获得了众多的辅弼大臣,澄清了吏治而百官都达到了考核的最佳等级,敦厚了民俗而风气变化的颂歌屡屡奏呈。然而圣君之心如此谦虚,不遗细微,勤勉地像尧舜那样访求于衢室,希望从割草农夫的话中得到可采纳之言。于是又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坚持心学、进用人才、考察官吏、安定善良诸大事。臣下我只会背诵经书,学识庸愚,怎足以知其大体与精要?但幸遇集思广益之时,窃自附从事先提供献策的古训,怎敢不就平素所诵读研习者,谨述所闻,以奉

献蠡测管窥的一点儿帮助呢?

跪拜敬读策问诏书上说:将尧舜也感到吃力之事责成于一人,进而思求持盈保泰之道。这确实是达到长治久安的至善之谋呢! 臣下我谨按:传心之学始于尧舜二帝,而其施用则为主敬。《尚书》的《尧典》以"钦"字开头,《皋陶谟》以"钦"字结尾。"钦"即是"敬"呢! 其后禹的"敬修己德",汤的"日日进步",文王的"小心",武王的"保持强盛",也还是讲"敬"。亦即孔子所谓"通过主敬来进行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也就可以安定百姓。"因此治理百官,纠察万民,无非是本着这种严恭敬畏之心而将其外化为行动。而所谓"敬胜怠则吉",也就是说"诚"的要求达到了就会心明。那么哪有利弊不可知,真假不能辨别呢?从前黄帝告诉颛顼说:"大圆之天在上,大方之地在下,你能取法它,便可作民父母。"这是三代以前的国家治理,它属于大同之治。至于躬行节俭,屏弃声色,如张蕴古《大宝箴》要求帝王严厉戒除"物侈声淫"的主张那样;天未明即起床办公,没时间从容用饭,如李德裕《丹扆箴》所胪列的要求帝王夜晚办公、身着正服的条陈那样。这又是三代以后的国家治理,它属于小康之治。孔子删定《尚书》,上限断自尧舜之时,议论政事必举周文王、武王为例。大约帝王之道,在他们身上已几乎完整地具备了。总之,先正朝廷而后才能正百官,正百官而后才能正万民。"格致诚正"之学已经最充分地灌输于君主一人,通过他垂为帝王典范,发为王者之言。这就是从《关雎》和《麟之趾》诗的吟咏中可看出王道教化的基础,可相信《周礼》为致太平之书的道理所在。皇上秉持上天特赋的聪明,以香醇如美酒的圣德感化臣民,并使淳厚的民风广为延展传布。这种至善之治的隆盛无疑已超出唐虞三代之上了。

策问诏书又认为,知人之道是君临天下者放在首要地位来重视的,因而考虑浚清此道之源的方法,全在于洞察言论而穷究其理。臣下我认为,人才是国家栋梁的依凭。所以自古以来,历代帝王无不以广选人才为治国之本。而在任用人才的问题上,又必有其难处和需要考虑得慎密的地方。这就是《大戴礼·文王观人》篇所以成为千古观人之法的缘由吧?至于陆贽、司马光、苏轼的有关议论,各不一样。

但总的说来，他们都是一代名臣，故能洞悉古今，足有可供选取之处。自然，朝廷三公宰辅之才不一定在现有的官僚队伍之中就能全都委任，因而国家铨选人才的衡量标准又岂能拘守常格？自古君臣在其互相等待之时就像刀在受磨，而当他们一旦相得之时便有如石投于水。差不多真有可在立谈之间便决定取用的人才，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左右之臣交相上奏荐举才相信他是国士呢？然而“善于知人，便表明明智”，这一点自古做起来不太容易。《舜典》说：让诸侯们报告了自己的政绩，又认真考察其实际事功。《皋陶谟》说：讲某人有美好的德行，必须以许多事实作为依据。这说的是“观人”不可不慎重。如果没有掌握察看人才的真道，而仅凭言貌取人，权宜机变之士每每在大廷上持论极善，可见有的人内心与外表就判若两途了。廉洁耿介的儒者多有到了最后而变节的，可见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始终如一。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保证完全不被这种人所欺骗和愚弄呢？如果权力既足以统摄他们，才智又足以驾驭他们，虽闻知某人有表里不一或言过其实等类毛病，却偶因一时爱才之念，依托“取人以大节”之说，遂予以任用。例如蜀汉诸葛亮、唐代李泌、宋代司马光所用之人，有的并不都是贤才，总之要看怎样任用他们罢了。圣天子神思广运，明察无疆，对于以德取人之道，运用之妙实在无以复加了。

策问诏书又认为：“辅助天上的职司而兴办民事，是治理天下的先急之务。官吏都能大官奉法小官守廉，这正是国家所依靠的”，并由此而思考如何扭转官场积习而收实效。臣下我查考《周礼》以六项内容来评断官吏的优劣，而其中首重的条件是廉洁。廉洁本是人臣的普通本分。然而守廉拒贿，稍知廉耻者也尚能做得较好。值得忧虑的倾向是：为政过于拘谨或因怕事而流于因循，唯唯诺诺相沿成习或为保身而陷于无原则的迁就。比如讼案多至堆积而不处理，日久又多所牵连，必至连累无辜。又如人民的生计发生了有赖于政府救济的困难却不加抚恤，百姓又没有再往上控告的权力，便不免自蹈于非法。那么对照忠国爱民这一为官从政之本意，这种人能不自愧于此种白拿俸禄的行为吗？当今风俗的淳厚与浇薄决定于官吏，而吏治的贤与不贤要由人来辨别。浮躁好事之吏多不自检，不如勤勉急公者

的循序无失；庸鄙玩惰之吏常不自振，不如老成持重者的干练多识、临事有备。这四种人是不必看其办事便可观察出真相来的。至诚安静之吏用之于安抚百姓则可以便民，但遇紧急之事也许就不足以依靠了，这说明其才识尚有不足。强健明干之吏用之于奔走则可以组织完成较大的政事，但其放纵不拘之气也许未能消除，这表明其心学修养还不精纯。这两种人是可以通过一个办事过程的测试并观其办事功效而辨识出来的。然而随事制宜，因才任事，举荐劾罢之权究竟还在于大吏呢！皇上整饬自身，给臣下作出表率，而且垂谕殷切。凡属臣僚，怎能不都知道奋发自励以效力国家呢！

策问诏书又鉴于天地之大，枭鸾并育，由此而唯恐恶草不除，则嘉禾不生。这更是教化人民美善风俗方面的要务。臣下我以为百姓尽管愚昧，也并非尽无良知。间或有一二邪恶之徒萌生其间，起初有的可能出于一时牟利的意图，于是结会敛钱，煽惑人心；有的又可能为了逞其一时好胜之心，于是纠党斗狠，武断乡曲。但如果地方官真能严究其为首起事之人而法办他，剀切晓谕其附和之众而设置禁令，则党羽不难立散，而其根株也可以铲除净尽的。对此难道能容许采取姑息养奸态度，致使蔓延不已吗！至于平时的纠察之法，则以保甲为最好。汉代所设的亭长、啬夫，唐代所设的里正、坊正，都是实行保甲制度的组织机构。然而历史上王守仁推行此法于赣南时百姓以为便利，王安石推行此法于北宋熙宁、元丰年间时世人却受其烦扰。这表明只有确能治理好国家的人，没有自行就产生效果的法度，只在有人能够很好地行用那法度啊！所以胥吏是用于察奸的，兵弁是用于除盗的。但只可将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而不可用之为爪牙；只可当指臂使唤，而不可作心腹信任。否则这边委之以权，那边诱之以利，又怎能保证他们不与奸盗之徒声气相通而反为其帮凶呢？至于为百姓开辟衣食之源，并使其明晓礼义以筑起思想堤防，那是应当在平时实行的教民养民措施，尤为正本清源之道。我圣朝以仁育民，以义正民，道德规范统一，风尚趋同。良吏奉行成法，于是法行而无弊。生于此世的人，怎敢自行处于荡荡平平的王道之外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取法天地以建立最高准则，君王的圣德便会日

日更新；辨识人材的九种能力而授予官职，众多的人才便会蔚然兴起；依照六条标准来考察官吏，百官便会严守礼法；陶冶百姓而使他们趋归于教化，民风便会变得淳厚。然而我又听说：人们承受了苍天的覆盖之德，而愿苍天更高；感激大地的容载之恩，而愿大地更厚。臣下我更敬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天德完备而更讲求恭敬，人才兴盛而益精于鉴别。严行黜陟之规便官吏都争相自我磨练，改善教化引导之方则万民都感到欢欣鼓舞。据此开启深谋大智所长远呈现的吉祥，扩展光荣昌盛的事业，淳美民风四溢，和睦风气遍流。那么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福便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董志国译〕

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曰:修己以安百姓。

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

殿试策问

[嘉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承昊穹眷命，列祖贻庥，翼翼兢兢，于今二十有四年。周挠甲以斟元，衍长庚而集祜。万方清晏，百谷庆成，四渎安澜，五韺来备，豫顺聿隆于此日，谦亨敢懈于初衷!靡文尽屏，却九牧之贡珍；询事维殷，辟四门而吁俊。敬惟制治保邦之道，厚生正德之原，去奢崇俭之方，肆武诘戎之法，洵整饬之当先，乃讲求之倍切。尔多士论秀于乡，用宾于国。伫闻谠论，式赞嘉猷。

唐虞授受，不外一“中”。嗣是仲虺言“建中”，孔子言“用中”。中者，帝王之心法，即帝王之治法也。其言“惟精惟一”，即孔门“明善诚身”之说所自出欤?《诗》颂不刚不柔，《传》称宽猛相济，盖言中也。乃汉兴之始，网漏吞舟；诸葛治蜀，赦不轻下。宽严不同，同归于治，何欤?《泰》之“九二”，备陈保泰之道。其与《论语》“宽信敏公”之旨，有相合欤?司马光论人君之德有三，其才有五，而为道则一。其于《中庸》“达道达德”、“人存政举”之义，可相通欤?《大学》平天下一章，专言财货、用人二事，何欤?朕际重熙累洽之时，深惟长治久安之道，所以巩丕基于永固，登郅治于大同。其要可得闻欤?

昔贤论富教之道，曰易田畴，薄税敛，立学校，明礼义。方今

之世，农务垦辟而地鲜遗利，赋惟正供而时予蠲除，设国学乡学以教士，宣《圣谕广训》以教民。法綦备矣，而未能民皆足食，户尽可封，其故安在?井田庠序，古法既不可行；讲约劝农，虚文或且滋扰。苏洵《田制》之议，柳宗元《种树》之篇，其明鉴也。将欲顺人情而收实效，其道何由?夫民生风俗，国家之元气也。大小臣工，于民皆有父母师保之责。使徒从事于簿书案牍，而置本务于不图，岂称识治体、培国脉者乎?古之循吏，转凋敝为沃饶，化顽愚以礼让，如召、杜、文翁之流，岂徒恃讲求之有素，才略之过人欤?

《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诚以奢俭之间，君心敬肆所由分，风俗淳浇所由辨也。方今太平久而生齿繁，人情自质而趋文，物力虽丰而易匮。有如汉诏所云：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习染既久，富者僭而逾制，贫者滥而为非，岂细故哉?朕躬行节俭，出于天性，时颁训言，冀挽薄俗。乃诏书屡下，淳朴未臻，将欲严法制以绳之，又虑奉行不善，适以病民。将何以移风而易俗耶?古之卿大夫，若杨绾、卢怀慎、杜黄裳之徒，高节清标，闻者感而自化。《羔羊》素丝，风流如在。今何必异于古所云也?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整军经武，先王所以保太平也。然有空籍而无胜兵，徒滋糜费，则简阅为要矣。汉代训练之法，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卞射诸制，其详若何?唐时讲武都外，宋有大阅之典，其法若何?《文献通考》载兵有五练，厥目安在?我朝以弧矢威天下，家法罔敢怠荒。侍卫禁军，躬亲校阅，屡谕掌兵大臣尽心简练。又以时举行大阅，教演阵法。每岁行围，肄武习劳。至直省营伍，亦严饬将军、督抚、提镇等勾稽较核。其果能选骁锐，汰老羸，以得实用乎?修整犀利，变更寨窳，以精器械乎?役使兵丁，摊扣粮饷，不加惩儆，何以肃戎政乎?

夫图治所以经邦，遂生继以复性，节用以裕民食，振武以壮国威。凡此四端，参互考订，则轨迹易遵；通变化裁，则推行尽利。多士学于古训，通知时事，拜献厥有先资，远猷尚期辰告。勉殚素蕴，毋袭陈言。朕将亲第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说:修养好自身来使百姓安乐。

人们行用大道却离切近的事情很远,就不能够行用大道。

使自己诚心诚意具有方法。如果不明了什么是善,也就不能使自己诚心诚意了。〔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敬承上天的关怀和授命,以及列祖列宗给予的庇荫,小心翼翼,兢兢业业,至今二十四年了。这些年来,皇帝我根据历法的周而复始来斟酌元气的化育情形,推衍长庚星的闪耀而聚集了各种福瑞。以致万方清平安乐,百谷喜获丰收,江淮河济狂澜安伏,五种气候正常来到。在今日人民安适顺心,国家迅速兴盛,皇帝我惟有日益谦虚恭俭,不敢懈怠于初衷。因而将浮华的文字尽行摒除,谢绝各地进贡的珍奇之物;殷切地咨询国事,打开明堂四门而吁请英杰贤才。敬思施治保邦之道,厚民生正民德之本,去奢崇俭之方,经武整军之法,实为应当先行整饬的政事,因而对其加以讲求也倍加迫切。你们众士子由地方相继被推荐到朝廷,现在就伫立聆听你们的正直言论,择取辅政的嘉策良谋。

唐尧虞舜之间所授受的"心诀",其实不外乎一个"中"字。嗣后仲虺讲"建中",孔子讲"用中"。所谓"中",就是帝王之心法,亦即帝王之治法。"十六字心诀"所讲的"惟精惟一",就是孔门"明善诚身"之说的渊源吗?《诗经》赞颂"不刚不柔",《左传》称道"宽猛相济",都是讲的"中"呢!但汉朝建立之初,法网之疏可漏掉吞舟之鱼;诸葛亮治蜀,宽赦之令从不轻易颁下。二者宽严如此不同,却又同样达到了国家治理,这是为什么呢?《易·泰》的"九二"爻辞,全面陈述了保守平安之道。它与《论语》主张"宽、信、敏、公"的旨趣相符合吗?司马光

论说君主应有三种品德、五种才能，但所遵行之"道"却只能是一条。此论与《中庸》所说的"达道达德"、"人存政举"的含义，可以相通吗？《大学》的"平天下"一章，专讲财货、用人二事，为什么呢？皇帝我际遇国家持续兴盛之时，深切思求长治久安之道，以便实现皇基永固和进入大同至治的状态。你们能将其大要说给皇帝我听吗？

先贤讲论富民教民之道时说过：要开辟田地，减轻赋税，设立学校，昭明礼义。当今之世，农民见荒必垦因而土地未被利用的很少，赋税只征收正额部分而且不时予以蠲免，设有国学乡学用以教育士子，宣布了《圣谕广训》用以教化人民。采取的措施可以说是很完备了，但却未能使人人都足食，户户可旌表，其原因何在？如今对井田和乡校的古制已不可实行，形式主义地讲求乡规民约和鼓励耕作，也许又会生事扰民。苏洵题为《田制》的议论，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就是明鉴呢！那么想要顺民情而收实效，又该通过什么途径呢？人民生计和社会风俗，是国家的元气所在。大小官吏，对人民都负有父母师保之责。倘若仅从事于簿书案牍，而置根本事务于不顾，难道符合为官者要懂得治理大体、培植国家命脉这一基本要求吗？古代的循吏，能变凋敝之地为富饶之乡，把愚顽之民教化得讲求礼让，例如召信臣、杜诗、文翁这类人物。他们能有如此政绩，难道仅凭自己对治理之术讲求有素，以及才干谋略有过人之处吗？

《尚书》说：要注意养成节俭的品德，只想到永远保有天命。这样说，的确是鉴于在奢与俭之间，可以分辨出君王心术的敬谨与放肆，社会风俗的淳厚与浇薄呢！当今太平已久而人口日多，人情由质朴而趋于华饰，物力虽然丰厚也容易匮乏的。正如汉代的诏书所言：制造精美物品必然影响农事，刺绣高级丝织品就会害苦了家庭纺织。百姓染上了奢华习气，久而久之，富者便会超越礼制的规定，贫者则可能由于其消费超过了自己财力的限度而走上犯罪道路，这难道是小事吗？皇帝我躬行节俭，出于天性，不时颁布训令，希望挽回浇薄风俗。然而诏书屡下，却未能使民风臻于淳朴。想要严厉法制以作纠正，又恐官吏执行不好，反而会扰害人民。究竟该如何来移风易俗呢？古代的卿大夫如杨绾、卢怀慎、杜黄裳这类人物，志节高尚而生活

作风朴素,使人们闻风而感化。《诗经·羔羊》所歌咏的廉洁作风,在他们身上还风流长在。当今的时尚为何一定要不同于古人所讲的那样呢?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整军经武,是先王用以保障太平之策。但如果所谓军队只是空有名册而无可用之兵,白白浪费国家粮饷,那就必须以检查挑选为重点来加以整顿。汉代训练军队的办法,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卞射"等制度,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唐朝时练兵于都城郊外,宋代有"大阅兵"的典制,其办法怎样?《文献通考》载述兵有"五练",其名目各是什么?我朝凭武力威震天下,皇帝我对此家法不敢懈怠荒疏。不仅亲自校阅侍卫禁军,屡次指示掌兵大臣尽心挑选训练,又按时举行大校阅,教练演习阵法。每年秋天例行围猎,借以练武习劳。以至对中央直辖省份的军队,也严饬将军、督抚、提镇等对照簿册进行检查考核。这样做果真能挑选出骁将锐卒,淘汰掉老弱之兵,使军队变得切实可用吗?果真能修整出坚甲利兵,改变营寨的窳劣,从而使军械精良起来吗?现在有些将领奴役兵丁,克扣粮饷,若不加以惩办儆诫,又如何整肃军政呢?

总之,谋求治道是用来实现国家治理,解决了人民的生计问题后必须继而恢复其善良的本性,节省财政费用以充裕人民的生活所需,振兴军事以壮国威。对此四条,若能加以互相参照考订,则实行的路子清晰而易于遵循;若能加以贯通变化,做出裁制,则推行起来无不获利。众士子学于古训,通晓当今事务,就请将你们的建议首先奉献出来,今后有了远虑宏谋尚期随时禀告。要尽力写出平素积蕴的知识见解,不要因袭陈旧之言。皇帝我将亲自评定你们的名次。

陈沆　殿试对策

陈沆(生卒年不详)　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工诗,风格以平淡见长。兼治宋代心性之学。撰有《近思录补注》、《诗比兴笺》、《简学斋诗存》、《白石山馆遗稿》等。

臣对:臣闻制治所以经邦,安民在乎正德,同风必先谨度,讲武斯可宁人。遐稽载籍,《书》纪绥猷之命,《诗》歌率育之文,《易》垂制节之占,《礼》著经戎之典。备哉灿烂!崇闳之式也。伊古帝王,绍天阐绎,冠德卓踪,端表极于几康,布经纶于久大,崇俭以敦民俗,简兵以示国威。莫不本虔恭抑畏之心,为骏固醇庞之业。用是无偏无党,上理登焉;引养引恬,群伦育焉。以礼以时,财用阜焉;有严有翼,武备修焉。所由覆露芸生,陶甄品汇,胥一世而跻之仁寿者,恃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道光谟烈,功洽修和,陈度数以移风,饬车徒以讲事,固已时几无逸而仁让咸兴,训俗有方而蒐苗罔懈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景郅治之上仪,冀刍言之有得。进臣等于廷,而策之敷帝治、笃民生、挽浇风、简军政之要。如臣椿昧,何足以裨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夙昔所诵习者,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帝王之心法,即帝王之治法,其理不外一"中",而因博求夫长治久安之道。此诚勤施之至意也。臣谨按蔡沈《书传》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孔颖达《尚书正义》曰:立君所以安民,安民必先明道,明道必先精心一意。精一所以执厥中也。嗣是仲虺言"建中",孔子言"用中",其源俱出于此。而《中庸》"明善诚身"之说,尤足与"惟精惟一"之旨相发明焉。《诗》颂"不刚不柔",《传》称"宽猛相济",中之道也。然而汉承秦苛,网漏吞舟而治;诸葛治蜀,赦不轻下而亦治。宽严不同,则所乘之时与地异也。地天交而成《泰》。《程传》谓能艰贞者,即可常保其泰。又曰善处泰者,其福可长也。盖德善日臻,则福禄日厚。德逾于禄,则虽盛而非满。是说也,诚为保泰之道矣。"九二"一爻,卦义赅备。其曰"包荒"者,即《论语》"宽则得众"之义也;曰"用冯河",即"信则民任"之义也;曰"不遐遗"、曰"朋亡"者,即"敏则有功"、"公则说"之义也。司马光论人君之德有三,才有五,而道则一,与《中庸》"达道达德"、"人存政举"之论若相符合。至于《大学》释平天下,其道莫大于絜矩,絜矩莫大于公好恶,公好恶莫大于理财用人,故特举二者言之。要之,丕基永固,则惟

视兢业之一心也。我皇上设诚于中，观化于久，洵足绍勋、华之轨而继轩、颛之规矣。

制策又以民生风俗为国家之元气，而欲使民皆足食，户尽可封，于以顺人心而收实效。此尤安百姓之全谟也。臣惟民生不厚，则无以为礼义之资；民德不兴，则又以生奢淫之渐。此井田与学校，所以为天下之大命也。使得其意以行之，则虽不必三代之井田，而何异东南之亩？不必三代之学校，而何殊上下之庠？若徒视为虚文，则讲约劝农皆足以滋犹。此苏洵《田制》之议病于法古，柳宗元《种树》之篇通于治人，其说有足采也。今夫君之于民，有父母师保之责焉，而凡大小臣工皆与分其责者也。诚使为大吏者公忠以率其属，务相求于人心风俗之原；为群吏者惛惛以字其民，不徒勤于簿书案牍之末。则安见凋敝之地不可转为沃饶，顽愚之民不可化以礼让哉？果能父母斯民，则皆如召、杜之守南阳也；肇兴学校，则皆如文翁之治蜀郡也。然古所称循吏，虽讲求之有素，而变通之妙用，讵容以成法自拘？虽材略之过人，而爱慕之实心，必难以虚浮相饰。要在识治体，培国脉，庶几劳民劝相，被润泽而大丰美耳。皇上子惠元元，教养兼至。一时小大之臣，孰敢不励精图治哉？

制策又以奢俭之间，君心敬肆所由分，风俗淳浇所由辨，而欲挽薄俗以臻淳朴。此尤撙节爱养之至计也。臣闻尚俭者开福之原，圣人之行此，可以导众，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行，而民争学其容。夫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天地之势，日趋于文。升平日久，涵濡煦育之余，万物莫不知有生之乐。于是乎文明之象踵事而增，其由和乐而习于华靡，由华靡而流为空乏，亦理之所必然，而势之所不可不虑也。《淮南子》称：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天路不画，越席不缘。舜之为君也，捐璧于谷，蔬食菲服，无以尚已。后世若汉之文帝，衣绨无文，而民破觚斫雕矣。武帝娱游壮观，而民绨锦被墙矣。可知同风俗在正人心，正人心在敦礼教，不徒恃法制以相绳矣。至若卿士大夫者，庶民之标准。诚能如杨绾、卢怀慎、杜黄裳之高节清标，则闻者感而自化，不且与《羔羊》素丝相辉映欤？我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生斯世者，有不登于熙皞之庥者哉？

制策又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而因讲求夫整军经武之道。此尤保太平之至计也。臣谨按:《周礼》大司马春夏秋冬有振旅茇舍、治兵大阅之文,简军实,修军礼。此训练之以时计者也。《汉书》载:连帅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训练之以岁计者也。汉设南北军,每十月都课试。《汉官仪》则谓在八月,《翟义传》又以为九月。唐讲武都外,则在城西外设四门五表、六军五旗之制。宋太平兴国间,定四时讲武仪,按炮角射,军仪精锐,后世宗之。夫不选骁锐,汰老羸,则不足以收实用。而其弊尤莫大于役使兵丁,摊扣粮饷。无以得兵心,何以作兵气乎?善哉苏辙之言曰:天下虽平,不敢忘战。农事之隙,致民讲武,使其耳习闻金鼓,目习见旗帜,而不至于有所慑。练兵之法,贵先练心。人心齐一,则百万之众即一人之身,而教可成矣。圣朝大阅巨典屡次举行,八旗劲旅因时肄习,以奋武卫,以昭戎经,岂不大哉!

若此者:基命以升猷,绍天以立政,去华以崇实,整军以卫民,洋洋乎亘千古而立隆者也。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懋日新不已之功,成悠久无疆之化。中和已致而倍切畴咨,豫大已臻而弥思保乂,法度已明而尤严裁制,兵戎已诘而益勖止齐。平康之福锡,府事之功成,族党之风醇,干城之力裕。猗欤盛哉!协气旁流,淳风四溢,荣镜宇宙,经纬乾坤。于以祗迓蕃厘,式承多祜。则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庆,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制定完备的治理措施是治理国家的需要,安定人民的根本在于端纯正统治者的品德,要整齐风俗必先慎定有关标准,讲习武事方可使百姓安宁。博览群书,可知《书》记录了先王关于思谋安邦之策的政命,《诗》咏唱"众百姓都应该养育"的文句,《易》垂示用制度来节制的占卦卜辞,《礼》彰明关于治理军队的法则。古代典籍所提供的各种灿烂崇宏的范式,是多么完备啊!那些古代帝王,继承天命阐明事理,德冠群伦行迹卓越。在自觉居安思危上树立起最高的表率,在经邦治国的永久大业上展布满腹经纶,崇尚节

俭以敦厚民俗,选练精兵以显示国威。他们无不本着恭敬戒惧之心,开创迅发、坚实、精纯、庞大的基业。因此不存偏私之见,最高的治理就达到了;给百姓的生养和安适创造了必要条件,人民繁育起来;教民以礼,使民以时,财用充足起来;既严肃又威震,军备完善起来。之所以能泽及芸芸众生,改造世间万物,使全社会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地,靠的就是这些措施啊!

敬思皇帝陛下,大道弘扬前代的谋略与业绩,功业达到天下和睦,定出了礼制规格用以转移风俗,为整饬军队而讲论并致力于武备。当然已经做到了时时注意防微杜渐而不贪图安逸,天下仁义礼让之风普遍兴起,规范风俗措施得当,军队训练坚持不懈。然而圣上的心怀如此谦虚,不遗细微,向往至善之治的美景,希望从草野之人的言论中能有所得。因而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关于帝王治学、充裕人民生活、扭转浇薄风俗、检查军政等问题的纲要。像臣下我这般愚昧无知,何足以有补于山海的高深?但当对扬开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怎敢不勉述昔日诵读研习之所得,以奉献管窥蠡测的意见来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忱呢?

跪拜敬读而见策问诏书上说:帝王之心法即为帝王之治法,其理不外乎一个"中"字,接着从多方面探求长治久安之道。这确实反映了勤勉施政的至诚心愿呢!臣下我谨按:蔡沈《书传》说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孔颖达《尚书正义》说:立君是用来安民的,而安民必先明白治国安民之道,"明道"必先精心一意。这说明精心一意是为了在用道时能把握其适中尺度。嗣后仲虺主张"建中",孔子主张"用中",其源皆出于此。而《中庸》的"明乎善"方能"诚乎身"之说,更是足以与"精心一意"的主旨互相阐明。《诗》赞颂"不刚不柔",《左氏传》称道"宽猛相济",这就是中正之道呢!然而汉朝继法制苛严的秦朝之后而建立,其初期竟以可漏吞舟之鱼的粗疏法制而治理了国家;诸葛亮治蜀时,大赦之令从不轻易颁下,也同样使国家达到了治理。二者宽严不同,那是由于它们所依凭的时势和地域各不相同呢。天地相接而形成了《泰》卦卦象。《程传》说能处艰难之境而品德纯正即可常保平安。又说善于自处平安之势,其福可以长

久。因为一个人的道德日臻完善,那么其福禄才会日益深厚。道德水平超过所享禄位,那么其人虽处于"盛"却未"满",不致于"满招损"。此说实为确保平安之道呢!《易·泰》中"九二"一爻,对卦象意义的解释内容完备。其中所谓"包荒",即是《论语》所讲的"宽则得众"之意;所谓"用凭河",即是《论语》所说的"讲信义则民众服从"之意;所谓"不遐遗"、"朋亡",即是《论语》所讲的"勤勉则有功"、"公道则众悦"之意。司马光论人君之德有三,其才有五,而其所循之道则只能是一个。这与《中庸》的"达道达德"、"人存政举"之论大体相符。至于《大学》解释"平天下",具体做法莫大于建立道德标准和规范,这种标准规范莫大于要处以公心来决定好恶,处以公心来决定好恶莫大于理财与用人,所以该章特举此二事来说明。总之,帝王的大基业能否永固,那只须视其有无兢兢业业的戒慎之心。我皇上置诚字于心中,观民风于长久,实足以接续唐尧、虞舜而继承轩辕、颛顼的规则呢!

策问诏书又认为民生风俗是国家元气所在,而欲使人人都足食,户户可旌表,借以顺人心而收实效。这尤为安定百姓的完备计划呢!臣下我想到:人民的生计不丰厚就不能为讲习礼义提供物质基础,而人民的道德不兴行又会因此产生奢华无度的趋势,这就是古代的井田与学校所以成为天下之命脉的原因。当今若能掌握其精神实质而仿行,那么尽管田制不一定仍是三代的井田,学校不一定还是三代时的学校,但它们发挥的鼓励农耕和教育人民的实际作用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仅袭用其空洞的形式,那么就连讲论乡规民约鼓励耕作这样的好事也都足以生出对百姓的烦扰来。因此苏洵题为《田制》的议论批评了形式主义的法古倾向,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说明了与这相通的治民之道。他们的主张都足有可取之处。当今君主对于人民负有父母加师保的双重责任,凡大小官吏也都是参与而分担这种责任之人。果真能使大官们以公忠之心督率下属,务必相求于人心风俗之本原;而为群吏者又本着至诚之心以抚育其民,并不仅仅勤于簿书案牍等末务。那么怎见得凋敝之地不能转为沃饶之土,顽愚之民不可化为礼让之士呢?只要真能像父母对子女那样关心百姓,那么现在的官吏也都可如同汉代的召信臣、杜诗做南阳太守时那样;而在

兴建学校方面都可如同文翁治理蜀郡时那样呢！然而古代所称的循吏，虽然他们的确对法制讲求有素，但他们在执行中加以变通的妙用，难道是只知拘守成法所能办得到的吗？虽然他们才略确有过人之处，但要获得百姓们那种真心爱慕，是不可能靠虚假浮华言辞装饰出来的。总之在于能识治理之大体，培国家之命脉，差不多做到为百姓操劳，勉励他们，多施恩惠而富足起来罢了。皇上惠民如子，对人民教养兼顾。此时的大小官吏，谁敢不励精图治呢？

策问诏书又认为在奢与俭之间，可以分出人君心地的谨敬与放肆，辨别风俗的淳厚与浇薄，而要扭转薄俗以使之臻于淳朴。这最可算得是提倡节制以爱民养民的至善之策呢！臣下我听说：尚俭为开福之源，圣人通过实行它可以引导众人，可以生存有保证。因此其臣下皆效法其行为而人民则争学其风采。的确，制造精美物品，是妨碍农事的；刺绣高级丝织品，是损害家庭纺织的。然而天地之势日趋于文华，加之升平日久，万物在温暖湿润中浸染化育之余，无不感觉有生之乐，于是文采现象接踵而增。其由和乐而习惯于奢华，由奢华而流为物资空乏，也是理所必然的，然而其发展趋势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淮南子》说：尧在统治天下时，自居屋顶的茅草不加修剪，椽木长了也不砍削，而且天路不画画，越席不包边。舜为君时，弃璧于山谷，蔬食薄衣，没有能超过他们的人了。后世帝王如汉文帝，穿普通衣袍无文饰，因而百姓自砸酒具自劈雕床。汉武帝喜欢娱游，而且场面壮观，因而民间便有人用绸锦贴墙了。可见统一风俗在于正人心，正人心在于督行礼教，而不能只靠法制来纠正。至于卿士大夫，本是庶民的榜样，若真能像杨绾、卢怀慎、杜黄裳的志节高尚作风清朴，那么闻听者便会自行感化，不又与“《羔羊》素丝”相辉映吗？我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表率，生于此世的人，哪有不跻身于兴盛和睦的美好境域中的呢？

策问诏书又依据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的道理，而讲求整军经武之道。这尤为保障太平的至善之策呢！臣下我谨按：《周礼·大司马》载有如何在春夏秋冬四季训练回师入城、行军宿营、熟习战斗和大阅兵的文字。检查军用器械，教学军中礼节。这是按季节来计

算的训练。《汉书》载:连帅连年检阅一次车兵之长,三年检阅一次步兵之官,五年举行一次车兵步兵的联合大检阅。这是以年计算的训练。汉代设南北两军,每年十月对将士进行一次集训考试。《汉官仪》则说是在八月间,《翟义传》又认为是在九月份。唐代讲武于都城之外,为此在城西门外按有关规定设置四门、五表、六军、五旗。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制定"四时讲武仪",排炮竞射,军容精锐,后世尊奉它。如果不挑选骁将锐卒,淘汰老弱残兵,便不足以收到军队的实际功用。但军中的最大弊端在于将领役使兵丁,摊扣粮饷。无以得兵心,又怎能振作士气呢?苏辙说得好:天下虽太平,不敢忘战。农事之隙,组织民众讲武,使其耳边习闻金鼓,眼中习见旗帜,而不至于有所恐惧。练兵之法,贵在先练其心。人心齐一,则百万之众便构成一人之身,而训练定可有成了。圣朝大阅兵巨典屡次举行,八旗劲旅因时演习,以此振奋武卫精神,以此昭显治军之道,岂不超越千古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承藉天命以确立宏猷,继承天道以设置政事,远离奢华而崇尚朴实,整饬军队以保卫人民,真可谓开创了千古未有的万分隆盛的局面。臣下我更敬望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不断加强日新不已的道德修养成效,造成悠久无疆的淳美风俗。"中和"境界已经达到了却倍加恳切地访问征询,安泰局面已经形成了却更加思谋保持安定,礼法制度业已彰明则进而强化等级规定,军队业已整治则愈益督励其严格训练。以使平安康乐之福源源得于天赐,六府三事的功业获得成功,社会风俗醇厚,军事力量充足。那是何等美盛啊!协和之气遍流,淳厚之风四溢,华光照耀宇宙,制度规范乾坤。据以敬迎上天的繁富赐予,恭受众神的诸多庇佑。那么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福便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仕途新进,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杨九畹　殿试对策

杨九畹(生卒年不详)　字余田,浙江慈溪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俟考。

臣对：臣闻敬修者绥猷之本，厚生者成治之原，敦淳朴所以端风俗，勤训练所以整戎行。是以《书》纪陈谟，克勤与克俭并著；《礼》言体国，司徒与司马相维。稽诸典册，灿焉备矣。皇道炳焕，帝载缉熙。本议礼制度之经，端文教武功之具。单心宥密，而升恒献颂矣；子惠黎庶，而昌炽兴歌矣；黜华崇实，整军经武，而龙光载赓，兕觥晋祝矣。伊古圣王，临莅区宇，握乾符，阐坤珍，扬鸿名，播芳烈，上凝帝眷，下答舆情。所为开五福之康宁，跻一世于仁寿者，道由于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协健行，化成久道，切持盈保泰之图，成长治久安之业。固已一德日新，万邦丕变，文质酌中，兵农足卫矣。乃圣德渊冲，勤求无已，期大化之维新，察微言于在迩。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崇圣学、厚民生、慎俭德、昭武备之至计。如臣椿昧，何知体要？顾当嘉言罔伏之时，念敷奏以言之义，幸逢万寿庆榜，俾以观光，敢不缕述见闻，以纾管蠡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唐虞授受，不外一"中"。帝王之心法，即为帝王之治法，而因进稽夫刚柔宽严之互用，理财用人之交资。此诚圣学王道之全功也。臣谨按：帝王之治本于道，帝王之道本于心。心者，合天与人而一之者也。自《虞书》以"允执厥中"一语，开千古之道统，嗣是而仲虺作《诰》则曰"建中"，孔子《中庸》则曰"用中"，皆本于是，以推阐道德之功用。其言"惟精惟一"，所由开知行之端也。惟其"精"，则理无不彻而善可明矣；惟其"一"，则心无不实而身可诚矣。先圣后圣，无异旨也。夫"中"非有形迹之可据，要在随事以制其宜而已。《诗·颂》言"不刚不柔"，《左氏传》称"宽猛相济"。言"中"者固在调剂之得其平，而其间先后时势之不同，则尤在柄政者相其所急与其所宜，以神明乎"中"之用。故汉兴之始，承秦之敝，网漏吞舟，无害于宽。而诸葛治蜀，赦不轻下者，所以惩汉末之柔懦也。宽严不同，同归于治，兹其所为得"中"也欤？至于保泰之要，详于《泰》之"九二"，其义与《论语》"宽信敏公"之旨相发明。人君之道著于司马光之论，其意本《中庸》"达道达德"、"人存政举"之义为根柢，要之皆不出于中道而已。《大学》"平天下"以财货、用人为要务，盖非人则无以任天下之

事，非财则无以供天下之用，圣贤固未尝以空言为经济也。而其要则在乎慎德以清好恶之源。所谓絜矩之道，即执中之道也。我皇上中和建极，合道法治法而贯之以诚，统天心民心而主之以敬，巩丕基于永固，登郅治于大同。猗欤休哉！美矣茂矣。

制策又以牧民之道，莫急于富教，欲使民皆足食，户尽可封，而期大小臣工共尽夫父母师保之责。臣窃惟后世之州县，即古者乡遂之官也。《周礼》乡大夫兴其贤能，党正书其德行道艺，族师书其孝弟睦姻，闾胥书其敬敏任恤。遂则遂人巡其稼穑，里宰趣其耕耨。先儒谓：乡言教，遂言养，互交也。三代而后，井田庠序之制既不可行，讲约劝农之文徒以滋扰。将欲顺人情而收实效，惟在良吏本实心以行实政而已。盖州县为亲民之官，虽地有广狭，事有繁简，顾一月之中岂无斋戒停刑之日，亦有因公下乡之时，诚能不辞劳瘁，亲履田间，父老子弟欢然相接，如家人父子言孝言慈，启其固有之良，化其惰怠之习，因而询问疾苦，讲求利益，土田宜垦则垦之，水利宜兴则兴之，树木宜植则植之，务使土田尽其利，妇子尽其力，则衣食足而礼义兴矣。由是义学书院有设也，要使人有所造，而无视旧文之虚立；乡饮读法有时也，要使人知所劝，而不为故事之奉行。保甲所以联族党，要使莠有所惩，而无使良有所扰；积贮所以备平粜，要使民有所利，而无使吏有所奸。转凋敝为沃饶，化愚顽以礼让，何难与召、杜、文翁同称循吏！而尚至如苏洵《田制》之议，柳宗元《种树》之篇，足为扰民之明鉴哉？圣天子保民如子，常以正德利用为亟图。牧民之吏皆思尽心于劝课，含哺鼓腹，食德饮和。四海之内，固已同我太平矣。

制策又以奢俭之分，为风俗淳浇之辨，而虑人事增华，物力易匮，求所以杜其渐而防其微。此诚敦本善俗之至要也。臣按《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左氏》云：俭，德之共也。俭以德名者，有清心寡欲之功，而后有制节谨度之事。民心之淳薄，民俗之美恶系焉。当夫太平日久，物力既盛，则人情以相夸侈丽成风，则财用虑有不给。《管子》曰：奸邪生于匮不足，匮不足生于侈，侈生于无度。是以国奢示俭，国俭示礼，圣王之所以善更化也。图匮于丰，防俭于逸，圣王之所以谨防维也。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

者也。可谓知本计矣。有势位之贵者,冀挽其薄俗,革其颓风,必先躬行节俭,如杨绾、卢怀慎、杜黄裳之高节清标,以为小民之表率。则君子爱礼,小人爱财,而移风易俗之权,返朴还淳之洽,闾阎之间,胥闻风而自化矣。我皇上体唐成俭,踵虞为朴,屏纤丽而弗珍,却贡献而弗纳。在位诸臣,莫不凛《羔羊》素丝之节,彼民其有不观感而兴起耶?

制策又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而筹思简阅之法。臣考《周官·小司徒》伍两卒旅,此训练之数也。《司马法》甸出长毂一乘,此调发之数也。训练宜勤,调发贵少。训练勤则人尽知兵,调发少则民不苦战。汉时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其时训练之方,则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卞射诸制。唐置府兵于各州,其制渐坏,更改矿骑,而讲武都外,固未尝废校阅也。宋有大阅之典,《文献通考》称有五练之目。简阅之法,由来尚已。夫练在于兵,而权则操于将。我皇上练肄雄兵,训迪将吏,盖诚兵将交奋矣。

若此者:法天自强,则至诚无息之学懋焉;修和有夏,则悠久无疆之治成焉。重民依以固本,则万户腾欢;厉武事以宣威,则三军效命。卓哉灿烂,道洽政治,腾实蜚声,蔑以加于此矣。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观象而弥切寅恭,鞠谋而益施乐利。聿昭永赖之功,典常式训;丕树太平之续,磐石长安。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主敬修德是安邦大计的根本,充裕民生是形成大治的基础,敦促归淳返朴是为了端正风俗,勤抓训练是为了整饬军队。所以《书》记载大禹陈献的治世方略中,“能勤”与“能俭”一样突出;《礼》谈到国家机构时,将掌管土地户口的司徒与掌管军政军赋的司马联在一起。查考典册,灿然详备。称皇天下的大道一片光明,帝王的事业十分兴盛。依据礼仪制度规范,端正文教武功手段。由于尽心于宏深静密地积德,因而日月也献上颂辞;由于惠民如子,因而百姓们感情炽烈地唱起了赞歌;由于黜华崇实,整军经武,因而宝剑的光芒直射牛斗,天下人都举起酒器表示庆祝。这些古代圣

王统领整个寰宇，把握天道，阐明地宝，传扬盛名，撒播万世留芳的功业。以此对上回报天帝眷顾，对下抚慰民情。其所以能开创五福齐全的康乐安宁之世，使全社会步入仁德长寿的境地，都是因为采取了以上的措施。

敬思皇帝陛下，圣德修养合乎皇天刚健运行精神，教化形成来源于长久施用大道，笃切于持盈保泰的愿望，成就了长治久安的大业。自然已经是一君之德日新，万邦之俗大变，文采与质朴结合适中，部队与农民足以彼此保卫了。然而圣德高深谦虚，勤求无已，期望带来化导天下的全新景象，察听浅微之言于身边。因而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策问尊崇圣学、充裕民生、慎重俭德、整饬军备的至善之策。像臣下我这般愚昧，怎能知其大体与精要？但当此嘉言不被隐没之时，念及“敷奏以言”的古训之义，以及幸逢万寿庆典，皇上特开恩科金榜，使我等众士子得以来京观光，怎敢不缕述见闻，从而抒发管窥蠡测之见，以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忱呢？

跪拜敬读而见策问诏书上说：唐尧虞舜之间所授受的帝王心法，其实不外乎一个“中”字。这帝王之心法也就是帝王之治法。并又进而考察刚与柔、宽与严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财与用人彼此补充的关系。这确实揭示了圣学王道的全部功用。臣下我谨按：帝王之治本于道，而帝王之道本于心。这里的所谓“心”，是天人合一之“心”。自从《虞书》以“允执厥中”一语开启千古道统，嗣后仲虺作《诰》则讲“建中”，孔子《中庸》则讲“用中”，都是依据此语来推阐道德的功用的。而《虞书》所说的“惟精惟一”，则是人的认知与践行的开端。因为只要“精心”，那么对于道理就会无不彻悟而明晓其善；只要“一意”，那么便会心无不实而德达于诚。对此，无论先圣与后圣，看法无有不同。至于“中”亦即中正之道，并非有形迹可依，关键在善于因事制宜而已。《诗·颂》讲“不刚不柔”，《左氏传》称“宽猛相济”，可见讲求中正之道诚然在于调剂两极而使事得其平衡。但事物之间有发生先后所处时势的不同，这就特别要求执政者视其所急与所宜，把中正之道运用得出神入化。所以汉朝建立之初，鉴于承接了秦末造成的社会凋敝，所置法网疏阔得可漏掉吞舟之鱼，其效果却是法虽宽而无害。

而诸葛亮治蜀，赦免之令从不轻易颁下，为的是鉴戒汉末政风的柔懦。二者宽严不同，却同归于治，这或许就是所谓“得中”了吧？至于“保泰”的要义，详述于《易·泰》中“九二”一爻，其文义与《论语》讲的“宽信敏公”的意旨互相阐明。“人君之道”彰显于司马光的著名议论，其意依据《中庸》的“达道达德”、“人存政举”之义作为根柢，总之都不外乎中道而已。《大学》的“平天下”一节以财货、用人为要务。因为非得其人则无以承担天下之事，非有其财则无以供应天下需用。圣贤诚然不曾用空言来经邦济世呢！而其要旨则在于慎修其德以清好恶之源。所谓建立道德规范之法，亦即守中之道。我皇上道德修养达到了中和境界，从而为天下树立了最高准则，结合心法与治法而贯之以“诚”，统摄天心与民心而主之以“敬”，打牢大基业使之永远稳固，把最高治理带入大同境地。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兴盛啊！

策问诏令又认为治民之道最紧要的是富民教民，欲使人人都足食，户户可旌封，并期望大小官吏都对人民尽到父母师保之责。臣下我窃自认为后世的州牧县令也就是古时的乡遂长官。《周礼》规定：乡大夫荐举贤能，由党正记录其德行道艺，由族师记录其如何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和睦姻亲，由闾胥记录其如何恭敬勤勉、任劳恤民。在一遂则由遂人负责巡视庄稼的播种和收割，由里宰负责督促农民进行中耕除草。先儒说：乡官讲求教民，遂官讲求养民，二者互相促进。三代之后，原有的井田制和学校教育制度已不可行，继续保留宣讲乡规民约、劝课农桑的形式，只会徒然生事扰民。若要顺人情而收实效，全在于良吏本着实心以行实政而已。因为州县守令为亲民之官，虽然所治之地有广有狭，所管之事有繁有简，但一月之中岂能没有斋戒停刑之日？也必有因公下乡之时。真能不辞劳累，亲到田间，与父老子弟欢悦地打成一片，彼此如家人父子一般谈论子孝父慈之理，启发百姓们固有的良知，转化其惰怠的习气；并进而询问其疾苦，指导其讲求利益，田土宜垦则开垦，水利宜兴则兴办，树木宜植则栽植，务使田土尽其利，妇女子弟也各尽其力，那么就不难使民间衣食足而礼义兴了。在此基础上，义学书院将设立起来，其主要目的是使人才有所造就，而无须受不切实际的旧形式的束缚；乡饮酒礼和宣读法令将

按时举行,其主要目的在使人知所劝戒,而不是为了例行公事。同时建立保甲用以联合族党,其要旨在使莠民有所惩戒而不使善良百姓受到骚扰;积贮谷米用以准备平粜,其要旨在使民众有所受益,而不使吏胥有所售奸。这样,必能转凋敝之地为沃饶之区,化愚顽之人成礼让之士,何难与召信臣、杜诗、文翁同称循吏呢?还至于像苏洵题为《田制》的议论,柳宗元那篇《种树郭橐驼传》,确实足以作为扰民的明鉴吗?圣天子保民如子,常以端正品德、有利民用为急切目标。治民之吏都想尽心于劝教耕作,百姓们吃得饱,挺起肚子唱歌,按传统方式生活,一片和睦。四海之内,自然已与我同享太平了。

策问诏令又认为从奢侈还是节俭足可判别风俗的淳朴与浇薄,并忧虑随着人情事理日增其奢华,物力容易匮乏,而探求防微杜渐之方,这确是培厚国本改善风俗的最重要问题呢!臣下我查考《尚书》说:要注意养成那个节俭的品德,只想到永保天命。《左氏传》说:俭是德的固有成分。之所以将"俭"直接称为"德",是因为先有清心寡欲的功夫,而后才有自制自节、谨守标准的行动。这关系到民心是淳朴还是浇薄,民俗是美善还是丑恶。每当太平日久,物力已盛,社会上便容易形成以奢侈华丽相夸耀的风气,这样就有财用不够用的忧虑了。《管子》说:奸邪生于财用不足,财用不足生于奢侈,奢侈生于没有限度。所以国有奢风时提倡节俭,国内物资缺少时则提倡礼义,这是圣王善于依据时势改变教化重点的表现。物丰之时作好财匮之日的准备,足够用时作好不够用的防备,这是圣王谨慎预防社会消费的办法。汉景帝的诏令说:制作精美物品是影响农事的,刺绣高级丝织品是伤害家庭纺织的。真可谓懂得根本大计呢。有势有位的权贵者,若希图挽回浇薄之俗,革除颓废之风,必先躬行节俭,有如杨绾、卢怀慎、杜黄裳的志节高尚作风清淳,以此作为小民的表率。那么就会使君子爱礼,小人惜财。又灵活地实行移风易俗,和谐地引导返朴还淳,里巷之间便都会闻风自化了。我皇上体会唐尧而养成俭德,紧跟虞舜而躬行简朴,摒弃华丽的物品而不以为珍贵,谢绝远方的贡献礼物而不予收纳。在位诸臣无不凛然而持守"《羔羊》素丝"那样的节操,那庶民哪有不观摩感化而振奋起来的呢?

策问诏书又认为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进而筹思检查挑选之法。臣下我查考《周礼·小司徒》有"伍、两、卒、旅",这是指训练时的人数。《司马法》规定"每甸出长兵车一辆",这是指调发时的出兵数。训练宜于勤,调发贵在少。训练勤则人皆熟知军事,调发少则民不苦于征战。汉代在各郡国建置"材官"兵种,京师则有南北两军屯戍。当时的训练方式,则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卞射"等制度。唐朝设置府兵于各州,后来此制渐形崩坏,更改为矿骑。但仍继续讲习军事于都城郊外,不曾废弃定期比武考查的制度。宋代有大阅兵之制,《文献通考》说有"五练"的项目。可见检查挑选之法,由来已久。当然,训练在于兵卒,而权力操于将领。我皇上教练雄兵,训迪将吏,诚然使兵将一齐奋发了。

像以上这些问题:效法上天的自强精神则至诚不息之学必然昌明,在整个华夏大兴和睦之风则悠久无疆之治必将造成,重视民间疾苦来巩固根本则万众欢腾,严格整顿军队来宣播威势则三军效命。多么卓越而灿烂啊!大道遍布到政治里面,腾驰盛大实绩又播扬仁德美名,真是美善得无以复加了。臣下我更敬望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观天象而更切实讲求恭敬,养民之方业已筹谋而越发施予快乐与利益。让史册昭显您所建立的为后世长久依赖的功业,其中的制度将成为常典,法式已堪称准则。将大基业建立在持续太平之上,使之坚如磐石,长治久安。那么我国家万年有道之永福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胡达源　殿试对策

胡达源(生卒年不详)　字清甫,湖南益阳人。湘军首领胡林翼之父。嘉庆二十四年(1819)探花。道光初,充实录馆提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提学贵州大定武举。任满回京,升侍讲学士,擢詹事府少詹事,充日讲起居注官。不久以丁艰归里,未再复出。著有《弟子箴言》、《闻妙查轩文集》等。

臣对:臣闻建极所以绥猷,厚生因以正德,裕国则政先崇俭,安邦则道在足兵。稽诸载籍,《易》著健行之训,《书》重府事之经,《传》称俭德之共,《诗》重肤功之奏。茂实英声,粲然赅备。自古帝王,乘乾御宇,锡极临宸,缉熙有学,康乂有方,封靡有戒,训练有条。悉本夙夜勤求之实,以握天人协应之机。用是醇粹宅心而醇修密,阜安成俗而郅治隆,淳古端风而物力饶,蒐狩诘戎而嘉师靖。郁郁乎焕哉!以扬骏业,畅鸿庥。所由旸雨依时,升恒衍庆,合天下而登诸仁寿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符圜矩,化洽垓埏,固已绍精一之传,昭时雍之象,寓撙节于度支而用不竭,严简阅于戎政而武益修矣。乃圣怀冲挹,蓟菲无遗,既运钧而开模,复考言以询事。进臣等于廷,而策以懋宸修、重教养、敦节俭、饬军伍之至计。臣之颛愚,曷知体要?顾念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当兹对扬伊始之时,敬绎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所诵习乎!

伏读制策有曰:唐虞授受,不外一"中"。而因推夫帝王心法治法。此诚制治保邦之大道也。臣谨按:帝王传心之学,莫切于《尚书》。尧曰"钦明",舜曰"温恭",禹曰"祗承"。而"精一"十六字,要本"执中"。中者,帝王之心法,即帝王之治法也。自是仲虺言"建中",孔子言"用中",皆以执中之道为用人立政之本。盖中则不偏不倚,而有以协乎刚柔相适之宜,得乎宽猛相成之用。故《诗》颂不刚不柔,《传》称宽猛相济,胥是道也。夫治天下者,必审其时势之所际,以善其化裁推行之准。"中"之所在,非执一者所可语也。汉兴之始,网漏吞舟;诸葛治蜀,赦不轻下。其宽严不同,而同归于治者,夫亦审其时势之宜而酌乎大中之用而已矣。且夫中之道,以之开治,则经纬天地而范围不过,曲成不遗;以之守成,则作求世德而百度修明,万邦和协。故《论语》终篇叙帝王心法治法之原,而揭以"宽信敏公"之旨。此虽统论治道,而已括唐虞夏商之全也。司马光论人君之德有三,其才有五,而为道则一。其于《中庸》"达道达德"、"人存政举"之义,实相发明。《大学》平天下一章,专言财货与用人,而推原于絜矩慎德,好民好,恶民恶,此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而即自古帝王执中之心法所推

阐也。皇上参三立极，执两用中，洵接心源于往哲，树作睹于群伦矣。

制策又以昔贤论富教之道，在乎易田畴，薄赋敛，立学校，明礼义，而深究夫遂生复性之经。臣惟古昔圣王统临亿兆，屯以经纶，作之君；蒙以养正，作之师。故《颂》列《思文》，陈常之先急谋率育；《范》陈八政，食货之后爰及司徒。井里之制定，而耕九余三，仓庾充溢；庠序之教申，而祇父恭兄，子弟恂谨。故其时民皆足食，户尽可封，穆然想见乡邻风俗之隆焉。夫力田者，比闾之所以康阜也，而即为教之所由兴；孝弟者，编氓之所以善良也，而实为富之所由成。故庶而未富，必开其田畴之利；富而未教，必明其学校之经。是二者不可不急图也。故井田庠序，古法既不可行；而讲约劝农，虚文或且滋扰。宋苏洵《田制》之议，唐柳宗元《种树》之篇，非其明鉴乎！然则将厚民以生而培风俗，固国家之元气，登郅治于大同，是在有父母师保之责者，瞻榆束来，望杏开田，则南亩尽力而富可致矣；《白华》明孝，《常棣》明欢，则东胶博谕而教可成矣。使徒从事于簿书案牍，而置本务于不图，岂所称识治体、培国脉者乎？古之循吏转凋敝为沃饶，化顽愚以礼让，如召、杜、文翁，则可谓顺人情而收实效者矣。圣朝重熙累洽，民俗敦庞，咸与劝农桑而兴礼乐也，何其盛哉！

制策又以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诚以奢俭之间，君心敬肆所由分，风俗淳浇所由辨也。臣考汉诏有云：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其言崇俭之意，可谓深切著明。夫太平既久，人情日趋于文；物力虽丰，度支侈而易竭。此自然之理也。节其情之踵事而增华，则必示之以礼，而使之不逾其闲；惜乎物之丰极而易匮，则必限之以制，而使之各受其财。古帝王躬行节俭，为天下先，而比闾自臻淳朴。故其时货不弃地，用不尽财，而凡天下之户饮其和、人食其德者，无不乐醉饱而歌太平也。夫茅茨土阶，恶衣菲食，古帝王之遗风，尚已。越自唐宋以来，焚裘谢贡，集囊为帷，罔不以是为兢兢。岂非以移风易俗，道固操之自上乎？又如古之卿大夫若杨绾、卢怀慎、杜黄裳之徒，高节清标，闻者感而自化。岂非《羔羊》素丝之风，有以维持世俗也哉？皇上躬行节俭，时切永图，而天下亦莫不敦俗尚以崇俭

德也。

制策又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臣以为古者寓兵于农，无事扰于司徒，役于司空。故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出则为伍两卒旅之兵。诚法良而意美矣。汉置材官于郡国，而京师有南北军之屯。南军以卫宫城，北军以卫京师，得居重驭轻、内外相制之道。唐分天下为十道，置府兵六百二十四，关内二百六十一。其后一变为矿骑，再变为方镇，三变为禁军，而兵制坏矣。宋统外兵于枢密，而总内兵于三卫，有发兵之柄，无握兵之权。兵制之目有四：曰禁兵，曰厢兵，曰乡兵，曰蕃兵。明之京兵共三十万，畿内兵共二十万，可谓得强干弱枝之道矣。夫兵训之不早，则无以作其义勇之气；练之不勤，则无以娴其击刺之方。是有实籍而无胜兵，徒滋糜费，岂所以整军经武为保大定功之谟哉？圣朝中外禔福，遐迩一体，固可养兵不用，而简阅训练之法尤加详密。凡在将弁咸知鼓舞奋兴，而苞桑于以永固也已。

若此者：基命以单心，遂生以复性，节用以敦俗，振武以经邦，恢郅治而臻上理。猗欤盛哉！盖亘古独隆也。臣尤伏愿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时几已敕而益亹明聪，教养已周而弥殷保乂，风俗已淳而犹思撙节，军制已肃而更切习娴。兢业之修懋焉，诚和之象成焉，淳朴之风著焉，震叠之威昭焉。握乾符，阐坤珍，总八方而为之极。事勤乎三五，功兼乎在昔。由是蔼洽熙春，欢腴函夏，以迓蕃厘，而膺多祜。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高准则是据以谋求天下安定的，富厚民生是端正道德的前提，要使国家富裕则为政先崇尚节俭，要使国家安稳则其道在建立足够的军备。查阅书籍，《易》彰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教训，《书》重视六府三事的法则，《左传》说俭是德的固有成分，《诗》重视军事大功的奏报。茂实英声，灿然齐备。古代帝王承藉天命治理天下，赐给民众最高准则而高居在上，无不在汇集美德于自身方面有学问，在使人民安居乐业上有方法，对如何杜绝奢侈浪费有饬戒，对如何训练军队有条规。这全都凭借朝夕勤勉探

求所获得的修养实效，以把握天人协和感应的机宜。因此能使纯粹之德入居心中而且坚持宏深静密地修积美德，人民富足安乐形成习俗而国家治理也提高到至善的程度，民风端正淳厚古朴而天下物力丰饶，军队训练有素整治得法因而善良百姓得享安宁。真是文采郁郁光华焕焕啊！去播扬大业，广布洪福。由此各种气候正常，日月延展喜庆，聚合整个天下而步入仁德长寿的境地。

敬思皇帝陛下，道德符合天圆地矩，教化融洽九天八疆，当然已经继承了“危微精一”的帝王心传，昭示了社会和睦的气象，寓节制于财政因而财用不竭，严检阅于武政因而军备日益完善了。然而圣上的心怀如此谦虚，细微得点滴无遗，既大力造就人才，又垂询国事而征求建言。因此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关于加强帝王道德修养、重视对人民的教化和抚养、敦行节俭、整饬军队等方面的至善之策。以臣下我的愚昧，怎能知其大体与精要？但想到泰山不排斥撮土，河海不挑剔细流，当此应对开始之时，敬思“敷奏以言”之义，怎敢不勉力陈述曾经诵习过的知识呢？

跪拜敬读而见策问诏书上说：尧舜之间所授受的心法，其实不外乎一个“中”字，接着推求帝王的心法与治法。这确实是施治保邦的大道呢！臣下我谨按：关于帝王“传心”之学，没有比《尚书》阐述得更深切的了。其中说尧“恭俭圣明”，舜“温和谦恭”，禹“恭敬戒慎”。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其要义本在“执中”。这个“中”，既是帝王的心法，也就是帝王的治法。自此仲虺讲“建中”，孔子讲“用中”，都以“执中”之道作为用人立政之本。因为“中”就会不偏不倚，而能够有保证地把刚与柔协调到互相之间的最合适之点，使宽与严相辅相成恰好合乎实际需要。所以《诗》赞颂“不刚不柔”，《左传》称道“宽猛相济”，都是这个道理。因此治理天下者，必须审度其所逢之时势，以便对治理加以变化取舍而获得一个推行它的最佳准则。“中道”的实际运用，不是只知执其一端者所能谈论的呢！汉朝建立之初，法网可漏掉吞舟之鱼。诸葛亮治蜀，赦免之令从不轻易颁下。二者宽严不同而同归于治的原因，也就是都能准确地审度时势而斟酌运用了“大中”之道而已。而且这个中正之道，按

照它来建立对天下的统治，则能经天纬地，而终归超不过它的限度，该委曲成全之事也不会遗漏；按照它来守护已有成就，则能兴作求取传世之德而百事昌明，万邦和睦。故而《论语》终篇叙说帝王心法治法的本原，并揭示“宽、信、敏、公”的宗旨。这虽然只是统论治国之道，但实际上已经概括了唐虞夏商几代的全部经验呢！司马光论述人君之德有三，其才有五，而所循之道则只能是一个。此论与《中庸》的“达道达德”、“人存政举”之义，实在是互相阐明的。《大学》的“平天下”一章，专讲财货与用人，而推本溯源于划一衡量标准与规则，重视修德，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这是自古帝王治理天下的要法，也就是从他们“执中”心法所推阐出来的。皇上与天地并列而建立最高准则，凡事执其两端而取用那适中之道，委实已从往昔圣哲那里接通了帝王心法的源头，在群伦中树立起众人景仰的榜样了。

策问诏书又根据先贤讲论富民教民之道，在于开垦田地、薄取赋税、设立学校、昭明礼义，而深入探究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并恢复其善良本性的途径。臣下我想到古昔圣王统治亿兆之民，用谋略解决艰难事情而作民之君，用培养纯正的品德来开启愚昧而作民之师。所以《诗·颂》的《思文》篇在陈示常规之先，急于考虑“众百姓都应该养育”；《书·洪范》讲“八政”，在陈述了“食”、“货”之后，便说到要设置司徒掌管土地以礼义教育百姓。古代井田制度定立，因而能耕种九年存有三年的余粮，使粮仓充溢；同时各级学校教育开展，因而子敬其父，弟恭其兄，子弟诚实恭谨。所以那时人人都能足食，户户尽可旌封。其乡邻风俗之美盛，至今仍令人想见而肃然起敬。致力于耕种是乡村之所以安乐富足的原因，也是教育赖以发展的基础。笃行孝悌是普通人民之所以能保持善良的缘由，实际上也是每一个家庭的致富之道。所以人口众多而未富就必须开发田亩之利，已富而未教则必须倡明学校教育之法，这两件事是不可不急于谋求的。因此当井田制及与之相应的古代学校教育制度已不可行用时，徒有形式地集众宣讲乡规民约和鼓励耕作也许只会骚扰生事。对此，宋代苏洵题为《田制》的议论，唐代柳宗元那篇叫《种树郭橐驼传》的文章，不就是明鉴吗？虽然如此，但想要富厚民生而培养好的风俗，加强国家的

元气,将至善之治提高到大同境域,这就在于对人民负有父母师保之责的官吏们,能够看到榆树结果而下地收割麦子,望见杏树开花而带头开耕稻田,那么百姓必将尽力于田间耕作因而富裕可致。若又能通过向百姓讲解《诗·小雅》的《白华》篇来宣明孝道,讲解《常棣》篇来彰明兄弟友爱之理,那么原只在大学里传授的伦理知识将变得家喻户晓,因而教化可成。相反,如果仅仅从事于簿书案牍,而置根本大事于不顾,那难道合乎为官者应该懂得治体、培植国脉的要求吗?古代的循吏能变凋敝之地为沃饶之区,化愚顽之民为礼让之士,例如召信臣、杜诗、文翁之所为,那才真可谓是顺人情而收实效了。圣朝长期昌盛繁荣,民俗敦厚,官吏全都参与了劝勉耕织和倡兴礼乐教化的工作。这是何等的盛事啊!

策问诏书又认为:必须注重养成节俭的品德,只想永远保住天命。这是因为在奢与俭之间,确实可以分辨出人君之心诚敬与放肆,以及社会风俗的淳厚与浇薄。臣下我查考汉代皇帝的诏令中说过:制作精美物品,伤及农事;刺绣高级丝织品,妨害家庭纺织。它所讲的崇俭之意,可谓深切显明。由于天下太平已久,人情日趋于文华,物力虽然丰厚,在支用过于浪费的情况下也是容易枯竭的,这是很自然的道理。要节制人情的文华日增,则必须对人民示以礼制,使之不逾越有关法度。为爱惜物力,防止其丰极而易匮,则必须对人们的消费限以制度,使其消费水平适合各自的财力。古代帝王躬行节俭,为天下作出表率,而民间自然臻于淳朴。故而那时货不弃于地,用不竭尽其财,天下家家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因而无不享受醉饱之乐而唱太平之歌。茅屋土阶,布衣粗食,本是古代帝王的遗风,已经是由来已久了。但自唐宋以来,帝王们又焚烧裘袍谢却贡品,收集旧囊袋拼缝为帐幕,无不以此为兢兢讲求之事。这难道不是因为移风易俗的实行,本来就需要从上面做起的吗?又如古时的卿大夫像杨绾、卢怀慎、杜黄裳之辈,志节高尚而作风清朴,使闻听者感动而自觉效法,这岂不是说明"《羔羊》素丝"之风,有维持良好世俗的作用吗?皇上躬行节俭,时时想到永保天命,因而天下之人也无不在努力敦厚民俗风尚而尊崇节俭之德呢!

策问诏书又认为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臣下我以为古代实行寓兵于民，百姓在司徒官、司空官那里不受征赋税搅扰和服劳役之苦。所以居则为比、闾、族、党基层组织中的“民”，出则为伍、两、卒、旅军队编制中的“兵”，的确是法良而意美呢！汉代设置“材官”兵种于郡国，而京师屯有南北两军，以南军保卫宫城，北军卫戍京师，合乎居重驭轻、内外相制之道。唐代分天下为十道，设置府兵共六百二十四处，其中关内二百六十一处。其后一变为矿骑，再变为方镇，三变为禁军，兵制越变越坏了。宋代将外兵统摄于枢密院，而内兵总领于三卫，但都只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柄。其兵制分为四种：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明代的京兵共三十万，畿内兵共二十万，可谓获得强干弱枝之道。对于兵，不及早进行思想训导则不能振奋其义勇之气，不勤加操练则不能娴熟其击刺之技。这样就会虽有足够的在册人数却无可用之兵，白白浪费粮饷，怎么能够实现整军经武、保泰定功的目标呢？圣朝中外安福，远近一体，本可养兵而不用，但检查、挑选、训练之法却更加详密。凡属在职将士，全都感到鼓舞振奋，江山也必然赖此而永固的。

像以上这些问题：承藉天命以纯一帝王之心法，满足人民生活要求进而恢复其善良本性，倡行节俭以敦厚风俗，振兴军事以安定国家，恢弘至善之治而达到最高治理，这是何等美盛啊！亘古最为隆盛了。臣下我更敬愿皇上安益求安，治益求治。时刻警惕防微杜渐已经做到了又努力充实自己的聪明才智，对百姓的教化养育已经周全了又更勤恳于保其安定，社会风俗已经淳朴了却仍思节约，军制业已严整了则更关切将士习武是否达到娴熟。从而使讲求敬慎戒惧的道德修养功夫深厚，举国上下和睦融洽的局面形成，淳朴的民风显著，军事震慑的威力昭显。在此基础上，把握天道，阐绎地珍，建立统摄八方的最高主宰地位，治事勤于三王五帝，功业兼综当今往昔。于是天下和洽如春光融融，欢乐呈现于整个华夏。以此迎来上天繁富的赐予，接受众多的福佑。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永福便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董志国译〕

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仁者先难而后获。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殿试策问

[嘉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承大宝,抚御寰区,二十有五年。孜孜汲汲,罔敢一日暇逸。仰荷昊绥笃祜,列圣贻庥,函夏乂宁,民人乐业。冀与内外臣工早作夜思,由小康而跻上理。洪惟帝王治道之原,学校教人之法,儆群僚以励翼,奠德水以安流。所为斟元阐绎,以保万世丕基者,爰广咨诹,用资启沃。尔多士其敬听之。

道莫高于唐虞,法莫备于成周,《典》、《谟》、《官礼》,万世之圭臬也。皋陶之谟曰"知人安民",而其文何以有详略?三公之职曰经邦论道,而其官何以独不传?人心道心,授受之要,而荀卿何以引为《道经》?乐德乐语,教胄之规,而窦公何以独传其遗法?玑衡为测天之器,而浑天、周髀何以殊途同归?什一为取民之常,而乡遂都鄙何以因地异制?以至虞五服,周九服;虞十二州,周九州;虞服十二章,周九章;虞五载巡狩,周十二年巡狩;礼乐虞分为二,周合为一;兵刑虞合为一,周分为二。变通损益,其道安在?若夫《虞书》五篇,约之以一钦,《周礼》六官,统之以为民极。古帝王所以握万化之原而端出治之本者,不更有心法在乎?

辟雍之名,见于《诗》、《礼》,郑氏笺注何以不同?或以辟雍为文王乐名,其说何本?蔡邕、袁准,其论何以互异?汉以明堂、灵台,辟雍为

"三雍",何故?释奠、释菜,视学合语,其典若何?汉代圜桥观听,称制临决,其时讲论于白虎观者谁氏?东汉魏周养老,为老更者何人?北面乞言,所对何辞?唐七学三馆,宋六学三舍,明六堂积分,其法若何?我朝辟雍肇建,聿举上仪,石鼓石经,灿然昭列。诸生沐浴教泽,有能通经述古,扬扢而言之者欤?

《书》曰:无教逸欲有邦。又曰:天工,人其代之。明乎居官行政,不可以不勤也。为吏者苟能厉廉隅,循法度,其亦可矣。然或怠玩因循,燕燕居息,以废弛为安静,以颟顸为老成,狱讼积而不问,职事惰而不修,国有安赖有是官为?至若曹参之治齐宽而简,诸葛亮之治蜀严而详,而二人皆以贤相称。龚黄之治民以慈仁,张赵之治民以明敏,而四人皆以贤守著。为道不同,同归于治,其故若何?悃愊之吏可以宁人,而缓急或不足恃;武健之才易以集事,而跅弛或至逾闲。量才器使,其道何若?朕宵旰厉精,率作兴事,内而曹司,外而守令,实繁有徒,惟赖为大吏者躬亲倡导,以熙庶绩。而或徒以旅进旅退、谨身寡过为事,岂所谓靖共匪懈者乎?

江淮河济,古称四渎,何以河之为患独甚于今?《尔雅》河出昆仑。言河源者,汉张骞,唐薛元鼎,元都实,孰得其真?周定王时河始南徙,迄今迁变凡几?古谓河不两行,禹何以播之为九?汉武帝之塞宣房,王景之治汴渠,其事若何?贾让三策,其议若何?潘季驯之治河,主于束清刷黄,其切实可施行者何在?方今河道所关至巨,北决则虑穿运,而转漕或碍,南溢则恐入淮,而高堰可虞。自桃汛以至秋汛,自兖豫以至徐扬,司事者昼夜巡防。培筑之法,疏浚之宜,坝堰之宣泄,薪料之储备,在在宜慎。朕不惜巨万帑金,为生民图安宅。欲使绩底平成,民无垫隘,万世永赖,计将安出?

凡此者:法古以立治,兴学以作人,廉法而庶政和,清晏而百川理。尔多士学古入官,先资拜献。今日陈之为谠论,异日施之则为嘉猷。毋泛毋隐,毋袭陈言。朕将亲第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仁德的人，先做出一番努力，然后有收获。

用善来使人归服，就从来没有能使人归服的。用善来培育人，然后能使天下人都归服。

修养成自己，这是仁德；成全外物，这是明智。两方面正构成本性的德业。〔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继承帝位，驾驭广大的地域，已有二十五年。始终孜孜汲汲，不敢有一日的偷闲安逸。仰荷上天的厚予庇佑以及列圣遗留的福荫，全国安宁，人民乐业。皇帝我期望与内外臣僚一起通过早起夜思的努力，使天下由小康之世步入大同之境。因而广泛思考帝王治理天下之道的本原，设立学校教化人民的方法，以及如何儆戒群臣而勤勉辅政，如何稳定那有德于人的江河水道而安伏其水流。用来斟酌起始状态，穷究事理，以保住万世大基业。于是广为咨询，以资启沃，你们众士子敬请听好。

论帝王之道，没有比唐尧虞舜更高的；论治世之法，没有比成周时期更完备的。《尚书》中的《典》、《谟》和《周礼》，实为万世圭臬。《皋陶谟》讲“知人安民”，但其文为何有详有略？《周礼》规定三公之职是“经邦论道”，但这种官职为何到后世独不全设？“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等十六字，为帝王心法授受的要旨，但荀卿为何引作《道经》之语？“乐德乐语”，是教育贵族子孙的规则，但为何只有宴公独传其遗法？璇玑玉衡为测天仪器，但为何用浑天仪来测与用日晷“周髀”来测，可以殊途而同归？十取其一的税法是取之于民的常数，但为何对征取比例各乡遂都鄙可以因地而异制？以至虞时将京畿以外的地区按从近到远分为五等即“五服”，而周朝分为九服；虞分天下为十二州，而周为九 州；虞时从天子到士人的礼服上的文采按尊卑分为十二种，而周朝分为九种；虞时每五年巡视诸候所在之地一次，而周天于每十二

年巡视一次;虞时将掌管礼乐之官分设为二职,周朝合为一官;虞时把掌兵刑之官合设为一职,周朝分为二官。其中的变通损益之道何在?又如《虞书》五篇,概括起来就是一个"钦"字,《周礼》的六官职掌,统一起来就是为人民建立最高准则。由此看来,古代帝王借以把握万事变化之本原,并端正出治天下之根本的东西,不更有正确心法的存在吗?

"辟雍"作为古代大学的名称,见于《诗》和《礼》,但郑康成对它的笺注为何不同?有人认为辟雍是周文王所作乐歌的篇名,此说有何依据?蔡邕与袁准的有关论点为何互异?汉代将明堂、灵台、辟雍合称为"三雍",是何缘故?古时学校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有"释奠"、"释菜",而天子视察学校时,往往把它们合在一起来说,这类典礼的仪式是怎样的?汉代时天子到太学讲论经义,士子儒生环桥观听。经师产生争议,则由天子亲自裁决。当时讲论于白虎观的有哪些人?东汉北魏及北周,帝五尊养有德望的老人于大学称为"三老五更",这"三老五更"是些什么人?史称周武帝向三老五更"北面乞言",后者以何言辞相对答?唐代太学实行"七学三馆"制,宋代为"六学三舍"制,明代为"六堂积分"制,其具体办法如何?我朝建造了辟雍,按期举行了崇重的有关典礼仪式,石鼓文和石经灿然昭列。众位考生沐浴教化的雨露,有能通经述古而阐扬讲论的东西吗?

《尚书》说:勿教安逸之欲流行于国中。又说:天上的职责,要由人来代替完成。这表明居官行政,不可以不勤勉。作为官员,若能砥励品行志节,遵守法律制度,大体上也算合格了,然而有些人怠惰玩忽因循,整日安逸,以废弛为安静,以颟顸为老成,任凭狱讼积压而不审问,对政事懈怠而不整治,国家怎么能依靠这种官吏呢?至于曹参治理齐国刑宽而政简,诸葛亮治理蜀汉法严而制详,但二人都以贤相著称。龚遂、黄霸治理民众靠慈仁,张敞、赵广汉治理百姓靠明敏,但四人都以贤太守扬名。他们所采取的治道不同,却同归于治,原因何在?至诚之吏可以宁人,但遇有紧急之事则可能不足以依靠。健锐之才容易办成事情,但其放纵不羁可能发展到逾越限度。量才使用,其方法如何?皇帝我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率先起来兴办国事,朝内的各

个部门，朝外的太守县令，官吏人数实在不少，全靠身为大吏者亲身倡导以使各项事业振兴起来。然而大吏中也有人专以共同进退、谨身少过为事，这难道是所谓虔敬供职而努力不懈吗？

长江、淮河、黄河、济水，古称“四渎”，为什么黄河水患于今最严重？《尔雅》说黄河出自昆仑山。谈论过黄河发源地的，汉有张骞，唐有薛元鼎，元有都实，他们中谁得到了正确答案？周定王时黄河开始南移，迄今迁变共有几次？古人说黄河不能两道而行，大禹为何将它分散为九条？汉武帝塞宣房，王景治汴渠，是怎么回事？贾让提出的三种治河之策，其具体意见如何？潘季驯的治河主张是“束清刷黄”，其中切实可行之处何在？当今河道情况关系甚大，若其北面堤决则担心黄水穿运河，而可能使漕粮转运遇到阻碍；若黄水南溢则唯恐其流入淮河，而使高家堰堪忧。因此自桃汛以至秋汛，从古兖州、豫州之地以至徐州、扬州，掌管此事的官吏昼夜巡防。而有关培土筑堤之方法，疏浚河道之事宜，坝堰上的开闸泄洪，柴草木料的预为储备，事事宜慎。皇帝我不惜巨万帑金，为民众谋安居。若要使治河成效达到地平天成，百姓不被洪水包围淹没，所筑堤坝可万世永赖，计策该如何定出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效法古代圣王以建立完善的国家制度，兴办学校以振兴人才，使官吏品行廉正遵守法度而各项政事协调，使百川治理而百姓清平安乐。你们众士子学古从政，拜见君主要事先想好自己的建议。今日陈献的是谠论，他日被采纳实行就成了嘉谋。不要空泛隐讳，不要因袭老套之言。皇帝我将亲自为你们评卷排名。

陈继昌　殿试对策

陈继昌（生卒年不详）　字莲史，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其乡试、会试亦俱第一，为三元及第者。他事俟考。

臣对：臣闻建极所以绥猷，兴贤所以致治，旌别严而鹓联式序，荣

光塞而龙叙呈图。此景铄之上仪，郅隆之盛轨也。稽诸载籍，《诗》征式命之符，《礼》重书升之典。克知灼见，百司慎简于《周书》；距浍浚川，九功特详于禹绩。自古帝王，德迈鸿轩，勋逾象纬，莫不建中以锡福，立教以凝禧，储杞梓而用协衡平，销竹箭而休占河润。是以佩德则带铭恭寿，歌风则琯奏昭华，朝殷亮采之咨，世献安澜之颂。所以凝薰六幕，陶铸二仪，永受鸿名而诞膺多祜者，用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道光泰宇，仁洽坤舆，固已神枢合撰于山渊，荣镜腾辉于日月，饬六事而治昭廉法，宅四隩而绩奏平成矣。乃圣怀冲挹，深维长治久安之道，弥切持盈保泰之思。进臣等于延，而策以敷政之本，誉士之经，与夫考察之隆规，宣防之要务。如臣椯昧，奚补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辰，敬维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竭刍荛之一得，用效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道莫高于唐虞，法莫备于成周"，而因《典》、《谟》、《官礼》之垂，进溯宰化出治之本。臣惟帝王之治，因革损益，不必尽同，而其源则一。立纲陈纪，以有为者振其机；恭己垂裳，以无为者端其范。篇章具在，训诫如闻，溯厥心源，若合符节也。知人安民之旨，二帝犹励其难；经邦论道之原，三公独专其责。盖礼乐刑政，制治之具，而心法则有深焉者矣。"精一危微"，千古传心之要，而荀卿或引为《道经》；"乐德乐语"，一朝教胄之规，而宾公独传其遗法。夫治法自唐虞而降，历代沿袭不同。周人修明兼用，亦惟参以变通之妙，酌以损益之施。《记》云：协诸义而协，可以义起者是也。是以玑衡之器，什一之征，画地之殊，分疆之别，莫不因地异制，因时制宜。他如虞服十二章而周则用九，虞巡狩以五载而周则行于十二年。其灿著于礼乐兵刑者，或分为二，或合为一。措施之际，识者于以观制作之精。盖其敬以作所，主善为师，絜矩端好恶之原，修己立均平之准。所以虞廷之交儆曰钦，《周礼》之以为民极。帝王圣不自圣，精益求精，端拱而坐致雍熙，太平而犹廑惕厉者，诚以一个握万化之枢，唯恐因陋就简之意萌于幽独，急功计利之念扰其神明也。我皇上德符圜矩，化洽垓埏，端本则于亿万年，饬几康者一二日，奉三无以出治，遍九有以覃恩。唐哉皇哉，诚帝者之隆矣！

制策又以辟雍之名，见于《诗》、《礼》，而因考夫历代之创建。此诚教崇实学之至意也。臣惟移风易俗，立教为先。古者旌俊造以兴贤，尊彝典以立训，具有仪型，聿存矩范。是以博士之设始自汉宣，太学之规隆于光武。其后三雍并建，经始永平，举视学之典，修养老之文，称制以决五经之异同，亲幸以考诸儒之论说，肄业者给舍，听讲者圜桥，盖一时称极盛焉。降及唐宋以来，莫不悉遵斯轨，故有七学三馆、六学三舍之制。夫褒显经术，尊礼师儒，治化所由昌明，文教所由光被也。顾昔之举是典者，或旷代始一见，或累朝始一行。拘于"更""叟"之说，泥于"巡狩"之文。议礼则聚讼纷如，说经则折衷无主。求其昭示训行，范模天下，懋亘古之隆仪者，亦鲜矣。《洪范》云：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盖必有聪明足以牖世，教训足以宜民者，始足以迪彼颛蒙，光兹道化。故大昕之警众者特其文，主极之持源者乃其实也。圣天子体道敷言，本身立教，中外士民亦既沐浴膏泽矣。兹奉特诏，来岁举临雍之典，崇仪茂矩，炳焕辉煌，谓非千古盛事哉！

制策又以天工人代，居官行政不可不勤，黜其怠玩因循，而期于靖共匪懈。臣考《周礼》以六计弊吏，而策之以廉善廉能；《洪范》以五福锡民，而重之以有为有守。洵课吏之良规，立身之大节也。以废弛为安静，以颟顸为老成，狱讼积而不问，职事惰而不修，国政难与之振兴，即士品亦不堪自问矣。汉以六条察二千石，有田宅逾制之禁，侵渔聚敛之诛，训洁崇廉，至三至再。故汉之吏治，犹为近古。然曹参与诸葛亮皆贤相也，而其为治一则宽而简，一则严而详。黄霸与龚遂皆贤守也，而其为治一则以慈仁，一则以明敏。盖因人立政，因地制宜，惟本慈祥恺恻之心，以副其励精图治之实。夫全才之得，自古为难。有体者不尽有用，有才者不尽有德。所以处常则有余，任重则不足；暂用之易以见功，久任之易以见过。国事所关，民命所属，职无巨细，所系匪轻。惟操其柄者一本乎公正之心，以赏善而黜恶，而大吏复体此意，以相懋勉，不阿所好，不徇所私。庶几贤能之士争自濯磨，于以熙庶绩，贞百度，不徒以寡过为事矣。我朝用人立政，一秉大公，内外臣工，宜何如勤慎以襄盛治哉！

制策又以河之为患独甚于今，培筑疏浚之方在在宜慎。臣惟尧

警九年，禹勤八载，河之为患，自古已然。盖南北之高下不同，而古今之迁徙无定。河自孟津而下，土性卑湿，地势宽平，缓则停淤，急则涨溢，无底柱、龙门之巨限，汇伊、洛、漳、沁之支流，北高南下，其地殊也。汉唐以来，宣房初筑，汴渠再修，始但东趋，继且南注。合济运束淮为一事，举兴利除害之两端，古易今难，其时异也。载稽往牒，如贾让之三策，王景之八渠，季驯所书，至正所纪，具有成法，咸可施行。然而时势互殊，情形各异，泥乎古而河不治，离乎古而河亦不治。是在司事者有精练之才，洞达之识，清廉之守，强固之身，察其高下分合缓急节宣，不以仓卒淆其见，不以补苴毕其功。工坚料实，滞导川疏，古之上策，何以加之？仰惟睿谟广运，德意旁敷，发千万之帑金，拯亿兆之民命。行且见夫金堤巩固，玑镜昭融，则翕河媲于《周诗》，酾渠同夫禹绩矣。

若此者：大猷允升则光昭玉烛焉，多士藹吉则泽敷圜海焉，月要日成则法垂八柄焉，河清海晏则化被九垓焉。英规茂矩，昭古铄今，备哉灿烂！真神明之式也。抑闻荷帡幪之化则仰天之弥高，感光大之恩则冀地之弥厚。臣伏愿皇上至诚育物，稽古同天，政和而治益修，轨顺而防益豫。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隆，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高准则是用以谋求天下安定的，起用贤能之士是用来实现国家治理的，认真识别官吏的善恶则品节清高之臣犹如鹓鹭成行翩联有序地入朝站立，祥瑞的五色云气充塞河洛之间时龙马便会依次呈献《河图》、《洛书》。这真是光华灿烂的最高法式，至为隆盛的极则大道。查考书籍，《诗》证明了帝王的行为符合敬遵天命的要求，《礼》重视从读书士子中选拔人才的制度，《周书》主张百官要慎重选择而对胜任者确有真知灼见，《禹贡》特别详细地记载了大禹用开挖九条水道来疏浚黄河的事功。自古帝王圣德高过帝鸿氏和轩辕氏，功勋超过观天授历的唐尧，无不树立中正的原则以赐福于民，建立教化场所用以凝聚吉祥，储备优秀人才而恰当地使用和公正地考核他们，准备好治水物资而预测出河水浇灌良田的美

好结局。因此臣下敬服其美德,便在腰带上刻写恭祝长寿之辞;人们歌颂世风淳美,便以美玉制作的乐器伴奏。朝廷上殷切询问可以辅佐政事的贤才,世人献上对安抚黄河波澜的颂辞。用来薰陶天地四方,再造天地,永保英名而广受多福,靠的就是这些措施。

敬思皇帝陛下,道德光照太平寰宇,仁心浸润大地,当然已经是神明像高山深水那样融为一体,光辉像日月那样普照。用六项考察内容饬戒百官从而使吏治归于守廉遵法,治河大功告成而使四方百姓安居乐业了。然而圣上的心怀如此谦虚,深思长治久安之道,更笃切于持盈保泰的思虑。于是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施政之根本,兴学之常道,以及考察官吏之隆规,泄洪防汛之要务。像臣下我这般愚昧,怎能有补于皇上的高深学问?但当此应对开始的时刻,敬思"拜献先资"之义,怎敢不谨竭山野农夫的一得之见,以贡献有如葵豆花叶倾向太阳的那种忠忱呢?

跪拜敬读而见策问诏书上说:论帝王之道没有比唐尧虞舜更高的,论治世之法没有比成周时期更完备的,接着垂问《尚书》的《典》、《谟》之篇和《周礼》,进而溯求把握事物变化规律并运用于国家治理的根本。臣下我认为帝王的治世之法,可以沿革损益,不必尽同,但其本原是同一的。一方面要以立纲陈纪的"有为"之举来启动国家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又要以恭己垂裳的"无为"之态来为臣民端正道德规范。关于这一点,有关典籍的篇章俱在,古圣先王的训诫如闻,溯其心法之源,若合符节。知人安民的目标,连尧舜都感觉不易达到因而自励。而经邦论道的职责,古代原本是由三公独任的。因为礼乐刑政,都只是造成国家治理的手段,而帝王心法则有深层次的内涵了。"危微精一"十六字,是千古帝王传授心法的精要之语,但荀卿把它当作《道经》上的话来引用。"乐德乐语",是一个朝代教育贵族子孙的规则,却只有窦公能传其遗法。帝王的"治法"自唐虞以后,历代沿袭不同。周朝将"修德"与"明刑"兼而用之,也注意妙加变通,酌施损益。这正是《礼记》所讲的:对照正义而不违背,就可以按照正义来创制。所以测天的璇玑玉衡仪器,法定赋税按多大比例征收,京畿以外地区划为几等,将天下分为几州,无不因地异制,因时制宜。其他

如虞舜的礼服分十二种文彩而周朝只用九种，虞舜每五年巡视一次天下而周天子十二年一次，尤其灿然明显的是古代礼乐兵刑之官的设置，有的分开，有的合一。在这些事情的措置实施之间，识者可以从中观赏到精妙的创制方法。因为他们以守“敬”来做天子，以主“善”来作民师，通过制定有关标准来为人们好恶提供正确的依据，通过完善自己德行来为臣民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树立准则。因此虞廷君臣相互儆戒强调“谨慎”，而《周礼》则是作为人民行为的最高准则而制定的。古帝王圣明而不自以为圣明，精益求精，端身垂拱而不干事就招致和睦兴盛，天下太平而仍经常警惕自励，这诚然是因为一人掌握万事变化之关键，唯恐因陋就简之意萌生于幽居独处之中，急功近利之念困扰其精神呢！我皇上道德符合天规地矩，教化融洽九重天和八方边际，端正了亿万年不变的根本法则，每天处理政务就检讨自己是否居安忘危了。崇奉“三无”的境界而拿出治理措施，把皇恩施遍九州万民。多么伟大而辉煌啊！真是帝王中的杰出者呢！

策问诏书又鉴于“辟雍”之名见于《诗》、《礼》，并顺而考求历代对国家学府的创建。这确实是敦崇实学的至意呢！臣下我想到，移风易俗应以立教为先。古代旌表才俊之士以使大批贤能兴起，尊崇彝宪典章以树立准则，而且在这方面树有典型，立有规范。所以博士的设置始自汉宣帝，太学制度兴盛于东汉光武帝时。其后三所大学并立，创始于永平年间。当时举行了天子“视学”的典礼，完善了尊养“三老”于学校的制度，皇帝亲自裁决关于五经的学术争议，并亲临太学以考察众儒的论说，给讲习学业者安排馆舍，让旁听者环桥而立，因而一时称为极盛之事。等到唐宋以来，历朝无不悉遵这一法式，故而有“七学三馆”、“六学三舍”的体制。褒扬光显经学儒术，尊崇礼制师事儒者，是国家管理和社会风俗达到昌明的途径，礼乐教化隆盛延布的基础。但往昔能行此法则者，或几代才得一见，或几朝始有一行。往往拘泥于“五更”是否为“五叟”之说，古帝王巡视诸侯究竟称为“巡守”还是“巡狩”这类支节问题。议礼则聚讼纷纭，说经则折衷无主。想要从中找到能昭示行为准则，规范天下，扩展亘古最高法式的，也太少了。《洪范》说：帝王宣布最高准则，就要作为大法和训条，它符

合天帝的意旨。因为必须有聪明才智足以诱导社会、教化训诲足以适合人民的君主,才足以启迪那愚蒙之民,光大这道德教化。所以一大早就警诫众人,这只是一种推行教化的具体形式;尊崇最高准则,抓住教化的本源,这才是推行教化的本质显现。圣天子体察天道而广为宣讲,以身作则建立德教,中外士民业已沐浴恩泽了。现奉特诏,明年将举行天子驾临辟雍的大典,想见那崇隆而丰茂的礼仪规则,光彩辉耀,岂非千古之盛事!

策问诏书又认为上天的职责要由人来代行,居官行政,不可不勤勉,因而贬斥怠玩因循之风,期望百官努力不懈地恪尽职守。臣下我查考,《周礼》以六条标准来评判官吏,而以"廉善"、"廉能"的要求来鞭策他们;《洪范》以五种福祉赐予人民,而所看重的是官吏"有作为"和"有操守"。这实为督导官吏之良视,立身之大节呢。若以废弛为安静,以颟顸为老成,狱讼积压而不审问,政事怠惰而不修明,不仅国政难以振兴,而且作为士人的品行也堕落得不堪自问了。汉代以诏令"六条"内容考察二千石,其中有对田宅超过限度的禁断,有对侵渔百姓聚敛财富行为的责罚,崇廉倡洁,再三再四,故而汉代吏治仍然近似古代。然而曹参与诸葛亮均为贤相,而其为治一个宽而简,一个严而详;黄霸与龚遂都是贤太守,而其为治一个靠仁慈,一个靠明敏。这说明,为治可因人立政,因地制宜,问题全在于要能够本着慈祥恺恻之心,去切合励精图治之实。自古全才难得,有学问者不全有能力,有才者不全有德行。因此一般官吏的情况是:处常则有余,任重则不足,暂用之易于见功,久任之易于见过。但用人行政为国事所关,民命所托,官职无论大小,所系非轻。这就全靠用人者坚持公正之心,以赏善而黜恶;而大吏又能体会此意去相互上下勉励,不偏袒于好友,不徇情于私人,差不多做到贤能之士争相磨练,为了国家和人民而兴办各种实事,端正各种制度,而不仅仅以少犯错误为能事了。我朝用人立政,一贯秉着大公无私的原则,内外臣僚,应当如何勤勉谨慎以共同辅助盛治啊!

策问诏书又鉴于黄河为患于今特严重,在培筑堤坝、疏浚河道的方法上应处处慎重。臣下我想到尧曾为此戒备了九年,禹曾为此辛

勤了八载，黄河为患，自古已然。都因为南北地势的高下不同，而河道从古到今迁徙不定。黄河自孟津以下，其流域土性卑湿，地势宽平，流缓则泥沙沉积而淤塞，流急则暴涨横溢。此段已无底柱、龙门那样的巨大天然阻限，又汇入了伊、洛、漳、沁等支流，因为北高南低，地势不同。自汉唐以来，由于先有宣房河堤的修筑，后有汴渠的开凿，黄河开始只是东流，继而则又南注。在治河战略上，欲将“济运”与“束淮”结合起来，使兴利与除害并举，此事古代容易办而当今却困难，因为时势已不同了。查阅已往的有关书籍所载，如贾让的治河三策，王景的八渠分洪，以及潘季驯所写的，元朝至正年间所记的，俱有成法，都可施行。然而古今时势互殊，情形各异，拘泥于古代成法黄河不可能得到治理，完全抛开古代成法黄河也不可能得到治理。这就在于掌管治河之事者要有精练的才干，洞达的见识，清廉的操守，强壮的身体，能明察地势之高下，河道之分合，水流之缓急，以及洪水何时宜束蓄，何进宜宣泄，不因仓促而自乱其定见，不用修修补补来成其事功。用足实的材料，修坚固的工程，播导壅滞，疏浚河道，这在治理施工方面，自古已为上策，有什么能比它更好呢?敬思皇上睿谟广运，德意遍施，拨出千万帑金，拯救亿万百姓生命。人们即将见到黄河金堤巩固，水平如镜，发出融融之光。这样，按图合祭大河又恢复到《诗·周颂》所描写的状况，而疏导河渠之功则等同于《禹贡》所述了。

像以上这些问题：宏图大计允当成熟则光辉照耀美好天象，人才济济则恩泽遍布海内，对官吏考核实行日结月总则治吏之法垂示八柄，河清海晏则淳美教化直上九重天。英规茂矩，昭古光今，完备而灿烂，真是神明所造的法式呢。且又听说：蒙受皇天覆盖之德则祝愿天能更高，感激大地光大之恩则希望地能更厚。臣下我敬愿皇上以至诚化育万物，坚持考察借鉴古法如同皇天一样广远，大政业已通和则使盛治更加修明，河流业已顺轨则更注意加强对水患的预先防备。那么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隆盛便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皇威，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许乃普　殿试对策

许乃普(?~1866)　字滇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榜眼。道光、咸丰年间,历任贵州、江西学政,官至兵部尚书,曾充经筵讲官,赏加太子太保衔。其多次充任乡试正考官及殿试阅卷大臣,以屡司文柄,历官三朝,谥文恪。

臣对,臣闻建极为绥猷之本,崇圣为典学之原,官箴肃而百职具修,水利兴而万民允赖。粤稽载籍,《易》重体元,《书》详教胄,凛《周官》则法廉交勖,遵《禹绩》则清晏呈祥。茂矩崇仪,粲然具备。自古圣人在上,锡畴御宇,握镜临宸。以之饬旰宵而亦临亦保,以之广乐育而是训是行,以之分职设官而治隆于熙载,以之平天成地而绩奏于安澜。懋昭执竞,圣功也;兴贤育材,至教也;纲纪无不肃,府事无不修,又上理也。所谓埴在埏,金在熔,陶天下为一家者,恃此尔。

钦惟皇帝陛下,斟元寿世,锡福诚民,固已健行撰协于清宁,时敏化先于庠序,联一德而泰交叶吉,恬三汛而丰靖征休矣。乃睿怀冲挹,深维累洽重熙之运,弥切持盈保泰之图。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单心逊志之修,造士崇儒之要,考绩亮功之典,宜民度地之功。以臣占毕庸愚,奚知体要?顾念对扬敷奏,拜献先资,敢不即平昔所诵习者,用效刍荛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道莫高于唐虞,法莫备于成周",而因参观《典》、《谟》、《官礼》之源流,以求其损益变通之道。此诚治法心法之要也。臣谨按皋陶之谟曰:"在知人,在安民",而知人尤为安民之本。有虞之君知人则哲,五臣弼亮,而后致四方风动之休。惟在位者咸当其职,斯在下者咸奠其生也。故于"知人"之说特详。三公之职,经邦论道,弼谐燮理,不名一官,由其所任者大也。"人心道心"之语,荀子引为《道经》,则可知伪古文之所自出矣。"乐德乐语"之教,窦公传其遗法,则可知成均之教之流泽远矣。测天之器,玑衡是始。为浑天,为周髀,皆神明其意而变通之。赋民之额,什一为常。为乡遂,为都鄙,皆

权度其宜而损益之。若其建置，则五服、九服之分，十二州、九州之别，《禹贡》、《尔雅》、《职方》可按籍而稽也。其服色制度，则虞服十二章，周以九章；虞巡狩以五载，周以十二年。至礼乐，虞分为二，周合为一；兵刑，虞合为一，周分为二。此由有姒之世，浑噩堪风，民情淳朴，垂裳而理，礼乐宜详。及乎成周，地大物博，风会日开，遂不能无所增损而繁简因之。要之《虞书》五篇，约之以一钦；《周官》六职，统之以为民极。则"敬止"、"敬胜"之学，"建极"、"锡极"之模，先圣后圣何尝不若合符节哉！皇上庄敬日强，钦明立极，圣功之懋，洵迈成周而媲美虞廷矣。

制策又以辟雍之名见于《诗》、《礼》，而因详考笺注之异同，与夫列代之制。臣按辟雍之说互异。《大戴礼》曰：明堂外水曰辟雍。是以明、辟雍为一也。蔡邕《月令论》则以庙学、明堂、辟雍为一。《春秋释例》则以庙学，明堂、辟雍、灵台为一。郑康成谓灵台、辟雍在西郊，《周颂》"于彼西雍"即辟雍。孔颖达亦谓灵台在国之西郊，与辟雍同处。是与明堂、太庙异地，义固甚明。古者学校观礼，有"释币"，有"释奠"，有"释菜"。"释奠"有常举者，如《文王世子》云"凡学，春官释奠于先师，秋冬亦如之"是也。有不常举者，如《灵台》之诗曰"於乐辟雍"，言始建学也。所谓大昕鼓征及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是也。"释菜"之礼，每岁行之。如《月令》"季春命学正习舞释菜"，《周礼·大胥》"春合舞舍菜"是也。若夫临雍之制，则《光武纪》建武中，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永平中临辟雍，初行大射礼。至若虎观谈经，临制称决，尤见崇文盛事。"三老五更"：老，寿考之称；更，谓多所更历。膺是选者，皆一时世臣重臣，亦巨典也。唐七学三馆，宋六学三舍，明六堂积分，其制备详于胄监，亦教育人材、敬业乐群之良法也。仰惟圣朝肇建辟雍，石鼓石经咸昭法守，多士观光鼓舞，岂不懿欤！

制策又以居官行政，不可不勤，狱讼积而不问，职事惰而不修，而欲力挽夫怠玩因循、废弛颟顸之弊。此诚率作兴事之要图也。臣谨按郑注《周礼》，六计以廉为本。《黄霸传》有"察廉"。王褒《四子讲德论》曰："禄勤增奉，以励贞廉"。廉固人臣之大节，然人臣不可以之自诿，

谓进退可幸无过，燕燕居息，遂泰然忘效职分猷之义也。夫尊莫尊于九重，而人主不以寡欲清心，遂谓可乂安寰宇，亦不以制节谨度，遂谓可高拱法宫也。方且一日万机，不遑暇逸，而人臣不过智效一官，能效一职，当亦胜任无难矣。乃或以干济责之，而未必实心；或以明允期之，而转多留狱。在国家优待臣工，方薄惩其退葸之非，而力振其因循之习，独为人臣者不堪清夜扪心耳。夫萧规曹守，较若画一，而诸葛治蜀，陈寿称其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风化肃然，何严而详也！龚黄之治，古所称慈惠之师；张敞、赵广汉之尹京兆，盗贼屏息；人民安堵，则又何尝非贤守也。为人臣者，亦惟尽湔其委靡之习，仰体圣天子敕几图治之怀，以几于靖共匪懈之义，则庶乎其可矣。

制策又以河道所关至巨，而因详稽历代治河之法。此万世所永赖也。臣考《尔雅》，河出昆仑。言河源者如张骞、薛元鼎、都实诸人，皆不得其实。按星宿海之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阿勒坦者，黄金也；郭勒者，河也。此系黄河之源，其水已黄。至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上有天池焉，则尤黄河之上源也。若治河之法，自汉迄今，代有成效。而潘季驯"束清刷黄"之说，尤切实可见诸施行。夫坚筑高家堰，蓄洪泽湖所注，全淮之水以七分入清口，刷黄入海，而以三分入运河，自山阳、宝应、高邮、江都三百里内，以达之江，诚有以固东南之保障，导粮艘之关键也。自在善治河者因时度势，或设矶嘴以御其冲，或修月堤以防其溃，或挑引河以杀其流。而其大旨，不外助淮以敌河，使淮治而河亦治；合黄淮以治漕，使黄淮治而漕亦治。则水得遄行而帑归实用矣。

若此者：德懋建中，化行劝学，而百僚率职，四渎安流。是用北燮南谐，东渐西被。臣尤伏愿皇上至诚无息，益臻治安。宵密基而倍切宸修，乐育宏而愈恢文治。虽朝无幸位，而忱恂迪哲必饬以敬勤；虽河出荣光，而疏筑宣防必求其永久。由是雨旸时若，年谷顺成，受厚福以浸黎元，永延长而膺天庆，蕃厘溥锡，仁寿同跻。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树立最高准则是谋求国家安定的根本,尊崇圣贤是主抓学习的开端,官诚严肃而百政俱修,水利兴修而万民信赖。查考典籍,《易》强调体察天地万物的本原,《书》详示如何教育帝王贵族的后代,按照《周官》的严格要求大小官吏相互要勉励循法与守廉,遵循《禹贡》来治水则河清海晏纷呈祥瑞。丰茂的规则,崇隆的礼仪,灿然具备于典籍之中。自古圣人在上,施布九种治世大法而统御天下,手握明镜登临宸极。依据圣学典籍,他们自饬于勤政则光明照临又一心保民,推广学校教育则既训导又做出行为表率,分职设官而使治理在完成政事上特隆盛,实现地平天成则使治河工程取得安伏狂澜之功。大德昭显,保持强盛,这是圣人修身功夫的表现。兴贤用能,广育人才,这是教育事业已步入至善的特征。法纪无不严肃,六府三事无不修明,这又显示国家管理已达到了最高的水准。所谓将粘土置于陶模,将金属放入熔炉,把天下陶铸为一家,靠的就是这些措施罢了。

敬思皇帝陛下,斟酌元气加寿天下,恩赐福禄和洽人民,诚然已将刚健运行同天下清平融为一体,敏于修德的教化最先在学校推行,用纯一的品德联结起官吏而政通人和无不吉利,并使每年的三次讯期安然度过而百姓丰足安定喜气洋洋了。然而皇上睿圣的心怀如此谦虚,深思国家日益和睦兴盛的前景,更殷切于持盈保泰的谋求。因而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纯一心法谦虚为怀的修养,造就人材尊崇儒学的要领,考核政绩辅助天工的法则,便利人民查看地势的政事。以臣下我的学识庸愚,如何能知其大体与精要?但念及应对奏陈,事先提供个人谋划,乃是人臣的义务,怎敢不就平素所诵习者,呈献山野农夫的一得之见呢?

跪拜敬读而见策问诏书上说:论帝王之道,没有高过唐虞的,论治世之法,没有高过成周的。接着比较观察了《尚书》中二《典》、三《谟》和《周礼》的源流,以探求其中的损益变通之道。这诚然是治法心法的精要。臣下我谨按:皋陶的献策说要了解官吏,安定民心。而了解官吏尤为安定民心的基础。舜帝了解官吏因而明智,获得五位杰出大臣的辅助,而后招致四方闻风响应的喜庆。只有使当权者全

都称职，那在下之民才能都得到安定的生活。所以皋陶对了解官吏这方面讲得特别详尽。三公的职责是经邦论道，彼此协调而调理阴阳变化，本身没有管理任何一方面政事的名义，因其所任职责太重大。“人心道心”一语，荀子当作《道经》上的语句引用，这就可知伪古文《尚书》是从何而出的了。“乐德乐语”的教育，窦公传其遗法，这就可知西周及其以前大学教育的流泽很广远了。测天仪器的出现，是从璇玑玉衡开始的。其后制造浑天仪，制造出测量日影的“周髀”，都是人们神会璇玑玉衡的原理而加以变通的产物。征赋于民的数额，以十分之一为比例，但在乡遂，在都鄙，官吏都能因地制宜地灵活变通，对此比例加以增减。至于说到古代的行政建置方面，那么有虞舜将京畿以外之地分为五等而周朝分为九等的区别，有虞舜划分天下为十二州而周划为九州的不同，这在《禹贡》、《尔雅》、《周礼·职方氏》上都可依据古籍的记载而加以查证。在服色制度方面，虞舜礼服十二种彩章而周只分九种，虞舜每五年巡视诸侯一次而周天子十二年一次。以至于礼乐之官的设置，虞舜分为二，周合为一；兵刑之官的设置，虞舜合为一，周分为二。这是由于虞舜为帝之时，社会风气浑厚正直，民情淳朴，人君垂裳而治，礼乐之事需要周详一些；到了成周时期，地大物博，风气日开，便不能完全因袭先前政事设置的繁简而无所增损。总起来看，《虞书》五篇可概括为“谨慎”一词，而《周礼》讲的六官职事，统一起来可以作为人民行为的最高准则。这表明“敬胜怠”到“极其恭敬”的主敬之学，“建立最高准则”到“把最高准则赐给人民”的治世模式，先圣与后圣又何尝不是前后一致的呢？皇上庄重敬慎的修养功夫日见其强，恭敬圣明，树立了最高典范，圣学功夫的弘扬，实在是远超成周而媲美虞舜了。

策问诏书又因辟雍之名见于《诗》、《礼》，进而详考有关笺注的异同，以及历代学校制度。臣下我考查：关于古代大学即辟雍，说法各有不同。《大戴礼》说，明堂四周环水就叫辟雍。这是把明堂与辟雍看成是一回事。蔡邕《月令论》则认为庙学、明堂、辟雍三者是一处。《春秋释例》又认为庙学、明堂、辟雍、灵台四者是一处。郑康成则说灵台、辟雍在国都西郊，《诗·周颂》中的“于彼西雍”就是指辟雍。孔颖

达也说灵台在国都西郊，与辟雍同在一处。据此来看，辟雍与明堂、太庙异地，这意思是很明白的。古代学校公开举行的典礼，有“释币”，有“释奠”，有“释菜”。“释奠”有经常举行的。如《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开学，每年春天都要对先师举行释奠之礼，秋冬也是这样”。也有不经常举行的。如《灵台》那首诗说“於乐辟雍”，就是指在太学初建时举行此礼，亦即所谓天子大清早来校视学因而击鼓召众以及学生初入太学时，必须“释奠“于先圣先师。“释菜”之礼每年举行。如《月令》所说：“季春命学正习舞释菜”，《周礼·大胥》所说：“春合舞释菜”，都说明这一点。至于天子亲临辟雍之制，则《后汉书·光武纪》有如下记载：建武中，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永平中明帝驾临辟雍，初行大射礼。至于章帝还亲临白虎观听五经博士讲论经义，并亲自裁决学术争端，更属崇文盛事。所谓“三老五更”，“老”是称其寿高，“更”是谓其多所经历。膺受此选者，都是一时的世臣重臣。这在当时也算得上一种大典。唐代大学教育实行“七学三馆”制，宋代为“六学三舍”制，明代则为“六堂积分”制。这些制度都备详于国子监，也是教育人才、敬业乐群的良法。敬思我圣朝建造辟雍，校内的石鼓文、石经都昭示求学法度，使众士子得以入内观光而大受鼓舞，岂不美哉！

策问诏书又认为“居官行政，不可不勤”，并鉴于有些官吏“狱讼积而不问，职事惰而不修”，决心力挽当前吏治中怠玩、因循、废弛、颟顸等流弊。这的确是督率百官振兴政事的重要考虑。臣下我考查郑注《周礼》上考核官吏的六条标准都以廉洁为本。《汉书·黄霸传》有“察廉”之说。王褒《四子讲德论》主张：“官吏能勤政有为则增其俸禄，以便鼓励他们坚守清廉之节。”清廉诚然是人臣之大节，但人臣却不能以此推卸自己的责任，说什么“进退皆可，但求无过”，整日安闲不干事，忘记效力本职、分担大计的义务。要说地位之尊没有尊过天子的，但人主并不因为做到了寡欲清心，便说天下可以不治而安了；也不因做到了自我节制，遵守法度，便说可以高拱于皇宫了，而且正在日理万机，无暇闲逸。而人臣不过献一官之智，尽一职之能，应该说也还是不难胜任的。然而对于有些官吏来说，你责成他为国家

办大事，他却未必真有实心；你期望他断狱明察公允，他却滞留很多案件不加审理。从国家这方面来看是优待官吏的，正在薄惩其退避畏缩的错误，而力振其因循习气，只是某些为人臣者经不住清夜扪心自问了。说到汉初的"萧规曹守"，法制何其粗略简单又前后一致！而诸葛亮对蜀地的治理，《三国志》作者陈寿称道其对官吏容不得奸猾行径，使人人怀有自励之心，风俗教化肃正，这又是何等的严密而详审。龚遂、黄霸对地方的治理，在古代被称赞为慈爱惠民的师表；而张敞、赵广汉在做汉朝的京兆尹时，使盗贼屏息，人民安定，又何尝不是贤太守呢！作为人臣，也只有彻底清洗自己的委靡之习，体会圣天子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的心愿，接近恪尽职守而努力不懈之义，才算得称职呢。

策问诏书又指出黄河水道所关至大，因而详考历代治河之法。这实为万世永赖之事呢！臣下我查考《尔雅》，说是黄河出自昆仑山。古代讲过黄河源头问题的如张骞、薛元鼎、都实等人，都未能找到真正的河源。认真作察验：星宿海西南有一条河，名为阿勒坦郭勒。"阿勒坦"意为黄金，"郭勒"就是河的意思。此系黄河之源，其水已黄。至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名为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其上有天池，那就更是黄河的上源了。至于治河之法，自汉迄今，代有成效。而潘季驯"束清刷黄"之说，最为切实可行。坚筑高家堰，蓄住洪泽湖所注入的水流。而将整个淮河水的十分之七汇入清口冲刷黄河泥沙入海，而以其十分之三流入运河，自山阳、宝应、高邮、江都三百里之内以达于长江。此法确有可能加强东南地区防涝的保障，并成为疏导漕粮运道的关键呢。要使之成为现实，还在于善于治河者能因时度势，或设矶嘴以挡其冲击，或修月堤以防其溃决，或挑引河以杀其水势。而大旨不外乎帮助淮水以抵敌黄河的倒灌，使淮水得到治理而黄河也跟着得到治理，同时结合对黄河淮河治理而治理漕运水道，使黄河淮河得治而运河亦得治。这样就可使河水得以顺畅奔流而国家治河帑金用在实处了。

像以上这些问题：圣德修养繁茂而树立了中正之道，教化兴行而鼓励人们学习，百官谨遵其职守，四水安恬其清流。因此南北东西政

协人和,皇恩延布。臣下我更敬愿皇上至诚不息,愈益勤勉于治国安邦。积德已厚而加倍迫切于圣德修养,教育已广泛而愈益恢宏文教业绩。虽然朝中无有幸进之臣,然而对于百官除要求其忠诚戒慎、循法明智之外,必定要告戒他们敬业勤勉;虽然黄河已发出了吉祥之光,然而对于疏浚宣泄、筑坝堤防要追求永久可靠。因此风调雨顺,屡获丰收,得受厚福以浸润黎民,永远延长国脉而承受皇天的吉福,幸福普遍施布,一同增仁添寿。那么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永福便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天子尊严,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

陈銮　殿试对策

陈銮(1785~1839)　字玉生,湖北江夏(今武昌)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探花。道光初年外放,在苏、赣等省任知府、粮道,按察使等职,后官至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卒于任。在道光十八年开始的禁烟运动中,曾上奏力将贩销鸦片及开设烟馆者置于重典,吸食者逾期不戒亦论死,为禁烟派重要成员之一。

臣对:臣闻考道者经邦之本,视学者宣德之猷,厘工者熙绩之原,导滞者兴氓之要。古帝王斟元御宇,握镜临宸,以励缉熙则大经务备也,以宏乐育则举礼必隆也,以昭法守则课最宜严也,以利河渠则疏川宜顺也。粤稽圣籍,《易》示健行,《诗》歌於乐,明试训于《虞典》,潴防具在《周官》。茂矩崇规,粲然赅备。用是皇躬饬,而玉金式其度矣;圣教覃,而钟鼓播其和矣;吏治升,宣防理,而廉法得其宜,畎浍兴其利矣。所由祉祚流衍,景运延洪,洋洋乎郅治之上仪也。

钦惟皇帝陛下,元模轨物,广冶陶才,勖庶采以靖共,追丰功于浚距,固已宸修懋敬而化被谨庠,国典钦孚而朝宗庆洽矣。乃圣德谦冲,廑总章衢室之畴咨,冀土壤细流之裨益。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单心之学,礼士之规,弊吏之条,治河之计。如臣椿昧,奚补高深?顾幸当嘉言罔伏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备陈所习,勉述所闻,用

效蠡测管窥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道莫高于唐虞,法莫备于成周",而因思夫损益之精、钦承之密。此诚"执两用中"之至道也。臣谨按:帝王心法之传,莫详于《书》;帝王治法之隆,莫备于《礼》。盖心法以"执中"为要,帝誩以后皆能敬思授受之原;治法以"用中"为归,大舜以来无不奉为损益之准。安民之理,寓于知人,故甄别既严而闾阎自靖;三公之职,资其论道,故略言调燮而秩序已崇。至于"危微精一"之训,尤为千古宥密之衷。虽黄帝学于大真,颛顼学于绿图,帝尧学乎务成,师承有异,而"二典"以"钦"始,"三谟"以"钦"终。不外乎敬,即不外乎诚,荀卿所以独引为《道经》也。璇玑玉衡,说者不一,以《蔡传》折衷为是。言天之家,有"周髀"、"宣夜"、"浑天"之异名,要所以象周天之经纬,仰七政之运行,皆与玑衡有相表里。若夫赋税之异制,章服之异宜,山川州邑之可减可增,礼乐兵刑之可分可合,则又本制作之神明,运精心而立极,因时损益,随事权衡。所以《周礼》六官统之以为民极,而于古今之制至详备也。我皇上心通造化,道阐苞符,衍往圣之心传,析诸儒之底蕴。而且睿思周密,凡在所因所革之条,皆必求夫尽善尽美之道。所谓握万化之原而端出治之本者,不可见心法治法之备乎!

制策又以辟雍之制,代有不同,养老之文,古所最重,询所以嘉惠士林,推崇硕德也。臣惟辟雍之制,周已有之。《诗》曰"於乐辟雍",《礼》曰"天子曰辟雍",非其名所自昉欤?虞夏以还,各有党庠术序之名。汉初未遑学校,文帝始立博士,武帝始兴太学,成帝时刘向请建辟雍而不果。自东汉世祖时,起太学于洛阳,立明堂、辟雍、灵台,号三雍宫,始建辟雍。明帝永平二年,始临辟雍,冬十月壬子幸辟雍,行养老礼。李尤有《辟雍赋》以志其盛,盖圜桥观听者亿万计云。此后若晋武帝幸辟雍,诏复讲旧典;魏齐梁隋,代举其仪;后魏太和十七年幸太学,视石经,亦其制也。"三老五更",蔡邕以"更"为"叟",郑氏以为"老"、"更"各一人,取象三辰五星。汉明帝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不徒以其文,而实应诏讲论。魏文帝以司徒尉元为"三老",鸿胪卿游明根为"五更"。后周武帝以于谨为"三老"。或陈三孝六顺之道,或陈虚心听谏之端。北面乞言,非虚制也。唐之学馆,宋之学

舍，明之六堂积分，典至不一。然皆因辟雍之制而培养人才，且以崇鼙鼓之英也。夫祁祁生徒，济济儒术，郅隆之世，鲜不以此为先务。方今圣天子崇学重儒，典章宏备，京畿太学，遣员肃祀。兹复以明岁亲临，行释奠礼，聿举上仪。沐酳泽者，咸鼓舞以观德化之成也。

制策又曰："居官行政，不可不勤"，而以曹司守令之繁，责诸大吏。此尤整饬治原之至意也。臣窃以为，廉隅法度之规，可以严官箴而不可以尽官职；老成安静之度，足以镇无事而不足以励有为。《书》曰"无教逸欲有邦"，又曰"天工，人其代之"。当其时，君日孜孜，臣日赞赞，咸有一德，何其勤也！且夫庶事之康，期于矢慎，而非怠玩者之所能胜；百度之厘，在于矢勤，而非因循者之所能理。《旅卦·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孔颖达《正义》云：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势不能久留，故君子体之以治狱讼。曹参宽简，龚黄慈仁，诸葛严详，张赵明敏，而或为贤相，或为贤守。循良之绩，照灼古今，所谓为道不同，同归于治也。夫悃愊之吏，惟能加以实力，则于宁人息事之中，早卜缓急之可恃。武健之才，如能剂以平心，则于果敢集事之际，不至跌弛以逾闲。国家课绩之规，先求敏事，盖非惟大法小廉，而当思匪懈也。

制策又以河渠疏浚之宜，与坝堰宣泄之法，在在宜慎，因思所以奏平成之绩而图永赖之功。臣考堤防始于战国，汉以河堤领职，宋以河防名书。屯田员外郎沈立，采摭大河事迹，著为《河防通议》。夫宣房之塞，汴渠之筑，皆补苴之术，而非利导之功。贾让三策，最为周至。后此论河者，莫如潘季驯之束清刷黄。盖清水力劲，不束之则其势不能高出于黄，而无以胜之。南河之治，悉由于此。盖揆今之势，北决而碍漕者可以无虞，惟虑东河为吃重之区耳。治东河者，又莫若先治其上游。明决开封，宋礼浚祥符鱼王口，至中泺二十余里，以正开会通河也。其后河决原武，溢流为二：一自兰阳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经曹濮入张秋。以尚书白昂治之。大抵河流日趋于东，沁河之溜，所宜急杀其势也。皇上廑求民隐，不惜巨万帑金，以为群生图安宅，德至渥矣。况圣虑周详，机宜悉协，窃闻桃汛以后，水流已缓，行见安澜普庆，而尚虞垫隘哉！

若此者:典学守其兢业,得民重夫师儒,聿彰澄叙之严,丕著平成之绩,所谓千载一时也。臣尤伏愿皇上矩执有恒,图陈无逸。饬性功以宰化,而直内方外,弥殷敬义之怀;合乡国以育才,而养老尊贤,益念仪型之式。不以明良已庆,而省日省月考绩稍宽;不以德水既平,而或委或原经营稍弛。将见五辰抚焉,四术崇焉,六廉饬焉,百川顺焉。扇淳风,席福嘏,固保定之鸿业,开骏发之远祥。则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庆,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研求帝王道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天子视察学校是宣播德教的良法,治理百官是兴办政事的肇始,疏河导滞是振兴民政的要途。古代帝王斟酌元气统治天下,手握明镜登临宸极,自励于学问大放光明则对治世大法能完全把握,致力于推广学校教育则一切典礼仪式必求其崇隆。为彰明官吏守职法度,则使考核评比的工作符合严格的要求;为发挥河渠的水利功能,则必令疏浚河道的工程达到使水流顺畅的效果。查考圣学典籍,《易》昭示刚健运行,《诗》歌咏国家学府一片欢乐,对臣下要明察其政绩的教导写于《舜典》,关于治河要筑坝蓄洪修堤防溢等经验详备于《周官》。真是崇规茂矩,灿然完备。循此而行,则帝王自身整饬而德行足称楷模,圣教广为流布而钟鼓播撒和谐之声,吏治水平提高而守廉循法适得其宜,闸坝堤防整齐而河水遍润农田。由此福祚流衍,盛运延长,真是至善之治的最高典范。

敬思皇帝陛下,以自己德行为臣民树立了最高榜样,又通过兴学立教广泛陶冶人才,用恪尽职守鼓励百官,在疏通河水上效仿大禹的业绩。自然已是帝德修养弘扬主敬,教化雨露普润于学校,国家典制令人敬畏信服,治河成就使得百川畅流入海,万民其乐融融了。然而圣德如此谦虚,勤勉地像尧舜那样访问臣民于总章、衢室,希望从土块细流那里也能获得裨益,因而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而策问纯一心法之学问,礼待士人之成规,考核官吏之条目,治理黄河之方略。像臣下我这般愚昧,怎能有补于皇上学问的高深?但既然幸逢嘉言不被

埋没之时，敬念事先提供献策的大义，又怎敢不备陈所学，勉述所闻，以贡献蠡测管窥的一得之见呢？

跪拜敬读而见策问诏书上说：论帝王之道，没有高过唐尧虞舜的；论治世之法，没有比成周时期更完备的，进而考虑继承帝王之道的秘诀和损益治世之法的精妙之处。这的确符合“凡事执其两端而用其适中”的最高法则呢！臣下我谨按：关于帝王心法的传授，以《尚书》最详尽，关于帝王治法的隆盛处，以《礼》体现得最为全面。因为帝王心法以“执中”为要旨，帝喾以后都能敬思其授受本原；帝王治法以“用中”为归宿，大舜以来无不奉此作为损益的依据。“安民”之理寄寓在“知人”当中，所以对官吏认真加以考核甄别则百姓自然安定。三公之职，本以论道来资治，故只须略言如何协调阴阳变化而百官秩序便已确立。至于“危微精一“的训示，更是千古帝王道德修养方面的中正之道。虽然黄帝学于大真，颛顼学于绿图，帝尧学于务成，师承关系各不相同，但《尚书》中的二《典》篇均以“钦”字开始，三《谟》篇都以“钦”字结束，却说明不外乎“敬”，亦即不外乎“诚”，所以荀卿独将“危微精一”十六字作为《道经》之言来引用，也不无道理。关于璇玑玉衡，说法不一。宜以《蔡传》的折衷说法为正确。讲天文学的古代有“周髀”、“宣夜”、“浑天”等不同说法，但总的来说都是用以描述整个天象的分布状况，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的，因而都与璇玑玉衡有相通之处。至于在赋税方面采取不同的制度，在礼服采章方面作出不同的规定，以及州邑设置的或增或减，掌管礼乐兵刑之官的或分或合，那又需要本着创造的精神，精心运筹并建立准则，因时损益，随事权衡。所以，《周礼》的六官合起来可以作为人民言行的最高准则，同时对古今制度又作了最为详备的归纳。我皇上心法通达于创造化育，大道阐明经书秘籍的奥妙，能推衍往圣心传，解析诸儒底蕴。而且睿思周密，对凡属宜因宜革之事，都必定求取尽善尽美的方案。真所谓把握了万事万物变化的总规律，用以端正治国的根本，不可见心法治法的完备吗？

策问诏书又因作为古代大学教育场所的辟雍之制，历代有所不同，而“养老”于辟雍的礼仪，在古代最受重视，便询问嘉惠士林、推崇

硕德的良法。臣下我认为,辟雍之制,西周已经产生。《诗》云"於乐辟雍",《礼》称"天子曰辟雍",这不是辟雍名称的最初出现吗?虞夏以后各朝就已经有了称为"党、庠、术、序"的地方学校。汉初还顾及不到学校事宜,至文帝时始立经学博士,武帝时才兴办太学,成帝时刘向奏请建立辟雍而没结果。自东汉起,世祖兴建太学于洛阳,分立明堂、辟雍、灵台,号称"三雍宫",这才首次建立辟雍。汉明帝于永平二年首次驾临辟雍,冬十月壬子,驾临辟雍,举行养老礼。李尤作有《辟雍赋》以记其盛,据说那次环桥观听者以亿万计。此后如晋武帝驾临辟雍,下诏恢复讲求旧有典礼;魏、齐、梁、隋各代都在辟雍举行有关仪式;后魏太和十七年孝文帝巡幸太学,视察石经,这也属于天子视学之制的内容。关于"三老五更",蔡邕认为此中的"更"字应为"叟"字,郑康成以为其中的"老"和"更"实际都只设一人。因取象于三辰五星,故名"三老五更"。汉明帝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并非只给他们一个虚名,而是实实在在让他们承奉诏书来讲经论道。魏文帝以司徒尉元为"三老",鸿胪寺卿游明根为"五更"。北周武帝以于谨为"三老"。这些人或陈述三孝六顺之道,或陈述虚心纳谏之理。如此看来,所谓古代帝王向三老五更"北面乞言",并非虚设之制。唐代的七学三馆,宋代的六学三舍,明代的六学积分,各自在大学教育制度上极不相同,但又都是继承古代辟雍之制而培养人才,并借以尊崇最杰出的老人。培养众多生徒,光大经学儒术,至盛之世,几乎无不以此为先务。方今圣天子崇学重儒,有关典章完备,并特遣大员至京畿太学,肃穆祭祀先圣先师。现又定于明年亲临辟雍,举行释奠礼,振扬最高礼仪,而沐浴深厚的教化恩泽的士子,全都欢欣鼓舞而仰观皇上以德化民的成就呢!

策问诏书又说:"居官行政,不可不勤",而把督察曹司守令的繁重任务责成于大吏。这更是从根本上整饬吏治的极好主意。臣下我窃自认为,要求官吏品行端方遵循法度的规定,可以强化为官准则而不能使官吏恪尽职守;老成安静的规则,足以教官吏平安无事地镇守一方而不足以鼓励他们有所作为。《尚书》说:"莫教贪图安逸的欲望流行于国中"。又说:"上天职司的责任,是要由人来代行的"。在那

时，君主每日孜孜不倦，臣子们每日辅助不休，君臣都有一种勤政的美德，那是何等勤奋啊！而且众多之事的妥当处理，有赖于始终慎重之人，而不是怠惰玩忽者所能胜任的；各种规则的厘正，在于坚持勤奋之人，而不是因循者所能治理的。《旅卦·象辞》说："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势不能久留，故君子体之以治狱讼"。曹参宽刑简政，龚遂、黄霸慈爱仁惠，诸葛亮严明详密，张敞、赵广汉明达敏慧，但有的成为贤相，有的成为贤太守，其循吏良臣的事迹，照耀古今。正所谓持道不同，同归于治呢。至诚之吏，只要能加强其实际能力，那么当他宁人息事之时，早已预知其能胜任紧急之事；健锐之才，如能调剂以平和之心，那么在他果敢成事之时，也就不至于放纵不羁而逾越限度了。国家考核官吏的规则，是首先要求办事敏速。因为不仅要大官守法，小官廉洁，而且应当常思如何努力不懈地恪尽职守。

策问诏书又认为疏浚河渠事宜与坝堰宣泄办法，处处都应慎重讲求，进而思求既能成功地平治目前黄河水患又能使其成效永久可赖的方略。据臣下我查考，修筑堤防始于战国，汉代以河堤之事为某官之职，宋代以"河防"作书名。屯田员外郎沈立，采摭有关黄河的事迹，写成《河防通议》。汉代的宣房塞流，汴渠修筑，均为修补之术，而非利导之功，倒是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最为周到。此后出现的治河议论，最好的是潘季驯的"束清刷黄"。因为淮河的清水水力要强劲，不蓄束则水位势必不能高出黄河，而无法战胜它。南河的修治，全是出于这种考虑。揆度当今形势，黄河北决而妨碍漕运这一点可以无忧，值得忧虑的是黄河东段为水灾吃重地区。治理黄河东段，最好的办法是先治理上游。明代黄河在开封决口，宋礼就开挖由祥符县的鱼王口到中泺的二十多里河道，这因为正在疏通会通河。其后黄河决口于原武，溢流为二：一自兰阳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经曹濮入张秋。明廷派尚书白昂去治理。大抵黄河流向日趋于正东，对其支流沁河的漩流应急杀其势。皇上勤于访求民间疾苦，不惜巨万帑金用于治河，以求为众生谋安居，恩德至厚。况且圣虑周详，机宜悉合。窃闻桃汛以后，水流已缓，眼看就普天同庆治水大功告成，还需要耽心人

民生命财产被黄水吞噬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坚持圣学而持守兢兢业业,重视师儒兴教而大得民心,使吏治澄清的效果彰显,平定江河水患的功绩大著,真所谓千载一时之盛治呢。臣下我更敬愿皇上对各种良规坚执有恒,大展宏图而不求安逸。加强循性悟道之功以主宰万物变化,并做到内直外方,使主敬、"执中"更见深厚。充分发挥地方和中央所办学校的作用以培育人才,并坚持"养老"尊贤,更讲求有关典礼仪式。不因世人已在庆贺得到明君良臣,而稍微放松日计月总地对官吏进行考绩。也不因为江河水患已平息,而稍微松弛对水利工程的筹划营谋。如此则将见日月星辰完全顺应,《诗》、《书》、礼、乐四术尊崇,百官自饬于"六廉",百川顺流于河道。煽淳风,延福寿,巩固上天所保定的大业,开启深谋大智所呈现的久远吉祥。那么,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福乐便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无根本,新入仕途,不知忌讳,冒犯天子尊严,不胜战栗跌腾之至。臣下我谨对。〔董志国译〕

清宣宗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

殿试策问

[道光二年闰三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抚绥寰宇,仰荷昊穹洪贶,祖考诒谋,御极以来,兢业敕几,日慎一日。勉思制治保邦之道,兴贤育才之方,诘戎讲武之猷,戢暴安良之法,冀与中外臣庶,臻郅隆之盛轨,致上理于大同。延揽人才,特开恩榜。兹值临轩发策之始,虚衷博采,爰举胪询,尔多士其敬听之。

朕惟帝王之道,统乎修己治人。明德慎徽,修身之本;知人安民,治世之纲,《典》、《谟》尚已。《伊诰》、《说命》,举其粹语,可与《典》、《谟》互相发明。执中为心法之传,溯自尧舜以前,已开其绪。其散见于载籍者,如尧戒之言战栗,舜对之执忠信,禹以骄汰自儆,汤以慎举为先,皆古圣之微言。《丹书》敬胜义胜之旨,垂训万世。武王受之,因作十七铭。顾《汉书注》所引,与《大戴礼》所载互异。何者较为淳质?三代以后,人君知治道而著之篇章者,如唐太宗之《金镜》,宋真宗之《正说》,胥能深通政要,取鉴古今。魏徵之疏十思,司马光之上五规,皆千古君道之大闲。择其要者而绎述之,其皆可以为修齐治平之助乎?

贤才之兴,本乎学校。自乡举里选易为科目,士为青紫而明经。道德文艺,几判为两途,而务正学者鲜矣。汉自董仲舒倡养士之论,元朔议崇化厉贤与计偕者,郡国先慎其选。虞溥作《学诰》,奖训生

徒,以正心修行为本。胡瑗教授子弟,咸使适于实用。朱子《白鹿洞学规》所列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乃圣贤入德之门。真德秀《示学者说》,于学术真伪,剖析谆挚,可以廉顽立懦。今欲使学者处为修士,出为良臣,必知先德行而后文艺,国家乃获收人才之用。多士素所向慕者安在?其述所闻,可以觇器识焉。

兵可不用,不可无备。《周礼》载振旅茇舍,治兵大阅,教以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以行蒐苗狝狩之礼,立法最为详备。《管子》春秋角试,以练精锐,有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诸法。汉之都试,行于十月。唐之讲武,举于仲冬。史册具存,沿革不一。宋沈括论九军阵法,臧景陈马射六事,明于谦创团操之议,王骥定练兵之制。其详异同何若?夫兵知所劝,则士气益腾。技艺若何而熟娴,马步若何而骁健,是在统兵之员,平日存记,以随时鼓励。朕严饬武备,务期一日有一日之功,一兵有一兵之用。将何以收实效乎?

禁暴所以安良。稂莠不除,嘉禾不殖。《周官》比追胥之事,以行赏罚。外有野庐氏,内有修闾氏,讥察严则邪慝潜消。古者发奸摘伏之政,如赵广汉缿筩投书,张敞赭污衣裾,尹翁归收人会中,韩延寿置立五长,其治术皆卓然可纪。汉唐亭长、啬夫、里正、坊正之制,即成周里宰、鄙长遗意。顾熙丰立法,民不胜扰,而王守仁踵行于南赣,民皆称便,法同而行之者异也。欧阳修、汪应轸之议,并以慎择官吏为要,诚探原之论。今门牌户册之设,亦缉奸之一端,但恐视为具文,有名无实。化顽梗而为善良,除奸宄以厚风俗,或更有其本欤?

凡兹四事:慎修以端宸极,敦行以励士风,肄武以卫民生,诘奸以淑政化,敷施凝绩,莫切于斯。尔多士讲求有素,拜献先资,且自田间来,见闻较切。其务摅实蕴,毋泛毋隐,毋蹈袭陈言。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说:学习好像追逐什么东西似的,生怕赶不上;赶上了,还唯恐丢掉了。

《诗经》上说：鹫鸟飞上天空，鱼儿跃在水中。这是说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啊！

子贡说：看到一国的礼仪，就会了解它的政治。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谨地继承极大的基业，抚慰安定全天下。仰赖上天的宏大恩赐和列祖列宗遗留下的谋略，登上帝位以来，兢兢业业，奉从天命，时时事事都多加小心，一天比一天谨慎。努力思索建立政教制度、确保国家安宁的准则，兴用贤能、化育人才的方法，整治军队、讲求武备的谋略，止息凶暴、安定良善的措施，希望和中外的臣僚百姓，步入昌盛的终极轨道，使最完美的治理状况达到天下为公的大同境地。为此延揽人才，破例在正科以外，开科考试，现在正值皇帝我在殿前平台上发布策问刚开始的时刻，虚心广加采用，于是列举所询问的问题，你们这些众多的士子要恭敬地听好。

皇帝我想来，做帝王的原则与方法，归结在修养好自身，治理好众人。宣明德性，慎重对待并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奉为五种美德，这是修养好自身的根本；识别人才，安定民众，这是治理社会的纲领。《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皋陶谟》指出这些问题已经很久了。而《伊训》、《说命》，摘出其中的精粹话语，可以同《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相互阐明。执持住那最为适中的尺度，这是心治大法递相传授的核心。追溯到唐尧、虞舜以前，已经开启了端绪，那些散见在古书中的记载如唐尧的戒语说到要十分戒惧，虞舜对答唐尧的提问强调执守忠诚信义，大禹拿骄纵奢侈来自我警戒，商汤把谨慎采取行动放在第一位，这都是古代圣帝明王精微的言论。《丹书》关于恭敬克制住懈怠就吉利、道义克制住私欲就求吉得吉的主旨，给后世万代留下训诫，周武王接受它，据此写下了十七篇箴铭。但《汉书注》所援引的，同《大戴礼记》所载述的，相互存在着歧异现象。哪一种较为淳朴原始呢？夏商周三代以后，君主了解治国之道而写成文章的，如唐太宗的《金镜》，宋真宗的《正说》，都能深

切通晓国政的重要方面，从古到今，汲取借鉴。魏徵奏进章疏讲十思，司马光献呈五规，都属于千古君王之道的大界限。选取其中的重要内容而予以推究阐述，都可以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辅助吗？

贤才的兴起，根基在学校。自从古代由民间基层向朝廷选送荐举人才的制度变成科举考试后，士子为获取到官职而究明经书。道德和写文章的技艺，几乎明显地分作两回事，而在纯正学问上真下功夫的人就很少了。汉代从董仲舒倡行培育士子的主张，元朔年间讨论重视教化、勉励贤德，让这些人和当地上报政绩考核文书的官员一起到京师，由各郡和诸侯王国先期慎重地确定好人选。虞溥写有《学诰》，奖励训导学生，把端正心志、修炼品行作为根本。胡瑗教授弟子，全都让他们适合实际的用场。朱熹《白鹿洞学规》所拟列的五教的名称，治学的次序，修养好自身、外理好事情、与外物相接触的要领，是圣人贤人进入道德最高境界的门径。真德秀的《示学者说》对于学术的真伪，剖析得头头是道，十分恳切，可以让刁顽自私的人不再贪得无厌，使软弱无能的人立志奋发图强。如今打算让读书人在家居住成为道德修养很高的人，出来做官成为忠良的臣僚，必定要清楚德行占第一位，而写文章的技艺占第二位，国家才会获取到人才的用途。你们这些众多的士子平常所向往羡慕的东西在哪些方面呢？陈述各自所曾听说过的讲法，可以看出度量见识来呀！

军队可以不动用，但不能没有防备。《周礼》记载回师入城，除草平地作为野战宿营地，进行大演习、大检阅，用卧倒与站起、前进与后退，快速与缓慢、距离远与距离近的一套常规来教导士兵，举行春蒐、夏苗、秋弥、冬狩的四季出猎的大礼，所定立的法式最为详尽周全。《管子》中说春季和秋季进行比试，来训练精锐，有用五色指挥旗教导士兵的眼力、用坐起的号令教导士兵的身体动作、用进退规则教导士兵的步伐、用长短兵器教导士兵的手技、用赏罚必信教导士兵的心志等方法。汉朝对地方部队集中训练的都试，在每年的十月份举行。唐朝讲习武备，在每年的十一月份举行。史书至今摆在那里，各个朝代之间的沿袭与变革并不完全一样。宋朝沈括论述九军阵法，臧景

陈说骑马射箭的六大事项,明朝于谦首次提出编组演练的建议,王骥制定出练兵的规制。彼此的具体详情、不同和相同的地方到底怎样呢?兵士知道所应劝勉的东西,士气就更加腾跃。技术武艺怎样就会熟练,骑兵步兵怎样就会骁勇矫健,这完全在于统领兵众的官员,平日留心记下,来随时进行鼓励。皇帝我严格整治武备,务必希望做到每天有每天的功效,一个士兵有一个士兵的用处。这将靠什么来收到实际的效果呢?

禁除凶暴,目的是安定良善。危害禾苗的杂草不去掉,好禾苗就生长不起来。《周礼》验核统计驱逐入侵的敌人和伺捕盗贼的事项,来实行赏赐和惩罚。国都外设有野庐氏这一官职,国都内设有修闾氏这一官职。稽查严密,邪恶奸凶就会在无形中消除。古代有关揭发出隐藏的坏人坏事的政务,像赵广汉设置小口瓶形状的器具让人往里面投送检举信;张敞叫偷盗团伙的老大在酒席上用赭色土抹在每个成员的衣服后襟上,散席后一网批尽;尹翁归在秋冬考核官吏的大集会上当场逮捕平日所掌握的奸吏和地方豪强;韩延寿在五家组成的一伍中各设一名伍长,严禁各家收留奸恶的人。他们这些治理的方法全都卓然可以记述。汉朝、唐朝在基层设置亭长、啬夫或里正、坊正的制度,也就是西周在基层设置里宰、鄙长所遗留的用意。但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定立保甲法,老百姓经受不住搅扰,而明代王守仁在江西南部地区接着来施行,老百姓却全都说很便当。这是制度相同而施行的人存在着差别啊!欧阳修、汪应轸的意见,一起把慎重选择官员看成是关键,确实属于探究本原的论断。如今门牌、户口簿的设置,也是辑察奸邪的一个方面,只怕把这看成是一纸空文,有名无实。要把刁顽不服管制的人改造成善良的人,除掉为非作歹的人来使民间风尚变得淳厚,或许还有那更为根本的举措吧?

总共这四种政事:慎重对待自身道德修养来由皇帝本人做出表率,注重品行来激励读书人的风尚,讲习武备来卫护百姓的生计,盘查奸恶来使政治教化纯净,广加施行而建成功绩,没有比这些政事更紧要的了。你们这些众多的士子讲论探求,久已精熟,向君主拜献建议,首先要谋划好个人的建议,而且从民间上来,所看到和听到的,较

为真切。对答中务必要抒发出真实的底蕴，不要浮泛，不要隐讳，不要重复前人已经讲烂了的东西。皇帝我准备亲自观览。

戴兰芬　殿试对策

戴兰芬(生卒年不详)　字湘浦，安徽天长人。道光二年(1822)状元，例受翰林院修撰。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显道本于缉熙，立教先乎俊造，诘兵戎斯能谋保乂，除奸慝所以安善良。稽诸载籍，《书》训修来，《礼》隆德进，《诗》咏陈师之烈，《易》传击柝之文。茂矩崇仪，秩然赅备。自古帝王绍天阐绎，锡极临宸，主术光昭，士林彬雅，允武与允文并懋，用刑与用赏兼宜，悉本设诚致行之实，以致延洪纯佑之符。用是日就月将，圣功笃焉；贤登才举，学校修焉；习仪辨等，军实昭焉。刑暴诘奸，民情肃焉。上哉夐乎！所为规矩二仪，陶甄万类，胥一世而跻之仁寿者，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治光轩顼，荣镜垓埏，固已体乾行之健德，端蒙养之教思，兵农交卫而师律綦严，风俗久移而井闾胥乐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景郅治之上仪，冀刍言之足采，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崇圣学、育人材、肃军政、化邪民之至计。臣之愚昧，譬诸撮壤涓流，奚补山海？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先资拜献之义，敢不就平日所诵习者，勉效葵藿之微忱也乎！

伏读制策有曰：帝王之道，统乎修己治人，而因思《典》、《谟》心法之传，以及篇章所载可以为修齐治平之助。此诚制治保邦之鸿谟也。臣谨按，《吕氏春秋》引《黄帝之书》曰：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淮南子》引尧戒曰：日慎一日，人莫蹶于山而蹶于垤。古帝王执中以遍天下，明德慎徽，所以为修身之本；知人安民，所以为治世之纲，惟本精一危微，以宰持乎万化，故心法开于十六字，而帝学彰于十七铭。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朱子《大学或问》，自修齐以至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或问》，自中和以至位育，枢纽不外乎诚。诚敬立而体用赅，千古之治术，约之即在乎性功矣。后世人君知此意

者，莫如唐太宗之《金镜》，宋真宗之《正说》。人臣知此意者，莫如魏徵之疏十思，司马光之上五规。深通政要，而闾阎之衣食，胥关宵旰之忧勤；取鉴古今，而史乘之箴规，悉作庙堂之惕厉。故贞观《帝范》，凡十二篇，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宋范祖禹《帝学》八卷，上自三皇五帝，下迄神宗，会而通之，固犹是《伊诰》、《说命》之所陈，而衍其遗意焉。程子曰：帝王之学与儒生异。然聪明天亶，亦有慎修思永之功，则勤夙夜而不忘念典，夫且有较中材而倍惕者矣。皇上圣敬日跻，中和建极，接心源于往哲，表作睹于群伦，合道法、治法而一以贯之，洋洋乎诚远轶二帝三王之隆轨也。

制策又以贤才之兴，本乎学校，而欲使先德行，后文艺，庶几乎处为修士，出为良臣。此诚彰德育才之至意也。臣考《周礼》大司徒有宾兴三物之典，六德、六行、六艺，皆书其人而登进之。自乡举里选易为科目，而古法不行，道德文艺，几于判为两途，而务正学者盖鲜。汉董仲舒精心大业，为群儒首，是以倡养士之论，实足崇化厉贤，章明文教者也。后世若虞溥之奖训生徒，胡瑗之教授子弟，卓然可称。朱子讲学于白鹿洞，盖本二程遗意，而示人以圣贤入德之门。虽其时有朱陆异同之说，谓朱子道问学功多，然其理初无相悖。真德秀剖学术之真伪以示人，固可廉顽而立懦焉。夫君子小人之辨，惟儒术为尤难。汉时有孝弟力田之科，与异等茂才俱用。然其既也，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者。可见士生斯世，果能诵法儒先，敦尚实学，不必德行有书，而纡青紫者自俊髦之美也；不必弓旌有召，而登科目者皆经济之才也。屏浮华而守中正，安异古所云哉？圣天子崇儒重道，教育英贤，奖劝修士之余，固宜收其实用矣。

制策又以兵可不用，不可无备，而因思夫坐作进退之节，蒐苗狝狩之经。臣按振旅茇舍，治兵大阅，掌于《周官》大司马者綦详。《管子》春秋角试，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皆所以练精锐也。汉时南军卫宫城，北军卫京师，期门、羽林、材官、蹶张，悉皆入选，而都试、都肄、卞射、貙刘，莫不务为详密。唐讲武都外，举于仲冬。太宗命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赏赐盛行，而其将亦加上考。后惟李抱真观察泽潞，籍丁男，结弓矢，令于农隙分曹角射，得士卒九十余万，昭义

步兵称极盛焉。大要步伐止齐,非训练不能娴习。《晋志》所载公卿相仪,君王执节,典何如其重也。《唐志》所载旗分卧举,阵列圆方,容何如其整也。沈括之论九军,臧景之陈马射,皆有关于武事匪浅。王骥所云练兵,一曰练胆,二曰练艺,三曰练阵,四曰练地,五曰练时,尤为可取者矣。夫技艺熟娴,马步骁健,是在统兵之员随时鼓励,胜兵自多,戎政自肃尔。圣世道隆化洽,疆宇乂安,乃偃武而不忘武备,养兵而不弛兵威。凡属在弁兵者,其孰敢怠惰偷安而不期于果锐也哉!

制策又以禁暴所以安良,稂莠不除,嘉禾不殖,而期于化顽梗、除奸宄之实政。臣惟比闾族党,保受相资。管仲治齐,郊内则轨里连乡,郊外则邑卒乡县,各立官长,以司其事,使奔走无所匿,而迁徙无所容。汉官百官公卿而下,十里置一亭,亭有长;十亭为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为此皆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之人,故尝赐食赐帛宠之,以异齐民也。唐时里正、坊正,免其课役,尚有成周遗意。自古诘奸之法,保甲为善。然王守仁行之于明,而民恃以安;王安石行之于宋,而民且为累,则有治人无治法也。大抵胥吏所以察奸,兵弁所以弭盗。可以耳目寄之,不可以爪牙用之;可以指臂使之,不可以腹心任之。非在上者明察为怀,则此委以权而彼反借以为利,除奸而转以养奸,不能谓必无是也。圣朝风同道一,良有司奉行成法,勤勤恳恳,凡革面洗心者,固其适于荡平之路矣。

若此者:绿图尹寿,不足诩其传也;辟雍灵台,不足赓其化也;赫声濯灵,不足颂其严翼也;立民顺则,不足喻其熙雍也。猗欤盛哉!亘古独隆也。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圣神已著,而弥切严恭;庠序已明,而愈思培养;令甲行威,而不忘乎简阅;夷庚式化,而益凛乎防维。经纬万端,涵濡多士,干城共守,睚眦俱消,于以扇巍巍,显翼翼,恩乐熙春,欢胪函夏,寰区饮化,匝宇归仁。则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庆,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彰显大道,根源在于学问逐渐积累直至大放光明;树立起教化,要把选拔培养优秀的人才放在首位;整治军

队，这才能够谋求保有和治理天下；诛除奸凶邪恶，目的是安定善良。考察典籍，《尚书》训示帝王要修养好自身的道德，以致各个邻国的百姓都说就等他来到了。《周礼》推重进用贤德。《诗经》歌咏摆开阵势、战前誓师的雄壮气势。《周易》流传下敲击更梆、防备盗贼的解说文字。重大的成规与崇高的法则，明晰完备。自古以来，帝王效法和承顺天地，开创和化导人事，赐给百姓最高的准则，统治天下。君主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光明显耀，读书界文质彬彬很雅正，真能文和真能武一起繁盛，动用刑罚和施行赏赐同时得体，这都是依据设布至诚、得到践行的实际，来达到那延长加宽大福的上天瑞应。因此日积月累，圣人的修养功夫深厚了；贤能提拔，人才举用，学校得到整治了；熟习军礼，辨别出等次，兵事显明了；惩治凶暴，盘察奸恶，民情肃正了。真高远啊！效法天地阴阳，造就万物，使整个一个时代都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域，原因就是依仗有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治理国家比黄帝、颛顼还显赫，照耀九重天和大地的八方边际，原本上已经体悟那天道运行永远刚健的品德，开启那从童心就修养正道的教化意念，兵士和农民交相卫护而军队的纪律极为严格，社会风尚久已改变而民间全都欢乐了。可陛下圣明的心怀却谦虚自抑，不遗弃微不足道的人，向往那治理到极点的最高法式，希望山野村夫的言论也有足以能够采纳的地方，把臣下我等宣召到殿廷，而用崇尚圣人的学问、培育人才、整肃军政、教化邪恶的刁民这些最重要的大计，来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好比一撮土、一滴水，哪能对泰山和大海有什么补益？但正当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刚开始的时刻，恭敬地想到向君主拜献建议就要首先谋划好自己的建议的古义，敢不仅就平日所诵读研习过的东西，勉力献上葵花向阳的一点儿忠诚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做帝王的原则与方法，归结在修养好自身，治理好众人，据此而思索《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皋陶谟》关于心治大法的递相传授，以及其他书籍所载述的可以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辅助的东西。这实在是建立政教制度、确保国家安宁的大谋略啊！臣下我恭谨地查验，《吕氏春秋》引述《皇帝之

书》说:皇天在上,大地在下,你能效法天地,就会成为百姓的抚养爱护者。《淮南子》引述唐尧的诫语说:要一天比一天谨慎,人们往往不在大山面前跌倒却在小山包那里跌倒。古代的帝王执持住最适中的尺度来推广到整个天下,宣明德性,慎重对待并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奉为五种美德,之所以是修养好自身的根本;识别人才、安定民众,之所以是治理社会的纲领,原因只在于根据人心危险、道心幽隐而必须精心一意,以便来主宰并操持住各种变化。所以治心大法开启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上,而帝王的学问彰显在周武王所写成的十七篇箴铭上。先出世的圣人和后出世的圣人,彼此之间的道理是同一个啊!朱熹《大学或问》这部书,从修身、齐家一直到治国、平天下,由始至终不外乎强调恭敬问题;《中庸或问》这部书,从情感的抒发符合最适中的那个尺度,一直到天地正位、万物化育,枢纽纲领不外乎标举至诚问题。至诚和恭敬确立起来了,而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外在的表现与作用就都包括进来了。从古以来的治理原则与方法,集中起来就在于心性修养的功夫罢了。后世的君主明白这种意旨的,谁也比不上唐太宗的《金镜》一文和宋真宗的《正说》一文。大臣明白这种意旨的,谁也比不上魏徵奏进章疏向唐太宗讲论知足自戒、知人善任等十思,司马光献呈奏状向宋仁宗讲论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这五规。深切通晓国政的重要方面,而民间的衣食住行,全都和帝王为国事操劳终日忙得不可开交有关联。从古到今汲取借鉴,而史书上记载的劝告规谏,全都变成朝廷警惕危险的目标。所以贞观年间唐太宗写成的《帝范》,总共十二篇,起首为《君体》、《建亲》,结尾为《阅武》、《崇文》。北宋范祖禹《帝学》八卷,上起三皇五帝,下至宋神宗,把历代帝王融会贯通起来,原本上仍然属于《尚书》中《伊训》、《说命》所陈述的宗旨,而推衍它们所遗留下的深意。程颐说:帝王的学问,与儒生不一样。但帝王听得远、看得准虽然出自天赋也要有谨慎地修养好自身、往大处和长远方面多加考虑的功夫。既然这样,从早到晚就要勤勉不止而不忘记始终常念学习,况且还有比中等人需要加倍警惕的东西呢!皇上您圣明恭谨的德性一天比一天上升,情感抒发符合那最适中的尺度,建立起

最高的准则，从前代的贤哲那里接续上治心大法的本源，给众人显现出圣人兴起而万物观望来，融合治心大法与治国大法而用一个根本的东西统贯起来。真是广大呀！确实远远超过二帝三王的隆盛轨道了！

制策又认为贤才的兴起，根基在学校，而打算让德行占第一位，写文章的技艺占第二位，差不多使读书人在家居住成为道德修养很高的人，出来做官成为忠良的臣僚。这确实是显扬德行、化育人才的最深远的意图啊！臣下我考察，《周礼》大司徒掌有乡学三种教纲教导民众并荐举尊重优秀分子的典则。教纲中明智、仁惠、预见、果断、忠诚、宽和这六德，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亲近宗族、亲近亲戚、取信朋友、体恤贫苦人这六行，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写、计算这六艺，全都用文书登记好那符合要求的具体人选，上报给天子。自从由基层向朝廷选送荐举人才的制度变成科举考试后，而古代的办法不再行用，道德和写文章的技艺，几乎到了明显地分成两回事的地步，而在纯正学问上真下功夫的人就很少了。西汉董仲舒把心力投注在治国大业上，成为众儒生的代表，因而倡行培育士子的主张，确实是重视教化、勉励贤德、彰明礼乐教化的举措。后世像晋朝的虞溥奖励训导学生，北宋的胡瑗教授弟子，都与众不同，值得称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大致是依凭程颢和程颐所遗留下的意图，而把圣人贤人进入道德最高境界的门径指示给人们。尽管当时存在着朱熹与陆九渊的主张互有异同的说法，认为朱熹在充实知识和穷尽圣人道法的细小部分上功劳居多，但二人所主张的义理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互背离的地方。南宋真德秀剖析学术的真伪，亮给人们看，固然可以让刁顽自私的人不再贪得无厌，使软弱无能的人立志奋发图强了。一般说来，君子与小人二者的区分，只有在儒家学问上是难上加难的。汉朝时有孝弟力田这一类的荐举名目，与另一类荐举名目异等茂才同时选用。可是到最后，竟有被荐举为秀才却不认识字的，被荐举为孝廉却和父母不在一处居住的。可见读书人生活在人世上，果直能诵习效法儒家的先贤，注重和崇尚朴实的学问，不一定非得德行有文书上报，而当上官员的人，也原本就是优异突出的人物。不一定非得由朝

廷用弓或旌旗来招聘,而进入分科取士行列的人,就都是经国济民的人才。摒除浮华,恪守正直,又哪里同古代所讲论的那一套标准有差别呢?当朝圣天子推崇儒学,重视大道,教导培育英才贤士,奖掖鼓励道德修养很高的人,在这之后,固然会收到实际用途了。

制策又认为军队可以不动用,但不能没有防备,据此而考虑卧倒、站起、前进、后退的一套常规和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出猎大礼。臣下我查验,回师入城,除草平地作为野战宿营地,进行大演习、大检阅,这一整套掌管在《周礼》大司马那里的制度极为详明。《管子》讲春季和秋季进行比试,用五色指挥旗教导士兵的眼力,用坐起的号令教导士兵的身体动作,用进退规则教导士兵的步伐,用长短兵器教导士兵的手技,用赏罚必信教导士兵的心志,这都是用来训练精锐的部队啊!汉朝时南军负责守卫宫城,北军负责保卫京师长安,期门、羽林、材官、蹶张这些不同番号的侍卫军和地方部队,全都入选,而在郡国或京师举行的都试、都肄、卞射、貙刘这些训练名目,没有一项不尽力安排得详尽周密。唐朝在京师长安城外讲习武备,时间定在冬季十一月举行。唐太宗命令十六卫的将士,在显德殿练习射箭,赏赐很丰厚,而那些将帅也列为考核的第一等级。后来只有李抱真在出任泽潞观察留后期间,对成年男子进行登记,配备弓箭,命令在农闲时间里分成类属比试射箭,获得士兵九十余万,昭义镇步兵由此号称最强盛。总体说来,行进刺杀不乱阵容,除去训练就没办法熟习。《晋书·礼志》所记载的三公九卿辅助阅兵仪式,君王亲自击鼓指挥,这种大典是多么隆重啊!《唐书·礼乐志》所记载的旌旗分为放倒和竖起两种变换方式,放倒就士兵们坐下,竖起就士兵们起立;阵式布列成圆阵、方阵等五种形式,相互变换呼应。这种讲习武备的势派是多么严整啊!北宋沈括讲论九军阵法,臧景陈述骑马射箭的六大事项,全都和讲习武备的大事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明朝王骥所主张的练兵规制,第一条叫练胆气,第二条叫练技艺,第三条叫练阵列,第四条叫练地形,第五条叫练气候,更是可以取法的东西了。一般说来,技艺熟练,骑兵和步兵骁勇矫健,这完全在于统领军队的官员随时进行鼓舞激励,结果战斗力很强的士兵自然就会数量很多,军政

自然就会肃正了。我朝圣明的时代道法隆盛，教化深入人心，天下太平无事，但停用武力却不忘记武备，养护军队但不四处显耀军事威力。凡属在部队里的人，有谁竟敢懈怠懒惰、贪图安逸，而不希望达到果敢勇猛呢？

制策又认为禁除凶暴，目的是安定良善。危害禾苗的杂草不去掉，好禾苗就生长不起来。据此而对改造刁顽不服管制的人、诛除为非作歹的人这种确见实效的政事，寄予厚望。臣下我想来，古代由五户人家组成的比，由二十五户人家组成的闾，由一百户人家组成的族，由五百户人家组成的党，彼此间进行保护和承担责任两相补充。春秋时管仲治理齐国，国都城郊范围内，在五户人家组成的轨、五十户人家组成的里、二百户人家组成的连、两千户人家组成的乡；国都城郊范围以外，在三十户人家组成的邑、三百户人家组成的卒、三千户人家组成的乡、九千户人家组成的县，分别设立每一级的长官，来主管各自的事务，使逃窜的罪犯没有可以藏匿的处所，迁居的人家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汉朝官制，从百官公卿往下排，十个里也就是每千户人家组成一个亭，亭设亭长。由十个亭也就是每万户人家组成一个乡，乡设掌管教化的三老、掌管赋役的啬夫、掌管治安的游徼。担任这些基层职务的，全都是具有纯洁的品行、能够带领民众做好事的人，所以经常由朝廷赐给酒食、赐给绢帛来抬高他们，显出和普通老百姓的区别来。唐朝的里正、坊正，都免除他们的赋税和徭役，这还带有西周所遗留下的用意。自古以来，盘察奸邪的方法，保甲制度是很有效的。但王守仁在明朝行用它，而百姓靠它获得安宁。王安石在北宋行用它，而百姓眼看着成为拖累。这说明要有真会治理的人，没有什么自行就会产生效果的治理法度。一般什么情况下，官府的办事人员是用来纠察奸恶的，带兵的小头目是用来消除盗贼的。可以把他们当成耳目来借用，不能把他们当成爪牙来重用；可以把他们当成手指手臂来驱使，不能把他们当成腹心来信任。如果不是管辖他们的人时刻想着要明细察识，那么，这里把权力交付给他们，而他们那里反而借用权力来谋取私利，结果是诛除奸恶却倒过来成为养成奸恶。不能认为肯定没有这种情况啊！我朝社会风尚都相同，道

德都一致，称职的各级政府部门奉守执行既定的朝廷法令，勤勤恳恳，凡是彻底改悔的人，当然都归向宽广平正的天朝大道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即便是颛顼的老师绿图和虞舜的老师尹寿，在我朝也不足以夸耀他们所传授的那套帝王学问啊！即便是西周所设立的最高学府辟雍和灵台，在我朝也不足以扬布它那教化啊！即便是殷高宗的显赫声名与盛明威灵，在我朝也不足以颂扬它那民众端庄、京师堂皇啊！即便是周文王使百姓仁义存立，遵守规则，在我朝也不足以说明它那清明和乐啊！真真繁盛极了！属于整个古代的唯一盛举！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您，已经大治了，进一步谋求大治；已经安宁了，进一步谋求安宁。帝王的圣明和神妙已经大为显露，却更加注意谨严和恭敬；学校教育已经大见成效，却更加关注人才培养。号令和装备施布了兵威，却不忘记检阅；车马往来的通道都教化大行，却更对防范倍加警惕。用圣心把各种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降赐恩泽化育众多的读书人，勇猛的将帅们共同守卫国家，邪僻的行为全都消失掉，用来弘扬那虞舜大禹的崇高功业，显扬那商汤的盛大威名，皇恩使人们喜悦得像在明媚的春天里一样，欢呼声传遍整个华夏，天下都蒙受到家家给人送去谐和的教化，全国都归向仁爱，我们国家永远没有尽头的福庆，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问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郑秉恬　殿试对策

郑秉恬(生卒年不详)　字云墅，江西上高人。道光二年(1822)榜眼，例受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建极所以绥猷，敦行所以善俗，简车徒所以昭武略，除稂莠所以安善良。博观载籍，《易》垂健行之象，《诗》传思乐之篇，《书》纪诘戎之文，《礼》详刑暴之法。茂矩英规，粲然具备。古帝王寅承大宝，本内外交修之实，握天人协应之机，以溯精一，则心法传焉；

以宏乐育，则规模远焉；以饬戎兵，则军威肃焉；以斥奸邪，则政化醇焉。所为握镜调元，抚图赞化，醇洪鬯之德，丰茂世之规，骏发开其远祥，保定固其洪业，郁郁乎扬鸿名而播芳烈，洵亘古之上仪也。

钦惟皇帝陛下，性端轨则，业炳修和，超乎鸟纪之时，轶于云官之世，固已道贶往哲而士尚真修，武勤蒐苗而人化偏陂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既运钧以开模，复考言而询事，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传心，励士、讲武、诘奸诸大政。如臣愚昧，譬若涓流撮壤，奚裨崇深？顾值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述素所诵习者，以效葵藿倾向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帝王之道，统乎修己治人，而因推及往代之微言。此诚明德新民之事也。臣谨按，蔡沈《书序》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而《尧典》以钦始，《益稷》以钦终，传心之要，在主敬而已矣。禹之祗台，汤之圣敬，文之小心，武之执竞，此皆经训之粹，足相发明者也。至若载籍微言，稽诸唐虞三代而上者，《吕氏春秋》黄帝语颛顼曰：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新书·修政语》引帝喾曰：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丹书》颛顼之训曰：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从。古帝王乘乾宰化，其保邦制治之源，总之不离乎修身焉。后世若唐太宗著《帝范》，其书自《君体》、《建亲》至《阅武》、《崇文》，凡十二篇，述前王之善事，示后嗣以典型，洵为一代之巨制也。宋范祖禹《帝学》八卷，其言深切著明。真德秀作《大学衍义》，首论为学之要，次分格致、诚正、修身、齐家，为四大纲，可与范祖禹之《帝学》并垂不朽。但其书不及治平，故明儒邱浚因而补之，就真氏所衍者，于齐家之下，续以治平之要。其书虽云芜杂，而亦不愧德秀之功臣。我皇上朝乾夕惕，蕴为德行，发为事业，放勋重华，先后如一辙矣。

制策又以贤才之兴，本乎学校，而欲其处为修士，出为良臣，以收人才之用。臣惟《周礼》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有曰儒以道得民；而《礼记·儒行》一书，言儒最详。虽其趣不同，而道则一也。夫士者，民之坊也。必砥砺廉隅，不亏儒行，以中道为准，而志不惑于奇邪；以正大为归，而行不蹈于匪僻。如是，则虽入官之后，当不至贻贪污严

酷、旷官废职之诮矣。然而致此者有其渐，则趋向之本，不可以不端焉。虞溥之作《学诰》，而勖以正心修身也；胡瑗之教子弟，而使适于实用也；朱子白鹿洞之《学规》，而列以五教之目也；真德秀之《示学者说》，而力别其真伪也。诚使就其言而守之，而进之以问学，砺之以节操，养之以优游涵泳之功夫，将见出而致用，无文艺而非德行，于以底于圣贤之域，不难也。而又何至有取之以文，而或徒竞浮华绮靡之词；取之以行，而或争为矫情饰貌之举，致国家不获收人才之实用哉？我皇上雅意作人，士生其间，其敢不争自濯磨，以求无愧于心乎！

制策又以兵可不用，不可不备，而因讲求训练之法。臣谨按，古无所谓兵，凡民皆兵也；无所谓将，六卿皆将也。考《周礼》所载，有乡遂之兵，有邱甸之兵，皆因井田而制军赋。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出则为伍两卒旅之兵。即蒐苗狝狩，为步伐击刺之法；即乡遂大夫，为将帅司马之职。兵民不分，将不外设，制诚善也。管子作内政而寄军令，兵民始分为二。汉初，置材官于郡国，而京师有南北军屯，得内外相维之道。自武帝置八校，以习知远方人充之，募兵始此，后遂有养兵之病矣。唐初，置府兵，至高宗之时，而其制渐坏。宋兵制有禁、厢、乡、蕃之目。明京兵、锦衣十二卫，留守四十八卫，即唐府兵之遗，而日久就弛。于谦乃汰其老弱，得胜兵十五万，改为十团营，自后或置或废。究之专用募兵，而游手无籍滥入其中，养兵之费日浩，得兵之用益难。故惟是勾稽有册，训习有期，老弱充伍之必惩，巡防疏惰之必察，而团练乡勇，尤与同井友助之意相符。斯固足兵之善策耳。皇上神武布昭，八旗劲旅如虎如貔，投戈脱剑，海宇乂安，然犹训谕屡颁，殷殷以简阅为念，凡在将弁，孰不鼓舞而思奋也哉！

制策又以禁暴所以安良，因稽汉唐以来发奸摘伏之政，而进为探原之论，凡以期化顽梗而为良善也。臣按《周官》，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使之相保相受。无事统于司徒，有事则隶诸司马；夜则声相闻，昼则目相识，法至善也。管仲制国，有轨里连乡之法，各立官长，以司其事，使奔逃无所匿，迁徙无所容，盖犹得《周官》遗意。汉有亭长、啬夫、游徼，盘诘奸宄。唐设里正、坊正，检察非常。要皆慎其选择，免其课役。宋则所以待之者，与汉唐异矣。故同一保甲也，王安石意主《周

官》,而或受其扰。王守仁抚南赣,盗弭民安,江右以为便。此又可见不在法,而在乎行法者矣。夫保甲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动息易知,形踪难掩,而又汛营必设其人,墩堡必详其制,寺院等处时有巡察,于以杜奸民而安良善,不难矣。盖惩盗于已然,不如弭盗于未然。平日因循苟且,不能实力奉行,加意稽核,迨其形迹既彰,虽如虞诩之广募壮士,李崇之村置楼鼓,盗虽止,究不胜其扰矣。圣朝典章明备,道一风同,良吏奉行成法,宽严相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其孰不观感兴起,摩义渐仁,相与遵道遵路哉!

若此者:敬持宅中,道德粹矣;选俊抡英,贤才出矣。夫且整军经武,骏厉彰焉;诘奸纠暴,邪慝弭焉。侯其祎尔,治蔑以加矣。抑又闻之,高明莫若天,而庞洪遍覆,戴之者弥仰其高;博厚莫如地,而光大含宏,履之者愈期其厚。臣尤伏愿皇上,所其无逸,时乃日新,政和而治益修,轨顺而防益豫,蜚英声,腾茂实,总八极而为量,于以上迈蕃厘,下绥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高的准则,目的是能安定那大道的教化;注重品行,目的是使社会风气变得良好;查检战车和民众,目的是显扬武备韬略;去除危害社会的人,目的是安定善良的人。广泛观览典籍,《周易》垂示天道刚健运行的卦象,《诗经》传诵为泮宫学府建成而欢乐的篇章;《尚书》记载有整治军队的文字,《周礼》详尽说明惩治凶暴的法典。重大的原则和英明的规定,灿烂详备。古代的帝王恭敬地承受天命,依据内外交相治理的实际,把握住上天和人事协调对应的时机。用来追溯精心一意,治心大法就递相传授了;用来扩展化育人才,规划就很长远了;用来整治军服和兵器,军威就很肃正了;用来斥逐奸邪,政治教化就很纯净了。由此掌握大道,调理初始的状态,手按瑞应秘图,协助天地的化育,使宏大顺畅的仁德更纯正,让盛世的成规更充实,深谋大智开启那长远呈现的吉祥,上天保定巩固那盛大的基业。真真繁盛啊!传扬誉满天下的美名,播布美好的事迹,实在是整个古代的最高法式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心性为天下树立起准则,功业在谋求六府三事的整体协调上十分显赫,超过凤鸟来到而用鸟纪事的少皞时代,凌越得云瑞应而用云字命名官职的黄帝时代,原本上已经是道德统括以往的贤哲,读书人崇尚纯真的修养,武备上对定期训练不放松,世人都改正那偏私不平的行为了。可陛下圣明的心怀却谦虚自抑,不遗弃微不足道的人们,既造就万物,创立规范,又考察言论,询问事体,把臣下我等宣召到殿廷,而用传授治心大法、激励读书人、讲求武备、盘察奸恶各项重大的政事,来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的人,就好比一滴水、一撮土,哪里能对高大如泰山、深广如大海的圣上有所补益?但正当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刚开始的时刻,恭敬地想到向君主拜献建议,首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经典古义,敢不恭谨地陈述平常所诵读研习的东西,来献上葵花向阳的一点儿忠诚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做帝王的原则与方法,归结在修养好自身,治理好众人,据此而推衍到以往时代的精微言论。这确实是宣明德性、使百姓自新的大事啊!臣下我恭谨地查验,南宋蔡沈《书集传序》中说:尧舜二帝和夏禹、商汤、周文王及武王这三王的治绩来源于大道,尧舜二帝和夏禹、商汤、周文王及武王这三王的大道又来源于心性。而《尚书·尧典》从一个"钦"字也就是恭敬地处理政务来讲起,《益稷》从一个"钦"字也就是恭敬地履行职责来结尾。由此看来,传授治心大法的要领,在于把恭敬作为核心而已。大禹的把敬重我的德性放在第一位,商汤的圣明恭谨的德性一天比一天上升,周文王的小心翼翼,周武王的执守强盛,这些都是经典训戒的精粹话语,足以能够相互阐明的东西。至于其他古书中的精微言论,考察那些在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吕氏春秋》有黄帝对颛顼讲过的话:皇天在上,大地在下。你能效法天地,就会成为百姓的抚养爱护者。贾谊《新书·修政语》引用帝喾的话说:国政没有比讲求信用更重要的了,治理没有比讲求仁德更重要的了。《大戴礼记》中的《丹书》有颛顼的训示说:恭敬克制住懈怠就吉利,道义克制住私欲就求吉得吉。古代的帝王依照时机运用《乾卦》六龙的变化,主宰化育万物,有关确保国家安宁、建立政教制度的本原,总之离不开修养好自身。后

世像唐太宗写成《帝范》,这部书从《君体》、《建亲》一直到《阅武》、《崇文》,总共十二篇。讲述以前帝王的美好事迹,给继位的君主树立效仿的典型,确实属于一代重大的著述啊!北宋范祖禹的《帝学》八卷,书中的论述深刻中肯,显著明确。南宋真德秀写成《大学衍义》,首先论述治学的要领,其次分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构成四大纲领,可以同范祖禹的《帝学》一起垂示后代,永不磨灭。不过这部书没有涉及到治国、平天下,所以明朝的儒士邱浚根据原书进行补充,特就真氏所推衍的内容,在齐家的后面,接续上治国、平天下的要领。这部书虽说繁芜驳杂,可也不愧是真德秀学术的功臣。我皇上白天进取不息,夜晚警惕忧惧,积聚成德行,焕发为事业;和那唐尧虞舜,前后如同一个样了。

制策又认为贤才的兴起,根基在学校,而打算让读书人在家居住成为道德修养很高的人,出来做官成为忠良的臣僚,借此来收到人才的用处。臣下我想来,《周礼》太宰,通过九种使君民上下和协的方式来联结起天下的百姓,其中第四种说儒士凭借道德取得民众的信服。而《礼记·儒行》这篇经文,讲论儒士最为详尽。尽管《周礼》和《儒行》的归宿不一样,但总原则却完全相同。儒士是对老百姓防范的力量。必须要磨炼那端正不苟且的品行,在儒士的行为规范上不存在亏缺现象。把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作为准则,而心志不被奇异邪说所迷惑。把光明正大作为目标,而行为不陷入邪僻。都像这样的话,那么,即使做官以后,想来肯定不至于留下贪污严酷、荒废职守的笑柄了。然而达到这种状态,存在着一个过程。那么,趋就归向的本原,不可以不端正。晋代虞溥写成《学诰》,用端正心志、修养好自身来对学生做勉励。北宋胡瑗教导弟子,都让他们适合实际的用场。朱熹所拟定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开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名目。真德秀的《示学者说》,极力辨析学术的真伪。假如真的依照这些人的主张来恪守它们,而用请教学问来提高教育对象,用节操来磨练教育对象,用优闲自得、深入体会的功夫来涵养教育对象,眼看步入社会而得到应用,即便是没有写文章的技艺或不具备德行的人,用来最终进入圣贤的境域,也并不困

难哪！而又何至于出现用文章选取却有人只是比试那浮华绮靡的词句；用品行选取却有人争相做出掩饰真心、装模作样的举动，致使国家收不到人才的实际用处呢？我皇上一向就化育新人，读书人生活在这个阶段，有谁敢不争相洗涤磨砺自己，来求得内心无愧呢？

制策又认为军队可以不动用，但不能没有防备，据此而讲求训练的方法。臣下我恭谨地查验，古代没有后世所说的兵士，只要是民众，就全都是兵士；也没有后世所说的将帅，当时辅助王室的六卿，全都是将帅。考察《周礼》的记载，当时有距离国都一百里以内的乡，距离国都百里以外、二百里以内的遂所组成的部队，还有卿大夫封邑内拥有十六块井田的丘，拥有六十四块井田的甸所组成的部队，全都按照井田的数目来制定军事行动所需要的物资和人力。平常就属于五家为比、二十五家为闾、百家为族、五百家为党的行政基层单位里的居民，战时就成为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两、百人为卒、五百人为旅的军队编制单位里的士兵。就拿春蒐、夏苗、秋弥、冬狩这四季行猎活动，训练步伐和击刺的方法；就拿乡大夫、遂大夫，承担将帅、司马的职责。兵士和民众不分离，将领不再另行设置。这种制度确实很完善啊！从春秋时齐国管仲定立国内的政治制度，把军令寄托在里面，兵士和民众才开始分离成两部分。汉朝建立初期，在各郡和诸侯封国内设置材官这类地方部队，而京师长安有守卫皇宫的南军和守卫京城的北军分区驻扎，符合内外相互维系的原则。自从汉武帝设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这八支防护长安及城郊的部队，用熟悉边远地区情况的人充实它们，招募士兵由此开头，于是后来就产生了由国家供养军队的弊病了。唐朝初期，设置以折冲府为基层单位的府兵，到唐高宗时，这种兵制逐渐解体了。宋朝的兵制，设有禁军、厢兵、乡兵、蕃兵的军种名称。明朝的中央主力军京军三大营，天子侍卫军锦衣十二卫，留守四十八卫，也就是唐朝府兵的遗留，但时间一长，陷入废弛状态。兵部尚书于谦于是淘汰三大营的老弱残兵，选取出精锐能打仗的士兵十五万，改编为十团营，此后有时设置，有时罢废。细加推究，专门采用招募士兵的制度，而游手好闲、没有正式户籍的人就充数进入到里面来，结果供养军队的费用一

天比一天巨大，获取到军队的用途却更加困难。所以只有验核兵额总有登记，训练演习具有固定的时间，老弱病残在部队编制中充数必定要引起警戒，巡逻驻防疏忽松懈必定要加以察照，而团练、乡勇这类地方武装，更与古代在同一井田内的人友爱互助的意旨相符合。这固然属于充实兵备的良策啊！皇上您神明英武天下传遍，八旗劲旅像猛虎，像猛豹，放下戈矛，解下弓剑，整个天下太平无事，但仍旧训告和谕旨多次颁发，非常殷切地把检阅作为所考虑的大事，凡是在部队里的人，谁不倍受鼓舞而立志奋勇直前呢？

制策又认为禁除凶暴，目的是安定良善，据此而考察汉代唐朝以来揭发隐藏的坏人坏事的政务，进一步寻求那探究本原的论断，总之希望能把刁顽不服管制的人改造成善良的人。臣下我查验《周礼》，把五户人家组成一比，把二十五户人家组成一闾，让他们互相进行保护，彼此承担责任。没有变故的时候由司徒管辖，发生变故的时候就归司马指挥。夜里发出的声音互相就都听得见，白天一看见互相就都认识。这种办法好极了。春秋时管仲划分国都城郊以内的政区，有五家为一轨、五十家为一里、二百家为一连、两千家为一乡的制度，分别设立每一级的长官，来主管各自的事务，使逃窜的罪犯没有可以藏匿的处所，迁居的人家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这大致上还获取到《周礼》所遗留下的用意。汉朝有乡级之下的亭长和乡官啬夫、游徼，负责盘察讯问为非作歹的人。唐朝设置基层的里正、坊正，负责检察形迹可疑的人。总之全都慎重地对待具体人选的择取任命，免除他们的赋税和徭役。北宋对待这些人的办法，与汉朝、唐朝就不一样了。所以同一项保甲制度，王安石倾向于效法《周礼》，而有的却受到它的搅扰；王守仁巡抚南赣，盗贼消除，百姓安宁，江西感到很便当。这又可以看出不在于哪项制度，而在于推行这项制度的人罢了。保甲制度通过居住区内彼此熟悉的人们，督察听说和看到的最切近的事情。举动和声响容易知道，形迹和去向很难掩盖，而又当地驻守的军队一定要委派好合适的军官，墩台堡垒一定要周密地安排好活动的规则，寺院等处经常要进行巡察，用来杜绝奸恶的刁民，安定善良的百姓，也就不困难了。在已经形成的时候惩治盗贼，不如在还未发生

的时候止息住盗贼。平日里沿用成规,敷衍了事,不能够切实用力履行职责,对稽察验核格外留心,等到盗贼的形迹已经公开显露,即使像东汉虞诩那样大量招募壮士,像北魏李崇那样每村各置楼鼓,盗贼虽然止息住,毕竟经受不起盗贼的那番搅扰了。我朝典章制度详明完备,道德一致,社会风气都相同,好官员奉守执行既定的朝廷法令,宽大和严惩相互补充,生活在最远处的百姓和全天下众多贤能的人,谁不目睹感念,振兴奋起,磨练道义,逐渐养成仁德,相互遵循天子所确定的大道正路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恭敬地执持住最适中的那个尺度不动摇,道德修养就纯粹了。选拔优秀突出的人物,贤才就涌现出来了。而且还整顿军队,筹划武备,迅猛凌利就充分显露了。盘察奸恶,处治凶暴,坏人坏事就消除了。真盛美啊!治理国家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不过臣下我又听说,高远明亮没有比得过皇天的,又浑然宏大覆盖一切,头顶皇天的人更仰望它再高远。广阔深厚没有比得过大地的,又能包容生养万物,在地上活动的人,更期望它再深厚。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您,在帝位上却不贪图安逸享乐,经常使自身的道德一天一个样。政治谐和却治理进一步加以整顿,人们都遵守法令但防备更为充分。飞扬仁德教化的名声,腾驰隆盛美好的业绩,总括八方边际形成那度量,用来对上敬迎皇天的多种福佑,对下安定蒙受恩泽的臣民,我们国家永远政治清明,绵延不断,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问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罗文俊　殿试对策

罗文俊(1792~1852)　字泰瞻,号萝村先生。广东南海人。四岁丧父,清苦勤学。道光二年(1822)探花。旋即守亲不出。后历任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山西和浙江等省学政。为官清廉,重风操气节。鸦片战争中,曾独自在夜晚抚剑自誓,必以身殉国。后因病辞官,卒于家。为文清雅,赢得"摽然秋云之端"的赞誉。

臣对：臣闻建中所以锡福，崇德所以兴贤，卫民则道在足兵，安良则政先除暴。稽诸载籍，《易》著健行之训，《礼》详选俊之经，《书》传整旅之文，《诗》诵宜民之化。茂矩崇仪，粲然具备。自古帝王德迈鸿轩，勋逾象纬，绥猷有要，誉髦有方，经武有规，训俗有法，莫不本夙夜勤求之实，以握天人协应之机。用是精一执中而主极建，简贤选能而士品端，训练既明而军政修，保守相资而民风懋，汪汪乎丕天大律，诚振古之上仪。所为万福臻而百禄萃者，恃有此道焉尔。

钦惟皇帝陛下，规矩二仪，甄陶万汇，固已乾行协撰于穆清，时敏化先于庠序，效干城而民皆向义，除奸宄而俗尽型仁矣。乃圣怀冲悒，深维累洽重熙之运，弥切持盈保泰之思，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保邦、兴学、讲武、戢暴诸大端。臣占毕庸愚，曷足以知体要？顾幸际广思周逮之时，窃附于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竭素日所诵习者，用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帝王之道，统乎修己治人，而因求乎修身之本与治世之纲。此诚郅治之隆轨也。臣惟帝王之治本诸道，帝王之道本诸心。昔者黄帝之训曰：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其说见《吕氏春秋》。心法、治法之传，溯自尧舜以前，已开其绪。其他散见于载籍可考者，如尧戒之言战栗，舜对之执忠信，禹以骄汰自儆，汤以慎举为先，皆古圣之微言，实宰世之大本。尚父以《丹书》告武王，而敬胜、义胜两言，垂训万世。武王因之作十七铭以自儆。盖惟敬则勿敢慢，惟敬则勿敢欺。《洪范》九畴，皇极之所以锡也，而"用五事"者，首之以"敬"。《中庸》一书，圣道之所为大也，而陈九经者，要之以诚。盖先儒训敬为主一无适，一者，诚而已矣。诚敬合，而帝王之道已立，而所谓明德慎徽，知人安民，皆可一以贯之矣。后世人君知此意者，如唐太宗之《金镜》，宋真宗之《正说》；人臣知此道者，如魏徵之疏十思，司马光之上五规，胥能通达政要，取鉴古今，真足立千古之大闲者也。皇上道昭往圣，治协执中，心法治法，洵足继唐虞而隆千古矣。

制策又以贤才之兴，关乎学校，而因实求乎先德行而后文艺。此诚敦崇实学之至意也。臣考古者德行之教，著于司徒。三载宾兴，实

始广登进之路。自汉以来,郡国守相,得以掌荐举之权;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自隋始有科目之设,唐以后皆因之。盖自乡举里选易为科目,而天下之士为青紫而明经。道德文艺,判为两途,而务正学者鲜矣。夫士者,民之表,亦官之朴也。必其平日敦崇实行,砥砺廉隅,利禄之见不以扰其中,浮薄之行不敢设于体,然后有贞介之行,则居官必无贪婪;有仁慈之心,则宰物必无严酷;而且勤慎自矢,则任事必无旷厥官,庶几处为修士者,出为良臣也。若夫虞溥作《学诰》,奖训生徒,以正心修行为本。胡瑗教授子弟,咸使适于实用。与夫朱子《白鹿洞学规》所列,真德秀《示学者说》,其于立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世之要,圣贤入德之方,条示精详,剖析谆挚。学者诚能身体力行,斯德行文艺两者兼之,则为纯儒者,可谓贞臣矣。圣朝崇尚实学,加意人材,为士者敢不砥行立名,争自濯磨哉!

制策又以兵可不用,不可无备,而因严饬武备,以期乎实效之可收。臣考《周礼》所载,乡遂郊甸,皆因井田而制军赋,居为比闾族党,出为伍两卒旅,制诚善矣。而又振旅茇舍,治兵大阅,教以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以行蒐苗狝狩之礼,立法最为详备。且夫兵,所以卫民者也。古之时,战则胜而攻则取者,夫岂有异民?良由训练之经,习于平日,而义勇之气,积于中心。《孙子》曰: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往来,无不如意。则练士之道得也。《吴子》曰:人能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则治军之道得也。昔者管子相齐,令春秋角试,以练精锐,有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诸法。而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所云画方点圆,步教足法,兵教手法者,犹得古治兵遗法。至若宋沈括论九军阵法,臧景所陈马射六事,明于谦创团操之议,王骥定练兵之制,往制所垂,皆可参酌行之。特是训练之责,在兵更在将。为将者诚能鼓励士气,简阅必勤,赏罚必当,则一兵有一兵之用矣。圣朝武功远播,武备精严,固足以驾汉唐而隆于成周之世矣。

制策又曰:稂莠不除,嘉禾不殖,而因求所以禁暴而安良。臣考《周官》有比闾族党之设,以行赏罚。外有野庐氏,内有修闾氏,皆所以严讥察而消邪慝。自后管子有轨里连乡之法。汉制亭有长,乡有三老,有啬夫、游徼,游徼职捕盗贼,尚有成周里宰鄙长遗策。夫太平日

久，生息日繁，宵小不肖之徒，每萌蘖其间，使莫为之防闲，则积渐将不可止，而良民遂受其害矣。其发奸摘伏，如赵广汉鉥簏投书，张敞赭污衣裾，尹翁归收人会中，韩延寿置立五长，其治术皆卓然可纪。夫安民莫先弭盗，弭盗莫如保甲。诚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法诚甚便。然王安石行之而民扰，王守仁行之而民安，则有治法，更贵有治人也。是故胥吏所以察奸也，兵弁所以诘盗也。可以耳目寄之，不可以威权假之；可以臂指使之，不可以心腹任之。否则，此委以权，彼诱以利，又安保其不消息相通，而反为之援引哉？欧阳修、汪应轸之议，并以慎择官吏为要，真可谓探本之论也乎！圣朝典章明备，一道同风，严奇邪之诛，申左道之禁，一时衣食足，礼义起，学校隆，仁让兴。凡民皆有耻，无敢犯法，而有司董劝，又复实力奉行，而无或扰民之事，所由经正民兴也。

若此者：德懋绥猷，化行劝学，政垂奋武，法备安民。酝化懿纲，蜚声腾实，仁寿之事赅焉，而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至诚无息，立政有恒，主德懋而弥切寅恭，儒术端而不忘申儆。止齐已习，尤思整饬之方；安平有书，益致严察之用。按经校德，成袭六为七之书；稽古论功，跻咸五登三之盛。由是协气旁流，仁风四溢，上以迓蕃厘，下以绥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不偏不倚最适中的准则，目的是赐给百姓长寿、富足、安康等五种福禄；崇尚道德，目的是兴用贤才；卫护民众，办法在于充实兵备；安定良善，施政要首先诛除凶暴。考察典籍，《周易》突出天道刚健运行的训示，《周礼》详尽说明选拔优秀人才的常规，《尚书》流传下整顿军队的文字，《诗经》吟诵使民众安定的教化。重大的成规和崇高的法则，灿烂详备。自古以来，帝王的仁德超过帝鸿氏和黄帝，功勋胜过观天授历的帝尧，安定那大道的教化具有要领，使优秀人才远近闻名具有方法，筹划武备具有规则，训导民间风尚具有法度，无不依凭从早到晚勤恳求德的实际，来把握住上天与人事协调对应的时机，因此精

心一意，执守那最为适中的尺度，帝王的准则就建立起来了；挑选任用贤能，读书人的品行就端正了；训练已经严明，军政就得到整顿了；各家保卫守护相互作补充，民间的风尚就隆盛了。真真广远啊！奉守上天的大法，实在是从古以来的最高法式啊！各种吉福来到，各种福禄汇集在一起，原因就在于拥有这些措施罢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效法天地阴阳，造就万物，原本上已经自强不息而同上天协调契合了，疾速修德而把学校放在教化的首位了，卫国将士效力而民众全都归向正义了，诛除为非作歹的人而社会全都向仁德看齐了。可陛下圣明的心怀却谦虚自抑，深深关注世世代代清明和乐的际运，越发加重守住已成事业、保持平安的心思，把臣下我等宣召到殿廷，而用确保国家安宁、振兴学校教育、讲求武备、止息凶暴各项重大政事，来进行策问。臣下我只知道背书本，平庸又愚昧，哪里足以识大体，知纲要？可是正荣幸地赶上集思广益、普遍延及的时刻，私下附从那向君王拜献建议，首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经典古义，敢不恭谨地竭尽那平日所诵读研习的东西，来献上微不足道的一点儿补益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做帝王的原则与方法，归结在修养好自身，治理好众人，据此而谋求修养好自身的本原和治理好社会的纲领。这实在是治理达到极点的隆盛轨道啊！臣下我想来，帝王的治绩来源于大道，帝王的大道来源于心性。从前黄帝的训示说：皇天在上，大地在下。你能效法天地，就会成为百姓的抚养爱护者。这种说法见于《吕氏春秋》。治心大法和治国大法的递相传授，追溯到唐尧、虞舜以前，已经开启端绪。其他散见在古书中能够考查出来的记载，如唐尧的诫语讲到要十分戒惧，虞舜回答唐尧的提问强调执守忠诚信义，大禹用骄纵奢侈来自我做警戒，商汤把谨慎采取行动放在第一位，这都是古代圣帝明王的精微言论，实属主宰天下的最重要的依据。尚父吕望拿《丹书》告诫周武王，而恭敬克制住懈怠就吉利，道义克制住私欲就求吉得吉这两句话，给后世万代留下训诫。周武王根据它写下了十七篇箴铭来自我做警戒。大致因为，只有恭敬，就不敢怠慢；只有恭敬，就不敢欺诈。《尚

书·洪范》的九条根本大法，用来赐给百姓最高的准则，而处理好态度、言语、观看、听闻、思索等五个方面的事情，这句话的开头特地用了一个“敬”字。《中庸》这部书，是圣人道法广大的缘起啊！可陈述治理天下的九条原则，专用至诚来做概括。因为前代的儒家学者把“敬”解释成“一”为核心，就没有对万事万物不适应的。所谓“一”，也就是至诚罢了。至诚与恭敬结合在一起，做帝王的原则与方法就已经定立起来了，而所谓宣明德性，慎重对待并把父义、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奉为五种美德，所谓识别人才、安定民众，就全都可以用一个根本的东西统贯起来了。后世君主明白这种意旨的，像唐太宗的《金镜》一文，宋真宗的《正说》一文。大臣明白这种意旨的，像魏徵奏进章疏向唐太宗讲论知足自戒、知人善任等十思，司马光献呈奏状向宋仁宗讲论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这五规，都能深切通晓国政的重要方面，从古至今汲取借鉴，真是足以定立起千古大界限的东西啊！皇上您道法比从前的圣帝明王还要显耀，治国同执守那最适中的尺度相协调，治心大法与治国大法，确实足以上继唐尧虞舜而高照千古了。

制策又认为贤才的兴起，同学校关系很大，据此而切实谋求把德行放在第一位，把写文章的技艺放在第二位。这实在是注重和崇尚朴实学问的最深远的意图啊！臣下我考查古代德行教育，附属在大司徒那里。每隔三年，对民间的优异人才进行荐举和给予宾客礼节的待遇，这实际上是首次扩大选拔进用的途径。从汉朝以来，各郡和诸侯王封国的郡守与国相，得以掌握荐举的权力；按九个品级对州郡人士进行评定的中正官，得以操纵选拔官吏的权柄。从隋朝开始有科举考试制度的设立，唐朝以后全都沿用这一制度。自从由基层向朝廷选送荐举人才变成科举考试后，天下的读书人为获取到官职而究明经书。道德和写文章的技艺，明显地分成两回事，而在纯正学问上真下功夫的人就少了。读书人是老百姓的表率，也是官员的原型。他们必须平日就注重崇尚朴实的行为，磨练那端正不苟且的品行，功名利禄之类的观念不拿来扰乱自己的心志，虚浮轻薄之类的行为不敢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具有正直耿介的品行，身居官

位就必定不存在贪婪；然后具有仁慈的心田，主宰百姓就必定不存在严酷；而且把勤勉谨慎作为自己的誓言，担当政事就必定不荒废职守。这样一来，在家居住成为道德修养很高的人，出来做官也就差不多成为忠良的臣僚了。至于晋朝虞溥写成《学诰》，奖掖训导学生，把端正心志、修炼品行作为根本。北宋胡瑗教授弟子，都使他们适合实际的用场。以及朱熹《白鹿洞学规》所拟列的条款，真德秀的《示学者说》，对于定立教法的名目，治学的次序，修养好自身和处世的要领，圣人贤人进入道德最高境界的方法，逐条开示得精确详明，剖析得头头是道，十分恳切。求学的人果真能够身体力行，这就道德品行和写文章的技艺同时具备，那么，成为纯粹的儒士的人，也可以称得上是正直的臣僚了。我朝崇尚朴实的学问，对人才十分关注，作为读书界的人，敢不砥砺品行，树立美名，争相洗涤磨练自己吗?

制策又认为军队可以不动用，但不能没有防备，据此而严切整治武备，来期待实际效果可以收得到。臣下我考察《周礼》的记载，距离国都一百里以内的乡、郊，距离国都百里以外、二百里以内的遂、甸，都根据井田的数目来制定军事行动所需要的物资与人力。平常在“乡”以下划分为由五家组成的比、由二十五家组成的闾、由一百家组成的族，由五百家组成的党；战时组建为由五人组成的伍、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两、由一百人组成的卒、由五百人组成的旅。这种制度确实很完善了。而又回师入城，除草平地作为野战宿营地，进行大演习、大检阅，用卧倒与站起、前进与后退、快速与缓慢、距离远与距离近的一套常规来教导士兵，举行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四季出猎的大礼，所定立的法式最为详尽周全。况且军队，是用来卫护民众的。古时候交战就获胜、攻打就占领的原因，哪里是拥有奇异的民众呢?实在是由于训练方面的常规在平时就很熟习，而正义勇猛的那股气概又积聚在内心。《孙子兵法》上说：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弯曲伸直，打出去，收回来，没有不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的。真像这样，训练士兵的方法就获取到了。《吴子》中说：一个人能学好作战，就会再教成十个人；

一万个人能学好作战，就会再教成三军。真像这样，治理军队的方法就获取到了。从前管仲在齐国担任国相，命令在春季和秋季进行比试，来训练精锐的部队，有用五色指挥旗教导士兵的眼力、用坐起的号令教导士兵的身体动作、用进退规则教导士兵的步伐、用长短兵器教导士兵的手技、用赏罚必信教导士兵的心志等方法。而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这部兵书中所说的六花阵、用队列距离的步数来教练腿脚移动的方法，用各队执持的兵器来教练刺击的方法，仍然获取到古代演练军队所遗留下的做法。至于北宋沈括讲论九军阵法，臧景所陈述的骑马射箭的六大事项，明朝于谦首次提出编组演练的建议，王骥定立出练兵的规制，它们作为过去的定制垂示后代，都可以参照酌取来施行。只是训练的责任，在士兵更在将领。担任将领的人，果真能够鼓舞激励士气，检阅必定勤勉，赏罚必定公正，那就一个士兵具有一个士兵的用处了。我朝武功向遥远的四方播布，武备精详严密，本来就足以超越汉朝唐朝并且比西周时代还隆盛了。

制策中又讲到：危害禾苗的杂草不除掉，好禾苗就生长不起来，据此而谋求禁除凶暴、安定良善的对策。臣下我查验，《周礼》有五家为比、二十五家为闾、百家为族、五百家为党的基层组织的设立，来施行赏赐和惩罚。在国都外设有野庐氏这一官职，在国都内设有修闾氏这一官职，都是用来严密进行稽察，消除邪恶奸凶。此后管仲创造了五家为轨、五十家为里、二百里为连、两千家为乡的制度。汉朝制度规定，由千户人家组成的亭设有亭长，由五千户或一万户人家组成的乡设有三老、啬夫、游徼三个基层官，游徼负责搜捕盗贼，这还带有西周国都郊外二十五家为一里设一里宰、一百家为一鄙设一鄙长的遗策。大致说来，太平的时间一长久，人口的繁殖一天比一天增多，而盗匪坏蛋败家子这类人，常常滋生在里面。假使不对他们进行防范和禁阻，就越积累越扩大，将会不可制止，而善良的百姓就遭受这帮家伙的危害了。有关揭发隐藏的坏人坏事，像西汉赵广汉设置小口瓶形状的器具让人往里面投送检举信；张敞叫偷盗团伙的老大在酒席上用赭色土抹在每个成员

的衣服后襟上，散席后一网打尽；尹翁归在秋冬考核官吏的大集会上当场逮捕平日所掌握的奸吏和地方豪强；韩延寿在五家组成的一伍中各设一名伍长，严禁各家收留奸恶的人。他们这些治理的方法全都卓然可以记述。一般说来，安定百姓没有比消除盗贼更占首位的，消除盗贼没有比得上保甲制度的。这实在是因为通过居住区内互相熟悉的人们，督察听到和看到的最切近的事情。这一制度确实特别便当。然而北宋王安石推行它，却百姓受到搅扰，明朝王守仁也推行它，却百姓得到安宁，这证明要有治理的成功办法，更可宝贵的是有真会治理的人。因此，官府的办事人员是用来纠察奸恶的，带兵的小头目是用来整治盗贼的。可以把他们当成耳目来借用，不能把权力交付给他们；可以把他们当成手指手臂来驱使，不能把他们当成心腹来信任。不然的话，这里把权力交付给他们，那里用私利来引诱他们，又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与盗贼相互串通消息，反过来给盗贼做内应呢?北宋欧阳修和明朝汪应轸的意见，一并把慎重选择官吏看成是关键，真可以称得上是探究本原的论断啊!我朝典章制度详明完备，道德一致，社会风气都相同，对邪僻奇异行为的责罚很严厉，申明对歪门邪道一律禁绝，一时间衣食充足，礼义兴起，学校隆盛，仁让盛行。凡是大清的百姓都有羞耻心，不敢触犯法律，而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和劝勉，又都切实用力来奉守执行，没有或许还去搅扰百姓的事情，由此而法制严正，民众振兴啊!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仁道盛美，安定确立那大道的教化。教化施行，鼓励人们归向纯正的学问。国政垂示要奋扬武备，法规完善来安定民众。正确化导深入人心，美好治理确立起纲要，飞扬仁德教化的名声，腾驰隆盛美好的业绩，把百姓带入仁寿境域的事体全都包括了，而做帝王的原则与方法也完整无缺了。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您，至诚永无止息，定立国政持之有恒，做君主的仁德已经很盛美，但更注意恭敬。儒家经学已经端正，但不忘记告诫提醒。行进刺杀已经熟习，但更要考虑整顿的方法。安定太平有各地的上报文书，但更要获得严厉纠察的用处。对照经典来验核仁德，

构成沿袭《六经》而另为第七部的经典。考察古昔排定功业，进入同于五帝、超过三王的隆盛状态。由此协和之气往远处流布，仁德之风向四方飘溢，对上敬迎皇天的多种福祐，对下安定蒙受恩泽的臣民，我们国家永久政治清明，连绵不断，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问肤浅、刚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杨寄林译〕

清宣宗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

殿试策问

[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仰承昊苍眷佑,祖考贻庥,履位以来,于今三载。幸海宇乂安,国家无事,思与天下臣民同乐太平,允臻上理,而朕怀兢业,惟虑风化之未淳,主术之或怠,听言之未广,民生之未裕,周咨博采,罔敢少康。尔多士弹冠而来,必有嘉谟,用裨朕治。

学校者,人才之本,风化之原也。虞廷有教胄之训,周官重成均之职。化民成俗,实基于此。朕躬临辟雍,讲学兴礼,非徒盛三雍之上仪,修汉唐之故事也,亦惟多士观听,庶知向风耳。夫礼乐何以防民,教训何以正俗,师儒何以有得民之责,庠序何以为明伦之地?崇儒重道,何以驯致太平?讲让兴贤,何以潜消匪僻?建首善以励天下,何以远迩会归?端士习以振民风,何以本末维系?辅世长民之道,明德新民之学,必有能识其要领者。毋第以环林璧水,徒以揄扬之词进也。

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然考其心迹,诚伪判焉。茅茨土阶、绨衣挛领之世,尚已。三统而降,可得而言。汉文帝衣绨履革,蒲席韦带,屏雕文之饰,惜中人之产。其视初元、建平之代罢齐三服官,易帷幛,去锦绣者,何如也?厥后令辟,亦知克己。焚翟裘,毁简布,以萧何壮丽之对为非雅言。又其甚者,一冠三载,一衣屡浣,俭矣。然或盛衰殊途,始终异辙,岂徒俭不足以示国欤?抑务名不求

其实欤?朕仰思《禹谟》勤俭之训,永怀《商书》俭德之言,欲使天下黜华屏欲,治登淳古,何道以致之?

朕观郅治之世,必有论思献纳之臣,辅翼左右;而人主亦复虚衷下问,翕受敷施。所以上下一德,民受厥福也。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夏禹闻善则拜,殷汤好问则裕,文、武谘询于虞、虢,访问于箕子。帝王御宇,未有不以询事考言为先务者。后世令主,非无勤勤之言,恳恳之求,然或旒纩上辟,刍荛下遗,白兽之尊徒设,肺石之函莫启。即有听纳,或慕虚名,急于进言,未遑详察。盖非明不足以察其言,非断不足以行其言。若泛然受之而无所别于中,将亦悠然容之而莫能区处于外矣。取舍之宜,厥维艰哉!明断之本,可得闻欤?

昔大禹尽力于沟洫,以备水旱之虞,其功尚矣。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不乏人。故郑渠凿而秦人富,蜀堋成而沃壤兴。汉唐循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为急务。畿辅大川有五:南北运河、永定、清河、滹沱是也。今欲南北运河入海之路畅达,何以使下游无阻?滹沱会合之水甚众,何以免横溢之虞?清河以两淀为滀畜,何以疏瀹深通?永定为山水所会归,何以沙淤不积?或者又谓治河之吏,知有堤而不知有河,密于修防,疏于浚导。营田之吏,知有田而不知有河,利其淤垫,忘其涨塞。夫五行之材,水居其一。用之善则灌溉可资,用之不善则泛溢为患。将欲兴利除害,何道而尽善焉?

凡此四者,皆经国之大猷,立政之本务。夫蓄疑而不问,主术之疏也。博学而不达,士林之愧也。考之于古,验之于今,何去何从,孰得孰失,多士其悉言无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抓住要害来发问,多就当前的问题做思考,仁德也就包含在这里面了。

明了远处是由近处才形成的,明了风是从哪里吹来的,明了事物是从萌芽状态才发展到明朗阶段的,这样就能够进入圣人的道德境

界了。

在家里就孝顺父母,到外边就尊敬长辈,执守古代圣帝明王的礼法道义。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仰承上天的眷顾保佑和列祖列宗遗留下的吉安福庆,登上皇位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很庆幸四海之内安定,国家无事,一直想和天下的臣民共同为太平而欢乐,确实达到最完美的治理状态。可皇帝我时刻想着兢兢业业,只是担心教化还没有特别淳正,君主的治国原则与方法还存在着懈怠的地方,听取各种建议还不广泛,百姓的生计还不宽裕,因而普遍地加以询问,多方面进行采择,不敢稍微安乐一下,你们这些众多的士子,非常庆幸地前来应试,一定怀有良好妥善的谋略,来补益皇帝我对国家的治理。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根基,教化的本原。虞舜时代就有教导年青人的训示,周朝官制也重视最高学府的官职。教化民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实际上就奠基在这里。皇帝我亲自驾临辟雍这最高学府,讲论儒家学问,兴行礼仪,不单单是让辟雍、明堂、灵台这三个场所的最高礼仪更隆盛,修明汉代唐朝的旧有惯例啊!也只是要众多的士子观看闻听,大致上知道闻风仰慕罢了。礼法音乐为什么能防禁民众,教导训示为什么能端正风气,师长儒者为什么负有获得民众的职责,庠、序之类的地方学校为什么是宣明伦理的处所?尊崇儒学,看重大道,为什么会逐渐达到太平?讲求让贤,使贤良的人兴盛起来,为什么无形中就会消除掉邪僻不正的行为?树立最好的榜样来激励天下,为什么就能远近都朝这方面会聚归拢?端正读书人的习气来振作起民间的风尚,为什么就会本末相互维系住?有关这些辅助社会、管理百姓的原则与方法,宣明德性、使百姓自新的学问,在你们这些应试者当中一定有知道那些要领的人。不要只凭学府林木环绕,四面环水圆如璧,仅仅用赞扬之类的言词来进献。

自古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无不亲自励行节俭,给天下人做出

表率。但考察他们的存心和行事，真假也就区分出来了。茅草屋顶土台阶、缝制粗衣缀脖领的尧舜时代，由来已经很久了。夏商周三代以下，可以讲个明白。汉文帝身上穿粗糙的帛制衣服，脚上穿生皮做成的鞋，坐席用蒲草编成，剑带只用柔皮条，上面没有任何装饰，宫内去除华丽的饰物，惜念用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而停止修造露台。他比照汉元帝初元年间和汉哀帝建平年间，罢废齐地专为天子做冠服的三服官，撤换帷障，去除绮丽的宫内丝织品，究竟又怎样呢？后世的英明君主，也知道克制自己。有的在殿前烧掉山鸡裘，毁掉筒中细布，认为萧何关于修建宫殿要壮丽、借此显示帝王气派的对答属于不纯正的言论。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一副头冠戴了三年，一件衣服换洗多次，真是够节俭的了。可是有的却兴盛、衰败不一样，国家存在长短不一样。这难道是光节俭还不足以给全国做出榜样来吗？还是务求虚名不求实际所造成的呢？皇帝我敬慕地思索《大禹谟》中克勤克俭的训诲，永远牢记《商书·太甲》中高度注意节俭美德的箴言，想使全天下去除掉奢华，打退掉贪欲，国家的治理步入淳朴而有古风的境地，用什么方法来达到它呢？

皇帝我观察治理到极点的时代，一定要有谋划国事献纳意见的贤臣辅助在左右，而君主反过来也虚心向下面询问，聚合并用，施布政教，这是上下一德、百姓蒙受那福禄的原由啊！唐尧有在大道上筑室来向民众征询意见的做法，虞舜有在正殿西堂访求意见的方式，夏禹听到了好言论就给人敬礼，商汤喜欢用询问来扩大视听，文王向虞国、虢国进行咨询，武王主动对商朝遗民箕子加以访问。帝王统治天下，没有不把询问政事、考察舆论作为首先要做的事情的。后世的英明君主，不是没有殷切希望人们提出建议的诏命和恳切的访求意愿，然而有的却玉串、玉丝缀在皇冠上摆着，而把民间百姓遗弃在下边。表示直言进谏的人可以饮用的白虎樽徒然放设在殿廷上，允许穷苦百姓在朝廷门外所立的赤色石头上来鸣冤的上告词却不打开看。即使有所听问采纳，有的也只是仰慕虚名，盼望臣下快快进言，可却顾不上审慎地察照。大致上说来，只有明智才足以察照进言者的意见，只有果断才足以行用进言者的意见。如果浮泛地采纳其意见却在心

中无所判别，那也将会随便让它去而在外部却不能做处置了。取舍合适，这可太艰难了呀！明智与果断的本原，能从你们这些应试者中听取到一些什么吗？

从前大禹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渠水利上，来防备水灾旱灾给人们带来的忧虑。他的功绩已经很久远了。但根据大禹所完成的水利事业而让它对人更有利的，各个朝代都不缺乏这样的人。所以郑国渠开凿后，秦国人就富足了；蜀地都江堰修成后，肥沃的土地就开发出来了。汉朝唐代的好官员，让他们辖区内的老百姓有衣穿、有粮吃的举措，没有不把视察水情作为优先要办的事情的。我朝京师周围地区，大河流有五条，这就是南运河、北运河、永定河、清河、滹沱河。如今要让南、北运河入海的水道畅通，靠什么办法能使下游不存在阻塞呢？滹沱河会合的水流特别多，靠什么办法能免除它泛溢成灾的忧虑呢？清河用东淀、西淀作为积聚水和蓄水的地方，靠什么办法来疏导而特别通畅呢？永定河是山中河水汇聚流入的一条河，靠什么办法能使泥沙不淤积呢？有人又说负责治理河流的官员，光知道有堤坝却不知道有河流，在修堤拦防上很细密，在开挖疏导上却不在意，而负责营造水田的官员，光知道有水田却不知道有河流，对泥沙淤积感到很有利，忘记了河水会因此而涨溢堵塞。五行这五种自然物，水占其中的一种。利用好它，灌溉就能有凭借；利用不好它，就会泛滥，造成灾患。想准备兴利除害，采用什么办法能搞得十分完善呢？

总共这四个问题，都属于治理国家的大谋略，定立朝政的根本大事。存留疑虑却不询问，这是君主在治国原则和方法上的漏洞。广博地学习却表达不出来，这是知识界的愧辱。考察古代，验证当今，究竟该摆脱什么，依从什么，哪些属于得，哪些属于失，你们这些众多的士子要全部讲出来，不要有所隐瞒。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林召棠　殿试对策

林召棠(生卒年不详)　字芾南，广东吴川人。道光三年(1823)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致治本于育才,正俗先乎谨度,听箴规斯能综众善,勤疏浚所以庆安澜。稽诸往籍,《诗》咏作人,《易》严节制,《书》著从绳之美,《礼》有修防之文。茂矩崇仪,秩然赅备。伊古帝王,斟元立极,握符阐珍,庠序修明,轨仪端肃,询事与考言并慎,随山与导水兼宜,皆本持盈保泰之心,以懋咸五登三之治。用是渐仁摩义,圣化隆焉;去华崇实,民风茂焉;集思广益,政理平焉;陂泽涤川,地利尽焉。猗与盛哉!所为被润泽而大丰美,受厚福以浸黎元者,恃有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布辟雍之雅化,敦浑穆之醇风,酌众论以权衡,登寰瀛于清晏,固已臻淳熙而还质悫,赓喜起而奏平成矣。乃圣怀冲挹,蓟菲不遗,体至善之无穷,冀迩言之可采,进臣等于廷,而策以讲学、崇俭、纳谏、治水诸大政。如臣椿昧,有若涓流撮壤,奚补海山?顾当对扬伊始之辰,敬附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前闻,备陈诵习,以效管窥蠡测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学校者,人才之本,风化之原也。化民成俗,实基于此,而因求辅世长民之道,明德新民之学。此诚致治之首务也。臣考米廪虞庠,教胄聿开乎《姚典》;东序右学,隆义嗣启于两朝。乡询五物,士论三升,咸莘莘而济济矣。《诗》曰"於乐辟雍",文王之学也;"镐京辟雍",武王之学也。古者天子有视学之典,燕礼食礼,四代兼修;合舞合声,三时备举。发德音,记惇史。所由朝廷有菁莪之化,多士美蔪吉之誉也。西汉三雍,兴于孝武之代;明堂辟雍,修于元始之年。建武中兴,投戈讲艺,车驾亲临。中元之间,其礼备举。桥门圜观听之人,羽林悉通经之士。其后顺帝阳嘉,灵帝熹平,嗣举隆仪,勿替敬典。降及魏晋、唐宋之间,余风犹被焉。夫王者讲学行礼,所以训迪多士,使知向方也。岂徒美鼍鼓之於论,夸鸾旗之焜耀云尔哉?礼明乐备,所以防民;一德同风,所以正俗。重师儒之选而论道秉德,万方有归化之诚;谨庠序之修而教孝劝忠,天下明人伦之义。崇儒重道,久且驯致乎太平;讲让兴贤,即以潜消其匪僻。建首善以励天下,而是行是训,咸遵王道之荡平;端士习以振民风,而无党无偏,悉纳群伦于轨物。时雍风动,不即在环林璧水之间哉!圣天子阐千古之心传,

迈百王之治法，贤才蔚起，仁让风行，复临雍讲学，明至道以示群英。海滋山陬，有不研经而砥行者哉！

制策又以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以为天下先，而因考心迹诚伪之判。此返朴还淳之至意也。臣谨按，《逸周书》曰：不为骄侈，不为靡泰。《礼记》曰：国奢则示之以俭。是岂爱财惜费，为《唐》、《魏》俭啬哉？盖民生有欲，圣人不能绝之使无，而以礼为防。先王所为，节而不过，因其情，制其物，与之等级，戒其侈淫。自古范民之道，未之有改也。然制之于下，防其流，非以清其源；谨之自上，正其本，即以礼其末。《禹谟》美勤俭之训，《商书》崇俭德之言，《周礼》王后服膳，有不会之文，而司服、膳夫，各有成宪，则其谨而不过，可知也。各守尔典，无即慆淫，天下所由式化乎！夫茅茨土阶、绨衣挈领之世，尚已。三统以降，可得而言。汉文帝衣绨履革，蒲席韦带，屏雕文之饰，惜中人之产，其时家给人足，几致刑措，非节俭之效欤？厥后令辟，亦知克己，焚翟裘，毁筒布，以萧何壮丽之对为非雅言。又其甚者，一冠三载，一衣屡浣，可谓俭矣。而或盛衰殊途，始终异辙，非俭不足示国，则务名而不求其实耳。夫俭出于诚，则心无逸欲，而天下皆化其风；俭饰于伪，则外矫纷华，而芃人且窥其隐。心术所存，从违即判已。皇上躬尧舜之温恭，崇夏商之忠质，黜华敦朴，已风行四海矣。

制策又以郅治之世，必有论思献纳之臣，辅翼左右，将求上下一德，民受厥福也。臣惟尧舜之圣，度越臣工，可以独行不惑矣。而《典》、《谟》所载，曰畴咨，曰弼谐，戒面从，美师锡，罔非求善纳诲，冀臻上理。衢室之问，总章之访，所由开万世帝王之大法也。三代之隆，夏禹闻善则拜，商汤好问则裕；文王询于八虞，谘于二虢；武王访《洪范》于箕子，受《丹书》于尚父。明试敷奏，非帝王御宇之先务哉！夫独断者，勇于自信，而听言太广，用人太骤，又无以核其实，而或失所折衷。故必之明而后能察其言，至断而后能行其言。隐恶扬善，执两用中，决择所以能精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推行所以尽利也。欲其能明，必先穷理，而后不惑于疑似之交；欲其能断，必先去私，而后不溺于依违之见。惟明且断，聪明斯称天亶，勇智乃为天锡也。岂虑旒纩上辟，而刍荛犹下遗哉？皇上圣德日新，渊衷下济，人无不尽之怀，亦

理无不析之蕴矣。

制策又以大禹尽力沟洫，以备水旱之虞，而因求兴利除害之善政。臣惟畿辅地势广衍，诸川巨海，汇于津门，堤防疏导，厥功要矣。诸川之中，滹沱、漳河最大。滹沱即《禹贡》卫水，水势湍急，同于桑干，源出山西繁峙县东北泰戏山，曰青龙泉。回环九百里，入直隶界，会井陉水至献县，分为二派。一派东流，与漳河合，至青县，与运河合，至天津，合白河、桑干诸水入海。一派北流，径子牙河，至静海县，与清水河合，至西沽北，与白河、桑干合，又东南，合运河，而二派复合。合流既众，横溢之虞所当备也。漳河旧名葫芦河，为滏、洺诸水之委。清浊二源，分流至交漳口而合，至广平县，分为二，至天津而俱入于海。源委既远，疏导之方，所宜详也。夫治河之吏，知有堤而不知有河，密于修防，疏于浚导。营田之吏，知有田而不知有河，利其淤垫，忘其涨塞。将因势利导，并收厥功，如虞集之议海田，何承矩之耕水田，可仿其法矣。皇上俯念民依，勤求底绩，不且安流如镜，资灌溉以为丰年哉！

若此者：承明金马，不足言选俊也；沉珠抵璧，不足言返淳也；肺石路鼓，不足言达情也；郑渠蜀堋，不足言兴利也。蜚英声，腾茂实，备哉灿烂，真神明之式乎！抑闻荷帡幪之化者，则仰天之弥高；感光大之恩者，则冀地之弥厚。臣伏愿皇上教思加广，俭德永崇，理明而研益精，轨顺而防益豫。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隆，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达到大治，根基出自培育人才。端正社会风气，首先要严明法度。听取劝告规谏，这才能集中起各方面的益处。勤加疏浚，目的是庆贺河水安定地流淌。考察从前的典籍，《诗经》歌咏作育新人，《周易》驯化用制度来节制人的欲望和行为，《尚书》宣明采纳意见、归于正确的良好效果。《礼记》有修筑堤防的内容。重大的成规与崇高的法则，明晰完备。古代的帝王，斟酌初始，确立起至高无上的原则，把握并阐明天地所降示的瑞应，学校整治清明，礼法端正顾肃，询问事体和考察言论一并慎重，勘察山脉和疏导

河流同时适宜。这都是出自守住已成事业、保持平安的心愿，来勉励本朝步入同于五帝、超过三王的极治状态。因此而灌输仁德，磨砺道义，圣明的教化隆盛了；消除摒浮华，崇尚朴实，民间的风尚淳美了；集思广益，政治公平了；围住湖泽，清理河流，土地的效益都发挥出来了。这真昌盛啊！延布恩泽而使丰美范围扩展，蒙受上天厚福而延及黎民百姓，其原因是依仗有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施布国家最高学府的雅正教化，促进浑厚温和的淳正风尚，斟酌众多的言论来加以权衡，把天下带入黄河水清、沧海波平的境地了。这本来就已经达到淳正清明而返归质朴诚实了，君臣相继歌咏大臣乐意尽忠和帝王事业振兴，宣告地平天成了。可陛下圣明的心怀却谦虚自抑，对稍微有用的东西也不遗弃，体察最完善的国政没有止境，希望浅近的话语也有可以采纳的地方，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而用讲学、崇俭、纳谏、治水各项重大政事来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无知的人，简直就如同一滴水、一撮土，哪能对大海泰山有什么补益？可是正当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刚开始的时刻，恭敬地附从那各自陈述奏进治理措施的经典古义，敢不勉力述说所曾听到的前人的说法，毫无遗漏地陈述自己所诵读研习过的东西，来献上狭小浅薄的一点儿心得吗？

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中有这样的话：学校是人才培养的根基，教化的本原。教化百姓，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实际上就奠基在这里。据此而求取辅助社会、管理百姓的原则与方法和宣明德性、使百姓自新的学问。这实在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头等大事啊！臣下我考察米廪是虞舜学校的名称，要教导年轻人则由《舜典》首先提出来。夏代在京师中王宫东侧设立东序，商代在京师西郊设立右学，使国家最高学府的礼仪进一步隆重，这又是由夏商两朝继虞舜之后创造先例的。周代由乡大夫在乡设学校举行习射礼时，向围观的乡民询问参加习射者的五种表现：是否志正体和，是否容仪符合礼法，是否命中率高，是否与音乐伴奏合拍，是否弓矢舞跳得合乎规定。士子的评定选拔，历经三级：由乡大夫核定为秀士，上报给司徒为选士，由司徒再选送到国家最高学府为俊士。这样一来，就人才众多又可观了。《诗经》上

说:“啊!可喜乐的辟雍大宫。”这是文王的最高学府。《诗经》上还说:“镐京筑有辟雍大宫。”这是武王的最高学府。古代天子有到最高学府视察的制度。敬老的宴饮礼、食用礼,到周朝兼用舜夏商的做法来加以修明。士子合跳代表国家政权的舞蹈,音乐诗歌组配在一起表演,分别在春夏秋视察时按顺序进行。讲出有益的话语,记载下长者的美德善行成为众人效法的淳厚之史。正因为如此,朝廷产生了像萝蒿在山湾中长得十分茂盛那样的化育人才的景象,众多的士子对济济一堂全是国王众贤士的赞誉感到特别自豪。西汉的三雍宫,兴盛于孝武帝时期。其中的明堂、辟雍,在孝平帝元始年间又得到修治。东汉光武帝中兴汉室,放下兵器,讲求儒学,亲自莅临国家最高学府。从建武中元到明帝永平之间,视察的礼仪完备地行用。辟雍四周环水而辟设的桥门外边,围满了一圈又一圈观听明帝讲论并解答经书义旨的人群,羽林卫队个个都是通晓《孝经》的武士。此后顺帝阳嘉年间,灵帝熹平年间,又接着行用隆盛的礼仪,不废弃敬重儒士的典则。往后到魏晋、唐宋之间,余风仍然在流布。帝王讲求儒学,行用礼仪,目的是教诲开导众多的士子,让他们知道朝什么目标迈进。哪里仅仅是显示鳄皮鼓的鼓声匀称动听,夸耀鸾旗光彩鲜亮就完事了呢?礼法让人看得清清楚楚,音乐一样都不缺,是用来防禁百姓的。使道德归一,让风尚相同,是用来端正社会风气的。重视师长儒者的人选而讲论大道,持守仁德,世上所有的地区就都会产生归顺服从的诚意。加强各级学校的整治而教人孝敬,勉励忠君,全天下就都会明了人伦的义旨。尊崇儒学,看重大道,时间长了,将会逐渐达到太平。讲求让贤,使贤良的人兴盛起来,也就是用它来无形中消除掉那些邪僻不正的行为。树立最好的榜样来激励天下,只管照此行事,照此训导,就全都遵从王道那宽广顺畅的宏规。端正读书人的习气来振作起民间的风尚,没有相互勾结和偏私的现象,把各类人全部纳入法度和准则的范围之内。世风和美,到处响应,不也就蕴含在学府林木环绕,四面环水圆如璧之间了吗?圣明的当今天子阐发千古相传的道统理论,超过历代帝王的治国大法,贤能的人才大量涌现,仁德礼让普遍兴行。又驾临国家最高学府讲论儒学,宣明最高的道法来

启示所有的英才。这样一来，海边上和山脚下，还有不研习经典、砥砺品行的人吗？

制策又因为自古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无不亲身励行节俭，给天下人做出表率，据此来考察各自的存心与行事究竟是真是假的区别。这属于返归质朴、回到淳厚的最深切的意图啊！臣下我谨慎地查验，《逸周书》上说：不奉行骄纵奢侈，不奉行华靡过度。《礼记》上说：国家财富多，就用节俭亮给百姓看。这哪里是贪爱财物，吝惜费用，纯属《诗经·唐风》和《魏风》中所说的俭约吝啬呢？大致上讲来，老百姓从来到人世就存在着欲望，圣人不能断绝掉它，让它不复存在，而用礼法作为防禁的手段。古代圣帝明王所用的办法是，有节度但不超过极限，根据人们的欲望，裁制各自的用品，赋予给等级限制，戒绝人们奢侈过度。自古使百姓守规矩的办法，未曾有过改变，但对下面做出规定，只是防禁支流，不是用来廓清本源。而从上面多加小心，属于端正根本，这也就是用来规范末节。《大禹谟》赞扬克勤克俭这一训诲，《商书·太甲》推崇注意节俭美德的箴言，《周礼》讲到王后的服装饮食，有年终不做统计的内容，而司服、膳夫这些宫内供奉官员，各有既定的法规。那么，加小心而不超越，也就从中可以搞清楚了。各自严守你们的不变法规，不要陷入放肆过度，天下正是由此而实现教化吧！茅草屋顶土台阶、缝制粗衣缀脖领的尧舜时代，由来已久了。夏商周三代以下，也可以讲个明白。汉文帝身上穿粗糙的帛制衣服，脚上穿生皮做成的鞋，坐席用蒲草编成，剑带只用柔皮条，上面没有任何装饰，宫内去除华丽的饰物，惜念用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而停止修造露台。当时家家宽裕，人人丰足，几乎使刑法搁置起来不动用。这不是君主节俭的效验吗？以后的英明帝王，也知道克制自己。有的在殿前烧掉山鸡裘，毁掉筒中细布，认为萧何关于修建宫殿要壮丽、借此显示帝王气派的对答属于不纯正的言论。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一副头冠戴了三年，一件衣服洗过多次，真可以称得上节俭了。可是有的却兴盛、衰败不一样，国家存在长短不一样。这倒不是节俭不足以给全国做出榜样来，而是光求虚名不求实际罢了。大致上说来，节俭出自真诚，内心就没有安逸的念头，而天下全都染化

那节俭之风。节俭由假意而装出来,外表上就故意矫正纷繁浮华,而淳朴人也将窥探君主的隐秘所在。思想和心计投注在哪里,像孔子那样依从下拜还是违反众人也就显出来了。皇上您亲自践行尧舜的温和恭谨,崇尚夏朝所崇尚的忠诚和商朝所崇尚的质朴,去除奢华,促进淳朴,已经风行全天下了。

制策又因为治理到极点的时代,必定要有谋划国事献纳意见的贤臣辅助在左右,据此而准备谋求上下一德,百姓蒙受那福禄啊!臣下我想来,尧舜圣明,远远超过群臣百官,可以独自处理朝政而不疑惑了。可《尧典》、《舜典》、《皋陶谟》所载述的,却讲谁可胜任,讲大臣和谐,戒绝当面顺从,赞美众人提出意见,这都是在求取好的东西,采纳教诲,希望达到最完美的治理状态。唐尧在大道上筑室来向民众征询意见,虞舜在正殿西堂访求意见,由此而开立万世帝王的大法啊!夏商周三代进一步发扬光大,夏禹听到了好言论就给人行礼,商汤喜欢用询问来扩大视听,周文王向八虞、二虢进行咨询,周武王向商朝遗民箕子访求《洪范》,从姜尚那里领受《丹书》。考察验核群臣的政绩,群臣陈述奏进自己施政的情况,这不是帝王统治天下的头等大事吗?大致上说来,独自做出决断,往往在自信上很勇壮,但听取言论太宽泛,用人太急促,又没有什么验核其实际,或许就会在调合两种情况,取其中正上出现闪失。所以必定极为明智,然后才能详察那个人的意见;必定极为果断,然后才能行用那个人的意见。扣押住邪恶的,扬布那良善的,抓住过头和未达到这两种状态,取用最适中的那个尺度,这是对意见判断选择能做到精明的原因。聚合并用,施布政教,凡是在宽宏大量又严肃恭谨等九种美德范围以内的人,全都任职办事,这是对意见付诸实施而能尽收其利的原因。要想真能明智,先穷尽事理,然后对是非难辨的交会点也就不再迷惑了。要想真能果断,必须先去掉私念,然后对两可之间的见解也就不再沉迷了。既明智又果断,这才聪明称得上出于天性,勇敢明智是上天的赐与啊!哪里还忧虑玉串、玉丝缀在皇冠上摆着,可民间百姓仍然被遗弃在下面呢?皇上您的圣明仁德日日自新,深心接济到下面,人们没有不完全讲出的心里话,事理也没有解不开的奥秘了。

制策又因为大禹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渠水利上，来防备水灾旱灾给人们带来的忧虑，据此而谋求兴利除害的妥善政术。臣下我想来，我朝京师周围地区，地势宽广低平，各条河流与大海，汇合在津门。修堤拦防和疏浚导水，这两种功效太紧要了。各条河流当中，滹沱河、漳河最大。滹沱河也就是《尚书·禹贡》中的卫水。它水势湍急，同桑干河一样。河源出自山西繁峙县东北部的泰戏山，叫做青龙泉。河水回环九百里，流入直隶境内，与井陉水汇合，流到献县，分成两支。一支朝东流，同漳河汇合，流到青县，又与运河汇合，再流到天津，同白河、桑干河等河流汇合，注入大海。另一支朝北流，穿过子牙河，流到静海县，与清水河汇合，再流到西沽北，与白河、桑干河汇合，又向东南流，与运河汇合，而两支又重新汇合在一起。汇合的河流既然众多，泛滥的忧患是所应防备的。漳河旧名葫芦河，是滏阳河、洺河各条河流的聚集处。有清流、浊流两个河源。它们分流，流到交漳口汇合成一条，再流到广平县，又分成两条，两条流到天津，全都注入大海。从发源地到入海处，流程既然很长，疏导的方法，是所应当详加筹定的。负责治理河流的官员，光知道有堤坝却不知道有河流，在修堤拦防上很细密，在开挖疏导上却不在意。而负责营造水田的官员，光知道有水田却不知道有河流，对泥沙淤积感到很有利，忘记了河水会因此而涨溢堵塞。对此要因势利导，两方面都收到功效。如元朝虞集讨论海田的意见，北宋何承矩开垦稻田的举措，可以效仿他们的办法去做。皇上您向下体念百姓的疾苦，勤勉地谋求像大禹治水那样达到平定的功绩，不将会河水像明镜似地安稳流淌，有益灌溉而变成丰收年吗？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汉代设置承明庐、金马门，还不足以讲论我朝的选拔英才呀！古代让珍珠沉没在深渊里不采集，把璧玉埋藏在山谷中不开采，还不足以讲论我朝的返归淳朴呀！古代在朝廷门外设立百姓来上告的赤色石头和擂击喊冤的四面大鼓，还不足以讲论我朝的民情上达呀！秦朝的郑国渠和蜀地都江堰，还不足以讲论我朝的兴修水利呀！飞扬仁德教化的名声，腾驰隆盛美好的业绩。完备啊！光辉灿烂真真是神圣的法式啊！又听说蒙受上天覆盖化育的人，就仰

望上天更高远;感念大地包容和生养万物之恩的人,就希望大地更广厚。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兴教育才的思绪进一步广远,节俭的美德永远崇奉,事理明辨而研核更精详,河流水道顺畅而防备更提前。那么,我国家永久政治清明的隆盛景象,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问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王广荫　殿试对策

王广荫(生卒年不详)　字菱堂,江苏通州人。道光三年(1823)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崇学所以明伦,谨度在乎节用,集思斯能广益,兴利期于宜民。帝王寅承宝命,本内外交修之实,握天人协应之机,以彰雅化,四术重于师儒;以杜奢浮,九式均乎财用;以资启沃,义著于好问用中;以策浚疏,功要于审时度势。是以《诗》有作人之咏,《易》传制节之占,《礼》有酌言之文,《书》载浚川之绩。综搜载籍,德化兴而贤才乐育,封靡戒而物立盈余,朝有君咨臣儆之辞,民有海晏河清之颂。所由德矩从心,仁枢运掌,膺宝箓而集福嘏者,胥是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治炳乾符,光昭泰宇,超乎鸟纪之时,轶乎云官之世,固已制崇文教而化洽醇庞,道集群谋而膏流润泽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既观民而设教,复询事以考言,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崇学校、敦节俭、广听纳、筹水利之至计。如臣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学校者,人才之本,风化之原,而因思化民成俗之道实基于此。臣谨按,自虞廷传教胄之文,周官重成均之职,而辟雍之名,则见于《诗》、《礼》。辟雍居中,东为东序,西为瞽宗,是谓太学。《汉光武纪》建武中,初起太学,车驾幸辟雍,赐博士弟子有差。永平中,临辟雍,初行大射礼。至虎观谈经,临制称决,尤见崇文盛事。其

时如桓荣、伏恭诸人,膺三老五更之选,皆名儒也。唐有七学三馆,宋有六学三舍,并为教育人材之良法,亦可见学校之所系甚众矣。夫礼乐所以防民,教训所以正俗,师儒有得民之责,庠序皆明伦之地。崇儒重道,太平之所由驯致也;讲让兴贤,匪僻之所由潜消也。建首善以励天下,而远近无不会归;端士习以振民风,而本末皆相维系。学因地而设,故州长属民于序,党正属民于庠,司徒升之于学。誉髦之登,由此其选也。学尽人所当为,故王太子、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及国之俊选,皆造格致诚正之功,修身齐家之理,不以贵贱而有殊也。古人之学,明一己之德,以新天下之民,以止于至善之地。此成己成物、淑身淑世之功,即辅世长民之道也乎!圣朝懋建辟雍,本身立教,凡中外士民,亦既沐浴膏泽矣。恭逢临雍特举,茂矩丕承,知非徒盛三雍之上仪,修汉唐之故事也。

制策又曰: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以为天下先,然考其心迹,要自有诚伪之判。此当求副其实,非虚务其名也。臣按《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左氏云:俭,德之共也。俭以德名者,有清心寡欲之功,而后有制节谨度之事。民心之淳朴,民俗之美恶系焉。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其言崇俭之意,可谓深切著明矣。故国奢示俭,国俭示礼,圣王之所以善更化也;图匮于丰,防俭于逸,圣王之所以谨防微也。夫茅茨土阶,纻衣掔领,古帝之遗风尚已。三统而降,可得而言。汉文帝衣绨履革,蒲席韦带,屏雕文之饰,惜中人之产,治近古焉。厥后令辟,亦知克己。焚翟裘,毁筒布,以萧何壮丽之对为非雅言,岂非以移风易俗,固操之自上乎?至卿大夫,为民之标准。一冠三载,一衣屡浣,俭矣。然徒俭,奚足以示国欤?后世如杨绾、卢怀慎、杜黄裳之高节清标,使闻者感而自化,庶几与羔羊素丝相辉映矣。是知挽其薄俗,革其颓风,当必实心以崇节俭,而天下自臻淳朴。故其时货不弃地,用不尽财,而凡户饮其和、人食其德者,自莫不乐醉饱而歌太平矣。皇上体唐成俭,踵虞为朴,屏纤丽而弗珍,却贡献而弗纳。在位诸臣,咸皆凛簠簋廉隅之饬。彼民其有不共登淳古者乎!

制策又以郅治之世,必有论思献纳之臣,辅翼左右,而因思以询

事考言为先务。诚执两用中之要道也。臣窃念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夏禹闻善则拜，殷汤好问则裕；文王询于八虞，谘于二虢，武王访道于箕子。帝王御宇，未有不广听言之益者。夫都俞吁咈，帝治之所以底于修和也；献可替否，臣职之所以效其忠悃也。察其言之是非，明乎理之当否，措诸政事，而皆能酌其中。后世令主，非无勤勤之言，恳恳之求，然或旒纩上辟，刍荛下遗，白兽之尊徒设，肺石之函莫启。即有听纳，或慕虚名，急于进言，未遑详察，当必泛然受之而无所别于中，悠然容之而莫能区处于外矣。盖听言之道，宜精于取舍，而取舍之精，要在于明断。非明不足以察其言，非断不足以行其言。诚能本乎大智，以运神灵，具乎大勇，以彰英武，不自可协建中之盛治欤？皇上虚衷下问，翕受敷施，此所以上下一德，而民诞受厥福也。

制策又以大禹尽力于沟洫，以备水旱之虞，遂详求夫因其利而利之之道。臣考郑渠凿而秦人富，蜀堋成而沃壤兴。以汉唐循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为急务。畿辅大川，天津之南为卫河，北为白河。卫河为永济渠，白河名潞河。滹沱为子牙上游，势均而力敌。永定汇于桑干，源合而流分。皆当游衍而节宣之，使无淤积之患，得免横溢之虞。故格淀以障浑流，而三滩必须接筑；筐港以泄盛涨，而坦坡亦且致功，并宜因势而利导之也。至治河之吏，知有堤而不知有河，密于修防，且疏于浚导矣。营田之吏，知有田而不知有河，利其淤垫，且忘其涨塞矣。夫《禹谟》六府，《洪范》五行，皆以水居首。用之善，则灌溉可资；用之不善，则泛溢为患。诚能讲求水利畅达疏通、涤川陂泽之猷，比隆禹绩矣。皇上圣谟广运，轸念民依，行见怀柔丕著，薄海共庆夫安澜也。

若此者：视学以兴贤，黜华以崇实，虚怀以访道，利济以厚生，洋洋乎畅九垓而溯八埏，盖亘古而独隆也。臣尤伏愿皇上，懋日新不已之怀，成悠久无疆之治。德教已敷，而愈昭雅化；靡文已屏，而益尚淳风；博访已勤，而弥思虚受；川原已定，而更念疏通。按经校德，成袭六为七之书；稽古论功，跻咸五登三之盛。协气旁流，仁风四溢，总八方而为极，于以上迓蕃厘，下绥多祜，开骏发之远祥，固保定之洪业。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视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

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崇尚办学,是用来宣明伦理道德。严明法度,目的在于节省费用。集中众人的意见,这才能够更有收益。兴办有利的事业,目的在于安定百姓。帝王恭敬地承奉天命,依据内外交相治理的实际,把握住上天和人事协调对应的时机,用来彰明雅正的教化,那么,《诗》、《书》、礼、乐这四种经术,重在师长、儒者的选配。用来杜绝奢侈浮华,那么,有关祭祀、酬宾、丧葬和救荒、服装饮食、器物制造、出使聘问、饲养王室牲畜、颁赐群臣、恩赏这九项财政规定,靠它去调节平衡财物费用。用来帮助自家扩大视听,那么,义旨突出显示在喜好询问、取用最为适中上。用来对河流疏导沟通,那么,功效紧要在审查当前的状况和估量客观的地理形势上。因此,《诗经》中有作育新人的咏赞,《周易》中传布用制度来节制人们欲望和行为的占测,《礼记》有君主酌取民众言论的内容,《尚书》载有大禹疏通河流的功绩。综合搜采典籍来看,道德教化兴盛而贤能的人才欢乐地得到培育,富厚奢靡戒绝而财物得到配置出现剩余,朝廷上有君主询问、臣僚申明戒备的言词,百姓有沧海波平、黄河水清的颂语。道德的准则随心所欲都适宜,宽仁的纲要运作在手掌上,承当起吉祥的兆应而会集起各种福禄,其原由都是因有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治理国家映照上天降示的祥瑞,光辉普照太平的人世,超过凤鸟来到而用鸟纪事的少皞时代,凌越得云瑞应而用云字命名官职的黄帝时代,本来就已经在裁断上崇尚学校教育,民风教化达到淳朴厚实了,在治国原则和方法上会集众人的谋略,让丰饶的水流给百姓带来幸福了。可陛下圣明的心怀却谦虚自抑,不遗弃微不足道的人,既观察百姓的情况而布设教化,又询问事体和考察言论,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而用崇尚学校、敦促节俭、扩大听取范围、筹划水利这些最重要的国家大计来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的人,哪里足以识大体,知纲要?但正当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刚开始的时刻,恭敬地念及那各自陈述奏进治理措施的经典古义,敢不勉力述说平常所诵读研习的东西,来献上狭小浅薄的一点儿

忠诚吗?

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中有这样的话:学校是人才培养的根基,教化的本原,据此而考虑到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气的途径,实际上就奠基在这里。臣下我谨慎地查验,自从虞舜时代传下要教导年青人的记载,周朝官制重视最高学府的官职,而辟雍这一最高学府的名称,见于《诗经》和《礼记》。辟雍位于正中,东面是学习武舞和文舞的东序,西面是学习礼乐的瞽宗。这三处称作太学。《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年间,开始修建太学,光武帝驾临辟雍,赏赐各地选送的博士弟子各有差别。明帝永平年间,也驾临辟雍,首次行用祭祀前择士助祭的大射礼。到章帝在北宫白虎观讨论经书义旨,对不同的解说亲自做出裁决,更可看出崇尚文教的盛事。当时像桓荣、伏恭等人,承当三老五更这天子所敬养的有德老人的入选之列,都是著名的儒士啊!唐朝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崇玄学等七学和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宋代设有国子学、太学、律学等六学和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这都属于教导培育人才的好办法,也可以从中看出学校所关系到的事体特别广泛了。礼法音乐是用来防禁民众的,教导训示是用来端正风气的。师长儒者负有获得民众的职责,庠、序之类的地方学校都是宣明伦理的地方。尊崇儒学,看重大道,太平由此而逐渐达到啊!讲求让贤,使贤能的人兴盛起来,邪僻不正的行为由此而在无形中就消除掉啊!树立最好的榜样来激励天下,而远近无不朝这方面会聚归拢。端正读书人的习气来振作起民间的风尚,而本末全都相互维系住。学校根据地区而设置,所以管辖二千五百家的州长把所辖居民集合在州立学校进行教化和考核,管辖五百家的党正把所辖居民集合在党立学校进行教化和考核,中央掌管民政的司徒把地方推荐的优秀人才选送到国家最高学府。享有声望的英才得到进用,正通过这种途径成为人选啊!学习是世人都应该从事的活动,所以具有王位继承权的王太子,其余的王子和卿大夫的长子、品级为士中第一等的上士的长子、以及国家由民间选拔上来的俊士,全都深入到究明事理、充实知识、使意念真诚、内心端正的功夫里去,全都深入到修养好自身、整治好自己家族的道理中去,不因出身

尊贵或低贱而有什么差别。古人的学问,在于显明自己的德性,来使天下百姓自新,达到最完美的地步为止。这种成就自己和成就万物、完善自身和完善社会的功效,也就是辅助社会、管理百姓的原则与方法吧!圣明的我朝大力营建辟雍,依据每个人的情况定立教化,凡是中外士子和百姓,也都已经蒙受皇恩了。恭敬地正赶上圣上亲自特地莅临辟雍视学,重大的成规奉用承接,由此可知并不单单是使辟雍、明堂、灵台这三雍宫的最高礼仪更隆盛,修明汉代唐朝的旧有惯例呢!

制策又讲到:自古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无不亲身励行节俭,给天下做出表率,但考察各自的存心与行事,总之客观上存在着真假的区别。这应当力求符合那实际,不是表面上光图那名声啊!臣下我查验,《尚书》中说:高度注意你那节俭的美德,时刻考虑长久统治天下的谋略。《左传》上说:节俭是美德中很大的一种。节俭用美德来称说它,道理是具有清心寡欲的修养功夫,然后才有用制度节制欲望、严明法度的举措。民心淳朴与否,民间风尚是好是坏,同它密切联系在一起。汉景帝的诏书说:华美装饰那一套,纯属伤害农业生产的。绮丽服饰那一套,纯属损害妇女纺织的。这番讲述崇尚节俭的意向,可以称得上是深刻恰切、非常明白了。所以国家财富多,就向百姓亮出节俭来;国家财富少,就向百姓亮出礼法来,这是圣明的帝王善于重新教化的原由啊!从丰饶就想到匮乏,从宽裕就防备缺少,这是圣明的帝王防止坏苗头的原由啊!茅草屋顶土台阶,缝制粗衣缀脖领,尧舜等古代帝王遗留下的这种风范已经很久远了。夏商周三代以下,可以讲个明白。汉文帝身上穿粗糙的帛制衣服,脚上穿生皮做成的鞋,坐席用蒲草编成,剑带只用柔皮条,上面没有任何装饰,宫内去除华丽的饰物,惜念用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而停止修造露台,把国家治理得接近远古时代了。以后的英明君主,也知道克制自己。在殿前烧掉山鸡裘,毁弃筒中细布,认为萧何关于修建宫殿要壮丽、借此显示帝王气派的对答属于不纯正的言论。这难道不是因为移风易俗,原本就看上面做得怎么样吗?至于卿大夫,本身是百姓的榜样。一副头冠戴了三年,一件衣服换洗多次,当然是节俭了。可光

外表上节俭，哪里足以亮给全国百姓看呢？后世像唐朝的杨绾、卢怀慎、杜黄裳，他们的高尚节操和清正的风采，使听到的人感奋而主动染化，差不多能和《诗经》所说的召南大夫节俭正直、内外相称前后辉映了。由此可知，扭转那浇薄的习俗，改变那颓败的风气，必定要真心来崇尚节俭，而天下自然就达到淳朴。所以那时货物不遗弃在地上，用度不耗尽钱财，而凡属家家给人送去谐和，人人受用旧有美德的按传统方式生活的百姓，自然就没有谁不为醉饮美酒、饱食米麦而欢乐，讴歌天下太平了。皇上您体察唐尧形成节俭，紧跟虞舜奉行质朴，摒弃精巧华丽的玩艺而不珍视，退回天下四方的贡品而不接受。在位的各个臣僚，全都严肃对待为官清廉、品行端正的自我约束问题。在他们管辖下的民众还有不一起步入淳厚古朴的吗？

制策又鉴于治理到极点的时代，必定要有谋划国事献纳意见的贤臣辅助在左右，据此而考虑要把询问事体、考察言论作为头等大事。这确实是抓住过头和未达到这两种状态，取用最适中的那个尺度的重要方式啊！臣下我私自想到唐尧有在大道上筑室向民众征询意见的做法，虞舜有在正殿西堂访求意见的做法，夏禹听到了好言论就给人敬礼，商汤喜欢用询问来扩大视听，周文王向八虞、二虢进行咨询，周文王向商朝遗民箕子访求治国安民的根本大法。帝王统治天下，没有不扩展听取言论的益处的。朝廷上发出都、俞赞同，吁、咈反对的表态声，这是帝王治理天下达到盛美和谐的原因。进献可行的，去掉不可行的，这是臣僚尽其职责、献纳忠诚的表现。体察所提意见的正确与错误，明辨事理符合与否，落实到政事上，都能够酌取那最为适中的东西。后世的英明君主，不是没有殷切希望人们提出建议的诏命和恳切的求取意图，然而有的却玉串、玉丝缀在皇冠上摆着，而把民间百姓遗弃在下面。表示直言进谏的人可以饮用的白虎樽徒然放设在殿廷上，允许穷苦百姓在朝廷门外所立的赤色石头上来鸣冤的上告词却不打开看。即使有所听问采纳，有的也只是仰慕虚名，盼望臣下快快进言，可却顾不上审慎地察照。这就必定会浮泛地采纳其意见却在心中无所判别，随便让它去而在外部却不能处置了。听取言论的方法，应对取舍相当精详，而取舍精详，关键在于明

智和果断。只有明智才足以察照进言者的意见，只有果断才足以行用进言者的意见。真能够凭仗大智来运作神明，秉具大勇来彰显英武，不就自然会与建立起中正原则的隆盛治绩相协调了吗？皇上您虚心向下面询问，聚合并用，施布政教，而百姓蒙受那福禄了。

制策又因为大禹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渠水利上，来防备水灾旱灾给人们带来的忧虑，于是周详地谋求根据大禹的水利事业而让它对人更有利的方法。臣下我考察，郑国渠开凿后，秦国就富足了；蜀地都江堰修成后，肥沃的土地就开发出来了。汉朝唐代的好官员，让他们辖区内的老百姓有衣穿、有粮吃的举措，没有不把视察水情作为优先要办的事情的。我朝京师地区的大河流天津南面是卫河，北面是白河。卫河即永济渠，白河又名潞河。滹沱河属于子牙河的上游，它同子牙河势均力敌。永定河汇入桑干河，它同桑干河源头聚合而支流又分开。因而都应当针对这些河流流程大面积分布漫流的状况，有步骤地加以宣导，使它们没有泥沙淤积的祸患，得以免除四处泛滥的忧虑。所以像修筑格淀堤，来把浑浊的水流遮挡住，而三滩里这样的地段必须连成线。开通筐儿港，来把猛涨的水流排泄出去，而平缓的土坡也应投入力量。一并应对它们因势利导。至于治理河流的官员，光知道有堤坝却不知道有河流，在修堤拦防上很细密，在开挖疏导上却不在意。而负责营造水田的官员，光知道有水田却不知道有河流，对泥沙淤积感到很有利，眼看要忘记河水会因此而涨溢堵塞了。《尚书·大禹谟》所讲的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洪范》所讲的五行，都把水放在第一位。对水利用得好，灌溉就能有依赖；对水利用得不好，就泛滥而成为灾患。果真能够讲论探求水利方面畅达疏通、清理河流，围住湖泽的大计谋，就赶上并超过大禹治水的功绩了。皇上您圣明的谋略广大深远，深切体念百姓的疾苦，即将就看到以柔制柔大见成效，从京师到四海都共同欢庆水流安稳地流淌啊！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视察学校来使贤才兴起，去除奢华来崇尚朴实，虚心来访求治国的原则与方法，修治好河流来使民众生活充裕，真是恩德广大极了，上达九重天，下及大地八方的边际，恐怕属于整个古代的唯一盛举啊！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扩展每日自新、永

不停止的心怀，形成悠长久远、没有尽头的治绩。道德教化已经施布，而更宣明雅正的教化。奢靡那一套已经摒除，而更崇尚淳朴的风气。广泛访求已经勤恳，而进一步考虑虚心听取。河流原野已经稳定，而进一步顾念疏导开通。查照经典来验核仁德，构成沿袭《六经》而另为第七部的经典。考察古昔排定功业，步入同于五帝、超过三王的隆盛状态。协和之气往远处流布，仁德之风向四方飘溢，统领各个地区形成天下的中心，用来对上敬迎皇天的多种福佑，对下安定蒙受恩泽的臣民，开启那深谋大智所长远呈现的吉祥，巩固上天所保定的大业，我们国家永久政治清明的宏运，就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属于学问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周开麟　会试卷一道

周开麟（生卒年不详）　字石生，江苏江宁（今南京）人。道光三年（1823）探花，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进言君子之知几，而入德有本矣。夫曰近，曰自，曰微，皆几之所由动也。为己而又知此，德不从可入乎？《中庸》一书，皆示人以入德之门也。然由不明则不行，故其道莫要于知。夫知岂徒在众著哉？必从迹象之昭然，以验气机之必然，而返诸身心性命之本然。斯其见理愈精，其责躬愈密，而其体道愈真矣。君子为己之心，见于淡简温者如此，固已操乎德之真，而务实不务华矣。尤必察乎德之几，而见外如见内矣。吾不遽言其所入，吾先实课其所知。

知必求其迹之相反，迹彰于众著，君子独从未著以探其本。凡表里之若不相肖，正其所以曲肖也，则识宜深也。知必推其理之相因，理藏于未著，君子又即众著以验其机。凡寂感之若未必应，正其所以立应也，则神宜定也。今使昧乎相反之迹，则不知远必有近，风必有

自，微必有显。游移无据，日求德于泛骛纷驰，将务广而荒，一时莫得其会归之处。抑使昧乎相因之理，更不知即远即近，即风即自，即微即显。胶固弗通，徒视德为抱虚守寂，而扩充无自，终身难造乎贤圣之途。

惟君子澄其知于至密至精，而身世之渊源以澈；扩其知于至周至广，而心性之推暨以宏。合之为己之心，而德不从可入乎？德必有其基，知即溯乎基之所由起。曰远，曰风，曰显，德所究之地，非德所由究之地。君子由国而家，由家而身，由身而心，事事寻其造端之所，则识以敛而不浮，神益操而不放。并其所谓为己者，有以确守不移也，而德何难立其基也哉！德必有其量，知即推其量之所由终。曰近，曰自，曰微，德所阈之处，非德所终阈之处。君子由诚而形，由形而著，由著而动，在在穷其究极之区，则见以恢而弥广，功亦进而加密。并其所谓为己者，有以深历无竟也，而德何难充其量也哉！观于德有可入，知几之学愈重，即为己之功愈严，而谨独之要，可进言矣。

深入一步来讲论君子能了解事物变化的隐微状态，而进入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也就具有根基了。偏偏要说近处，要说风吹来的地方，要说苗头，这都是事物变化的隐微状态萌动的来由。修养自己而又明白这一点，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不能由此可以进入吗？《中庸》这部书，全都是向人们显示进入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的门径啊！但是，由于不清楚就不能够实行，所以，具体途径没有比首先能了解更为紧要的了。所谓能了解，哪里只是局限在人们全都看得很清楚的地方呢？必定要从那迹象明显的地方，来验核那客观现象的契机必然出现的原因，返回到自身、心志、性情、命运的本来状态。这才看出那义理更精粹，对自己的要求更周密，体悟大道更真切了。君子修养自己的心愿，表现在淡雅而又不讨厌，简朴而又有光彩，温和而又有条理上，就是这样。这样原本上就已经操持住圣人道德修养境界的真髓，致力于实际而不致力于浮华了。更必须体察出圣人道德修养境界的萌芽状态，表现在外面也就如同表现在内心了。我不猛然就讲论那进入圣人道德修养境界的情况，我先来切实地考核一番怎样先能了解

的这个问题。

要能了解，一定要探求那迹象倒过来看的情况。迹象在人们全都看得很清楚的地方显现出来，君子偏偏从迹象还未明朗的状态来探求那根源。凡是表里似乎彼此不相像，这正是二者之间违反常规而相像的原因。对此就应当察识深切啊！要能了解，一定要推究那义理相互沿袭的情况。义理在迹象还未明朗的状态中隐藏着，君子又根据人们全都看得很清楚的地方来查验那契机。对此就应当神思固定啊！如今假设对倒过来看的迹象闹不明白，就不能够了解有远处就必定存在着近处，风必定存在着它吹过来的地方，苗头必定有它明朗的时候。翻来覆去没有一个依凭，每天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过阵子这样，过阵子那样来探求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将会追求浮泛而荒怠，一时间得不到那会聚归向的地方。再者假设对相互沿袭的义理搞不清楚，更不能够了解接触那远方就是接触那近处，接触那风就是接触那风吹来的地方，接触那苗头就是接触那明朗的状态。死板不能贯通，只把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看成是抱持虚无，执守静寂，而扩展充实就没有来源，坚持一生也难以跨入贤人圣人的道路。

君子只有把那能够了解搞透到最细密、最精粹的程度，而人生经历的本源才十分清澈。只有把那能够了解扩大到最周全、最广泛的地步，而心志性情的拓展延及才非常宽广。再与修养自己的心愿结合起来，而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不能由此进入吗？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必定要具有那根基，而能够了解就是追溯那根基的起始之处。偏偏要说远方，要说风，要说明朗的状态，这属于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所最终达到的地步，不属于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通过什么而最终达到的那个状况。君子从国家而到家庭，从家庭而到自身，从自身而到心志，事事都探寻那最起始的地方，就会识见集中而不飘浮，神思更加操持住而不放纵。这样连同那所说的修养自己，也就有依凭坚确地来执守而不变动了，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哪里还难以奠立起那根基呢？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必定要具有那容量，而能够了解就是拓展那容量的终止之处。偏偏要说近处，要说风吹来的地方，要说苗头，这属于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所止息的地方，不属于圣人的道德修养

境界最后止息的地方。君子从至诚而到显露,从显露而到彰显,从彰显而到变动,处处穷尽那到了尽头的领域,就会见解高明而越来越广阔,修养的功夫也精进而进一步周密。这样连同那所说的修养自己,也就有依凭深入地来经历而没有终点了,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哪里还难以扩充那容量呢?观察圣人的道德修养境界有理由可以进入,能了解事物变化的隐微状态的学问也就更加重要。这也就是修养自己的功夫进一步严切,而那独自一人时能非常谨慎的要领,可以进一步来讲论了。

周开麟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教育者,兴贤之本;撙节者,爱养之原。集思广益,则庶事康;因地制宜,则水利举。博稽载籍,《诗》歌於乐,《书》训俭勤,《易》占纳牖之明,《礼》著旧坊之用。茂矩崇仪,粲焉具备。古帝王绍统燕谋,润色洪业,乐育以兴士气,崇俭以励民风,纳言以备箴规,翕河以利农亩,悉本正位凝命之实,以立丰亨豫大之模。用是《诗》、《书》、礼、乐,教术兴焉;起居服御,俭德隆焉;鞮鞻鼓钟,嘉谟萃焉;河渠沟洫,美利溥焉。所为撰合乾坤,治齐《谟》、《典》,皇道炳蔚,帝载缉熙者,胥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教隆太学,治绍皇初,厘工则意切畴咨,导川则功勤浚距,固已王化隆而俗归节俭,嘉言纳而绩奏平成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体至善之无穷,虽迩言其必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兴教化、隆主极、广言路、裕民生之至计。臣占毕庸愚,曷足以知体要?顾幸际广思周逮之时,敬附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就平昔所诵习者,勉述见闻,以效管蠡乎!

伏读制策有曰:学校者,人才之本,风化之原,而讲求夫辅世长民之道,明德新民之学。此诚化民成俗之要图也。臣考学校之制,始于虞庠。嗣是校、序之名,历代必详,而泮宫之教,逮乎侯国。国学则自王世子及凡民之俊秀,皆得与焉。师氏教三行,保氏教六仪,有大司徒以董其成,有乐正、大胥、太师以分其职。乡学则八岁入小学,教以

长幼、洒扫、进退、应对之节。二十人太学，教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君臣上下之大端。而其师，则归有齿有德者为之。典至重也。汉初未遑立学，至武帝始建太学。自是元帝加以廪饩，平帝立甲乙三科，以为岁课。东汉营明堂、灵台、辟雍，临雍大射，食三老五更，与诸儒执经讲学。晋宋之间立四学，唐立六学，宋立五学，元立国学，明诏天下府县皆立学。夫礼乐所以防民，教训所以正俗，师儒有得民之责，庠序为明伦之地。必崇儒重道，然后可以驯致太平；必讲让兴贤，然后可以潜消匪僻。建首善以励天下，端士习以励民风，非徒修故事而已。皇上临雍讲道，网要义于身心，绍真传于精一。承学之士，伏闻御论昭宣，金声玉振，莫不鼓舞向学，行见道德一而风俗同矣。

制策又曰：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爰及历代崇俭之治。此尤黜华崇本之要务也。臣谨按，《书·太甲》云：慎乃俭德。夫俭以德名，盖制节谨度，必本于清心寡欲也。尧之土阶茅茨，舜之饭糗茹草，禹之菲食，文之卑服，尚已。后世如汉文帝，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莞蒲为席，集上书囊为殿帷，罢灵台以惜中人之产。晋武帝诏省郡国御绸，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有献雉头裘者，于殿前焚之。唐太宗营玉华宫，惟所居之殿履以瓦，余皆茅茨。高宗诏诸州尝贡珠宝者，并宜停进。宋太祖令公主勿衣翠襦，恐致伤生。元世祖取太祖始居之地草一株，置于大内，名之曰示俭草。仁宗戒近侍，勿以奢靡蠹财相导。明太祖初立庙社，不用雕琢奇丽。宣宗于东苑构草舍，为致斋之所。类皆节俭可风者也。然或盛衰殊途，始终异辙，非俭不足以示国，抑务名不求其实之过也。诚深维《商书》俭德之训，而以实心体之，则华靡斥而淳古自敦矣。臣伏见圣躬行俭，倡率天下，屏纤丽而弗珍，却贡献而不纳，由是在位诸臣，皆凛羔羊素丝之节，民命亦还淳返朴，伫臻上理也。

制策又以郅治之世，必有论思献纳之臣，而人主亦复虚衷下问，翕受敷施，民受厥福。此诚上下一德之治也。臣惟尧有衢室之咨，舜有总章之访；夏禹闻善则拜，殷汤好问则裕；文王询于虞、虢，武王访于箕子。帝王御宇，未有不以询事考言为先务者。后之令主，如汉文帝之于冯唐、张释之，唐太宗之于魏徵，皆能从谏如转圜，而有虚己纳

善之美。其他详于采纳者,代有其主。徒观其勤勤之言,恳恳之求,固亦不愧令辟。然或旒纩之明辟于上,而刍荛之采遗于下;或白兽之尊徒设,而肺石之函莫启。则是有求言之名,而无求言之实;有听言之美,而不收听言之功。盖听纳或慕虚名,进言未遑详察耳。《书》称出纳五言,汝听。诚谓言不一致,听言宜详其中。公私邪正之分,是非疑似之介,信有非明不足以察,非断不足以行者。明断之本,要在立中生正,穷理以烛其几,行健以致其决者,庶无惑于听受之际耳。皇上执两用中,治益求治,并观兼听,幽隐无遗。诚哉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一会也。其视五声听致之治,不且益隆哉!

制策又以五行之材,水居其一,而欲使其灌溉可资,疏瀹无患。此又兴利除害之至计也。臣按畿辅之地,川原绣错,皆足以溉农田。古称汉张湛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亩。魏刘靖开车箱渠,灌田万有余顷。后魏裴延俊开督亢渠,灌田九百余万亩。宋何承矩引滹沱水以灌田,自顺安沿海数百里,禾稼咸登,民享其利。元明以来,虞集有《京东屯田》诸议,徐贞明有《潞水客谈》一书,皆能洞悉原委者也。故元代之导浑河,疏滦水,而武清无垫溺之虞;浚治河,障滹沱,而真定免决溢之患。明神宗时,于永平一带行疏浚潴蓄之法,一岁得熟田三万九千余亩。水之有利,自古已然。顾北地风沙易积,水泉多挟淤泥而下,则疏瀹诚不可缓。乃或谓治河之吏,知有堤而不知有河,密于修防而疏于浚导。营田之吏,知有田而不知有河,利其淤垫而忘其涨塞。是又在董厥成者,相其宜而利道之,则利可永兴而害可永去矣。圣天子劭农重谷,勤思耕田凿井之风,缅怀浚畎距川之道。前特谕畿辅臣工,讲求水利,则所以备畜泄、时灌溉者,法至密矣。

若此者:敷文宣化,教泽宏矣;崇俭黜华,民物阜矣。采听详,而谟猷罔虑其攸伏;疏导慎,而河岳遍颂乎怀柔。臣伏愿皇上,至诚无息,立政有恒,廑持盈保泰之怀,懋长治久安之计。稽古造士以尚贤,兴太学之才;利用厚生以慎俭,维永图之治。不以谘诹既广,而惟视惟听,或隘明聪;不以畎浍既成,而或委或原,偶忘疏浚。于此茂扬骏业,祗迓洪庥,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教导化育,是使贤才兴起的根基。节省费用,是爱民养民的本原。集思广益,就众事安宁。因地制宜,就水利兴办。广泛考察典籍,《诗经》歌咏令人喜乐的辟雍大官,《尚书》训示克勤克俭,《周易》占测从开通明达的地方进献忠信良策,《礼记》彰显邪僻就用礼制防禁的作用。重大的成规和崇高的法则,灿烂详备。古代的帝王继承综揽那安定的谋略,发扬光大宏伟的功业,让士子欢乐地得到化育来振兴起士子的气节,崇尚节俭来激励民间的风尚,采纳意见来让人规谏劝戒,汇聚固定住河流来有利农业生产,这全都根据摆正上下地位、凝合天命的实际,来建立起富足隆盛的法式。因此《诗》、《书》、礼、乐这四种教化的内容与方式兴起了。帝王日常生活和服饰车马,在这些方面需要高度注意的节俭美德就加厚了。通过设置告状摇动的拨浪鼓,言事摇动的大铃铛,进献治国大道所敲击的大鼓,进献得当措施所敲击的铜钟,妥善的计谋就汇聚起来了。通过兴修各种水利,收益就相当大了。掌握阴阳变化的定律契合天地,国家的治理同《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所讲的一个样,不烦劳天下每一个人的三皇那样的治国之道光辉灿烂,帝王的事业大放光明,其原因都是依仗有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教导化育,在太学这最高学府十分隆盛。治理天下,继承那伏牺氏最淳朴的原始状态。修明百官的职守,意向全都投注在向众人询问谁能胜任上。疏导河流,功效专在疏通入海方面下气力。这原本上已经是圣王的教化很隆盛,民间的风气归向节俭,妥善的言论广加采纳,功绩宣告地平天成了。可陛下圣明的心怀却谦虚自抑,不遗弃微不足道的人,体察最完善的国政没有止境,即便是浅近的话语也必定对它加以察照,把臣下我等宣召到殿廷,而用兴行教化、提高君主的表率作用、广开言路、使百姓生计宽裕这些重要的国家大计来进行策问。臣下我只知道背书本,平庸又愚昧,哪里足以识大体,知纲要?可是正荣幸地赶上集思广益、普遍延及的时刻,恭敬地附从那向君主拜献建议、首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经典古义,敢不仅就自己平常所诵读研习过的东西,勉力述说见闻,来

献上狭小浅薄的一点儿心得吗?

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中有这样的话:学校是人才培养的根基,教化的本原,据此讲论探求辅助社会、管理百姓的原则与方法和宣明德性、使百姓自新的学问。这确实属于教化民众、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谋略啊!臣下我考察学校制度,从虞舜把最高学府命名为庠的时候开始建立。自此以后,有关校、序这些名称,历代一定要周详地予以对待。而把学校称作泮宫所施行的高等教育,延及到诸侯各国。国家最高学府,从享有王位继承权的王太子到民间的优秀士子,都有权进入到里面去。校内专职官员师氏负责教诲亲近父母的孝敬行为,敬重贤能的交友行为,尊重师长的顺从行为。保氏负责教诲举行祭祀、招待宾客、上朝参拜、参加丧葬、置身军事活动、使用车马的六种容仪。有大司徒负责全面管理和统一领导,有乐正、大胥、太师等官员分别掌管各项事务。乡间学校乡民子弟从八岁开始进入初级小学,用年龄辈份、日常劳务、进见拜退、应酬对答的行为规范来教导他们。二十岁择优送入太学,用明智、仁惠、预见、果断、忠诚、宽和这六德,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亲近宗族、亲近亲戚、取信朋友、体恤贫苦人这六行,用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写、计算这六艺,以及君臣上下关系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来教导他们。而他们的师长,都由上年纪、具有道德修养的人来充当。这种制度特别重大啊!西汉初期还没顾得上建立国家最高学府,到武帝时,首次建立太学。此后元帝增加待遇,平帝设立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作为每年督课的常规。东汉营建明堂、灵台、辟雍这三处最高学府,皇帝亲自莅临辟雍,举行祭祀前择士助祭的大射礼,隆重款待三老五更这天子所敬养的有德老人,并和众位儒师手执经书,讲论儒学。晋朝至南朝宋代之间,并立玄学、儒学、文学、史学四学,唐朝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宋朝设立国子学、太学、律学、算学、医学等五学,元朝设立国子学,明朝下诏,命令全国各府各县都设立地方学校。礼法音乐是用来防禁民众的,教导训示是用来端正风气的,师长儒者负有获得民众的职责、庠、序之类的地方学校都是宣明伦理的地方。必须尊崇儒学,看重大道,

然后才能够逐渐达到太平。必须讲求让贤，使贤能的人兴盛起来，然后才能够在无形中消除掉邪僻不正的行为。树立最好的榜样来激励天下，端正读书人的习气来振作起民间的风尚，这决不仅仅是修明前代的旧有惯例而已。皇上您亲自莅临辟雍，讲论大道，把那切要的义旨包纳在修身正心上，把那圣帝明王递相传授的治心大法一脉相承在精纯专注上。转承师长学说而进行学习的读书人，跪拜聆听圣上的论断和透彻的宣讲，如同奏乐先敲钟来引发众音，到末尾再击磬来收拢众韵，没有谁不倍受鼓舞，归向儒学，即将就看到道德一致，风尚相同了。

制策又讲到：自古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无不亲身励行节俭，给天下做出表率，于是延伸到历代崇尚节俭的治国状况。这可属于废斥浮华、推重本初的特别应当做的重要事情啊！臣下我恭谨地查验，《尚书·太甲》中说：高度注意你那节俭的美德。节俭用美德来称说它，大概是因为用制度节制欲望，严明法度，必定要来源于清心寡欲。唐尧的宫室用土台阶、茅草屋顶，虞舜吃干粮，啃野草，大禹的食物非常简单，周文王的服装很平常，这已经由来很久了。后代像汉文帝，身上穿粗糙的帛制衣服，脚上穿生皮做成的鞋，用蒲草编成坐席，把臣民上奏文书套在外面的囊袋聚集起来，做成宫殿里的帷帐，停止修造露台来惜念用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晋武帝下诏，命令省去郡国按宫廷要求所应进献的丝织品，禁断乐府机构里淫靡华艳的各种表演节目以及装饰华丽的游猎用具，有人献呈山鸡头缀成的裘服，就在大殿前烧掉了它。唐太宗营建玉华宫，只有所居住的宫殿用瓦铺上顶，其余全都铺的是茅草。唐高宗下诏，命令各州曾向朝廷进献珠宝的，一律应停止进献。宋太祖让永宁公主不要穿翠羽铺缀的罗裙，担心招来伤害百姓生计的后果。元世祖选取元太祖最初居住地的一棵草，放置在皇宫里，给它起名叫示俭草。元仁宗训戒身边服侍的人，不要用奢华淫靡、耗费财物那一套来做诱导。明太祖开始建立祖庙和祭祀土神、谷神的社宫，不采用装饰华美、工巧绮丽的玩艺。明宣宗在东苑构设一处茅草屋，作为祭祀前斋戒的场所。这些都大致上属于节俭可以耸动天下的呀！然而有的却兴盛、衰败不一

样，国家存在长短不一样，这倒不是节俭不足以给全国做出榜样来，而是光求虚名不求实际造成的过错呀！果真深切地思考《商书》注意节俭美德的训示，而用真心来体悟它，那么浮华奢靡就去掉而淳厚古朴也就自然加厚了。臣下我跪拜目睹皇上亲自励行节俭，给天下做出表率，摒弃精巧华丽的玩艺而不珍视，退回天下四方的贡品而不接受，由此在位的各个臣僚，全都严肃对待《诗经》所说的召南大夫节俭正直、内外相称的那等节操，百姓日常生活也回到淳厚，归返质朴，眼看着就达到第一等的治理了。

制策又鉴于治理到极点的时代，必定要有谋划国事献纳意见的贤臣辅助在左右，而君主反过来也虚心向下面询问，聚合并用，施布政教，百姓蒙受那福禄。这实在是上下一德的大治景象啊！臣下我想来，唐尧有在大道上筑室向民众征询意见的做法，虞舜有在正殿西堂访求意见的方式，夏禹听到了好言论就给人敬礼，商汤喜欢用询问来扩大视听，周文王向虞国、虢国进行咨询，周武王向商朝遗民箕子加以访求。帝王统治天下，没有不把询问事体，考察言论作为头等大事的。后世的英明君主，如汉文帝对于冯唐、张释之，唐太宗对于魏徵，都能够听从劝谏像转动圆形器物一样，具有敞开胸怀、采纳良善的美德。其他对采纳意见很在心的人，每个朝代都有那样的君主。光是看他们殷切希望人们提出建议的诏命和恳切的访求意愿，固然也不愧为英明的君主。可是有的却玉串、玉丝缀在皇冠上摆着，而从民间百姓那里采择意见却遗弃在下面。有的表示直言进谏的人可以饮用的白虎樽徒然放设在殿廷上，而允许穷苦百姓在朝廷门外所立的赤色石头上来鸣冤的上告词却不打开看。这种情况就属于仅有求访言论的名义，却没有求访言论的实际；仅有听取言论的美誉，却收不到听取言论的功效了。这大概是因为听取采纳有的仅是仰慕虚名，对进献的意见还顾不上详审地察照罢了。《尚书》上说，发布和采纳仁、义、礼、智、信五种言论，你来听取。这实在是说言论各种各样，听取言论应当仔细斟酌那不偏不倚最适中的部分。为公为私和奸邪纯正的区分，正确错误和是非难辨的交织，确实存在着只有明智才能察照、只有果断才能行用的情况。明智和果断的根源，总之在于确立起

那个最适中的尺度，生发出平正，穷尽事理来洞察那苗头，运行强健来实现那决断，这样就差不多能在听闻采纳的过程中不迷惑了。皇上您执持住过头和尚未达到这两种状态，取用最适中的那个尺度，已经大治更进一步谋求大治，合起来做观察，两方面来听取，隐藏在深处的东西都没有遗漏的。这真是上下都各遂心愿，十分欢跃，交相庆幸，机会极为难得可贵呀！这同大禹通过拨浪鼓、大铃铎、大鼓、铜钟、石磬来听取敲击者意见的治国情形相比照，不是将会更隆盛吗？

制策又因为五行这五种自然物，水占其中的一种，而想让它对灌溉能有补益，得到疏通，不存在忧患。这又是兴利除害的最重要的谋划啊！臣下我查验京师周围地区，河流原野像锦绣那样交错分布，都足够用来灌溉农田。古时候讲，汉朝张湛在狐奴一带开垦稻田八千亩。曹魏刘靖又开凿车箱渠，灌溉田地一万多顷。北魏裴延俊又开凿督亢渠，灌溉田地九百多万亩。北宋何承矩又导引滹沱河河水来灌溉田地，从顺安军沿海数百里，农作物全都大丰收，老百姓享受到这一治水举措的好处。从元朝、明朝以来，元朝虞集有《京东屯田》各项议论，明朝徐贞明有《潞水客谈》这部书，都是能够透彻了解来龙去脉的意见。所以元代导引浑河，疏通滦水，而武清县境内没有淤积淹没的忧虑。开挖冶河，遮挡住滹沱河，而真定府境内免除了决口泛滥的忧患。明神宗时，在永平府一带推行开挖疏导、会聚积蓄的方法，一年就获得熟田三万九千多亩。水本身大有益处，自古就是这样。但北方地区风沙容易聚积，河水的源头大多挟带着淤泥冲刷下来，既然如此，疏通就实在不能够延缓。至于有的认为治理河流的官员，光知道有堤坝却不知道有河流，在修堤拦防上很细密，在开挖疏导上却不在意。而负责营造水田的官员，光知道有水田却不知道有河流，对泥沙淤积感到很有利，忘记了河水会因此而涨溢堵塞。这又在于负责全盘工作的官员，察视那因地制宜的具体情况，朝有利的方面来引导，这样就益处可以永久地兴用，而害处可以永久地去除了。当今圣天子督劝农业，重视谷物，殷切地追思唐尧时代百姓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风气，缅怀大禹疏通田间沟渠、让水都顺畅流到大河中去的做法，前不久特意下达谕旨，责成畿辅地区的官员讲求水利。这样一

来，准备蓄水排泄、按时令节气灌溉的一切举措，其方法就最为细密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施布礼乐制度，宣明教化，教化的恩泽就广大了。崇尚节俭，废斥奢华，百姓的财物就繁多了。采纳听取很周详，谋略计策就不再忧虑它们还有所隐藏了。疏通引导很慎重，山河就到处称颂以柔制柔了。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万分赤诚而不停息，定立国政持之有恒，总是涌动起守住已成事业、保持平安的心怀，总是致力于长治久安的大计。考察古代，造就士子，来崇尚贤能，兴用太学的人才。物尽其用，使民众生活充裕，来谨慎对待节俭，只考虑那长远的治理。不因为咨询访求已经很广泛了，就任从自己想怎样观听就怎样去观听，以致有时会阻碍住对问题看得准，听得清。不因为水利网已经形成了，就对河流的入海处或发源地偶尔忘记了疏通开挖。在这些方面弘扬大业，敬迎洪福，我们国家永久政治清明，延续不断，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问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了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清宣宗道光六年(1826)丙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无求备于一人。

殿试策问

[道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仰承苍昊眷佑,列圣贻庥,御极以来,于今六载。寅恭夙夜,惟几惟康。举凡甄综人才之实,诘戎讲武之经,整饬士风之原,明刑弼教之要,兢兢业业,时廑于怀。兹当授简敷言,对扬伊始,咨尔多士,仁听嘉谋。

夫欲熙庶绩,必借群才。《书》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又曰: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自古用人器使,岂必求备哉!然简任者,人君之权;荐举者,大臣之责。祁奚举贤,李克论相,后世称之。其故安在?赵武举管库之士七十,而晋君不以为多。淳于髡一朝荐七士,而齐王厌其众。将毋类聚攸殊,疑信各异欤?徐庶倾心于南阳,祢衡受知于北海。其荐贤之职,可并论欤?狄仁杰储材于药笼,吕蒙正置册于夹袋。何以得人称盛欤?国家延访人才,惟秉虚衷,能收实效。其何由祛比周之习,登公明之选欤?

古者文德诞敷,不忘武备。诘戎治兵,所以辅化安民也,汉之训练,唐之讲武,宋之大阅,其法果有裨益乎?边防之策,汉唐最详。贾谊、晁错、陆贽之论,昭然具在。然自古承平日久,中外无事,武臣边帅往往奉行具文,不能尽心简阅,劳役兵丁,虚糜饷食,流弊孔多。其何以选精锐,汰老羸,简器械,演阵法,裕于平日乎?朕万几之暇,时御弧矢,侍卫禁军,躬亲校阅,亦欲习劳肄武,为将士先耳。将何以整军

饬备,戎政克修乎?

士习文风,相为表里。汉初经学昌明,文章醇茂。其时绩学之士,各有师承,老儒耆德,化行乡里。沿乎末世,标榜日滋。魏晋而下,逮及陈隋,文渐华缛,士多浮靡。唐代起衰,人文并蔚,初盛中晚,体以时殊。波流五代,雕琢曼词,其间人材,披沙拣金,得不偿失。宋以五纬之瑞,笃生大儒,名臣联镳接轸,故其文章淳雅宽博,炳耀一时。洎乎元明,犹承余韵,论文讲学,可溯渊源。朕典学几余,总览风会,登崇俊乂,道归朴淳。夫文辞,艺也;道德,实也。惟尔多士,敷奏以言,有先资矣。虚车之诮,何以免诸?

先王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刑罚明,而后教化行;狱讼平,而后民心服。画象不犯,厥风古已。三典既用,五听惟详。汉代循吏治狱,每多平反,论者谓得《周官》遗意。盖欲天下无冤民,必先朝廷无枉法。罪疑惟轻,所以广好生之德;刑与众弃,所以平万物之情。后世守令,不能尽知古人立法之意,乃至姑息养奸,游移骫骳,名为慎重民命,实则屈抑民情。其武健者,又或深文周内,恃才徼功。将欲清讼,不亦难乎?朕慎宪省成,惟刑是恤,申谕封疆大吏严饬守令,明慎用刑,期于无枉无纵,辟以止辟。将何道而臻刑措之风乎?

凡此者:储材以资治,讲武以卫民,敷教所以端风化,慎刑所以彰明允。是皆经国之至计,保民之远猷。援古证今,可行可法,其要安在?尔多士读书待用,各胪所知,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人家具有本领,就好像自己也具有那本领一样。人家优秀突出,通达英明,自己就从心里喜欢他。

这种浩然之气是积聚正义所产生的,不是偶然做一件事符合正义就突击式地获取到的。行为出现自己心里感到不欢快的地方,这种气就没有力量了。

不要对某个人求全责备。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仰承上天的眷顾保佑和列祖列宗遗留下的吉安福庆，登上皇位以来，到现在已经六年了。日夜恭敬谨慎，思虑那事物的萌发状态，以求获得安宁。举凡鉴别及综合分析人才的实际状况，整治军队、讲论武备的常规大法，整顿读书人习气的根本途径，宣明刑罚、辅助教化的关键措施，都兢兢业业，时常涌动在心头。现今正值下发制策，陈述奏进各自的见解，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刚开始的时刻，询问你们这些众多的士子，等待着听取每个人的好谋略。

打算广泛办好各种事务，必定要借助众多的人才。《尚书》中说：凡是臣民，都要具有道德，具有才能和作为，具有执守的最高准则，你们要时刻记住这三点。《尚书》中还说：有些人的行为同最高准则还不吻合，但尚未达到犯罪的地步，天子的大法还应容纳他们。自古任用人才，根据各自的特长来加以使用，哪里非得求全责备呢？但是进行选拔任用，属于君主权衡的范围；加以推荐保举，属于大臣的职责。祁奚推举贤人，李克论说国相的人选，后世称赞他们的举动。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赵武推举掌管库房的办事人员七十人充任士大夫，而晋国国君不认为人数太多。淳于髡一个早晨推荐七名人士，而齐国国王却讨厌人数有些过多。这恐怕是同类人的聚合存在着差异，怀疑与相信各有区别吧？徐庶对南阳诸葛孔明满心佩服，祢衡从孔北海那里受到知遇。他们推荐贤能的职责，能够相提并论吗？狄仁杰在药笼中储备着日后待用的人才，吕蒙正在衣服口袋里装放着人才记录本。他们靠什么获得人才，世称繁盛呢？国家延揽搜访人才，只有持守毫无其他杂念的心怀，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通过什么来去除结伙营私的恶习，步入公正严明的选任呢？

古代礼乐教化广加施布，但同时不忘记武备。整治军队，修缮兵器，是用来辅助教化，使百姓安定啊！汉代的训练，唐朝的讲武，宋朝的大检阅，有关这些做法果真具有补益吗？对边防的筹划，汉代和唐

朝最详密。贾谊、晁错、陆贽的议论，非常清楚地全摆在那里。然而自古以来，太平的时间一长久，中外没有变故发生，武职官员和边防统帅往往奉行一纸空文，不能竭尽心力进行检阅，役使兵丁干苦力，白白耗费军饷，相沿下来的弊病特别多。究竟靠什么来挑选精锐，汰除老弱病残，查检武器装备，演练阵法，在平常就做得很充分呢？皇帝我在处理繁重政务的空当，还时常练弓箭，对侍卫的中央部队，亲自进行检阅，也是想习惯于劳苦，练习武艺，给将士做出表率罢了。将靠什么来整治军队，加强武备，军政能得到修明呢？

读书人的习气和写文章的风尚，相互构成表里。汉朝初期，研究经典本义和主旨的学问兴盛显明，文章醇厚丰实。当时学问渊博的人，各有一脉相承的师法。年老博学的儒者和道德高尚的老人，在乡里推行教化。延及到末期，相互标榜一天比一天滋长。曹魏两晋以后，一直到南朝陈代和隋代，文章逐渐华丽繁缛，读书人大多虚浮淫靡。唐代挽回衰颓的状态，人品文章同时兴盛。初唐盛唐和中唐晚唐，文体因时代而不一样。余波流衍到五代，刻意创制华美浮艳的文词。那个时期的人才，仔细加以筛选，所剩下的没有几个。宋朝凭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聚合在奎宿天区的祥瑞兆应，得天独厚，降生大儒，名臣一批又一批，所以那个朝代的文章淳厚雅正，宽阔广博，光彩焕发一时。到了元朝和明朝，仍然承受遗留的精神，论说文章，讲求儒学，能够追溯出根源。皇帝我在常念学习剩下一点儿空隙的时候，总去观察风云际会，进用推重优异的人才，道德归返质朴淳厚。文词是一种技艺，道德才是实体。想来你们这些众多的士子，陈述奏进各自的见解，已有首先都谋划好的个人建议了。像空车摆样子的讥诮，靠什么来免除呢？

古代的圣帝明王制定礼仪，用来崇尚诚敬；制定刑罚，用来宣明威势。刑罚严明，然后教化才推行得开。审断案件公平，然后民众才内心悦服。在器物上刻画五种刑罚的形状，使百姓有所儆戒而不触犯，这种风尚已经很古了。轻、中、重三类刑法既已施用，审案的五种方法更要审慎。汉代的好官员审理案件，常常多数纠正原来的错误判决，发表议论的人认为这种做法获取到《周礼》所遗留下的本意。

大致说来,要想天下没有蒙受冤屈的百姓,首先一定要朝廷没有枉滥的刑法。罪行还有确定不下来的,只能从轻处罚,目的是扩展那爱惜生灵的仁德。刑罚与众人一起废置不用,目的是使万物的本性获得平和。后代的郡守县令,不能完全透彻地了解古代人定立刑法的用意,以至于姑息养奸,迟疑不决,名义上是谨慎看重老百姓的生命,实际上纯属摧折压抑老百姓的实情。那些威猛刚健的官吏,有的又苛细周密地援用法律条文,让人陷入罪罚,依仗才干,求取功赏。这样来打算去除掉诉讼,不也就很难了吗?皇帝我谨慎地对待法度,省察成功的事业,慎用刑罚,责成各省最高行政长官严厉告诫知府和县令,严明慎重地运用刑罚,最终达到没有错判、没有漏掉的现象,通过刑罚来停止住刑罚。这将采用什么办法而实现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的风尚呢?

总共这四个问题:储备人才来有助于国家的治理,讲求武备来卫护民众。施布教化,目的在于端正社会风气;慎用刑罚,目的在于显示严明公正。这都是治理国家的最重要的大计,保护百姓的长远的谋略。援引古代,验证当今,可以行用,可以效法,其中最关键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你们这些众多的士子,读书等待国家的起用,各自胪列所了解的东西,不要隐瞒。皇帝我准备亲自加以观览。

朱昌颐　会试卷一道

朱昌颐(生卒年不详)　字朵山,浙江海盐人。道光六年(1826)状元。历任户部员外郎,山西道监察御史、吏科给事中。曾充会试同考官,并典学云南。对南漕海运事宜多所筹划。奉命办理团练,对抗太平军。曾督劝绅民捐筑海塘,在敷文书院主讲八年。著有《鹤天鲸海诗文稿》。72岁卒于家。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

用才者忘乎己,可进思其好德焉。夫惟忘乎己,斯人之技皆其有

也,则夫以彦圣称者,正可即所好以进想其心。且大臣本公怀以用天下,使偏才在所必录,全德无以相孚。几疑取善之量虽宏,而乐善之诚未著。岂知广其识以收天下之偏才,即专其念以契天下之全德。既与物而忘我,将由偏以企全,则向往弥殷者,固难写其精神之所注焉。休休有容,其心之所容,即其心之所好也。顾或谓大臣者,超彦俊之列而艺无不通,擅圣哲之资而才无不备,亦安有人焉挟其技以投其所好哉?而抑知若臣之于有技,固有异焉者。

其始无人之见存,一材一艺,胥归乎己以裁成,故虚其心,以与斯人相接,将蓺菲可采,庶士咸奋于功名之路,而宏奖者深。其继无己之见存,一职一官,悉量其人而位置,故公其心,以与一己相合,将事权分属,百司共励其职业之勤,而匡襄者众。则直以为若己有之而已,且夫技而视若己有,正大臣好善之心迫而形焉者也。顾人有分途,则心不一致。间观智名勇功,群材竞思效用,大臣身集其成,转无事功之可纪,而读史者遂钦为相业之隆。群策群力以兼收,而益见其宏也。因思哲谋肃乂,美德非无间生,大臣身亲其遇,若有歆羡之当前,而观治者遂以上得人之颂。至性至情以专注,而弥形其永也。夫不有彦圣其人乎!大臣之好不更有深焉者乎!

第以推食解衣为收拾人才之计,其好也,犹是术之伪而非心之诚。夫心之诚与不诚,一时难以外著。苟仅于其著焉者以求之,则不诚亦可矫托于诚,其心终入于不可知之数。而兹之推诚相与者,在当局且不自解其饥渴之深也,则遇其人而若臣之心以慰者,亦遇其人而若臣之心转觉难以自慰已。第以授粲适馆为网罗英俊之思,其好也,犹是礼之文而非心之挚。夫心之挚与不挚,局外难以微窥。苟不于其可窥者以验之,则挚亦只自知其挚,其好且沦为不足信之端。乃兹之肫挚为怀者,在旁观终莫测其结契之真也,则因是人而若臣之所好以见者,正因是人而若臣之所好转觉难以骤见已。盖口不逮心也,不合才德而胥容乎!

选用人才的人忘掉了自己,可以进一步推想他喜好贤德呀!只有忘掉了自己,这也就是别人的本领全都归他拥有了呀!这样一来,凭

借优秀突出、通达英明而著称的人，正好可以依据选才者对这些人的喜好来进而想见他的心地。况且大臣出自公心来选用天下的人才，假使具有一技之长的人个个都录用，而认为德行完美的人却没有谁能够得上。这几乎就令人怀疑择取良才的度量虽然很大，但喜欢良才的诚意却不明显了。哪里懂得拓宽那识见来收用天下具有一技之长的人，也就是集中那意念来契合天下德行完美的人。已经选拔众人而忘掉了自己，即将从一技之长去企盼德行完美。那么，对人才向往越发殷切的那种情状，原本就很难形容出那精神所专注的程度来了。心地宽厚，能够容人容物。其内心所能容得下的，也就是他内心所喜好的啊！然而有的人却认为，大臣超越优秀人物的行列而道艺没有不通晓的，独秉圣人贤哲的天赋而才能没有不具备的，这哪里还会有人挟带他那一技之长去迎合大臣的喜好呢？但还要知道像庖丁解牛那样对于身怀技艺，原本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

大臣从一开始就心存没有谁本领那么高的看法，一种专长和一项技能，全都归自己来裁制成就，所以心中没有任何其他杂念，来同这个人相接触，将会对稍微有用的东西也感到可以采用，于是普通的士人全都在功名的道路上奋发努力，而普遍加以奖掖的东西就深远。大臣接下来就心存自己没有任何牵涉的态度，每个职务和每个官位，全都权衡那个人能否胜任来加以委派，所以把用心摆得很公正，来同某个人相符合，将会政事职能分别有所归属，各个机构共同激励自身职责要勤勉，而匡正扶助的东西就众多。这样就只是以为像自己拥有它们罢了，而且别人的本领看成是自己也拥有一样，这正是大臣喜好良善的心地迫切并显现出来的证明啊！不过人们各有本职工作的区分，志愿也就不是同一个目标。隔一段考察一番以智谋著称、靠勇猛立功的情况，各种人才争相想着出力，大臣自身汇集起他们的功绩，反过来却没有什么事迹功勋能够记载，而研读史书的人于是敬佩地评定为宰相德业真隆盛。群策群力得到一并收用，而更加看出大臣度量大啊！因而思索一下明智的筹划使天下肃正大治，德行完美的人并不是没有隔世而出的情况，大臣亲身赶上了同这种人遇合的机缘，好像有值得羡慕的东西就在眼前，而观察国家治理状况

的人于是就献上获得人才的颂语。达到极点的心性和达到极点的情志非常专注，而更加显现出那绵长来啊！这还没有那优秀突出、通达英明的真正人选吗？大臣所喜好的东西不更有深远的地方吗？

只是像汉高祖刘邦对待韩信那样，把食物分给对方吃、解下衣服给对方穿作为收拢人才的计策，这种喜好，仍然是手段的虚伪而不是内心的诚恳。内心的诚恳与不诚恳，短时间内很难在外表上显现出来。如果光从那显现出来的地方去探求，那么，不诚恳也可以假装成诚恳，而其内心最终会陷入到不可理解的道理中去。但这时的相互用诚意对待，在当局尚且还不能自己解除自己的饥渴很迫切，那么，知遇那个人而像大臣内心所感到欣慰的东西，也正是知遇那个人而像大臣内心反转来却所感到难以自慰的。只是像春秋郑武公那样，把前去住处看望、回来请吃上等饭作为网罗英才的想法，这种喜好，仍然是礼仪的形式而不是内心的真挚。内心的真挚与不真挚，在局外难以看出点儿什么来。如果不从那能够看出的地方来验证，那么，真挚也只是自家知道那真挚，喜好也将会沦为不足以让人相信的开端。可这时把恳切真挚当本心的人，在旁观者到最后也猜测不出他那结交相得的真相来，那么，通过这个人而像大臣所喜好并显现出来的东西，也正是通过这个人而像大臣所喜好的东西反转来却感到难以一下子显现出来。这是因为口不及心啊！不符合才干与道德的要求，却全都容纳吗？

朱昌颐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求贤为致治之原，讲武为卫民之要，设教者型方之善，慎罚者明德之修。古帝王执枢斟化，握镜临宸，以登宅俊，则忱恂之意昭焉；以诘戎兵，则简阅之规肃焉；以宏乐宥，制详乎论秀书升；以示慈祥，法期乎准情酌理。是以《周礼》著举能之典，《雅诗》陈鞠旅之章；道艺有书，爰章三物；明允有训，用弼五刑。逖观曩纪，旁求切而念殷硕辅，训练勤而吉协嘉师，士行端风化之先，国宪凛德威之用。所由函夏归仁，熙春泳化，饮和六宇，畅德九垓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建中立极，锡福诚民，固已辟门轶美于重华，奋武齐徽于文命，德行懋而经明待用，钦恤昭而刑措咸欣矣。乃圣德谦冲，廑总章、衢室之畴咨，冀土壤细流之裨益，进臣等于廷，而策以举贤之典，肄武之方，与夫教士之良规，明刑之巨制。如臣愚昧，奚补崇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竭刍荛之一得，用效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简任者，人君之权；荐举者，大臣之责，而因思所以祛比周之习，登公明之选。此诚厘工熙绩之首务也。臣谨案，《洪范》之书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又曰：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自古人君将登斯民于上理，未有不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者也。然而四海九州之广，使人人待于察识，则日旰不遑矣。巨细经曲之繁，使事事躬为尝试，则旷职必多矣。故必赖乎左右辅弼之大臣，各举其所知，以为朝廷之任使。昔者祁奚举善于晋国，李克论相于魏侯，有足称焉。且夫大臣之荐贤也，必其忠信诚悫，为九重之所倚赖，则自深信而不疑；其公溥明通，为物望之所引重，则自群萃而不涣。彼夫赵武举管库之士至七十，而晋君不以为多。淳于髡一朝荐七士，而齐王厌其众。固由其取类各殊，亦由其所以格君者，有诚与不诚之异也。虽然，有举贤之任者，尤必有相士之识。夫士有始终之可信，有名实之攸殊。若诸葛亮为徐庶所荐，卒成蜀汉之业；而孔融之所荐者，迄无实用。何得震于其名哉？况一材一艺，不可以或遗也；一官一邑，不可以遽授也。必默识于平日，而取用于临时。如唐之狄仁杰，储材于药笼；宋之吕蒙正，置册于夹袋。其得人称盛，尤征以人事君之忠焉。皇上孜孜求治，延访人材，秉虚衷以收实效，咸登报最之书矣。

制策又以诘戎治兵，所以辅化安民，而因思夫选精锐、汰老羸、简器械、演阵法之事。臣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汉时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其时训练之方，则有郡试、都肄、貙刘、卞射诸目，立法至为详密。唐讲武都外，时则举于仲冬，太宗命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赏赐盛行，而其将亦加上考。其后惟李抱真观察泽潞，令于农隙分曹习射，昭义步兵称极盛焉。宋有大阅之典，《文

献通考》所载五练之法，皆有裨益营伍者也。若乃边防之策，汉唐最详。贾谊、晁错、陆贽诸人，不惮再三论列，以切求夫抚驭之术。夫自古承平日久，中外无事，武臣边帅往往奉行具文，不能尽心者矣。大抵校阅之制既弛，则兵丁适以供役使，而试之弓马则疏；饷廪之馈既繁，则武弁转以恣侵渔，而给于卒旅则伪。其流弊殆有不胜言者。而且精锐宜选，则老羸不可不汰也；器械宜备，则行阵不可不演也；俾之将作士气，士识将心，其裕之平日者，不可不亟讲也已。皇上几暇习劳，躬亲校射，整军经武之宏规，迈往古而上之矣。

制策又以士习文风，相为表里，而因博求夫汉唐、元明文学盛衰之源流。此尤黜华崇实之至意也。臣考西汉初兴，下求书之诏，其时老师宿儒，每各抱其残缺，以待当世之征辟。有如《书》有古今文之异，《诗》有齐、鲁、韩三家，《易》、《礼》、《春秋》，咸有师承。故其著之文章，贾谊之醇，董仲舒之茂，卓为一代名儒。然沿乎东汉之世，则淳厚之风渐息，而节义之气克敦。清议既起，标榜日滋。若夫建安之格，永明之体，逮乎梁隋，竞以声律相尚。文既趋于华缛，行亦流于浮靡。惟唐韩愈，奋然振兴，能起八代之衰，匪独其文辞迈越，实由其制行醇笃，足为士林之表率。然而初盛中晚，体以时殊，波流五代，而雕曼之词犹所不免，则信乎端士习以厘文体，尤非易事也。宋以五纬之瑞，笃生周、程、张、朱诸大儒，嗣是名臣联镳接轸。其文章淳雅宽博，足与《六经》圣贤之旨相发明。至元明，论文之纯疵，讲学之异同，溯厥渊源，指归可睹也。圣主典学高深，崇儒重道，先德行而后文艺，教思被乎无外已。

制策又以刑罚明而后教化行，狱讼平而后民心服，而因求所以无枉无纵、辟以止辟之道。臣闻三古以前，画象不犯，厥风尚已。汉代循吏，如龚、黄之仁慈，张、赵之明敏，其断狱每多援经术以饰吏治，论者谓得《周官》遗意。夫欲天下无冤民，必先朝廷无枉法。罪疑惟轻，所以广好生之德；刑与众弃，所以平万物之情。乃后世守令，不能尽知古人之意，往往自恃其才智，而不审夫出入之重轻，不辨其情为之得失，深文周内，苟且徼功，此健武之吏不可不惩也。然或因循视事，委靡不振，姑息适足以养奸，游移只成其寡断。推彼惮于烦劳之念，亦

谓民命甚重，初不可旦暮以期速效。而岂知案牍积而不理，则无辜之羁累益多；吏胥扰而不惩，则比户之追呼益急。民情之屈抑，且有甚于武健之所为。然则欲求夫刑罚明而狱讼平者，惟力返怠玩之习耳。圣天子慎宪省成，洞烛民隐，恤刑之治久已遍洽乎寰区，犹时申谕封疆大吏严饬守令，期于明慎用刑，无枉无纵，岂不懿欤！

若此者：才欣特达，众乐知方，乡物宾兴，祥刑式化，是用南谐北燮，西被东渐，汪汪乎振古之上仪，无以加矣。臣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懋持盈保泰之思，臻累洽重熙之盛。贤能已奋，而倍切登庸；义勇已昭，而愈勤教阅；胶庠已振，而弥励儒修；嘉肺已平，而尤严敕法。蜚英声，腾茂实，于以弥纶宙合，鼓铸群生，扬骏烈以永绥，迓洪庥之蕃衍，则我国家亿万载咸熙之庆，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近，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求取贤才，是达到天下大治的本原。讲求武备，是卫护民众的关键。设布教化，旨在给天下四方树立的法则很美好；慎重地对待刑罚，旨在宣明那仁德修养。古代的帝王抓住天机，斟酌化育，掌握大道，统治天下，用来起用各居其位的贤才，那么，信赖宽宏大量又严肃恭谨等九种德行的诚意就显现出来了。用来整治军队，那么，检阅的规则就严格、端正了。用来扩展那致使士子欢乐地得到培育的广度，具体制度就在于逐级考选优秀士子，用文书上报给王室方面很周详了。用来显示仁慈和善，国家刑法就希望达到依照情由、斟酌事理的地步了。所以《周礼》突出那荐举贤能的规定，《诗经·小雅》中陈述那军队誓师的篇章。道德技艺设有上报王室的文书，于是彰明六德、六行、六艺这三事。明察案情，处置公允，这在虞舜那里早有训示，用来辅正刺面、割鼻、断足、破坏生殖器官和杀死这五种刑罚。远观从前的记载，广求贤才十分热切而更希望得到重要的辅佐大臣，训练兵士很精勤而吉兆同良好的部众相对应，读书人的德行在教化的前列起端正的作用，国家的法度使仁德和威猛并用更显严峻。全国归向仁爱，像在明媚的春天里浮游染化，上下四方都家家给人送去谐和，仁德直达九重天，其原由正是在这些方面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建立起那最为适中的尺度,确立起最高的原则,赐给百姓长寿、富足、平安等五种福禄,使民众和协,本来就已经在开辟四门、倾听四方建议上,比虞舜做得还要好了。在奋扬武功上,也和大禹相媲美了。德行盛美而经义大明只等运用了,慎重用刑显然可见,而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天下全都感到高兴了。可陛下圣明的品德却很谦虚,对像虞舜、唐尧那样征求意见十分勤勉,希望得到哪怕是极为细小的一点儿补益,把臣下我等宣召到殿廷,用荐举贤能的典制、讲习武备的方法以及训导士人的良好规划、宣明刑罚的重大原则来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的人,哪里能对高大如泰山、深广如大海的圣上有所补益?但正值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刚开始的时刻,恭敬地想到向君主拜献建议,首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经典古义,敢不恭谨地竭尽那山野村夫仅有的心得,来献上葵花向阳的一点儿忠诚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进行选拔任用,属于君主权衡的范围;加以推荐保举,属于大臣的职责。据此而考虑去除结伙营私的恶习,步入公正严明的选任的途径。这实在是治理百官、广泛办好各种事务的头等大事啊!臣下我谨慎地查验,《洪范》这篇宏文中说:凡是臣民,都要具有道德,具有才能和作为,具有执守的最高准则,你们要时刻记住这三点。宏文中还说:有些人的行为同最高准则还不吻合,但尚未达到犯罪的地步,天子的大法还应容纳他们。自古以来,君主打算把这些百姓带入最完美的治理状态,没有不在访求贤才上操心费力而在用人后省心省力的。然而四海九州那样的广大,假设人人都等君主来详察识别,那就天色已晚也顾不过来了。大事小事、按常规办理或酌情灵活处置,又是那样的繁琐,假设事事都由君主亲自来尝试,那就荒废职守一定很多了。所以必定要仰赖左右的辅佐大臣,分别推荐他们所了解的人,来供朝廷委任使用。从前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向晋国荐举胜任职务的人选,战国李克对魏文侯讲论国相的担任条件,有足可称道的地方。况且大臣荐举贤能,大臣本身必定要忠实、坦诚、谨慎,被天子所倚重依靠,自然就对他深深相信而不怀疑。大臣本身公正博大,详明通达,被众望所援引推重,自然就群英

荟萃而不涣散。像那晋国大臣赵武推举掌管库房的办事人员充任士大夫达到七十人，可晋平公却不认为人数太多。战国淳于髡一个早晨荐举七名人士，可齐宣王却讨厌人数有些过多。这固然因为他们两人择取的人才类别各不相同，也由于他们两人规正君主的动机，存在着忠诚与不忠诚的差别啊！尽管这样，肩负着荐举贤才责任的人，更必须具有察识士人的眼光。一般说来，士人有从始至终可以信用的，也有名声和实际不一样的。像那诸葛亮被徐庶推荐给刘备，最终成就了建立蜀汉的功业。可北海相孔融向汉献帝推荐的祢衡这类人，一直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怎么能够震慑于他们的名声呢？况且仅有一种才能、一种技艺的人，不能够有的就给遗漏下。每个官职和每个城邑，不可以一下子就授付给他。一定要在平日不动声色地加以察识，到需要的关头予以择取任用。像那初唐时期的狄仁杰，在药笼里储备着日后待用的人才。北宋的吕蒙正，在衣服口袋里装放着人才记录本。他们获得人才众多，更证明了凭借人臣的身分事奉君主要忠诚。皇上您勤勉不息地谋求天下大治，延揽访求人才，持守毫无其他杂念的心怀，来收到实际的效果，全国就都奏进那政绩第一的文书了。

制策又认为整治军队，修缮兵器，目的在于辅助仁德教化，使百姓安定，据此考虑挑选精锐、汰除老弱病残、查检武器装备、演练阵法这些事项。臣下我想来，军队可以一百年不动用，但决不能一日不做防备。汉朝时在各郡和诸侯王封区设置材官这类地方部队，在京师长安有南军、北军这两支中央部队的驻扎。当时训练的方法，则有郡试、都肄、貙刘、卞射等各种名目，定立的制度最为周详细密。唐朝在京师长安城外讲习武备，时间定在冬季十一月举行。唐太宗命令十六卫的将士，在显德殿练习射箭，赏赐很丰厚，而那些将帅也列为考核的第一等级。此后只有李抱真在出任泽潞观察留后期间，命令人们在农闲时间里分成类属练习射箭，昭义镇步兵由此号称最强盛。宋朝有大规模检阅的制度，《文献通考》载述的五个方面的训练方法，都是对军队建设很有补益的东西。至于边防的筹划，汉朝唐代最为详密。西汉贾谊、晁错和唐代陆贽等人，不怕麻烦地再三论列，来殷

切地谋求那安抚驾驭的计策。自古以来,太平的时间一长久,中外没有变故发生,武职官员和边防统帅往往奉行一纸空文,不能竭尽心力了。大抵检阅军队的制度既已废弛,兵士就正好来供役使,而让他们练习骑马射箭就不当一回事了。军饷的供给既已繁多,武官就转过来肆意加以侵吞,而发放给部队就成了假的。其中相沿下来的弊端恐怕存在着说不过来的情况。而且精锐应当挑选,老弱病残就不能不汰除;武器装备应当齐全,队列阵法就不能不演练。致使将帅振作起士气,兵士了解将帅的用心,那些在平常就要做得很充分的事项,就不能不赶紧讲求。皇上您在处理政务得空闲的时候,亲身检阅部队,练习射箭,那整治军队和经营武备的长远筹划,已经超过古代并在它们上面了。

制策又认为读书人的习气和写文章的风尚,互相构成表里,据此而广泛探求汉代唐朝、元代明朝文章学问兴盛与衰落的前后过程。这更是斥退浮华、崇尚朴实的最深厚的用意啊!臣下我考查西汉建立初期,发布搜求图书的诏令,当时年老资深的学者和老成博学的儒士,每每各自执守本人经过秦朝焚书幸存下来的不完整的经典,来等待当今朝廷和官府的征聘任用。这就像《尚书》存在着用大篆书写的古文和用隶书书写的今文的差异,《诗经》存在着齐人辕固生传授的齐诗、鲁人申培传授的鲁诗、燕人韩婴传授的韩诗这三个流派。《周易》、《礼经》、《春秋》,都有一脉相承的师法。所以他们显现在文章上,像贾谊的醇厚风格,董仲舒的丰实风格,卓然成为一代名儒。然而延续到东汉时代,淳朴厚实的风尚逐渐息灭,而节操道义的风气得到促进。评议朝政得失和人物优劣的社会舆论既已兴起,相互之间的标榜也一天比一天滋长。至于东汉末建安时期的诗文风格,南朝齐武帝永明时期的诗歌新体,一直到南朝梁代和隋期,竞相用音节韵律来比试高低。文章既已趋向华丽繁缛,品行也滑入虚浮淫靡。只有唐朝的韩愈,奋猛地振兴文坛,能够挽回东汉到隋朝这八个朝代的衰颓状态,这不仅仅是他的文辞雄迈激越,实际上是因为他那适中的品行纯正忠厚,足以成为学术界的表率。但是初唐、盛唐和中唐、晚唐,文体因时代而不一样,余波流衍到五代,而刻意雕琢的华艳文词,仍

然免除不掉。这确实证明端正读书人的习气,改革文体,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朝凭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聚合在奎宿天区的祥瑞兆应,得天独厚,降生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各位大儒,随后名臣一批又一批。那个朝代的文章淳厚雅正,宽阔广博,足可同《六经》圣贤创制解说的义旨相互阐明。到了元朝和明代,讨论文章的精纯和瑕疵,讲求儒学的不同处和共同点,追溯它们的来源,主旨意向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圣明的皇上您,常念学习,高明精深,崇尚儒学,看重大道,把德行放在第一位,而把文章技艺放在第二位,兴教育才的思绪已经延及到所有的地方了。

制策又认为刑罚严明,然后教化才推行得开;审断案件公平,然后民众才内心悦服,据此而谋求没有错判、没有漏网和通过刑罚来停用刑罚的办法。臣下我听说上古伏羲氏、中古周文王、下古孔子以前,在器物上刻画五种刑罚的形状,使百姓有所儆戒而不触犯,这种风尚已经由来很久了。汉朝的好官员,像那龚遂、黄霸的仁慈,赵广汉、张敞的明智敏捷,他们审断案件,常常大都援用经典的理论,用来整治地方官吏处理政事的方法与成绩。发表议论的人认为他们获取到《周礼》所遗留下的本意。一般说来,要想天下没有蒙受冤屈的百姓,首先一定要朝廷没有枉滥的刑法。罪行还有确定不下来的,只能从轻处罚,目的是扩展那爱惜生灵的仁德。刑罚与众人一起废弃不用,目的是使万物的本性获得平和。可是后代的郡守县令,不能完全透彻地了解古代人定立刑法的用意,往往自己依仗本人的才干智慧,却不审慎地对待判为重罪还是判为轻罪的利害关系,不辨明究竟是真还是假,苛细周密地援用法律条文,让人陷入罪罚,一古脑儿去求取功赏。对这类威猛刚健的官吏,不能不加以警戒啊!然而有的官吏只按旧有规定处理政事,萎靡不振,无原则地宽容恰恰足可用来养成奸恶,迟疑不决只能形成那缺少处断。推究起来,这类官员,一想到烦忙辛劳,就感到害怕,也就只管借口说百姓的性命十分要紧,刚一上来决不能一天就审判完诉讼案件而指望收到迅速的效果。然而却哪里知道立案卷宗积压不做审理,无罪的人被关押、受牵连就越来越多。官府办事人员搅扰百姓而不惩办,他们对一家又一家的追问传

讯就越来越厉害。民众的实情被摧折压抑，恶果恐怕有比威猛刚健官吏的所作所为还要严重的。既然如此，那么打算谋求刑罚严明和诉讼平息，办法只有大力矫正怠懈随便的习气罢了。圣明的当朝天子谨慎地对待法度，省察成功的事业，完全彻底地察照出百姓的痛苦，慎用刑罚的法治很久就已经普遍同整个天下相协调了，仍旧经常责成各省最高行政长官严厉告诫知府和县令，希望做到严明慎重地运用刑罚，没有错判，没有漏网的现象。这难道不太美好了吗?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贤才为得到特殊礼遇被聘用而欣喜，众人为懂得振作奋厉的方法而欢乐，乡里用六德、六行、六艺推举贤能敬重优待，完善刑法来同时加强仁德教化，所以南北和谐，东西延布，真是深广极了，自古以来的最高法式，没有什么再能增加了。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已经大治了，再进一步谋求大治。已经安定了，再进一步谋求安定。扩大那守住已成事业、保持平安的思绪，达到世世代代清明和乐的鼎盛局面。贤能的人已经奋起，却加倍注重那选拔任用。正义勇武已经昭显，却更勤加训练检阅。学校教育已经振兴，却进一步激励读书人的道德修养。使坏人改悔，让百姓申冤已经予以公正处理，却更加严明法律。飞扬仁德教化的名声，腾驰隆盛美好的业绩，用来包罗宇宙天地，陶冶人类万物。弘扬大业来永保安宁，敬迎繁盛众多的天赐洪福，我们国家永久万事兴旺吉庆，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问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贾桢　殿试对策

贾桢(1797～1874)　字筠堂，山东黄县人。道光六年(1826)榜眼。历任工部、户部、礼部、吏部、兵部要职，充上书房总师傅、京城团防大臣，授武英殿大学士。曾察举书吏以钞票抵库银之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奉命留守北京，每日危坐天安门，阻止英法联军入内。后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监修《清文宗实录》和《圣训》。71岁退休，同治十三年卒。

臣对:臣闻任贤所以立政,讲武所以卫民,敷教而治仰化成,明刑而道归钦恤。稽诸载籍,《易》占育德,《书》训诘戎,作人咏乎《周诗》,参听详乎《王制》。崇规茂矩,秩然具赅。自古圣人在上,斟元御宇,锡极临宸。以之登群材,而迪简胥宜;以之修军政,而德威丕著;以之崇儒造士,而文风聿进于朴淳;以之纠慝诘奸,而国宪聿觇其明允。旌则攸严,至治也。戎兵攸饬,宏模也。学术于以正,讼狱于以清,又上理也。所由祥集璇图,化光玉镜,胥一世而跻之荡平者,恃此尔。

钦惟皇帝陛下,治亮天工,极昭圣武,整儒风以布化,彰刑典以宜民,固已俊乂登庸而威严师律,人文炳蔚而恩洽井闾矣。乃圣怀冲挹,蓟菲不遗,思崇久治之规,弥切谘询之念,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储人才、修武备、端士习、慎刑罚之至计。如臣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辰,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竭刍荛之一得,以勉效夫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欲熙庶绩,必借群才,而思所以祛比周之习,登公明之选。此诚制治保邦之要图也。臣惟国家以人理政,政非一政,即任政非一人,自古未有用人而求备者矣。夫简任者,人君之权;而荐举者,大臣之责。祁奚举贤,李克论相,后世称之。为国举贤,固人臣以人事君之道,而要不能视汲引之名为虚文,而无荐贤之实也。贤否判于几希,邪正别于疑似。故古来君子,或误用小人。诸葛之所取,既显违其节制;李泌之所用,又复涉于贪污。鉴衡之或爽,皆由于学识之不精耳。夫荐举之道,必举人者先贤,而后其志□,其识精,其所举者亦无不贤。居心严正,则无阿比之私也;待物公平,则无媚忌之意也;持鉴清明,则虚声不得而动之也;处世周详,则知其始必有以考其终,不至所举者始终殊辙也。况夫良乐为御,无虑骅骥之不来;卞和罗珍,岂虞琳琅之不集?简贤以崇德,是在膺荐举之责者,有以得其真而收实效耳。昔唐虞三代之盛,禹让稷、契,伯夷让夔、龙,益让朱虎、熊罴。其相与推荐者,非以博汲引之名也。则夫后世荐贤,若虞邱荐孙叔,魏献子举贾辛,犹未足称盛矣。皇上明目达聪,所宝惟贤。容才利国之臣,固皆能赞襄盛典也。

制策又以古者文德诞敷，不忘武备，而因思所以诘戎治兵之道。臣谨按，古者寓兵于农，振旅茇舍，治兵大阅，周制详矣。自管子作内政，寄军令，而兵农以分。汉之军卫分屯，而都试行以十月。唐之府兵分道，而讲习举以仲冬。皆三时劝农、一时肄武之意也。他若宋总内兵于三卫，统外兵于枢密。元立五卫，明置五府。虽不无因革之殊，而要视乎振厉之方耳。夫边防之策，汉唐至详。贾谊、晁错、陆贽之论，昭然具在也。然自古承平日久，武臣边帅往往奉为具文，不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故兵以义勇为主，而以训练为先。明于谦十营之改团操，聿创其议；王骥五法之详练兵，特定其规。盖督率有素，则弓马技艺皆熟娴；校阅有恒，则乡勇团练皆裨益。而况水操始于汉之习楼船，火器始于金之用铁罐。用兵不一方，而惟期乎一兵有一兵之用，则精锐有以选，老羸有以汰，器械有以简，阵法有以演，其道无不裕于平日。是在有统兵之责者，尽心简阅，不使有缺额之虞，而克免虚糜饷食之弊，夫而后军实严也。我朝化洽中外，输诚者固亿万计，而营伍之间讲求至密。复奉谕旨谆详，以八旗兵丁素称劲旅，尤不可因承平日久，稍弛训练，务期有勇知方。则辅化安民，诚偃武而不忘乎武备也。

制策又以士习文风，相为表里，而欲多士有以免虚车之诮。臣惟人文之蔚，先道德而后文章。然文以足言，言为心声。昌言之拜，飏言之歌，自古已然。是文辞亦根道德以出者也。三代而上，学术隆矣。汉文帝十五年，亲策贤良。武帝元光年间，策试董仲舒。其时有贤良、茂才、明经诸科，经学昌明，文章醇茂。绩学之士若董、贾辈，各有师承焉。魏晋以下，文渐华缛，士多浮靡。唐代以诗赋取士，宋改为经义，后复兼用经义及诗赋，至明而遂定三场之式。夫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古今取士，本无二致，未有不务实而徒尚虚名者。制义代圣贤立言，果能根柢经术，通贯古今，则尚理法简老者，不流于迂疏；尚机法议论者，不流于恣肆。读书服古之余，即居官致治之方，庶可以觇实行而不至盗虚声也。宜乎宋太宗谓科级之设，以待士流，而不容以走吏冒取耳。皇上崇儒重道，云汉为章，多士观光鼓舞，孰不争自濯磨也哉！

制策又以刑罚明而后教化行，讼狱平而后民心服，期用刑之无枉无纵。臣惟画象不犯，古治尚已。《周礼·秋官》示刑象，而凡轻重之典，声气之听，法具详焉。汉代循吏，若黄霸等之决疑狱，每多平反，犹得古人爱民之意。夫罪疑惟轻，所以广好生之德；刑与众弃，所以平万物之情。古者刑官称大理，则刑衷乎理，见用法之必以揆情。古者大刑用甲兵，则刑合乎兵，见除慝之即以戢暴。后世守令，不知古人立法之意。其游移寡断者，或且假长厚之名，而不计养奸之患，外以为宽容庶姓，内实以屈抑小民。此欧阳修之有讥于纵囚一事也。又或武健之吏，以深文为才，以刻核为智，以果决为功，遂使民苦于刑而不知恤。夫五刑之设，古所难废，而要为圣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虽用法至当，犹存矜爱，而况非刑、酷刑之苛，又岂古人止辟之意也乎？皇上用刑明慎，恺恻慈祥，至周且渥，固为万世理刑之鉴，而复谕封疆大吏，于案件详加鞫讯，速行拟结，则诚无枉而无纵矣。

若此者：抡才以经邦，足兵以裕国，宣化以端儒范，慎刑以重民生，洋洋乎锡福凝禧，洵为亘古之上仪也。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黜陟幽明，弥思奋庸于辰绩；干城素裕，弥勤肄习于丁胥。不以儒学既隆，而稍弛裁成之化；不以祥刑既示，而稍宽惠保之怀。执两用中，参三立极，于以弥纶宇宙，鼓铸群生，开骏发之远祥，固保定之宏业。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任用贤才，目的是定立起朝政；讲求武备，目的是卫护民众。施布教化，而大治仰赖顺从教化获得成功。宣明刑罚，而总的原则归结到慎重使用刑罚。考察典籍，《周易》占测那培育光明的德行问题，《尚书》训示要整治军队兵器，作育新人在《诗经》周代《大雅》中有咏赞，三公相互审断判决结果在《礼记·王制》中讲得很精详。崇高的成规和重大的法则，明晰详备。自古圣人置身在最上面，斟酌初始，驾驭天下，赐给百姓应遵守的最高准则，统治全国。凭借它来选拔众多的人才，而提升择用全都很合适。凭借它来修明军政，而仁德与威严特别显著。凭借它来崇尚儒学，造就士子，而

文章的风尚进升到朴实淳厚。凭借它来纠察邪恶,整治奸诈,而国法能让人看出那严明公正来。对臣僚表彰的原则非常严格,这是最好的治理啊!军队兵器整治,这是长远的谋划啊!学术有理由纯正,诉讼有理由不发生,又是第一等治绩啊!祥瑞会集在星象神图上,教化映照那清明的道法,整个一代都步入王道宽广顺畅的境地,其原因是依仗有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治国辅助那上天的职能,所确立的最高准则显示出那圣明英武,整顿读书人的风气来施布教化,彰明刑法来安定百姓,本来就已经是优异的人才加以进用,而使军队的纪律严明具有威慑力了。礼教化导鲜明华灿而恩德遍及民间了。可陛下圣明的心怀却谦虚自抑,对稍微有用的东西也不遗弃,考虑要扩充长久大治的成规,越发加重咨询的心念,把臣下我等宣召到殿廷,用储备人才、修明武备、端正读书人风气、慎重对待刑罚这些最重要的大计来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的人,哪里足以识大体,知纲要?但正当对答称扬君王之命刚开始的时刻,恭敬地想到向君主拜献建议,首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经典古义,敢不恭谨地竭尽那山野村夫仅有的心得,来勉力献上葵花向阳的一点儿忠诚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打算广泛办好各种事务,必定要借助众多的人才,据此而考虑去除结伙营私的恶习,步入公正严明的选任的途径。这实在是裁断治理、保有国家的紧要筹划啊!臣下我想来,国家依靠人来处理政务,政务不是就那一项政务,任用人处理政务也就不是光那一个人。自古没有任用人而求全责备的了。一般讲来,进行选拔任用,属于君主权衡的范围。加以推荐保举,属于大臣的职责。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荐举胜任职务的人选,战国李克讲论国相的担任条件,后世对他们很赞赏。为国家荐举贤才,本来就是人臣凭借自己的身分事奉君主的一种方式,但总之不能把大禹、后稷和皋陶这些圣贤递相来引进看成是一纸空文,却没有荐举贤能的实际。贤能与低劣,要从隐微细小的地方就分辨出来。邪恶与纯正,要从是非难辨的时候就区别出来。所以自古以来具有才德的人,有的却误用行为不正派的人。诸葛亮所择取的马谡一类人,就公开地违

抗他的命令。唐朝李泌所用的人,又陷入到贪污里面去。在察照评定方面有的出现差错,都是由于学问见识并不精详啊!推荐保举的法则,一定首先要荐举别人的人本身贤明,然后他的心志才纯正,他的识别力才精审,他所荐举的人也就没有不贤良的。居心严切纯正,就不存在偏袒勾结的私情。对待事物公平,就不存在嫉妒的心理。坚持识别人物的标准很明确,对方的虚名就不能够打动自己。处理世间事务周全详密,就知道对方开始是这样,也一定有根据考定他最后将会什么样,不至于所荐举的人前后表现不一致。况且王良、伯乐担当驾车的人,不担心千里骏马不前来。楚国卞和罗列宝玉,又哪里还忧虑各种珍宝不聚集?提拔贤能来崇尚仁德,这完全在于肩负推荐保举责任的人,有理由获取到真才而收到实效罢了。从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期,大禹把司空的职位推让给稷、契,伯夷把主持祭祀的职位推让给夔、龙,伯益把掌管山泽的职位推让给朱虎、熊罴。他们相互推荐保举的行动,并不是来博取引进的美名啊!既然如此,那么后世的荐举贤能,像春秋楚国令尹虞邱子荐举孙叔敖代替自己的职位,春秋晋国大臣魏献子荐举贾辛担任祁大夫,还不足以称为盛举了。皇上您看得清,听得远,所当成宝物的,只是那贤才。而容纳贤才、为国谋利的大臣,原本上也都能够扶助我朝盛明的政典啊!

制策又认为古代礼乐教化广加施布,但同时不忘记武备,据此而考虑整治军队、修缮兵器的方法。臣下我恭谨地查验,古代把兵士寄寓在农民中,回师入城,除草平地作为野战宿营地,进行大演习大检阅,周朝有关这些方面的制度已经规定得很详密了。从春秋齐国管仲定立国内的政治制度,把军令寄托在里面,兵士和农民才分离开。汉朝守卫皇宫的南军和守卫京城的北军分区驻扎,而地方部队称为都试的检阅活动在冬季十月举行。唐朝以折冲府为基层单位的府兵按监察区划十道来分布,而集中训练和演习在冬季十一月举行。这都是春夏秋三季鼓励农生生产、冬季习武的用意啊!其他像宋朝把中央禁卫军归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来辖领,把地方部队归枢密院来统领。元朝设立左卫、右卫、中卫、前卫、后卫这京师待卫军五卫,明朝设置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这五军都督府。尽管各朝不是没

有沿袭和变革的区别，但总之是依据振作奋厉的方法来作转移罢了。对边防的筹划，汉朝唐代最为详密。西汉贾谊、晁错和唐代陆贽的议论，非常清楚地全摆在那里。然而自古以来，太平的时间一长久，武职官员和边防统帅往往奉为一纸空文，不知道军队可以一百年不动用，但决不能一日不做防备。所以军队以道义勇武为主，而把训练放在第一位。明朝于谦把京军十营改为编组演练，首创这方面的动议。王骥关于练胆、练艺、练阵、练地、练时这五法详述练兵，特地定下这方面的成规。大致说来，督率久已形成习惯，射箭骑马各种技艺就全都熟练得很。检阅持之以恒，正规军之外的乡勇、团练这些地方武装，就全都会起补益的作用。况且水上操练是从西汉演习楼船开始的，火器是从金朝动用铁罐开始的。用兵并非就一种方法，但只希望一名士兵有一名士兵的用处。既然这样，精锐就有办法来挑选，老弱病残就有办法来汰除，武器装备就有办法来查检，阵法就有办法来演练，它们没有不需要在平常就做得很充分的。这就完全在于具有统兵责任的人，竭尽心力进行检阅，不让出现兵员缺额的忧虑，又能够免除掉白白耗费军饷的弊病，然后兵事就严密了。我朝教化遍及中外，前来归服的人原本就以亿万来计算，而对部队之间讲求武备最为周密。又奉谕旨教诲详明，由于八旗兵丁一向号称强大的军队，更不能因为太平时间已经很长，便对训练稍有松弛，务必要达到有勇力，知道振作奋厉的方式，那就辅助教化，安定民众，确实是停用武力而又不忘记武备了。

制策又认为读书人的习气和写文章的风尚，相互构成表里，而打算让众多的士子有办法免去北宋周敦颐所发出的装饰空车摆样子的讥诮。臣下我想来，礼教化导的大放光彩，要把道德放在第一位，而把文章放在第二位。但文章是用来充分表达所要说的话的，所要说的话正是心里要发出的声音。大禹对精辟言论的拜答，皋陶高声接话后的讴歌，从古以来就早已这样了。这说明文词也是在道德的基础上抒发出来的东西。夏商周三代以上，学术太隆盛了。汉文帝在执政的第十五年，亲自对贤良进行策试。汉武帝在元光年间，又策试董仲舒。当时有贤良、茂才、明经等各种科目，研究解释经典文义和主

旨的学问昌盛显明,文章醇厚丰实。学问渊博的人像董仲舒、贾谊之类,各自都有一脉相承的师法。曹魏两晋以后,文章逐渐变得华丽繁缛,读书人大多虚浮淫靡。唐代用诗歌和律赋选拔人才,宋朝改成以经典文句为题目,让考生论述其义理,后来又兼用经义和诗歌、律赋。到明朝,于是确定下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和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道和判五道及诏、诰、表任选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的乡试、会试的程式。文词,属于一种技艺。道德,才是实体。古今选拔人才,本来就没有不同的目的,未曾出现过不致力于实体却只是崇尚虚名的做法。应试按程式作文,是代替圣人贤人来确立起理论。真能够把根基奠立在经学上,通贯古今,那么,偏重义理阐发而讲求简要深沉的应试者,就不滑入迂腐疏阔。偏重机缘所在而讲求议事论政的应试者,就不滑入任意放纵。读书用力于古法以后,也就是居官达到治理的方式,差不多可以看出实际践行而不至于窃取虚名啊!怪不得宋太宗说科举次第等级的设立,用来等待读书人,而不容许办理杂事的人员冒充窃取而已。皇上您尊崇儒学,看重大道,像银河在天上显现文彩,众多的士子仰望光辉,欢欣鼓舞,有谁不争相洗涤磨励自己的呢?

制策又以为刑罚严明,然后教化才推行得开;审断案件公平,然后民众才内心悦服,希望达到用刑没有错判现象,也没有漏网现象。臣下我想来,在器物上刻画五种刑罚的形状,使百姓有所儆戒而不触犯,古代的这类法治已经由来很久了。《周礼·秋官》说是在宫门外的门阙上公布写在木板上的法律条文,而凡属执行刑罚用轻典或用重典,对诉讼双方的陈述词和陈述时的语气等方面进行听断,具体规定都很详尽。汉代的好官员,像黄霸等人审断疑难案件,往往大多纠正原来的错误判决,还能够获取到古人爱惜百姓的本意。罪行还有确定不下来的,只能从轻处罚,目的是扩展那爱惜生灵的仁德。刑罚与众人一起废弃不用,目的是使万物的本性获得平和。古代司法官叫做大理,这就说明刑法要切中事理,可以看出运用刑法必定要斟酌情由。古代诛除暴乱动用中央部队,这就说明刑法同武力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诛除奸恶也就是用来止息凶暴。后世的郡守县令,不知

道古代人定立刑法的本意。那些迟疑不决的官员，有的暂且借用宽宏厚道的名义，却不考虑养成奸恶的祸患。表面上认为是对百姓很宽容，骨子里实际上是摧折压抑普通的民众。这是北宋欧阳修对唐太宋故意放走囚犯这件事之所以有所讥刺的原因啊!再者,有些威猛刚健的官员,把周密援用法律条文当成才干,把苛刻当成明智,把果断判决当成功绩，于是致使百姓对刑罚感到非常痛苦而不知道体恤这一说法。刺面、割鼻、断足、破坏生殖器官和杀死这五种刑罚的设立，在古代也难以废除，但总之属于圣明的帝王不得已而使用的东西。所以尽管动用刑罚最为恰当,仍然存有怜悯爱惜,何况任意私设的刑罚和残酷的刑罚那样地苛细，这又哪里是古代人通过刑罚来停息住刑罚的用意呢?皇上您动用刑法严明慎重,和悦恻隐,仁慈和善,最周密又最宽厚,本来就成为万世处理刑法的一面镜子,而又责成各省最高行政长官,对案件详慎地加以审讯,迅速做出判决,真真是没有错判又没有漏网的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充实军备来使国家获得主动,宣明教化来端正读书人的规范行为,慎用刑罚来重视百姓的生命。广大极了呀!赐给百姓长寿、富足、平安等五种福禄,凝聚起吉祥,实在是整个古代的最高法式啊!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已经大治了,再进一步谋求大治。已经安定了,再进一步谋求安定。对政绩突出的人大加提升,对政绩暗淡的人予以处罚,虽已这样去做了,但更要考虑在按天象变化处理政务取得成效这方面确实能够奋发有为的人选。捍卫防御一向很充分,但对兵丁熟习武备要更精勤。不因为儒学已经很隆盛,却稍微松弛那效法天地相交之道、裁制成就万物的教化。不因为审慎的刑法已经亮给天下看，却稍微放宽那爱惜保护百姓的心怀。执待住过头和尚未达到这两种状态，采用那最为适中的尺度,同天地并列为三,确立起最高的准则,用来包罗宇宙,陶冶人类万物,开启那深谋大智所长远呈现的吉祥,巩固上天所保定的大业。我们国家永久政治清明,延续不断,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问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帅方蔚　殿试对策

帅方蔚(生卒年不详)　字子文,江西奉新人。道光六年(1826)探花,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得士者,经邦之本;整军者,讲武之规;考文者,成俗之原;议狱者,敷恩之实。逖稽往牒,《礼》详论秀,《易》系师贞,《传》称行远之文,《书》美协中之治。古帝王绍天阐绎,锡极临宸。以贲干旌,则素丝有咏也;以张武节,则彤矢有颁也;以端士习,则青衿有仪也;以正祥刑,则赭衣有恤也。上仪景铄,侯其祎而。用是敷求广,而用达于圭璋;训练明,而威宣于弧矢。文采彰,而义崇于黼黻;听断允,而气静于桁杨。所由铺张对天之洪休,扬厉无前之伟烈者,得此道耳。

钦惟皇帝陛下,四门登俊,七德定功,同文臻淳厚之风,定宪布祥和之泽,固已策力收而六师并饬,文章正而五听惟详矣。乃圣德渊冲,不遗葑菲,时廑畴咨之虑,共钦翕受之宏,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荐士、饬戎、观文、慎罚诸大端。臣才愧虫雕,功微蛾术,顾念明试次于敷奏,拜献厥有先资,当嘉言罔伏之时,值学古入官之始,敢不敬效蠡测管窥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欲熙庶绩,必借群才,而因详及夫荐举之法。臣谨案,《尚书大传》曰:诸侯岁贡士于天子。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茂世之规,厥在于此。粤自虞廷时举,周制宾兴,荐举之途,浸以益广。暨周之季、祁奚、李克之徒,推毂名流,弹冠朝籍,莫不蜚声来叶,流誉当年。汉初若萧文终之荐淮阴,魏无知之荐曲逆,勋猷茂著,名迹同昭。自高祖十二年,始下求贤之诏。下逮文景,皆能垂情国士,雅意旁求。是时州举秀才,郡察孝廉,以为常法;而公卿守相,亦时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应诏书。荐剡无虚,名臣相望。沿及杪汉,风流辉映,亦有可称。若元直倾心于南阳,正平受知于北海,其最著矣。唐宋以后,科目之势重而荐举之风微。若狄仁杰储材于药笼,吕蒙正置册于夹袋,虚怀若渴,后世称焉。明洪武

六年,罢科举,行察举法,其目自聪明正直以下凡八。其后复行科举,荐举浸废。岂不以人情偷薄,荐举之法易滋奸伪,而积行之君子或至壅于上闻,固不如试以文章,犹可以得方闻之士欤?洪惟我皇上,虚衷延访,人材辈出,职事修明,洵足以薄两京、追三代矣。

制策又以古者文德诞敷,不忘武备。此诚辅化安民之至计也。臣谨案,《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圣人论政,足食之后,次以足兵。王符有言:国未有不以德昌而以兵强者也。考古天子六军,大国三军。其时民庶皆兵,公卿皆将。爰自秦汉,兵农始判,文武攸分。汉京师有南北军,郡国置守相、都尉、中尉,分统文武。汉末置诸州都督,而刺史理人,都督典军。魏晋以还,并循其迹。唐制,京师有六军、十六卫,谓之南、北衙。贞观中,置府兵。开元中,改为矿骑,而府兵之法坏。宋制,京师有侍卫、殿前二司,而诸路有帅、漕、宪 、仓四司,分领军民之任。明置五军都督府,京师有三大营,于外置都指挥使司。夫承平久,则怠玩生。武臣边帅往往奉行具文,不能实心简阅。尺籍末虚,而有如马氏《兵考》所云:兵数虽多,只形劣弱。貙刘常举,而有如《明史·兵志》所云:旌旗虽胜,徒为容观。是以《诗》美既攻,《书》箴克诘,诚不敢苟安于无事也。我朝丹冥投锋,青徼释警,当偃武修文之会,存有备无患之心。皇上躬亲校阅,以练宿卫之士,所由干城有选、磐石无虞者哉!

制策又曰:士习文风,相为表里,而因究论夫文章之异。臣谨案,文以明道,千古载道之文,未有能出《六经》之范围者也。秦汉之初,去古未远,其间作者,皆能根柢六籍,彪炳一时。西京经学昌明,文章醇茂,贾、董实为称首。观《言政事疏》及《贤良对策》,卓哉一代之楷模也。是时士有师承,老儒耆德,化行乡里。洎乎末世,标榜日滋。魏晋陈隋,文渐华缛,士多浮靡。人夸正始之音,清言大扇;家习永明之体。文格日卑。能起八代之衰,端赖一时之杰矣。有唐受箓,人才并起,大手斯繁。若李、杜、韩、柳之流,其与江淹、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相去何远也!宋初文尚钩棘,欧阳修屈轧茁之句,而士习翕然一变。其后名儒接轸,其文淳雅宽博,俊伟光明。降及元明,犹承余韵,论文讲学,可溯渊源。明代诸家,自宋濂、王祎以下, 体裁各别,《明

史·文苑传序》论之详矣。夫裴行俭轻文艺之才，刘莘老薄文人之号。士必克敦实行，毋饰虚车，庶几有德有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允为不朽之业耳。圣上振兴文教，裁浮伪以端风尚。多士识所折衷，争自濯磨矣。

制策又以刑罚明而后教化行，狱讼平而后民心服。此诚明慎用刑之至意也。臣谨案，《汉书》总兵、刑于一志，以其所施者同也；分名、法为二家，以其从出者异也。《周官》五刑之属各五百，穆王定为三千，稍增轻刑，而重刑颇减。然《周官》郑注引《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五刑三千，实为夏制。汉文仁厚，始除肉刑。而《通鉴》载西魏大统十三年，除宫刑。《书正义》及《周官疏》，又谓至隋唐乃赦。崔浩《汉律序》所谓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肉刑在汉，未尽除也。粤稽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甫刑》，尚已。秦汉以后，民俗益偷，奸法者多，网亦少密焉。《汉志》：《李子》三十二篇，《商君》二十九篇，为后世言律之祖。原立法之意，必使民易知而难犯，猾吏不得为奸。汉兴，高祖蠲除苛政，萧何捃摭秦法，作律九章。其后律令繁多，文书盈于几阁，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能尽通，吏因缘为市，刑罚不中，所由来也。我皇上抚绥万方，哀矜庶狱。理官诚不持偏见，不设成心，无深文巧诋以周内为能，无姑息养奸以优容为德，庶几辟以止辟，臻刑措之休矣。

若此者：吁俊以康时，诘戎以威远，敷文以造士，刑暴以安良，所以长世字氓，无逾于此。臣尤伏愿皇上，蒿宫悠德，松牖凝神，扩天亶之聪明，劭日跻之圣敬。蔫吉已歌，而弥殷甄拔；戎行已饬，而益切张皇；浮华已洗，而更示裁成；从欲已形，而倍加钦恤。龙云之遇盛焉，豹韬之略娴焉，鸾旗之泽长焉，雀角之争息焉，于以奉若三无，艾安九有，跻俗寿宇，驱民福林，上以大灵承，下以开统绪，则我国家亿万年受天之祜，视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获取到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基。整治军队，是讲求武备的常规。考察文章，是形成社会风气的本原。

审议案件，是施布恩德的实体。往远处考察从前的典籍，《礼记》详述评定民间优秀人才的方法，《周易》编列兵众严正可以完成大业的卦爻，《左传》称赞能够流传久远的文词，《尚书》赞美刑罚恰当正确的法治。古代的帝王，效法和承顺天地，开创和化导人事，赐给百姓最高准则，统治天下。用来高竖旗竿招聘贤能，那么贤能就用洁白的丝线编成马缰绳前来应聘，这在《诗经·鄘风》中有咏叹啊！用来扬布用武之道，那么王室的朱红色弓箭就对诸侯也有颁赐啊！用来端正读书人的习气，那么士子就具有礼仪啊！用来使那审慎的刑法公正施行，那么就对罪犯也有体恤啊！最高的法式光彩闪耀，真盛美啊！因此普遍访求人才非常广泛，而任用的意向在所传送的圭璋物品上喻示出来。训练士兵严明，而声威在锐利的兵器上宣达出来。礼乐文彩彰显，而道义在华美的词藻中十分突出。审讯判决公平，而声气在动用大型的刑具时也很沉静。铺展那用以回报皇天的洪福，弘扬那前所未有的大业，其原因在于获取到这些措施罢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像虞舜那样开辟四门，进用贤才。奉守用武要禁止强暴、止息战争等七种美德，定立下功业。写文章全都让一致实现那淳厚的风尚。制定刑法就施布那祥和的恩泽。本来就已经收到群策群力的效果，中央主力部队一律得到了整治，文章归于纯正，审案从供词到神态等五个方面进行听断都很周详了。可陛下圣明的德性深厚又谦虚，不遗弃稍微有用的东西，时刻涌动那谁可胜任的思虑，和大臣一起谨慎对待各种人才一并任用的宏规。把臣下我等宣召到殿廷，用荐举贤士、整治军队、观察文风、慎用刑罚各个重大事项进行策问。臣下我的才能连雕虫小技都不如，功力比蛾子时时衔土还微弱，但想到经典上所讲的考核功绩安排在陈述治理措施的后面，向君主拜献建议得有个人事先谋划好的建议，正当良好的言论不可隐藏的时刻，适值学习古训、入官从政的起始之际，敢不恭敬地献上狭小浅薄的一点儿心得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打算广泛办好各种事务，必定要借助众多的人才，据此而详明地推及到荐举的方法。臣下我恭谨地

考察，《尚书大传》中说：诸侯每年向天子选送士子。第一次做得很恰当，这叫做喜好仁德。第二次做得很恰当，这叫做把贤能看成是贤能。第三次做得很恰当，这叫做给王室立下了功劳。使时世兴盛的成规，全都表现在这里。自从虞舜时代按照职务推举确能胜任的人选，周朝制度规定民间评定优秀人才，予以贵宾一样的优待。推荐保举的途径，逐渐就越来越宽广了。到了周朝的末期，晋国大夫祁奚和战国李克这些人，推荐著名的人物，为登入朝廷官员的名册而相互祝贺，无不飞扬名声到后代，流播美誉在当时。西汉初年，像萧何推荐韩信，魏无知推荐陈平，功勋和谋略宏大显著，名声和事迹一起显扬。从汉高祖在位的第十二年，首次颁布求取贤才的诏书。往后直到文帝和景帝，都能对全国范围内属于才能出众的人予以关注，一向发自内心地广泛访求人才。在当时，各州荐举秀才，各郡察访孝廉，作为固定的制度。而三公九卿、郡守和诸侯国相，也定期荐举朝廷所规定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这一类人士，来对诏书作出响应。荐举的公文没有虚假的内容，著名的臣僚一个接一个出现。延续到东汉的末期，遗风辉映，也有可以称述的地方。像徐庶对诸葛亮满心佩服，祢衡从孔融那里受到知遇，就是最突出的了。唐宋以后，科举考试的势头越来越加重，而推荐保举的风气越来越微弱。像唐朝狄仁杰在药笼中储备着日后待用的人才，北宋吕蒙正在衣服口袋里装着人才记录本，心中毫无其他杂念，求才若渴，后世对他们很称赞。明太祖洪武六年，停止科举，推行察举法。具体名目从聪明正直往下排，一共八类。到后来，又实行科举，荐举逐渐废止。这难道不是因为世情不厚道，荐举的方法容易滋生奸诈虚假，而从一点一滴积累起高尚品德的君子，有的以至于被朝廷闻知受到阻碍，原本上还不如用文章来考试，仍旧可以获取到博学多闻的士子吗?只有我皇上，心中毫无其他杂念来延揽访求，人才辈出，职责政事整治清明，实在是足以逼近西汉和东汉，追比夏商周三代了。

制策又认为古代礼乐教化广加施布，但同时又不忘记武备。这实在是辅助教化、安定民众的最重要的筹划啊!臣下我恭谨地查

验，《左传》上说：上天生出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物，老百姓全部都使用它们。圣人讲论政治，在使粮食充足以后，接下来要使兵备充实。东汉王符说过这样的话：国家从来没有不靠仁德昌盛和靠武力强大的呀！考察古代，天子设有六军，诸侯大国设有三军。当时百姓都是兵士，公卿都是将帅。自从秦朝汉代，兵士和农民才开始区别开来，文武分开各成系统。汉朝京师长安有南军和北军，各郡和诸侯王国设置太守和国相、都尉和中尉，分别掌管文教、武备。汉朝末期设置各州都督，而州刺史负责民政，都督管辖军队。曹魏两晋以后，全都沿袭东汉的做法。唐朝兵制，京师长安有六军、十六卫，把六军称作北衙，十六卫称作南衙。唐太宗贞观年间，设置以折冲府为基层单位的府兵。唐玄宗开元年间，改为由召募来的士兵所组成的矿骑，而府兵制度废坏。宋朝制度，京师开封有领辖中央主力军的侍卫司、殿前司，而各路有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分别担负军政、民政的职责。明朝设置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这五军都督府，京师北平有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这三大营，在地方上设置各个都指挥使司。大致说来，太平的时间一长久懈怠随便就产生出来。武职官员和边防统帅往往奉行一纸空文，不能够实心实意进行检阅。军队花名册虽然没有缺额，但正像《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在本书《兵考》中所说的那样：军队人数尽管众多，但只会显露出低劣虚弱来。集中演习虽然时常举行，但正像《明史·兵志》所说的那样：旌旗尽管很繁盛漂亮，但只是摆给人看的花架子。所以《诗经》上赞美周宣王我那车辆已经坚牢，《尚书》中告诫周成王要能整治好你的军队兵器。这实在是不敢对天下无事而暂且就放宽心啊！我朝在南方朱冥旷野的尽头放下兵锋，在东方青羌旷野的边塞上解除警戒，正当停用武力、修明礼乐文教的际会时机，仍存有备无患的意图。皇上您亲身进行检阅，来训练保卫京师和皇宫的兵士，这是捍卫防御的力量有挑选、国家巩固无忧虑的原因啊！

制策中又说：读书人的习气和文章的风尚，相互构成表里，据此而推究讲论文章的不同。臣下我恭谨地查验，文章是用来宣明圣

道的，历代载述圣道的文章，没有能够超出《六经》所固有的界限的。秦朝和汉代初期，距离古代还不太久远，这一阶段的作者，都能够把基础定在《六经》上，文采焕发一时。西汉研究解释经典文义和主旨的学问昌盛显明，文章醇厚丰实，贾谊、董仲舒实际上属于领袖人物。观阅贾谊的《言政事疏》和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三道贤良对策，简直卓越极了，真是整个一代的楷模。当时读书人各有一脉相承的师法，年老博学的儒者和道德高尚的老人，在乡里推行教化。到了衰败的末期，相互标榜的风气一天比一天滋长。曹魏两晋和南朝陈代、隋代，文章逐渐变得华丽繁缛，读书人大多虚浮淫靡。人人夸示曹魏齐王正始时期的诗歌形式，崇尚老子和庄子，空谈玄理的风气大规模煽动起来。家家修习南朝齐武帝永明时期的诗歌新体，诗文的格调一天比一天低下。能够挽回东汉到隋朝这八个朝代的衰颓状态，确实要靠那一时的豪杰了。唐朝承受天命，人才同时兴起，大手笔非常多。像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这些人，他们同南朝江淹、沈约的诗歌，任昉、陆倕的不带韵的散文相比，两者相差得多么远啊！宋朝初期，写文章崇尚艰涩，欧阳修在主持科举考试中贬抑险怪奇涩的文句，而读书人的习气不约而同地发生根本改变。此后著名的儒士一个接一个涌现出来，他们的文章淳厚雅正，宽阔广博，俊健雄伟，光采明亮。下至元朝和明朝，仍然承受遗留的精神，论说文章，讲求儒学，可以追溯出根源。明代各个独成一家的作者，从宋濂、王祎以下，体裁各不相同，《明史·文苑传序》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了。唐朝裴行俭轻视擅长写文章的才士，北宋刘挚看不起文人的称号。读书人能敦促自己实际践行，不用装饰空车摆样子，差不多既有道德，又有言论，藏置在名山，传给真能懂得的人，确实就成为不朽的事业了。圣上您振兴礼乐文教，裁抑浮华虚伪来端正风尚。众多的士子认清所应恰当把握的尺度，争相自觉地洗涤磨砺自己了。

制策又认为刑罚严明，然后教化才推行得开；审断案件公平，然后民众才内心悦服。这实在是严明慎重地使用刑罚的最深厚的用意啊！臣下我恭谨地查验，《汉书》把军事、法律汇总为一篇《刑

法志》，这是因为它们所施用的东西相同啊!把研讨名实关系的名家和主张法治的法家在《艺文志·诸子略》中分成两个学派，这是因为它们产生的来源不同啊!《周礼·秋官》五种刑罚的具体规定各有五百条，周穆王定立为三千条，稍略增加轻刑，而重刑减少很多。但《周礼》郑玄的注解援引《夏刑》，也说死刑为二百条，断足为三百条，破坏生殖器官为五百条，割鼻、刺面各为一千条，五种刑罚总共为三千条。这实际上是夏朝的法律制度。汉文帝仁德宽厚，最先废除掉残害人的身体的刑罚。但《资治通鉴》记载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废除掉破坏生殖器官的刑罚。《尚书》孔颖达《正义》和《周礼》贾公彦《疏》，又说直到隋唐才实行赦免。北魏崔浩《汉律序》中说到汉文帝废除掉残害人的身体的刑罚，但破坏生殖器官的刑罚并没做改变。这证明，残害人的身体的刑罚，在汉朝并未全部废除掉啊!自从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吕刑》，刑罚已经由来很久了。秦朝和汉朝以后，民间风气越来越不厚道，违背法令的人很多，法网也逐渐严密了。《汉书·艺文志》载录：《李子》三十二篇，《商君》二十九篇。这两部著作是后世讲论法律的鼻祖。推究定立法律的本意，务心要让老百姓容易了解而对触犯感到不得了，使狡诈奸猾的官吏不能够从中做手脚。汉朝建立之初，汉高祖去除严苛的政令，萧何拾取秦朝的法律，制定成《汉律》九章。此后法律条文繁多，案件卷宗在桌子上、房屋里堆得满满的。审判官在国家法律之外另有所请来定罪，援引其他案件的处理作比附来补充法律条款，这类现象一天比一天增加。连研习法律的专门人才都不能够全部通晓得了，官吏更借机拿法律来和罪犯做交易。刑罚不公正，由此而来呀!我皇上抚慰安定天下各个地区，哀怜体恤百姓案件的审理。司法官确实不抱持偏见，不先入为主，不把周密地援引法律条文、用巧言进行诋毁诬陷而使人陷入罪罚当成是才干。不把无原则地宽容、养成奸恶而显示宽恕当成是仁德，差不多已经通过刑罚来停息住刑罚，达到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的美好地步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召用贤才来使时世安康，整治军队来威

服远方，施布礼乐教化来造就读书人，惩治凶暴来安定良善，用来统治社会，抚养普通老百姓，其措施没有超过这些方面的。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您，在蒿草为柱的斋戒官室里更谨慎地对待仁德，在殿堂上像松生门下、云生窗口那样凝聚神思，扩展那出自天性的明察善断，弘扬那每天都升入一个新境界的圣明恭谨的德性。济济一堂全是天子众贤士，已经得到歌咏了，但对识别选拔更为殷切。军队已经整治了，但对壮大震扬更为关注。虚浮华艳已经洗刷了，但更宣示那效法天地相交之道、裁制成就万物的教化。用刑顺应百姓的意愿已经显露了，但加倍予以慎重对待和体恤。君臣像云气随龙而生那样的知遇关系隆盛了，三韬六略熟悉了，驾临学府视察的泽惠很绵长了，强暴男子侵凌贞正女子之类的官司不发生了，用来崇奉那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招徕天下人，治理安定全中国，使百姓步入长寿的境地，把民众引导到吉福的界域。往上来使更好地接受天命得到扩大，往下来开启那世代相继的国统，我们国家永久蒙受皇天的保佑，就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属于学问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清宣宗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殿试策问

[道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承洪绪，统驭寰区，夙夜兢兢，不敢暇逸。仰荷昊苍笃佑，疆圉乂安，岁功康若。惟益勤求治理，以丕绥我亿兆民。兹当临轩吁俊，式殷延访，用集嘉谟。

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兴化善俗，致治之本。《虞书》敷教，俾民亲逊。《周礼》以三物教民，以八刑纠民，故风化维持，久而弗替。汉置三老、孝弟常员，征拜美俗使者。唐赐孝义、高年粟帛，遣使观览风俗。皆以劝民厉俗，惟怀远图。国家承平日久，芸生者众，良莠不齐。将返漓者而使之淳，若多设科条，则易滋扰累；即广颁文诰，或徒饰观听。昔吕氏《乡约》，袁氏《世范》，或牧令以化一邑，或缙绅以教一乡。其言至为浅近，然由其道而实行之，俗美风淳，虽王政无以易。今欲使四海之内，狱讼衰息，邪慝不兴，里党辑睦，耆孺和乐，其操何术以收劳来匡直、辅翼振德之效，而致时雍之化欤？

黄河水道，汉元光中注钜野，通于淮泗。武帝筑宣防，导之北行。逮永平中，王景修渠筑堤，偶合禹功，自汉至唐不为害。石晋开运年间，浸汴、曹、濮、单、郓五州境，自北而东。宋元丰后，日趋于南，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而后注海，禹迹遂不可复。今治河之法，曰疏曰防，其要尤在蓄清以刷黄。束清坝，御黄坝，清黄

之关键也。因时启闭,治河即以通漕。河道深通,南北重空运,自无阻滞。蓄清之法,尤以保护高家堰为急务。何以使黄水无倒灌之虞,洪湖无下溢之患?石堤摸砌,难期稳固。谋经久之策,以何术为善?余阙、邱浚、潘季驯诸人,均有成法可稽。诚能会通其说而治之,俾河流顺轨,漕艘遄行,庶可一劳永逸欤?

选贤任能,政之枢要。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贤能分任之。其德器必过人,而责效在专其任。尧舜之世,皋夔稷契皆圣人,各守一官而治隆。三代用人,首德行,次才能。汉举孝廉及贤良方正,制为近古。魏立九品官人法,论者何以有或损或难之讥?唐制科之外,择人有四事。何者为先?崔祐甫荐举日除数十人,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史称允当者安在?宋司马光云,专引知识则嫌于私,止循资序未必皆才,欲设十科取士。可详陈其条目欤?抑行之果无流弊欤?夫贤才登进,则治道昌明。士人立德修行,宜何如圭璧束身,以应旁求之典?

自古治平,不忘武备。整军戢暴,驭世大权。汉唐以来,训练之法载在史册。其制若何?历代边防,孰得上策?若贾谊、晁错、赵充国、陆贽之伦,其著为条议、见诸施行者,亦有可采欤?我朝中外一家,边徼敉安,偶有不靖,命将出师,肤功迅奏。盖有鉴于前代弛备之弊,诘文讲武,未尝一日不儆也。绥边之法,在乎强内以警外。今西戎即叙,凡边帅之侵渔,屯师之惰废,已增其禄糈,汰其衰庸,剔除积弊,禁令严申。任将帅之责者,将何以使之日人弗懈,振国威而慑荒服,以长保太平之治乎?

夫敦化以善民俗,浚川以利民生,简贤以励官常,振武以靖边圉,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多士稽古有年,先资拜献,其各陈谠论,毋有所隐。朕将亲第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性急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只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

有的人生下来就知道,有的人学习后才知道,有的人遇到困难经

过学习然后才知道,等到他们知道了,就都一样了。

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大学是三代都有的,都是为阐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伦理道德的。伦理道德在上层人士中弄明白了,下层百姓就会亲密和睦。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敬承大业,统治天下,日夜小心谨慎,不敢闲散放纵。仰承上天保佑,整个辖区太平无事,年年获得大丰收。只有更加用心管理,以抚慰我的亿万百姓。现当亲临殿前主持考试以求取贤才,殷切访问以集中好的谋略。

只因世人生活充裕,因外物役使才改变了天性。所以倡导一种好的社会风气,才是达到治理的根本。《虞书》主张施行教化,使百姓和睦谦逊。《周礼》用六德、六行、六艺来教化百姓,对不孝、不睦等八种人施以刑罚来纠察百姓,所以风俗教化能长久地维持下去而不改变。汉代设置三老、孝悌的固定名额,征召美俗使者,唐代对有孝行节义者和老年人赐给粮食布帛,派遣使者观察风俗人情。都是为了勉励百姓振奋民风,这实在是谋划深远啊!国家太平的日子很长了,老百姓增加了很多,良莠不齐。想把浅薄的风气恢复过来,使之敦厚朴实,如果多设立法令条规,就容易带来很多扰乱牵累;即便是到处发布文告命令,也只能走走形式。古时吕大忠订立《乡约》,袁采制订《世范》,有的用地方官员来教化当地百姓,有的让士大夫来教育乡民。言辞虽然非常浅薄,可是如果按照他们的办法来实行教化,也会使风俗和美风气淳朴,即使帝王的仁政也不能代替它们。现在想使天下争讼减少直到杜绝,邪恶不再出现,邻里和睦,老幼安乐,这要用什么办法才能收到使人勤勉正直、帮助他们振作美德的效果,从而形成和美的风气呢?

黄河水在汉代元光时流入钜野,直通淮水泗水。汉武帝修建宣防宫,引导河水向北流去。到了东汉永平时,王景修渠筑堤,恰巧应合了大禹治水的做法,从汉到唐没有发生过水灾。后晋开运年间,黄

河水淹没了汴州、曹州、濮州、单州和郓州，并由北改向东流。宋代元丰以后，又逐渐向南流，到了中牟汇合了汴水，到了徐州汇合了泗水，到了清口汇合了淮水，然后流入了海洋，大禹时的河道于是就无法恢复了。现在治河的办法，一方面疏导，一方面筑堤，其要点主要在于多蓄清水以冲刷河底的黄沙。加固清水坝，拦筑黄水坝，是以清刷黄的关键。要按时开启或关闭闸门，这样治理河道也能通漕运。河道又深又通畅，南北连成线，重载空驶船只，自然没有阻碍。蓄积清流的办法，尤其以保护高家堰为当务之急。怎样才使黄河没有倒灌之忧，洪湖没有泛滥之害呢？石堤砌成，难以永远坚固。从长久考虑，用什么办法最好呢？余阙、邱浚、潘季驯这些人，都有现成的办法可以查考。如果确能领会变通其法来治理黄河，使河道运输畅通，满载货物的船只航行迅速，是不是能够一劳永逸呢？

选用贤人，任用有才能的人，这是施政的中心。一代的政事，一定要有一批贤能之人分别来料理。他们的道德才能要超过常人，而取得实绩还需要让他们专门负责。尧舜时代，皋陶、夔、后稷、契都是圣人，他们各司其职才社会安定兴盛。夏商周时选用人才，首先看其品行，其次是才能。汉代实行推举孝廉和贤良方正的制度，这近似于上古。曹魏时代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择人才，谈到这个问题的人怎会有“八损”、“三难”这些讥讽呢？唐代在科举取士之外选择人才有四种规定，哪一种为先呢？唐朝崔祐甫一天就推荐并由朝廷任用了数十人，不到一年时间又任用了差不多八百人，历史上还认为公允恰当，这是什么原因呢？宋代司马光说，只引荐相识了解的人就可能有私心，只根据资历选拔出的也未必都是有才能的人，所以他计划设立十个科目来选拔人才。你们能详细地陈述这些条目吗？或者照此实行果真就没有弊端吗？贤能之人被选拔重用就会政治清明。读书人树立美德修养品行，应该怎样才能做到品德高尚，不放纵自己，以符合选贤任能的准则呢？

自古太平安定不忘战备。整顿军队，禁止暴乱，是统治天下的大计。从汉唐以来，练兵之法史书都有记载。其制度怎样呢？历代边防，谁的办法最好呢？像贾谊、晁错、赵充国、陆贽这些人，他们所提的建

议被朝廷实行的，是否也有可供我们采用的呢？我们大清王朝，中外亲如一家，边疆因此安定，偶尔发生战事，命令将士出征，很快就会奏来捷报。这都是鉴于前代放松战备的教训，我们才重视文治武功，不敢一日不警惕啊！安定边疆之法，在于加强内部以抵御外敌入侵。现在西部少数部族已经逐个进行了安抚。凡边将侵吞军饷、驻军纪律懈怠松弛的，都进行了整治，增加他们的俸禄粮饷，淘汰衰老无能的人，去除多年来的弊病，严申禁令。担任将帅的人，将用什么办法使他们每天都不松懈，能够斗志昂扬，振作国威而使边远地区慑服，以长保太平盛世呢？

用淳朴的风气教化人们来改善社会风气，疏通河道以造福于民生，选拔贤能之人来劝勉官员忠于职守，整顿军队以安定边疆，这都是筹划治理、保国安邦的重要谋略。众多士子研习古书很多年了，首先谋划好自己的建议并献纳出来。各自陈说正直的言论，不要有所隐瞒，皇帝我将亲自阅览后排列名次。

李振钧　殿试对策

李振钧(生卒年不详)　字海初，安徽太湖人。道光九年(1829)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正俗斯能成化，济运莫如导河，致治在乎得人，怀远期于振德。古帝王夕爽选政，晨旦调风，操天人协应之机，本内外交修之实。以神於变，光被及于万邦；以谨堤防，潴蓄通乎四渎。以昭迪简，典隆于翘乘招弓；以广幅员，道存乎整军经武。是以《书》纪敕和之训，《易》占利涉之爻，《诗》赓兴宾之章，《传》垂慎守之戒。以暨声教，会归大也；以资灌既，飞輓通也；以登俊乂，干旌贲也；以严征缮，金汤巩也。寰海镜清，方隅砥平，所为涵泳圣涯，藻被歌颂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侔帱载，治炳登咸，则古圣以同民，本至仁以育物。固已匝宇归仁而翕河献颂，弹冠志庆而脱剑扬休矣。乃圣怀冲挹，愈切畴咨，勤葑采而听卑，询刍言而察迩，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

敦化、治河、简贤、振武诸大政。臣之愚陋，何足以知体要？顾念泰山峻极，犹资土壤之微；沧海宏深，不遗涓流之细，敢不就平素所诵习者，敬效先资之拜献乎！

伏读制策有曰：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兴化善俗，致治之本，而因思夫劳来匡直、辅翼振德之效。此诚勤求上理之大原也。臣谨按，《尚书》契作司徒，敬敷五教，而化成时雍。成周忠厚开基，《雎》、《麟》雅化，起于《二南》，又设官教以三物，纠以八刑，故风化维持，久而弗替。汉承秦敝，首除苛法，后乃置三老、孝弟常员，征拜美俗使者。唐赐高年粟帛，遣使观风。皆将以廉顽立懦，薰其德而善良，犹存古太史陈诗观风之遗意。夫民性非本漓也，民俗非本偷也。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鲜廉寡耻而俗不长厚也。将欲使之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嗜欲源灭而礼义心生，固非多设科条、广颁文诰之所能奏效也。昔吕氏《乡约》，袁氏《世范》，或以牧令而化一邑，或以缙绅而教一乡。此犹之匹夫为善于家，尚可刑于八口也。况乎立端本善则之极，操移风易俗之原，一人笑嘻，群黎逖听，九重好恶，四海具瞻，诚有相深于本原之地，而潜驱默化于不觉者。故《山枢》、《蟋蟀》之篇，俟著从狼之咏，非独其风气不古也。国奢则示以俭，国俭则示以礼，未始非亲民之吏徒簿书之鞅掌，而申劝未经心耳。苟能型方训俗，俾返浇薄于太初，又何虑良莠不齐，或偭规而背矩哉？圣天子修和有夏，恺泽如春，道昭乎遍德敷文，化治乎近光保极。海隅日出，安平和亲，喁喁向化，盖歌康衢而赓击壤矣。

制策又以河流顺轨，漕艘遄行，而咨夫一劳永逸之至计。臣尝诵浚畎距川之文，随山刊木之纪，未尝不叹美哉禹功，明德远矣。然其时洚洞为灾，非独黄河为害，故禹以海为水之归，而治河以通水道，所谓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者是也。河至汉元光中注钜野，通于淮泗。武帝筑宣防，导之北行。逮永平中，王景修渠修堤，偶合禹功，自汉至唐尚不为害。迨及石晋开运年间，河始汛溢，浸汴、曹、濮、单、郓五州境，自北而东。宋元丰后，日趋于南，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而后注海，禹迹遂不可复。欧阳修《治河三策》，至今称之。夫治河之法，惟就下之性不可拂，而遏厥狂澜；宣泄之宜不可违，而慎

其启闭。曰疏曰防,其大要也。然非束清御黄两坝,安能蓄清以刷黄乎?况乎因时启闭,治河即以通漕。河道深通,重空军船北运南旋,岁以为常,咸称利济矣。第扼清黄之要津者,莫如高家一堰,蓄清尤必慎加保护。石堤摸砌,功费浩繁,所以防九折于天来,望千帆之云集,经久之策可勿讲平昔?余阙、邱浚、潘季驯,虽各有成法,第非明乎地势而因时制宜,殆未易言法古也。盛世庆奏安澜,功成作楫,桃花无恙,瓠子不波,河流固屡清矣。

制策又曰: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贤能分任之。其德器必过人,而责效在专其任。斯诚选俊书升之大要也。臣窃惟名世之生,必钟间气,而群才之策,咸景清时。古者上有放勋重华,下有皋陶夔拜,明良喜起称极盛。三代之隆,伊傅周召,犹堪继轨,而用人则首德行而次才能,可谓法良意美。汉举孝廉及贤良方正,制虽近古,然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者。安在策于天子,察于州郡,举于学校乎?唐有国学、太学、四门学之制,后乃重进士而轻明经。惟崔祐甫荐举日除数十人,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史未尝以为滥。大抵荐剡之贤否,惟视推毂者之公私耳。如曰专引知识则嫌于私,将叔向之不避亲,鲍叔之知我贫,皆私乎?如曰止循资序未必皆才,将冯唐之老为郎,相如之久不迁,非才乎?此宋司马光所欲为设十科以举士,特惜其阻也。皇上四门吁俊,一德旁求,鸾旗而芹藻生香,鹿野而苹蒿掇秀。士之幸逢斯盛者,将黼黻尔躬矣,宜何如圭璧尔心也哉!

制策又以治平不忘武备,振国威而慑荒服,所以长保太平之治也。臣窃考汉分南北二军,唐有府兵、军府、折冲、矿骑,其制屡易,而训练之法,要不过较阅精而赏罚当耳。夫七旬而格有苗,益彰大舜之文命;三年而克鬼方,何损高宗之中兴!然必慎固封守而绥靖边陲者,安不忘危,耀德而非黩武,戢暴正所以安邦也。欲强内以警外,则善将兵莫如善将将矣。夫边帅寄膺阃外,营列细柳,乃真将军。纛建高牙,非假节钺,固当壮元老之猷,以赵屯田为法。无使书生矜纸上谈,如贾谊、晁错、陆贽辈之议其后也。况乎虎帐不喧,豹韬有略,练胆练艺,教目教身,惟在军实日讨,刁斗宵严,士皆挟纩而无敢执冰,斯边弗争桑而罔窥牧马矣。圣朝恩覃赤县,威震青徼,何殊陈涿鹿之师而

奋扬鹰之烈哉!

若此者:端己以齐民,涤源以利运,任贤以佐治,申儆以防边,洋洋乎畅鸿庥而垂骏业,盖亘古而立隆也。臣尤伏愿皇上,薰轸常调,璇衡默运。风声已树,而益凛蚤旅;雪浪不扬,而愈筹竹箭;鹑鸾咸集,而夏屋弥庇;鲸鲵久封,而秋防倍警。训俗之道昭焉,济民之功懋焉,作人之化隆焉,正域之规立焉。光玉镜,披金绳,奄九有以来同,总八方而为极。用以德征风动,泽洽露生,衍奕叶以壬林,承昊绎之申锡,则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庆,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回答:臣下我听说匡正庸俗的时尚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搞好漕运最重要的是疏通河道,实现社会太平在于选好人才,征服边区部族就期待振兴德政。古代的帝王晚上铨选官员,早晨又早起整顿风俗,控制好上天人间协和相应的关键,根据内外交相治理的实际情况。精心调理好世风的变化,光明覆盖到全国各地;小心地守好堤防,使蓄积的水流入大江大河;明正地进行选用提拔,制度的盛大会超过古代礼聘贤能的方式;扩大巩固疆域,具体办法在于整顿军队练兵习武。因此《尚书》记载了告诫人们和睦的训导,《易经》占卜了顺利渡河的爻辞,《诗经》承续了举荐贤能并待以宾客之礼的篇章,《左传》留传了谨慎守卫边防的警告。把它们施于声威和教化,内外就有了共同依归的准则;用以整修水利,航运就通达了;用以选贤任能,旗帜就会宏大盛美;用以整肃军备,江山就会固若金汤。海内像镜子一样清明,边境四方安定,人们沉浸于皇恩之中,诗文歌颂盛世,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品德可与天地相齐,政绩昭著可与三王五帝并尊,效法古代圣人使百姓同归和好,本着极大的仁爱之心养育万物。本来就天下归于仁爱,河水归道合流也献上颂歌,人们弹冠相庆,称颂止戈休兵的太平美好了。但皇上谦虚自抑,更加用心访问探求,勤于细微之处,听取卑贱人的意见,征询草野之人的建议,明察身边人的言论,宣召我们到朝廷,策问使教化敦厚、治理黄河、选用贤

能、使军队奋勇等大政方针。臣下我愚笨浅陋，哪里知道大体和纲要呢？但又想到泰山高峻还积蓄点点细土，沧海宏大也不遗弃涓涓细流，哪敢不把平时所学的知识，恭敬地附从那首先谋划好个人建议的经典古义，并向君王呈献出来呢？

跪拜敬读制策，上面说：人们生活充裕，因外物役使才改变了天性。所以倡导一种好的社会风气，才是达到治理的根本，因而就考虑怎样收到使人勤勉正直、帮助他们发扬美德的效果。这确实是期望得到最高治理的根本。臣下我认真地思考后认为，《尚书》记载契作司徒官时，用亲人间的五种道德准则来教育人们，终于使得风气和美。西周靠忠厚建立了基业，《关雎》、《麟之趾》诗所歌咏的纯正教化，开始于《周南》、《召南》。又设立职官用六德、六行、六艺来教化百姓，对不孝、不睦等八种人施以刑罚来纠察百姓，所以风俗教化能长久维持下去而不改变。汉朝承接了秦朝的败坏风气，所以首先废除了苛刻的法令，后又设置三老、孝悌的固定名额，征召美俗使者。唐朝赐给老年人粮食布帛，派遣使者观察民俗人情。这都是为了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振作起来，品德得到薰陶而变得良善，这还有古代史官采风献诗以观民情的本意。民性不是原本不朴实，民俗不是原本鄙薄。只是因为父兄事先没教育好，晚辈行为不谨慎，才少廉寡耻使得民俗不敦厚了。要想荡除不健康的风气，使民风清明，根除各种嗜好和欲望，让礼义在心中生根，确实不是多设立法令条规，多发布命令所能奏效的。古时吕大忠订立《乡约》，袁采制订《世范》，有的用地方长官来教化当地百姓，有的让士大夫来教育乡民。这就像一个人为善于家一样，还可以在八口之家中做表率。何况树立端正根本改善法度的准则，控制着移风易俗的本原，皇上的欢笑或皱眉，百姓很远就知道，朝廷的喜好或厌恶，天下都能看得见，确实有深入于本原之中就会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所以有《山有枢》、《蟋蟀》这样的诗篇，有"等待我于屏风前"和"一齐驱逐两只狼啊"这样的歌咏，不只是风气不像古代。国人奢富就要提倡俭朴，国人贫乏就要提倡礼义，未尝不是管理百姓的官吏整天只忙碌于公文往来，而对百姓申告劝勉不够留心啊！如果能端正训导各地风俗，使浅薄的风气回到上古时的淳朴和美

好之中，又哪里用得着担心良莠不齐，或有人不遵守正常的法则呢？圣明的天子使国家和美，和乐的恩泽就像温暖的春天，道德昭著，广施恩泽和教化；治理化导达到接近天子的尊容和保持那最高行为准则。偏远的海角也如日出照耀一样，安乐平定，和睦相亲，众人向慕，人们歌颂太平盛世之声就会在大路上此起彼伏了。

制策又着眼河流归道，漕运畅通而询问一劳永逸的最好办法。臣下我曾经习诵记载大禹疏通水道流入江河、沿山砍树作出标记开通道路的文章，特别感叹大禹的伟大功劳，他的伟大品德真是影响深远。然而当时洪水无边无际，不只是黄河为害，所以大禹把大海作为河水的归宿，治河来疏通河道，所谓在积石山疏导黄河流入龙门就是这样。到了汉代元光年间，黄河流向钜野，直通淮水泗水。汉武帝修建宣防宫，使之向北流去。到了东汉永平年间，王景修渠筑堤，恰巧应合了大禹治水的做法，一直到唐代不再为害。到了后晋开运年间，黄河开始泛滥，淹没了汴州、曹州、濮州、单州、郓州，河水由北折向东流。宋代元丰以后又逐渐向南流，到了中牟汇合了汴水，到了徐州汇合了泗水，到了清口汇合了淮水，然后流入了大海，大禹时的河道于是就无法恢复了。欧阳修《治河三策》至今仍被人们提起。治河的办法，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规律不能违背，而要遏止狂涛泛滥；河水宜疏导不可堵塞，而要慎重地开启或关闭河闸。一方面疏导，一方面筑堤，这是治河的要领，如果不是束清、御黄这两个坝，哪能积蓄清水来冲刷黄沙呢？何况按时开启或关闭闸口，治理了河道也就能够通漕运。河道深而且畅通，重载空驶的军船，南来北往都很顺当，长年如此，自然就认为交通便利了。但控制清除黄沙的关键，都不如高家堰最为重要，蓄积清水尤其要更加谨慎地保护好。石堤砌成，要花费很多人力财力，所以治理好九曲黄河，使航道畅通千帆竞渡，长久的办法能不在平时常作讲求吗？余阙、邱浚、潘季驯，他们虽然各有现成的治河办法，但是不明黄河地势并因时制宜，大概不能轻易就说效法古人了。太平盛世庆贺河水平安，各种船只来往如梭，春汛无事，瓠子口没有决堤，黄河一定不再泛滥了。

制策又说：一代的政事，一定要有一批贤能之人分别来料理，他

们的道德才能要超过常人,而取得实绩还需要让他们专门负责。这确实是选拔贤才的要旨啊!臣下我私下认为:闻名于世的人出生后,一定能蕴含隔世而出的奇气,而众多贤能之人的谋划,全都归往社会祥和安定的时期。古时候上有尧舜,下有皋陶和夔,明君良臣兴起,使得当时极其兴盛。夏商周三代兴隆昌盛,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仍然能够继承上古的法则,选用人才时,首先看其品行,其次是才能,这可以说是法度好用意美了。汉代荐举孝廉和贤良方正,制度虽然跟上古差不多,然而却有举荐的秀才不识字,举荐的孝廉不孝顺父母的。可见哪里在于天子策问,州郡选拔,学校推荐呢?唐代有国学、太学和四门学来教授学子的制度,后来重视进士科而轻视明经科。只有崔祐甫一天就荐举而由朝廷任用了数十人,不到一年又任用了差不多八百人,历史上没人认为这是滥用。大概荐举人才是否贤能,要看推荐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罢了。如果说只引荐相识了解的人就可能有私心,那么把叔向举贤不避亲、鲍叔牙爱护管仲,也都看作是私心吗?如果说只以资历身份为标准,选拔出的未必是有才能的人,那么年老才授以中郎官的冯唐,很久都得不到升迁的司马相如,难道他们都不是人才吗?这就是宋代司马光计划设立"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等十种科目来取士的原因,只可惜受到了阻碍。皇上四处求贤,一心一意广征博选。天子之旗下,芹藻也能发出香气;鹿鸣的原野中,莘蒿一样的人也能被选取任用。士子有幸生在这种太平盛世,将在外表上修整一番又从内心应怎样培养自己的美好品德啊!

制策又鉴于社会太平不忘战备,振作国威而使边远地区慑服,目的在于永久保住太平盛世。臣下我私下加以考察,汉代分设南军北军,唐代有府兵、军府、折冲、旷骑,兵制多次变动;而练兵之法,大体不过查核仔细、赏罚得当罢了。七十天感化征服有苗,使得虞舜的文德教化更加显明;三年战胜鬼方,不会妨碍殷高宗重新振兴。然而定能巩固边防而安定边疆的,还是居安思危,以德感人而非滥用武力,止息暴乱正是为了安定国家。想要内部强盛以抵御外敌侵略,那么善于带兵,不如善于统率将领。防守边疆的将帅统兵于外,像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样军纪严明,才是不负重托的真正将军。竖起高高的牙旗,

不是授给符节斧钺，本来就应当看重老将的谋划，要学习赵充国屯田的办法。不叫书生骄傲自大纸上谈兵，致使贾谊、晁错、陆贽等人在事后议论他们。何况军营里不能喧闹议论，大将胸中自有用兵之术，训练勇气，训练武艺，教练眼力，教练身段。只要白天认真练兵，晚上严明纪律，兵士们都听从指挥，边境就会没有纷争，敌人就不敢侵犯了。我朝恩泽广施天下，威震边疆，这与涿鹿之战和牧野之战还能有什么区别呢？

像上面对答的问题：端正风气来治理百姓，清理河道使航运畅通，选贤任能以辅助治理，加强戒备来防守边疆，真是皇恩浩荡大业永存，属于自古以来的唯一盛举啊！臣下我格外希望皇上，和风常调，天机默运。好的风气已经树立，更加注意听取意见；波涛不再泛滥为害，更要谋划河道的畅通；贤能之人都征召上来，使江山更加稳固；敌人不再侵扰，但边防更加戒备。训导风俗的办法已经明晰，治河以救助百姓的功劳已经伟大，培育选拔人才已经收到很大成效，整饬军队安定边疆的制度已经建立。用来光大清明的政治，播布最高的准绳。统一天下使之都来朝见参拜，总括八方以确立起最高地位。因此以德征召人才就会像风一样四方响应，恩泽广博像雨露滋润万物一样，皇朝世代承继更加盛大，接受上天的申戒厚赐，那么我们大清王朝亿万年的永久统治，根基就在这里了。臣下我学问肤浅，属于刚要被进用的人，不知道忌讳，触犯了皇上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了极点。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

钱福昌　会试卷三道

钱福昌（生卒年不详）　字辰田，浙江平湖人。道光九年（1829）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达与成非幸致也，务绝其所欲所见之弊而已。盖政之行也，求其

达也,求其大事之成也。然则欲速见小,其弊可不深戒哉!且为政者,必使天下无阻我之化,而后我之化达焉;亦必使天下无隘我之勋,而后我之勋成焉。此非可预存一达与成之念也。骤期其达,即自窒其达之机;悉要于成,亦自域其成之量。则与其进而言功,何如退而救弊也?欲速见小之不可为政,固也。

顾第以欲速见小为戒,而不深究夫欲速见小之所以失,则天下之欲速者,犹且以达为冀也;天下之见小利者,犹且以大事之成为幸也。然而达不能以仓猝致也。譬犹丝焉,治之而不棼则达;譬犹道焉,由之而不径则达。非然者,其序紊矣,紊则其迹滞。事不可以苟且成也。拟诸纲焉,纲举而目自张则成;拟诸经焉,经立而纶自比则成。非然者,其识浅矣,浅则其守拘。今以欲速之心为之,朝下一令焉,暮即期其效;夕设一筹焉,旦必策其勋。其视天下之事皆易事,其图天下之功无全功矣。且以见小利之心为之,制不必井田学校,而俗狃欢虞;职不问礼乐兵刑,而勋难建竖。于其所不屑就者而轻就之,于其所不可诿者而反诿之矣。

则我见今古不同风,而急遽以图之,不达于时;远近不同习,而仓皇以措之,不达于势。即或时势相通,而纵情一往,累世所莫得而殚者,将以一蹴几之,殆至求治太殷,纵有优裕之经猷,亦见夺于张皇之念虑。而始阻其气,继阻其机,人以为达之甚难,我以为欲之太易也,速则然也。则我见修和者府事,而规模既狭,才不足以成之;燮理者阴阳,而意量未宏,识不足以成之。即使才识兼优,而因陋就简,钜典所不可不遵者,或以琐务纷之,殆至补苴无功,纵有精详之经制,亦渐域于浅近之图维。而内隘其量,外隘其规,人以为所成之未备,我以为所见之已拘也,小则然也。商其深警此欲速见小之心哉!

达到目的和成就大事不是靠侥幸来实现的,一定要杜绝性急求快和只顾小利的弊端罢了。政令的推行,是为了能够达到目的,希望能够成就大事业。然而图快就会只顾小利,其弊端怎能不多加警惕啊!而且执政的人,一定要使天下没有妨碍我教化的,然后我的教化就能实现;一定要使天下没有阻挠我的功业的,然后我的功业就能

完成。这就是不能先存有一下子就达到目的和成就事业的想法。急切地希望达到目的,也就堵塞了自己达到目的的心机;一样也不缺地想成就大事,也就限制了自己成就大事的度量。那么与其先前一步只想成功,哪如退后一步去除弊端呢?性急图快只顾小利是不能执政的,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过只警惕性急图快和只顾小利,而不深究这种做法为什么有害处,那么想要图快的人,还会想着怎样才能快点达到目的;只顾小利的人,还会想着怎样才能侥幸成就大事。可是达到目的是不能仓促实现的。就像丝线织成布,有条理而不乱就是达到了目的;就像道路,顺着走下去而不绕弯儿就能达到目的。如果不是这样,次序就会紊乱,次序紊乱行动就被束缚住了。事业也是不能马虎草率就可以完成的。就像鱼网的纲绳,大纲一举而细目张开,鱼就捕着了;就像织物的经线,有了经线再紧密地织好纬线,布就织成了。如果不是这样,见识就会浅薄,见识浅薄就办事拘泥,而受到限制。如果以性急图快的想法来办事,早晨才发布了一道命令,天黑就想收到成效;晚上才谋划了一件事,天亮就想大功告成。这就把天下之事都看成了极容易的事,这样来谋划功业就不会取得完整的功业。况且办事只顾眼前小利,制度不必像上古时的井田和学校那样,就会世风难以欢娱;而职官不管礼乐兵事刑罚这些份内之事,功业是难以建立的。在不值得介意的事情上去用心,在不能推托的事情上反而推掉不管了。

而我认为古今风气不同,急迫地想达到目的是不合时宜的;不同地方习俗不同,匆忙拿出办法是不合形势的。即使时势合适,但纵情而为,多少世代都没有得到的,一下子就全想得到,以至于谋求大治太殷切,即使有很多好的办法和谋略,也会被性急图快的想法所侵夺。开始时被气性所阻,按下去又失去了时机,人们都以为要达到目的是很难的,而我以为是太容易了,这是图快造成这样的。我还看到修明的是六府三事,可规划却狭窄,其才能不足以成就大事;协调治理的是阴阳变化,可度量却不宏大,其才识不足以成就大事。即使才能见识都很好,但苟且保守,处处该遵守的重大典制,或被琐碎事务干扰,等到补救无效,即使有精细详备的治国制度,也会被浅近的谋

划和想法所限制。内心受到度量的限制，外部受到制度的限制，人们都以为成功的条件还不具备，而我以为这种看法也太保守了。这是只顾小利造成这样的。子夏深切地提醒这些性急图快和只顾小利的人！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即知之者而递念之，其所知无不同矣。夫犹是知也，而或生、或学、或困异焉，则甚不一矣。虽然，亦未即其知之后而合观之耳。今使天下之言知者，必尽出自天亶之聪也，亦安在不可比而同哉？惟夫受质者业分其清浊，斯明道者各判夫后先，即所判以究所终，然后知天下之言知者有纯杂之殊，初无明昧之异也。道之达于天下也，夫人而知之也。夫人而知之，则其所知者一焉而已矣。虽然，犹有辨。

自造化启文明，而英灵首出，特征诞降之奇，则知之者以生为上。山川之钟毓非常，而灵秀所呈，遂以见绝世英姿之异，夫孰从而同之者？试观仲虺作诰，商王之智锡于天；夏史成书，虞陛之华协于帝。生而知之，固无借讲求之益，更何烦研索之劳也。自《诗》、《书》垂至理，而纪载成编，聿肇鸿通之选，则知之者以学为次。名物之源流有素，而精英所汇，乃以成古今淹贯之才，又孰从而媲之者？试观鸟纪呈祥，数典不忘于郯子；龟畴锡福，访范且衍自商臣。学而知之，纵不敌英哲之姿，当远胜颛蒙之习矣。自旦昼矢精勤，而研求既力，亦通颖悟之神，则知之者以困为极。简编之启牖甚微，而探索维殷，亦不啻古昔神灵之贶，又孰从而非之者？试观道可传心，忠恕尚征其一贯；人能受教，启发亦反夫三隅。困而知之，固远逊如神之质，当永怀稽古之心矣。则试为之比而论之，则试为之合而验之。

骤而观或生、或学、或困之殊，几疑上帝之降衷，特故为是不齐者，以静验斯人之高下。故当夫致知格物，精华之昭著自在两间。生知者以为不必学，学知者方且无所困。而及其虚灵顿启，则一旦之贯通，自有人定胜天之理。生知犹是知，学知犹是知，困知亦犹是知也，而何弗同也？继而念或生、或学、或困之异，更疑斯世之品评，乃故为是各异者，以显别其人之优劣。故当其书数方名，物理之纷陈昭于天壤。生

知者不知有学，学知者不知有困。而及其敏悟初开，则一心之融澈，同此引伸触类之方。生知者于知无所加，学知者于知无所益，困知者亦于知无所损也，而又何异也？及其知之，一也，更何疑于行之者乎？

专就知道的东西逐层去思索它，人们所知道的也都一样了。但还是这种知识，有生下来就知道，学习后才知道和遇到困难就去学习然后才知道的区别，这是很不一样的。虽然这样，这种差别也不是就其知道后一块儿看的。如果使天下讲论那些知道的人，他们一定都是出自天生的聪明，这在哪儿不能并列相同呢？只因秉受天资的人有聪明和不聪明的区别，他们明白事理才有先后之分，根据他们的不同来推究其结果，这样才能弄清天下讲论那些知道的人有纯正驳杂之分，而在开始时是没有明白不明白的区别的。道理通达于天下，人们就都知道了。人们已经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也就都一样了。虽然如此，仍然有需要分辨清楚的问题。

自从天地间有了文采，杰出的人首先出现在世上，就与众不同地显示出降生时的奇异征兆，这种生下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的。山川养育了这种不平凡的人，他们天赋聪明，于是表现出冠绝当世的英俊风姿。谁和这种人一样呢？看看仲虺写的诰文，商王成汤的智慧就是上天赐给的；看看夏朝史官编成的《尚书》，帝舜的文德就合于帝尧。生下来就知道的人，本来就不靠学习来帮助，更用不着研究探讨的辛劳。自从《诗经》、《尚书》垂示最高的治理，就有了记载这些治理的书籍，开始了学识渊博者的选拔，这种人是把学习放在次一等的。名号器物的源流都有根本，把精华汇集于身，就成了通晓古今的人。谁可以和这种人相比呢？试看少昊氏时，凤凰呈祥，郯子不忘祖先的这些历史；神龟显示的九种治国大法，赐给天下幸福，访求《洪范》是从商代箕子推广开的。学习后才知道的人，即使比不上杰出圣人的风姿，也远远超过愚昧之人的习性。从每天早起勤奋用功，研究探讨非常努力，也能使自己聪明起来，这种人遇到困难而努力学习就属于最后一等。书籍很少启发，但遇到困难探索，也无异于如有神灵之助。又谁是可以受到非议的呢？试看帝王之道可以传布于心，忠诚宽厚需用

一种道德来贯穿;人可以教育,开发心智要举一反三。遇到困难而学习从而才知道的人,本来远远比不上神奇之人的天性,就该长有研习古事之心了。试着把他们并列来评论,试着把他们合起来作考察。

乍看生下来就知道、学习后就知道和遇到困难经过学习才知道这三者的不同,几乎怀疑上帝降给人的本性时,故意安排了这些区别,来平静地验证这些人的高低。所以要获得知识,推究事物的原理,精华之显明,自在天地之间。生下来就知道的人认为不必学习,学习后才知道的人也不会遇到困扰。等到他们天资顿开就一下子明白了道理,当然是人力可以战胜自然了。生下来就知道的是这个,学习后才知道的是这个,遇到困难才学习然后才知道的也是这个,这能有什么不同呢?接着又想到生下来就知道、学习后才知道和遇到困难经过学习然后才知道这三者的不同,更怀疑是世人的品评,故意有这些不一样,来区别人的优劣。所以当文字算术和四方的名称这些事物的常理纷然陈列,显示于天地间时,生下来就知道的人不知道还需要学习,学习后才知道的人不知道还会有困难。等到他们聪慧一开,就一下子都明白了,在推及其他、触类旁通上又是相同的。生下来就知道的人对知识没有增加,学习后才知道的人对知识也没有增益,遇到困难经过学习然后才知道的人对知识也没有减少;这又有什么不同呢?等到他们都知道了,就是一样的,还在实行上怀疑什么呢?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备详立学之旨,而民之亲也可立致矣。夫学有乡国之殊,而皆以明伦,盖以伦之足以治上下也。明于上而亲于下,有断然者。且天下制之所垂,人心所共白也。而惟统古今而一致者,乃能合贵贱而胥通于起化之地,寓尊亲即于被化之人征性情。道德一而风俗同,乃以知古昔之创垂,其所以感化夫人心者至深切矣。庠序校之各具其义也,无非为民计也,无非为民之相亲计也。而抑知民之为民,有不必上之代为计,而自无不相亲者。何也?则以其有伦也,则以其伦之所明,上

与下共之者也。我不禁念国学乡学之制而瞿然矣。

事不外天经地义之大，而为校为序为庠，合之学而初无异旨，则以知国子之尊，编氓之贱，无在非伦中人，即无在无伦中事也，盖其理同也。道不越民彝物则之经，而惟夏惟殷惟周，揆以学而亦有同心，则以知小子有造，成人有德，其克全乎为人者，其无愧乎尽伦者也，盖其情一也。于斯时也，适馔省醴教以孝，而父子之伦明；三老五更教以弟，而兄弟之伦明。上则鸾旗警众，小大从公；下亦鸠杖谈经，愚顽悉化。其秀而良者，不愧书孝书弟之典；其朴而愚者，克敦同父同姓之情。相古有夏若有殷若有周，三代醇风不是过也。起视其民，其犹有不亲者乎?其犹有不亲于下者乎?然后知感化之真情自在也。

闾阎之兄弟婚姻，万不敢拟天家之贵戚。而上明之则行苇方苞，下亲之亦莶萝克庇也。朝宁问安视膳，初何关愚贱之性情?乃一导以水原木本之思，而天良之勃发，已有观感于不自知者，则创制之精心，倍昭万古也。然后知肫诚之相召，甚神也。闾里之睦姻任恤，万不敢同王室之恩荣。而上明之则麟趾呈祥，下亲之亦羔羊献寿也。英主谊美恩明，初何与烝黎之观听?乃一动以琴瑟埙篪之谊，而太和之洋溢，有固结于不可解者，则和亲之雅化，自可再期也。惟其明于上也，所以亲于下也。岂不彬彬乎与三代同风也哉?

详细地了解建立学校的意义，百姓的亲密和睦就可马上达到了。学校有乡学和国学的不同，那都是为了阐明各种伦理道德的，有了这种伦理道德，就足以治理好社会的上上下下。这种伦理道德，上层人士明白了，下层百姓就会亲密和睦，肯定会是这样的。而且制度的留传，人们心里都明白。可是只有统括了古今的各种制度并使其一致，才能使贵贱融洽而都归向兴起教化的本原，寄托尊敬父母的品行也就是在受教化的人那里验证他们的性情。道德和谐一致风气相同，才知道古代的创建制度并使之流传下来，用来感化人心的地方极其深挚而切实。庠序校虽然各有其办学的宗旨，但无非都是为老百姓考虑的，是为百姓亲密团结考虑的。而且知道老百姓之所以为老百姓，也有不必让上层人士为他们考虑，而自己就亲密和睦的。为什

么呢?因为有了伦理道德,因为这种伦理道德所宣明的,在上层人士和下层百姓中都是接受的。我不禁想到国学乡学制度的益处而使我震惊了。

事情不外乎天地间的正理为最大,建立校序庠,总起来看学习目的上开始并没有不同,从而知道尊贵的公卿大夫的子弟和低贱的普通百姓,没有不在伦理道德中的人,也就没有不在伦理道德中的事,因为道理都是一样的。道理不过是人之常理和事物法则这些正理,对夏商周来说,揣摩它们办学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从而知道年轻人学习后可以有成就,成年人学习后可以有美德,使人们能够完善人格,不愧是模范遵守伦理道德的人,所以情理都是一样的。在这种风气形成的时候,酒饭安排适当来教给人们怎样孝敬老人,于是明白了父子间的正理;设置三老五更之职来教给人们怎样尊敬兄长,于是明白了兄弟间的正理。在上则天子作出榜样,使人们都正直无私;下层百姓中也有老人讲论经典大义,愚昧之人也受到感化。那些优秀的,无愧于记录孝悌的典制;那些愚笨的,也能使父子兄弟之情更加敦厚。看看古代的夏商周,三代风气非常朴实,超不过这些去。看看那时的人们,还有不相亲的吗?然后就知道感化的真情是自然存在的。

百姓中的婚姻嫁娶,绝不敢僭越而仿效皇亲贵戚。上层人士明白了伦理道德,就会像《诗经·行苇》中那样敦厚仁和,下层百姓明白了伦理道德,就会像《诗经·颍弁》中那样和睦互助。早晚探望父母,端饭送水,这在最初哪里关系到愚昧百姓的本性呢?但一教导他们要饮水思源不忘根本,就会良心大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而深受感染了,于是建立这种制度的良苦用心,更加显明于千秋万代了。然后就知道用诚实来互相号召鼓励是非常神奇的。百姓懂得了友爱亲人,讲求信用,救助穷人,就绝不敢等同王室的荣光。上层人士明白了伦理道德,就会像《诗经·麟之趾》中那样仁和宽厚;下层百姓明白了伦理道德,就会像《诗经·七月》中那样和睦相亲。英明的君主知礼义,爱士民,这在最初哪里与百姓的视听相关联呢?但一启发和谐融洽的道理,社会太平的风气就会到处洋溢,一定能团结起来而不可分开了,于是仁和亲睦的美好教化,自然会有希望实现了。只有这种伦理

道德在上层人士都明白了，就能使下层百姓和睦相亲。难道不就和夏商周的社会风尚同样隆盛了吗？

钱福昌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训俗所以致治，导河所以卫民，选士所以兴贤，诘戎所以讲武。是以《书》垂敷教之文，《诗》有翕河之颂，《礼》重书升之典，《易》占弧矢之威。遐稽典籍，灿焉备矣。伊古帝王御宇，德迈鸿轩，勋逾象纬，民情古而水性安，俊民章而戎律备。上凝帝眷，下答舆情，莫不本虔恭抑畏之心，为长治久安之策。用是防伪防情，教化浹焉；距海距川，委输顺焉；兴贤兴能，甄别严焉；教狝教狩，训练精焉。所由规矩二仪，甄陶万类，于以永受鸿名而诞膺多福者，胥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光泰宇，化协坤舆，巩丕基于永固，登郅治于大同。固已万民率化而四海安澜，三适有功而六军奋武矣。乃圣怀冲挹，蓟菲不遗，期至化之遐敷，察微言于在迩，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训俗、修防、造士、经武诸大端。如臣椯昧，奚足以仰赞夫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辰，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勉述夙昔之所诵习者，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而因精求夫兴化善俗之方，於变时雍之盛。此诚移风易俗之至意也。臣谨按，《虞书》敷教，俾民亲逊，虞廷所以致风动之休。至于《周礼》以三物教民，以八刑纠民，成周所以有太平之象。降而汉之兴也，置三老、孝弟常员，征拜美俗使者，亦于闾阎有所裨益。唐代以粟帛赐孝义高年，盖犹本养老之古意。至遣使观览风俗，用以励俗劝民，此即先王省方、观民设教之心。《王制》所谓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者，亦此意也。古者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刑，一道德以同俗。《坊记》数千百言，皆有以此坊民之语。盖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能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能节。故虽在至治之世，不必设禁暴之官，严齐民之律，而所为司化道于未发，严惩创于已萌者，奇邪有禁，保甲有稽。以云厚生则广沛恩施，而蠲免之恩溥

焉；以云正德则求臻上理，而劝惩之法详焉。于以致仁让之庥，杜奢侈之习，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尚何烦多设科条而致扰累，广颁文诰而徒饰外观哉？吕氏之有《乡约》，袁氏之有《世范》，其言虽至浅近，而由其道以实行之，狱讼衰息，邪慝不兴，雍雍乎三代之遗风也，而岂止一乡一邑之化乎！皇上礼陶乐淑，教泽涵濡，普天率土有不道德同而风俗齐哉！

制策又以黄河水道，自古迄今均有成法可稽，而欲使因时启闭，上合禹绩之隆。此尤治河以通漕之大要也。臣考河发源于昆仑山，汉张骞访之于葱岭，唐薛元鼎访之于闷磨黎山。宋程大昌云，黄河自龙门而来，达于秦晋，则谓之西河。其由底柱而来，达于豫冀，自古所谓河南之南河也，而又谓之北河。由豫冀而达衮、青、徐、扬诸州，则谓之东河，而亦谓之江南之南河。其由直隶之碣石而入于海者，乃北河之委也。其由江南而东北入于海者，乃南河之委也。此黄河之源委也。至济运之河，肇于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成，乃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前明因之，所谓以清刷黄者是也。古之善治河者，汉有王延世、王景，元有贾鲁，明有刘大夏，皆纪美于前史矣。他如水衡都尉，都水长丞，则治河之官也。《河防通议》、《河防一览》，则治河之书也。而河道之变迁，又因时而异。或自北而东，或日流于南。于此而欲宣防之得其宜，疏导之得其法，不诚有恃于蓄清以刷黄也哉？我皇上廑念民依，随宜浚治，行见河堤永固，而美利溥于无疆矣。

制策又以选贤任能，政之枢要，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贤能分任之，而因深思夫量能器使之方。此尤官人之要计也。臣惟选举之制，自古有然。唐虞之世，翼为明听，皆良弼也；稷契皋夔，皆圣人也。此所以各守一官而治隆三代与！降而成周，有书升论秀之典，有言扬事举之文，至矣备矣。汉制郡国取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其制诚为近古。至魏立九品官人之法，而论者遂有或损或难之讥。唐于制科之外，择人者尚有四事，则较汉魏而更详矣。崔祐甫荐举日除数十人，未逾年而除吏者八百员，此亦千古之盛事矣。专引知识则暱者易于私，止循资序则才者无自进，司马所以有举士之十科也。要之贤才登进，则治道昌明，盛世所由有用人而无弃

人与!皇上达聪明目,登明选公,凡束身名教者,敢不争自濯磨也哉?

制策又以自古治平,不忘武备,而因详求夫整军戢暴之规,训练边防之制。此尤讲武诘戎之大道也。臣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故《周礼》大司马之职,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阅。举所谓坐作进退之节,镯铙鼓铎之用,无不以时肄之。则兵之耳目,习闻夫金鼓,习见夫旗旃;当临阵之时,亦犹居恒训练之日矣。周制每乡卿一人,六乡六卿。平居无事,则各掌其政教禁令,属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则各帅其乡之一万二千五百人,属于大司马。所谓军将皆卿也。其立法之意亦甚善。汉制材官于郡国,有南军以卫宫城,有北军以卫京师,诚得居重驭轻、内外相制之道矣。唐时分天下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则二百六十一焉。宋有禁、厢、蕃、乡之目,天下之兵统于枢密,京师之兵统于三卫,制綦密矣。至于边防之要,训练之法,则若贾谊,若晁错,若赵充国,若陆贽诸人,著为条议。虽所论不同,而其见诸施行者,则亦有可采也。圣天子文德诞敷,武功奠定,西戎即叙,士卒知方。而营伍之间,简稽具有常经,以威不轨,以保太平,则诚制治保邦之要矣。

若此者:闾里淑其性情,水土勤其疏泄,贤才庆其升庸,遐迩钦其威武,卓哉煌煌!超千古而立隆者也。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懋日新不已之功,成悠久无疆之化。万邦和协,而犹重平章;四涘呈祥,而犹勤修筑。门辟征贤,弥重作人之化;军皆奋武,时申严肃之箴。握乾符,阐坤珍,事勤乎三五,功兼乎在昔,于以欢胪函夏,蔼洽熙春,则我国家亿万载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回答:臣下我听说训导风俗是为了达到社会安定,疏导河流是为了保护百姓,选拔士人是为了任用贤能,整顿军队是为了练兵习武。因此《尚书》流传了契作司徒施行教化的文句,《诗经》有河水归道合流的歌颂,《礼记》重视选用人才的制度,《易经》占卜了用弓箭威慑天下的爻辞。远考古代典籍,这些很都明确完备。古代帝王统治天下,品德超过帝鸿氏和黄帝,功勋胜过观天授历的帝尧,民性古朴,

河流顺畅,俊杰之人受到重用,军事法令严密完备。往上巩固住天帝的佑护,往下顺应民众意愿,都本着虔诚敬畏的思想,来制定长治久安的办法。因此防止虚伪任性,风俗教化就会周遍;水流直通河海,运输就会顺畅。选贤任能要严格甄别,秋练冬训要精锐熟练。制定天地间的各种法则,陶冶培育万物,以长保崇高的美名,多受福禄,都是凭借这些办法。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品德照耀苍天,教化与大地和谐,伟大的基业永远巩固,实现了天下大同的盛治。本来就万民相率感化,天下没有水患,臣僚举荐人才接连恰当有功,军队奋发用武了。但皇上谦虚自抑,不因葑菲根茎不良而连叶子也抛弃,希望最好的教化能远达于各地,明正地察询身旁臣子的言论,宣召我们到朝廷,策问训导风俗、修筑堤防、选用贤能、管理军队等大政方针。臣下我愚昧无知,哪里能帮助解决这些高深问题呢?但现在正是回答皇上策问的时候,恭敬地想到那向君王拜献建议,首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古义,哪敢不把从前所学尽力回答出来,以奉献管窥蠡测的一点儿忠诚啊!

跪拜敬读制策,上面说:人们生活充裕,因外物役使才改变了天性,因此要努力寻求一种施行教化、完善风气的方法,使之变得和善完美。这确实是改变社会风气的最好主张。臣下我恭敬地思考后认为,《虞书》施行教化,使人们和睦谦逊,因此帝舜时形成了君主一呼而百姓风起响应的好风气。《周礼》用六德、六行、六艺来教化百姓,对不孝、不睦等八种人施以刑罚来纠察百姓,因此西周有一种太平景象。后来汉代兴起,设置三老、孝悌的固定名额,征召美俗使者,这对于民间风气好转也有补益。唐代对有孝行节义者和老年人赐给粮食布帛,这就像古代一样是出于奉养老年人的考虑。至于派遣使者观察民俗人情,用来勉励民风好转,劝导百姓亲睦,这是先王巡视四方、观察民俗来施行教化的本意。《王制》所说的让太师采风献诗以观民情,命集市官员介绍物价贵贱来看百姓的好恶,也是这个意思。古时司徒制定婚丧祭祀等六种礼节来节制民性,明确父子、兄弟等七种教化来培养人们的美好品德,整顿饮食等八种制度来减少犯罪,统一道德行为来规范社会风气。《坊记》数千言,讲的都是如何防止百姓过

失的话。质朴是一种人性,人性非教化不能养成;人的欲望也是一种本性,本性非法令不能节制。所以即使在太平盛世,不必设置防止暴乱的官员,严申管理百姓的法令,而所做的也是在问题还未发生时进行教化引导,一旦出现苗头就严厉惩罚,谄媚欺诈要严格禁止,户籍编制要有案可查。说到使人民生活充裕,就应广施恩泽,免除徭役赋税的恩德就要周遍;说到端正德行,以求实现最完美的治理,劝勉和惩罚的法令就应详备,从而达到仁和谦让的美德,杜绝奢侈铺张的恶习,上下四方全国各地都是这种风气,哪里还用得着多设法令条文而招致牵累,到处发布文告命令而徒有虚名呢?吕大忠的《乡约》,袁采的《世范》,其言辞虽然浅近,但按着他们的办法实行开来,争讼减少直至杜绝,奸邪之人不再出现,这种和谐亲睦的局面正是三代时的遗风,哪里只是一乡一地的教化成效呢?皇上用礼法乐舞来陶冶百姓使之品行美好,教化滋润万物,整个天下还有不品行端正而风气一致的吗?

制策又鉴于黄河的治理自古至今都有现成的办法可以查考,想要因时开启或关闭闸门,建立像大禹治水那样的伟大功绩。这尤其是整修河道以通漕运的纲领啊!臣下我考察,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汉代张骞寻找到葱岭,唐代薛元鼎寻找到闷磨黎山。宋代程大昌说黄河从龙门而来,流到秦晋,叫做西河。另一支由底柱山而来,流到豫冀,就是自古所说的河南的南河,又叫做北河。由豫冀再流到兖州、青州、徐州、扬州的一段叫做东河,又叫做江南的南河。由直隶的碣石流入大海的一段是北河的下游,由江南折向东北流入大海的一段是南河的下游。这是黄河的来龙去脉。至于黄河的航运,开始于元代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凿成后,黄河水流入了淮河,明代仍是这样,所说的用清水冲刷黄沙即指此。古代善于治理黄河的人,汉代有王延世、王景,元代有贾鲁,明代有刘大夏,他们的功绩在前代的史书中都有记载。其他如水衡都尉、都水长丞,是治理黄河的官。《河防通议》、《河防一览》是治理黄河的书。而河道的变迁又因时而异。有时自北折向东流,有时又逐渐地折向南流。因此想要使泄洪防洪恰到好处,采用的疏导办法正确,不正是靠的蓄积清水以清除黄沙的办法吗?皇上殷切地为百

姓疾苦着想,根据实际情况来疏通治理,很快就能见到河堤永固,没有水患,从而造福于千秋万代了。

制策又因选用贤能之人是施政的中心,一个朝代的政事,一定要有一批贤能之人分别来料理,因此就认真地考虑量才使用的办法。这尤其是选拔官吏的大计。臣下我认为选拔举荐的制度自古就有。尧舜之时,辅助君主处理政事的人有完美的品德,都是良臣,后稷、契、皋陶、夔都是圣人。他们各司其职,才超过了三代时社会安定兴盛的局面啊!到了西周,有关于逐级选拔推荐贤能之人的制度,有因言论美好或道德高尚而受到举荐的记载,而且制度非常完备。汉代的制度是从郡国选拔士人,科目大体有三种,即贤良方正、孝廉和博士弟子,这种制度确实像上古一样。到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评论者于是就有了"八损"、"三难"这些讥讽。唐代在科举之外选用人才还有"身、言、书、判"四种办法,这比汉魏就更加详备了。崔祐甫一天就荐举而由朝廷任用了数十人,不到一年又任用了八百人,这也是千年以来的盛事。只引荐相识了解的人就会使亲近者滋生私心,只看资历地位就会使贤能者不得进用。因此司马光就提出了"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等选用人才的十种科目。总之贤才进用就政治清明,这是盛世能任用人才而不抛弃人才的原因。皇上耳聪目明,明白公正地选拔人才,凡是用名声和教化约束自己的人,怎能不争着磨练自己而有所作为呢?

制策又鉴于自古太平安定不忘军备,因而认真寻求一种整顿军队、禁止暴乱的办法和训练兵士、巩固边防的制度。这尤其是练兵习武、整顿军队的大计。臣下我认为,兵可百年不用,但不能一天不做好准备。所以《周礼》说大司马的职责是,仲春训练回师入城,仲夏训练野战宿营,仲秋练兵习武,仲冬阅兵。像坐下站起、前进后退的规则,镯铙鼓铎的使用,无不按时练习。这样兵士们整天听的是金鼓的声音,看的是旗帜的挥动;在打仗的时候,也会当作平时训练一样进退有序,奋勇争先。周代的制度,每乡设卿一人,六个乡有六个卿。平时不打仗,就各自掌管其政事,属于大司徒管辖。打仗的时候,就率领本乡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军队出征,属于大司马管辖。这就是所说的军队将领都由卿来担任。建立这种制度的想法也是很好的。汉代的

制度是在郡国设置材官这类地方部队,用南军守卫皇城,用北军守卫京城。这确实是掌握住关键而内外相互牵制的办法。唐代把全国分为十道,设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个,而在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个。宋代有禁军、厢军、蕃兵、乡兵等,全国军队都属枢密院管辖,京城的军队属于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管辖,制度非常严密。至于边防的要略,练兵的方法,就像贾谊、晁错、赵充国、陆贽等人在奏议中所条分缕析的那样。他们所说的虽有不同,但其中被付诸施行的,也有可供我们采纳的地方。圣明的天子广泛施行礼乐教化,战功已经建立,西部少数部族已经逐个进行了安抚,士兵遵纪守法。在军队里,检查考核都有一定的法度,来威慑谋叛之人,以长保社会太平,这确实是筹划治理、保国安邦的大要啊!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对民间百姓陶冶他们的性情,河水勤于疏导畅通,贤才庆幸能被任用,远近敬慕强大的兵威,高大辉煌光照天地,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功业啊!臣下我格外希望皇上安定了更求安定,太平了更求太平,勉励自己每日都加强德行修养而不断进步,建成亿万年的太平盛世。各地都风气和谐而更求平和修明,河流顺畅而更加勤于整治。选贤任能而更加重视教化培育人才,军队奋勇威严还时常严申整肃的告诫。和天地呈现的吉祥相一致,像三王五帝一样勤于政事,建立和古人一样的伟大功业,全国到处都欢欣鼓舞,亲睦和谐如温暖的春天,那么我们大清王朝亿万年的伟大功业,根基就在这里了。臣下我学问肤浅,属于刚要被进用的人,不知道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了极点。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

朱兰　会试卷三道

朱兰(生卒年不详)　字久香,号耐庵,浙江余姚人。道光九年(1829年)探花。后官内阁学士。爱好诗文,有《补读室诗文集》、《师友言行录》、《群籍撷闻》等。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申言浅近者之弊，而政体宜知所持矣。夫政贵乎达，亦贵乎成。彼欲速见小利者，又安望其政之达、大事之成哉？夫子所以特揭其弊耳。从来善为政者，令行而四达不悖，法立而一成不易。岂恃有异术哉？亦惟务其远者、大者而已。不规于远，无通之非窒也；不图其大，无张之非弛也。惟审量于缓急、取舍之间，而政始克祛其弊焉。无欲速，无见小利，何以知其当戒哉？夫政未有不求其达而要其成者也，即欲速见小利者，亦未始不求其达而要其成者也。

然而政之达也，要必先有涵养之气，气舒则其神弥永，而万事之轻重先后，各适其宜。人第见立纲陈纪，已治具之毕张，以为其达也，如是其速也。而岂知政之所以达，不在乎速，在乎不期速而速焉。政固有揆之于时而多所扞格，度之于势而未可变迁，陈之于上而不事更张，令之于下而犹有违咈者。虽欲奋发有为，而丛脞正宜自防矣。欲速则始以躁心，终以幸心，其气能动而不能静，而逐逐之欲，卒无以自遂也。吾见其挟事前之奢愿，并不能收事后之近功，越畔者荒矣，能克期而奏治平之策乎？商诚有鉴于政之不达，则且俟之期月，俟之数年，循而布之裕如耳。又何有急遽张皇之虑哉？

政之成也，要必先有扩充之识，识广则其量弥宏，而万物之常变经权能提其要。人第见德盛化神，已远犹之辰告，谓其成大事也，不弃小利也。而岂知政之所以成，不在乎利，在乎不言利而利焉。政固有金玉之生听之天地，衣食之富藏之闾阎，井疆之制受之前人，学校之规贻之后世者。虽欲纤悉无遗，而国体尤宜维持矣。见小利则累于褊心，中于贪心，其识能近而不能远，而煦煦之见，适足以自封也。吾见其智计不及之区，更多于智计所及之地。持筹者隘矣。能举念而跻明备之休乎？商诚有鉴于大事之不成，则举所谓五至，所谓三无，推而行之皆备耳。何至若欢虞苟且之为哉？商能去其弊，于从政乎何有？

指明见识浅薄者的弊害，施政的纲领大概就知道该怎样把握

了。施政贵在通达，也贵在能够取得成功。那些性急图快只顾小利的人，又怎能希望他施政通达，办成大事呢？孔子因此特意指出其弊害。历来善于处理政务的人，政令能够通达各地而不违反，法令一旦颁布就不能轻易改变。难道是靠什么特别的办法吗？只是致力于长远的利益、伟大的目标而已。不谋划长远，没有通达而不受到阻碍的；不谋划大事，没有紧张而不变为松弛的。只有仔细观察衡量轻重缓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政事才能去除弊害。可是没有图快，没有只顾小利，怎能知道应当戒除这种做法呢？政事没有不求通达和想取得成功的，即使是性急图快只顾小利的人，也没有不求通达而取得成功的。

然而政事的通达，主要是一定先修养性情，性情平和就会精神长存，各种事情的轻重缓急就安排得恰如其分了。人们只看到确立制度法纪，已经把治国措施全都张大开来，就认为要达到目的，就像这样快。可是哪里知道政事能够通达，不在于单纯求快，在于不求快而能很快达到目的。政事本来就会有这种情况，根据时势来揣度还常常格格不入，根据形势来考虑却又不能变通，向君王陈述意见就不能重新安排，向下发布命令但还有违背的。即使想奋发努力有所作为，但这些烦琐的事情正应该自己多加防备。性急图快就会从急躁的心情开始，而走向存有侥幸之心，其心气浮躁好动而不能平静，这种汲汲以求的急躁想法，最终还是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我看到这种人事先怀有不切实际的愿望，但并不能使事情很快成功。超过一定界限就会一事无成，还能期望建立政绩上报吗？子夏确实对政事不能通达有一个明确认识，那么暂且等待一整年，甚至等待几年，按照事理来安排办理，那就很从容了，又哪里还会产生急迫匆忙的想法呢？

政事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一定先有广大而充实的见识。见识广就会度量宏大，对万物的常规和变通、处理原则和灵活策略就能够抓住其纲要。人们只看到德泽教化的盛大美好，有了远大的谋略并按时告诫，就认为成就大事也不必丢弃小利。可是哪里知道政事所以能够办成，不在于求取眼前小利，在于不求小利而取得了利益。政事本来就有这种情况，金玉的生成，要听任天地的安排；衣食的富有，还在于储藏在民间；井田的制度，是从前人那里接受来的；办学的规

程,要传给后人。虽然想细小的方面也不丢弃,但国家的典章制度尤其应该维系起来。只顾小利就会被狭窄的心胸所牵累,从而走向贪得无厌,这种人的见识只看到眼前而不顾长远,而自得自满的见识,只能走向固步自封。我看到这种人智慧和考虑达不到的地方,远远超过他能想到的方面。这在筹划上就狭窄困顿了,还能心有想法而达到明晰完整的美好境地吗?子夏确实对没有成就大事有一个明确认识,那么就提倡志、诗、礼、乐、哀等思想行为的五种最高境界,提倡没声音的音乐,没形体的礼仪,没服制的丧事,实行并推广开来就一样不缺。哪里还至于只图欢乐而得过且过呢?子夏能去掉这些弊端,对于处理政事还有什么问题吗?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知别其等,百虑而一致焉。夫本达德以行达道,未有不藉于知者也。生知学知困知,虽其等不同,而知之所终极,岂有异哉?且天无不予人以达道,即无不予人以知。知也者,所以达此达道者也。惟大圣自能达天,其次则贤智有一间之未达,庸众只一间之能达。而由其所达,以至于无所不达。则天纵与人为,品量虽分,无异道也。

天下凡事有尽,而惟知无穷。内照之知,理与心融;外来之知,心由理入。见深见浅,有不可等量矣。天下凡事皆后,而惟知为先。不待教而知者,自然之知不见加;必待教而知者,当然之知不见损。先觉后觉,亦无庸歧视矣。人第见弗虑而无弗获,弗思而无弗通。谓是生而知之者,古今能有几人?人之知处乎劳,而彼独处乎逸;人之知得于困,而彼独得于创。惟其生不可阶,斯其知不可企耳。谓学而知之者,说诸心,研诸虑,知由人力,不关天授也。引而伸之,精粗皆备焉;触类而长之,左右逢原焉。以视生知之无事于学,已非一致矣。谓困而知之者,险而说,穷而通,知以困极而后能亨也。聪明所锢,师友提其耳焉;心思所阻,鬼神告于室焉。以视生知、学知,更难一例矣。

虽然,由未知之前以观,生知虽不废学,而知与生俱来;学知无歉于生,而知由学而进。彼困知者限于所生,更限于所学,几疑大造生

材，何厚何薄？则定其等而递及之，不能无彼此之分。由既知之后而论，生不可强而知，则尽人可能；知不可及而学，则尽人可几。彼困知者不负所学，即不负所生。则虽灵明所触，有速有迟。而要其终以统计之，更何有清浊之判？及其知之，一也。然则已进于知者，当更浚其知；未进于知者，亦求通于知。有真知而后可力行，人不重赖有知哉？

知识是分等级的，但各种思虑最后都能趋于一致。依据美好品德而行用美好大道，没有不借助于知识的。有人生下来就有知识，有人学习后才有知识，有人遇到困难经过学习才有知识，虽然等级不同，但最后都能有知识，哪里还有不同呢？况且上天把美好的大道都交与了人们，也就把知识交与了人们。知识就是用来通向这种美好大道的。只有杰出的圣人能够通于上天，其次是贤能聪慧的人，他们只有一点儿还不通达明白，老百姓则只明白一点儿。这样就能由这类通达，而发展到无所不通。那么上天的赋予与人力所为，等级虽然不同，但最后都是一样的。

天下事情都有尽头，只有知识是无穷的。生下来就有明白透彻的知识，道理和内心是融为一体的；学习得来的知识，思想随着道理而深入，有的深有的浅，是不会都一样的。天下事情都是后来发生的，只有知识是早就有的。不用学习就知道的，这种先天的知识并没有增加；学习之后才知道的，这种应当掌握的知识也没有减少。先行觉悟还是后行觉悟，也用不着两样看待。人们只看到没有思虑也就没有收获，不去思考也就不能通晓事理。说这种生下来就知道的，自古至今能有几人？别人的知识是从辛苦中得来的，而生下来就知道的人却用不着辛苦；别人的知识是遇到困难得来的，而他们是得自上天的赋予。只因出生是不能选择的，这种知识别人也就不敢企求了。说这种学习之后才知道的，要心里愉悦用心思考，知识是学习得来的，不是先天就有的。加以引申发挥，无论事理大小就都掌握了；触类旁通，就可以左右逢源了。把这种情况跟生下来就知道的对照一下，两者是不一样的。说遇到困难经过学习才知道的，有了艰险仍然感到喜悦，困顿了然后才能通达，这种知识是因为极其困苦而学习才通达

顺利的。听不清看不懂的，老师同学认真地给以讲解；想不明白的，就集中精神认真揣摩思考，鬼神受感动而前来告知。这跟生下来就知道和学习之后才知道的对照一下，是更不容易的一类了。

尽管这样，但从有知识以前来看，生下来就知道的人虽然也不废弃学习，可是他的知识是天生就有的。学习后才知道的人出生后并不缺少什么，但他的知识随着学习而长进。那些遇到困难经过学习才知道的人出生时就差了一等，再加上没有及时学习，这就更差了，几乎叫人怀疑天地造就人才，为什么厚此薄彼？但要确定等级，渐次往上升华，又不能没有这些分别。从有知识以后来看，出生时不能强加给他知识，那么就尽人所能；知识比不上别人，但可以抓紧学习，那么就尽人所学。那些遇到困难经过学习才知道的人没有辜负学习，也就是没有辜负一生。尽管灵性的启发，有快有慢，但从最终结果总起来看，哪里还有聪明愚笨之分呢？等到人们都知道了，就是一样的。然而已经有了知识的，应当再深入一步，还没有知识的，也应该去学习掌握。等到有了真知更加去努力实行，人们就不更加看重知识了吗？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明伦通乎乡国，上作而下应矣。夫乡国之学，昉自三代。命名有同异，而明伦则一也。小民之亲，岂外是哉？且古圣王之设教也，名有沿革，而实则相感孚。吾观王道之行于乡国，而知礼不下庶人之说，未可概论矣。中外无异旨，古今无异趋，贵贱无异性，未有礼教不行而风俗可以大醇也。庠序校既别其义矣，其义上下通行之，而其名则三代以来有辨异者焉，有统同者焉。

一代之神灵首出，皆欲肇锡嘉名，以振当时之聋聩。夏叙彝而有校，殷率典而有序，周陈常而有庠。乡学不仍其号，所为示更新于天下也。三王之文物同昭，皆欲立其标准，以范百世之神明。游东胶而学兼庠，诏瞽宗而学兼校，选泽宫而学兼序。国学统归于一，所为树

首善于京师也。是则名有同异，得毋疑教之亦有同异乎？而非也。今夫天地之性，人为贵；人道之大，伦为先。庠序学校之所以无异旨，三代之所以无异趋，而上与下之所以无异性者，恃有此明伦之教也。

先王患小民之无等也，于是有司徒以兴三物，有司马以论三升。而严其别嫌明微之制，使之尊卑无逾，内外无越，而人伦之合者，遂分乎不得不分，分斯明矣。为上者诚有鉴于三代之典型，而立极建中，首庶物以定其分，则风声渐被，其谁有犯齿犯贵之愆哉？先王患小民之离心也，于是诏髦士以《诗》、《书》，化胄子以羽籥。而导其中和孝友之天，使之小大相比，长幼相持，而人伦之分者，遂合乎不得不合，合斯亲矣。为上者诚有志于三代之忠厚，而敬宗收族，胥一世以联其情，则董劝多方，孰不念父在兄在之训哉？盖伦之所在，礼之所在也。上之德性以礼养之，而下之德性即以上之所自养者养之。夫是以礼教盛行而风俗醇美，虽谓三代至今存可也。

弄明白伦理道德并通行于乡里都城，上层社会实行了，下层百姓就会响应。乡学国学开始于夏商周三代。名称有异，但宣明伦理道德则是相同的。让普通老百姓亲睦团结，难道还能在这范围之外吗？古代圣明的君王施布教化，名称前后有沿袭和变革，但具体内容却是让人相互感染并信服。我看到先王之道实行于乡里都城，才知道礼不能在下层百姓中实行的说法，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中央和地方没有不同的意向，古今没有不同的旨趣，贵贱没有不同的性情，没有不实行礼教而能使风俗淳朴的。庠序校在义理上虽然有不同，但其义理都能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百姓中实行，而其名称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有辨别其区分的，也有统括其相同点的。

一个时代的神奇人物刚出现时，都想在开始时起个好名称，以使当时愚昧无知的人们振作起来。夏代为建立社会法则才开办了校，殷商为遵循先王制度才办起了序，周代为列举纲常才建起了庠。乡学没沿用原来的名称，为的是向天下人们显示一种新气象。三代君王的典章制度都很明白，都要树立一种典范，来规范后世的精神和思想。游历东胶即东学，大学就把庠包括在内了，受教诲于瞽宗即西

学，大学就把校包括在内了，选择泽官，大学就把序包括在内了。国学都是统归一处，因而在京城建立一个最高的国家学府。虽然名称有同有异，但恐怕会怀疑传授的内容也有同有异吧?不是这样的。天地间的本性，人是最尊贵的。社会的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伦理纲常占首要地位。庠序学校之所以目的相同，夏商周三代之所以旨趣相同，上层人士和下层百姓之所以性情相同，都是因为依仗有这种宣明伦理道德的教育。

先王忧虑百姓分不出等级，因此让司徒负责兴起六德、六行、六艺，让司马论定由秀士到选士，以至到俊士的选用。来严明那种辨清嫌疑和隐微之事的制度，使尊贵和卑贱有序，宫廷内外有别，人们的等级关系还没有分清的，于是就不得不分清了，这样就等级分明了。上层统治者确实借鉴了夏商周三代的常规，建立中正的法则，首先给万物安排了名分，那么就使好的风气渐渐流行开来，谁还会有违反等级序列的罪过啊!先王忧虑百姓用心不一，因此用《诗经》、《尚书》来训诫俊杰之士，用礼乐来教化贵族子弟。来训导他们中正平和孝悌友爱的天性，使之大小依序排列，长幼保持规矩，那么该分清伦理纲常的，于是就不得不相合了，这样就亲睦友爱了。上层统治者确实想努力实现夏商周三代时的忠厚风气，尊敬祖先团结族人，都使人们感情上密不可分，这样就会多方面地进行督察勉励，谁还能忘记尊奉父兄的告诫啊!所以哪里有了伦理道德，哪里就有了礼法。上层人士的品德性情用礼法来陶冶，下层百姓的品德性情就会像上层人士一样来陶冶培养。因此就会使礼教盛行，风气醇厚和美，即使说夏商周三代的风尚一直留传到今天，也是站得住脚的。

朱兰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正俗者，化民之本；浚川者，利运之方。兴贤致治，所以策群才；训练有经，所以修戎政。粤稽载籍，《易》著振民之象，《书》传敷土之谟，《礼》重升秀之文，《诗》重肤功之奏。英声茂实，洵崇闳之式也。自古帝王，寅承宝命，宣畅淳风，握天人协应之机，励内外交

修之实。以广教化，则治道恢焉；以利转输，则河防固焉；以兴贤能，则儒术重焉；以诘戎旅，则边陲安焉。锡民极而平成奏绩，饬士行而瀛宇畏威。所由规矩二仪，陶甄庶汇，保鸿名而膺介禧者，胥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符帱载，治轶勋华。固已荡平协彝训之仪型，浚导著随刊之丕烈，选举公而俊良聚，车徒饬而蒐苗修矣。乃圣怀冲挹，蓂荚不遗，既运钧而开模，复考言以询事，进臣等于廷，而策以端治化、顺水道、进髦士、饬戎行之至计。以臣占毕庸愚，何知体要？顾当广思周逮之时，窃附拜献先资之义，敢不敬述平昔所诵习者，用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兴化善俗，致治之本，而因思所以道一风同者。此诚容保无疆之至意也。臣闻虞廷教百姓亲逊，实本放勋劳来辅翼之旨，而致四方风动之休者也。《周礼》大司徒以三物教民，以八刑纠民，盖有教化而后有风俗，有风俗而后有人心。闻其教者，莫不争自濯磨，以相勉于士君子之行，而不忍自暴弃焉。夫风有刚柔，士有高下，而民气应之。《记》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是在因势而利导之，使有以进于淳古耳。是故以禁奇邪，而诳疑必尽泯；以严保甲，而奉行宜尽善。蠲贷普而民罔不厚生，诰诫谆而民罔不正德。治之以长吏，则乐防情而礼防伪，有以渐进于敦庞。董之以师儒，则贤得民而道得民，有以日生其观感。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三代之隆德礼修而政刑不废者，无非冀斯世共归于大中至正。如泥之在钧，金之在镕，惟甄者之所为，冶者之所铸也。汉置三老、孝弟常员，征拜美俗使者。唐赐孝义、高年粟帛，遣使观览风俗。非不欲劝民励俗，而未能跻于上理者，良由广颁文诰，徒饰观听，多设科条，易滋扰累耳。将欲使四海之内狱讼衰息，邪慝不兴，则惟在上者端本善则，而后能致时雍之化也。圣朝教泽涵濡，风俗淳古，敷天之下不已臻康乐和亲之治哉！

制策又以治河之道，疏防兼施，而遂及夫蓄清通漕之法。臣考《禹贡》一书，治水曰导而不曰防。然考《毛诗》、《尔雅》、《礼记》，皆有防之名，不得谓古无防川也。汉元光中，黄河之水注钜野，通于淮泗。武帝遂筑宣防，导之北行。厥后王景修渠筑堤，自汉迄唐而水不为

害,此与禹功偶合者也。乃自石晋开运年间,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皆受水害,水势自北而东,已非禹之故道矣。至宋元丰后,水势又日趋于南,而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而黄河之水由是注海。禹迹之不可复,时势然也。大抵治河之法,不与水争地,则于疏为宜。然而地利之沃饶,人民之富庶,不与水争地,地且为水所夺,则防之为宜。而其要,尤莫如蓄清以刷黄,蓄清尤以保护高家堰为急务。余阙、邱浚、潘季驯,皆善治河者也。成规具在,变而通之,推而行之,可耳。要未有执守一说、可泥古以通今者,况乎河治则漕可通。河之淤者浚之,河之激者分之,由是度地建坝,因时启闭,南北运道自无阻滞之患。夫岂若飞刍辇粟者之不可以经久哉?皇上廑怀转运,诰诫维殷,自见顺轨循流而漕艘益征迅速已。

制策又曰: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贤能分任之,而遂及夫历代选举之制,以求育才之实效。臣思简任为人君之权,荐举为大吏之职。自古圣贤治臻上理,未有不求贤以辅世长民者也。官人之制,本于唐虞三代。四岳举舜,汤聘伊尹,乃特选也。成周以来,乡学掌于乡老,而用之在大司徒;国学掌于大乐正,而用之在大司马。论定后官,位定后禄,八柄之驭于是乎在。汉兴始立大学,置博士弟子员。文帝诏举力田孝弟,武帝诏举贤良方正及茂才异等。一时经明行修,如董仲舒诸人辈出,最得古者造士之遗意。东汉以还,时行选举,文章不及西汉,而气节过之,是其化泽深也。《唐书·选举》法有四:曰身,曰言,曰书,曰判。四事皆可取,则完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盖得人之盛,莫详于兹。夫记诵词章,急功近名之学也;躬行孝弟,敦本崇实之功也。使为士者,皆如陈仲弓、王彦方之修德于乡,则虽有不类,望而知愧矣。为吏者如文翁之遣吏受经,招子弟入学,则儒与吏无异趋矣。要之课士之责,任之学臣;训士之方,责之教职。必以实行为先,则胡瑗教士之法具在,朱子白鹿洞之规犹存,举而行之,贤无不就范矣。皇上敷求俊彦,嘉惠士林,宇内之士咸知束身圭璧,猗欤盛哉!

制策又以训练之法,自昔所重,而因求所以绥边者。此又制治保邦之远模也。臣惟幅员既广,约束虽难,声教攸同,抚绥自易。自古善

治天下者，欲敷文教，先奋武卫。虞之三苗，殷之昆吾，周之猃狁，其彰著者也。自汉以来，边防之策若贾谊、晁错、赵充国、陆贽所建议，昭然简册，皆有可采。然而汉唐之通西域，不过羁縻勿绝，且非回极遐荒。况闭关谢绝，仅仅内完。安西、高昌，得而复失，未能永作边陲也。惟平定之世，悉举其男女结束、田园、宫室、城市而丕变之，道途无阻，饮食攸同。盖乾坤之仁无不覆载，日月之明无不照临，所以大一统之规而示无外之意，岂同驰骛兼并之为哉？皇上圣武布昭，德威远播，所由西戎即叙，咸归于统驭之神也。

若此者：敦其仁以型俗，懋乃绩以奠川，造士而聿振士风，偃武而不忘武备。蜚英腾誉，茂矩崇仪，粲然备矣。臣伏愿皇上，至诚无息，立政有恒。民气厚而弥切训箴，河流顺而益求利导。既明黜陟，犹殷简任之忱；已习止齐，更饬知方之训。案经校德，成袭六为七之宏规；稽古论功，跻咸五登三之盛治。由是休风四溢，协气旁流，经纬乾坤，荣镜宇宙，则我国家亿万载咸熙之庆，视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回答：臣下我听说纠正社会风气是教化百姓的根本，疏通河道是有利于漕运的办法。选拔贤能实现社会安定，目的是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教练兵士有法度，目的是整顿好军政。考查一下古代书籍，《易经》有振兴百姓美德的卦象，《尚书》传下了大禹治水的谋划，《礼记》重视优秀人才提拔选用的记载，《诗经》重视战功的歌颂。美好的名声，盛美的业绩，确实是伟大的法式啊。古代帝王敬承天命，大力提倡质朴的社会风气，掌握了上天人间协和相应的关键，劝勉内外交相治理的实效。广施教化，就会使强国富民的途径非常宽广；有利于运输，就会让河防稳固；更好地选贤任能，就会重视儒家学说；整顿军队，就会边境安定。给百姓制定中正的法则，河道治理已极有成效，整顿士人的操行，天下敬畏强大的兵威。制定天地间的各种法则，陶治培育万物，从而长保美名享受大福，都是因有这些办法。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品德与天地相符，治绩超过尧舜。本

来就使百姓在广大平和的王道上合于常道法则的规范，河水顺畅建立大禹治水一样的伟大功业，选拔任用公正无私而能聚集起杰出的人才，军队纪律严明而训练有素了。但皇上谦虚自抑，不因葑菲根茎不良而连叶子也抛弃。既造就万物，创立规范，又考查言辞，询问政事，宣召我们到朝廷，策问端正风俗教化、疏通黄河水道、选用俊杰之士和整顿军队的大计。臣下我既平庸又愚笨，哪里知道大体和纲要呢？但想到现在正是集思广益的时候，又想到附从那向君王拜献建议，首先谋划好个人建议的经典古义，哪敢不把往日学习的知识恭敬地回答出来，以奉献管窥蠡测的一点儿忠诚呢？

跪拜敬读制策，上面说：倡导一种好的社会风气，才是达到社会安定的根本，因而就考虑怎样使道德一致，风俗相同。这确实是永远容纳保护民众的最好主张。臣下我听说虞舜教导百姓亲睦谦逊，实源于帝尧帮助人们发扬美德，使之勤勉正直的义旨，从而形成一种君主一呼而百姓风起响应的大好局面。《周礼》大司徒用六德、六行、六艺来教化百姓，对不孝、不睦等八种人施以刑罚来纠察百姓，所以先施行教化然后才能形成社会风气，形成社会风气后才会赢得人心。接受了这种教化的人，都会争着磨练自己，用正人君子的言行来互相勉励，而不会自暴自弃的。风土有刚柔之分，士人品德有高下之别，百姓中的风气也是与此相应的。《礼记》说，修正教化而不改变当地风俗，整顿政治而不改变人们习惯之处。这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做法，使之有理由形成敦厚古朴的风气。所以防止邪恶行为，就会使欺诈和迷惑绝迹；加强保甲制度，人们就会很好地遵照执行。广泛地免除徭役租税就会使人民生活充裕，告诫教诲不倦就会使百姓品行端正。让有地位的官吏来管理百姓，就会用音乐防止情欲用礼法防止欺诈，而逐渐形成敦厚朴实的风气；让老师和儒者来劝勉人们，就会以贤德和道义团结起百姓，而每天都能出现新气象。用爵禄来培养人们的美德，用刑罚来威慑邪恶。夏商周三代品德伟大、礼仪端正而政令刑罚不废弃，无非是希望天下同归于中正之道。就像泥坯放在陶轮上，金属浇铸在模型里，只听凭陶工的处理，铁匠的铸造。汉代设置三老、孝悌的固定名额，征召美俗使者。唐代对有节行孝义者和

老年人赐给粮食布帛，派出使者观察民俗人情。并不是不想劝勉百姓振奋民风，但那些未能达到最高治理状态的，的确是由于过多地发布文告命令而徒有虚名，过多地设立法令条规招致牵累啊！想要使天下争讼减少直到杜绝，奸邪之人不再出现，只能是居于高位的人端正自己改善法度，然后就能实现和美太平的化导了。我朝恩德教化滋润万物，风俗敦厚古朴，普天之下已经达到安乐亲睦的太平社会了。

制策又鉴于治河的办法，要疏导和筑堤并用，于是又涉及到蓄积河水以利漕运的办法。臣下我考查过《禹贡》这本书，只说治河要疏导而不说筑堤。可是又考查了《毛诗》、《尔雅》和《礼记》，它们都说过筑堤，可见不能说古代就没有筑堤拦水了。汉代元光年间，黄河水流入钜野，沟通了淮水泗水。汉武帝时于是修建宣防宫，使水向北流去。后来王景修渠筑堤，从汉代到唐代黄河不再为害，这与大禹治水正好相合。从后晋开运年间，汴州、曹州、濮州、单州、郓州都被河水淹没，河水从此又由北折向东流，已经不是大禹时的旧河道了。到了宋代元丰以后，黄河又逐渐向南流，到了中牟汇合了汴水，到了徐州汇合了泗水，到了清口汇合了淮水，黄河从这里流入了大海。大禹时的河道无法恢复了，这是时代和形势造成的。大概治河的办法是不与水争地，疏导比较合适。然而土地肥沃富饶，百姓因此富裕，即使不与水争地，土地还有会被水淹没的，于是筑堤防水比较合适。治河的要旨，最好是蓄积清水来冲刷黄沙，蓄积清水以保护高家堰为当务之急。余阙、邱浚、潘季驯，他们都是擅长治河的人。已经形成的治河办法都摆在那里，加以变通实行就可以了。总之没有死守一种办法，又拘泥于古代成规而能适用于现在的。何况河道治理好了就可以通漕运。河道淤塞的地方就进行疏浚，河流迅疾就进行分流，由此寻找合适的地方修建大坝，按时开闭闸门，船只南来北往就会畅通无阻，难道粮草运输还能不长年进行吗？皇上殷切地挂念着航运，多次殷切告诫，一定能使河流顺畅，航行运输更加迅速了。

制策又说：一个朝代的政事，一定要有一批贤能之士分别来料理，于是就又谈到历代选拔举荐人才的制度，谋求取得培养人才的实效。臣下我想选拔任用是皇上的权衡范围，推荐人才是大臣的职责，

自古圣人治国达到最佳状态，没有不征求贤能之士来辅佐政权管理百姓的。任用官吏的制度，开始于尧舜时代。四岳向尧举荐舜，商汤聘用伊尹，这些都是特别的选用。西周以来，乡学由乡老掌管，但征用人才属于大司徒；国学由大乐正掌管，但征用人才属于大司马。经过辩论考核才授以官职，爵位确定后才发给俸禄，驾驭臣下的爵位、俸禄等八种手段于是就确立了。汉代才开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官，令郡国选送年幼者来学习。汉文帝下令举荐努力耕作的人和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人，汉武帝下令举荐正直有德行的人和特异出众的人。使得当时经术得到修明，人们品行美好，出现了像董仲舒等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最符合古代选拔人才的本意。东汉以来，经常实行选拔举用贤能的制度，这时礼乐文教不如西汉，但志气和节操超过了西汉，这是因为加强了教化并广施恩泽。《唐书·选举志》记载选用贤能的标准有四种。即体貌高大端正、有口才、书法刚劲优美，会写判决书。四者之中都有可取的，再看品德和行为的完美程度。品德一样再看才能，才能一样再看功绩，合格者留任中央，不合格者发往外地。所以能得到人才没有比这时更周备的了。默记背诵诗文，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问；努力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是一种不忘根本、崇尚求实的功效。应该使士人都像陈仲弓、王彦方那样去完善自己的德行，那么即使有德行不好的人，也会看到他们而自知惭愧了。也应使官吏都像文翁那样开办官学派人传授经义，招收年轻人入学，那么儒者和官吏就没有不同的归宿了。总之考核士人，责任在学官；训导士人，责任在教师。一定要把实际践行放在第一位，那么胡瑗教导士人的办法摆在那里，朱熹《白鹿洞学规》仍然存在，能全面实行开来，贤能之人就都自觉受约束了。皇上广求俊杰之人，恩惠优待知识界，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约束自己完善品行。真是光明盛大啊！

制策又鉴于练兵之法，自古就非常重视，因而想寻求一种安定边疆的办法。这又是筹划治理、保家卫国的长远谋略。臣下我认为疆域广阔，管理有一定难度；但声威和教化使各地归于一致，安抚边防也就不难了。自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想广施文德教化，一定先振作军队。虞舜伐三苗，商汤伐昆吾，周代伐猃狁，都是显著的例证。自汉代

以后，安定边疆的办法像贾谊、晁错、赵充国、陆贽等人提的建议，明白地记载于史书上，都有可以采纳的地方。然而汉代唐代出使西域，不过是一直笼络，没能成为本朝极远的地方。何况东汉光武帝紧闭玉门关，谢绝西域入贡，只不过内地完整。唐朝时安西、高昌两地得而复失，就没有能够保住这两块边疆之地。只有在太平之世，全都把当地百姓的装束、田园、房屋、城镇大大改变面貌，道路通畅，风俗相同。天下仁政无处不达，像日月一样光明温暖的恩泽无处不到，这才是用来昭示天下大一统的标准而没有不归统辖的大义，哪里和使者来回奔、暂时兼并的举措相同呢？皇上圣明英武昭示于天下，美德和威望传得很远，于是西部少数部族已经逐个进行了安抚，都归到皇朝的统治之下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劝勉百姓仁爱来端正风俗，扩大使河水不再泛滥的伟大功绩，士人学而有成更能振奋风气，停止战争但不能放弃战备。英名飞扬远播，法度美好威仪盛大，光明灿烂一应齐备了。臣下我希望皇上，真实无妄永远进取，推行政事有恒心。民风敦厚更要加强训导和告诫，河流顺畅还更勤于疏导。明正地进行选拔罢免还更注意任用时的诚意，练兵习武更严申知道目标的训诫。依照经典对比仁德，成为继承六经而为第七经的伟大典范；稽考古代评定功劳，达到和五帝三王一样的盛世。由此和美融洽的风气到处传布，规划治理天下，光辉照耀宇宙，我们大清王朝亿万年的兴盛事业，就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学问肤浅，属于刚要被进用的人，不知道忌讳，触犯了皇上的威严，发抖跌倒，简直恐惧到了极点。臣下我恭敬地对答如上。〔李彦循译〕

清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君使臣以礼。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殿试策问

[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缵膺大宝,统御寰区,中外乂安,于兹十有二载。仰荷昊苍眷佑,列圣垂庥,敕命时几,兢兢业业。深念亮功熙绩之道,去奢崇俭之模,厚生藏富之规,布宪颁条之要,期臻上理,延访维殷。尔多士拜献先资,对扬伊始,冀聆谠论,式赞嘉猷。

唐虞官人,申言载采,成周分职,重戒惟勤。《官礼》所载八法八成,六叙六计,所以治官府、正群吏者,至详且备。能晰言之欤?汉史言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有合于董正治官之旨。然上求实效而下务虚名,以拘守绳墨为慎,以奉行条律为勤。励翼之谓何?其遂称庶官无旷欤?夫询在事,考在言,而宅俊之克知灼见者则在心。任职之吏,岂徒以奉令承教为贤欤?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帝王之盛轨也。上以诚待下,则下当以诚事上。朕权衡黜陟,一秉至公。内外大小臣工,宜何如敬慎法廉,实心任事,以克副厘工熙绩、澄叙官方之意欤?

尚俭者,开福之原。尧不以土阶为陋,而舜怵戒于涂槚,禹卑宫,文王卑服,尚已。嗣是衣从弋绨、贡罢缣纶,往迹流传,其俭德不犹可溯欤?去奢去泰,上下所同。古大臣励《羔羊》素丝之操。如赵抃守成都,一琴一鹤;程炎令盐城,一马一仆。其高节清标,非臣下所当矜式欤?夫镂簋朱绂,玉缨琼弁,自昔所讥。乃积习相沿,敝化奢丽,以致

不能养廉。将何以重诫风愆，儆于有位欤？《蟋蟀》、《山枢》，民风近古，今则闾阎不免逾礼。将何以挽其浇漓，俾还淳而返朴欤？朕躬行节俭，为天下先，时以绌华崇实之意训迪臣民。何由而使风气日臻醇茂欤？

积贮者，生民之大命。仓人、遗人之法，具在《周官》。汉耿寿昌设常平仓，增价减价，因时以济民之缓急，意非不善。然出入在官，易滋流弊。若社仓、义仓二者，系民间自为经理。不更有以辅常平之不及欤？义仓起于隋长孙平，当社立仓，丰则取之，歉则散之。社仓行于宋朱子，夏贷冬偿，主守则属于乡之行义，收敛则请于郡之长官。二者岂非久远之利欤？乃日久弊生，仓正不无偷卖，州县不无那移，胥吏不无侵蚀，甚至日就亏缺，仅剩空廒。将何以整顿旧规，使良法及时兴复欤？夫仓以社、义为名，宜听小民输纳。苟州县有抑勒侵那诸弊，而大吏不加惩办，无以肃吏治，又何以厚民生欤？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周礼》官法治要，官成治凡。纲举目张，无一切苛碎繁重之政，粲然明白，庶事所由康欤？《系辞》言：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盖本显明之理，以立要约之法，则人皆易知而易从。汉代萧规曹随，较若画一，犹得行简临民遗意。嗣后簿书日积，科条日增，庶司顾虑既深，救过不暇。将何以折衷一是，裁定明文，俾吏胥无从高下欤？夫徒法不能以自行，一弊未除一弊已伏。如经徵考成过严，则缘垫欠而适成亏帑；承缉处分太重，则因讳饰而转致养奸。科指猥多，册籍重复，苟非汰其丛杂，归于简明，何由蠲涤烦苛以昭示法守欤？

凡厥四端：董迪以肃官治，敦朴以开化原，积贮以阜民生，简核以防吏蠹，皆立政之大纲、经邦之要道也。多士学于古训，通知时事，以敷奏为明试，务收实用，毋摭肤辞。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国君使用臣下要依照“礼”。

不愿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也不要施加给别人。

乐意上天安排的人能够保住天下,敬畏上天的人能够保住他的国家。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承皇位,统治天下,中外太平无事,到现在已经有十二年了。上承苍天保佑和列祖列宗荫庇,谨慎对待天命,时刻保持警惕,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十分留意辅助天工、振兴政事的策略,去掉奢侈和崇尚节俭的办法,使百姓丰衣足食以及国家储藏丰富的规划,公布法令和颁发法规的要点,期望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延访人才的心情十分殷切。请各位文士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对答,希望能听到你们正直的言论,以佐助皇帝我制定出完美的治国方略。

唐尧和虞舜任用官员时申明要举出事例做验证,周朝任命官员时很注重官员的勤奋。《周礼》所记载的"八法八成"和"六叙六计",是用来整治官府和整顿官吏的,非常详细而且十分完备。你们能够将它清楚地说出来吗?汉朝的史书说当时综合考核名与实,结果官吏都能称职。这符合加强督导、治理百官的主旨。然而,上面要求实效,但下面却只看重虚名,把拘守法度当作谨慎,把奉行条规当作勤奋。这样《尚书·皋陶谟》所说的"努力辅佐"又是什么意思了呢?这难道就能叫做百官尽职尽责了吗?咨询在事情,考察在言行,而安排官员的真知灼见则在心里。任职的官吏岂能只把奉行命令、领受训示当作贤明呢?任用贤人不要有二心,除去奸邪不要有疑虑,这是帝王的最高法则。上面的人用诚心对待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就应当用诚心来侍奉上面的人。皇帝我衡量和升降官员,完全是公正无私的。内外大小臣子应当如何敬重谨慎、廉洁守法、真心实意地办事,以符合让百官负起责任、办好事情、澄清吏治的意思呢?

崇尚节俭是开启福运的本原。唐尧不认为士阶简陋,而虞舜保持警惕,不肯用油漆的器物,大禹不愿修建豪华宫殿,周文王不肯穿

豪华的服装，这些都是十分久远的事情了。在这之后，君主衣服用黑色的厚粗布做成，停止地方交纳精细的丝绢贡品。往事流传，这种俭朴的品德不是仍然可以追忆吗？去掉奢侈，去除享乐，是上下共同的心愿。古代的大臣用《诗经·召南·羔羊》所称颂的"素丝"那种俭朴的情操来勉励自己。如北宋的赵抃知成都府时，只有一琴一鹤相随；明代的程烨任盐城县令时，只有一马一仆相伴。他们的高节清标，做臣下的是不是应当仿效呢？享用精美的食具、红色的冠带、玉制的缨饰、豪华的帽子，自古以来都是受到人们讥讽的；然而积习相沿，人们越来越讲究奢侈华丽，以致不能养成清廉的风气，应该用什么办法来有力地制止这不良的风气，使官员能有所畏惧呢？在《诗经》的《蟋蟀》、《山有枢》中，可以看到民风的质朴；可如今，民间却不免超过了礼仪的规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挽救这种浅薄的风气，使其回归淳朴呢？皇帝我带头实行节俭，为天下作表率，时常用去除奢华崇尚朴实的意思来训导和启迪臣民，怎么才能使风气一天天达到醇厚美好呢？

粮食的积贮，是关系到百姓性命的大事。仓人、遗人的制度，都记载在《周礼》中。汉朝的耿寿昌设立常平仓，增价减价，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解救民众的危急；他的用意不是不好，但由于粮食的出入由官方掌握，因此容易滋生流弊。至于社仓、义仓，因这两种形式都是由民间自行经办的，所以不是更能弥补常平仓功能的不足吗？义仓是从隋代的长孙平开始创立的。在本社建立仓库，丰年就储积粮食，荒年就发放粮食。社仓是由宋代的朱子所推行的。夏季借出，冬季偿还，主管权则属于乡里有德行的人，收储和发放则向州郡的长官请示。由此可见，社仓、义仓难道不是具有久远的好处吗？然而，日子久了也会生出弊端，仓正偷卖粮食现象不是没有，州县挪用粮食的情况不是没有，胥吏贪污粮食的事情不是没有，甚至一天天亏缺，仅仅只剩下了空仓。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整顿旧规，使好的办法能及时振兴社仓、义仓呢？仓库用社、义作为名字，应当听任小民自愿交纳；假如州县有强行摊派、侵占挪用等弊端，而省级长官不加惩办，就不能整肃吏治，那么又怎么能使民众生活富足呢？

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能从根本上使天下太平、杜绝邪恶。《周礼》说：百官办事的法度，用来治理关键的大事；按文书簿册考核官府的政绩，用来治理一般的事务。这样，就能做到纲举目张，不再有那些苛刻繁琐的法令，使法令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各种事务不就能很好地完成了吗？《周易·系辞》说："阴阳变化简单，但却能把握天下的道理。"因为本着显明的道理来制定简要的法令，那么人人都容易理解，也容易照办。如像汉代的"萧规曹随"，两相比较，好像就是一样，确实还保留了简化法令的办法来管理民众的意思。在这以后，由于簿籍文书日益堆积，法令条目日益增多，因而各有关部门已经是顾虑重重，来不及补救过失了。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折衷出一个统一的意见，裁定明确的法律条文，使办事的官吏无法在法律条文上做手脚呢？光是法令摆在那里，不能够自动就发挥作用，一种弊端还没有除去，而另一种弊端就又已经酿成了。例如，赋税征收和考核指标过于严厉，那就会因有关人员暗中填补拖欠而正好造成财政亏欠；搜捕犯人，因没有搜捕到而受到的处分太重，那就会因有关人员说谎掩饰，结果反而导致奸邪消遥法外。科目繁多、册籍重复，如果不删除冗杂使其回归到简明，又怎能蠲涤烦苛、以昭示法纪呢？

总之这四个方面：督察官员以整肃吏治，敦促俭朴以开启教化的根本，积贮粮食以使民众生活富足，简化考核以防止官吏舞弊，都是建立政纪的大纲、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各位贡士学习古代的训条，通晓时事，要把奏呈建议当成是验核实绩，一定要收到实际用途，不要使用肤浅的言辞。皇帝我将亲自阅览你们的答卷。

吴钟骏　殿试对策

吴钟骏（生卒年不详）　字崧甫，江苏吴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状元。后任福建、湖南乡试考官。道光十七年，以修撰出任福建学政。道光二十三年，以内阁学士出任浙江学政。次年，升任礼部右侍郎。道光二十七年，充殿试读卷官。道光二十九年，转礼部左侍郎。咸丰二年(1852)，再度出任浙江学政，旋即调任福建学政。次年

八月，因病免职。

臣对：臣闻课绩者，任官之法；崇实者，化俗之原；藏富者，裕国之猷；行简者，临民之本。综稽往籍，《礼》著官常，《传》称俭德，《诗》有崇墉之颂，《书》详慎宪之文。自古帝王，斟元御宇，握镜临宸。以辨廉能，则貊庭无诮也；以敦淳朴，则鹿裘可风也；以谋贮畜，则鱼旅占丰也；以涤烦苛，则蠹胥不扰也。懿纲酌化，侯其祎而。用是官箴饬而纪纲肃其型，主德清而茅茨昭其朴，天庾盈而坻京储其备，吏治简而官府考其成。所由荣镜宇宙、经纬乾坤、固万叶而为量者，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治亮天功，懋昭大德，溥乐利于闾阎，颂清和于易简。固已百职具修而兆人永赖，三年有备而庶事惟康矣。乃圣怀冲挹，深维长治久安之计，弥切持盈保泰之思，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考绩、崇俭、积贮、立政诸大端。臣占毕庸愚，奚足以知体要？顾幸际广思周逮之时，敬绎夫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平昔所诵习者，用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唐虞官人，首言载采，成周分职，重戒惟勤，而因推本于任贤去邪之方。此诚澄叙官方之至意也。臣谨案：《虞书》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尚书大传》以为积善至于明五福，以类升，故陟之；积不善至于幽六极，以类降，故黜之。九载而三考者，法天数也。《周官》太宰之职，以八法治官府。小宰之职，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以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条分目析，粲然具备。而又曰有成，月有要，岁有会，三岁有大计，随时而考课之，法綦密矣。汉以六条察二千石，其考课之次第：令长于岁终计户口钱谷之数上之郡国，是郡国得课令长也；郡守课于刺史，刺史课于御史、丞相，丞相上之天子，而赏罚乃行。循名责实，诚有合于董正治官之旨。如以拘守绳墨为慎，以奉行条例为勤，岂所称庶明励翼之意欤？夫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惟在官者敬慎法廉，实心任事，以上实求，下非名应，庶乎小大之臣咸怀忠良，鹓梁无彼已之讥，驺虞有备官之乐，济济多士，交相勖于靖共尔位也。皇上整饬官常，删除冗滥，洵乎教清于云官，治穆乎鸟纪也矣。

制策又以尚俭者开福之原,而思所以挽其浇漓,俾之臻于醇茂。此尤慎乃俭德之至计也。臣谨考《子华子》曰:尧不以土阶为陋,而舜怵戒于涂槉。仰见勋华之圣,躬行节俭,昭示来世,诚不欲以逸欲教有邦也。嗣是而大禹卑宫,文王卑服章矣。三代而下,汉文犹为近古。《汉书·扬雄传》称绨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盖承秦敝之后而返斯民于敦庞之治,皆汉文之俭所致云。厥后哲王亦知恭己,翟裘则焚,筒布斯毁,素木卑构,陶匏允御,其俭德不可想欤?夫风化之行,自上及下。昔紫衣贱服,齐桓犹变其风;长缨玩好,邹君且移其俗。诚得节俭正直之臣,如赵抃之守成都,程炳之令盐城,宣化承流,图匮于丰,防俭于逸,化其逾礼之习,俾成比户可封之俗,安见民敦工朴、商悫女憧之风,不再见于今?而镂簋朱纮、琼弁玉缨之侈,不返而为浣衣濯冠、豚肩不掩之朴也?管子曰:奸邪生于匮不足,匮不足生于侈,侈生于无度。是知奢俭之分,正风俗之原也。圣天子体唐成俭,踵虞为朴。游其宇者,孰不勉于淳质之化哉!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而因详及夫三仓之利弊。臣考《周官》遗人掌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仓人掌谷入之藏,廪人掌九谷之数,旅师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闲粟,均所以备豫不虞而待平颁也。李悝曰:谷贱则伤农,谷贵则伤民。权其轻重,宜设仓以贮之。此常平所由立也。厥后耿寿昌行之于汉,民以为便。隋长孙平复设义仓,唐踵而行之。宋常平、义仓并设,而常平为重。朱子借常平之粟立社仓,有社长一人稽其出入。行之三年,民以饶裕。夫常平、义仓、社仓三者,行之各有成效,而其久均不能无弊。如常平之贮在官也,或上下相蒙,只视为肥身之计。义仓之蠲在民而贮在官也,或吏胥得伺缓急以行其私。社仓之贮在民也,视诸仓为较便,然社长不得其人,则侵渔科派,以千家之粟,利一人之谋,弊亦犹之二仓也。要之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诚使在官者以爱民为念,为民者以体上为心,采买之法则如陈尧佐之增价,发粜之法则如赵抃之减价。而且胥吏有察,不至于作奸;市廛有稽,不至于囤积。乐岁有以储之于先,歉岁有以筹之于后。斯经画之宜,于此克尽耳。皇上轸念民依,思艰图易,所以为百姓谋生聚者,至深且远矣。

制策又以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因思蠲涤烦苛以昭示法守。诚立政之大纲也。臣惟《周礼》官法治要，官成治凡，纲举目张，昭然大备。在上者无丛脞之虞，在下者无繁重之苦。是操何道而致此哉？《大戴礼》引《易》曰：正其本，万物理。盖握其至简之理，以为宰制之本。斯刀笔筐箧之琐，不足以动其耳目；簿书钱谷之繁，不足以扰其心虑。昔萧、曹为相，有觏若画一之歌。盖汉承秦之敝，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其解苛除娆，与民休息，深有得于出政之宜。史氏所谓治尚黄老者，殆谓此也。夫徒法不能自行，而防弊即以滋弊。如经徵之考成过严，则缘垫欠而适成亏帑；承缉之处分太重，则因讳饰而转致养奸。大抵科条愈备，则诈伪愈多。吏胥之舞文，即长吏亦有所不及觉者，法太繁故也。《系辞》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谅哉！圣朝澄清吏治，剔弊厘奸，凡百臣工，孰不砥砺以期有为也哉！

若此者：厘工以熙绩，去奢以黜华，足国以保民，除烦以度事，洋洋乎畅皇风而熙帝载，洵亘古而立隆也。臣尤伏愿皇上，至诚无息，立政有恒。综核已精而弥殷考察，封靡已戒而愈凛俭恭；囷仓已裕而倍切盖藏，政务已清而益期简约。班联之序肃焉，撙节之风厚焉，储蓄之资充焉，清净之理成焉。猗欤茂哉！上咸五，下登三，同风八宇，均禧九垓。用是缉熙帝图，润色皇猷，民气合于卢牟，邦本巩于磐石。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考核政绩是任用官员的方法，崇尚朴实是改变风俗的本原，储藏丰富是国家富裕的谋略，政令简易是管理民众的根本。综合考察过去的史籍，《周礼》写明了居官的职责，《左传》称颂了俭朴的品德，《诗经》有颂扬粮食丰收、堆积如城墙的诗篇，《尚书》有慎守法度的详细文字记载。自古以来的帝王，斟酌初始，统治天下，心怀明镜而登临王位。他们辨明廉洁与贤能，就能使《诗经·伐檀》所讽刺的白拿俸禄现象绝迹；他们敦劝淳朴，就能使《礼记·檀弓》所记载的丧葬用鹿裘的古代俭朴风俗风行社会；他们谋划储蓄，

就能使《诗经·无羊》中的旐旗众多、蝗虫变成鱼的丰收梦想变为现实；他们消除烦苛，就能使贪官污吏不能危害民众。完美的纪纲、隆盛的教化，已经十分完美了。因此能使官员的纪律得到整饬；能使《诗经·羔羊》中古代官员的俭朴形象得以重新树立；能使君主品德完美，唐尧居住茅屋的俭朴之风得以再现；能使国家的仓库储备丰足，粮食堆积如山；能使吏治简明，政府能定期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之所以能达到光耀宇宙、整顿乾坤、使江山万世稳固的境界，靠的就是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治理辅助天工，品德格外高尚，使民间普遍享受到了快乐和福利，使清和之风在简明的政令中得以传扬。固然已经是百官尽职尽责而亿万人有了永久的依靠，国家九年中有了三年的储备而百业兴旺了。但皇上却十分谦虚，一心考虑着长治久安的大计，持盈保泰之心更加殷切，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考核政绩、崇尚俭朴、积贮粮食、建立法规等大政来策试我们。臣下我只会背诵书本，平庸而愚笨，哪能知道国家大政的要领呢？然而臣下我有幸遇到了广泛发表意见的时机，恭敬地牢记《尚书·尧典》所说的让大家都陈述政务的教诲，怎敢不努力陈述平日所诵读和学习的东西，以效法土壤和细流对于高山和大海的一点帮助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认为唐虞时期任用官员，首先提到的就是举出事例做验证；周朝任用官员，强调的就是勤奋；从而从本原上去推导任用贤人和去除奸邪的原则。这确实是澄清吏治的强烈愿望。臣下我细致查考，《虞书》说：三年考核官吏政绩，三次考核决定升降善恶。《尚书大传》认为积善达到了长寿、富足、康宁、美德、善终这五福的，应按规定提升，所以提拔他们；积不善达到了早死、疾病、忧愁、贫穷、邪恶、懦弱这六极的，应按规定降级，所以贬黜他们。九年进行三次考核，效法的是一年十二个月。《周礼》说太宰的职责是按照"八法"来治理官府；小宰的职责是按照官府的"六叙"来管理下级官员，按照官府的"八成"来管理国家事务，按照官府的"六计"来考核下级官员的政绩。分列条目，明明白白，全都具备。而且，每日有小考，每月有中考，每年有会考，三年有大考，随时考核官员，法规十分严密。

汉朝用"六条"考察太守,其考核的次序是:县令和县长在每年年末统计户口钱谷的数目上报给郡国,这样,郡国就能考核县令和县长;郡守由刺史考核,刺史由御史大夫、丞相考核,丞相上报给天子,随后实行赏罚,循名责实,确实是符合《尚书·周官》的"督察和纠正负责官员"主旨的。如若把死守规矩当作谨慎,把奉行条例当作勤奋,那还能谈得上是明白了《尚书·皋陶谟》所说的"努力辅佐"的意思了吗?老实的官吏,朴实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只有当官的人对守法和廉洁保持敬慎的态度,实心办事,上级用求实来要求下级,下级不弄虚作假来应付上级,这样才能使小大臣子都心怀忠良,使《诗经·候人》中借用鹈鹕来讥讽的对象不再出现,使《诗经·驺虞》中赞美的人才能被选用;众多的人才,相互勉励,认真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皇上整饬官员的纪纲,删除冗滥,确实是教化已经达到了黄帝时代的清明,政治已经达到了少昊时代的完美。

制策又认为崇尚节俭是开启福运的本原,从而想要用它来挽救世风的浮薄,使其达到醇美。这尤其是贯彻"谨慎对待你们的俭朴品德"的最好计划。臣下我恭敬地考查,《子华子》说:唐尧不认为土阶是简陋的,虞舜保持警惕,不肯用油漆的器物。仰见唐尧和虞舜这两位圣人,亲身实行节俭,为后世作出榜样,他们的确是不愿意让安逸和贪欲来败坏国家。在这之后,大禹不愿修建豪华宫殿、周文王不肯穿豪华的服装。三代以下,汉文帝仍然保持了质朴的作风。《汉书·扬雄传》说粗绨衣服不认为破旧,不穿皮鞋,不住大厦,木器上没有花纹。这承受秦朝破败之后而使人民返回敦厚的政绩,都是汉文帝的俭朴所造成的。此后圣明的帝王也都知道用端正严肃的态度来约束自己,焚烧翟裘,毁掉筒布;用普通的木头建造简易的住房,用陶器和葫芦充当御用品。他们那俭朴的品德难道还不能想象吗?风化的传播是自上而下。从前齐桓公不愿意看到民众穿着奢侈的紫色衣服,于是他在上朝时也不穿紫色衣服,带头改变民风;邹国国君不愿意看到民众竞相贪图安逸,便废弃长缨玩好,以改变民俗。如果能有节俭正直的臣子,就像赵抃任知成都府,程灏任盐城县令那样,宣扬教化、顺承美好的风尚,在丰收时考虑到荒年,在安乐时想到节俭,改变那

些超越礼仪的习俗,使其变成比户可封的习俗。那么,又怎见得民众敦厚、手艺人俭朴、商人诚实、女人纯洁的风气,不再在今天见到呢?而使用精美的食具、红色的冠带、玉制的缨饰、豪华的帽子的奢侈风气,不会返回到古代那种贵人自己洗换衣冠、祭祀只用一小块猪肩肉的俭朴风气呢?管子说:奸邪是由于物质匮乏不足产生的,而物质匮乏不足则是由于奢侈造成的,奢侈是由于没有节制而产生的。由此可知,分清奢侈和俭朴,是端正风俗的根本。圣明的天子学习唐尧,养成了节俭;跟随虞舜,学到了俭朴。在他的天下生活的人,谁不努力使自己接受淳朴的教化呢!

制策又认为积贮是有关百姓生命的大事,从而要求对三仓的利弊进行考查。臣下我查考《周礼》的记载:遗人掌管乡里的储蓄以解救百姓的生活艰难,仓人掌管谷物的收藏,廪人掌管粮食的数目,旅师掌管征集农民在田野收获后应按规定交纳的粮食、以及处罚有田不耕者交出的粮食、处罚无业游民交出的粮食,这都是用来防备意外而留待低价发放的。李悝说:谷价便宜就会伤害农民,谷价上涨就会伤害民众。权衡轻重,就应该设立仓库来储存粮食。这就是常平仓设立的原因。其后耿寿昌在汉朝实行,民众认为很方便。隋朝的长孙平再次设立义仓,唐朝接着施行了这项制度。宋朝是常平仓和义仓同时设立,而以常平仓为重点。朱子借用常平仓的粮食建立了社仓,有社长一人稽查社仓的粮食出入。实行了三年,民众因而得以富裕。常平、义仓、社仓这三种形式,实行后各有成效;然而,日子久了,都不能没有弊病。例如,常平仓的积贮,权力在官府,于是有人上下相互蒙骗,只把它看作是中饱私囊的办法。义仓的粮食是民众捐献的,而积贮却由官府管理,于是有的官吏便得以找机会营私舞弊。社仓的粮食积贮是由民间管理的,在所有仓库形式中是比较方便的一种,然而如果社长不好,那么他就会侵吞摊派,用千家的粮食来谋自己一人的私利,弊病于是也就会与其他两种仓库一样了。总之,有了法规,重要的还在于要有执行法规的人。假如当官的人时刻不忘爱民,作为百姓则时刻不忘体谅上级,采买的办法则如陈尧佐的增价一样,发卖的办法则如赵抃的减价一样。而且对官吏有监察,使他们不至于干

坏事;对市场有稽查,使商人不至于囤积居奇;丰年事先有储备,荒年事后有安排。这样,储蓄所应该经营筹划的事情就很完善了。皇上挂念民众的痛苦,想用简单易行的办法来应付艰难岁月,这种为百姓谋求生活保障的考虑,是十分深远的。

制策又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能从根本上使天下太平、杜绝邪恶,从而想要除去烦琐苛刻以使法令得到遵守。这确实是建立法制的大纲。臣下我想:《周礼》说百官办事的法度,用来治理关键的大事;按文书簿册考核官府的政绩,用来治理一般的事务。这样,就能做到纲举目张,使法令明白、十分完备。在上面的人没有因法令细碎而带来的苦恼,在下面的人没有因法令繁多而带来的辛苦。这种状况是使用什么办法而达到的呢?《大戴礼》引《周易》说:使根本端正,那万事万物也就理顺了。这是因为把握了最简单的原理,可以从根本上主宰万事万物。像这种刀笔筐箧的琐碎事务,不足以干扰他们的视听;像这种簿书钱谷的繁杂事务,也不足以扰乱他们的思路。从前萧何、曹参任丞相,人们赞颂他们的政治规划简单明白。这是因为汉朝承受了秦朝破败的现实,破觚为圆,斫雕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他们解除苛酷烦扰,与民休息,在政治上确实是恰到好处。写历史的人所说的政治上崇尚黄老,大概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如果只有法令,那法令是不能自动施行的,而且防止弊病产生的举措就会立即滋生出弊端。例如,赋税征收和考核指标过于严厉,那就会因有关人员暗中填补拖欠而正好造成财政亏欠;搜捕犯人,因没有逮捕到而受到的处分太重,那就会因有关人员说谎掩饰,结果反而导致奸邪逍遥法外。大抵法律条文越详备,那欺诈作假的也就越多。下级官吏舞文弄墨,即便是主管长官也会有觉察不到的地方,这就是因为法令太繁杂的缘故。《周易·系辞》说:"阴阳变化简单,但却能把握天下的道理。"确实是如此呵!圣朝澄清吏治,剔除弊端,铲除奸佞,所有官员,谁不愿磨练自己以期望自己有所作为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整顿吏治以使政事兴盛,去除奢侈以摈弃浮华,使国家富足以保养百姓,去除烦琐以简便处理政事,真是皇风盛大而畅快、帝业兴盛,属于整个古代的唯一盛举。臣下我尤其恭敬

地祝愿皇上,永远保持最大的真诚,建立的政教要有恒心。综合考核尽管已经精细,但还要更加深入地考察;奢侈已经禁止,而越加要保持俭朴谦恭;仓库已经充裕,而更要加倍储藏;政务已经清明,而更应要求简约。百官秩序已经整肃了,节俭的风气已经浓厚了,储蓄的物资已经充裕了,清明的局面已经形成了。呵,伟大呀!陛下的功德等同五帝三王,八方同风,九天同福。在此基础上,描绘帝王宏图,润色皇家大计;民心凝聚、团结如钢,政权巩固、坚如磐石。那么,我国万年久长的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朱凤标　殿试对策

朱凤标(?　~1873)　字桐轩,号建霞,浙江萧山人。道光十二年(1832)榜眼。历任湖北学政、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同治十二年病逝。

臣对:臣闻厘工者熙绩之原,谨度者同风之要,储谷所以备患,居敬所以临民。旁稽往籍,《礼》重考成,《书》歌克俭,《诗》咏屡丰之瑞,《易》详涣汗之颁。茂矩崇规,秩然具备。伊古圣王在上,阐珍御宇,握镜临宸,莫不黜陟以严纲纪,淳朴以式浮华,积粟而重儆盖藏,远猷而时殷辰告,迈鸿轩之至德,轶象纬之殊勋。用是克知灼见,官方定焉;阜财足用,民生厚焉;酌盈剂虚,良法备焉;颁条布宪,庶政修焉。所由六幕凝薰、二仪陶铸、皇风洽穆而帝载纯熙者,胥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治光泰宇,道协坤舆,固已迪知交赞于臣邻,礼制悉衷乎忠质,绸缪豫而仓储不匮,易简著而法度咸遵矣。乃圣怀冲挹,弥切畴咨,虑葑菲之或遗,冀刍荛之可采。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察吏、崇俭、积贮、法令诸大政。如臣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拜扬伊始之辰,敬维敷奏以言之义,敢不谨述平昔之所诵习者,以勉效夫管

窥鑒测之微忱也乎！

伏读制策有曰：唐虞官人，申言载采，成周分职，重戒惟勤，而因求所以亮工熙绩、澄叙官方之道。臣谨案：安民之法在乎选吏，而吏有廉吏，有能吏。廉吏淡泊自守而或短于才，则政事必不免废弛；能吏奋发有为而或失其守，则举动不免轻浮。故察吏之要，必先责其操守，而即试其才能。《周礼》八法八成、六叙六计，所以治官府、正群吏者，至详且备。汉以六条察二千石，其法自田宅逾制以及通行货贿，所以察其廉。唐以四善叙内外官，其目自献可拾遗以及城隍修理，所以考其能。二者相济而不偏废，庶几综核名实，吏称其职，为能得董正治官之旨也。然或上求实效而下务虚名，以拘守绳墨为慎，以奉行条律为勤，岂所称庶官无旷者？夫古来群吏之黜陟，不能不寄于大吏。大吏得其人，则察之有其识，督之有其方。凡积案未厘，民风未淳，则劾罚随之；而又旌其有猷、有为、有守者，以为凡百有司劝。庶几考言询事，自竭克知灼见之明；分职任官，不在奉令承教之末。群吏皆知守法，相率忘私奉国，以诚事其上，所由收庶明励翼之效，而凡实心任事者，无玩惕之端、虚矫之弊也。皇上权衡至当，整饬时严。内而群尹庶司，外而封疆大吏，当循名责实，宜无不争自濯磨，以力除夫保禄保位之习也矣。

制策又以尚俭为开福之原，去奢为养廉之本，而因思挽其浇漓，俾还淳而返朴。此诚绌华崇实之至意也。臣考《书》曰：慎乃俭德。左氏云：俭，德之共也。盖有清心寡欲之功，而后有制节谨度之事。民俗之美恶，民心之淳薄系焉。故尧不以为阶为陋，而舜戒涂褰；禹不以卑宫为羞，而文安卑服。嗣是衣从弋绨，贡罢缣纶，往迹流传，犹堪追溯。然自古太平日久，物力既盛，则人情易以相夸，侈丽成风，则财用虑有不给。管子曰：奸邪生于匮不足，匮不足生于侈，侈生于无度。是故国奢示俭，国俭示礼，圣王之所以善更化也；图匮于丰，防俭于逸，圣王之所以谨防维也。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夫去奢去泰，上下所同。有势位之贵者，诚能躬行节俭，励《羔羊》素丝之操，如赵抃之守成都，一鹤一琴；程炳之令盐城，一马一仆。清标高节，为小民端表率则。君子爱礼，小人爱财。斯玉

缨琼弁,积习可更,而有位不蹈风愆之儆;《蟋蟀》、《山枢》,民风近古,而闾阎可无逾礼之讥。移风易俗之权,洵无出乎此者矣。圣主体唐成俭,蹈虞为朴,屏纤丽而弗珍,却贡献而弗纳。在位臣工,莫不凛簠簋不饬之戒,彼民有不观感而兴起也耶!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而因思所以整顿旧规,睹兴复之效,图久远之模。此尤厚生足国之至计也。臣考《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周礼》仓人、遗人之制,即后世常平、社仓之所由昉。然而昔人行之或享其利,或滋其弊,则非法之不善,行法之不得其人也。汉耿寿昌设常平仓,增价减价,因时以济民之缓急。意非不善,但出人在官,易滋流弊,不若社仓、义仓使民间自为经理之为得。夫王者爱养黎元,勤求积贮,务令州县计地之广狭,以定常平之额。可谓法良意美矣。乃日久弊生,地方有司贤愚不一,仓正不无偷卖,州县不无那移,胥吏不无侵蚀,甚至日就亏缺,仅剩空廒。惟在督抚诸臣随时核实,则仓储自无不足之患。乃若偶逢歉岁,米价稍昂,即当设厂平粜。而商贩囤积,为害实深,又地方大吏所宜设法稽查,俾市侩绝其居奇,而商贾使之贸易,则不惟州县无抑勒侵那之弊,而输纳自便于小民。此积储之,即以救荒也。皇上念切民依,首重足食,偶值偏灾,即发粟赈饥,且令丰收各省源源协济。斯酌剂盈虚之道得,而丰财安民之法备矣。

制策又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而因思汰其丛杂以归于简明,涤其烦苛以昭夫法守。臣惟《周礼》官法治要,官成治凡,纲举目张,无一切苛碎繁重之政,粲然明白,庶事由康。盖古者必雍宫肃庙,修意于立法之先,而后锡福绥猷,明示诸始和之布。故无取乎政令条教之繁,自无不家喻而户晓。且夫立法者,君也;行法者,民也。民所不知,不能强之使知;民所难从,不能强之使从。惟本显明之理,以立要约之法,则人皆易知而易从焉。若汉代萧规曹随,较若画一,诚得行简临民之遗意。苟簿书日积,科条愈增,则庶司将讳过之不暇。如经徵考成过严,而适成亏帑;承缉处分太重,而转致养奸。故必易简,而后天下之理得也。皇上折衷至当,裁定典章,居敬行简之道固迈往古而上之矣。

若此者：课最以懋功，崇俭以维国，平准以权缓急，简核以饬纪纲，皇皇乎洵亘古之上仪，丕天之伟烈矣。臣尤伏愿皇上，端居益懋，垂拱弥勤，劭日新月盛之功，迈云灿星辉之治。明良已庆而倍饬廉能，撙节已昭而愈严裁制，丰亨已告而尤备粮储，烦猥已除而弥思简要。于以上咸五，下登三，经纬乾坤，荣镜宇宙，跻斯民于仁寿，膺天庆之延长。则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福，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管好官吏是振兴政事的根本，敦促俭朴是使风俗完美的关键；储备粮食是用来备荒的，保持诚敬是用来统治天下的。遍查古籍，《周礼》重视考核政绩，《尚书》歌颂节俭，《诗经》咏唱连年丰收的祥瑞，《周易》详细说明了颁布政令的严肃性。美好的制度、崇高的规矩，井然有序、十分完备。古代帝王高高在上，阐扬大地祥瑞而统治天下，心怀明镜而登临王位，没有不用提升和贬黜的手段来严肃纲纪的，没有不用淳朴的风气来遏止浮华的。储积粮食而格外重视储藏，把自己远大的计划随时告诉国人。道德高尚，超越了帝鸿氏和黄帝；功勋卓著，超过了观天授历的帝尧。因此能有真知灼见，使为官准则得以稳定；能增加财富以满足需要，使人民生活得以富足；能酌盈剂虚，使好的制度得以具备；能颁布法令条规，使国家政治得以完美。他们之所以能达到天地四方凝聚起薰陶之风、天造地设养育万物、皇风肃穆而帝业盛大的境界，靠的就是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的统治光照宇宙，道德协和大地；的确启发诱导已经得到了臣属的交口称赞，礼制完全符合完美的原则。由于事先有了准备，从而使仓库储蓄永不匮乏；由于贯彻了简易的原则，从而使法度完全得到了遵守。然而，圣上却心怀谦逊，咨询更加殷切，考虑到或许有一德可取的人被遗漏，希望从割草打柴的人那里得到有用的建议。于是将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考察官吏、崇尚俭朴、积贮粮食、制定法令等大政来策试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哪能知道国家大政呢？然而正当对答开始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尚书·尧典》所说的让大家都陈述政务的教诲，又怎敢不小心

地陈述平日所诵读和学习的东西，努力奉献管窥蠡测的微小热忱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唐尧虞舜时代任命官员，强调要举出事例做验证，周朝任命官员则十分重视勤奋，从而想要探讨辅助天工、振兴政事、整顿吏治的方法。臣下我细致查考：安民的方法在于选好官吏，而官吏有廉洁的官吏，有能干的官吏。廉洁的官吏能淡泊自守，但或许缺乏才干，因此在处理政事上就必然免不了失职；能干的官吏奋发有为，但或许会丧失操守，因此在举动上就免不了轻浮。所以，考察官吏的关键是一定要首先责求他的操守，然后才测试他的才能。《周礼》的“八法、八成、六叙、六计”，是用来整治官府、端正群吏行为的，十分详细而完备。汉朝用“六条”来监察太守，从田宅超过规定标准到接受贿赂，“六条”中都有详细规定，是用来监察太守廉洁的。唐朝用“四善”来提拔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从主动献计献策、补救失误到修理城池，“四善”中都有明确标准，是用来考察他的才能的。操守与才能二者相互补充而不偏废，才能综核名实，使官吏称职，才能获得加强督导、治理百官的主旨。然而上面要求实效而下面却追求虚名，把死守规定视为谨慎，把奉行条律视为勤奋，那还能称得上是官员称职吗？自古以来，群吏的提升和贬黜，不能不交给上级长官负责。如果上级长官的人选得当，那么他们考察下级官员就会有自己的见识，督促下级官员就会有自己的方法。对于那些凡是积案还没有办理、境内民风还没有淳朴的下级官员，就会及时弹劾和处罚他们；同时又会表扬那些有办法、有作为、有操守的下级官员，把他们作为各级部门的榜样。这样，在考察官员言行、征询官员意见时，他们自然就会竭尽全力、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各级官员就能承担责任，不会只考虑奉行命令、按上级指示办事了。群吏都知道守法，竞相忘我地为国效力，用诚心对待上面，这样就会收到《尚书·皋陶谟》所说的“众人贤明、努力辅佐”的效果了；而且凡是真心实意任职的官员，就不会有玩忽职守、弄虚作假的毛病了。皇上的处理非常恰当，从不放松对吏治的整饬。朝廷内的中央官员及政府部门，朝廷外的封疆大吏，应当循名责实，都理应发奋磨砺自己，大力去除那种保俸禄和

保官位的恶习了。

制策又认为崇尚节俭是开启福运的本原，去除奢侈是保持廉洁的根本，从而想要挽救世风的浮薄，使其回归淳朴。这的确是废除浮华、崇尚朴实的强烈愿望。臣下我恭敬地查考：《尚书》说“小心保持俭朴的品德。”左丘明说：“俭朴，是道德的共同体。”因为有了清心寡欲的功夫，而后才会有节制、严守法度的事情。民俗的美与恶，与民心的淳朴和浮薄相关。因此，唐尧不认为土阶是简陋的，虞舜保持警惕，不肯用油漆的器物。大禹不为自己卑陋的宫殿感到羞愧，而周文王甘愿穿简朴的服装。在这以后，帝王的衣服用黑粗布制作，废除用双丝细绢做成的青色丝绶的贡品。往事流传，仍然可以追溯。然而自古以来，由于太平日久，物力已经丰盛，于是人情就容易相互攀比夸耀，奢侈华丽成风，那财力物资就会有不足的忧虑。管子说：奸邪是由于物质匮乏不足产生的，而物质匮乏不足则是由于奢侈造成的，奢侈是由于没有节制而产生的。因此，国家富足就要教育民众节俭，国家困难就要教育民众讲礼仪，这是圣明的帝王之所以善于培养好风气的原因。在丰盛的时候想到匮乏，在安逸的时候要想到节俭，这是圣明的帝王之所以要谨慎考虑预防的原因。汉景帝下诏说：“雕刻纹彩，伤害了农业活动；绣刺锦衣华服，伤害了妇女的针线活路。”革除奢侈，这是上下共同的要求。有权有势的贵人，如果能从自身做起、实行节俭，用《诗经·羔羊》中贵族用素丝做衣服的操行来激励自己，像赵抃任知成都府，只有一只鹤、一张琴；程灼任盐城县令，只有一匹马、一个仆人那样。他们的清标高节，就能为小民树立表率和准则。君子爱礼，小人爱财。用美玉装饰簪和帽子的这种积习可以更改的话，那么有官位的人也就不会受到淫靡风气的警告了；《诗经》的《蟋蟀》和《山有枢》所歌颂的民风，非常质朴，也就不会有因民众超越礼制而被讥讽的事情发生了。移风易俗的计划，确实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圣明的天子学习唐尧，养成了节俭；跟随虞舜，学到了俭朴。摈弃华丽而毫不怜惜，取消贡品而不愿接受。如果在位的臣子，都怀有警惕自己修养欠缺之心，那么，那些民众能有不受感动而崇尚俭朴的吗！

制策又认为积贮是关系到民众性命的大事，从而想要整顿旧的规模，看到振兴的效果，图谋建立久远的规模。这尤其是使民众生活丰厚、使国家富足的最好计划。臣下我细致查考《王制》，上面说：三年耕作一定要有一年的积蓄，九年耕作一定要有三年的积蓄。《周礼》仓人、遗人的制度，就是后世常平、社仓的由来。然而，过去的人推行它，有的得到了好处，有的却产生了弊病。这并非是它的办法不好，而是推行它的人不行。汉朝的耿寿昌设立常平仓，使用增价和减价的办法，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以赈济民众的紧急需要。用意并非不好，但粮食的出入都操在官府手中，容易滋生流弊，不如社仓、义仓让民间自行管理为好。帝王爱护和抚养百姓，辛勤地谋求粮食的积贮，命令州县务必按照土地的宽狭来确定常平仓的数额，可以说是法良意美了。但是，日子久了就会产生弊病，地方部门好坏不一样，仓正没有不偷卖的，州县没有不挪用的，胥吏没有不贪污的。甚至一天天亏缺，仅剩下了空仓。只要总督、巡抚等大臣随时核实，那么仓库储蓄自然也就没有了不足的担忧。假如偶然遇到了荒年，米价稍涨，就应当立即设立米厂，平价卖粮。然而商贩囤积居奇，为害实在太深。地方长官又应该设法稽查，使市侩断绝他们囤积居奇的门路，而让商贾进行贸易。这样，不但州县不会有摊派、贪污、挪用的弊端，而且小民交纳粮食自然也很方便。这积储的粮食，也就是用来救荒的。皇上挂念着民众的痛苦，首要注重的就是使粮食充裕，偶然遇到了灾害，便立即发粮赈济饥荒，而且命令丰收的各省源源不断地协助赈济。把握了这样的酌盈剂虚的方法，使财物丰盛、百姓安宁的方法也就具备了。

制策又说：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能从根本上使天下太平、杜绝邪恶，从而想要除去杂乱以使法令回归简明，清除烦琐使法律能得到遵守。臣下我想到：《周礼》说百官办事的法度，用来治理关键的大事；按文书簿册考核官府的政绩，用来治理一般的事务。这样，就能做到纲举目张，一切苛碎繁重的政令都没有了，法令非常明白，使各种事务都能井井有序地施行起来。因此，古代一定要使宫廷和太庙整洁肃穆，在立法之前先修明用意，而后赐给百姓幸福，安定

天下，在春季来临时，明确颁布法令。所以，他们用不着使用烦琐的政令条文，自然就能做到家喻户晓。立法的是国君，而法令实施的对象则是民众。民众所不理解的，不能强行让他们理解；民众所难以遵从的，不能强行让他们遵从。只有本着显明的道理，用来制订简约的法令，那么人人就都容易理解而且容易遵从了。如像汉代的“萧规曹随”，两相比较，好像就是一样，确实是保留了用简化法令的办法来管理民众的意思。假如文书日益堆积，科目条文愈来愈多，那么所有部门就将连掩饰过错都来不及了。假如赋税征收和考核指标过于严厉，那就会因有关人员暗中填补拖欠而正好造成财政亏欠；搜捕犯人，因没有搜捕到而受到的处分太重，那就会因有关人员说谎掩饰，结果反而导致奸邪逍遥法外。因此，必须用简易的方法来办事，才能掌握天下的道理。皇上处理政事十分得当，裁定典章，保持诚敬、简易施政的方法确实是超过了远古之上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通过考核选出最好的官员以勉励有功的人，崇尚俭朴以维持国家的强盛，储积粮食以应付紧急情况，简化法令以整饬纪纲，确实非常伟大啊！是千古的最好制度，是齐天的宏伟功业。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临朝听政更加勤奋，无为而治更加努力；让日新月盛的德业更加昭著，达到云灿星辉的太平盛世。尽管君明臣良值得庆贺，但更要加倍整饬廉能；节俭的风气已经占主导地位，但更要严厉裁制奢侈的风气；物资已经丰盛，但尤其还要重视粮食的储备；烦琐的条令已经被删，但更要考虑让它进一步简化。这样，就能等同五帝三王，整顿乾坤，光照宇宙，让民众达到仁寿的境界，使国运承膺上天之福而永久延长。那么，我国亿万年长久无疆的福运，就从此奠定了基础。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季芝昌　殿试对策

季芝昌（1791～1860）　一作之昌，字云书，号仙九，江苏江阴

人。道光十二年(1832)探花。历任山东学政、浙江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山西巡抚、吏部侍郎、军机大臣、闽浙总督等职。咸丰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病逝于通州,终年70岁。

臣对:臣闻厘工亮采,为敷政之大原;崇朴黜华,实式型之先务。阜成兆庶而胥备盖藏,整饬科条而咸知法守。聿稽载籍,《诗》咏作人之盛,《易》垂制节之文。养民善政,著在《虞书》;读法始和,传诸《周礼》。伊古帝王,握镜临宸,执枢斟化,莫不以夙夜勤求之意,致天人交应之符。作楫作舟,辅弼勉焉;捐金捐璧,淳朴崇焉;相保相受,民财裕焉;不愆不忘,官常肃焉。于以播经猷,谨节度,厚生而利用,持维而振纲。所由庞禧罔被、协气旁敷、函夏翔和、熙春泳化者,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登俊四门,还淳九宇,廑修和而溥泽,彰宪典以宜民。固已庆洽赓飏而戒严封靡,歌盈率育而制美修明矣。乃圣怀冲挹,蓟菲不遗,深念久治之规,弥切畴咨之念。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勖官僚、厚风俗、裕储蓄、涤烦苛之至计。如臣愚昧,曷知体要?譬若尘涓,奚裨山海?顾当对扬伊始,敬念拜献先资,敢不勉竭刍荛之一得,用效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唐虞官人,申言载采,成周分职,重戒惟勤,而因本综核名实之情,以求夫询事考言之效。此诚澄叙官方之至意也。臣谨按《大戴礼》,官有九用,用有九徵。辨论官材,惟在于事举言扬之始。其考之平时者既无不至,而又必试之以事,任之以官。举凡所以诏爵诏禄者,无不兼功与德而计之。盖上求实效,下不务虚名。此庶明励翼,所以无旷厥官也。《周官》以六计弊吏,首重惟廉。汉取士曰兴廉,察吏曰廉察。廉固人臣之大节,然徒以苞苴不行,簠簋必饬,谓进退可幸无过,而燕燕居息,遂忘效职分猷之义,则徒以奉令承教为贤,犹无裨于政治也。史纪汉宣帝曰: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而《三国志注》始载清、慎、勤之说,其论以慎为本。不知居官最戒怠玩,则勤乃其要乎!夫任贤弗贰,去邪弗疑,帝王之盛轨也。上以诚待下,则下当以诚事上。国家优礼臣工,方薄惩其退葸之非,而力振其因循之习。苟以干济责之,而任事鲜实心;以明允责之,而案牍多

留滞。旷官之诮，人臣何以自安？又或以拘守绳墨为慎，以奉行条律为勤，其于任职之义岂有当欤？皇上明目达聪，课绩用人，必循名而责实，居官者有不自励哉！

制策又以尚俭为开福之原，而因以儆有位敦民风。此尤化民成俗之要务也。臣按《尚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逸周书》曰：不为骄侈，不为靡泰。自古俭为美德，有清心寡欲之功，乃有制节谨度之事。民心之淳薄，民俗之美恶系焉。然制之于下，防其流非以清其源；谨之自上，正其本即以理其末。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其言崇俭之道，可谓深切著明。故国奢示俭，国俭示礼，圣王所以善更化也。图匮于丰，防俭于逸，圣王所以谨防维也。尧不以土阶为陋，而舜怵戒于涂髹，禹卑宫，文王卑服。三代以降，代有令辟。如汉文帝衣绨履革，唐宋以来焚裘却贡，集囊为帷，其俭德犹可溯也。夫去奢去泰，上下所同。人臣励素丝羔羊之操，必如一冠三载，一衣屡浣，亦觉俭不中礼。若赵抃之一鹤一琴，程炜之一马一仆，其高节清风，诚臣下所当衿式也。盖戒奢所以养廉，返朴必先由礼。惟躬行为天下先，而比户皆挽浇漓之习，以敦淳古之风，则货不弃地，用不尽财。凡天下饮其和、食其德者，莫不乐醉饱而歌太平也。则《蟋蟀》、《山枢》之咏，岂专美于前哉！皇上体唐成俭，踵虞为朴，迪臣民而振风气，固已同臻醇茂矣！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而因思整顿旧规，以兴复夫良法。臣惟《周礼》仓人掌粟入之藏，旅师掌聚野之粟，遗人掌邦之委积，此积贮之所自昉也。常平之设，起于管子，行于李悝。汉耿寿昌令边郡设仓，增价减价，因时以济民，而常平之法立。隋长孙平令诸州百姓当社各立义仓，收获之日随所得出麦粟，委社司检校，以备水旱。社仓起于朱子，因乾道间建民艰食，请于府，得常平六百石，委本乡赈贷。淳化、景德之际，修复社仓。村有社，社有仓。嗣后三仓常并立矣。若夫东汉之名常满，北齐之号富人。韩琦广惠之兴，恩周老疾；周忱济农之设，泽于东南。皆仿常平社仓之遗意也。然事行既久，则弊有自生。刘般言常平之弊，在豪右因缘以为奸。胡寅言义仓之弊，在文移之阻艰，书吏之侵蚀。马端临言社仓之弊，在所司之不得其

人。此皆行之者之弊,而非其法之弊也。使行之而善,则陆贽所谓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岁之蓄;朱子所谓敛散有经,维持有要,即此乡之粟,活此乡之民。又何虑州县之抑勒侵亏也哉!我朝藏富于民,时和岁稔,所以咸跻仁寿者,赖有储备之实也。

制策又以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因欲汰其丛杂,归于简明。此又行简临民之要道也。臣惟《周礼》官法治要,官成治凡。无一切苛碎繁重之政,庶事所由康也。《系辞》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要约之法,必本诸显明之理。汉高祖除秦苛政,与民约法三章;萧何定律,曹参守之勿失,较若画一,后世美焉。夫徒法不能以自行,科条日增则庶司将救过不暇。如经徵考成过严,则缘垫欠而适成亏帑;承缉处分太重,则因讳饰而转致养奸。惟清厘册籍之重复,而酌减科指之繁多,将裁定明文,使吏胥无从高下,而凡在庶司亦不至有所顾虑。则所以防吏蠹而省簿书者,庶符乎易简之旨,而得乎临民之枢要矣。圣天子布宪颁条,昭垂百代,又何有烦猥之未除而劳简核哉!

若此者:分职程能,浚明肃其联事也;戒奢崇俭,撙节昭其爱养也;崇墉比栉,民物彰其阜康也;纲举目张,法令见其明易也。丕天之大律,所以长世字氓,无逾于此。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庶绩已熙而更精迪简,淳风已播而更励敦庞。积仓既裕,弥隆保息之谟;法制咸修,倍著裁成之化。治徵风动,泽洽露生,奄九有以来同,总八方而为极。用以绍天阐绎,曼羡延洪,畅垓而溯埏,登三而咸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整顿百官、辅佐政务是行政的最基本条件,崇尚俭朴、废除奢华是整顿风气的首要任务。民众富足安康就能使储备丰富,修订法律条文就能使大家都知道守法。详细查考古籍,《诗经》吟咏了造就人才的盛况,《周易》留下了关于节制欲望的文字。而养育民众的善政,写在《虞书》上;让民众在春季来临时阅读法令,记载在《周礼》中。自古以来的帝王,心怀明镜登临帝位,手握

权柄对民众进行教化，没有不用日夜辛勤寻求的苦心，来得到天人相互感应征兆的。他们把臣僚当作船桨船只来使用，使辅佐大臣受到鼓励；他们抛弃金、抛弃玉，使淳朴得到尊崇；他们让民众通过保甲制度相互依存，使民众的资财得以充裕；他们不违背也不忘记祖宗法度，使作官的规矩得到了整肃。用来传播治国的方针，谨慎节制用度，能使民众生活富裕、物尽其用，能维护礼义廉耻而振兴纪纲。之所以洪大吉福广泛施布，协和之气四处溢散，华夏充满祥和，和煦的春风沐浴万物，靠的就是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将杰出人才选拔到朝廷，使九州回归淳朴的境界，小心谋求六府三事而使恩泽广泛流布天下，使宪章法典更加明白以适应民众，确实已经是君臣递相作歌而欢庆之声高扬，奢侈之风遭到严禁，颂歌赞美人们都得到养育而制度完美、政治清明了。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连有一点能力的人也不遗弃，深深挂念着长治久安的大计，访求贤能征求意见的心情更加急切。将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激励官僚、淳厚风俗、丰富储蓄、清除烦琐苛刻等头等大事来策试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怎能知道国家大政？就好像一粒尘土、一滴水点一样，对高山和大海又有什么补益呢？但是，在这对答开始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又怎敢不竭尽村野小人的一点心得，像葵花向阳一样向陛下献上一片微小的诚心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认为唐尧虞舜时代任命官员，强调要举出事例做验证，周朝任命官员则十分重视勤奋，因而本着综核名实的情况，以谋求询问事情和考察言论的成效。这确实是澄清吏治的强烈愿望。臣下我细致地查考，《大戴礼》说官员有“九用”，而每“用”有“九征”。辩论官员的才能，只是在开始办事和发表言论的时候。所以尽管对他们平日的考察已经是无所不至了，但还必须试着让他们处理具体事务，让他们担任官职。凡是诏命授予爵位和俸禄时，都是把功与德加在一起来考虑的。上面要求实效，下面就不会追求虚名。这样才能众人贤明，努力辅佐，勤于政事而不渎职。《周礼》用“六

计”评定官吏，首先注重廉洁；汉朝录取士人做官叫“兴廉”，考察官吏叫“廉察”。廉洁固然是臣子的大节，然而只是不行贿受贿、端庄有礼，认为无论进退都能幸好没有过错，从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忘记了忠于职守的原则，那就只会把奉命行事当作贤能，对于政治没有补益。据史书纪载，汉宣帝说：政府的重要机关设置完善，官员的品级升降制度完备，上下相安，不要产生苟且的心思。而《三国志注》则首次记载了“清廉”、“谨慎”、“勤奋”的论说。它在理论上把“谨慎”作为了根本，而不知道做官最忌讳怠惰和玩忽。由此可见，“勤奋”才是做官的根本！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清除坏人不要有疑虑，这是帝王的最高原则。上面用诚心来对待下面，那下面就应该也用诚心来奉事上面。国家礼遇臣子，就应当稍稍惩罚官员不求上进的过错，而尽力改变官员因循守旧的习气。假如用完成国家大事来要求他们，而他们办事却少有实心；用精明公正来要求他们，而他们处理案件拖拖拉拉。那么，面对渎职的讥讽，做臣子的又怎么能够自安呢？另外，有人把拘守条规守为谨慎，把奉行律条视为勤奋，那他们又怎能对得起他们任职的责任心呢？皇上看得远、听得清，考核政绩和用人必然会循名责实，做官的人还敢有不自励的吗！

制策又认为崇尚节俭是开启福运的本原，从而想用来警告官员、敦劝民风。这尤其是教育民众养成好习俗的重要事情。臣下我细致地查考，《尚书》说：“小心保持俭朴的品德，心怀长远打算。”《逸周书》说：“不要骄侈，不要享乐。”自古以来，俭朴是美德。有了清心寡欲的修养，才会有节制、严守法度的事情。民心的淳朴与浮薄，与民俗的美与恶相关。然而，从下面来控制奢侈，尽管可以防止它的滋蔓，但却不能澄清它的源头；从上面带头节俭，便可以扶正根本从而最终去除奢侈。汉景帝下诏说：“雕刻纹彩，伤害了农业活动；绣刺锦衣华服，伤害了妇女的针线活路。”他谈论崇尚俭朴的道理，可以说是深切而明白的。因此，国家富足了就要教育民众节俭，国家困难了就要教育民众讲究礼仪，这是圣明的帝王之所以善于培养好风气的原因。在丰盛的时候想到匮乏，在安逸的时候想到节俭，这是圣明的帝王之所以要谨慎考虑预防的原因。唐尧不认为土阶是简陋的，虞

舜保持警惕，不肯用油漆的器物。大禹不为自己卑陋的宫殿感到羞愧，而周文王不穿豪华的服装。三代以后，代代都有贤明的君主。如汉文帝穿着黑粗布衣服和皮制的鞋，唐宋以来焚毁裘皮大衣，退回贡品，收集布袋制作帷帐，他们的俭朴品德还可以追忆。去除奢侈和安逸，上下的愿望都是一致的。臣子用《诗经·羔羊》中贵族用素丝做衣服的操行来激励自己，必定要像一顶帽子戴了三年、一件衣服洗了多次，这样节俭，会让人觉得并不符合礼仪，像赵抃的一鹤一琴，程烨的一马一仆，他们的高节清风。确实是臣子应当仿效的。因为戒除奢侈是为了培养廉洁，回归淳朴必须首先要遵循礼仪。只要帝王亲自带头为天下先导，而后家家户户改变浮薄的习气，以复兴古代的淳朴之风；那么，就能达到物品不丢在地上、用度不耗尽财产的局面，凡天下按传统方式生活的人，就没有不欢乐于酒醉饭饱而歌颂太平的。那么，《诗经》的《蟋蟀》、《山有枢》的赞咏，又怎能是专门赞美前人的呢！皇上学习唐尧，养成了节俭；跟随虞舜，学到了俭朴。开导臣民而振兴风气，确实已同臣民一道达到醇美的境地了！

制策又认为积贮是关系到民众生命的大事，从而想要整顿旧的制度，以复兴良法。臣下我认为，《周礼》上说仓人掌管粮食的收藏，旅师掌管征集农民在田野收获后应按规定交纳的粮食，遗人掌管国家的物资储备，这就是积储制度的由来。常平的设立是从管子开始的，李悝开始推行；汉朝的耿寿昌命令边郡设立仓库，根据当时的情况，或提价、或减价，以赈济民众，常平仓的法规于是建立起来。隋朝长孙平命令各州百姓在本社各自建立义仓，收获的时候随同正税所应交纳的麦粟交纳，委托社司检查核对，以预防水灾和旱灾。社仓的设立是从朱子开始的。由于乾道年间建宁府的民众缺乏粮食，于是朱子向知府请求，从常平仓得到了六百石粮食，委托本乡赈济借贷。淳化、景德年间，修复社仓。村有社，社有仓。后来，三仓常常同时设立。至于东汉叫做“常满”，北齐叫做“富人”；韩琦兴建“广惠”，恩惠遍及老弱残疾；周忱建立“济农”，恩泽沐浴东南；都是仿照常平、社仓的遗贸式样建立的。然而，既这件事施行已久，那自然就会产生弊病。刘般说：常平仓的弊端在豪强乘机使坏。胡寅说：义仓的

弊端在文书往来艰难、以及负责文书的官吏的侵吞。马端临说:社仓的弊端在有关机构的人选不当。这些都是施行中的弊端,而不是其制度的弊病。如果让它得到很好的执行,那就会像陆贽所说的一样,不超过十年,必定会积累三年的储蓄。就会像朱子所说的一样,聚敛和发放有人管理,维护仓库存粮有人核查,用这一乡的粮食救济这一乡的民众。又何须担心州县的摊派和侵吞呢!我朝藏富于民,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民众之所以都能达到仁寿的境地,就是依赖有充裕的储备。

制策又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能从根本上使天下太平、杜绝邪恶。因而想去除它的丛杂部分,让它回归于简明。这又是用行政简化的手段来管理民众的重要方法。臣下我认为,《周礼》说:百官办事的法度,用来治理关键的大事;按文书簿册考核官府的政绩,用来治理一般的事务。这样,就能做到纲举目张,不再有那些苛刻繁琐的法令,使法令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各种事务就能很好地完成了。《周易·系辞》说:平易则容易认识,简单则容易遵从,平易简单,也就得到了天下之理。简要的法令,必须本着显明的道理来制定。汉高祖废除秦朝的苛政,与民众约法三章;萧何制定法律,曹参遵循而不违反,两相比较就像一样,从而得到了后世的赞美。光有法令摆在那里,并不能自动发挥作用。科目条文日益增多,那么,各政府机构将来不及补救过失。如果赋税征收和考核指标过于严厉,那就会因有关人员暗中填补拖欠而正好造成财政亏欠;搜捕犯人,因没有搜捕到而受到的处分太重,那就会因有关人员说谎掩饰,结果反而导致奸邪逍遥法外。只有清理重复的表册簿籍,斟酌减少繁多的科目条令,裁定明文,使官吏无从随意解释和利用法令做手脚,而所有机构也不至于有什么顾虑了。那么,用来防止官吏贪污舞弊而减少册簿文书的办法,就差不多能符乎"易简"的主旨,而且抓住了管理民众的关键了。圣明的天子颁布宪法条令,光耀本朝、流传千古,还能有什么烦琐没有去除而劳烦简化核定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分清职守、考察能力,百官恭敬努力而使吏治得以整顿;戒除奢侈、尊崇节俭,在节制上表明了爱护和养育百

姓之心；物资堆积如山，人民和万物显示了富足的程度；法令纲举目张，可以看到它的简明行易。遵奉皇天的根本原则，用来驾驭社会，抚育百姓，没有能超过这几个方面去的。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尽管各种政事已经振兴，但还要进一步考核精简；尽管淳朴的风气已经传播开来，但还要进一步勉励敦厚朴实；尽管仓库积蓄已经充裕，但还要更加重视保障民众生活的规划；尽管法制已经全都修明，但还要进一步加以修订、使它更加完善。对国家的治理就像风吹大地，对民众的恩泽就像雨露滋润万物；包容九州而使各地归从，总合八方而成为最高主宰。用来继承天命而阐发天理，国运洪福无限蔓延；屹立天地之间，丰功伟业与五帝三王相等。那么，我国亿万年美好而长久的国运，就从此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杨子江　徐立群译〕

清宣宗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大德不逾闲。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殿试策问

[道光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抚绥方夏,仰荷昊穹笃祜,列圣垂庥,函夏镜清,黎民康乂。庶几上理克臻,跻群伦于仁寿之域。兢兢业业,弥切畴咨。惟恐敬德之未昭,戎律之未娴,民俗之未醇,转输之未利。宵旰讲求,冀闻谠论。尔多士对扬伊始,庶明化道,以赞大猷。咨汝昌言,其敬听朕命。

治法莫盛于唐虞。《典》、《谟》所载,一则曰惟危惟微,一则曰无怠无荒。自古帝王,未有不谨小慎微、允迪厥德而能底久安长治之庥者也。三代而下,如汉之文、景,唐之文皇,称极盛矣,而治终不及古。将世变不同,抑所尚各异耶?《大学》之教,统内圣外王而归于修身。真德秀《衍义》一书,略外而详内。岂有说欤?保泰之道,在于谨几。《论语》"宽信敏公"之旨,有与经义相发明者欤?清净可以致治,而高谈名理者或长浮华;兢业所以揆几,而衡石传餐者难言政体。治忽之故,固当辨之于微欤?

《禹贡》揆文,必兼奋武;《周官》立政,特训诘戎。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古有蒐苗狝狩之法,所以娴步伐、习威仪也。汉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诸制。果名异而实同欤?唐太宗亲临阅射于显德殿,赏劳有差。不诚以训练诸政为亟亟欤?府兵旷骑,沿革若何?宋

沈括论九军阵法，臧景陈马射六事，明于谦创团操之议，王骥定练兵之制，皆可参酌用之欤？朕严饬武备，鼓励戎行。直省督抚提镇，宜如何随时操演，加意稽查，老羸之必汰，惰窳之必惩，器械之必精，伍两之必协，以期一兵有一兵之用欤？

稂莠不去，嘉禾不生。《王制》所以严左道之诛，《周礼》所以设奇邪之禁也。夫愚民莫不自重其利，自爱其生。一惑于邪说，而金钱取以奉人，身家置之不顾。岂非守土之吏化导之不先欤？其初视为无害，姑息养奸；其后惧于严谴，隐匿不报。为长吏者，其何以纠察之？汉之亭长、啬夫，唐之里正、坊正，皆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至近之事，犹有闾胥比长遗意。故诘奸之法，莫善于保甲。然王安石行之于宋，而民不胜扰；王守仁行之于明，而盗无所容。其故安在？张敞之治京兆，尹翁归之治东海，桴鼓稀鸣，奸邪震慑。所以发奸摘伏者，果何道之从欤？

漕运之法，其来尚矣。《禹贡》州末系河，即唐裴耀卿节级转输之所由昉，而法至汉唐而大备。汉仰漕于山东，唐仰漕于江淮。顾引渭穿渠之谋，不见于高、文之时，而见于武帝之世；溯河入渭之说，不见于太宗之日，而见于代宗之后者。何欤？漕粮为天庾正供，挽粟飞刍，岁有常额。顾逾江淮而达京师，南则患河身之高仰，清水不能敌黄；北则患河流之微弱，湖水不能济运。治河先于治漕，启闭之节，疏浚之宜，潴蓄之利，可不讲欤？

夫慎德所以图治，讲武所以卫民，除莠所以安良，治河所以利运，皆经国之远猷、立政之要图也。多士学古通今，蕴怀有素，其勉悉乃心，胪列见闻，详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道德的大节不超过界限。

“孝”，就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承继前人的事业。

自身不能在心中保持“仁”、在行为上履行“义”，那就叫做自弃。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承了宏大的基业，安抚华夏四方，仰赖上天笃厚的保佑，列位先帝的荫庇，中国像镜子般的清明，黎民百姓安乐太平。由此希望能使天下达到最佳治理的状态，使芸芸众生达到仁德长寿的境地，于是兢兢业业，殷切咨询。深怕恭敬的德行还不够显著，军队的技艺还不够娴熟，民俗还不够淳朴，漕运还不够便利，于是不分昼夜地筹划探求，希望能听到正直的言论。你们各位贡士开始对答，期望能透彻地阐述教化的原则，以辅佐治国的宏大的规划。希望能听到你们的美好言论，请你们敬听皇帝我的命令。

治理天下的方法，没有比唐尧和虞舜更好的了。《尧典》、《大禹谟》诸篇所记载的，一是说“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一是说“不要怠惰，不要荒废”。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谨小慎微、不真诚遵循道德而能最终享受到长治久安的荫庇的。三代而下，如汉朝的文帝、景帝，唐朝的太宗，称得上是极其兴盛了，然而他们治理天下却最终达不到古代的境地。这是因时世变化不同，还是因所崇尚不同呢？《大学》的教导，总括了“内圣外王”的道理而归结到了“修身”。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却略于外而详于内。这是不是有什么说法？保持太平，在于谨小慎微。《论语》的“宽”、“信”、“敏”、“公”的要旨，有与经书含义相互阐明的地方吗？清净无为可以治理天下，但是高谈名理的人却常常浮华不实。兢兢业业是为了辨明事物的苗头，而废寝忘食、埋头处理大量公文的人却很难把握政体。治理与忽怠的缘故，是不是应当去仔细分辨那萌芽状态呢？

《禹贡》中说设置文教官员，同时要振奋武备；《周官》里讲确立政体，尤其要整治军事。军队可以百年不用，但不可一天不备。古代有春夏秋冬四季打猎的制度，是用来使军队娴熟步伐、练习威仪的。汉朝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等制度，是不是名称不同而实际一样呢？唐太宗在显德殿亲自观看射箭，分别给予不同的奖赏和慰劳，不正是把训练等政务时刻挂在心上吗？“府兵”和“矿骑”的沿革

是怎样的？宋朝的沈括谈论九军阵法，臧景陈述骑马射箭的六件事情，明朝于谦首倡团操的建议，王骥确定练兵的制度，都能参考斟酌使用吗？皇帝我严格整顿武备，鼓励军队。中央直辖各省的总督巡抚、提督和总兵官应如何随时操练军队，加以考核检查，使老弱的必定被淘汰，懒惰低劣的必定被惩罚，装备必定精良，队伍必定协同，使一兵能有一兵的作用呢？

杂草不除，好苗就不能生长。《王制》之所以要严厉惩处邪门歪道，《周礼》之所以要下令禁止奇邪行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愚昧的百姓，没有不看重利益、没有不爱惜自己生命的，然而一旦被邪说迷惑，就会把金钱拿出来献给别人，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和家庭的安全。这难道不是地方官吏未能事先加以教导而造成的吗？他们起初以为没有害处，姑息养奸；到后来又害怕遭到严厉的处分，便隐匿而不上报。作为地方长官，应该用什么办法来纠察邪门歪道呢？汉朝的“亭长”、“啬夫”，唐朝的“里正”、“坊正”，都是用住在一处、彼此熟悉的人，来监察看到和听到的事情。这还留有古代“闾胥”、“比长”的意思。所以追查奸人的办法，没有比保甲制度更好的了。然而王安石在宋朝实行，老百姓却忍受不了它的搅扰；而王守仁在明朝实行，强盗却无藏身之地。这原因在哪里呢？张敞治理京城，尹翁归治理东海郡，报警的鼓声很少响起，奸邪被震慑住了。他们之所以能发奸擿伏，究竟是采取的什么办法呢？

漕运的办法，它的来源很久远了。《禹贡》书中在九州后所记载的河道的情况，就是唐朝裴耀卿逐级转运由来的开始，这办法到汉唐就十分完备了。汉朝的漕运依靠崤山以东的粮食，唐朝的漕运依靠江淮的粮食。不过引渭水穿渠的计划，在高祖和文帝的时候没有见到，而在武帝的时候才见到了；上溯黄河进入渭河的说法，在太宗的时候没有见到，而在代宗以后才见到。这是为什么呢？漕粮是地方输送到京城粮库的上供物资，挽粟飞刍，每年有规定的数额。不过，越过江淮到达京城，南边就担心河床太高，清水不能抵挡黄河水；北边又担心淮河的水流微弱，洪泽湖水不能漕运。治理河道应先于整顿漕运。水闸开关的控制，河道疏浚的合适，水量储蓄的好处，难道可

以不讲求吗?

谨慎德行可用来谋划治理天下,讲究军事可用来保卫百姓,除掉坏人可用来安定善良的人,治理河道可用来便利运输,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远大的规划,确立政治方针的关键。各位文士,学古通今,心中向来积聚有不少学问;你们要勉励自己尽心尽力,陈述所见所闻,详细写在答卷中。不要泛泛而谈,不要隐瞒什么。皇帝我将亲自阅览。

刘绎　会试卷三道

刘绎(1797~1878)　字詹岩,江西永丰人。道光十五年(1835)状元。供奉南书房。道光十七年出任山东学政。任满后,请假回乡奉养双亲。在鹭洲书院担任主讲。咸丰八年(1858),得赐三品卿衔,在家乡督办团练。光绪二年(1878)病逝,终年82岁。著有《存吾春斋文抄》12卷、《诗抄》13卷、《崇正黜邪论》1卷。

大德不逾闲

观人者辨于其闲,当专求诸大德矣。盖闲所以定乎其人不逾,所以定乎其闲也。综其人之全,而规其德之大,辨闲端在此矣。子夏将扩其见以论人也,曰:世徒知不逾矩为圣人从心之候,而遂谓学者之蹈矩为拘牵。虽然,礼义之防,维毕生之名节关焉。士君子立身行己,将以蕲希圣希贤,乃并此宅心之大范,而亦在不可知之数,则衡品者更执何道以相绳?故吾谓千古能立大节之人,皆断然有不逾之矩也。

吾尝追维往哲,遍览时贤,而见学术虽殊,有所要以为归,吾所独至,不必果别其途也。事业虽分,有所遵以为轨,吾所独践,不必果异其迹也。天地有不易之经义,古今无或变之纲常,岂不重赖此闲哉!盖穷大者失居,宇宙之完人有几?独留此闲,以植千秋之名教。而惟性所宅,固于防意之城。而有基者勿坏,斯人之造诣可凭。惟守此闲,以贯一生之始终;而职思其居,严于越思之畔。吾将求之于大德不逾

者焉。

性情本于天生,而意气以有所闲而不激。故豪杰之事,往往为君子所取者,谓其于义有独伸也。夫义伸,则大德自见矣。以彼中怀浩落,亦若有独往独来之机,而不知其任天而动者,正其不逾夫天则者也。而性情不已相越欤!局量成于器识,而才智以有所闲而不偏。故节义之途,往往为圣贤所予者,谓其于理有各得也。夫理得,则大德亦昭矣。以彼一意孤行,亦若有不挠不回之概,而不知其循分自尽者,即其不逾夫分际者也。而局量不更相远欤!是故从事后以品评,或故为推原之论。若其人之大德足观,则固无待于推原矣。从来论古之识,惟闲可以定品。尝有亮节高风,简册无多纪载,而生平一二懿行,实足以信古而传今。则梗概可思,早自超于寻常意计之外。自局外以衡论,或尚有节取之词。若其人之大德不逾,则更不徒以节取矣。从来观人之法,惟闲可以见全。尝有独行特立,乡曲绝少称誉,而平日实践家修,已足以维世而厉俗。则风规自异,何妨求之规矩准绳之中!盖即闲以定其人,而其人可见;即不逾以定其闲,而其人之大德亦已得也。若小德,何足以论人哉?

观察人的人,在对人的德行进行界定的时候,应当专看人的大节。因为界限是用来划定人的道德所不能超越的范围的,所以才确定了界限。对人做全面综合的考察,从而观看人德行的大节,这确实是对德行进行界定的关键。子夏将他自己的见解加以扩展,用来谈论人,说世上人只知道圣人到时候就自然能随心所欲,而且不会违反规矩,因而便认为学者的循规蹈矩是迂腐死板。尽管如此,"礼义"的防线,却与维系毕生名誉和节操密切相关联。有志操和学问的人立身处世,将希望达到圣人和贤人的境地;他们把这作为坚定信念的最大规范,也在难以让人了解的范围以内。要是这样,那衡量品德的人又还能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呢?所以,我认为千古以来能树立大节的人,都断然有不能超越的规矩。

我曾经追忆古代的哲人,看遍当代的贤人,看到学术虽然不同,但在最终的归宿上,却有共同的主旨;因此,我独自要达到目标,不必

与他们不走同一条道；事业虽然有区别，但在具体的道路上，却有应当共同遵循的原则；因此，我独自要走的路，不必与他们不在同一条路上。天地有不能改变的法则，古今没有细小变化的纲常，这难道不是完全依赖这种界限才得以实现的吗！极大的事物就必然会失去它的居处，宇宙中的完人又有几个呢？只有保留这种界限，用来培植千秋名教。而保持性情的专一，加固防止思想邪僻的城防。只要作为根基的东西不毁坏，这个人的造诣就有了依靠基础。只有固守这个界限，以贯穿人的整个一生；而集中精力专注于本职，严守心思不能超越的界限。我将去寻求那些道德的大节不超过界限的人。

性情原本是出于天生，但意气因为有所限定而不激动。所以英雄豪杰的事情往往被君子择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独自在道义上有所伸张。道义一伸张，那道德的大节就自然可以看到了。由于他们胸怀宽广，所以他们心中也好像具有独往独来的机谋；但是如果人们却不知道随着天命而有所行动，正是不超越上天的规则的地方，而性情不就已经超越常规了吗！器量是由才能和见识所造成的，而才智因为有界限限制而不偏离原则。所以节操和道义的路途往往被圣贤占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道理上各有所得。一旦具有了道理，那道德的大节也就昭明了。看他们一意孤行，也好像具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气概；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遵循原则、竭尽全力，正是不超越界限的地方，而器量不就差距更大了吗！所以，在事后去品评人物，或许会故意去推论本原。但假若人的道德大节已经很可观了，那就确实没有必要再去推论本原了。在历来议论古人的见识中，只有用界限才能确定人的品行。曾经有人具有高风亮节，但是史书却没有太多的记载；然而只消凭借他生平中的一两件美好的行为，就确实足以在古代让人信服并且流传到今天了。由此可见，只要人的事迹梗概可以想见，那他的品德早就自然超出了人们的寻常看法。从局外来评价人物，或许还有节取一两处的评论。但假若人的道德大节不超越界限，那就更用不着只节取他的部分言行了。在历来观察人的方法中，只有用界限才能看得全面。曾经有人具有出类拔萃的品行，但乡里却绝少赞誉他；然而他平日的实际行动和家中修养，却已经完全

能够维护世道、激励风俗了。由此可见，既然风范和规则各不相同，那又何必不按规矩和准绳来要求呢！因此，用界限来确定人的品行，是可以看清一个人的；用不超越来确定道德的界限，也就可以发现那个人的道德大节了。如果是道德的小节，那又怎么能够评价一个人呢！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即继述以言孝，圣人之善推其孝也。夫前人之志事，赖后人以永之耳。善哉！继述之意。此即武周之所以为孝乎？今夫前王之精神与后嗣之天性，两相待也，即两相成也。不可知者，时数之适然，心与迹不必显为合；不容没者，伦理之交尽，作与述不啻隐为同。盖至精神不隔于旷代，斯天性之浃洽有独深焉矣。武周何以为达孝乎？夫孝亦莫大于继耳、述耳。前此积功累仁，岂有难明之志待白于异日？而数传以后，或反晦而不彰，使功在子孙而过归祖父，毋亦有大伤先志者乎？前此创业垂统，虽无成功之事隐望夫后人。而天眷日隆，或反疑而不决，将命已维新而邦仍由旧，毋亦有坐失乃事者乎？而武周何其善乎！

将以隐微莫喻之衷，而求为幽明之合一，则必尽己之志，以潜孚乎人之志。顾人之志，则已往矣。往而欲其来，此际尚在绝续之交，而敢不为之继乎！夫继不难于继已慰之志，而难于继未慰之志。未慰者而求其慰，知不在率由之迹，而视乎契合之神也。夫孝者之克承厥志，固有如是之微至耳。将以缔造艰难之意，而欲为前后之相师，则必合己之事，以默符乎人之事。顾人之事，则已过矣。过而欲其留，此际尚在因循之会，而敢不为之述乎！夫述不难于述已竟之事，而难于述未竟之事。未竟者而期于竟，知不徒功烈之盛，而存乎心理之安也。夫孝者之率乃攸行，固有如是之周详耳。

世运有日新之机。使前人处此，亦必有志事之踵增；而缵绪者因时势以通经权，初非有改于前代之辙。故因之为继，创之亦为继；同之为述，异之亦为述。善作者于以善成，无难媲止孝之显谟，而诉合

无间。法制无再传不变。使前人尚在,亦必有志事之迭乘;而成德者因会通以垂经典,初非有更于古昔之制。故继与述,既有尽善之道;斯志与事,益为至善之经。善始者尤能善终,于以追大孝之极轨,而心迹无殊。试徵继述之事,而益知武周之达孝矣。

从继承和承继的角度来谈论“孝”,是圣人善于扩展“孝”的含义。前人的志向和事业,是靠后人才能得以永远延续的。继承和承继的意义,真是太妙了!这就是周武王和周公之所以能做到“孝”的原因吧?如今,先王的精神与后嗣的天性,是相互依存的,其实也就是相互成全的。而不能知晓的,只是时势恰恰就该那个样。心与事迹不必明显合一,它们不容埋没的东西,在于伦理都相互达到了极点,开创与承继完全是暗暗相同的。至于精神不会被若干代所隔断,这是天性的贯通有着独特而深刻的地方。周武王和周公为什么能做到可以普遍适用于天下的那种最大的“孝”呢?因为“孝”再大,也大不过继承、承继罢了。前人积累功德和仁爱,哪里有难以实现的志向要留待他日实现呢?然而在传了几代以后,有的却埋没而得不到宣扬,把功劳记在子孙身上,而把过错放到祖先头上。这不是大大地伤害了最早立下志向的人吗?前人创业留下了江山,虽然没有成功的事业暗暗把它寄托在后人身上。然而当上天的眷佑日益兴隆的时候,有人却反倒疑而不决,在天命已经更新的情况下,国家却仍然维持着旧的制度。这不是坐失良机了吗?但是,周武王和周公却是做得多么好啊!

如果用隐微的、旁人无法理解的心情去寻求幽暗与彰明相互合一的境界,那就必须完全实现自己的志向,以在暗中去符合祖先的志向。然而,祖先的志向已经成为过去了。过去的要想成为将来,此时此刻还处在一个交接点上,因此,敢不继承祖先的志向吗!要说继承并不难在继承已经实现的志向,难就难在要继承还没有实现的志向。还不能告慰祖先而又想要告慰祖先,很明显,这不是遵循旧的规定就能实现的,而要看阴阳契合的神机变化。能做到“孝”的人要能继承祖先志向,确实有如此的奥妙和精微。如果本着缔造艰难的心

境，想要做到前人后人相互学习师承，那就必须总括自己的事业，以默默地符合祖先的事业。然而，祖先的事业已经成为过去了。过去的想要它留下，此时此刻还处在一个交汇点上，因此，敢不承继祖先的事业吗！要说承继并不难在承继已经完成的事业，难就难在要承继还没有完成的事业。还没有完成的事业想要完成，很明显，不是只靠赫赫功绩，而是要靠心志修养感到做得很好。能做到“孝”的人要效仿祖先的所作所为，确实有如此的周详。

世运有天天翻新的机变。假使前人处在这种境地，那他们也必然会不断有志向和事业的新追求；因此，继承它们功业的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原则和灵活的策略，起初就不是在更改前代的成规。因此，沿袭前人是继承，创新也是继承；与前人相同的是承继，与前人不同的也是承继。善于开创的人就能有好的成就，要和最高孝行的显赫谋略相匹配也不是难事，而且会做到亲密无间。法令制度没有延续几代不变的。假使前人还在，那他们也必然会在志向和事业上有所变化；因此，成就他们德行的人用会合变通的办法来遵循经典，起初就不是在改变古代的制度。所以，继承和承继既然有十分完善的原则，这志向和事业也就会有更加完美的方法。善于开始的人尤其能有好的结果，用来去紧跟大孝的最高标准，就会做到心迹与前人完全一样。如果试着探求继承和承继的事例，那就会更加明白周武王和周公的那种可以普遍适用于天下的最大的“孝”了。

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以仁义自诿者，是自弃其身也。夫居仁由义，亦为之而已矣，孰谓非吾身事乎！而诿曰不能，所谓自弃者，此耳。且天生人而与以身，即有与身俱来者。是故欲知其身之弃不弃，当转而叩其身之能不能。本不能也，而不甘于不能，则不能者终进于能。本能也，而甘于不能，则能者亦归于不能。至甘于不能而其自弃也，乃不啻甘之矣。彼非礼义者，不知礼义，犹无足怪也。乃天下明明有知仁义而卒不可以有为者，则何哉！恻隐羞恶之良，人所固有。使知仁义与吾身有两相附丽

之缘，则虽虚与委蛇，而若合若离，犹望其有自强之一日。穷理人神之学，固所难言。第令吾身与仁义有不忍恝置之念，则虽时形捍格，而将迎将距，尚冀其有自悟之一时。是故仁义非不可为也，为之在吾；居仁由义非不可能也，能之在身。而奈之何竟有不然者？

凡人之情，知美德之可贵。功虽未施，辄矫饰以为已有，则有以不能为能者矣。夫矫饰亦岂足以窃仁义之名！而君子犹曲恕之，谓其有掠美之心，斯歆羡在是，是其机尚有可转也。至并矫饰之心，而亦不留于寤寐，则苟且既习于性成，锢蔽更难以术救。虽欲强为推挽焉，庸有冀乎？凡人之情，知大任之难胜。力虽不逮，尚宽假以俟后期，则有以不能而姑云未能者矣。夫宽假亦岂足以缓居由之责！而君子犹姑俟之，谓其有难辞之隐，则顾忌在是，是其愧尚有可激也。至并宽假之说，而亦不欲以自文，则当局既先加决绝，旁观复何事低徊？虽欲代为策励焉，究何裨乎？谓之自弃，职是故耳。

造物之降衷，如此其备；材力聪明之用，非必独绌于是人。乃不自爱惜者，冥然独抱此形骸。天爵虽贵，谁复能牖其衷也？夫举善而教不能，朝廷日辟仁义之途，以引伸士类。而乡简不率，郊遂有时而递移。物必先腐也，而后人弃之。夫非咎由自取哉！师友之责望，如此其勤；诗书礼乐之化，非必独吝于是人。而狃于苟安者，恬然自甘于放废。大道虽公，谁则能侬之力也？夫嘉善而矜不能，圣贤亦宏仁义之训，以乐育人才。而愤悱未经，教诲有时而不屑。人必自废也，而后人置之。夫非戚之自贻哉！藉非然者，吾犹日望其能矣。

推托仁义的人，是自己抛弃自己。在心中保持“仁”、在行为上履行“义”，要做也就是去做罢了，谁说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呢！然而却推托说不能，所谓自己抛弃自己，就是说的这种举动。况且，上天降生人而给予他身躯，便有与他的身躯同时来到人世的东西。所以，要想知道自己是否该抛弃自己，应当转而问问自己能不能去做。原本不能去做，但不甘心不能做，那么，原本不能做的人最终会达到能去做。原本能去做，但却甘心不能做，那么，原本能做的人也会退到不能去做。至于那种甘心不能做而且自己抛弃自己的人，那就无疑是

甘心这样了。这种人不是讲究礼义的人，不知道礼义，所以还无足怪罪。但是，天下明明有知道仁义可却最终不能有作为的人，那就没法说了！恻隐羞恶之心，是人所固有的。假使知道仁义与自己的身躯有两相附丽的缘份，那么，尽管内心与仁义虚与委蛇，但它们却保持着若合若离的关系，还有希望能有自强的那一天的。穷理入神的学问，确实是难以说清的。然而，只要让自己与仁义保持着不忍恕置的念头，那么，尽管内心与仁义不时发生抵触，但它们却保持着将迎将距的关系，还有希望能有自悟的那一刻的。所以，仁义不是不能做到，要做到仁义就在于自己；在心中保持“仁”、在行为上履行“义”不是不可能的，让它实现就在于自身。然而，没有办法的是，竟然有不这样做的人。

人的心理，都知道美德是可贵的。所以，尽管没下功夫，但总喜欢做作，认为自己已经具备。这样，就有了原本不能、却硬要逞能的人。难道做作也能窃取仁义的名声吗？然而君子却仍然宽恕他们，只是说他们有掠美之心；只要他们这种追求在这上面，那他们还可能会有转机。至于他们始终保持做作的心态，而且对在心中保持“仁”、在行为上履行“义”整天也不留心；那么，他们既然已经苟且成性，这种难以改正的毛病也就更难再有什么办法挽救了。即便想要强行推他们一把，但这又有什么希望呢？人的心理，都知道重任是难以胜任的。所以，尽管能力不行，但还是希望能再等一等以等候来日。这样，就有了原本不能、却暂时说不能的人。难道再等一等也足以把心中保持“仁”、在行为上履行“义”这种责任往后推吗？然而，君子却仍然暂且等着他们，只是说他们有难以表达的隐情；既然他们还有这种顾忌，那他们的羞愧之心还是可以激励的。至于他们始终保持再等一等的说法，而且自己也不想再做掩饰；那么，既然当事人已经首先拒绝，那旁观者又何必要替他们感到焦急呢？即便想要单方面地去鞭策他们，但这对他们究竟又有什么帮助呢？说他们自己抛弃自己，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造物者把善良本性赐给人类，是如此完备；才干和聪明的发挥，并非必然会偏偏就少给某一个人。然而，自己不爱惜自己的人，却昏

昏噩噩,只是空有这副躯壳。“仁”、“义”、“忠”、“信”这些上天所设立的爵位虽然宝贵,但又有谁能够使他们的善良本性开窍呢?弘扬善行而教育还不能行善的人,朝廷每天都在开辟着仁义的大道,以引导和启发读书人。然而有人在地方荐举后却不服从教导,按规定被贬斥到郊野去。事物必然是先腐烂,然后才会被人抛弃。这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老师和朋友的期望,是如此的殷切;诗书礼乐的教化,并非必然会偏偏就不作用于某一个人。然而,习惯于苟且偷安的人,却心安理得,自己甘心让自己成为放荡颓废的人。最美好的法则虽然公正,但又有谁能为他们助一臂之力呢?赞扬善行而怜悯不能行善的人,圣贤也在不断扩展仁义的教诲,以尽心地培育人才。然而没经过自己的冥思苦想,师长的教诲有时也会对他不屑一顾。人必然是自己废弃了自己,然后才会被别人甩在一边。这种悲剧难道不是由自己造成的吗!假使不是这样的人,我仍然每天都在希望他能够在心中保持“仁”、在行为上履行“义”。

刘绎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建极者绥猷之本,整军者经武之规,防民者正俗之原,重粟者阜财之要。古帝王酌元御宇,锡福诚民。将欲严至德于缉熙,申明威于军旅,令典昭而闾阎胥静,民生厚而输转惟勤,则必本持盈保泰之心,以懋咸五登三之治。逖稽往牒,《书》昭典学,《易》叶师贞,《礼》垂禁暴之文,《传》美泛舟之役。是故惟时惟几,上理也;有严有翼,英规也;相保相受,有干有年,安民和众之善经也。仁圣道赅,粲乎同揆。所由亮敷天之骏业、丰寿世之鸿规者,胥恃此道耳。

钦惟皇帝陛下,积懋修和,法详简阅,昭荡平之正轨,普乐利之深仁。固已抱蜀垂刑而舞干敷德,播琴化俗而纳秸输忱矣。乃圣怀冲挹,犹切勤求,撮细壤以崇山,导涓流而益海。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慎德、讲武、卫民、利漕诸大端。臣占毕庸愚,曷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就平日所诵习者,藉摅葵藿之诚,用效刍荛之献乎!

伏读制策有曰:保泰之道在于谨几,而因推原夫治法心法之所由懋。此诚圣功王道之至精也。臣考《尧典》一篇,始终曰钦,而授受之道,不外惟精惟一之旨。其后禹之祗台,汤之日跻,文之小心,武之执竞,皆本无怠无荒之意,以迪夫谨小慎微之德。三代以后,如唐太宗《贞观金镜述》与《帝范》三卷相表里,尚有关于治术学术,可与汉文景同称盛焉。然而世变不同,所尚各异,则始终不及于古矣。从古内圣外王之学,莫备于《大学》之教统。内圣外王而归之于修齐,诚握乎其要而综乎其原也。夫存诚乃所以保泰。考《易》之象,阳开三而成泰。《乾》之三曰:终日乾乾,夕惕若。盖忧勤惕厉,所以开泰交之运也。故《泰》之三亦曰:艰贞无咎。《程传》谓:既能艰贞,即可常保其泰。又曰:善保泰者,其福可长也。故德善日积,则福禄日臻。彼清净亦可以致治,而非高谈名理之谓;兢业本所以揆几,而非衡石传餐之文也。可不辨其微与?皇上正谊明道,励俗宜风,盛三雍之上仪,修五品之常教,酌百王损益之中,成一代太平之治。不诚绍乎唐虞之至德哉!

制策又以兵可不用,不可无备,而爰念夫器械必精、伍两必协之政。臣谨按《周礼》所载振旅、茇舍、治兵、大阅,致以鼓铎镯铙,教以坐作进退,蒐苗狝狩,立法綦详。管子作内政寄军令,春秋角试以练精锐,固有教目、教身诸法,务使娴习有素,所以齐步伐、整威仪也。汉时置材官于郡国,南军以卫宫城,北军以卫京师。其时训练之方,厥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诸制,而都试之法十月举行。唐代之制有府兵,三时劝农,一时讲武。太宗常引诸卫将帅习射于显德殿,赏以弓刀绢布。由是人知自奋,悉为精锐。宋咸平有东武之阅,而八阵之额,训练于是设官;明于谦拯京师之弊,而十营之改,团练所以创议。自古沿革不同,成规具在,不外督率之用、振厉之方。王骥所为,有练胆、练技、练阵、练地、练时之法也。要在操兵权者随时讲习,加意稽查;行之以信,恤之以仁;庶几纪律严明,声威远著,士气益奋,而咸知所劝矣。圣世文德武功,渐被中外,寰海镜清,销剑戟以为农器,而营伍之间讲求至密。盖偃武而不忘武备,养兵而不弛兵威矣。

制策又以稂莠不去,嘉禾不生,而因思所以发奸摘伏,震慑邪慝。此又制治保邦之至计也。臣考比闾族党之法,士师八成之治,所

以防微杜渐、弭盗于未然者也。且夫盗之发也，始或出于一时射利之意，继或逞夫一时好胜之心，至于惑于邪说，而金钱取以奉人，身家置之不顾，而陷溺日益深矣。而为长吏者，其初视为无害，而姑息养奸；其后畏于干谴，而隐匿不报。则所以纠察之者，诚不可不亟讲矣。夫安良必先弭盗，而弭盗莫如保甲。保甲之设，原于《周官》，管子因而变通之，创轨里连乡之法。皆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近识之事，其法最为尽善。其后亭长、啬夫称于汉，里正、坊正置于唐，犹此制也。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故王守仁行之南赣而民以为便，王安石行之熙丰而民不胜扰。盖稽核必协于画一，而法令惟恐其纷更也。他如龚遂守渤海，以散为饵；张敞治京兆，以用为饵。尹赏守长安，志在锄奸；郭伋守颍川，意存安抚。是亦弭盗之善术也已。圣朝深仁厚泽，仓廪实则民自爱其身家，学校兴则民咸知夫礼义。固胥一世而纳之轨物也，又何有宵小之窃发也哉！

制策又以治漕济运，必先治河，而因讲求启闭之节，疏浚之宜，潴蓄之利。臣惟三代以前，漕运之法未详。《禹贡》州末系河，先儒以为运道至于青达济，扬达泗，荆止于南河，雍止于西河。此正裴耀卿节级转输之法。汉唐而下，漕法始详。汉孝武通西南而劳馈饷，郑当时引渭水入河以通运，桑弘羊请山东致粟而益漕。光武时张纯引洛而穿阳渠，安帝时虞诩凿阻而达下流，曹魏由陈项以抵寿春，元魏运中州以济边镇。此其得失，皆可考也。夫沿河以运漕，逾江淮而达京师，其所资治河之功者甚钜。溯自明初，浚会通之故道，瀹汝水以分流，而疏清河之浦，凿二洪之石，则平江之功，全河允赖。苟随时而导之防之，何至于南患河身之广而清水不能敌黄，北患河流之微而湖水不能济运乎？夫漕粮为天庾正供，治河转运，任事者当深悉其方略矣。国家海宇恬波，河流顺轨，设飞挽以输漕，疏大川以作运，俾贡赋通于三壤，刍粟济于群黎，不诚驾禹功而上之也哉！

若此者：治心者其学，奋武者其猷，保俗者其规，丰财者其政。以端主德，则三才之道备焉；以详武略，则五权之法昭焉；以肃宪章，则四民之生遂焉；以兴水利，则千仓之积盈焉。洋洋乎治迈鸿轩，祥呈象纬，盖亘古独隆矣！臣尤伏愿皇上，日新进德，天健昭行，本至诚无

息之衷,臻累治重熙之盛。宸居作所,以存诚为安止之符;甲士奏功,以畜众为容民之务。礼教已臻善俗,而弥切劝惩;和丰已裕群生,而犹勤补助。于以奉三无,安九有,扬休于六宇,式化于八埏。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高准则是安定天下的根本,整顿军队是讲求军事的要求,防备百姓是端正风俗的源头,重视粮食是增多财富的关键。古代帝王斟酌初始,统治天下,赐给民众幸福、使民众和谐安宁。要想在日积月累中严格培养最高的道德,在军队里树立明确的权威,使法令制度得到贯彻而民间安宁平静,百姓生活丰厚而输送转运经常进行,那就一定要本着持盈保泰的思想,来努力实现超越五帝三王的治绩。远考以往的书籍,《尚书》昭示了学习的事情,《周易》有军队严整的占卜,《礼记》留有禁止凶恶的记载,《左传》赞美秦国用船向晋国输送粮食的活动。因此,时时事事保持警惕,是最高的政治要求;既威严又显赫,是英武的法式;彼此保护又共同承担责任,有防卫,有丰年,是安抚百姓、协调众人的良好原则。仁爱、神圣的道德已经完美,道理相同,非常明晰。之所以能光大普天之下的伟大事业,扩大太平盛世的宏大规划,都是依靠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培育美好道德,军事制度十分详尽;向民众昭示了光明大道,播撒使百姓有利、感到欢乐的深深的仁爱。已经手握权杖颁布了刑法,整顿了军队,布施了德政,教化已经传播,民俗已经改变,四方贡献不断。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仍然不断殷切探求,想要收取细小泥土来增加大山的高度,引导涓涓细流来增添大海的广阔,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遵从道德、讲求军备、维护民众、方便漕运等大政来策问我们。臣下我只会背诵书本,十分平庸愚昧,哪知道国家大政?但在对策开始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尚书·尧典》所说的让大家都陈述政务的教诲,哪敢不把平时自己所学习、诵读的东西拿出来,借此抒发葵花向阳的忠诚,用来效法割草打柴人的那种微小奉献,提出村野鄙见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认为保持天下太平的办法在于谨小慎微,因而从本原上去推导统治方法和传心养性方法的扩展途径。这确实是圣人功夫和帝王原则最精微的地方了。臣下我考察《尧典》,全篇始终说诚敬,而传授的原则不外乎是"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只有精诚专一,才能真诚地保持中道"这一主旨。这以后,大禹的"敬重以道德为先",商汤王的"诚敬天天升华",周文王的"事事都要做到诚敬",周武王的"保持自强",都来源于不要怠惰、不要荒废的意思,是用来启发谨小慎微的德行的。三代以后,如唐太宗的《贞观金镜述》和《帝范》三卷互相补充,还与统治方法和学术有关,可以和汉文帝、汉景帝一道号称鼎盛。可是由于世代变化不同,所崇尚的也各不同,所以他们也就始终比不上古代帝王了。自古以来,"内圣外王"的学说,没有比《大学》的教统更完备的。把"内圣外王"归结到"修身齐家",确实抓住了它的要害、综合了它的原理。保存真诚就是用来保持国家平安的。考察《易经》的卦象,阳爻开三就成了安泰。《乾卦》的三爻说:"整个白天自强不息,夜晚像提防危险一样提高警惕。"这是因为经常保持警惕是用来开启泰交之运的。所以《泰卦》的三爻也说:"艰贞就能无害。"程氏《周易传》说:"既然能艰贞,就可以常常保持平安。"又说:"善于保持平安的,福气也就可以长久了。"所以德行善事天天积累,福禄也就一天比一天多。清净无为也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并不是指的高谈名理;兢兢业业是用来辨明事物苗头的,并不是指的废寝忘食、埋头处理大量公文。这种细微的区别不辨别清楚能行吗?皇上强化正义,宣明大道,改造风俗,使汉朝三雍宫尊崇文教的盛景再现,使五种伦理的基本教化得以贯彻,有选择的吸取百王的经验教训,造成一代天下太平的治理,这不的确是承续了唐尧虞舜的最好德行吗!

制策又认为兵可以不用,但不可无备,因而想到武器装备一定要精良,军队上下一定要协调。臣下我细致查考:《周礼》记载有春季回师入城,夏季野营拉练,秋季军事演习,冬季大规模阅兵,运用锣、鼓、钟、铙,教会士兵坐下、起立、前进、后退;一年四季围猎训练的方法,制度订立得十分详细。管子在制订国内政令的同时把军令也放在了

里面，春秋举行“角试”以训练精锐，原本就有了“教目”、“教身”等方法，务必使部队平素演练娴熟，用来整齐步伐，整顿威仪。汉朝时，在郡国设置“材官”，用南军来保卫宫城，用北军来保卫京城，那时训练的方法，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诸种制度，而“都试”的制度在十月举行。唐朝的制度有“府兵”，一年三季从事农业生产，一季进行军事训练。唐太宗常常引进诸卫将帅在显德殿练习射箭，拿弓刀绢布赏赐他们。因此人人知道发奋，全都成了精锐。宋朝咸平年间有东武阅兵，于是，按八阵的名目训练，并设置了专职官员。明朝的于谦革除京城部队的弊病，把十营改为团练的办法由此产生。自古以来，制度沿革是不相同的，已有规则全都还在，不外乎是督导统率的办法、振奋士气的方法。王骥所创立的，有“练胆”、“练技”、“练阵”、“练地”、“练时”等方法。重要的是在于掌握兵权的人随时讲习，加意稽察，以诚信施行，用仁爱体恤，就能做到声威远著，士气更加奋发，而且大家都知道努力了。如今，圣世文德武功逐渐覆盖中外，天下如镜子一样清明；尽管销毁剑戟等武器来做农器，然而在军队中却越加讲求军事训练。因为停止作战却不能忘记军备，蓄养军队却不能废弛军威。

制策又认为杂草不除，好苗就不能生长，因而想要寻求能够捕获坏人、震慑邪恶的方法。这又是治理天下、保卫国家的最重要事情。臣下我考察：《周礼》“比”、“闾”、“族”、“党”的制度、士师按“八成”的要求来实施的治安管理，是用来防微杜渐、把盗贼消灭在未发生之前的。盗贼的产生，开始或许是出于一时贪图钱财的想法，接着或许是施逞一时的好胜心，结果被邪说迷惑，便把金钱拿来奉献给别人，身家性命也置之不顾，一天比一天陷溺得更深了。可是做长吏的，起初认为没有害处，而姑息养奸；后来又害怕遭到处分，因而隐瞒不报。由此可见，用来纠察的对策，确实不可不认真讲求了。安抚良民必定要先消除强盗，而消除强盗的办法没有比保甲更好的了。保甲的设置，原本出于《周礼》，管子承袭而变通了它，创建“轨里连乡”的制度。它们都是用里巷互相熟的人，监察耳目相近的事情。这办法非常完善。后来，在汉朝出现的“亭长”、“啬夫”，在唐朝设置的“里正”、

"坊正",还是这种制度。只是有了好的制度,更要有能很好施行这种制度的人。所以王守仁在南赣施行保甲,老百姓认为方便;而王安石在熙宁、元丰时期施行保甲,老百姓却忍受不了它的搔扰。这是因为稽察核对一定要协调统一,法令就最怕变来变去。其他如龚遂做渤海太守,用"解散"作为诱饵;张敞治理京城,拿"任用"作为诱饵;尹赏镇守长安,下决心坚决消灭盗贼;郭伋做颍川太守,曲意安抚盗贼。这些都是消除盗贼的好办法。圣朝有深厚的仁爱和恩惠,仓库充实,百姓自然会爱自己的生命和家庭,学校兴旺,百姓都知道了礼义。本来我们这一时代都已经全部纳入了正轨,又怎么会有坏人乘机跳出来捣乱呢!

制策又认为治理漕运、增加运河运量一定要先治理黄河,因而讲求启闭的控制,疏浚的得当,潴蓄的便利。臣下我想来:三代以前漕运的办法不能详尽知道,《禹贡》在九州后记载了河道情况,于是先儒们认为当时的运道是从青州到济水,从扬州到泗水,而荆州的河道则到南河就中断了,雍州的河道则到西河就中断了。这正是裴耀卿逐级转运的办法。汉唐以后,漕运制度才开始详细起来。汉武帝打通西南运送馈饷,郑当时引渭水进入黄河来接通水运,桑弘羊请求让山东送来粮食、因而增加了漕运。东汉光武帝时,张纯为了引来洛水而开通了阳渠;安帝时,虞诩开凿阻碍处,使船只能通达下流;曹魏时,由陈郡、项县抵达寿春;北魏时,运中州的粮食来接济边镇。这些举措的得失都可以考察的。沿运河转运粮食,经过江淮到达京城,这对借助治理河道的功效很大。追溯到明朝初年,疏通会通河故道,疏导汝水加以分流,又疏理清河湾,开凿洪泽湖的石坝。由此可见,平江的功效,使整个河道确实都有了依靠。假如随时疏导它,防止淤积,那何至于在南边担心黄河河床广阔,清水不能抵挡黄水,北边担心淮河流量微少,洪泽湖水不能帮助漕运呢?漕运的粮食是地方上缴给京师仓库的正额上供,治理河道进行运输,担任漕运职责的人应当深深了解其方法策略。我们国家沿海地区风平浪静,河流顺着河道平静流淌;设置快速运输来运送漕粮,疏通大河来进行运输;使贡物赋税通达到全国,草料粮食可以救济众百姓,不正是超越大禹的功劳了吗!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治心，是学问；振兴军备，是谋略；维护风俗，是准则；丰富财物，是政要。用学问来端正主上的品德，那天、地、人这“三才”之道就能齐备；用谋略来详尽制订军事策略，那治军“五权”的法则就能得以贯彻；用准则来严肃法纪，那士、农、工、商这“四民”的生活就能幸福；用政要来兴修水利，那千仓万库的积蓄就能充裕。如今治理超越了帝鸿氏和轩辕氏，日月五星呈现祥瑞，属于千古而呈现出的独有兴隆景象。这是多么伟大呀！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道德每天都有长进，自强不息，本着极为真诚不息的心念，到达功业辉煌、代代相传的盛世。在平时安居和临朝听政的时候，把“存诚”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在披挂盔甲的战士取得战功的时候，就要像《周易·师卦》所说的那样，把像地中有水一样容民养众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任务。尽管礼教已经使风俗变得十分醇美，但还要进一步殷切劝勉和惩戒百姓；尽管太平和丰收已经使百姓们生活富裕了，但还要经常积蓄粮食。在此基础上，奉行“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这“三无”原则，安定九州；在天地之间宣扬美善，在八方之内传播教化。这样，我国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曹联桂　会试卷二道

曹联桂（生卒年不详）　字馨心，江西新建（今南昌）人。道光十五年（1835）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推孝所由达，于志事验之焉。夫志事而继述则孝矣，志事而善于继述，乃孝所由达也。子故赞武周而申言之欤！且夫孝之道，合天人而一以贯之者也。顺乎天理之当然而孝在，应乎人心之同然而孝在。论者第以恪承先业为足仰体亲心，是以庸众之孝窥圣贤，以凡民之孝

律君相。乌足与尚论时世，显扬功烈，而以观我朝世德相承之盛也欤！武周之达孝，于何徵之？徵之于志事焉耳。夫先人有无穷之思，而可共白于天下。其志本无他也，世笃忠贞而益勤于服事，此为继序不忘焉。先人有素守之业，而以留贻于来兹。其志本众著也，家传典则而有事于修明，此为述而不作焉。虽然，执是以言，可云继述，未可云善也。夫孝者之继述，亦唯其善焉而已。

后儒据陈迹而观，谓弓矢专征变而麾旄仗钺，玉门演册易而制礼建官。其志其事，固有大相径庭者。而不知唯其善也，质诸当世而无惭，即告诸先灵而不愧。运移势极之会，有必如是而后理得心安者。而岂得以今昔而泥之！俗士凭臆见为断，谓管叔、蔡叔犹然胜国之忠臣，《多士》、《多方》可验新朝之违怨。曰继曰述，岂得竟无余憾者！而不知唯其善也，一时不及窥其隐，万世如将见其心。建中立极之余，有不如是而难光前裕后者。而岂得以创制而疑之！

是故《有声》一诗，盛称辟雍之化，明家法之有自承也。文王之文，非不足于武；武王之武，非不足于文。圣圣相承而丕扬大烈，变通其志，而先人之志光；恢拓其事，而先人之事大。夫亦维孝思之弥纶已矣。《周南》一篇，不著分陕之勋，明国政之有所统也。为文王之子，庆衍螽斯；为武王之弟，谋襄燕翼。心心相印而迪惟前光，守为继，创亦为继；雅颂变国风之音，因为述，造亦为述。《官礼》本《雎》、《麟》之意，夫亦维孝思之周浹已矣。开八百年有道之长，贤君相化家为国；绍九十载无疆之德，难兄弟奉父为师。君子观我朝世德相承之盛，而叹孝治天下之永世无穷也。

推求“孝”可以达到普遍适用于天下的那种境界的原因，可以从志向和事业上来验证。如果在志向和事业上能继承前人和能承继前人，那就是“孝”。如果在志向和事业上能善于继承前人和能善于承继前人，那“孝”也就可以达到普遍适用于天下的那种境界了。孔子不就是因此而赞扬武王和周公、并申明了这其中原理的吗！而且“孝”的原则，就是总合天与人而把它们统一贯穿起来的东西。如果顺应天理的自然法则，就自然会有“孝”；如果顺应人心的共同法则，

就自然会有"孝"。议论者却认为只要能恭敬地继承祖先的事业就足能符合祖先的心意,这是用一般人的"孝"来窥视圣人和贤人的"孝",用民众的"孝"来规定君主和辅相的"孝"。这怎么能用来评论时代,颂扬功绩,进而观看我朝世世代代道德交相继承的盛况呢!武王和周公那种可以普遍适用于天下的最大的"孝",从哪里可以找到呢?只消从志向和事业上就可以找到。先人有无穷的心思,并且能够向天下表白清楚。这种志向原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后人世代保持忠贞,而且更加勤奋地工作。这是不忘记继承和保住祖先的基业。先人已经有了基业,并且把它留给了后代。这种志向原本就是大家都明白的,后人继承祖先的规定,而且把政事处理得很好。这是承继而不作发挥。虽然依据这种情况来看,可以说是继承和承继,但还不能说是善于继承和善于承继。具有孝心的人,他们的继承和承继,也就是善于继承和善于承继罢了。

后代的儒生根据对历史实事的考察,认为周国当初为商朝讨伐西戎,周武王时却演变为率兵讨伐商朝;周文王在当初推衍八卦,周公时期却演变为制订周朝的礼仪和建立周朝的官制。他们的志向和他们的事业,前后确实是大相径庭的。然而儒生们却不知道只要能做到善于继承和善于承继,能够接受当时社会的检验而不感到惭愧,那么在告慰各位祖先的灵魂时也就不会感到惭愧了。在天命转移、形势转折的关头,必须得这样,然后才能心安理得。这怎么能够不管古今变化而拘泥于固定的看法呢!见识浅陋的人凭自己的主观意见做判断,认为管叔和蔡叔还是商朝的忠臣,《尚书》的《多士》和《多方》就可以验证商朝臣民对新建周朝的怨恨。要说继承和承继,哪会一点儿没有值得遗憾的事情呢!然而这些人不知道只要能做到善于继承和善于承继,那么尽管一时还来不及看清其中的隐情,但万世却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周武王和周公的心迹。在建立"中正之道"和最高准则的时候,如果不这样做,那就很难做到为前人增光、为后人奠基了。这怎么能够因为创立制度而怀疑周武王和周公呢!

因而《诗经·文王有声》这首诗,高度赞美了文王迁都丰邑和武王迁都镐京时的学校教育,表明了周朝的家法是前后相传的。周文

王进行文治，并不表明他不能建立武功；周武王建立武功，并不表明他不能进行文治。这些圣人代代相传，从而建立了赫赫功勋；他们变通祖先的志向，从而使先人的志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他们弘扬前人的事业，从而使先人的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些也只有本着孝心才能包罗和总括。《诗经·周南》这篇诗，没有彰明周公和召公分划陕地而各自治理的功勋，表明了周朝的国家政治前后是统一的。周武王作为文王的儿子，他发展了前人的事业、使子孙繁衍兴旺；周公作为武王的弟弟，他出谋划策、为子孙考虑天下大计。他们心心相印，发扬和光大前人的事业，保守是继承，创造也是继承。《诗经》的"雅"和"颂"改变了"国风"的音乐，因袭是承继，创造也是承继。《周礼》本着《关雎》和《麟之趾》诗的的精神制订，也只有本着孝心才能做到周密和详备。他们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美好而长久的历史，贤明的君主和辅相把家庭化为了国家；他们继承了享年九十七岁的周文王的影响长远的道德，难兄难弟共同尊奉父亲为老师。君子如果观看我朝世世代代道德相传的盛况，那就会感叹：用"孝"的原则来治理天下，将是永世无穷的。

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以身所能者而自谓不能，弃其能即弃其身矣。夫身有仁即能居仁，身有义即能由义。乃自诿曰不能，是尚足与有为乎？且夫人之有身，亦何事不可为哉！其为之者能之也，理得于天而非由外铄，才足于己而无事他求。夫亦重视其身而已矣。而不然者，既以薄待其身，因以厚诬其力。吾不知其自待果居何等也。何以谓自弃者之不足与为哉？为莫大于仁，仁兼万端，屋漏旦明之地，必以是为居焉。为莫重于义，义制百物，周旋进退之间，必以是为由焉。夫其所以居之由之者，身也；而使其身居之由之者，吾也。且夫一言吾，而其所能曷可意量测哉！

其身可以立言、立功、立德，而以仁义为体验之端。渊渊乎！一私之无敢存也，一理之无敢越也。制心制事之余，固有父兄师保所不及

觉者，断之自吾，而志气俱振，惟恐与流俗为归焉。若此者谓之自爱。其身可以希贤、希圣、希天，而以仁义为依归之地。浩浩乎！体仁足以长人也，利物足以和义也。至精至熟之候，固有天地民物胥受范围者，行之在吾，而知勇相乘，卓然备大人之事焉。若此者谓之自成。乃今而概诿曰不能。害仁者欲，谓吾不能去欲；贼义者利，谓吾不能忘利。此亦情之陷溺已深也。

然天下岂有难制之情哉？既纵恶而力有余施，则亦可迁善。而才无弗逮，乃并无转移之念，而先为决绝之词，是非徒不自树立也。仔肩不切于当躬，犹望为崇朝之奋，愧悔胥捐于寸念，乃终无夜气之萌矣。恻隐，仁之端，谓吾不能有恻隐；羞恶，义之端，谓吾不能存羞恶。此亦性之昏蔽已甚也。然天下岂有难反之性哉？既知有吾而不甘同于物，即宜抚此身而不敢亵其天。乃并无惩创之怀，而转作怨尤之语。是非仅妄自菲薄也。当境或形退沮，犹可激发于半途；抚衷已极衰颓，乃如陨坠于深谷矣。此为自弃而已矣。夫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则不至为人所弃也。乃人不弃我，而我先自弃，则亦终必见弃于人焉。是尚可与有为哉？

如果自身有能力但自己却认为不能做，那么，放弃自己的能力就是抛弃自身。自身有“仁”，在心中就能保持“仁”；自身有“义”，在行为上就能履行“义”。然而有人却推脱说自己不能。这种人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况且，人只要有副身躯，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事情只要去做就能够做成，道理是天生的，而不是由于其它外部原因造成的；自己的才能是足够的，用不着从其它地方去寻求。只不过是要重视自身罢了。然而，有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既然自己看不起自己，因而便大肆糟践自己的能力。我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是把自己摆放在什么位置的。为什么说自己抛弃自己的人不能有所作为呢？人的行为没有比“仁”更大的了。“仁”同时包容着种种表现。在个人独处的地方和早晨明净的时候，必然要凭借“仁”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人的行为没有比“义”更重的了。“义”控制着所有事物。人们在周旋进退的时候，必然要凭借“义”才能达到目的。那之所以能保持“仁”和

履行“义”的东西，就是人的身躯；而能使人的身躯保持“仁”和履行“义”的东西，就是自我。说到自我，它的能量又怎么能够估量呢！

具有这副身躯可以创立学说、建立功劳、确立德行，而把仁义作为体验的开端。这真是深不可测呀！一点私心也不敢存有，一点原则也不敢逾越。控制内心、把握事理之外，尽管还有父亲、兄弟、老师、保姆所未能觉察到的东西，但只要由自我来决断，就能够做到志向与志气同时振奋，惟恐自己退回到流俗上去了。像上面所回答的问题：就叫作自爱。具有这副身躯能有希望达到贤人的境界、能有希望达到圣人的境界、能有希望达到上天的境界，而把仁义作为依归的基地，这是多么伟大呀！体察“仁”就能做世人的领袖，对人和万物有利就能符合“义”。到了最精通、最成熟的时候，尽管有上天、大地、人民、事物都有受到限制的东西，但只要由自我来施行，就能够做到智勇兼备，超凡脱俗地具备伟大人物的品质了。像上面所回答的问题：就叫作自我成全。然而，如今却有人一概推脱说自己不能。危害“仁”的东西，就是“欲”；但他们却说自己不能去除“欲”。损害“义”的东西，就是“利”；但他们却说自己不能忘掉“利”。这也是由于他们的情感已经陷溺得太深了的缘故。

然而天下哪有难以控制的情感呢？既然放纵恶心，而且还有余力去干，反过来的话，那也能改恶从善。而才能没有达不到的，可有人竟没有改正的念头，而且还事先就说出拒绝的言词。这就不单单是自己不去有所树立了。自己不切实担负起责任，那还能期望有只争朝夕的振奋？心中一点都没有了惭愧和悔恨，那最终也就不可能萌发清明和纯净。恻隐，是“仁”的表现；但他们却说自己不能存有恻隐；羞恶，是“义”的表现，但他们却说自己不能存有羞恶。这也是他们的性情已经被困惑得太厉害了。然而，天下哪有难以改正的性情呢？既然知道有自我而不甘心与动物相同，那就应该抚慰自身，而不敢亵渎自己的天性。可有人竟没有接受教训的意思，反而说出怨天尤人的言辞。这就不单单是妄自菲薄了。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还可以在半路上去激发自己；摸摸自己的心，要是已经衰颓到了极点，那就如同掉下了深谷一样了。这不过是自己抛弃自己造成的。在自然

规律中，人是宝贵的。宝贵就不至于被别人遗弃。然而别人不遗弃我，可我却首先自己抛弃了自己。这样一来，最终势必就会被别人遗弃。要是这样的话，那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曹联桂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揆文所以绥众，讲武所以维邦，迓淳和而蒂屋庐欢，重飞挽而竹流效顺。稽诸往籍，《易》重乘乾，《诗》歌鞠旅，《礼》载同风之化，《书》传则壤之文。茂矩宏仪，粲然具备。自古帝王斟元御宇，握镜临宸。《大匡》有解，除器存经，和民而董劝维殷，足国而转输永赖，皆本恪恭谨守之衷，以昭锡羡延洪之庆。用是若时若宗，皇风琚焉；载戢载橐，懿德懋焉；遵道遵路，彝训归焉；厥上厥中，赋法定焉。上哉夐乎！所为弥纶宙合、鼓铸群生、畅九垓而溯八埏者，胥是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体元育物，寿世诚民，固已启泰运于时雍，卜师贞于训练，道重渐摩而化成恒久，功成需养而利普丰绥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廑衢室之畴咨，冀迩言之可采。进臣等于廷，而策以敬德、诘戎、移风、利运诸大政。如臣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绎敷奏以言之义，敢不谨述平昔之所诵习者，以勉效夫管窥蠡测之微忱也乎！

伏读制策有曰：治法莫盛于唐虞，因观夫《典》、《谟》所载，以求久安长治之经。此守诚立政之大纲也。臣考《典》、《谟》之篇，一则曰惟危惟微，一则曰无怠无荒。古帝王未有不谨小慎微、允迪厥德者也。汉之文、景，唐之文皇，称极盛矣。而治终不及古，盖所尚异也。《易》曰：正其本，万物理。握其至简之理，以为宰制之本。斯刀笔筐箧之琐，不足以动其耳目；簿书钱谷之繁，不足以扰其心思。昔《大学》之教，统内圣外王而归于修身。真德秀《衍义》一书，略外而详内，亦重本之意。至明邱浚补之，而内外兼修，本末赅备矣。夫清净可以致治，而高谈名理者或长浮华；兢业所以揆几，而衡石传餐者难言政体。治忽之故，不可不细审之耳。朱子《大学或问》，自修齐以至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或问》，自中和以至位育，枢纽不外乎诚。诚敬立而

法自赅。千古之治术,约之即在乎性功。此深通政要,取鉴古今,为慎修思永之道也。惟能本显明之理,以立乎握要之图,在君则居敬行简而不务乎烦苛,在臣则大法小廉而不流于苟且,由是清和咸理,布政优优。《系辞》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焉。其即斯道之谓也欤!我皇上圣敬日跻,中和建极,心法治法,洵足继唐虞而隆千古矣。

制策又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因详求夫严饬武备、鼓励戎行之法。臣按振旅、茇舍、治兵、大阅,掌于《周官》大司马者綦详。管子春秋角试,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皆所以练精锐也。汉时南军卫宫城,北军卫京师,期门、羽林、材官悉皆入选,而都试、都肄,卞射、貙刘,莫不务为详密。唐讲武都外,举于仲冬。太宗命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赏赐盛行,而其将亦加上等。后惟李抱真观察泽、潞,籍丁男给弓矢,令于农隙分曹角射,得士卒九十余万,昭义步兵称壮盛焉。大要步伐止齐,非训练不能娴习。《晋志》所载:公卿相仪,君王执节。典何如其重也!《唐志》所载:旗分卧举,阵列圜方。容何如其整也!沈括之论九军,臧景之陈马射,皆有关于武事匪浅。王骥所云练兵,一曰练胆,二曰练艺,三曰练阵,四曰练地,五曰练时,尤为缺一不可者矣。夫技艺熟娴,马步骁健,一以当百,固宜所向无前。而要在统兵之员勤于操练而不以自惰,严于赏罚而不以自私,则有以作其忠义之心,鼓其奋勇之气,而戎行以肃,胜兵亦以多矣。始知偃武之时不忘武备,养兵之日不弛兵威,诚有如我皇上整饬兵戎,团练将弁,所由干城有选,而磐石于以无虞哉!

制策又以稂莠不去,嘉禾不生,必先严左道之诛、奇邪之禁。此化民成俗之至计也。臣惟先王之治,六礼节民性,七教兴民德,凡以使愚蒙知所劝,而顽戾知所儆。夫愚人莫不自重其利,自爱其生,一惑于邪说,而金钱取以奉人,身家置之不顾。此在守土之吏化导之为要耳。周有闾胥、比长,其法至善。汉有亭长、啬夫,盘诘奸宄;唐设里正、坊正,检察非常。犹有《周官》遗意,则诘奸之法莫善于保甲。而王安石行之于宋而民不为便,王守仁行之于明而盗无所容,又可见不在法而在行法者矣。且夫长吏惮于纠察者,其初视为无害,姑息养奸;其后惧下严谴,隐匿不报。遂令奸宄得以潜藏,巡察不能周至,迨形

迹既彰，虽如虞诩之广募，而民已不胜其扰。则保甲诚在实力行之，不可因循苟且也。圣天子修和有夏，恺泽如春，道昭乎遍德敷文，治洽乎近光保极。良吏奉行成法，不当宽严相济以臻康乐和亲之治哉？

制策又以治河所以利运，而欲河流顺轨，粮艘遄行，以期一劳永逸。此转输之要图也。臣按王应麟《玉海》云：三代以前，漕运之法不备。《禹贡》州末系河，先儒以为运道至于青达济，扬达泗，荆止南河，雍止西河。此即裴耀卿节级转输之法。汉仰漕于山东，武帝元狩中，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唐太宗时，江淮米至东都，输含嘉仓，而陆运至陕，颇为烦费。夫漕粮为天庾正供，挽粟飞刍，岁有常额。顾逾江淮而达京师，南则患河身之高仰，清水不能敌黄；北则患河流之细弱，湖水不能济运。则治河必先于治漕，启闭之节，疏浚之宜，潴蓄之利，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也。治河之法，惟就下之性不可拂，而遏厥狂澜；宣泄之宜不可违，而慎其启闭。曰疏，曰防，此其大要也。然非束清御黄，亦安能蓄清以制黄乎？况乎因时启闭，治河即以通漕。岁以为常，咸称利济，夫而后明乎地势，因时制宜，被润泽而大丰美者，均由于此也。皇上轸念民依，不惜帑金以通漕运，为群黎谋生聚者至周且备。行见怀柔丕著，润普通渠，不共广仓储而粳玉荐馨哉！

若此者：治茂元功，礼成大阅，道隆会极，泽被苍生。洋洋乎总八方而为极，仁圣之事赅焉，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至诚无息，立政有恒，化敏蒲庐而益凛乾行，威生弧矢而弥廑豫备，野茁葭蓬而犹劳观省，仓盈黍稌而永念丰亨。由是协气旁流，淳风四溢，荣镜宇宙，经纬乾坤，迈蕃厘，绥多禄。猗欤盛哉！所由焕丕天之大律，延亘古之上仪，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振兴文教是用来安抚民众的，讲求军事是用来维护国家的。迎来敦厚温和，民间就会呈现一派祥和；注重快速运输，河流就会顺畅奔流。查考古籍，《周易》注重乾卦有关道德修养的占卜，《诗经》歌唱军队摆布战阵，《周礼》记载着统一风俗的教化，《尚书》传播了地理的分划。宏大的法度、美好的礼仪，光辉灿灿，

全都具备了。自古以来，帝王斟酌初始，统治天下，心怀明镜登临王位。能解释《管子·大匡》，能去除武器而留存经典。督察劝勉非常殷切，使百姓和睦相处；长久依靠转运输送，使国家富足。都能本着恭敬谨慎的内心，使国运洪福无限蔓延。因此，他们能顺应天命、顺应祖宗，使帝王风范十分高尚；能收起干戈、收起弓箭，使美好的德行十分崇高；能遵守先王之道、遵循先王之路，使百姓都归向基本原则；能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而划分等级，确定赋税制度。这是多么高尚、多么久远啊！之所以能经天纬地，养育万物，控制无比广阔的世界，都是靠的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遵循天地之德、抚育万物，使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尽管已经做到了在美好的社会环境中开启国家吉祥的气运，通过训练使军队严整精良；重视道德感化、使风俗能永远保持醇美，国家粮食充裕、使芸芸众生都能受益。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不愿遗漏任何细微的意见，十分注意对民间的咨询，希望能就近听取好的建议。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尊崇道德、整顿军事、改变风俗、方便漕运等大政来策问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怎么能知道国家大政呢？但在对策开始的时侯，臣下我恭敬地牢记《尚书·尧典》所说的让大家都陈述政务的教诲，哪敢不小心陈述平常所诵读、所学习的东西，来努力奉献出管窥蠡测般的微小忠心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治理天下的办法没有比唐尧和虞舜时期更高明的了，从而想要观看《尧典》、《皋陶谟》等经典的记载，来求取久安长治的经验。这真是保持真诚、确立政体的大纲。臣下我认为：在《尧典》、《皋陶谟》等篇章中有两个重要原则，一是“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一是“不要怠惰、不要荒废”。古代的帝王没有不谨小慎微、真诚履行自己德行的。汉朝的文帝和景帝，唐朝的太宗，可以说是极盛了。可是到底赶不上古代，原因是时代所崇尚的不同。《周易》说：端正了根本，万物就得到治理。抓住事物非常简单的道理，用以作为主宰控制天下的根本原则。可见日常公务的琐碎，不足以干扰帝王耳目；文书帐目的繁杂，不足以扰乱帝王的内心。从前，《大学》的教诲，统括“内圣外王”的道理，归结到“修身”上。真德秀

《大学衍义》一书，省略外在功用而详细论说了内心修养，本意也是注重根本。到明朝，邱浚补充它，内外同时修明，本末完全包容了。清净无为可以治理天下，但是高谈名理的人却常常浮华不实。兢兢业业是为了辨明事物的苗头，而废寝忘食、埋头处理大量公文的人却很难把握政体。治理与忽怠的缘故，不可不细致审查它。朱子的《大学或问》，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始终可以归结到“敬”上；《中庸或问》，从保持中道到使天地正位、化育万物，关键不外乎“诚”。“诚敬”树立了，法度自然齐备。千年以来治理天下的办法，简要地说就在“性功”上。这正深深通晓施政的要点，借鉴古今，是谨慎修身、想到国运长久的方法。只要能本着显明的道理，来确立把握关键的原则；那么，对于君主来说，就能做到保持诚敬、施政简要而不追求烦琐苛刻；对于臣子来说，就能做到大臣守法、小官廉洁而不会放任苟且。这样，就能实现天下大治，施政绰绰有余。《周易·系辞》说：“阴阳变化简单，但却能把握天下的道理。”不就说的是这个办法吗！我皇上圣明诚敬天天升华，用平和中正建立起最高准则，传心养性的方法和统治的方法，确实足以继承唐尧虞舜而隆盛千古了。

制策又认为兵可以百年不用，但不可以一天不备，从而想要详细探求严格整顿军队和鼓励士气的方法。臣下我认为：春季回师入城、夏季野营拉练、秋季军事演习、冬季大规模阅兵，在《周礼》的记载上，由大司马掌管，极为详细。管子的春秋角试，“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都是用来训练精锐的。汉朝南军保卫宫城，北军保卫京师；“期门”、“羽林”、“材官”这些兵种全都入选；而且“都试”、“都肄”，“卞射”、“貙刘”这些制度，没有不务求详细周密的。唐朝在都城外所进行的军事训练，在冬季的第二个月举行。唐太宗命令诸卫将兵在显德殿射箭，赏赐盛行，那些将领也加为上等。后来只有李抱真担任泽、潞观察使时，征集成年男子，发给弓箭，命令他们在农闲时分队比试射箭，由此得到士兵九十余万，使昭义节度使麾下的步兵号称强盛。总之，要做到步伐整齐，除了训练，就不能娴熟掌握。《晋志》记载：在拜将时，公卿参加仪式，由君王手持节钺。这种典礼是多么隆重呵！《唐志》记载：在举行军事训练时，将士随着令旗卧下

起立，布列圆阵和方阵。这种阵容是多么严整呵！沈括议论九军阵法，臧景陈述骑马射箭，对于军事都是很有用的。王骥所说的练兵，一叫练胆、二叫练艺、三叫练阵、四叫练地、五叫练时，这尤其是缺一不可的。技艺熟娴，马、步军骁健，一以当百，怪不得能够所向无前。总之在于统兵将领勤奋操练而自身不懒惰，赏罚严格而不自私；那么，就能激励士兵的忠义之心，就能鼓舞士兵的奋勇之气，从而使军队严整，精锐士兵也就能得以增多了。臣下我这才知道停止作战不能忘记军备，养兵的时候不能废弛军威，确实像我皇上那样整饬军事，训练将士，由此就能挑选出国家的有力捍卫者，从而使国家坚如磐石，没有担忧的事情！

制策又认为杂草不除，好苗就不能生长，因此一定要首先严厉惩罚邪门歪道，严厉禁止邪恶行径。这是教化百姓、形成好风俗的最好计谋。臣下我认为：先王治理天下，之所以用“六礼”来调节百姓的性情、用“七教”来培养百姓的美德，就是想让愚昧无知的人知道上进，顽固凶暴的人知道畏惧。愚昧的人没有不看重自己利益、爱惜自己生命的，然而他们一旦被邪说迷惑，就会把金钱拿来奉送给别人，连身家性命也不顾了。对此，地方官吏的教化和引导是很重要的。周朝有“胥间”、“比长”，制度非常好。汉朝有“亭长”、“啬夫”，负责盘查和追问奸恶；唐朝设置“里正”、“坊正”，负责稽查坏人坏事。这还保留了《周礼》的意义。由此可见，追究坏人的办法没有比保甲更好的了。可王安石在宋朝施行保甲，百姓却不认为方便；王守仁在明朝施行保甲，盗贼却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又可见问题不在法令，而在执行法令的人。地方高级官员之所以害怕纠察，是因为他们起初认为无害，姑息养奸；到后来，又畏惧受到上面严厉谴责，便隐匿不上报。于是就使得奸恶得以潜藏，巡察不能周到。等到盗贼的形迹已经明显了，即使像虞诩那样广泛招募捕役，百姓也已经不能忍受骚扰了。由此可见，保甲制度确实得要下大力气去施行，不能因循苟且。圣明天子治理华夏，和蔼感人，恩泽像春天一样；品德和文化教育普及，道德得到尊崇；治理达到百姓接近天子的尊容，保持住最高准则。优秀官吏奉行已有的法令，宽严互相补充，必将达到康乐和平的太平局面！

制策又认为治理河道是用来便利漕运的，因而想要使河流顺着河道安然流淌，粮船到处通行，以便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这是转运输送粮食的重要计划。臣下我认为：王应麟的《玉海》说：三代以前的漕运制度不完备。《禹贡》在九州后记载了河道情况，于是先儒们认为当时的运道是从青州到济水，从扬州到泗水，而荆州的河道则到南河就中断了，雍州的河道则到西河就中断了。这正是裴耀卿逐级转运的办法。汉朝依靠山东的漕运粮食来接济京城。武帝元狩期间，下河漕运了四百万石。唐太宗时，江淮的粮食运到东都，交到含嘉仓；但陆运到陕州，颇为艰难、耗费很大。漕运的粮食是京师仓库的正额上供，车载船运，每年有规定的数额。经过江淮到达京城，南边就担心河床的高出，清水不能抵挡黄水；北边就担心河道流水的细弱，洪泽湖水不能帮助漕运。由此可见，治理河道必定要在整顿漕运之前进行。沿河船闸的开启和关闭的控制，疏通浚导的合宜，储蓄水流的便利，不可不讲画明白、切实研究。治理黄河的方法，只有遵循河流下泻不可违背的规律，才能遏止住那汹涌的波澜；只有把握泄洪不可违背的时机，才能安全开启和关闭船闸。疏导和筑堤防范，这是治河的基本办法。然而，如果不是约束清水来抵御黄水，又怎么能蓄积清水来治理黄水呢？况且根据不同时间来开启和关闭船闸，治理河道就是用来通畅漕运的；年年都是这样，大家都说能便利漕运。然后再了解地势，根据不同时间采取相应的措施。受到恩泽滋润而提高富裕的生活，都是由于这个缘故。皇上挂念百姓的痛苦，不惜动用国库的金钱来疏通漕运，为芸芸众生谋划的生活条件，非常周到齐全。眼看以柔制柔大获成功，水量丰沛而水道畅通，粮仓增加存储，用新米来祭祀祖先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治理胜过元气化育的功效，礼法形成大阅兵的规则，道德隆盛，民众都归向最高准则，恩泽施布给天下苍生，总括八方构成最高主宰，仁德圣明的事情都包括了，帝王的大道全具备了。这是多么盛大的景象啊！臣下我尤其祝愿皇上，永远保持最大的真诚，建立政教要有恒心；尽管道德已经醇美，但还要进一步保持奋发上进和小心谨慎；尽管军事力量已经强大，但还要进一步加强战

备；尽管天下已经太平，但还要加强治安防范；尽管仓库粮食已经充裕，但还要让天下永远保持富裕。这样，祥和之气到处流动，敦厚之风四处飘荡，光照宇宙，经天纬地，迎来上天赐福，致使民众幸福。多么壮观呀！宏大如天的伟大法规将光照人间，自古以来的最好制度将永远延续，我国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也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乔晋芳　殿试对策

乔晋芳(生卒年不详)　字春皋，一字心农，山西闻喜人。道光十五年(1835)探花。历任军机领班章京、湖南常德知府等职。咸丰二年(1852)七月，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将他调任长沙，协助防守长沙城。后因病离职归乡，不久病逝。

臣对：臣闻建极为绥猷之本，奋武为制治之经，严教典所以厚民生，慎漕务所以裕国用。稽诸载籍，《易》训健行，《诗》歌整旅，《书》有协中之治，《礼》详委积之经。茂矩崇规，秩然具备。自古帝王斟元御宇，锡极临宸，主术光昭，声灵丕振，敦淳风于浑穆，纳正贡以丰亨，皆本持盈保泰之心，以懋咸五登三之治。用是缉熙宥密，圣学精焉；果毅严威，武备裕焉；和亲康乐，民俗懋焉；墝埆茨梁，天庾充焉。上哉夐乎！所为规矩二仪、陶甄万类、熙春泳化、函夏归仁者，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建中立极，耀德修文，紹郅治于皇初，裕丰亨于帝籍，固已敬修可愿而纪律以娴，於变时雍而转运以利矣。乃圣怀冲挹，菲葑不遗，思崇久治之规，弥切谘询之念。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昭敬德、娴戎律、善民风、利转输之至计。如臣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辰，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以勉效夫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治法莫盛于唐虞，而因及夫惟危惟微、无怠无荒之旨。此设诚致行之首务也。臣谨按《吕氏春秋》引黄帝之书曰：大圜

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淮南子》引《尧戒》曰：日慎一日，人莫蹶于山而蹶于垤。心法开于十六字，帝学彰于十七铭。自古帝王未有不谨小慎微，允迪厥德，而能底久安长治之庥者。是故尧之钦明，舜之浚哲，禹汤之祗台、日跻，文武之小心、执竞，《诗》、《书》所载，条贯咸周，神圣用承，符契若合。而修己以敬一语，圣人所以阐帝王心法之原。盖非本基命宥密之意，凛自强不息之神，则必不能以天下之大，操之一心而洁齐以相见也。三代而下，汉之文、景，唐之文皇，足称极盛，而论者谓其始终不及古。非世变不同，且所尚各异耶！《大学》之教，统内圣外王而归于修身。真德秀作《大学衍义》，首论为学之要，次分格致、诚正、修身、齐家为四大纲，可与范祖禹之《帝学》并垂不朽。且夫保泰之道在于谨几，《论语》宽、信、敏、公之旨，有与经义相发明者。要之高谈名理则易长浮华，而清净非所以致治；衡石传餐则难言政体，而兢业乃所以揆几。固当辨于其微也。皇上乾惕为怀，勤求上理，端本则于亿万年，敕几康者一二日，综治统、道统而一以贯之，洵足远绍唐虞而独隆千古也。

制策又以《禹贡》揆文，必兼奋武，《周官》立政，特训诘戎，而因念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此尤制治保邦之要务也。臣按兵制肇自轩辕，至成周而大备。考《周礼》所载，有乡遂之兵，有邱甸之兵，其法因井田而制。居则为比闾族党，出则为伍两卒徒。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以时娴其步伐，习其威仪。养天下奇杰之气于礼义之中，使娴夫坐作进退之节。司马掌之，制诚善也。汉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诸制。其京师教试之法，则以秋后郊礼毕，会五营士；其州郡教试之法，则以八月会都试，课殿最。自光武罢州郡训练之役，而武备弛矣。唐府兵之制，训练最善。太宗亲临阅射于显德殿，赏劳有差。其后一变而为矿骑，再变而为方镇，三变而为禁军，而法制以坏。夫老羸之不汰，惰窳之不惩，器械之不精，卒伍之不协，非所以除戎器、备不虞之道也。宋沈括论九军阵法，臧景陈马射六事，明于谦创团练之议，王骥定练兵之制，诚能参酌用之，庶一兵得一兵之用也。圣朝大阅钜典，屡次举行，八旗劲旅因时肄习，以奋武卫，以昭戎经。凡在弁兵，孰不鼓舞奋兴，于以奠苞桑于永固也哉！

制策又以稂莠不去，嘉禾不生，而思所以严左道之诛，设奇邪之禁。此又化民成俗之至意也。臣考《周官》之制，比闾族党，保受相资。管仲治齐，郊内则轨里连乡，郊外则邑卒乡县，各司稽察，制綦善矣。汉有亭长、啬夫，唐有里正、坊正，皆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至近之事，古制犹存。夫民莫不自重其财，自爱其力，乃一惑于邪说，而利害俱有不顾。司守土之吏或姑息以养奸，或隐匿而不报。是岂安民之道哉？自古诘奸之法，保甲为善。然王安石行之于宋而民不胜其扰，王守仁行之于明而盗遂无所容。有治人，无治法，惟在人善用其法也。张敞之治京兆，尹翁归之治东海，桴鼓稀鸣，奸邪震慑。非发奸摘伏之得其道欤？是惟在牧民者振作之，化导之，愧厉之，为之谋其衣食，教以礼节，示以荣辱，镇化导于未萌，严惩创以已发，庶谩妄之言、奸宄之迹，皆有以戢其志而格其心，而终不至惑于邪说之为害也。圣朝典章明备，道一风同，众庶敦庞，清和咸理。凡在良有司莫不实力奉行，董劝维谨，庶经正民兴，而邪慝于以永消也。

制策又以漕运之法，由来已久，而勤求夫治河、治漕之策。臣惟《禹贡》州末系河，即后世漕运所由始。汉都关中，用萧何计户转漕，始有漕运之名。汉仰漕于山东，唐仰漕于江淮。而引渭穿渠之谋，见于武帝之世；溯河入渭之说，见于代宗之后。因时制宜，有不可以成法拘者矣。粮漕为天庾正供，挽粟飞刍，岁有常额。然逾江淮而达京师，南则患河身之高仰，清水不能敌黄；北则患河流之微弱，湖水不能济运。故治漕必以治河为先务，河不治则漕亦不治也。而顾治河之吏，知有河而不知有漕，修其堤防而忘其淤淀；治漕之吏，知有漕而不知有河，利其疏通而忘其泛溢。是在协力同心，无分畛域，庶启闭、疏浚、潴蓄之道，讲之有必亟也。皇上慎重粮储，剔清积弊，简大吏以专责成，通河道以利挽运。凡任漕、河之责者，有不筹划周详，经理妥协，以尽乃职哉！

若此者：慎德以图治，讲武以卫民，除莠以安良，治河以利运，洋洋乎畅九垓而溯八埏，盖亘古而立隆也。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懋日新不已之怀，成悠久无疆之治。德业修明，弥思奋庸于辰绩；戎威严肃，弥勤肄习于丁胥。不以比户可封，而稍弛训行之

准；不以仓储既裕，而稍忘豫大之模。执两用中，参三立极，仁风四溢，协气旁流，于以上迓蕃厘，下绥多祜，开骏发之远祥，固保定之鸿业。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高准则是安定天下的根本，加强军备是保障政治的常规；严格教化是用来使百姓生活幸福的，注重漕运是用来使国家富裕的。查考古籍，《周易》告诫说自强不息，《诗经》歌颂了整顿军队，《尚书》中有保持中道的施治原则，《周礼》详细记载了储备的方法。美好的制度、崇高的规矩，井井有条地具备了。自古以来的帝王斟酌初始，统治天下，赐给臣民最高准则而登临宝座。能使王道学说光照天下，名声威望振动四海；能够敦劝淳朴，使社会风气浑厚美好；能够收纳正额上供，使社会富裕繁荣。这都是本着持盈保泰的思想，来进一步实现超越五帝三王的大治局面。因此勤奋学习、日积月累，使帝王之学精通；果敢坚毅、严肃威风，使军事力量强大；和蔼慈祥、爱护民众，使民俗醇美；积蓄充裕、使京师的仓库堆满粮食。这是多么高尚、多么久远呀！之所以能效法天地，培育万物，像春风化育民众，使华夏归依仁德，就是靠的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建立中正之道，确立最高准则，尊崇道德，振兴文教，继承三皇时代那样的治绩，扩展五帝时代那样的富足景象。尽管做到了"敬德"修养已经如愿，军队纪律已经严明，风俗已经变得醇美，漕运已经便利；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有一德可取也不遗漏；向往长治久安的规模，更加想要迫切咨询。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发扬"敬德"、训练军队、改善民风、方便漕运的最高计划来策问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哪里能知道国家大政？但是，在这对答开始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又怎敢不努力陈述平时所诵读、所学习的东西，以竭力仿效向阳的葵花，向陛下献上一片微小的诚心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治理天下的办法没有比唐虞更好的

了,因而推及到了“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和“不要怠惰、不要荒废”这一主旨。这是建立诚意以规范行为的首要任务。臣下我仔细查考:《吕氏春秋》引用黄帝的书说:上天的规矩在上面,大地的规矩在下面;只要你能效法它们,那就能成为民众的父母。《淮南子》引用《尧戒》说:要一天比一天更小心。人不会被高山绊倒,但却能被土块绊倒。传心养性的方法是从“十六字”开始的,帝王之学是从周武王“十七铭”彰显的。自古帝王没有不谨小慎微、不真诚地履行德行而能够达到久安长治的美好境界的。因此唐尧的恭敬明智,虞舜的深邃聪明,大禹和商汤王的敬重以道德为先、道德天天升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谨小慎微、保持强盛,《诗经》和《尚书》的记载,条理都很周详;神圣的人继承这些德行,就像符契一样、十分吻合。“用虔敬搞好自身修养”这句话,是圣人用来阐明帝王心法的本原的。因为如果不是本着诚敬、宽仁、宁静之心,保持着自强不息的精神,那就必定不能在自己一人的胸中容纳下天下的广大,而以操守清白、见贤思齐的态度来与天下人相见了。三代以后,汉朝的文帝和景帝,唐朝的太宗,他们的统治是能被称为最鼎盛的了,可议论的人却说他们始终赶不上古代。这还不是时代变化不同,而且所崇尚的东西也各不相同吗?《大学》的教诲,统括“内圣外王”的方法归结到“修身”上。真德秀撰写《大学衍义》,首先论述作学问的要点,其次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为四大纲。它可以与范祖禹的《帝学》一书一道永垂不朽了。况且,保持天下太平的道理在于谨小慎微,《论语》“宽”、“信”、“敏”、“公”的主旨,有和经文原义互相阐明的东西。总之,高谈名理就容易滋长浮华的风气,清净无为并不能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废寝忘食、埋头处理大量公文是很难把握政治原则的,而兢兢业业是用来辨明事物苗头的;确实应在它们的微小区别上加以辨别。皇上日夜保持警惕,勤勤恳恳地谋求治理天下的最好办法;为亿万年端正根本、确立原则,天天谨慎对待天命、考虑天下安危;综合“治统”、“道统”而从头到尾地加以贯通,确实足以继承远古的唐尧虞舜、独自超越千古了。

制策又认为《禹贡》说设置文教官员一定要同时发扬武备,《周

官》在说到建立政体时特别告诫要整顿军事，因而想到兵可以百年不用，不可以一日无备的问题。这尤其是巩固江山、保卫国家的首要任务。臣下我认为：军事制度从轩辕黄帝时候开始，到周朝就十分完备了。查考《周礼》的记载，当时有“乡遂”之兵，有“邱甸”之兵，这种编制方法是根据井田制度而制定的。在家时，大家就是同“比”、同“闾”、同“族”、同“党”的乡亲；征战时，大家就是同“伍”、同“两”、同“卒”的战士；春夏秋冬的狩猎，都是按时训练士兵的步伐，培养士兵的威仪的；在礼义之中培养天下英雄的气质，使他们娴熟坐下、起立、前进、后退的要求。这些由司马主管，制度确实很好。汉朝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诸种制度。当时京城的教试制度，是在秋后郊礼完毕，聚集五营士兵进行。当时州郡的教试制度，是在八月聚集，进行“都试”，测试优劣。自从汉光武帝取消了州郡训练的事务后，武备就松弛了。唐朝“府兵”制度，训练最精。唐太宗亲临显德殿检阅射箭，分等级进行奖赏。其后，“府兵”一变而变成“矿骑”，再变而变为藩镇，三变而变成了禁军，然而法制已经被破坏了。老弱的士兵不淘汰，懒惰粗劣的士兵不惩处，器械不精良，队伍不协调，决不是能制止战争、防备突发事变的办法。宋朝的沈括论述九军阵法，臧景陈述骑马射箭的六件事情，明朝的于谦创办团练的建议，王骥制定的练兵办法，真能参考斟酌使用，那就可以达到使一名士兵能顶一名士兵用场的目的了。圣朝大规模军事演习的盛典，多次举行；八旗劲旅按时训练演习，以振奋军队、显示军威。凡是在军队中的官兵，有谁不感到鼓舞和兴奋呢？凭借这一点，我们国家的根基就将永远坚如磐石！

制策又认为杂草不除，好苗就不能生长，因而考虑要严惩歪门邪道，要设置对邪恶行径的禁令。这又是教育百姓、养成好风俗的深远用意。臣下我考察：《周礼》的制度规定：“比”、“闾”、“族”、“党”，相互维系。管仲治理齐国，在郊内则实行“轨里连乡”的制度，在郊外则实行“邑卒乡县”的制度；各自负责稽察，制度极其好。汉朝有“亭长”、“啬夫”，唐朝有“里正”、“坊正”。它们都是用里巷互相熟悉的人，稽查可以听到、可以看到的事情，还保存着古代制度。老百姓没有不看

重自己财物、不爱惜自身的，可一旦被邪说迷惑，就会产生出利害全都不顾的人。地方官吏有的姑息养奸，有的隐匿不报。这难道是安定民众的办法吗？从古以来，惩处奸恶的制度，保甲是最好的。然而王安石在宋朝实行，百姓却忍受不了它的搔扰；王守仁在明朝实行，盗贼却没有地方可以藏身。有能施行好制度的人，但却没有自动就发挥作用的好制度；要有好效果，那得取决于人们善于运用制度。张敞治理京城，尹翁归治理东海郡，战鼓很少敲响，奸恶已被震慑。他们揭发奸恶，抓捕隐藏的坏人，不是非常得法吗？只有管理百姓的人振作百姓，开导百姓，使他们惭愧，使他们振奋，为他们谋求衣食，教导他们懂礼节，告诉他们荣辱。在事情还没发生时先加以教导，在事变发生后严厉惩罚，才能使人们在欺骗虚妄的言谈、邪恶作乱的事情的面前，都会打消作乱的念头，改变邪恶的心思，而最终不至于被邪说危害。圣朝制度明白而齐全，道德统一、风气相同；所有百姓敦朴厚实，天下大治；凡是管理民众的部门，没有不下大力气来奉行的。只要小心督察、认真劝勉，那么就能做到根本端正、百姓向善，使邪恶永远消失。

制策又认为漕运制度由来已久，因而努力寻求治理河道、整顿漕运的办法。臣下我认为：《禹贡》在九州后所记载的河道情况，这就是后代漕运的开始。汉朝定都关中，采用萧何的办法按照户口用船运输粮食，才有漕运的名称。汉朝依赖山东的漕运，唐朝依赖江淮的漕运。引导渭水穿通渠道的计谋，出现在汉武帝的时代；逆黄河而上进入渭河的说法，出现在唐代宗以后。按不同时间、采取与之适应的措施，具有不能死守已有法规的了。粮漕是京师仓库正额上供，用车船快速运输粮草，每年都有规定的数额。然而越过江淮而抵达京城，南边就担心河床高出，清水不能抵挡黄水；北边就担心河水流量微弱，洪泽湖水不能帮助漕运。所以治理漕运一定要把治理河道作为首要任务，河道不能治理，漕运也不能得到整治。然而治河的官吏，知道有河道却不知道有漕运，修筑堤防却忘了河道的淤积；而整治漕运的官吏，知道有漕运却不知道有河道，利用它的通畅却忘记了它的泛滥。这就重在同心协力，不要划分部门界限。只有这样，船闸开启和

关闭、河道疏通和浚导、水量蓄积的办法，才能迅速讲求。皇上注重粮食储备，剔除积累的弊病；选拔重要官员来专门负责督促完成任务，疏通河道以利于漕运。凡是负有漕运、河道责任的官吏，有谁不周密筹划、经办妥当以尽到职责的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注重德行以图谋治理，讲求军事来保卫百姓，除去坏人以安定良民，治理河道来利于漕运。真是盛大呀！直上九重天，延布到八方过际，超越千古而达到最高的境界。臣下我尤其祝愿皇上，天下太平更求太平，天下安定更求安定；努力扩大一天比一天更有上进的胸怀，实现永久无疆的统治。尽管道德美好高尚，但还要进一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尽管军队威风严整，但还要努力训练壮丁。不能因为已经达到比户可封的美好局面而稍稍放松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不能因为仓库储蓄已经充裕而稍稍忘记使社会富足的更高规模。找准事物的两极而采用“中道”，与天地并列而确立最高准则；让仁爱之风四方吹送，让祥和之气到处飘荡；从而对上迎接苍天降福，对下赐给民众幸福，开启深谋大智所呈现的久远吉祥，巩固上天所保定的宏大帝业。这样，我国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可以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倩描　王大奇译〕